

# 20世纪俄罗斯

---

##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四)

#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 РОССИЯ XX ВЕК

###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Данилов В. П., Ватлин А. Ю., Кошелева Л. П., Роговая Л. А., Хлевнюк О.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崔继新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马杰 责任校对:阎宓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四)/[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赵永穆 郑异凡 李铁军 徐燕霞 译 朱文佩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260-0

I. 新… II. ①雅… ②赵…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607 号

###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四)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赵永穆 郑异凡 李铁军 徐燕霞 译 朱文佩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5

字数:92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260-0 定价:11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260-0



9 787010 062600 >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B. П. 科兹洛夫 B. A. 马尔丁诺夫  
C. B. 米罗年科 B. П. 纳乌莫夫 E. M. 普里马科夫  
A. H. 萨哈罗夫 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H. Г. 托米林娜  
C. A. 菲拉托夫 A. O. 丘巴良 A. A. 雅科夫列夫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赵永穆 郑异凡 李铁军 徐燕霞 译  
朱文佩 校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     |     |     |     |     |     |
|-----|-----|-----|-----|-----|-----|
| 王钊贤 | 王钢华 | 乌传袞 | 冯育民 | 李方仲 | 李京洲 |
| 李慎明 | 李静杰 | 汪 宁 | 郇中建 | 张达楠 | 赵永穆 |
| 赵仲元 | 赵国顺 | 徐 葵 | 黄书元 | 鲁 桓 | 戴秉国 |
| 魏 华 | 臧乐安 |     |     |     |     |

## 卷首语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内容贯穿俄罗斯20世纪特别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

2001年春，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同志向我建议翻译出版此书，我表示赞成，并担任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六载寒暑一挥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及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同志，为本书的按期译成出版，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的译者，多为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正是他们经年的认真严谨工作，才使我们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内容。在此，我对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崇高的敬意！

苏联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是人类第一次探索、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人民国家的历史；是人类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诗。人类这部遗产必须记取，并深入反复研究。

十月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响亮的一声号角，洞开了人类的眼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探索是充满曲折、艰难、复杂，甚至严重的挫折或一时的失败。苏联在建立后69年解体了，倒下去了，但历史永存、精神永存！道不亡，理不失，历史将按自己的规律、道路走下去。潺潺细流，终将千回万转夺路归大海，这是自然律！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历史资料，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拔高一寸，不贬低一分，不涂抹一笔，不杜撰一字。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把苏联史作为当代史来研究。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其经典著作。这些史学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传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脉络渊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发展的伟大探索。在这一历史探索过程中,汲取人类的历史遗产,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也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善学善为者史存焉!

史料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础。这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文献集,将为我国对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的研究提供大量新鲜史料。但是,任何史料都会因编者的立场观点而存在局限性和倾向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要对之加以分析和鉴别。

我建议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斯为馨香以祝之!



2007年9月30日



## 序

### 1929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

1929年冬春之际,联共(布)领导层内的冲突达到了顶点。“右倾分子”放弃了修改斯大林的多数派执行的方针的斗争,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对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初党内斗争情况的描述基本上是根据四月全会的个别参加者已经发表的讲话<sup>1</sup>。斯大林的讲话只是在他去世前夕才发表,占去他的《全集》第12卷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sup>2</sup>。速记记录中删去了斯大林对全会参加者插话的反应,因为它破坏了“右倾分子”遭到一致谴责的画面。布哈林的发言只是在为他恢复名誉之后,在1989年才得以发表,而且被删去了谈共产国际问题的部分<sup>3</sup>。

1928年中央十一月全会只是在表面上缓和了斯大林集团同“右倾分子”的矛盾。同年底斯大林又采取了迂回行动,避开了政治局内的冲突,却安排在委托给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负责的部门中对他们的攻击。

1929年四月全会上曾经宣布说,布哈林从休假回去后就忽视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这话不错,但是有一个例外,即1928年12月7日,政治局同共产国际的“俄国代表团”领导曾经有过一次非正式会见。这次会见的细节我们是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瑞士人洪别尔-德罗的回忆录中知道的。那天晚上布哈林和李可夫到柳克斯旅馆去找他,然后他们一起去了大剧院。剧院里正在上演歌剧《萨特阔》,但主要的活动发生在政府包厢里。洪别尔-德罗留在走廊里,他明白,如果布哈林在同政治局多数的争论中需要补充论据,就会来叫他<sup>4</sup>。

从参加会见的皮亚特尼茨基写的记录看,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之外,出席会见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

托夫、洛佐夫斯基、希塔罗夫、古谢夫和库西宁<sup>5</sup>。通过的决议批准了对德国共产党内“右倾分子”的谴责,同时向台尔曼派的领导指出了在和“右倾分子”的斗争中所犯的错误的,并确定了抑制德共内的调和分子的方针<sup>6</sup>。公开的冲突又一次暂时被推迟了。不过这次妥协也注定不会太久——12月11日皮亚特尼茨基通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说,“莫洛托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至今没有把关于德共党内右派的公开信起草出来”,他建议使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准备的文件<sup>7</sup>。12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讨论德共党内“右倾”的会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出席了会议。在布哈林缺席的情况下,他的战友克拉拉·蔡特金和洪别尔-德罗试图坚持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紧急全会,但处境孤立。斯大林粗暴地指责洪别尔-德罗,称他是“心怀叵测的记者,为了替右派辩护,不惜诽谤共产国际”<sup>8</sup>。主席团的决议为台尔曼排除德共领导内所有不赞成他的政治路线的人开了绿灯。这实际上是用德国模式为日后联共(布)内粉碎“右派”做了一次试验。

斯大林马不停蹄地在各条战线上发动了攻势。12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托姆斯基提出了更换领导的问题,重提自己辞职的想法。托姆斯基在四月全会上发言时,详细地讲了代表大会上他受到大会党团的压力,讲到莫洛托夫“突然”提议让卡冈诺维奇参加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等等。工会代表大会闭幕前夕,托姆斯基向政治局提出辞职的请求,但遭到拒绝。

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失去了实际领导的可能性,于是拒绝参与委托给他们负责的部门的工作。他们坚持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全会,以便向它陈述自己的观点。用托姆斯基的话来说,“两度推迟全会的不是我们”。可是斯大林并不急于开会,他要等待有利的时机来进行政治局内的决战。1929年1月10日,政治局再次要求托姆斯基回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去工作。作为回答,托姆斯基于1月14日给全体中央委员送去一份声明。他详细介绍了工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并坚持自己的辞职(见补充材料4)。布哈林也准备了类似的文件,不过在1月30日才交到中央委员会(见补充材料5)。据认为,这次拖延不仅是由于布哈林历来不愿参与权力之争,而且因为他要在1月21日做《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他于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做了报告,与会的有高层领导,包括政治局委员。此外,报告刊登在所有的中央报纸上。布哈林首先从同农民的关系的角度谈了列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和意义。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的领导所执行的方针越来越背离“列宁

的遗嘱”<sup>9</sup>。布哈林最后一次公开做的正式报告,其社会意义在于国内形势证实了“右倾分子”忧心忡忡的警告。布哈林实际上公开宣布了党内斗争的内容,而这正是斯大林的领导极力想要掩盖的。

粮食采购再次失败了,南方的歉收使局势更加严重。农民不愿意按压低了的价格出卖粮食,于是政府又一次采取了非常措施。城市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中断;人们整夜排队;罢工事件日益频繁。为了避免事态失控,地方政府自发地实行了配给制。1929年2月14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在全苏联推行了配给制<sup>10</sup>。

联共(布)中央收到的材料表明,被制度认为是自己的社会支柱的工人中不满情绪在增长。受困难的影响,党组织内也出现了动荡。1929年初,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主任巡视员到了乌拉尔的下塔吉尔区。他报告说:“支部里都认为,右倾在于他们要求给工人供应充足的面包。”《乌拉尔工人报》的记者报道了工人的看法:“应当来一次新的革命,”“何必既折磨了农民,又折磨了工人?”“我们非常清楚,李可夫同志、加里宁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是站在农民这边的,为什么不让他们讲话呢?”<sup>11</sup>。

社会—政治问题的尖锐化当然并不能保证“右倾分子”取得胜利,但是却使政治局内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的一张传单,上面登载着布哈林同加米涅夫1928年7月11日的谈话(见补充材料1),——这对斯大林及其同伙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半年前的这件事把就各种日常实际问题进行的争论推到次要地位。政治局内的斗争具有了另一种性质和另一个方向。

迫使布哈林走出同一个原反对派分子接触这一步的原因,很难从政治逻辑方面加以说明——这很可能是绝望的一步棋,因为他力求不使“右派”昨天的敌人和今天的敌人组成统一战线。加米涅夫当即做了谈话(实际上是布哈林的独白)记录并送给了自己的同伙、当时在卡卢加的季诺维也夫。后者的反应是:政治局出现了分裂,眼下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要等待斯大林派人来把我们召回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合作(补充材料18,季诺维也夫1928年7月13日的信)。

托洛茨基也持同样的立场,他得到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见记录的副本大约是在11月<sup>12</sup>。这份记录最终落到托洛茨基手中是经过加米涅夫的秘书施瓦尔贝。施瓦尔贝把这份材料给了自己的兄弟,他兄弟又给了托洛茨基分子尤戈夫。尤戈夫立即安排把材料转送到阿拉木图。公布这份笔记的意图似乎在于彻底打

消斯大林分子同“右倾分子”和解的念头。托洛茨基分子用《党被蒙上眼睛带向无底深渊》为名发了一份传单,公布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话的记录。传单的注释积极地评价了联共(布)业已开始的向左的转变。

这里叙述的“托洛茨基分子传单”的出笼经过得自1930年7月阿格拉诺夫对政治保卫总局在押犯审讯的供词(见补充材料16及17),以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恢复党籍的“奖励”后的信件(见补充材料2、13及18)。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指出的“传单”内容上的“怪事”和下述事实:任何地方都不曾散发这份传单,但它却在1929年1月23日,即在布哈林做《列宁的政治遗嘱》报告后的第三天,就到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手里(见补充材料5及6)。

“托洛茨基分子传单”的出现使斯大林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因布哈林的不忠而受了委屈的样子,指责“右倾分子”违反了党纪并转入决定性的进攻。1月23日,奥尔忠尼启则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审问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承认了7月间同布哈林谈话的事实并确认了他的笔记的真实性。稍后,参加了7月11日会见的索柯里尼柯夫也做了类似的声明。1月24日以后政治局会议上两度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利用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退席以示抗议的机会,通过了1月30日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实际上这就类似于同反对派斗争时期用过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月30日会议的速记记录用专门的简报——所谓“红皮书”——分送给了党的高级干部<sup>13</sup>。

1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详细介绍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强调他们秘密筹组反对派。布哈林承认同加米涅夫见面的事实,也承认笔记中叙述的某些会见情节属实。但是,布哈林说,就整体而言“这份文件是不正确的和虚假的”。1月30日,他不是局限于替自己辩护,而是发表了一篇详细的声明(见补充材料5)。布哈林声明的核心是坚决反对破坏“集体领导”的党内体制:制定党的路线不是根据正式的文件,而是依据安插“政治委员”的斯大林的书记处的指示;结果是“降低了政治局的作用”和共产国际中出现的“叫喊和强制”。在经济困难达到顶点、粮食匮乏、出现外国武装干涉危险时,国家领导应当表现出“最大限度的深思熟虑”,然而却“用党的拳头替代了思维的功能”。布哈林也和托姆斯基一样,声称看不出“长期战争”和“无休无止的吵闹”有什么意思,所以再度请求辞职。

但是布哈林1月30日的声明和后来2月9日“三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声明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政治局内或共产国际内的关系,也不是斯

大林式的领导方法本身。布哈林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反对它的实质。声明说,这个政策的核心是斯大林1928年7月在中央全会上宣布的“贡赋的口号”<sup>\*</sup>。布哈林把这个口号的含义解释为“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这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根据的。的确,从独立的生产者手中用强制(直至使用武力)收购和课以重税的办法拿走产品,——对这种制度不可能有别的称谓。布哈林断言:“贡赋是和社会主义建设毫无共同之处的范畴。”(见补充材料5)这个原则性的评价在三人的声明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贡赋是剥削者经济的范畴。如果农民支付贡赋,这就是说,农民是进贡者,是被剥削和受压迫的人,就是说,从国家的观点来看,他不是公民,而是臣民。”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不仅“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同于剥削者类型的关系,而且采取了最残酷的剥削方式(‘贡赋’)”。(见补充材料10)

布哈林和他的拥护者懂得,在工业化时期,农民必然要多付出一些来支持工业——“这可能还要继续相当长的时间,不过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迅速消除这种状况”<sup>14</sup>。三人声明中提到列宁把农村为城市承受的负担界定为应当归还的“借款”、“贷款”<sup>15</sup>,坚决否定了贡赋制度。他们问道:“农民对工业建设的共同参与难道可以用贡赋来表示吗?”他们回答说:“这是胡说八道,文不对题,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既然把中农看成进贡者,那还能搞好同他的联盟吗?……既然从贡赋的角度看问题,那当然无需注意课税的分寸,以及对农村的供应等等。”声明说,贡赋的口号是要使非常措施“在意识形态上永久化”。

三人声明对斯大林的农民政策的总评价是毫不妥协的。他们断言,“贡赋”口号的实质“……在于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关系做了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评定”,将导致危害极大的后果。他们的主要结论是:“执行‘贡赋’和‘向小农和小小农生产进攻’的方针,这种生产就不能健康发展,可是那样一来就不会有粮食,也不会有工农联盟了。”(补充材料10)到1929年初,前者和后者都成了事实。

---

\* 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取消了非常措施,肯定了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而斯大林却又在会上宣布向农民征收“贡赋”的口号值得特别注意。在布哈林发言之前,斯大林做了主要发言,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贡赋”的暗示,相反,对于在新的粮食采购活动中取消非常措施表示十分同意。必须向农民征收“贡赋”来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斯大林是在全会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宣布的(参见本书第2卷)。在取消非常措施的情况下,说应当向农民征收“某种类似贡赋的东西”可以被理解为只是斯大林的一种习惯用语。但是1928年中央十一月全会后立即恢复,而且明显地逐步加强了非常措施,迫使“右倾分子”声明自己对“贡赋口号”的态度。

1月30日和2月9日的声明都谈到“实际上消灭了中央的集体领导”，“党的官僚主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际上剥夺了党章赋予党员的党的权利”，谈到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的“无边权力”，列宁认为这是最大的危险，而如今它却“变得更加无边”。声明警告说，存在着把斯大林的立场同中央和全党的立场混为一谈的危险。三人声明中说，由斯大林亲自起草并提交2月9日会议的、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草案“一再把斯大林和党放在等值的地位上，甚至直接用中央委员会代替斯大林同志，也用斯大林同志代替中央委员会”。（补充材料5和10）

最后，两个声明都像1928年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一样，要求辞职或是调任其他工作。这不是在统治阶层和集团中常见的那种耍手腕或是捉迷藏游戏。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坚决要求辞职是，第一，抗议“恶意攻击，败坏名誉，组织包围”的完全自然的形式，其次，捍卫自己立场的最后手段。然而斯大林集团还没有下定决心让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辞职，因为距离处置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物集团太近了，不便处理另一个集团。还需要使党的基本领导层相信布哈林的“反党行为”，粉碎最高领导层中“右倾分子”的反抗。

本卷公布的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材料表明，这是怎样做的。斯大林的讲话特别值得注意，它是一份十分粗暴的起诉状。“招摇撞骗”、“卑鄙”、“拙劣的诽谤”一类的词汇同“布哈林发疯了”等断言交织在一起。（补充材料7）难怪它在收入领袖的《全集》时作了彻底的修改<sup>16</sup>。讲话的基调是“右倾分子”对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感到高兴，想利用它来撤换党的领导。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决议的起草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其成员有：奥尔忠尼启则（组长）、基洛夫、科罗特科夫、鲁祖塔克、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对布哈林做了说服工作，让他参加这个小组。他的反应（“如果你们像当年对待托洛茨基那样提出问题，那好吧，我参加小组”）表明，他记得同以前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伎俩，也很明白现在这套伎俩要用来对付他本人了。最后，斯大林坚持要把自己最亲密的伙伴莫洛托夫拉进委员会。

布哈林并没有参加关于加米涅夫同布哈林会见一事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29年2月6日下午3点在斯大林办公室举行了委员会的决定性会议<sup>17</sup>。会上向布哈林提出了貌似温和的和解方案<sup>18</sup>。这份文件建议，如果布哈林承认错误，放弃1月30日的声明，停止对《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抵制，回到“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那他和加米涅夫的这段事情就“一笔勾销”。这仿佛是要让布哈林本人来选择是战还是和，是同意又一次讲和，或是在政治局多数规定的阵地上

接受挑战。斯大林这次出人意料的“退却”原因何在呢？可能只是为了储备一份能证明斯大林喜爱和平的文件。决非偶然的是：这个方案在四月全会上曾经两次被全文宣读，而且是在两个主要起诉人，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斯大林，的发言中。

也不能排除斯大林试图把布哈林同他的伙伴们脱开，利用他同加米涅夫谈判的事实“挤压”他。但是斯大林的打算没有成功——布哈林拒绝停止对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抵制，却提出了他自己的和解幻想：给他四个月的考验期，其间他将只研究理论问题。显然，在这个时期内斯大林派应当表现出“同心协力工作”的意愿。后来，在准备四月全会的发言时，布哈林写道：“我不会为了政治局中的座位而出卖自己的信仰。”<sup>19</sup>

布哈林拒绝放弃1月30日的声明，拒绝脱离自己的同伴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实行非和解方案。随即出现了重大而严厉的另一个方案，不是和解方案，而是斥责“右倾分子”的方案。2月6日奥尔忠尼启则把这两份文件分送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并注明布哈林不同意和解。和解方案不同的是“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草案指向的不是布哈林一个人，而是政治局里的所有三个“右倾分子”。“右倾分子”感到这份文件是斯大林的主意，称它为“歼灭战文件”。受到指责的不仅是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会见，而且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向党隐瞒了这件事情。列举了“替联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分子作外交辩护”的种种事情，但其中有许多（同意弗鲁姆金的信、反对将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集团开除出德共）是十分可疑的。

决议的起草者们使出了党内斗争的惯用手法，抬出了足以“摧毁”论敌的列宁的文字。针对布哈林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论点，决议草案宣称：“右倾分子”攻击党的基础，宣传“由各个封建王国，例如《真理报》王国、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王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王国、交通人民委员部王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王国等等堆积起来的不定型的東西”。这些论据对习惯于硬性的垂直联系的党的机关产生了很大影响。斯大林及其集团用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来掩盖自己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同农民的结盟，却反而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脱离了党的路线，而“爬”向右边。

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在四月全会的讲台上谎称“右倾分子”以宣战回答了和解的建议。其实，他们2月9日的联合声明（补充材料10）是在他们看到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详细的决议草案之后才出现的，这份草案使人毫不怀疑：镇压已经开始，它的第一步就是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至于它的含义和

做法,只消看左翼反对派的经验就明白了。

从一些间接资料可以看出,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讨论并没有使力量配置发生什么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预示了1929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进程。代表“右倾分子”发言的是李可夫。他集中谈了同农民“破裂”的问题,以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中的不健康制度。斯大林本人又一次回答了反对派(补充材料12),他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声明“基本上是反对中央路线的纲领”,而且重申他们对日益扩大的危机感到高兴,想借此确立自己的方针。不过这一次的主要结论却是针对个人的:“所以,问题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把斯大林排除出政治局”。斯大林在结束讲话时,答应在即将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辞职。斯大林的这个声明只不过是玩弄手腕,目的在于把自己打扮成“右倾分子”横行霸道的受害者。这种狡猾手段是斯大林棋局的组成部分,指望吸引并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同“右倾分子”斗争的结局。斯大林为了把党的最高级领导人拴在自己身边,使用了各种方法——多年合作和私交(如莫洛托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政治局其他委员之间因为职务关系而发生的冲突(例如,李可夫同伏罗希洛夫由于军事预算而产生的不和)等等。可以有根据地认为,斯大林使用了讹诈手段,迫使一些政治局委员就范。

从1929年2月起,政治局内出现分裂的信息就日益频繁地传到各地,搅动了党员群众。斯大林派的成员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积极活动,大肆渲染“右倾危险”。在莫洛托夫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则安排各地做出相应的决议,准备在四月全会上加以利用。“基层”一如既往,走在“上层”前面。联共(布)维堡区组织要求清除不单是“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还有“动摇分子和犹豫分子”。而且这些行动和声明并不都是中央机关采取组织措施的结果。斯大林不仅制造,而且能够把握党的官员和党员积极分子的情绪。这些人仍旧按照内战时期那种绝对命令的方式思维:富农是敌人,必须彻底打倒。对于必须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解各不相同:一些人建议对现代化的前景做谨慎的探索,另一些人则回到了“最后的决战”。在布哈林准备四月全会发言的草稿里保留着这样一句话:“多数人的策略方针是‘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完了,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和米高扬的)新经济政策。”<sup>20</sup>

在苏联加紧迫害“右倾分子”的同时,在国际上也没有放松。和德共同时,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共产党里也发现了“右倾”,后来这份名单还要延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开除外国共产党员中的“右倾分子”,而联共



(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则在清除它的机构中布哈林的拥护者。

离开了共产国际和工会的战线之后，“右倾分子”在四月全会前夕，在政治局内进行了后卫战。他们拒绝支持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3月26日起草的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答复，因为它会助长对“右倾”的新议论。由此产生了政治局4月1日的信中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错误的新“解释”（补充材料13、14）。4月10日，李可夫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送去了供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审批的五年计划提纲草案，坚持各经济部门的增长要保持平衡，规范市场关系并放弃非常措施。斯大林派的立场由米高扬负责陈述，他没有忘记1928年七月全会前夕他提出的粮食采购决议草案被“右倾分子”彻底修改的难堪。<sup>21</sup>

苏联政府主席及其政治伙伴力求保留新经济政策的框架，米高扬却把这种努力说成是回到1921年去，是替“资本主义市场”翻案。他说，提纲草案把经济的具体情况描绘得一团漆黑，说提纲没有讲到交通、合作化、培养新干部等等问题。米高扬声称，李可夫的出发点是布哈林“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sup>22</sup>。作为回答，布哈林4月12日给米高扬送去了一张尖刻的纸条：“既然你在对李可夫同志的五年计划提纲的‘评论’中说到布哈林‘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给这些词加了引号，我请你回答，你是从我的哪本著作中引用的这些词。我认为，你知道各种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也知道文学—政治礼节的起码规则。”<sup>23</sup>然而问题早已不是“文学—政治礼节”了。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政治局拥有多数，他们准备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提纲。在政治局4月15日审批提纲时，“右倾分子”投了弃权票。

第二天开幕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从讨论党内状况问题开始工作。雅罗斯拉夫斯基虽然有相当明显的倾向性，但是用词较为缓和，介绍了实际情况。不过他的“客观性”由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露骨的攻击性发言做了弥补。全会的导演工作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派的手中，和“右倾分子”一致的中央委员为数不多，他们的发言被淹没在“总路线”的拥护者无休无止的声浪中。结果是全会拖得很长。甚至在同“联合反对派”斗争时期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事——用了8天时间，开了13次会讨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的问题。

大部分人的指控可以归结为：“右倾分子”看不见国内阶级力量的新变化，看不见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日渐增长和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必要性。每篇发言都根据布哈林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著名言论，喋喋不休地企图证明他们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的。在对党内情况的估计方面，给“右倾分子”扣上

了转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企图挑唆党去反对斯大林同志”等等。出席全会的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宣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向困难投降,谴责他们的“幕后谈话”和“预言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在须要提出组织结论的地方,发言者至少要求把“右倾分子”逐出政治局,以后再酌情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例如波斯特舍夫的发言)。

在被指控的人中,首先获得发言机会的是托姆斯基。他没有正面谈论“右倾分子”的纲领,而着重讲了败坏声誉的一些事实——“恶意攻击”和干部撤换。这种事情多得很:有92个在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支持他、投票反对选举卡冈诺维奇的人或者被撤了职,或者被迫表示忏悔。托姆斯基描绘的人事压力和思想压力是无须争议的,但是全会的参加者中,多数人了解事情的经过,甚至参与其中。呼吁表示常见的同情或者党内团结未必能打动他们:“同志们,如果这种肆无忌惮的迫害继续下去,真是叫人活不下去了。”

布哈林的发言把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同近年来斯大林的非常措施加以对比。这是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公开陈述自己对国内和党内发生的事情的观点的最后机会,——这种情况使布哈林的发言带着特殊的感情和真诚。他首先说明了作为国家“严肃而长期”采用的政策,以及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可能性。从斯大林开始“自上而下的革命”以来,布哈林曾不止一次地谈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sup>24</sup>。

布哈林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对市场的意义做了原则性的概括:“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国还将存在许许多多。我甚至可以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将长期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是决定性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市场联系实现的,是通过城乡之间市场的商品流通实现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经济角色应当通过市场关系,也就是通过发展商品流通来实现。”

布哈林的主要意思在于否定作为从农村榨取“贡赋”制度的“非常措施”,否定在城乡关系中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和“非常措施”相对立,他提出了在提高农业和“通过市场关系”解决发展方向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商品流通”的纲领。

为此布哈林讲到1927年对“联合反对派”纲领的批判,讲到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驳了向富裕农民强制借贷1.5亿普特粮食的思想,因为,按他们当时的说法,这是“搞垮新经济政策”,所以出这种主意的人是

## 目 录

|   |       |
|---|-------|
| 序 1929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br>..... B. П. 丹尼洛夫 A. Ю. 瓦特林 O. B. 赫列夫纽克(1) | (1)   |
| <b>1929 年 4 月 16—23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b>                                 |       |
| 联席全会 速记报告 .....   | (1)   |
| 第一次会议 .....   | (4)   |
| 第二次会议 .....   | (40)  |
| 第三次会议 .....   | (88)  |
| 第四次会议 .....   | (127) |
| 第五次会议 .....   | (180) |
| 第六次会议 .....   | (224) |
| 第七次会议 .....   | (275) |
| 第八次会议 .....   | (322) |
| 第九次会议 .....   | (361) |
| 第十次会议 .....   | (401) |
| 第十一次会议 .....  | (440) |
| 第十二次会议 .....  | (492) |
| 第十三次会议 .....  | (554) |
| 附 件 .....   | (585) |
| 1. 1929 年 4 月 16—23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br>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记录 .....                   | (585) |

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  
党内事件的决议 1929年4月23日通过…………… (589)
  3. 1929年2月9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 经1929年4月23日联  
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同意…………… (595)
  4.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  
收到的信件和声明…………… (605)
- 补充材料…………… (616)
1. 托洛茨基分子于1929年1月公布并在各工厂散发的  
加米涅夫同志1928年7月11日和12日的笔记…………… (616)
  2. 加米涅夫同志1929年1月27日致奥尔忠尼启则  
同志的信…………… (624)
  3.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1929年1月28日致奥尔忠尼  
启则同志的信…………… (626)
  4. М. П. 托姆斯基1929年1月14日的声明…………… (628)
  5. 布哈林同志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 (633)
  6.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640)
  7. И. В. 斯大林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647)
  8.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665)
  9. Е. Ф. 罗兹米罗维奇1929年1月31日的信…………… (670)
  10. Н. И. 布哈林、А. И. 李可夫、М. П. 托姆斯基  
1929年2月9日的声明…………… (672)
  11.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1929年2月9日在政治局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691)
  12. И. В. 斯大林1929年2月9日在政治局和中央

---

|  |       |
|--|-------|
| 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   | (696) |
| 13. 政治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1929 年 3 月 14 日<br>来信的答复草案 .....                              | (707) |
| 14. 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 1929 年 3 月 27—29 日的<br>声明和政治局对声明的答复 .....                       | (713) |
| 15. 斯大林 1929 年 4 月 22 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br>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br>(未经修订) .....       | (719) |
| 16. 加米涅夫同志的秘书菲利普·彼得罗维奇·施瓦尔贝<br>1930 年 6 月 30 日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科科长做的<br>供词(速记记录) ..... | (766) |
| 17. 关押在政治犯隔离室、日前声明与托洛茨基主义断绝关系的<br>全苏托洛茨基中心原成员 A. 康斯坦丁诺夫的供词 .....                 | (775) |
| 18. 季诺维也夫涉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话的信件 .....   | (777) |
| <br>   |       |
| 注 释 .....  | (783) |
| 人物简介 .....   | (817) |

绝 密

按密件存放  
用后归还  
禁止复制

1929年4月16—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速 记 报 告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29年4月16—23日  
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  
会  
议 程

1. 关于党内事件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2.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问题
  - 1) 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李可夫同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古比雪夫同志)
  - 2) 提高农业的道路和减轻中农税负  
(加里宁同志)
  - 3) 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  
(雅科夫列夫同志)
  
3. 关于清党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 第一次会议

4月16日晚间

**鲁祖塔克**：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现在开会了。我提议选举李可夫同志担任今天会议的主席。

**喊声**：好吧！

**鲁祖塔克**：有反对的吗？没有。

**主席（李可夫）**：大家手里都有议程吗？关于会议议程和今天的日程有什么建议吗？有没有人要发言？

没有。那就表决。赞成议程的请举手。有反对的吗？没有。通过。发言时间限制按通常的吗？（场内笑声）

**柯秀尔**：不明白什么叫“通常的”。

**主席**：通常的就是一种很好的限制，可是人人都不断地违反它。

**柯秀尔**：那就用通常的吧。

**主席**：第一项议程由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发言。

### 关于党内状况

**雅罗斯拉夫斯基**：首先我认为必须简单地谈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把党内状况列入会议日程的主要原因。

#### 1. 提出问题的原因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sup>1</sup>以后，党内生活出现了许多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情，使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议程。

首先就是政治局内的分歧。我们原来以为，由于1928年的七月全会前夕一

致通过了决议,这些分歧已经消除了,可是后来它们又冒了出来;莫斯科组织的领导层内的动摇迫使该组织更换领导;中央十一月全会前夕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三同志的辞职声明,不错,这份声明他们在一致通过决议后同意销毁;然后是弗鲁姆金同志的信<sup>2</sup>(我当然不是按时间顺序来列举这些事实)和一部分党员对这封信的态度;托姆斯基同志拒绝服从中央关于用卡冈诺维奇同志充实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决定,拒绝和他一起在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并不顾中央政治局的再次决定和工会代表大会党团的决定而提出辞职;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支持托姆斯基同志的错误行为;布哈林同志拒绝履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和《真理报》<sup>3</sup>责任编辑的职责,并提出辞职;布哈林同志拒绝服从中央政治局坚决要求他履行这些职责的决定;由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试图查明出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1928年7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毫不知情,而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托洛茨基分子却知道)的《笔记》<sup>4</sup>的原因而发生的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三同志的行为;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今年1月30日和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sup>5</sup>;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三同志1929年2月9日的书面声明<sup>6</sup>,其中对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许多严重的指责。

同志们,对这些事情必须讲得详细一些,因为它们事关重大。

## 2. 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到七月全会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一致通过了决议,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一致清算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会后我们以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分歧了。

可是就像过去一样,我们工作中的困难,这一次是改造初期和社会主义展开进攻时期的困难,在我党的一些环节中引发了动摇和举棋不定,这个时期的困难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反抗在十五大以后立即在个别党员,甚至在个别中央委员中引发了动摇和举棋不定。出现这些动摇特别是由于粮食采购中的困难,城市里出现了排队购物,个别党员议论说,花三个卢布向富农买一普特粮食总比排队强些,有人就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工作计划,动摇我们的工作前景。为了消除粮食采购引起的困难,我们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中央四月全会<sup>7</sup>上我们总算对这些措施做出了一致的评价,至少我们一致通过了决议,其中说: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不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就

不可能克服粮食收购方面的严重困难。”

“联席全会完全同意政治局今年1月6日和2月13日在指示性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方针。”

这里说的指示性信件是由斯大林同志起草,又经政治局其他委员同意的。所以说,1928年的四月全会表明,在足以引起我们之间某些意见分歧的最尖锐问题上,我们对于为了拯救工人阶级,摆脱由于粮食采购不顺利而陷入的困境所采取的措施,有一致的评价。当时我们在必须反对这些非常措施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歪曲政策和过火行为,以及应采取的措施方面也没有分歧。因此当时我们有权说我们中央没有分歧,大家意见一致,有一条共同的政治路线。不仅如此,到初夏时节,出现了丰收的预兆时,有一些为最近的将来担忧,认为我们几乎是大难临头的同志,看到我们已经用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局势,也说如果我们能得到稍好一些的收成,那就连我们现有的分歧也会消失了。

### 3. 七月全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开中央七月全会<sup>8</sup>时,我们认为有权说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虽然在讨论七月全会上提出的问题时政治局内出现了分歧,但是由于我们又一次一致通过了向七月全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而消除了分歧。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同布哈林同志没有重大分歧的情况是,布哈林同志是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sup>9</sup>上最重要的问题、共产国际纲领问题的报告人,而这份纲领是由他和斯大林同志起草的。当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议论,说我们政治局内有意见分歧,而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又加紧散布谣言的时候,我们用政治局全体委员的名义,由他们签名,向大会的代表会<sup>10</sup>提交了下述声明:

“在下面署名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向大会的代表会声明,他们最坚决地抗议散布任何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间存在意见分歧的谣言。对于实际问题存在争论(即便是最团结的领导集体也不可能没有争论)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议论存在分歧和散布谣言的根据。在下面签名的人持相同的政治路线,认为有责任特别警告利用这些谣言在共产国际问题上搞任何投机取巧活动的企图,认为这种投机取巧对于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有危害的,也是不体面的。签名人:И. 斯大林、Н. 布哈林、К. 伏罗希洛夫、Я. 鲁祖塔克、В. 莫洛托夫、А. 李可夫、М. 托姆斯基、М. 加里宁、В. 古比雪夫。1928年7月30日。”<sup>11</sup>

如果我们之间的确存在布哈林同志此前不久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中提到的

那些分歧,我们还有权做这样的声明吗?我们不知道这个谈话。假如我们知道这个谈话,那这样的声明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查清这个谈话的起因和缘由之前是不正确的。可是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谈话。七月全会之前存在过的那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都消除了,所以我们才有充分的根据说我们是一条政治路线,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

那么七月全会之前究竟有哪些分歧呢?我认为必须谈谈这些分歧。这些分歧不久以前,1929年1月30日,斯大林同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已经讲过了。

斯大林同志说:“六月底,布哈林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一份关于经济形势和粮食采购问题的手写提纲(他现在称之为宣言)。政治局委员们要求他把提纲分发给他们以便认真地讨论,布哈林同志拒绝了,说是他只能接受一种讨论形式,就是布哈林同志来念,而其余的人听着。政治局委员们反对(只有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不反对)这种党内没有先例的、奇怪的讨论办法,布哈林同志回答说不能用别的办法。至于布哈林同志的这份提纲,或者说宣言的实质怎么样,那么它虽然在许多地方是正确的,但是有三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受到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严厉批评,这三点是:1)关于破裂(布哈林在宣言中宣言我们已经同中农破裂了,政治局的多数则否认这点,认为他是惊慌失措了);2)关于贸易自由(布哈林在提纲中讲到贸易的完全自由,‘忘记了’国家机关的调节作用,对此政治局的多数坚决反对);3)关于集体农庄(布哈林在提纲中对集体农庄运动的作用估计不足,否认个体农民经济的不足,遭到政治局多数的坚决反对)。结果布哈林同志的提纲被否决了,决定成立由米高扬、莫洛托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斯大林组成的小组来审查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提纲。米高扬答应向小组提出新提纲,他也在6月30日,或者是7月1日向小组提出了新提纲。小组批准了提纲,只做了几处不大的修改。后来政治局批准了提纲<sup>12</sup>,于是,大约在7月3日提纲被提交给中央七月全会审查。”(1929年1月30日—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速记记录,第32页)

所以七月全会前同布哈林同志的分歧至少因为在七月全会上他投票赞成所有我们的解决办法而消除了,其后好几个月里我们也没有根据认为他不同意这些解决办法。相反,后来他一再强调他同意我们通过的所有决议。

不仅如此,在七月全会上讨论这些问题时,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三同志一致声称,政治局执行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不执行这条路线我们就不能走出困境。

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李可夫同志说：

“非常措施有它的长处，也有短处。假如我们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的处境就会更坏，因为很明显，如果在工人聚居区不发给面包，就会引发总危机而使局势更加恶化。必须采取非常措施，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第2卷，第75页）

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他就七月全会的总结做报告<sup>13</sup>时，也是这样说的。

托姆斯基同志说：

“既然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能在两天之内达成一致的决议，我敢肯定地说，谈论我们之间可能有某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就是极不严肃的。”（七月全会速记记录，第2卷，第138页。异体字是我加的。——雅罗斯拉夫斯基）

布哈林同志宣称：

“我必须坚决声明，现在不存在任何就非常措施表示忏悔的问题。也谈不到事后责怪这些措施，或是事后认为无须采取这些措施。非常清楚，我们过去失败了，搞得措手不及，所以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让工厂停工，要么拿到粮食（不是买，而是要拿到）。

喊声：这不对。

布哈林：嗨，这根本不是不对，而是，在我看来很正确。但是我认为，即便是按照我提出的这个说法，这些措施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七月全会速记记录，第2卷，第111页。异体字是我加的。——雅罗斯拉夫斯基）

所以，既然有了这样的声明，我们当时连想都不曾想过，布哈林会有某种特殊的路线，某种特别的观点，他同政治局多数的分歧到了，如他所说，没有任何别的出路的地步，而只能去找加米涅夫同志，向他抱怨说我们的处境几乎是大祸临头了。

我现在简单地提了提这些讲话，这能证明什么呢？四月份时，布哈林同志认为，除了采取非常措施，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但路线是正确的；在七月全会上布哈林同志和我们大家一起投票赞成决议，承认路线是正确的。而在同一个七月份（7月11—12日）布哈林同志到加米涅夫同志那里去，同他做了完全相反的谈话。我以为，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这段时间里布哈林同志思想上摇摆得非常厉害。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怎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出这种事来。布哈林同志的这种摇摆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同我们党组织的一定阶层的摇摆有直接关系，这是我国某些阶级层面的斗争和摇摆的反映。这是毫无疑问的。

#### 4. 莫斯科组织(领导层)的动摇

在莫斯科组织里这种摇摆特别明显。因此不能不谈一谈。我已经说过,在困难——主要是粮食困难和供应困难——的影响下,这里出现了种种言论,要修改价格政策,要改变我们整个的工业化计划。我可以引用佩尼科夫同志在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上的讲话,他谈了这些问题,还可以引用其他同志的讲话来证实。此外当曼德尔施塔姆同志发表了一篇糊涂文章<sup>14</sup>,证明无须为各种倾向而惊慌的时候,莫斯科组织表现了对倾向的明显的调和态度、机会主义态度;当里亚多夫同志认为必须捍卫向农民不停地让步这种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理论<sup>15</sup>(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托姆斯基同志在我们中央全会上所捍卫的),把它视为我们对农民态度的指示性方针时,莫斯科组织表现了机会主义的、混乱的情绪。后来是对弗鲁姆金同志的信的态度问题。起初这封信并没有广为流传,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发现弗鲁姆金同志的说法并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看法,而是代表了现在莫斯科组织的某些阶层中开始表现出来的情绪。后来又发现了更令人担忧的事情。有些地方出现了肯定无疑的宗派情绪的萌芽。如果要比较的话,那么最足以作为对比的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1925年在列宁格勒搞的那种宗派活动。手法几乎完全相同。今天莫罗兹同志在场,他应该记得,我曾经一再警告他说,莫斯科有点列宁格勒反对派初期活动方式的味,因为在莫斯科河南岸、红色普列斯尼亚和哈莫夫尼克等区,领导同志召集少数积极分子,向他们灌输什么现在的困难是错误政策和错误领导的结果,说是必须改变政策,还要更换领导。因此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中,许多人对偏离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党的路线的种种倾向表现了调和的态度。直到这一切都十分明显了,公开了,普遍了,而且这种情绪显然得到政治局个别委员的支持,这个问题才由莫斯科的基层组织比较坚决地提了出来,更换了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但是这种动摇已经在其他组织中表现出来了。

#### 5. 中央机关报的状况

还应当谈谈这时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内形成的局面。同志们,我认为从十月革命以来没有比我们最近几个月里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经历的更为沉重、更不确定的局面了。

如果中央机关报的责任编辑好几个月都不到编辑部去看看,如果他的领导只是名义上的,而且不是因为不让他领导,而是他不想参加这张机关报的领导工作,如果把领导实际上转交给了几个在理论上也许受过训练,但没有经过真正革命考验的年轻同志,那这时中央机关报的局面当然是异常严重的。这就可能出现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和中央机关报在路线上的脱节。而《真理报》同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脱节的确在这时,1928年夏季出现了。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刊物处于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在我们党的机关报不仅对于我们党,而且对于共产国际都有重大作用的条件下,这种脱节是多么危险。这简直可能就是一种宗派活动,也可能只是对一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也可能是对党的决议的忽视或曲解。

所以,当有些在《真理报》工作的同志注意到业已形成的、不能忍受的局面时,政治局决定改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组成<sup>16</sup>。

1928年7月,《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秘书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向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真理报》编辑部业已形成的、不能容忍的局面。当布哈林同志得知后,他就此给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写了一封信:

“致韦·谢·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同志

亲爱的韦尼阿明·谢拉菲莫维奇!

您对莫洛托夫同志说,阿斯特罗夫、斯列普科夫等人似乎在《真理报》搞反对中央的派别活动等等,这是真的吗?如果属实,能不能请您简单给我写几句,在您看来,这种反党的派别活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进行的,表现在哪里。希望您就算是看在我们老交情的分上,肯赏光给我一个回答。

您的 H. 布哈林

1928年7月23日晚,莫斯科

我请您尽快给我回答,因为这一切也直接涉及我(不是作为自然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人)。致同志的敬礼。尼·布哈林。”

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同志写了回信,并将副本送给了中央委员会。

“副本

莫斯科,1928年7月27日

致布哈林同志

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非常遗憾,您不愿意就您的来信同我谈谈。面谈时我能把事情的实质说得更清楚些。

我本想在见面时告诉您的话,主要有下面这一些。

我坚信,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对《真理报》编辑部情况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认为你由于最重要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不能到编辑部来,但能领导编辑部是纯粹的幻想。领导报纸的是那些实际在干活的人。所以不应当夸大您在《真理报》的直接影响和领导作用。由于您脱离了报纸,您要依靠那些想按自己的理智和意愿来搞政治的同志来提供信息、分析和提示。您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其他的检查途径。一些不曾在基层干过的人,直接到了最高层当领导。不正是因为缺乏生活的实际经验和知识,才有了不负责任,覬覦领导高位,却又底气不足的情况吗?

以斯列普科夫同志和阿斯特罗夫同志为首的编委会领导小组,它自己的政策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中央政策在重大问题的困难和关键时刻受到中央机关刊物默默的抵制,被它搞得缓和了,或者说,遭到它的怠工了。

举个例子。本来应当在党的生活中构成一个时代的、最重要的自我批评运动<sup>17</sup>在很大程度上被《真理报》搞歪了,阉割了,报上发表的关于自我批评的官样文章中流露出对“滥用”自我批评的担心。斯列普科夫在自我批评方面的作业以给莫斯科委员会的狂妄信件结束,它最好不过地说明,《真理报》编辑部领导小组对中央直接指示的态度。

虽然让人痛心,但是必须指出,《真理报》在这里接触的是党的、经济的和苏维埃的“任职阶层”中最落后的,甚至是官僚化了的那一部分。它不断地扑灭工人群众欢迎中央号召进行自我批评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本来应当发挥成广泛的运动,从而大大有利于尽快地将自发的自我批评引上正轨。

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事也是这样。在这里中央的指示也遇到了无声的反抗:一方面是谈论集体农庄好处的文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另一方面却是被掩饰起来的阻碍活动,“保护”个体中农,给人的印象是中央提出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方针仿佛是要取代帮助中农和个体贫农的政策。不足为怪的是弗鲁姆金同志的那封“信”(它不仅仅是惊慌失措的,而且在我看来是党性很少的文件)在这里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注意(“当然……可是……”),因为它是反对“滥用”党的方针的。

《工农检查之页》<sup>18</sup>在《真理报》上搞的自我批评确实不错,可是您大概也知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异类”。

情况成了这样:中央和中央机关报的路线形成了“剪刀”,而且后者要“纠正”前者,我认为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现在来谈谈编辑部本身的状况。



您知道,我早就说过,而且多次说过,必须改组编辑部的工作,使每个编辑能够按各自的部门独立地进行工作,由他自己负责,当然要同编委会保持接触,而且是在它的监督之下。我的这些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结果怎么样呢?首先,不存在什么编委会,只有一个由部分编辑组成的、独立的责任(确切些说是不负责任的)编辑组;它缺乏您的智慧,也没有您的经验,却绝对能够最出色地了解世上的各种事情。在一间偏僻的小屋子里无休无止地开会,窃窃私语,从那里拿出现成的决定,从那里指导一切,改正一切。不久以前在编委会全体会议上对各部门的编辑郑重其事地做了分工。这简直让人笑掉了大牙。一切都维持原状,只是大大地缩小了职权。不让没有参加这个组的编辑们工作,而且处理得很简单,毫不掩饰。谁也没有权利这样来办《真理报》。这一切使我相信,在编辑部这样的状况下,我,第一,没法对交给我的工作负责,第二,我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集体的一员,对于我在上面讲到的对中央指示的错误态度负有责任。我处在一个错误的环境里,我应该找到出路。我同莫洛托夫同志谈的就是这些,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我想,我在这里充分而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您在3月23日\*给我的信中提出的问题。

致同志的敬礼!

B. 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

1928年7月27日

这就是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同志当时给布哈林同志的信。中央得到了这样的信,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状态。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派去了克鲁敏同志、萨韦利耶夫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召回了斯列普科夫同志和阿斯特罗夫同志<sup>19</sup>。对中央委员会的这项决定是什么态度呢?它简直就遭到了敌视。克鲁敏同志和萨韦利耶夫同志当初是布哈林同志本人坚持要任命的,如今却被称为(在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三同志的材料中和《真理报》的某些工作人员中)“政治委员”、“政委”。不难理解,这样的局面对于他们的工作不是很有利的。可是如果换一个方式提出问题呢:怎么啦,难道这几个同志比他们的前任斯列普科夫同志和阿斯特罗夫同志少一些党内的经验、党内的考验,不那么值得中央的信任和关注吗?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可以看出,把克鲁敏同志和萨韦利耶夫同志看成政委的态度是根本不对的。既然有了中央机关报和中央

\* 原件如此。指的是布哈林1928年7月23日的信。——编者注

分道扬镳的事情,既然像编辑部的一个秘书说的那样,存在对中央决定的某种悄悄的怠工、悄悄的抵制、掩饰、沉默,对右倾采取了某种调和态度,那就很明显,中央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变中央机关报内的状况。

但是,同志们,直到今天情况还是非常严重。当然,从政治路线上说,我们可以认为《真理报》的政治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了;可是我们面对的是——布哈林好几个月都不到中央机关报去工作。对这事周围的人怎么看?无论在我们党内,还是其他党内都只能认为,布哈林同党有重大的政治分歧。否则无法解释、无法理解,一名政治局委员怎么能拒绝履行责任编辑的职责。如果没有重大的政治分歧,如果路线是一条,那就应该抛开其他的一切,应该开始工作,布哈林同志早就应该到中央机关报去工作了。布哈林同志这样做就能缓和他目前的处境,找到一条出路,同时也能使党摆脱由于他布哈林同志的行为而陷入的境地。我知道,布哈林同志会说:我的处境很困难,那里对我进行恶意攻击等等。

我在这里要代表《真理报》编辑部的所有其他成员,以及《真理报》的其他工作人员郑重地宣布,我们全体准备为布哈林同志创造最同志式的、最友好的工作环境,只要他不对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怠工。

不久前我们召开过一次《真理报》工作人员、《真理报》支部会议。会上马列茨基同志、塔宁同志、伊霍克同志用最不光彩的办法攻击了中央的路线,就像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三同志在他们的声明中那样最不像话地指责中央。可是《真理报》的其他工作人员是怎样说的呢?我引用一段党的生活部主任科瓦廖夫同志的讲话。他说:

“马列茨基在这里一再声称,布哈林没法工作,老是挨整。这是诽谤。你拿不出一个证据来。谁能说编辑部(无论是编委会,还是党组)里有过整人的事?你找不出一件这样的事来。相反,我们为布哈林同志的工作创造了气氛。无论哪次会上都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虽然我们在政治上都不是小孩子,都知道《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sup>20</sup>的价值等等。不久前党内广泛地讨论过政治问题,这次会上就是马列茨基同志提到了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的名字,你们没有把支部挑动起来,却遭到了支部的反击,所以后来才说什么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支部挨了骂。为什么编辑部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布哈林同志却不能在那里工作?我们现在也还是要求布哈林执行中央的指示,立即回到《真理报》去工作,无条件地贯彻中央的路线,这样他就能得到党和编辑部的充分支持。”

的确,这种处境的出路何在呢?我认为只有一条:布哈林同志必须立即服从

党中央的决定,恢复自己在中央机关报的工作;布哈林同志必须停止对以政委身份经常在那里工作的编委们的压迫:如果他对工作有不同看法,他有责任把分歧提交政治局讨论。他指责我们这些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同志,说我们对许多问题的阐述是不对的,不充分的,甚至没有阐述。可是谁不让他把这些问题在编委会上提出来呢?谁不让他自己写或是约别人写相应的文章呢,他至今仍然是《真理报》的责任编辑,没有被撤职呀!所以这种种说法都证明,布哈林同志没有改变处境的强烈愿望,不想改变处境,至于指责《真理报》编辑部,说那里的环境简直不能工作,他只不过是为了替自己不打算服从中央的决定辩护而已。

##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状况

现在我来谈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问题,那里的局面更加严重。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布哈林同志就去休假了,休假以后他实际上就没有回共产国际去工作;可是他知道,因为共产国际六大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整个俄国代表团<sup>21</sup>更积极、更仔细地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代表团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而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工作人员又是非常之少。布哈林同志是专门被派去做这个工作的,而他却好几个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谁给了他这样的权利呢?谁容许他这样做的呢?他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呢?

他是怎样解释这件事的呢?起初他说是因为对他进行了“恶意攻击”,借口希塔罗夫同志,一个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在什么地方对布哈林同志,对他那篇《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现了不尊重等等。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有索尔茨同志和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未必有人会怀疑这个小组有什么倾向性。他们审查了这件事的各种情况。请大家听听他们的结论:

“听取了:关于希塔罗夫同志 1928 年 10 月 31 日在共产国际党支部内的发言情况。

决定:鉴于希塔罗夫同志在共产国际党支部会(1928 年 10 月 31 日)上的第一次发言成了某些在场的同志,格罗尔曼和艾德尔森,的借口,说希塔罗夫同志给布哈林同志(根据《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文章)扣了右倾观点的帽子,而希塔罗夫同志本人在同一次会上第二次发言时说他并没有这样说过,而且所有在场的同志都证明是这么回事,而支部会本身也反对按格罗尔曼和艾德尔森的意思来解释希塔罗夫同志的第一次发言,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什基里

亚托夫同志和索尔茨同志小组 1928 年 12 月 22 日会议记录)

好吧,就算希塔罗夫同志有些话说得不对,就算他说了布哈林同志企图保护右倾,他的话难道就成了西方以至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法律了吗?这不是可笑的论据吗?布哈林同志只消站出来,证明事情不是这样,希塔罗夫同志错了,不就行了吗。布哈林同志却不这样做,他用这微不足道的事做借口,不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去工作。或者看看他的另一种说法,说是原《共青团真理报》<sup>22</sup>编辑科斯特罗夫同志恶意攻击他。我们仔细看了一位红色教授、在《布尔什维克》<sup>23</sup>编辑部工作过,后来又编辑过《革命与文化》<sup>24</sup>杂志的萨波日尼科夫同志就这个问题写的声明。党组就萨波日尼科夫同志写的这份关于科斯特罗夫同志的声明决议如下:

“阅读了书面声明并听取了科斯特罗夫、萨波日尼科夫、格列博夫、波德沃洛茨基等同志的说明之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萨波日尼科夫同志提出的对科斯特罗夫同志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摘自 1928 年 12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会议记录,第 53 号,第 3 段)<sup>25</sup>

请看,以这种毫无根据的材料和个别同志(科斯特罗夫同志和希塔罗夫同志)微不足道的声明为理由,即便事情就像布哈林同志的朋友们说的那样,布哈林同志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到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中去工作呢?这难道是可以容许的吗?他这样做,难道不是给所有坚决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的人提供了一个抵制党和共产国际的某些决议的借口吗?难道这种行为不会引起各布尔什维克党的个别党员或集团的动摇吗?顺便说说,这段时间里布哈林同志能够不止一次地看到,在共产国际的各党内,他的行为已经成了那些违反党纪的人的根据,他们说,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名书记,既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委员认为自己可以不服从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那他们为什么不能不服从呢?所以说,布哈林同志在这方面简直就是对违反党纪的人的一种诱惑。无论是像洪别尔-德罗这样的人的行为,还是一些集团不服从共产国际决议的事实,其原因毫无疑问都部分地在于布哈林同志不服从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不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工作,不坚决地贯彻党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后来,过了相当长时间以后,布哈林同志在 1929 年 1 月和 2 月的声明中,也和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一样,提出了一个同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领导共产国际各党问题上有分歧的完整纲领。我认为必须在这里引用这些指责。这些指责可以归结为我们实行的仿佛是“对西方而言是双倍荒唐的领导政策和方法,用喊叫代替论据,把一切都归结为是不是‘自己人’,即使这些

‘自己人’是很坏的政治家,而且人品也非常可疑”。

难道这些指责不是逐字逐句重复了布兰德勒分子<sup>26</sup>、马斯洛夫分子<sup>27</sup>和乌尔班斯对我们的指责吗。当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右派起来反对共产国际<sup>28</sup>和自己的领导的时候,他们难道不是也拿这种“莫斯科领导”的错误方法做根据的吗?因此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同志是从另一方面迎合了共产国际的这些分裂者和瓦解者:对呀,对呀,的确是这样。共产国际的领导确实是错误的,这都要怪联共(布)中央的错误领导。

布哈林同志把共产国际的现状描绘成这样:“分裂、脱离、搞小团体。没有丝毫的力量集中”,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则“不是认真地探求客观真理,以便形成正确的政策,而只是‘左的’喊叫”。

还能有比这更坏的对中央委员会的指责吗?!布哈林同志同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一起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它试图机械地解决同西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不肯“令人信服地、认真地”解决这些分歧,有捷克斯洛伐克党这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要问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他们是否曾经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过这类问题,他们是否到俄国代表团去说过:同志们,你们在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问题,应该在那里采取这样这样一些措施。我可以肯定:这样的事一次也不曾有。这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这样形容这种态度,有的人什么建议也不提,什么工作也不参与,却提出这样的指责。怎么回事?他们难道不知道敌人明天就会抓住这种指责?如果共产国际的某些问题解决得不对,为什么布哈林同志不在政治局提出重新研究的问题?他是政治局委员嘛,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也一样,他们完全能够提出重新研究任何决议的问题。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然而后来他们却提出了这么严重的指责。如果说我们的路线错了,他们又不打算修改路线。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而这种指责就成了,也不能不成为一切反对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人的旗帜。这就是危险之所在。危险在于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也能够成为所有反对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集团、形形色色的倾向性集团和分裂主义集团的旗帜,这就是危险之所在。而且他们过去在我们党内起的作用越大,这种危险也越大。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的不是对党的帮助,而是企图败坏领导的声誉和向共产国际各党虚伪地、错误地通报共产国际内的真实情况。

尽管共产国际的某些党内出现了分裂和脱离,但我们的确看到了各共产党的团结,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中的巨大影响,可是他们对这一

一切都避而不谈,这些重大的事情都不谈,只是谈“分裂和脱离”,谈机械的方法。

这种情况的出路何在呢?直到今天我们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布哈林同志应当立即停止拒绝工作,立即开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实际地进行工作,如果他看到领导有错误,他就应当把这些错误提交政治局讨论。

至于布哈林同志的建议:“请你们解除我的工作,我不提辞职,可是请你们让我实际上离开工作,让我写点评论,但是让我离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这不是出路,因为到那时谁都可以说,分歧确实非常严重,所以被任命干这项工作的布哈林不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工作下去了。而我们有责任向党员解释这些分歧,也就是对布哈林的“恶意攻击”究竟在哪里。

## 7. 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

现在谈谈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sup>29</sup>。虽然我们一再向布哈林同志建议收回实际上的辞职并开始工作,他却并没有去工作,而在中央十一月全会前夕,他,还有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写出了辞职声明。

他们曾经同意销毁这份辞职声明,可是他们自己并没有销毁,而是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查明并无重大的原则分歧,也就是他们不能讲清楚让他们有权提出辞职的原则性分歧,而只谈了些小事之后销毁的。

我可以引用李可夫同志的话来证明情况的确如此。他1928年11月30日在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传达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时,就政治局内有意见分歧的传闻说道:

“我必须坚决驳斥这些传闻。无论是在政治局的委员会里,还是在政治局里和中央全会上,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关于全会议程上的问题的所有决议,无论是在政治局讨论时,还是在全会上,我们也是一致通过的。在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以及对决议的态度方面我们政治局里都没有任何分歧。谁要是否定这一点,他就是在撒谎。”

1928年11月30日李可夫同志就是这样说的。既然没有政治分歧,既然没有背离政治路线,那辞职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上,右倾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等同志完全能够对弗鲁姆金同志发挥的那些观点说明自己的态度。最后我们通过了决议,其中说:

“全会确认,目前联共(布)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

危险。它所以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一方面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党在同托洛茨基思想的斗争中已经获得了若干决定性的胜利。中央全会满意地指出,右倾和调和主义已经受到了全党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回击,全党已表示决心为维护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有没有权利宣布说,我们联共(布)中央没有分歧?它当然有权这样做。我们又不知道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那些谈话,我们不知道这些幕后的,实际上是派别活动的谈话。既然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我们对所有的问题有一致的路线,既然我们没有政治分歧,那自然就没有道理要辞职,没有道理拒绝履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所以在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决议之后,在他们同我们一起投了票之后,在他们收回辞职之后,我们就有权指望布哈林同志会回到《真理报》编辑部和共产国际去工作。可是这事没有发生;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时散布流言,说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有七月份的谈话。甚至在托洛茨基 1928 年 10 月 21 日的信中引用了加米涅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谈话笔记的摘录时,我们也没有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无端造谣,是托洛茨基同党进行的不光明正大的斗争的一个例子而已<sup>30</sup>。

## 8. 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就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sup>31</sup>。在这次会上,托姆斯基同志作为工会领导人,完全有可能广泛地提出他在 1 月 30 日的声明<sup>32</sup>中谈到的那些困难问题。他可以向 1100 万苏联无产阶级的代表广泛地提出这些问题。可是如果你们看一看这次大会的全部记录或是速记记录,你们就会看到,像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必须坚决反对右倾危险这样重要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任何提醒大家注意这些问题的尝试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某些成员和领导人看来都是伤脑筋的事。而对工会运动中的缺点和在工会中有所发展的、骇人听闻的官僚主义的批评、完全合情合理的批评却遭到了十分严厉的回击,譬如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成员科泽列夫同志居然把《共青团真理报》说成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把《真理报》的文章称为谤文,于是我们不得不提醒代表大会的领导,这样开会是不行的。

于是,同志们,由于工会组织给我们准备的这许许多多出人意料的事情,中央认为必须加强领导,加强同工会领导机关的联系,派去了一名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同志<sup>33</sup>。这个建议是由被任命领导这次大会的小组成员提出的。它受

到怎样的对待呢?对此托姆斯基同志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认为自己没法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说他不能以工会领导者的身份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一道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

我们在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代表大会期间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做出了决定,让(12月23日)提出了辞职的托姆斯基同志收回辞呈并继续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12月23日政治局听取了托姆斯基同志关于辞职的建议:

“听取了: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组成。

决议:2)拒绝托姆斯基同志关于解除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的建议。3)政治局责成托姆斯基同志停止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参与领导代表大会,但仍旧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摘自1928年12月23日政治局会议记录第56号,第18段)<sup>34</sup>

托姆斯基同志没有服从。问题起初提到了代表大会党团支部,后来又提到了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党团会议上,中央委员们不服从政治局的决议,把问题提交党团会议讨论。托姆斯基同志认为这是完全合法的,符合党章精神,他还引用了联共(布)党章第95条,其中说:

“如党委和党团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某个问题上有分歧,党委必须同党团的代表再次审理该问题并做出最后决定,党团应立即执行。”(联共(布)党章,第2章,第95条)

那好吧,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政治局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在1929年1月10日做出决议:“建议托姆斯基同志收回自己的辞职声明。”<sup>35</sup>

为什么托姆斯基同志自己要引党章的这一段话呢?显然也是为了表示他是在履行党章的这一条。可是正是这一条责成托姆斯基同志在问题被再次审理之后他必须立即执行这项决议。立即执行!那他是否立即执行了呢?没有,没有执行。他直到今天也没有执行这个决定——无论是政治局的决议,还是代表大会党团的决议都没有执行。那他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引用党章呢?请你们说说吧,托姆斯基同志是工会的领导人,他的这种举动能给工会起执行纪律的表率作用吗?既然一名政治局委员几个月里实际上都不执行代表大会党团的决议,那我们还能要求普通党员、一般的工会会员遵守普通的劳动纪律吗?他还说,因为一部分党团成员走开了,所以才形成了反对他的多数票,这样的论据真是太可笑了。他怎么知道那些人会投什么票,——也许,甚至可以肯定,他们也会同多数人一样,投票要求他服从决议呢!甚至可以断定他们会这样投票!不管怎么说



吧,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形势:托姆斯基同志声称,他并没有政治路线方面的分歧,政治路线是一条,可是他不能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不能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共同领导。对这个问题不能只从形式上看。这话对。可是我们并没有只是从形式上看这个问题。一名政治局委员是否执行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代表大会党团的多次决议,这不是形式问题。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会应当在新阶段上起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极其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要求托姆斯基同志停止抵制中央的决议。他的那些论据,说得粗鲁一点,是一文不值的。

## 9. 关于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

下面谈谈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关于这个谈话我们是1929年1月里才知道的。1929年1月份出现了一张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题目是《党被蒙上眼睛带向新的无底深渊》<sup>36</sup>。虽然布哈林同志说这张传单在各地几乎没有散发,但是它在莫斯科各区,以及其他城市中散发了好几百份。1月23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得到了一份。由于传单的内容有加米涅夫同志记录的1928年7月11—12日的谈话,奥尔忠尼启则同志首先找来了加米涅夫同志,想问问他,是不是他做的笔记。从你们得到的文件中你们已经知道了加米涅夫同志的回答:他肯定确实做过这样的记录,而且把它给了季诺维也夫同志,看来它被托洛茨基分子窃取了而且发表了。这张传单的内容你们也知道,我就不说了。我只想说这件事的意义。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事实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各种重要的党的会议上,在党和共产国际面前声明,我们政治局里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性原则分歧。这种声明做了不止一次,而几乎是和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和向党声明的同时,布哈林同志却同一个不久前才恢复党籍、另一个党——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的组织者、因为派别活动被开除党籍的人去谈判。知道布哈林同志这次谈话的有两名政治局委员,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可是他们并没有报告。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也没有向政治局报告,认为没有必要;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三同志没有报告,虽然他们非常清楚,这件事本身,就是谈判这件事本身破坏了政治局的威信,败坏了政治局的声誉。

由于托洛茨基分子的缘故这件事被人们知道了,于是要查清楚这件事,而布哈林同志是如何对待调查的呢?我要说,也只能这样说:布哈林同志的态度是很

不光明正大的。他首先声明这是伪造(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声明)<sup>37</sup>：“我认为这个文件是卑鄙的伪造，大约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制造和散发的，是毫无根据的捏造。”“你们想让我来证实这种骗人的文件。”布哈林同志声明说：“我要求检查这些文件，检查它们的来源、出处等等。所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宣言都到处散发，可是各处都没有这张传单。”“我还要求本次会议注意立即取得关于这个文件来源的材料，要求国家政治保卫局机构或其他机构抓住这件事，并查明文件是在什么地方，在谁那里印刷的，在哪里散发的，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等等。”

在2月9日的会上，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同志又声称，这件事的形式方面(清查这张传单的问题)“是对党内审理案件的基本规则的粗暴违犯，可疑传单的整个事件就是一种德雷福斯案<sup>38</sup>。”

这种指责是指向中央的。这种怀疑是什么意思呢，是暗示这是伪造的，这张传单好像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可惜我们当时手头的材料太少，没法回答布哈林同志。我现在要宣读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是我刚刚才得到的，他们足以完全澄清这个问题。这是托洛茨基的儿子1928年12月26日从阿拉木图写到莫斯科的信的影印件，这封信里显然是按照托洛茨基的委托做了如下指示：

**“我再一次坚持希望公布关于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判的文件。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我想，这就说明了一切。这就是说，这些文件早就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手里，他们保存着。托洛茨基以前就说过应当发表这些文件，可是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发表。1928年12月26日托洛茨基再一次坚持要他们发表。叶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人说过，发表之前的几个月这份文件就在托洛茨基分子手里，不过他们在要不要发表这份文件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这份文件发表了。

最后，我这里有一份《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莫斯科小组第3(8)号公报》，日期是1929年1月1日。其中夹了一张编辑部的传单，上面写着：

**“1月份我们印刷并散发了下列文件：传单《我们对机关当权人物的回答》，传单《党被蒙上眼睛带向无底深渊》。”**

大家看，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声称，它在1月份印出了这份文件。现在还有什么好调查的呢？托洛茨基分子说：“我们印了这份文件。”托洛茨基写信给莫斯科的组织：“我坚持希望公布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的确就在1929年1月

份出来了,可是布哈林却强词夺理地(这样做并不须要是教授和大经济学家)议论说,为什么传单里没有谈这些,却谈了别的呢?当一个政治家被要求向布尔什维克党为自己的错误举动做出回答时,这样做和他的身份相称吗?

最后,关于传单是在谁那里找到的问题,我可以提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近查明的详细资料。在搜查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切尔诺斯维托夫家里找到一只箱子,里面有托洛茨基分子的非法出版物,其中有78张传单《党被蒙上眼睛带向无底深渊》,还有其他传单。索洛维约娃的家是托洛茨基分子组织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秘密接头点,在她家里找到了36份;别尔津娜是托洛茨基分子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地下区委委员,在她家里也找到了传单,还有地下技术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的鲁达可夫和许多别的地方都找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总共没收了好几百份这张传单。

我想,传单的事情,它的来历,谁刊印的等等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

现在谈谈这份传单的实质。关于传单的内容,你们都知道,布哈林同志声称它同他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不符,不过谈话是确有其事。而且布哈林同志承认,这是他很不谨慎的行为,对谈话个别地方的记述也是对的。那他否认什么呢?他否认谈过同党的分歧,建议结成同盟。没有建议结成同盟,而是说他们不要搞某人和某人。就这些。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布哈林同志,还有少数几个同志觉得情况不好,没有出路,只好去找加米涅夫同志,向他哭诉自己的痛苦。我们不是有党,有中央全会吗。到中央全会上来说明:“我有哪些分歧,请你们判断一下,我对还是错。我们有哪些困难处境,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出路。”——这样做对党不是更诚实一些,更好一些,更恰当一些吗?

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等同志是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呢?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不把分歧提出来讨论,不再增加新的困难。大家看,由于搞这一套,他们制造了最大的困难。现在他们这样搞了,却反过来就这次谈话指责我们说:

“重大的困难问题不讨论。全国都在为粮食和供应问题担心,可是无产阶级的执政党代表会议却保持沉默。全国都感觉到,和农民的关系不好,而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会议却一声不响。全国都感觉到,也看到国际形势中的变化,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会议却保持沉默……”(布哈林同志1929年1月30日声明)

他这里说的是什么代表会议呢?让他指出来哪一个代表会议对这些事保持沉默了,他哪怕能指出一次我们没有向工人阶级充分地指出这些问题。如果说

问题提得还不够,妨碍了他们,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等同志在任何一次讲话中,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那他们三名政治局委员也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正这些仿佛存在的错误;他们去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要由于他们的立场而过分责备他们,写出他们认为自己不便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手的发言稿,——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了。难道说我们党内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恐怖制度,使我们在政治局内也不能把任何一个文件交给中央委员们去阅读,使我们必须把它拿在手里,免得以后有人来检查某个政治局委员说了什么话?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我们一再要求,让布哈林同志把他给皮达可夫同志等人看过的那份关于我们物资十分匮乏的文件也给我们看看时,他就是不肯给我们,为的是驳斥错误的指责,说他起草了一份反对党的路线的文件。

我们看见了对加米涅夫那份倒霉的“笔记”的这种态度,布哈林同志没有坚决地谴责自己的行为,没有坚决地放弃那些声明,没有坚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在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支持下企图向党进攻,我们看到事情比我们原先想的要严重得多。我们召开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想找到一条出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sup>39</sup>,其中也有布哈林同志,想在委员会里解决问题。我们事先准备了建议的草案,准备在必要时就这些谈话的实质向全党做出回答。我们向布哈林同志提出了什么建议,向这些同志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1. 布哈林同志承认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是政治错误;

2. 布哈林同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的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3. 根据这一点,布哈林同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4. 布哈林同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5. 因此,布哈林同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的一切文件(发言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责任编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

件。我们认为,如果布哈林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本可以把联席全会第一次会议时所有的一切,所有那些速记记录、文件等等都收回,放在中央档案里不再下发。布哈林同志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必须(显然他有权这样做)要求解除托姆斯基同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很明显,没有事先的勾结,就不可能有他的这个要求。

## 10. 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 1929年2月9日的声明

等我们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报告委员会的解决办法时,我们遇到了下一个新步骤。李可夫同志宣读了你们已经知道的声明,这是一份大家知道的文件,它包含了在许多问题上对党的路线的批评和几乎在所有方面对党的攻击<sup>40</sup>。同志们,我不详细讲这个声明了,你们大家也知道了。不过,这个声明有几点还是值得谈一谈。首先,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同志责备党在几个月内在幕后准备了对他们的攻击,进行了无原则的、组织上的陷害。我要在这里完全负责地声明,他们举不出任何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指责,他们举不出来。至于布哈林同志早先举出的那些对他进行恶意攻击的证据,实际上是一些可笑的论据。你们自己也能看到,这些证据是多么不严肃。现在,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的确同加米涅夫同志进行了幕后谈判,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知道这件事,却保持沉默之后,该怎样来形容这种指责呢?难道这种行为不是最恶劣的败坏政治局的名声,败坏党的名声吗?我们完全应当不管那些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形式上违反了党章规定的荒唐议论。我不明白,为什么政治局可以单独地讨论布哈林同志的行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它也有权单独地讨论布哈林同志的行为,可是它们合起来讨论,这就叫形式上违反了党章的什么规定。我们并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只做出了现在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报告,也就是全党都已经知道了的决议。党表明了对我们和对这项决议的态度。这个声明再次提出的问题——这个传单的来历问题——我们也放在一边,因为它是清楚的。可是关于其他的指责还必须谈谈。这些指责中,最令人气愤的就是说党对农民似乎在执行什么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我不知道,这样的声明是说给我们党内的什么人听的,可是我必须说,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党员的觉悟现在远远高于这份文件在“贡赋”问题上玩弄的文字游戏。如果把这份文

件提出的指责同弗鲁姆金同志提出的指责比较一下,你们就会看到,这是完全倒向了这条路线的指责。弗鲁姆金同志指责党,说它不去同中农联合,不去同中等的农民联合,却安排了同他们分裂。政治局三名委员的声明实际上附和了弗鲁姆金同志的指责,说它执行的不是帮助中农和贫农的路线,不是同基本农民群众联合的路线。

实际上这是比弗鲁姆金同志更加恶毒的说法。应当毫不客气地这样说。既然是这样,怎么能在中央全会上一致赞成反对右倾,反对弗鲁姆金那样的理论的决议,然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发表一个严正声明,实际上保护弗鲁姆金的理论,甚至是比弗鲁姆金的宗派理论还要糟糕的理论呢?

这个声明中提出的对党的经济政策的指责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指责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保护弗鲁姆金关于农业退化的观点,而不顾农业正在增长的明显事实。我们全会将要讨论的数字,五年计划的数字,——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同志对我们说,他们对这些基本数字并没有原则分歧,他们认为这些数字是正确的,——这些数字根本不是说明退化,不是说明政策错误,而是说明我们的农业正在不断地增长,说明优良的措施,如多区轮作制、牧草栽培、秋耕制、采用优良品种、增加集体农庄等等,正在不断增加。所以说,三人的声明一方面迎合了富农的情绪。这点必须明确地指出来。这样的批评只对富农分子有利。另一方面声明使党迷失方向,企图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散布悲观情绪,认为党的领导一无是处。这就同托洛茨基分子关于政治局把党和国家引向毁灭的一贯断言相去不远了。这种话非常非常像早先的反对派所说的。

可是我要请在座的同志们回答一个问题:他们什么时候认真地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过足以根本改善国家情况的建议呢?我可以断定,这种建议他们从来就不曾提过。

关于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是一样。当然,可以说我们同官僚主义斗争得不够,这样说是正确的。在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我们专门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sup>41</sup>。我们将要讨论,是不是应该对我们的实际工作做一些改变,要不要对我们的建议做一些补充。如果同志们有什么建议,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看看它们是否正确。可是他们讲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说我们没有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却在培植官僚主义。我要问问你们,你们是否知道布哈林、李可夫或者托姆斯基在官僚主义的问题上有过什么改善状况的提议呢?我可以断言,他们没有提过这种建议。同时他们看不见我国正在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大规模运动,而且吸收了越来

越多的群众参加进来。难道从反对官僚主义的角度清理党的机关、清理国家机关、清党,难道这些事实不是说明党在认真地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难道近来进行的精简国家机关不能表现同官僚主义的斗争?难道我们在所有报纸上设置的“工农检察之页”,它鞭挞官僚主义的各种痼疾,帮助我们清除它们,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这场斗争,——难道这不是同官僚主义斗争的鲜明表现?难道加强申诉处<sup>42</sup>的工作,吸引几十万工农群众参加这项工作,不是加强同官僚主义斗争的表现吗?

难道我们正在进行的、在苏维埃机关中就接待群众来访等等开展的大规模调查,难道这些事实不是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表现吗?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能有相反的说法吗?不能,只能平白无故地指责说党不反对官僚主义,却在培植官僚主义。我们非常欢迎这方面任何实事求是的建议,如果他们能提出来的话;可是他们提出来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建议,而是完全别有用心地指责,说党不反对官僚主义,却培植官僚主义。

党内民主问题也是一样。布哈林同志提出了骇人听闻的指责,说我们的党委书记没有一个是选举产生的。我要直率地指出,这是从托洛茨基分子的武库中拿来的指责,我要干脆地指出:同志们,何苦从这个武器库中去找反对我们的武器呢。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就是用这个武器打击了托洛茨基分子的。

最后,对斯大林同志的攻击。非常典型的是:从列宁同志去世后,我们党内的所有宗派在攻击领导的时候,在背离党的路线的时候,他们总是拿斯大林同志开刀。为什么呢?是因为斯大林同志最脆弱吗?不是,是因为他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所以他们再次拿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所谓遗嘱来,说我们公布得不够广泛<sup>43</sup>。这是从哪里来的指责?这也是来自另一个阵营的指责。为什么他们现在要从这里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嘱是全党都知道的,我们曾经讨论过不止一次;每个反对派都顽固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证明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不是偶然的,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也就是攻击执行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那些人。正因如此,每次在我们党内都遭到严厉的回击。别把我们所有的党组织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决议不当回事。党组织成长起来了,不可能迫使它们通过任何一个决议。你们倒试试迫使党组织通过一个赞成你们的步调或者托洛茨基分子的步调的决议看。你们做不到。

最后,就辞职问题说几句。这些同志说:“我们为什么提出辞职?因为我们不想看到党内斗争、争论、不管什么派系、党内震动。我们愿意为了党内和平而牺牲自己。我们放弃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物而斗争。我们不想反击对我们的

恶意攻击。没有任何别的和平道路。请大家理解。在委员会讨论了问题之后，全会开会之前，我们特别注意安抚中间派，所以达成了共同的决议，于是我们废除了辞呈，然而经验证明，反对我们的斗争还在继续。工会事件表明，对托姆斯基同志也打算像对待乌格拉诺夫同志一样（虽然同总路线没有分歧）。又掀起了新一轮‘恶意攻击’。在这种氛围中简直没法生活。于是才有了再次辞职。李可夫同志要不是因为地位特殊，也早就由于困难重重而提出辞职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建议随便用什么方式去职。布哈林同志甚至同意根本不提“辞职”这个词，如果给他分配另一个工作的话。这样，政治局的三名委员就否定了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全党向他们建议的那条路。

他们再次走上了辞职的路。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糟糕的路——用辞职的办法向党施加压力。他们说是不想看见党内斗争，所以才辞职，这简直是可笑之极。难道辞职能消除党内斗争吗？难道布哈林同志拒绝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中工作，他就能中止政治局内部的斗争吗？仿佛因为他是《真理报》的编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才迫使他去找加米涅夫同志，和他谈这些事情；如果他没有这些职务，而只是政治局委员，他就不会去了吗？这不是毫无价值的可笑论据吗？如果托姆斯基同志不当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就能立即摆脱他现在的立场吗？那时他就会放弃他现在提出的那些指责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最最无原则的观点。你说：我们对政治局提出了种种指责，从各方面指责它这样那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们解除我工会主席的职务，我们就不指责了。这就是最大的无原则。可是你们却偏偏这样提出问题。你们提出一系列指责并说，出路就在辞职，以免发生内部争吵和辩论，出现新的派别和党的震动等等。所以说，这些同志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是坚决放弃辞职而去完成委托给他们的工作，不是收回对党的不体面而且错误的声明，却反而打着消除分歧、维护和平的招牌对党提出了许多新的指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这些同志的建议，而接受已经发给大家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sup>44</sup>。

我不说此后发生的书信往还，其中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表示反对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讲话中的个别词句<sup>45</sup>等等，还有对于我们的回答，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等同志表示不同意，开始指责我们，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不相信党员同志的证词，却相信党的公开的敌人的证词。同志们，我们只能相信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现在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马斯洛夫分子的机关刊物《人民意志》<sup>46</sup>上都发表了，它还发表在孟



什维克分子和白卫分子的报纸上。它现在是在所有分裂派别反对我们的共同资本和手段。在这方面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拿这个东西要花招,不坚决和它划清界限,不谴责这种错误的,绝对错误的做法——都是最有害的事。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2月9日在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中实际上同意弗鲁姆金纲领的许多观点,从而表明他们也许是不知不觉地滑到了公开保卫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了——这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最后是他们在五年计划问题、在巩固农业的措施问题、在从经济上帮助中农问题上的动摇。这表现在政治局最后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提纲时,他们弃权了。

当然,这些同志完全有权反对这些提纲或者弃权,可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为什么在我们一再声明我们之间在主要问题上没有分歧之后,却突然在五年计划和从经济上帮助中农这样最重要的问题上,在拒绝了布哈林同志的一些修正意见后,这些同志对整个决议案投了弃权票呢?我们来参加这次全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时,就不能说政治局是完全一致的了,我们不能说,这是政治局全体的提纲,因为有三名政治局委员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而这三名委员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使得弃权有很重的分量。如果弃权的是党内不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无关大局,而如果弃权的是三名政治局委员,那就不是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意见,而是意义远比这些修正重大的分歧了。

## 11. 党对业已形成的局面的态度

同志们,我不来引用各州、边疆区、省和区的党代表会议因为党内状况而做出的许多决议。我必须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得到全党的一致支持。正如这些同志的行为受到全党一致谴责一样;我还要说,有些党组织比我们通过的决议走得还要远些。比如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sup>47</sup>在决议中宣称:

“代表会议最坚决地谴责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采取辞职政策的行为,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特别需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钢铁纪律和党的团结一致。代表会议要求联共中央让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守规矩,如果必要,不惜将他们开除出政治局。(一致通过)”

卡巴科夫同志报告了乌拉尔州委全会4月14日一致通过的决议,其中说:

“在目前存在困难的条件下,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1929年2月9日的声明是他们提出的、反对中央路线的一个根本不正确的、错误的纲领,实

际上是一个宗派的纲领,其目的在于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团结起来,形成反党的右派。揭露这个纲领是每个党员的责任。乌拉尔州委全会要求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无条件地放弃对中央的指责及自己的错误观点,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保护被党谴责为右倾代表的弗鲁姆金的立场。全会认为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拒绝履行委托给他们的工作是不能容许的、对党有害的行为,破坏了党的意志,不能容忍地违犯了党内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作为政治局委员,在特别需要全党统一意志、最准确地执行领导机关的决议、战胜阶级敌人的反抗、克服社会主义面临的困难的时候,竟然前所未闻地忽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定。乌拉尔州委全会认为在目前时期党内争论是不能容许的,坚决谴责个别同志把自己同党的分歧带到非党群众中去。全会认为,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粗暴地违反了党的意志,不能再留在他们现在的岗位上。州委全会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提出必须撤去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撤去托姆斯基同志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同时全会强调不能容许辞职政策,因为这必然要讨论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留在政治局的问题。”

由于大家都知道这些决议,我只极简短地引用最大的党组织的决议。远东边疆区党委常委和远东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大体上也是这个精神,其中说:“联席会议坚决谴责布哈林的宗派行为,企图背着中央搞反对中央及其列宁主义政党的无原则集团。辞职的办法表明,他们滑到了搞宗派斗争来反对中央的路上去了。”

联席会议坚决谴责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不服从党纪的行为。

联席会议相信,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新宗派暗害活动,并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履行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

本决议由远东边疆区党委常委和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以及远东监察委员会和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致通过。”

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全会和西伯利亚监察委员会在1929年3月6日的决议中说:“全会认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应当坚决向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提出同右倾路线公开地、完全地划清政治界线的问题。”

莫斯科党委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全会指出:

“在目前条件下,当工人阶级正在展开自己的社会主义进攻,日益紧密地团

结在布尔什维克的总路线周围,加紧战胜阶级敌人的反抗,克服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困难的时候,特别需要全党及其领导机关统一意志,这就要求坚决回击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我们党的某些阶层施加压力而产生的种种摇摆和动摇……

因此莫斯科党委全会特别强调不能容许辞职政策,认为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这种行为提出了他们是否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内的问题。”

列宁格勒州委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的决议最后说:

“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联共(布)列宁格勒州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毫不怀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将坚决谴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的路线和行为,终止他们在困难时期动摇党的企图。扩大联席会议宣布,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将坚定地捍卫党的现行路线,因为它完全符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及其后历次中央全会的决议。”

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和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声明:

“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无条件地完全赞成联共(布)中央的路线,坚决谴责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的宗派破坏活动,认为必须在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要求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停止宗派活动,服从中央决议并放弃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否则就必须做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结论。”

大家都很了解的其他决议我就不再引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谴责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等同志在党的路线的重大问题上采取的右倾路线,并支持党的路线。

## 12. 无中生有的新困难

我还要简单地谈一件事,也是令人不安的事。

我们有许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无中生有的困难。

我举一件事。在最重要的国家领导机关讨论预算的会议上忽然“发现”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全部计划、全部预算仿佛都同我们的资源完全不相符合,仿佛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无法改正的漏洞。没有认真地检查过数字,就在群众面前提出像降低工人工资这样的主张。这样的结论只能引起工人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惊慌不安。检查结果表明,这种漏洞并不存在,而这种说明是极不严肃的。即使的确“发现”了这种问题,难道就不能在小范围内,在政治局的闭门会议<sup>48</sup>上

加以讨论?

应当知道,各种传闻都会非常轻易地通过我们苏维埃的官员们传到小市民中去,而成为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异己分子手里的宝贝;它们很快又传到国外,成了与我们为敌的资本主义国家手里的宝贝,影响到向我们提供贷款和我们的国际地位。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忽视这些事实,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它们也证明,个别中央委员对我们的领导机构——政治局缺乏充分的、完全的信任。本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把问题首先提交政治局,首先在那里加以讨论,首先在那里最严格地检查得出令人担心的声明的那些数字和事实。

根据这一切,我们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违犯了党纪。我们指责他们对党、对中央政治局不忠诚。指责他们同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动组织的活动分子进行幕后谈判,破坏了党的声誉而且掩饰这些谈判。我们指责他们发表纲领性的声明,证明他们背离了党的路线,滑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去。我们要求他们立即服从党的所有决议,履行党的所有委托。我们要求他们立即放弃辞职。我们要求他们不仅坚决谴责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幕后谈判,而且坚决放弃他们对党和共产国际领导的种种指责。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提出的指责。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实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想起我们党内早先出现过的反对派和宗派集团。那时人们声称,他们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原则性分歧,在十四大前夕,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说,他们对我们向十四大<sup>49</sup>提出的建议,95%都赞成,可是过了几小时,他们又要求做正式的副报告。党由此而来的经历是很沉痛的,我们不希望再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警告这些同志,他们走上了一条对自己、对党组织都是危险而致命的道路。

我们认为,他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来摆脱这条道路。

同志们,我们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的行为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在令我党、共产国际各党和整个工人阶级不安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同这些同志一起工作了几十年,而且相信还会同他们一起继续工作下去,我们希望,他们能有布尔什维克的勇气来谴责自己的错误,放弃这些错误,和全党一起帮助工人阶级在新阶段上取得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那些成绩。

我们要在这次全会上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认真地分析这个问题,以布尔什

维克的尖锐性谴责这些同志的错误道路；而他们应当以列宁式的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谴责这些错误，放弃这些错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有责任这样做。

主席：要休息一下吗？

喊声：休会到明天。

主席：表决一下。谁赞成今天的会到此为止？谁反对？多数。休息15分钟。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波斯特舍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日丹诺夫同志。

波斯特舍夫：同志们……

柯秀尔：本来应该是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言，而不是你！

波斯特舍夫：是的，当然应当先听听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发言，那样也许对党内目前形成的情况就清楚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三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立场。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谈现在的状况。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而且都是政治家，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用不着白费工夫，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向这三名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提出问题。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立场是让党跟着富农走。既然是这样，毫无疑问就是这样，请这三名同志试试驳斥这个观点。我敢肯定就是这样。所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应当向这些同志展示布尔什维克的拳头，这样来说明，托洛茨基分子没有能挑唆党和工人阶级去反对中农，右派也不可能牵着党跟富农走。

我们必须坚决宣称，我们党内不能有这种情况：某个党员，也包括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党的布尔什维克司令部。这第二个问题应当提得特别干脆。在我们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目前工作的环境中，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坚定的回答：他们是服从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就是政治局，还是不服从？如果他们继续不服从政治局，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就应当在这里给这些同志毫不含糊的回答。所有党组织给我们来这里开会的中央委员们的嘱托，给我们的指令就是这样的。机床工人——布尔什维克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深刻，他们提出：党不能容忍，不能允许任何人，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党的布尔什维克司令部。

我还要提第三个问题。哈尔科夫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员特别要求我在全会

上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掩盖自己的立场，还有主要是挑唆党去反对斯大林，就像季诺维也夫分子、加米涅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一样，这种企图在会上必须揭露出来，而且毫不留情地，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加以谴责。我们记得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讲话，他们曾经正确地回击了托洛茨基分子，保卫了斯大林同志免遭诽谤性的攻击。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工人阶级的顺利斗争事业来说，右倾危险是最主要的、最严重的，所以我们说，这么搞不行，想挑唆党去反对斯大林同志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没有求过人，除了党之外，没有找过人，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抱怨过党，这是全党都知道的。此外，全党都了解斯大林同志，而且不比了解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差。我再强调一下，党也知道，他没有找过人，没有抱怨过，没有痛哭流涕，没有诽谤过党，也没有违反过党的路线和纪律。所以挑唆党去反对斯大林，这个事是不可能的。

联席全会应当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有两条路：要么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同志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公开地，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说明，他们放弃自己的错误。这是一，其次，布哈林同志公开承认他对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跑到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诬陷了党，而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虽然知道这一切，却向政治局隐瞒了。这是这些同志全部历史中最可耻的一页。而且不仅诽谤了党，还企图结成反党联盟，这一切是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干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得对，应当把这些同志积累的问题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来，而不是跑去找加米涅夫。

问题怎么解决取决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公开地、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承认错误，而不是玩弄花招，说什么我们同党没有分歧，所有的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我们过去保卫了总路线，今后也将保卫它，在总路线方面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都是花招，党一眼就能识破。朋友们，你们把党看扁了，党已经成长起来了，足以识破这些花招。如果你们不公开放弃自己的错误，这次全会就要提出把你们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而且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这些同志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不能不采取别的办法。党用不着害怕对它的恐吓和威胁，因为这只能叫做威胁。

**布哈林：**是你们在吓唬人！却说我们在吓唬你们！

**波斯特舍夫：**我谁也不吓唬，我没有嚷嚷过，说国家要毁灭了。列宁说过，辞职政策是对革命总工的一种手段。你们想用辞职表示什么呢？“我们没几个人，不过你们倒试试撤我们的职看看。党会对你们说，领导人、领袖到哪儿去找

呢？”这就是你们现在所指望的。可是你们忘记了，事情不在于领袖，而在于党本身，党就是工人阶级不可动摇的领袖。党，也只有全党才能引导工人阶级度过这些困难。我再说一遍，你们的辞职是威胁党、吓唬党。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全会必须明确地、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提出问题：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要么你们在联席全会上大声地说：是的，我们错了，对党犯下了大罪，我们放弃这一切，今后将一如既往，协调地工作。要么不这样做，那全会就要解决你们是否继续留在政治局的问题，并且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越走越远，党就不惜采取更加坚决的办法。

主席：下面是日丹诺夫同志发言。

日丹诺夫(雷希瓦)：我谈谈一些同志，就是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三名同志，和政治局的分歧问题。我记得，在上一次十一月全会上，我们大家仿佛都是一致的。只需要继续工作就行了。当我们基层组织，企业的工人们知道这些同志的行为，知道他们的动摇，拒绝工作，不服从中央以后，他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积极分子会议的一致意见是谴责这三名同志。在我们工作的困难时期，在工业和农业中建设社会主义成分的时期，这些同志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乌拉尔的工人阶级和全体无产者谴责这件事。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让这些同志改正错误。如果不行，那党就要处分他们，因为现在不是搞辩论的时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是不能搞宗派活动的。我们有党的十五大的指令。这些指令说什么呢？它们明确地、肯定地、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把自己无产阶级的意志加在资产阶级世界身上，在新技术和改造生产方面我们要赶上和超过资产阶级国家。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些同志开始阻碍工作。亲爱的托姆斯基同志……

托姆斯基：亲爱的同志，怎么啦？

日丹诺夫：托姆斯基同志，你可是工人基本骨干分子的领导，可是却从自己的岗位上逃走了，你违反了党的指令。我们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它谴责你们的行为。会议说你们搞幕后谈判，说必须坚定地执行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可是你们不执行。我们工人明确地宣布：是的，我们会帮助你们的，我们会把一切都担起来。这就是乌拉尔的工人阶级，还有全体党组织，特别是有3000人的联共雷希瓦组织的宣言。

托姆斯基：这非常好。

日丹诺夫：可是这时候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却害怕了。我替你们难过，同志们，你们可是老地下工作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不仅是为党难

过,而且为你们难过。什么意思呢,从坚定的列宁主义的党滑进了右派阵营?党不能听任你们这样。你们想要什么?你们想说,党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你们想把自己的路线强加给党;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让农村中的富农发财等等。放明白点,这是行不通的。你们的理论通不过,所以你们抱怨说你们挨了批评。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工作,要求辞职等等。那又怎么样呢?党对付过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现在的困难它也能应付。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得好,问题不在个性。如果这些同志不改正,党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知道自己的力量,也知道自己的任务。你们提出同农民破裂,而同农村中的富农结合,可是你们要知道,整个工人阶级和党不会容许这样做,因为我们夺取政权,并不是为了在困难面前低头,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知道自己的价值,中农和贫农也非常了解,所以才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愿意恢复城市、工厂和乡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工人阶级同农民要联合,同贫农和中农,而富农和我们是两股道。无产阶级专政明白自己的任务。我们在乌拉尔地区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都坚信我们的事业,相信能完成这个计划。因为我们正在改造旧工厂,建设新工厂,我们就要为五年计划、为我们的工厂投入那些资金。我们亲眼看到,我们的建设是按照苏维埃的路线进行的,搞工业建设,在我们乌拉尔地区也有农业建设。你们看不起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工作。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农业中也要建设这样的工厂,因为我们在这里也要提出工业化的任务,而不是在它面前退却。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希望和工作。

在我们眼下的困难时刻,任何动摇都是不应该的。如果这种动摇继续下去,起码工人阶级和农民,贫农和中农,是不答应的。这样摇来摆去,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对同农民结合没有信心,对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没有信心,而且总的说来对工人阶级没有信心——这是我们今后不能容忍的,因为工人阶级负担着一切,今后也要由它来负担。所以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应当回去工作,承认错误。如果你们不承认,托姆斯基同志……

**托姆斯基:**请问,那就怎么样呢?

**日丹诺夫:**那就对你们不利。同志们,我认为,而且庄严地宣布,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困难都必须克服,必须消除。我们知道有困难,我们大家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我们的任务就是向不觉悟的工人和不觉悟的农民解释这些困难。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你们就幸灾乐祸吧,你们自己害怕了,跑进了右倾分子的阵营。这怎么行呢?你们给人家落下话把啦,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得对,他说你们在困



难的时候,逃避了困难。不过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又错了,说党离开了你们会很困难。我们摆脱了托洛茨基分子,整个说来,党也会摆脱你们,如果你们不服从,不承认错误的话。

主席:鲁缅采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哈塔耶维奇同志。

鲁缅采夫:我们必须在这次全会上解决党内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党过去同反对派斗争的经验证明,如果不事先防止或及时解决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会给全党造成更坏的后果,更难以克服;如果一开始就更坚定地解决,那就比过去更好。另一方面,在基层,搞生产的党员往往向普通中央委员,按现在的说法是中央委员中的中间派,提一个问题:按照列宁的倡议搞的紧箍咒到哪里去了?紧箍咒就是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吸收普通工人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有人说:你们这些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作为紧箍咒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因为在政治局领导层中早就有了分歧,而你们作为紧箍咒却没有起作用。

我想,这无疑就是说我们的联席全会如果不能严厉地解决党内现在的不稳定状况,我们就不能散会。地方领导干部的难处在于正确地说明政治局里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都是深刻的理论问题,须要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和细致的讲解。必须讲得使普通群众能够明白,能够懂得。我们有过托洛茨基反对派、有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因此毫无疑问在党的基层留下了对党内分歧作简单理解的痕迹:说是他们对反对派、对意见分歧上了瘾,我们的领导人往往是为了争夺领导位置而争吵,把种种理论性的原则问题都归到这里。现在我们看到沦为党内反对派的是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这样一些受人尊敬的同志。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说他们在地方上受到“恶意攻击”,都是不对的。相反,我们在地方上仅仅限于回答某些问题,而避免落入被人说成是“按计划”进行“恶意攻击”的境地。因此,必须驳斥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说他们受到了“恶意攻击”。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做出了很好的评价,说一名普通党员的政治水平已经很高了,足以分清什么是原则分歧,什么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否则党内现在就不会有100%的赞成党的路线,而反对沦为反对派的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我已经说过,即使党内有人想败坏这些同志的声誉,即使有人想添油加醋等等,也是办不到的。这不可能,是因为这些今天沦为反对派的同志名气太大了。所以如果在这次全会之前全党做出了100%的结论,要求严厉地谴责这些同志,请求全会这样来解决问题:要么他们声明自己错了,继续工作下去,服从党的决议,要么全会采取组织措施。

要全国范围内的党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实需要全党有很高的政治水准,来分清那些分歧,抛开那些可能是从上面塞进去的“恶意攻击”。应当说,现在连工人、非党群众、农民都明白这些分歧的政治含义。一名普通党员是这样分析分歧问题的: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同志说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粮食问题。而这是中央错误政策的结果。改变政策,削弱一点我们列宁的无产阶级路线,向农村中的富裕阶层让步,粮食就有了。这就是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工人和农民在评价分歧时的思路。

党从这里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要回答今天的困难是不是领导错误政策的结果,应当说,每一个多少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会得出不言而喻的回答——不是。因为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太广泛了,在一定程度上太“客观”了,太合乎规律了,不能算到中央的错误政策的账上,不能说是某项决定、某件实际工作的结果。

第二个基本问题:我们确实一切都很糟糕,或者我们有成绩?于是每个普通党员都要权衡一下:什么多一些呢,是错误和困难,还是成绩?在天平上占优势的一定是我们的成绩。所以这些同志说政治局里的分歧是由于斯大林同志的错误,说对他们的“恶意攻击”是按上面的“指令”进行的——他们的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这都是胡说八道,完全不对。我想转达一下我所在的党组织的心情。总的说,就是党的路线和它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党不能有另一条路线。有右倾情绪的同志的建议从原则上讲是同工人阶级的路线、同工人阶级的心情相违背的,因为工人阶级凭自己的感觉懂得,把工人阶级和我们党推出党从十月革命以来就采取的路线——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党的路线更加灵活了,把党推向对富裕的那一部分人让步的方向,以便消除眼前的困难——这同无产阶级的愿望和心情原则上是对立的,是有内在矛盾的。这就说明工人阶级和我们党具有健康的无产阶级政治嗅觉,所以才坚决驳斥这种种建议,严厉谴责那些有这种倾向的人。所以现在党内的情绪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以全体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心情为根据。劳动群众的愿望是在这次全会上正面地解决(这当然完全取决于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问题,不同这些同志分道扬镳,不要造成新的反对派,而要和谐地一起工作。如果能做到,那党自然也会满意。否则就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别落入腐朽的妥协的境地,而应当提出组织处理的问题。这大体上就是全党,就是我所在的组织的嘱托。

主席:哈塔耶维奇同志发言。

哈塔耶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其中大部分都使用了温和的、开

导的语调。如果这种教诲能取得一些效果,我当然很欢迎。不过我要说,那些看过中央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会议速记记录<sup>50</sup>的领导同志,他们的心情可并不那么轻松。我要说,这些同志对于布哈林同志在1月30日的声明中和三名政治局委员在2月9日声明中对党提出的那些不诚实的指责感到非常气愤。

布哈林同志说,历次代表大会和全会的决议是我写的,说我们是思想家,是党的意见的体现者,可是有人篡夺了党的意志,把党的实际政策引向了另一条轨道。

说党的意志和意见被篡夺、被修改,说它的实际工作被引向了另一个方向,我想,这种指责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如果对党、对党的领导提出这种指责,就不能指望广大的党员群众能平心静气地对待这种指责。

指责党的政策近来实际上是从“贡赋”理论,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出发的,这种指责不会唤起人们对它的温和态度。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指责我们看到了更为激烈的反应,米留可夫的机关刊物《最近新闻报》<sup>51</sup>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军事—封建制度》。是谁帮了米留可夫和我们党的形形色色的白卫分子—敌人的忙呢?就是臆造和发表了对党的这类指责的人。我想,由于这类没有根据的指责而在党员群众中引起的极大的愤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布哈林同志在1月30日的声明中写道:

“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经过激烈争论总算一致通过了决议。非常措施被取消了。”读了这段话的人都会认为,争论就是在取消非常措施的问题上进行的。但是参加了七月全会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赞成保留非常措施。这些文件还提出了许多这类不严肃的、没有根据的指责,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比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中的评价和说明要厉害得多的评价。

谈谈辞职问题。党员群众怎样评价这种辞职呢?在党内是这样评价的:要么这是一种手段,向党施加压力的特殊方法:“我们走,没有我们你们没法办,所以还是接受我们的观点吧。”——要么这是想逃避困难,想躲到一边去,在困难时期逃避责任。

不管这两种说法对不对,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种辞职的办法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每个坚定的党员在阅读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的声明时,都感到气愤。同时还必须指出,这些声明对中央提出了不严肃的、从事实方面说是轻浮的、虚伪的指责,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误会。[同时还应当指出,这些有人签名,起到某种宣言作用的正式的文件中有非常不严肃的指责。]

托姆斯基同志在他1月14日的声明<sup>52</sup>中,还有三名同志的声明中都说中央委员会召集了几乎所有党组织的书记来参加全苏工会代表大会,以保证大会党团会议得到必需的表决结果。我本人偶然参加了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不过并没有人找我去,会上除我之外,一个书记我也没有看见。

至今为止,我们习惯于非常尊敬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我不知道是出于神经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当一个在别人眼里身价双倍,甚至是身价十倍的人提出这种轻浮的声明时,总感到有些不可理解,觉得这些同志好像是要破坏和降低自己的声望。

我想,绝大多数党员都想尽力保留这三名同志作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领袖和领导者,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要保留他们,不能以向右倾让步为代价,不能以抹煞党的路线为代价,不能以放弃执行布尔什维克的铁的纪律为代价,不能以给某个党员规定另一种纪律为代价。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保留这些同志作为党的领导人、作为领袖,那就应当尽一切努力保留他们。

全会应当最坚决地、最严厉地谴责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的两份文件中制造的那些对党的诽谤性的、不诚实的指责,那些胡说八道。全会应当要求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坚决放弃这些指责,放弃这两份文件。

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过去不止一次犯过错误,过去他在党的压力下还有勇气放弃错误。党应当再一次用全体的力量施加压力,让他再一次放弃自己错误的、荒唐的指责,放弃最近的错误,也让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和他一起放弃自己的错误。

**喊声:**让他们以后别再错了!

**主席:**全会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休会。

## 第二次会议

4月17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格列恰内同志发言。

格列恰内(斯大林格勒):从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都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同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现在,从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应当分析某些同志背离这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党内倾向。在十五大上我们分析了那些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同志犯了托洛茨基倾向的问题。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分析了另一些同志的问题,他们也是在原则上不同意政治局的。如果我们在党的领导机关自身都意见不统一,那在地方上、在基层、在城市里还怎样工作呢?必须最广泛地提出这个问题,让全体群众都来分析它。我们有党的总路线。我们在十五大上讨论了五年计划。我们应当完成它。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地执行它,可是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既然对党的主要任务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在地方上还能工作吗?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重新装备和改造我们的工业和整个经济上。这是基础。显然,我们不应当被面临的那些困难吓倒。比如说,粮食问题。过去我们向所有的人敞开供应粮食而没有统计,从来也没有人向我们说过我们是浪费粮食。可是我们规定了粮食消费定额,就有人,既有投机分子,也有小市民,他们不考虑形势,不考虑我们应当节约粮食,就只会说,党不能领导。

我们规定了粮食消费定额<sup>53</sup>,闲话就来了,而在我们敞开供应粮食的时候,党也是好样的。我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等同志是不同意我们的路线的。党发出了指令,我们大家就应当同样关心执行这些指令。如果我们也像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那样,改变党的既定政策,我们会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我们提出了重新装备工业和新建工厂,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任务。我们提出了迅速发展工业的任务,因此有些资源就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和党一起来拉那辆已经开始拉了的大车,而不应当走到一边,不应当说我很难工作,我要走开。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反正要为自己的工作向工人群众负责,你们离不

开群众。工人群众会拿鞭子抽你们。我已经说过,从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一直在同反对派作斗争。现在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些同志的问题。这次全会上我们必须彻底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使我们回去时思想上十分明确。如果这个问题还保留着它现在的状况,那是不行的,那样就没法工作。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过,一起搞过工业和农业建设,可是他们现在离开了这件工作。我想,这些同志不应当脱离工作,而应当把它进行到底。我们一直沿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道路前进。他们也不应当离开这条道路。现在不能歇一口气。等到新的力量起来代替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休息。在那以前我们必须站在岗位上工作。我们和你们一起在这个大厅里定下了路线,我们也应当执行它。如果我们一起制定了路线,而你们明天又同我们有了分歧,那就是改变党的方向。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是一名车工,我要说,同志们,你们退缩了,而这是不行的。你们干着干着,却忽然说:我们太困难了,让别人来拉车吧,我们不拉了。这不是党的路线,不是列宁同志的路线。我们正在吸引党的新生力量和非党积极分子到建设事业中来。我们不断吸收新党员,党的队伍不断壮大,非党群众、党外的工人积极分子都不离开党的路线,帮助我们工作,而这些同志却要脱离这条路线。我想,不管我们在哪里工作,是在车床边还是干其他工作,我们都不能放松努力,不能放松工作。我们大家都应当共同承担困难。我已经53岁了,也许我已经感到疲倦,可是我无论如何不能退缩。我们应该干到底,直到有人来接替我们,对我们说:请你们休息吧。在面临困难的时刻,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时候,更不能后退。我们应当告诉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希望他们回头,承认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开始和谐地工作。我再说一遍,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不应当背离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历次全会制定的路线。如果他们离开了,我们就应当像对那些在十四大期间背离了党的路线、脱离了党的建设的同志一样提出他们的问题。

主席:托姆斯基同志发言。托姆斯基同志请求给他75分钟,谁赞成?多数通过。

托姆斯基<sup>54</sup>:同志们,我认为,全会应当解决的那些问题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我们的“高层人物”,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即怎样保证对党和工人阶级实行真正正确的领导,怎样预防党内动荡和分裂的危险,用什么办法解决党内的种种危机。列宁逝世后的许多事件表明,他对领导的完整和一致的担心是很有根据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辞世前所预见到的一切,都在比我们大家的预期更大程度上实现了。

所以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必须持最冷静的态度,而且要认真研究许多事实。

昨天,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报告中讲了政治局内分歧发展的经过。可是我要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讲述的经过,也和直接参与了制造这些事情的人的讲述一样,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也许我的讲述也会有某种主观性,你们的责任就是根据提供的事实来搞清问题。确实,如果你们仔细地听取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讲述,它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呢?总的印象是: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人们过得挺好,谁也没有碰着他们,也没有人对他们进行恶意攻击,谁也没有打扰他们。忽然有人因为克里姆林宫的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由于“饱食终日”而发狂了、胡闹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就应该像我在谈话和会议上一再说过的那样,请一位或者三位医生,心理专家,来给那些在党内生活了二十多年,现在却突然闹别扭、找岔子的人诊断诊断。其实,事情的发展并不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的那样,你们也都可以作证。如果你们再回忆一下,想一想在你们眼前发生过的事情,你们就决不会同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说法了。政治局委员之间的这些分歧是怎样越来越大的?政治局内这种关系的破坏,也像各种问题一再地尖锐化一样,是非常缓慢地、难以觉察地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强烈的爆发出现在1928年3月政治局审议工业财务计划的公开会议上,当时莫洛托夫同志极其尖锐地攻击了李可夫同志<sup>55</sup>。我说“政治局的公开会议”,指的是政治局的闭门会议,安排这些会议是为了保障政治局避免委员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激烈的攻击,避免对工作中就争论问题必然出现的辩论做出恶意的解释。所以多年来在每周一的政治局闭门会议上,我们总是提出可能发生激烈争论、激烈冲突的那些问题,为的是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消除这些冲突。如果莫洛托夫同志当时确实对李可夫同志提出而且维护的工业财务计划有重大怀疑,他本可以在政治局周一的闭门会议上顺理成章地提出来。可是没有这样做。

如果莫洛托夫同志对问题的提法不那么粗暴尖刻,这本来是一件小事。批评李可夫当然是可以的(李可夫是政治局委员,我们大家都是政治局委员)——批评当然是可以的,可是问题在于批评的调子和它的毫无道理。

此后不久,《共青团真理报》就在5月底突然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展开了攻击。这算什么呢?自我批评时期,批评一下也是可以的。的确,到此时为止,在我们的做法上,按照针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还不曾有过不经我们同意、不向我们打招呼的公开批评。我们对批评的看法始终同全体政治局委员,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是一致的,认为自我批评归自我批评,但我们必须领导它。党、中央委员会应当领导自我批评,否则这种自我批

评天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不是中央宣传鼓动部<sup>56</sup>在指导报纸吗？攻击开始了。那好吧，年轻人嘛，何况是在自我批评时期，谁会为它负责呢？如果回想一下年轻人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的这次突然而猛烈的攻击——虽然工会理事会主席团，特别是我仅仅为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决议作了辩解——在工会工作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中引起的困惑，就能够发现，我们的处境是既不能在非党工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也不能把《共青团真理报》强加给我们的那些该死的过失归咎于上级机关的相应决议<sup>57</sup>。我们不想拿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威望做挡箭牌，而是自己承受了打击，等待着中央替我们说话，等待着某位中央书记出来替我们说几句话。而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年轻人嘛，能把他们怎么办呢，我们没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大对头吧，是你们自己在进行攻击。

托姆斯基：很对头吧，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如果你想这样来改正我的话，柯秀尔同志可以作证。他当时是共青团的领导，我给他打过电话：请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对我什么也没有说，而攻击却在继续。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干吗要这样搞呢，这对谁有利呢？如果说工会理事会的路线错了，我不能排除这一点，就算工会理事会的领导在同共青团的争论中错了，虽然后来无论是政治局还是人民委员会都肯定在这场争论中错的是青年团，因为它的建议被否决了。可是我并不排除工会理事会的领导可能出错。我们迄今为止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是这样解决的：既然出现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很强烈的辩论，新闻界的某种内战，那这个问题就应当提交给政治局。也许是工会理事会错了，也许是托姆斯基错了，也许是共青团错了——这个问题应该加以审查，这就是党中央的领导作用，所以中央持中立态度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提交给政治局呢？这时我们很为难：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政治局，那就表明我在“抱怨自我批评”，抱怨攻击我的年轻人，虽然领导自我批评的是中央宣传鼓动部。我宁愿不这样做。我要看看事态怎样发展。请看，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说这都是“自我批评”，“没有报告”，“不知是怎么回事”，“全是些偶然事件”。可是一个有几十年生活阅历、饱经沧桑的人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些“偶然事件”的真实含义。

7月间，有些政治局委员担心粮食采购的进度，担心国内经济生活，担心日渐增长的困难。乌格拉诺夫、布哈林，还有我请求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政治局闭门会议来讨论经济问题，以便在最平静的氛围中，用最平静、最坦诚的语调



(至少过去是可以这样做的)最广泛地讨论这些问题。这次会议被拖延了很久。后来召开了这次会议<sup>58</sup>,提出来讨论的是(这样说不是为了使米高扬同志难堪)米高扬同志的一份很不像样的、浮皮潦草的、简短的提纲,这份提纲后来作为一个显然不能用的、不切题的文件(谈了几句粮食采购,谈了些一般的话等等)被收回了。这份文件甚至没有经过讨论。

布哈林同志拿出了他手写的另一份文件,读了起来,当别人要求他分发这份文件时……

**伏罗希洛夫:**可是他放进了口袋里。

**托姆斯基:**布哈林同志说,这是一份草稿。然后是莫洛托夫同志生硬的发言,他以莫洛托夫同志惯有的(缓和些说)粗暴把这个文件说成是“反列宁主义的”,是“违背了列宁主义,违背了共产主义”,是“和党性毫无共同之处的”文件。斯大林同志声称,他十分之九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设想,只对布哈林同志有关市场的不正确提法做了修改,说否则的话可以有种种理解。大家交换意见。我、布哈林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回答斯大林同志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谈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的确是绝对的愚蠢,当然,一个比少先队员年长的、思维健康的人,如果他自命为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在所有的命脉都掌握在工人阶级国家手中的时候这样谈的。

便笺指的也不是这件事。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在仿佛最友好的形式中进行的。写了决议。七月全会上通过了这项决议。可是就在七月全会上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莫洛托夫同志在发言中通过攻击阿斯特罗夫同志间接地(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何必躲躲闪闪)攻击了布哈林同志。我在他之后发言,我驳斥了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不同意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你们读一下速记记录就会看到,我的发言是什么样的,——是最温和的……

**喊声:**好一个最温和!

**托姆斯基:**我的发言谈到在这个时期,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最仔细、最谨慎地对待农民。我在讲话里特别强调要仔细地、谨慎地对待农民,在革命的某些阶段上必须对中农做一些让步。

后来斯大林同志就另一个问题发言,他很生硬地把这叫做“不断让步论”(不断的含义就是不停顿的)。七月全会以后,在许多会上就都讲到了“不断让步论”。我想就此单独说几句。

**雅罗斯拉夫斯基:**还在七月全会以前,在一篇讲到利亚多夫同志的文章里<sup>59</sup>。

乌格拉诺夫：你记性太坏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托姆斯基：我们都是是一把年纪的人，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何必互相欺骗，说是指利亚多夫同志呢。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怎么会知道你要发言呢？

托姆斯基：马丁的发言要晚得多，何必乱说呢。好吧，既然是错了，叶梅利扬，我接受你的订正。

伏罗希洛夫：利亚多夫的发言要晚一些，晚一些。

托姆斯基：那你们是不是有人肯在全会上站出来说，在谈到不断让步论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是指的某个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声明一下：“谁要是说是政治局委员提出的不断让步论，那是诽谤。”——那样我就安心了，就收回我说过的一切。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开始了“讨论”的第一波，向各级组织散布流言蜚语。我们全都知道。谈右倾危险，影射着我们。这股浪潮掀起得晚一些。

七月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状况的决议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嗯，可以有种种争论，不过，同志们，全会通过的决议是以布哈林同志在政治局委员专门召开的闭门会议上宣读的提纲为基础的。

喊声：不是这样的。

托姆斯基：不对，就是这样的，绝不是别样的。当时的重点是什么呢？布哈林着重谈了什么呢？他谈了必须放弃非常措施，必须承认在经济计划方面的错误，必须提高粮食价格，必须更仔细地对待粮食生产等等。这都是决议中最重要的一环，最实质性的内容。

我在七月全会上发言之后，斯大林同志应莫斯科州常委会的要求在莫斯科州常委会上讲了两次话<sup>60</sup>，而且按类似的请求在列宁格勒州常委会上也讲了话<sup>61</sup>。在这几次会上斯大林同志率先，也是第一次对政治局的某些委员做了评价：谁有些紧张，谁惊慌失措等等。同志们，如果是相反的情况，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在类似的会议上对斯大林同志做了评价，会怎样呢？如果其他政治局委员中的某个人到一个党支部去对自己的其他同行讲了类似的话，又会怎样呢？

米高扬：加米涅夫可不是党支部。

托姆斯基：让我说说我的看法。我不能说你们所想的，我只能说我所想的。[这是我的意见，如果这也不能谈，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如果说，如果是另一个人，如果是李可夫给别人做了评价，——斯大林同志

如何如何,莫洛托夫同志如何如何等等,那会怎样呢?这至少会被认为是非同党式的行为。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无权在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向党组织给自己工作上的同志做出评价。谁给谁授权把自己置于政治局之上,来评价个别政治局委员呢?要是我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被提付表决,那每一位同志都可以对我做出评价。可是为什么在这几次常委会上要由斯大林同志来做这样的评价呢?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会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昨天一带而过地说,代表大会上有过议论,很重要的议论。代表大会上有哪些“议论”,布哈林同志要发言的,他大概会告诉你们。不过这些议论太厉害了,让人只好逃出大会。现在就是喜欢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说布哈林神经过敏了,说在代表大会上谈的不过如此等等。可是由于那种活动和恶意攻击,由于代表大会上来自我们代表团的某些成员,例如洛米纳泽,德国代表团的某些成员,特别是奈曼同志的恶意攻击,尤其是专门做了特别通报<sup>62</sup>的时候,由于这一切,即使是一头大象也会神经过敏的。

Cr. 柯秀尔:不过,大象也怕小老鼠——你知道吗?

托姆斯基: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传闻说布哈林是去阿拉木图的候选人。有过这种议论。

雅罗斯拉夫斯基:托派分子的议论。

托姆斯基:托派分子?假如这是来自托派分子,那就不值得担心了,你们知道,托派分子在这次大会上没有什么威信。会上有什么托派分子呢?请你们指出大会上的托派分子吧。请你们别把什么都推到托派分子身上。

后来出现了莫洛托夫的文章《论目前局势》<sup>63</sup>。这篇文章也申斥了“让步论”。

9月间召开了莫斯科州委全会。全会之后就出了乌格拉诺夫案件。同时布哈林同志写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也出版了。在俱乐部里或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就这篇文章及其质量展开争论。我认为它的主要缺点在于写得不够通俗。那些说它很糟糕的人没有说明它糟在哪里。他们甚至不能批判它。你们在哪儿见过对《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多少有点道理的批判吗?

政治局认为,这篇文章有可以争论的地方<sup>64</sup>。政治局起码可以再回过头来认真地审查这篇文章,给它做出另一种评价;可是它没有这样做。而《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却在莫斯科的所有党组织里受到攻击,被说成是“折衷主义的”文章,是“右倾纲领”等等,尽管按照政治局的评价,这篇文章只是含有可以争论的地方。

在审理莫斯科党组织的冲突时,给乌格拉诺夫同志做了这样的评语:

“中央声明,莫斯科州委及其领导核心总的说来执行了党的路线,并且无条件地贯彻了党的领导机构的决议。中央指出,关于莫斯科州委把自己同中央对立起来的议论是不符合实际的。”(1928年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致莫斯科党组织的信)<sup>65</sup>

这个案件就是这样的。究竟在什么时候,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乌格拉诺夫同志犯下了你说的那些过失:是在这个决议之前呢,还是之后?要是按你的说法,是乌格拉诺夫对中央进行了某种令人怀疑的恶意攻击。如果这是在这个决议之前,那么投票赞成这封信的中央委员显然很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乌格拉诺夫的过失,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决议,或者是?……怎么把它联系起来呢?

我本人投了赞成票,并且说明,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莫斯科州的领导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是一致的,这在目前时期是一条出路,但是我声明,我不同意对莫斯科组织采用的那些方法。政治局委员们都同意保留莫斯科州委的主要领导人。但结果却是乌格拉诺夫同志<sup>66</sup>和莫斯科州委的其他几个领导干部,都是很好的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老布尔什维克,我们党的好干部,被撤了职。还给他们又扔了几块砖头:“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动摇”,等等。这是在他们和中央一起签署了那封信,而且答应不撤他们的职之后。

11月份召开了中央十一月全会。全会之前恶意攻击走得很远很远。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的诽谤从两个方面在继续。一方面是《共青真理报》,另一方面是由工会理事会的支部发动的。那些不假思索、随意编写的同志们总想在工会领导中找出各种倾向、各种过错来。对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同时对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进行了恶意攻击。七月全会后立即撤了《真理报》一些干部,所谓“年轻干部”的职,他们都是长期在布哈林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很信任的<sup>67</sup>。

**伏罗希洛夫:**他们对中央可并不完全信任。

**托姆斯基:**迄今为止我们党历来的做法都是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为党中央机关报的领导负责。

**雅罗斯拉夫斯基:**由全党负责。

**托姆斯基:**说得对!在非党群众面前由全党负责,可是为这张机关报的缺点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负责的不是这张报纸的某个工作人员,而是受中央委托的人,也就是责任编辑。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中央机关报的责任编辑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

是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所以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机关报的责任编辑,也只有他才为机关报的方向对政治局负责。政治局越过责任编辑,直接向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发指示的事情,我们从来就不曾有过。

我们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托给古比雪夫同志,把政治保卫总局委托给缅仁斯基同志,对它们的工作由全党负责,可是如果古比雪夫同志或是缅仁斯基同志工作得不好,那么为不好的工作向政治局负责的就是古比雪夫同志和缅仁斯基同志。别人会对古比雪夫同志说,你的工作很糟糕;会对缅仁斯基同志说,你的工作很糟糕。于是他们每个人都要向政治局负责。为什么《真理报》,它的编辑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为什么《真理报》却是另一样呢?

给《真理报》安排了新人,对这些新人布哈林同志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们被安排进去了,这就表示了对作为责任编辑的布哈林同志的不信任。布哈林同志把委托给他的工作搞糟了——这样的问题在哪儿讨论过吗?没有,哪儿也没有讨论过。布哈林同志错误地领导了委托给他的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工作——这样的问题在哪儿讨论过吗?没有,从来也没有讨论过。布哈林同志是否不曾完成过委派给他的什么工作呢?没有,没有这种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绕弯子呢?它对谁有好处呢?

然而攻击还在继续。我不明白是谁在领导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是我还是党支部?人们跑来跑去,开会,做决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干部在所有的报纸上批评工会理事会的工作,各部主任几个星期都不到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办公室去。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还是布哈林同志都没法工作。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不懂得斗争的老办法吗?“败坏他的声誉,用自己人把他包围住,剥夺他的军队,然后撤职,赶他走,把他轧死”。

我们察觉有人想包围我们,败坏我们的声誉,从四面八方传来窃窃私语,后来是必须避免的各种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当我们察觉到这些苗头时,这就要求发表一项声明,说我们政治局里没有右派,也没有调和分子,——可是说政治局没有右派这件事本身就会让人们竖起耳朵,悄悄地问:也许是有吧?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止一次谈过工会运动的领导,谈过工会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起什么作用。我不再重复了:这离题太远,可是主要之点在于对待工会机关这种工具必须十分谨慎。我在私下谈话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怎么回事,是我干得不好,在现在的时代不中用了,还是对我不信任了,请你们告诉我,我会毫无反抗地

离开。最好是撤我的职,安排其他工作,而不要动工会的机关。

如果同时既攻击我,又打击整个工会机关,分裂这个机关和整个组织,那就糟糕了,而且对党是有害的。我有过这种担心,而且我的担心完全得到了证实。我们,布哈林和我,被置于这样的环境中,使我们在被安排的岗位上没法工作。

我们的处境是:要么布哈林同志到“攻击”他的所有支部去进行驳斥,要么我们在报刊上针对种种诽谤和攻击发表文章,可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开始辩论了。李可夫同志也遭到广泛的“攻击”,而且关于他的流言传得很广,他也必须起来反对。我们几个人必须要么投入战斗,要么离开工作。在我们生活的条件下,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认为进行辩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请允许我们离开。”

雅罗斯拉夫斯基:可是在这之前你们就到加米涅夫那里去了。

托姆斯基:因为激烈的攻击还在进行,我和布哈林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继续遭到射击,所以我们声明:“请允许我们离开这些岗位。”不过我们并不拒绝其他任何工作,我们并没有拒绝在政治局工作。我们只是请求解除我们的职位: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和我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职务<sup>68</sup>。我们想带着它来参加中央全会。全会可以拒绝我们的辞职。在这里我要订正一下斯大林同志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讲话中的不确切之处。他说,我们“当时(即在11月份,在十一月全会之前——米·托·)是带着一份专门的集体辞职声明到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起草小组来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辞职是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机关提出的,而斯大林同志,据别人告诉我,把这封信拿到小组里,让参加小组的一些政治局委员讨论,而我也被召到小组里。我们讨论了迫使我们提出辞职的种种条件。不信任的气氛、“恶意攻击”、败坏声誉,我们感觉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不可能认真地履行领导工作。所以我们提出了一条最不困难的出路——让我们辞职。而且我们并不是这样提出的:这是我们的辞职信,我们走了。我们希望带着辞职信来参加中央全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告诉了其他政治局委员。这有什么不忠诚的呢?同志们对我们说,这将是一次领导危机,不要把关系搞紧张了,向中央全会提出辞职这件事本身就能引起爆炸,别这样做。有些同志把事情说成这样:没有对我们进行过恶意攻击,谁也不曾惹我们生气,怎么回事等等。那就给我们洗一次冷水浴吧,请一位心理医生,给我们服溴剂好了。怎么回事:我们是病了,还是疯了?

我不来转述令人十分难受的两天小组会的全部内容了,最后终于问我们了:

“你们要什么？”我们提出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些为创造健康的气氛，使我们能够工作的最起码条件。这是一些最起码的条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些条件应当表明，恶意攻击已经停止，野心分子得到遏制，而主要的是提出一个标准，表明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准备同心协力地共同工作的意愿，为我们工作创造必要条件的愿望。条件中包括撤掉一些最起劲地攻击我们的某些同志，必须召回奈曼，因为他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德国特别狂热地破坏布哈林同志的声誉。起初对我们说，我们的条件仿佛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后来，在两天的谈判过程中，这些“愿望”<sup>\*</sup>就所剩无几了。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并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你们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不跟你们谈了。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我们说：亲爱的同志们，这证明你们不想改善环境，不打算为我们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一直被告知，说是我们错了。我们决定试一下。辞职信被撕掉了，我们放弃了向全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在十一月全会上表现一致，决定一致投票赞成决议。小组的闭门会议上有过争论。布哈林认为对富农课税和超额课税的原则应当保留，甚至加强，但必须采取别的形式。布哈林同志甚至提议对富农的课税比现在还要重些，但是放弃个别课税<sup>69</sup>，因为执行个别课税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就算布哈林同志错了吧。任何讨论、任何探讨问题都是怎样形成的呢？有人主张这样，有人主张那样。集体工作的意义何在呢？每一个提出建议的人都知道：他的建议或者被接受，或者被否决。如果建议被接受，那就是说它是正确的；如果被否决，它就是错误的。如果实行另一种办法：一个人提出建议，其他人接受了，但是没有人说什么好话；如果建议被否决，别人就来劲了，起先说是错误，然后是倾向，把它拿到发生这事的机构外面去，那还叫人怎么工作！如果你们在任何一个集体或者常设局内规定这样一种工作制度：只能提出绝对正确的、无可挑剔的建议，如果你提出的建议被否决或修改了，那就应当这样看问题：某人提出的建议被我们否决或者修改了，因为它是错误的，建议错了又因为这个人错误的，而人之所以错是因为他的方针错了，然后就说是倾向，——那还能工作吗？于是我们的集体工作制度变成了这个样子：在各个常设局里只能有一个或两个绝对完美无缺的圣徒，他们说的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迫使别人接受他的决定，除此之外，一切都被认为是“倾向”——其余的人只能注意听着，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而这就是倾向。

\* 是托姆斯基添加的。——编者注

那些在政治局闭门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在政治局门外传来传去呢？这是为什么，又对谁有利呢？为什么放弃对富农个别课税的建议被歪曲了，让市场有更多自由的建议冲出了政治局关着的门框，而且以严重歪曲的形式到处流传？谁需要这样呢？又是为什么呢？

最后是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唉，同志们，对工会八大的态度是非常奇怪的。我同政治局的个别同志谈过，八大应该有个结论：如果必须撤换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我准备不声不响地、毫无抗拒地离开。我至今信守自己对党内同志许下的诺言。怎么说呢，难道我和工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其他委员真是什么不可取代的官员吗？只有在争论中发火时，斯大林同志才会说我和布哈林仿佛把自己的岗位看成“封建王国”。如果你，斯大林同志，说的“封建王国”确实有一丝一毫的真理，那就应当立即撤掉我和布哈林同志。我几十次地说过，党应当特别严格地挑选工会运动的干部，因为这个工作比其他任何工作都有更大的危险把党同广大非党群众对立起来。难道我在讲话中不是一再谈到这一点吗？如果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同志稍有怀疑，认为我们，我作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布哈林同志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把党出于信任而委派给我们的岗位看成自己的“封建王国”，在那里为所欲为，“随心所欲”，那就应当毫不拖延地立即撤我们的职，而不用说服我们收回辞呈。我说过，如果有人真是这样看，而又对这些事不予理睬，那他就会给党造成很大危害。显然，斯大林同志在这样说的时侯，他自己也并不相信。所有这些都全是胡说八道。

叶梅利扬同志，我不相信，——我们认识已经25年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你会故意歪曲事实真相。你昨天说：“托姆斯基在工会八大上没有谈阶级斗争。”你不是连我的报告都不曾读过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是一般的阶级斗争，而是同右倾危险的斗争。

**托姆斯基：**如果你愿意，我给你引一段报告里的文字：谈阶级斗争及其尖锐化的，谈必须同富农进行斗争的等等。看在上帝分上，你读一读吧。你说：“托姆斯基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里没有谈阶级斗争，没有谈必须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同右倾作斗争。”我认为，右倾问题是党内问题，所以我在非党人士面前没有谈。至少当时是这样的。这不是工会运动的问题，不是要由党外群众来评判的问题，如果你在我向大会做的报告中，在我在大会的活动中确实察觉了什么错误的东西的话，你应当立刻就说：“托姆斯基，你在报告里遗漏了东西了，你犯了错误了。”有人对我这样说过吗？谁也没有说过。报告广播了。我讲了四个小时。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当然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表述得不确切。如果我



们互相盯着,盯着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个词,那么,同志们,请别生气,把你们任何一个人拿出来,特别是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和加里宁同志,审查你们所有的报告,审查每一个提法,然后再来分析有没有错误,为什么没有谈这一点啦,为什么没有指出那一点啦,为什么不这样说啦,为什么有这个错误提法啦等等——我们一定能找到让人啼笑皆非的表述!但是尽管对我在大会上的讲话拿了放大镜来审查,却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对我提出过任何意见。大会上出现了不健康的环境,而且由乌克兰代表团制造的这种环境在增长。到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大会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就不像有人在这里说的那样心平气和了。大会领导小组投票表决的结果是9比10和8比9。任何一次工会代表大会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事。领导小组会议的进程和小组投票的结果平分秋色,这事实本身就说明气氛不健康。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终于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早上4点钟,在小组开会的时候,莫洛托夫同志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把卡冈诺维奇补进主席团,你以为如何?”我当即回答说,我反对。可是问题被提付表决,气氛立刻就紧张了。你们希望怎样看这个问题,是从形式上看呢,还是从实质上看呢?如果从形式上看,那就没什么可讨论的,每个人当然有权提出候选人,并且提付表决。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这样解决过政治问题呢?把卡冈诺维奇补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无疑是政治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在我们领导机构的历史上有过不事先和一个机构的领导同志们打招呼,不顾他们的希望,单纯从形式上来解决这类问题的事吗,不商量,不说服……

**伏罗希洛夫:**把一个同志补进主席团或者不补进——没有过这种先例吗?

**托姆斯基:**伏罗希洛夫同志,我来告诉你,我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的10年或11年中,补进或者不补进某个同志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关于是否把安德烈耶夫同志<sup>70</sup>和安季波夫同志补进工会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指望他们成为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干部,还是指望什利亚普尼科夫同志,——这个问题我不清楚,当时我在突厥斯坦<sup>71</sup>。

**臧声:**难道是个问题吗?

**托姆斯基:**就是这个问题。历史证明,我是正确的。我向党建议,而且坚持要指望安德烈耶夫和安季波夫,而不是指望施略普尼柯夫。事情就是这样。

补进卡冈诺维奇同志会怎样呢?他只能把所有对卡冈诺维奇同志的人品不满意的人发动起来,因为我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小组里的意见分歧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卡冈诺维奇和企图扮演反对派角色的乌克兰代表团的头头有思想联系,而且很接近,这对谁都不是秘密。谁都知道,所有反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路线的人都得到这位中央书记的支持,他们也都都被提名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候选人。在被提名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许多候选人存在严重分歧的条件下,把卡冈诺维奇同志补进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这种情况下显然是没法工作的。这就意味着一切都将越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来进行。这只是间接地表示对工会中央理事会现任领导政治上的不信任,并且安排了对他的斗争。

有人在这里说“政委”等等。同志们,我要说,我们这些老工会干部在工会中央理事会什么没经历过。政委我们也见过。你们不妨去问问布哈林同志。他和拉狄克曾经一度被任命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政委。你们知道吗?工会中央理事会当年有过两个政委,就是布哈林同志和拉狄克同志。不过当时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路线不正确”,并且在代表大会之前任命了政委<sup>72</sup>。这是在第三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之前<sup>73</sup>。那时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无论是报纸,还是支部都没有任何“恶意攻击”。这个问题是在上层,在那个圈子中解决的。他们被任命是为了对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路线进行政治监督,这一点谁也不隐瞒。现在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卡冈诺维奇同志该起什么作用呢?有人说,补进他是“为了联络”。昨天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解释改变《真理报》编辑部组成人员时说,必须补进某些同志,因为那里都是一些年轻同志,没有经受过足够的党的路线的考验,所以要补进克鲁敏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等等。这个论据总算有点道理,因为它指的是年轻。可是你们说说,难道在工会理事会主席团里也全是太年轻的人吗?如果你们说,“是太年轻了”,那简直是奉承我们!或者工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同志们经验不足,没有经受过足够的党的路线的考验吧?那里有14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sup>74</sup>。为什么非要再补进卡冈诺维奇同志呢?为了联络吗?那为什么又需要这种联络的新形式呢?为什么不把工会常任干部中的某个人补进中央书记处呢?为什么你们事先不跟我和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其他委员谈谈:同志们,我们认为联系不够,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改进和加强这种联系的办法。这样不是就好一些吗?那为什么不谈,不打招呼,也不商量就把问题直接提了出来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这样做对不对,请你们来判断吧。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我相信由于我的存在,工作以至整个组织都会来个大翻个,我就不能再待在工会理事会里。代表大会之前,我是在十分沉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在业已形成的环境中,内部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要继续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是不可能的,我不会这样工作。也许这是可恶的,也许我的做法很糟糕——

请你们来判断吧,不过我不能这样工作,而且认为在这个广泛的非党工人组织中这样工作是错误的、有害的。在非党的工人组织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有领导的充分团结一致,领导层中不能有丝毫怀疑、动摇和摩擦。如果我们在工会理事会主席团里组织多数派、少数派,那就必然有隐蔽的斗争、争吵等等——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行的,这不叫工作,也不是领导。所有反党分子,甚至反苏维埃分子就都会钻这个空子。对工会这样的组织是不能开玩笑的。政治局的同志们应该怎样办呢?他们起码应当深思熟虑地对待我的论据。如果他们看到我不能,如果我说我不能在工会理事会工作,就应该关注这件事,认真思考导致我这样做的原因。可是对我说了些什么呢?对我说:不行,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工作。开始了野蛮的,请原谅我用词粗鲁,党的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中伤。从工会八大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事?关于托姆斯基,散布说,托姆斯基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看成“自己的封建王国”,托姆斯基想把工会同党对立起来,托姆斯基同联共(布)中央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联系——为了加强联系必须把卡冈诺维奇补进去。现在甚至影射说托姆斯基已经成了“官僚”了,还有,托姆斯基“右倾”,托姆斯基是“破坏者”、“怠工者”、“逃兵”等等。经过了这一切之后,你再来试一试领导吧!同志们,把一个带着这样鉴定的人派去当领导,要么是十足的虚伪和嘲弄,要么是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你们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领导呢?如果对我的指责哪怕有十分之一属实,那这样的人就应当把他痛痛快快地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岗位上轰出去,不能把他放到广泛的非党组织中去。“企图把工会同党对立起来”——这是最厉害的指责。如果有这样的怀疑,如果它哪怕有十分之一是对的,我再重复一遍:决不能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后来就开始做出责备的决议了,开始把那些和我持相同意见的人免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你昨天说,我在声明中引用了党章,为的是替自己不服从中央辩解。我引用党章是为了证明,党章的这一段赋予每个党员权利在工会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投票赞成请中央重新考虑关于补进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决定。有92个人这样做了。为此其中的一部分人被撤了职,而另一部分人被要求忏悔,要求放弃他们的做法。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让人解释,为什么你这样投票,而不那样投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为人们根据党章赋予的权利,按他们的意愿投了票而被撤了职?我不引用某个同志关于一位省委书记的信中的一小段话了。这段话非常简要地说明了,为什么撤了那些要求重新考虑将卡冈诺维奇同志补进工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决定的同志们的职。当一位同志提出,为什么撤了他们的职,而没有撤托姆斯基?为什么托姆斯基没有被

撤职,而那些认为托姆斯基正确的人倒被撤了职?他得到的回答是:同托洛茨基是怎样斗争的?同托洛茨基也进行过斗争,也把托洛茨基保留在领导层里,而托洛茨基分子则到处都被撤了职。然后又说,你去领导工会中央理事会吧。我不能做这样危险的实验,到工会理事会去,装模作样,好像的确在领导,也就是形式上执行党的纪律。实际结果并不重要,可以不去管它,是吗?你们怎么看呢?我不能去,我也没有去。如果强迫我去,我有合法的权利向中央申诉,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历史上何曾见过完全不顾个人的愿望,不顾他不能履行该项工作的坚决声明,而强行任命的事?在这之前我有过哪怕一次提出辞职的事吗?我在困难条件下工作了十年,难道过去的十年里是那么容易工作的吗?难道我没有经历过同托洛茨基的最严重的冲突吗,难道不是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同他在政治部、劳动军事化等等问题上有最强烈的分歧,而我有时不得不违心地履行职务吗?政治局里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有过多少反对派!可是我直到现在没有提出过辞呈。从来没有提过。我总是以党的利益为重,对大家说:辞职不合适,党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撤谁的职。党、中央、政治局、党内同志不应当形式主义地对待这件事,而应当从实质上看问题:为什么你,一个在党内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为什么你说不能履行政治局的决议?可是没有这样对待,认为只要迫使你放弃辞职就够了,用“敲断脊梁骨”来做说服工作,仿佛这就是党的政治工作的典范!然后就安排了败坏声誉的活动,迫害……明显地歪曲事实。说是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罢工了”,说他们“不愿意工作”,他们“害怕困难”。这是事实吗?我们,我和布哈林,不能在工作过的岗位上(工会中央理事会、《真理报》、共产国际)工作下去,因为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工作条件并不比我在工会理事会的条件好些。可是这是不是我们根本不想工作,不想参加政治局,拒绝为集中解决各种困难等等的政治局的工作负责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最后,我要认真地谈谈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

主席:你还有一刻钟。

托姆斯基: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主席:托姆斯基同志还剩下一刻钟。他请求再增加半小时。

喊声:给他!

托姆斯基: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文件说两句。值得说说这份文件的出笼很可疑吗?值得为此而认真地争论吗?这份文件的出现,而且变成了传单至少是十分神秘的。这很像是一篇侦探小说的片断。的确,这看起来怎么样?布哈林

到加米涅夫那儿去了。加米涅夫就像一个天真的女学生,在第一次同情人会面后,用颤抖的手给自己的“女朋友”季诺维也夫写信说,“他”来过,“他”说了些什么。(笑声)

伏罗希洛夫:谈恋爱的人都是这样的。

托姆斯基:而且,是什么样子呢?“他”来了,不停地说话,而“她”呆若木鸡,一声不响。(笑声)

伏罗希洛夫:你把自己的友人们描写得不错嘛!

托姆斯基:这份文件落到了“女朋友”手里。“女朋友”没有发现,一个“恶棍”,大约是带着面纱的妇人,把它偷走了。从哪儿偷的呢?从书桌里吗?也许是。从衣袋里吗?也许是。什么时候偷的呢?不知道。“恶棍”又是谁呢?不知道。不过可以得出结论:历史终究会揭开恶棍的姓名。这一切是多么奇怪。两个人聚在一起,谈了些话。不知为什么这次谈话却被记录下来,具有了文件的形式。这记录不知为什么又很片面:只有布哈林同志一个人在说,而加米涅夫同志或是一声不响,或者给他提一些很聪明的问题。布哈林似乎滔滔不绝,而加米涅夫同志则默不作声。如果你想从这份文件里看出加米涅夫同志对涉及的问题怎么看,那你是办不到的,因为不知道他是否在听。这是一次奇怪的政治谈话。它持续了两小时,清楚的是一个人在不停地说,完全不清楚的是另一个人持什么看法……

鲁祖塔克:让布哈林自己说吧,他是当事人。请布哈林讲讲加米涅夫说了什么。

伏罗希洛夫:托姆斯基同志,你在这里讲得可是很糟糕,很糟糕。

奥尔忠尼启则:请布哈林讲讲加米涅夫说了什么。

托姆斯基:请让我说说我认为必要的话。谈话变成了文件。这文件又从写文件的人的衣袋里走了一段距离,落到了另一个人手里,它在另一个人那里又神秘地消失了,不知怎么一来又被托洛茨基分子印了出来。

好了,现在来谈谈这份文件的实质。我们在讨论布哈林同志的举动。布哈林同志自己也认为这个举动是错误的。他值得去找加米涅夫吗?不值得。接下来是什么呢?我和李可夫受到指控,说我们知道这次谈话,却没有报告,指控我们是所谓“掩盖罪行”。关于掩盖罪行。首先是谈话本身,一个政治局委员能不能同加米涅夫或者季诺维也夫谈话?如果你们来问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能谈还是不能谈。

喊声:你太天真了。(喧闹声)

托姆斯基：我想一般说来是可以谈的。为什么不能谈呢？

雅罗斯拉夫斯基：用这种语气谈政治局？不行。

托姆斯基：你不必提醒我。关于政治局的政策不应该谈。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是不是犯了错误呢？好的，我想起了同加里宁同志的一次谈话。他有一次顺口告诉我：“季诺维也夫邀请我同他谈谈，我想去谈谈。”我没放在心上，我当时没有想过他打算犯罪。这有什么呢？加里宁同志是否到季诺维也夫同志那里去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谈过，我也不知道，我对此不感兴趣。他说：“我想去同他（季诺维也夫）谈谈。”我回答说：“这有什么呢，没关系。”他去没去，我不知道，谈没谈，我也不知道。我头脑简单，当时不知道我应该，按现在的说法，立刻去找奥尔忠尼启则，告诉他；加里宁想同季诺维也夫谈话。我当时想，如果他，加里宁同志，想到季诺维也夫那里去，那就不会有什么坏事。（笑声）

[伏罗希洛夫：你是那么想的，却受骗了<sup>75</sup>。]

托姆斯基：起码我这个头脑简单的人直到今天都是这么看的。我一生见过各种事情，可是我第一次看见谈话变成了文件，而文件又变成了传单。在我和加里宁谈话时，我根本没有想过加里宁会去，而季诺维也夫会把这次谈话变成文件。我从没想过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过了三分钟我就忘了这次谈话。指控我和李可夫同志，说我们没有报告，显然是很牵强的。因为我们的罪过就在于布哈林事后告诉我和李可夫同志，说他找了加米涅夫同志，和他就各种政治问题谈了话，而我和李可夫应当跑去报告，说布哈林犯下了“反党罪行”。在出现文件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这样说。我敢断言，如果布哈林同志对你们中的任何人说：我找过加米涅夫，和他谈了种种政治问题，未必会有人说他是罪犯……

臧声：问题就在这里。

托姆斯基：这在你们眼里被看成罪行，仅仅因为这次谈话具有了文件的形式，而后来又成了该死的传单。

臧声：问题在于内容，而不是形式。

托姆斯基：是不是有一个集团呢？在这个问题上，对待文件的态度令人感到奇怪：当加米涅夫说的话对布哈林不利时，大家都相信加米涅夫；而当加米涅夫否认这次谈话具有集团的性质时，大家又不相信他了。加米涅夫说：没有谈过集团。布哈林是政治局委员，他也说：没有谈过集团。索柯里尼柯夫是中央委员，他也说：没有谈过集团。可是提出指控的人却说：不对，谈过集团。为什么这一次不相信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了呢？谈到笔记的真实性时，斯大林同志是这样说的：“李可夫把加米涅夫的‘笔记’称为讹诈的伪造品。我也许不像李可

夫和布哈林那样信任加米涅夫。可是加米涅夫同志是党员。既然他在呈交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专门声明中肯定由托洛茨基分子发表的他的笔记符合实际,我就不能把这份文件称做伪造,也不能说它是讹诈。”(1929年11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速记报告,第84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米·托·)

可是加米涅夫同志是党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是中央委员,布哈林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都说谈话一点也没有涉及集团,而别人却依然断定有集团存在。这些断言是根据对谁的信任呢?这些断言对不对呢?不对,是空话,没有证明。谁需要这些话呢?为什么需要呢?这只能使党陷入谬误,而不能说明真相。

施利希特尔:谈判在集团之前。

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分子为什么要出版这份文件呢?这份文件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党的领导人在我们经历的环境中,在政治局内关系紧张、剑拔弩张的环境中应当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昨天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读了托洛茨基信中的一段话,它无疑说明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信里给自己的同伙发指示说:“必须公布,目前这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认为这在“目前”是重要的呢?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用了多少是正常的途径,在自己的圈子里试图消除这些紧张关系和许多分歧,把它们掩盖起来,使它们缓和下来,而不至于爆炸。而托洛茨基分子却想揭开它们、扯断它们,使它们更加尖锐化,引发激烈的斗争,使党经历一场领导危机。这就是党的敌人所需要的。谁也不能否认,这才是这份文件的唯一政治方针。大家都同意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份在政治上进行讹诈的文件,为的是在党内造成混乱、纠纷,破坏领导的威信,搞垮整个现有的领导。

请问,为什么政治局的多数会受到这种挑唆?(喧闹声)

Cr. 柯秀尔:谁受挑唆了?你搞错了对象。

托姆斯基:你是要发言的,你来回答我吧。

喊声:你回答吧。

托姆斯基:你们许多人讨论过不止一次了,做出了种种决议,我都没有参加,我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发火生气,所以请你们平心静气地也听我说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可是不妨听听。

Cr. 柯秀尔: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呢?

托姆斯基:别急,听我说。

为什么你们要受这次挑唆?为什么你们接受了这次讹诈?能够怎样利用这

份文件呢？这份文件可以从两方面来利用：首先，托洛茨基分子是进行讹诈，想用这份文件挑起党内危机。我们不能上这个当，我们应当尽量避免他们指望的爆炸，相反，应当巩固，应当团结自己的队伍。

**伏罗希洛夫：**我们在政治局的三次会议上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可是你们在会上干了什么呢？

**托姆斯基：**干得比你们好，比你们体面。

其次，这里有一份文件，可以用它来反对某几个政治局委员。用这份文件可以败坏布哈林同志的名声，顺便把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也捎上一块儿整。

这就是文件的两种用途。给它派了哪种用途呢，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给它派的是第二种。这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党已经多少次主要讨论这个问题了，虽然党和国家面临着更重要的、更严重的问题。对这份文件是怎么看的呢？文件在这儿。有这份文件。布哈林犯了错误，这我也同意。布哈林自己也承认是错了。可是却对我们说：你们收回辞呈，承认布哈林做错了，那我们就可以减轻处分，把这个问题的讨论记录藏进档案里去。我们能同意这样做吗？不能。同志们，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这是无原则的态度。

**伏罗希洛夫：**就是说，这份文件应当肯定你们开始了反党斗争。你们要的是这样吗？

**托姆斯基：**辞职问题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没有关系。它的解决应当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完全脱钩。托洛茨基分子的这份文件对于你们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正好落在辞呈上。为什么要把辞职问题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联系在一起呢？为什么呢？难道它消除了那些迫使我们提出辞呈的条件吗？只有那些打算使关系尖锐化的人，只有那些想在这个问题上算账的人，只有那些想使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希望用内部方式消除掉的东西发生爆炸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像现在人们这样来处理这份文件。文件处理错了。如果大家说，文件在国外已经广为流传，那这并不是难事，因为你们用红皮书<sup>76</sup>印发了它，印了几百份，甚至上千份，发给各级组织，各级组织发给了小范围的积极分子，从小范围扩大到大范围，然后又到了某些支部。

**伏罗希洛夫：**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

**米高扬：**德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从俄国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得到的，这你知道吗？

**喊声：**你走得太远了。

**托姆斯基：**你们不用吵吵嚷嚷的。你们知道，我们有庞大的党的机构，哪怕



只印200—300份,向全国发下去,到地方上就有几千人传阅,进入成百上千个家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省到县,难道不会有疏漏的时候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可这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传单。

托姆斯基:是的。如果你们计算一下,如果缅仁斯基同志计算一下,托洛茨基分子散发了多少份传单,你们把它作为中央政治局的文件又印发了多少份,那就可以看出,你们的数字要超过传单读者一千倍。假如所有的传单都被收缴了,而且就此打住,那它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广泛流传。

臧声:也不会传到国外吗?

托姆斯基:与此同时,流传着种种议论、窃窃私语,然后是含沙射影,然后就开始指责,说我们对右派持调和态度、动摇、摇来摆去、惊慌失措等等。后来我们自己就突然变成了调和分子,最后成了右派,就是被我们自己投票赞成的中央十一月全会决议宣布为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右派。

伏罗希洛夫:是突然的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真是怪事!

托姆斯基:不对,不是突然,而是逐渐地,可是十分巧妙地。从七月全会直到这次全会,通过一种特别的程序逐渐地给我们改变颜色,逐渐地,每天稍稍地给我们抹上一点——今天抹一点,明天再抹一点。好呀,既然你们坐着一声不响,那就再抹一抹。由于这样巧妙的工作,我们就被变成了右派。

斯图鲁阿:你们还支持弗鲁姆金吗?

托姆斯基:对不起,请让我说话,你还能证明我们是右派呢。

斯图鲁阿:你们投向右派了。

伏罗希洛夫:或者你们是非常左的。

托姆斯基:确实,有这样的指控,说我们是右派,布哈林这个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共产国际的书记,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工作,就被指控是右派;李可夫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右派;托姆斯基不想在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也是右派……

臧声:那宣言呢?

托姆斯基:为什么非要逼迫他们在这些岗位上工作呢?一般说来,能不能让这些干部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呢?那到处谈论,而且把他们定为右派又是什么意思呢?要不要引用政治局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做出的最新决议呢?当然,那就请听吧,我来念:

“李可夫同志不满的是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试图给‘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而政治局没有对此予以反击。这个意见毫无根据。政治局并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根据什么认为布

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右倾。至于政治局本身,则它没有掩饰,也不打算掩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基本上背离了党的路线,而接近党认为其纲领是右派纲领的弗鲁姆金同志的立场。这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中说得很明白。不能排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可能放弃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如果发生了这种事,党就没有理由指责这些同志右倾。如果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等同志不放弃这个错误立场,则党,不言而喻,将把他们看做是转到了弗鲁姆金阵营中去的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9年4月1日致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信<sup>77</sup>)

而乌拉尔州委全会的决议说:

“他们(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米·托·)继续固执己见,坚持对党的指责,滑到了右倾立场上去……

全会坚决谴责个别同志企图把自己同党的所有分歧都传到非党群众中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全会1929年4月14日决议)

所以说,这些文件宣布我们是右倾的代表人物。广义上的右倾是指什么呢?

塔甘罗格州的《红旗报》写道:“右派说,为什么要支持中国革命呢,让我们同英国划分在中国、波斯和阿富汗的势力范围不是更好吗?”(《真理报》,1929年4月7日)

请你们读一读加里宁同志的报告提纲,你们会看到,右倾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党。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克兰的全权代表巴利茨基同志在发言(刊登在《真理报》上)中说:“我们知道一些反革命政治活动家发表了许多声明,说右倾分子的口号完全符合反苏维埃集团、富农集团和耐普曼集团的心情。”(《真理报》,1929年4月13日)

喊声:对!

托姆斯基:政治局的多数人说我们是右派,地方上的同志们说右派想同英国划分势力范围等等,乌克兰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人说右派的口号得到白卫分子的响应和支持,而这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说的,指的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又对我们说,没有人在败坏我们的名誉,并且建议我们回到由于这种恶意攻击而被我们放弃了的位置上去,还对我们说:怎么回事呢?你们别激动。干你们的活儿,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谁惹你们生气了?许多组织都在讨论,要不要把我们开除出政治局。如果这些指责哪怕有一丝一毫是确实的,如

果你们的确相信波斯特舍夫昨天说的,右派想使党“被富农牵着走”,如果你们的确相信这一切,如果你们的确认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右派,你们何必聚在这里,打算讨论是不是把我们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呢?这样的人是不能留在政治局的,也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连留在党内也是不行的。如果你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切,而且看起来就是这样的,那就请你们说说,谁须要这样做呢,这样的鼓噪对什么人有利呢?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如此这般地解释了右倾危险之后,装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在投票表决结尾部分谈到反右倾斗争的五年计划提纲时,我们为什么要弃权呢?在表决加里宁的提纲<sup>78</sup>时,我们弃权了,因为除了一系列错误方针之外,提纲还谈到右派企图将资产阶级倾向强加给党。有人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弃权?因为你们对右倾做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你们想把我们搞成右派,既然你们想把我们置于那个自我鞭打的士官遗孀的地位,那你们就把我们看得太坏了。

臧声:难道你们就是右派吗?

托姆斯基:这一套巧妙的圈套是怎样搞的,这种神话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如果你们认为这些技巧除了诽谤,还能算个什么玩意儿的话,那你们就错了。像不断让步论这样的神话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斯大林同志说:“……我不能同意托姆斯基同志昨天的讲话。按照托姆斯基的说法,工人阶级要保证同农民的结合,只有一种可用的手段,就是让步。今天让步了,明天还得让步,没完没了的让步——说是这样结合才能巩固,而工人阶级才能加强。不对,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种忧郁的哲学和我们党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斯大林在七月全会上的讲话速记报告,第3卷,第38页)

这一切来得多么快——砰的一下子!就“和党的政策没有共同之处了”。今天还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明天就滚蛋吧,机会主义者。这样干是多么轻巧,轻巧得让人吃惊!25年党龄毫无意义。就算我话说得确实不对吧。列宁有一次给我的结论是:“托姆斯基不是理论家。”是的,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理论家,可是现在,即使是我错了——实际上我并没有错——我立刻就成了“和党毫无共同之处”的人,成了“机会主义者”。

臧声:他指的是右派,不是说你。

臧声:弗鲁姆金怎么样?

托姆斯基:别打断我。到你发言时再说,你们喜欢这种非同志式的态度,可是不喜欢,我要抗议,这是我布尔什维克的权利!请别打断我讲话!

我继续引用斯大林的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某种城乡结合。这种结合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加强工人阶级,能够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结合。我想,不断让步的政策,在来自农民的压力是由富农分子组织的条件下,只能削弱工人阶级并破坏它的领导。”(同上)

下面,在另一个地方,斯大林同志说:

“……受到富农鼓励的农民可能要求我们取消关税壁垒,取消对外贸的垄断,以便得到最便宜的外国商品。大家知道,这种要求在很多农民阶层中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边境地区。该怎么办呢?也许该做出让步并取消对外贸的垄断?”(同上)

所以,按斯大林的看法,似乎我在发言中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步”,而结合不应当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现,这种结合像是为结合而结合,农民要什么就给什么,直至放弃对外贸的垄断。如果我的确是这样说的,那当然是不断让步论。可是宣传鼓动员们在各种会议上正是按斯大林的意见这样讲的。

而我实际上是这样说的:

“……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用工人阶级,而且要用农民的双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你们大概还记得,这就是列宁的说法,我是凭记忆说的,可是你们大家都知道。所以,结合不是为结合而结合,而是为了充分地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和在实践中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条真理。可是怎样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这种结合呢?这种结合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可是这样说还不够。说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是不够的。必须说它用什么办法实现。怎么办呢?让工人阶级抓住中农的衣领来“领导”他吗?不行,不能这样来实现结合。结合是通过工人阶级考虑到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特殊利益,经常向基本农民群众做出某种让步来实现的。”(七月全会速记报告,第2卷,第133页)

我接着说:

“……它(工人阶级的领导)表现为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领导着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政策。”(同上,第134页)

接下去:

“……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怎样来实现对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呢?它是在工人阶级对中农做出许多让步的条件下,在必须保留自己的实现社会主义、在我国实际上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情况下,把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对外贸的垄断、我国的财政制度、国有化的工业等等,总之,就是我们经常

称之为命脉的那些东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的。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能做任何让步的。”(同上,第134页)

这就是我说过的话。这里有什么不断让步论吗?为什么会这样恶意歪曲我们的观点?为了破坏他的名声,在党面前羞辱他,“恶意攻击”他,把他说成右派。

这不断让步论表现何在呢,它是怎样表述的呢?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卡冈诺维奇同志。听听这个年轻领袖是怎样说的吧。在乌拉尔党代表会议上他说:

“右倾分子提出的不断让步论是这样的让步,它不符合中农和贫农的利益,而是对富农的历史性让步。富农手里掌握着粮食,他们想用瘦骨嶙峋的饥饿之手来阻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前进步伐。当然,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在必要时可以,也应当对基本农民群众——中农和贫农做出必要的让步,而这些个别的让步同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是并不矛盾的;例如,大家知道的提高粮食价格、新的农业税法,可是这不是右派提出的那种让步。这样说了之后,右倾会把我们引向哪里难道还不清楚吗?它把我们引向进去容易,出来难的那座门。门额上写着:‘欢迎光临资本老爷的王国’。”(《真理报》,1929年4月10日,第82期,卡冈诺维奇同志在乌拉尔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还有比这种伪造的、强加于我的倾向更恶意的、更诽谤性的、更不诚实的、更加非同志式的东西吗?还能有比这更糟糕的东西吗?

在这之后却对我们说:你们何必生气呢,同志们,何必激动呢,何必抗议、抱怨呢,谁恶意攻击你们了?

我再谈谈个别的指责。

我们被指责搞宗派。宗派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宗派活动的特点是党内某个集团形成党内的一个组织单位,在组织上多少是成型的,结合起来捍卫自己的观点体系,他们在党内,有时也在党外用散发印刷的或是手写的、合法的或是非法的文件的办法,用在党的会议上发言的办法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你们看见我们有这种宗派活动吗?我们用散发某种文件的办法来散布自己的观点或是观点体系,反对党的机构,这次就是反对中央委员会了吗?你们看见了这种事吗?你们看见我们在党的什么会议上把政治局内的分歧透露出来了吗?在这整个时期里,我们的“宗派性”和我们的行为,如果说可以给我们起一个外号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托尔斯泰主义者”。(笑声)因为我们遭到了恶意攻击,而我们却老老实实,一声不响。几百份咒骂的决议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泼脏水。有些同志创造了多少词汇,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

至我们不单纯是对党“撒谎”、“诽谤”，而是散布“诽谤性的谎言”。比如说，我们在昆古尔党组织的决议里就见到了这种珍品。

伏罗希洛夫：米沙，这不是新玩意儿。季诺维也夫也从各个党组织里找出过这些东西。这个例子不好，已经过时了。

托姆斯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好不到哪里去。半斤八两吧。（笑声）

哪有宗派性呢？我们唯一的宗派性就在于我们三个人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发表了一份文件，在中央政治局的闭门会议上共同签名，赞同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怎么啦？是一个完备的纲领，还是系统的观点呢？都不是，你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写这份文件是在建议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草案起草和分发之后，而通过这项决议只能被认为是让人在政治上受到羞辱。我们有责任回答这样的“草案”，于是在文件里这样做了。怎么啦？我们分发过这份文件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份声明在分发给中央委员们之前搁置了两星期；我交给中央委员会是在1月14日，的确，经过我同意，有两个星期没有发出去，我不能自己去分发它，难道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吗？可是我们在哪儿，在什么会议上反对过政治局多数的路线吗？哪儿有宗派活动呢？宗派活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整个宗派活动就在于布哈林常去托姆斯基那儿，而托姆斯基又常去李可夫那儿。哎，同志们，如果你们指望，我们这几个政治局委员在彼此拜访时都带上假发和假胡须，那就错了。如果这就是宗派活动，那莫洛托夫常去斯大林那儿，斯大林也去莫洛托夫那儿，伏罗希洛夫常去斯大林那儿等等，你们也都得称之为宗派活动。人们是在生活，他们彼此拜访，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就政治问题谈一谈。同志们，宗派活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关于领导。什么叫领导，它的实质又是什么？任何领导的任务就是围绕着当前的最重要的、最必须的问题团结工人阶级，团结全党，发动并组织……

喊声：是党赞成的问题，而不是你们提出的问题。

托姆斯基：发动并组织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去解决面临的问题。为此需要什么呢？为进行这样的领导必须使党获得正确的信息。为此应当向党和工人阶级提出，决不粉饰现实，也不缩小工人阶级和党面临的种种困难，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为此须要在各个时期找到必须抓住的环节，在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对彼此的意见持集体主义的、同志式的、宽容的态度。这一切在我们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列宁的条件下，迫切要求必须进行集体领导。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正确领导。我们现在有没有集体领导呢？应不应该有集体领导呢？从前，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期，我们察觉到，而且是斯大林同志首先察觉到，季诺维也夫

同志的某些倾向,企图突出他自己,把他自己放到第一位来取代集体,用个人来取代集体制。我还记得,开始是斯大林找了我、已经去世了的伏龙芝,好像还有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向季诺维也夫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样工作是不行的,他不能容忍这种倾向。你们知道,由此引发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当时斯大林同志对不对呢?他当然是对的。为什么我们会支持斯大林呢?因为他针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实行个人政治或是两人政治的企图提出必须实行集体领导。我们在这次合法的、正义的起义中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消除了实行个人政治的企图。

扎东斯基:说实话,是谁反对谁呀?

托姆斯基:你用不着提醒我,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不是别人希望我说什么。

现在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集体工作呢?集体工作首先就要求集体的全体成员有充分的自由在绝对同志式的信任环境中畅所欲言,这是保证客观地、全面地讨论重大问题的必要前提,即便是在集体的闭门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说过:“政治局是一个可以摇来摆去的机构。”可是我们没有对别人意见的这种同志式的宽容态度。我们现在是每个人都必须提出百分之百正确的建议。如果它有百分之二是错误的,或者像布哈林遇到的那样,十分之九都同意他的意见,只有十分之一不同意,那这十分之一就是“反党的”,等等。就给他扣上种种的倾向,然后秘密会议上的事就窜到了门外,成了广泛“讨论”的题目。

集体领导要求在讨论问题时有完全的自由、充分的勇气和布尔什维克的大无畏精神。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同志们会纠正;别人错了,我就来纠正。我们大家一起来找出一条最正确的,能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路线。从党的利益来看,集体领导的原因就是我们大家加在一起也顶不上一个列宁!无论谁,如果有任何这种欲望,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过错:有人缺这样,有人少那样,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我们大家加在一起,由于积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还是有些价值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缺点。遗憾的是,这些为集体工作所必需的条件近来不复存在了。在政治局,甚至在闭门会议上,也绝对不能讲心里话,讲话要瞻前顾后,因为你的建议很可能被否决——尽管由别人来讲,它也可能被接受——它也许会变成错误,而给你戴上倾向的帽子。没有了作为集体领导的必要条件的同志式的讨论,在每一项没有被接受的建议里都能够看出有“非列宁主义的路线”,别人的任何思想都轻率地被认为“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任何反对意见都是机会主义。你们哪

怕是读一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速记记录,注意一下讨论的语气——难道这是同志式的讨论吗?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有效地工作,正确地领导吗?能够真诚地、大胆地、毫无顾虑地、诚实地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吗?这不是集体工作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讲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现在却大谈自我批评,谈大范围地讨论重大问题,谈广泛地提供信息。

同志们,这种工作方法对不对呢,竟然连我都不知道确切的日期,虽然我当政治局委员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大致在(让缅仁斯基同志给我更正好了)3月8日阿扎尔发生了武装暴动<sup>79</sup>。3月13日这次暴动被消除了。好像是3月16日或者18日,就在阿扎尔又发生了暴动。的确,这次暴动规模不大,但是暴动者拘捕了阿扎尔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人。暴动者拥有有组织的军队800人,发生了互相射击,有死有伤,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的一切。红军追击他们,敌人退走了,好像在3月25日暴动被彻底消除了。3月2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知道了这些事件,也就是在事件发生两周之后。1924年发生过格鲁吉亚暴动<sup>80</sup>——格鲁吉亚暴动和阿扎尔暴动在政治方面的规模哪一个大些,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格鲁吉亚暴动发生在1924年8月28日,戈戈别里泽同志9月3日就在梯弗里斯的公开全会上做了公开的正式报告,讲了这次暴动,而9月4日莫斯科的所有报纸都发表了格鲁吉亚暴动的消息,党仔细地研究了它的起因和情况。当时,1924年,我们从这次暴动中得出了许多结论。可是现在我们政治局委员只是在两周之后才得知了阿扎尔暴动……

顺便提一句,我们得知,斯大林同志为消除阿扎尔暴动采取了某些措施,发了电报,做了指示。可是我们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也许这是一个错误?可是这次在民族共和国里发生的农民暴动不是一件小事。请大家说说,在正常条件下,人民委员会主席应当,请缅仁斯基同志原谅,把缅仁斯基和亚戈达交付审判。

布哈林:对!

托姆斯基:在正常情况下,因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得知在苏联边境线上发生了暴动,有组织良好的一支800人的军队,得知这一切发生在土耳其边境上,暴动者组织了自己的议会,进行着一场战争,虽然规模不大,互相射击,抓俘虏。他知道这些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呢?是过了大约20天之后。请原谅,这不是集体领导……

乌格拉诺夫:对。

托姆斯基:同志们,请大家说说,在正常条件下,领导中出现这种情况正常还是不正常?



在全国范围内,从白海到黑海,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进行的这场党内状况大讨论是谁领导的呢?也许这场党内状况的讨论是没有领导,“自发地”进行的?同志们,如果这是一场自发的讨论,那这就很讨厌了,因为党内有这样的讨论和解决党内问题的“自发的”办法。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做出一副有集体领导的样子,虽然实际上并没有集体领导,那才是真正的怠工。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做出一副天真的样子,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察觉,我们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那这就是虚伪。我们穿上制服,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有人会问,你知道在做什么事吗?跟你讨论过吗?没有,我不知道!那谁都会说:嗨,你这个笨蛋,你不是政治局委员。你们说,这叫什么,是集体领导吗?如果你们认为这就是不折不扣的集体领导,那是你们的事。难道你们就那么天真,难道你们就不懂得,政治局的平衡作为这个集体的最起码的前提不是从白海到黑海,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到处都把我们同污泥浊水搅在一起,败坏我们的名声,所有的党组织都责骂我们,而给另一些人发致敬电。我不反对你们赞扬斯大林同志,要求平等对待所有政治局委员是愚蠢的。某些同志有时候是在给斯大林同志帮倒忙,他们通过和罗戈扎-西蒙诺夫区党代表会议类似的决议。让我来宣读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决议吧:

“正在举行的区第八次党代表会议向你(斯大林。——米·托·)致以热烈的同志式敬礼并保证,列宁式的中央委员会在你的领导下进行的困难工作中,罗戈扎-西蒙诺夫区党组织将始终和中央站在一起,为列宁的党的统一而奋斗。”(《商工报》<sup>81</sup>,1929年1月13日,第11期。)

我头脑简单,迄今为止,直到这个决议之前,我都认为集体领导是这样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的说来是领导一切的,统统归它领导,可是罗戈日-西蒙诺夫区党代表会议过于热心了,给斯大林帮了倒忙,它把问题翻了个个儿。结果是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它领导着一切,而斯大林同志领导着中央委员会。同志们,这是不行的。如果你们以为,你们所做的一切,还有这一套决议(这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我、李可夫和布哈林,每天早晨和报纸一起拿在手里喝茶,吃面包的)能保证领导的平衡和稳定,如果你们以为这样做是在为真正的、同志式的集体领导创造前提,同志们,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列宁同志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sup>82</sup>上是这样说的:

“为避免发生某种误会起见,从一开始就必须着重指出,党中央书记只执行中央委员会集体作出的决议,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否则,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不能正确进行的。”(《列宁文集》,第17卷,第62页,

《中央委员会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sup>83</sup>)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有集体领导吗？是谁允许，谁下的指示让在积极分子会上和支部里，宣读并且讨论那些上面印着“按密件保存”的材料的。是谁下的指示让散发这些材料，宣读而且散发这些材料的？政治局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没有人问过我们，我们，我、李可夫、布哈林，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讨论过。如果你们认为这就是理想的领导方法，那就请你们说出来。那我们就把党章重新写过。我对党章是这样理解的：需要集体领导，在这个同志式的集体内应当有起码的平等。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必须是白头发或者黑头发，我根本不是说，如果斯大林同志比我或者其他哪一个享有高一些的威望，那就要把他的威望分一点给我们，那样做是愚蠢的。我认为，任何一个同志积累起来的威望都是党的资本和财富，党不该把这笔财富大手大脚地、随随便便地浪费掉，就像现在所做的那样。我认为，这种做法对党的健康是沉重而有害的。当年我们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同志，还有一大批最老的党员和工人从领导集团切割出去，那对党是一次大手术。现在我们是处在第二次手术的前夕——将被切割的，或者是全体，或者是一部分，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许，因为涉及我和我的朋友，我不能正确理解，可是我认为，我坚信，这对党是一次太大的浪费。问题不在于我个人——去它一边儿的吧！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可是一个害怕当共产党的士兵的将军也不是一个共产党的好将军。我有三次被从将军贬为士兵，这我并不害怕。说我们拒绝工作，害怕等等，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承担任何工作，而且认真地完成它，可是对党来说这是太大的浪费。如果你们说，亲爱的同志，你的理解错了，现在我们到了另一个时代，党需要的不再是集体领导，而是另一种领导体制，也许是更强有力的领导，也许是比较狭窄的集体的领导，需要成立三个人的，而不是九个人的或者十二个人的领导，那我就要回答说：如果确实需要，那你们就这样办吧。我会争论，可是如果做出决定，那对我来说就是法律，和党章一样的法律，我同意。如果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两驾马车，我也许会争辩一番，可是如果你们决定要两个人，我也会像党章一样服从。如果你们放一个人甚至是半个人来领导党，而且是合法决定的新体制，那我也接受这样的领导(笑声)，并且服从它。可是现在并没有这样的事，而是迫使我们做出一副存在集体领导的样子，实际上它又不存在，那我就要喊，没有这回事，别逼我们说假话！……

我们有政治上的分歧吗？你们已经看到，这些政治分歧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怎样从我在七月全会上原则上正确的讲话中制造出了“不断让步论”，怎样把我

们三个人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右倾”……这要走多远呢？谁需要呢？如果我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我，也想对政治局内发生的事情进行恶意攻击，那我们可以拿出许多东西。比如说，鲍曼同志说过，五年之内粮食困难不会终止。我们可以拿出加里宁在讨论卡冈诺维奇同志提出的非常措施时说过的话：粮食主要不在富农手里，而在中农手里。我们还可以拿出米高扬同志关于向部分富农庄园提供优惠的建议。

米高扬：谁说的？米哈伊尔，你撒谎。

托姆斯基：从提交给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建议中可以拿出许多东西来。这些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可是我们认为用不着，它并不能给党的领导人增添光彩。我们说这些是为了保证领导。如果在现阶段需要另一种领导体制，而不是集体制，如果我们妨碍了组织正确的领导，那就请你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大无畏精神说出来：在现阶段领导体制和人员应当改变，让我们别碍事，把我们抛出去。如果你们以为在这个基础上以后会建立某个反对派，那是白费心思。直率的、诚实的解决问题就不会有任何反对派。

我们之间现在有没有政治分歧？同志们，有，它们正在形成。当开始用“新的”结合来吓唬人，想说一些不是列宁的，而是自己最近的、最“新的”理论词语的时候，我很担心。遗憾得很，我不能签字，不能无条件地赞成它。

这是什么样的结合的新形式呢？它是列宁的还是非列宁的结合呢？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列宁的形式？一分析就知道，没有什么列宁可能说的新东西。可是你们却拿你们发明的什么“新”结合形式来吓唬我们。你们还拿新经济政策的新形式和新方法来吓唬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只有非常措施和购货本<sup>84</sup>。从米高扬对李可夫提纲的修改<sup>85</sup>就可以看出所谓的“新”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事先在什么场合讨论过吗？没有。

臧声：你在搞繁琐哲学！

托姆斯基：你连繁琐哲学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没有，我们没有在集体里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样的建议应当写出来，分发下去，加以证明，免得出现意见分歧。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如果众说纷纭，那事情就糟了。

关于主要环节问题。主要环节在哪里？最主要的困难现在在哪里？我认为这就是粮食问题。同志们，难道你们真的以为可以打肿脸充胖子，说这不是危机，只不过是困难。不能指望靠一两句空话，什么“困难”等等，来安慰自己，空话掩盖不了事实。应该更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粮食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而它归根到底是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是否有过关于粮食问题的具体建议呢？我

们提出过许多建议,有的被否决了,有的被接受了。今天在座的有多加多夫同志,还有许多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他们想必记得,在10月份,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就提出过许多建议,要求采取限制消费的措施。我们当时就说过,必须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粮食困难问题,至少要限制消费。我们当时已经预见到,粮食将很困难,粮食不足。当时就应当发动全党立即告诉工人阶级:伙计们,粮食情况不好。应当立即做出某种牺牲和限制。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指出最主要的困难。可是我们拖了两三个月,只是到了发现粮食很少的时候,才开始拼命地、毫无用处地调整。那以后怎么办呢? 如果不改变对中农的政策,以后粮食会越来越来少。而什么叫粮食问题,每个人都应当清楚。当我们谈这些困难的时候,别人却对我们说:“你们大惊小怪。”现在则影射我们的神经有问题等等。唉,靠这种论据能走多远呢?关于神经,我可以和你们任何人较量一下,看谁的神经更健全一些。昨天有些发言的同志在讨论最重要的问题时拍桌子,拿不出论据来,却对我们说:“如果你们不承认错误,就叫你们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头。”同志们,扔掉那一套说服的办法吧!如果有人想恐吓我们,那是妄想!如果我们害怕这种恐吓,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这叫什么话:承认错误,不然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你!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在你们许多人还穿着小裤衩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捍卫自己的布尔什维克观点了,不害怕恐吓,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信念。

你们要问:政治局里面有没有政治分歧?有的,近来在再度实行非常措施的基础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我们认为,在七月全会放弃了非常措施之后,在许多同志承认了而且在公开讲话中声称,恢复非常措施孕育着严重的危险,非常措施有脱离基本农民群众的危险之后,我们认为,再度实行伪装得很糟糕的非常措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这是冒险,是同中农决裂。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你们怎么看呢,难道阿扎尔的暴动是单纯的政治或者宗教事件吗?不是的,不满的根源当然在于经济。如果说格鲁吉亚的暴动是同农民关系紧张,而被孟什维克分子利用了,那么阿扎尔的暴动同样说明,问题不仅仅在于取掉面纱,而在于经济:税收、保障等等。如果我们指出这些危险,难道说这就是缺点,难道说这样做不好吗?我想不是的。如果政治局的一半委员只知道大喊大叫:让胜利的雷声更响吧,我们正在成长,成长,成长等等,而另一半委员稍稍稳重一些,说你们小声点,看一看,没有粮食了,——这有什么坏处呢?这要想一想,这要大声喊叫。你们不打算进口粮食,没有外汇。那就应当另找出路,而出路在于建立同中农的正确关系,提高其利益。而现在,尽管有种种困难,却是什么情况呢?现在的情况是

这些粮食困难就意味着破坏城乡之间的正确关系。

波斯特舍夫：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托姆斯基：我听到了，波斯特舍夫，你在这个讲坛上说的种种蠢话。你的这些插话全都是废话！你最好站出来说，为什么3月4日“玛丽娅”矿井发生了事故<sup>86</sup>，而我们直到3月14日才发表了，莫斯科的工人过了十天才知道了这件事？这还是发生在自我批评时期呢！经理的老婆穿了双丝袜，你们就讨论，这叫自我批评。可是30个人牺牲了，却默不作声。这哪是什么自我批评！

[柯秀尔：这是你应当讲的。]

[托姆斯基：可是为什么你们自己什么话也不说，为什么我倒有责任来讲你们的错误呢？同志们，别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不要在严肃的时刻做各种各样的插话。]

喊声：你说说怎样拿到粮食。

托姆斯基：我要结束了。我说，当瑟尔佐夫同志最初提出向富农强制性地摊派粮食公债时，你们是否想起了不久以前，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时期党已经遇到过的事情呢，我们拒绝了；可是不久以后，卡冈诺维奇同志提出了实际上一样，只不过稍加变动的同一个建议，实行非常措施这种变相的余粮征集制，算是“公众的主动精神”时，我们却赞成了。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建议实际上是非常措施的巧妙伪装，是它的最坏的形式，却由政治局的多数通过了，只有我们投了反对票。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错误。我要提一个问题：这算什么呢，是正确的、稳定的领导吗？今天承认非常措施，明天又放弃它、谴责它，认为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到了后天又把它改头换面地接受下来了。你们以为，这不会使党的种种努力，以及在春耕播种、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的文明程度这些方面采取的措施瘫痪吗？你们以为，这就叫正确路线吗？我可不能同意。这样的政策和领导方法是不中用的。许多人问道：既然没有粮食，那你有什么建议呢？目前的粮食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不能用目光短浅的政策去解决它，不能用现在采取的办法去解决不同一般的粮食问题，——这种政策不行。这走的是阻力最小的路线，这只是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解决眼前的问题。的确，请大家看一看有关非常措施的那些论据。它们大致是这样的：城市需要粮食吗？是的，需要。农民手里有粮食，可是他不肯卖，因此哪怕用强制手段也要把粮食拿到手。这就是全部论据和“从政治上”解决问题。这里有什么结合呢？这里有什么刺激个体农民经济，有什么保证进一步扩大播种面积，有什么列宁孜孜不倦地强调的，取得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呢？我们关于春耕播种的法律和命令怎样实施呢，而我们

关于再也不能采用非常措施的决议和声明又到哪里去了呢？对这样的路线我们不能同意。

关于我们承认错误。(主席摇铃)我就要结束了。同志们,如果你们以为可以强迫别人,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昧着良心承认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错了,而且同意粗暴地歪曲事实和文件,败坏他们名声的整个活动是正确而善意的措施,那你们就错了。我深信,我的同志们——“同案犯”布哈林和李可夫……我和布哈林早就是同案犯了……[第一次是在……情况下在克里姆林宫受审。]

雅罗斯拉夫斯基:托姆斯基,这样的比较不合适。

托姆斯基:你不高兴吗?好吧。我为这样的比较抱歉,问题不在这儿。至少我并不想使什么人难堪,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别想乘机捞一把。

雅罗斯拉夫斯基:你也捞不着什么,除了烦恼。

托姆斯基:我不怕烦恼。我们不能承认自己似是而非的错误。如果你们问我:你在形式上是否违反了纪律?我要回答说:形式上我拒绝在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有违反党纪的成分。(笑声)如果你们指望我会用某些同志谈论我的腔调来谈论我自己,那么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为我说话的人,那就是我自己。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时候只是从形式上看一切问题呢?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会有这样的事吗?制造这么深刻的危机,到底对谁有利呢?难道你们以为,从12月拖到4月是我愿意的吗?如果危机确实深刻,那就应当加紧解决它。为什么要从12月底起到4月一直拖着不开全会呢?为什么不早些召开全会呢?两度推迟全会难道是我或者布哈林同志建议的吗?为什么不能在全会上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要拖到最后,不是早就清清楚楚我决不会回到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岗位上去了吗?显然,这一切都不过是装模作样。对布哈林同志也是如此。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免去布哈林的职务,免去托姆斯基的职务,这样就可以减轻一点危机,哪怕是部分地减轻也好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先把人搞臭,然后才说:你已经被抹黑了,你去说:我回来了,到工会或是共产国际来领导了。有这个必要吗?这出喜剧是给谁看的呢?在政治局的闭门会议上发展了那种理论,说是谁要是不服从党的纪律,党就要“敲断他的脊梁骨”,把他“碾得粉碎”等等。当然,党能够,也有权利和力量来敲断最坚强的脊梁骨,把整个人碾得粉碎,可是这难道是理想的党的领导吗?把事情做绝,把人逼到墙角,逼迫人们去包围,去把别人搞臭,去消灭别人——这难道是党的理想的政策吗?我看到的不仅是对我的错误态度,而且是对工会中央理事会、对整个工人运动的错误政治态度。我没有足够积极的办法来引起中央的注意,不过我

认为你们应当注意这些事情。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再回到工会中央理事会去,那就是瓦解工人运动。假如是我一个人搞起来的工会运动,可是它是几千名党的优秀干部用了十年的功夫才搞起来的,而且搞得不错,所以我不能纯粹从形式上对待这个问题,回去当一名普通干部,而实际上是怠工。叶梅利扬一直就非常轻易地使用如“怠工”这样的词,而且说我在怠工。其实,如果我按你们的意思做,那才是怠工,我会搞垮整个工作。我就会看到它注定要垮台,可是我还得做出一副样子,仿佛我什么也没有察觉,把它掩饰起来,说一切顺利,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怠工。

同志们,请你们说说,到底要我们怎样做?如果发言——那是派别活动,如果写出来——那也是派别活动。甚至是写出来,而且在政治局的闭门会议上讲讲——还是派别活动。

喊声:你写什么了?

托姆斯基:写什么都一样。什么也不说,坐着一声不响——怠工。想斗争——派别活动。不斗了,说:见鬼去吧,我走——怠工、逃跑。你们想拿我们怎么办?站着别动!过来!你们究竟要我这个有25年党龄的人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一般说来干得不错,虽然有时候犯些错误,也许和你们一样,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错误;的确,现在时兴的是100%不犯错误的领导人,虽然连列宁也犯过错误,而且每次代表大会上都摆出犯下的错误,用它来教育全党。现在是既不讲错误,也不教育党,只有从来不犯错误的领袖。至于我,我犯过错误,大概还不少,可是我不完全明白你们要我做什么。要我谴责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向我认为错误的东西致敬,于是你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问心无愧地带着似乎全党一致、统一的假象回去,而把我保留在政治局里——你们是要这个吗?我可不能这样做,那是没有原则性,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解决办法。如果确实能够说服我,是我犯了这些错误,那我有勇气说我错了,我不会害怕这样说,因为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坏处。我不想当理论家,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领袖,太可笑了,你们扔掉这些废话吧!让什么领袖都见鬼去吧,那不是什么领袖,不过是一些被你们放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他们单个说来都有很多缺点,只是放在一起才有些价值。如果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或是我的某个同志还会说:我们承认错误,可是请把我们保留在政治局里,那就是廉价的、不诚实的、毫无用处的外交手腕。

你们会说,我们能逼你服从决议。那就请吧。我有过一次形式上的违反,可是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我的做法没有错,因为我深信,我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错的是那些赶尽杀绝的人,错的是那些加深事件的人,错的是那些拖了四个月的

人,因为早就该把我撤职了。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去,那我就是败坏自己的名声,也是给党抹黑。这对谁有利呢?

同志们,在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看来,谈论必须遵守党纪是可笑的。这我们知道。谁要是不想遵守纪律,就应该把他开除出党。这在我是第一次,我再说一遍,是我在党内生活的25年来第一次违反党纪。请让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我和布哈林同志在党内都有24—25年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走到了这一步?你们怎么不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呢——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走到了这一步?怎么可能绕开这个问题呢?我请军人们注意,如果当初由于托洛茨基持反对立场,我们打算在他身边撤掉斯克良斯基,而把已经去世的伏龙芝同志安排任他的副职,古谢夫同志,他今天在座,皮达可夫同志,他今天可能也在座,想必记得,政治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托姆斯基任主席,成员有托姆斯基、古谢夫、皮达可夫和已经去世的拉舍维奇,委员会被从莫斯科派去苏呼米,说服托洛茨基同意用伏龙芝同志取代斯克良斯基同志<sup>87</sup>。有过这件事。

喊声:你认为这样做最好吗?

托姆斯基:不是最好,可是有教益。托洛茨基有条件地同意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那是和自高自大的托洛茨基演的一出喜剧。可是你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呀!

托姆斯基:当然不是。可是为什么现在和我们关系很好,又一起经历过不止一次风暴的老同志们却不能问问我:托姆斯基,你真的不能吗?是的,确实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吗?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什么我没有权利要求同志们用最起码的、同志式的、关怀的态度对待我呢?为什么不放我走呢?为什么要把我逼到墙角,对我说,你胡说,狗崽子,去工会理事会工作,否则敲断你的脊梁骨。同志们,我不能执行,你们懂吗,不能!你们有权谴责我。可是如果你们以为,有了卡冈诺维奇这样的讲话<sup>88</sup>,说右倾在国内是“为资本开辟道路”,有了巴利茨基这样的发言之后,在你们指责我们右倾之后,又把我们保留在党的领导位子上,而且说这样做总的说来无损于我们的名声和党领导的威望,那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主席摇铃)

我们自然会执行党的任何决议。我本人不能承认我认为完全正确的东西是错误的,也不能承认我认为错误的东西是正确的。谴责我,处分我都随你们的便。我不是小孩子。我对我走出的每一步都负责任。可是你们应当最密切地关注这种情况:一些人虽然思维健全,记忆力良好,却决定抛弃心爱的事业,自愿退休,认为自己别无出路,事情进展不顺利。在我们党和工人阶级面临种种困难的



时候,我们——我说的是我自己、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愿望就是一直不把这些分歧公开出去,不从政治局的小范围里拿出去,不让它们激化,尽可能做出让步,可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信念。我们不曾反对过党的决议,现在也不反对,我们不曾反对过,当然,现在也不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存在什么新反对派,这是废话,我们不会说这种话。有谁能够明明白白地证明确实存在像新反对派这样的东西呢?可是如果这种毫无顾忌的谣言继续传播下去,同志们,那就真的让人没法活了。我给你们举了个例子:如果把一只最温顺的兔子放进箱子里,再用烧红的铁块去烫它,那兔子也会咬人的,于是你们恼怒地说:兔子是嗜血的野兽……(笑声,主席摇铃)

我们真诚地不希望给党制造什么困难,我们很明白现在党面临着困难,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我们不希望把我们的分歧拿到街上去,甚至不要拿到中央委员会以外去,从而增加困难。可是我们认为,那些生气勃勃,像卡冈诺维奇一样的同志,他在乌拉尔州党代表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大谈右倾,指的却并不是真正的右倾危险,而是指的我们,他们是在工人阶级中散布惊慌情绪,他们给工人阶级提供错误的信息,这就可能造成重大危害。

我深信,在党面临许多困难的重大问题,在工业化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如纺织工业企业、纺织工厂停工,哪怕只有几天,而像美尔尼昌斯基同志这样的负责干部说,由于原料不足,纺织工厂可能要停工不是十来天,而是三星期,没有粮食,粮食成了日常最重要的问题,使整个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在这样的时候让全党来搞党内分歧,说我们右倾,用右倾来吓唬人,逼迫全党来讨论谴责和斩断的问题,是错误的。这是克服困难的错误方法,这是浪费党的精力。不论你们做出怎样的决议,我们都服从,不过,要把错的说成对的,或者相反,这我办不到,我的布尔什维克良心不容许我这样做。

主席:现在休会。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柯秀尔同志发言。

Cr. 柯秀尔:我请大家给我半小时。

我想,如果我说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引起了绝大部分在座者的惊异和愤慨,这能够代表全会绝大多数参加者的意见。比它更无原则,更走投无路,更渺小,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喊声:“更庸俗气息”。

**С. 柯秀尔:**就算是庸俗气息吧……简直难以设想。

托姆斯基同志在讲经过时,编了一张真正的蜘蛛网,存心不良地歪曲了事情的经过。他指望大部分普通党员不知道这些细节,甚至大多数中央委员也不知道,也许会有人相信托姆斯基同志说的话呢。

当我从托姆斯基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那儿听到他们的说法,说这些相互关系和分歧是怎样产生、怎样出现的时候,幸亏我亲眼见过这些事情,否则我真的也会相信了。可是相互关系和分歧的出现和发展都是我眼见的,所以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等同志,还有他们的追随者表现出来的那种花言巧语和对待事实的不能容忍的态度使我特别气愤。请看,托姆斯基说:“难道你们认为我们是疯子,神经不正常,所以突然无缘无故地朝三名政治局委员扑过来。”哎,托姆斯基同志,你怎么啦,认为我们才是疯子,所以无缘无故地朝三名政治局委员扑过去,而且还要加上乌格拉诺夫同志,攻击他们,咒骂他们?拿出这样的论据来就是站到了名副其实的庸俗立场上去了。这对于一般共产党员来说,更不消说是中央委员,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了,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当委员都不是一年两年了。难道你们大家不清楚,这里的根基不在于托姆斯基同志对你们编造出来的那些可怜的事实、设想、圈套、陷阱,而在于原则性的分歧。我可以肯定,政治局内部的斗争[因为所有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斗争]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开始的。是这三个同志和政治局出现了分歧,他们把分歧拿到政治局以外去了,拿到街上去了,对中央进行了攻击。

托姆斯基同志对我们讲了一套车轱辘话,说他们好好地、安安静静地、规规矩矩地待在政治局里,却突然对他们进行了恶意攻击。可是难道我们不知道在七月全会之前莫斯科党组织开始了对中央委员会路线的攻击吗?这是不是事实呢?难道在这之前有过什么议论,有过什么攻击吗?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分歧是在1月份,大家从粮食采购工作回来之后出现的。乌格拉诺夫同志那时就在政治局说,我们的困难是因为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太冒进了才发生的。

**乌格拉诺夫:**说谎也得有个分寸嘛!

**柯秀尔:**因为我们在基本建设中冒进了。乌格拉诺夫同志能否认这点吗?

**乌格拉诺夫:**说谎也得有个分寸嘛!

**柯秀尔:**不对,乌格拉诺夫同志,我没有撒谎,如果你想脱身,那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里有许多见证人。我们当时相当尖锐地谈过话。这是不是事实:后来乌格拉诺夫同志把经济干部找到一起,安排他们出来说乌格拉诺夫以前说过的那些话:给轻工业较大的发展机会就会好些。此后在莫斯科就开始了政治局路

线的攻击。要是说我们在莫斯科对你们进行了恶意攻击,那是愚蠢。莫斯科党组织的机关完全控制在你手里,乌格拉诺夫同志。对政治局里发生的事情,乌格拉诺夫同志是唯一的证人。他是唯一能给莫斯科州委通消息的人,他通报的情况把许多人搞糊涂了。这是不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乌格拉诺夫永远也推翻不了它。这就是同中央委员会斗争的开始。结果我们现在是走到了斗争的尖锐形式。这不是政治局搞的,是这些同志走的这条路。他们走分歧的路,把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带进了莫斯科党组织。现在他们处于挨打的境地。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对我们讲的那些话,特别是有些地方,比如说,那份文件,老实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过是有人在装蒜而已。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就像什么文件啦。托姆斯基同志走上来,向我们提出指责,说我们对这份讹诈性的文件分析得不正确。这可真是本末倒置了。他本该在这里承认自己的错误,说布哈林同志对加米涅夫所说的一切,你们对一群青年文学工作者说的那些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坏话——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本该说这对于中央委员,对于政治局委员是不能容许的;他本该承认这一切,可是却对我们说:“你们完全错误地利用了这份文件。”真是怪事,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是完全和布哈林同志站在一起的,布哈林同志到加米涅夫那里去了。加米涅夫可是昨天的反对派,刚刚恢复了党籍,他的名声不好,要是到他那儿去,就不能说这事不会传到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恰恰相反,就是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他到加米涅夫同志那儿去了,有传闻说他同反对派分子有联系;他去了,天知道在那儿胡说了些什么,当这一切都被抖搂出来以后,却说:“你们完全错误地利用了这份文件,你们多余拿出这份文件来。”这就叫故作镇静。既然你们表现了对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的不能容忍的、不忠诚的态度,既然你们的行为给党造成了危害,你们就应当承认。你们难道不明白,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把这份文件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在于布哈林同志去找了加米涅夫,而且不知道同他谈了些什么话。你们不对我们说谈话的实质问题,却对我们耍花招。对党内形成的局面持这种态度是不行的。作为讨论的基础的这件事情,到加米涅夫那儿去这件事情,你们是抹不掉的!这是办不到的!党已经不是四五年前那样了,它对事实和环境了如指掌。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这三名同志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提出的指控。难道没有确认这三名同志——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的动摇吗?这种动摇和弗鲁姆金同志的纲领都诞生在同一种遭际之下,也就是困难之下,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是弗鲁姆金这份文件的精神上的父亲,是它的教父。

乌格拉诺夫:你就接着撒谎吧,接着往下撒谎吧!

喊声:对!对!

柯秀尔:我没有撒谎。要不是你们的那种麻利劲儿和坚决态度,弗鲁姆金未必敢那么公开地拿出自己的纲领来。这个文件在莫斯科党组织里传播难道是巧合吗?那些和你们一起搞了这种派别活动的同志已经讲了。这用不着再证明了。

乌格拉诺夫:你撒谎!撒谎!

柯秀尔:我敢肯定,我说的话你一个字也推翻不了。所有这些事情都有记录,有好几十个证人。

托姆斯基同志现在被人称为右派,他很生气。他在这里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右派……

喊声:只有一些兔子。

柯秀尔:说是我们的笼子里只有兔子。既然你们现在持这样的观点,而直到今天以前你们却说,你们同意党关于右倾问题的各种决议,那你们现在的立场就完全证明了党对你们立场的激烈攻击是正确的。同志们不时提出的那些建议和观点同弗鲁姆金说的完全吻合,这难道还须要证明吗?你们不打算承认,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勇气承认,你们不仅滑到了弗鲁姆金一边去,而且在许多表述和对中央及政治局的指责方面甚至比他还要厉害!你们对中央和政治局提出了比弗鲁姆金同志更加严厉的指责。难道破裂问题不是你们和弗鲁姆金共同的问题吗?不错,你们有些动摇,改变了提法,但是你们的出发点和弗鲁姆金却是一样的。事实就是事实。关于农业退化这个尽人皆知的问题,或者如现在李可夫同志把这个退化抹去了,换成了指责党的政策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一回事。这难道和弗鲁姆金说的不一样吗?完全是一样的。在一定阶段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上,李可夫在上次全会上曾经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通;可是难道布哈林同志不曾对加米涅夫说过,断言在社会主义进攻的现阶段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毫无意义的?难道这不是你们和弗鲁姆金的共同之处吗?然而这正是右倾的基本特点。

现在托姆斯基同志走出来说,不存在右倾。如果同意右倾不存在的观点,那托姆斯基同志的立场就更加清楚了。可是右倾是存在的,你们的基本观点正是在滑向右倾。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多少学到了一些东西,特别是在列宁去世以后,因为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分析和解决党内生活的一些最复杂的问题。我们知道,往往是要对托姆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的决议稍加修改,像布哈林

建议的取消个别课税,而仅仅限于一般课税的决议。难道党不明白,这项决议掩盖的思想是减轻富农的税负?难道我们不明白,这个工作就是弗鲁姆金同志建议的那条路线?现在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它很清楚这种种现象的起因和联系。可是你们却把党看成五六年前的状态。这是不对的。现在人民也更有文化了。你们的所有观点和建议都是盯着富农,盯着大的中农户,盯着那种仿佛能够给我们提供粮食的单位,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从这种种言论中看到它们的根源和底牌。这是这些同志不想看到,而党不能不揭露出来,并且指明这些观点的方向的。我们谈右倾的时候,并不是说它就是反革命什么的。可是我们要揭露右倾的发展趋势和它遵循的路线。我们说右倾发展的结果是和资本主义分子达成某种妥协和共处。如果你们认为这不对,那你们就放弃会导致这条路的立场。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是一分为二:一条路线是我们的各种决议,另一条路线是我们的实际工作。这是对党的最恶毒的诽谤性指责。我们的政策没有什么一分为二。如果有这种一分为二,那党就会大声地提醒我们,我们就会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看到它。农民也会大声疾呼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在对付困难、克服困难,这就表明,路线和执行路线都是正确的。我们这儿没有什么一分为二。既然我们只有一条路线,而现在却打着一分为二的招牌要求我们改变这条路线,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们引到哪里去,我们想知道,也想看看。我们不能被蒙着眼睛牵着走。请你们拿出一条明确的路线来。你们没有明确地谈到它,因为你们的新路线除了引向同富农搞阴谋、妥协,避免尖锐的阶级斗争,得到和平关系之外,不会再有别的前途。这是不行的。我认为,党必须坚决排除的、不能容忍的最主要的指责之一就是布哈林同志首先,然后三个人一起提出的,指责我们实行贡赋政策,也就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我想,这项指责丝毫无损于斯大林同志,因为斯大林同志从来不曾讲过类似的话,相反,他揭露了这些同志的路线和政策。请看,他们想和中农和平共处,而我们,按他们的说法,实际上对中农实行贡赋政策。同志们,你们在对谁说话呢?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工作的发展,看到我们工作的结果,所以党说,这话不对,是谎言。没有什么一分为二,没有什么贡赋政策,也没有什么军事封建剥削。他们却对我们说,起初是布哈林同志在他读过的那份文件里,后来是在他们三个人的声明中:

“可是实际上是什么决定了以后的政策呢?就是在‘文件’里提到的,也就是斯大林同志关于贡赋的讲话。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斯大林同志为了殖民地对农民的剥削狠狠地批评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可是到了七月全会上他却提

出了贡赋,也就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贡赋是一个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范畴。遗憾的是,广为流行的词‘贡赋’不单单是‘文学语言’。”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农民的税负过重、日益增长的粮食困难、播种面积缩小、农民怨声载道(于是只好降低税负)。

这就是从指责引申出来的结果。由于政策错误,结果是我们同农民的联系削弱了,课税太重,粮食困难,播种面积减少等等。这里谈的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党的基本路线。按他们的看法,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执行的路线导致了这些结果。如果是这样,那就必须立即推翻这样的政治局,因为它可能葬送我们的国家。如果把现行的依靠贫农、和中农结成同盟、大力支持个体经济的政策叫做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我们就要问:你们有什么建议呢?你们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呢?我想,我们所有的文件都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同志害了相当明显的右倾病。他们得的是类似斑疹伤寒那样的病,必须认真地加以治疗,如果不是认为他们已经不可救药的话。我希望他们不是不可救药,他们不是没有希望,他们可以治愈而留在党内。

现在应该怎样认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11月份“三驾马车”辞职事件中的行为,以及跑去找加米涅夫,如今被说成是两个老朋友的一次普通谈话的事件呢?怎么能够不把这种行为和这些同志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动摇联系起来看呢。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你们去找加米涅夫,以及你们的种种行为都完全出自你们的错误政治立场。你们看不到这一点是很可悲的,它表明你们病得不轻。直截了当地指责党犯了官僚主义,说我们没有民主,没有一名书记是选举产生的,这也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有同反对派,特别是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丰富经验,使我们能够立即看出这些指责里有一定的公式。你们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当有人要和党作斗争的时候,他总是举起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旗帜,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如今也是这么办的。可惜的是你们不想承认,你们正在滑到党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立场上去。现在的形势是,实际上领导右倾的不是弗鲁姆金,而是你们。所有犯错误的人、所有把党拉向右倾路线的人,——右倾分子都极力向你们靠拢,都尽量把你们视为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教父等等。怎么能够走到这个讲台上来,如此庸俗地谈论右倾问题呢。你们不明白,各种倾向反映了党外的某些势力,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我是一名年轻的中央委员,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托姆斯基同志,二二得四这样简单的道理吗?在不得不指出这样重大的错误时,我简直感到羞愧。说有人想把你们扔掉是可笑的,也是愚蠢而罪过

的,根本没有这种事。甚至有人放出风声,说是在全会上没什么好谈的,反正事先已经决定把我们扔掉了。你们这样对待党的利益是有罪的。提这些问题让我们很痛心。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私交,全党对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还有其他同志的态度。可是我们必须把党的利益置于个人的好恶和利害之上。只要还可以把你们保留下来,只要你们接受党的要求,我们大家都是欢迎的。托姆斯基同志说:“你们别威胁我们。”可是你们也别威胁党呀。党并没有威胁你们,而是坚定地说:你们止步吧。如果你们把这看做威胁,如果你们像小孩子那样对待它,那只能更糟糕。你们也别威胁党。党已经成熟了,它不会对任何领袖屈膝下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活生生的例子。你们去找他们,寻求帮助,请求不要迫害你们等等,可是你们不明白,他们现在对党已经没有用了。要为他们在党内恢复名誉,还需要几十年。党在发展,新生力量在成长。托姆斯基同志,看到像你这样的人离开我们,我们心情很沉重,非常沉重,可是我们不能走调和主义的路线,不能容许在中央委员会内,在政治局内保留一个右倾司令部。我们希望避免这件事。如果我们同你们不能在这次全会上找到共同语言,那我们就要坚定地说,你们走上了反党的路。能不能把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行为说成是小事情呢?请看,我们辞职,我们不想斗争,我们也不搞反对派,你们放了我们,问题就算完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消失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也不会再有什么意见分歧。不能对党内生活、对严肃的政治问题继续持这种小市民的庸俗态度了。你们不会不知道,自发势力会把我们,而且已经把我们拖向了同党作斗争,而我们想挽救你们。(乌格拉诺夫笑了)

可笑吗,乌格拉诺夫同志?如果你在同党作斗争时不那么坚决,那就会好一些。

乌格拉诺夫:我从来就不是懦夫!

柯秀尔:你同党作斗争时很坚决,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你不希望离开我们,那你就走上来说——我错了。

两者必居其一。要么这些同志和大家一起驾车,和大家一起拉着大车前进,要么他们就离开我们。不能容许在政治局内有自由自在的批评家,他们对什么都不负责任,不帮助我们工作,不和大家一起同困难作斗争。我们也不能容许那些右倾势力在他们身边组织起来,积极活动,同党作斗争。党现在警告你们:小心,你们走上了绝路。你们面前只有一条路:要么你们和党一同前进,要么你们反对党。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党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你们却不打算认识它。如果你们不和党一同前进,不放弃自己的错

误,你们就必然滑到同党斗争的路上去,而这条路是明摆着的,已经有人走过了。这里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我们来说,都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我们竭尽全力希望把你们留在党内,保护你们,你们不是小孩子了,你们应该听听党的声音,党在帮助你们,我们相信,党员的责任感会在你们身上占上风。

**主席:**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发言。

**什基里亚托夫:**布哈林同志在一份文件里说,“这里有一些潜在的政治意味”。现在大家看到,这些潜在的政治意味成了一个大故事。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向我们报告了事情经过。托姆斯基同志不高兴了,于是他把这段经过又重讲了一遍。我想,我们这次全会能把事情搞清楚并且做出决定。当托姆斯基在保卫正义的事业时,我喜欢听他讲话,他是很有力量的。可是现在托姆斯基同志保卫的是错误的事情,他就很可怜了。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论据为自己辩护,那都没有分量,没有说服力。

托姆斯基同志拿出了什么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呢?第一,没有集体领导。阿扎尔事件似乎证明了没有集体领导。还有什么呢?还有对我进行了恶意攻击。出面的是共青团员。

**喊声:**是集体的恶意攻击<sup>89</sup>。

**什基里亚托夫:**这也成了不能在政治局集体工作的口实。再就是把卡冈诺维奇同志补进了工会理事会主席团。也许托姆斯基同志继续讲下去,还能找出点什么来。可是拿这些东西是不足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的。托姆斯基同志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犯了许多错误,他用了种种法子为自己辩护。详细讲要很多时间,我只谈谈托姆斯基同志丝毫不曾涉及的纪律问题。

**柯秀尔:**他拿党章作挡箭牌。

**什基里亚托夫:**你们搞地方工作的比我们在座的更清楚,现在地方工作有多么困难,建设任务紧,资金也紧张,粮食不够,不单是由于个别地方富农不给粮食,还因为许多地方歉收等等。地方上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真是非常困难。只有大家都执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路线,才有可能克服困难。可是既然在最高层都没有纪律,那在地方上怎么能确立必要的纪律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最高层必须有那种基层干部可以依靠的纪律。可是上层有这样的纪律吗?没有。现在是我们党历史上新的一页。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政治局的一名委员不服从政治局的决议。托姆斯基同志讲了许多历史资料,他能够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找出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党纪的哪怕是一个例子来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如果这样下去,那就很难实现我们面临的巨大任务。托姆斯基同志



为自己的不服从政治局决议辩解说,卡冈诺维奇同志补进了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共青团员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对他进行了恶意攻击。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服从党的纪律。大家知道,有时有这种情况,某些东西我不喜欢,可是要我做,我也就做了。有时候给我派来的干部我不怎么喜欢,可是也得接受。这么说来,党的指令对我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对其他一般干部也是一样,而对政治局委员就不是必须执行的了,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当派遣一个一般干部去工作,而他不愿意时,就对他说:没关系,你会习惯的等等,你应当服从,去工作吧。现在每个这样的党员都可以说:托姆斯基同志为什么可以不服从呢?我向他看齐。我们的党之所以强大有力,是因为在纪律问题上总是以领导机关为榜样。如果领导机关没有纪律,党的纪律就遭到削弱。托姆斯基同志是老党员,谁也不会取消他的资格,谁也不会贬低他的功绩。托姆斯基同志何必对我们说这些呢?年轻人能够从老党员的这种榜样里学到什么吗?当然不能。

托姆斯基同志在发言为自己辩护时,“大胆地”攻击了中央委员会,指责它没有集体领导。可是他对涉及布哈林同志的文件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虽然他已经没法为他开脱了。他说:“嗨,这算什么文件,没什么意思。”然后又轻描淡写地说到这个问题,似乎这份文件是不知什么人写的。后来又说,仿佛这份文件是我们自己写的。他为了替自己不遵守纪律的行为辩护,居然走上用这样的根据攻击党和中央委员会。我不明白,托姆斯基同志,你怎么能这样做。这样来为自己不遵守纪律的行为辩解是不行的。更不像话的是为了替布哈林同志辩护,硬说这份文件仿佛是什么人捏造的。我不知道去找过加米涅夫的布哈林同志会怎么说。可是托姆斯基说布哈林爱上了一个女学生,是去找她的。(笑声)我不知道这个女学生叫什么名字。

柯秀尔:这个女学生是有胡子的。

什基里亚托夫:托姆斯基同志想用开玩笑来绕过这个问题。他不是自己也笑了吗?

臧声:对。

什基里亚托夫:可是我们是在笑托姆斯基同志,因为他把党内生活的严肃事情说成布哈林似乎是“去找女学生谈恋爱”。我们这儿不讨论道德问题——谁跟谁谈恋爱,而是审理重大政治问题。你们在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这整个事件中指责谁?我们并没有让你去找加米涅夫,你为什么去了呢?这里还谈到恶意攻击。连敌人也想不出对党更恶毒的攻击、更恶毒的文件,对党的危害到了极点了。托姆斯基同志辩解说,你们印了这个东西,所以才发生了这一切,大家才知

道了。托姆斯基同志,拉倒吧,你是老干部,是政治领导人。过去你一直都是能正确对待这种问题的,可是今天你为什么拿这份文件开起玩笑来了?你说你是从这份文件里才知道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过话,谁会相信呢?

托姆斯基说,既然斯大林在列宁格勒州委全会或是在常委会上讲了某个政治局委员神经过敏,另一个委员更加神经过敏,那还让人怎么工作。托姆斯基同志看来有一部分记忆力是差了些,所以他不打算说,可是别人会说对斯大林是怎样恶意攻击的。托姆斯基同志也许连这也不知道吧?那里没有说斯大林同志神经过敏。你大约听说过,在莫斯科河南岸区的扩大全会上,库利科夫同志召集了一些同志,对斯大林进行了恶意攻击。他没有谈神经质的问题,而是说,跟他很难共事,对他做了评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了列宁的遗嘱。难道这就叫做“没有进行恶意攻击”?而布哈林同志在和加米涅夫的谈话中说,“我们的任务是逐步说明斯大林的致命作用,引导中间派的中央委员把他免职”。这就是他瞄准的目标。应该坦率地把它讲出来。没搞成,那就说没搞成好了。可是你却抱怨对你们进行了恶意攻击。你们自己想搞别人,可是没有搞成。党在这个问题上对你们进行了回击。我不会像鲁缅采夫同志那样,否认我们对你们进行了攻击。有两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政治局的决议,该怎么办呢?你们以为,党员群众就什么也不能问吗?不能提出问题:为什么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不工作?我们就应当回答:他们不愿意——就完了?这是不行的。党员群众“多少”是成熟了,要求了解全会上和政治局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对他们说明。难道向党通报就是恶意攻击吗?你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们只能说: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不服从政治局决议,不肯工作。我们解释了原因,是按照党的决议的精神解释的,而不是按你们的愿望讲的。如果你们愿意,本来是可以为你们创造正常的环境的。党为你们所有的人树立了威望,把你们放在高位上,可是党有权说,你们这些有威望的同志错了。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否则就会成了这样: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是批评不得的。不能批评是因为他会失去在工会的威信。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也不能批评,他在商业人民委员部里会丧失威信。那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不能批评:伏罗希洛夫是红军领导人,鲁祖塔克是交通人民委员等等。按你们的说法,能批评的只有基层干部,而你们是批评不得的。这也该讲平等嘛。如果你们错了,就应当让你们改正,而且要及时,免得犯更大的错误。[现在我谈谈斯大林的问题。我想谈一谈。有同志在这里说他们遭到了恶意攻击,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攻击过他们。]我认为三个人写的那份文件是一个纲领。我不知道他们是为谁写的,也不知道指望什么?

施利希特尔:指望国际上。

什基里亚托夫:我们不说国际上,就谈谈我们苏联吧。布哈林同志有一次在讲话中发誓说,没有政治分歧,只有一些潜在的政治上的小差异,后来又在文件里写道:写的和通过的都对,就是不执行,执行的是另一套。写一套,做一套——这是对全党的指责。我认为,在你们写自己指责党写一套,做一套的纲领时,你们想到的是自己,可是指错了对象。你们在这份文件里声称,没有政治分歧,只有一条路线。你们才是写一套,做一套。投票赞成决议,可是并不执行。

反对派的同志们大概会在这里拿出文件来,说明我们党的困难处境。不管是在粮食采购,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肯定有个别错误。也有这种情况,正确的决议在个别地方执行得不正确,马马虎虎地执行。你们拿到两三封信,就说:请看,就是这样的场面,这也不够,那也不够,到处排队,购货本,照你们说来,一点好处都没有。这难道是帮助党吗?难道一切就像你们企图证明的那么糟吗?既然许多同志怀疑通过的决议是否正确,企图把一切困难都归罪于政治局的多数人,指责中央委员会的路线错了,那中央委员会还能够平心静气地领导吗?既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有人散布惊慌情绪,自己犯了错误,又把它推给别人,那中央委员会就不能平心静气地领导全党。

关于斯大林同志我也说两句。请李可夫同志在发言时再讲一讲他自己在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时说过的、关于斯大林同志的那些话。现在他是否放弃这些话呢?他当时说:“你们(托洛茨基分子)中伤斯大林,可是你们不会得逞的”,而现在李可夫同志和其他人用的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用过的中伤的方法。[李可夫同志忘记了他昨天说过的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话,今天他拿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文件,说的是另一些话了。]当你们举斯大林同志的例子的时候,最好也举一下自己的例子。还有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等同志在文件的个别地方故弄玄虚,如果你没有参与其事,你就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做也不光彩。我举个例子。三名政治局委员拿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文件,接着说:“这就是我们的意见,我们绕过人身攻击,也不揪住布哈林同志的老账”。你们应当说:“我们避开”,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做过的事。“我们过去掩盖了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为了保护他的威信,如果现在来谈他的一切错误,那就扯得太远了。”说完了这些话,接下去却根本没有谈错误。为什么你们不谈呢?如果你们找到了错误,你们想必就谈了。没有错误。托姆斯基同志在发言时,一个字也没有谈斯大林同志的错误。我们可以等着瞧,看他其他同志会不会谈。何必故弄玄虚呢:“如果现在来谈”,请吧,谈吧。不明真相的

人读了会想,也许斯大林同志确实有错误吧,何况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读到在这里说的和写的东西。于是就有了怀疑。请你们在这次全会上说说,斯大林同志究竟有什么错误。我敢预言,你们什么也拿不出来。你们会提出“贡赋”,可是别在全会上说,到别处去说吧,也许有人会相信你们。

由三个人签名的文件里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一段:“从写下这几行文字直到今天,‘无边的权力’变得更加‘无边’,以至到了这种地步,比如,不顾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党的决议,至今不公布列宁的遗嘱(除了发给代表们的大会公报之外),也不公布同一时期的其他文件。”

在我们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时候,也提出过这个论据。他们没有说出什么新玩意儿。你们想怎么办呢?印成单张传单,贴到每家的大门上吗?你们要的是这个吗?列宁的遗嘱对谁也没有隐瞒过,每个党员都知道。关于斯大林同志说不出什么坏话了,就用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老办法。

为什么在印发第十五次党代会的记录时,你们不提出来呢?那时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尽管我们现在有种种困难和缺点,谁也不掩饰它,我不认为我们应当到处去大喊大叫,说我们只有困难和缺点。我们可以,也应该说做了哪些好事,不能只看到困难和缺点,要看到好坏两方面。我认为,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只要在党的基层和最高层都遵循坚强的党纪,我们就能走出困境。我认为,如果政治局的少数人连这也不顾,不顾全党的意见,那他们就只能怨自己了。那就只好采取别的措施,做出别的结论了。(鼓掌)

主席:同志们,现在是3点钟。让下一个人发言吗?

喊声:别了,晚上吧。

主席:那就休会。

## 第三次会议

4月17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科托夫同志发言。

科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昨天发言时,顺便提到我们提出党内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碰到了困难。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我们今后再碰到困难,而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又该怎么办呢?照他说的,一碰到困难就要提出党内问题了。按照他们对党内问题的提法,这就是要扔掉一些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昨天在这里给我们读了各地党组织关于一致决议的决定,我不怀疑它们是一致做出的。可是我,还有许多党员都想问一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做出了那么多的一致决议,可是并没有一致呀。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讲到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等同志不服从时,应该谈谈它的根源,谈谈这种不服从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涉及的是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老政治局委员。这个问题重要还因为最近三年来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提出开除老干部的问题了。

我讲到布尔什维克老干部,完全不是说我们不当提拔党员中的优秀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党会这样做的。党今天也在这方面做许多工作。党提拔一些新的层次,让他们接近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可是在提拔新干部时,我们不当忘记列宁关于为数很少的老布尔什维克的价值的爱护他们的态度。

鲁缅采夫同志昨天在发言时说,许多党员读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联席会议的速记记录时,都坚决要求谴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我想,这是不对的,或者不完全对。坦率地说,这整个事情给党员留下了沉重的印象。我认为,党员们坚决主张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保持一致,而且和谐地共同工作。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创造条件来保证这

种工作的可能性。

在我们讲到我们的领导中枢一致工作的时候,在我看来,中央监察委员会也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听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列宁同志在写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文章<sup>90</sup>时所设想的那种作用。

(插话听不清楚)

**科托夫:**我没有妨碍你们,所以我也请你们别妨碍我。我是党员,是中央委员,我有责任陈述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那就糟糕了。我不是那种人。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而且不是跑到外面去说,而是在中央委员会里说。我从来没有不服从党的最高组织的决定,对我来说,它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我们和右倾的斗争是怎样开始的?我个人认为,全党应该同右的危险和右倾坚决斗争。我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可是我认为这场斗争的实际做法是不对的。为什么我认为不对呢?因为我们的报刊上众说纷纭。大家都是成年人,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很明确。特别是《消息报》<sup>91</sup>说的是一个样,《真理报》说的是另一个样。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普通党员,而且使一些负责同志也认识不清。报刊的领导机构也不明确。我向责任重大的报纸《真理报》的领导人克鲁敏提了一个坦率的问题(我是在政治局开会时问的):《真理报》的社论《国内没有右倾危险,可是党内有》该怎样理解?他没有解释,却简单地回答说:“你知道吗,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位书记的命令写的。”

**喊声:**这是蛊惑人心!

**波隆斯基:**这是蛊惑人心!投机取巧!

**科托夫:**波隆斯基同志,我们知道你的忠诚。

**喊声:**我们也知道。

**喊声:**什么意思呀,“你们”、“我们”的?

**喊声:**这是往日的朋友在互相应答呢!

**科托夫:**报刊全都在呼吁同右倾危险作斗争,可是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提到右倾的思想家,只是根据暗示和个别语句可以理解,这是针对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等同志的。能不能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做报告时说的那样,以前没有看到这些分歧呢?不能那么天真吧。你可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书记呀!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知道,他也不能不知道这些分歧。让我奇怪的是,从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中,我听到人民委员会主席不知道阿扎尔暴动。

七月全会以后,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同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做了报告。此后,根据他的报告和七月全会决议,政治保卫总局部队特遣师的宣传鼓动处长做了报告,谈到取消非常措施的重要性。他讲话的速记记录被没收了,他也被复员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出了这种事之后还要说,我们主张诚实的政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难道能说我们主张诚实的政治吗?]

在须要纠正路线时,列宁是怎样做的呢?列宁同志非常尖锐地说,为什么这条路线不对,为什么保卫这条路线的同志不对,他错在哪儿,他公开地指名道姓,谁在执行错误路线。全党都知道了,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方向,可是我们现在提出右倾的问题却不很明确。这种不明确就在党内造成一些混乱。我到支部里做报告,同志们问我:“科托夫同志,你是中央委员,请你说说,政治局有没有分歧?”我回答说:政治局没有分歧。于是他们拿来一堆报纸,翻给我看:这里有一篇文章,这又是一篇,从这两篇文章看得出来事情不妙。他们说:“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吗?你不诚恳,说假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右倾危险的问题。

还有,布哈林同志是政治局委员,看来他是按照政治局的委托在大剧院纪念列宁的会议上做报告的。他在报告里引了许多列宁的话,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报告在报刊上刊登了,又发行了几十万册<sup>92</sup>。谁也没有提出过布哈林同志的报告是否正确的问题。就算布哈林同志做了一个不正确的报告,在报告里犯了一些错误。那政治局该做些什么呢?它本应该听取这个问题,如果需要,就改正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可是没有这样做。政治局没有讨论布哈林同志报告的问题。同时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不直接提布哈林同志的姓名,但是把他描绘成繁琐哲学家、右倾分子等等。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是错误的。齐夫里诺维奇同志和瓦雷基斯同志想当理论家<sup>93</sup>,他们在文章里说这些引文都是牵强附会,文不对题等等。列宁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那些话并不是暂时有用,只管一两年的,它们是我们几十年都需要,而且正确的。所以这样无理地对待列宁同志的引文我认为是粗暴地歪曲列宁。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办法,这种方法无损于布哈林同志的声望,而只能败坏党的领导的威信。这无助于党的团结,而是破坏党的领袖的声誉。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回避了这个问题,什么话也没有说。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认为莫斯科党组织里有宗派活动的味道,柯秀尔同志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那里搞的完全是反对中央的宗派活动。同时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里读到,中央批驳关于莫斯科党组织同中央闹对立等等的传闻。怎么能把这一切放在一起呢?以后你们又说什么不忠诚。虽然有保留莫斯科州

委领导的决议,可是过了不几天,州委常委委员有一半被撤了职。这显然是两面派。拿库利科夫同志被撤职做个例子吧。对是否要撤掉库利科夫同志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不,我们不撤库利科夫同志,不要撤掉他,他是个好人。”可是后来库利科夫同志从粮食采购工作回来后,还是被撤了<sup>94</sup>。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党的团结。

对莫斯科州委领导的指控是说它搞事务主义,波隆斯基同志特别讲了这一点。可是列宁同志在4月14日发表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在革命者中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口号……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现在讲求实际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的主要口号。”<sup>95</sup>显然,莫斯科州委搞“事务主义”没有什么坏处,何况列宁同志还讲到我们谈政治太多,而干实事太少。

还有人说,向莫斯科州委提供信息搞得不好。那现在搞得好些了吗?还是那样的信息嘛。工人在会上坦诚地提出问题:售粮会不会有限制,回答说,不会。可是实际上限制了。问托洛茨基会被流放吗?回答说不会,芬科夫斯基同志还特别宣布,散布这种传闻的人是反革命,可是人们第二天一看报纸,托洛茨基被流放了。如果你们在指责莫斯科州委领导时客观一些,那他们就可以至今留在岗位上。我们在建设巨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继续犯错误,我们应该改正错误,应该像列宁同志那样来改正错误。列宁同志是怎样改正错误的呢?列宁同志对各种倾向是绝不调和的,同时又始终找机会保存同志,从他们那里取得一切需要的东西。甚至对已经站到了街垒那一边的米亚斯尼科夫,列宁同志也表现了最大的关怀。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和反对派斗争时,斯大林同志在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做结论时说:“……制订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李可夫,不要加里宁,不要托姆斯基,不要莫洛托夫,不要布哈林来领导党。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纲在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我认为,这些话不是即兴发言,它们至今还是正确的。所以尽管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等同志有种种缺点,仍然不该提出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我要投反对票。

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自相矛盾,他起初说有困难,后



来又说右派吓唬人,什么困难也没有。困难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可是我从不困难面前垂头丧气。党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中的贫农、雇农和中农,能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取胜的基本保证就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团结一致。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没有这种团结一致。党的任务就是保证这种团结一致。

列宁同志去世以后,我们说过,我们没有了列宁,而且今后许多年内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人。能够代替列宁的只能是一个集体。鲁缅采夫同志发言时讲到,工人说:“中央委员会应该是一个铁环,你们的铁环在哪里呢?”所以,鲁缅采夫同志,我们必须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应该是一个铁环,它现在不能容许开除什么人,而要使大家找到一条共同路线,为了党的利益共同工作。

主席:鲍曼同志发言。

鲍曼:当然,谁也不高兴就党内纠纷问题发言,不过我们终归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在一些紧迫的基本问题上,党内不应当留下不明不白的地方。各级党组织会问:问题怎样结束,问题怎样解决,我们大家应当回答:如果是这样,就这样解决;如果是另一样,就用另外的办法解决。总之,直到现在是不明确的,我们希望,这次全会会做出一定的结论,就是大多数党组织已经有了的结论。

很可惜,历史又在重演。不久以前,也就是两三年前,我们就在这个讲台上同那些坐在左边的同志们战斗过。那时主要是同列宁格勒人等等打仗,而现在就是同坐在右边的同志们斗争了。(笑声)

乌加洛夫:你还可以找到一些中间分子。

伏罗希洛夫:是从那里被挤出来的。

[洛米纳泽:请别混为一谈。]

鲍曼:还有一个特点。如果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给自己起了一个骄傲的名字,把自己比做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雷孟梭,那托姆斯基同志就只是把自己比做兔子。(笑声)不过两个反对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从抱怨对他们进行了恶意攻击开始。到处都在攻击,到处都在败坏他们的名誉,到处都在迫害他们,当然,首先干这些事的就莫斯科的党组织。这是三个人的声明。那里面说,莫斯科撤掉了许多老党员干部。当年关于列宁格勒说的也是这些话,仿佛把所有的积极分子都撤了职,而且赶跑了等等。我们总共才撤了,乌格拉诺夫同志知道,十来名领导干部。

乌格拉诺夫:才十个吗?

鲍曼:你能说出哪个支部书记被撤了吗?我们是根据各级组织本身的要求,

撤了莫斯科州委最高领导和各区委书记的,而在基层支部里,在工厂里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谈不到撤了许多人的事。至于谈到莫斯科的事情,那科托夫同志也用不着哭鼻子;首先应该怪自己。我知道科托夫同志是尽心尽力的,可是他还是成了落汤鸡,他因为一些小问题而忽略了大问题,走上了错误的路。科托夫同志本该用他在莫斯科党组织里工作的尽心尽力的态度来捍卫党的路线。那样就正确了。难道莫斯科的党组织里就没有背离党的总路线的倾向吗?有的。就拿7月积极分子会来说吧<sup>96</sup>。难道报告人李可夫同志对某些问题的叙述没有离开七月全会的记录,而是按照另一种精神,以至在7月积极分子会上发言的人不得不指出:李可夫同志为什么要在这里用红军中的政治动荡来吓唬我们等等呢?

发生过这些事。莫斯科的积极分子早在7月间就明白了,如果这种动摇、这种思想上的细微差别继续下去,那莫斯科党组织是不会跟着这样的领导走的。虽然莫斯科州委在1928年7月积极分子会上已经有了这样的教训,州委领导却仍然动摇,摇摆不定。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在工业化速度问题上就有动摇。当时乌格拉诺夫同志就不停地谈重工业和轻工业的问题。对他多次说过,你拉倒吧,干吗老是说这个问题,老是说应该对轻工业做或大或小的修改——应该坚定不移地采取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方针嘛。

**乌格拉诺夫:**你撒谎!

**鲍曼:**我没有撒谎。许多同志可以作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李可夫同志在党代会以前也纠正过乌格拉诺夫同志。他对重工业的调子是不对的。

有过一个时期,大约在1928年4月以前,乌格拉诺夫同志是坚决支持农业集体化思想的,后来在许多会议上他讲的就不同了,把它推到了次要地位上。那些对农业集体化表示冷淡的同志也没有受到乌格拉诺夫同志应有的反驳。

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尖锐化这个现在非常重要的问题,情况也是这样。在莫斯科州委九月全会<sup>97</sup>上,阿尔费罗夫同志对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中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提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方针。乌格拉诺夫同志却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乌格拉诺夫同志尖刻地批驳他,说他是政治上的小孩子等等。这是事实。

再看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在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九月全会的决议里有丝毫的反映吗?没有,找不到反映。那里提出托洛茨基分子问题是主要危险,而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只字未提。难道这不是歪曲了政治前景吗?无疑就

是这样。

最后,某种宗派活动的苗头开始显现出来。我不是说莫斯科党组织里已经有了宗派,可是宗派攻击的苗头是有的,无论是在莫斯科河南岸区,还是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等地都有。这方面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的完全正确。

科托夫:现在整个莫斯科组织都是这种情况。

鲍曼:如果整个莫斯科组织都攻击党的决议,这并不是宗派活动。我为像佩尼科夫和别尔津这样的好同志感到难过,更不用说科托夫了,他们是非不分,掉进了泥潭。

乌格拉诺夫:你难过什么,用不着你来难过,我们入党比你还早呢。

鲍曼:我衷心地为这些同志难过,他们分不清是非。是否确实做过努力来帮助莫斯科州委领导,帮助乌格拉诺夫同志改正错误呢?难道中央,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没有做过这种努力吗?莫洛托夫同志一再指出莫斯科州委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对于莫斯科州委的领导干部来说,他真是一位老师。也许他做错了一些事,拖延了问题的解决,也许在莫斯科州委九月全会上应当更坚决地批判某些错误,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指责中央,怪罪它老是想撤掉领导。就拿中央10月的呼吁书来说吧。这份正确的呼吁书为莫斯科党组织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而且不仅为莫斯科党组织,也为全党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的斗争指出了正确方向。这份呼吁书也试图保留莫斯科州委的领导。我本人同乌格拉诺夫同志和科托夫同志谈过话,指出应当坚决打击右倾机会主义情绪。我说:“你们为什么拖拖拉拉的,应当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可是他们没有站出来。10月份采取了一些步骤,比如10月2日的信<sup>98</sup>。可是后来又动摇了,因此莫斯科的基本党员群众对莫斯科州委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七月全会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条裂痕变成了一个大大裂缝。

乌格拉诺夫同志和科托夫同志在莫斯科党组织里是否有过威信呢?有过,而且威信很高。整个莫斯科州委是否有过威望呢?它在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的基础上确实赢得过很高的威望。在1928年的夏季和秋季,你们失去了威信,也丧失了莫斯科州委的威信。莫斯科州委被称为五光十色的省的代表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因为它失去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是关键所在。你们靠几年工作赢得了威信,后来你们,乌格拉诺夫同志和科托夫同志,却在全会上提出了辞职,大家是怎样和你们告别的呢?大家把你们看成失去了组织信任的人。现在你们问道,如果你们在第十七次省党代表会议<sup>99</sup>上发了言,那会怎样呢?假如你们发了言,那你们就会遭到彻底的政治上的失败,彻底的政治破产。

喊声：对！

鲍曼：这是显而易见的。第十七次省党代表会议也做了一定的政治总结，划出了界线，指出了莫斯科老领导在总政治路线上存在的错误和动摇，同时指出存在宗派活动的苗头。这是过去的事了，用不着为它伤心，也不用抱怨，因为三人声明中已经说了，撤掉乌格拉诺夫的经验表明，把卡冈诺维奇补进工会中央理事会是把托姆斯基同志撤职的第一步。你们应当怪罪自己，而不是中央委员会。

至于说莫斯科党组织恶意攻击了一些同志，我首先要说，是三驾马车（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的拥护者们攻击了党。库兹明在红色教授学院<sup>100</sup>讲话了没有？讲了。而且把我们党的政策比作鞑靼汗王的政策。

喊声：可耻！

鲍曼：再看马列茨基和塔宁在《真理报》发表的文章<sup>101</sup>、谢苗诺夫同志在革命军事委员会<sup>102</sup>支部的发言——值得注意的是支部当场就要求把谢苗诺夫同志开除出党——你们可以看到最可恶的反党声明。何必装做兔子呢，像你们现在这样诽谤党，就是兔子也会变成嗜血动物的。这不是兔子叫，而是狼嚎。看看你们的字眼，什么“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贡赋”政策，这是说给什么人听的呢？说给小资产阶级分子听的。显然这是指望得到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响应的口号……

喊声：指望富农。

鲍曼：首先是富农，个别落后的农民阶层也可能跟他们走。尽管在政治局里就贡赋的问题谈过很多，尽管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做了详尽的、清楚的、令人信服的说明，正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的那样，无须在这个问题上再玩什么文字游戏了，可是仍旧想在党组织里就这个问题对党进行恶毒攻击。我念几段斯大林同志的讲话。这是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讲的：

“在这方面，我国农民的情况是这样：农民不仅向国家交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

他接着说：

“……这种额外税不是在农民群众注定要遭受贫困和剥削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征收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征收的，在苏维埃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剥削农民的，而且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交

纳的。”

然后斯大林同志讲到这样说是符合实际的,这是实话,用“贡赋”这样刺耳的词正是为了提醒我们布尔什维克认真地抓好消灭这种“超额税”,消灭剪刀差的工作。

所以非常明显,斯大林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讲话,正如他自己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里解释的那样,说的不是“贡赋的口号”,而是一旦有可能就消灭剪刀差、超额税和“贡赋”的口号。

我认为这是很详尽的回答。可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指责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指责贡赋等等事情仍然在继续着。这当然是对党的政策的诬蔑,特别是对斯大林同志的诬蔑。这种诬蔑的背面实际上是反对我们现在发展工业的速度。这就是叫嚷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后被掩盖着的实质。(主席摇铃)

鲍曼:请再给我10—15分钟。

喊声:让他接着讲。

鲍曼:和军事封建剥削同时,又加紧夸大渲染党在官僚主义化。当时中央正提出自我批评的口号,而斯列普科夫同志等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作人员,在布哈林同志安排下,却极力要掐掉这个口号,这你们从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的信里已经听说了。还刻意渲染瓦解共产国际的问题,而当时德国的最新事态表明,德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导致了工会中的革命少数派在工会机构的选举中获胜,德国共产党能够更多地控制工人运动<sup>103</sup>。所有这些论据、这些指责都是不对的。所有这些指责都落空了。

不过,这些指责让我们认真地想一想,他们三个人是不是像他们声明里说的那样,和党是一条路线。我完全赞成斯大林同志的说法,这个声明的核心是模棱两可的:它一方面指望出现危机,另一方面指望着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也有退路:路线是一条嘛。不行的,同志们,既然对党提出了如此严重的指控,就谈不到路线一致了。这里掩盖着更深刻的东西。不能说卡冈诺维奇同志补进工会中央理事会是一切不和、怄气、辞职的起因。卡冈诺维奇同志不过是一块橘子皮,同党的总路线有分歧的托姆斯基同志在它上面摔了跤。如果看一下政治局对加里宁关于农业问题的提纲,李可夫、古比雪夫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五年计划的提纲的表决情况<sup>104</sup>,就可以看到有三名政治局委员弃权,弃权的是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既然在基本路线上没有分歧,而这里恰好是基本路线,那为什么弃权呢?闹不明白。除了三人声明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还有布哈林同志讲述的列宁的政治遗嘱。科托夫同志发言时说,

政治局没有讨论过布哈林讲述的列宁的政治遗嘱问题,可是党却进行了批评。请问,既然它发表了,既然上了报纸,既然出了小册子,那每个党员就可以读到它、批评它。不仅如此,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它还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同志们只是在大剧院听了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他们就已经提出了布哈林同志在解释列宁的话时,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既然在报刊上发表了,在党报上发表了,就不能要求党员们不讨论。

如果仔细看—看这份政治遗嘱,那它的基本方针是什么呢?从国际的分析出发,它的基本方针就是我们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列宁也说过这些话——“最大的谨慎”,可是如果一味强调这些话,而把列宁讲过的其他因素搁在一边,那就会得出同党的方针相矛盾的另一个方针。现在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必然要求我们加紧发展速度。的确,每走一步都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可是时间在前进,而革命的年代是重大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是我们从那时以来走过的5—6年,这是不少的年头。不能繁琐地把一段文字同另一段文字串起来,不联系时代,不分析事件,而且绕过这些事件。听过布哈林同志报告的米哈伊洛夫同志应当知道,报告的最大弱点就是没有分析现在的事件,没有提出当前的任务。

**米高扬:**拿繁琐哲学代替辩证法。

**鲍曼:**不是辩证法,而是繁琐哲学。我们在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上当然要谨慎从事。可是列宁关于对国家进行技术改造的口号、关于国家电气化的口号、关于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到哪里去了呢?布哈林同志还保留着这些口号吗?完全没有了或者是藏起来了。结束时只是谈到“我们提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是一般地提过的,建设集体农庄(和合作化联系在一起,也是我们现在强调的)的问题、建设国营农场的问题、技术改造的任务”。只是一笔带过,而上下文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问题被推到后面去了,被留在阴影里了。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也说了同样的话:除去取消了列宁主义,哪里有什么结合的新形式,哪里有什么新任务?不是取消了列宁主义,而是要正确地理解它。列宁讲过电气化,讲过集体农庄……

**臧声:**讲过拖拉机。

**鲍曼:**全讲过。

现在应当非常清楚,我们走到了这一步,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挖掉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老根,现在决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不再是商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重心已经转到了生产领域,转到了发展小商品生产的道路问题:是走资本主义的、富农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

就是重心所在。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结合中起越来越大作用的不再是花布,而是机器。过去的宣传画上画的是农民在运送粮食,而朝他迎面飘来的是一长条花布。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可以向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机器。你们怎么看呢,我们能不能用花布去帮助没有农具的八百多万农户耕种土地,而且改良耕种方法呢?显然,我们面临着—项紧迫的任务:发展工业,发展生产资料(拖拉机、化肥)的生产,那些对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认识不足的同志同时也打击了工人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在集体化的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

布哈林同志在《政治遗嘱》<sup>105</sup>中引用了列宁的话:

“不能立即把纯粹的、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拿到农村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农村中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在这之前,这简直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毁灭。”<sup>106</sup>

这段引文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可是列宁是不是谈到过工人阶级应当是农村中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呢?是的,谈到过。现在我们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口号,集体主义的拖拉机也开始在农田里奔驰,现在这个时期是不是已经来到了呢?当然是来到了。现在十五大已经紧迫地提出了(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工人阶级的新责任问题,而他却强调另一些东西,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说,引用了一段话,而现阶段特别需要突出的,特别适用于现阶段的那些话却被搁置起来了。我就不说国营农场了,对国营农场的态度也是很冷淡的,我要说是很怀疑的、很嘲弄的……

喊声:是傲慢的。

鲍曼:是傲慢的。这也是事实。还有预购合同<sup>107</sup>的问题、机器拖拉机站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困难的。我想,现在还有对于增加城乡之间的流通这个巨大杠杆的计划性,对于提高贫中农经济、在农业中推广集体形式、遏制富农等的认识不足。是的,和富农签订某种预购合同,在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克服富农的反抗,是遏制富农、限制投机自发势力的一种办法。

还有,从《政治遗嘱》中,从三人声明中,最初是从李可夫同志的提纲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抹煞了阶级斗争。比如,布哈林同志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文章里完全没有提到富农。”这些文章被他(布哈林)认为是政治遗嘱,认为是经过列宁深思熟虑的。不错,布哈林后来轻描淡写地提到现在阶级力量对比有些改变了(包括富农的活动更积极了)。布哈林同志自己提出了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可是现在又抹煞了我们面临国内阶级斗争加剧的问题。

再看关于调节市场的问题。莫斯科实行了购货本制度,规定了粮食和食糖

的定量,为的是同投机的自发势力作斗争,向莫斯科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廉价供应粮食和食糖,可是他们却说,这是回到战时共产主义<sup>108</sup>去了等等。

**乌格拉诺夫:**这叫什么? 降价政策吗?

**鲍曼:**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粮食非常紧张,显然,我们实行配给制和调节粮食主要品种是帮助了工人和劳动人民,对他们没有任何害处,相反,打击了投机活动。

再比如,三人声明谈到黄金储备,指责我们无节制地浪费黄金储备,执行近视政策,说浪费黄金储备是危险的。而当粮食困难出现以后,这些同志又迫不及待地,从国外进口粮食吧,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就是浪费黄金储备吗?

很明显,进口几千万普特粮食当然会沉重地打击我们的黄金储备,既消耗了黄金储备,又影响到我们在国外的信贷平衡,而且要重新审查我们的进口计划,影响到工业。粮食问题自然是我们的重大问题。于是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拿出我在政治局闭门会议上的发言来,说鲍曼讲的,五年之内都会有这些困难。我没有这样讲过。我说的是,粮食困难大约不仅限于今年和明年,这方面的困难今后也会有,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困难,我们大约需要4—5年。今后几年为了提高农业和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须要紧张地工作。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困难,可是这不是说还会有这样的困难……

**托姆斯基:**没有冻死,倒叫一个小疖子整死了!

**鲍曼:**不对,托姆斯基同志,我想,明年可能就不会再为粮食排队了,不过要彻底消除粮食困难,还须要大大提高商品粮生产,要建立和提高国家储备,最终我们要出口粮食,为此五年计划,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规定了五年的期限。

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是否同右倾划清了界线呢?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划清过。托姆斯基今天讲了一大篇话,可是他在哪儿明确地说过他们反对右倾、反对调和呢? 说过他们不同意右倾和调和,认为必须同它们进行坚决斗争呢? 科托夫讲了,而托姆斯基却很不明确。

总之,我们从这三个同志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反对加紧、加快国家工业化;其次,对集体化,而且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认识不够;还有,没有充分发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富农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追随,特别是现在,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害的某些倾向。

最后,还有一些问题。政治局三名委员的声明中有和历次反对派同样的调子——把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把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对立起来。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而中央全会和地方党组织却都不这样做呢? 这里显然有点



不对头。这是无事生非。托姆斯基今天发言的基调是缺乏集体领导,可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说的也是昧心话。他谈到了集体工作,可是把卡冈诺维奇补到他身边,他立刻就不干了。托姆斯基同志说,如果这个或那个建议没有被否决,那叫什么集体工作;如果没有争论,没有意见分歧,那叫什么集体工作。可是说到卡冈诺维奇,你却说:会有争论,会有分歧,会有瓦解。的确,你是想保证自己在工会运动中有统治地位、某种垄断地位。

**喊声:**让大家都听主席的。

**鲍曼:**而在其他地方,在政治局你们要求绝对民主。不行,要当民主派就应该当一个彻底的民主派。那在工会就不该反对补进新人,而应该和他们一起工作。

托姆斯基同志起劲地引用列宁的预言,说斯大林主观成分太重,因此导致了恶果。三人声明也谈到这些事。他们在这里也引用了所谓列宁遗嘱的相关文字,而且在攻击斯大林的时候,在党内大谈特谈斯大林太粗暴等等。列宁指示中的其他方面则避而不谈。比如说,我注意到有这样一段话:“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的两个杰出领袖(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这两种品质能够在不经意间导致分裂。”“两个杰出领袖”——在这里列宁把斯大林称为现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杰出领袖。[托洛茨基的问题已经结束了,托洛茨基没有注意列宁的指示,他跑到资产阶级营垒里去了。根据列宁的指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杰出领袖,就是斯大林同志。]为什么只说他“太粗暴”,而不提他是“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杰出领袖”,——是没有看见吗?列宁建议仔细想一想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挪开的方法——用一个新人来替换他,这个人在各方面都和他一样,但是只有一个长处,就是比他更忠诚,对同志更宽容。显然,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有一些杰出的同志,他们不同于斯大林的不单是有这一个长处,而是有许多其他不足之处,有许多缺点。如果仔细揣摩托姆斯基的发言,那就应当得出结论:免去斯大林的职务。何必吞吞吐吐呢。[免去斯大林的职务。不能有别的解释。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列宁的遗嘱得到证实了,斯大林确实太粗暴。我没法争辩。]既然列宁说斯大林粗暴,那想必是真的。我要说,斯大林能够表现很大的宽容,而且表现出来了。不过要考虑这种宽容不是无限的。当有的人公开地,有的人秘密地议论反对中央的时候,难道可以容忍到这种地步,以至人们不再尊重中央。因为列宁提过关于斯大林的这种忠告,那是不是说,斯大林同志就应该什么都容忍呢。公开议论也罢,秘密议论也罢,他都得容忍,否则他就是粗暴,不忠诚。

谁也没有提出遗嘱的其他方面。我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不应该片面地解释

列宁的遗嘱,错误地敲打同一个地方。

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同志的声明中说:“我们要工作。”莫斯科州委2月14日的决议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们服从,那就去工作。你们何必对我们说漂亮话,什么要工作啦,服从党啦。那你们就按照党的意志去工作吧,到党派你们去的地方去。党的意志很清楚。你们像是无辜的羔羊,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请求着——给我们一条最好的出路吧。我们能给你们什么出路呢?首先,放弃你们错误的指责和观点,其次,服从党的意志。这就是你们最好的出路。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是从来没有吃过败仗的。如果战略错了,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也要吃败仗。为什么你们这一小撮人,尽管有许多错误,却认为自己是不能服从的坚强堡垒呢?我听说过了,什么“我们可不是加米涅夫那样的人”。可是这种自命不凡只是让托洛茨基得到了可悲的结局,如果你们也要走这条路,走孤家寡人的路,不把党放在眼里,那结局就是最悲惨的。你们必须放弃对党提出的那些荒唐指责,到党给你们指定的岗位上去工作。如果你们不打算放弃错误,服从党,那么虽然看到一些老党员,一些久经考验的干部离开岗位时,我们每个党员都会感到伤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也只能这么做了。(掌声)

主席:我收到这样一张条子:“我们建议让布哈林同志发言……”

喊声:对!早就该让他讲了!

主席:“他的发言必须不迟于今天晚上。本建议必须提付表决。”下面是一串签名。

布哈林已经登记发言了,不过在稍晚些时候。如果大家同意延长会议,可以在今天晚上让他发言。

喊声:是怎么个顺序?

主席:布哈林登记的是第六十个。

喊声:真够可以的!

主席:我通知了布哈林同志:大家希望你早些发言,最好在今天晚上。他回答说他希望尽快发言,就在明天上午。

要不要表决?

喊声:不要。既然在明天上午,那就不用了。

主席:瑟尔佐夫同志发言。

瑟尔佐夫:现在很清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讨论的这场危机早就在酝酿了,而且可以说已经熟透了。

我们这些中央委员在前几次中央全会上就已经感到高层领导中正在形成的不和。每次全会之后,我们许多人在回去时都很不满意,而且意识到这种不和随时都可能爆发,使党不得不广泛地讨论这场危机。不单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且很多党员多少都料到这种不和的性质和起因。最近这段时间,对中央全会决议的评论是常有的事情,它造成了一种局面:每次全会都留下了双重痕迹。这两条痕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党内的众说纷纭和混乱。仅仅这一点就表明了领导层内的不和。而且我认为这种各行其是并不是从七月全会才开始的——我既不同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意见,也不同意托姆斯基同志的意见。

我觉得,去年的中央四月全会就有了党内分歧和让党感到不安的苗头。去年的四月全会是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之后几个月召开的。

原本指望在党代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会能够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情况——向资本主义成分开展的进攻等等,做出政治分析和初步总结。可是我们感到非常失望,没有做出政治分析,而且把这个问题抹掉了。这说明中央的最高领导有不同看法,或者是害怕把这些不同看法捅出来,把分歧暴露出来。这清楚地表明,对第十五次党代会如此一致地通过的决议看来有并不相同的理解,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十五大以后,在执行路线和决议时会出现分歧。

党代会之后的最初几个月是向富农进攻的时期,在由于必须而形成的特殊条件下如何执行粮食采购和非常措施,——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地方报刊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在向富农进攻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表明,在最高领导层中并不明确,在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向富农进攻的问题可以在任何地方讨论,就是不能在《真理报》上讨论,这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困惑,使机会主义分子在《真理报》很能说明问题的沉默中组织起来。特别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许多党委提出指责,说地方上有点独善其身,实行一种自行其是的路线,和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宣传和解释的党的路线不符。这些事情不能不令人担忧,不能不表明存在一些无法抹煞,又不能解决的矛盾,它们正在酝酿,一旦党面临严峻的客观形势时,它们就会爆发。

我觉得,作为自我批评,必须指出中央委员会没有掌握局面,而我们中央委员也完全没有掌握局面。我们提心吊胆,可是没有明确而尖锐地指出来,也没有要求消除这种局面,至少是使它明朗一些。我们没有干预这件事,而是迟疑不决。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充分地提到了中央,而当时本应当把某几块木板换掉或是抽掉,而不是用我们的铁箍把它们连接起来。我记得,在讨论工作计划时,中央全会有过一项决议,要求政治局定期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据我的记忆,这项

决议从来就不曾执行过。可是我觉得,这本来可以使中央委员会有可能系统地监督自己司令部的工作,及时对领导机构中哪怕是最小的令人不安的信号做出反应。

有些同志和政治局的多数,看来也是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他们的政治立场中的某些部分、某些因素现在被右倾分子紧紧地抓住了。很遗憾,《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分析,——《札记》的某些部分被党内的右倾分子拿去为他们所用。这使右倾分子可以为集聚队伍隐蔽地进行一定的组织工作。

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工人运动的许多远非优秀的干部、那些工会官僚型的干部,即便不是按路线,也是按托姆斯基同志定下的调子组织起来,评论工会领导的活动和工会的状况。托姆斯基同志对工会的状况和领导做了最公式化的、乐观的评价。托姆斯基同志同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一起,在一份文件中说,现时领导的缺点是往往用叫喊来代替领导。可是在这次工会大会上,在这个群众组织的大会上托姆斯基同志表演了很多精彩的喊叫的例子。让我们西伯利亚工会代表团特别生气的是:我们对西伯利亚边疆区工会理事会主席沙兰戈维奇同志领导工作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最诚心诚意的批评,作为回答,托姆斯基同志却来了一番极其傲慢的、老爷式的大喊大叫,还对那些想把大会开成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的人大加赞扬。而现在托姆斯基同志却指责党的领导,说它老是用单纯的喊叫来代替领导,不容许批评。至少应当这样说,托姆斯基同志并没有做出过别的榜样。

关于农村问题说几句。农村问题是产生分歧的基本问题之一。现在富农试图用恐吓和断言我们实际上已经取消了新经济政策来把中农组织起来。我觉得,布哈林同志提出,而得到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支持的,对五年计划提纲的修正案是一个新把柄,使富农可以断言新经济政策已经取消。毫无疑问,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最大弱点就是往往把进攻富农的事情转移到它们熟悉的余粮征集制的轨道上去,可是我觉得,从这种歪曲中、从这种错误中不能不看到我们现在执行的新经济政策和几年以前的新经济政策之间的巨大差别。新经济政策现在的条件已经不同了。我们从来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固定的关系体系,而是一种和农民的关系体系,它容许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引导农民前进。前进的主动权无疑应当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因为农民不可能表现这方面的主动精神,而由于其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偏见,倒可能阻碍这种运动。然而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固定的、不动的关系体系正是要推迟、延缓社会主义建设,把农

村社会主义建设往后放一放。即使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论证随意放慢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可能性,那资本主义也不会等待。从我们西伯利亚的实际经验来看,我可以断言,西伯利亚的富农,至少是它的大部分,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富农的积累规模,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和阶级关系的逻辑,都必然要推动富农去打破苏维埃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党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阻挡富农的路线,用相应的进攻切断它的道路;第二条路线是等待的路线,用原地踏步来帮助富农。后一条路线使资本主义分子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我觉得,只有把农村中的关系看成一成不变的,不懂得阶级关系的性质,不懂得彻底改变着农村形势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辩证法,才会站到1924—1925年的立场上去。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看到富农的疯狂反抗。我们粮食采购中的一些冲突就是证明。这些冲突往往被说成是情况不妙信号,是我们的政策不对的信号。顺便说一句,莫斯科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在西伯利亚几乎造成了暴动。许多同志问我,想得到关于暴动的消息。我要断然声明,这不符合实际。我希望下次中央全会(在听取了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问题之后)能讨论西伯利亚农村问题,我们能够提供一份客观的、令人信服的材料,说明西伯利亚农村的稳定形势和顺利的建设。可是我们不能断定这方面不会出现复杂的情况。在采取强制措施时,个别村落里有群众性冲突和反抗。可是不能用五六个村落里的冲突<sup>109</sup>来抹煞五六千个村落里发生的事情。

这些冲突的起因各式各样,但其中之一无疑是我们的基层机构质量太低,犯了许多错误,胡作非为,违反政策等等。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莫斯科的领导、莫斯科的错误。现在执行的许多措施我们直到最近才得到批准,当你们在决定要不要采取必不可少的措施时,在莫斯科摇摆不定时,在政治局碰到党内的麻烦事,问题拖着不能解决时,——我们的建议,这方面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而在西伯利亚就到了道路翻浆期和播种期了。现在须要实行这些措施时,我们只好匆匆忙忙地贯彻下去,这就必然增加了错误。一般说来,今年的领导特别不恰当,表现在我们不能赶在事情的前面,而是跟在后面跑,我们在领导工作中有很多尾巴主义。既然是领导,就该有预见性,我们今年预见的太少了。经济年度开始时碰到的问题是粮食采购的杠杆作用,而地方上坚持要把捐献<sup>110</sup>作为这样的杠杆。莫斯科许多领导同志有一种几乎要完全放弃捐献的情绪,或者说他们对捐献提出许多保留意见,以至留不下什么东西了。我声明,我们在这方面是不能容忍地绕圈子。起初规定的限额是农业税的25%,后来提高到35%,又提高到

50%。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立法标准都被破坏了,弄得声誉扫地。由于我们领导的摇摆不定而丢掉的速度、丢掉的时间真不少。

这些冲突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在我国条件下,无论执行怎样的政策,我们在近期内都会遇到富农凶猛的反抗。富农中最具有阶级意识的那一部分人会提出一定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在我们向富农进攻时,富农的反抗是一回事;在我们遭遇到富农的进攻性冲突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宁愿富农的反抗和冲突发生在主动权掌握在党、工人阶级和农村中支持我们的那些阶层手中时。

这里有人引证了很多列宁的文字,而且加以解说。我想请谁来解释一下列宁这样一段话的含义。列宁说过,我们将同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决战,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我们还要进行许多最后的决战,而是同企图夺回自己阵地的国内资本主义。列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说现在正在发生的富农的反抗就是同资本主义最后决战的前哨战呢?富农现在正试图领导农村中最落后、最个人主义的成分。当人们以为,正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那些被称为非常措施的做法刺激了农村中的一部分人,而我们在采取这些措施时遇到的反抗正在威胁到结合时,同志们,还必须注意,比如预购合同这样的措施也在农村的某些阶层中遭到了反抗,尽管这项措施并不是非常措施,而且在现时,在现阶段给个体农户带来很多利益。正是因为富农感到这项措施的背后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计划和调节作用,认为这项措施是向富农有计划进攻的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才对党的这项工作组织了反抗。我们能够战胜这种反抗,粉碎这种反抗,用农村中贫农和中农的社会积极性来粉碎它。可是为此党的意志必须是十分清楚而一致的。只有这样,党的意志才能够把贫农和中农群众组织起来;而党只有用这种意志武装起来,而不被动摇和犹豫所侵蚀,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些散布这种动摇的人是在给党帮倒忙。我认为,今年的粮食采购活动末期我们自发地采取的态度,让每个区、每个村的农民都知道他们这个区的计划是多少,这在今后的粮食采购运动中应该是一个出发点。我们抓住必要性,有可能在计划作用的范围内增添一些新的因素。明年秋天应当不是抽象地提出计划问题,不是仅仅依靠市场关系,而是提出经过论证的、经过仔细检验的计划任务,——对每个农业地区说明计划,而且坚定地灌输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应尽的义务。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遭到农民的痛骂。他们说:你们现在才告诉我们计划,告诉我们应当给国家多少粮食,而我们已经把余粮在自由市场上卖光了。如果你们这样做,就会好一些:事先提出计划,然后再说——你们还能剩下多少,就可以自由支

配了。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摸索加强无产阶级国家对农村的计划作用和调节作用的一些环节。

当人们对我们在贫农和很大一部分中农中地位的加强估计不足时,党内对于农村路线的动摇就会加剧。如果把个别农民、富农及其应声虫的发动一股脑儿记在整个农村账上,并且根据这种事实说:“农村现在是这么想的”,“农村现在是这么说的”,那就错了。去年七月全会上,布哈林同志受到农民来信的很大影响,这些信讲到农村中十分强烈的情绪。一部分工人,和农村有联系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包括我们西伯利亚的工人在内,也受到这种信息的影响。最好是不读这些信,而同活生生的农民打交道。西伯利亚的工人就其经受考验的程度和自觉性而言,当然比工业地区差很多。为了消除他们的动摇,我们就把一些工人,即所谓的工人工作队,派到农村去,让他们能够就地搞清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及时把布哈林同志随同这种工人工作队派到农村去待上两三个月。我想,他直接看到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之后,他就能对他得到的信息持比较批判的态度。当然,他在农村会看到当地实际的许多缺点和胡作非为的事情,往往把党的路线歪曲了。他会看到某些基层干部在阶级划分问题上的漫不经心,混淆了不同的农村阶级集团。可是我觉得,布哈林同志在对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提纲所做的修正中,也表现了这种漫不经心。布哈林同志的修正得到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支持,其中说,同农村中的中农和贫农群众建立稳定的、有保障的、牢固的同盟是必须的。我觉得,这种表述法有重大的缺陷,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直到今天我们都认为,我们同农村中的中农群众能够结成联盟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而这里却建议我们同中农和贫农建立联盟。这里抹掉了贫农同中农的区别,对不同的阶级范畴建议采用相同的策略路线。在今天复杂而关键的政治经济时期,不能容许党的集体头脑中有互相矛盾的原则路线。政治经济局势的复杂而巨大的困难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在原则问题上有最大的明确性和坚定性。如果不能通过使政治局内有分歧的同志也赞同基本政治路线而达到这一点,那显然一些党委主张改组政治局的建议就是对的,为的是保证在现阶段政治局有最大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我认为,这样做并不是排斥。这样做并不排除往后几个月的经验、生活对党的某项决议的检验能够使这些同志相信自己立场的错误而痛快地回到多数人的立场上来。

主席:卡冈诺维奇同志发言。

卡冈诺维奇:同志们,我们看到党的一些最高级领导人最严重地破坏党的组

织基础,违反党纪的许多事情。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几个月内不服从政治局的决议,不工作,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这些同志的反对政治局的斗争走得多么远了。在党的历史上,除了十月革命时期的著名事件<sup>111</sup>之外,没有类似的事情。当然还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那已经远远超出了党性的范围。可是同反对派我们是用特殊的语言谈话的。

然而在我们这次全会上有决定意义的中心问题不单是这个组织问题。决不能把一切仅仅归结为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从严重违反党纪这个事实出发,揭示出作为这种行为基础的原则性根源。正因如此我要说,听托姆斯基同志发言是很不舒服的。我们早先很爱听他内容丰富的、尖锐的讲话。可是他这次的发言却贫乏得让人吃惊,尽管他企图塞进许多“轰动的言辞”。托姆斯基同志的整个发言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什么呢?可以归结为批评组织工作上的某些混乱,集中火力攻击我们党的领导。我们没有听到托姆斯基同志从原则上论证自己的路线,从原则上论证自己反对中央政治局的斗争。而大家知道,这是在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三同志对提出了我们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的农业问题提纲投了弃权票之后,对控制数字提纲提出了改变提纲含义的修正案又投了弃权票之后。在这之后他来到中央全会上,装模作样地诉了一通苦,想引起中央委员们的怜悯,诉说委屈,以为中央全会会集中注意这件事,而避开主要的原则问题,这当然是他对中央委员会不了解。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在这三名政治局委员同整个政治局之间有严重的分歧。你们不妨拿最涉及托姆斯基同志本人,而他也谈得最详细的那个问题,即工会问题做个例子。[我要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这里出现了我的名字。我能够无拘无束地谈这个问题是因为除了我的名字以外,还可能涉及另一名中央书记。这就不是姓名的问题,而是中央书记了。]

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把事情说成这样:他是受到“恶意攻击”才提出辞职的,中央的错误组织措施使他必须提出辞职。我们现在知道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话的事,我们把这次谈话和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在11月提出辞职这件事做了比较,——托姆斯基的种种说法就全部失去了意义。不过我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向大家说明,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也并不像有人企图在这里描绘的那样,一切原则问题都很顺当。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工会代表大会领导小组内有分歧,而且不仅是在人事问题上。出现人事问题上的分歧是因为打算从地方上补进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任何一个新人都遭到激烈的反对。许多同志反对这种路线,于是认为这是要挖墙脚。



而且问题不限于此。工会领导小组内有严重的原则分歧。我补进主席团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因为它从小组转到了政治局。可是在其他问题上有争论,我们小组有时开会开到清晨五六点钟。都是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科泽列夫同志的发言。他在大会上发言,骂《真理报》是诽谤,骂《共青团真理报》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我们在工会领导小组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样大的会上是不能对这种事置之不理的。提出了一项非常严厉的决议。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我坦率地说,无论是小组成员还是托姆斯基同志都不能否认这一点。莫洛托夫同志起草的决议是很尖锐的。]对决议的每一条、每句话都争论了很长时间。托姆斯基同志极力维护科泽列夫。

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抱怨非同志式的斗争方式。托姆斯基同志试图在这里把同共青团的争论说成是有人挑唆。仿佛某个人就能够把两百万人的青年组织挑动起来似的。这是胡说八道!这么说就是对现时在千百万人中开展起来的、真正的主动精神采取官僚主义的错误态度。共青团是健康的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不能对两百万人的组织实行官僚主义的监护,不能要求共青团不批评工会。当然,中央委员会是领导共青团的。如果中央干预了共青团同工会的争论,那也不是为了挑动,而是为了对青年人有所遏制。工会工作有重大缺点,这是事实,这是中央委员会全会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说的。可是对工会工作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却遭到了猛烈的反击。说这是侵犯了工会运动的根基。从什么时候开始批评成了侵犯工会运动的根基了?托姆斯基同志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不仅没有保护共青团不受科泽列夫的攻击(只是根据领导小组的决议,他才在总结发言中稍稍缓和了科泽列夫发言的印象),而且他在报告中用他全部的尖刻(我们知道托姆斯基同志是很善于尖刻地鞭打的)攻击共青团,败坏它的声誉。而这个代表大会本来应该努力团结工人阶级的年轻一代,老干部本应为无产阶级的年轻干部做出布尔什维克修养的表率。我们能同意这样做吗?

对托姆斯基报告的决议草案里有一条谴责共青团,我们提出了修正,建议取消这一条。不能,也不应该在两百万人的无产阶级青年组织和工会之间制造裂痕。而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志们并没有对共青团表现出最起码的同志式态度。

第二个原则性的争论。对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提出了一个草案。这个草案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请看,决议中主要的一点是这样说的:

“第七次代表大会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之间,工会的整个工作是在加紧开展国家工业化,大力建设新工厂、铁路、电站,重新装备老企业和紧张进行工业国有化的条件下开展的。这两年内虽然有过许多错误和缺点,工人阶级仍然沿着把

苏联从一个农民的、落后的、小私有者的国家切实变成一个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道路一步步前进。”

在整个决议中,除了最后一小段里说了几句之外,哪儿都没有明确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克党。这叫什么呢?“工人阶级一步步前进等等,虽然有过许多错误和缺点,”什么错误呢?什么缺点呢?在谁的领导下呢?苏维埃政权、党到哪里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又在哪里?我们认为这样写是错误的,建议把第二段改成这样:

“第七次代表大会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之间,工会的整个工作是在苏联在国际上处于困难环境、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展开的。工人阶级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成功地沿着把苏联从一个落后国家切实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的道路前进。”

还有,我们用不着含糊地暗示错误和缺点,而是明确地说:

“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正确阶级政策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恢复时期,转向改造国民经济,建设新工厂、铁路、电站,重新装备老企业和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时期。”

接下去我们认为决议完全没有提到同小资产阶级的的情绪作斗争,同工人阶级和工会内部的孟什维克情绪作斗争。

这有什么可委屈的呢?说有这样的情绪就值得委屈吗?伊里奇不是说过这些话吗,他不是警告过我们吗。可是这却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最大的委屈”。领导小组对此争论了很长时间: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请看:

“对于把工会同苏维埃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党——联共(布)对立起来的任何企图,对于表现非政治化的任何企图,无论是打着复活孟什维克的独立思想的旗号,还是打着非政治化的旗号,苏联的工会运动都将给以坚决的、革命的、列宁式的回击。”

这样写有什么不好呢?伊里奇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批示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这样写道:

“工会只有在它能够团结最广泛的工人阶层时,才是实际的。因此必然出现,特别是在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中,各种政治影响在工会中相对稳定的情形,这些影响是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是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伊里奇接着提出了任务:

“因此,无论是共产党,还是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或是工会中的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更多地注意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表现、潮流和倾向作思想斗争,何况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因此迫切地须要与之对抗,加强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斗争。”<sup>112</sup>

这是伊里奇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写的。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长叶夫列伊诺夫同志建议把伊里奇的这段话写进文化工作提纲,中央理事会领导小组拒绝了这项建议。为什么呢?因为据说,这样做可能成为“恶意攻击”的借口。列宁关于同工人阶级中、工会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摇摆作斗争的话居然能成为“恶意攻击”的借口!请看,如果把这些微不足道的盘算置于伊里奇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上时,病态和疑虑可以达到何种地步!

还有许多修正意见也引起了争论。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说:投票结果是9比10。可是这不是随心所欲的投票,而是就原则问题的投票。为什么你,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不说说,在哪些问题是9比10?

**托姆斯基:**时间不够。

**卡冈诺维奇:**是时间不够吗?给了你两个小时,后来还追加了。你把工会代表大会领导小组说成是一个勾心斗角的小组,它欺压工会,对工会吹毛求疵。而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小组里提出了原则问题,和你们就原则问题进行了争论,把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写成了它本该具有的样子。

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把事情说成这样:反右倾斗争是党内斗争,没有必要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在我们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他当时还是党员,你在全会上,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过激烈的讲话吗?为什么你认为在同托洛茨基斗争的问题上可以在广泛的场合讲话,而在反右倾的问题上却不能呢?是不是因为你实际上不同意反右倾斗争,所以不想在代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讲话呢?

小组中的下一个分歧是托姆斯基在党团会议上的发言。在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时,关系上有些紧张,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所有代表都知道,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情况不很确定,须要明确下来。代表们要求在党团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乌克兰代表团就提出了这个要求。托姆斯基同志试图把事情说成是卡冈诺维奇同乌克兰代表团有特殊联系。

**斯克雷普尼克:**真是罪恶!

**臧声:**没什么好认错的<sup>113</sup>。

**卡冈诺维奇:**我也没打算认错,可是我要声明,乌克兰代表团没有任何特殊

的组织。这是托姆斯基的捏造和诽谤。事情就在于乌克兰代表团确实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明确地发了言。你们就为此中伤它。跟乌克兰代表团站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大代表团,它们在大会上也遭到了你们的中伤。于是提出了乌克兰代表团,还有西伯利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团的问题:请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一下。谁做报告?就让托姆斯基来做好了,他是党团会议主席,又是工会领导,我们欢迎他,我们给他喝过彩,他有威信,就让他,让托姆斯基来谈谈反右倾斗争。

领导小组提出这个问题后,托姆斯基同志声称:我不能做,随你们怎么办吧。我病了,我没有准备等等。同志们,这是在党已经广泛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之后,每一个负责干部都能够做这样的报告之后,而他却说,我病了,我没有准备等等。昨天托姆斯基同志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他们不是幼稚无知的人,那好,请托姆斯基同志也别把我们看成幼稚无知的人。显然,托姆斯基同志不想把这个问题在党团会议上提出来是出于政治考虑,出于政治性质的考虑。

为什么托姆斯基同志没有谈这些呢?我要说,我参加了领导小组的工作,我坚信,——我不想挖掘别人的心理活动,不过对我而言,十分明显的是托姆斯基同志想把工会保持在关于右倾的争论之外,起初把它作为一支中立势力(我们布尔什维克知道,中立势力,特别是像工会这样的中立势力,是不存在的),然后才把它放到天平上。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事情的确是这样的。托姆斯基同志起草过一份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党团会议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草稿。它没有像所有的党组织,首先是莫斯科的党组织那样,明确地提出党的任务、工业化速度、反右倾斗争等问题,而全是一些空话,领导小组的成员,包括托姆斯基同志的支持者在内,都不满意。我们当然拒绝了这份决议草案。后来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由多加多夫同志做报告,起草了一份确实经得住考验的决议草案,给了右倾明确的回击。党团会议表明,它不赞同托姆斯基同志,因为它热情地接受了这个决议。当我们建议在代表大会的决议里加入这样一段话:“组织成工会的工人阶级坚定地知道,只有联共(布)执行的政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工人阶级要同脱离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的种种倾向作坚决斗争”(这个建议对不对呢?),托姆斯基同志脸上酸溜溜的,吹毛求疵,投票结果9比10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尽量不使关系紧张,尽量争取达成一致,因此在个别表述方式上做了让步。我们认为重要的不是在个别表达方式上斤斤计较,而是路线。当表述方式明确了以后,我们对决议整个说来就满意了,大会的决议很明确,完全正确。用不着拿莫洛托夫的纸条写早了还是晚了这种事情来掩盖问题,[别以为我们很

幼稚。问题在于托姆斯基同志在工会大会上表明了一定的原则分歧,]别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大会代表们,如你和布哈林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在压力之下投的票。你们一直是同这些干部一起在工会工作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当面侮辱他们,证明工会干部害怕了,在压力下投了票。对不起,你不该这样说。连那些以为事情出在组织问题上的争吵的个别代表,当他们感到问题在于路线的时候,也起来反对你们,反对在工会大会上搞任何派系之争。

我们很明确,我们遇到的是某种在政治上背离党的路线的问题。

任何企图把我们引到一边,引到组织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去的企图都是不能得逞的。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愤愤不平地声称:“卡冈诺维奇怎么能说我们在走向资本的王国?”托姆斯基同志指责我不诚实、不老实等等。我要说,是托姆斯基同志自己不诚实地引用了我的话。

[除此之外,托姆斯基同志还试图就年轻的领袖等等说一些俏皮话。

**托姆斯基:**你太谦虚了!

**卡冈诺维奇:**可是我要说:我是年轻,但我不是领袖,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领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托姆斯基:**你太谦虚了!

**卡冈诺维奇:**托姆斯基同志,为什么你要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谦虚的人,为什么你要声称,“我不是领袖”。

**托姆斯基:**年轻人要接班了。]我是按《真理报》引用的,可以核对一下,谁说得对。

**卡冈诺维奇:**我本来不打算在这里引用我在乌拉尔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可是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引用了我的话,对我提出了许多指责,所以,同志们,我请大家不要生气,让我引一段我的讲话,让大家看看托姆斯基同志怎样歪曲了我的本意。在分析总的局势时,我是这样说的:

“关于减少商品经济比重的问题,用商界人士的话来说,右倾分子找到了一条‘救命的’出路:放宽富农和农村中资本主义上层的积累条件。可是放松挤压或者说刺激农村的这个上层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线索,右倾分子通过弗鲁姆金的口,用商界的语言说得相当坦率。右倾分子还关心加强和中农的联盟。显然,这不是加强和中农联盟的列宁主义道路,走这条路我们就会把中农推向富农的怀抱,富农的威望就会提高。不要以为,现在可以用旧的方式加强和农民的联盟。我们过去和农民的联盟是以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基础的,有过军事的联盟,后来结盟的形式具有了贸易联系的性质,而现在这些不够

了。我们需要新的结合形式,这就是工业的结合。加里宁同志的提纲中鲜明地说明的正是这种形式。”

接着我说:

“右倾分子提出的是什么呢,怎样来表述他们的纲领呢?降低工业化的速度,说是农民承受不了,减轻负担,为发展强大的富农个体经济提供更多的刺激和空间,也就是给富农更多的空间和刺激。不要搞国营农场这种‘无聊的事情’,不要把耐普曼、个体户等等逼得太紧。然后是窃窃私语地要求减少对工人做的自我批评,增加对农村上层和官僚的保障和民主等等。”

接下去是:

“右倾分子提出的不断让步论是要做出不利于中农和贫农的让步,是对那些持有粮食、企图用饥饿的魔掌来阻止无产阶级专政进军的富农的大让步。当然,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也应该对基本农民群众——中农和贫农——做出必要的、不违背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让步:比如,正在实行的提高粮价、新农业税法<sup>114</sup>,可是这不是右倾分子提议的让步。右倾分子要把我们引向哪里,难道还不清楚吗?他要把我们引向那座进去容易,出来难的大门。这门上写着:‘欢迎来到资本老爷的王国’。”

同志们,大家看到,这里提出的不单是不断让步论的问题,而且是把我们引向资本王国的整个右倾的问题。托姆斯基同志不高兴了,因为他和整个不断让步论一起落进了右倾的怀抱。

托姆斯基:你引得不对。你说的不断让步论在哪里?这是诈骗!

卡冈诺维奇:托姆斯基同志,虽然你是“反对派的显贵”,可是你不要重复托洛茨基的办法,指责大家诈骗。不管你用什么粗鲁的咒骂也不能掩盖你的右倾主义。我对自己说过的话一个字也不放弃,你不高兴了,托姆斯基同志,可是不要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我们说右倾把人引向资本的王国,这可是列宁的话,你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议论右倾的话,你全揽在自己身上,这怪得了谁呢。

臧声:说得对!(笑声)

臧声:这和托姆斯基有什么关系呢?

卡冈诺维奇:托姆斯基同志,你今天的发言起码比你早先的提法都走得远多了。你对结合的新形式的不理解和嘲弄,你关于余粮征集制的声明,还有关于我们不去克服困难,却搞反右倾斗争的声明,都说明你更接近右倾了。

右倾分子不理解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阶级斗争。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任务和克服困难斗争的出发点是生产力的总增长,或者像李可夫同志在他早先的提

纲里说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他们不是从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不是从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看问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脱离,和阶级、阶级斗争脱离,这就是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错误的基础。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说,谁也没有一针见血地批评过《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而它的缺点就是写得不够通俗易懂。我不打算在简短的发言里认真地批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对它的批评已经够多了。布哈林同志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斗争去考察我国生产力的高涨。[他想引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徒劳的。他在影射谁呢?纯粹是胡扯!他想干什么呢?把我们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拴在一起吗?这怎么可能呢。]托姆斯基同志也显示了他不懂得阶级斗争和提高我国生产力的任务之间的关系。托姆斯基同志今天在这里说,这结合的新形式是怎么回事,你们想出什么新形式来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托姆斯基同志要么是在装疯卖傻,要么是真的不明白结合的新形式的本质。它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实质在于,十月革命时期我们同农民的结合是以没收地主的土地,再把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为基础的。内战时期我们同农民的结合建筑在为巩固这些土地而战的基础上。新经济政策的初期这种结合以销售和贸易为基础。现在我们到了第二阶段——工业结合的阶段。托姆斯基同志认为这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显示了他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是独特的、非辩证的、机械的。这和列宁主义是否矛盾呢?完全不矛盾。我们就以农业合作化为例吧。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销售,这就是它的实际工作。现在我们到了第二阶段,农业合作社成了生产力,在农业的联合和改造中发展生产力。伊里奇在合作社计划中曾经预见到这点。他根本没有像你们在修正意见中说的那样,仅仅限于贸易结合这种形式。我们现在是一个新时期,我们应当提出生产结合,让农业迈上一个新的经济台阶和技术台阶。我们应当给农村提供新机器和最新的技术。现在不能满足于我们过去采用的那些措施。列宁提出了改造农业的合作化计划,在这个计划的框架内我们有两个台阶、两个阶段。看不到这点就是忽略了主要的,就是不明白,如果我们满足于旧任务而停步不前,如果我们不提出改造农业,建立日益强大的工业的供应基地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建立什么社会主义的工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富农会壮大起来,个体经济会壮大起来,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整个工业置于饥饿的定量供应之上,不提供粮食,迫使社会主义工业对他们俯首听命。那些为粮食大喊大叫的人不懂得这一点。布哈林同志不懂得这一点,不断地说我们应当采取让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方针。

**托姆斯基:**他在哪儿说的?

**卡冈诺维奇:**他在《到社会主义之路》里就是这样写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读一下。

**托姆斯基:**请读吧,请你把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话一字不差地读出来吧。

**卡冈诺维奇:**请听吧:

“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由‘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而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国家出版社,第49页)<sup>115</sup>

**托姆斯基:**你读全了,不要“等等”,那里没有讲富农长入社会主义。

**卡冈诺维奇:**怎么没有说?!再清楚不过了:“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托姆斯基:**哪儿讲长入了?给逮住了吧。

**卡冈诺维奇:**是你的朋友布哈林和你给逮住了,可是你还装模作样地喊:“抓贼呀!”托姆斯基同志自己是书呆子,却想把我们变成书呆子。不是说了吗:“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也许你打算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说得够明白的了!就是小孩子也能明白,这里说的是长入,如果你还不明白,那就请看,这本小册子里(第67页)布哈林声称:“必须给农业资产阶级以更多的经济自由。”明白了吗?你要否认吗?布哈林同志声称:我们必须给农村资产阶级更大的经济自由!布哈林是不是说过这句话?清楚了吗?如果你还是不明白,请你接着往下听:在集体农庄大会上布哈林说,集体农庄“不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路,不是康庄大道,不是干线”<sup>116</sup>。布哈林同志是否说了这些话呢?布哈林同志今天的理论不是偶然的,这是你没法狡辩的。

**喊声:**对!

**卡冈诺维奇:**在为粮食而奋斗的时期这个理论表现得特别刺耳。你们想利用这些困难来从理论上、政治上、实践上论证我们政策的转变。

**瓦雷基斯:**扩大新经济政策。

**卡冈诺维奇:**为农村资产阶级扩大新经济政策,给它提供“更大的经济自由”。这是布哈林的话,这些话是你们躲不开的。这在困难时期表现得最明显。他们建议的是什么呢?他们是要给农村资产阶级更大的经济自由,而且还说:我们不是通过斗争,而只用经济手段取得粮食。同志们,我们赞成经济手段,党正



在采取一切必要的经济手段。工人节衣缩食,而我们把商品投向农村。

喊声:对!

卡冈诺维奇:工人阶级容忍了,它表明自己是懂得领导者的角色的。

乌格拉诺夫:你说工人阶级容忍了,卡冈诺维奇同志,你是发昏了吧!

卡冈诺维奇:不对,乌格拉诺夫同志,你不单是自己发昏了,而且让别人把你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大澡堂里泡得晕头转向了!所以我说,工人阶级同意了,容忍了自己节衣缩食,顺应了必然性,它不单是同意了,而且自己执行了这些措施。

喊声:对!

卡冈诺维奇:我们给农村提供了商品,我们提高了粮价,可是富农仍旧说:余粮我有,可是不给你们。你说我们该怎么办,你能想出什么措施来吗?你提不出别的经济措施,你没有。你没有提过一个新建议,你也提不出新建议,因为你没有,因为我们是在和阶级敌人打交道,而阶级敌人在向我们进攻,他不愿意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交出余粮,他还声称:给我拖拉机,给我选举权,我就给你粮食。同志们,我走过很多村庄,和农民,甚至和富农谈过话。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把拖拉机给我,把机器给我,也就是说,别给集体农庄,因为你们的机器不够,别跟贫农费口舌,也别建立国营农场,统统给我,我就给你们粮食。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说:我们在搞余粮征集制。托姆斯基同志,让我来告诉你,别随随便便地使用这些词。我可是听富农说到过余粮征集制……

托姆斯基:你听到的还少吗?

卡冈诺维奇:不对,托姆斯基同志。列宁教导我们要听听阶级敌人说什么,不仅要用朋友,而且要用敌人的话来检验自己。我听富农谈过余粮征集制。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做。同志们,我们提高了粮价,我们花钱买粮食,这叫什么叫余粮征集制?你是否知道,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你是否知道,在西伯利亚,增加的粮价几乎等于全部农业税。这你知道吗?按照计划,提高粮价应该付出2500万,而西伯利亚的全部农业税收人才3100万。这你知道吗?这能叫余粮征集制吗?这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蠢话吗?我相信,这种关于余粮征集制的谈话可以在《社会主义通报》<sup>117</sup>上读到。托姆斯基同志,别信口开河,说什么余粮征集制了。没有余粮征集制。有的是什么呢?对不起,同志们,我占你们的时间了。

喊声:请你接着讲吧。

卡冈诺维奇:我想根据自己的观察,举几个粮食采购的例子。粮食采购的基

本部分是自发地进行的。贫农交出了粮食。大部分中农也交了。余粮现在控制在富农手里,一部分在上中农手里,就是常说的富裕中农。我可以就一些生产单位举出一些明确的指标:他们播种了多少,交了多少,在私人市场上出售了多少,最后他们手里还剩下800、600、400普特<sup>118</sup>。

比如说,在阿克莫林州还有不曾脱粒的粮食垛,我对遇到的农民说:你们怎么看呢,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播种计划都没有完成,可你们还有大垛大垛没有脱粒的粮食,苏维埃政府能容许吗,这样的政府早该赶走了,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他们回答说:你说得对,是这样的。可是粮食还是不给。不过,我在那里也遇到了乌克兰人,那里有许多乌克兰人。我跟他们讲乌克兰语,他们满脸堆笑:“嗨,你还会说乌克兰话呀。真是见到老乡了。”可是一谈到粮食,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哪怕你说的是乌克兰语,你也拿不到粮食。(笑声)这种花言巧语在地方上有时达到了死乞白赖的地步,纠缠着到人家家里去,对他们说:苏维埃政权眼下很困难,顿巴斯在挨饿,红军也要保障等等。农民听了这些话,把粮食藏得更严实,因为既然有难处,那粮食就能卖高价。许多富农干脆就说:你们把我抹得再黑,我也不给粮食。给我选举权<sup>119</sup>,我就给粮食。还有一个教堂的长老,他种了26俄亩土地,可是只给了12普特。简直是开玩笑!他说,我不给国家粮食。你要说服他吧。不给就是不给。教堂长老哪怕种了26俄亩地,你也说不服他!(笑声)

我们怎样才能拿到粮食呢?那些托姆斯基同志本当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道听途说来加以研究的新方法,究竟新在哪里呢?新方法的实质就是:在全村大会上贫农和中农积极分子公开倡议把本村应当承担的粮食采购数量向全体居民(富农除外)公布,由全村大会给富农规定一定的义务,而中农则自愿承担某种义务。全村大会选举一个委员会,负责实施全村大会的决议。政治局的决议里是这么写的<sup>120</sup>:

一、按村落硬性规定粮食采购计划任务的公开倡议不应当由粮食采购单位或政权机关的代表直接提出,而应由社会团体(贫农小组、积极分子小组)提出,通过全体公民大会实施。

二、实施全体公民大会通过的全村粮食采购计划时,应将富农上层和其余农民群众分开,通过全体公民大会,或根据大会的委托通过专门委员会,给富农上层规定从其余粮中向国家交售粮食的一定任务。

三、计划规定的本村粮食交售数超过富农交售任务的部分,由全体公民大会分配给村里其余的农民,作为自愿承担的义务。全部这项工作都应当和大力加

强无产阶级舆论对基本农民群众的宣传动员同时进行。

#### 四、本方法在哈萨克、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实行。

当然,这些办法要实行起来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工作就很难执行,而且会被扭曲。

我并不想描绘一副田园风景画,把粮食采购工作说得完美无缺:贫农组织起来了,粮食也都交了等等。歪曲政策的情况是有的,我可以举出几十个、上百个例子来。李可夫同志散发了从农民来信中摘出的几件事。歪曲政策的事有许多,可是要拿它们来证明这就是搞余粮征集制,那就是胡言乱语,说蠢话。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把贫农组织起来,把农村中的阶级力量团结起来。我观察过农村:凡是我们没有从阶级的角度尖锐地提出问题的地方,贫农没有组织起来的地方,那里的富农就趾高气扬。我到了巴尔瑙尔。我听说有一个村庄叫季米诺。那儿的人不交粮食,也不卖,而且拒绝做出任何决议。我们就去了。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贫农没有组织起来,没有支部,也没有阅览室。贫农被富农蒙骗了,拿着空口袋来开村民大会,对特派员说,我们没有粮食,是苏维埃政权把我们的口袋都掏空了,我们这儿没有富农,也没有中农和贫农,你们见鬼去吧。这是贫农说的!等贫农受到责备时,他们说,是的,你们说得对,我们是错了,没有组织起来等等。

应当说,我们发出了正确的、很好的指令——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sup>121</sup>、关于组织贫雇农的决议<sup>122</sup>,遗憾的是我们的决议贯彻得很差。应当加强贫农的组织工作,把他们团结起来,应当完善和扩大贫农的组织形式。在粮食采购的基础上,现在正大力开展组织贫农和团结中农的政治工作。我们在粮食采购的基础上正在组织自己的农村政治大军。粮食采购成了一个中心问题,围绕着它在农村中正在发生更加明确的分化和阶级斗争。

有一个区里的160名贫农和中农写了一份声明。我来读一下。这份声明让我们看到农村的真实气氛:

“声明。我们是布罗欣区执委会科诺涅尔村贫农小组的公民,共计160人。我们交出了自己的全部余粮来巩固我们的工业,尽快建设农机厂,我们的粮食是通过合作社卖出的,我们为完成我们村的粮食采购计划尽了力。我们交出了余粮,而富裕户却故意把粮食藏起来,放在仓库里,按投机价格出卖,破坏而且提高国家规定的价格。这些人公开反对粮食的定价,对他们来说,科诺涅尔村村民大会的任何决议都没有约束力和威信,他们继续拿着粮食,生活在苏联土地上,却不给国家一磅粮食。例如,雅科夫·季莫菲耶维奇·季谢列夫种了17俄亩小

麦,打了400普特粮食,还有5个没脱粒的大粮垛,可是给消费合作社的只有7公担。这样的大粮户还有:尼古拉·马卡罗维奇·哈里托诺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洛乌索夫、库兹马·费多罗维奇·涅克拉索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谢尔盖延科、达尼伊尔·安得列耶维奇·基谢列夫——这些人是凶狠的粮食持有者,引起了居民的普遍愤慨,所以我们声明,这样的公民在科诺涅尔村,在建设和巩固自己的国家的人们中间,没有他们的位置。我们要求村苏维埃采取坚决措施来执行布罗欣区代表大会的指令。我们要求立即宣布同他们断绝一切往来,把他们的孩子开除出学校,取消他们从商店得到商品的权利,停止村苏维埃同他们的任何对话,不发给他们任何证明文件,取消他们的份地和使用土地的权利,我们还要求立即把他们,首先是别洛乌索夫,撵出科诺涅尔村。我们要求立即召开村苏维埃会议讨论我们的声明,而且让我们亲自出席会议。我们请求把我们的声明转交给区和州执委会,并在《农民报》<sup>123</sup>上发表。署名人:”。

这就是特别让人气愤的事。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通过了决议,可是富农满不在乎:去你们的吧,不给我商品,——我也用不着。

伏罗希洛夫:富农就这样悄悄地“长入社会主义”。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可是偏偏有人希望富农的粮食会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粮仓,以为不经过斗争就可以拿到粮食。

请大家再看一个例子。

“在巴拉杜里赫村有一个富农,是被剥夺了选举权、断绝了一切往来的人。他有1500普特余粮,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声称:‘我不交,没这个必要。我也不要纺织品,我有钱,等我需要时,我就交,交给国家。’那你什么时候交呢?‘可能过三个月吧,没准明年再说了。你们和我断绝一切来往好了,煤油邻居会给我捎来的。强制没收你们没这个权力。农民有权处置自己的粮食,新经济政策这样规定的。’”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提纲写到贸易正常化和新经济政策,可是富农却是这样理解新经济政策和贸易正常化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规定的,——我有1500普特余粮,可是我不交粮食,我藏起来,我就是把它烧了也不给你们。”在贫农没有认真组织起来的地方,富农就有力量,我们就会和农村统一的力量发生冲突。

那些抹煞贫农组织本身,说富农并不那么强大,何必进攻等等的同志不明白这一点。而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意见却说我们对富农势力估计过高。布哈林同志不明白,要不是党这些年来同富农进行斗争,我们面临的就是以富农为首的农村

一致反对无产阶级的城市。因为当中农感到苏维埃政权在同富农的斗争中软弱无力,而富农更强大一些的时候,中农就跟着力量走,而贫农这时垂头丧气,不相信苏维埃政权在困难的时候会支持他们。

有些扭曲是遭到我们反对的,可是困难在于我们要组织自己的力量,组织自己的农村大军,通过这支力量来迫使富农服从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而不同我们作对。遗憾的是,那些散发富农和个别中农的声明,起劲地收集扭曲政策的事情的同志,从来不提贫农、雇农问题,不提富农的恐怖行径等等。在人民委员会的政治通报中讲到了歪曲政策,讲到了不满情绪,可是为什么不举一些富农枪杀我们的公社社员、枪杀积极分子的例子呢,为什么不举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例子呢?请看这些数字:1927年10月发生了67起恐怖事件,1928年1月有168起,1928年12月是337起。你们也许会说,这是错误政策的结果。布哈林同志在《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中说,在某个阶段上阶级斗争尖锐化可能是错误策略的结果,影射由于我们的错误策略才有了阶级斗争尖锐化。这样提问题是错误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非列宁主义的。出现阶级斗争尖锐化是因为我们更好地组织了贫农,因为我们更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的进攻。我在乌拉尔的报告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说革命党使反革命党团结起来。这话说了几十次了。我们越是把贫农和雇农团结起来,富农就越是凶狠。我们越是推广集体农庄,富农就越是凶狠,他们就越是组织地进攻,枪杀、纵火。例如,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周围富农纵火烧了一家农户。一个贫农拿着一份声明来找我,说他家被烧掉是因为他帮助完成了粮食采购工作。我当然请当地政府帮助他。可是这个阶级斗争的典型事例你们却看不见,也不想看见。如果你们在议论粮食的时候,以为可以找出在阶级措施之外的什么抽象措施,可以在阶级斗争之外迫使富农服从苏维埃政权,那你们就错了。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

国家调节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总和。这些同志指责我们采取行政手段,他们是想掩盖自己有意无意地袒护富农。

粮食采购问题的争论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看到,右倾分子的观点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所以我认为应当在这次全会上说清楚。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的讲话不是零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片断的,而是一个完整的观点体系。

实际上他们提出的建议是取消国家对贸易的调节,而只采取经济措施。只采取经济措施是什么意思呢?是放弃对价格的调节,是采用布哈林和弗鲁姆金的建议:搞自由贸易。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富农希望一普特粮食卖五六个卢布,

他们不满意现在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我们在政策上努力降低工业品的价格,可是富农却希望大大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他们通过右倾分子的嘴指责党实行“贡赋”政策。他们要的是另一种贡赋,另一种剪刀差,他们想规定反剪刀差,从而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取得另一种阶级政策,即富农的阶级政策。于是你们这些同志就嚷嚷贡赋,用中农的名义做掩护,实际上你们是主张无产阶级向富农进贡。这就是对国家工业化最尖锐、最强有力的进攻。种种辩解之词,什么我们赞成国家工业化,只不过是装门面。

如果说三年以前布哈林同志提出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党还可以不管,因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还不那么激烈,不那么突出,那么现在,当我们在农村被拖进一场阶级大战,而且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把我们拉向后退的企图,这种路线就是瓦解无产阶级大军的路线,瓦解党的路线,破坏党的路线。

我原来打算详细地讲一讲反对派观点的整个体系,可是我没有时间了。因此我只能简单地谈谈。这些观点的体系可以大体上归结为放慢工业化速度,不理解高速度的重要性,改变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增加轻工业的比重。由此产生了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说法,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它实际上反对工业化。然后是不理解结合的新阶段的意义和工业在改造农业和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中的主导作用。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喊道:出现的算个什么新阶段呀?请原谅,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你这是对历史进程典型的官僚主义的不理解。这是怎么啦,1921年在我们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有人说:你们操的什么心,着的什么急,想出个什么结合的新形式、结合的生产形式——这都是没用的事儿,我们什么都有,你们何必打扰我们,出什么新点子呢?这是典型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任务不理解。

托姆斯基:修正主义者向来都是这么说的。

卡冈诺维奇:哎,托姆斯基同志,修正主义的问题你最好不要谈。在我们党内找不出比你更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了,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托姆斯基:伯恩斯坦也说过马克思过时了。

卡冈诺维奇:你现在就是跟在伯恩斯坦后面呢。右倾分子的观点体系还表现在哪儿呢?在保护中农的虚伪旗帜下,制造“退化论”,放开刺激富农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削弱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不相信而且忽视党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进行的工作,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意义估计不足,提出改变党的农民政策的口号;抹煞,忽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削弱向富农进攻的方针,鼓吹向农民不断让步的政策、和平共处和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抹煞将贫农

独立地组织起来的意义——这些都是企图让党改变政策的同一个右倾观点体系的各个环节。如果再加上在共产国际方面支持德国共产党内明显的社会民主分子(我们要问,为什么布哈林同志不参加关于德国共产党问题决议的投票,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回避这项决议?),我们就看到了让布哈林去同加米涅夫进行派别谈话的那个观点体系了。

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发言反对雅罗斯拉夫斯基。他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你何必装聋作哑,把自己说成好人,把我们说成坏人。那就请看托姆斯基同志是怎样对待加米涅夫的那份文件的。他躲躲闪闪,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他说,嗯,的确不好,本来用不着去同加米涅夫谈的。同志们,大家仔细听听他的用词:“本来用不着”。现在是你们被揭露了,所以才说本来用不着同加米涅夫谈话。可是你们非常清楚,同加米涅夫谈话是政治性的,是你们在7月份不信任党的政策,反对中央,搞了你们自己的观点体系,才去找加米涅夫做一次政治谈话。托姆斯基在这里生气地说:谈话变成了政治文件,这是从何说起呢?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托姆斯基同志,你怎么变得这样健忘了?你想必记得,在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斗争初期,列昂诺夫把自己同扎鲁茨基关于热月政变的谈话整理成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使我们看到反对派要把我们引向哪里去<sup>124</sup>?不过,在党的历史上确实从来没有过一些政治局委员投票赞成中央的决议,同时又转身去同别人谈话反对中央。

由于他们在原则上背离了党的列宁主义路线,他们接着就向党的领导展开了攻击。我们在托洛茨基分子身上看到的事情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这绝不是偶然的:攻击党,攻击领导,攻击斯大林同志——这是反对领导,反对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每一个反对派、每一个机会主义的反对派都必然要做的。布哈林同志说:“的确,仅仅因为在工会党团会议上投票反对中央的建议就被撤了职,这是什么意思呢?”可是我要声明,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有许多工会中央全会的决议(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它们坚决谴责宗派活动,谴责投了票的人,而且谴责托姆斯基,要求撤换自己的领导人(商业职员工会、印刷工人工会以及其他工会)。如果说乌加洛夫同志被撤了职,那不是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投了票,而是因为他在列宁格勒讲了许多蠢话,列宁格勒工会组织不能再容忍他担任主席的职务<sup>125</sup>。

乌加洛夫:我所有“蠢话”的速记记录我都带来了,我的“蠢话”比你的要好多了。

卡冈诺维奇:乌加洛夫同志,你说我们党内的习惯和罗马帝国差不多?这话

你说过吗?

**乌加洛夫:**没有,这话是别人说的,可是却记在我账上了。到我发言时我会说的。(笑声)

**喊声:**你为什么在这里也说蠢话呢?

**卡冈诺维奇:**在评价党内制度的时候,布哈林同志完全滑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上去了,指责党培植官僚主义,缺乏民主等等。请听他的话:

“党员也形成了双重‘路线’:一边是‘为良心’,一边是‘为自己’。参加会议、一致投票、通过官方公式成了党内仪式所必需的程式。正是应当从这里开始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却在培植官僚主义。”

同志们,我想布哈林同志是把他自己的感觉当成全党的感觉了。的确是这样,请看:他说,一边是为自己,另一边是为良心。布哈林同志的一边是为了政治局,他在这里说,我们一致通过决议,遵守一致表决的仪式(7月份一致通过了决议,11月一致通过了决议),他为共产国际写道,所有的决议都是一致的,大家一致的。这是“为自己”,另一边是为加米涅夫,为了到加米涅夫那儿去——这就是“为良心”了。布哈林同志是在把自己的这种复式记账法加在党身上。多此一举!党没有复式记账法。如果党对中央委员会实行复式记账法,那中央委员会靠这条路线是维持不下去的。如果说中央顺利地领导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了国际政治,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百万党员的党只有一种记账法——列宁主义的路线。

布哈林同志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你们拿出我给皮达可夫的札记,说我犯了个错误,那这就不是党,而是警察局、监狱、囚室,是什么都行。”看看一个人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能说出什么话来:“监狱、警察局、囚室”!他写了一个纲领,却不给自己政治局的同事看,而拿去找皮达可夫。托姆斯基同志滔滔不绝地谈集体领导,责备斯大林同志和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

[奥尔忠尼启则:给托姆斯基看过。]<sup>126</sup>

于是布哈林同志本着“忠诚的集体领导”和“对政治局及同志们忠诚”的态度写了一份文件,拿去给皮达可夫看。当然,他和托姆斯基可能有集体领导,可是和政治局没有集体领导。别人对他说:你不应当去,他回答说:“监狱、囚室”等等。他说:“用不了多久,我们这里就要严格禁止想问题,谈问题了。”这纯粹是胡言乱语!

**喊声:**他把我们党看成什么了!<sup>127</sup>

**卡冈诺维奇:**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我们有百万党员的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发扬了前所未见的创造精神,社会主义竞赛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千百万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被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自我批评正在广泛开展的时候。这时却有人叫嚷什么监狱、囚室等等。同志们,我想在经历了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之后,未必还须要举出证据来为党内民主辩护。

生活每天都提供成百上千的事例来驳斥托洛茨基分子对党、对党的领导、对党的机关的诽谤。党的机关的更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快,来自基层的成百上千的新干部不断注入党的机关。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很清楚,我们党现在开展了最广泛的党内民主。这他们也知道,可是为了改变党的路线,他们必须攻击党,攻击斯大林,攻击中央。

当年托姆斯基同志就党内民主问题说了什么呢?我来引一段他的讲话,很值得我们在这里听一听。在党的十四大上,他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

“……有人到这里来,对我们谈论民主啦、压制啦等等。同志们,我们知道,在旧时代每一个中等的资产者都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学一点拉丁文,说是‘拉丁文能使人漂亮一些’。稍稍一点民主也总是能让反对派的显贵漂亮一些。(鼓掌)这就是一切反对派的逻辑。同志们,请看,这是多么无聊地在重复着……”

你听见了吗,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稍稍一点民主也总是能让反对派的显贵漂亮一些”,——托姆斯基对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也完全有权对你这样说。

**托姆斯基:**它可是不能让你漂亮一点。

**卡冈诺维奇:**托姆斯基同志,我宁愿它让你,而不是让我变得漂亮一点。托姆斯基说:“这就是一切反对派的逻辑。同志们,请看,这是多么无聊地在重复着!”对了,托姆斯基同志,这是多么无聊地在重复着!你在这次全会上鸡蛋里挑骨头,说是罗戈日-西蒙诺夫区党代表会议给斯大林同志发了致敬电,其中说在他的领导下什么的,可是你,托姆斯基同志,想必记得给你发过什么样的致敬电吧!比如说,在你担任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十周年的时候给你写了些什么话:“在你的领导下,苏联的工会运动将团结和教育千百万劳动者。”

**托姆斯基:**工会运动和党是有区别的。

**卡冈诺维奇:**直到今天我们都一贯认为,工会运动是在全党领导下教育千百万人的。原来这一切都是在托姆斯基一个人领导下,甚至不是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的。这就是说,你是司令官。

**臧声:**是工会首长。(笑声)

卡冈诺维奇:美尔尼昌斯基在谈到托姆斯基时是怎么说的呢?“在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托姆斯基同志是以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出席的。当时就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进行了争论,我们在托姆斯基的影响下,得到列宁的支持,在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等等。”同志们,请看,多大的人物呀。(笑声)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过于谦虚了:说我不是领袖等等,原来托姆斯基在工会的角色比列宁还要高咧。

托姆斯基:这只不过表明,朋友们有时是会帮倒忙的。

卡冈诺维奇:托姆斯基同志说梅利尼昌斯基同志帮了倒忙。好在托姆斯基同志起码承认了这件事。其实托姆斯基同志在自己“非常原则性的”讲话里何必要去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何必要拿什么罗戈日-西蒙诺夫区党代表会议的电报去刺斯大林同志呢。不行的,托姆斯基同志!你用这些玩意儿是刺不着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要深刻得多,是原则性问题。关于斯大林同志你当初是怎样回答反对派的呢:“请你们说说,是哪些社会—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条件造成了这种局面:在中央书记斯大林周围形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而在迄今为止不曾拿出自己的分歧意见来、又表现平平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身边却空无一人。”托姆斯基同志,现在你也知道什么叫空无一人了吧!

“这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在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在平等对待政治局全体委员的基础上发生的。”

托姆斯基同志,这些话你要否认吗?

托姆斯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的。

卡冈诺维奇:对了,一旦落了笔,是拿斧头也砍不掉的。这些话是你说的,当时是真理,现在也还是真理,你知道斯大林善于集体工作。斯大林同志不需要别人来保护。你在十四大的发言是全党的声音,现在你不再想听了,因为对你而言,重要的是攻击党,攻击党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你需要民主和言论自由是为了把党拖下富农的泥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党把它揭露了。党员都很清楚。托姆斯基同志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党是按命令说话的,上面下了命令,于是决议就出来了。可是1929年你是怎样描绘党的呢?难道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有比这更官僚主义的态度吗?党凭阶级嗅觉感到,现在是困难时期,特别须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而不是在你们周围。你们是空洞无物的。你们一个像样的建议也提不出来。右倾分子公开了自己和党的路线相矛盾的观点体系。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托姆斯基同志今天在全会的发言中对右倾只字不提,而只是说,我们不和困难作斗争,却搞反右倾。按托姆斯基同志的看法,我们没有右倾,

我们不是和困难斗争,却凭空想出个右倾来,而且和它去斗争。这就叫做“按列宁的方式提出问题”。列宁教导我们——每个共青团员都知道——正是为了和困难作斗争,才须要首先克服党内基于这些困难而产生的各种倾向。必须让党武装起来,使它能够战斗,必须粉碎那些瓦解党和工人阶级的精力和热情的人。可是托姆斯基同志却在这里说一些典型的庸俗货色:应当和困难作斗争,而你们却在反右倾。我们要直率地说,党中央的功绩就在于它及时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右倾的问题,发动了全党,为顺利地克服困难从思想上和实践上武装了党。

现在像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这样一些有很高威信的领导同志实际上倒向了右倾。这件事并不能阻止我们坚决反对右倾。是的,我们应当爱惜积累起来的资本,应当尊重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威信,可是党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成熟了,懂得在这些权威人物要把党拉向错误道路时,必须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给他们以坚决的反击。

或者是这些同志服从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意志,走上改正错误的道路,或者是党即使没有他们,也能应付它面临的那些困难任务。(鼓掌)

主席:乌格拉诺夫同志发言。

喊声:休息!

主席:付表决,谁赞成休息,请举手。少数。乌格拉诺夫同志发言——15分钟。

乌格拉诺夫:我得要多一些时间。

主席:乌格拉诺夫同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请求延长他的发言时间,可是今天到休会只剩下15分钟了,所以主席团建议把发言移到明天。付表决。赞成满足乌格拉诺夫同志请求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少数。

赞成今天听取乌格拉诺夫发言的请举手。赞成移到明天的请举手。多数。好的,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发言移到明天。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 第四次会议

4月18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乌格拉诺夫同志发言。乌格拉诺夫同志请求把他的发言时间增加到一个半小时。

喊声:一个小时。

主席:谁赞成一个半小时?谁赞成一个小时?多数。

乌格拉诺夫:同志们,中央全会面临……

喊声:听不见。

斯·柯秀尔:听不见乌格拉诺夫说话,真是怪事!

喊声:现在是既看不见他,又听不到他。

乌格拉诺夫: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涉及我国工人运动的三名杰出领袖、列宁在世时在列宁的领导下在政治局工作过的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今后是否参与领导党、国家和国际革命。我想,这种局势迫使我们考虑,这个绝非不重要的问题远远超出我们所经历的时代的范围,从这个角度看,不应当像在我之前发言的相当不差的同志们那样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

喊声:是相当不错的同志们吗?

乌格拉诺夫:我说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

喊声:数量是要转变为质量的。

乌格拉诺夫:我们走着瞧!在评述社会—政治问题之前,由于分歧产生的历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不得不首先涉及这个问题,并且回答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按照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事情好像是这样的:党的十五大以后,当出现经济困难时,三名领导人、三名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开始动摇了。同时莫斯科人[他们对政策问题从来不曾提出过什么意见]也走歪了,

他们后来滑到了宗派活动,破坏了党纪,最终滑到了右倾。按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说法,一切都很简单。实际上,问题不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在这里发言反对我们的同志说得那样简单。

臧声:听不清楚。

主席:他错在说话声音太大,压倒了话筒。

乌格拉诺夫:我声音轻一点。十五大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粮食采购的严重危机和采取非常措施。因此我们在去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七年以来第一次,不得不在同农民的经济关系上采取非常措施,——不仅对富农,而且对中农,有些地方甚至对贫农采取施加经济压力和行政压力的措施。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应不应当对此想一想呢?这完全不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的那么简单。我认为,对于出现的困难我们有责任好好想一想。党中央政治局是怎样讨论这个问题的呢?1928年2月,当讨论粮食采购工作的初步总结时,也谈到了是否须要继续执行非常措施的问题,当时是否有过分歧呢?当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对粮食采购形势的估计有没有差别呢?是的,有差别。如果说斯大林同志在总的评价上着力强调是富农大大破坏了我们的粮食采购工作,那么李可夫、布哈林和莫斯科人说:是的,富农坏了事,可是不能不看到问题不仅仅出在富农,还有许多重大经济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我们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措施,在领导经济方面我们还有许多错误。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争的事实。

造成去年粮食采购危机的种种错误包括没有正确地课税、没有及时向农村提供必须的商品、没有及时收回发放的贷款、1927年秋天(8、9月间)错误地降低了1926—1927年度采购运动中执行的粮食采购价<sup>128</sup>。所有这些情况都被富农利用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奥尔忠尼启则:你后来也提出了降价,而且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还支持你!]

乌格拉诺夫:政治局这个错误是大家的,我不想推诿给任何人,我只是指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情。我当时在评价形势方面的立场是相当激烈的。柯秀尔同志大可不必断言,仿佛我当时说过,我们发展工业的速度超过了可能。柯秀尔同志,你搞错了。

现在我来谈谈鲍曼同志的行为路线。鲍曼同志当时同意我关于粮食采购危机问题的观点,而且和我完全一致。我要声明,因为坚决捍卫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那时飞出了莫斯科州委<sup>129</sup>。

Cr. 柯秀尔:我们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荒唐话!

**乌格拉诺夫:**没听说过吗?那就算是我告诉你的吧。让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来回答你。

[奥尔忠尼启则:大家都会回答的。]

**乌格拉诺夫:**中央四月全会的决议中对粮食采购危机的评价基本上采用了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莫斯科人2月12日在讨论粮食采购总结时所做的评价。决议说,我们没有维持国民经济各种成分的平衡,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927—1928年度发生粮食采购危机的原因。就经济政策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莫斯科的干部,乌格拉诺夫、乌汉诺夫、米哈伊洛夫、科托夫等同志,在1928年3月间和斯大林同志长谈过几次,每次几小时。我们指出,这些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我们讨论了工业、农业、富农、私人资本等等问题。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一定会谈到这些,不过我也想谈谈这个问题。在我们谈到富农和富农的作用时,斯大林同志说,乌格拉诺夫同志,你以为富农有了粮食就会卖给我们吗?斯大林同志接着说:你别以为在发生战争时,富农会卖给你粮食。我们回答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发生战争,只要国内有粮食,哪怕是从魔鬼那儿我们也要把它拿到手。发生战争时,我们把全体农民发动起来反对富农,就能拿到粮食。可是如果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斯大林同志说,那事情可就糟多了。

在1928年3月我就是这样看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柯秀尔:**没问题,是这样的!

**乌格拉诺夫:**下面谈谈工业发展问题。一直有人打算给我,说得客气点,扣上一个指责,说我反对发展重工业,主张发展轻工业。这样说是不对的。在十五大以前,中央政治局讨论五年计划提纲时,我提出建议,要求把提纲初稿中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写得准确些。我认为那个比例是不对的,因为它对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作用估计不足。斯大林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我,我的建议被采纳了<sup>130</sup>。

有人放出风声反对我,说我反对第聂伯建设工程。不错,两年半以前,在讨论第聂伯建设工程问题时,加里宁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好像还有伏罗希洛夫同志,还有我在中央政治局投过反对票<sup>131</sup>。可是这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反对电气化。这样看我们,这样指责我简直可笑。沃尔霍夫水电站就是在我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时候,在列宁格勒开始建设的。下诺夫哥罗德发电站是在我的参与下建设起来的,我还积极参与了中央工业区电气化的巨大工作。毫无根据地、没有道理地放出这种风声是愚蠢之极。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第聂伯建设工程问题

时,我提过什么建议呢?我说:这是一项重要任务,可是我们还有更紧迫、更刻不容缓的任务。我说:应该立即开始最大的冶金工厂的奠基和建设,这些工厂两三年后就能够为我们提供8000万至1亿普特生铁、钢和熟铁,这对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和备战都更重要。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难道这种方针是反对发展重工业吗?不是。这是空穴来风。想把这些罪名扣到我头上是办不到的,也不能让我丢脸,我还是一个活人,还没有死。给我扣上什么惊慌失措,主张搞手工艺等帽子是太轻率了,太没有说服力了。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这只能瓦解党。

有人一直在指责我偏向纺织工业。

奥尔忠尼启则:那我们反对过吗?

乌格拉诺夫:我当然关心过纺织工业,不关心也是不可能的。纺织工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着最大的作用。我们莫斯科人一直在说,轻工业,首先是纺织工业,应当是一个储油罐,从它的利润里吸收发展重工业的资金。这始终是我们莫斯科各级组织一切工作的方针。可是我同时在政治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请给大修留下最必需的资金,我坚持对纺织工业进行彻底改造,要求进行最必要的修缮,保持固定资产完好无损,以便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能够继续提供利润。可是有人偏要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我们是手工业者,所以只想到小工业,而不懂得重工业。别忘了,纺织工业有六十多万工人呢。

可以提出指控,但是总得有点分寸吧,也要讲点良心吧,那样分歧就会少一些了。

我们多次提出了亚麻工业的问题。一再提请注意这个问题。亚麻工业在三年里经历了严重的危机。有八九万工人的亚麻工厂每年都要停工两三个月。为此我们承受着巨大的亏损。我们一再提出,这样是不行的,价格太低农民就不会再种亚麻了。如果是这样,那就不会有供出口和工业用的亚麻了。这种局面得到了证实。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我同斯大林同志谈过,应当把亚麻每普特的价格增加一个半卢布。斯大林同志认为,增加超过40—50戈比是我们办不到的。政府决定增加1卢布20戈比。可是过了两年才执行,而那时亚麻经济的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指出必须提高某个经济部门,哪怕是对国民经济具有不小意义的轻工业,是不是惊慌失措呢?这算什么呢?是偏离总路线吗?

伏罗希洛夫:李可夫是怎样看的呢?你为什么不同他谈谈呢?

乌格拉诺夫:我同与此有关的米高扬同志谈过,而且谈得不少。在政治局也谈过。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全会上和我私下谈话时说:这一切错误全在你。

我认为我只是错在去年中央4月全会上没有讲本来应当讲的话。当时本来应当讲我今天讲的话。应当把去年4月份时在我心头积累的东西统统讲出来。那样的话,今年4月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就要容易得多。应当习惯于怎么想就怎么说。可惜的是我们有时候言不由衷。我们的自我批评讲什么的都有,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就是不讲重大的政治问题 and 经济问题,不讲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极少讨论国内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应当经常地、系统地对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做出评价,那样事情就会好办一些,冲突也会少些,工作也会容易些,我们的道路也会更正确些,那时要找出什么倾向,或是扣倾向的帽子也就不那么容易了。工作方法是重要的。不应当害怕,而要及时讨论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和阶级关系问题。我们政治局害怕讨论这些问题。这种害怕现在还有。大家都想绕着走。列宁教导我们,想欺骗阶级是不可能的。如果回避讨论重大问题,就只会使自己糊涂,也迷惑了党。

杨松:说得对,把话说透吧!

乌格拉诺夫:下面还要谈的。顺便谈谈私人资本问题。去年春天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在商业和手工业中,我们应当根据我们的经济能力,根据替代私人资本的可能性来排挤私人资本;不能用制革手工业去年采用的那种办法来排挤私人资本,结果是我们今年没有了皮革。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买不到钉鞋掌的皮子,而且价格极贵。排挤私人资本要根据我们经济实力的增长程度。我至今仍然持这样的观点。不久前,就是11月份,米高扬同志关于私人资本的提案在政治局放了三四个星期,后来把它交给苏维埃系统去执行,责成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研究并提出各种重大问题交政治局审议<sup>132</sup>。米高扬同志就私人资本问题提了些什么建议呢?米高扬同志提的大致如下:“鉴于在排挤私人资本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今后应当执行下述政策:在商业和工业中应当根据我们国营机构和合作社取代私人资本的能力来取代私人资本。”接着他建议尽量把私人资本引导到小工业和租让工业中去等等。

这就是我半年以前提出的那些建议嘛,可是却指责我不愿意向私人资本主义分子进攻。我再举一个例子。不久前人民委员会根据政治局的指令通过了一项决议,向租让资本提供优惠待遇。如果租让资本家将产品销往国外,而将所得外汇存入苏联银行,则向租让资本在税收方面——工业税和外汇提成,提供优惠和折扣。

列昂诺夫:有这么好的优惠呀!这些优惠早就该采取了!

乌格拉诺夫:你怎么看呢?这当然是优惠。



扎东斯基:对呀!

乌格拉诺夫:可是去年一年,我们试图合理地提出许多经济问题,却一直被谴责为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机会主义、不愿意对私人资本主义分子施加压力。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不让人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等等。封住你的嘴。

列昂诺夫:谁?

乌格拉诺夫:我马上就要说的。昨天托姆斯基同志提到莫洛托夫同志对李可夫同志的攻击。我们莫斯科人听到以后,就对斯大林同志说,这要引起注意,这种现象不会有好结果。这次攻击是怎么回事呢?人民委员会制定了一个1927—1928年度的基本建设计划和工业财务计划。这个工业财务计划是准备得很细致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在政治局做了报告,这是1928年3月份的事。接着发言的是莫洛托夫同志。他把这个工业财务计划说成是国家计委专家们的创作,声称它没有反映党的路线,建议否决它<sup>133</sup>。

斯克雷普尼克:搞一点自我批评都不行吗?

莫洛托夫:说得对。

奥尔忠尼启则:难道国家计委的专家们就批评不得?

乌格拉诺夫:可是跟国家计委的专家们没有关系嘛。你自己去年就攻击过莫洛托夫同志,发言反对过他,因为当时你明白莫洛托夫对李可夫同志的攻击是粗暴而没有道理的,后果是有害的,可是你现在不承认这点了。

奥尔忠尼启则:是的,我发过言,可是涉及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地方工业和共和国工业<sup>134</sup>。

乌格拉诺夫:斯大林同志也支持莫洛托夫同志。为什么莫洛托夫同志要把工业财务计划说成是反党的呢?他认为给重工业的资金太少。事情最后怎样了呢?决定为冶金工业寻找1000万—1500万资金,而且责成委员会去寻找。基本建设计划里有13亿卢布资金,可是偏要说它不符合党的指令,是国家计委专家们的创造,最后却把事情归结为再去寻找1500万卢布——这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伏罗希洛夫:是2700万,而不是1500万。

乌格拉诺夫:对苏维埃机构的干部,对人民委员会的重大工作采取这种态度决不能加强人们之间的关系。你不能把这种事叫做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应当一视同仁,可是也要善于批评。

1928年4月在和斯大林同志谈话时,我们指出经济局势在我们看来很严峻,特别是粮食问题很尖锐。有一次斯大林同志狠狠地骂我们是尾巴主义、改良

派等等。他对我们说,我们想要执行尾巴主义、改良主义的政策。我要说,斯大林同志的这种“论据”丝毫也不能让我相信我们错了。我特别坚持要求把总的经济形势问题提交政治局和中央四月全会讨论。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我们建议在中央委员会下定期召开主要经济干部及其他干部会议,听取他们对总的政策和某些主要工作方面的意见。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我们这样做会破坏中央委员会在经济干部眼中的威望,他们会觉得中央没有路线等等。

柯秀尔:不是这么回事。

伏罗希洛夫:你最好说说,你在莫斯科经济干部会上都做了些什么。

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州委下面我经常召开经济干部会。3月底我召开过一次这样的会议,会上他们就经济政策的一般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斯大林同志因为召开这次会议狠狠地批评了我。

伏罗希洛夫:狠狠地教训你了吧。

乌格拉诺夫:不管怎么说,连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加里宁同志都承认安排这样的会有好处,所以在政治局的闭门会议上决定召开这样的会。责成古比雪夫同志准备一个报告<sup>135</sup>。可是上帝保佑,过了一年也没有召开这个会。

柯秀尔:议论过,这个会可以召开,可是会上要保卫党的路线。

乌格拉诺夫:昨天鲍曼同志指责我反对集体化。我声明这是诽谤,决不接受。早在党的十五大以前两年,在莫斯科省的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就研究过农村工作和农业集体化问题。

鲍曼:1928年4月份以前你是赞成集体化的。

乌格拉诺夫:你别着急,别胡说。如果有人读一读1928年莫斯科省委四月全会上我的总结发言,其中谈到我国农村发展的道路问题,那他就能够准确地看到,指责我反对集体化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恶意诽谤。有人企图把我对农业发展道路的立场说成是反对集体化,而突出必须注重发展个体经济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不过我在1928年5月底6月初强调过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注意。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从工人的情绪中,从农村传来的信息中捕捉到这个思想,这些信息讲到过火行为开始表现为忽视个体农民经济。这难道是忘记了集体化吗?难道中央七月全会不曾肯定个体农民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将长期发挥巨大作用吗?难道中央十一月全会不曾再次强调涉及个体农民经济、中农的经济利益等等的这个重要问题吗?现在你们企图丑化这个及时提出的、完全正确的问题,蛊惑人心地纷纷指责我们反对集体化。不行,这样做是不行的。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忘记了自己的血脉,忘记了自己

是布尔什维克出身的铁杆。

喊声：大家都知道你是铁杆。

乌格拉诺夫：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义无反顾地朝前冲。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和我们打交道的是几千万小生产者，要善于周旋。列宁同志对这个问题说过什么呢？“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sup>136</sup>

我想，列宁在党的十一大的闭幕词中做出的这个指示，即使是现在，即使到了今天，过了七年之后，也没有失去意义。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按照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五年之后农业总产值的80%也要由个体农民经济提供。

而五年之后，商品谷物的60%也要由个体农民经济提供。

因此，几百万个体农户的合作化和集体化问题，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角度看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这也是一件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只有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在提供农业机器、肥料的基础上，通过推广大量的科学技术和农业技术，才能顺利地完成农民的集体化和合作化。直到今天上述种种在农业中还是很少的。只要它们还没有大量存在，认为我们只要经过两年就能够跨越它们，而立即在农村中充分地展开社会主义战线，那就是十足的幻想和夸大。

伏罗希洛夫：你正是这么看的！

乌格拉诺夫：伏罗希洛夫同志指出，仿佛我就是这么看的！我要提醒伏罗希洛夫同志，在1928年9月，政治局（主持会议的是鲁祖塔克）讨论农业税方面的过火行为时<sup>137</sup>，伏罗希洛夫同志讲了下面这番话：“粮食采购的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对富裕农民、对富农太过火了，应当和他们共处，搞好关系，一起工作”。

伏罗希洛夫：不对。

卡冈诺维奇：不对，他讲的是中农。

乌格拉诺夫：我记性好极了，我记得非常清楚。

喊声：反正没有人相信。

乌格拉诺夫：所以你们就不必提醒我什么看法了。下面谈谈国营农场。我们大家都主张更快、更好地建立国营农场。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不用加紧，对吗？

乌格拉诺夫：可是我们听斯大林同志多次说过，国营农场在近期内不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粮食。

奥尔忠尼启则：能提供的。

乌格拉诺夫：国营农场在最近五年内不能解决粮食问题。我们在这里将要讨论的五年计划也说明这个问题。既然如此，该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你就建，不过别忘了个体经济。

奥尔忠尼启则：要它们提供粮食，就得着手建设，如果老是拖延，那它们就永远不会提供粮食。

乌格拉诺夫：这话对！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不过我顺便提醒一句，我在莫斯科省工作期间，整顿了国营农场，进行了改组，国营农场的状态比其他地区都要好些。

安采洛维奇：不对，莫斯科的国营农场离好还差得远着呢。

乌格拉诺夫：请原谅，安采洛维奇同志，你这是从雇农的眼光在看问题。（笑声）

安采洛维奇：对了，是从无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sup>138</sup>。

奥尔忠尼启则：这没有什么坏处吧？

阿库洛夫：而你是用退休将军的眼光看问题。

乌格拉诺夫：我不是以退休将军的眼光看问题，而是说，发展国家的经济生活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容易。如果有人指责我忘记了雇农的利益，那我就要说，最近我刚刚和安采洛维奇同志一道制定了改善农村雇农劳动的法律<sup>139</sup>。

臧声：你做得很对。这是你职责所在。

乌格拉诺夫：我记得自己的职责。我老实地待在你们给我安排的地方工作。如果你们不赶我走，我就能够工作，而且干得很好。

臧声：既然你要工作，我们为什么要赶你走呢。

臧声：你是想说，施米特把事情搞糟了。

臧声：同施米特可别吵架。

乌格拉诺夫：我同施米特是老朋友了，有16年的交情，我们不会吵架的。

臧声：难道永远不会吗？<sup>140</sup>

乌格拉诺夫：在政策上可能有时会争论，但在私人关系方面。

伏罗希洛夫：要是你诽谤同志，那当然就会吵起来。

乌格拉诺夫：所以说，我们这些莫斯科党组织当时的领导人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先是同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争论的结果，就是至少在莫斯科党组织的上层中开始传说乌格拉诺夫同志要被免职了。斯大林同志给我写了张条子：“你听说了吗，莫斯科传说你要被免职了？”我回答

说,我什么也没听说,也不想听,因为莫斯科胡说八道的人太多了。

喊声:那也是在你的领导下。

乌格拉诺夫:到7月份时情况是这样的:经济方面问题比较尖锐,而政治方面有些紧张。因为1928年6月在卡巴尔达发生了一场小暴动<sup>141</sup>,城市里粮食供应情况紧张,有些地方失业人员闹事——这一切都让我们考虑这些问题。莫斯科省委几次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对局势必须有明确的意见。我们根据莫斯科省委形成的意见,打算把这些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来。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是否对中央的个别决议持批评态度呢?是的,有过这种批评。

是否批评过某些中央委员呢?是的,批评过。这是不是什么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围绕着弗鲁姆金同志的信出现分歧的情况完全不像柯秀尔同志昨天说的那样。柯秀尔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而且指责说,“弗鲁姆金同志的信的教父是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等同志”。这是诽谤!

伏罗希洛夫:你怎么知道呢?

乌格拉诺夫:是讨论弗鲁姆金同志的信的过程吗?

伏罗希洛夫:还可以加上你!

乌格拉诺夫:可以加上我,我来说说。

柯秀尔:那你就说吧!

乌格拉诺夫:有一个星期一,我们开政治局的闭门会议。斯大林说,有一封弗鲁姆金同志的信<sup>142</sup>,应当讨论一下。大家回答说,我们都没有看过。

柯秀尔:因为你们刚刚休假回来。

乌格拉诺夫:加里宁说:“我看了,没什么特别的,可以等一等,不用着急。”

斯大林坚持:“还是讨论一下吧。应当决定下来,我们对这封信怎么回答。”政治局委员们都指出应当先看看信,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回答合适。

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回答吗?

乌格拉诺夫:我认为并不一定要回答弗鲁姆金同志的信,所以我建议,如果弗鲁姆金同志的信里有什么重要的内容,那就可以加进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的决议里去。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呢?因为在斯大林坚持要求决定怎样答复的时候,我就想到:托洛茨基的来信和答复的那一段历史是不是要重演呢?

喊声:好事情!

乌格拉诺夫: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被否决了,决定在下次会上考虑这个问题并决定是否回答这封信。不过还没有等到下次会议,柯秀尔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说:

我和斯大林同志起草了给弗鲁姆金同志信的答复,你看看,然后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签署,分送给政治局委员们。我对柯秀尔同志说我不能签署。中央政治局有决定——推迟到下周一,所以应当遵守这项决议。过了一小时,也许是一个半小时,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柯秀尔告诉我说,你认为起草和分发对弗鲁姆金来信的答复是不合适的。我回答说,我遵守政治局上次会议的决定,把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所以我不签署这份答复。

Ст. 柯秀尔:可是弗鲁姆金的信这时在莫斯科党组织里传开了。

乌格拉诺夫:对不起!是你们把这封信和答复一起通过中央各报刊编辑会议<sup>143</sup>分发出去的。我收到弗鲁姆金的信和斯大林同志的答复方案后,就按照莫斯科组织的规矩,像其他许多文件一样送给莫斯科组织的领导同志在小范围内传阅。这个小范围的领导同志一直是在阅读各种重要文件和材料的。

[奥尔忠尼启则:其中也包括弗鲁姆金的信?这真是重要的决定!]

乌格拉诺夫:大家看了弗鲁姆金的信和斯大林同志的答复草案。我要说,我们不得不遏制一下那些最近半年来特别起劲地攻击我的同志们对斯大林同志的回答的非常尖刻的评价。我就不提这些同志的名字了。这没有意思。

斯大林:不过你终于没能护卫住弗鲁姆金。(全场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你倒是说说,弗鲁姆金的信究竟对还是不对?

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省委常委的闭门会议上,我们讨论了这封信,没有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同意弗鲁姆金的信。

奥尔忠尼启则:你现在认为它对还是不对呢?

乌格拉诺夫:当然不对。

柯秀尔:乌格拉诺夫是说问题本身提得对,可是结论错了。

乌格拉诺夫: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讲了中央7月全会决议的起草经过。我只能补充一点:在政治局那次会议上我建议把李可夫同志关于国民经济总形势的报告列进去。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可是刚过了一分钟,斯大林同志却提议把米高扬同志同一个层次的报告——与国民经济总形势相关联的粮食采购报告列进去。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可是我的看法是:我的建议被否决是为了提出米高扬的报告,而不让李可夫同志做报告。

出席中央七月全会的同志们都记得,会上我和其他发言的人都谈到总的经济政策。莫洛托夫同志当面对我说过,斯大林同志也对乌汉诺夫等同志说过,乌格拉诺夫的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为,我当时讲的话现在也不过时,即便是现在也还是有价值的。可是中央七月全会上对莫斯科人有一种警惕的态度。当

然,此前的整个环境造成了一种神经质的情绪。于是为了把情况说清楚,我们在中央七月全会闭幕前夕和斯大林同志开了个会。莫斯科省委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总共13个莫斯科人和斯大林同志做了一次长谈。澄清了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层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七月全会之前产生摩擦和紧张的许多问题。也谈到了中央政治局内部关系的一些问题。在党中央内部相互关系问题上,库利科夫同志直率地向斯大林同志提出:“政治局里现在有没有分歧,我从发言里感到有分歧,会出什么事吗?”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做出决议之前有过分歧,现在没有了,——他接着相当坚定地说了一个想法:现在的政治局不是偶然形成的,如果它发生分歧,那我就第一个跑到图鲁汉斯克去。斯大林同志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政治局情况很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科罗斯捷列夫同志提醒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要小心,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时也有过这样的声明。”我们为政治局内正在形成的局面非常担心。也许我们的担心不怎么合理,也许我们帮了倒忙,不过我们认为,我们领导着最大的党组织,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我们认为必须干预。关于我们莫斯科的工作谈了很多,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有错误,可是你们也有不少失误。这次谈话之后,许多同志都有一种万事大吉的心情。这时又发生了共青团莫斯科州委书记瓦西里耶夫同志对我提出声明的问题。我同他就政治局的一般情况,对中央政治局不同委员地位的评价问题谈过一次话。他就此对我提出声明。我要说,我承认犯了一个错误,根本不该和这个年轻同志谈话。(笑声)

Ср. 柯秀尔:这话对。

乌格拉诺夫:当然,我错了,不该跟他谈。

曼努伊尔斯基:特别是他事后还写什么声明。

乌格拉诺夫:顺便说一句,我们还有这种情况,三个人谈话……

伏罗希洛夫:可是第四个人能把它写出来。(笑声)

乌格拉诺夫:可是事后有人写出来。莫斯科党组织在七月全会以前的情况和我们对所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就是这样。那时出现的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就导致了莫斯科组织内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莫斯科的干部、中央委员们,大多数都是中央组织局委员,而我又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经常积极参加中央的工作,积极对待七月全会之前政治局内一般政治问题的斗争。在主要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我在政治局内支持了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建议。这些情况实际上就是莫斯科组织内种种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我不

来谈这些事态的细节,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而现在的问题要重大得多。我再谈一个我认为意义重大的问题,就是工会的问题,托姆斯基同志的问题。昨天有一位同志谈到托姆斯基同志的老爷态度。卡冈诺维奇同志说了托姆斯基同志不少坏话。让人感到托姆斯基同志似乎已经官僚主义化了,拿出当官做老爷的架子来了等等。如果说的是共青团,那就完全没有说服力:工会同共青团的争论涉及什么问题?工会组织和劳动人民委员部执行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为青工保留工位<sup>144</sup>、关于技工学校<sup>145</sup>等等决议,没有同意共青团中央的要求,而共青团紧逼不舍。紧逼当然是他们的权利,不过逼也要有点分寸,要控制一下。因为工会不是老板,它口袋里没有为青工保留的多余工位,也没有多余的技工学校。工会执行的是党通过的指令,是中央通过的指令。1928年秋天,召开工会八大之前,对托姆斯基同志形成了怎样的态度呢?对他是信任的吗?我真诚地相信,党中央七月全会以后,当莫洛托夫同志在《论当前局势》一文中就让步论问题对托姆斯基同志开始射击,当如此猛烈的攻击开始时,我就完全清楚这不是偶然的了。于是我就明白,1927年秋天,十五大召开前夕,在我们着手实行税率改革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和我的一次谈话不是偶然的了。我提前到了中央委员会来参加星期一的例会,办公室里只有斯大林同志一个人。我对他讲了税率改革<sup>146</sup>。我告诉他,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准备工作做得很差,税率改革进展缓慢。你们知道斯大林同志是怎样回答我的吗?——让你去当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就好了。我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

伏罗希洛夫:居然不知所措了,真可怜!

乌格拉诺夫:是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听了这种话是可能一下子回不过神来的。

奥尔忠尼启则:乌格拉诺夫,说实话,你是不是说过工会的事很糟糕?

乌格拉诺夫:我从来没有掩饰过工会工作中的缺点,今后也不会掩饰,我在工会工作过十年<sup>147</sup>。从事党务工作快八年了,我一直很关注工会的问题,知道那里的缺点、因循守旧、不灵活。不过我虽然知道工会工作中的因循守旧、不灵活,可是从来不曾提出过托姆斯基应当被撤去工会领导职务的问题,我是这样回答斯大林同志的:“只有托姆斯基去世了,才能任命工会理事会的新主席。”我就是这样一字一句回答斯大林同志的。(笑声、喧闹声)

伏罗希洛夫:回答并不聪明。

乌加洛夫:可是今天,人还活着就要任命了。

乌格拉诺夫:有人觉得这不聪明,可是从预防分歧可能扩大的角度来看,我



认为我当时的做法是聪明的。这时莫洛托夫同志进来了。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你看，我对他说，让他去当工会主席就好了，可是你猜猜，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只有托姆斯基死了，才能任命工会理事会新主席。”莫洛托夫对我说：你真是怪人等等。（笑声、喧闹声）

臧声：他直到今天也闹不明白，他当时说了些什么。

乌格拉诺夫：托姆斯基同志的问题在有些人乍看起来似乎很可笑，可是这绝不是开玩笑，现在每个人都应当清楚，这是有意思的，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有连续性的。显然，托姆斯基同志的免职早就在酝酿了。

奥尔忠尼启则：你跑去给托姆斯基通风报信，是给他帮了倒忙。

乌格拉诺夫：1928年秋天以前我没有对托姆斯基谈过这件事。

奥尔忠尼启则：是夏天说的。

乌格拉诺夫：我在春天只对两个同志——加里宁同志和乌汉诺夫同志谈过这件事。加里宁同志还赞成我的回答呢。

臧声：可是夏天大家都知道了。

柯秀尔：对。莫斯科到处都在传。

乌格拉诺夫：政治性问题。政治局内部围绕着原则性问题展开了斗争，可是我深信，这种斗争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如果我们多一些宽容，彼此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同志式的态度。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从我今天谈的事情，从同斯大林同志的多次谈话，从莫洛托夫同志的种种攻击——他攻击了李可夫，还攻击了其他人，而且比所有的人都更起劲——从这一切中可以看出，像现在这样不讲策略，即使没有分歧，也能制造出分歧来。应当对此严肃思考，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今天，而且适用于将来。我们，党和工人阶级，今天面临着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比1928年春天要复杂得多。这是人人都感觉到了的，可是无法回避。对于我国的所有重大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必须回答。给全国的城市人口都规定了粮食消费定额。许多农村的粮食消费区在挨饿。近期的前景并不光明。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最认真地想一想这些问题，而为了思考这些问题，就不应该把珍贵的时间用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事情上。

鲁祖塔克：难道要用在同加米涅夫谈话上吗？

乌格拉诺夫：我们现在的形势如何？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粮食严重不足，而且其他农产品也不足。毫无疑问，我们最近几周内就会遇到向工人供应肉类的严重问题。

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我们，怎么说好呢，保持沉默。可是冬小麦的播种面积

怎么样呢?1928年秋天,我国各主要农业地区的冬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3%。北高加索的播种面积怎么样?劳动与国防委员会3月6日提供的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表明,全区冬小麦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0.5%,而个体农户减少了15%。

柯秀尔:乌克兰减少了11.8%。

乌格拉诺夫:乌克兰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1.8%。

柯秀尔:是的,可是你说说为什么。

乌格拉诺夫:为什么?去年歉收了,可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这反正是一样的。

奥尔忠尼启则:你说说党的政策。如果是干热风、旱灾、霜冻,那和党的政策没有关系。

乌格拉诺夫:我并不把冬小麦播种面积减少的全部责任都推到党身上。可是今年农业税方面的错误无疑产生了影响。去年的旱灾影响到牲畜数量等等的减少,影响到经济形势,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问题终归是问题,终归是要考虑的。

柯秀尔:我们现在不是在考虑嘛。

伏罗希洛夫:是谁在争论呢?

乌格拉诺夫:我们是极力避讳谈这些,把事情描绘成仿佛一切都顺利。

施利希特尔:这叫什么呢,是退化吗?

臧声:直截了当地说吧。

乌格拉诺夫:别用这些词吧——什么退化、赤贫化<sup>148</sup>,我们不说这样的蠢话。你们别给我塞退化这样的字眼,还是给困境找出路吧。牲畜减少的情况如何呢?

施利希特尔:总之是退化。

乌格拉诺夫:全国平均奶牛头数减少了3%,俄罗斯减少了2%,乌克兰减少了6%。

柯秀尔:是减少吗?你这是哪儿来的?

乌格拉诺夫:奶牛减少数是中央统计局局务会议3月份向人民委员会提供的经济形势总报表中的数字。现在提供的是2月份的全国经济形势总报表。冬小麦减少、牲畜头数减少等等,今年党和苏维埃机构进行的春播运动都比去年好得多,可是形势仍然很严重。现在我们在今年丰收的主要粮食采购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又采用了行政性的非常措施。这无疑有碍于扩大春播面积的计划。

喊声：胡扯！

乌格拉诺夫：有数据表明秋翻地的面积减少了，现在又采用了非常措施，它主要打击了富农，可是也伤及中农。非常措施对于我们扩大播种面积的计划肯定有妨碍，所以1929年春天的局势是很不乐观、很严重的。对此当然不能一声不响。

奥尔忠尼启则：你说说应该做什么！

乌格拉诺夫：我现在就要谈。我们不能吹嘘说农民的情绪好得不能再好了。昨天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我们正在痛击富农，把他们赶出去等等，这话并不完全对。同富农斗争是应当的，可是这场斗争，据我看，需要的时间比卡冈诺维奇同志形容的要长得多。卡冈诺维奇同志昨天说，我们正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决战。

卡冈诺维奇：不是最后的战斗、而是被拖进了一场尖锐的战斗。

乌格拉诺夫：尖锐的战斗、主要的战斗等等。全部方针就是我们能够一举而粉碎一切。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断言是不对的。在最近大约三年内我们还不能消灭富农经济，哪里谈得上什么尖锐的决战。不要忘了，根据国家五年计划，五年以后农业总产值中个体农户还要占到80%，而商品产值中是60%。其中富农还要占一定的比例。

奥尔忠尼启则：富农要占80%吗？

乌格拉诺夫：个体农户占总产值的80%，而在个体经济中富农还要占一定的比例。

奥尔忠尼启则：占多少？

乌格拉诺夫：我不代表国家计委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所以回答不了所有的问题。在我们继续前进的过程中还会有富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像昨天卡冈诺维奇同志那样，把我们的粮食困难问题统统推到富农头上是不对的。我们不管怎么说，总该知道迄今为止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是中农。今年4月我们采购到的粮食比去年少1亿普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要和中农打交道。我们尽管施加压力，从富农那里能拿到的粮食也就是1000万—1500万普特，而我们缺的是1亿多普特。今后我们面临的大问题依然是同中农打交道。现在大家都清楚我国的经济形势紧张。十五大上我们通过了许多决议：降低工业品价格，建立商品、粮食和外汇储备，稳定外汇平衡。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执行党代会的这些重要决议。我们的经济形势表明，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考虑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应当长期执行的许多主要措施。不能只顾眼前。当这些问题出现时，它就表明经济形势不妙。这就是我们应该想一想的事情。

不应当像昨天波斯特舍夫同志那样,毫无根据地给我们扣上右倾的帽子,指责我们转到了耐普曼和富农一边,想让富农牵着党的鼻子走,而应当对我们国家遇到的这些问题、最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做出回答,并且搞清楚它们的根源。

伏罗希洛夫:你眼下离搞清楚根源还远着呢!

乌格拉诺夫:这样事情就会好得多。党和工人阶级不会相信现在的困难仅仅取决于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长无疑是巨大的,同1921—1922—1923年比起来,我们是大踏步地前进了,显然,这样的规模不可能不伴随着紧张。可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经济生活的紧张终究不能统统归结为成长的困难。

鲁祖塔克:那归结为什么呢?

乌格拉诺夫: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领导有错误。

臧声:错误是任何时候都有的!

乌格拉诺夫:可是很遗憾,我们现在不愿意谈领导经济方面和一般政策方面的错误。我们这儿占统治地位的是“完美无缺论”。

臧声:那你现在就说!

乌格拉诺夫:我曾经尝试着说过。

奥尔忠尼启则:你现在就说,有什么错误!

伏罗希洛夫:现在就说!

乌格拉诺夫:应该讲,否则没什么好处。

奥尔忠尼启则:那你现在就说吧!

乌格拉诺夫:可惜我们不讲这些。

奥尔忠尼启则:你讲讲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方法。

乌格拉诺夫:我们经常谈到过火行为,讲到地方干部办事马虎,可是如果认真地想一想,那么“过火行为”和办事马虎的根子同上面来的、领导的杂乱无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在上面制定各种指令,做出决定,颁布法律,然后看到它们并不适用,就责怪地方干部行为过火。可是并不承认上面犯下的错误。革命已经12年了,人们并没有变得坏一些。地方上有文盲、愚昧无知,搞强迫命令,可是干部成熟了,他们在成长……

臧声:当然是这样!

乌格拉诺夫:说这里错在过火行为,那里错在地方干部办事马虎,这样推诿是不行的。我们困难的根源在哪里?我认为我们困难的根源在于城乡发展的差别太大。

奥尔忠尼启则:这话怎么讲?

乌格拉诺夫:我们的农村远远落后于发展中的城市。我们没有用应有的速度使农村的发展赶上城市的发展。

贼声:那应该怎样做呢?

乌格拉诺夫:应当切实地,而不是在口头上保障中农的经济利益,不应当采取非常措施,那样就会有更多的粮食、更多的牲畜、更多的羊毛等等。

施利希特尔:他是在发表宣言吗?

伏罗希洛夫:你说得详细点,该怎么做?

乌格拉诺夫:应该这样做:既然中央十一月全会决定了不采取非常措施,既然通过了农业税法,要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那我们就有责任遵守革命的法制,严格执行通过的决定,而不把什么都推到地方干部办事马虎头上。我们的立法和指令摇来摆去,而没有一条路线。

奥尔忠尼启则:乌格拉诺夫,有一个问题,请回答:农村落后于城市,这是不是说农业落后于工业呢?

乌格拉诺夫:农业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可是由于城市发展的主要支柱是工业,所以农业落后于工业的发展。

布勃诺夫:那应当怎样做呢?

乌格拉诺夫:应当加紧让农业赶上来。为此就必须保证我们的税法稳定许多年等等。

贼声:说得好听!

乌格拉诺夫: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你是打算从我嘴里套出富农来,卡冈诺维奇同志。

卡冈诺维奇:什么?

布勃诺夫:贼喊捉贼!

乌格拉诺夫:谈五年计划的时候我再详细地谈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放弃我们现在在商品流通领域里实行的那种高度集中。我们这样做就压制了主动精神和经济的成长。我们实际上是把合作社变成了一个分配者。[柳比莫夫同志是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主席,他在苏维埃机构的正式会议和半正式会议上都一再谈到这一点。]我们用不着把什么都揽过来,既有供应工作,又有小手工业,统统搁到国家的肩膀上。我们压制了主动性,什么都想自己干。我们自己不能把什么都做好,结果呢,就像最有权威的经济领导人、国家计委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说的那样,有些地方反而成了空白。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要求动用大量物资。而对于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工业化来说,首先是居民的小额存款具有最

重大的意义。这种小额存款、小额储蓄只有具备土壤时才会出现。所以我说，发展手工业将长期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这就是说，手工业将增加商品的数量。这样就能缓解商品的匮乏，同时通过储蓄所增加积累。这一切能够填补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说的那种“空白”。我们通过发行国债大大动员了工人和职员资金。近来我们看到了紧张的局面。第一期债券有很大一部分投到了工业化中<sup>149</sup>。财政人民委员部曾经预计投入不会超过3500万，而实际达到了7000万，这就是说，这个资金来源很紧张了。而产品和商品不足、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这都是偿还国债的来源。应该认真地考虑和找到寻求国内资金的长期措施。

在人民委员会讨论五年计划时，德沃莱茨基同志说，虽然国家的本质不同，可是小额储蓄在德国起了很大作用。在我国现在还收集不到这么大量的小额储蓄，因为没有基础。在德国，1924年储蓄所的小额储蓄是6亿马克，1925—1926年是12亿，1927年是18亿，1928年是24亿，到1928年底，储蓄所的小额储蓄达到了75亿马克。我们当然达不到这样的规模，可是要关心这件事。然而报告人、国家计委主席团委员斯特鲁米林同志是怎样回答这个严肃的论据的呢？他大体上是这样说的：“你们何必给我们塞什么小额储蓄问题呀。为了得到小额储蓄，必须创造条件，可是我们是另一种方针。再说这种叫花子一样的储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党提出搞一个储蓄双周活动，党尽了一切努力来收集这些小额储蓄，而国家计委主席团的委员、“伟大的五年计划”报告人却说，小额储蓄没有什么意思。

臧声：在这儿谈是什么意思？

乌格拉诺夫：意思在这儿！既然连斯特鲁米林同志这样的大经济学家都对人人都懂得的、对调动国民资金有很大作用的这个重大问题持这样的态度，那还能指望别人会认真地对待制定的计划，认真地实施计划吗？我们往往起草一些庞大的计划，而不考虑物质资源，然后一年之内又反复修改计划。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忙乱、官僚主义等等。现在我来回答说我们只谈缺点，而看不见优点的指责。在这里提出这种指责的是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对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提出这种指责是不像话的，我们坚决拒绝。我们每个人都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付出了许多精力。要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仰，那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比某些人还要大得多。可是我反对粉饰太平，反对不实事求是，反对不指出在领导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要善于承认缺点并及时改正缺点。他说，历史上有过一些政党骄傲了，最后

垮台了的事情。他还说我们不会垮台,因为我们能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须要仔细地想一想国内发生的一切:农业的情况如何,农民的情绪如何,工人阶级的处境和情绪如何,我们有几百万党员的党现在想些什么。我们领导核心应当敢于无所畏惧地、及时地承认和改正错误。

臧声:那你就承认吧。

乌格拉诺夫:可是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个承认错误。我们骄傲了。检查我们的工作、成绩和缺点首先就应当通过工人阶级。我在去了顿涅茨煤田、戈尔洛夫区和雷科夫区之后,向政治局做了报告<sup>150</sup>,说工人情绪稳定,对经济建设有信心,工人在提高经济方面干劲十足,不过工人在干劲十足,热情高涨的同时,也坦心地追问工人阶级承担的当前经济困难的根源。党的任务就在于……

臧声:帮助他们认识<sup>151</sup>。

乌格拉诺夫:完全正确,帮助他们认识,但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我们现在主要是说空话。

我在顿涅茨煤田看到了什么呢?我到叶纳基耶沃冶金工厂(现在叫李可夫工厂)去参加了一个很大的群众集会。我就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做了详细的报告,之后有很多工人发了言。发言的大多是非党工人。他们讲了我国总的经济形势,要求我回答现在的经济困难,指出了错误。他们要求市场正常工作。工人要求让农民把产品运到市场上出售,不要采取行政手段压制市场。可惜我们党的干部在讲话时只是发号召,而对群众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不做任何回答。这些党的干部的发言都被嘲弄的掌声打断了。

臧声:工会干部的讲话也被打断了么?

乌格拉诺夫:是的,工会干部的讲话也被打断了。实际上工人就没有让这家大工厂的工会主席讲话。他的讲话两次被听众鼓倒掌打断了,不到十分钟就把他轰下了台。我毫不怀疑,非党工人要求对我们面临的经济困难的主要问题做出回答,而我们党的干部对总的形势并不了解,只是发号召,因此处境十分艰难。

马约罗夫:骂你是右倾呢,你说说这个吧。

乌格拉诺夫:有同志提醒我右倾的事,这很好。我本来打算绕开它,那现在我就来说说吧。(喧闹声)

在戈尔洛夫卡有3000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我做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报告。我谈得很充分,而且讲了我们报刊上不曾谈过的许多东西。报告之后,首先发言的人(叫了两个人,可是他们不肯走上台来)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开门见山,一上来就说,乌格拉诺夫尽谈国际和国内形势,可是没有讲到右倾:“全

国、所有的报刊都在谈论右倾,可是他对我们什么也不说”等等。他说:“人家告诉我们,弗鲁姆金是右倾,可是这不对,右倾分子是李可夫、布哈林和乌格拉诺夫,他因为右倾被撤了莫斯科州委的职务。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摇摆不定。”他的发言时间到了,可是又给他延长了三分钟。在最后三分钟里,他“受到鼓舞”,转过脸来对我说:“乌格拉诺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不是说过,如果政府不向右转,他就让红军向右转?这是确实的,你否定不了。”我当时就对大家说,这是诽谤。全体与会者于是高喊:“打倒诽谤者!”

经理佐林同志把他扣住了。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原来是一个非法的托洛茨基分子,三天前才从哈尔科夫非法来到此地,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在他的住处搜查出满满一篮子托洛茨基分子的材料和托洛茨基本人的照片。(主席摇铃)稍等一会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发言之后,有很多工人发言,坚决驳斥了诽谤者。然后区委宣传鼓动部长(他是一个年轻人,一名年轻的党员干部)讲了这样的话:同志们,当然,第一个讲话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要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可是我们还有想破坏总路线的右倾分子,所以要同右倾分子作斗争。宣传部长并没有从实质上揭露反革命的发言,他的发言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发言只有一点差别,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对“右派”指名道姓,而宣传部长没有指出右派的姓名。我在结论里这样提出了问题:“同志们,在这里发言的第一个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他把我们的领导人和我说成是右派。我给你们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我回答了你们提出的问题,请你们说说,我的报告里有什么右倾的东西、反革命的东西、非共产主义的东西、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吗?”工人们回答说:“全都对,乌格拉诺夫同志。”

波隆斯基:这是向非党人士求救呢。

乌格拉诺夫:我又问了一次,我的报告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大家说,都对。

喊声:这是反党行为。(喧闹声,主席摇铃)

主席:你该结束了。

乌格拉诺夫:这就是工人的真实情绪。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工人们指出的事情呢?应当保证市场生存的可能性,应当保证农民运送和出售产品和购买商品的可能性。对工人阶级指出的这些事情不能不理不睬。

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我们指出了结合受到威胁。现在这种威胁是否减弱了呢?



柯秀尔:这很有意思。

乌格拉诺夫:对这个政治问题必须回答。我的回答是:直到1929年春天威胁并没有减弱。我们的任务是开展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来减弱这种威胁并巩固和农民的联盟。这就是党面临的任务。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却在政治局委员中去抓右倾。

我国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谁不承认这一点,否定这一点,他就是倒向右边。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请你们证明一下,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等同志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建议里,在什么情况下否定过我国发展的这条路线?没有人能够证明。如果有一位同志建议今年用15亿,而不是用20亿来建设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工厂,我说我不能把这个建议划到右倾里面去;那你们怎么说呢?要扣右倾的帽子吗?这不过是一个经济上怎样合理的问题,它和有没有资金十分密切地联系着。这也是工人阶级国家手里有多少力量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却要扣上右倾的帽子,说是你反对速度,也就是反对工业化。这是最有害的方针。它只能给党带来损害。它扼杀了独立思考。让人无路可走。结果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有害无益的。

简单说说右倾危险。

现在什么地方可能出现最大的右倾危险呢?这种危险1929年春天来自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群众处境的恶化和日渐增长的不满情绪。参加阿扎尔暴动的不仅有富农,而且有中农和贫农,除了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之外,它也是群众经济处境艰难的结果。这才是党应当注意的地方。

再说说要求忏悔和清除的问题。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前,仍然必须搞清楚。有许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原则问题现在引起了争论。我们就这些问题充分地讨论过几次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匆匆忙忙做出谴责和清除的决定是非常有害的。如果我们及时把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提交集体讨论,那就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出现扣倾向帽子的事。本来应当把主要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提交全会讨论,那样就可以看到谁是对的,谁看得更远一些。而现在问题却被淹没在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里。我认为,对党和革命最有害的莫过于有些发言的同志在这里发挥的把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同志清除出去的想法。我认为,谴责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同志的观点的建议是对党有害的。先认真地、全面地分析清楚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然后再做出决定吧。

我提醒大家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清除的有害性的指示。他说:

“如果在为数很少的党的老近卫军中出现分裂,那问题的解决就不取决于这一小群人了。”我想问问你们:怎么啦,难道老近卫军已经衰老了,革命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吗?不对,还非常需要他们,今后也需要。在谈清除之前,应当先想一想列宁同志的指示。波斯特舍夫同志很勇敢,他在发言时说:“我们一咬牙就把党的三个领袖赶出去,没有领袖,党现在也能领导国家。”应当记住,我们党现在不仅领导着我们国家,而且领导着国际革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领袖和领导干部的意义和作用做了什么样的评价。我们现在不把它放在眼里了。清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喊声: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布哈林不愿意工作呢?]

乌格拉诺夫:现在的状况、现在仍然在进行的败坏领袖声誉的活动使党的整个领导层都遭到贬低。

喊声:那你在这里贬低谁呢?

乌格拉诺夫:清除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无疑会削弱对我们国家和国际革命的领导。打击这些同志会使我们党的理论思维枯竭。不管在这里怎样咒骂布哈林,不管鲍曼和其他同志怎样张牙舞爪,说《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充满了修正主义,说布哈林同志关于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是修正主义的,——谁也不能抹煞和贬低布哈林同志作为一个理论家所起的作用。列宁同志说过,布哈林同志不仅是党最宝贵的理论家,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喜爱。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这样对待我们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不珍惜他们,轻易地抛弃他们是不行的。我们的革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可以随意抛弃党的领导干部。工人阶级是提心吊胆地看待最近几个月来开展的这场斗争,看待破坏像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等同志这样的党内大人物的声望的行动的。工人阶级非常气愤,也不同情现在搞的败坏领导同志名声的举动。这一点我们应当记住。

主席:捷连斯基同志发言。

喊声:那布哈林呢?

主席:你们希望让他现在发言吗?布哈林同志在这儿,他同意休息以后发言。有反对的没有?现在休会。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同志们,我们开会。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sup>152</sup>：同志们，我认为，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错误地认为党内产生了某种新反对派，因此我们将在某种程度上遇到同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反对派一样的反对派。我觉得许多同志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在这里听到的许多发言就是出于这种担心。

同志们，请你们尽量仔细地听我的发言，因为我觉得，我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发言已经是最后一次了。首先，我要说，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目前的处境是任何一个党员，更不要说是迄今为止仍是党的领导集团的成员，都不曾遇到过的。实际上，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联席会议之后，在党的相应最高级机关没有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我们变成了众矢之的。实质上，这种处境令人想起革命前的所谓“民间死刑”——把人缚在耻辱柱上，在鼓声中把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朝他泼去，同时禁止他说话。这种“可爱”又“可靠”的古老手段，从我们主观的感受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东西。并且还使用别的手段。还“企图”，轻一点说，直接和间接地把我们“拉入”争论。例如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sup>153</sup>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喊声：“他们没有来参加代表会议”，“他们没有做解释”，“他们没有讲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没有在党的面前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想对党员群众负责的人”等等，不一而足。在听到这些意见之后，要有巨大的克制力才能不在代表会议上露面，不回答问题，不进行反驳。

可是我们保持了沉默。我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只要我们在某个代表会议、会议和支部出现，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争论就会开始，而我们当然立即就会被指责为争论的挑起者。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不解释、不辩护会受到污蔑，而如果试图解释、试图辩护，就会受到更多的污蔑。

我再说一遍，过去的几个月表明，我们这一方表现了最大的、极大的自制力，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党员所能做到的，也是可以向他们要求的极限了。我认为，这对于有反对我们的情绪的那部分中央委员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虽然是较小的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的经验”（我把这个词加上引号）。

认为我们又出现了“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大体上会再次经历过去反对派所经历的那些阶段，从这种观点出发是否正确呢？

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证实，被你们许多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作为出发点的这个核心问题是根本错误的。你们没有新的反对派！你们将来也不会有新的反对派！我们中间谁也不会去领导任何“新的”或“最新的”反对派。我在同见到的许多同志的谈话中都很有信心地坚持这个观点。因为我深信“反对派”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这种看法的政治根据和政治理论根据是，通过派

别斗争来消除党内分歧的旧办法现在是不能允许的,并且客观上现在采用这种办法在党内也是不可能的。我在所谓同加米涅夫的谈话中也说过这一点,对这次谈话的歪曲成了对我们发动“严厉批判”道路上的主要信号之一。那时就讲过这一点。你们应当根据我现在提到的事实,从我所说的我们的行为来想一想,关于新“反对派”的各种各样“灾难”的描绘并不存在,无须制造“血腥的孩子”,说什么我们要组织党内争论和斗争,等等。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做。整个党内形势都反对这样做。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反对这样做。阶级力量对比反对这样做。国际大范围内的客观力量对比也反对这样做。

我必须先说明这一点,这个问题以后就不再谈了。

现在我来谈几点也是引言性质的看法,这涉及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草案<sup>154</sup>,它现在是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须要通过的决定的正式出发点。

同志们,现在我不谈整个决议,而只想对其中某些论断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我认为,只要对事情稍微认真负责一些,就应当摒弃这些论断。

先谈谈决议的道德方面。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共事几十年的同志进行种种道德谴责——指责他们不诚实、不正派以及其他一系列罪名。

对此我必须坚决抗议,这不仅是为了捍卫个人的某种主观利益。也是为了捍卫心目中的列宁。我再重复一遍,我在这里必须坚决反对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中滥用1916年4月列宁给什利亚普尼科夫的信,信中说,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sup>155</sup>,在决议起草者看来,这封信应当能够“盖过”,即消灭列宁的政治遗嘱<sup>156</sup>,也就是他对许多负责同志所做的最后的政治评语。我必须坚决地提起这件事,因为这是不正当地利用这封信。以前,在向我出示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时,我不能立即想起、得知,也不能反驳决议中所引用的列宁同志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所提到的有关情况,那时我对此说不出任何东西。我从列宁研究院<sup>157</sup>取来了列宁同志的信,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信件,阅读了我私人档案中的通信,从而明确无误地确定了一个事实:这句话是因马利诺夫斯基奸细案<sup>158</sup>引起的,在这个案件中我是反对马利诺夫斯基,而同他没有任何私人争执和私人关系的唯一证人,在这个案件中我是完全正确的。同志们,现在我要证明多么不正当地使用了列宁的这封信。

首先,我询问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他是否记得“轻信流言蜚语”这个词组同什么事情有联系。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回答如下(但愿你们理解,我询问施略

普尼柯夫不是因为我同他建立了“反对派联盟”，而是因为列宁的信是写给他，而不是写给普希金的）。施略普尼柯夫这样回答我的便条：

“您1929年3月24日的便条收到，但不能立即回答，因为须要查看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所有通信。在他和我的信件中，我没有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您“轻信流言蜚语”的依据。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是否通过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通信查询过信中的这一点，但那时（1916年5—6月）我从许多同志那里听说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评语是在审查马利诺夫斯基议员奸细案时您的行为引起的……”

现在我接着说下去。在审查马利诺夫斯基奸细案时（这事在座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可以证实），我是怀疑马利诺夫斯基从事奸细活动的证人。我是唯一的证人，在指控马林诺夫斯基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同他没有任何私人的或者类似的争执。但那时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一系列非常狡猾、非常做作的手段，得以哄骗我们的调查委员会（如果大家愿意，我可以说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事你到党史委员会<sup>159</sup>说去。

布哈林：我会到党史委员会去说的，不过关于您，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我还有点东西要说。

奥尔忠尼启则：请吧，请吧。

布哈林：同志们，我反对马利诺夫斯基。但我所支持的指控被推翻了，调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由已故的伊涅萨·阿尔曼德同志誊抄，其中说我“轻信流言蜚语”，“听信”了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流言”。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但不是我犯的，而是调查委员会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信中的表述就是同这一错误有关，通过分析我在战时同季诺维也夫的通信也可以得到证实。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下面不再谈了。不过我要问问你们，同志们，在放出这些话之前，有谁核查过没有，核查过这些话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有人完整地读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没有？核查过没有？是否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发生的？没有，没有做过。而只是不光彩地利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内斗争中无意犯的一个错误，甚至不去想一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说得轻一些，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下列事实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1917年革命后马利诺夫斯基的奸细面目被揭露，而我对他的指控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被揭露后就被枪毙了，此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做过各种各样的评语，但再也没有使用这个评语，这种指责当然

也没有再重复。

然而到底是谁提醒要这样来利用列宁的信的呢？从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所写的文章《不断革命和列宁的路线》中我们读到：

“还须要补充一点，在列宁给柯伦泰（既然是给柯伦泰的，那也就是给施略普尼柯夫的。——尼·布·）的这些信中含有对柯伦泰所同情的布哈林的猛烈攻击。不过通信中的这一部分暂时还被掩盖着。只有在公开反对布哈林的运动中才会问世。这不要等待太久了。”

托洛茨基是这样写的，他鼓舞了决议的起草者。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就到此为止。

我现在来谈谈提交全会的决议中的理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决议在理论方面的特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建议以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批准的关于“贡赋”的公式，这个公式至少是可以争论的。提交给你们的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中不容争辩地写道：

“全党（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的出发点是：农民购入的工业品的价格还较高，而卖出的农产品的价格却较低；而现在还不能取消这种超额税（“贡赋”）……”等等。

同志们，我不想在这里大谈“贡赋”问题。但是如果我请你们每一个人自问一下，斯大林同志用这个词（“贡赋”）来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否妥当，那么对这种表述难道不应当至少回答说：“用词不当”。如果有谁（首先是这个词的使用者）出来说：“我同意，我用词不当”，这个问题就会取消。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为什么要坚持明显的错误呢？

斯大林：如果伊里奇也说过这个词呢？

施利希特尔：针对专家和资本家的。

布哈林：列宁没有用过与斯大林的从农民那里收取贡赋类似的说法。对专家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就资产阶级专家和资本家而言，我们应当给他们付学费<sup>160</sup>。

斯大林：不，不是这么回事。

布哈林：不，请等等，正是这么回事。不能把资本主义世界和资产阶级专家（他们得到工人阶级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即在一定程度上剥削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国家向农民征税问题混为一谈。这种征税同剥削的范畴毫无共同之处。无产阶级不是农民的剥削者，也不可能是农民的剥削者。请取消您的“贡赋”，哪怕作为失言也罢！不要再提这一点！不要把自己装扮成不犯错误的

教皇！这就是我觉得须要提出的最低要求。同志们，我简直不明白，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名称去说明在苏联对农民的征税，并且还是在正式的决议上。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同其他所有学术流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总是要求对经济现象做出相应的历史标志：资本就是资本，而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商品也完全不是单纯的产品。贡赋也是这样。贡赋是非常确定的历史范畴，它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可能共同之处！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理论观点。这是无知，也是有害的！

我现在来谈第三点意见，涉及决议的政治方面。我觉得，下面的话很能说明决议在政治方面的特点：

“今年党不曾采取非常措施也总算应付过去了，党还算保持了就全苏联说来一般不坏的粮食收购速度，否认这一点同样是不对的……”

然而，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这个决议通过还没有几个星期（就是几个星期！），这个出色的预言就被生活推翻了。如果全会在决议中再留下这种政治上绝顶聪明的东西，那是极端可悲的，因为它清楚地表明和证明令人吃惊地缺乏起码的政治预见性。不能把它写进现在提请你们审议的决议中去！

我不谈决议中关于我们似乎反对工业化的指责以及其他种种莫须有的罪该万死的指责。我将在相关的地方来谈。在这里我只想顺便谈一个出色的理论发现，足以同“贡赋理论”相比美的发现，它出自自由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签署并得到政治局批准的一个提纲<sup>161</sup>。除了其他东西，那里还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非常特殊的理论“创新”，不妨说是“标新立异”的东西。在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提纲中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为国外市场和殖民地服务”等等，等等（接下去谈苏联）。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在其最初发展阶段”如何“为殖民地服务”的，马克思说得最好。

加里宁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为国外市场和殖民地服务”等等。我是准确引用的。

鲁祖塔克：不是在封建社会，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布哈林：说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黎明时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迄今为止是向马克思请教的，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

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资本论》,1928年版,第1卷,第603页)<sup>162</sup>

不仅马克思,而且连资产阶级学者桑巴特也说,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受折磨和被灭绝的其他民族的鲜血和白骨之上的。而现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却提出一个公式,说资本主义强盗在为(!!)殖民地服务(!!!)! 这岂不是新发现?

喊声:“资本主义为殖民地服务”是可以说的。

布哈林:写了就是写了。如果愿意,请写上: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曙光时期”在为殖民地“服务”。但这是非常错误的!它展现出一幅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新的理论发现的确实奇妙的图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曙光时期”“为殖民地服务”,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却从农民那里收取贡赋!请看我们走到哪里去了!请看我们学到了什么!现在我们学到了许多过去从来不知道,也不会知道的东西!

[卡冈诺维奇:这和马克思并不矛盾。]

喊声:太差劲了,太差劲了。

布哈林:我知道,这不是太差劲,因为这对你们来说是一剂很好的泻药,亲爱的同志们!

喊声:要看是对谁了。

布哈林:现在我要转向主要的重大指责之一,这是昨天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提出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报告的“功绩”之一是,他并不限于各种各样相对来说较为次要的东西,虽然也许是尖锐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东西,而且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指责。他指责说,三名政治局委员,特别是我这个罪人,犯有深刻的内心的思想政治动摇和摇摆。我被政治之风吹得摇来摆去,逐渐倒向右边,已经到了必须把我排除出党的领导的地步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就是这样说的。好吧。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来谈谈“深刻的思想政治动摇和摇摆”。不过为了“自我批评”,请允许我首先回顾一下这些问题,以便尽量清楚地看看巨大的思想动摇和摇摆总的情况如何。我觉得,这同事情有最直接的联系。不仅是因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盛情地触及这个题目,还因为既然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提出指责我们为“右派”等等的决议,所以不言而喻,从通过某个决议来说,根本观点问题具有最首要的意义。

首先,同志们,我要谈谈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莫洛托夫同志的一些言论。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提交给党的十五大的提纲<sup>163</sup>中有如下词句：

“列宁用下面的话最确切地表述了现阶段我们在农民方面的任务：

**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

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发言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这一口号说：

“然而在反对派问题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农问题。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光明正大的，它企图以列宁的引文来加强自己反中农的倾向。反对派通常都引用列宁一篇文章中的如下词句”（接着是上述引文。——尼·布·）。

（反对派说）这就是对我党政策的最准确、最正确的规定！

是不是这样呢，同志们？不，绝对不是，这对目前来说是完全不够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论农村工作》，第1090页）<sup>164</sup>

接着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这段文字出自列宁写于1918年秋天的文章，那时列宁似乎还赞成让农民保持中立的口号。在“解释”了这个问题之后莫洛托夫同志继续说：

“反对派现在却想把这个公式作为最正确的公式用于同农民的关系！难道这不是对列宁的侮辱？”（同上）<sup>165</sup>

在指责了反对派侮辱列宁之后，莫洛托夫同志走得更远了。“但是反对派分子恰恰把这个公式当做自己的主要公式，这不是偶然的。”——莫洛托夫同志说道，同时引用伊万·尼基·斯米尔诺夫的话接着说：

“由此可见，反对派根本不要同中农的任何联盟，它不相信这件事，它不承认列宁的这个口号、政策原则，因此自然地持这种观点（斯大林：因而灭亡）。不仅灭亡，而且还不能留在我们党内。（鼓掌）”（同上，第1091页）<sup>166</sup>

这样，莫洛托夫同志在十五大上说，反对派所引用的列宁在1918年的口号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正确的：

认为这个口号是目前“最正确的”的口号的反对派，必然灭亡；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留在我们党内（不是说这是“动摇”或者一般错误，不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党内！）

莫洛托夫同志是这样说的，而斯大林赞同他的说法。

后来斯大林同志竭力否认；后来莫洛托夫同志写文章自我驳斥<sup>167</sup>，声称这是他的错误。可惜，那里只字未提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完全赞同他的说法！

似乎这是“突然冒出”的。这件事的意义决不在于莫洛托夫起初这样说,后来又那样说,他动摇了,摇摆了,等等。主要的不幸不在这里,并且我的前提也不是说大家都只能讲百分之百的真理……

伏罗希洛夫:你习惯于这样。

布哈林:就像伏罗希洛夫同志那样(笑声),我不认为莫洛托夫同志会动摇。不过我提请注意下述情况。从莫洛托夫同志所做的论断“不能留在党内”等等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严肃认真地对待莫洛托夫同志的话,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或者现在的莫洛托夫应当把十五大上的莫洛托夫开除出党;

或者十五大上的莫洛托夫应当把现在的莫洛托夫开除出党。

还有,按照莫洛托夫在十五大上的发言,党既然接受了现在所说的口号,它就必然灭亡,并且是得到斯大林的准许的,斯大林说的正是灭亡。

最后,党现在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光明正大的”。

这就是从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所做的解释中应当得出的结论。

奥尔忠尼启则:那么口号是正确的吗?

布哈林:列宁的口号是正确的。下面我接着谈莫洛托夫同志。要知道,按照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说法,我们犯有巨大的思想动摇;我们有过巨大的思想摇摆。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说。可是莫洛托夫同志的这些话呢?斯大林的这些插话呢?不,这当然不是动摇!而莫洛托夫动辄把人驱逐出党的威胁呢?不,这不是对活生生的人的官僚主义的冷漠:一个人在不在党内难道不是都一样吗?莫洛托夫今天因为一种原因“驱逐”,明天因为相反的原因“驱逐”,用的都是这么强硬的语言。对莫洛托夫来说反正都一样,把一个人驱逐出党还是不驱逐,党“灭亡”还是不“灭亡”——都是小事一桩!没有任何动摇!

“朋友们,假如我这样做,你们会怎么说呢?”

我们来继续分析“非常坚强”、“从不动摇”、“极其坚定”的人的“彻底性”。

大家知道,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十五大政纲中有如下建议:

“资金从哪里来?……

(2)为了增加出口,从约占农户总数10%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的实物储存中征借不少于1.5亿普特的粮食,在1926—1927年度这种实物储存已经达到8亿—9亿普特,并且大多集中在上层农民手中。”

托洛茨基反对派是这么说的。在党的十五大上,莫洛托夫同志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项建议,他说:

“正是反对派的这种敌视中农、敌视同中农联盟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促使它提出强行征借的建议。

然而这个‘征借’的建议直接破坏我党的全部政策，破坏整个新经济政策。因此，今天谁向我们提出这个强行征借的政策，哪怕是从10%的农户那里强行征借1.5亿—2亿普特的粮食，即不仅向富农，而且也向农村中部分中农阶层征借，不管他提这样的建议用心多么好，他都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工农联盟的敌人……(斯大林：对!)，他都是在执行摧毁苏维埃国家的路线。”(联共十五大速记报告，第1091页)<sup>168</sup>

这样，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彻底”“坚定”地声明：1)非常的实物征借破坏新经济政策；2)不管这种建议提出者的动机如何，他们都是工农联盟的敌人；3)他们都是苏维埃国家的摧毁者。

斯大林同志也“坚定”“彻底”地完全赞同这一切。而现在的“非常措施”(这比为了出口向富农征借要坏得多!)正在变成常规，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请求不要忘记新经济政策，我们却受到侮辱，说“你们干吗把我们拉回去？”这是不是动摇？瞧，莫洛托夫同志过于热心的公式把他自己带到了什么地步：他现在必须把自己驱逐出党，宣布自己是新经济政策的破坏者、工农联盟的敌人、苏维埃国家的摧毁者。莫洛托夫同志以自己绝对的、“极端坚决的”公式把自己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在非常措施问题上他也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在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上莫洛托夫同志在做粮食收购运动的总结时说：

“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措施(即运动的准备措施。——尼·布·)或者采取得迟了，或者在这方面做得太少，那么我们事先就应当看到，这有导致重新采取非常措施的危险，而使同农民的结合受到完全实际的威胁。”(速记记录，第2册，第127页)<sup>169</sup>

他在谈到安德烈耶夫同志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时重复了同样的东西。在8月5日《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论当前局势》中，莫洛托夫同志写道：

“采取非常措施，把它作为农村长期的或者经常的方针，这就意味着放弃党同中农的联盟的政策，用托洛茨基对中农施加暴力的政策取代列宁主义的政策。”

奥尔忠尼启则：那你是怎么说的？

布哈林：这样，非常措施制度在这里被确定为背弃列宁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而这些同志现在是怎样发展“理论”的呢？啊，现在这些人忘记了自己的昨

天,一本正经地说,非常措施并不那么坏、那么危险,因为它团结了、推动了我们的机关;因为它似乎把农村所有的阶层“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现在一种臭名昭彰的“理论”在党内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这就是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我们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就越多。这个理论是斯大林同志在七月全会上提出来,而古比雪夫同志加以特别发挥并天才地予以“深化”的。我认为,这个“理论”混淆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它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某个短暂阶段(我们现在就处于此类阶段之一)同发展的总进程混为一谈了。它把目前尖锐化的事实本身说成我们发展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规律。根据这一奇怪的理论得出结论,我们越是朝社会主义前进,就会遇到越多的困难,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而到达社会主义大门口时,我们显然应当或者发动国内战争,或者活活饿死,变成一堆白骨。

卡冈诺维奇:不要夸大古比雪夫同志的发言。(喧闹声)

布哈林:同志们,听我说。不要激动!

这个“奇怪的”(说得轻一些)“理论”,如我所说,被古比雪夫同志“成功地”深化了,看来,他从自己的经济工作经验中懂得,阶级斗争是如何加剧的。9月19日,古比雪夫同志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会议上是这样谈论阶级斗争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有成就,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抗和对抗就会在越大的程度上增长起来。

阶级消亡(我们整个发展的最终结果)应当,自然也必将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局势下进行。”(1928年9月19日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9月25日)

这样,由古比雪夫同志补充、加深并提到高级阶段的这一理论,宣布了这样一个论点,阶级的消亡越迅速,阶级斗争就将越尖锐,显然,阶级斗争的火焰将在已经没有任何阶级的时候燃烧得最旺!(笑声)这也是最近众多的理论“发现”之一,遗憾的是,它们已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政策……

索尔茨:在某个阶段上。

鲁祖塔克:而你是根据什么理论去找加米涅夫的?

布哈林:由于理论是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不是玩具,也不是解闷逗乐。这些绝顶聪明的理论必然在政策上有所反映,于是把我们导向我们在粮食收购、谷物经济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所遇到的那种奇妙的实际结果。

不过,同志们,我在这里请你们给予某种特别注意,因为你们现在将听到米高扬同志有关这一问题的富有预见的声音。大家会知道,在同托洛茨基分子争

论的时候,米高扬同志说过些什么话。下面就是米高扬同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同皮达可夫争论时所说的话。米高扬同志说——我恳请你们仔细听听他的话:

“他(皮达可夫。——尼·布·)的下一个提法非常重要,好像是偶然从皮达可夫同志的嘴里蹦出来的,但却很能说明反对派的整个方针。皮达可夫同志一字不差地说了如下的话: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矛盾也将增长。这就是他的提法。

**皮达可夫:完全准确。**

**米高扬:**谢谢你证实了我转述的准确性。皮达可夫所叙述的论点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允许进行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它预先就决定了我们的发展确实遵循着热月政变<sup>170</sup>的进程。我们在建设什么?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减少矛盾,完全消灭矛盾。如果我们是在走向社会主义,那么矛盾将随着我们前进的每一步而减少,如果还会有矛盾,那么它们也将不那么深刻,然后阶级将消失,我国内部的所有矛盾也将随之消失。而如果我们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走向热月政变,即走向资本主义,那不管我们向前走多远,矛盾将越来越尖锐,阶级斗争也将越来越尖锐,等等——按照皮达可夫同志以及整个反对派的看法就是这样。

**皮达可夫:**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呢?

**米高扬:**国内的矛盾不是越来越尖锐,而是越来越减缓,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将越来越多地压倒资本主义。当然如果你们说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同苏维埃世界之间的矛盾,那是正确的,但这里说的是内部矛盾,是我们国家及其经济内部的矛盾。你们的论点是建立在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的矛盾也将增长之上的。这个论点是绝对不正确的,你们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不是通过克服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而是指望发展资本主义。正是在反对派的这一方针下隐藏着真正的热月危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速记报告,1927年8月,第3册,第118—119页)

好,请品味一下吧!是谁让谁露出了马脚,米高扬同志?从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看,斯大林—古比雪夫的现代“理论”是什么货色呢?

**奥尔忠尼启则:**这不是十五大之后吧?而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在十五大之后做报告的。

**布哈林:**不,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用玩笑是躲不过去的。不,我不玩做有暗记的牌!这样,被皮达可夫同志以及整个托洛茨基反对派所鼓吹的东西,被米高扬同志批判为指望热月政变的东西,被他叫做指望资本主义发展的东西,现在被斯

大林同志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加以鼓吹,尤其是被古比雪夫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天才地予以深化了。如果从我们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看,这又是什么呢?这是思想上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全面投降。

罗济特:说得对。

布哈林:我先插一句。当然,发展的经常趋势是一回事,阶级矛盾的暂时尖锐化则是另一回事。有人指责我们,似乎我们否认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谁否认这一事实了?相反地,倒是有人不想告诉我们关于阿扎尔暴动的事实。但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人想向我们隐瞒这件事,想抹煞这个事实。但我们还是知道了,我们公开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是无可争议的,这是事实。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现在又向农村通讯员开枪等等,这也是事实;我们应当给予反击,这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这一切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把阿扎尔的暴动<sup>171</sup>拔高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且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二个年头,如果我说得不对,就让上帝打死我,在古比雪夫同志看来这也许是成立的,但依我看来,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笑声)

我还可以援引不止一条说明如此明显矛盾,如此鲜明“彻底性”的引文。在这以后这些“不动摇的”同志来找我们并声称:“我们坚如钢铁!我们硬如斧头!”难道这不是对现实的真正嘲弄?

这些例子已经足以说明,至少在“理论”王国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而这是不能闹着玩的!

现在我还想就一位同志说几句,他就是现任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鲍曼同志,昨天他在这里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例如鲍曼同志在合作社理事会第五次会议<sup>172</sup>上所做的题为《粮食合作社的任务》的报告(刊登在1928年12月7日《真理报》上)。鲍曼同志在这里说:

“我们应当通过订购合同把全体农户,包括富裕农户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对富裕农户来说订购是农村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它在农村应当成为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使之服从计划经济的手段。”

鲍曼建议对“所有的村社和农村实行订购合同<sup>173</sup>”。他说:

“农村的富农上层不得不服从贫农和中农的多数,根据国家的订购和计划来生产商品粮。”

是否须要向富农订购,可以争论。可以就此争论,也许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恰当形式(我个人对此有怀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没有钱可以贷给集体农庄,为什么还要贷款给富农?)不过,同志们,请想

一想,如果使用现在常用的争论方法,其中包括鲍曼同志所使用的争论方法,那么关于鲍曼同志的言论能说些什么呢?可以说,鲍曼同志支持富农;可以说,鲍曼同志把人民的钱花在富农身上;可以说鲍曼同志在经济上指望富农;可以说,鲍曼同志忘记了同富农的斗争;可以说,鲍曼同志指望的正是……

鲍曼:我说了,须要使富农服从,要限制他们。

布哈林:是的,要使富农服从并予以限制,但不是用把人民的钱发给他们的办法!!

现在说一下斯大林同志。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同志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讲话中说:

“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企图破坏党的这个政策,提议用一种实际上剥夺富农的政策、恢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代替这个政策。实际上这是重新在农村中燃起内战的政策。”(斯大林《论反对派》,第738页)<sup>174</sup>

在同一个讲话中斯大林同志还谈到安定农村的必要性:

“党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和孤立富农的路线。

党这样做获得了什么成就呢?党获得的成就是:安定了农村,改善了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使贫农组织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使富农进一步孤立,使千百万个体农户逐渐被国营机构和合作社机构所掌握。安定农村是什么呢?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土匪骚扰和农民暴动的情况之下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论反对派》,第739页)<sup>175</sup>

一个月以后的11月23日,即十五大前夕,斯大林同志说:

“列宁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同基本农民群众一道前进。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我们不应该同农民一道迈进,而应当同他们闹翻。”

“实行同多数农民闹翻的政策也就是在农村掀起内战,阻碍我们以农民生产的原料(棉花、甜菜、亚麻、皮革、羊毛等等)供应我国工业,打乱工人阶级的农产品供应,摧毁我国工业的基础,破坏我国的整个建设工作,破坏我国整个工业化的计划。”(斯大林《党和反对派》,1927年11月23日在莫斯科省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12—13页)<sup>176</sup>

在十五大前夕斯大林同志是这么说的,并且说得完全正确。不过如果斯大林同志现在想说服我们,包括我本人在内,说现在我们用非常措施的政策联合所有阶层反对富农,那么这是同上述方针绝对不能吻合的。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另一种调子。1928年同一个米高扬同志在联共七月全会上的声明怎么能

同这种说法一致呢？他说：

“我们只有这种(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尼·布·)破裂的危险,它还会加剧,如果排斥中农的事实还不断地继续下去,如果以后继续采取非常措施,这种危险必然还会存在。所以我们主张纠正这些错误,以便坚决取消任何非常措施,使这种危险不致加剧。”(第2册,第143页)<sup>177</sup>

米高扬:对。现在也应当竭力做到。

布哈林: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对你说:“秋菊春桃,物各有时。”

这就是政治肖像的画廊。这一切是否就是“彻底的”、“一贯的”路线?这里是否有“铁的”逻辑?你们难道看不见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思想多么强烈地影响着这些“坚强的”同志?实际上这是不是思想上的极端混乱?我认为,说得轻一些,这正是思想上的极端混乱!

奥尔忠尼启则:那时候这位理论家在哪儿?

鲁祖塔克:那时他在同加米涅夫谈话,所以疏忽了。

布哈林:是的,我同加米涅夫谈过话。我还尝试着写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并且知道了,“可以”怎样写文章,“可以”怎样纠正某些东西!

现在,同志们,我要转入某些尖锐的思想—政治指责,这是针对我们,首先是对我本人的。在反对我们,其中也反对我的斗争中,卡冈诺维奇同志昨天从托洛茨基的垃圾堆中搬来了关于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污蔑之词。请允许我说一下,这一“指控”最初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的(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提交联共十五大的政纲)。我必须声明,“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在我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小册子、任何一个报告中都是找不到的,然而这些词按照托洛茨基一伙的命令都是加上引号的。这个说法甚至获得了合法地位。我所说的为政治死刑而敲响的鼓声全都是以这一粗暴的谎言为“依据”的。就在仅仅几天以前,米高扬同志在评论李可夫同志的提纲时<sup>178</sup>也谈到这一点,并且给“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加了引号。我起先口头问他,是从哪里找来这个说法的。后来又向他书面提问。我这里读一下给米高扬同志的信:

“尊敬的同志:

由于在你对李可夫提纲的评论中提到似乎是我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给这个词组加了引号,请告诉我,这些词是从我的哪本著作中引来的(请费心指出版本页码等等)。致

同志的敬礼!

H. 布哈林”



米高扬:《到社会主义之路》。

布哈林:你曾口头回答我,是从我的某个报告里引来的,现在你却回答说是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小册子里引来的。然而,对书面问题你根本没有赐答。

奥尔忠尼启则:读一读,读一读。

卡冈诺维奇:读一读。

米高扬:他不喜欢读自己的东西。

布哈林:我读一下我真正写的是什么。但我不喜欢别人乱喊乱叫,妨碍我说话。还是得请你们安静下来,不要一片惊慌!(笑声)卡冈诺维奇同志,不要用大声干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笑声)

昨天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也提出同样的指控,他在犯罪现场被逮住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污蔑有什么根据呢?顺便说一下,我还是得向在这里参加“轻率”争论的所有可敬的同志们说一下:这本小册子写于1925年;就是说,我那时就是右倾极凶狠的化身了?那么为什么你们那时给我加上那么重的担子?而关于右倾却不置一词呢?

奥尔忠尼启则:那时你抛弃了这些错误。

布哈林:不,我没有抛弃这些所谓的“错误”,小册子后来还多次再版<sup>179</sup>。如果那时你们自己真的相信现在的这些废话,那就会高喊救命<sup>180</sup>,这本小册子就会被抛到它该去的地方!但我不想“把问题复杂化”。还是回到被打断的思路上来。

托洛茨基分子从我的小册子中摘引了什么,某些同志又向他们学到了什么?依我看,总的说来,他们从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学到了东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向托洛茨基分子学到了这样一些东西: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抄本重弹反对我们的伪造的攻击之词。他们按照托洛茨基的方式以我现在宣读的那些地方作为依据,这些地方卡冈诺维奇同志昨天在这里也引用过,但故意不把引文读完。我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体系中去……”

卡冈诺维奇:长入体系?

布哈林:等我读完,卡冈诺维奇同志,我不像您,我不在引文上捣鬼,卡冈诺维奇同志!

卡冈诺维奇:可是您同加米涅夫捣鬼。

布哈林:关于加米涅夫,我也要说的,您会看到,谁跟谁捣鬼!“长入到我们

全国性机构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

(鲁祖塔克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鲁祖塔克同志!大家都知道,当你看到多数站在哪一边的时候,你是“奉公守法”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笑声)

接下去是:

“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

卡冈诺维奇:什么体系?

布哈林:我们的国家和合作社机构体系。

卡冈诺维奇:对不起,说的是“社会主义经济”。

布哈林:“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

卡冈诺维奇:某种程度上!

布哈林:“……异物,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这就是1925年我在小册子中所说的!(喧闹声)

听我说,我会回答所有的问题的!请安静一点!别激动!你们会说,布哈林在这里——啊,真可怕!——允许“同资产阶级合作”,同富农合作,他竟允许有富农的合作社窝巢,虽说是异物,但毕竟在这个总体系中活动、存在和起作用……

奥尔忠尼启则:它对不对?

布哈林:等一等!我说我的想法!我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必须保持最大的冷静,尽管他有南方人的气质!(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我认为可以向共产国际总书记<sup>181</sup>提问题,尽管他在政治上已经破产。

布哈林:请用书面提问题,以后如果我有发言的机会,我会回答的。

奥尔忠尼启则:迄今为止我们认为可以提问题,而且不用书面形式。

布哈林:你是在妨碍我发言,打断讲话,就像你身边的朋友那样!

喊声:身边的人没有说话。

布哈林:我必须就这个问题说一说:政治局是否做出过允许富农参加总的合作社网(但不给他们被选举权)的决定?我肯定,这是政治局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我们也允许富农参加合作社网。我们自己在政治局做出了这个决定,而我不能取消政治局的决定。

莫洛托夫:但是也不能歪曲。

布哈林:我也不能歪曲,我可不是莫洛托夫,他可以今天赞成这个,过后又赞同相反的东西!

当然,这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某种合作的一定形式。现在某些人为此而歇斯底里大发作。不过,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的说法,他在确定我国的阶级结构时说:我们目前的制度是建立在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之上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这一合作<sup>182</sup>。列宁说过这话没有?你们为什么要用这来责备我?

或者你们是想既要允许资产阶级,又要使他们处在国民经济之外?也就是完全处于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之外?你们这不过是在玩玩具!这是小孩子的童话。这是苏兹达利的拙劣绘画!

有人说,在我的小册子里(一本旧的小册子,现在根据托洛茨基的忠告就这本小册子发出喋喋不休的议论!)似乎只字未提阶级斗争。但这是更为无耻的污蔑。我不想再念引文了,这里只指出页码:第46—47、53、59页以及其他许多页,国家出版社第2版。想弄清问题的人可以自己去看!

现在我想立即谈谈针对鄙人及亲密的政治朋友提出的所有美妙的思想和政治指责。

伏罗希洛夫:你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朋友!这怎么理解?

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同志请闭嘴!

我想把反对我的所有指责集中在一起。

喊声:说说资产阶级。

布哈林:请安静!请等一等!我都要谈的,我还没有谈到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东西都没有谈。但不要以为我不懂得这些喊声的辅助作用,想把我搞糊涂,你们是办不到的!我想把反对三个人,特别是反对我的所有政治指控集中在一起,指控很多,我试着把它们编成一个清单。请听一听这张清单:

1. 对工业化估计不足;
2. 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业;
3. 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和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反而指望富农;
4. 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
5. 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6. 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

你们瞧,相当广泛的一张清单。

卡冈诺维奇:对你来说,清单是准确的。但是不完全。

臧声:关于德国党。

布哈林:“关于德国党”,这是另一条。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很在行地宣称我这清单是“准确的。但是不完全”。好吧,我应当在这里声明,我所宣读的这几条,几乎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十五大的政纲。托洛茨基的政纲同现在对我提出的指责竟有如此奇怪、如此可疑的“思想上的一致”!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些指责都不是第一次提出,它们全都是从托洛茨基政纲中读到和抄来的,在那里这些指责不是针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而是针对全党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列举这张清单的时候写道: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是沿下列最主要的路线进行的”(以下便是我念过的“指责”的汇总)。

反对派写道:“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我们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纠结在一起,他们依靠官方方针中的这些修正主义倾向,公然要把农村政策转向资本主义道路。”

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才禁止散发反对派的政纲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被宣布为反党政纲;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联共十五大才认定赞同这个纲领的人不能留在党内吗?

所以你们看到,昨天在全会上卡冈诺维奇同志所表演的“绝顶聪明的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托洛茨基的政纲。现在,当重复所有这些无谓的思想,所有这些托洛茨基的污蔑之词的时候,没有援引任何东西,如果引用的话,引文也会在最有意思的地方中断。这表明,说得轻一些,是……某种“思想上的犹豫不决”。

同志们,总的讲,我完全不理解目前的讨论方式。如果须要同别人争论,同他们谈话,弄清什么问题等等,那就应当立足于争论对象的口头或书面声明,而不是捏造。例如,难道可以指责我们反对工业化,反对所采取的速度吗?我们赞同工业化,我们赞同所采取的速度,我们赞同提出的计划,这要说多少次才行呢?我们就此声明过多少次!而大量的污蔑不实之词却滚滚而来。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说话。我们在争论中,在搏斗中有时难免相互使用激烈的言词,但是难道不能遵守最起码的规则,不要互相倾倒入明显的废话吗?而除了发言、声明和文章之外,你们还有哪些反对我们的论据?而如果我,比如说,是古比雪夫,即经济工作者,那我还会有可能说一套,做一套。那时还须要检查工作。但我的全部活动不是说就是写。你们根据什么把在文章中、讲话中所没有的东西强加于我呢?你们大谈杜撰的谎言,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谁需

要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谁也不需要。我们赞成集体农庄，赞成国营农场，我们赞成伟大的改造，我们赞成向富农坚决进攻，要做多少次这样的声明，才能最终中止对我们的诬告呢？你们是否记得，在十五大上莫洛托夫因“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而从右边批评过我？我在什么地方放弃了这个口号呢？请对我说！然而，正确贯彻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是一回事，而用可以说是“聪明”的办法贯彻这一切，则是另一回事，其结果完全相反——贫农吃不到面包，城市缺粮，中农动摇。现在需要的不是大喊大叫和施加压力，而是头脑和计算。现在须要懂得局势的复杂性和经济政策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什么？金属还是粮食？这样提问题是荒谬的。而如果我说，既要金属，也要粮食，就会对我说：“这是折中主义”，“这是二元论”，不，你一定得说要什么，或者是金属，或者是粮食，否则，你就是支吾搪塞，就是玩戏法。

莫洛托夫：多么左的布哈林。

布哈林：“戏法”不错！请试试取得金属而没有粮食，请试试播种粮食而没有金属！让我们面对蒙昧无知的问题提法，这种提法只适用于少先队员，而不适用于经济政策的领导人。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我们经济政策的实质问题。

目前须要把什么突出在第一位？当然是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五年计划。

实现这个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建设任务，要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来齐心协力地提出并解决这个巨大的任务。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理解和思考这样一个真理，即我们必须从既有的经济状况出发，来解决这项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制订大型的行动计划，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在于拥有阶梯，可以沿着这个阶梯登上大型经济计划的社会主义顶端。我们需要的这一阶梯的各级台阶不是腐朽的，不至于使我们从上面掉下来；相反地，我们要沿着这些坚固的台阶越登越高。

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必须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出发，记住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乃是本经济年度。我们正是应当以本经济年度为出发点，无所畏惧地分析我们所面对的远非美好的局势。（来自主席团的插话听不清楚）在发言时间问题上我打算满足同志们的愿望，但不知道能否做到。同志们，你们完全清楚，主要矛头是针对我的。

奥尔忠尼启则：人家不想争吵，应当让他多讲讲。

布哈林：我可以完全走开。

伏罗希洛夫:何苦呢,你说下去!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听得非常认真。

布哈林:我知道,对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派不同的用途。

Ст. 柯秀尔:任何谜语都有谜底。

布哈林:那又怎么样呢?

同志们,现在我来分析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以便采取在我看来解决某些经济任务的必要办法。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所谓经济困难的基础,我认为,就在于基本的经济比例遭到某种破坏,首先是破坏了工业和农业之间正常的比例关系。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出现这种局面不应当理解为我们采取的工业发展速度太快了。前一段时间也许可以这么看。最近的分析表明,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今后的速度,即我们所采取的速度,也许还可以再快一些——我们能够发展,但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即如果我们能够使作为工业基础的农业得到提高,城乡之间有很快的经济周转。

与此同时,由于迟迟不采取某些措施而造成的我们的一系列错误(我认为,属于此类毛病的有:不灵活的价格政策,过去改革前对农业税的过度征收,政策多变,实行非常措施——这在第一轮是被迫采取的,也是先前的错误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禁止商品流通),农业,其谷物部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粮食收获的总量减少了。我在这里重复并强调,是因为这个道理极为重要: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无力实现我们所采取的建设速度;它引起极大的、非常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对基本农民群众缺乏足够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某些改变(关于这些改变我下面还要谈),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会使伟大建设的五年计划成为完全现实的,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是有保证的。

我想谈一下我是怎么看待我国的经济困难进程的。“困难”不是经济学名词,但这是我们大家都在使用的名词,是公认的名词,所以我也就这么用了。

对不断扩大的困难可以这样分析:近来基本建设的大量花费(工业、电力、住宅建设、市政建设、仓库业,等等),是在对农业的许多部门,特别是对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谷物业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投入的。这就是我们目前困难的起点。后来日趋严重的困难,其初始阶段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没有关心我们谷物业的状况,在我国,1)在农业税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2)在价格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3)在农业的各种价格和工业价格间的对比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4)在农业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价格对比方面,谷物业

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就是说,就所有的基本渠道而言,谷物业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由于在我国,我们的计划调节作用不那么强有力,不足以把农民经济(即无数的,两千万农户)直接纳入真正意义上的计划轨道,所以我们这里出现某些生产力从谷物业流失的现象。农民或者不尽其所能扩大耕种面积;或者用谷物去喂养牲畜,而不用于播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改种其他作物。这个生产部门(粮食)陷入了最不利的境地。这倒不是说“绝对”不利。起作用的是相对的数字和相对的数值。正是这一状况成为所有其他状况的出发点。

因此,我国出口的最重要项目之一,农业中的谷物业实际商品价值下降了。我们必须以确定不移的,几乎是铁的逻辑(虽然我们有时没有感觉到),哪怕是自发地提出粮食出口减少的替代品问题。[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自发地或者半自发地提出了替代这个主要出口项目的问题,为的是继续工业化,维持工业的速度等等。]可以用什么来替代呢?暂时可以有两种办法:动用我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就是发行货币。我现在不提在那种局势下做得对不对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那时是半自发地卷入的,但我们卷入了,这是事实。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没有看清谷物业的状况,在一定的时间里是靠动用储备和纸币发行税来维持工业化的。

加里宁:十五大上察觉了谷物不足。

布哈林: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不是在过去几年重视谷物业的状况,在牢固而不是摇晃的基础之上,在经过1—2—3年后能得到大规模的加速建设,不是拥有稳固的国际经济地位,有良好的外汇状况,有黄金,有储备,有出口顺差和国际结算平衡,有稳定的汇率并有平稳过渡到自然的外汇平价的前景,却走向了不可避免的困难。同志们,请注意,困难最清楚地表现出来是在我们一度据以前进的那些资源消耗殆尽的时候,在我们大家都看到不能这样继续前进的时候。这个时刻也就是最困难的时刻。既然出现了这种状况,既然这些困难成了客观事实,我们就陷入了第一轮非常措施。[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重视得不够,我绝对没有突出自己的意思,也不是说在这一轮中我采取了特殊的立场……]

喊声:问题就在于你错过了。

米高扬:好一个预言家!

布哈林:依我看,你米高扬同志才是一个糟糕的预言家。我看到,你在同皮达可夫同志争论时预言得多么棒!

(米高扬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米高扬同志,我可以对你说,看来你对希腊哲学家和犹太预言家的个性很不

熟悉,但对于你不懂得这些东西我并没有责任。

臧声:这就是说预言家的粮食收购工作做得很糟糕。

布哈林:关于预言家问题我要说一下,当我问米高扬同志,莫斯科的粮食状况如何,他解释说,这“没什么”,这是因为人民吃得太多了。

米高扬:不要撒谎。

布哈林:当我在十一月全会前夕问米高扬同志,秋播情况如何时,米高扬同志说:“真是的,你慌什么!农民以极高的热情打着灯笼在连夜耕种!”而实际上秋播面积减少了很多。所以谈到预言,米高扬同志,不管谁的母牛在叫,反正你的母牛是不叫了!

米高扬:总是叫唤我们要完蛋,我们要完蛋。

布哈林: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完蛋。

米高扬:怎么没有说过?没对皮达可夫说过,没对加米涅夫说过,没对我说过吗?

布哈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米高扬:没说过?

布哈林:什么完蛋?我说过,你很卖劲地在干,但你毕竟无法毁灭我们。

(笑声)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巨大经济困难的起点和基础是工农业之间错误的比例关系,如果以大量中农农户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受到压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当前生产资金的短缺。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军事部门历来是纪律和秩序的模范。

没有粮食出口,我们不能从国外购买足够数量的原料和设备。一切都不够,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新建设项目和日常生产、大修和周转资金之间的资金分配只能处于如下状态:用于消费市场和用于农民生产市场这两种市场上的商品都缺乏。这样只好开辟另一个来源:为进口而出口,我们不得不削减消费(出口消费品),这就更恶化了粮食市场的状况。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困难的机制就是这样运转的。这个过程的各种因素沿着无穷的螺旋线互相影响,互相缠绕,而问题在于……

鲁祖塔克:正是互相缠绕。嗯,绕吧,绕吧。

布哈林:你认为,这样说很俏皮?

鲁祖塔克:绕吧,绕吧。



布哈林：我可以完全不讲，鲁祖塔克同志！

斯大林：别理会插话。

乌加洛夫：让人讲话嘛。这些爱争论的新人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布哈林：他们对饥饿问题、对群众的苦难等等的态度非常“认真”。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

米高扬：你并不感到更痛苦……

布哈林：他们当然对认真讨论这些折磨人的问题“非常感兴趣”。（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除了你和乌加洛夫，谁也不干这种事。

布哈林：你为什么要打搅呢？你哈哈大笑，而且打搅！

奥尔忠尼启则：大家瞧，连笑也不行。法律可并不禁止笑。

布哈林：我知道，谁也没有禁止你打司机的耳光。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同志们，如果可以把农业状况归结为一点的话，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述：现在小商品生产者从卖粮者变成了交粮者。因此破坏了结合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市场联系的形式，而它在长时间内本来应当是我们的主要形式、决定性形式。由于卖粮者越来越多地变成交粮者，而出售变成了国家赋役（交纳），所以粮食也越来越多地从商品变成赋役的对象，同时变成货币的代用品和积累的手段。因此它开始“消失”，因为它变成了“统计数字”。而同时，“机关的开支”和取得粮食的费用也随着市场联系形式的消灭而剧增。收集到的每一普特粮食的附加费用急剧上升——特派员的开支，各地巡视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有其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其经济上的“附加费用”。配给原则，摊派原则（随便怎么叫都行），过去和现在无疑都在增加使生产基地继续缩小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作用，它在城乡流通中的作用下降了，并且还在下降。于是，既然这个杠杆的作用削弱了，那么继续加强压制，采取直接的行政命令措施，直接施加压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里也是一环扣一环的。这正是新形式的“非常措施”：所谓捐献、抵制以及一系列其他新的（公开的或隐蔽的）非常措施的根源。

秋播面积缩小是形势尖锐化的一个警报，大家知道，大约减少了3%—4%。我认为，减轻农业税<sup>183</sup>是扭转局势的一个重大步骤，不过我必须公开地说，政治局后来的决定，即一些同志在这里谈到的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再次实行非常措施<sup>184</sup>（其中包括实际上对中农的强行摊派制），使形势急剧恶化了。不能这样来摆脱目前的困境。

我想在这里谈谈，我认为在总计划、总路线（当我们说总计划的时候，我们

指的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框架内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经济困难。波斯特舍夫说什么“戏法”,说不直接回答,等等,而其他同志也在重复这些话。然而问题并不像“头脑简单的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认为总路线和总计划就是我们现在的五年计划(这里包括这个计划的全部基本组成部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业化速度),你们会问我:“你赞同这个总计划吗?”我的回答是:“我百分之百赞同。”

斯克雷普尼克:那你为什么弃权呢?

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我以后再谈,我全都会讲的:为什么,以及怎么样。

我赞同这个总计划。不过,同志们,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个总计划得到执行,为实现总计划应当做什么。我觉得,在政治局多数和我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

臧声:是在少数人那里,而不是多数人那里有分歧<sup>185</sup>。

布哈林:(这些分歧)可以表述如下。现在须要继续做什么?政治局讨论过的五年计划提纲中有一个地方说,须要在新的结合形式下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我向政治局委员们建议(我先把建议提交委员会,然后又提交政治局),把这一点改为两点。我的第一点是:

“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扩大由国家调节的城乡商品流转的基础上,加强工人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作用。”

第二点:

“鼓励和发展工业和农业之间、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结合的新形式。”

我修改的意思是希望重申新经济政策和扩大商品流转。有的同志说:“你想退回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初期的状态,而我们应当向前看。”对此我表示反对:如果我们拒绝谈商品流转,拒绝重提新经济政策(尽管我们在以前的全会上都提到过),而来表述同农村的联系,完全在“新的结合形式”(这首先是预购合同)的基础上谈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我们就会陷入极端片面性之中。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似乎仅仅立足于新的结合形式,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正是我在这里认真地进行分析的、我们现有的种种分歧的根源。那么,在五年计划的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方针的根源是什么?我是这样看的(也许我错了,以后发言的同志可以纠正)。我觉得,同志们对不经过市场关系而影响基本农民群众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了。我可以这样来表述:他们过高估计了直接影响小农和最小农的可能性,他们跳越到我们经济关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去了。正是跳

越。有同志说,这同新经济政策无关。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争论过不止一次,但据我所知,在政治局委员之间没有任何分歧。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的中央全会上,我和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不引我自己的话了。我读一读斯大林同志就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所说的话。他说: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经济政策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经的阶段”。

对!我对此百分之百地赞同。然而能不能从理论上一般地认定,我们已经可以超越这个定义,已经跳出新经济政策的阶段?依我看,不能,远非如此。

臧声:谁也没有这样建议。

布哈林:等一等。

臧声:而你的建议是什么?

布哈林:我认为,远非如此!的确,如果我们大家说,在国外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在英国,甚至在美国,我们都必须经过新经济政策阶段,那怎么用我们目前状况的尺度来衡量呢?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国还将存在许许多多。我甚至可以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许多年内将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决定性的!而既然如此(请试试反驳说,不是这样),既然如此,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社会主义的发展要通过市场联系,通过城乡市场商品流转,那就是说,我国经济中的结合形式的基本路线是市场路线,我国主导的经济作用应当通过市场关系,即通过扩大商品流转来发挥。这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

斯大林:在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条件下。

布哈林:自然,在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条件下。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争论。如果在关键地方发展要通过商品流通,那么请说说,起某些“非常”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削减这种流转,它们从经济观点看是什么意思呢?从经济观点看,它们是极大的祸害,是发展的最大障碍。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系列这样的“措施”(我不讲它们是怎样出台的,这我过去已经说过了),它们强行缩小商品流转,是一种直接施加行政压力的形式,是施加直接行政影响和“命令”的形式。因此我们出现了非法的粮食市场,往往在森林里,或者悄悄地出售粮食,等等。这是不明智地缩减我们的商品流转。这是

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东西？我认为，这是非常消极的东西。既然这是非常消极的东西，那为什么在决议中不说呢？为什么不注意呢？为什么不努力纠正这种状况呢？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只有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已经完成了的发展阶段，才能这样行事。

从十五大开始，我们是否进入了某个新阶段呢？是的，进入了新阶段，但是在什么意义上？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已经结束的意义上吗？是在市场联系已经必须取消的意义上吗？不。只是在以下意义上我们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由于我们经济命脉的发展，由于我们经济的发展，由于政治稳定性的增长，等等，我们从十五大起可以比十四大的决定走得稍微远一些。我们在推广订购合同方面能够往前走了；我们能够也应当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我们应当开始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等等。这一切都对。对待这些事我们是否应当“无动于衷”（这是某些同志对我们信口开河地提出的不公正指责）呢？决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否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是近期内就会结束的问题呢？不，这是今后多年的前景。因此不应忘记商品流转，以及贫农中农的个体经济。决不能说，这是“混乱”和“折中”；如果我说，新的经济联系形式的增长不能也不应当同扩大商品流转的任务对立起来，不能说这就是“混乱”和“折中”。大罪孽、大错误的根源就是这种反辩证法的对立。我们对所有这一切考虑得不够。我们没有充分地纠正自己这方面的政策。我们不善于把发展商品流转同增加直接经济联系的新形式的任务结合起来。因此，我们越来越深地让自己卷进非常措施的机制，妨碍经济发展，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困难。

同志们，我问你们，你们的前景如何？今后将会如何？嗨，很好嘛：我们今天施展全部压制手段收购了供一天之需的粮食，但明天，后天会是什么样呢？今后怎么办？总不能搞只顾一天的政策！你们摆脱现状的长期出路在哪里？

喊声：应当强迫他们把粮食送到市场上去。

布哈林：我知道这种争论的手法：比如，你说粮食收购的数字，人家就回答你：“嗯，嗯，嗯，那你为什么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反对列宁？”<sup>186</sup>（笑声）这是非常不高明的手法。这种赤裸裸的“强迫”口号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足以说明。我从西伯利亚的一家报纸《劳动权力报》<sup>187</sup>（在伊尔库茨克出版）中引一篇文章，它清楚地说明我们现在的状况。这是一篇署名文章，具有指令的性质。署名为卡拉巴也夫。这位卡拉巴也夫同志写道：“对凶恶的囤积者——富农的抵制须要进行到底，把所有的社会组织和贫农中农群众都吸引过

来投入抵制”<sup>188</sup>。下面是加着重号的：

“至于居民自身不协助粮食收购员揭露凶恶的粮食囤积者，又不参与对他们的抵制的地方，则要对整村、整区实行抵制，要对位于这些地区的消费合作社实行抵制。

在这些地区应当使居住在该区的所有人，而不是个别人受到抵制。实施抵制的应当不仅仅是伊尔库茨克联社，还应当有周边的消费合作社和国营商业。

对全村或者消费合作社管区实施抵制的目的是什么？使各组织和全体居民参加揭发个别凶恶的拒交余粮者，影响他们，做到不是在两三个五天周期里，而是在所有时间里都提高粮食收购量。”

接下去：

“对个别拒交粮食者，以及整村和整区实行抵制，是反对破坏城市粮食供应，因而也是反对破坏城乡结合的武器，应当认真采用它，直到能经常获得预期的结果。”（《劳动权力报》第65期文章《加强抵制，认真实施》）

我要说的是，有时候“结合”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为了结合，对全体居民、整个村庄实行抵制。这是通过有组织的破裂来实施的结合！这简直是疯人院！

沙茨金：这是谁写的？他是党员吗？

布哈林：既然在官方报纸上发表指令性的文章，那显然是党员。让瑟尔佐夫同志给我们做出权威的解释吧。你说说，面对这种东西我们是否有责任说：“不要那么激烈，同志们，我们毕竟还没有取消新经济政策！”有人对我说，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开始的，我是在向后拉。但我是从刚才谈到的那种经济的和政治的疯人院往外拉，这就是我要拉的！不从这种地方拉出来，就会错过许多良好的机会，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不可能完成任何五年计划的。按照这种做法，五年计划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变成一部写得很好的文学著作，仅此而已。

分析目前经济现实的困难何在？困难在于，在我们这里，我们前进的真正成分、我们经济—计划调节的先进成分（它们已经成熟了，它们完全切实可行，它们是从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中产生的），同“非常措施”的成分交错在一起，混合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这就是现实生活状况。在党的意识中，在同志们的意识中这些成分经常纠缠混合在一起。比如说，订购合同和农村的抵制。订购合同和农村抵制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订购合同是好东西，订购合同推动我们前进，订购合同不是非常措施。

[卡冈诺维奇：那抵制……

布哈林：请等一等，卡冈诺维奇，凭什么我要顺着你的想法讲，而不能按我的

意思说呢?}

我认为非常措施和订购合同不是一回事。我断定,它们的经济性质和政治性质是绝对不同的。依我看,这次全会的任务应当是,我们要向全党清楚地说明,引导我们沿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前进的东西(订购合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村际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对农民的帮助)是一回事,而应当摆脱、应当结束的“非常措施”,则是另一回事。应当把非常措施同多少直接影响农民经济的、经济上得到论证的、必要的合理形式区分开来。说来可笑,我觉得,十五大提出了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为十五大没有把同农村保持经济联系的进步形式和非常措施混为一谈。十五大没有忘记扩大商品流转的任务,没有忘记合作社,等等。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向我建议:“抛弃弗鲁姆金,声明你没有抛弃十五大的决议”,这简直是笑话:这样写决议太可笑了。也不能这样对待老同志!你们大家是知道的,我在七月全会上对弗鲁姆金的“退回到十四大”的口号说了些什么话。要知道,我提出了一个公式:“退回到十四大”就等于“打倒十五大!”

臧声:不是你。

布哈林:不,是我!请查速记记录……

斯大林:关于富农的书面争论?

布哈林:我是在复述我在全会上说的话,至于你在全会之前所写的东西,我并没有对你的荣誉提出异议!因此,我不理解(或者准确地说,非常理解),为什么要把问题说成似乎我有什么别的看法。我不认为从党的利益看,玩弄这种严肃的东西有什么好处。

现在回到被打断的议论。

新的结合形式——订购合同、集体农庄、村际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周围个体经济的帮助,所有这些自然是我们近期的任务。但这一点也不取消新经济政策,即市场关系。而如果存在市场关系,那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刺激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决不要把个体经济同富农经济混为一谈。你们把我们对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的关怀说成纵容富农。你们谈论加米涅夫文件……然而连加米涅夫文件也说:要整治富农……

斯大林:这怎么叫整治?限制,而不仅仅是整治。

布哈林:是的,限制,但还要整治。要限制,甚至排挤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志们,须要限制它,并且我重复一遍,比限制再进一步,要排挤它,

方针是把它彻底排挤出去。

**斯大林**:不让它长入,而是排挤。

**布哈林**:不让它长入,而是排挤——完全正确,但不是通过“第三次革命”<sup>189</sup>,现在某些人在转向这种观点。也不是通过托洛茨基的剥夺富农,就像现在许多“反托洛茨基分子”所希望的那样。至于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那是荒唐透顶的,因为这种公式意味着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里还有阶级,还有富农。怎么想都可以,但认为在共产主义下会有富农,这就犹如说在共产主义下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那样,是天才的发现。我决不想转向古比雪夫的观点。决不!为什么要把这莫名其妙的发现强加给我呢?

我说下去。如果关怀个体经济,刺激农民经济(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问题,与新的结合形式问题一起是极端重要的问题,那么关于新经济政策也可以并且应当这么说。因为,否则我们就会在另一端遭到失败:我们在一端建立自己集体的房子、梯子和横梁,而在另一端我们又给自己造成巨大的损失,削减商品流转,从而大大减慢一般积累的速度,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成分积累的速度。这里可以回想一下列宁在实物税的报告中所说的话:

“我应当再就个体商品交换问题讲几句话。

我们说流转自由,就是指个体商品交换,也就是鼓励富农。那该怎么办呢?不要闭起眼睛不看这个事实: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富农在这种制度下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发展的地方发展起来。但是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不能采取禁止的办法,而应当由国家实行联合,由国家采取措施。如果你能给国家机器,那就能提高他,当你能提供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富农就会被消灭掉。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商品。如果商品在你手中,那你就掌握住政权,而停止、判断和取消这种可能,那就是取消流转的一切可能,就不能满足中农的要求。”(实物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8卷,第1册,第133页)<sup>190</sup>

我想,重温这些话对我们非常有好处。我们现在对富农采取的影响手段要比十大那时候坚决得多。总的说,我们大大成长了。你们记得,还在两年前我们有过私人资本问题,托洛茨基反对派用这个私人资本吓唬过我们。现在你们再看看这个问题。甚至都把它给忘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经济的和整个经济—国家机关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其含义。政策应当立足于正确的估计,而不是对私有者的惊慌恐惧。

**主席:**还剩下多少?现在是3点钟。

**布哈林:**我请求换个时间接着讲。

**主席:**发言人请求把发言结尾部分挪到晚间会议去讲。谁赞成,请举手。请放下。

现在休会。



## 第五次会议

4月18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同志们!为了真正实现国家计委制订的五年计划须要做什么,这是鲜明的工业化计划,其特点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同志们,我这里故意强调后一点,因为我听到有同志说:“他赞同计划,但反对工业化。”

斯大林:对。

布哈林:也许这种对立在你看来是正确的,但依我看,这种对立纯属无知,因为五年计划是我国工业化的计划。如果从这个五年计划中除去工业化,那说的就是另一个计划,而不是提交全会审议的这个计划了。

那么,从五年计划的观点看,从我国已经形成的经济状况看,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须要做什么呢?我觉得,从我前面的叙述中看得非常清楚,既然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同提高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结合起来。同志们,我认为在目前,在相对急剧的历史转折关头,重温列宁同志的下述原理是有好处的。列宁同志说,在我们的时代之前,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在把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个人刺激同公共刺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跌了跤,而我们找到了这种结合点,首次找到了结合的具体形式,这就是我们叫做“新经济政策”的东西<sup>191</sup>。正因如此,把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同发展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结合起来的原理,以及在贫农中农经济同我们工业以至整个社会主义成分结合的条件下刺激其经济的问题,才成了我们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同志们,如果我们从大问题转向日常经济问题,即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完全具体的经济联结物问题、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阶梯问题,以便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五年计划,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问题、最折磨人的问题、非常复杂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阶级和经济意义的问题,就是粮食危机问题,粮食问题。

这个问题最近一次摆在我党中央,即政治局面前,是不久前的事。像其他一些同志一样,我个人认为,作为某种初步的临时措施(我甚至想说得更清楚一些;不妨叫做非常性质的措施,但不是非常压制的意义),我们可以也应当提出**进口粮食**的问题。

臧声:这是非常措施<sup>192</sup>。

布哈林:是的,是进口粮食。我认为有些同志说得对:要么进口,要么采取非常措施。[一切都很好,很漂亮,可是你却在这里抹黑,说非常措施有缺点,说非常措施虽然可能有某些优点,但总的说来是应该否定的。

(斯大林同志的插话听不清楚)<sup>193</sup>

可是必须考虑到我们急需粮食,没有粮食我们就毫无办法。某些阶层手里有粮食,既然他们不肯自愿地出售粮食,那我们就一定要拿到这些粮食,从而不用进口的办法,而好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要么进口,要么采取非常措施。]

我认为,如果掂量一下这两种办法——进口粮食还是继续实行非常措施(政治局决定继续实行非常措施,我应当预先告诉你们,这个问题不久以后会再次向我们提出来),我认为,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是**进口粮食**。

(主席团有人插话:拿什么去买呢?)

我下面就说。这完全是具体的事务安排。

鲁祖塔克:不全是事务性的。

布哈林:鲁祖塔克同志,不要“太卖力气了”!我必须说一下,不太久以前我们还曾准许为远东进口300万卢布的粮食<sup>194</sup>。这不是5000万普特,但我们毕竟准许了,所以在这里像白雪一样纯洁的“原则”动摇了。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完全否定进口,我们可以讨论进口多少,到哪里去购买,价钱如何,期限如何,等等。

我断定,我们有可能用贷款来购买粮食(有过向我们出售粮食的建议)。我认为,从各种观点看,用贷款来购买粮食比实行非常措施对我们要有利一些。为什么?进口粮食对我们有什么坏处?进口粮食的坏处如下。对我们的坏处是,会有人说:一个农业国家却进口粮食。从国际地位看,这当然不那么好。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国际地位问题,这当然具有一般政治意义及其经济意义,它发出经济状况相当严重的信号。

不过,同志们,首先请告诉我,难道我们的粮食状况对国际资产阶级是个秘密吗?这一点秘密也不是!粮食收购进程不是秘密,购货本不是秘密,粮食困难

也不是秘密。而与此同时,不进口粮食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们的损失是,同我们的全部保证相反,必须再度实施非常措施,使我们的前景急剧恶化。不很久以前,我们还大声宣布,我们将避免采取非常措施。我们面临秋播面积减少的事实。全党和所有苏维埃机关都竭尽全力设法扩大春播面积以弥补秋播面积减少造成的损失。我们做了一件改革粮食税的大事,这是所有同志都知道的,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广大中农阶层保证不采取非常措施。而在大谈一通之后,我们实际上又在有望以春播弥补秋播的那些产粮区实行非常措施。众所周知,我们在乌克兰食言了,在北高加索食言了,我们指望扩大春播面积的主要地区是哈萨克、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而在这些地区,在我们做出全部保证之后,我们又实行了披着伪装的非常措施!

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才同我们结成联盟的农民会作何议论。我们对他说:扩大春播面积吧,而他说:我知道,我扩大了,可是时候一到,又会实行非常措施,从我这里拿走一切。你要农民提高技术,纯化种子等等,他会说:很好,我去提高,去纯化,而你们却来拿走一切。

雅罗斯拉夫斯基:得到我们帮助的农民不会这样说的。

布哈林:如果春播能弥补秋播,我会第一个感到高兴,但我觉得,由于采取非常措施,我们不会有这种增加的。我们不会得到这种补偿的。因此明年农业的基础,秋播加春播,将比今年差。这是什么意思呢?开始了关于小白牛的童话:我们将在同一个圆圈里转——起初粮食收购状况良好,某些同志会说:“瞧,惊慌失措分子,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就如莫洛托夫同志在编辑会议<sup>195</sup>上说的那样;而过了十天半月又出现下降曲线,只会比今年更坏的曲线。我们再次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是进口粮食还是采取非常措施。于是又开始采用非常措施,不过是在恶化了的基础之上。应当提出一个问题:怎样走出这个怪圈。必须走出这个怪圈。必须跳出这个怪圈。必须爬出这个怪圈。如果我们郑重地对待国家的继续工业化,那么我们首先关心的应当是怎样走出这个怪圈,用什么办法挣脱它。

当然,也可以设想,一年之内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会给我们提供一切。但这只能表明不懂得起码的算术。

斯大林:不,不是一年之内。

布哈林:而我觉得须要这样做:须要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发展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农业基地,向前发展,不过,无论如何要保证避免非常措施,它打击了中农阶层,并会最终打击到整个工业化事业。须要采取紧急办法保证有一定

的机动粮食储备,其中包括通过进口,这要做些牺牲,削减一些进口开销;经过这些“火急”措施,继续实行基于坚决抛弃非常措施的政策。我认为,这是把事业推向前进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同志们,归根结底你们应当明白,形成了制度的非常措施(像我们大家过去所说的,像莫洛托夫同志过去也说过的,像米高扬同志过去也说过的)锁住了我们的所有出入口。

[我们大家的出发点,我们没有任何分歧的出发点是:必须放弃这种可能是必然的,但终究是一种灾难的非常措施。]

坚决抛弃伪装的或不加伪装的非常措施,应当是我们政策的最必须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留新经济政策的体系。非常措施同新经济政策是相互矛盾的。非常措施当然就是取消新经济政策,哪怕是暂时取消。作为制度的非常措施是排斥新经济政策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革命法制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今年你用进口粮食来解决困难,而明年你用什么办法解决?

布哈林:我下面再讲。我们需要“真格儿的”、长期的、稳定的和经常的革命法制。经济要求有相当的立法和法律措施,如果法律遭到破坏,经济往往就不能发展。我们必须懂得,如果我们老是说“计划原则”、“坚决合理化”、“评估”、“农艺帮助”等等,尤其是在对农民说这些话,我们进行鼓动宣传,劝说农民更好地耕作,使经营合理化,进行成本评估,更好地计算,以便事先制订出自己的“草鞋”“计划”。但为此首先应当让农民事先知道,要从他那儿拿走多少,在什么期限内,按照什么样的日程安排,等等。

(回答莫洛托夫的插话)我在说到发展的必要性时,指的不是富农,已经跟你声明二十次了?!你并不需要特别好的记忆力就能够记住这一点!

总之,必须有革命法制。当我们自己向农民鼓吹用新的、较为文明的方法去经营的时候,农民现在需要革命法制,没有革命法制他是无法经营的。应当懂得,如果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后天又是另一样,那是我们自己在瓦解农民的经济,不仅是从经济上,也从法律立法上;如果事先不能预见,不能计算,那他就不能进行经营。他会逃出这一部门,到处乱跑:用马车拉脚,搞手工作坊,去城里当小工,到哪儿去都可以,只是不再去种粮食。要求革命法制不是偶然地被提到第一位的,正是在改造时期我们需要革命法制,我们迫切地需要革命法制;它是我们建立某种稳定关系的前提,是繁荣贫农中农经济的某种框架的前提。我谈这件事是因为在反官僚主义委员会上我投票赞同雅科夫列夫同志的提纲<sup>196</sup>,但我关于革命法制的修正案却被否决了。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恰当地改造国家机关,以及正确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严格执行革命法制,以及保持国家机关和国家经济机构的所有环节都必须遵守的法规的稳定性。这些法规不断地变来变去,缺乏起码的稳定性,以及得不到严格的执行,乃是官僚主义胡作非为、机关人员腐化及其不适应改造时期经济需要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修正案被否决,借口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口味:说这是影射非常措施不好。是的,非常措施不好,应当放弃!我们不当规避革命法制问题,而应当以其真正实施为目标。

总之:1)进口粮食;2)坚决抛弃非常措施;3)革命法制。第4条是价格政策问题。这是大问题之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摸索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同志们,我下面先说一下前提,请你们记住,免得千百次地重复。我的出发点是:谈不上“等价交换”,我们在价格中必须从农民那里取得参与工业建设的那份资金。不过,我认为,我们大概须要制定一个较为灵活的按季节、按地区的价格政策。也许这难以做到。我决不敢说我所说的一切都百分之百正确。但我认为应当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这里的问题何在?须要注意,在市场价格问题上,富农、中农以及出售谷物的贫农都是站在卖主的立场上的。我们不能(或者很困难,因为这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到处都实行“阶级”价格。就市场而言,不论卖方是贫农、中农或者富农(他有时不得不出售粮食),他们都对一定的价格感兴趣;由于他们是卖家,他们是不会欢迎低价格的。这是很清楚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比较倾向苏维埃,另一些人不那么倾向苏维埃。但所谓的优良动机在经济关系中,在大规模的经济关系中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其次,现在我们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区执行的价格缺乏足够的弹性,不适应市场粮食的数量。而如果我们能够弹性地采取不同的价格,我们就能够使价格同粮食的数量相适应,避免收购价同“自由市场”之间出现严重脱节,使市场同生产相适应。当然,春天较高的价格使农村富裕阶层获得额外收入;春天的价格比秋天的高,而春天富农手上有较多的粮食。但我们完全可以用相应提高赋税的办法予以弥补。还有一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税收制度,足够正确、足够灵活、能及时察觉农户收入增加的那种税收制度。我要问问你们,如果我们实行较为灵活的按地区、按季节的价格政策,同时看到,由于这种变化我们在一定时期内会不由自主地帮助较为富裕的阶层,不过我们可以安排好税收制度,使较富裕户得到的额外收入,我们能通过我们的税收制度充分回收,这样做有什么危险呢?

奥尔忠尼启则:你认为这样骗得了富农?

布哈林:我决不反对骗一下富农。[所以说,在无法区分富农、中农和贫农,因为他们都是出售粮食的人,都是卖方的时候,我们这样做有好处。我们很难区分他们,可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因为我们可以从税收制度方面把他们加以区别。]就是说,重心在于制定相应的税收制度,而察觉额外收入的可能性应当同较为灵活和弹性的价格政策结合起来。

其次,我已经向十一月中央全会提出,现在再重复一下:我觉得须要更加仔细地查明富农的地区性特征。我们这方面做得太少,因此往往在全然不同的条件下采用划分农民的同一种标准,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的同一种标准。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制订课税定额的时候,结果中央颁发的定额在地方上引起真正的混乱。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没有地区的标准,没有区分不同农民阶层和集团的特殊标准。因此税额和税率不很符合地方的条件,结果打击往往不是落在应当打击的地方。

关于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类措施,已经说过了。

米柳亭:这是中心问题。

布哈林:这是中心问题之一。

米柳亭:工业品,首先是农业机器,工业化是中心问题。

布哈林:关于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品,现在往往有这样的说法,在某地区它们都放坏了。不过必须看到,只有我们的整个关系体系是正常的,才有可能改善我们同中、贫农的关系。你们也许拥有生产资料,但如果你们以非常措施相威胁,那么农民是不会购买生产资料的,因为使用起来不合算。

米柳亭:你们提高了货币价格。

布哈林:因此,这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或从那个角度把事情搞糟,不能一手降低税收,另一手推行非常措施。所有法规的某种稳定性以及农业税在更大程度上的稳定性,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也许为此须要补做大量的工作,而这须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劳动,不过,同志们,你们大家根据经验都知道,甚至在进行这次农业税改革之后,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抗议,因为有许多所谓“不调协”。因此,深思熟虑的税收政策,极为稳定、非常稳定的农业税率,应当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基本的和中心的措施之一。

最后,在涉及这种关系的诸问题中,我要谈谈合作化问题,在这种合作化中的巨大选择性等等。这个题目本身是相当清楚的,在我们党的机关刊物上,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翻来覆去地谈论过了。不过我还是要说,由于非常局势和非常措施,合作社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国家强制的工具、国家“行政命令”

的工具。由于经济政策各种因素的汇集,这种现象是完全“自然”形成的。这种现象应当同非常措施一起予以消灭。这就是我觉得应当采取的措施的大致数目,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稍微不同,准确点说,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我们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同中农和贫农的关系问题。

米柳亭:这是消费观点,而不是生产观点。

布哈林:这里我必须稍稍谈一下“自由市场”问题。我受到指责,似乎我在鼓吹我国的“资本主义市场”。首先,我必须说明,“我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说法,即使我没有说过坚强的国家调节,也只是一种绝对毫无意义的东西。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市场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比如说,即使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即在不受任何国家调节的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在中、贫农与社会主义国有工业之间存在自由市场关系,即使这样,这种市场也不会是资本主义市场,因为国有工厂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而简单的商品生产者也决不是资本家。另一方面,说由于市场的缘故,资本主义关系会(局部地)生长,这是对的;但要把这种类型的市场叫做资本主义市场,那需要非常大胆想象力,或者是不懂得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其次,不言而喻,在我们的条件下谈论“自由的市场关系”,这就等于说“干的水”一样。愿意这么说就说吧!甚至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也不存在自由市场,因为那里存在生产的高度聚集和集中。而在我国,生产更集中,工厂更集中,还可能有“自由市场”吗?“自由市场”要存在,须要有“一点小东西”才行——须要取消土地国有化,须要取消工厂国有化,须要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不多不少!这种“解释”,客气点说,是对什么叫“自由市场”做某种粗浅的理解。我再重复一遍,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具有垄断的集中的工业的那些经济部门已经不存在自由市场了。因此强调“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比赛”,就是不懂得所议论的对象,是关于“干的水”的议论。然而,不言而喻,在我国这些因素还不多,还很少。不言而喻,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强大的调节器;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机关的全部集中的强大力量。不过这是一回事,而非非常措施则全然是另一回事。如果我说不要利用国家—经济机关的集中的强大力量,那我就完全是个疯子,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当然,这支强大的力量是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最强大的武器。但这同采取非常措施,同动用我们庞大的机关的镇压措施相距有十万八千里。说我似乎鼓吹“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比赛”、“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等等,等等,对这种指责我必须坚决予以摒弃。这一切全是紊乱想象的产物。

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并尖锐地强调,决不能以富农来代替个体经济。当我谈

到个体经济时,席上有一些插话。“它是各种各样的。”多谢!非常感激这种“发现”!当然,它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一直说的是农民经济的基本群众,即个体的贫农中农经济。富农经济也是个体经济,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是生长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即剥削雇佣劳动的经济。然而许多人有一种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你一谈发展个体经济,似乎你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同志们,应当看到我国的现实。和反对派的种种神话不同,我国的农村并不是那么富裕的农村。我国的农村多数还是贫穷的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野蛮的贫困。在我们的某些地区,没有马匹的农民占40%,甚至还要多。

柯秀尔:超过40%。在北高加索达到50%。

布哈林:甚至超过40%。请看,这就是我国的农村。从经济观点看,我们的中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悲惨的半贫困者。当然,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中农。例如,西伯利亚的中农不是中央黑土区的中农。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卡冈诺维奇:那富农呢?

布哈林:富农?尊敬的同志,我们的社会范畴是以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作为划分标准的。富农也许并不特别“富”,但如果他经常剥削雇佣劳动,他就是小资本家。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旧争论,并且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坚持这一标准,而不是别的什么标准。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想象一下我们农村还存在的这种贫困景象,看到其全景,然后自问:就这些群众而言,如果我们谈论个体经济及其沿着个体经济的道路发展,请问要达到上层剥削者的地位,还需要多少发展时间?我认为,需要许多时间。这个距离(从贫农和中农到富农)对基本群众来说是非常长的距离,我们绝对无须担心这里会很快生长出庞大的富农阶层。正是这种状况允许我们把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同发展个体经济(在使之不断合作化的条件下)结合起来,同时无须害怕我们公开谈论发展中农和贫农经济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许多“最新”理论认为,这里已经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这里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用尽了”,同这种理论相反,这里还有巨大的发展可能性。斯大林同志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得对,简单的识字、文化上某些起码的改善都会使产量有巨大的增长。如果这在两年前是对的,为什么今天就不对了呢?为什么不把这个“真理”变成我们政策的杠杆之一呢?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



米柳亭:这是谁说的?

布哈林:同志们,我觉得,目前如果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去刺激个体经济,与此同时不断采取措施,通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立强大的谷物生产基地,如果我们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那时我们就会为工业建立牢固的基础,从而创造一切条件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飞速前进。

从这种观点出发,从这种经济方针的观点出发,还有(属于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一个阶级分类的问题。对结合的威胁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它现在也没有消失,有的地方还有些激化,对这种威胁当然也应当从社会阶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很多同志往往认为,好像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值得特别担心的问题。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影响我党的工人阶级的许多阶层中,有一种极为良好的自我感觉,有一种前进的感觉,有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不断发展的感觉,等等。这暂且是存在的。

斯克雷普尼克:怎么是暂且?!

布哈林:我现在就说,为什么我要说是“暂且”。

如果说这不存在,那是可笑的。因为现在的问题跟1921年危机的时日完全不同,也不可能相同。我国阶级力量的配置,基本经济力量的配置与过去完全不同。我们现在没有一蹶不振的工厂,我们现在的工厂是生气勃勃的,我们现在没有生产“打火机”的一蹶不振的大型工厂。这些强有力的大型工厂在发展,我们的建设在前进,问题完全不是因为我国像过去那样,存在着零散的工厂。问题在于,无产阶级所乘坐的庞大的机器,像飞机一样,刚离开地面,发动机就有熄火的风险。危险就在这里。

伏罗希洛夫:然后怎么样?

奥尔忠尼启则:发动机熄火了,还能怎么样。

伏罗希洛夫:然后是灾难?

布哈林:我认为不会发生,因为毕竟有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对的。

布哈林:但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的素质就在于他能看到着陆的状况如何,飞出多远,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如何。

雅罗斯拉夫斯基:你又飞出多远去了。

布哈林:同志们,从阶级力量配置的观点看,我国处于主要地位和软弱地位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毫无疑问,富农现在掌握一定的力量。他们不是“一般地”掌握一定的力量,也不仅是因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成分向他们进攻,

还因为在许多产粮地区我们的非常措施也伤害了中农,而在许多消费地区我们给贫农和部分中农供应的粮食不足。另一方面,现在贫农的状况如何?由于我们帮助他们的规模还不足以立即把大部分群众纳入集体农庄运动,由于还不能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粮食,他们到哪里去寻找起码的出路呢?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是,也必然是按照“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思想路线形成的,因此非常自然,在实行非常措施期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贫农。但这决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即生产问题,因为这只解决一年的问题,解决如何分配在这一年内已经生产出来的粮食问题,但一点也没有解决谷物生产的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做到一年比一年生产得多的问题。与此同时,富农却挨家挨户地分送粮食,建立富农同部分贫农中农的联盟。

现在,当我们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们承认现在存在阶级斗争尖锐化以及阶级斗争形式激化的事实。

奥尔忠尼启则:几个月前,你还就这一点提出争议。

布哈林:没有,没有,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奥尔忠尼启则:争议了,争议了。在起草决议的委员会上争议过。

伏罗希洛夫:你把阶级斗争尖锐化叫做白痴。

布哈林:争议的不是这个问题。有一种理论说,我们应当把阶级斗争尖锐化当做我们改造时期的规律,应当点燃阶级斗争。我把这种原理叫做白痴。这就是我过去叫做白痴的东西,现在也要这么叫。不过,事实是有的,农村甚至存在这样一些阶级斗争的形式,如互相纵火,火灾的数量增加了,杀人案件增加了。我不认为我们喜欢这些形式的阶级斗争,喜欢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化。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加紧进攻富农应当首先在征税方面展开。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使其陷入绝境。

米高扬:[那保护雇佣劳动呢?]那你为什么主张废除富农的个别征税?<sup>197</sup>

布哈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走发展我国经济的所有社会主义形式的道路。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又对我提出同样的谴责:你主张废除个别征税。

是的,我现在也主张废除个别征税。

米高扬:使其陷入绝境!

布哈林:看来,你认为只有个别对待,才能限制富农并且对他课税。

喊声:按照你的看法,可以大规模地干了!<sup>198</sup>

布哈林:是的,可以大规模地,也可以按照法律,还可以把税率提高到高于你的个别征税率。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想只有小孩子才不懂这样简单的真理。为

什么我反对别征税,而主张用较高的甚至非个别征税来取代它,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个别征税意味着地方当局可以随意征税。

伏罗希洛夫:这意味着查明富农并向他们征税!

布哈林:查明富农可以是一两个,也可以是全部;而如果是全部,那就应当向全体征税,而不是挑几个人征税:自己的亲家不征,只征别人的。

伏罗希洛夫:这不好,就是自己的亲家你也该征税!

布哈林:而个别征税的做法恰恰造成了这种现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要同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殊死斗争。在我今天引用过的引文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要用拖拉机等等去打倒几十万富农。这完全正确。

奥尔忠尼启则: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盖拖拉机厂。

布哈林:阶级斗争问题在于我们要拼命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分和我们工业,为自己争得这种阵地,并继续向前推进,把资本主义分子排挤出去,并最后埋葬他们。

臧声:那富农会沉默吗?

布哈林:富农不会沉默,不过富农是居民中的少数,是一小撮。如果执行这样的政策,中农就会站在我们一边,贫农就会站在我们一边,农村无产者就会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孤立的富农作为阶级敌人就会一钱不值,而如果通过“非常措施”以及其他绝顶聪明的东西把部分贫农和部分中农抛到他们那边,成为他们的盟友,那时他们就变成了巨大的社会威胁。

斯大林:可是富农毕竟不喜欢非常措施。

布哈林:富农当然是不喜欢非常措施的。不过,遗憾的是中农也不喜欢非常措施。您没有察觉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全部问题就在这里,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臧声:对富农的新奇理解。

布哈林:同志们,这里有许多发言者对我提出这样的指责。他们说:“很好,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谈过所有这些经济问题呢?”另一些人说:“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不同意见?”

奥尔忠尼启则:说得对!

布哈林:嗯,好的:“说得对!”你们用自己的方法迫使我来向你们宣读我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这还是在七月全会以前,即1928年6月初写的。下面是我给斯大林同志的信的内容。

臧声：什么时候写的？

布哈林：在6月，1928年6月1—2日。我给斯大林同志写道<sup>199</sup>：

“柯巴<sup>200</sup>：

给你写信而不当面谈，是因为我觉得谈起来很沉重，也怕你不会听完。而信你总会读完的。我认为国内外的局势非常严重。我想我们须要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特别是在收获临近之际。集体农庄救不了我们，它们还须要建设几年。我们还不能立即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和机器。如果我们进入新的收获期时同庄稼汉保持极端尖锐的关系，我们在新的运动中就有破产的危险。须要准备，在各方面做认真的准备：在税收方面，在工业品方面，在价格方面，在商品的运输作业计划方面以及作业按地区具体化方面。

而我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大量批评工作。这很好。但我们一次也没有，哪怕在最小的范围内，哪怕在每星期一，我重复一遍，一次也没有讨论过政策的普遍问题。还在全会之前，我曾犹犹豫豫地试图提出普遍问题来，但没有成功。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和全党没有任何完整的计划。我们做得比最草率的超经验主义者还糟糕。

其次，我们在思想上也使党失去了方向……

我们的特殊措施（必要的）在思想上已经变成和发展成不同于十五大的新政治路线……如果必要的话，即使离开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也丝毫不会害怕。但这种必要性在哪里？……

如果全部问题在于富农，那么现在已经被承认为神话数字的这9亿又是怎么回事<sup>201</sup>？既然我们的粮食本来就少，那怎么能说是‘富农控制了’我们？如果全部救星在于集体农庄，那么从哪儿取得供它们机械化之需的资金呢？在我国，要在贫穷和分散的基础上发展集体农庄，总的说来这正确吗？吸收小额储蓄的方针是仍然有效，还是已经过时？也要发展个体经济的方针仍然有效，还是也已经过时？根据新的事实看，你当时曾批评过的И. Н. 斯米尔诺夫的错误表现在什么地方？等等，等等。

不过，这是‘一般情况’。更迫切的是秋播运动的计划。然而，我们既没有路线，也没有共同的想法。难道这不令人担心？我们甚至不再谈这些问题：怕谈，谁都不喜欢吵架。然而，如果连中央思想实验室都被摧毁了，如果相互间不能毫无顾忌地，推心置腹地商量最重要的政策问题，那么情况就危险了。国民经济不是执行秘书。你不能用提交法办去威胁它，不能对它大声叱责。而我们缺

乏深思熟虑。”

“……我向你说过,我不要争吵,也不愿争吵。我非常清楚,争吵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我们全国和我们党目前所处的这样艰难的条件下。

我请你现在考虑一件事:使(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有可能平静地举行;不要在这里制造不必要的裂痕;不要制造唧唧咕咕的气氛(不要以无法容忍地把斯列普科夫打发走的办法去帮忙)。

大会(及中国)结束后我可以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喧闹,也没有任何斗争。

H. 布哈林”

我为什么读这封信?因为有人居然敢对我说:你不光明磊落,你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自己的不同意见,谁也不知道这些意见分歧,说只是由于公布了《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sup>202</sup>,事情才暴露了,揭露了。

而我说,这种指责是不光明磊落的。因为我说过,也写过,也敲过门,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这封信彻底粉碎了一个神话,似乎谁也没有写过,“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有任何意见分歧,因此只是在这种白璧无瑕的“不知情”的基础上……

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

布哈林:等等,不要打断我!……只是在不知情的基础上写了给共产国际各代表团代表会议关于政治局观点一致的声明。

斯图鲁阿:在加米涅夫的信之后?

布哈林:这在任何信件之前。我说了,是6月1日……

臧声:吻合了<sup>203</sup>。

布哈林:既然你们要提起加米涅夫的信,那么那里说的是,我极其激动。

米高扬:什么,这是事实吗?

布哈林:是的,这是事实。

米高扬:那就说说,什么不是事实,否则弄不清楚。

布哈林:同志们,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你们问:为什么你那时要求写关于一致的声明?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声明,我就不能把代表大会开到底。这就是全部要求。我还能有什么选择?我不能把大会开到底,我在那里几乎是单身一人。你们希望我做什么呢,希望我出于个人考虑而不开完大会?抛开大会,最终制造一个世界丑闻?应当这么做吗?我只有一条出路,我也就这么做了。而你们,同志们,却以此为依据提议在决议

中指责我不规矩!

关于经济政策我们也有过较为详细的谈话。例如,幸好我还保存了一张我和斯大林同志就米高扬同志的某些建议而交换的便条。这比我宣读的那封信还要早一些。这是在1928年5月17日。我前面宣读的是6月1—2日的信,而这张便条是1928年5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事,在讨论米高扬的进口计划的时候。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张便条,内容如下:

“我非常害怕下述情况。米高扬的三个便条都有这样的倾向:1)加强工业品的出口;2)抛开作为出口物的粮食(谷物)不管。

结果:

- (1)我们会延长国内的商品荒;
- (2)在国内商品荒的情况下,我们却迫使工业为出口而生产;
- (3)我们不采取措施去发展农产品(谷物)的出口;
- (4)一个农业国却搞工业品的出口。

而应当采取的是另一种做法:

- (1)加强工业化,为国内市场生产;
- (2)使农业工业化,提高其生产率(同时使谷物业机械化);
- (3)为工业化的目的而采取出口农产品的方针。没有一定的农业积累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化,因为机器是不能白拿的,而用一千台木犁也装配不成一台拖拉机。

我很担心下述本质性的缺陷:打算搞的工业化并不同时使农业也工业化,而是使工业脱离农业和谷物生产的稳定,等等。

这种政策只会加深巨大的困难。”

斯大林同志对这张便条加了批语:

“对。米高扬有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它不是来自某种自觉采取的方针,而是来自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经验主义的实际考虑。但这并不可怕,因为米高扬在这里不能决定问题。斯”

这就是对方针可能导致的错误的小小的警告。可以不同意我,可以说我鼓吹的不是地方,但在这些事实面前不能提出指责,似乎谁都一无所知,谁也没有同谁说过,“绝无此事”,等等。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真相!

[斯大林:七月全会之前有过争论,我们不否认,有过各式各样的讲话。]

布哈林:也许我不得不向中央全会散发某些旧文件,它们会说明,这里所提出的指责有多少是正确的。

现在来谈加米涅夫的信。

同志们,我须要说说关于对名声不好的《加米涅夫的信》的指责,你们想必知道,我在正式的会议上已经说过几次了:在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第一次和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我当即承认,在我这方面犯了一个错误,我认为同加米涅夫整个谈话是个错误。但我必须坚决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根本没有的东西强加于我。我完全否认关于联盟的说法,加米涅夫否认这一点,索柯里尼柯夫也否认这一点。[好吧,就算我们都在撒谎,就算托洛茨基说得对,全是未知数……]

斯大林:加米涅夫并不否认自己的信的真实性,而信里谈到了联盟。

布哈林:他在信中两次否认此事,至于说联盟,如果我没有搞错,那不是加米涅夫同志本人笔记里说的。

臧声:是加米涅夫笔记里的。

布哈林:我似乎同加米涅夫“商谈过”改变政治局的组成。

奥尔忠尼启则:那里说,我们宁肯要你和季诺维也夫来取代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布哈林:“那里说”。但我绝对没有义务为那里“说”的每一个字负责……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另一回事。

布哈林:我没有义务!请你们向我解释一下,我同加米涅夫“商谈过”改变政治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说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可能同加米涅夫“改变”政治局的组成呢?

奥尔忠尼启则:说得对,这是件大蠢事。

布哈林:[这是说,我和加米涅夫是在做游戏,或者说我们能够不推翻中央委员会,就用个什么办法改变政治局现在的组成。]我根本闹不懂。

臧声:我们也闹不懂。

斯图鲁阿:那么您去拜访加米涅夫同志是什么目的呢?

布哈林:谈话的目的我已经说过并刊登在红皮书上。我前面给你们读过的信中谈了是怎样对我个人进行污蔑的,当我得知他们也想污蔑我时,我说:“请不要污蔑我。”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你说过“我们宁肯要你和季诺维也夫”吗?

布哈林: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没有讲过吗。你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可以说我在撒谎——这是你的良心问题,但我不能老是重复一句话。

奥尔忠尼启则:这不是重复。

**布哈林**：为什么加米涅夫声明说根本没有谈到联盟问题，而你们不相信他？实际上当然没有谈到联盟问题，不过你们须要建立联盟，于是你们“建立了它”。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有巨大的政治分歧。后来的事变进程证实了这一点。但所有这些关于同加米涅夫联盟的谈论，目的都是为了掩盖正在准备的另一个“联盟”，这就是政治局的某些同志同某些原托洛茨基分子目前正在缔结的联盟。

**奥尔忠尼启则**：举个例子，同谁？直截了当地说。

**鲁祖塔克**：把话说透彻。怎么回事？

**臧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托洛茨基曾经有意见分歧，但后来联合了。

**布哈林**：好吧，可是我同托洛茨基永远也不会联合，因为对我来说，联合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我没有一点点这种联合的政治基础！而请求与我共事几十年的党员不要参与对我的污蔑，我看不到这里有什么可指责的。我的错误在于过于坦率，过于轻信地谈论了某些内部问题，议论了一些人，等等。我从未料到会卑鄙到这种程度，会把这些谈话“记下来”并“加以利用”。

**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的政治局委员是谁？

**布哈林**：这件事我会说的。我现在说的是思想方针。至于思想方针，其中包括反对我们，反对我个人，托洛茨基是这样写的：

“毕竟不能否认，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斯大林学到了一些东西……他针对右派所说的一切言论，已经不止一次针对他本人说过了。他没有补充任何一点新东西。”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给托洛茨基写信说：

“与此同时，在经济政策的许多最基本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大大缩小了。眼下出现了我们同左翼中央建立联盟或其他形式的协同行动的因素。这一点应当坦率地讲出来，并由此做出必要的结论。”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要回到我们党内来，对此我不反对<sup>204</sup>。

**柯秀尔**：这事儿还不清楚。

**古谢夫**：斯大林去找他了？

**布哈林**：你古谢夫同志认为，一定是加米涅夫来找我，因为否则我这个大人物的威望或者官位就会受到影响。我的官气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最近的一篇著作，即告反对派分子书中都写了些什么。他在列举了党内生活的各种事实后说：



“把所有这些事实加以比较,应当得出如下基本的和总结性的结论,即党的政策在十五大以后没有像反对派所担心的那样向右转(见政纲和关于工业问题的反提纲),相反地,在某些重要论点上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首先是联合反对派向党提出的两个中心思想:加快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积累速度的思想,和反对作为蜕化和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危险的农业资本主义的思想。尽管反对派的观点取得了巨大的道义上的胜利,但它的微小的力量与此很不相称(因而也说明胜利的取得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努力),由于党的领导的错误,也由于自身的错误,反对派同在十五大上被开除的时候比较,被抛得离党更远了。”

他们感到自己在道义上胜利了,因而他们……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写的吗?

布哈林:就是这样写的。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反对派分子“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

奥尔忠尼启则:那你认为他们胜利了吗?

布哈林:也不准备道贺。但奇怪的是,连本次全会要直接讨论的问题,即把三名政治局委员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早就有人写到过,而且把开除作为自己最主要的要求。这不是别人,正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奥尔忠尼启则:作为自己的要求吗?

臧声:把话说到底吧。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写的是可以同李可夫分子结盟。

布哈林:不,他写的是别的东西;他是这样写的:“关于同右派的联盟和其他废话。”

奥尔忠尼启则:不对。

布哈林:不是不对,而是对!

奥尔忠尼启则:让我们去读文件。

布哈林:同志们,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说过的东西,我没有必要再说了。我还想简单地说一下关于我在共产国际“不工作”的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关于此事谈得很多。我已经说过,到七月全会前,共产国际六大前夕,在共产国际内形成了一种沉重的、完全无法忍受的局面。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不得不请求政治局(这是我的倡议)向共产国际六大各代表团代表会议发表著名的声明。同志们,我向你们解释过,否则我无法把大会开完。我在那里的处境使我回避接见任何一个来找我的外国代表团。

(插话听不清)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斯大林同志!我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避接见任何外国代表团,在大会期间没有同外国代表团进行过任何单独谈话,尽管表面上我在共产国际六大上起领导作用。洛夫斯顿,一个美国人,在各代表团代表会议上说,实际上在举行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公开的,另一个是幕后的,这幕后的代表大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集团,是反对布哈林的。

这就是大会之前和大会期间的情况,由于这种局面,我才在那时给斯大林写了那封信。

代表大会闭幕后,我就去休假了。在我休假时发生了“台尔曼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台尔曼同志没有就他的内弟维托尔夫在党费上的不光彩行为做出说明;台尔曼同志得知以后,不仅没有向中央报告,却反而提出维托夫作为国会的候选人!而且把无辜的出纳员作为维托尔夫的替罪羊开除出党!这件事台尔曼同志无论是对他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或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没有谈过。显然台尔曼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一般说来,把浪费经费“为了党的利益”(有些人就是这样看的)而掩盖起来是一回事,为自己的亲戚打掩护就是另一回事了,更何况在这之后还要提他做国会的候选人。

抓住这件事的既有右派,又有“调和分子”,还有天知道是些什么人。大家都抓住不放了。台尔曼集团自己也发抖了。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反对台尔曼的决议,并公布在《红旗报》<sup>205</sup>上。不言而喻,这一切对于德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共产党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这时我还待在高加索。我收到一封电报,通知我这件事并征求我的意见。我答复皮亚特尼茨基说:必须向政治局通报,而且在那里事先讨论这件事。我建议,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之前,不要把这件事拿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去。鉴于德国现在的形势,这件事可能造成损害,因为我认为在《红旗报》上公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的答复如下:

“回答皮亚特尼茨基的通知。必须将事件向政治局通报,而且在那里事先加以讨论。鉴于德国现在的形势,这件事可能造成很大损害。在德共中央的决议在《红旗报》上公布(这是一个大错误)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再宣布不同意德共中央是不恰当的。必须由台尔曼本人在报刊上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承认错误(不必通知中央委员会),承认必须将维托夫开除出党。然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才能表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其他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可以不涉及。决不能让自己脱离了反装甲舰运动<sup>206</sup>。同时我建议派一个俄罗斯

人去帮助台尔曼,彻底消除奈曼使德共最高领导精神瘫痪的恶劣影响。请尽快公布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能再拖了。布哈林,28年10月2日”

这就是我对“台尔曼事件”的反应。这里有人说,我想整他一下。而实际情况呢?实际上我是建议承认公布决议是一个错误,建议立即派一名俄罗斯同志去帮助他,建议把事情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你们以为,通知过我吗?什么也没有通知过!绝对没有,虽然这是一件头等大事,而我当时好歹也还算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领导人。

我为这整个事件深感不安,9月7日<sup>①</sup>又发了第二封电报。电报发往两处:共产国际的皮亚特尼茨基和中央委员会的莫洛托夫,因为我想看看政治局做了什么,因为我的建议就是把事情提交政治局。我的电报说:

“我没有收到台尔曼事件的后续材料和关于公布代表大会决议的答复。请告诉我,台尔曼为什么在代表大会期间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隐瞒了这件事。这的确是俄国的经费吗,台尔曼确实知道被开除出党的出纳员是无辜的,而起初却否认自己知情吗?请告诉我决议的草案和委员会的讨论纪录。布哈林”。

我从莫洛托夫那里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他不肯赏光赐复!

莫洛托夫:这封电报是皮亚特尼茨基答复的。

布哈林:显然是因为我还在领导共产国际。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通知我,决议明天见报……

这就是我参与“台尔曼事件”的情况。虽然我鲜明地表示了对这件事的党性的关切,别人却认为可以长时间对我不做回答,然后给我发来了一行字,说是你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伙计,你明天就可以从报上读到了。我想,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任何人都会明白,要我到共产国际去“工作”的种种“请求”究竟是什么意思!

而现在,在事件的最近阶段,3月9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带着全套大牌<sup>207</sup>在政治局做了关于事件的情况报告,但却没有把全部材料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信息取自红皮书,只选取对报告人有利的。如果在中央全会之前有必要把事件移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好吧,——我决不反对。但为什么做的时候不取得政治局的正式允许?为什么关于这件事不通报?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说的是什么事?

<sup>①</sup> 应为10月7日。——编者注

布哈林:说的是我的事,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事,3月9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把这件事转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sup>208</sup>。我说,我不反对这样做,但还是得正式通知政治局。我不会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正式为自己辩护,但我有为自己辩护的正式权利。共产国际不是联共(布)的支部,而联共(布)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程序上我有权利去说明,什么地方不对。

插话:为什么到共产国际去?

布哈林:我实际上不会去控告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即使我认为它在决议中对我极不公正。但我还是有权要求至少应当通知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处理涉及联共(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事务时,可以不告知?我不知道过去什么时候有过这类做法。这一切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都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情和为什么。

接着,——请听我说!——“通报”后过了三天,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sup>209</sup>上,今天在座的登格尔同志(德国人)作为大会代表之一,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我的问题。对此我还是没有得到正式的通知。政治局对此也一无所知。没有经过任何实质性讨论就通过了决议: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布哈林同志继续留在共产国际领导岗位上的”可能性问题……

斯大林: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喊声: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奥尔忠尼启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布哈林:我应当说——我希望斯大林同志予以证实——在俄国代表团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就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集团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我说,在他们破坏了纪律,组织了成形的小集团之后,我主张消灭这个小集团。

斯大林: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能对此负责,因为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知道此事。

布哈林:算了!很好!“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不过也许毕竟有什么人是知道的,这一切都刊登在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在《红旗报》上,并且用的是粗体字。

喊声:这是洛夫斯顿干的。

布哈林:我不知道是洛夫斯顿,还是不是洛夫斯顿;我想,《红旗报》的编辑不是洛夫斯顿,而是别的什么人物。而在这以后,你们今天提出的决议(它今天还具有法律效力)却要求我在共产国际工作!

伏罗希洛夫:你多少时间不工作了?

布哈林:不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不信任你布哈林,我们觉得你推行的是错误路线,让我们分手吧!”——我也建议这么做——却采取了另一种做法。因为首先必须羞辱你、侮辱你、败坏你的名誉、把你踩在脚下,然后问题就不是满足辞职的要求,而是“因为怠工”而“被解职”。这里的游戏是绝对清楚的。

关于右倾危险。

伏罗希洛夫:你多少时间不在共产国际工作了?

布哈林:我在私下谈话时对你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过:如果对你的各位司令说,对全军说,你是凶神恶煞,然后没事似的向你建议:“请吧,亲爱的,去领导这支军队吧”,那时你至少会摇摇头……

我必须就右倾危险说几句话。有人对我说:你在关于右倾危险的决议上签了字,而现在你在表决的时候却弃权,并且是因为关于右倾危险的条款。不过,同志们,问题不那么简单。看到没有,根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以及地方组织的头一批决议,我“在陷入”右派的观点,而现在,虽然我没有迈任何步子,却“已经陷进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我还只是“在陷入”右倾观点。从那时起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什么事也没有干。而现在我已经“陷进去了”。我一点也没有动。但别人却说:过去的提法,那是“已经过去的阶段”。不过,对不起,是谁走过这个“阶段”了?是决议走过这个阶段了,结果却说是我走过了!(全场笑声)这东西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就为了下述原因需要这种东西,因为需要的不是“允许”,不是同意辞职,而是经过这种“陷入”,变成“已经过去的阶段”。同志们,我必须说明,我准备同右倾危险作坚决斗争,但这是指真正的右倾危险。

莫洛托夫:它到底有没有?

布哈林:它当然有,如果没有,那是可笑的。不过,莫洛托夫同志,它并不在你们寻找的地方。

莫洛托夫:那它在哪儿?

布哈林:我给右倾危险下的定义大致是这样的:这是真正反对工业化的人,反对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人……

米高扬:这不是共产党人。

斯大林:你影射谁?

布哈林:这不是共产党人。

米高扬:哪一个布尔什维克会反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工业,如果他反对,

他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布哈林**：问题在于可以用不同的时限，不同的速度等等去搞工业化。谁确实把我们拉回到十四大的立场，谁否定十五大的立场，谁就是右派。但是，米高扬同志，反对皮达可夫—托洛茨基关于矛盾不断增长的理论，反对这种废话的人不是右派。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反托洛茨基主义时期米高扬的观点。

**米高扬**：你不要瞎扯。你善于瞎扯。讲了六小时，尽是瞎扯。

**布哈林**：好吧，我准备听你讲！是的，这些人是右派，必须同他们作斗争。但我一秒钟也不能承认自己是右派。我不能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我曾请求在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中写进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条款，因为决议里关于反对右倾危险谈的很多，而关于托洛茨基主义不置一词。但我的修正被否决，关于也必须同托洛茨基主义危险作斗争的条文遭到了否决！

**奥尔忠尼启则**：同托洛茨基没有办法进行斗争。他在君士坦丁堡<sup>210</sup>。

**布哈林**：谢尔戈同志，请看，可以同托洛茨基进行激烈的斗争，而同托洛茨基主义却不怎么进行斗争。进行前一种斗争甚至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

我现在来做结论。我承认同加米涅夫谈话是个错误。我认为我有权向中央全会申诉，我现在的发言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向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申诉。

我看出来，现在我将被“开除”，而不容许我辞职——以最简单的理由提出的辞职。为什么不让辞职，为什么一定要开除。我服从中央的所有决定。我赞同在国家计委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但我坚决反对在贯彻经济政策时采用“非常”方法。

至于强加于我的其他所谓“错误”，我不能承认这些并不存在的错误，理由很简单，它们不存在。我之所以不能承认不存在的错误并自我污蔑，还因为我认为必须在我们党内捍卫可以思考、可以讲话的做法。然而我们这里往往有这样的东西，例如我们在2月19日的《真理报》上（关于第十二次维堡区代表会议）就可以读到。短评中说：

“关于右倾危险问题有一些旗帜鲜明的发言。代表们要求同右倾危险进行坚决斗争，要求中央对动摇者和调和者、对思考者采取强硬政策。”（笑声）

如果我们党提出“旗帜鲜明的口号”：“不许思考！”我认为，我们是走不远的。在改造时期这是非常“合适”的东西，特别是如果记得马克思曾经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常常进行自我批判。列宁也讲过自我批评，而我们也满不在乎地谈论自我批评。

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人和农民之间可能出现分裂的担心、对与

此相联系的我们党内发生摩擦的担心、对与后者相联系的政治局内部发生摩擦的担心、对这个最高机关的分离和分裂的担心——列宁的这些担心应当引起最密切的注意，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对此进行“思考”。

**斯大林**：可是不要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

**喊声**：对。

**布哈林**：不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但也不要赤裸裸的拳头政策去取代思想和思考！

**柯秀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选举产生的书记毕竟还是有的吧？

**乌加洛夫**：我们知道，你是怎样被选出来的。

**主席**：现在休会。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泽连斯基同志发言。

**泽连斯基**：我非常仔细地听了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布哈林等同志的发言。他们无论是在发言中，还是在2月9日向政治局提出的声明中，都从党现在面临的、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出发。我原来指望，在面对困难时，这些同志会在发言中提出一条明确的加强我们党内团结和消除这些同志同党的分歧的路线。但是在这些同志的发言中，我没有找到这种成分。我要说，他们发言的基调就是继续争吵，而不是消除争吵。为了捍卫自己和党中央的分歧，反对派的发言做了某种分工。托姆斯基同志哭哭啼啼，乌格拉诺夫同志(希望他原谅我)多少有点自吹自擂，而布哈林同志则转入进攻，顺手给许多同志抹了黑，虽然这和事情毫无关系。

我想先谈谈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发言。在谈他涉及的那些问题之前(可惜乌格拉诺夫同志现在不在场)，我要指出，乌格拉诺夫同志大谈自己的功劳、自己在党内的长期工作。我们知道乌格拉诺夫同志的一切长处和优点，可是一个自认为是党的大干部的负责同志用不着走上台来，拿自己的功劳来教训年轻同志。我们在党内工作并不是为了挣点功劳。我们为党工作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党员都应当悉心尽力，因为他是党员，因为他是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奋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全党的事业，都是整个组织的事业，而不是个别人的事情。乌格拉诺夫同志指责中央和政治局，说中央回避提出和解决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虽然乌格拉诺夫同志自己说记忆力很好，可是他的记忆力还是很可怜的。难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不是涉及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吗？

难道这不是涉及我国阶级关系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吗？难道解决粮食采购问题不是最重要的阶级关系问题，难道在发展合作社建设，首先是发挥生产合作社、定购合同的作用方面的一系列措施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吗？难道大规模工业化、难道自我批评不是从十五大以来直到今天我们的重大决策吗？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只有火气十足的人，只有非常激动的人才会走上台来说中央和政治局回避提出和解决重大的社会—经济任务。乌格拉诺夫同志说事情涉及三个重要的党员、三个党的领袖。这是对的，不过既然涉及三个领袖，那就完全没有必要把问题归结为工作制度、领导方法，而不试图揭示分歧的主要根源、性质和作用。正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涉及党的重要政治领袖的事件，正因为党的这些重要领导人许多年来都在领导着党，我们才丝毫也不能认为这里的问题仅仅是领导方法，或是个人之间工作不协调，我们才应当仔仔细细地看一看，这些同志和党中央的原则分歧，其基础究竟是什么。

这些分歧有什么特点呢？我谈谈布哈林同志发言中的两点。布哈林同志详细谈到了粮食采购问题。我差不多是逐字逐句地记下了他的讲话。他从我遇到的困难来谈粮食采购政策，对目前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小商品生产者变成了交粮者。粮食从商品变成了贡品，货币在城乡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作用削弱了”。布哈林同志接着说：“不应当用这种办法来走出困境”。

接着布哈林同志发挥怎样才能走出困境的想法。可是布哈林同志对我国粮食情况和我们粮食采购方法的描述却完全像是在说我们回到了余粮征集制。我想，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和描述，必须坚决驳斥它。现在谈的不是余粮征集制，不是回到国家垄断了粮食，小商品生产者不可能通过市场出售余粮的时期，我们同小商品生产者的那种关系去的问题。相反，现在确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系乃是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的关系体系。我们同农民之间的关系中保留了市场这个环节，所以我们认为必须，也只能加强市场关系中的调节和计划基础。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曾放弃过。

我想谈谈粮食采购的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小生产者和国家采购者之间的关系中市场是不是确实消失了呢？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粮食采购年度的上半年成绩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并不很费劲就采购到了粮食。米高扬同志肯定会在这里发言，他会详细讲这个问题的。下半年粮食采购出现了许多困难，可是应当分析，我们是从谁手里拿的粮食，谁在头半年里是交粮食的人。头半年里交粮食的首先是贫农和中农。后半年发现粮食采购进度很慢，粮食采购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信号。贫农和中农的余粮已经在市场上卖掉了，不仅如此，农村



中耕地较少的那一部分贫农到这时也需要口粮和种子了。这时我们才接触到没有把余粮在市场上出售的那一部分上层——中农和富农手里的余粮。这样就发现了这种困难。事情就是这样的。

不仅是根据我们在中亚采购粮食的些许经验,而且根据哈萨克粮食采购的数字,我要说,在这些地方缴纳粮食的主要农户在很大程度上是贫农。按戈洛谢金同志向我介绍的数据,在高加索北部,每俄亩播种面积贫农提供的商品余粮平均是27普特,中农是26普特,而富裕农民虽然有余粮,提供的粮食却只有31普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某些富农阶层想利用粮食困难来投机,利用粮食短缺,利用饥谨来发财。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许多地方由于去年歉收、干旱和种子不够,粮价涨得很厉害,因为富农利用了糟糕的情况。这样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当不去鼓励投机心理,不让富农有投机的自由,——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对富农说,我们要保留市场关系的自由,可是不让他们拿饥饿投机。当我们对粮食的大持有者采取一定的措施时,这些措施不涉及中农,也不取消市场关系的自由和中农支配余粮的自由,而是针对富农阶层投机情绪的措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是不是放弃过对富农施加影响,是不是放弃过安排和投机活动作斗争呢?这在哪里见过,在哪里写过呢?这在哪儿也没有写过,在哪儿也没有见过。布哈林同志说,现在的最好出路就是从国外进口粮食。我不知道,也许不能不采取这个措施,这是计算的问题,可是我想,不能指望从国外进口粮食,而要在国内得到粮食。从国外进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的不是数量不大的500万或是1000万普特,而是数量大得多的粮食。我们说的是必须动用国家很大数目的外汇储备来进口粮食,而妨碍执行工业化计划。我们能不能这样做,须不须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后果?只能有一个后果——我们削弱同富农的斗争,我们容许粮食的自由投机而帮助富农巩固在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我们削弱了工业化的机会,而且我们在将来也得不到粮食采购、调节粮食市场和粮食供应的坚实基础。我还想这样提出问题:要买,可是有时候是越买越钝<sup>①</sup>。这也许应该少谈。布哈林同志还提出一个能保证采购的办法,作为进口粮食的补充:实行按地区、按季节的粮价。按地区规定的粮价,据我所知,是有的。

米高扬:是有的。

泽连斯基:至于季节性粮价,它规定季节性地提高价格,同时加重富农的税

<sup>①</sup> 原件如此。——编者注

赋(虽然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夸夸其谈地说到革命法制的必要性),这种削弱富农上层的办法会使富农和中农丧失信心,对发展经济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布哈林同志说,我们要靠税收制度使富农走上绝路。谁也不会争辩说可以让富农走上绝路,可是这个办法根本无助于掌握粮食市场,所以也不必把它作为稳定粮食市场的药方。

我还想谈谈结合的新形式问题。布哈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坚决反对关于结合新形式的表述。他们指出,基本的结合形式已经有了,这就是通过市场的结合。这是对的。新经济政策为商品生产者规定了自由流通和社会主义成分通过市场来影响小商品生产。这一切都是对的,可是能不能到此为止呢?难道继续发挥列宁关于结合的基本思想的任何新形式都不应该有吗?我觉得,到此为止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记得列宁在论合作社的文章里说,通过合作社来组织和改造个体农民经济是基本形式之一,那我们就应当坦率地说:伊里奇当时规定的必须通过市场发展结合形式不仅仅指组织销售,组织商品流通,而且指改组农业生产的技术形式本身。

使小商品生产者通过市场服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形式有哪些呢?首先,通过合作化,小商品生产者通过合作社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其次,通过价格调节;第三,通过预购合同和加强计划领导。这是不是和农民经济结合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呢,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呢?是的,这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通过市场的结合形式的进一步新发展。

**李可夫:**合作社出售和合作社交售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泽连斯基:**在合作化和预购合同的条件下,合作社出售和合作社交售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现在能不能在通过市场结合的体制中,放弃加强对农民经济的计划领导,放弃价格调节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因为这和结合的思想并不矛盾。可是结合的基础不仅仅是小商品生产者通过市场的服从;结合的基础是更为深刻、更为严重的改造农业经济问题。我们之所以须要结合不仅仅是为了使巩固小商品生产者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盟有一定基础,而且是为了取得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改造这种小经济的可能性。农民现在需要什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社会主义工业和个别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结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不单是组织销售,而且是改变农业的生产基础问题。农业现在受到小生产的挤压。如果我们说,缺粮的基本原因是市场行情的困难,那是不对的。它的实

质要深刻得多,它在于小生产是脆弱的商品经济,小生产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剩余商品,从分散的小生产体制中我们得不到大量的商品和巨大的商品率,所以我们就不能为迅速提高农业创造条件。

怎样才能消除农民生活的“愚昧”,怎样才能消除小商品生产者的贫困?农民走出贫困的道路何在?这就是结合的关键所在,对此必须注意。如果我们不让农民以十五大及以后的中央全会的决议为基础来改造他们的经济,从而找到出路,那么结合的问题我们就只解决了一半。

现在结合的基本任务在于给它增加一个新基础——为分散的小农经济转向大农业创造条件,并在这条道路上保证农业的大提高和消灭农民的贫困、落后和不文明。这才是现在结合的基础。

主席:泽连斯基同志请求再给他十分钟。

喊声:让他讲吧,给他时间!

泽连斯基:伊里奇向我们指出,如果我们同农民经济结合,同农民群众结合,那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能获得巨大的力量和速度。我们不仅在组织销售和把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看到了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在改变农民的技术—生产基础的条件下看到了结合的必要性,这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村中的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结合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当我们在这一点上同农民经济,同小商品生产者结合起来后,我们就获得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和迅速走向社会主义的巨大可能性。

下面我谈谈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几个问题。

是的,这涉及三四个最重要的党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工作。这话不错。可是我们应当这样来提出问题。现在我们党内斗争所围绕着的根本问题是右倾问题。几个同志都尽力同右倾划清界限。好吧,我们暂时相信,这几个同志和右倾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党内、我们国内有没有右倾呢?有的。这个右倾在党内、在国内表现得很张扬吗?表现得很张扬。在地方上这种右倾的表现是不是每时每刻都能遇到呢?都能遇到。那好,同志们,请你们走上来,坦率地说说,你们怎样对待右倾。请你们教教我们,你们早先是怎样和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倾向作斗争的,也教教我们怎样和右倾斗争。那样你们对右倾的态度就完全清楚了。我们知道,你们工作得很出色,我们知道,你们也善于出色地斗争,那就请你们教会我们同样出色地同右倾作斗争,向我们展示一下你们是怎样同右倾斗争的,展示一下你们认为我们必须克服右倾。请你们坦率地、公开地向党说明,并且用实际行动表明你们对右倾的态度。

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三同志在2月9日的声明中指出,他们没有重大分歧,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农业税和中农问题的决议后,种种分歧都已经成为“历史”了。这很好。可是在同一份文件中却重复关于军事封建剥削的神话,提出了许多问题,尖锐地批评党的路线、中央的路线。如果你们主张我们需要一致,如果你们说没有分歧,那就请你们放弃说我们党对农民的政策是军事封建剥削的断言,说你们的声明是错误的。那才是消除分歧,巩固统一的路线。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无论这些同志在这里怎样说,我们都不能相信你们确实希望消除这些分歧。

关于辞职政策。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事情。托姆斯基同志说,我们不过是要离开。一些政治局委员、最重要部门的领导人怎么可以说——“我们不过是要离开”。

米高扬:是两个人要离开,不是三个人。

泽连斯基:这简直就没有见过。我们党进行了艰巨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们怎么会认为我们都是小孩子,我们会相信,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仅仅因为累了,因为过度疲劳或是因为特别喜爱理论问题,就贸然决定离开了。没有这样的事。专区委员会的书记不会这样离开,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也不会这样离开……

柯秀尔:支部书记也不会这样离开。

泽连斯基:不单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或者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这种离开是政治示威,是不同意中央路线的一种表现,而不能被认为是其他的含义。这不可能有别的评价,因为它的基础是政治上的分歧。在这件事上党不会受骗,这样做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不能容许这样做。他们说,我们离开工作,可是留在政治局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政治局里不需要出主意的汉子,不需要只管批评别人,却对执行决议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人。这样的政治局我们用不着。我们应当做到使政治局把政治领导和在最重要的部门中完成实际工作,以及为这种实际工作承担责任同时结合起来……

喊声:说得对,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实行对党的领导。我们不能把领导权交给那些提出建议,提出批评,就某个问题举举手,而对执行党的决议却不负责任的人。这种事我们有过经验,应该说是教训。

柯秀尔:结果是可悲的。

泽连斯基:现在说说“恶意攻击”。对这一点也有很大的怨气。可是你们也

别向党组织解释中央委员会里发生的事情呀！我应当向中央全会检讨，我不单是干过“恶意攻击”，而且指名道姓地提到一些我知道不同意中央路线的同志。有别的办法吗？人们读到关于右倾的报道，人们要提出问题，他们知道托姆斯基已经半年不工作了，他们知道布哈林已经半年不工作了，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党团实际上是反对托姆斯基的，结果发现托姆斯基原来也反对党团，可是我们却要说：同志们，什么事情也没有，这些人没事儿。这怎么行呢！这样来领导党怎么能行呢，要求我们做出切实的、正确的、明确的回答：领导层发生了什么事，欺骗党是不对的，也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应当公开而明确地说明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们把说明党内发生的事情称为“恶意攻击”，那的确有过这种攻击，而且今后还会有，它是从发扬党内民主而来的。

Ст. 柯秀尔：说得对！

泽连斯基：最后，关于布哈林去找加米涅夫的事。我读到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时，我想也许是加米涅夫添油加醋了。可是当我在红皮书里读到布哈林同志的讲话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发疯了，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些话都是一个思想健全的人说的。

喊声：该送进疯人院。

泽连斯基：我不知道，有时候是会出这种事的。

布哈林同志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太脱离党和党组织现在出现的情况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托姆斯基同志提醒我们：大家还记得伊里奇在遗嘱中对于某些党员都说了些什么吗？是的，我们记得伊里奇的遗嘱。也许还能背出来，可是布哈林同志是否还记得，他说没有政治集团的时候，他去找加米涅夫寻求政治建议和支持的时候，他去要求某种政治支持的时候，他是否记得伊里奇说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他跑去找那些政治上破了产的人，被党开除了的人，反对党的人，伊里奇说过他们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人，跑去找他们要一点政治建议。布哈林同志嘲笑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因为那里的某个区的同志们就“正在思索”的人们做了个决议。布哈林同志如果坐下来多想一想，多读读列宁的书，就会更好一些，——要是这还不够，那就到工人群众中去，不是以宣传员、演说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或是书记的身份，而是去听一听，工人组织都说些什么，基层都说些什么，工人农民过得怎么样，——那他就可以用生活经验，用实践，用基层工作检验一下真实情况。他就用不着去找加米涅夫出主意，寻求政治帮助。我们党的这个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怎么会丧失了和党的联系的感觉，却去

寻求政治上破了产的人的支持？这才是我们应当严肃地思考的问题，这才是布哈林同志的悲剧之所在！他是彻底地手足无措了。布哈林真可怜，也正因为 he 可怜，才必须坚定地对他说：布哈林同志，你走的方向不是你该去的方向。

布哈林同志，还有托姆斯基同志和乌格拉诺夫同志都抱怨斯大林同志的性格很难相处。如果把关于领导方法和体制的所有谈话，把这些长篇大论都解读出来，那就可以归结为，斯大林的性格难以相处，所以同斯大林难以共事。我想起了加米涅夫组织反对派的最初几步棋，那时同一个加米涅夫不说自己同中央的政治分歧，却声称斯大林同志的性格难以相处。结果如何呢？一起反对了托洛茨基，反对了加米涅夫，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斯大林的性格并不难处，可是现在却突然发现难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С. 柯秀尔：性格变坏了！

泽连斯基：问题看来不仅仅在于性格。

关于性格难处的种种议论正是想为表述政治分歧做铺垫。什么叫“性格难以相处”呢？党的领袖比其他人更应当捍卫党的统一和党的意识形态。党的领袖应当更彻底地为路线而斗争，否则他就不是党的领袖了。如果党的领袖发现某个地方出现了倾向，有动摇的苗头，那他就有责任招呼大家遵守秩序。如果他为党的路线而奋斗，有人却反对党的路线，想贯彻有倾向性的政策，背离党的路线，那自然就会出现“性格难以相处”的问题。关于列宁，不是也有人说他性格难以相处，说他是铁腕人物，说他是分裂派，说如果没有列宁，那在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工作要好得多吗？所有这些关于性格难处的议论，都掩盖着希望在贯彻背离党的路线的思想时，能有某种自由。我想，什么领导方法问题，什么提出反对派的性质问题，我们都不妨看做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以便灌输倾向分子的观点。对此我们应当回答说：我们党内没有过这种事，党也不能容许这种事。只有为了党的路线毫不留情地、彻底地斗争到底的人才能做党的领袖。

主席：加里宁同志发言。

加里宁：我想，我大概要讲六七分钟……

喊声：不行。

加里宁：我本来应当在乌格拉诺夫和托姆斯基之后发言呀。可是现在问题变得复杂些了，因为布哈林同志又发了言。至于说乌格拉诺夫和托姆斯基的发言，他们说的尽是小事情。

古谢夫：对了！

加里宁：乌格拉诺夫把事情归结为行政上的过火行为，而托姆斯基是在讲

“历史”。应当说,托姆斯基的发言纯粹是议会里的讲话。它确实是议会里的讲话。他说:“布哈林去找了加米涅夫,那有什么呢,我们还听说加里宁也找过季诺维也夫。”这能说明什么呢?我去过,现在也去,将来还要去。难道问题在这里吗?这里是中央委员会嘛,问题是去干什么。(笑声)

喊声:说得对!

加里宁:假如没有那份文件,布哈林可以天天去和加米涅夫喝茶,谁也不会提出什么问题。为什么托姆斯基想给中央委员们搅混水呢?这不行。

任何一个原则性的反对派在活动的时候,都总是抛开一切个人的问题,而拿出反对派同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之间的分歧。乌格拉诺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说,他们有委屈,他们是老布尔什维克。可是你们不妨换一个方式提问题:过去有过布尔什维克单纯为了私人问题而吵架的吗?什么时候有过呢?相反,各式各样的人,只要在政治上合得来,就成了朋友,可是一旦出现政治分歧,就必然发生个人之间的摩擦。所以应当坦率地说,存在原则性分歧,抹煞它们是不行的。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托姆斯基谈的那些问题我们在11月间解决过,而且解决得多少是顺利的。可是顺利的解决却原来并不妥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可是显然保留了那些分歧。于是布哈林尽量想把这些分歧摆出来。可是我要明确地说,布哈林在这里讲了三四个小时;而别连基对我说,凡是讲话超过50分钟的人都不能对自己的话负全责。(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你就指望自己不做更长的演说吗?

加里宁:要短得多,因为别连基说了,人的头脑可以接受并充分思考的能力只有50分钟。

米高扬:布尔什维克的头脑要长一些。

加里宁:布哈林同志花了三小时谈分歧。可是这些分歧表现在哪儿呢?据我看,他说得很尖刻,说是你们彻底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了。

柯秀尔:对,这是主要的指责。

加里宁:既然有人向中央委员会或是现任领导提出指责说它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了,那他就应当一步步地说明具体表现在哪里。可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在三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一个证据也拿不出来。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却没有任何证据。说我们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的人应当拿出证据来。可是证据在哪儿呢?

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应当最鲜明地表现在哪儿呢?据我看,在五年计划里。如果有表现,那就应该在五年计划里。但是他却说他100%同意五年计划。怎

么能这样呢,一方面提出指责,另一方面又说基本同意我们对五年计划的实际设想?

这就是他的第一条原理,用科学的说法,是他的公理。(笑声)

[柯秀尔:你何必用什么科学术语呢。]

既然指责我们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那去找加米涅夫就是另一种性质了。如果他说,我同你们(也就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分歧比我同政治局分歧要小一些,这就有了真实性和原则性。既然我们倒向了托洛茨基主义,那还能到哪里去找同盟者呢,当然只有加米涅夫了。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要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还能到哪儿去找同盟者呢?于是他去找加米涅夫了。(笑声)

我不仅仅因为布哈林同志去找了加米涅夫就指责他,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确实相信加米涅夫对他来说比政治局的大多数更亲近,那他为什么不去找加米涅夫呢(我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去的),也用不着隐瞒。我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掩盖去找他的事实。既然你认为大多数在原则上离你非常远,那就是找魔鬼结盟你也会去的。不可能有别的情况。不过从这个观点看来,这就不是普通的造访,而是政治的造访了。当然,不是去喝喝茶的问题。喝茶是跟随便什么人,喝多少次都可以的。

就是说,布哈林在五年计划的问题上是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意见一致的。不仅如此,他对我们的整个路线也是同意的。那布哈林同志的分歧在哪儿呢,具体表现又怎么样呢?除了非常措施,布哈林同志什么也没有拿出来。除了非常措施!让我们看看历史。他说,我们犯了错误,去年实施农业税时犯了错误。但是去年政治局是全票赞成农业税的。去年非常措施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政治局全体一致通过的。可是这并不是说我就赞成非常措施。

喊声:漂亮,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加里宁:情况就是这样:要吃饭,要养活工人,不采用非常措施就搞不到粮食……

喊声:对。

加里宁:要买又没有钱。必须搞到几千万普特粮食,不是五六百万普特。总之,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认为非常措施是管理的最佳手段,所以投了赞成票的。没有政治局委员是这样看的,可是一致投票赞成。这不是说,非常措施在我们眼里是一些基本措施呢?没有这回事。有人在这里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改头换面的非常措施”。我们实行是因为这些措施会有一些影响,不过应该说,我并不认为这些“非常措施”会损害到播种面积。为什



么要实行呢？还是因为正在经历粮食困难嘛。〔不过我要说，这些改头换面的措施都是以农民本身的主动精神为基础的，如果地方能够很好地执行，那大家就会相信，这些措施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危害。问题在于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正确地执行。有些地方搞过头了。〕

布哈林同志忘了说一句，完全以农民本身的主动精神为基础的这些措施只在我们苏联的三个地区执行；今年我们苏联的主要地区几乎没有粮食采购任务。

乌克兰今年提供3000万普特，而去年是2亿普特。如果我们注意到草原地区歉收，那就应该说，采购量并不大。

臧声：这是你不了解情况。

加里宁：如果这是我不了解情况，那还是要怪你们，因为你们说，歉收的只是草原地带。

丘巴尔：黑麦和小麦我们少收了三亿多呢。

加里宁：你们单是波尔塔瓦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两省就交了5000万商品粮。谁让你们当时说，可别声张。（笑声）我们从你们那儿拿来粮食，而你们又朝我们要粮食。我们的中央黑土区，你们认为，它交了多少？500万普特粮食。

奥尔忠尼启则：那去年呢？

加里宁：去年至少是4000万。实行余粮收集制时，我们给坦波夫省派的是1800万普特，它交了1400万—1500万普特，可是中央黑土区还包括库尔斯克省和沃罗涅日省呢。

北高加索交得极少。由此可见，如果说我们在执行“改头换面的非常措施”，那也只是在三个地区，而在其他产粮区完全有根据认为有人在把持粮食，农民囤积粮食，或者是歉收比我们预期的要多得多。

如果你们注意到这些事，那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分歧在哪里呢？我真想说，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没有比他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走得更远一些。这篇讲话是折中主义的，尽管叙述得很有条理。〔可以大胆地说，如果这篇讲话里有点滴真理，那它们的表述是很鲜明的。〕如果你解释一下这篇讲话，就会发现这里什么也没有：扣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把分歧归结为粮食采购和政治局一致通过的非常措施，这起码是可笑的。最后我再重复一遍，现在的非常措施只使用在三个地区。在什么地区呢？这是须要说明的。实际上，这些“非常措施”是不会破坏经济的。这些“非常措施”在哈萨克、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实行。可以把乌拉尔撇开，因为那里有许多工厂，所以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投机倒把，不把粮食交给国家。拿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做例子吧。今年我们提高了粮价。西

伯利亚的粮价是不同于中央黑土区的粮价的；它接近战前的水平。可是西伯利亚我们商品的价格却和莫斯科相差不多。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西伯利亚的合作社里堆满了商品，我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西伯利亚那么多的商品。

丘巴尔：我们感觉到了。

加里宁：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的困难，仅仅因为困难才迫使我们采取这些措施。它们实际上不会使农民经济破产，因为我们并没有把种子也收走。所以我认为这个论据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还有一个原则性的大论据，它似乎说明我们实际上消灭了自由市场，不过按我们苏联的理解，自由市场由于有了新经济政策会推动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我想，我们现在经历的粮食危机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歉收，部分地是由于农业税，但是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由于我国的农业太分散，由于我国的农民经济难以置信地分散。我国有2500万农户，农民经济的分散及其落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仅仅靠市场和发挥个体农民主动性的空洞口号，我们解决不了粮食危机，当然不是说像现在那样尖锐形式的危机，而是指一般的粮食问题。

所以集体化问题、农民和城市的新结合问题才从一个新角度提了出来。大家知道，未必有人比我更坚定地赞成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我敢说，未必有人像我这样维护发挥个体农民经济的主动性，以求提高商品率了。不仅如此，我有时候还不得不“捍卫”富农咧。

[斯大林：这是右倾。

加里宁：就算是右倾吧。(笑声)]<sup>211</sup>

反正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捍卫”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反对没收富农的生产手段和土地，难道这就是右倾？我从来不曾把它上升到路线。就是这么回事儿。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每时每刻都能够估计到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我直到今天一直在为发挥个体经济的主动性而奋斗，只要是哪怕有一点点提高这种经济的商品率的可能性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现在贫农和中农希望得到土地，而且这种愿望表露得十分强烈，泽连斯基也遏制不了，农民要求分地，——这种要求从我到他那里去时，好像是在1924年，就有了，每次开会都要求：把别人耕种的土地给我们吧，而这种革命过程也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我们偶尔能够遏制一下，稍稍缓和一下。]

在纯粹是个体经济的基础上现在就来谈大大提高商品率，认为通过市场的主动性就能大大增加个体经济提供的商品量，这在今天就是错误的。所以才提

出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赞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可是问题在于,你们怎样赞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革命性就表现在这儿。我要问你们:你们是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还是带机会主义色彩的人来对待的呢?对我来说,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解决粮食问题(我指的不是配给粮食,而是说能够出口粮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发挥私人的主动精神。这并不是说不须要发挥私人的主动性,我不反对这样做,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为此而奋斗。我是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这儿,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依靠扩大农业——这就是我的提纲的含义。奇怪的是布哈林同志怎么会提起用殖民主义的态度对待发展农业。很可惜,我没有逐字逐句记下他的话,也不打算谈这个问题,因为其他人会讲一两个小时,会同他争论的(笑声),这是理论问题,虽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且决议的实质也不在这里,它是说,只有在扩大农业的基础上解决粮食和原料问题才有保证。在我国条件下应该怎样扩大呢?只有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使分散的小农经济合作化。

关于市场关系,或者说商品关系,反正都一样。难道我们同农民的市场关系、商品关系今天也和,比如说,两三年前一样吗?完全不是那样。它们是全新的。我们现在是和农民签订播种合同,而合同往往是以直接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我们的合同规定的不是金钱,而是某些商品、农具等等。现在合同本身已经不仅仅是城乡之间的交换关系、贸易关系了,它同时也是集体化的最重要因素了。

喊声:这些话都对。

加里宁: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任何提高农民经济的措施都以某种形式和集体化联系着。布哈林同志,这就是基本问题之所在。

主席(莫洛托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你还需要多少时间?

加里宁:我就讲完了。

喊声:请他接着讲吧。

加里宁:不必了,何必呢,我马上就说完了,好东西尝尝就行了。(笑声)如果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你们和我们能说到一起去,那就有了一致,我也不怀疑我们的关系有了改善。这是关键问题。

上次全会上有人说,谁也没有指责过我左倾。(笑声)同志们,这话对:谁也没有指责过我左倾。可是别忘了,当须要组织十月革命起义时,当人数还有限时,我出于谨慎,认为我们可能被击败,我说:“不管,必须起义!”当时就是这样的。现在我说,我赞成发展个体经济,赞成发展这种个体经济的主动性。可是革

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他在每个具体的时间里能够考虑到全部条件。当他感到根据一定时期里执行的路线不能解决问题时,他就提出新路线。而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拘泥于老路线。这就是不革命的表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被指责为右倾,因为他不能在必要的时候起来捍卫革命路线,也就是不能考虑到我们在当时所必需的新事物。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坚决扩大农业,我们需要集体化。没有集体化,在我国条件下我们就拿不到为社会主义发展所必需数量的粮食。(鼓掌)

主席:莫罗兹同志发言。

莫罗兹:现在全党都在紧张地等待着本次全会的决定。我想,我们面临的困难在我们的司令部一致的条件下一定能够克服,这无须多说。我觉得,为了正确地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首先有责任,也有权要求每个发言的人都开诚布公。

我现在就知道,有些同志对我的发言是不会满意的。

喊声:为什么?

莫罗兹:我现在就说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认为我的发言是想随大流。他们会说我想忏悔等等。说到忏悔,首先让我们这些莫斯科的干部表示忏悔的是乌格拉诺夫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我现在就来证明一下。昨天,托姆斯基同志引用了一段《中央委员会告莫斯科党组织书》,不过他只引用了中央委员会说莫斯科委员会没有在路线上把自己同中央对立起来的那一部分。

托姆斯基同志忘了引用《号召书》的另一部分,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投票赞成这一部分仅仅是因为乌格拉诺夫同志同意了。他赞成的这一部分是什么呢?这一部分讲的是(我是凭记忆引用的),“莫斯科组织的个别领导干部动摇了,表现在对右倾采取了调和态度”。

托姆斯基同志自己解释说,他投赞成票是因为乌格拉诺夫同志声明他并不反对这一点。我这样理解托姆斯基同志对吗?

喊声:对。

莫罗兹:那我就要问:乌格拉诺夫同志,还有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你们在投赞成票时,指的是谁呢?

柯秀尔:是自己。

莫罗兹:恰恰不是自己,因为动摇之后,接着就会有组织处理,而他们,大家知道,并没有被撤销领导工作。看来他们指的是莫罗兹、留京、曼德尔施塔姆,也就是那些因为右倾被免去了莫斯科组织里的职务的人。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同志(他没有出席全会),我要说明,他和我们的动摇毫无关系。曼德尔施塔姆同志就他写得不成功的那篇文章检讨了十次。乌格拉诺夫同志总不会借此投票赞成曼德尔施塔姆同志表现了动摇和对右倾持调和态度吧。谁表现了动摇呢?有两三个同志,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省委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上,乌格拉诺夫同志对我们几个同志说,应当发言承认错误,也就是说要忏悔。所以我按照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劝告,认为有必要再来讲一讲自己的错误。[一般说来,我认为忏悔的话说起来是不舒服的,听起来也不舒服,可是既然提到了忏悔的问题,那我就要说,是乌格拉诺夫同志首先让我来忏悔的。他没有来,所以他不能证实我的话。]托姆斯基同志解释说,今天全会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库尔干或是昆古尔的一家报纸发表了关于右倾的错误言论,或是《共青真理报》责骂了工会中央理事会的结果——这样的解释,坦率地说,都是胡说。问题当然不在这里。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在发生党内争论时,必须研究分歧的实质,同时研究这些分歧产生和形成的各个组织阶段。撤换莫斯科组织的领导是我们今天在全会上审理的问题的重要因素。

柯秀尔:说得对。

莫罗兹:我想谈的就是党内斗争的这个阶段。在莫斯科省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之前,为什么,根据什么撤换了以乌格拉诺夫同志为首的莫斯科的领导?为什么莫斯科组织感到忐忑不安?我要说,正是因为当时莫斯科组织的领导干部,包括我在内,在根本政策问题上有另一个方针,而不同于我们全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

柯秀尔:说得对。

[罗伊津曼:你也是的。]

莫罗兹:[我完全不想为自己辩护,罗伊津曼同志,也不想缩小自己的错误等等。]这种不同于中央的方针表现在哪里呢?

乌格拉诺夫同志老是回避这个问题,可是这却是关键所在。[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想归罪于托姆斯基或是其他任何人。]我绝对肯定,是我和乌格拉诺夫同志定下的方针,说党为我国工业化规定的速度太快了。

柯秀尔:啊,原来如此!

莫罗兹:工业化过分了。乌格拉诺夫同志多余说没有这回事。有这回事。你谈花布的问题谈得够多的了。我们的方针就是说我们在电站建设上,在第聂伯建设工程等等上花的钱太多了,而对那些必须的,对纺织工业,对轻工业我们却一分钱都不给。这都是归根到底反对工业化速度的政治方针的一部分。我认

为,这条路线最鲜明地表现在经济干部会议上,柯秀尔同志已经说过了,而乌格拉诺夫同志避开了这个问题。可是这次会议却透露出我和乌格拉诺夫同志是怎样领导的,向莫斯科经济机构的领导人交待了怎样的方针。这次会议的基调,我可以拿现有的速记记录来证明,是抱怨和指责上级机构错误领导和不恰当地分配基建资金。把一切都描绘得很阴暗。乌格拉诺夫同志和我们大家是怎样回答这种言论的呢?

[齐夫里诺维奇:只不过插了几句话而已。]

莫罗兹:是的,只是说了我召开了这次会议等等。50个重要经济干部开会,讲了许多错误言论,却没有一个字加以谴责,哪儿见过这样的事情?]

领导这次会议的乌格拉诺夫同志只是说:“同志们,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声明,我将向中央报告。”

Cr. 柯秀尔:他确实报告了,不过是按他自己的意思报告的。

莫罗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因为我们要巩固自己的阵地……

臧声:对。

莫罗兹:不仅用自己的意见,而且用经济干部的意见来巩固必须削减工业化速度的阵地。

Cr. 柯秀尔:所以他才要开会嘛!

莫罗兹: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乌格拉诺夫同志,现在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完成了莫斯科省的电气化等等。这都是些小事情。关于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发言,应该说,非常遗憾,他的讲话里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都是一个“我”字!

莫斯科组织的旧领导执行错误政治方针的第二个问题是必须缓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有这回事吗?我要说,有。在粮食采购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召开过莫斯科省委常委的闭门会议。这次会上我们不是正确地分析形势,却听到了许多暴动的信息。仿佛全国都着了火似的,而且这种情况也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材料所证实。

莫斯科省委常委这次会议的主调和会上的讲话都是要削弱党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采取的进攻方针。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错误。

我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了解开为什么乌格拉诺夫同志投了赞成票,而我们还是动摇的。在什么问题上的呢?我要说,直到布哈林同志今天发言之前,我们对自己执行的那条路线了解得还是很不清楚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乌格拉诺夫同志不像布哈林同志说得那样清楚,他讲得太庸俗了。]我们还是动摇的问题就是集体农庄的建设问题。说得粗鲁一点,我们对集体农庄持怀疑的、冷

漠的态度。如果把我们在四月全会以前的态度概括一下,那么最正确的说法就是:“想发牢骚”。我们不是特别明确,就是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上对中央的路线不满。七月全会上我们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所以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和斯大林同志谈谈,彻底讲清楚。

这时有各种议论,说政治分歧是可以抹平的,四月全会改正了路线,可是问题在于斯大林不想老老实实在地执行四月全会的决议[所以必须对他加以约束。所以七月全会上许多莫斯科干部的方针就是要约束斯大林]。跟我们说的是,政治局的多数,就是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对四月全会的决议有自己的解释,和我们的方针吻合,而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则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和执行这些决议。

Ст. 柯秀尔:总之是一伙篡权者。

莫罗兹:所以必须对他们加以约束。结果怎么样呢?不是约束他,而是在同他谈话之后,对他和中央的路线进行了攻击。

托姆斯基同志昨天在这里很委屈地说,哪儿见过个别中央委员在党委会上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下评语呢?我要说,在一些区委会上不是给托姆斯基,而是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下评语,而且这些评语无疑带有攻击他们的性质。我想,库利科夫同志和柳廷同志不会否认有过这种攻击。我坦率地说,我也参加了这种攻击。应该抛弃做忏悔发言对于个人不舒服的想法,而坦诚地谈问题。事实就是事实。首先指责斯大林同志执行纳贡政策的是留京同志。我不认为布哈林同志是从留京同志那儿借用来的。在区委常委的闭门会议上留京同志提出了这种指责。是这样吗,留京同志?

留京:是这样,可是完全不像你说的那样。

莫罗兹:不,留京同志,是这样的。你是在这之后同斯大林同志谈的话;怎么会不是这样呢?是这样的。我不是在揭露什么秘密,莫斯科的许多会议都证实了库利科夫同志召集了区干部,对中央进行了攻击。这都是为什么呢?我就是想谈这个问题。这样做就是因为七月全会之后,我们这些莫斯科的干部走出了“发牢骚”的阶段,而进入了“要行动”的阶段,因为继续停留在“发牢骚”的阶段是可笑的。假如说托姆斯基同志和其他人因为对他们的攻击感到委屈,那我要说,主动攻击不是发自中央的。是我们在莫斯科首先发起了对中央的攻击。

Ст. 柯秀尔:说得对。

莫罗兹:而我们之所以主动,正是因为我们中央的政治路线不满。我们的攻击当然不仅仅是针对个人的,不仅仅是对斯大林的,而是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

了,须要改正。在哪些方面呢? 必须降低工业化的速度,缓和对富农的进攻。所以我认为许多同志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现在承认我们的政治路线错了,可是却默不作声,因为怕被人说成是想讨好、想忏悔等等。我认为,我们这些莫斯科的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对所发生的事情有过错,因为,我再说一遍,“莫斯科事件”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中的一件大事。[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这件事中无疑并不是最后一个有过失的人。我不是想说乌格拉诺夫同志操纵了一切,但是他毫无疑问比其他所有跟着他走的同志的过错要大一些。我知道,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得知乌格拉诺夫执行的政策是针对中央的,那他就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是乌格拉诺夫告诉我们,事情不仅涉及三个人,不仅是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还有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和政治局的多数,而反对的是极少数。]

所以我决定要做这样的说明。我想,既然有分歧、有不满,那就应当直接说出来,可是既然有错误,那也应当坦率地说出来。[我要声明,当我读到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之后,我对整个问题就非常清楚了。速记记录里有三个人的声明,说是并没有原则性分歧,我们丝毫不反对斯大林。那我要问,为什么会有这场争吵呢?为了什么呢?我要结束了,我想说,和我一起认为必须支持乌格拉诺夫同志,必须支持乌格拉诺夫的路线和他的无原则性的同志们,由于这条路线是绝对错误的,由于十足的欺骗性,由于这一切必须放弃乌格拉诺夫的这条路线,必须同它划清界限。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主席: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布哈林同志今天没有重复他在今年1月30日和2月9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关于我们党在共产国际工作中的作用和路线的那些声明,可是布哈林同志声称,他完全支持自己早先的那些声明,所以它们也同三个人共同签名的声明一样,依然有效。我想,在提交我们党讨论的这些问题中,这个问题是最严肃、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不能对它保持沉默。应当在这里彻底地分析对我们党提出的那些指责,——严肃而分量极重的指责。

布哈林同志在1月30日的声明中说,“关于共产国际的政策,他完全同意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草拟并执行的”。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近来共产国际的各个党内的右倾和调和集团<sup>212</sup>的各种代表人物都发表言论和声明,说他们完全赞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观点,而且试图按自己右倾的模式来曲解这些决议,为什么在这样做的时候,右翼党的这些代表人物总是求救于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国际形



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大家不妨想一想洪别尔-德罗的声明和他保护右派的宣言(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称为假仁假义的机会主义宣言);洪别尔-德罗的声明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同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表述的原理对立起来。我仔细对比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和布哈林同志最初提出的提纲,我认为必须向中央全会报告,对布哈林同志提出的提纲做了那些修改。

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是一把钥匙,有助于理解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初期的处境,理解导致了必须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代表会议提出由我们党的政治局全体委员签名的声明的那些怀疑。引起困惑的主要问题就是共产国际对待各种集团和派别活动的总路线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稳定。我要说布哈林同志最初的提纲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又由他提交我们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支部讨论,在散发之后,就发现必须对这份提纲做重大修改。

对于主要问题,那些决定整个共产国际及其各党的政策的问题,布哈林同志最初提出的提纲做了不正确的表述,如果通过了它,就会给共产国际规定一条错误的、接近右倾的方针。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声称,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洛米纳泽同志为反对他在底下做了些工作,对他进行了攻击。这话是不对的。洛米纳泽同志的活动是完全公开的,他向我们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支部写了声明,准确地指出了他认为布哈林同志提纲中错误的地方。应当说明,洛米纳泽同志的某些基本观点起初被联共代表团支部接受,后来又被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联共代表团全团所接受,最后被写入提纲<sup>213</sup>。

主要问题是布哈林同志最初提出的提纲在谈到资本主义稳定的现阶段时,有一种欢欣鼓舞的语调。如果我们看一看共产国际通过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最后文本,我们就会看到关于现阶段资本主义的动摇和腐朽的明确表述。应当说,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布哈林提出的,而是在代表团支部会上由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主要论点是:

“这个时期(第三个时期)通过各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动摇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

这就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基本点,它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稳定的第三时期。可是布哈林同志的提纲里没有这一点!所以来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个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拿到了布哈林

同志起草的、对现在的资本主义稳定没有做出列宁主义的正确评价的决议,自然要摊开两手,感到惊奇了。他们听完布哈林同志的说明报告后,互相议论,布哈林的提纲和他的报告是不是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批准发展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和布哈林本人的向右转呢?

再看另一个问题,对党内情况评价和党的总路线问题。我们再一次看到,共产国际在第八部分里对左倾和右倾做出了界定之后,又把基本路线归结如下:

“在存在如此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下,这种种右倾是特别危险的,所以同它们的斗争应当放在首位。”

我再一次强调,布哈林同志的提纲里没有这一点,而这是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必须遵循的总的指示的地方,这也是在代表团支部会上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议增加的。大家想想,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们,他们要同各种倾向,首先是同蠢蠢欲动的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右倾斗争,拿到了布哈林同志的提纲,自然要奇怪地问道:布哈林怎么了,他是不是转到右倾观点去了?毫无疑问,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的,如果像布哈林同志说的那样,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初期对他形成了那样一种“气氛”,使他感到有些尴尬,那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他没有在共产国际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在评价世界资本主义目前的阶段问题上对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一条明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重大问题上他没有为共产党指出一条基本的总路线。因此我们政治局才不得不进行干预。因此在修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把它转到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时,政治局才不得不发表一个没有分歧的声明。这为什么能够做到呢?为什么政治局得以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呢?因为在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问题上,布哈林同志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等人在代表团支部会上提出的对他的提纲的所有建议和修正。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消除了分歧,既然在此前的联共七月全会上就我们的国内工作达成了一致,政治局就有权,也有责任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发表一个政治局内没有分歧的声明。

这本来是可以不谈的。错误的提纲、错误的疏漏等等难道还少吗,它们靠集体工作来纠正,靠集体工作来制定适合各种主要问题的正确路线。问题不在于布哈林同志的提纲里缺少应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所有问题的基本方针,他既然接受了这些观点,就可以认为这些错误都由他本人消除了。可是现在布哈林同志把自己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立起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们完全有权明确地说,当布哈林同志试图绕过政治局而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不报告政治局而直接提交共产国际主席团,只是

在事后才交给代表团支部,他就犯了原则性的大错误,我们出席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做了许多工作才纠正过来了。

布哈林同志说,现在的路线已经不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了,就是说,共产国际不执行积聚力量的路线。我要指出,指示各国共产党执行积聚力量的路线也是布哈林同志的最初提纲里没有的,也是代表团支部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补充的。在谈到对各国共产党的评价和指出德国共产党的形势的地方,代表团支部提出了下面的建议:

“因此彻底地同右倾作斗争(现在的生产监督的口号、抵制红色工会国际<sup>214</sup>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对社会民主党左翼持调和态度等等),无条件地克服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同时吸引党内赞成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埃森代表大会<sup>215</sup>决议的优秀力量参加党的负责工作,坚决实行党内团结的方针,团结现任领导的所有力量,巩固其集体领导的性质(少数无条件服从多数),是当前的主要任务。”这也是布哈林的提纲里原来没有,而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由代表团支部增加的。

这个建议说了什么呢?它指出必须积聚力量和团结领导。这是基本方针。这是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令。可是这个建议也指出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克服右倾。而布哈林同志在他1月30日的建议里,后来三个人(布哈林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支持下)又企图撕毁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这项指令,把一部分同另一部分对立起来,他们忘记了必须团结力量、团结领导,正是为了击破右倾,——他们这样做符合代表大会的路线吗?

就要休会了,我也不能指望延长我的发言时间,所以我不能指出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的其他缺点了。当我们的路线在共产国际内在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得到执行时,它是正确的,而现在布哈林同志试图把自己和全党、整个政治局对立起来,而且不仅在苏联的工作中还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这表明,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提纲草案中表现出来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在共产国际能不能执行列宁主义的路线也没有足够的保证。所以应该说,如果布哈林长期不在共产国际工作,原因不在于不让他工作,不在于攻击他了,不在于决定问题时他没有参加,在他休假时,在决定关系到德国共产党的生命的问题上,没有等他的回电,而在于他有一条不正确的、错误的、倒向右倾的方针,这个方针在他起草提纲时已经有了,现在已经查明了。显然,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路线是正确的,而布哈林是另一条路线,错误的路线。在这方面他也和在苏联的工作一样,滑到了右倾。

由于我们现在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我们应该注意到,布哈林同志确实不可能

在共产国际的问题上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不仅要解除他的职务,而且要指出他的右倾,指出他袒护各国党内的右倾,必须把他免职,而且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

共产国际的问题十分重要。必须提出保证共产国际有正确领导的问题。

主席:在宣布休会之前,让我读一下下面这份声明: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尊敬的同志们,从布哈林同志的发言中可能得出一个印象,美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情况的决议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或者联共(布)的领导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动提出的。

与此相反,我要声明,无论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还是联共(布)的领导都与此毫无关系。实际上是美共多数的领导提出了这项决议,共产国际代表团并不知情。

致共产主义敬礼。共产国际出席美共六大的代表但格尔。1929年4月18日”

明天第一个发言的是卡巴科夫,然后是施米特。现在休会。

## 第六次会议

4月19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卡巴科夫同志发言。

卡巴科夫:在党内情况的问题上,几个同志的举动和行为不能仅仅通过从各处抽出来的一些小事情来看。对党和中央应尽的重大责任有一个范围。这首先就是党的统一,它对中央委员,特别是政治局委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责无旁贷的。正是履行这些重大责任的情况应当是评价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行为的标准。布哈林同志向我们保证说,他不会和党作斗争,也不打算成立派别集团。托姆斯基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他把自己比做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兔子。他没有进攻,可是,请看,他却要被处死,而且无处可逃。这样的声明仿佛是从根本上防止了对党的统一的侵犯,并且排除了种种担心,可是除非认为托姆斯基同志的抗议是真实的,否则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扮演角色可以有不同的办法。为此不须要有特别高的智慧:多一点想象力,稍稍有一点幽默和尖刻,这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讲事情。而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向党提出的根本问题不是笼子问题,也不是兔子问题,甚至也不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磕磕绊绊的问题;不管他们是不是愿意,他们提出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党的命运、党的统一问题。这个问题既然提出来了,那就不能用什么放弃派别斗争的声明来抹煞它、掩盖它。他们把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来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在判定一个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行为是否正确、正派和忠诚时,应当不是看他怎样讲述个别牵强附会的事实,而要看主要的东西:在极其复杂的当代环境中,一个政治局委员是否维护了党的统一,是否为此而斗争过?中央委员应当维护党和党的决议,这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因为在一个半农业国里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除了能够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之外,还可以使其他异类阶层积极活动起来。

从另一方面来看,从维护党的统一来看,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等同志做

得如何呢？我只举一件事做例子。假如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党团拒绝了党中央的决议，那又会怎么样呢？那是不是意味着团结和巩固了中央的威信呢，或者这样的表决结果会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呢？而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希望的就是否决中央的决议，希望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党团否决中央的决议。不妨想一想，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我国的工农群众会看到什么事情呢？结论是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用不着抱怨各个地方迫使投票反对中央决议的那些代表放弃错误，用不着抱怨各个地方对投票反对中央决议的那些代表采取措施。实际上这就是有意继续反对中央决议的斗争。我们基层选派代表不是为了反对中央，不是为了动摇党，——我们的代表到莫斯科来开大会是有肯定的方针的：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中央的周围。这就要求每个党员维护党中央的决议。只能这样提出问题，特别是在现在的复杂情况下。可是事情却成了这样：这些同志不仅在这里投票反对中央的决议，而且在各地鼓吹，向群众散布他们怎样投票反对中央的决议。托姆斯基同志可以在这里讲关于兔子的俏皮话，可是这不过是号召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反对中央的一个信号。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参加工作，不担任选举产生的职务，他们的摆挑子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谦虚、恭顺，实际上却是指望积聚力量反对党的一种有力手段，也是要把反对政治局的斗争继续下去的一种表示。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发言，还有跟着他们的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发言，毫无疑问贯穿着的精神不是为统一而奋斗，恰恰相反，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动员了他们的全部智慧，尖刻、挖苦的所有武器，把这一切都用来反对中央领导的统一，反对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志。

我们应该这样来对待这个问题：政治局委员在现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是把全党团结在中央周围的基础。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看政治局的举动，看它是不是竭尽所能来维护党的统一，那就应该说，政治局为维护统一尽了力。布哈林同志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在中央全会上对决议投票时，一个字也没有对中央说过他有分歧意见，他对事态有另一条路线、另一种观点。他签署了向全世界发表的声明，说政治局是一致的，同时他又去找了加米涅夫，对他说：“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其实是党中央的路线）对整个革命是致命的，执行这条路线我们就会垮台”。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是知道这次谈话的。他们也没有对中央说过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不对。他们不向中央说出这个秘密，却到加米涅夫那里去抱怨、去哭诉，讲了许多坏话，让他相信可以指望什么、相信反对中央的力量正在集聚起来。这不是一个小错误，

特别是它发生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来开会的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在这个时候宣称,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执行的是一条致命的路线!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符合政治局委员称号的大错误。

政治局的反应是什么呢?建议布哈林同志承认错误,承认和加米涅夫会谈是政治错误。接着决议说,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包括速记记录在内,都应当撤销,换句话说,这件事就画上句号,结束了。这就是政治局的建议,它只能说明政治局对党的统一的全面、深刻的关怀。可是布哈林同志是怎样回答的呢?他在自己的建议中指出:不对,这不是政治错误,只是在同加米涅夫同志过于坦率的谈话中犯了个错误而已。我觉得,现在连少先队员都懂得,这不是普通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错误。

政治局在维护统一方面尽了全力。政治局表现了空前的温和,我担心,如果这种温和真的实现了,那对它所可能包含的后果也应当认真地考虑考虑。如果一名政治局委员可以犯这样的错误——在最高领导机构内违反纪律——而且得到的只不过是向他指出这是政治错误,那我们还能期待我们有百万党员的党的每个成员能做出什么举动呢?这只能表明一个党员在领导机构面前,在全党面前的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被合法化了。问题就是这样。

现在谈谈在这里向我们讲述的纲领。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党的统一呢?托洛茨基指责党蜕化了,投入了资本主义的怀抱等等。托洛茨基同党的斗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现在托洛茨基主义要瓦解社会主义建设战线,进行反革命活动,发动力量来反对党。现在没有人争论,也没有人怀疑托洛茨基主义是第三种势力的旗帜,现在每个工人都懂得托洛茨基主义正在把一切反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党,反对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

布哈林同志走得比托洛茨基更远。他指责党搞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而且打算用实例来证明。为此布哈林列举了许多政治家,据他看来,这些人都滑到托洛茨基主义那边去了。他的整篇发言都贯穿着一个愿望,就是给全体政治局委员抹黑,向党、向全国表明:请看,领导共产党和全国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党内搞的是两面手法。决议是做给全世界看的,实际上执行的完全是另一套政策。

这些指责是在中央全会上抛出来的。如果读一读红皮书里刊登的宣言,那里白纸黑字写着,我们有的不是党,不是党委会,而是斯大林,全党都站在他身后,执行他的指示。党竭尽全力仅仅为了实行“贡赋”理论。地方干部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硬塞给他们的。这就是对党提出的指责。对于形容党的领导的那

一段应当怎样理解呢？在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三同志的宣言中是不是能听出托洛茨基对党的描述呢？如果再加上我们不当采购粮食，而应当进口，不当发动农民群众来战胜富农的反抗，而要发展自由的市场关系，在产粮区放弃粮食采购的争论，那就可以看到使我们为我们共产党的统一命运担忧的种种问题了。

这张很不完整的问题清单仿佛并没有明确提出应当怎样行动，但它仍旧是反党的积聚手段。它特别能激活农村的富农阶层起来反对党。我认为，同志们，把对党、对党的任务持这种观点的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留在共产国际和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岗位上是如何不行的。

我觉得，在目前这样非常复杂的形势下，在我们需要党的统一意志，须要把我们全部力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持这种观点，抛出这样的纲领让广大群众判断就只能是规避一个政治局委员的直接责任。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都提出了这些同志是否能留在政治局内的问题。现在中央全会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说在中央全会之前还可以有怀疑，要斟酌这个结论会不会错了，那么在听了整个纲领、整套同党在目前最困难的条件下制定的路线对立的观点之后，就不可能再有动摇了。我们举一个小例子，看看观点是怎样变化的。不久以前，好像是在2月初，也许在1月底，我和李可夫同志就粮食采购问题谈过一次话。这次谈话是由于很严重的情况引起的：在年中时给我们增加了700万普特的粮食采购任务。每个州、每个区都知道我们的任务是4200万普特，现在要增加到4900万普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困难很大。我们把问题提给了政治局，可是被拒绝了<sup>216</sup>。投过两次票。和李可夫同志谈话时，我指出，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完成这个计划是很困难的。可是他对我说，你们在这里要求降低计划，要求不要提高粮食采购计划，可是请你们看一看，普斯科夫省在流行坏血病，乌克兰在挨饿，到处都感到对工人的粮食供应不足，而你们却来对我说，希望不要增加粮食采购计划。就这个问题我和李可夫同志谈了一个多小时；可是李可夫同志坚决地封了口，声称我们必须完成采购任务。显然，我只好提出种种后果的问题。采购4900万普特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得不动用苏维埃社会的全部杠杆来对商品生产者施加影响。我对他解释说，这就是要把合作社的全部机构拉进采购工作中来。这就是说，要动用整个苏维埃机构，动用所有的杠杆。我得到的回答是：“必须采购到粮食。”那就可能要启用非常措施了！可是他说：“你们注意一点，注意纠正，不要采取非常措施。”问题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当时李可夫同志提得对。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过了两个月，粮食采购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请



看,在中央全会之前,从全苏联收集了十份声明,散发给了中央委员,而且说:大家看吧,某某村发生了过火行为,某某村采取了非常措施等等。可是究竟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因为采取了非常措施?过火行为大部分不是我们苏维埃机关,而是贫农和中农群众采取的,因为吸收了广大农民群众来参加粮食采购,粮食采购运动也不是单靠苏维埃机关的努力,它也是靠农民群众的努力来开展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于贫农和中农经济来说,不是漠不相关的。我认为,在现时的条件下,用不着指责采取了非常措施,这种指责是多余的,也是有害的。可是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却采取了这种指责。

我还有一些问题,可是我的时间完了:我就此打住吧。

主席:施米特同志发言。

B. 施米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提出了许多指责,其中有一条的矛头无疑是对着李可夫同志的。他指责李可夫同志说,在讨论人民委员会第二季度的预算时,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出有5亿卢布的缺口,李可夫同志在有外人参加的情况下讨论这样重要的问题,却没有事先请政治局审议。

我首先要指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提供的材料是不正确的。人民委员会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也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讨论。我们是在主席会议<sup>217</sup>上研究支出计划时,讨论预算情况的。主席会议是经政治局批准的机构,成员有全体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以及政治局专门决议规定的几名同志。所以这个机构的人数是非常少的,按照政治局的设想,它应当事先审议所有重大的经济问题,以便政治局在决定某个重大经济问题时,能有这个机构,即主席会议事先提供的结论。所以最初把这个问题提交主席会议,然后再提交政治局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李可夫同志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讨论了什么问题?我们讨论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提出的报告,说我们的预算可能出现缺口,财政人民委员部计算的缺额是4.5亿卢布,而按皮达可夫同志的计算则有将近5亿卢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由我任主席,委员有:布留哈诺夫、皮达可夫、赞格维尔和克维林。这个委员会应当审查这个问题并确定,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预计的缺口的可信度有多大,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委员会里争论得很激烈。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一些数字,而国家计委和工农检察院提出了另一些小得多的数字。国家计委认为,总缺口不会超过1亿至1.2亿卢布,而工农检察院认为会达到2亿卢布。我们委员会没法取得一致意见。很明显,预算的缺口是由于我们酿造的酒精不够,没有完成计

划;缺口还由于许多税收不足,由于冬小麦的订购合同须要补充支出,由于要支付出口亏损,因为我们不出口粮食,而出口其他商品,以便增加我们的外汇储备。这方面的缺口有1亿卢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措施来补上这个缺口。我们提高了伏特加消费税,这个建议我们起初向主席会议提出了,然后又向政治局提出了,政治局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sup>218</sup>。提高伏特加和啤酒消费税总计提供了9500万卢布,把我们预算中最起码的缺口补上了。再次讨论时,财政人民委员部认为这项措施还不能解决问题。委员会继续工作,又一次发现预算里可能出现缺口。经过仔细计算,仍然有5000万卢布的缺口补不上。提出了许多建议。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计委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把这个观点带到了主席会议上。主席会议又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至少是多数人,一致认为,这个缺口只有5000万卢布,只占我们庞大预算的不足1%。在70亿卢布的预算中总会有一定的机动,到年底时这个缺口就不会有多大威胁,而且可能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就被补上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计委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个缺口要大得多,不同意会上提出的建议。按照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有人可能会以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降低工资的建议出自李可夫同志。这个建议是皮达可夫同志提出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从我的报告里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

**施米特:**你把这个问题讲得十分含糊,给人的印象是在党内的意见分歧中,李可夫同志可能利用了自己的地位和苏维埃机构。所以我认为必须向中央把问题说清楚。

皮达可夫同志提出了降低名义工资的问题,他的出发点是我国发行的货币太多了,所以我国正在出现通货膨胀,虽然速度很慢。卢布在贬值,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工资支出上节省一些,那就可以少发行一些货币,卢布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工人因此不会受到什么损失。李可夫同志当时就这个问题指出,这个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它不可能被我们接受。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也指出,这样的问题应当直接由政治局来讨论。请大家说说,既然连不做记录的、小范围的会议上都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而要由政治局直接讨论,那苏维埃机构还怎么能正常工作呢。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甚至做了这样的决定:“建议施米特同志商同皮达可夫同志和布留哈诺夫同志将有关预算情况和信贷制度的材料分送主席会议各成员,以及苏利莫夫同志,同时指明只准许主席会议成员使用此材料,不准让他人阅读……”因此这是遵循了保密的一切条件的。像预算缺口这样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建议只能在小

范围的会议上,在对会上发生的一切绝对保密的条件下加以讨论。这方面的各种措施都采取了,所以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多余提出指责,好像我们是在公开会议上讨论过似的。[大家都出席了,都听见了,可是却搞这么一场大惊小怪的事来加以利用。]

**雅科夫列夫:**弗鲁姆金同志在会上提了什么建议呢?

**施米特:**弗鲁姆金在会上提了什么建议,就请你,雅科夫列夫同志,来说吧。据我的记忆,弗鲁姆金在会上提了增加食糖消费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提的)和实行一次性税制。这些都没有被接受,因为我们都认为5000万卢布的缺口无论如何都不能使我们去采取这样紧急的措施。

还有另一种情况,我们根据内外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意见,决定实行限制粮食消费和购货本制度。这个问题在政治局受到严厉批评。据我记得,斯大林同志称这是对工人实行非常措施。结果是政治局不得不接受内外商业人民委员部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因为粮食的情况是,假如我们不采取限制措施,我们现在就要困难得多<sup>219</sup>。如果要问,既然连人民委员会都不能在小范围内讨论这样的问题,那苏维埃机关又该做些什么呢?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这里说的那样,没有一个苏维埃官员会讲出自己的意见。他会害怕提出任何自己的建议供人民委员会或是别的机构讨论,因为他提的任何建议一旦错了,就会给他带上倾向的帽子,或是说他背离了党的路线。在这种条件下,苏维埃机关能够正常工作吗?我们把事情导向哪里呢?导向官员按上级的命令办事,自己不动脑筋。官员连做梦都在想怎样使自己摆脱干系,只消执行上级的命令,自己什么都不用想,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他想点什么事情,提出什么建议,就会给他带上倾向的帽子,或是指责他不执行党的指令。]内部环境导致每个官员只顾自己的地位,——而你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官迷……

**斯图鲁阿:**你把什么人称为官员呢?

**施米特:**我国的官员有党内的和非党的。那些在我们的苏维埃机构中工作的……

**斯图鲁阿:**党内的就不是官员了,如果他是官员,他就会被清除出苏维埃机关,被开除出党。

**施米特:**在这次全会上,你们将要通过反对官僚主义的决议。你们将要通过清党的决议,提纲里讲得很清楚了。在我们这儿,在共产党员中间官员多得数不胜数,要想隐瞒是可笑的。

喊声：嗨，什么样的官儿没有啊！

施米特：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要是环境就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这里说的那样，我们在苏维埃机关工作就十分困难了。

斯图鲁阿：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里面有官员吗？

施米特：既然你愿意知道，可以告诉你，要多少有多少。我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员。

斯图鲁阿：就是说那里挑选干部没搞好。该把他们撤职，派上优秀的干部。

施米特：这是个人品质问题。

斯图鲁阿：你把自己叫什么，官员？

施米特：也是官员，因为我是按党的意志在苏维埃机关工作的。

斯图鲁阿：这很糟糕。

施米特：是好还是坏，要靠党来判断了。是党派我干这件事的。如果党说，我能胜任工作，我就去干。

如果我们也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那样提出问题，那我们当然是完成不了工作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执行五年计划这样规模的巨大工作。我们必须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必须动员我国的一切长处来克服面临的困难。在这种条件下能够为实现五年计划而工作吗？我要说，不能，因为人人都害怕讲话，因为在不断地寻找错误和倾向。在这种条件下是没法工作的。

在这种条件下，在面临困难的环境中，如果我们党内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团结和统一，那我们是不能实现这项工作的。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发了言之后，在他承认了自己去找加米涅夫是一个错误之后，承认五年计划是党的基本总路线之后，表示他将为实现五年计划……

[波斯特舍夫：同时还倒向了托洛茨基主义……(听不清楚)]

施米特：[波斯特舍夫同志，]你当然可以不信任布哈林同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上共同工作吗？如果一个同志在这里讲话，而你们不信任他，那就没法工作。

[伏罗希洛夫：不知道他会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说些什么。]

施米特：既然布哈林同志承认了自己去找加米涅夫是一个错误，难道你们认为他还会去找他吗？

鲁祖塔克：已经去过一次了，很难相信他不会再去第二次。

施米特：这太可怕了。

伏罗希洛夫：除了加米涅夫，他难道就没有别的朋友？

施米特：难道你们对布哈林同志就缺乏起码的信任？简直可笑，既然你们连布哈林的这个声明都不相信，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斯图鲁阿：有进化的规律。

施米特：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同志当然没法工作。

雅罗斯拉夫斯基：可是我们是不是在滑向托洛茨基主义呢？

施米特：布哈林同志在这种条件下没法工作，尽管他发表了声明，尽管他有知识，他也不能为党带来他本该带来的好处。何况昨天加里宁说是他赞成发展个体经济，甚至是富农经济，说他并不害怕这样说之后，再谈这些就是很可笑的了。昨天有人给他插话：“这是右倾”，他却说：“那好吧，我并不害怕右倾，你们给我扣帽子吧。”布哈林在这里说：“只要党中央认为须要，我准备竭尽所能同富农斗争。”——可是没有人信任他，而对加里宁的声明却视若无睹。当然，谁也不会给加里宁扣右倾！

斯图鲁阿：格鲁吉亚有一句谚语：我信你的赌咒发誓，可是你的尾巴让我感到惊奇！

施米特：加里宁可以这样说，布哈林这样说就没有人相信他。这简直没法工作。我们须要竭尽全力来共同工作。我们只有依靠团结才能完成面临的艰巨任务。许多同志忐忑不安地在想，怎样解决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问题。如果只是在简单地把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开除出去的层次上解决问题，许多人回去时是会提心吊胆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这样做。相反，我们应该尽力把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保留在政治局内，因为在布哈林同志发言之后，我们无疑会在党内散布巨大的疑虑。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不能保持党内必要的团结，树立统一意志来实现五年计划呢？

喊声：施米特，你说说，政治局是在滑向托洛茨基主义吗？

施米特：不，同志们，我们不能这样做，将要决定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应当考虑国内的形势。

喊声：别昧着良心说话，瓦夏，请你坦率地说，我们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主席：施瓦茨同志发言。

施瓦茨：我昨天非常认真地听了布哈林同志的发言，他讲了我们的总路线、农业政策和国家工业化。尽管他在这里赌咒发誓，可是我心里却一直相信（请他原谅我），他说的不是那么回事。福音书上说……（笑声）

柯秀尔：你说，你说，福音书上说什么？

喊声：你最好是引用圣经。

臧声：没关系，谢苗，说你的！<sup>220</sup>

臧声：在哪一章里？

施瓦茨：“不是每一个喊上帝的人都进得了天堂的。”

臧声：福音书太旧了。

施瓦茨：没关系，有时候也不妨引用一下福音书。当他在这里发言，做理论分析的时候，他归根结底说的不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是个体经济。

臧声：是按福音书上讲的吗？

施瓦茨：不对，是布哈林的福音书。当有人给他插话：“关于粮食是怎么回事呀？”他非常生气地做了回答。可是问题正在于粮食，这是回避不了的。他还引用了伊里奇的话。我们都知道伊里奇是怎样提出问题的，他说，阶级的爱是不会仅仅因为眼睛漂亮就给你的。

臧声：这就是色情了。

臧声：一见倾心嘛。

施瓦茨：是的，不过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苏维埃制度下，连个人的爱情也不会白给的。（笑声）

我到乌拉尔转了一圈，走了十家矿山。全会以后我就要结束乌拉尔之行了。同别的地方一样，那里也有粮食问题。

既然我们的方针已定，我就试图说服工人（成绩很大，可是不知道今后会怎样），我说，德国的工人是在替资本家干活，开支里也没有多少粮食，他们没有奶油，只有人造黄油，他们的孩子没有牛奶和鸡蛋，等等。可是，同志们，我总觉得有些心虚，甚至是很心虚。

我事先就知道，工人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他们怎么能不同意呢？可是过了两三个星期，他们的孩子一直在为面包而吵吵……

臧声：你别扯这些生活琐事。

施瓦茨：可是我总得告诉你们，我也和卡冈诺维奇一样，在乌拉尔的草原上跑了500俄里，在那里看到了没有收割的和没有脱粒的粮食。工人也看到了这些大粮垛。他们怎么说呢？“谢苗同志，你是个好伙计，可是你仍然是个王八蛋。”（笑声）[粮食还是扔在地里呀。你对我们说，伊里奇讲过同农民结合什么的，还有阶级友爱等等。这些话都很好。可是，伊里奇讲结合，而当农民不给我们粮食的时候，他就去拿，我们用刺刀拿到了粮食。对了，是用刺刀拿到的。]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来了一通理论上的胡说八道，可是他并不是要搞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调教富农。他要的不是工人的平静，而是富农的平静。这就是

从他的一套理论里得出来的结论。靠这一套我们是走不远的。

米高扬同志也许是个糟糕的计划工作者、糟糕的经济学家。可是如果把十个布哈林那样的经济学家放在他的位置上,如果他手里又没有基本的工具——粮食,[他有的只是货币,]他会怎样调教这2500万个体农户呢?如果农民仍然不愿意拿出粮食来呢?

奥尔忠尼启则:农民到那时也不会同意拿出来的!

臧声:搞一个假协议吧!

施瓦茨:可是假如农民就是不肯拿出粮食来呢?假如就是不愿意呢?他该怎么办?他会不会想一想农民的心态,还有我们应当首先关注的工人的心态呢?不行,这不是在为总路线、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奋斗。我这是嘴上说说,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实际上你想的是另一套,那他们会怎样办呢?应当考虑考虑,怎样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市场。正是为了这个我们才需要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能给我们提供粮食,有了粮食我们才能调节市场。你说,我们应当放弃行政手段,而采用经济调节。可是为什么你不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呢?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那就正是在于我们放弃了实物税(他曾经是调教农民的一种工具)之后,没有很快地认识到该抓什么。因为我们不曾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富农就试图调教我们了。

我也和大家一样,遇到过小市民,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谈话。如果你今天去问一个富农:“一普特粮食多少钱?”他头也不回地从牙齿缝里回答一句:“八九块吧。”我检查过,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今天富农就是这样调教我们的。

应该想一想阶级结合,可不是同富农的结合。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工人阶级。可是你并不这样想。你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不触怒富农为准则。[你只能怪罪自己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的结果就是这样——你用自己的方针解除了党和工人阶级的武装,解除了它反对农民阶级的武装。]你的方针是有害的!

在工业问题上你也是以不触怒富农为准则。这里又遇到了“贡赋”的问题。去年我走遍了顿巴斯<sup>221</sup>,现在又去了乌拉尔。谈问题不仅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际上,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和你工作得怎么样?可以说很漂亮,再好不过了!可是你是《真理报》的编辑,你哪怕是提过一次应该怎样工作的问题吗?伊里奇一再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就出版节写过,是在1921年。他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你不妨想一想。斯大林同志是对的,他说必须消除这个“贡赋”,党也接受了这一点。否则怎么办呢?不错,现在该提出巩固结合的问题了。而为了消灭这个“贡赋”,必须按另一种方式工作。[我们缩小“贡赋”的范围,如果

说征税,也是一回事。你不要“贡赋”,我们要。不然怎么办呢?或者如你所说的,应当把我国看成欧洲资产阶级的市场,用不着盖什么工厂。第聂伯建设工程算什么呢?第聂伯建设工程是十几个亿呢,是这样的吗?

**奥尔忠尼启则:**你说说,为什么是十几个亿?

**施瓦茨:**为什么?因为要利用第聂伯建设工程的能源,就得有大工厂,为了这些大工厂,还要盖别的大工厂,还要建金属矿、煤矿,这不是得十几个亿吗?从哪里出这笔钱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的。

**奥尔忠尼启则:**英国皇帝会给的。

**施瓦茨:**对了,英国皇帝会给的。既然是这样,那就该实话实说,用不着兜圈子,直接提出问题嘛。(笑声)别跳芭蕾舞呀。]而你并不想和我们一起工作,说的是工业化,实际上你是在反对工业化。

现在我就找加米涅夫一事谈一谈。他们想把这事抛到一边:有什么大不了,他去找了加米涅夫,原来以为加米涅夫也会反对他,所以去请他不要这样做。

同志们,这太不像话了。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政党,不能容许这样对待问题。这对于年轻人是一次非常不好的教育。加米涅夫昨天还反对党,反对苏维埃政权,走上大街去造反,你却跑去找他,向他哭诉。是谁呢?是布哈林!

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加米涅夫做了那些事之后,尽管他现在还是党员。我宁肯付出极高的代价,也不会同他见面。

**洛佐夫斯基:**不付代价也是可以做到的。

**施瓦茨:**同志们,我想,事后才来说一句,这是一个错误,这样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是不行的,特别是作为我们的领袖。这不像话!这对党、对工人都是一个恶劣的先例。

最后一点意见是关于纪律问题。(主席摇铃)我就完了,只有几分钟。

他们在这里声明说,形成的条件让他们没法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托姆斯基同志关于缅仁斯基同志和亚戈达同志还说,他们也没有就阿扎尔事件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报告呀,为此应当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不知道,按照我国的法律,军事部门是不是也应当每天报告?

**奥尔忠尼启则:**应当。

**施瓦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显然,按照军事纪律,因为职务过失是要关禁闭的。

**奥尔忠尼启则:**假如你遇到了暴动,你就什么也不报告吗?

**施瓦茨:**看来,这种事可以作为失职,给予纪律处分。(笑声)可是,不执行



苏联最高机关的决定该怎么办呢？我国的最高机关总要算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了吧？对于那些不执行决定的政治局委员该怎么办呢？这好像不是失职，而是不执行命令。该怎么看呢？这不禁让我想起往事，不是现在的事，而是旧事，是1911年流亡国外时候的事。我们几十个流亡者在巴黎的一家小酒馆里开会(笑声)商量问题。是的，同志们，我们在小酒馆里聚会，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了<sup>222</sup>。

[喊声：喝酒了吗？(笑声)]

施瓦茨：不，没有喝酒。(笑声)]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对孟什维克的小册子做出应有的回答，那本小册子叫《党的摧残者还是拯救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马尔托夫<sup>223</sup>写的。在那里开会的布尔什维克(有几个人今天在场)决定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来回答孟什维克分子。我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个晚上，结果是大多数决定，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要由他去回答。尽管他一再向我们证明这样决定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坚持了，而且决定要他去回答。他向我们证明，没有必要去找那些站在街垒另一边的人。我们却一再声称要他去。他走了，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送来一封信，说明为什么不须要去找孟什维克分子。可是你们知道他在信的最后是怎么写的吗？他说，他服从我们20个流亡者的决定，去找孟什维克分子。服从我们20个流亡者，而且是我们错了！可是我们第二天早上，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放弃这个决议。(笑声)我们承认他是正确的。可是，同志们，他仍然服从了我们20个流亡者，服从了我们的决定。这是在流亡期间，在处于地下的时候。

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政治局委员不是失职，而是不执行最高机关的命令。让他们自己说吧，现在该怎么办？

主席：库利科夫同志发言。

库利科夫：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建议开除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

奥尔忠尼启则：在哪儿写着呢？

库利科夫：写在党的某些州委的决议里——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而泽连斯基同志昨天在这里发言时，为了说明对这些同志、对三名政治局委员的“攻击”是正确的，声称今后还将继续这种“攻击”。显然，按照你的意见，如果一个政治局委员今后错了，那他就会立即遭到这种猛烈的“攻击”，直到把他开除。

臧声：说说你是怎样攻击的。

库利科夫：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它首先就会破坏我们党中央的威信，然后就会……

臧声：说说你是怎样攻击别人的！

臧声：库利科夫，你自己就攻击过！

库利科夫：破坏我们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喧闹声）还有另一种建议，不妨叫做和解建议。建议说，如果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承认错误，那就恢复他们原来的工作，而且把他们留在政治局内。我觉得，这个建议也包含着虚伪。说的是：“如果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承认错误”，可是他们错在哪儿呢？请看，要他们承认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了宗派“同盟”是错误的，承认“在困难面前当逃兵”是错误的，承认“保护资本主义分子”和“抹煞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以及形形色色的胡说八道。

臧声：阶级斗争也是胡说八道？

库利科夫：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可是不是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错误。我觉得，这些指责是从托洛茨基分子那儿借来的。难道这些指责不正是为了把这些同志开除出去而杜撰出来的吗？

安采洛维奇：你自己不是就在中央全会上承认了错误吗？

库利科夫：你们破坏这些同志声誉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齐夫里诺维奇：那你破坏谁的声誉了？

库利科夫：齐夫里诺维奇同志，你破坏了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誉。

卡冈诺维奇：那你破坏谁的声誉了？（喧哗声）

库利科夫：谁不知道，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一贯站在加紧发展社会主义成分的立场上？布哈林同志已经在这里证明过了。

谁不知道，这些同志赞成发展重工业，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谁不知道，这些同志赞成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原则和同右倾危险斗争的原则？

安采洛维奇：从哪儿看出来的？

库利科夫：这些同志从来不曾赞成过抹煞阶级斗争。不错，他们也从来不曾赞成过人为地煽动阶级斗争。

奥尔忠尼启则：谁也没有赞成过。

库利科夫：我想，这不是他们的错误，而是他们的优点。同志们，当然可以给倾向涂上任何色彩——右的，或者随便什么色彩……

齐夫里诺维奇:右可不是色彩。

库利科夫:这样来对待那些同志对不对呢?他们提出了促进个体农民经济——贫农和中农经济——发展的问题,使我们有更多的商品粮,能够切实保证向工人和贫困农民提供粮食,向工厂提供原料,摆脱在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困难必然增加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一系列非常措施和国内不断暴动的基础上,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觉得,这不是右倾,而是必须看到的现实。你们可以指控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犯了“右倾”,可是我以为,这并不能缓解我们的处境,这里的关键是党的日常领导方法(虽然有人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不是这样的,可是我认为就是这样的)。党的日常领导方法中缺乏灵活性,它本来可以把党的整个领导集体团结成一股创造性的力量,而和种种对“铁腕人物”的信任对立起来,鄙弃形形色色的随心所欲、粗暴和不忠诚。”

齐夫里诺维奇:这已经过时了,托洛茨基分子就这么说过,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吧。

库利科夫:斯大林同志说过:“我们党是一个活的机体。和其他任何机体一样,党内也在新陈代谢:旧的、腐朽着的东西衰亡下去,新的、成长着的东西生长和发展起来。上上下下都有人衰亡下去,上上下下都有新的人成长起来,把事业向前推进。我们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今后它也将这样发展。”(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总结)<sup>224</sup>

在我看来,如果党内的新陈代谢按照正常而自然的秩序进行的话,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

斯图鲁阿:这取决于胃。

库利科夫:可是你们能不能说,从党的领导中开除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是在等待开除的队伍里)是正常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呢?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你们是否认为这种事情是正常的……

安采洛维奇:生物学的观点!

库利科夫:就是出席区党代表会议,甚至是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的为数很少的经济干部,几乎一个个都被开除了莫斯科省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

安采洛维奇:这是挑拨离间!

库利科夫:你们是否认为,对我们党的优秀干部,对我们的好同志,而不是坏同志,持这种态度是党内自然的新陈代谢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些事情说

明的不是党内自然的新陈代谢,而是人为的过程。我觉得,它的后果是……

**苏霍姆林:**你生物学学得很好,但糟糕的是忘了列宁主义。

**库利科夫:**同志,请你对我说俄国话!……它的后果是,即便不是全党,那也是它很大一部分积极的干部可能会袖手旁观,而不再是一个积极行动的党员。这在我看来,是应当及时预防的。你们想谴责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可是为什么不愿意认真地对待问题,揭示问题的实质呢?为什么就不能严肃地对待,譬如说,党的日常领导的方法问题呢?许多同志显然感到,这些方法并没有包括团结领导成员的所有因素。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人人都感到这一点,可是为什么不能说呢?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谈谈。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说过,没有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莫洛托夫、加里宁,我们就不能领导党。这是在十四大上说的,现在则讲的是另一些话。现在是要把三名同志开除出党的领导。

**喊声:**我们建议他们去工作!

**库利科夫:**1928年七月全会上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肯定了我们——莫斯科的旧领导——可以继续领导下去,而实际上仿佛是听从自我批评精神的指挥(笑声),而且是在有些人缺席的情况下,把一些人开除出了这个领导层。

**喊声:**你不高兴了?

**库利科夫:**问题不在于高兴还是不高兴,问题在于这种领导方法本身。

**喊声:**你说说你的领导方法吧!

**喊声:**为什么群众不支持你呢?

**库利科夫:**第三件事:有人说,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想工作,不服从党的纪律,不愿意工作。

**斯图鲁阿:**你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库利科夫:**事实是在败坏这些同志的声誉,造成一种这些同志没法工作的环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是事实,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这些事实恰好说明,在党的日常领导方法中不应当有必须把某某人开除出政治局的情况,而应当有更多把党的领导团结起来的成分,这样今后才不至于有开除的事。

这种领导方法也反映在基层组织里。波斯特舍夫同志在这里气势汹汹地主张开除,而且威胁说,今后如果你们要……等等。可是波斯特舍夫同志自身又怎样呢。我来读一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根据波斯特舍夫同志的报告做出的决议。决议很长,我不读全文了,只念含有指令的那一部分:“党组织应当警惕地

注意在背离党的总路线的基础上的种种违反党纪的倾向,即使是最轻微的倾向……”

臧声:对呀!

库利科夫:对的,我也同意……“注意组织上闹独立性的种种苗头,即使是最微弱的苗头,注意种种打击,哪怕是悄悄地打击党的组织领导及其机关的企图,即使是十分谨慎的企图,注意这种种现象,以及仿佛是维护党内民主,实际上是掩盖背离党的路线的偏向的言行”等等。

臧声:对呀!

库利科夫:我知道,不单是哈尔科夫州的组织里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很普遍。可是它说明什么问题呢?按照这个指令,只能说,今后看你们谁还敢批评党的机关!

斯图鲁阿: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歪曲!

臧声:这是随心所欲的解释!

库利科夫:结论是:看你们谁还敢批评党的组织领导!

安采洛维奇:别歪曲,库利科夫!

库利科夫:谁要是想批评,——你们就注意,这是掩盖右倾。这就是这个指令的含义。我觉得,它违背了我们关于自我批评和党内民主的决议。不妨说,它就像吊在主动精神上方的一块大石头,同时也助长了扣倾向帽子的环境,所以它是错误的。

同志们,我觉得,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应该用自己的决议把全党的领导引导上更加集体主义的轨道,更加团结,更巩固全党的统一。

现在我用两件事来结束我的发言。

莫罗兹同志在这里忏悔时说,我们,就是莫斯科省委的领导,有一条特殊的政治方针。

Ст.柯秀尔:还有“攻击”中央。

库利科夫:我要在这里声明,莫斯科省委领导的旧成员中,除了它一贯执行的党的政治方针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另外的政治方针。

Ст.柯秀尔:哎呀,库利科夫,库利科夫!不对!你在说昧心话!

库利科夫:没有这回事。你们要是愿意,不妨说个别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柯秀尔:差异可是大大的。

库利科夫:所以莫罗兹同志才在这个问题上搞混了,显然是因为他忏悔时太

冲动了。

**扎东斯基:**都是谁,有什么样的差异?

**库利科夫:**莫罗兹同志说,库利科夫在七月全会上和斯大林同志谈话之后,“攻击了”政治路线,或者是类似的话,我手边没有速记记录,所以不能保证引文的准确性,可是起码意思是对的。依我看,莫罗兹同志在这里又搞错了。我从来就没有过和党的路线不同的另一条政治路线,也从来没有攻击过斯大林同志。13人会议在七月全会之前,是区委常委会,有三四名区委委员出席,我们在这次会上讨论了弗鲁姆金的信。

**安采洛维奇:**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讨论”。

**主席:**佩拉耶夫同志发言。

**佩拉耶夫:**布哈林同志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了人们常用的一种普通手法——向对手进攻,向中央进攻,攻击优秀的党组织。现在他就是这样干的。

**乌格拉诺夫:**你在维堡区是禁止思考的。

**佩拉耶夫:**我来说什么人在思考,以及用什么地方思考。(笑声,喧闹声)

我原来指望布哈林同志的发言不是像他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布哈林同志指责全体政治局委员犯了托洛茨基主义。这还不够,他对每一个人都分别进行了攻击,有莫洛托夫,有斯大林,以及其他所有人,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有些人,譬如说,伏罗希洛夫和鲁祖塔克,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来,他也有办法:一个人就知道军队的纪律,所以他老是对的;而另一个人就知道跟着多数人走。这不正派。

[**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总是跟着少数走。]

对列宁格勒党组织,特别是对维堡区,布哈林同志的做法也是不正派的,对不起,我用了这样的词。我没有逐字逐句记下他念的决议或是报道,可是有许多同志来找我,问我决议里都写了些什么。

**乌格拉诺夫:**这是《真理报》上登的。

**佩拉耶夫:**我不能立刻记下布哈林说的话。

**喊声:**读《真理报》的有几百万人呢。

**佩拉耶夫:**《真理报》的编辑是布哈林同志,他要为报纸负责,显然,他要发到区里去的那些报道负责。他的引文不是出自我们的决议,而是《真理报》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会上发言的有50个人,大部分是工人。大家知道,维堡区有很多工人,按人员构成来说,党组织也是工人居多。会上谈到既然有了决议,那同志们就应当放下思考,把工作抓起来,而谈得更多的是,他们是在怠工,是可

恶的矿工者,党同工人中的矿工者进行斗争,可是找不出办法来和政治局委员中的矿工者作斗争。(笑声)

**齐夫里诺维奇:**尽管事先提出过一些警告。

**佩拉耶夫:**完全正确。干嘛要在这里夸夸其谈,歪曲事实,好像我们列宁格勒的党组织,还有维堡区,不许人思考。这种手法是把别人都看成傻瓜,纯粹是诬蔑。

乌格拉诺夫同志,你拉倒吧,别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教育党员。你自己到区里去看看。你在叶纳基耶沃讲过话。我希望你到维堡区去讲一讲,你就会看到,列宁格勒的党组织成长起来了,它不仅会思考,而且能分析清楚乌格拉诺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搞不明白的问题。请你来看看吧。

我来谈下一个问题。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提出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和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问题。据我看,在十一月中央全会上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按照布哈林同志的评价,我们目前的处境不但在今年,而且在今后五年内都会经常如此。至少他的发言给人的总印象是这样的。我非常仔细地听了,也记了他的发言。

**乌加洛夫:**这是鲍曼说的,你却记到他的名下。

**佩拉耶夫:**我说的是布哈林同志的发言给人的印象。许多同志都讲到了,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印象。同志们忘记了今年是一个歉收年,其特点是,十一月全会的决议里大致是这样写的,在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速度放慢的总背景下,今年的播种面积减少了500万俄亩。我不知道布哈林同志根据什么把今年的粮食情况同今后五年混在一起。据我看,这是(这个会上不好讲粗话)有点惊慌失措的评价。摆脱困境的出路也是惊慌失措的。如果记下布哈林同志的所有结论,再认真考虑他关于按地区论价的建议,那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显然是在提高价格的层面上。这也是托姆斯基同志提出的方针。如果采纳按地区划分农民的建议,那这项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如果指的是一种新的、特殊的划分法,——此外还要考虑到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反对个别课税的问题,还有他提的保留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他提的所有问题了)——那这基本上就是倾向于保护富农利益的方针了。这正是问题的落脚点。当然,布哈林是很有经验的人,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些结论,而是由乌格拉诺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代他这样做了。乌格拉诺夫同志说,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你可以讲得具体一点,农业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十一月全会讲到过分的落后,而且提出了克服的办法。你们要的是什么呢?提出加快发展农业,却降低工业的发展吗?

提出这种建议,你乌格拉诺夫同志必然会跌落到不把国家工业化作为主要问题,而把国家农业化放在首位。那你们还谈什么同意五年计划,建议第一年进口粮食,而不去克服国内的困难,同西伯利亚的富农斗争等等。既然在五年计划的基本原则上你们把整个事情都转了轨,那你们的同意又是什么意思呢?据我看,这是说给穷人听的。

我来谈最后一个问题。他们所有的人在发言时都说,我们赞成同右倾危险作斗争。我不知道他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的发言都没有说明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的必要性,相反,我们看到他们全都在和党中央作斗争。

如果你们看看布哈林同志建议的那些措施,那就可以看到,那些措施完全不是为了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相反,却抹煞了这种斗争。他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感到他是在向弗鲁姆金靠拢。

布哈林同志把问题提得细腻一些,而托姆斯基同志提得简单一些。他使用的语言和弗鲁姆金的语言很相似。他说,我们说的结合的新形式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在该谈粮食的时候,却错误地用谈论右倾来吸引党的注意。他在这里就是这样讲的。还有:右倾的问题是党的问题,而不是工会的事情。托姆斯基同志和乌格拉诺夫同志都在这里发了言,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和弗鲁姆金划清界限,谁也没有向党表明,弗鲁姆金和他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相反,托姆斯基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他的那些论据都是弗鲁姆金分子乐意签名作证的。

你们执行的是抹煞右倾危险的路线。你们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确定了,也充分地表明了你们的真面目。

今后怎么办?我可以说,在维堡区的党代表会议上全体一致声明:要么责令所有这些同志切实服从党中央,认真开展反右倾斗争,或者是如果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不执行这个决议,不肯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工作,那就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

**乌格拉诺夫:**佩拉耶夫同志,你是在造舆论呢!

**主席:**谢尔加宁同志发言。

**谢尔加宁:**我不会讲话,所以简单说几句。施米特同志引用了布哈林同志的发言,说布哈林表示他会完全彻底地执行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经过相应的机构通过并提交给本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讨论的五年计划。不过,想一想布哈林同志讲话的另一部分,他说他同意服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有决议。如果考虑到这个声明,那就可以得出必要的结论说,布哈林同志对中央的许多观点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实际上不是完全赞成五年计划的,



尽管他必须服从这个计划。

托姆斯基同志说,政治局里有两个集团:一个集团很善于绘声绘色地描述国内形势,另一类同志比较谨慎,不那么乐观,不愿意抹煞困难,指出我们的缺点;照这么说来,是中央在抹煞困难,掩饰缺点,而他们——托姆斯基等人——主要是指出这些问题。这是十足的废话——正是中央,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及时对困难和缺点做出迅速反应。这里发言的同志们列举了我们党中央近来做出的指示、决议和采取的措施。最近中央就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废品、旷工,玩忽职守等等做了许多指示——这表明,中央没有一丝一毫掩盖缺点,相反突出了缺点,而且做了许多指示来消除缺点。像托姆斯基同志等人那样,说中央有一种把事情形容得天花乱坠的情绪,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如果托姆斯基同志也像大多数同志那样客观而老实地看待会上提出的问题,他就知道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

下面说说库利科夫同志的发言。他说必须尽量避免采取开除最杰出的同志的措施。可是如果自觉地、忠诚地,像工人那样地对待这里的那些发言,那我就认为,正是你们那方面应当表现出比你们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表现出的更好的态度。

托姆斯基同志、乌格拉诺夫同志,特别是布哈林同志(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杰出的才干)的所有发言都是为了破坏中央领导层的威望。布哈林同志收集了个别同志在很长时期里的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把它们巧妙地串在一起,干着侮辱和败坏名声的勾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他们站出来说,应当老实地对待我们,不要搞开除,别人在败坏我们的名誉等等。要求我们这样做起码是令人奇怪的,也是不诚实的。

下一个意见是关于纪律问题。我们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向布哈林同志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希望这种学习能够继续下去,可是,唉,现在布哈林同志关于纪律的教导,很可惜是不能容许的,也是有害的,尤其是在党的纪律和经济纪律方面。佩拉耶夫同志说:如果布哈林同志等人出席过我们的党代表会议,或是在工人区里参加过会议,他们就会相信工人的情绪远不是对他们有利的,是不利于布哈林同志等人的,因为他们好几个月都没有工作。要说应当尊敬你们是很困难的。只有你们坚决放弃你们明显的错误观点之后,我们才能够尊敬你们。

我想,库利科夫同志用工人的方式最坦率地提出了问题。就是我们在农业和工业化方面的路线、我们的政策问题,这是这些同志最不感兴趣的问题。库利科夫同志说,我们的领导感兴趣。你们就应当从这里开始。这对你们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同志们,你们这件事是行不通的,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你们都不可能推翻斯大林的。

**乌格拉诺夫:**列宁就关心过这件事。

**谢尔加宁:**我知道列宁关心过这件事。他也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可是你们也应当从列宁的遗产里学到一些东西。难道你们忘了列宁的教导吗?他用过你们采用的方法吗?列宁从来不曾用过。你们说攻击是从中央委员会里先开始的,可是莫罗兹同志立刻当场揭露说,你们比中央更早就攻击了斯大林同志和中央的主要领导。既然是你们自己开的头,那又何必生气呢?自己长得丑,就别怪镜子不好呀!

对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现任领导的攻击,比对你们三个人加在一起的攻击还要多些。我们认为斯大林不能走,应当工作,继续领导我们党。你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你们想要什么呢?你们想要改变党的领导。我再说一遍:你们办不到。

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干,那你们就犯了一个最大的、最深刻的政治错误,因为你们反对的那个人没有什么毛病,只不过有点粗暴。你们拿不出其他任何理由来。而你,乌格拉诺夫同志,你自己是工人,你也有,我们许多人都有粗暴的毛病。难道你能说,你始终是诚诚恳恳、彬彬有礼、关心别人的吗?不能,不是始终都这样的,乌格拉诺夫同志,你有时候也有点粗暴,我对你多少有些了解。所以把什么都串在一起,指责斯大林同志,说他有点粗暴,可是路线正确——这起码是不诚实的。

我想,应当坦率地提出问题:党的领导不能做任何改变。它符合列宁的精神、我们党的精神,斯大林同志应该得到最大的支持,是他能够在集体领导的基础上继续领导我们党,在今后复杂而责任重大的工作中走集体主义的道路。

**主席:**米高扬同志发言。他请求给他一小时。

**喊声:**给他。

**主席:**给他一小时。

**米高扬:**同志们,在所有反对派的发言中值得注意的是托姆斯基同志,特别是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托姆斯基同志的长篇发言完全是由精心组织的细枝末节构成的。他的整个讲话就是抱怨党的体制,抱怨政治局个别委员的性格特点,抱怨对反对派同志们的恶意攻击。而且他把自己描绘成“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兔子”,被逼得只有咬人,因为不给他安静,不停地欺侮他。托姆斯基同志不像一只兔子,也从来不是吃素的人,这从他一度用自己大多数人的抱怨猛烈地攻击政

政治局个别委员,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从来不怜悯落到他手里的人,用最粗暴的方式辱骂他们,最恶毒地攻击他们。

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不仅没有澄清我们争论的实质,反而用各种各样的小事情把问题的实质搞乱了。抱怨别人的个性,抱怨组织上的摩擦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遭到他攻击的那些人早就同托姆斯基同志在一起工作了,他们对他们的性格从来没有抱怨过,相反,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他们进行攻击时,还保护过他们。

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开始抱怨别人的性格是在他们和党的路线、党的领导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之后。正如发生原则性分歧时常见的那样,这一次也感到别人的性格不好了,党的体制也不让人喜欢了。这正是因为要执行自己不同于党的路线的新路线,就需要另一些人、另一种性格和另一种体制。所以为了查清问题,就必须着手分析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同三名政治局委员之间确实存在的那些原则分歧,由于这些分歧才派生出种种组织上的摩擦、抱怨、攻击等等。

对于查清政治分歧的基础来说,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有重大意义。布哈林同志在三小时的发言中,实际上详细说明了他们集团的整个纲领,以及在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他们所持的特殊路线。布哈林同志慷慨激昂地声称,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以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是这里发言的同志和各地党组织通过的决议却说明我们的分歧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们提出的问题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更尖锐一些。如果大家都忘记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也就是三名同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之后发表了声明,修改了党的政策的所有主要问题——如果大家把这些都忘记了,那布哈林就会是正确的。这篇声明把这段时间里我们和布哈林集团的所有分歧都综合在一起了,具有派别声明的含义,否定了党在共产国际、一般经济政策,特别是农民政策,党的组织政策、党的体制和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对于一个派别纲领来说,它还缺少什么呢?既然不满意共产国际政策,既然不满意经济政策,既然不满意党的体制和党的领导,而且还要改变这一切,那这份文件还能不被认为是反对派的纲领吗?既然有了这份声明,那就自然要提出一个问题:哪里还有统一呢?是没有分歧吗?可是在提出声明之后,布哈林同志居然还有勇气断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分歧,他同意党的所有决议,也不打算修改它们。按照布哈林的说法,事情仿佛是这样的:一家伊尔库茨克的报纸刊登了某个记者一篇报

道,说对整个村庄采取了抵制行动,于是布哈林同志起来反对这件事,他因此而被指责为右倾。这简直可笑!这是欲盖弥彰。难道有人在保护像建议对全村进行抵制这样愚蠢的做法吗?难道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还有我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没有布哈林同志,而且在他讲话之前)没有在西伯利亚同这种胡闹斗争过吗?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工作环境又很复杂,在执行党的总路线时,我们要在实践中排除和改正各种各样的错误。可是只有布哈林同志才会把我们党和农村党员为取得粮食的斗争,为我们的阶级路线而进行的严酷斗争说成是胡闹,因为他近来对党内的一切都不喜欢。还有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农村党员应当竭尽全力,为采购粮食和保证供应城市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同富农坚决斗争,可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却可以不负责任地在这里批评和嘲笑他们呢?如果一些人为党的领导、为党的状况、为党的成绩和失败承担责任,而另一些人却不愿意对任何事情负责,只是当一个不负责任的批评家,专挑毛病,那就谈不上党的领导。这也可以说明,我们的分歧有多大。

布哈林同志在几小时的发言中,企图用种种说笑、戏谑、俏皮话和拐弯抹角来回避党的政策的重要问题,来掩饰自己背离党的路线和十五大,以及历次中央全会的决议。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布哈林同志归罪于古比雪夫同志,说他似乎曾经断言,我们越是接近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越尖锐,似乎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阶级斗争,而我们和布哈林同志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他不同意这种由他布哈林同志本人杜撰出来的断言。为什么需要这种杜撰呢?谁会相信呢?要用它来说服什么人呢?古比雪夫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如果党内有人断言,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阶级斗争,也会有富农,那是可笑的。布哈林同志需要这些不过是为了用巧妙的花招掩饰自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掩饰和抹煞自己背离了党的路线和决议。

连那些不曾读过《共产主义入门》<sup>225</sup>的人也明白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社会,因此到共产主义时就既不会有富农,也不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即便只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的人也都知道的。我们在中央全会上也用不着争论。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清楚,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实行的专政是走向消灭阶级,随着社会主义占领的决定性阵地,以及这些阵地在过渡社会中的优势意义,阶级斗争在历史的大剖面上日益削弱,然后完全消亡。不过这是在历史的大剖面上,就离开各种具体道路的抽象意义而言。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抽象的问题。从抽象的观点来说,我们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都能找到准确而完满的公式。布哈林同志把我们拖到绝对的抽象里面,为的是摆脱他不喜欢的具体的现实和当

前具体的阶级力量对比。他不是辩证地,而是繁琐哲学地提出问题。而列宁教导我们的、辩证地对待问题则是根据整个具体的现实来解决政策问题。而具体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有阶级斗争,它正在尖锐化,而且在一定阶段上今后还会继续尖锐化;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排挤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会遇到资本主义势力的反抗,这个排挤的过程有时会采取非常痛苦的形式,因为新形式不是简单地长入资本主义的旧形式,而是在资本主义类型经济的废墟上建设起来,不断发展的。这就决定了阶级斗争在一定阶段上可能尖锐化。布哈林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有争议。他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所以他才杜撰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有没有富农的争论。可是关于共产主义制度下有没有富农的花言巧语并不能使他避开列宁对问题的提法,也不能掩盖他在这个问题上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事实。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化问题,列宁不止一次用最鲜明、清晰的语言谈到过:

“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列宁文集》,第16卷,第49页)<sup>226</sup>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同上,第25卷,第173页)<sup>227</sup>

列宁还写道: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灭(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同上,第16卷,第227页)<sup>228</sup>

我们和布哈林同志的争论就是围绕着列宁的这些观点展开的。我们捍卫列宁的明确立场,拒绝布哈林修正的企图,因为他否认在一定阶段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性,而列宁却说得非常明确。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却用他自己臆造的关于富农和共产主义下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做掩护。否则布哈林同志为什么要杜撰种种蠢话,为什么要制造一些傻瓜理论,而且把它们推到别人身上呢?

**罗济特:**这是古比雪夫出版了的!

**米高扬:**没有的事。古比雪夫从来就没有说过在共产主义下还会有富农和阶级斗争,也没有说过我们越接近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越激烈。

**布哈林:**这是出版了的。让古比雪夫出来否认吧。

**米高扬:**古比雪夫从来就没有说过在共产主义下还会有富农和阶级斗争。这是布哈林的捏造,所以不是古比雪夫应当出来否认,而是布哈林应当放弃自己的捏造和嫁祸于人。布哈林这样做是为了掩盖自己背离了列宁主义的立场,掩盖自己否认阶级斗争在一定阶段上有尖锐化和激化的可能性;否认我国的富农和资产阶级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他们在国内有势力,还在于国际资本的势力。从两个方面:从国际资本主义及其对我国资产阶级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和富农反抗社会主义进攻的斗争,都会在某些时候引起阶级之间的激烈搏杀。布哈林否认这一点,而我们坚持这一点,这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唯一理解,而布哈林否认它,企图把我们引到列宁讲过的那种“庸人”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去。在这整整一年里,在起草中央全会决议的几个委员会里,布哈林在阶级斗争可能尖锐化的问题上始终和我们有分歧。十一月全会是这样,现在,在四月全会前夕也是这样。我们接受了中央全会关于阶级斗争和尖锐化的可能性的决议草案,否定了布哈林,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自己特殊的立场,也因为看来他并不同意十五大的决议,其中说: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核心的领导作用日益增强,苏联经济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阶级矛盾的局部加剧。”

**乌格拉诺夫:**十五大的主要决议都是布哈林写的。

**米高扬:**没有那回事。这个决议不是布哈林写的。以后的几次全会表明,布哈林是反对这个表述的。七月全会前夕,在起草粮食采购问题决议的委员会里,布哈林坚决反对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那一段。七月全会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中央全会指出,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发展,不会使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减弱,而只会使它加强,同时,苏维埃政权及其群众基础也更加加强起来,但这并不排斥某些阶层在整个形势紧张时发生一定的动摇。”

我们在七月全会上表决这个决议时,布哈林也投了赞成票,可是他立即跑去找加米涅夫,对他说,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这个公式是愚蠢的无知。

布哈林把古比雪夫作为攻击的靶子,仅仅是由于他反对中央全会的决议,可是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反对,而只能闪烁其辞。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种种事实都说明他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反对被他称为愚蠢的无知的中央七月全会

的决议。这才是问题所在,根本不是古比雪夫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某个说法。个别同志在个别问题上的说法可能有毛病,可是无论古比雪夫,还是别的同志都不反对党的决议,只有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是例外。古比雪夫和遭到布哈林攻击的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在地贯彻,今后也将继续贯彻党的一切决议。而布哈林攻击他们,企图破坏党的决议,想用自己的路线来取代列宁主义的路线。

我们和布哈林之间在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上的这些分歧,在中央十一月全会前夕又以尖锐的形式再度爆发出来。五天中,我们在决议起草委员会里就许多原则性问题,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1月里,委员会不顾布哈林的反对,就这些问题通过了完全准确的表述:

“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时代:同农民群众结成了巩固联盟的工人阶级充分估计到任务的艰苦性和长期性,正着手在整个战线上(包括落后的农村在内)铲除由小商品经济滋养着的资本主义老根。这必然会加强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排挤,因而也就不能不意味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布哈林反对这点,这一切他都不喜欢。他认为这是愚蠢的无知,因为他要修正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阶级斗争及其尖锐化的问题上,两天以前我们在关于五年计划决议的起草委员会里也有同样的分歧。这一次我们不顾布哈林同志的反对,在决议里采用了列宁式的鲜明的表述。布哈林对整个决议的表决投了弃权票。这个决议是这样说的: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困难,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必然引起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这种动摇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中,甚至在党内也有所反映。”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决议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管布哈林同志怎样攻击,我们都决不从这些决议后退。所有这些决议里关于阶级斗争的一段都是不顾布哈林同志的反对而通过的,第一次、第二次、两天以前在政治局起草五年计划决议的委员会里,布哈林都是完全支持李可夫同志的决议草案的,而李可夫同志的决议草案虽然长达19页,却一个字都不谈阶级斗争尖锐化,甚至连阶级都不谈。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吗?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决议用词里,根本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几个词。

罗济特:你说说热月政变的事吧。

米高扬:罗济特同志,我不会说什么让你宽心的话的。你还是听听布哈林的劝告,别惊慌失措好了。别妨碍我讲话,最好是听听别人说什么。

五年计划是什么呢？从本质上说，五年计划就是党以五年为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可是这份解释这个纲领的决议里却没有一个字讲到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尖锐化。而布哈林支持这个决议，在表决委员会多数人的决议（其中明白无误地谈到阶级斗争尖锐化）时弃了权。布哈林认为那个不讲阶级斗争的决议很好，这是偶然的吗？不，这不是偶然的，正因如此布哈林才在发言中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一幅漫画。他这样做是为了把自己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塞给大家，说富农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我们会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没有斗争，不用打碎旧形式，也不用在旧形式的废墟上产生新形式，而是通过一些形式和平长入另一些形式的办法。这就是布哈林整个方针的实质，他想用戏谑来掩盖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他的讲话里有许多尖刻和玩笑，我听到这些俏皮话时，就想起了一位老革命家米哈·茨哈卡雅。他听到这种俏皮话时，说过这样的话：

“俏皮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消化，可是俏皮并不是智慧，俏皮只不过是智慧打的一个喷嚏。”（笑声）我们大家听了布哈林的智慧打的一个四小时的喷嚏。

罗济特：你的喷嚏全是废话！对喷嚏是无须祝福的。

米高扬：罗济特同志，但愿你别打喷嚏。

乌格拉诺夫：你在商业人民委员部里的喷嚏打得不错嘛。

米高扬：尼古拉，你讲话时，我可是一个字也没有打断过你，请你也听我讲完吧。近来你的神经非常脆弱。从前你可是一个很坚强的小伙子。

乌加洛夫：你把人惹火了。

米高扬：还不知道谁惹火了谁呢。你打算把我们惹火，可是没有得逞，于是自己发火了。

乌加洛夫：你会把什么人都惹火的。

米高扬：阿尔卡季，你说说，是谁把你拉下水的。

乌加洛夫：我要说的。

米高扬：布哈林现在的发言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上修正了党的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全会原本指望，布哈林集团和他本人会发言，并且哪怕是间接地承认自己近来犯的错误。这会使全体中央委员和全党松一口气，有助于消除党的领导中出现的裂痕，使党摆脱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同志造成的困难。可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布哈林等人显然在坚持自己的错误，而这对于他们自己，就像伊里奇曾经警告过的那样，是很大的危险。布哈林不仅没有承认最近一年里犯的错误，而且加深了这些错误，变成了完整的体系，而最有征兆意味的是，他历史地把这些错误同自己早先的种种错误联系起来。人人都会犯



错误。如果已经承认了,改正了错误,再谈这些错误就不对了。譬如说,1925年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有过危险的动摇和不该犯的的错误。那时我们说服布哈林改正了错误,特别是他的口号“发财吧”。关于这个口号他专门发表过一个声明,承认了错误。我觉得,他当时和现在都承认的错误不仅是这个口号,还有他在1925年论证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错误口号的那些讲话。如果他承认,而且改正了自己1925年的全部错误,现在再把这些错误拿出来分析就不合适了。可是布哈林在发言中说了一些出乎我意料的话。他实际上不仅重复了,而且发挥了自己1925年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他还为1925年的错误表述和他当年写的那些东西辩护。我故意在他发言时插了一句,提醒他承认过自己1925年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回答说,不对,他没有承认过。既然布哈林直到今天还坚持自己1925年对农民问题的观点,那么布哈林全部理论的原则性本质和他的政治立场就越来越明朗了。因此必须分析的不仅是他昨天的发言,而且是他在1925年加以发挥的那些观点的根源。1925年布哈林的错误不仅在于那句著名的话:“总的说来,应当对全体农民、对他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财富吧,发展你们自己的经济吧。”这句话很快就被反对派抓住了,用来打击党。不单是我们,也包括布哈林同志在内,都和这句话划清了界线。可是问题不在于这句话。布哈林不仅在一次讲话或是一篇文章里讲到了这些观点。不是的,这里的问题不是某一句话欠妥,而是他1925年的三部主要著作中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著作是:《到社会主义之路》<sup>229</sup>、1925年刊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长篇讲话<sup>230</sup>、在集体农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sup>231</sup>(见这次大会的速记报告)。此外还有许多这类讲话和文章。总之是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的一连串思想动摇和庞大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完全错误的,党从来不曾赞同过,布哈林也曾经和它划清过界线,而今天,在过了四年之后,又把它复活了。而且布哈林在发言中说,这本小册子是1924年出版的。这话不对。它是1925年出版,1927年再版,并没有做任何修改、说明和注释。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人人都可能犯的、偶然的错误,而是布哈林经过深思熟虑的、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路线。1925年直接推动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堕落的是格鲁吉亚暴动<sup>232</sup>。布哈林把格鲁吉亚暴动看成是第二个全俄罗斯喀琅施塔得暴动<sup>233</sup>的信号。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臧声:他后来还被选为格鲁吉亚的荣誉公民呢。

米高扬:他那时认为,格鲁吉亚暴动是苏联全体农民暴动的信号,而且认为我们会像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后那样,根本改变我们的政策。1924年秋天的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一起提出了许多让步措施,要取消

对农村富农发展的各种限制,除此之外,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还提出要自上而下,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到村苏维埃,普遍建立非党农民党团,并让它开办自己独立的出版物。由此可见这些勇敢的同志当时在格鲁吉亚暴动面前墮落到了何等地步。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偶然事件。如果有人想改变党的农村政策,他立刻就会从高加索的某些事件中找到借口。1925年的格鲁吉亚暴动成了改变党的政策的借口;去年的卡巴尔达暴动布哈林也想用作改变政策的借口;现在阿扎尔暴动又被用来打击党的政策,企图斩断党的路线,把它纳入别的轨道。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对高加索的事件表现出如此敏感,每次都认为是向我们党发出的全国性“暴动”的信号,为的是改变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这表明布哈林的政治立场是不坚定的。这一切的根源是对社会现象非辩证的认识,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理解和解释。

也是在1925年,布哈林打算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的种种社会现象,他用下面的方式来解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

“诚然,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形式爆发出来,不过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他人发财并且钻进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现在开始向农民通讯员开枪,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

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可是,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苏维埃地方机构还软弱无力的地区。随着这种机构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地方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十分明显,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直至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理论杰作的全部含义就是:如果农民通讯员遭到枪杀,有罪的不是富农,原因也不在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客观环境,而在于布尔什维克干得不好,有罪的是他们。

乌格拉诺夫:别胡说八道。

米高扬:乌格拉诺夫同志,没有什么胡说八道,我可以逐字逐句地读一读印出来的文字:

“……在苏维埃地方机构还软弱无力的地区。随着这种机构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地方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十分明显,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直至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此,按这个说法,富农反对苏维埃和党的农村干部的恐怖行动不是由阶级

斗争的环境引起的,也不是由敌对阶级的反抗引起的,也不是由他们企图向我们反攻引起的,而是由于地方机关的工作很糟糕,以及党和共青团的农村组织软弱无力。

布哈林的这些话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点一滴,不过他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在我国农村杀害农民通讯员和党的干部的事件越来越多?据我们所知,今年对我们农村干部采取恐怖行动的事件比去年和前年要多得多。难道是最近一两年里我们的机关比1925—1926年要坏一些吗?没有的事。我们的农村机关和党组织比过去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它们不断地清除异己分子、富农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农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政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在不断改进。我们的农村机构现在无疑比过去更好了。

乌格拉诺夫:可是我们起劲地朝他狂吠,把什么都推到他头上。

米高扬:也许你觉得是这样,可是我们农村的机构现在是好多了。我们的农村干部、共产党员成长起来了,可是朝他们开枪的事却比过去多。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工作得比过去差。相反,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出差的共产党员或是当地的共青团员在当地村苏维埃机构里发现了腐化分子,揭露了富农的窝巢,把他们驱散了,正是在这时候富农就暗杀优秀共产党员,放火烧他们的房子。用主观的成分来解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不管农村干部是好是坏,完全不分析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粹派的议论方法。出现阶级斗争的尖锐形式并不取决于我们干部的品质或是富农的个性。它们是阶级关系尖锐化的产物。布哈林同志对这一切都不明白,而且搞得晕头转向。所以他才避开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重要问题。

(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插话听不清楚)

你,乌格拉诺夫同志,关于自己谈了许多。你对自己的评价是很高的。我们对你的评价也曾经是很高的。你有许多优点,可是你太钻牛角尖了,把自己给毁了。如果你没有掉进布哈林错误和混乱的罗网里,那对于你和党都要好得多。

就李可夫同志的提纲,我给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分送了我的意见,我写道:

“令人费解的是,不仅在现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而且一般说来,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应当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可是在五年计划提纲里,也就是为期五年的党的纲领里,却一字不提存在阶级及其斗争,不提我们向资本主义的进攻,不提富农和耐普曼的反抗。所有这些党的政策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的最主要问题在提纲里都没有一点反映。提纲不仅没有对这些最重要的问

题从五年的剖面上加以阐述,不仅没有哪怕是复述一下十五大和以后的中央全会就这些问题通过的决议,而且在提纲的用语中根本见不到这些话。除非你的出发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会有任何斗争,而且在奋斗中不会遇到富农和耐普曼,也就是说,从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才能够在写五年计划和提纲时不提富农。

对此布哈林本人给我写了一张条子:

“尊敬的同志!由于在你对李可夫提纲的评论中提到似乎是我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给这个词组加了引号,请告诉我,这些词是从我的哪本著作中引来的(请费心指出版本页码等等)。”

这张条子我是两天前收到的,还来不及回答。布哈林在发言中也提到了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布哈林要向我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比我更清楚他自己在1925年写了些什么。我前面举的三本著作都完全是发挥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那里直接指明,富农的窝巢将长入社会主义体系等等。请看逐字逐句的引文:

“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由‘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将也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异物,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

还需要什么说明吗?还有比这更明确的吗?第一,布哈林认为富农的合作社窝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有什么区别。既然富农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来说是异物,那还有什么异物呢?其次,布哈林认为,富农的窝巢,即使是合作社制的,将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体系。那是否还存在用社会主义排挤资本主义的任务呢,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呢?按布哈林的说法,不是同富农的斗争,而是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而奇怪的是,布哈林不说这是1925年的错误公式,他不打算捍卫它;却在昨天激动地捍卫这个公式。不过问题不在于一个公式。所有我在前面列举的布哈林的著作,特别是1927年再版过的《到社会主义之路》,都发挥了这些思想。我建议大家都读一读这本小册子,了解一下右倾是怎样生长起来的,那些想成为列宁主义者的人怎样用自己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路线取代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和政策。我建议中央鼓动宣传部在1929年再版这本小册子,让大家都知道右倾的理论纲领,而便于同右倾作斗争。我认为有必要引几段布哈林的话,它们表明布哈林的动摇不是偶然的,他在农民问题上有

一个和我们不同、和全党不同的方针：

“农民合作社必然长入无产阶级经济机关的体系中去，正如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下它长入资本主义经济机关的体系中去一样。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想要走上同资本主义对抗的发展道路的合作社组织，都逐渐被资产阶级的信贷和其他经济机构所扼杀，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恰巧相反，正是劳动合作社，即中农和贫农的合作社将获得全力支持，同富农和农村财主即农业资产阶级的合作社相比，他们能得到各种优惠。”

所以按布哈林的说法，农民合作社包括贫农和中农合作社和富农合作社，所有这些合作社都将长入社会主义体系，正如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它们长入资本主义一样。布哈林看不见小商品生产长入资本主义经济和同样的小商品生产长入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差别。布哈林认为，贫农合作社也好，中农合作社也好，富农合作社也好，都会同样长入社会主义。看来他是要一刀切了，因为它们都是合作社，他完全不顾它们不同的阶级性，既然所有的阶级，包括富农和农村财主，都将长入社会主义，那哪还有阶级斗争呢，还用得着阶级斗争吗？

第三，对待贫农和中农的合作社同对待富农和农村财主，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的合作社是有差别的。布哈林认为，这种差别仅仅表现在我们对农村合作社课税要比对富农合作社轻一些，我们将支持劳动合作社，如此而已。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我们对贫农和中农合作社较之对富农合作社实行优惠。按布哈林的说法，这就是同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

*(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不对，乌格拉诺夫，你这个插话不能抹煞问题的实质。鲍曼的建议和布哈林的方针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鲍曼还在七月全会上就揭露了你们，证实了你们用非同志式的态度歪曲了他和你们的私下谈话。这你是清楚的。

再说，布哈林同志还把这个思想继续发挥下去，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证明，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道路的共同性——我们和富农的道路是共同的，富农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请看另外一段这样的议论：

“由于我们实际上掌握了经济命脉，因此阶级力量自然就发生了重新配置。如果我们没有银行，可是成立了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那它就会压迫我们；可是如果有银行，那它就要听我们的了，我们向它提供贷款，如果我们两手空空，那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战胜我们，然而如果他是我们银行的储户，他就不可能战胜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他，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归根到底，富农的孙子说不定也会向我们致谢，因为我们这样对待了富农。”

**奥尔忠尼启则:**原来如此呀!(笑声)

**罗济特:**反正“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段话是你伪造的。布哈林没有这样的话。

**米高扬:**罗济特同志,我真拿你没办法,因为你什么都不想听。难道我引的几段,还有另外的几十段话对你来说还不够吗?难道你就看不出这是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论,否则富农的孙子为什么要向布哈林致谢呢。

**柯秀尔:**这是同一本小册子吗,米高扬?

**米高扬:**不是,这出自《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上布哈林同志的一篇文章。为了让罗济特安静下来,我可以再引一段,谈的是同样的问题:

“假如我们面前有一个富裕农民,他有些闲钱想要攒起来,他把这些钱放到哪儿去呢?放到和我们的国家银行有联系的储蓄所去。这样一来,这个农民和我们的银行是否巩固,和我们的国家制度是否巩固就有了利害关系。而且是很密切的关系。如果银行再通过自己的信贷机构向他提供比沙皇时代更便宜的贷款,那这种利害关系就更密切了。”

按布哈林的看法,如果一个富农或是富裕农民有许多钱,把它存入我们的储蓄所,那他就从属于我们了,而且同社会主义建设和“我们国家制度的巩固”有“密切的利害关系”。

**鲁祖塔克:**真是最忠实的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者!

**米高扬:**如果不同富农斗争,而是和他称兄道弟,如果向他提供比沙皇时期更廉价的贷款和发展他的经济的更优惠的条件,那他的确会对保存苏维埃政权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不过那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了。那就是我们国家的蜕化变质。

**奥尔忠尼启则:**总之是富农长入。

**米高扬:**照这么说,只要富农把他积攒的财富存入我们的银行,他就同保持苏维埃制度有了密切的利害关系。你们不妨自己判断一下,这种议论有没有哪怕是一丝一毫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认识呢?完全没有。有的却是用个别事实来掩盖富农的存款可以消除富农和无产阶级之间深刻的阶级矛盾的谬论。要粉碎这样的谬论,用不着像布哈林自命的那样的大理论家,因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布哈林接着写道:

“我们来看一个对我们最不利的例子。富农剥削自己的雇农,积攒了财富,取得了剩余价值,把它存入银行。他存到什么地方去呢?归根到底是我们的银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因为我们得到了补充资源,它的

增长使我们能够向中农合作社提供贷款,从而把全部农民群众引入经济增长。我们利用富农的存款来支持其余的农民阶层。”

古谢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作论。

米高扬:对不起,我使用了这么多大段的引文。我不再引了,因为我认为大家都应当看看布哈林的这些著作。我之所以使用大段的引文而不加删节,是为了不让别人说我断章取义,也不能说某句话是偶然错误,就像人人都可能有的那样,也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看清楚,这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它和党的列宁主义方针,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的阶级问题毫无共同之处。

假如布哈林在昨天的发言中没有声称自己完全同意自己在1925年写的东西,假如他今天的观点不是重复他1925年的那些错误观点,那我就不能用他1925年的小册子来说明今天我们同他的分歧。今天的布哈林和1925年的他只有一点不同,就是1925年的布哈林不像今天这样谨慎,许多让每一个共产党员大吃一惊的话会冲口而出。他现在谨慎了,不会说“富农的孙子会向我们致谢”一类的话了。他现在已经不会提“发财吧”这样的口号了。他现在把刀刃掩盖起来,用文雅的词句说:“扩大商品流通”、“按季节提高价格”、“贸易自由”等等。可是在有经验的人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布哈林是在继续发挥他1925年的错误理论,不错,是用“更高贵的形式”、更隐蔽的形式发挥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布哈林在他向政治局发表的声明中,以及他们三个人的声明中都讲了许多政治局的某些同志不老实、粗暴的话。我想,我们中间,不仅仅是政治局委员,也包括中央委员,甚至是布尔什维克,没有人会夸口自己有教养、懂礼貌、文质彬彬。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粗暴、用词尖刻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有共同的立场,有同志式的关系,那么这些粗鲁举动就不一定会惹人生气。布哈林和他的集团抱怨其他同志粗暴,看来认为自己是礼貌、待人诚恳体贴的好同志了。可是这不对。布哈林同志的粗暴和不老实并不比别人少一点,不过布哈林认为,如果这种粗暴披上了欧洲的外套,披上了议会伪善的“礼貌”,就不再是粗暴了。他昨天的整个发言都充满了对许多同志的不能容忍的粗暴态度。他去找加米涅夫和他对同志的攻击就是他对党不忠诚的最不能容忍的表现。布哈林辱骂我们大家时所使用的表面上礼貌的方式,并不能掩盖他令人难以容忍的粗暴,以及对同志、对党的不忠诚的事实。他的发言用极其文雅的形式对许多中央委员和党本身尽情嘲笑,我在听他发言时,不由得想起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企图把自己打扮成礼貌的骑士,居然下令“不准讲俄国话”(笑声),意思是骂人不要用脏话,而要文

雅一点。当然,脏话和粗暴都是旧习俗遗留下来的。我们应当摆脱它们,但这不是要用欧洲的、文雅的咒骂来取代俄罗斯的骂娘。大家想必记得,托洛茨基是怎样粗暴地、不老实地、敌视地攻击我们党的,他咒骂、鞭挞,用的是文雅的语言,可是非常粗暴,以至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有些中央委员气愤已极,差一点掏出手枪来。可惜的是布哈林走上了同党斗争的道路,学着托洛茨基的样子,用托洛茨基的派头来咒骂党和中央委员。骂人是很糟糕的事,可是既然要骂,在我看来那就别用托洛茨基的方式,别文绉绉地骂,就干脆用俄罗斯的办法骂娘。(笑声)这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可是至少让别人听得明白。布哈林详细地讲了粮食采购问题,特别讲了“贡赋”问题。从布哈林的讲话中得出的结论是,他之所以掀起一阵喧闹,只是由于他认为用词不当,我们争论的就是这个词是否恰当。谁也没有要求布哈林承认“贡赋”是一个恰当的词,而且用什么词恰当的问题在政治局里也不会引起严重分歧。我可以同意布哈林的意见,说这个词不是非常恰当,也不是恰当的标准语言的典范。斯大林在七月全会上使用“贡赋”一词的时候,立即声明这个词很粗糙,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不过在共产党员的圈子里可以讲得粗糙一些,假如这样可以使真理说得更透彻一些的话,而且在共产党员的狭窄圈子里用粗糙的语言谈问题,而不加修饰,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就算我们同意布哈林昨天的发言,同意布哈林说的“贡赋”是用词不当,他不赞成用这个词,可是难道我们的争论是这个词恰当还是不恰当吗?难道在三个人的声明中,以及后来的讲话中,布哈林不曾抓住“贡赋”一词不放,而把所谓“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强加给斯大林和我们党吗?他不仅抓住“贡赋”一词,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强加给我们,他还在三人声明中断言,近几年来我们党的全部实践都是这个理论的反映。难道他没有和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一起,说我们的粮食采购之所以搞得很糟糕,就是因为我们有“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和实践;说播种面积减少和课税太重都同“贡赋”的口号有关吗?他就是这样说的。请看布哈林同志1月30日提出的声明中的一段话:

“七月全会上他宣布了贡赋,也就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贡赋是一个和社会主义建设毫无共同之处的范畴。遗憾的是,‘贡赋’一词并不仅仅是‘文学用语’。与此相关的是尔后农民的税负过重、粮食困难日益增长、播种面积缩小和农民的怨声载道(现在只好减税)。”

为什么布哈林昨天要弄虚作假,说只是用词是否恰当的问题呢?实际上布哈林希望改变党的政策,把他自己臆造的“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强加给党。布哈林及其集团写了这个声明,就走上了和党公开斗争的道路。布哈



林休假<sup>234</sup>回来之后,和斯大林谈了几个小时,在这次谈话中他说的难道不依旧是这些东西吗?布哈林说,他不想吵架,因为吵架对党有害,虽然为了吵架已经是万事俱备。他说,如果吵架,你们会说我们是列宁主义的叛徒,而我们则说你们是饥馑的罪魁祸首。上面引的一段话说明了布哈林的打算。布哈林集团在斗争中所使用的最可恶的方法是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那儿学来的,这就是他们在反对党的路线时,把全部火力集中到一个同志——斯大林同志身上;把事情说成他们似乎并不是反对党,不是反对中央,而只是反对斯大林同志。可是斯大林同志始终是和集体一起工作的。至少我不知道他哪怕有过一次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或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事情。迄今为止我们不曾见过这样的事,所以不能把斯大林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或是把中央委员会同斯大林对立起来。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对一切负责。布哈林说,粮食困难、农民不满、播种面积减少——这一切都是因为斯大林用了“贡赋”这个词,其实他是想说我们现在经历的困难都是全党的政策的直接结果,这些结果证明政策错了,必须加以根本的改变。谁不知道,谁不明白,采购粮食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全党和斯大林一起。布哈林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不满的组织者,换句话说,是同农民决裂的组织者,我们是播种面积减少的罪魁祸首,我们对农民课税太重,我们造成了粮食困难。这些骇人听闻的罪名是布哈林同志扣在党头上的,也许他以为,这是他对党礼貌和忠诚的表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同志这样来指责党尤其不能容忍,因为直到这一次中央全会为止,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决议几乎都是我们和这几个同志一致通过的。如果在个别具体的经济问题上政治局里有人处于少数,那更经常是我和古比雪夫,而不是布哈林和李可夫。但是,我们有时在个别经济问题上处于少数并不能使我们有权开脱自己对政治局的整个经济工作和全部决议应当承担的责任。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经常是处于政治局的多数,而现在他们走上了反党的道路之后,却回过头来指责党犯了种种错误,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这是因为特别是布哈林内心有点沮丧。我很了解布哈林。同他经常有交往,对他也很好。最近这一年来不但是我,所有和布哈林有过交往的人都感到他心里很沮丧。看着他真让人难过,这样一个能干的同志,曾经为党做了很多工作的人,如今眼看着丧失了政治上的坚定性,失去了全部内在的动力,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布哈林了。

(乌格拉诺夫的插话听不清楚)

乌格拉诺夫同志,你很少看出来,也许是因为你自己从去年春天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沮丧吧。在这之前你一直是精神饱满的,毫不畏怯,在莫斯科党组

织里,还有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得堡工作得很好,眼看着你成长为党的一个重要活动家,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去年你到农村去搞了粮食采购,回来以后就有点沮丧了。

**乌格拉诺夫:**走着瞧吧,秋后才算账呐。

**米高扬:**你就直说吧。你知道,大家对你再好不过的了。你知道,大家是多么爱惜你,到你那里去,同你谈话,并不是因为大家怕你,而是因为看重你。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虚情假意。谁也用不着虚伪。这都是因为大家——不论是伏罗希洛夫,还是谢尔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爱惜你,把你看做党最宝贵的干部,是不能失去而应当努力维护的党的领导干部。

好吧,同志们,粮食采购问题怎么样了?我已经说过,布哈林诬蔑党,声称粮食采购的困难和比去年采购得少都是党的政策的结果。布哈林这样说的时候,忘记了,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忘记,可是为了宗派的目的而故意绕开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今年我们主要商品粮产区都歉收了,这些地区去年提供了粮食采购量的一大半,养活了俄罗斯。谁确实想了解粮食困难的原因,他就不能忽视这个重要事实。为了评价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歉收的意义,用不着援引这些地区粮食总产量和歉收的详细数字。只消把歉收地区今年和去年的采购数字和其他地区的数字比较一下就足够了。我们看到,由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采购量锐减,在俄罗斯东部地区的采购量急剧地增加了。可是布哈林说采购量的减少是由于我们党的政策;如果这样说是对的,那么为了解释这种情况,就要设想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执行的是—种政策,而在苏联东部地区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政策。然而这样的设想是绝对的愚蠢。数字说明了什么呢?今年4月1日时,全苏联的各种谷物采购量比去年少11300万普特。可是如果单看有不同程度歉收的乌克兰、北高加索、克里米亚和中央黑土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个地区加在一起今年比去年少采购24400万普特。我要强调一下,是比去年少采购24400万普特。

**喊声:**那这是谁的错呢?<sup>235</sup>

**米高扬:**布哈林认为这是党的政策错误。在苏联所有其余粮食采购地区到今年4月1日为止采购了31200万普特,而去年是18200万普特,也就是说,多采购了13000万普特,这些地区的采购量超过去年的40%以上。如果说是斯大林的“贡赋”口号妨碍了采购,难道说这个口号是专门为乌克兰人和北高加索人而提出的吗?难道说西伯利亚人、伏尔加河沿岸的人、乌拉尔人等等都执行布哈林的政策吗?没有的事,因为布哈林非常不喜欢西伯利亚人和伏尔加河沿岸的人。

柯秀尔:他连乌克兰人也不喜欢呢。

米高扬:布哈林走上了同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作斗争的道路,他想把所有的困难都归罪于党的政策,有意识地放过了一个情况,而这个情况正是李可夫恰当而又机智地提醒过托洛茨基的。李可夫说,除了我们的计划和政策,还要看天下不下雨,这可以从这一面或那一面来改变我们的计划。

扎东斯基:是寒潮决定了的。

米高扬:下不下雨都要起作用,这说明我们农业技术的落后,说明我们还要听命于自然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还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既然乌克兰的冬小麦冻死了,而春小麦又遭了旱灾,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中央的什么政策能够挽救乌克兰的歉收呢?当然,如果我们的谷物生产不落后,如果我们有大量的粮食储备,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易地渡过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歉收,可是既然我们的粮食本来就紧巴巴的,再加上主要的商品粮地区歉收,那就必然出现困难。布哈林正是忘记了南方歉收的事实,政治上不老老实实在地评价面临的困难,宣称粮食困难的罪魁祸首是我们党。对我们的困难的这种解释我们常常能够在国外的报刊上读到,可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却不能使用这种办法。

布哈林津津有味地冷嘲热讽,说贫农户和中农户仿佛是热情高涨地在播种。

喊声:打着灯笼播种哪。<sup>236</sup>

米高扬:他是想说,贫农和中农不仅没有什么热情,而且贫农户和中农户失去了播种的动力,不想播种,因为播种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在他昨天的发言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嘲笑的方式。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我们和布哈林争论了很长时间,那时我们在决议起草委员会里开了五天五夜的会,同布哈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布哈林一字不差地断言:“基本农民群众丧失了生产的动力。”“农民的情绪是取消派的情绪。”“我们束缚了农业生产力,我们能够,也应当放开它。”“我们在这次全会上应当彻底改变政策。”

这些简短的提纲是我在委员会上逐字逐句记下来的,我们已经忘记了,而布哈林现在却依然继续为它辩护,所以他才嘲笑贫农和中农的热情。我在同一个委员会上说,贫农和中农不仅没有丧失了生产的动力,也没有取消派的情绪,而且现在乌克兰的贫农和中农也在热情高涨地播种。所有和我就这个问题谈过话的乌克兰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假如你布哈林说的是富农不想扩大播种面积,富农没有热情,不希望扩大播种面积,那你就是对的,可是我们争论的不是富农。讲到热情,我们指的不是富农。因为富农不是基本的农民群众,而在许多地方富农确实减少了播种面积。如果布哈林指的是为扩大富农经济提供动力,那就请

他直说,可是贫农户和中农户是有动力的,而且在许多地方他们都热情高涨地在播种。布哈林抓住这个词不放,说你们粮食很少,播种面积也在缩小,因为大家都在热情高涨地播种。布哈林认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冬小麦播种面积减少完全是因为农民缺乏动力,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播种,所以要为农民提供动力,为此必须改变党的政策。可是每一个了解这些地区情况的人,每一个希望切实地说明这种现象的人都知道,也明白是怎么回事。连非党的农民都知道,乌克兰冬小麦播种之所以减少不是因为贫农和中农不愿意种,而是因为歉收使得农民即便愿意,也没有可能完全恢复前几年的播种面积。难道在北高加索种少了是因为没有愿望,丧失了动力?不是的。原因在于去年冬小麦受冻不会不影响到今年,而冬小麦播种时期的气候条件恶劣也产生了影响。贫农户和中农户虽然愿意,也没有力量大大提高自己的经济。为了弄清楚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今年播种面积减少的真正原因,我除了分析今年的特殊条件之外,还关注了俄罗斯在革命前遇到歉收年之后怎样立即恢复播种——在歉收年之后播种面积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我让商业人民委员部的经济专家检查了30年内这些地区的收成资料,把歉收年挑出来,再看紧跟在歉收年之后的播种面积变化。没有找到所有地区的完整资料,可是有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两三个省30年的完整资料。在大多数省里在歉收年之后播种面积几乎都有所减少,大约在12%—20%之间。

米柳亭:而且恢复用了好几年时间。

米高扬:是的,不是立刻就能恢复的,需要好几年时间。可是问题不在这里。事实就是事实,革命前的俄罗斯,歉收年之后在多数情况下播种面积要减少12%—15%—20%。现在我们在歉收年之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受灾特别严重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所减少,于是布哈林拿出一副哲学家不可一世的派头,把这种缩减算到党的政策和斯大林本人头上。然后他还要抱怨其他人不忠诚、恶意攻击等等。难道布哈林没有表现出对党中央的不忠诚吗?难道不是他企图把我们党在前进路上遇到的一切坏事和一切失败都归罪于党的领导,以便损害领导吗?难道这不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把什么事情、什么困难都归罪于党的政策,企图改变党的领导,改变党的路线的方法和派头吗?可是布哈林为什么要模仿和重复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派头呢?难道他不明白或是忘记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沿着这条路走到哪儿去了吗?当人们在党内什么也没有学到,忘记了各种反对派及其同党的斗争的教训,盲目地重复过去的反对派的做法,那就很糟糕了。

布哈林昨天的整篇发言是斗争的发言,而不是和解的发言。他继续发挥了

同党斗争的纲领,发挥了宗派的纲领。在所有三个同志中,布哈林同志是最混乱的一个,是他把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搞得晕头转向。他常去找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和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对他们进行诱导。我们几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和李可夫一起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共事,可是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中却没有任何分歧和特别的争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甚至早一些时候,在这场斗争之前,那时我年轻气盛,在莫斯科工作的初期,我也吵过架。

柯秀尔:现在你就不气盛了吗?

米高扬:现在我多少稳重一些了。要不是布哈林的挑剔和他对李可夫的诱导,也许不仅在人民委员会,而且在政治局我们也不会同李可夫发生分歧。可是布哈林为了纠集小集团,非常仔细地把他们拉在自己身边。他还拉了乌格拉诺夫。

臧声:他还拉过我呢。

米高扬:也许还拉过你。你们是互相拽着的。你们是同一条链子上的不同环节。

布哈林在搞派别活动的一年里,老是批评党的路线,可是一次也没有提出过具体建议。他在昨天的发言里才第一次提出了具体建议。

他建议改变我们的价格政策,用地区价格和季节价格使它更加灵活。

奥尔忠尼启则:主要是季节差价。

米高扬:我们现在来分析布哈林同志这些建议的全部含义。布哈林同志早就知道我们有地区差价<sup>237</sup>。他应该记得,我们在政治局报告今年的粮食价格政策时,详细讨论了必须有地区价差。其中西伯利亚的小麦价格比伏尔加河地区低30戈比。这就是地区价差,它多少符合这些地区的经济特点。当然,价差究竟应该是30还是35戈比,是可以争论的,地区之间的价差可能是2—3—5戈比。

可见布哈林的这项建议中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是他提出来了,看来指的不是地区的价差。看来他的出发点是必须改变价格,使其和私人市场的价格相适应,也就是说,把地区间的价差提高到私人的投机价格。实际上布哈林同志是要实行自由价格政策来代替国家规定的价格。他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只好遮遮掩掩,用没有政治色彩的地区价格的建议来做掩护,因为这种建议已经有了,再用季节差价来做补充。布哈林同志关于季节差价建议的含义是一样的,因为他自己不得不说,这意味着春天大大提高粮价。这个建议是布哈林同志早就有

了的,不过他害怕直接提出来。这个思想遮遮掩掩地出现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不过在那里这个建议只是像一条兔子尾巴罢了。加里宁同志读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后说,布哈林是建议提高粮价,不过没有明说而已。季节价格就是在某些季节提高,而在另一些季节降低价格。当然,布哈林同志想的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价格,他知道提高粮价之后,他不会赞成到秋天再急剧降低价格,然后到下一个春天再提高。假如我们这样做了,那就没有一个农民会愚蠢到愿意在夏天或秋天出售粮食,而不到布哈林的高价季节,当然,前提是贫困不至于把他赶到市场上去。这种价格政策对于需要钱而走投无路的贫农来说是低价政策,因为他秋天必须出售粮食;而对于富农和中农,这就是“把粮食囤积到春天”的口号。

再说,什么叫价格随季节而变动呢?农民会问,为什么价格按季节变动,而不是按月、按天随市场情况而变动呢?你跟他解释不清,为什么按季比按月好,按月比按周好。所有这些搞不清的问题布哈林同志自己也可能提出来,因为他自己分得清楚。他明白他的这些建议在实践上是不行的,可是问题在于他说季节价格和地区价格,心里想的却是用市场的自由价格来代替价格调节政策。布哈林同志主张市场自发势力的自由。这从布哈林同志纲领的观点来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对市场没有任何约束,没有国家的调节作用,而让市场的自发势力,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为所欲为。可是新经济政策只在一定范围内,在国家对它加以限制的条件内容许资本主义,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增加,这种限制会越来越大。所以布哈林同志为了避免直说,就议论什么季节差价和地区差价。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建议有利于富农。他似乎是在为局势找出路,而实际上这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出路,只不过是富农打开了通向财富之门而已。

**奥尔忠尼启则:**就算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富农把钱存入我们的银行。

**米高扬:**是的,那样一来富农也同巩固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有很密切的“利害关系”。(笑声)

可是布哈林同志能不能说说,为什么我们必须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向自由市场看齐,同时维持工业品价格的稳定,不准许提高价格,尽管自由市场是可以提高价格的。如果按照市场的要求来改变农产品的价格,那我们也就应当提高工业品的价格。比如说,市场上食糖脱销了,那就应当按市场可以接受的程度提高糖价,对于其他短缺商品也是这样,而现在许多工业品都不够。可是,同志们,这难道是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吗?这难道不是取消了对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的自觉调

整,而代之以市场自发势力的为所欲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分子,而有损于无产阶级吗?

还有,布哈林同志为什么忘记了,农产品价格的飞涨会影响作为这些商品购买者的工人家庭的开支。我们要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呢?看来,布哈林同志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他认为我们摆脱困难的出路就在于实行自由市场的政策,虽然布哈林同志声称他并不要求绝对的自由贸易。他说,“我不要求贸易的绝对自由,因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甚至是经典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贸易自由,而是由托拉斯和辛迪加在调节着贸易。”是的,假如布哈林同志要求连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存在的那种贸易自由,那可真是怪事。(笑声)

不过,好像没有人对布哈林同志提出这样的指责,布哈林同志又何必要驳斥呢。要求比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充分的贸易自由,这就是充当比资产阶级本身还要大的资本主义辩护士。谁也没有对布哈林同志提出这样的指责,令人奇怪的是他偏偏这样为自己辩护。

布哈林同志要求贸易自由和按照自由市场的需求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他提出这个要求恰恰是在最近两年来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比价发生了有利于农民的巨大改变的时候。我们原定在五年计划未实行的缩小剪刀差,现在已经实行了。如果再加上粮食商品的自由价格,那么由于现有的市场行情(许多粮食商品极度匮乏),我们就有反剪刀差,即有利于农民,而不利于工人的剪刀差。布哈林同志的实际建议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把粮价提高5—10戈比,甚至15个戈比现在都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价格和市场价格差距太大了,要想达到某种适应,必须提高1—2个卢布,甚至更多。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看来他是这样想的,那就请他说说,工人的工资怎么办。他有权不考虑这个问题吗?布哈林同志的所有这些具体建议的哲学意义,和他指责我们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联系起来,就非常清楚了。他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为了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向农民收取贡赋。可是他被困难吓得惊慌失措(眼下的困难特别严重),实际上建议从根本上改变政策,改成工人向农民支付贡赋的政策。

**臧声:**向富农,是向富农支付贡赋。

**米高扬:**我想谨慎一点,不但是向富农,也向中农支付贡赋。布哈林同志抓住“贡赋”这个词,借以攻击党的政策,企图根本改变市场上的价格比例关系和经济中的力量对比。

可是七月全会上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全

会严厉地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奥新斯基的方针,经过批评,奥新斯基在全会上放弃了这种政策,而索柯里尼柯夫稍后也声明放弃了这种政策。现在这个政策被布哈林同志捡了起来。对“贡赋”一词的攻击是战略迂回和挑逗公牛的那面小红旗,它应当帮助布哈林同志推行自己的政策,改变党的政策。这种转变的意义就是抹掉五年计划。因为如果你们不从五年计划规定的价格比例出发,而走布哈林同志建议的道路,那五年计划就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实现五年计划的财政基础没有了。布哈林同志不敢直接要求缩减五年计划,或者干脆反对五年计划,所以他赞成五年计划,但反对市场价格的比例关系。可是这就是反对五年计划,因为不可能接受布哈林的建议,而不立即重新审查五年计划,把它加以缩减,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和降低发展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速度。

布哈林同志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今天,放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看来他是这样想的:就算有五年计划吧,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主要的是明年不要按五年计划走,而要按照布哈林的建议走。

当然,我们今天的困难是非同寻常的,特别是在粮食和其他食品供应方面。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尽快解决食品供应问题,增加国家的粮食平衡,以免工业化受到这方面的威胁。

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向人民委员会建议,在五年计划中把人民的饮食问题单列出来,以便对它特殊处理,采取专门措施。

必须坚决回击想利用目前的困难改变党的政策,使它脱离社会主义工业化轨道的种种企图,布哈林同志建议从国外进口粮食。假如我们拥有容许我们这样做的黄金储备,这比起党加紧采购和供应紧张来,当然是最好的出路。把采购工作搞得像打仗一样紧张,要对每一个地区、每一普特粮食都精打细算,要关注每五天粮食采购的进度,要恰当地使用每一普特粮食,人民委员会和商业人民委员部为了向一座城市供应一个月、一个季度的粮食而伤脑筋,——这样做难道中央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各级机构容易吗?这项工作是不愉快的,是很艰巨的。可是我们不能不挑起这副重担,为的是摆脱困境,而不至破坏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只能这样来谈问题。

布哈林同志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健忘的人。2月份时,他,还有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指责中央,说中央浪费了黄金储备。可是现在他却建议进口粮食,而这笔花销不少于1亿至1.5亿卢布。

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指责中央政治局浪费黄金储备,还能有比这种指责更无理、更不忠诚的吗?



外贸和黄金政策问题是中央政治局经常审理和决定的。近几年来,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或是托姆斯基同志都从来没有对任何关于外汇,也就是用多少黄金的决议,以及关于扩大黄金储备或是减少黄金消耗的具体建议表示过不同意见。可是在大家一致决定了这些问题之后,三名政治局委员却突然宣布说:“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决定的,所以你们要负责。”这在我们党内叫什么德性呢?怎么能够同这些人在小范围内合作呢?看来他们是忘记了他们自己提出的浪费黄金的指责,今天他们却的确确实建议浪费黄金来进口粮食,而不是尽一切可能在国内采购粮食。而且他们还借口有人愿意提供购粮信贷。这是不值得一顾的小动作。近来整个外部世界都在等着我们进口粮食,而进口粮食就是向所有的银行发出减少向我们提供信贷的信号,因为进口粮食就意味着减少我们的黄金储备,降低我们的还贷能力。于是各家银行闹不清楚我们是不是要进口粮食,纷纷派人到我们的驻外机构(在巴黎的、阿根廷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提供3—6个月的信贷来购买一定数量的粮食。人人都清楚,这不是建议提供信贷,而是在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是不是要进口粮食。我们坚决拒绝了这种建议。如果说我们的国际信贷地位有所改善,而没有恶化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口粮食。拿出1亿至1.5亿卢布来进口粮食,就等于减少同等数目的原料(棉花、羊毛和有色金属)进口,而把几十万工人抛到街头,因为没有进口的原料,工厂就不能开工。布哈林同志很难在粮食采购上施加压力,可是看来他很轻松地就可以把几十万工人抛到街头。

**乌格拉诺夫:**你再看看其他的条款。

**米高扬:**唯一的其他条款和出路就是向富农施加压力来采购粮食,可是你们觉得这很困难。

**乌格拉诺夫:**这叫蛊惑人心。

**米高扬:**别拿蛊惑人心来吓唬人。应当面对现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要么向手里有粮食的富农施加压力,靠本国的粮食维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要么进口粮食,减少或者停止进口工业所需要的原料,那就意味着让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停工2—3个月。不能以为进口粮食不会有任何坏处,我们做事情不能这样任性。

布哈林同志试图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改善中农的处境而奋斗的人,他在保护中农的利益,希望巩固和中农的结合,可是按他的说法,中央在中农的问题上滑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上去了。为了证明这点,他用尽了各种办法,不过这一切都没有用。用不着驳斥布哈林说中央在中农的问题上滑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立场的指责。布哈林同志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他提出这种指责是为了掩盖自

已想把党的路线拧向右转。事实上,布哈林同志,还有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今年在中央没有提出过一个有关中农的建议。

臧声:连去年也没有提过。

米高扬:一个都没有。相反,党实行的改善中农处境的那些措施,布哈林同志都没有参加,而是由被他指责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那一部分政治局委员、那些人拟定和实施的。

中央在布哈林同志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来巩固同中农的结合和解决粮食问题呢?

1)大家都知道的、从今年粮食采购运动一开始就实行的提高粮价。这个建议根本不是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它是我们,特别是我在四月全会上,在政治局内部斗争开始之前提出的。当时四月全会决议起草委员会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新的运动开始之前就事先决定提高粮价,但是在运动开始之前不写进决议,也不宣布。这个建议是委员会一致通过的。

2)解决粮食问题的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建设新国营农场和提高旧国营农场的计划。

这项建议也不是布哈林同志,而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得到我们大家的支持<sup>238</sup>。而布哈林同志对待这个建议,轻一点说,是酸溜溜的,不相信它能实现,对它的意义估计不足。

3)大经济和集体农庄建设问题<sup>239</sup>是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得到我们大家,特别是当时刚出任农业人民委员的库比亚克同志<sup>240</sup>的支持。

4)统一农业税。去年提高统一农业税是政治局一致通过的<sup>241</sup>,而且在我们起草中央四月全会的决议时,布哈林同志也和我们一起证明了这种提高是必要的。决议说,粮食采购不顺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富农阶层的收入增加了,而他们纳税的税率太低。这个决议是我们和布哈林同志一起起草的。

是谁及时发现了提高统一税过了头,而采取了减税的措施呢?至少不是布哈林同志,也不是李可夫同志或者托姆斯基同志。他们那时都在休假,而布哈林正在写《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根据莫洛托夫同志和加里宁同志的提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政治局给各地发了指令,要求重新审核统一税的分摊办法,以便减轻税负。召开了地方干部的专门会议,检查指令的执行情况,根据政治局的委派,加里宁同志讲了话,反对对中农课税过重,这篇讲话在报纸上刊登了<sup>242</sup>。

统一农业税后来的变动布哈林同志都没有参与。布哈林同志没有提出过一

条建议,也没有提出过一条修改。

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哭哭啼啼地要求大家尊重他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当然,对老布尔什维克是应当尊敬的。可是这并不是说,托姆斯基同志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就可以歪曲事实,可以要求别人尊重自己,而自己却不尊重任何人,而且诬蔑其他人。他诬蔑我,说是我建议免除富农的农业税。他非常敏感,而且很容易生气。就因为支部里有人说了他,他就可以提出辞职。可是在全会上他却可以撒谎和诬蔑别人,认为这都是老布尔什维克的权力,认为这都是可以容忍的、忠诚的,而且是非常礼貌的。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身上,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形: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尊严,至于别人,他们连想都不愿意想。

关于新增的粮食播种面积两年内免税的建议是我在中央七月全会之前向委员会提出的。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无须提交全会,在政治局就可以解决了。我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了言。有我发言的速记记录。大家都记得,全会把这个建议交给政治局解决。全会交给政治局解决的仅仅是那些有争议的、原则上可以接受、只须要加以实际审理的建议。我关于统一农业税的所有建议现在都已经实行了。我完全同意这种新税制。它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可是它比去年的税制要好得多。

托姆斯基同志能不能说说,他就这个问题提出过哪些建议?在统一农业税上他对中农的关心表现在哪里?谁都知道,没有任何表现。

5)大面积提高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中农和贫农有重大意义,使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更接近农业生产的任务,提出了这方面具体的行动纲领。贯彻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也没有参与。

6)中央在这一年里解决的、对巩固和中农的结合,以及提高农业有重大意义的第六个问题就是向本次党代表会议提出加里宁同志关于中农和农业的专门报告。你们以为,提出报告是布哈林同志倡议的?没有的事。你们以为,他确实关心农民的疾苦,关心巩固工农联盟,所以提议在党代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在忙于宗派活动。向党代表会议提出这个问题的倡议是斯大林同志提的。

从列举的这些党关于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重大决策中可以看出,谁是真正关心和中农的结合,谁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农业的状况和城乡结合的状况,做出了无可争议的、连布哈林同志也不得不承认的必要的决议。我们没有看到布哈林同志表现出关怀。所有这些关怀都是来自中央。这表明我们的中央是列宁式的中央,它仔细地注视着城乡结合的状况,经常关注着和农民的联盟。而布哈林

同志和他的宗派谈论中农,只是为了利用今天的失误和困难来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既然中央在切实关心中农,那布哈林同志又为什么不顾这种种措施,还要在中农问题上做文章,认为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他自己又提不出什么新建议呢?看来他关心的是富裕农民和富农,而对这些人我们的确没有减轻他们什么负担,而是坚定地实行党的十五大的路线。布哈林同志不敢公开地、直接地谈论富农和富裕农民的问题,免得授人以柄,而只能拐弯抹角地提出这个问题。可是谁都清楚,布哈林同志要的是什么。他不相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能做出什么大事来,能弥补富农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失,解决农业的全部问题。所以他反对我们限制富农的各种措施,要求更大的自由来发展富农经济,他认为,没有富农经济我们就不能走出眼前的困境。

布哈林同志昨天说他并不反对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也没有取消这个口号,可是他的声明没有什么作用。让人奇怪的是他没有取消这个口号,可是他提出这个口号已经有一年了,从那时起,他不仅没有谈过要加紧对富农的进攻,连一般的进攻都没有提过,甚至在五年计划的提纲里完全抹去了“富农”这个词。而这正是同富农展开残酷斗争的一年。反正有点不对头,有点奇怪。布哈林同志昨天说他赞成向富农进攻,可是要用其他的手段。究竟用什么手段他没有说,只是说可以用统一农业税向富农施加压力。

**伏罗希洛夫:**他反对个别课税。

**米高扬:**问题就在这里,他只承认统一农业税是向富农进攻的唯一手段,同时他又反对统一农业税中最直接打击富农的那一部分。布哈林同志不惜用最不负责任的、大喊大叫的言词来反对富农,如“加紧向富农进攻”等等,可是又非常害怕反对富农的实际措施。

**臧声:**说得对,米高扬。

**米高扬:**也许春天提高粮价可以算做向富农进攻的其他手段吧?可是这不是向富农进攻,而是投入富农的怀抱。布哈林同志安慰我们说,春天提高粮价会给富农增加很多收入,不过我们可以用对富农提高统一税的办法再把钱拿回来。他甚至有勇气说,我们能够,也应当把富农搞得倾家荡产,就是说,布哈林同志准备把富农扫地出门。他可真有勇气!布哈林同志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没有个别课税就不能向富农收取重税,包括他的全部收入,而不伤及中农,因为统一税的一般税率所涉及的那些项目并不等于富农收入的所有来源。富农会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而并不突出那些要交税的项目。统一税只管耕地、牲畜和机械。统一税的期限至少是一年。而布哈林同志主张统一税要更稳定一些,甚至超过一

年。统一税当然不能经常变更,因为它涉及的不单是富农,还有中农。可是布哈林同志想用什么办法来向富农从季节高价取得的投机利润里征税呢?他什么也没有提,也提不出来。他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他这样说是为了顶住一个极重要的论据——提高粮价是针对着工人、贫农和中农的。只有个别征税才能具体地针对每一个富农,计算他的所有收入来源,包括市场投机和高利贷的收入,而避免伤害中农的危险,而如果采用统一税率,一体对待,这种危险是很可能存在的。采用统一税率的危险在于富农的耕地有时比中农要少一些,因为富农更灵活。他会把自己的经营活动掩盖起来,不让我们发现,以免征税。他会巧妙地隐瞒自己的收入,利用并保持自己的资本。不实行个别课税,我们就抓不住富农的收入;如果我们想抓,又往往会伤害了中农,而放过了富农。

我不明白,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把个别征税看成是很可怕的事。而个别征税只不过是真正意义上的所得税,它能够更好地体现我们的阶级路线。假如我国的文化水平够高,而机构又很健全的话,那么对所有的农民实行个别征税是一件有利的事,因为可以具体地对待每个农民,可以按实际收入对每个人课税,而不是根据一些笼统的标准一刀切。我们对富农实行这项措施,因为对富农课税不足或是犯错误是最危险的。实行这项制度的第一年出现的错误和过火行为不应当把我们吓倒。根据这个经验,我们要更好地对富农实行个别征税,为的是保证自己避免伤害中农的危险。我们有意把运用这项法律的范围限制在狭小的富农范围内——只涉及最富裕的那一部分富农,而把其余的富农放在一边,就是为了避免把中农当成富农课了税。布哈林同志说是赞成“加紧”向富农进攻,他甚至主张让富农倾家荡产,就是把他们扫地出门,可是他反对个别征税,结果是他口头上的要把富农一口吃掉,而实际上却并不拿出一件同富农作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像布哈林同志那样勇敢。我们没有提出让富农倾家荡产,或是把他们扫地出门,或是立即把他们彻底消灭的任务。所以我们赞成一切限制富农的建议,可是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言行不一。而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缺点就是他言语大胆,往往非常正确,甚至极端革命,而行事却和言语毫无共同之处。看来他一方面要使富农倾家荡产,另一方面又和李可夫同志一起在五年计划提纲中完全忘记了富农,既不提向富农进攻,也不说在富农面前退却,不提和富农斗争,也不说富农长入社会主义。他这样做了,还自以为是在保卫列宁的路线,而指责中央犯了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这样说是指望什么呢?我们党在和各种倾向和反对派的斗争中成熟了,能够警惕地识破反对派的各种手法,用这种言语是骗不了人的,也不能使党离开正确的道路。布哈林同志集团的立场已经被党识破了,全党

都高度警惕地反对这个集团和它的路线。

布哈林同志声称,他在我上面列举的他1925年的著作中阐述的农民问题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有什么错。这样一来,对于他的动摇性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了。此外,我还引用了布哈林1926年在集体农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实际上是反对集体农庄的,认为它不是改造农民经济的主要途径。

布哈林同志逐字逐句就是这样说的:

“集体农庄不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干线,不是康庄大道。它是很重要的辅路之一。”

既然谈到干线,谈到主路,那除了集体农庄之外,还能有什么道路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吗?

布哈林:除了富农合作社之外就没有别的合作社了吗?

米高扬:农民的合作社都要成为集体农庄的呀。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都在准备由单一合作社转变成复合型合作社,然后再成为集体农庄和公社。难道说建设集体农庄不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组成部分吗?建设集体农庄并不是列宁的补充计划或者从属计划。集体农庄仍然是合作社,不过是它更高级的组织形式而已,它是由市场关系的联合向生产关系的联合过渡。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简单形式向复杂形式的过渡。这确实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如果布哈林同志愿意按前面引用的公式来认识集体农庄的意义,那就很清楚,即使他不反对集体农庄,他也并不积极支持加紧建设集体农庄,因为集体农庄不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布哈林同志对发展集体农庄建设问题也是很冷淡的,认为它是次要问题。布哈林同志否认集体农庄的意义,认为它不是农民应该走的大道,他这样就阉割了列宁合作化计划的主要内容。他在列宁逝世纪念日的大会上做的报告也是这样说的。他把这个报告称为“列宁的遗嘱”,不过这不是列宁的遗嘱,而是以列宁遗嘱的形式出现的布哈林希望看到的東西。

1923年,我们刚开始学习搞贸易,这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情,根本不知道怎样做生意,列宁在证明合作社的意义时,正确地指出,不学会贸易,我们就不能建设合作社。他这样写道:合作社“现在是按亚洲方式进行贸易,而要想成为合格的商人,就应当按欧洲方式进行贸易”。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列宁当然从来不曾说过,只要学会了按欧洲方式进行贸易,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有把握了。合作社的欧洲式贸易是使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胜任自己角色的必要条件。可是列宁的合作化计划的内容不仅仅以此为限,因为合作社如果除了搞好贸易,也就是抓住农民经济的销售活动之外,不把农业的生产过

程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如果合作社只是依靠销售的成绩,而不转向生产合作和集体化;那就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列宁的计划就是这样的。可是布哈林同志在报告里歪曲了列宁的计划。他重复了我在上面引用的那一段列宁的话,可是过了五年之后,又给它加上了一段列宁不曾说过,而是他自己的话:“为了使合作社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的合作社,就需要既按亚洲方式,也按欧洲方式进行贸易。”于是,假如我们大家突然开始真正地、按欧洲方式进行贸易,我们就到了社会主义的王国了。布哈林同志完全忘记了作为贸易合作之后的第二阶段的农民生产合作这项任务了。布哈林同志不相信可以通过生产合作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他把贸易结合同生产结合对立起来。在李可夫同志的提纲(得到布哈林同志的完全支持)中就有这种对立。提纲中说:“生产结合的问题当然并不取消贸易结合,也就是通过市场的结合的问题。”贸易结合不仅不应当和生产结合对立起来,而且也不能说,生产结合并不取消作为城乡联系形式的市场关系,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生产结合产生于贸易结合,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相互关系的高级阶段,采取市场关系的形式。布哈林同志声称,他不反对结合的新方法,可是他没有说他是否同意托姆斯基同志的见解,托姆斯基同志和他一起签署了纲领,而布哈林同志也同意托姆斯基同志的讲话。要知道托姆斯基同志说的是完全相反的话:“谈的是什么样的新结合形式呢?这些新形式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什么新形式。”托姆斯基同志反对结合的新形式。他看不见,也不懂得新形式。布哈林同志不反对新形式。布哈林同志认为不反对新形式就足够了。可是不反对新形式是不够的,应当赞成它、保护它、实行它。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还需要大约20分钟才能讲完。

主席:我并不反对在粮食困难时期全会不吃午饭,不过这要由全会自己决定。(笑声)

喊声:休会。

主席:谁赞成下次会上继续发言?通过了。现在休会。

## 第七次会议

4月19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米高扬同志发言。

米高扬:布哈林同志在发言中说,他认为富农合作社将长入社会主义体系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一方面以政治局的决议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同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力量对比的见解相衔接。布哈林同志不仅没有放弃自己在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看来都显然是错误的思想。他企图用列宁和政治局的权威做掩护,再一次保卫这个思想。布哈林同志打出列宁和政治局的招牌是毫无道理的,而且简直就是对列宁和政治局的诬蔑。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个反对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党的人都不敢公然反对它们,却往往反而要用列宁的名字做掩护。托洛茨基反对派是这样做的,它甚至自命为“列宁—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现在布哈林同志也想用列宁的名字来掩护他自己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他把列宁描绘成德国的庸人,而列宁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列宁一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敢于直面痛苦的现实,研究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情况,制定工人阶级的斗争战略。把列宁说成是看不见阶级和阶级斗争,而认为我国的所有阶级都彼此合作的自由派人士——这是在给列宁画讽刺画。布哈林同志引用政治局的决议也是虚假的。他说的是哪一项决议呢?为什么他没有用引文呢?政治局没有足以替布哈林同志的富农合作社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辩护的决议。如果说政治局和党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那为什么虽然布哈林写下这些话已经有四年之久了,我们却没有成立完全是富农的合作社呢?为什么根本没有富农合作社的联社呢?为什么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长入社会主义,也没有长入我们的银行呢?列宁的党提出的和能够提出的任务不是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而是用社会主义的农业企业把资本主义的企业排挤出去。

布哈林同志谈到富农和一部分中农变成富农时,给我们端来了一盘小市民



的大杂烩、一锅折中主义的糊涂粥。他起初正确地声称,无论是富农,还是其他阶级都不是按他们的财产状况,而是按他们对劳动的剥削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确定的——这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明白的。可是接着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须争辩的思想之后,他又说(我请大家注意),我国的农村是贫困的,我国的中农和富农都是贫穷的,因此用不着害怕他们的壮大和富裕,用不着害怕出现成千上万个富农,总之,我国的中农和富农比起欧洲的富农和中农来,都是贫穷的。难道这种富农和中农都穷,富农的壮大没有危险的叫嚷不是抹煞了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不是对富农的危险估计不足吗?难道这同他说判定富农不是看他的富裕程度,而是看他是不是剥削的正确思想不矛盾吗?布哈林同志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他在1925年说过,而遭到党的谴责的那个思想的更精致的形式。1925年他在《到社会主义之路》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总的说来,应当对全体农民、对他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财富吧,发展你们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就应当永远贫穷。我们现在应当实行让我们的贫穷一去不复返的政策。”

我们赞成消灭贫困。我们赞成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赞成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主张农村的资本主义致富,我们主张发展富农经济。不是的。我们通过合作社,通过集体来提高贫农户和中农户的物质福利。我们不断地限制富农。限制富农的任务从布哈林同志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在1925年时也同现在是一样的。1925年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10期上他是这样写的:

“举一个对我们最不利的例子。富农靠剥削自己的雇农有了积累,得到了剩余价值,把它存起来。他能存到哪里去呢?归根到底是存进我们的银行。我们从这里能得到什么好处吗?能得到,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剩余资金,剩余资金多了,我们就能够向中农合作社提供贷款,带动全体农民提高经济。我们把富农的存款用来支持农民的其他阶层。”<sup>243</sup>

列宁早就预见到了布哈林同志种种错误的根源,他警告布哈林说,他繁琐哲学多了些,而辩证法少了些。因此他才经常脱离列宁的正确路线。他如今的反对派活动不是给我们党内的右倾伸出了一个指头,而是伸出了好几个指头的根源就在这里。

布哈林在谈到发展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时,重视一般地谈论商品流通,一般地谈论经济增长,一般地谈论劳动生产率,而不说明并不是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并不是任何一种商品流通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的纲领。而且我们是执政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是能使我们日益接近社会主义的那种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替社会主义加油,而不是替资本主义助威。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能明白的。列宁同志还在革命前就认为必须强调这一点:

“对资产者说来,重要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对被剥削劳动群众说来,最重要的是推翻剥削者,保证劳动者有条件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第25卷,第274—275页)<sup>244</sup>

布哈林同志正好缺乏这种态度,列宁的态度。不过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区别。

布哈林同志在讲到市场关系和新经济政策时,把它们同结合的新方法对立起来,对新经济政策做了错误的解释。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不是目的。它们只是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途径和手段,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国家同千百万小农户达成协议,有助于探索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我们的党纲中关于中农是这样说的:“力求在涉及中农切身利益的一切事情中同他们达成协议,在确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对他们做出让步。”

随着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物质资源的增加,随着领导农民的经验 and 能力的积累,随着不断取得的胜利,和农民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的协议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新经济政策并不像布哈林企图解释的那样,是一个凝固的经济关系体系。新经济政策反映了每一个具体时期内经济中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它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内容。难道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1925年的新经济政策和1929年的新经济政策都是完全一样的吗?难道布哈林看不见巨大的变化,难道在1929年还可以用1921年或者1925年的那些方法来实行新经济政策吗?新经济政策的内容随着经济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着,新经济政策也就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从低级走向高级。布哈林同志在谈到早年间的新经济政策时,忘记了即使在列宁在世时,新经济政策也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初我们的立场是主张本地商品流通的自由,后来则主张通过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进行城乡间的产品交换,这是列宁在1921年5月的党代表会议上提出来的。1921年8月伊里奇在给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指示中确定了另一种态度——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我们就走到了这一步,然后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说:“停止退却。”我们在1921年退到的阵地上站稳了脚跟,后来就开始了不断的进攻。这条道路就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内容的种种变化,也预先决定了它今后的变化。

八年前列宁写道：

“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卫恐怖的苦难。”（列宁：《论粮食税》的提纲，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7期第76页）<sup>245</sup>

八年过去了。我们拟定了五年计划，大体上能预见到五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不错，到五年结束时社会主义还不能得到完全保证。就是说，十年以后也不能完全保证。看来，五年计划之后还需要50年，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完全胜利。可是我们是在逐步走向它。我们现在拥有的和我们在1921—1922年间曾经拥有的已经不同了。而现时期和五年计划结束时期之间的差别将会更显著一些。五年之后将有15万台拖拉机在工作，而且每年将生产67000台拖拉机，以后的速度还会更快些。列宁说过：

“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列宁，第16卷，第153页）<sup>246</sup>

布哈林看不到这些重大的变化，看不到结合的新形式。他嘲讽地说，新方法就是粮食要凭购货本发给，食糖要凭本供应，食品不足，市场困难。他就像一个在市场上排着队买东西的婆娘那样发议论，尽管那个妇女比布哈林更有权这么说，因为布哈林体验不到排队的种种难处。

“革命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了，可是我们买糖要凭本，买粮食要凭本，五年以前这些都没有。这就是说，我们在后退。”

的确，我们市场上很困难，不能绕开它，必须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来克服困难。可是布哈林同志关心的不是这个。他不是把过渡时期暂时的困难和发展的基本纲领区别开来，而是想把我们拖下小资产阶级的泥坑。我们反对这种危险就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坚定性，号召工人阶级起来帮助克服困难。我们实行了工人阶级自我限制的许多措施，得到了工人阶级群众的完全支持。这个事实证明，我们有工人阶级的支持。今年为了鼓励粮食采购，我们几乎剥夺了城市，以便向产粮区提供足够的工业品，而使得工人居住区没有工业品。我们实行了粮食限量供应，而工人阶级完全支持我们。我国的工人阶级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党在工人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工人阶级感到，虽说我们非常困难，可是我们仍然在沿着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它相信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它完全支持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布哈林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拿出去年在讨论我关于加强出口措施的报告时,他给斯大林的一张便笺。在政治局开会时,我们就各种问题彼此交换了大量的便笺,可是直到今天,这些便笺从来没有被人像布哈林这样利用过。看来,他写便笺的目的就是要搞一个什么文件。这在今天已经很清楚。不过我手头也有许多布哈林的便笺可以利用,但是我不会这样做。我们政治局委员,在开会时每个人都有大量的这类便笺。我把这些办法留给布哈林自己的良心去处理,可是因为布哈林用它来攻击我本人,我只好就这件事说几句,尽管谈论自己并不那么愉快。布哈林制造了这张便笺,而且把它宣读出来,其目的在于给我栽上一个完全错误的立场,好像我在恢复出口的工作中并不看重粮食经济,而打算把出口完全建立在工业的增长上。布哈林这样捏造是为了好歹给我扣上一个倾向的帽子,因为他自己确实跌进了右倾的泥坑。他要尽了手腕,总想给我扣一顶倾向的帽子。他抓住个别事实,给一些政治局委员捏造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立场,企图证明他自己的基本思想:党在各方面都脱离了列宁的立场,而投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布哈林充分暴露了他自己,是他脱离了列宁的正确立场,投入了右倾的怀抱,而这种种指责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而已。布哈林种种虚假的指责和诬蔑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这个例子上。我要声明,布哈林是在故意说谎,捏造和诬蔑,政治上是不老实的。幸好除了口头报告之外,我还就提高出口问题向政治局提出了一份很长的书面报告。我今天又重读了一遍这份报告,为了说明事实,让我从我的报告中引用一大段也许很枯燥乏味,但却十分必要的文字,来揭露布哈林的谎言。我的报告里是这样写的:

“因此,假如我们走机械地恢复战前出口的路,那就只有当粮食在出口中达到将近6.5亿卢布时,我们才能达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在最近3—4年内我们不可能把粮食出口提高到这样的规模。”接着我说明了原因:“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苏联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以及和工业化进程相联系的城市人口的增加。但是如果粮食出口的规模停留在现有水平上,就是4500万—6000万卢布左右,也就是几乎不出口粮食,那我们就在最近3—4年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战前的出口水平。当然,在最近3—4年内使我们的出口达到战前水平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工业化的进程将改变我国出口的结构,就是说,许多种原料将在国内加工,而工业品出口将不断地迅速增长。”我接着强调说:“但是无论工业品出口怎样增长,如果粮食出口不能达到至少3亿—4亿卢布,我们仍然不可能在最近3—4年内把我们的整个出口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为了使苏联的出口恢复到战前的规模,我们必须在近几年内使粮食出口至

少达到战前一半的规模,而其他出口项目能有较快的增长。”我接下去再引一大段谈粮食经济的文字。

“粮食经济问题是我們全国最紧迫的一件大事,这反映在十五大的决议中。”在这一段里,我用了许多数字来比较粮食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其他部门,然后我这样归纳这一个段落:“中央不久前就粮食采购和粮食经济问题做出的决议更多地是回答经济行情的日常问题,而并没有包括粮食经济的全部问题,也没有为在最近2—3年内解决粮食经济问题指出明确的前景。可是这个问题不容拖延。”我在5月15日写了下面的话:“从解决粮食问题的观点来看,中央政治局不久前通过的、关于建设新的大型国营农场,期望在3—4年后能提供1亿普特商品粮的决议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措施。但是以此为限还是不够的,与此同时还应当采取与群众性的农民经济相结合的措施,扩大贫农户和中农户的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就这些问题我打算在6月1日前提出自己的建议。”

引了这些文字之后,我就无须再加什么评论了。我在1928年7月向政治局提出的这份报告,虽然布哈林想诋毁它,却至今还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如此,党后来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都完全遵循这条路线,我提出的五年粮食出口数字也完全被国家计委接受。可是布哈林自己搞错了,却在这里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礼貌和忠顺的课,居然编造、散布针对政治局委员的诽谤,歪曲事实真相。可是我要请问:一个政治局委员,即使他是“理论家”,是否应当有一个普通公民,更不必说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了,起码的诚实观念,不能这样胡编乱造,不能这样任意诽谤。幸好我把书面报告保存得很好,否则布哈林就可以随便对我提出指责,任意给我扣帽子,因为布哈林保留着他自己臆造的便笺,而我却没有文件,要想口头驳斥就很难了。

我不得不再提一件令我很不愉快的事。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月和2月召开联席会议时,我没有参加,因为粮食采购工作到西伯利亚出差去了。两次会上,李可夫和布哈林都提到我向中央的小组提交的、为七月全会准备的提纲草案。他们说,我的提纲草案的初稿是不能用的,政治局还给了我,建议重新写过。读到速记记录稿后,我曾经打算就这个问题在速记记录稿后面附上一份专门声明,因为李可夫和布哈林完全搞错了,歪曲了事实。考虑到要讨论的党内情况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些歪曲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决定不写这个声明,不理睬李可夫和布哈林的这种攻击。可是现在我不得不驳斥这些谎言,因为托姆斯基同志在发言里又第三次谈到了这个问题,虽然它和我们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七月全会的议程上有我的报告，题目是《即将来临的夏收和粮食采购问题》。我就这个问题草拟了提纲。提纲里有一——“报告的一般原则”、“草稿”。我这样写是因为事先我没有在政治局就报告的性质和将提出的决议交换过意见。我认为在讨论之后，在提出的一般原则和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再来最后写成提纲。应当说，那时我刚回来，留给我写提纲的时间非常少——只有一个夜晚。提纲一共有六页，只谈了粮食采购和粮食问题，对于其他一般经济和政治问题都没有涉及。这时发现，在中央七月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内有意见分歧。政治局的几次会议上就经济局势和经济状况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很激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要求除了粮食采购问题的报告之外，再向全会提出一个专门的经济状况问题。这时距全会开幕只剩下四五天了。政治局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以多数票否决了这几个同志把经济状况列入全会议程的建议，决定扩展我的报告，把原来的名称《即将来临的夏收和粮食采购问题》改为《总的经济状况和粮食采购政策》。

对这份提纲可以有不同意见——它是好或是不好。我并不指望我在几个小时里起草出来的草稿被认为是一份好提纲，也不指望别人会把我看成“起草提纲专家”。可是许多政治局委员都遇到过这样的事：他们起草的材料被政治局认为不行而退了回去。特别是李可夫同志不久前就五年计划问题向政治局的委员会提交的提纲就是这种情况。这份提纲因为写得不好而被退了回去，建议李可夫同志重新写过。提纲写得好或是不好——这不是对它的政治评价，而我的提纲从政治上看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一点错误。我的提纲整个被吸收进了提纲的最后文本，作为它的一部分，因为最后文本谈的问题更广泛，不仅有粮食采购问题，而且有总的经济形势和一般经济政策问题。提纲的初稿是正确的，可是须要写一份新的提纲，因为提出了新题目。我写了一份新提纲，被政治局的委员会接受了，只做了很少的修改。

大家可以看出，这份提纲草稿的问题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在中央活动的这个紧要时刻又把它提出来，第三次加以讨论。而且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等同志不是帮助缓和局面，却企图把局面搅得更乱，从四面八方把一些和我们的争论有关或是无关的小事都掺和进来。我坚决抗议托姆斯基说我的提纲草稿似乎是被从政治局委员们手里收走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不知道托姆斯基为什么要杜撰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手头上就有这份草稿。政治局委员们手上大约也有，因为是分发给他们的，我可以今天就把它分发给全体中央委员，以便澄清事实。至少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可以提供复制件。托姆斯基同志指责我，仿佛是我隐瞒

了什么草稿,所以我来揭穿他,我可以今天就散发下去。

可是为什么托姆斯基同志一字不提,布哈林也不说,在七月全会前夕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布哈林读过的那个提纲至今没有给过任何人,而且也没有交给党?事情是这样的:布哈林,好像还有李可夫,为了争取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关于经济形势的专门报告,写出了他们自己的提纲。李可夫认为没有必要宣读提纲,不过声明他已经有了提纲草稿。布哈林同志宣读了自己的提纲,可是全体政治局委员都要求让他们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提纲,而他却说:“不必了,你们看,我只有一份,而且是手写的。”我们说:“你给我们去复制。”他就是不肯,紧紧地攥在手里,给我们读了一遍。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可是布哈林依旧藏着他的提纲,谁也不让看。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不肯给我们提纲的复制件,可是过了几天他却去找加米涅夫,声称“莫洛托夫说了,十之八九会通过我在七人小组<sup>247</sup>中拿在手里宣读的声明。(他不肯给任何人哪怕是一张纸。)”

为什么布哈林害怕把自己的提纲给政治局委员们呢?这又不是会爆炸的炸弹,也不是容易丢失的一枚针,这是文件。既然提纲很好,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打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加以证明,那又何必把它藏起来呢?他们称赞提纲,他们自己说九成提纲都是可以接受的。既然是这样,那何必不拿出来,让中央委员们都知道这九成可以接受的是个什么样子,而那一成不能接受的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既然布哈林和他的集团不喜欢制造和散布流言蜚语,不想制造混乱,那就让他们向中央委员们散发布哈林的提纲来澄清问题。这份提纲他向加米涅夫宣读过,也向皮达可夫和季诺维也夫宣读过,可是瞒着有责任解决党内问题和他们之间的原则分歧的中央全会的参加者。伊里奇一再告诫我们,如果党内出现争论,就检查事实和文件。现在我们没有可能遵循伊里奇的教导,因为布哈林和他的集团有意识地隐藏文件,不让中央全会了解这些真实的文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布哈林提纲的这一成不能被接受的部分揭开了布哈林政治上动摇的奥秘。至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声明说提纲的九成是可以接受的,我不禁想起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1926年春天在中央全会上讨论过的托洛茨基的提纲。大家知道,我们当时和托洛茨基有严重分歧,斯大林说,提纲的九成都可以接受,可是那一成坏了一锅粥。大家知道,从托洛茨基提纲的这不能被接受的一成在1926年春天产生了多大的分歧,而且达到了怎样的地步。布哈林的提纲里也大体有这样的一成。布哈林在发言中企图使自己摆脱掩盖分歧的指责。作为证明,他拿出了他在去年夏天写给斯大林的一张便笺。布哈林在拿出便笺和做这样的声明时,却滑头地不说自己怎样向全党隐

瞒了自己的提纲。布哈林拿出这样一张无关紧要的便笺,却隐瞒了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文件曾经是政治局里两天激烈争论的问题,可以揭示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经过去了一年,可是无论中央委员会,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都没有从布哈林手里拿到这份文件——他的提纲。而这种情况自然就为混淆分歧,制造流言蜚语和揣测创造了条件。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这样高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发言,把藏匿起来的布哈林的提纲发给与会人员——这样做不是简单得多吗,不是可以消除怀疑,让与会者能够根据真实的文件来判断我们分歧的性质吗?这些人自己把可以揭示我们之间分歧的重要文件藏匿起来,却居然有胆量在三次会议上拿我关于粮食采购问题的提纲草稿来做文章。如果有人要求的话,如果有人真的对它感兴趣,我不仅可以把它分发给中央委员,而且可以发表在报纸上,让全党来评判。

托姆斯基在谈到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话的记录稿时,说这是一份神秘的文件,说它有许多疑点等等,看来他是有所指的。可是他们想指责谁呢?布哈林的谈话托姆斯基是知道的,也是同意的。假如说有谁能够澄清这个问题,那只有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再也没有别人了。只有他们才知道布哈林和加米涅夫是怎样谈的,谈了些什么。布哈林说,他不能为加米涅夫记下的每一个字负责,里面有不准确和不清楚的地方;可是他没有坦率地说,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这样就能够彻底澄清问题,而我们也可以知道他究竟对加米涅夫说了些什么,他本该凭自己的记忆把和加米涅夫的整个谈话记下来的。假如我们有布哈林的正确记录,我们就可以对谈话内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可是布哈林没有这样做,却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而不是帮助党来搞清楚问题。同时布哈林在发言中两次引用加米涅夫的记录。既然布哈林拒绝交出自己的谈话记录,既然他不肯准确地说记录里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可是他自己同时又引用这份文件;那我们也就有权引用这份文件,而且以它为根据。这也可以证明,谈话记录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此外,政治局委员们在读这份文件时,会想起加米涅夫记下的许多词句都是我们在交谈中、在会议中听到过的。托姆斯基表示惊奇,这份文件怎么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可是人人都清楚这种神秘莫测来自何处。是布哈林自己要求加米涅夫对谁也不要说,声明只有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知道这件事,只是请加米涅夫告诉自己人,让他们不要攻击布哈林和他的集团。神秘莫测是因为布哈林伙同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搞了反党的地下活动。地下活动垮台了,于是搞地下活动的人装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问道,怎么这样神秘。不仅如此,被当场拿获的布哈林还想反咬一口,责备中央制造谎言。三人声明中几乎毫不掩饰地说,这份文



件是伪造的。这是人赃俱获的小偷常用的独特方法,可是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里这个办法是没有用的。大家知道,这张传单由托洛茨基分子在莫斯科散发了好几百份,大量流入了工厂,只是亏了政治保卫总局的努力才得以制止。我到过“红色无产者”工厂,工厂支部开除了一个隐藏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就向党员散发过这份文件。最后,德国托洛茨基分子的机关刊物《人民意志》<sup>248</sup>公开发表了他们从俄国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得到的这份文件。还有被逮捕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记录里一再提到被他们认为是一颗炸弹的这张传单。可是现在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这些仿佛一贯追求忠顺和礼貌的人,却胆敢拿托洛茨基分子的这张传单来指责中央!布哈林在讲到自己同加米涅夫的谈话时,只认为自己同加米涅夫谈得过于坦率是错误的,看起来他是承认加米涅夫辜负了他的期望。由于加米涅夫不知道保守秘密,布哈林才失败了。可是布哈林企图用这样的声明来避开问题的实质是枉费心机。就算加米涅夫的这份记录没有落到托洛茨基分子手中,托洛茨基分子也没有发表,就算没有人知道这份记录,就算加米涅夫本人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党员,而且向布哈林声明说,由于这次谈话的政治性,他必须报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算他真的把自己的记录交给了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以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有这份记录,即使是这样,难道这份文件就没有意义了吗?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敌人不能用它来反党而已。可是从评价党内关系的角度看,从揭露布哈林的腐朽立场的角度看,从他玩弄宗派活动的手腕的角度看,他这次同加米涅夫谈话的意义都依然保留着。布哈林否认同加米涅夫结盟的事实。我想用不着否认。是的,他们的结盟没有搞成,可是对他的指控是他想同加米涅夫结盟,他企图和他结盟,只不过什么也没有搞成,倒不是违反了布哈林的意志,而是因为加米涅夫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又饱经风霜,不会听从布哈林的摆布。读过记录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说是谈话,实际上是一问一答。加米涅夫在这次谈话中扮演的是一个经验老到、又奸又滑的商人,他在和一个不那么在行的顾客谈生意。结盟没有搞成是因为加米涅夫不是傻瓜,他不会在这种条件下和布哈林结成联盟,然后和他一起被打倒。可是布哈林请他对这次谈话保密,请他转告自己人,就是那些还留在党内的原反对派分子,不要攻击布哈林和他的集团。这就是说,联盟没有搞成是因为加米涅夫不想搞。当时布哈林给加米涅夫提出的最低纲领是保持善意的中立。这是结盟的企图,谁也不能否认,如果不想昧着良心的话。我们大家都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此不会有什么怀疑。托姆斯基企图用夸张和开玩笑的办法来脱身,他说,布哈林会见加米涅夫这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难道朋友彼此

见见面都不行吗,难道别人就不同他见面吗?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见了面,谈了话。问题是同一个刚刚回到党内的原托洛茨基分子的一次严肃的政治性谈话,目的是背着中央缔结一个反对中央的联盟。这不是普通的见面和谈话,这是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去拜访加米涅夫缔结联盟,以便改变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布哈林巧妙地回避了我们根据这次谈话有权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装作天真地声称,请大家理解,只有疯子才会去找加米涅夫讨论改变政治局的组成问题,这太可笑了。这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可笑的,可是布哈林去找加米涅夫不在今天,也不在昨天,而是在7月里。对于当时来说,这可不是可笑的事情。不可笑是因为布哈林有一个不很小的少数——四个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党组织及其各个区的几乎全部领导都在他一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在他那边,组织局的多数也在他那边。还有,他指望某些地方组织的支持,指望另一些组织的中立或是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改变政治局组成的问题难道是可笑的事情吗?

伏罗希洛夫:《真理报》、《列宁格勒真理报》和莫斯科也是我们的。

米高扬:这可并不怎么可笑。尽管布哈林对于加米涅夫谈话记录的正确性极力争辩,可是这方面的事实就是事实:他们的谈话也涉及了改变政治局组成的问题。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索柯里尼柯夫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sup>249</sup>。加米涅夫的记录里写着,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自己的最低纲领来代替最高纲领——把斯大林开除出政治局。因为一下子搞不掉斯大林,力量不够,那我们就先搞莫洛托夫吧。这可以改变政治局里的力量对比而有利于布哈林,然后就可以搞掉斯大林了。索柯里尼柯夫的声明企图给自己做一点修正。他说,他提出要从政治局里搞掉的不是莫洛托夫,而是米高扬。

我非常相信索柯里尼柯夫的声明,说他想从政治局里搞掉的不单是莫洛托夫,而且有我。可是索柯里尼柯夫的声明本身表明,他们谈到了一些政治局委员,要把谁开除出政治局来改变它的人员构成。难道这样的问题是应当由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伙同加米涅夫背着政治局和中央来讨论和决定的吗?难道是他们应当把这件事瞒着整个中央的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去拜访加米涅夫的全部含义就是企图结成联盟来改变中央的路线和政治局的人员组成。布哈林说只有疯子才会有这样的计划,可是坐在我身边的索尔茨却说,布哈林是疯子,而且他还对我说,在夏末的8月份,托洛茨基分子在索契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名干部鲁萨科夫讲到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这次谈话。鲁萨科夫告诉了扬松,可是扬松同志等人不相信托洛茨基分子的话,认为没有必要去检查,因为他们认

为布哈林去找加米涅夫,而且同他谈话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是从托洛茨基的信里得知这件事的,而且也不相信,认为是托洛茨基诬蔑布哈林。结果却发现托洛茨基比中央委员会还更了解党内的情况,发现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在搞反党的地下活动,向党隐瞒重要的政治事件。这样做了之后,布哈林居然还有勇气抱怨别人对他粗暴和不诚实。难道还能够另一个中央委员身上找到这样极端的不老实和粗暴地破坏党的纪律和党的统一的例子吗?他抱怨别人粗暴和不老实,大概是为了证明布哈林非常老实和懂礼貌。大概他是由于性格温顺,才和其他同志一起对我进行了最粗暴和最不诚实的攻击,声称仿佛是我搞了许多名堂来毁灭我们无产阶级的事业。我把这些话留给布哈林自己的良心去判断,假如他还有良心的话,我就不来驳斥了。在布哈林多少还是诚实行事的时候,他的说法有些不同。在粮食采购顺利的时候,特别是在1926—1927年,他对我是极力赞扬的。布哈林一贯是这样的:当革命事业走上坡路,一帆风顺的时候,他歌颂革命;而当出现某些困难时,哪怕是稍稍有一点不顺利时,他就像乌鸦那样聒噪起来。

1927年,在五月党代表会议上他说: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由于政策的缘故,放松了对富农的控制,所以富农一定会扼杀我们,可是我们在这一年里(我要强调在这一年里)证明了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地控制着粮食市场。”布哈林一贯是这样的:当革命事业顺利时,他歌颂革命,他和党站在一起;可是当出现某些障碍时,他就不再是一个战士,也不肯帮助党了。布哈林非常清楚,遭到他攻击的政治局委员中,任何人都从来不曾反对过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须要做出决定时,我们争论过,今后也会有争论,可是一旦通过了决定,我们就以布尔什维克的诚实和坦率执行这些决定。粮食采购政策是政治局决定的,而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竭尽全力执行这些决定。直到今天政治局也没有发现过我有违反政治局决定,或是不认真执行决定的情况。粮食采购由于它本身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是同全党一起,同采购地区的州委和地委一起执行的。假如我是站在和布哈林相同的立场上,反对中央的路线,企图毁掉这件事,那谁也不会让我这样做,就像谁也不会容忍布哈林损毁党的事业一样。

他在说到我的毁灭性政策时,指的是他认为党的政策是毁灭性的。可是他不能直截了当地这样说,所以推到我头上,知道我不会把自己同政治局对立起来,除了中央的政策之外,我也没有其他的政策。他对加米涅夫谈过党的政策是毁灭性的,加米涅夫可以作证;他对皮达可夫也说过,皮达可夫也可以作证。他

对我和其他同志多次谈过。他现在也企图嫁祸于人,可是如果说布哈林彻底丧失了信心和政治上的坚定性,完全不知所措的话,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他在惊慌失措、内心崩溃的情况下同加米涅夫谈了话,造成了一个病人的印象,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请看加米涅夫是怎样描写布哈林和他谈话时的精神状态和自我感觉的。加米涅夫在谈话记录里是这样写的:

“总的说来,给我的印象是注定要失败了。他的用语:我们的这些‘胡闹’像是手淫。有时候我对叶菲姆(蔡特林,布哈林的秘书)说:我们的事情是不是毫无希望:1)国家毁灭了,我们也毁灭了,2)如果国家摆脱了困境——斯大林及时转变了,我们也是毁灭;该怎么办呢?遇上了这样一个对手,有什么办法……”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人是什么话都能说出来的,因为他丧失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丧失了心理的平衡,丧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把他自己的毁灭看成是国家的毁灭。最后,皮达可夫同志说,布哈林向他抱怨,说我们在走向毁灭,我们现在盖各种工厂,可是它们可能很快就落到白卫分子手里,我们正在死亡。皮达可夫根据这次谈话,认为布哈林发疯了。

假如布哈林认为皮达可夫是在诬陷他,那就请他声明一下,那我就不再使用皮达可夫的这些话,可是布哈林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他想用欺骗的手法摆脱困境,想把污泥浊水泼到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努力爬出他掉进去的那个泥坑。在对党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次全会上,布哈林本来应当自己努力缓和自己的处境,和党一起找出消除由他挑起的宗派斗争的途径,可是他却在这里发表了斗争的讲话,用最不体面的办法攻击了某些政治局委员。可是这次全会是由于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或是别的同志才召开的吗?难道在这里讨论的是他们的问题吗?布哈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紧紧跟随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地步走。在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时候,季诺维也夫说:“应该用机关枪扫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他们也是尽量照这样做的,可是他们的子弹没有伤及任何人,而射手自己却破产了。现在布哈林在重复季诺维也夫的战略手法,在自己的发言中横扫一切可以扫射到的人,不过他的“成绩”也和当年季诺维也夫一样。难道一个希望消除分歧、保存我们业已形成的领导集体的人会这样做吗?不会的。只有那些企图改变政治局组成的人才会这样对待中央委员,毫无根据地攻击他们,给他们抹黑。否则为什么要向中央委员射出毒箭,败坏他们的名声呢?这完全不像是一只兔子,更不消说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兔子了。

托姆斯基的整篇发言都是一些组织方面的小事情、个别中央委员的个性,以

及他受了委屈,想用这些事来说明发生的一切。可是这些组织方面的小事情和个别中央委员的个人行为说明不了问题。这些事情本身也须要说明。当初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反对派也曾经采用过这个方法来解释业已开始的党内斗争,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斯大林。托姆斯基也接过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我认为,今天最好是用当时布哈林回答托洛茨基分子的办法来回答托姆斯基:“现在是该放弃散布流言蜚语的时候了,它们把我们党内的所有争论都归结为托洛茨基不喜欢斯大林的鼻子,而斯大林又不喜欢季诺维也夫的卷发。”的确,不能把所有的争论都归结为布哈林是秃顶,而斯大林头发浓密,托姆斯基则右耳失聪。布哈林早就没有头发了,而托姆斯基也早已听不见了。斯大林一向头发浓密。可是尽管有这些差别,他们大家都在一起工作,这些个人特点直到最近也并不曾妨碍他们团结一致地工作。托姆斯基和布哈林集团现在来讲这些个人特点,只是因为不喜欢党的政策,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另一种政策。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应当用这些组织上的摩擦和某些同志个性的特点来解释,相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就可能导致抱怨、恶意攻击,指责别人的性格等等。这是历来如此。一旦有了原则性分歧,那就个人的性格也不合适了,制度也不行了。

反对派的许多发言者都企图走托洛茨基的老路。他们指责中央,似乎斗争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形成了反党的新反对派,而是由于事先就拟定了一个“清除”计划。“清除理论”早已过时,它已经名声扫地了,不值得再把它拿出来。托洛茨基当年曾经信誓旦旦地声称,政治局有一个首先清除托洛茨基,然后是季诺维也夫,然后是加米涅夫,再往后是托姆斯基等人的计划。乌格拉诺夫同志即席指出,现在看来托洛茨基是对的。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了。人们的作风真是奇怪——他们起初制造一个清除理论,然后他们自己尽力做出种种举动,使党忍无可忍,于是不得不清除他们。当然,如果明天布哈林和他的集团也像托洛茨基那样行动,那就无须什么清除计划,就可以把像托洛茨基那样的党的敌人清除出去。如果有人事先就决定要走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路,为了掩盖这条路线就想出了清除理论,而当他们因为瓦解和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威信而被清除时,他们就说,请看,我们的预言应验了,本来就打算清除我们嘛。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干的,可是谁都知道,中央和全党长期以来对他有多么耐心,有时候容忍了他本来不该被容忍的举动,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避免把他清除出去,而希望把他留在党内。托洛茨基指责我们,说是有一个事先拟定的把他托洛茨基清除出去的计划。不妨请乌格拉诺夫说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计划?他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想尽量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留在中央委

员会内和党内。难道乌格拉诺夫忘了,我们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进行过斗争,而就是因为他们想清除托洛茨基,而同他们分开了?可是我们还想保留他,指望还没有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怎么样,乌格拉诺夫,难道你忘记了吗?

**乌格拉诺夫:**米高扬同志,你知道我是什么态度。

**米高扬:**我知道你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在季诺维也夫要求清除托洛茨基的时候,你是同他进行过斗争的。我们有过多少次争吵,神经受到多少刺激,我们都容忍了,为的是不把托洛茨基清除出去。难道这一切像是有一个清除计划吗?没有的事。根本就没有什么要把那些我们现在已经清除的同志清除出去的计划,更不消说是想清除布哈林和其他人的计划了。我们希望,而且努力争取的是,为了党的利益保留业已形成的党的领导集体,让它团结一致地工作。可是如果有些同志破坏这个统一的领导,犯了右倾错误,而且坚持错误,加深分歧,形成了宗派纲领,从事反党的地下活动,建立新的反对派,而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不能制止这些同志,不能结束动摇党和毁灭党的总路线的企图,那中央就不称职。至于清除还是不清除,这个问题可惜不决定于中央,而决定于那些走上了新反对派道路的同志们。中央和党会怎样做,要看他们的举动。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中央要求布哈林集团最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服从,而不要坚持错误,因为那样就会跌进小资产阶级的右倾泥坑。这些同志不是这样做,而是走上来,用委屈的声调说是有一个什么清除计划。如果说什么人有这样的计划,那是布哈林,是他背离了党的路线,跑去找加米涅夫,企图改变党的领导和路线,清除那些于他不利的中央委员。特别是布哈林搞了一条清除斯大林的路线。不过布哈林什么也没有捞到,倒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失。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举动迫使党采取针对他们的坚决措施。如果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反对这些坚决措施,那他们就不应当说加深我们之间的分歧的话,相反,应当发表使我们接近起来的言论。可是布哈林的发言却是一篇斗争的发言。它展示了已经准备好了的同党斗争的纲领。是的,布哈林今天力量还不够,不能公然同党展开斗争,可是他的发言是为在适当时机展开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的。

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他为什么非但不放弃错误,反而坚持错误,而且胆敢指责中央滑向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立场。对党的领导的那种指责是号召推翻领导。谁都知道,也都明白我们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在党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同各种倾向的斗争,特别是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它不可能这样无声无息地就滑向托洛茨基主义,而且是全党都滑向托洛茨基主义了,只有布哈林一个人是最好的列宁主义者和辩证论者,只有他一个人坚持着自己的立场。这

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谁会相信呢?他自己也不相信,可是还要这么说,为的是提出反对党的口号、改变党的领导的口号。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政党能容忍倒向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吗?我们的党不能容忍。既然全党都团结在中央周围,反对布哈林,那就说明,中央没有滑向一边,而是布哈林脱离了原有的立场。党和中央委员会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坚定性来同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我们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采取的那些镇压措施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嗜血成癖。我们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也曾经犹豫过。我们这样做是出于革命专政的需要。既然中央同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进行着这样激烈的斗争,它怎么会投入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中呢?托洛茨基分子自己掉进了小资产阶级的泥坑,却指责党搞了热月政变,指责它滑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布哈林今天指责党犯了托洛茨基主义,而自认为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可是谁都知道,对党的种种指责不过是给他自己的背离披上一件好看的外衣罢了。

布哈林和他的集团背离了党的总路线,他们的批评站不住脚,他们的思想动摇也不仅表现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他们不同意党的农民政策,不同意总的经济政策,不同意党内制度和组织政策。除此之外,变成了右倾的布哈林集团还修正了党的国际政策。布哈林和他的集团声称,共产国际正在瓦解,共产国际内部正在发生分裂和碎裂,出现它自己的“秋播面积缩减”。布哈林在国际范围内支持共产国际内的调和派集团,从而妨碍了党反对兄弟党内的右倾的斗争。共产国际,特别是德国党成功地克服了右倾,而且坚决地同调和态度作斗争。布哈林已经有六个多月不在共产国际工作了,他把自己同共产国际内同情右倾分子的调和集团拴在一起,把共产国际内的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说它要垮台了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共产国际,特别是德国党不仅成功地克服了党内的动摇,而且在争取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通过它自己不断清洗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而达到的。由于把他们清除出去了,布尔什维克的党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坚强。

布哈林和他的集团向我们展示了根本不同于党的路线的一整套观点。同意这些观点的还有一些同志。我们应该谴责布哈林集团的整套观点,因为它根本不同于党的路线,而只会投入右倾怀抱,我们不能让右倾思想在我们党的队伍里生根开花,而应当毫不动摇地保卫我们党的原则立场和党的总路线。

布哈林在发言中声称他赞成服从党,而且他会服从党的决议,可是他没有说他将怎样服从。是像他最近几个月里那样服从吗?如果就是最近三个月里那样的服从,那就不是服从。那是违反党的纪律,那是我们党的领导的瓦解,那是向

全党提出的口号：“干你自己愿意干的事，执行你同意的那些决议”。这是破坏我们党最宝贵的东西，是违反它铁的纪律。我们应当要求，而且切实保证任何一个中央委员，现在指的就是布哈林和他的集团，无条件地、布尔什维克式地服从党及其机关的一切决议。决不容许动摇列宁的党的铁的纪律，我们必须给那些企图破坏党纪的人一个厉害看看。中央和党并不愿意把布哈林和他的集团开除出党的领导机构，相反，中央和党将采取一切措施把他们留在党的领导机构里。可是只有无条件服从党的决议才有可能这样做。我们应当谴责布哈林新反对派的观点，警告他们，坚持这些观点就是最大的危险，而且首先是对于这些同志自己。如果这些同志放弃自己的错误，而这些年来形成的党的领导保留下来而没有变动，那我们党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如果这些同志要走早先那些反对派的路，那党也能应付得了，而且虽然有种种困难，也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总路线，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堡垒。（鼓掌）

主席：斯捷茨基同志发言。

斯捷茨基：托姆斯基同志为阻碍揭露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一些中央委员同我们全党之间的原则性分歧而设置了许多障碍。大家为清除障碍做了许多工作。老实说，托姆斯基同志的整个发言就是想把这些同志说成是“无辜的罪人”。托姆斯基同志用了两个小时向我们解释，他们怎样被包围，怎样对他们进行攻击，怎样想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托姆斯基同志企图把这些同志描绘成被送上祭坛的无辜的羔羊。当托姆斯基同志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羔羊时，他很难让人相信。我们知道托姆斯基同志是一头布尔什维克的老狼，见多识广，那张羊皮对他显得不怎么合身。

喊声：是兔子皮！

斯捷茨基：好吧，是兔子皮！同志们，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非常清楚，我们见到的是一种策略手段，为的是让新反对派的观点能够轻易地渗透进我们党内。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很清楚，在刚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争论之后，在托洛茨基分子同党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再来采用托洛茨基反对派使用过的策略，也就是硬碰硬，拿出自己的纲领，从而在党内挑起一场新的争论，那就是最大的疯狂。

非常清楚，我们党会很敌视这种挑起新争论的企图。非常清楚，这种企图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所以任何一个新出现的反对派集团都要寻找新办法、新方式来向党灌输自己的观点。于是就发明了这些新手段：把自己打扮成受了委屈，把情况说成是他们要被排除出政治局，不让他们工作，对他们进行攻击；然后就提出辞职，等到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的时候，就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们见到的是一些新手法,这有以下事实为证。关于清除的话题在这里谈得很多了。是谁提出的这个清除问题呢?在中央七月全会时,在围绕着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而形成的小圈子里……

乌加洛夫:其中也有你!

斯捷茨基:我不否认:许多年来我一直同布哈林同志和他的集团有紧密联系,同他们分手只是由于出现了政治分歧。在所谓的“新学派”<sup>250</sup>中这些政治分歧是在十五大后开始出现的,涉及农业发展问题、工业化问题和自我批评问题。当布哈林同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对工业化政策打了一个大问号时,这些分歧就使我(还有另一些同志)和他完全分开了。尽管非常痛苦,我们还是不得不切断这些关系,因为这涉及主要的问题——党及其路线。就这样,在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圈子里,在七月全会时提出了斯大林同志的问题,就是更换总书记的问题。而且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提到了一些总书记的候选人。这时恰好托姆斯基,就是在这里扮演无辜的羔羊的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

喊声:这可是新鲜事!

斯捷茨基:(托姆斯基)起劲地提醒大家说,列宁同志曾经建议让他来担任总书记。

喊声:让他?(会场内出现骚动)

斯捷茨基:对,让他。同志们,我说这件事不是为了引起轰动,而是为了给说清原则分歧扫清道路。这件事再好不过地表明谈论清除是多么虚伪。问题的实质当然不在于清除,也不在于攻击——这都是伪装和掩护。问题的实质是这些同志和我们党有一些原则分歧,这些原则分歧他们现在就应当向我们彻底地讲清楚,使我们能够判断是非,不要耍什么花招,也不要抱怨,不要哭哭啼啼地申诉他们遭到了攻击,受了委屈,似乎要把他们拉上杀场,开除出政治局。

我们听了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是他提出了许多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发言的前半部分用来挑剔个别政治局委员表述上的一些错误。我想我们谁也不是圣人,每个人都可能有各种错误的表述。布哈林同志也有,他恰好应当比别人更多地注意自己的理论表述是否准确。我不久以前做了一些共青团的工作。我读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sup>251</sup>。我在那里看到一个提法,令我大吃一惊。布哈林同志在讲话里宣布了这样一个论点,而且在速记记录里加了着重号:和中农结成同盟的问题“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取消”。当我读到这个论点时,我就想起列宁同志在1921年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关于一个非常错误和庸俗的提法的讲话……

乌格拉诺夫:那是说的工农王国!

喊声:是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sup>252</sup>。

斯捷茨基:关于“工农王国万世长存”。是在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sup>253</sup>。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这个口号非常生气。布哈林同志的提法也有这种味道。和中农的同盟在我国不是永恒的:它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和无阶级社会的建成而消失。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有些错误的表述逐渐消失了,有些错误的表述被纠正了。但是有些错误表述里包含着错误观点的种子,这些种子后来落到了适宜的土壤里,发挥成了完整的政治理论。布哈林同志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恰好就发生在1925年他提出的那些错误的、不正确的表述身上。显然,这些表述现在落到了特别合适的土壤里,正在发展成一整套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问题出在哪里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近来常常反复地说,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我国局势的特点,必须考虑现在的改造时期的特点。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已经对于不久的将来,对于五年计划表述的各种特点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具体的认识。

如果谈到这种特点,那么改造时期的特点在布哈林同志的发言里是不是有所反映呢?他是不是向我们描绘了这种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新任务呢?什么也没有。相反,他提出了许多只能把我们从目前新时期所面临的重大任务拉向后退的说法。

这首先就是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问题。这是我国发展经济的五年总计划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新条件下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和党的路线完全对立的许多说法。我们现在讲阶级斗争尖锐化。布哈林同志声称他同意承认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可是他是怎样承认的呢?他只承认这是既成事实,而不是从法律上承认。他承认这是我们党的错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由新的改造时期的特点而产生的事实,不是由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形势的特点而产生的事实。问题就在这里。从承认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事实(按布哈林的看法,这是错误的阶级政策的结果)出发,他极力强调我们党的政策是错误的,借此证明他自己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内和平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

的确,布哈林同志怎样解释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事实呢?他的解释是我们犯了错误。他解释说,地方机关工作不称职,农村里错误地对全体居民采取了抵制政策,现在有些地方实行非常措施,而且非常粗暴,招致农民反感。他把这一

切都说成是我们的政策错误,而且强调我们必须采取另一种政策,采取国内和平的路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我认为这是他昨天发言里最重要的一点),他捍卫他早先的错误观点,认为富农的窝巢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喊声:对。

斯捷茨基:他是怎么捍卫的呢?他用了列宁的名字!为了捍卫自己关于必须实现国内和平的错误观点,他引用了列宁同志的论点,说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以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合作为基础的,在一定条件下,参与这个合作的还有资产阶级。

喊声:是吸收资产阶级参与合作。

喊声:是容许资产阶级参加。

斯捷茨基:对了,是在一定条件下容许资产阶级参加。近来布哈林同志在列宁的著作上花了很多工夫,把列宁的许多论点剪裁得符合他自己的观点。这样强加于列宁的事情还从来没有过。因为要把列宁说成是国内和平的鼓吹者,是阶级合作和和平共处的鼓吹者,这就太过分了。布哈林同志这就显示了他自己对于对立面的统一这个列宁的辩证法的无知,这在列宁关于我们这个矛盾的时代的表述中有说明。布哈林同志只取了列宁关于我国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的一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容许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里存在资产阶级,我们容许它存在是为了发动我们自己在目前还发动不了的、经济机器上最不重要的的小齿轮,我们容许它存在是为了增加我国的产品,把所有重要的阵地都保持在我们自己手中。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样说的同时,还非常明确地强调,容许资本主义“是斗争的同一种形态,是继续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但决不是用阶级和平取代阶级斗争”。他在谈到在一定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的那些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章中还着重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他甚至说,不是“斗争”,而是“最残酷的战争”。列宁还说:“现在的整个战争可以归结为:谁将取胜,谁将拥有一切——是资本家(他是我们放进门来的,而且甚至放进了几扇门和许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在我们身边打开的,甚至是违反我们的意愿而打开的门里),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虽然有了这一切,布哈林同志还是走上台来,企图用似乎是列宁的国内合作和阶级和平共处论来掩盖他自己的错误论点。这是反对列宁的最大罪过。布哈林同志现在提出的这种理论有特别大的危险性:它使我们党解除武装,它瓦解我们党。我们现在的时代,由于我国目前经济条件的特点而出现了阶级斗争尖锐化,正须要动员全党。在这方面今天的形势和我们早先遇到的形势有很大变化。我们先前

容许资产阶级。我们那时也同它作斗争,限制它,那时“谁战胜谁”的问题十分尖锐。

现在问题的提法不同了。现在我们进入了改造时期,我们更坚决地采取了把资本主义排挤出去的路线;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都挖断资本主义的老根。

我们拿国家计委的五年计划为例。计划规定了哪些进展呢?我们规定的局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成分的商品零售额从1927—1928年的75%应当上升到五年计划结束时的91%,也就是说,零售额几乎全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私人资本排挤出去。再看小型工业。小型工业的合作化应当从1927—1928年的19%上升到53.8%。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成分将有巨大的增长和扩大,就是说排挤资本主义,排挤资产阶级。这就是改造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现在采取在城市和乡村中都排挤资本主义的方针,——从经济上排挤资本主义。这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斗争尖锐化是符合改造初期的规律性的,它完全不是偶然的事情,更不像布哈林同志说的那样,是什么错误政策的结果。我们有一位巴达耶夫同志,他是列宁格勒消费合作社的头儿,他干的就是这件事情——巩固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把私有者排挤出去。事情的进展会不会是这样呢:私有者来找巴达耶夫同志,脱下帽子说,“巴达耶夫同志,你的合作社干得很好,请让我长入你的合作社窝巢吧。”

乌格拉诺夫:讲这种肤浅的东西不嫌丢人吗。

斯捷茨基:很遗憾,乌格拉诺夫同志,因为你们的立场才不得不讲这些话。当然,这有点像18世纪的某种田园牧歌,其中王子同牧羊女亲吻,而公主和牧童亲吻等等,而最终是两厢情愿。这样的牧歌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正是由阶级斗争来解决的,而解决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挖掉私有者和富农阵地的经济基础,而富农和私有者就用他们的牙齿和双手拼命地保护自己的阵地。他们要反抗,他们暴跳如雷,拼命地破坏我们的政策。正因如此,布哈林同志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发挥的机会主义理论才加倍地有害,它使党在阶级敌人面前解除了武装。这就是我们必须坚决回击这个理论的原因。

下面我谈另一个问题。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是怎样讲我们的经济前景的呢?他正确地指出了同基本农民群众的相互关系所具有的意义。可是他在经济方面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认为这种相互关系里有什么新内容呢?他一再强调市场联系和扩大商品流通的意义。他说,这才是主要的。当然,商品流通和市场联系现在仍然是城乡之间物资交换的主要形式。可是现在仅仅这样提出问题是不

够的,因为如果我们只讲扩大商品流通,只讲扩大市场联系,那归根到底就弄不明白,我们怎样才能接近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这种商品流通本身又将怎样改变自己的形态。难道事情会是这样进展的吗:商品流通不断扩大,市场联系也不断扩大,直到有那么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就发现身边全是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了?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当然,商品流通本身的形态变化这个过程现在正在发生,在未来的五年计划里也将继续发生。

我们来看一看商品流通的渠道问题吧。将来这些渠道几乎完全都是我们的。城乡之间实现商品流通的渠道将是合作社的,这些渠道是社会主义的渠道。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的重大改变,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在这里我们会逐渐接近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形式和过去一样,还是市场的形式,还是商品的形式,可是这种商品的形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列宁说过,“假如我们能够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商品分配,这种商品分配就已经接近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了。”还应当补充一点,这种联系的主体也将发生变化:作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型企业的集体农庄在农村中将壮大起来,它们将通过合作社和城市中的同类企业发生联系。这个因素是被布哈林同志完全撇在一边的。

可是问题不仅仅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现在仅仅谈论同农村的市场联系是不够的。现在只强调这一点就是停留在我们过去的立场上,就是看不见新的改造时期的特点。因为我们现在是全面转到尽全力为提高农村经济而奋斗。要知道单靠价格和税收现在根本不能解决提高农村经济的问题。我国的农村经济是非常落后,极端落后的,你们可以提出任何价格,你们可以随意降低农业税——可是单靠这些你们并不能解决提高农业的问题,因为须要向这种极端落后的农村经济表明,它应当怎样提高,怎样才能改弦更张。现在我们党在这方面有了一个大转变。十一月全会是一个标志,因为会上我们详细地讨论了怎样把每公顷的产量提高一普特,怎样更好地使用筛选机,在施肥和播种中使用什么新方法等等。

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党现在是对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领导者,这个因素在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中是最重要的。谈到我们的农村干部时,如今问题的提法已经不一样了。过去如果派到农村去的干部分不清黍子和小麦,这不算什么大缺点。如今这已经成了几乎是致命的缺点。所以安德烈耶夫同志在北高加索往农村派干部时,他要对他们进行一些考试,看看他们能不能分清黍子和小麦,是不是知道什么叫选种等等,因为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领导农村经济的

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这是说明我们同农村的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布哈林同志忽略了这个因素。这表明,他自己站在早先的立场上,而且想把我们也拉回到早先的立场上。我们现在要根据现阶段的全部特点向前进,可是反对派看不到这一点,却打算把我们向后拉。

这里关于他们的观点谈了很多。党并非偶然地对这些观点保持着警觉。我们党对那些背离党的路线的同志们说:你们停下来吧,不要和党斗,承认自己错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喜爱而且尊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没有一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爱护并尊敬自己的领袖。

托姆斯基:还是少尊敬一点为好。

斯捷茨基:可是我们党有布尔什维克的权利——批评和纠正这些领袖,而领袖就应当倾听党的声音而停下脚步,因为否则我们虽然沉重,但是不得不采取我们的党代表会议和各级党委讲到的那些措施。

主席:罗济特同志发言。

罗济特:我想就斯捷茨基同志说几句。斯捷茨基同志最好不谈布哈林同志似乎犯下的那些错误表述和惊慌失措,而说说他对于自己的“新新经济政策”做出的错误表述;同时我认为惊慌失措的顶峰就是斯捷茨基本人在七月全会上关于卡巴尔达的枪声是掌声的声明<sup>254</sup>。

安采洛维奇:为什么你当时不做声[,当时对你不利]?

罗济特:我没有出席七月全会。不过我把斯捷茨基的诽谤搁在一边,谈谈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

雅罗斯拉夫斯基根据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断言布哈林同志早在7月份就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动摇。

我想,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工作最鲜明而直观地驳斥了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个绝对错误的断言。同志们,只要认真地想一想,中央七月全会之后立即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知道,中央七月全会之后,就在8月份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大家都知道布哈林同志在起草共产国际纲领中起了什么作用,在这里用不着多谈。全党都非常清楚布哈林同志在这方面的作用。全党也清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在起草十一月全会关于经济形势的决议中的作用。全党都知道,布哈林同志还写了7月份中央《告全体工人和全体党员书》,号召开展和加强自我批评<sup>255</sup>。同志们,仅仅党内生活的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断言是根本错误的。因为遵循列宁的教导的、得到各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支持和参加的共产国际,其纲领不可能出自一个机会主义

分子之手,而且他还是富农的领袖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可是按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说法,事情就是这样的。

斯图鲁阿:纲领是集体,而不是布哈林一个人写的。

罗济特:别用这个插话来搅混全党都明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布哈林在这件事上的作用。

斯图鲁阿:保护也别过分,否则只能更糟。

罗济特:等一等,这有什么过分的?断定布哈林写的是一个,而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个……

臧声:这种事是有的。

罗济特:(这样断定)完全没有根据。全党也知道布哈林的坦率诚挚是很得人心的,在他确实犯了错误的时候,他能承认错误,还有他理论上的认真态度,为此列宁同志……

斯图鲁阿:他是去找过加米涅夫吗?

罗济特:(为此)列宁赞扬过他。也许,那些插话的同志善于写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或者相反。

我再说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这里提出的其他断言。他声称,在《真理报》编辑部里布哈林同志的处境是这样的:欢迎你来工作;在《真理报》里大家都在帮助他。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9月份\*《共青真理报》歪曲了,而且是用最不诚实的、最恶毒的方式歪曲了布哈林同志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的报告。

沙茨金:是删节了,不是歪曲了。

罗济特:这一期报纸可以找到,那时大家都会看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确实不得不拒绝《共青真理报》叙述的那份“报告”。当布哈林同志就歪曲他的政治观点写了抗议信,他这样做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且把它送到《真理报》之后,你们以为……

伏罗希洛夫:政治局处理了这个问题<sup>256</sup>。

罗济特:(你们以为)《真理报》发表了这封抗议信?没有的事!克鲁敏一声令下,一个政治局委员、《真理报》责任编辑的这封抗议信就没有登出来。

克鲁敏:布哈林自己修改了这封信,我立刻就把它登出来了。

罗济特:布哈林同志一再退让,为的是保持和平,可是你们不能否定主要的

\* 应为6月份。——编者注

事实。克鲁敏在这件事上的作用很清楚，他就是一个政治委员……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机关报责任编辑居然被安排了这么尴尬的局面，鼓励恶意地歪曲他的观点，——不允许布哈林驳斥，可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却要我们相信，这确实是为布哈林安排的优良的工作环境。

我谈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我要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声明：那种针对布哈林的“休息厅里的攻击”是闻所未闻的。这表明，在这个关键时刻，工作条件和可能性都是什么样子。可是有人却在这里努力把显示统一说成是对布哈林的让步，而这其实是让代表大会能够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最起码条件。

我还想就攻击问题谈谈莫斯科组织的情况。还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建议的本次联席全会通过的决议草案不曾拟定之前，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这项决议之前，我的朋友列昂诺夫同志，他是联共(布)普列斯尼亚区区委书记，邀请我参加他们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一个小型积极分子会，出席的大约有100人。

乌加洛夫：如今他再也不会请你了。

罗济特：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不邀请我了。可是2月1日他请我了。

列昂诺夫：我也没有想过要请你。

罗济特：列昂诺夫同志，你别赖账，我有你们机关的正式邀请函，我去出席了积极分子会。我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讲列昂诺夫同志在通报中说的托洛茨基分子那份传单的散发过程。我当场提出了抗议并向列昂诺夫同志指出，我们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来说明一位政治局委员的观点是不行的，是错误的。关于这一切我写信报告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可是直到今天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不过这并不重要，问题也不在这里。

我过去认为，今天还是认为，如果我们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来说明一位政治局委员的观点，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可是米高扬就当着我们的面引用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认为它对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谈话的叙述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

米高扬：布哈林自己也引用了。

罗济特：我认为像列昂诺夫同志那样做是不对的，那是对党的统一的前所未闻的挑拨和威胁。不过我还会谈到的。

我还想说说在莫斯科党组织内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在莫斯科党组织内无



可争辩的确切事实是,在莫斯科各区的党组织中,加里宁同志在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开的先例。加里宁同志在讲话中骂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等同志是右派<sup>257</sup>。

齐夫里诺维奇:撒谎,他没有说他们是右派!

罗济特:于是莫斯科充斥着种种传闻,简直是到处流传。莫斯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下面谈谈莫斯科省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会上莫洛托夫同志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在讨论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时,许多同志发了言。我也听了莫洛托夫同志的总结,有一件事令我吃惊:莫洛托夫同志指名道姓地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称为富农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同许多非常有害的错误发言划清界限。

我现在不得不向莫洛托夫同志提出下面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莫洛托夫同志没有同库兹明(不是红色教授学院的库兹明,而是军队的库兹明)的发言划清界限,关于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他说,“他们连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也不懂,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在纠正我们在1917年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国有化法令。”我是当场听了他的发言,后来又读了速记记录,按照库兹明的说法——这从我引用的文字也能看出——我们在列宁在世时执行的,也是在1928年加紧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之前执行的农民政策都是在实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而只有现在(“在斯大林时期?”)才开始执行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政策。我认为这样解释我们的农民政策是根本错误的,可是没有人当场驳斥它。

还有,如果我们看看现任莫斯科省委宣传鼓动部长、共产国际候补执行委员波波夫的讲话,就知道他对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历史有他自己的见解。《真理报》(2月26日第46期)刊登的对问题实质的表述是这样的。

波波夫:你还是引用速记记录好一点。

罗济特:速记记录和报纸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不过请注意,《真理报》的发行量比速记记录可要大得多,而且《真理报》的读者也要广泛得多。《真理报》的表述大家都知道,可是并没有遭到驳斥。波波夫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话如下:“共产国际的全部历史,我们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全部历史都是摆脱和清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历史。”

臧声:说得对。

泽连斯基:就找到这么一点?

罗济特:这里有人在喊“说得对”。请大家仔细想一想,波波夫把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说成什么样子呢:就是分裂和清除的历史。

伊克拉莫夫:为什么布哈林不在《真理报》上加以改正呢?

罗济特:如果是在党外的某个早先的孟什维克这样看布尔什维克化的历史,那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列宁鞭撻了他们,清除了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党等等。可是这样叙述共产国际的历史、布尔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历史,却一字不提列宁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聚集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力量,不提列宁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而聚集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提列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聚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喧闹声),不提列宁聚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力量和革命的东方和无产阶级的西方的力量;请看,他们这样描绘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质显然是有一定企图的。我认为莫洛托夫同志应当同波波夫那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化实质的描写划清界限。

最后是红色教授斯特列利佐夫的发言。他把布哈林比做伯恩斯坦。我想,大家都记得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比做机会主义者,比做瓦扬、伯恩斯坦等人。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套腐朽的玩意儿是托洛茨基开的头。

斯图鲁阿:“转弯时有人会从大车上掉下去的”——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五大上说的。

托姆斯基:小心点,你自己别掉下去了。

斯图鲁阿:不会的,我们牢牢地抓着呢。

托姆斯基:就是像你这样会嚷嚷的人才掉下去呢。

罗济特:我想,莫洛托夫同志应当同这种对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诽谤和谩骂划清界限。

我谈谈由于加里宁同志的发言而在我看来不能不提出的一些意见。我认为,加里宁同志受到全国的尊重和党的爱戴,他是党和苏维埃政权出色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大家都尊重他,可是我必须说他发言中的许多观点让我很气愤。这些观点令人担忧,所以我想谈一下。加里宁说,他也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样,不同意非常措施,可是投了赞成票。我要坦率地说,我不曾料到我们的政治局委员也会不同意,可是却投赞成票。(场内喧哗声)

柯秀尔:应当听一听,而不是胡说。

喊声:你什么也不懂。

芬科夫斯基:你就老老实实坐着吧。

罗济特:我认为这种情况是虚伪和不正常的。加里宁同志进一步是怎样发挥的呢? [加里宁同志接着说,当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就是承认非常措施的观点。]加里宁同志声称,非常措施不会妨碍播种面积的扩大。他接着说,非常措施会让农民致富。他甚至否认在现有的条件下,必须维持市场联系才能提高贫农和中农经济。加里宁同志把承认他说的这些荒唐观点看成是当代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加里宁同志接着说,没有比他更大的“个体经济,直到富农的保护者了——就算这是右倾吧”。可是保护富农,这不是“就算右倾吧”,而是十足的右倾。有些同志在发言里把事情说成这样,加里宁同志也是这么说的。假如某人去找了加米涅夫,那就是右倾,没有去的就不是右倾,我认为这种议论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我想,我以为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全会上向我们鲜明地展示了,不去找加米涅夫也可能是托洛茨基那样的党的路线的修正者,从这一边向右倾斜。我想,加里宁发言本身就证明了他虽然没有去找加米涅夫,可是他保卫了右倾路线。这是他自己承认了的。

我还想谈谈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整个事件中的作用。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审理这个重大问题时的作用。列宁是这样说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的:

“……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列宁,第18卷,第2册,第115页)<sup>258</sup>

他认为维护党的统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必须非常细致地加以执行。可是我们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是这样的:在公布政治局的记录时,要加上一篇像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那样的介绍。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方法。我本人在莫斯科的支部里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报告人从红皮书里读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有人问他是从哪里读到的,他说是从政治局的材料里。请看,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托洛茨基分子传单的基础上搞通报,可是声称这是政治局的材料。我认为,你们在讨论重大问题时使用托洛茨基分子传单的方法是不正确的、不能容许的、错误的,而对业已形成的局面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它应当反对这个决议,不让通过这个决议。

我还要谈一谈布哈林同志根据审理马利诺夫斯基一案的事实说的那些话。在报告人向全会提出的、我们正在讨论的决议草案里出现了不能容忍的滥用列宁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它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这件事

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丢了脸,我们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这个权威成为无可争议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查清楚,谁应当对滥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信任负责,是谁让它产生了误解。我认为,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斯大林:“我们”是指谁?

罗济特:我们是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威信应当是完全不能动摇的、无可争议的。至少这个事实损害了我们党的最高机关的威信,败坏了它们的声誉。

斯图鲁阿:你去问布哈林吧。

罗济特:这件事情应该检查,这种检查是绝对必要的。

我还想谈一件事。就是格鲁吉亚共产党梯弗里斯党代表会议给莫斯科党代表会议和中央总书记发来的致敬电。

梯弗里斯党代表会议在致敬电里提出了它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等同志的最低处罚措施。他们的最低要求是必须把这些同志开除出政治局。可是,要知道这是第一只春燕,是整个恶意攻击的最早的春燕之一。我是这么看的:如果说这是梯弗里斯同志们的最低要求,那请问他们的最高要求又是什么呢?我想,这个最高要求是每个党员都明白的,就是开除出党。这就是同志们的目的所在!我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至少是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向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做报告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应当反对这种含糊其词,反对这种不能容忍的问题的提法。他应当反对这样做,因为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正确地讨论让我们伤脑筋的各种重大问题。可是没有这样做。如果你们从发生在梯弗里斯同志们身边的阿扎尔暴动的角度看这件事,那格鲁吉亚共产党梯弗里斯党代表会议的“最低要求”问题就更加重要了。

喊声:这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错吗?(笑声)

罗济特:同志们,你们先别笑,还有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他在这里说,讨论这件事有关的事情是“毫无疑义的论据”。我认为,从我刚才念的、列宁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的主要任务来看,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和哄笑的同志们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从外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我以为那里没有粮食采购,也没有在俄罗斯执行的那种非常措施。所以那里不可能发生由于非常措施,由于施加压力而在主要粮食采购区里出现的那些复杂情况。那边没有这种种原因。如果你们看国家预算用于每一个居民的支出,那在这方面外高加索高于其他任何地区,至少高于俄罗斯。可是这同时也说明,在农民问题上有很大的物质基础来执行正确的政策和不至于导致农民暴动的路线。

喊声：那暴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罗济特：我认为，这一次这些事实是意味深长的：大家都不关心对农民的正确政策，而只关注清除政策。所以这一次不能对这整个事件不闻不问。

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裁减国家机关的斗争中是有成绩的，可是这并不能使中央监察委员会免除另一项任务——维护党的统一的任务。这件事同样重要，所以也不能把它忘记了。

同志们，我们正在经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我国的工业化，要和农民结成联盟来进行这项工作，以便巩固苏联的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是为了消灭阶级和建成共产主义。整个这项工作都应当同加紧改造农民经济，同在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道路上，在建设新的和老的国营农场的道路上改造农民经济结合在一起。这是无须争论的事情。而我们的工业越是发展，我们进行这种改造的物质能力就越是强大。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从五年计划可以准确地看到，由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建成，我们的这种能力将会特别壮大。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必须把工人阶级的意志组织起来，克服困难，完成这些任务，同官僚主义斗争，我们必须把群众吸引过来，我们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坚决提拔新干部，我们必须实行党内民主。为了进行这样的工作，我们应当同背离列宁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既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也特别反对公开的右倾和调和态度。

喊声：正确。

罗济特：可是我要说，有一些同志搞错了，他们总想把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说成是右派或者是调和派。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米高扬的整篇发言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认为应当完全清除他把布哈林说成是富农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的那些地方。米高扬的发言中有三个事实是无须争辩的：米高扬完全同意，而且为遭到布哈林同志嘲笑的，古比雪夫不正确的、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辩护。如果说在布哈林同志发言时还可以认为米高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这只是古比雪夫的理论，那么在米高扬发言之后就清楚了，这是古比雪夫—米高扬理论。还有，米高扬把发展商品流通和“发财吧”的口号混为一谈了。“发财吧”的口号是不对的，布哈林已经放弃了这个口号，可是存在商品流通，这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贸易人民委员在现今的条件下怎么能够放弃新经济政策的这个主要原则、这个主要特点呢？如果这样做了，那只能表明我们的贸易人民委员在经济学常识方面的理论水平实在太低了。在这样的水平上米高扬旨在败坏布哈林名声的发言就完全不对了，全错了。他没有能败坏布哈

林的名声,因为关于“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那段引文,他企图扣在布哈林头上,结果却发现是卑鄙的捏造,弄虚作假。布哈林没有这样说过,他说的是:“富农的合作社窝巢”,而且把这些富农的窝巢和租赁企业相提并论。米高扬说这本书应当广为散发。这话对,那样就不会有歪曲布哈林文字的事了,而且读一读这本书总的说来还是有好处的。

鲁祖塔克:那富农的孙子呢?

罗济特:至于“富农的孙子”,如果你对租赁企业有正确的理解,那就什么也不会改变。

斯大林:自由派。

罗济特:你关于自由派的叫喊是扣不到布哈林头上的。

斯大林:自由派是说你呢。

罗济特:斯大林同志,你总想肯定你自己虚假的、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贡赋理论,把它说成是真实的,你跟着富农把农民多付出的钱称做贡赋,而把布哈林说成是自由派,这是假话,这根本就是错误的。你的言辞抹煞不掉实际存在的真实。布哈林是我们党和共产国际最优秀的理论家。

列昂诺夫:李可夫同志,请注意秩序。

李可夫:同志们,明天终究要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了,而登记发言的同志和没有登记发言的同志都想先听一听李可夫同志的发言,然后他们再发言,所以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在短暂的休息后由李可夫同志发言。

喊声:对的!表决吧。

李可夫:我想这样来安排:我收到由政治书记处几乎全体成员签名的信,请求今天让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发言……有下面这些签名(读签名)。

假如我知道大家希望今天听我发言,那我就考虑,而且做好准备。按登记的顺序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喊声:曼努伊尔斯基可以让一让!

李可夫:也许曼努伊尔斯基可以让一让,不过我要声明一下,我没有准备。

米高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如果你没有准备,那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那我提议听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同志们,我只好从直接涉及我的那些问题开始。因此我不得不谈到许多同志发言中,特别是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发言中提到的一些事实。

首先我说说托姆斯基同志讲到政治局内分歧的历史时,他认为是分歧的起

源的一件事。托姆斯基同志指出,去年3月,在讨论1927—1928年度的工业财务计划时,我尖锐地批评了经人民委员会审议过、提请政治局批准的建议草案。是的,的确是这样的。我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关于工业财务计划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在一些关键地方写得很糟糕。我当时说,这份草案过多反映了国家计委的专家们的影响。这至少表现在1927—1928年度的工业财务计划仅仅考虑了和当时的市场情况相适应的问题。可是工业财务计划是整个经济工作的关键问题,它自然应当被看成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仅要同当时的市场情况相适应,而且要体现党的基本方针、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假如提出的草案中只是一些不很恰当的表述方式,那当然只是次要问题。可是在草案提出的实际结论中也反映了市场行情的压力。特别刺眼的是关于工业财务计划的决议表现了对发展重工业显然是错误的态度。决议在列举工业财务计划的许多缺陷时,直接指出,通过工业财务计划就意味着既不能充分保证石油开采量的继续增加,又使煤炭工业的建设有所萎缩,而且“放慢了冶金工业中新开工建设(刻赤、顿河畔的罗斯托夫的农机厂<sup>259</sup>等)的进度”。最后一句话我是从提交给政治局审议的草案中引用的。因此事情成了这样:我们在市场行情的压力下,不是进一步发展冶金工业,却决定压缩原定的冶金工业的建设计划。如果政治局不批评这个建议(虽然它事先经过人民委员会审议),却通过了它,那显然是不对的。草案必须修改。所以我在政治局尖锐地批评了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因为它们首先应该对提出的草案负责。李可夫同志对我的发言非常不满,可是他又不能保护这个错误的草案。政治局挑选了一个很小的委员会来修改上述草案,并寻找增加对冶金工业拨款的可能性。我认为,委员会的工作很有成绩。它不仅改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表述,而且为冶金工业找到了补充资金。结果非但没有阻碍刻赤的工厂、罗斯托夫的农机厂的建设工作,而且拨出资金来建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马里乌波尔钢管厂,还为建设特里别斯冶金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重型机械厂,以及建设新的高炉和马丁炉找到了资金。

所以由于我们在政治局有了一点争论,并没有发生什么坏事,反倒为我国的冶金工业发展带来了好处:推动了几个大工厂的建设,除了为已开工的工厂找到了资金之外,还为一些新的大型冶金工厂找到了资金,原定给冶金工业增加1000万卢布拨款,结果增加了3700万。为这些事是值得争论一番的。此后关于工业财务计划的决议就一致通过了。现在过去了一年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政治局做得对,增加了对冶金工业的拨款,我们增加这些开支并不是失算,而是对工业化毫无疑问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个决议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冶金工业,

可是托姆斯基同志却在这里声称,中央政治局里的分歧就是从去年3月讨论工业财务计划开始的。托姆斯基同志大可不必这样拙劣地讲述他自己同政治局的分歧的过程。无须怀疑中央和全党会批准政治局关于1927—1928年度的工业财务计划的最后决议,认为它保证了党执行的国家工业化的方针,而托姆斯基同志看来至今没有明白这一点。

就布哈林同志谈到的我的错误说两句。在十五大上,我的确在解释列宁的一段文字时犯了错误。当时说的是列宁的下述公式:“善于同中农达成妥协,一分钟也不放弃同富农的斗争,坚决依靠贫农。”反对派把列宁的这个公式和同中农结成同盟的口号对立起来,否定了列宁和中农结成同盟的思想。大家知道,这表现为我在代表大会上引用了斯米尔诺夫的一段话,他讲到容许无产阶级和中农的同盟破裂两三年。我本来应当揭露这种对立的虚伪性,可是我在维护必须巩固无产阶级和中农的同盟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时,却错误地解释了上述列宁的公式,把它归到了革命的另一个时期、保持中立的时期。我公开承认了错误,而且在致《布尔什维克》杂志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sup>260</sup>。布哈林同志企图拿我的错误做文章,可是这至少不能帮助他掩盖自己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于布哈林同志来说,特别不光彩的是他继续坚持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样根本问题上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

再说一件事——关于所谓“台尔曼案件”。布哈林同志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绕过了他。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德国共产党的右派和调和分子企图利用汉堡的维托夫盗用公款一事来破坏党的领导人台尔曼同志的名誉。很可惜德共中央的多数受了右派的挑拨,就这件事发表了一个错误的决议,破坏台尔曼同志的名誉。围绕着这件事全部资产阶级的报刊和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掀起了一场叫嚣,利用它来反对德国共产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揭露右派的挑拨,改正德共中央的错误,回击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卑鄙攻击。可是联共中央做了什么呢?虽然布哈林同志那时在高加索休假,还是就这件事征询了他的意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9月30日给他发了电报,他10月3日发了回电。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宣读了他就“台尔曼案件”发出的电报。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布哈林同志在这件事上恰好“没有察觉”主要之处。他在电报里回避了右派和调和分子在“台尔曼案件”中的反党作用问题。尽管右派和调和分子把维托夫盗用公款变成了一场反对党的领袖台尔曼的运动,布哈林同志不仅不反击这种反党的挑衅行为,反而对这次事件的政治含义不置一词。政治局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这种立场;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同不在场的布哈林同



志继续保持通信联系,因为任何拖延对反台尔曼同志活动的揭露都会给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造成巨大损失。政治局收到布哈林同志10月3日的回电后,10月4日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政治局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sup>261</sup>。在这份后来成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决议的基础的决议中揭示了所谓“台尔曼案件”的政治含义,揭露了右派和调和分子所起的作用。只能指出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政治局有了分歧,而且不知为什么没有明白这件事的主要含义。

应当认为,布哈林同志在右派和调和分子反对台尔曼同志的活动中“没有理解”主要之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可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却按照我们政治局的精神一致通过了决议。布哈林同志最好不要在这里诉说自己由于“台尔曼案件”而产生的“委屈”。因为他在这件事上是完全错了。

还有两点意见。

乌格拉诺夫同志说,鲍曼同志之所以从莫斯科省委调到中央机关去,是因为他原先和乌格拉诺夫同志持同样的立场。这是不对的。鲍曼同志被调到中央的负责岗位上,调任农村工作部部长<sup>262</sup>这件事,就足以驳斥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说法了。为什么乌格拉诺夫同志要歪曲事实呢?

柯秀尔:他不过是现在才想出来的。

莫洛托夫:的确,这是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臆造。对于如今的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来说,这种方法已经屡见不鲜了——极力把每个人都抹黑一点,给他抹点污泥,显然是想借此“减弱一点”党的集体领导。

现在说说罗济特同志的发言。用不着证明,这篇发言完全没有说服力。

雅罗斯拉夫斯基:浅薄。

莫洛托夫:肤浅,又没有说服力。罗济特同志就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某些发言提出的严厉质询完全没有道理。他认为库兹明同志的发言不准确,问我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讲话时,为什么不说一下。可是罗济特同志刚才的发言里不准确和不正确的地方还要多得多,没有必要一一指出来吧。至于波波夫同志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说,共产国际的历史是和清除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联系在一起的,那他说得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应当同各种机会主义潮流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应当不断把机会主义分子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是很有教益的。斯特列利佐夫同志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指出布哈林同志修正了列宁的学说,罗济特同志对此表示不满。那就让布哈林同志自己来证明他并没有修正列宁,他并没有按照忘记了阶级斗争,主张富农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修正列宁。我不打算证明,布哈

林同志在对待列宁主义方面没有堕落到修正主义的观点上去。就让布哈林同志自己来批驳这些指责,或者委托罗济特同志来批驳吧。(笑声)

下面谈主要问题。

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在这里一再声称:“我们不是反对派,我们也不会当反对派。”我觉得,这种声明本来应当证明这些同志不想变成反对派。可是我们近来见到的事情却说明了相反的情况。我们亲眼看到,我们党内的反对派正在形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看最近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去年6月份开始政治局内就出现了分歧,从尔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些分歧表明三名政治局委员有他们特殊的路线。现在我们不能不说,从那时起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特殊路线不仅没有消失,却反而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这条特殊路线最后终于导致了这三名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立场和中央的路线、党的路线相对立。

我简单地列举几件事情。

去年6月我们看到弗鲁姆金同志的第一次议论<sup>263</sup>。政治局试图给这种机会主义的议论以回击,可是立即遭到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坚决反对。这些同志企图绕开弗鲁姆金同志的信。在如何回答弗鲁姆金同志的信的问题上,这些同志的立场当然不是偶然的。就在6月份讨论关于粮食采购的决议草案时,布哈林同志在政治局宣读了他自己的提纲,其中宣布了同中农的“决裂”。得到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支持的这份布哈林的提纲宣读之后就被布哈林同志藏起来了,可是他们的共同路线(对富农、对国营农场、对集体农庄等等的态度问题)就在于把他们自己的立场同中央一贯执行的路线对立起来了。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政治局的这些同志加紧发表意见,例如反对对富农实行个别课税,这很能说明三名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路线。再看看最近的一些事情。今年2月我们讨论了乌拉尔州委在卡冈诺维奇同志参与下通过的、在粮食采购工作中向富农施加压力的建议。我们在得到贫农和中农广泛的社会支持下,加紧对富农施加压力这个问题上又一次遭到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坚决反对。在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投反对票的情况下,政治局通过了在收成最好的东部地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在粮食采购中加紧对富农施加压力的决议<sup>264</sup>。最后是表决代表会议问题的提纲。加里宁同志关于农村问题的提纲和五年计划的提纲在政治局都获得通过,三名同志投了弃权票。还是那三名同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甚

至在驱逐托洛茨基的问题<sup>265</sup>上,投票情况几乎也是同样的。在这个问题上上述三名政治局委员起初也是持特殊立场。

臧声:他们有什么建议?

莫洛托夫:他们建议不要驱逐,对托洛茨基或者维持原状,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应当说,这在莫斯科很快就传开了。莫斯科的各个角落都在说,某三名同志反对把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

没有必要详细地说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两个来月以前对党和共产国际提出的那些指责。他们反对党的经济政策、反对党的制度、反对共产国际政策的那些指责无非是重复我们已经听到过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指责和不久以前反对派联盟的指责。

奥尔忠尼启则:比那还要多些。

莫洛托夫:在某些方面他们可能走得更远一些,至少比初期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要远些。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反对党的制度上有许多地方都重复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指责,有许多地方滑到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诽谤的立场去了。在开展自我批评的时期,在党加紧反对官僚主义的时期,他们指责党在培植官僚主义。只有那些脱离了党内生活的人、那些丧失了对党的敏锐感觉的人才会这样说。在批评共产国际的时候,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完全滚进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直到今天,布哈林同志还企图借口他是依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为证明,他指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是他写的。布哈林同志很喜欢强调他常常为中央和共产国际起草决议。可是不要忘了,这些决议,特别是布哈林同志关于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决议草案,只是在经过出席六大的联共(布)代表团做了重大修改之后,才有了政治上的脊梁,也就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我要详细谈谈六大就主要问题,即国际形势问题通过的决议的经过。把决议的最后文本和布哈林同志起草的初稿比较一下就完全可以证明,决议的最重要条款,尤其是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的评价上有根本的修改。在评价战后资本主义的所谓“第三时期”时,布哈林同志没有指出,在这个第三时期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同它日益增长的动摇,同它日益加深的矛盾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布哈林同志关于“第三时期”资本主义稳定性问题的决议初稿包含着现在被洪别尔-德罗同志所重复的东西。洪别尔-德罗同志对右倾错误的调和态度从根本上说是同布哈林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决议的初稿中提出的方针有联系的。

再举一个例子。在反对右倾的问题上,布哈林同志的初稿里说的和六大通过的决议是不同的。布哈林同志的初稿里说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争,可是对这个草稿做了重要的补充,其中说,必须把反对右倾的斗争同克服对右倾危险的调和主义态度的斗争联系起来。最后这一点是布哈林同志的初稿里没有的。最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充分说明了对布哈林同志初稿的这个改正有多么重要。

近来布哈林同志表示要坚决反对布兰德勒—塔尔盖默集团。可是不能说布哈林同志最近几个月来在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派的斗争中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毫无疑问,洪别尔-德罗同志和谢拉同志在共产国际的讲话对德共的右派是一个支持。布哈林同志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对右倾的这种调和主义情绪。实际上布哈林在这些问题上的沉默间接地支持了这些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这就是近来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主要问题上实际执行的路线。然而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却在2月9日对共产国际进行了最令人气愤的攻击。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反对共产国际坚决把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共产党队伍的斗争。

不用多说,为了指责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只好采取从资产阶级机构那里租借来的诽谤性指责的手法。现在,在中央全会上他们指责党仿佛是站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场上。可是这只能暴露这些同志自己的立场。真正的右派分子不能不用指责党犯了托洛茨基主义来败坏党的名声,从而保护自己的立场。这些指责只不过是为他们自己反党放开手脚的方法而已。

喊声:对呀!

莫洛托夫: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不可能在我们党内捍卫自己的观点。一般说来,机会主义不喜欢公开自己的真面目:为了灌输自己的路线,机会主义总要找一些掩护。党内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一类的指责来败坏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的名声。尽管党历来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右派对党的这种指责却一再重复。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反党的这种指责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单是我列举的这几个表明他们的政治路线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和党的政策对立的特殊路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事实表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他们自己的纲领,这纲领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右派的纲领。所以尽管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企图否认事实,可是事实证明,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集团越来越成为一个定型的反对派。本

来布哈林同志应当在他冗长的发言中谈谈这些事情,可是他极力回避这些事实。

托姆斯基同志想在这里证明,指责他们(就是托姆斯基和他的伙伴们)搞宗派活动是没有道理的。托姆斯基同志想证明,可是他做不到。在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最近几个月的活动中宗派的成分是太多了。

他们对莫斯科组织内去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也要负一定责任。1928年夏季和秋季莫斯科组织内的形势表明,这些同志的宗派活动的根有多深。现在关于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莫斯科组织内工作的后期搞宗派活动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去年夏天,特别是在弗鲁姆金的信出现之后,许多区都召开了闭门会议。会上做了同中央进行斗争的准备。党组织高层领导的几个同志公开讲到了这点。比如说,可以指出佩尼科夫、留京、曼德尔施塔姆等同志。在这次全会上莫罗兹同志也谈到了这些事。显然,乌格拉诺夫同志,而且是在布哈林同志等人的支持下,那时就走上了宗派主义的疏远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同党的路线对立起来的道路。

大家知道,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判就在这个时候。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也企图在这里证明,这些谈判并不具有结成联盟的谈判的性质,并不是反对中央和党的政策的。可是那为什么要背着中央谈判呢?既然不是反对中央和党的政策的谈判,那知道这些谈判的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向党隐瞒这件事呢?为什么中央只能从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里知道这些谈判,也就是说,在这些谈判被党的敌人广泛利用之后才知道呢?从这件事,以及从谈判的内容来看,这些谈判的宗派性质是很清楚的。

再看一件事情。去年11月份,中央收到了一份由三个同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签名的辞职声明<sup>266</sup>,这是偶然的,还是不是偶然的呢?这个集体步骤显然是企图在中央将在十一月全会上做出重大政治决议之前向中央施加压力。三个人的这次集体行动有一定的政治含义——把这三个同志的政治立场同中央的路线对立起来。同时这个集体举动的宗派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不错,在政治局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同志们收回了这个声明,可是三名政治局委员集体行动这件事本身就是宗派性的明显表现。

最后,仍旧是这三名政治局委员在今年2月就所有主要的政治问题发表了一个政治宣言。这个宣言的出现说明,上述三名政治局委员的观点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同中央的路线对立的特殊路线。如果再加上这三个同志在就代表会议的两个主要问题的提纲进行表决时,投了弃权票,那么宗派的发展过程就非常清楚了。这种种事实都说明,新的反对派、新的宗派、有特殊政治纲领的新集团正

在形成。根据它发展的各种情况,它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我们党内的这种新反对派潮流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有益的东西呢?布哈林同志在全会上的发言充分表明,他的纲领的所谓积极部分是多么空洞无物,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在这方面是多么无可奈何。对李可夫同志向委员会提出的提纲草案的讨论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为提纲草案辩护,所以值得在这里谈谈这份提纲草案。

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为之辩护的五年计划提纲草案里有这样一条最典型的原则。草案说:“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指标是它规定的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原来我国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不是为克服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而斗争,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对发展国民劳动生产率很关心。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资产阶级国家也关心发展国民劳动生产率。

斯图鲁阿:这是米留可夫也能接受的。

莫洛托夫:显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需要的不是泛泛的“国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能够巩固无产阶级在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阵地的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当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提出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似乎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时,党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的。这是一条“非党的”方针,而不是党在五年计划中奉行的方针。对于党来说,五年计划的要点是在提高生产力和用社会主义成分排挤资本主义成分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值得非常注意的还有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在五年计划提纲中关于工业和农业关系问题的提法。提纲里是这样说的:

“五年计划提出了到五年结束时消灭工业和农业脱节的宏伟纲领。可是实现五年计划本身就要求在最近两年内最大限度地缓解这种脱节的后果,因为从实现五年计划的角度看,这两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原来我国存在着“工业和农业脱节”。这个“脱节”的公式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布哈林同志早在去年夏天就开始议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破裂”的政治公式在经济上的表现罢了。谁要谈论工业和农业脱节,他就必然要谈论无产阶级和农民结合的“破裂”。党谴责了关于“破裂”的废话。可是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又旧话重提,借“工农业脱节”的公式重弹“破裂”的老调。重复和加深“破裂”的错误只能表明这些同志的立场错得有多深。

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提纲的典型特点是:提纲一字不提阶级斗争,一字不提富农。要写出一份五年计划的提纲而只字不提阶级斗争和富农,也够他们

伤脑筋的！可是实现五年计划是无产阶级和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我们只有通过这场斗争，才能保证完成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铲除资本主义老根的任务；可是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却只字不提阶级斗争，不提同富农斗争。显然这样的提纲并没有反映党的路线，没有反映我们列宁主义的政策。布哈林同志在会上千方百计地试图掩盖自己否认在改造时期的现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性。为了掩盖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违背列宁主义的观点，他不惜歪曲古比雪夫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可是在得到他支持的、李可夫同志的五年计划提纲中一字不提阶级斗争，不提同富农斗争；他却认为是正确的。对待阶级斗争问题的这种态度同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李可夫同志的五年计划提纲中的其他许多缺点我就不谈了。提纲只字不提合作化，完全抹煞了储备等等。可是由于这份提纲，我还要谈两个重要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和所谓两年工作计划问题。

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极力强调必须“完全，而且只能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实行五年计划。应当说，在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力图证明必须保留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们是在闯进一扇打开的门。同时他们在五年计划提纲中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法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走入了歧途。他们不懂得，现阶段的新经济政策已经根本不同于早期的新经济政策了。为新经济政策唱赞歌并不等于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采取正确的列宁主义立场。不明白这个道理特别鲜明地表现为宣布“使市场关系正常化”的公式。这个“使市场关系正常化”的公式和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讲到的把发展商品流通作为我们摆脱经济困难的主要出路，是一致的。然而维护“使市场关系正常化”的公式恰好反映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缺乏阶级观点。必须从阶级观点来审查“使市场关系正常化”的要求。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审查这个问题。的确，富农在现有条件下会怎样理解“使市场关系正常化”呢？在我们加紧向富农进攻的时候，在我们清查粮食投机的时候，在我们按我们规定的、低于市场的价格采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时候，富农会怎样理解“正常化”的口号呢？在这种条件下，“使市场关系正常化”的口号对于富农来说，只有一个意义：它只能意味着要求取消国家对价格的调节作用和国家放弃同投机行为的斗争。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国家不能走这条路。再从另一方面看。在现有条件下，从工人和贫苦农民利益的角度看，“使市场关系正常化”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对于工人来说，“使市场关系正常化”现在就应当按照保证供应粮食、各种食品和工业品的要求

来安排市场。对于工人和贫苦农民来说,现在说“使市场关系正常化”,就是让市场首先尽可能地保证供应最短缺的食品。工人和贫苦农民宁愿对富农和投机分子施加更大的压力,也比没有粮食、没有食品好些。从工人和贫苦农民利益的角度看,并不是任何“放开”市场关系、任何扩大商品流通都可以接受的。谁也不能向工人证明,让他没有粮食吃的“市场关系正常化”对于他是合适的。由此可见,“使市场关系正常化”问题具有深刻的阶级性,而且依靠贫苦农民的工人只有同中农群众结成同盟,反对富农和投机分子,才能保证执行自己的政策。因此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宣布的“使市场关系正常化”的公式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他们关于“完全,而且只能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实行五年计划的公式就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个公式在强调现阶段必须保存市场关系的同时,没有反映在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必须加强国家的计划—调节作用。

这份提纲的特点是它有一个特殊的“两年工作计划”的思想。我引用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提纲的相应段落。那里是这样说的:

“综上所述,必须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同时再制定一个最近两年的工作计划,其中应当包括和农业落后,以及粮食供应危机有关的各种因素。这个计划应当反映为尽快纠正我国经济战线的农业方面而必须紧急执行的全部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农业税、价格政策、革命的法制等等)和物资—技术措施(农业机械、肥料、农业基本知识、农业网)。为实现五年计划的这一部分必须提供最有利的条件。”这样一来,给我们在五年计划范围内,又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两年计划。这个两年计划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必须“尽快纠正我国经济战线的农业方面”。显然,这个两年计划是在五年计划之外的一个特殊的计划。假如它不是在五年计划之外另有所图,那要它来干什么呢?

如果看看我引用的那段文字里谈到的两年计划的内容,那就可以看到它提出的是不同于五年计划的另一条路线。两年“工作计划”提出了为顺利解决农业落后和粮食供应危机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可是请看,这都是些什么措施!按照两年计划起草人的意见,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农业税、价格政策、革命法制问题上,还有农业机械、肥料、农业基础知识和农业网。似乎这些措施就是为“尽快纠正”我国落后的农业战线所必需的主要环节。可是多么奇怪,为纠正这条战线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中竟没有工业(除了农业机械和肥料之外),没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更不用说预购合同、机器拖拉机站、拖拉机队等等了。两年计划的起草者强调须要有特别优惠的条件来实施这个“工作”计划。这恰好暴露



了他们两年计划的真实含义。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提出的两年计划把克服农业落后和粮食危机的工作引向不同于五年计划的另一条轨道。这项建议的起草人强调须要有特别优惠的条件来实施这个两年计划,这就表明,他们最近两年的真实经济计划就是他们两年计划里提到的哪些内容。他们投票赞成五年计划,而这个五年计划不过是为了“使良心上过得去”。可是他们又提出了一个两年计划,而且把这个没有工业化、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机器拖拉机站、没有拖拉机队和群众性的预购合同的两年计划看成是摆脱我们因为农业落后而产生的种种困难的实际出路。他们为了“使良心上过得去”而投票赞成五年计划。实际上他们赞成的是他们自己以两年计划面目出现的特殊计划。这只不过表明,有些同志口头上准备接受党的主张,而实际上却极力贯彻他们自己特殊的路线。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提出的两年计划实际上是不要党的工业化方针,不要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这个两年计划忘记了“一件小事”:工业在提高农业和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主导作用。这个两年计划企图用不同于党所采用的办法来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困难任务。两年计划的起草人既赞成五年计划,也赞成他们自己的两年“工作计划”。这是机会主义的特点。我们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口头上可以赞成党的路线。实际上他们总想走他们自己的路。口头上他们可能赞成我们的五年计划,实际上却总是想把他们自己摆脱困境的计划塞给我们,而“忘记了”党的总路线。机会主义者会说,高速发展工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都很好,可是——他暗自思忖——什么时候才能见效呢?所以他要另找出路,而忘记了一个事实:从摆脱困境的角度说,没有工人阶级在主要道路上的前进,其他各种措施都是不够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两年计划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对党的政策的这种机会主义态度,所以我们不能同意李可夫和布哈林提纲中提出的这个特殊的两年“工作计划”的建议。

这就是对五年计划提纲的主要意见。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党的路线在其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了。这份提纲充分表明,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把自己的路线同党的路线对立起来,他们纲领的积极部分是多么没有道理。

布哈林同志在发言中讲了他自己实际建议的纲领。他的纲领是不是提出了比党主张的纲领更正确的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呢?请大家看看,布哈林同志的实际建议究竟是怎么回事。

布哈林同志提出了几条实际建议。第一是进口粮食。为了消除粮食困难,

原先也有过进口5000万普特粮食的建议。我们能够用什么办法来进口这些粮食呢?只能靠缩减工业计划。假如我们同意进口几千万普特粮食,也就是花掉几亿卢布,我们就不得不缩减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缩减为轻工业进口原料的计划。这就意味着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这就要求我们不定期地遣散几十万,甚至更多的工人。这种走出粮食困境的办法我们未必能够接受。它是由于放弃了对搞粮食投机的富农施加压力而产生的。可是它对于工业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工人阶级都不合适。

布哈林同志接着指出必须对农产品价格实行机动。他提出了按地区和按季节论价的思想。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实行了农产品按地区论价。而按季节论价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意味着在农业年度的最后几个月内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无论怎么说,布哈林同志关于农产品价格的建议只能是变相提高这些价格。不难理解,布哈林同志的建议不可能改善对城市和工业中心的粮食供应。它对农村中的富裕户和富农有利,而不会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

此外,作为克服粮食困难的实际措施,布哈林同志还提出了下述办法。他指出减轻中农税赋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是除了已有的决定之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布哈林同志指出了向农村供应农业机械和工业品的意义。可是除了业已采取的实际措施之外,他也没有在这方面提出什么新东西。布哈林同志讲到要发展合作社团体。可是在这方面他也仅限于发表一些空泛的议论。最后,布哈林同志强调了在农村中实行革命法制和取消非常措施的必要性。我列举了布哈林同志在他的实际结论中讲到的全部内容。

布哈林同志的实际提纲有一部分是无的放矢,而另一部分则是错误的。布哈林同志关于进口粮食、提高农产品价格、取消一部分现在执行的非常措施等是他实际提纲的主要特点。这些建议的含义是明白的。它们会打击我国的工业,然而对于富农它们却是自由主义的。布哈林同志的实际建议一再强调,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是在党执行的路线里寻求摆脱经济困难的出路。布哈林同志在减缓发展工业的速度、压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减轻对资本主义成分的压力等方面是能够做出让步的。难怪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在五年计划提纲里绕开了阶级斗争问题。难怪布哈林同志直到今天也不承认,由于资本主义成分加强了对我们社会主义进攻的反抗,阶级斗争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反映了布哈林同志原则性的根本错误。他直到今天也没有放弃他1925年为之辩护的、对待富农的错误理论。还在那时他就宣布了富农可以长入

我们一般的国家机构系统。现在他又重申,他至今认为他当时说的都是正确的。更有甚者,布哈林同志还想拿列宁来做挡箭牌。在为自己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辩护时,布哈林同志还引用列宁的话,明显地歪曲了他的原意。当然,列宁同“富农的合作社窝巢”长入社会主义体系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只有罗济特才会想到在这个问题上用长入社会主义体系的不但有富农的合作社窝巢,而且有租赁企业的说法来替布哈林同志的理论辩护。只有罗济特同志才会想到这可以改进布哈林同志的理论。实际上罗济特同志恰好强调了布哈林同志的理论和列宁主义不能相容。

米高扬:说得对,说得对!

莫洛托夫:即使没有布哈林同志 1925 年写的那些文章,他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也足以表明布哈林同志非常赞成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全会上的整篇发言,他把扩大商品流通作为走出经济困境的主要办法的整个方针都是对同一种理论的独特表述。布哈林同志在发言中表明,他承认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事实,不过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政策不对而引发的。他发言的意思就是要证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应当走的路必须排除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对富农施加压力。这实际上就是站在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否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在对农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的立场上。

布哈林同志对于党现在执行的农村政策的评价十分悲观。他问道:既然我们今年实行加紧向富农施压的政策,而且部分地伤害了中农,那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呢?布哈林同志这样说只是表明,他对党为提高农业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估计不足。可是同他那个微不足道的实际纲领比较起来,党为克服农业的极端落后和粮食困难所进行的工作就巨大得多了。

近来,党为提高个体农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去年决定提高农产品价格。减轻中农税负也是一项重大决策。现在开展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工作的确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单是今年预购合同所涉及的土地就不是几百万公顷,而是几千万公顷。而且提高农业不单是提高个体农户。大家知道,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国营农场的建设大大前进了,而且有特别良好的前景。帮助农业的新形式,如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正在发展,它们在提高农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不仅限于同农业直接有关的这些措施。党正在执行的加速发展工业的政策是提高农业的最重要条件。难怪党要说工业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钥匙。所以说,党在实现提高农业的任务方面并没有停步不前。党

也不是今天才提出这个问题。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方面的实际问题。

不错,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些经济措施还不足以解决向工人和贫苦农民供应粮食的实际任务。党现在还围绕着粮食问题,发动农村的广大贫农和中农群众来反对富农。我们不是简单地采取非常措施来反对富农分子,我们还围绕着这件事开展巨大的政治工作来团结农村中靠近我们的人,在执行非常措施的同时,支持贫农和中农群众。通过执行这样的农村政策,我们锻炼了农村干部,清除了异己分子,用和资本主义分子进行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的精神教育了干部。

党目前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的工作对于克服经济困难具有重大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团结在迅速发展工业的任务周围。我们在降低工业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方面的成绩,还有为完成这些任务而奋斗的方法,如开展社会主义竞赛,都表明在工人阶级中为了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我们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新任务,已经着手改造许多工会。近来,党加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有了很大改进。最后党决定检查自己的队伍,把异己分子、腐化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清洗出去。

党采取的各种措施,从直接提高个体农业经济的措施起,直到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止,对于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既在农村中,又在城市中实行这些措施,既有经济措施,又有政治措施,我们才能顺利地克服经济困难,才能顺利地解决向工业中心和贫苦农民供应粮食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要求在执行党的政策的基础上动员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右倾是发动群众力量的最有害的障碍。右倾妨碍党动员群众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而且它实际上涣散党的斗志,瓦解我们的队伍,因而是危险的。所以党现在十分注意反对右倾的斗争。

今天的反对派同志们搞不清楚什么是右倾。布哈林同志和乌格拉诺夫同志企图解释,他们是怎样理解右倾的。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清楚。他们说,他们认为那些反对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反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等的人是右倾。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右倾分子会公开表示反对。公开反对工业化方针,反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是自外于党。右倾,至少在目前是遮遮掩掩地要求收起工业化和有限地支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更应当不单是反对右倾思想,还要反对实践中的右倾路线。对于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我

们应当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反对右倾的积极战士。相反,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在使党内已有的动摇固定下来。布哈林同志去年和加米涅夫同志进行的宗派主义会谈已经证明,这些同志背离党的路线有多远。现在很清楚了,布哈林去年的动摇不是偶然的,直到最近它们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了。

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公开反对党的政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三个人过去都有过这方面的罪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布哈林同志不止一次反对过列宁。这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托姆斯基同志对于一次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独立性”决议负有一定的责任。当时(1921年)根据列宁的提议,托姆斯基同志只好因此而到突厥斯坦去了<sup>267</sup>。我们知道,李可夫同志也曾经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反对过党的路线。李可夫同志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因为反对党的政策,和另外一些同志一起提出了辞职<sup>268</sup>。因此,辞职不是什么新方法。它过去就曾经被用来反党。从这些涉及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些同志过去就和党的政策有过严重分歧。

近来,这些同志的路线使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党的政策发生了分歧。有典型意义的是现在这些同志又对斯大林同志发起了不能容忍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央没有集体领导。这种指责是完全虚伪的。昨天他们还没有这种指责,而今天由于他们同党产生了分歧,他们就谎称中央缺乏集体领导。这只不过是掩饰他们自己动摇的一种手法。这表明他们是在走托洛茨基分子的老路。我们很清楚,加紧攻击斯大林同志再好不过地表明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同党有严重分歧。斯大林同志从来没有同党发生过分歧。斯大林同志在党内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现在加紧反对斯大林只不过强调了新反对派的领导人在和中央的斗争中走得太远了。他们所使用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对中央的手法帮不了他们什么忙,而只能最终在党面前揭露他们自己。

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已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和党的列宁主义路线不能相容的特殊路线。我们必须指出是他们加紧了反对党的政策的斗争。他们走的路只能是反党的路。他们今后的所作所为将决定党对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现在同党对基本问题的观点有分歧。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仅要为自己的错误观点对党负责,而且要为他们抵制中央的工作负特殊责任。尽管中央有决定,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

志仍然抛下了党交给他们的工作,对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不能置之不理。毫无疑问,全党在谴责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观点上会是相当一致的。党也谴责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破坏党纪的行为。我们应当动员全党来反对这些同志,还有和他们一起滑向右倾的那些同志的动摇和错误,不容许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任何动摇,应当围绕着党的主要任务把全党团结起来。(鼓掌)

## 第八次会议

4月20日上午

主席(鲁祖塔克):同志们,全会现在开会了。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发言。你需要多少时间?

Cr. 柯秀尔:当然是一小时。

沙茨金:给他一小时,不过让他好好说。

主席:有反对的吗?通过了。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们,布哈林同志在四小时的发言中回答了我们国内政策的主要问题,可是他对共产国际的政策问题却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对布哈林同志报告的这种方针感到非常惊奇。我们认为,布哈林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他不能绕过那些现在已经提上日程的主要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看到德国的个别集团、意大利的个别人和共产国际机关本身的个别人试图修正大会的决议。这种修正首先就是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稳定问题。六大以后,德国的右翼分子公开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sup>269</sup>。我们不久以前还亲眼看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右翼分子的举动和他们制造分裂的企图<sup>270</sup>。全会的每一个参加者自然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布哈林同志现在对这些问题持什么态度。不能用沉默来避开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一般地声明布哈林同志同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草草了事。我想,不可能在俄国问题上维护布哈林同志在这里维护的那些观点,同时却在共产国际的政策问题上一贯地维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这种“比例失调”是政治上的破产、前后不一、混乱、摇摆、逻辑上和政治上的不连贯。我们就以资本主义的稳定性问题为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性问题,除了决定它性质的其他问题之外,还同我们社会主义的稳定问题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瓦解世界资本主义稳定性的一个因素。而我们的挫折则是加强世界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因

素。这两种稳定之间的对比关系就是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对比。谁要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性估计不足,谁要是夸大我们工人阶级现在面临的困难,他就不能不同时夸大资本主义稳定的意义。

**喊声:**说得对!

**曼努伊尔斯基:**机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自己本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同时又对异己阶级的力量估计过高。因为夸大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于是崇拜资本主义的力量。这我们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sup>271</sup>上佩珀和以洛夫斯顿为首的美国同志的多数派的立场里已经看到了。由于夸大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就产生了对工人群众的左倾化估计不足,提出了资本进攻的因素,而忽视工人阶级反抗的力量。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次日就发生了关于鲁尔冲突问题<sup>272</sup>的争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因为以布兰德勒为首的右翼分子,以及和他们结盟的调和派分子想要证明,在鲁尔冲突中我们看到的只有资本的进攻。他们完全看不到在这个冲突中工人阶级针锋相对的反抗浪潮的意义。正如我们的右倾分子在俄国问题上建议不要过于猛烈地向富农进攻一样,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分子也拒绝了关于共产党转入向社会民主党进攻的各种策略建议。如果说我国的右倾分子表现了向富农投降的倾向,那么现在我们在西欧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身上也看到了向社会民主党投降的相同现象。这里有最密切的联系。看不到这种联系是不对的,也不能用笼统地声明同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敷衍了事。

在执行我们共产国际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早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sup>273</sup>就决定了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右倾分子有什么建议呢?他们建议,在执行这种统一战线策略时,不要去碰社会民主党的痛处,不要执行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而应当执行同它们合作的政策。这反映在他们的口号中:监督生产的口号,在工人政府问题的提法上,在工会问题的整个方针中。他们也建议我们在改良主义的工会中实行“革命的法制”。

**洛佐夫斯基:**不对,是服从改良主义工会的法制。

**曼努伊尔斯基:**是的,是的,洛佐夫斯基同志,我会讲的。它们拒绝了罢工委员会保持独立的思想。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洛佐夫斯基同志的积极参与下通过了决议,认为在即将到来的经济战斗中,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应当不顾,甚至违反改良主义工会上层人士的意志,组织罢工委员会,把全体工人,包括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工人,都团结起来。德国的右倾分子拒绝了,而且现在也在



拒绝这条路线,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策略。还有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提出独立的候选人名单也被他们认为是极左的策略。

德国右倾分子的报纸《反潮流》<sup>274</sup>吓唬我们说,在选举中提出独立的候选人名单会导致工人阶级的失败,导致工会的分裂。我在下面讲到德国工厂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时,会用数字来表明这种孟什维克的预言究竟有几分正确。

联共(布)内的右倾分子和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分子绝对不是柏拉图式的。我们不妨以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党团中的争论为例。俄国代表团<sup>275</sup>拟定的路线是必须建立独立的罢工委员会。谁反对这一点呢?德国的恩德勒。

德国工会代表团分裂了。恩德勒的支持者们到哪里去寻求支持呢?我要对我们的老朋友托姆斯基同志说一个痛苦的真理:他们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里,在亚格洛姆同志身上找到了支持。

这种联系是偶然的吗?从我们国内政策问题开始的这些线索是不是延长到更远一些的地方呢?它们是不是包括了整个共产国际呢?

因此我想,我们的右倾和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类似的倾向有最密切的联系。可以避而不谈,也可以躲躲闪闪,可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同共产国际里的这些右倾潮流决裂,那就必须同某些同志,其中包括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在俄国问题上所主张的整个方针断绝关系;要么假如从逻辑上把俄国问题的立场同国际问题的分析联系起来,那就不能不跌到国际范围内的调和主义者和右倾分子现在保卫的立场上去。

[现在的右倾反对派是我们国内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过这种压力因为世界资本通过社会民主党向欧洲工人阶级施加的压力而增大了许多。]

布哈林同志现在把我们党向富农进攻的正确方针看成是退回到托洛茨基主义去了,这种情况难道是偶然的吗?德国的右倾分子在他们的机关报《反潮流》上发表的各种文章中说的难道不是同样的货色吗?请大家读一读布兰德勒的许多讲话或者调和分子在德国中央委员会全会<sup>276</sup>上的发言吧,你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对德共中央提出的主要指责就是说它又回到鲁特·菲舍尔<sup>277</sup>的体制去了。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认为我们党的方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复辟?为什么德国的右倾分子认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是恢复鲁特·菲舍尔的体制?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否认无产阶级现在能够转入进攻。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方针在他们看来并不符合力量对比。

还有,所有的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在反对我们党的体制和共产国际其他各党的体制方面是惊人地相似,这种吻合难道也是偶然的吗?请问,体制和政策能够分开吗?在我们和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一道反对联合反对派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体制改变了吗?如果说改变了,那只能是有了更多的党内民主,增加了自我批评。

喊声:对!

曼努伊尔斯基:可是只有当人们同党的路线产生分歧时,党的体制才变得不堪忍受。问题就出在这里。从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和党的路线分手的时候起,党纪的最起码条件对他们就不复存在了。现在要攻击党内体制是因为用谈论政治局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来掩盖在国内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原则性分歧,对于右倾分子来说要有利得多。可是无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全党都不会接受这种观点。它们不能阉割我们之间争论的内容,不能不看到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鲜明反映。

现在我来谈谈稳定问题。按照布哈林同志起草,后来又在俄国代表团参与下修改过的提纲,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是这样描述这种稳定性的:

“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在继续着,甚至在发展,虽然现在危机的形式不同了……稳定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在目前形势下发展是在由以前的阶段所造成的新范围内进行的,而这个新范围反过来又使所有矛盾极端尖锐化。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正在导致大崩溃、大灾难。资本主义之所以不稳定,原因就在这里。它的稳定之所以只能是相对的,原因就在这里。”(布哈林,《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3、34、35页)

这样的描述是否正确?同志们,是正确的。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提纲经过修改之后,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稳定正在遭到破坏,它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当然,这里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这里说的是它的前景,因为谁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长期的,他就不会低估工人群众的左倾化;他就会像意大利的谢拉同志那样,提出这种口号:“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退回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去”,这个口号符合我们的右倾分子后退的口号:“从党的十五大的决议退回去”或者“退回到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去”。可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听到了同代表大会的这种观点争论的另一些声音。我指的是埃韦特同志的发言(布哈林同志至今没有就令人奇怪的巧合同他划清界限)。关于稳定埃韦特同志讲了些什么呢?他在讲到奥地利起义<sup>278</sup>时,顺便谈了点资

本主义稳定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次起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左倾化的标志之一。下面是埃韦特对工人阶级左倾化的这个标志的评价:

“如果把奥地利这种只有一座城市的国家发生起义的突然因素转移到工业大国去,那就是错误的。

正是英国的总罢工和矿工罢工<sup>279</sup>既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英雄主义,同时又证明了资产阶级现在相当坚实而牢固的稳定性。

喊声:是坚实而牢固的吗?

是的,是坚实而牢固的,因为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作斗争时,并没有神经过敏。”(埃韦特,第382页。)

这是不是六大大会制定的方针呢?同志们,不是的。我们在六大上已经见到了德国的调和分子对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的悄悄的反抗。共产国际正在激烈地讨论资本主义的稳定问题。过了两三个月,这种悄悄的反抗就变成了公然修改六大的决议。政治书记处的会上提出了第三时期的特点问题。德国的调和主义分子和洪别尔-德罗同志拿出了反对德国共产党的神话,说是德国代表团根本否认有第三时期。这是不对的。个别德国同志也许倾向于走得远一些,根本怀疑存在第三时期。可是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担心,布哈林同志提出的提纲初稿可能会给错误的解释提供口实,后来他们的担心的确得到了证实。

去年11月28日政治书记处的会上<sup>280</sup>,洪别尔-德罗同志是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的稳定的:

“我想在这里谈谈六大提出的前景问题。两年前我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浪潮、英国矿工罢工等等。可是那时的稳定是不是比现在更牢固呢?现在是中国革命失败了,而德国正在进行的战斗也没有获得当年英国矿工罢工和总罢工那样的规模。”(洪别尔-德罗1928年11月28日在政治书记处的发言)

这已经是对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修改了。这里拿出了英国罢工和中国革命的失败,而且以它们为例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稳定巩固了的理论。而英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是揭示资本主义稳定的相对性的因素,这个事实却不见了。洪别尔-德罗同志接着说:

“第六次代表大会其实谴责了稳定在解体、动摇等等含糊其辞的一般表述,因为它关于稳定并没有说出什么肯定的意见。”(洪别尔-德罗1928年11月28日在政治书记处的发言)

这就是修正的源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向布哈林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布哈林同志是否赞同洪别尔-德罗在资本主义稳定问题上所持的立

场。布哈林同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布哈林同志应当明确地直接回答:他是否站在联共代表团委托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捍卫的立场,或者他现在是保卫洪别尔-德罗的立场;或者这样,或者那样,这里容不得沉默。布哈林同志是在共产国际有巨大影响的同志之一,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能够不仅仅把洪别尔-德罗和谢拉搞糊涂。这种动摇会导向何方,洪别尔-德罗的立场会变成什么模样,在法国的右翼人物克罗泽身上看得很清楚。在法国共产党最近的代表大会<sup>281</sup>上,克罗泽同志从洪别尔-德罗的立场出发,老实地得出了一切结论。我手边没有他讲话的文本,可是我引用的是我们塔斯社的报道。克罗泽同志的第一个论题是为修改六大的决议提出思想基础:“从六大以来资本主义变得更强大,更巩固了。六大以来才过了半年时间,资本主义稳定的因素就超过了危机的因素。”接着他修改我们的策略方针,他说:“小资产阶级左倾化了,所以社会民主党也左倾化了,因此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应当是反对社会民主党,而是同他们合作。所以应当重新审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那些有关法国共产党的选举策略问题的决议<sup>282</sup>。”

第三,由于对资本主义稳定的危机估计不足,其逻辑的必然就是缩小了战争危险。按照克罗泽的说法,战争危险被极端夸大了:“除了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之外,还有经济利益交叉的种种因素,例如成立国际战争赔偿银行,也在发挥作用。这是阻止战争的因素。反对苏联的战争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并不排除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能够达成妥协。现在英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英国可能被迫承认苏联。”请看,这就是稳定问题上完整的逻辑体系、成套的观点。请问,出现像伊列克这样的人难道是偶然的吗?捷克斯洛伐克的伊列克从对六大决议做一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修正开始,如今却和共产主义运动最坏的敌人盖斯、西科尔等人搅在一起。而伊列克在基本前提方面走得还不如克罗泽那么远呢。他只是不能理解,既然存在国际资本的压力,那怎么还能说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了呢,要知道国际资本对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强大了。

**乌加洛夫:**这和布哈林有什么关系?

**曼努伊尔斯基:**亲爱的同志们,假如布哈林同志走出来,公开声称他完全同意前天刊登在《真理报》上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决议<sup>283</sup>,那我就要说,这是布哈林同志为两三个月以后改变自己<sup>对俄国问题的观点</sup>而迈出的一步。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现在我要讲我发言的第二部分,关于共产国际内部的形势问题。布哈林同

志1月30日的声明对共产国际内部的形势是这样描绘的：“当领导实际上执行这样的路线，用喊叫加强制来代替说服的时候，能够集聚力量吗？难道列宁是这样领导共产国际的吗？正因如此，共产国际才没有了‘明灯’和‘热情’，而有了它自己的‘播种面积缩小’、分裂、脱离、集团（黑体是我表示的）——丝毫没有集聚力量的痕迹。”请看，这里的“分裂、脱离、集团”是和“播种面积缩小”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情果真是这么糟糕吗？我认为，事情并不像布哈林同志说的那样。

乌加洛夫：我们很高兴。

曼努伊尔斯基：请注意，当一个小集团开始离开共产国际大多数的路线时，它总是感到一切都是漆黑一团：到处都是分裂、脱离、小集团、窃窃私语。这样的小集团从打着批评什么“宗派主义的”方针、不健康的“强制”方法的旗号，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开始，到后来充其量是确实建立起一个小宗派，而最糟的是直接同“群众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混在一起。作为例证我们不妨看一看一个小集团的命运。它在不久以前为了结束所谓的“脱离、分裂、清除”政策，起来造了共产国际的反。它是怎样描绘共产国际内部形势的呢？它说：“显然，共产国际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在德国——同志们，请注意——这场危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它是可以感触到的。党在那里只不过是一堆废墟。在法国是党的危机和党外的六七个反对派集团。在只有千把人的英国党内，分裂的细菌在积极活动。意大利党虽然人数不多，但历来被认为是共产国际最成熟而内部坚强的党，如今也只是靠了它自觉地拒绝就国际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同国际中心维持着虚假的正常关系。”

这是谁写的呢？这是布兰德勒的报纸《反潮流》写的，是它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里每一个字都是谎言。“在德国这场危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实是这样的吗？工厂委员会的选举说明这样的情况吗？我马上就举出数字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只不过是一堆废墟”？为什么在这“一堆废墟”里有11万工会会员在红色工会的旗帜下和党中央走在一起，而只有10000—12000人跟着盖斯走呢？“在法国是党的危机”？在法国我们看到正在经历一个力量重新组合和我们党年轻化的过程。他们正在把过去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党变成法国共产党，变成名副其实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意大利是一幅思想涣散的图画，意大利的同志们对共产国际的重大政策问题是漠不关心吗？对于我们英雄的意大利共产党，它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就德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决议<sup>284</sup>，而且和谢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对于它有比这更厉害的辱骂吗？“英国共产

党只有1000人”吗？这样断言，用普希金的话来说，既不是“高贵的欺骗”，也不是“卑贱的真理”，而只不过是对英国共产党的卑劣的谎言和诽谤。我们并不掩饰，不同时期英国共产党员的数目在5000—12000之间浮动，在总罢工失败之后，近几年来共产党员人数减少了。可是现在，由于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和新的青年团积极分子走上领导岗位，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党员数都有所减少。这种暂时现象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这样阴暗地描绘共产国际内部的形势，他们的用心何在？他们打算把车往哪里拉呢？这种思想会长成什么东西呢？依然是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在他们的机关报上提醒大家，现在许多人在嘲笑那些1919年反对成立共产国际的人，其中就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们说：的确，成立共产国际我们是不是太着急了一些？联共在共产国际内享有垄断权，“俄国问题”决定着它的全部路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声音压倒了共产国际其他所有支部的声音。他们认为这样不妙。这种消极方针的导向就是如此。就是引向消灭共产国际的思想。

在谈到“分裂”、“脱离”的时候，能不能把共产国际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绩分开呢？我给大家提供有关德国工厂委员会选举总结的几个数字。在波户斐雷茵反对派现在得到了十个席位，而以前只有一个席位。（反对派就是共产党人和受他们影响的那一部分人。）改良派现在有七个席位，而从前是16个。

在维尔纳工厂的各个企业（有23000工人）里，反对派现在有13个席位，过去是五个。而改良派则只不过从18个减少到15个。可是这也是很大的成绩。

还有，柏林最大的一家控制着地铁，然后是有轨电车和公共马车的托拉斯，有25000名工人，反对派得到了57%的席位，而从前却只有25%。

在大工业中心之一的加勒-梅泽堡，工人总数达到65000名的57家企业中，共产党人得到234个席位，另有148席是同情者。而社会民主党人总共才有137个席位。

鲁尔的煤矿工业有大约54000名工人，共产党人得到了19000票，改良派也是19000票。有典型意义的是，过去我们只在六个联营社里获得多数，而现在是在16个联营社了。

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们无疑说明了德国工人阶级左倾化的进程。它们无疑驳斥了布兰德勒分子的悲观方针。因为不能忘了这场选举斗争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党不仅要同改良派上层人物的怠工行为作斗争，而且要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的怠工，因为他们认为不应当

在工厂委员会中独立提出自己的名单。现在我们看见了党的正确路线的结果。现在整个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为共产党人的这次胜利而嚎叫。

例如,《新普鲁士十字报》声称:“共产党人关于新策略的决定是近年来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福斯报》则谈到工会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最大的失败。

这就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策略和方针的结果。可是各国发生的罢工浪潮也许有利于布哈林同志的悲观方针吧?

例如,在法国 1928 年头十个月就发生了大约 500 次由我们的红色劳动联盟领导的冲突,其中 60% 是以工人取得完全的或是部分的胜利而结束的。如果大家把这些事实同布哈林同志到处都在分裂和脱离的说法比较一下,就立刻可以感到布哈林同志的评价的极端主观主义。可是当年布哈林同志反对我们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黄昏”理论时<sup>285</sup>,讲得多么好啊。我还记得,在联合反对派在一份文件里谈到“黄昏”时,他在这个大厅里,就是从这个讲台上对联合反对派发表了一篇义愤填膺的讲话。他当时说:被你们称为黄昏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正是千百万劳动者的觉醒。布哈林那时讲到了第聂伯建设工程,讲到了我们的劳动热情,讲到了新生活的建设者们。而反对派则被这篇布尔什维克的慷慨激昂的讲话震慑住了,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可是现在呢?言犹在耳,可是却令人难以置信,现在是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他们自己的文件里重复和当年的反对派几乎相同的失败论调。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脱离问题,现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那些牢骚满腹的人都在议论这个问题。从共产国际六大以来,我们发生过两次右翼分子脱离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一次在德国,一次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共产国际让人讨厌的行政命令作风,不善于领导,或者是因为执行了共产国际在布哈林同志参与下制定的正确方针呢?这个方针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也不是冒险的、不知深浅的一跳,它是在国际舞台上客观形成的阶级力量对比为我们规定的了。这条方针的轮廓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就已经定了。从表面上看,当时说的似乎是在竞选运动中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却是让共产主义运动随着阶级斗争尖锐化而活跃起来的问题。我国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国之内孤立的现象。我们现在是置身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冲突之中。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在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提高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它不能不是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可是这种进攻遭到了工人阶级迎头抵抗的浪潮,而且转变成反攻。日益临近的战争威

胁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化过程的表现,战争威胁首先就威胁到苏联。可是如果国际工人阶级现在不能击败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社会民主党,它就不能成功地反对资本。因此才产生了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共产党转而进攻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可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却有一些人或者拒绝转而向社会民主党进攻,或者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向我们提出警告;这样做可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方针引起了所有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的反抗,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脱离的原因就是右倾分子反抗这个方针。而且这种反抗不自今日始,它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之后就开始了,而在六大以后转为公开的造反。问题就是这样的。而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在他们提交给委员会的文件里是怎样解释这种现象的呢?他们在文件里写道:

“比如说,如果不对一系列实际问题进行最认真的研究,如果不能拿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严肃的宣传材料,如果不能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证明社会民主党倾向的本质和危害性,那就不可能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摆脱那里非常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倾向。但是却宁愿采取立即开除这样的极端措施,而不去进行这样的工作,不去争取每一个工人。”(李可夫宣读的三人声明。)

还能找到比这种经院式的建议更可笑的反对右倾的药方吗?在国际舞台上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尖锐化的时候,在阶级斗争尖锐化反映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布兰德勒分子和盖斯分子不向社会民主党进攻,却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难道还有比这种建议更软弱无力的吗?用这种毫无用处的、纯文学家的、教师爷的观点难道能解决这个问题吗?难道不是在一百步以外就能够嗅到这种观点散发出来的、布哈林同志学派培养的“讲坛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知识分子心理的味道吗?这才真正是存在决定意识。三人声明的这种断言是由红色教授学院的环境决定的。那里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任务都归结为写书,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种种危机都只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加以反映,而把共产国际为争取各个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日常斗争看成次要问题,不值得“具有批判思维”、以教育别人为天职的杰出人物注意。

只要有一个考茨基似的人物由于上了年纪而大小便失禁(笑声),拉出一摊理论稀屎(笑声),每一个红色教授就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刻写一本新的《反考茨基论》。可是要对阶级斗争直接做出反应,要在我们各个党的工作中看到必须加紧提高党员群众的思想水平,这种事情是没有的。

同志们,请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自上而下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开信而进行了好几个月的那场辩论难道不是反对右倾、争取工人的斗争吗?它难



道不是“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证明社会民主党倾向的本质和危害性”来提高党的思想水平吗？难道不是揭示了党的老机会主义上层的腐朽的红色日<sup>286</sup>为什么失败，教训又是什么？还有捷克工人阶级纺织罢工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党的群众来说，其意义难道不比党的作家们的十本最有战斗性的小册子更大些吗？工人阶级与其说是从最有教益的、最必需的书本上，不如说是从斗争的具体经验中学习共产主义和革命的阶级策略的。任何一本最有才情的书都不如盖斯们和西科尔们对纺织罢工直接的背叛，不如他们在声名狼藉的盖斯骚乱期间同警察的勾结那样深刻地揭露了他们机会主义的本质。盖斯们为了躲过风暴，情愿用双手签字，同意最左倾的书里面的理论真理和最佞屈聱牙的决议。必须经过一场阶级战斗的重大考验，盖斯的机会主义政策才会在工人阶级面前充分地现出原形。我们党在同盖斯斗争的过程中动员起来了，站立起来了，进行了最重要的思想工作。在我们深入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以盖斯为首的“我们的”工会上层对罢工委员会的口号的反抗；然后是不取得社会民主党的同意决不能举行任何罢工的观点；第三，如果没有足以保证罢工进行3—4周的基金，无论如何都不能投入罢工；第四，许多年来根据盖斯们的建议，我们的红色工会已经用仲裁制取代了罢工斗争。在自治政策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就执行了统一社会主义同盟的政策。还有在农业问题上是这样的口号：将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强迫出租或者是这样愚蠢而一无是处的口号：改善土地改革。把圣日尔曼和约<sup>287</sup>扩大到喀尔巴阡山前的乌克兰。

斯克雷普尼克：圣日尔曼的共产党员！我早就说过了！

曼努伊尔斯基：可是机会主义的这些糟糕透顶的花朵开放的时候，正是我们和布哈林同志一起坐在共产国际，相信捷克共产党在伊列克的领导下确实在布尔什维克化。只是在最广泛地开展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成千上万党员发动起来了，才把这些痼疾统统揭露出来。既然是这样，怎么还能够用你们反对“开除的极端办法”的意见来对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呢？这样的立场难道不是对盖斯和伊列克的直接支持吗？

简单说一下所谓的“自己人”理论。布哈林同志在文件中写道：“我特别反对对德国来说是荒唐的政策和领导方法，用喊叫代替论据，把所谓‘自己人’认为是主要的事情，尽管这些自己人是一些蹩脚的政治家，而且还有其他一些非常可疑的品质。”同志们，这是在影射谁呢，是台尔曼同志吗？

柯秀尔：显然是他！

**曼努伊尔斯基:**这是非常明显的。影射台尔曼同志,这真是太不诚实了。

**柯秀尔:**简直太肮脏了。

**曼努伊尔斯基:**今天在场的有德共中央的代表登格尔同志,他可以证明,台尔曼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和维托夫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布哈林同志还说,台尔曼在知道维托夫贪污公款之后,仍然在五月选举中提名维托夫为国会候选人,这样说也是不对的。维托夫被提名是在早些时候,台尔曼只是极力避免丢脸而已。可以承认,台尔曼在这里犯了个错误;可是仅仅根据右倾分子的诽谤就提出这样的指责,是不正派的。

大家都在谈论“自己人”。可是我要问:布哈林同志现在不是在同党中央的大多数决裂吗?可是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同党有几十年关系的工人。决裂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布哈林的“自己人”政策。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声音他不进去,因为有隔阂,像学派……

**洛佐夫斯基:**什么学派?

**曼努伊尔斯基:**布哈林学派。如果说自己人政策,那么促使布哈林和中央的多数分离的因素之一无疑就是他过于冒失地为那些聚集在布哈林身边的年轻同志辩护。

**喊声:**对!

**曼努伊尔斯基:**有人说:“用喊叫代替论据”。嗯,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早先就有过这种情形——只要布尔什维克开始对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机会主义者就说:你们拿不出任何论据,你们只会叫喊。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老掉牙的一套办法了。

**斯克雷普尼克:**对!

**曼努伊尔斯基:**这里有两位同志,他们是自己人政策活生生的见证。这是洛米纳泽同志,他反对过布哈林。请问,如果执行自己人政策,那洛米纳泽应当待在那里呢?为什么洛米纳泽待在库舍夫区,而不是待在共产国际呢?

**洛米纳泽:**我是根据自己的愿望。

**曼努伊尔斯基:**嗯,洛米纳泽同志,我不否认你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待在那里的。我还要问,为什么沙茨金现在不在共产国际工作呢<sup>288</sup>?同志们,现在怎么可以走上来诽谤共产国际执行自己人政策呢?

我就要结束了。我还想就集聚力量问题说几句。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提出的文件里忧心忡忡地问道:现在还有什么集聚力量呢?我们承认集聚力量,但是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的集聚力量,我们决不

会放弃对集聚力量的这种解释。集聚力量不能成为抹煞我们政策的原则性基础的挡箭牌。

臧声：对。

曼努伊尔斯基：抹煞我们政策的原则性基础的集聚力量是一种无原则的结盟，或者是党内各种思潮和宗派的联盟。有人是想通过这种集聚力量把托洛茨基分子关于党的观念塞给我们。布哈林同志显然试图和加米涅夫同志一起来实行这种集聚力量政策。我们赞成集聚力量，可是我们并不认为，集聚力量应当使党内的小集团和某些思潮永远存在。[我们曾经同迈耶尔集团搞过集聚力量，可是我们只认为那是暂时现象。]当然，从理论上说，可以否定集聚力量的原则，可以认为它就是机会主义的表现。比如，我听说，洛米纳泽同志仿佛是为了集聚力量来反对右倾，在《青年近卫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sup>289</sup>，指责我在共产国际六大以前支持德国的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

沙茨金：你在十五大上号召学习布兰德勒遵守纪律。请你现在证实一下，是不是确有其事。

臧声：没话说了吧！

托姆斯基：令人不愉快的回忆。

曼努伊尔斯基：你们能不能否认，十五大以前布兰德勒许多年里从来不曾违反过共产国际的纪律？

沙茨金：我能。

曼努伊尔斯基：听我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禁止布兰德勒干预德国事务之后<sup>290</sup>，他有好几年不曾进行过宗派活动。

沙茨金：可是他在准备。

曼努伊尔斯基：[请原谅，我同样有权说，比如，假如我想捍卫你的观点，而你后来却犯了许多错误，那我就错了……]如果说他做了准备，就是说他组织了宗派活动，那他早就该被开除了。

沙茨金：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应当有一点预见性，你否认过德国党内的右倾危险会增长。

曼努伊尔斯基：十五大上谈的是要集中火力。我们，就是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我在内，根据埃森党代表大会<sup>291</sup>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迈耶尔集团的决议<sup>292</sup>，在德国共产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执行集聚力量的政策。我们正是为了使每一个工人摆脱迈耶尔的影响而奋斗的（可是现在布哈林同志指责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这就是迈耶尔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甚至被吸

收进了德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原因。这条路线我们成功地执行过不止一次,为了达到党的团结一致而暂时和解,甚至同旧集团完全合而为一,在党的领导机构内为某些集团提供代表席位。我们在法国执行了这种政策,我们对意大利的国际主义者<sup>293</sup>执行了这种政策,我们现在在美国共产党和波兰党内执行的也是这种政策。

**洛佐夫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是的!

**曼努伊尔斯基:**可是洛米纳泽同志的立场却是宿命论的立场,把现在和党有分歧的一切都看成是清一色的机会主义,而不去分析机会主义的各种细微差别,也就是说,这种立场不把右倾分子同调和分子区分开。阶级斗争尖锐化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使右倾潮流和调和主义的潮流融为一体,而抹掉了两者实际上的差异(捷克斯洛伐克的盖斯和伊列克)。然而从我们来说,自觉地推动这个进程,按清一色的机会主义来制定路线却是错误的。

我马上就讲完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这里说,《真理报》编辑部非常愿意欢迎布哈林同志恢复原先的工作,《真理报》编辑部愿意为布哈林同志创造和谐工作的条件。我们和布哈林同志共事多年,我们和他没有任何个人冲突,所以我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群工作人员和所有在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声明:如果布哈林同志现在回到共产国际来工作,我们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来为布哈林同志的工作创造合适的环境。

**罗济特:**是在“恶意攻击”之后吗?

**曼努伊尔斯基:**不过有一个条件:布哈林同志向中央全会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准备尽力而为,可是我们并不认为,在你,罗济特同志,在这里做了这样的发言之后,在布哈林同志做了反对党的领导的发言之后,这样的发言会有助于创造让布哈林同志恢复工作的环境。我们认为,在我们可能会遇到困难的情况下,领导的团结一致、党的思想意志的团结一致是克服困难的先决条件。

**主席:**现在按顺序是丘巴尔同志发言。可是李可夫同志请求让他现在发言,免得他的发言被午休打断。

**喊声:**对!让他现在发言,不过先稍稍休息一下。

**主席:**休息十分钟。

(休息后)

**主席(鲁祖塔克):**李可夫同志发言。李可夫同志请求在休会之前都让他讲。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李可夫：同志们，我在准备自己的发言，没有听到莫洛托夫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发言，所以我大概不能像听了他们的发言之后那样有说服力地回答他们提出的论据。

提请联席全会解决的是改变党的领导机构——政治局的组成问题。实际上指的是我、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是否还留在政治局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一些党组织做出了相当多的决议，要求把我们开除出政治局。由于这个方针，所以有些部分……

波隆斯基：没有说要把你开除出政治局。

李可夫：波隆斯基同志问，把我，还有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是不是我的方针。

[波隆斯基：不是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没有明白，决议里没有说要把你……]

李可夫：我不来引证要把我开除的那些决议了，免得全会烦心。就在不久以前，4月11日，莫斯科一个区的党组织还做出了这样的决议。

波隆斯基：没有这样的决议，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李可夫：至少是我得到了这样的草案。也许这是伪造的，我不知道……

喊声：什么草案？

李可夫：关于本次全会应当解决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是否继续参加政治局工作问题的草案。

喊声：是哪个区？

李可夫：也许是哈莫夫尼克区，也许是鲍曼区，我不记得了。你们应当比我更清楚。

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就领导问题做出激烈的决定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有一些在政治方面全部或部分同意我的主要观点的同志建议我采取稍微“灵活”一点的做法，为的是避免最激烈的决议。他们的理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对我说：“你不妨委屈一下，使自己能保留工作的机会，让那些想避免激烈措施的意见占上风。”

我是这样回答这些同志的。既然讨论的是一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而我又真诚而且坚定地相信这些问题必须得到一定的解决，那这种灵活对我而言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我言不由衷，要我撒谎。这就是说要欺骗中央，欺骗全党。我接着说下去。就算我一时这样做了。那党内以后还能对政治局，对中央

委员会有信任吗？如果我或是别人在中央全会上撒了谎，那这对全党都是一个致命的先例。保持统一的愿望怎么能够同建议那些被党置于重要岗位上的人在中央全会上讨论重大政策问题时，不从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出发，而从保住自己的领导位置来发表意见联系在一起呢？不但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有这种想法本身都是丢人的！而且不仅是对我，还对那些有这种想法的人！我坚决声明，如果今后还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就把他赶出去。

当然，完全可以不争论某些小问题，不为分裂制造什么借口，把这些问题放一放。可是对于那些受党的委托，负责苏维埃方面，也就是涉及全国和我们苏联全体居民方面的重要工作的同志，对于那些受党的委托，负责工会方面，也就是涉及非党工人群众的工作的同志，对于那些受党的委托，负责共产国际方面，也就是涉及世界工人运动的工作的同志——对于这些同志不能要求他们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对政策和党的生命问题不说出自己的意见或是撒谎。

**这样的要求不但损害我们的尊严，而且损害全党的尊严。**

因此根本谈不到要我们中的某个人承认我们认为不正确的东西是正确的。哪怕我们只是想到用这种方法有可能解决领导问题，这也是党的整个领导制度的毁灭，因为如果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就重大政策问题和党内生活问题进行公开的激烈争论，那就意味着这些问题在其他某个地方进行争论和解决。

这里举了不少例子，说李可夫在这种或那种场合投了这样的票，而不是那样的票。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我就驱逐托洛茨基问题的投票。他说我投票反对驱逐。是的。我投了反对票，可是我对谁都没有说过。在向工人发表的所有讲话中，我都维护了政治局的决议。这项决议通过以后不久，我在莫斯科的许多工厂都讲了话，而且到处都维护了驱逐托洛茨基。今天在座的一些同志听过我在工厂的讲话，他们可以作证。驱逐托洛茨基问题是很明显的事情，是个大问题。我们在政治局内争论过。反对驱逐托洛茨基的有我、托姆斯基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布哈林同志是赞成驱逐的。

**伏罗希洛夫：不过这本来可以不谈的。**

**李可夫：**可是在政治局之外，我在哪儿也没有讲过这件事。我第二天就在工厂维护了政治局的决议。可是现在却有人跑上来，大张旗鼓地宣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确实争论过，提出对某个决议有利的论据。我说过，我担心托洛茨基会遭人杀害，因为他曾经是红军的组织者。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处决过许多白卫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民间的传闻在很大程度上把这归咎于托洛茨基的个人责任。这些被处决的人有许多亲友住在国外。他们个人的仇恨是很深的，

因此托洛茨基很有可能被杀害。

伏罗希洛夫:这本来可以不在这儿谈的。

李可夫:那你为什么要在联席全会上把这个问题挑出来呢?

伏罗希洛夫:我说的只有你说的百分之一。

李可夫:我再说一遍,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我投了反对票,然后就在工厂里维护政治局的决议。

什么是集体领导呢?我们在政治局里争论,彼此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时大家一起维护通过的决定。我们一次也没有破坏过这种程序。你们谁也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我在工作中违背过政治局的决议。

伏罗希洛夫:我们走着瞧吧!

李可夫:那你就瞧吧,你要是找出来,你就说好了。在目前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事例”,那还不早就拿到讲台上来了吗?为什么没有人讲呢?因为没有这样的事情。

既然我不得不从托洛茨基讲起,那就请让我把这个问题说完。

我反对驱逐出境的第二个考虑是,托洛茨基在国外可以比在国内更容易地开展他反革命的、反苏联的活动。也许我的论据是错误的,没有说服力,可是不能用这些论据和我的投票在党内搞投机取巧的活动。

党的统一、党的集体领导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意见斗争之间没有矛盾,只要领导机构的所有成员都执行通过的决定,而不管他们是处于多数还是少数。

而且环境越是复杂,文化水平越高,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成长越快,我们面临的问题越复杂(总是不断有新问题提出来的),争论也就会越多。

问题的实质在于,既然有了决议,我们就应当像一个人那样行动,可是在制定决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他认为是必须的那样进行争论和投票。这种情况和党的领导的统一没有任何矛盾。

莫洛托夫:关于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决议是中央通过了的,可是你并不支持它。

李可夫:这个我要说的。可是无论是托姆斯基同志还是布哈林同志,在他们工作的时候都不曾违反过党的决议。至少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这种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工作是对全国的,面对全党的,也是面对非党群众的,它从头到尾都是统一的。在这方面必须保持党的传统。伊里奇当年(在党的十大上)说过:

“如果根本问题引起了分歧,我们就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们向党呼吁的权利。我不能设想,我们怎么可能这样做。”

而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讨论,在政治局里谁是怎样争论的,又是怎样投票的!如果人们彼此争论,那就很明显,在争论中不可能大家都是对的。这一次是某人错了,下一次是另一个人错了。这对集体领导而言是完全必然的。

可是现在我们实际形成的工作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我举几件事,只不过是说明这种环境。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之一就是指责我故意压缩了粮食供应计划,刻意制造经济危机。这种指责刊印在你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皮书里。请看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顺便说说危机。现在没有危机,将来也不会有,虽然他们(也就是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A.李可夫)希望有危机。

**布哈林:**他们希望?

**斯大林:**我可以公开告诉你们,你们是在等待危机……”

接下去:

“……前几天,政治局收到一个建议,要求大量缩减粮食供应。这是一种针对消费者,而且首先是针对工人的类似非常措施的东西。我对这些同志建议把粮食供应量减少到最低限度时的那种轻率感到吃惊。那些害怕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人,现在却非常轻率地决定对粮食的消费者采取这项非常措施。情况是否证明这种措施是正确的呢?不,不能证明。他们不过是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走投无路……”

当时没有让我发言,虽然在斯大林讲话之后,我曾经要求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你没有要求发言。

**李可夫:**不对,我在斯大林同志发言之后登记了,可是讨论被终止了。假如我当时有发言的机会,我是会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讲下面这番话的。如果你们确实认为这些指责是应该的,那么你们就应当像任何一个革命者一样,把可以对其提出这种指责的人逮捕起来,因为这种指责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搞破坏活动的指责。指责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搞破坏活动!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怎么能够容许提出这样的指责,而且载入速记记录,散发到全国,可是对我却没有任何处置,甚至选举我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主席?!

**伏罗希洛夫:**可是你一直在主持会议,连周一例会<sup>294</sup>都是你主持,你却一直



没有说什么。

李可夫：问题就在这儿！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表明，甚至负最重大责任的人都可以断言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我深信，假如斯大林同志真的相信这种指责，他就会要求立即逮捕我，并且处以枪决。

伏罗希洛夫：这太不严肃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李可夫：我念的是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速记记录，没有添加一个字。现在我只想添加的是：供应计划（我为它而被指责为搞破坏活动）几天以后由政治局通过了<sup>295</sup>，可是我们不能执行！这是事实，计划由政治局通过了，但我们不能执行！不过知道这个事实的只有极少数人，而斯大林同志的诽谤却得力于红皮书而广为流传，至少是在党内。

第二个例子是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讲到的，而早先（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也讲到过的，就是我召集会议来讨论因为执行今年的经济计划而涉及的财政问题。

我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应两个最大的机构（国家银行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要求，召开了闭门会议（不做速记记录），听取他们关于今年财政计划出现缺口的原因和缺口大小的汇报。我们认为：第一，他们夸大了财政困难。第二，我们在同一时期内消除了困难。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提高了伏特加和烈性酒制品的消费税（这项决定得到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批准），决定通过削减过多的储备和物资，挖掘工业和运输业的内部潜力达2.5亿卢布。第三，为了化解困难，提高运输业的收费，这笔收入大约有几千万卢布。此外在执行已经批准的预算时，我们制定了按季度的预算行动计划。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正确的。

如果事先不在极小范围的保密会议上研究最大的机构提出的重大、复杂，而又不十分明显，因而不便直接提请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讨论的问题，那该怎么领导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呢？！我断定，不这样是没法工作的。不管卡冈诺维奇同志怎么说，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这样做的。

谈谈工资问题。正如施米特同志说的那样，在降低价格的总政策下，有可能降低名义工资的问题是皮达可夫同志在这次闭门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在其他任何会议上皮达可夫同志都不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可是不知为什么皮达可夫同志的这条建议，谁也没有赞成过，哪儿也没有记录在案，却受到大家质疑；而且在几个人的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这项建议，却闹得党内无人不知。而且在议论的时候并不指名道姓，只是同人民委员会联系在一起，显然是指望借此也给李可夫“栽”上点什么东西。

在这次会上,我指出,说财政计划有巨大缺口是言过其实。

顺便讲讲预算,免得以后再回过头来说它。我要说的是,虽然在这个阶段上财政困难得到了多少是顺利的解决,可是决不能因此而认为,年底以前财政计划可以百分之百地顺利执行。

[伏罗希洛夫:可能是这样。]

执行还会有困难,所以大概还要召集类似的会议来确定困难的程度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这个问题大概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都要审议,要采取一些新措施来实现今年的财政计划。

再举一个这里已经提到的例子,就是阿扎尔暴动。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在我看来,它作为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它表明了外高加索党组织领导的缺点。当地的领导犯了令人发指的错误。可是这次暴动事件本身比起当初格鲁吉亚暴动来,其意义要小多了。

奥尔忠尼启则:你和布哈林在这里有分歧。

李可夫:也许吧。我和布哈林在所有基本方面毫无疑问是一致的。在个别问题上,在个别实际建议上,我们之间当然是有分歧的,我们丝毫也不隐瞒,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宗派集团。我当初曾经和布哈林同志就他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争论过。我直到今天也还是保留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其余的问题上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

我举阿扎尔的例子,为的是说明领导机构里形成的那种关系。我是3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知道这次暴动的。无论是我还是政治局其他成员,除了斯大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之外,谁都不知道这件事。第二天我要求政治保卫总局说明,为什么向我隐瞒了阿扎尔暴动这件事,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同志,关于阿扎尔骚动的通报我按照党的系统呈报了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和军事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同志和温什利赫特同志。上述通报没有及时向你呈报是我的疏忽。签名”

乌格拉诺夫:好一个疏忽。

臧声:是谁的签名?

李可夫:是亚戈达同志的签名。这张便条我是26日收到的。就算是疏忽吧。可是在同一个问题上的这种疏忽在将近一个月内不断地重复着。政治保卫总局收到的电报数目相当不少,而且内容都很重要。比如说,3月8日的电报里说:

“3月7日阿扎尔的胡林县内,齐万河沿岸的许多村庄里都出现了阿扎尔人

的骚动,借口是抗议关闭宗教学校和禁止戴面纱。”

接下去:

“与出事地点的电报和电话联系中断了。前往骚动地区的阿扎尔人民委员会主席戈戈别里泽和执行委员会主席苏尔马尼泽,以及一些负责干部和肃反工作人员落入匪徒手中。局势严重。”

政治保卫总局出现了疏忽,这封电报没有送给我,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没有拿到,除了斯大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之外。

3月12日的电报:

“和暴徒在茨赫莫尔什、希乔里、齐万、利克塔等地,以及胡林警备队哨所地区发生的冲突中,我方有5人被击毙,9人受伤。敌方伤亡大致相同。”

又一次“疏忽”:除了斯大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之外,无论是我还是政治局都不知道这封电报。

3月22日的电报:

“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决定:为消灭胡林县的暴动,使用巴统的两营驻军和阿哈尔齐赫的一连驻军……”

……又一次同样的“疏忽”。

3月24日的电报:

“先头部队21—22日到达哨所。双方损失都不大。”

又是一次同样的“疏忽”。

3月25日的电报:

“我方3月24日损失——两人负伤。敌方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击毙6人,负伤2人,被俘29人。”

又是同样的事情,又“在同一地点”!

这样的电报在一个月里收到的大约不少于15份,而对于每一封电报都必然出现“疏忽”!

这是什么意思呢?有这种处境的并不是我一个人。除了斯大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之外,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全都是这样的。许多人不知从哪儿得知了阿扎尔暴动的事,跑来问我,阿扎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执行委员会主席落入暴徒手中,是不是真的。我回答说:“你们疯了吗,这是谣言!”

这就是我们现在形成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要参与领导,为工作负责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乌加洛夫同志从列宁格勒来,见面后问我,是不是

我下令把拖拉机和大型农业机械出售给富农经济,他指出,现在党员中间有些议论。的确,在一些支部里有这种议论。起因是这样的。瑟尔佐夫同志和埃赫同志接连发来两封电报。其中一封说:

“我们在民族区党委书记和民族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小会上全面讨论了局势,认为必须而又最能够被接受的方案是:在西伯利亚境内实行将抵制粮食采购的大粮食生产者的余粮以公债的形势强制划归国家所有。划入这个范畴的农户占6%—8%。公债规模1500万—1800万普特。划归国有的粮食偿还期:用货币支付的是一年以后,用粮食支付的是两年以后。拒绝交付公债的处罚办法:处以欠交粮食价值五倍的罚款,个别情况下没收全部财产并驱逐三年。”

政治局拒绝了这封电报提出的建议<sup>296</sup>,正如我们当年拒绝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联盟提出的类似建议一样。就反对派强制借粮的建议,莫洛托夫同志当年说过,维护这种建议和党籍是不相容的。他一般来说是喜欢动不动就以党籍相威胁的。

莫洛托夫:我可没有说过这种话。

李可夫:不对,就是莫洛托夫同志说的。如果莫洛托夫同志至今还持这样的意见,那他现在应该把多少人开除出党了。如果我们也走莫洛托夫同志的这条路,那我们就会因为同一种意见,今年把一个人开除出党,明年又接收他人党等等。

另一封电报是这么说的:

“近来我们收到苏维埃方面的许多指令,我们觉得,它们同十五大和中央全会决议规定的基本政策方针有根本分歧。第一,苏联人民委员会2月9日的命令建议把向农村上层,也就是富农阶层出售的农业机械的比例增加一倍,同时给他们价格上8%的折扣……”等等。

“……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各专区党委书记和代表会议的一些代表请求立即改正这些指令,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指令曲解了党的总路线,可能造成党的队伍涣散,削弱对贫农的支持,使中农迷失方向,加强它在农村中的经济威望,特别是政治威望。请立即用直达[电报]回答。瑟尔佐夫、埃赫、基西斯”

在一些支部里就这封电报议论说,它是李可夫在苏维埃工作中违反党的指令的具体证明。我和中央机关详细调查了这个问题。原来这个问题无论是人民委员会,还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都不曾讨论过。它是用签名的办法通过的。它的前前后后,以及怎么签的名,我毫不知情。这个命令不是我,而是鲁祖塔克同志签署的。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鲁祖塔克同志执行右倾路线。我们的工

作太繁重了,因此可能在某个场合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问题不在这里。可是我想问一问,假如不是鲁祖塔克同志,而是我签署了这份文件(要知道我的负担并不比他轻些),那时会怎么样呢?

臧声:那就再一次展开攻击罢了。

柯秀尔:那就改正错误好了。

李可夫:不单是改正的问题,那就要向所有的支部通报李可夫的富农倾向了。

乌格拉诺夫:对!

李可夫:甚至到了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绕开了我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甚至现在,这件事还在被用来作为反对我的根据。我提到这些话题,只是为了点破已经在流传的许多神话中的一个。

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些事情(它们在类似的事情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只是为了表明,这次联席全会必须对领导问题做出治本的决定。

我再就什基里亚托夫同志的发言说两句。他为自我批评辩护,而且完全正确。他说,你们何必感到委屈呢,我们批评所有的人,对你们也一样。因为你们对工作的影响比别人大一些,批评你们比批评其他人更有意义、更有必要、更有教益。

什基里亚托夫:我不是这么说的。

李可夫:最后一句是我说的;什基里亚托夫同志说的是:你们应当也像普通党员一样接受批评。我在这方面想要走得远一点:我们应当比普通党员更多地接受批评。我从来就不曾反对过批评。我反对的是颠倒是非的批评,不公正、不老实的批评。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局面:我在国内、在支部里、在全党、在全会上、在报刊上都像一名普通党员那样受到批评,而且“批评”证明了我是一个右倾分子,我反对工业化所必需的速度,反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等。

我要问,在这种情况下,党能够容许我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吗?我们的党员超过百万,谁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从一百万,甚至超过一百万党员中偏要挑选一个右倾分子来当人民委员会主席。

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就不行呢?

李可夫:奥尔忠尼启则同志问:为什么就不行呢?确实能够证明我们犯了许多错误的批评,其后果对于我们这些被党安排了负责工作的人,和对于普通党员是不同的。这样的批评客观上必然要求在一定阶段做出某种调动或者“组织处理”。这是客观的必然性!问题完全不在于如果在什么地方到处说我是“右倾

分子”，到处宣扬我的某些似是而非的错误，我是不是感到委屈。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处境是很讨厌的，因为你们把我摆在这样的岗位上，你们要对全国负责。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在我身上你们要对全国负责，因为在你们中间，很可惜，我是站在党和非党、党和国家连接的制高点上的人。一个犯了许多错误，而且还在继续犯错误的人，一个因此而不断受到批评的人，能够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吗？你们怎么解释呢？全国瞩目的工作应当委托给那些得到党的信任、德高望重、久经考验的人。他们应当不仅不辜负党对他们的信任，而且不辜负全国对党的信任。你们应当推举思想最坚定、最受信任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工作。所以在批评（不管是带引号的还是不带引号的批评）的一定阶段，我们作为执政党，不能不对这些人做出组织处理。这是无法回避的！

**什基里亚托夫：**能不能批评那些违犯纪律的人呢？

**李可夫：**什基里亚托夫同志问，能不能批评那些违反纪律的人。我的回答是：可以而且应该批评那些违反纪律的人，还有那些犯有其他错误的人。如果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想把批评仅仅限制在这方面——违犯党的纪律，那他就错了。我们需要党的纪律不是因为纪律本身，而是为了实现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在我们苏联和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批评还应当指向另一方面——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怎样工作。施基里亚托夫同志这一次好像可以同意我的看法了。

**什基里亚托夫：**不管他们处在什么岗位上！

**李可夫：**是的，应该批评，也可以批评任何一个党员。党员的职位越高，他们的工作越重要，他们对整个局势的影响越大，就应该对他们进行越猛烈的批评。

波斯特舍夫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和他在上次全会上一样，就辞职问题说是“背叛”。辞职、提出辞呈，按波斯特舍夫同志的说法，就是背叛。我上一次就回答他说，列宁曾经提出过辞职……

[波斯特舍夫：列宁提出过辞职，可是他留下了……]

**李可夫：**他上次用一个拉丁成语来回答我——“放在朱庇特身上是光彩的事情，放到一头牛身上就不光彩了”。好的，就算朱庇特和牛之间有差别！可是连斯大林同志也提出过辞职，而且不止一次。这算什么呢，是背叛吗？

**臧声：**可是他是不是服从中央了呢？

**李可夫：**如果辞职本身是背叛，那么提出辞呈就是企图背叛。斯大林同志一再提出过<sup>297</sup>。我手头有一张他提出辞职的便笺（1926年12月27日写的），是这样说的：

“我请求解除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我声明,我不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我没有力量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И. 斯大林”

臧声:没有解除,所以他又继续工作了。

臧声:可是他是不是服从中央了呢?

李可夫:有人问我,他是不是服从中央了。咳,我想,他提出辞呈就是为了“服从”嘛。(笑声)

臧声:你太过分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卡冈诺维奇:这话很机智,可是并不聪明。

斯克雷普尼克:他提出辞呈是不是想和党较劲呢<sup>298</sup>?

李可夫:难道提出辞呈都是想较劲吗?我觉得不是的。如果辞职是为了组织宗派,搞宗派活动,用不能容许的方法来保卫自己的意见,那就是较劲。可是在这次全会上,无论是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还是其他人都拿不出一份文件来证明布哈林同志或者托姆斯基同志在搞宗派活动,谁也拿不出这样的文件来。在这种情况下,辞职不是较劲。

我向你们描述了我的工作环境。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工作环境还要恶劣上千倍……

臧声:可是他们并没有工作呀。

李可夫:既然仅仅因为同意托姆斯基同志的意见就有一大批干部被撤了职,那怎么还能工作呢?既然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这样的环境,而他们的工作,无论是工会方面的还是共产国际方面的,又非常复杂,他们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些工作。不论批评是否正确,这种无休止的批评走得太远了,以至人人都清楚,领导机关不再信任他们了,或者至少在在一定程度上不再信任他们了。不信任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和他们意见相同的人都被撤了职。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是不是鉴于整个环境才提出辞职的呢?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们不会把两种因素(对我的批评和把我留在一定的岗位上)的“结合”搞到这种地步,让我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嘘声赶下台来。大家都明白,这不是对于我个人有多大损害。我的威信和我的工作是全党的事情。我是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对我的打击,或者破坏我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声誉都是对党的打击。所以应当及时做出组织处理,或者及时改变工作环境。而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正是被置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之中,所以他们提出辞职是正确的。我支持他们辞职,因为我认为,一个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执政,又领导着亿万人民的党,既然把对为领导工作向全国负责的那些人的批评(借用什基里亚托夫同志的说法)

搞到了现在这样的程度,它不会不受到惩罚。这是对全党有害的。这一次是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被置于无法工作的条件下,而政治局的多数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工作的。

这里有人说,他们不服从政治局的决议。我一点也不打算证明这里没有违反纪律的事。可是仅仅指出违反纪律的事实是不够的,还应当考虑,为什么会发生违犯纪律的事情。某一次违犯纪律是出于一种原因,由于一种情况;另一次违犯纪律是出于另一种原因,由于另一种情况。在这两位同志工作的环境里有没有迫使他们辞职的重要原因呢?

奥尔忠尼启则:什么原因也没有!

李可夫:奥尔忠尼启则认为没有,可是我要说,有这样的原因。现在这两个同志被指责说他们已经有六个月不肯工作了。这六个月是从何说起呢?他们(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曾经在政治局通过决议,拒绝他们辞职的当天,向我们、向联席全会提出申诉。假如我们第二天就召开会议,那我们就可以比现在更好地掌握局势。

臧声:那不是申诉。

李可夫:那是申诉。假如联席全会第二天就召开会议,那全会就可以比现在更好地掌握局势,因为现在全会面对的事实是各个地方组织根据片面的报道已经做出了决议。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央的控制。不单是广大党员群众知道这件事,而且非党工人都知道了,它成了近五六个月来国内整个政治生活的大事情。我认为,现在只好从这几个月里业已形成的局面出发了。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解决个人问题。我们的所有决议都应当从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从党在国内工作的环境出发。假如立即召开了全会,违犯党纪的行为本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六个月里许多东西都变了,或者说“被改变”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纳扎罗夫:先去工作,执行政治局的决议,然后再提出申诉,在这里进行讨论,这不是更好一些吗?

李可夫:谁应当先去,去哪儿?我不明白,纳扎罗夫同志,谁应当去,又应当去哪儿?

纳扎罗夫:去哪儿,去工作呀。

李可夫:去工作?我说了我的工作条件。我说了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工作条件还要坏一千倍。也许,到那里去是可以的,可是我认为,在那里坐不下来。(笑声)



下面我来谈我们的分歧。

我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说过,我们和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有一些细微差别,可是这些细微差别在党的总路线的范围内正在逐渐缩小。就分歧的范围我们在今年2月9日的声明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农问题。我们认为,在最近的党代表会议上改革农业税、向农村供应机械的措施、提出中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我们之间曾经存在过的、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某些分歧。所以上面谈到的分歧(不是和决议的分歧,和决议根本就没有分歧)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何况党的所有领导同志都应当和谐地工作,何况这种工作必须是卓有成效的。”

那时我觉得,细微的意见差别可以消除,到开党代表会议时,我们的意见分歧即便不能完全消除,也会小得多。可惜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分歧依然存在,而且到现在仍然是在统一的总路线范围内。首先,这些分歧涉及怎样评价我们正在经历的困难,以及怎样克服困难。我一再说过,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同政治局的多数人有意见分歧。我以为,两年来我们所经历的危机现象不能说是季节性的、市场行情的、偶然的,而且一年之内就能够缓解的。我想,这些危机现象要深刻一些,而且更长期一些。因此为克服这些现象,必须采取更为广泛、更加长期的措施。在消除这些危机现象时,不能仅仅限于采取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应急的措施。各种争论和分歧的其余环节都是围绕着这个主要问题而展开的。评价局势方面的分歧,在我看来可以追溯到1928年底,甚至是1927年底。在评价去年的困难时,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多数委员,认为,“我们在播种面积和总产量方面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斯大林),“农村在成长,日渐富裕起来,首先是富农成长起来,富裕起来了”,“三年好收成不是没有成果的”,“今年的余粮比去年并不少”,国内有许多粮食等等。用这种方式表述的评价,其主要思想就是:我国的问题不是粮食太少,也不是粮食生产落后,而只不过是怎样拿到粮食。“要善于搞到粮食”——这是一个细微差别!另一个细小差别是:不否认富农把持着粮食,应当从富农手里拿到粮食,但是认为,富农的这些花招,而且总的说来粮食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只有在国内粮食总量不足的情况下才会有重大意义。因此,在战胜富农阶层种种反抗的同时,克服业已形成的困难的主要方法是增加粮食生产。我们的出发点是不停止同富农阶层的斗争,同时全力以赴,增加粮食作物的生产。如果你们看看过去一段时间的报刊,注意一下争论和法律等等,你们就会看到,不同意见的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个主要问题——对困难的评价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而进行的。我们现在的习惯做法是把人分成乐观派和悲观派……

伏罗希洛夫:还有惊慌失措派。

李可夫:按照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插话,“还有惊慌失措派”。事情可能是这样。不过至少无论是我,还是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都不能归入这一派。

伏罗希洛夫:不,这跟你没有关系。

李可夫: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这跟我没有关系。显然这跟他的某一位至交有关系吧。(笑声)对目前局势评价上的差异不仅表现为对我们政策的重大问题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对局部问题也持不同态度。例如,有些人相信,按现有情况,扩大秋播面积是有保证的;另一些人则对这种前景持谨慎态度。由于政治局委员对一些地区的秋播工作有不同估计,有人就在这中间寻找什么倾向。比如说,对北高加索就是一个例子。斯大林同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就讲到了这个问题,说是布哈林太轻率了,他竟然相信像格罗曼这样的,按斯大林的说法,异类分子关于北高加索秋播面积缩小了的胡言乱语。斯大林同志向我们保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党组织“改正”了“异类分子”的统计数字。把一些局部问题的争论提到这样原则的高度,这种趋势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完全是由于对困难,对困难的深度评价不同,而这对于争论的双方来说是都有的。那么秋播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有了中央统计局经过订正的官方数字。请大家注意,秋播面积问题是一个经济上的大问题,因为秋播提供大约60%的粮食(黑麦和小麦)年产量。那么秋播面积的最后数字究竟是多少呢?如果以去年为100,那今年全苏联的秋播面积是97.1,也就是说,减少了大约3%。全部个体农户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了4.2%。公有制成分的播种面积和去年比是180.2(以去年为100),其中国营农场是129.2,集体农庄是242.4。从这些数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从党的政策角度看,我们应当继续扩大哪些数字,加快哪些过程呢?首先是加快公有制成分播种面积增加的进程。同时也应当鼓励个体经济扩大播种面积,当然,富农除外。秋播活动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呢?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142.4%,可是由于它的比重太小,不足以弥补个体经济播种面积的缩小。从秋播的总量来说,面积减少了大约3%(2.9%)。这个总计数字说明,今年以及最近几年内,在粮食生产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个体经济。今年个体经济的作用很大,以至集体经济的播种面积虽然比去年扩大了将近一倍半,但仍不足以弥补个体经济播种面积的缩减(4.2%)。

臧声:是三分之一。

李可夫:各共和国里集体农庄播种面积的增加(外高加索除外,那里公有制的播种面积是稳定的,而个体经济的播种面积增加了4.9%)是和个体经济播种

面积的绝对减少同时发生的。白俄罗斯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增加了200%，个体农户增加了1.3%，而播种总面积增加了1.8%。乌兹别克个体经济的播种面积是稳定的，集体农庄则扩大了200%，而总播种面积增加了0.3%。土库曼维持原状。

**奥尔忠尼启则：**按地区算怎么样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李可夫：**按地区算吗？我可以举出北高加索的数字：总播种面积是去年的89.4%，私有制的播种面积是85.1%，公有制是250.5%，其中集体农庄是286.7%，国营农场是153.6%。如果中农户没有缩小播种面积，私有制的面积能缩小这么多吗？我说不能。

**臧声：**富农户缩小了很多。

**李可夫：**富农缩小面积不可能导致总面积缩小了这么多，特别是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急剧扩大播种面积的情况下。这里起重大作用的是“我国农业的中坚力量——中农”。

**阿库洛夫：**是受了歉收的影响。

**李可夫：**有人说，是受了歉收的影响。不过请注意，我说的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个体农户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农户）播种面积的变化发生在相同的地区。

**臧声：**这不是一码事儿。

**李可夫：**几乎在所有地区都基本上可以看到相同的情景、相同的比例。

**臧声：**经济结构不同。

**伏罗希洛夫：**耕作方法完全不一样。

**李可夫：**气候条件对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们声称，集体农庄进行秋播时，中农不能播种，因为土壤是干旱的，那集体经济也不能进行人工灌溉呀！至于说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的那些地区种子和农具供应不足，那中农之所以成其为中农就是因为他有播种所必需的种子和农具。在正常条件下，特别是在第二个丰收年之后，在像伏尔加这样播种面积才达到战前水平的80%—90%的地区，播种面积的增加本来应该更大一些。可是既然这样的地区播种面积的扩大才只有1%—2%，那就说明增长受到很大遏制。

同志们，我比较详细地谈到播种工作，因为它有重大意义。意义重大尤其是因为播种状况是在许多方面预先决定下一年市场情况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今年经济困难的总背景是：我们虽然有工业迅速增长这样的积极因素，可是在农业中却是一条所谓“黯淡的曲线”，也就是说农业发展的速度减慢了。这种速度减慢的现象已经有好几年了。

臧声：是退化吗？

李可夫：以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为例，你们可以看到，它始终围绕着一个数字波动——大体上是45亿普特。这不是退化，因为得到这个总产量数字的条件是富农户的比重在缩小或者稳定不动，而农民中的贫困阶层，特别是通过集体形式，则不断扩大播种面积。这是有重大意义的积极因素。不好的现象是中农，确切些说是某些中农群体保持自己的播种面积不变，某些情况下甚至缩小播种面积。这些现象的总结果就是我们去年和今年遇到的那些困难。我相信，我们须要紧张地工作不是一年，而是2—3年，才能消除这些危机现象。要把这些将持续4—5年（去年、今年、以后大概还有2—3年）的困难叫做季节性的、市场行情的困难恐怕得给它加上很大的引号。所以说，我们面临着我国经济的巨大不协调——农业（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原料和粮食基地）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工业的需求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第一是长期的，第二是稳定的，它不可能不影响到其他经济部门，不可能不引起其他许多危机现象。对这一点大家应当有十分明确的认识。

对于今年实施的非常措施，应当从这些现象的角度来加以考虑。无论是我，还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应当盲目崇拜法制或者非常措施……

雅科夫列夫：可是布哈林说，要么是新经济政策，要么是非常措施。

李可夫：不是这样说的。“要么是若干年内不断地实行非常措施制度，要么是新经济政策”。

去年我们实行了非常措施。今年又是非常措施。下一年可能还会遇到粮食困难，于是许多人就会习以为常地建议，甚至不是提请我们审议，而是径直实行相同的非常措施。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3—4—5年内一直实行非常措施，那这还能叫实行新经济政策吗？我认为不能。长期不断地执行非常措施就必然形成一种思想，要把这些非常措施变成我国发展的“规律”，由此就在整个商品流通、供应、组织贸易等等方面又产生一连串新现象。一环扣着一环。这是必然的。今年的非常措施问题应该从这个具体情况出发，而不仅仅是从当前利益出发，而且从长远利益，哪怕是从明年的利益出发来考虑。现在采用非常措施是否恰当呢？就在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分歧。就在不久前，伏罗希洛夫同志还在列宁格勒省党代表会议上做报告<sup>299</sup>……

臧声：是州党代表会议。

李可夫：请原谅。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纠正，我不反对。是“州”党代表会议！（全场笑声）他在这次会上是这样说的：

“为了改善粮食采购状况,中央并不认为可以采取某种紧急的非常措施。我们手里有完全正常的、合法的手段来引导农民,提高粮食采购量。同志们,请注意,许多地区——西伯利亚、哈萨克、伏尔加河流域等——有足够的余粮。需要的是能够把它们拿到手。

党的、苏维埃的、合作社的机构,首先是采购机构的任务是,在革命法制的范围内把余粮拿到手,而且不能破坏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

同志们,请注意,现在许多地区已经实施非常措施了。

卡冈诺维奇:我们并没有超出法制的范围。

李可夫:卡冈诺维奇同志,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不超出法制范围的!请看,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实施非常措施之前几天,还是反对非常措施的。他的讲话到处都发表了。每个农民都知道他讲了什么话。因为我国的农民对报纸……

喊声:是不读的吗?

李可夫:不是,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当我们谈到农民的时候,他们读报的认真程度要超过大约80%在座的诸位。(笑声)在同农民谈话时,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我的讲话和引文知道的确切程度连莫洛托夫同志都望尘莫及。(全场笑声)不久以前,政治局的多数在针对我们(就是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一份文件中写道:

“如果注意到这样一些不利条件:乌克兰严重歉收、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带部分歉收和西北地区的歉收,那么党在今年总算避免了采取非常措施,而且总的说来在苏联范围内保持了不错的采购进度,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

我再说一遍。这段话是在1929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之前不久写下的。而现在非常措施付诸实施了。它们是这样实行的:卡冈诺维奇同志发来一封电报,于是要求我用电话、用征询意见的办法,表决实施所谓的社会抵制和积极公众措施,以便对粮食持有者施加压力,加强粮食采购。由于我知道为取得粮食而实施的社会抵制和积极措施是怎么回事,我就想:怪事,这是要取消上次全会的决议,是同伏罗希洛夫同志不久前的讲话完全背道而驰的,可是却打算用电话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用电话呢?政治局的会议日程上不是有许多比这个问题次要得多的问题吗?何况这个问题还涉及违背上次全会的决议。我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得到了同意。几天以后我们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人赞成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建议<sup>300</sup>。可是他在这里插话说,我们并没有越出合法措施的范围。我给大家读几份反映

实际情况的文件。卡冈诺维奇同志责备我把收到的几封来自农村的、由一个或几个农民签名的电报分送给了政治局委员。

柯秀尔:有时候没有签名,有这样的电报。

李可夫:也许有的地方没有签名,可是这大概是秘书的失误。在给政治局委员分送这些电报时,我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他们,这类电报已经发到我这儿来了。在自己的工作中,我自然执行政治局通过的这个决议。我在同来自各地区的同志们谈话时,也是这样做的。在关于市场情况的决议中,我也加进了一段对把持粮食的富农户应当采取社会措施、施加压力的话。

斯克雷普尼克:你是说,错不在你,而在政治局。

[米高扬:对的,对的,就应该这样。]

李可夫:斯克雷普尼克同志非常想帮我的忙。我很感谢他:他是一个很有才华,见多识广的人,而同志式的帮助总是令人愉快的!(笑声)他现在问我,是我错了,还是政治局错了?我承认,我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实质。政治局通过了某个决议,我投的是反对票。决议通过以后,我实施了这个决议。

伏罗希洛夫:更要紧的是你赞成集体领导。

斯克雷普尼克:你就这样向大家解释吗?

李可夫:我执行了多数通过的决议。我不明白,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对我的要求是什么。

我曾经给政治局委员分发过一些信件,我就不在这里读了。我们往往还分发一些个人的来信。我给大家念一封不是农民的信,而是由一个马尔科夫同志签名的文件。他是一名相当负责的干部,在实行这些非常措施的地区工作。下面是他写的:

“现在最强有力的采购‘手段’就是抵制。有准备的公众抵制是很有用的,不过可惜的是现在经常把它作为一种行政措施,而且形式上得到‘糟糕的’公众批准。我一路上都在尽力记录抵制和采购方法的荒谬形式。收集的材料是很有意思的。

**抵制和过火行为。**

“1)大规模地采用抵制,有时是半个村庄抵制另外半个村庄。抵制变成了采购手段,而不是引导的杠杆,不是尖锐的政治措施;

2)有时候抵制的是中农;

3)责成大家不得吸烟,也不得相互问候;

4)大门上悬挂着罚款告示(如果丢失告示,被抵制人就要受罚,结果是他本

人和他的家人不间断地在大门边值班)；

5)不准生火和点灯(如果主人生炉子,就有人来把炉子浇灭。窗户和护窗板都钉死了,屋子里很黑,这叫做光线抵制)；

6)禁止用水,抵制也应用于水井。水井边有哥萨克持剑站岗,贫农由领班员布置岗哨。富农嘲笑说:‘就让这些窝囊废去站岗吧’；

有的地方牲口要死了(就是这样说的),在特洛伊茨克专区,这是普遍现象,传播得特别广；

7)孩子被学校开除；

8)可以做出决议没收土地并赶出村子；

9)不准进入任何一个机构,也不准交谈,有时候甚至禁止走出菜园子,如果有事要找被抵制人,必须有见证人在场；

10)禁止奶酪厂收购被抵制人的牛奶；

11)禁止被抵制人在谢肉节乘车出游,强迫他们运粮食；

12)通常在大门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别来找我,我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13)在大门上涂焦油,窗玻璃上也涂焦油；

14)剥夺他们的医疗救助;顺便说一句,贫农因为被安排在水井边站岗,说没有衣服穿,太冷了,大家都感冒了。”

总之,什么叫抵制,一位干部在下乌维尔斯基的积极分子会上是这样通俗地解释的:“从学校赶出去,不许交谈,不许抽烟,从村苏维埃赶出去,从医疗站赶出去,不给柴火,不给商品,没收土地等等。”不错,奥什温采夫说,他指出了这一点,也提出了正确的方针。

在什么情况下采用这种抵制,怎样规定农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不遭受抵制。在乌拉尔工作的马尔科夫同志是这样写的:

“谈谈计划和控制数字。粮食采购计划匆匆忙忙下达到村苏维埃和区里,当然是很困难的,而且通常只是简单地计算一下。问题是既然没有计划,村苏维埃也就从来不进行核算。所以很难说哪一个村子完成了多少。何况农民除了我们的采购员外,当然还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他们现在就用它来做借口。问他,你是不是种了多少俄亩地?我种了。为什么不交给国家呢?我不知道不准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往往一个人遭到抵制是因为他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了,而没有交给合作社。他说他已经没有粮食了,于是对他说,你买去呀,反正得完成控制数”。

总而言之,“控制数字”在地方上变成了“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最不容推诿的责任。一方面这很好,是纪律,而另一方面就糟透了。一方面是会计的错误,技术人员的错误,而在另一方面却是政治上的争吵。

农民固执地提出问题,为什么秋天没有预先告诉农民不准把粮食运到自由市场上去。这可是一个很不好的征兆。假如它变成了群众性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必须重新审查了,显然,要么缩减新经济政策,转到“硬性统计”的轨道上去。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不行的。要么我们就得走“硬性统计”的路,这就是余粮收集制,这就是打倒市场、地方集市和粮食贸易;要么我们就应该保留新经济政策的这些最起码的基础。我再念一份文件。

**伏罗希洛夫:**也是一样让人讨厌的吗?

**李可夫:**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这是让人讨厌的文件。也许伏罗希洛夫同志了解文件的作者,所以他可以骂马尔科夫同志。可是我不认识他,也从来不曾见过他。

**伏罗希洛夫:**我也从来不曾见过他,可是这份文件让人讨厌。

**李可夫:**他是乌拉尔州商业局长,因此是这些措施的积极执行者。他是党员。

**伏罗希洛夫:**你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你应当立即派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是谁在这么干。这个马尔科夫应该为这些文件而受到斥责。

**李可夫:**也许我应当派一个委员会,也许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这方面是对的。可是有克雷连柯同志在关注同这份文件里列举的种种现象,以及其他同样危险的现象作斗争。克雷连柯同志向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斯米尔诺夫同志提交过许多报告,我现在念几段摘录。这是克雷连柯同志签署过的文件。

在3月29日的一份文件中,他是这样写的:

“据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族自治共和国检察长报告,由于必须加强粮食采购,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采取了许多违背历次中央全会关于粮食采购措施决议的非常措施。按照联共(布)下伏尔加边疆区委和专区委员会的决议,建议把粮食采购计划的未完成部分按村分配,作为必须完成的最后任务。至于按农户的分配计划,则建议将粮食采购的主要部分分配给农村的富农和大存粮户。如果他们不完成任务,则对超过1000普特的粮食持有者运用刑法典第107条<sup>301</sup>,而在德意志族自治共和国,粮食持有者即使不超过上述规模,也适用第107条。采购计划的剩余部分分配给其余有余粮的农民,而且农村富农的任务由贫农和中



积极分子会议制定,并由村苏维埃执行,其余非富农户的任务则由全体公民大会决定。”

接下去:

“据现有资料,其他地区采取了许多曲解党和政府指令的措施来加强粮食采购。例如,从收到的申诉可以看出,沙德林斯克专区的科梅什洛夫斯克区用逮捕、恐吓、侮辱的方法来收取粮食,这些方法也用在贫农和中农身上。在同一个区里,还对没有交够粮食的人采取有明显侮辱意味的抵制: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在脖子上挂上写着各种字样的耻辱牌子、驱逐出村、剥夺土地使用权,因此引起农民不满,有一次甚至造成农民雷切夫自杀身亡,因为给他规定了80普特的控制数字。这些抵制方法也在其他地区实行,例如巴什基利亚,据乌拉尔州检察长报告,甚至成立了阻截队。哈萨克(上乌宾斯克村)、西伯利亚(别列佐夫斯科耶村)和伏尔加中游的一些地方都有关于抵制方法的资料。”

克雷连柯同志给同一个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另一份报告里说:

“1)在哈萨克我曾经允许对那些拒绝缴纳粮食的人,按刑法典第61条<sup>302</sup>的规定,作为不履行国家义务处以罚款和强制劳动。这已经是对该条的牵强解释了。可是据哈萨克发来的电报称,地方机关坚持要将按第61条做出的判决立即付诸实施,而不必等待上诉法院批准。我并没有允许这样做。可是由于戈洛谢金同志坚决要采取这个措施,我认为必须向你汇报,等候指示。

2)还有许多地方提出了同样的申请。

3)在开展播种运动时,也发生过这样令人愤怒的事。比如在梁赞,土地管理机构没收了集体农庄和农业合作社的18台拖拉机,借口是这些拖拉机保养得不好。克维林同志(播种运动特派员)和检察院建议归还这些拖拉机,遭到拒绝,还说他们知道拒绝的后果。这个决定得到播种三人小组的批准。由我签名向他们建议归还这些拖拉机,否则将书面报告这次拒绝,为的是追究全体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并将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这种行为的动机看来是想在今年的播种运动中,用这些拖拉机来建立拖拉机队。

4)在阿克莫林专区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收到的申诉书说,专区特派员并没有核查过,按申诉书的说法,完全从个人恩怨出发的告密材料。他们把申诉人放在户外,冻上一整夜,禁止他用水,也不准用湖水和井水饮牲口。我下令立即停止这些令人愤怒的行为。”

斯米尔诺夫同志根据这些电报和其他许多材料,用加里宁和他自己的名义起草了电报,并将电文发给加里宁签署。

这封电报的草稿说：

“近来收到各地报来的、经共和国检察长核实的材料，说明在粮食采购中有违反政府和中央十一月全会的许多决议的事情。粮食采购在许多地方已经变成了义务交粮，也就是余粮收集制，对不交粮者按违犯现行法律惩处，采用了被党和政府坚决谴责的方法：恐吓、侮辱，直至宣布不受法律保护、驱逐、剥夺土地使用权，这些方法也适用于中农和贫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坚决要求立即制止上述现象，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采取一切措施不容许继续歪曲党和政府的决定。”

加里宁同志拒绝签署和发出这封电报，好像说是现在不出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臧声：什么？

李可夫：他好像说，不出我刚才念的克雷连柯同志报告的这种事是不可能的，而且拒绝签署这封电报。电报因此没有发出去。

斯大林：你这是歪曲。

李可夫：我没有歪曲，斯大林同志，只是讲了确凿的事实。请你问一问斯米尔诺夫同志。

我再读一份文件来结束我们是否采取了非常措施，以及表现在哪里的问题。这是西伯利亚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它是这样写的：

“如果居民本身不肯协助粮食采购人员揭露凶恶的粮食持有者，也不参与对他们实行的抵制，那就在当地实行对全村、对地区和该地区内的消费合作社的抵制。”

接下去：

“对不交粮食的个别人和全村，以及地区的抵制是反对破坏向城市供应粮食，因而也是反对破坏城乡结合的手段，采用这种手段必须十分认真，而且要能够经常取得所期望的效果。”

这就是说，对全村采取抵制是城乡结合的表现。这是印在报纸上的。

臧声：请问，这是哪儿的事？

李可夫：这是西伯利亚。这篇文章发表在《劳动政权报》第65期上，标题是《加强抵制，认真采用》。如果不是卡冈诺维奇同志和其他人插话，说我们似乎并没有越出法制的范围，而且上次全会关于不得使用非常措施的决议执行情况很顺利，我就不会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要说这种假话呢？！令人吃惊的是现在农村实行非常措施却不受到谴责，而且瞒着党的最高层。假如必

须实行非常措施,那就让我们合理地来实行,使它对事业造成的危害最小。首先,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及时贯彻,而不是在播种活动中实行;其次,要根据去年的经验认真地讨论,在采用非常措施时,我们是否要超出去年规定的范围。从遵循革命法制的观点来说,今年执行非常措施要比去年差些。

不单是违反了去年关于限制使用第107条款的指令,而且采取了那些去年谁都不敢提的措施:剥夺土地和驱逐。他们是这样议论的:只要公众肯积极发挥作用,我们的人就会把公众组织起来,首先是贫农和苏维埃积极分子,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按照这种议论,无须政权机关采取什么强制措施。政权机关可以待在一边。当问题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时,我就指出,按我国的条件这是不可能的。政权机关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这个运动,而且和这个运动相适应地采取强制措施。

波斯特舍夫:富农烧了多少贫农的房子,枪杀了多少贫农?这才是问题所在。

李可夫:这我也要谈的。克雷连柯同志也在座。他是检察长,是革命法制的维护者,可是他也毫无办法,尽管各地执行非常措施的都是政权机关。

波斯特舍夫:你言过其实了。

李可夫:我把了解情况的来源都告诉你了,如果你能在这里找到夸大其词,我会非常高兴。和我在全会上谈到的情况相类似的事件越少越好。在列举了种种说法和做法之后,谁也不能否认采用了非常措施,而且其形式比去年还要坏些这个事实。

同志们,我已经宣读了中央统计局关于秋播规模的数字,而且指出,秋播通常要占到全年谷物收成的60%。为了弥补秋播的不足,春播必须扩大10%以上。有些统计学家提到的是15%。指望把春播面积扩大15%,甚至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最大限度地扩大春播面积,否则明年我们也只好用非常措施来采购粮食,而且凭购货本供应粮食。所以我们反对在今年采取非常措施。米高扬同志慷慨激昂地讲到,假如采纳了我们进口粮食的建议,其后果将是长期关闭工厂。进口粮食的问题我曾经四五次提请政治局讨论。经过我手的就有好几封电报,建议用贷款购买粮食。

洛佐夫斯基:多期限的贷款?

李可夫:我们收到了用贷款购买粮食的建议。可是期限是多少年,我说不好。我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应当利用贷款在国外购买粮食,哪怕提供的贷款不是几年,而只到新粮上市,也就是说只有几个月。我们没有研究过,也不打算研究

用贷款购入粮食的问题,甚至没有试探过这个问题,尽管,我再说一遍,有过用贷款出售粮食的建议。世界粮食市场的情况是粮价下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在采取措施来帮助自己的农场主,促进他们在国外销售余粮。世界粮食市场的情况至少说明获得贷款是可能的。可是所有这些问题政治局都不屑一顾,仿佛我们在粮食上没有任何困难,仿佛不须要采取什么措施在几年内改善粮食状况。此外,我们的外汇状况,我们的外汇的确还不够,可是总算有所改善了。我们现有外汇大约是7000万—7500万卢布,年底可能达到1亿。如果认真地对待我们今年遇到的严重困难(如果再一次广泛采用非常措施,那我们明年一定还会遇到这些困难),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个薄弱环节(粮食困难和粮食生产)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那就可以,而且必须花费一部分外汇来购买粮食。我知道,有人会反对我,说去年在采取了非常措施后,播种面积增加了。这是对的。可是它的扩大并不是由于非常措施。

臧声:这是谁也不否认的。

李可夫:假如没有采取非常措施,它本来可以扩大得更多一些。

臧声:这都是对的。

李可夫:秋播面积缩小之后,扩大春播面积的问题对于下一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将决定,明年我们是否还保留购货本,是否还会有我们不能保证供应最低限度的粮食的地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和整个经济状况联系着的。认为我们可以经受几年像今年那样的粮食供应的困难,而不致引起总的经济困难,这样的想法是天真的。这绝对都是一些小问题!粮食困难不能不起初反映到相关的环节上,然后也绝对会反映到我国经济制度的其他环节上。

在现有条件下,实施五年计划是和解决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什么时候,怎样才能消灭现在遇到的所谓危机现象呢?我再说一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的话,取决于我们在工作中对待中农的那些错误做法。据我看,在今年秋播的规模上中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今后我们执行整个政策方面,它的作用也不会稍小一些。如何对待中农应当占据它应有的地位。“过火行为”不可能不打击,也确实打击了中农;非常措施也重重地打击了中农。我们不仅仅在粮食采购中,而且在最近的苏维埃选举中都有对中农的过火行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央机关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纠正地方机关在这次选举运动中对中农犯下的大量错误。最近党开了许多会,讲了许多话,用了许多墨水和时间,以求“证明”布哈林同志反对(?!?)工业化。这个运动在全苏联范围内进行,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支部。这证明党有很强的组织性,可是为什么不把这支有组织的

巨大力量用来保证执行对中农的正确政策呢？我们用在这方面的注意力、精力和组织性，有没有用于证明布哈林同志的“右倾”危险的一小部分呢？据我看，没有。这一切对于近来执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扩大春播面积机会的政策来说是典型的。这就是我们犯下的一个大错误。我们现在经历的困难不是“市场行情”在今年的粮食生产中特有的困难，而是有更为深刻的基础，对待非常措施的问题也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从来不曾盲目崇拜过革命的法制，也不曾盲目崇拜过非常措施，可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我们采取一切措施来进口粮食，那我们的做法就完全对了。假如这是不可行的，是无法完成的，那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提出非常措施的问题，因为在现时的条件下，粮食方面的困难拖得太长、太持久，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一点无论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及伏罗希洛夫同志本人都是认识到了的，所以才通过了放弃非常措施的决议，而且公布了这些决议。可是现在刚过了不久，所有这些广泛发布的决议就被违反了。既然是这样，那农民怎么还会相信，我们根据新的农业税法，在两年之内确实不会对中农户和贫农户的新种植面积课税呢？我们可是提前两年就在指望农民对我们的信任。农民会不会说：“人家可是一再保证过不会采取非常措施，可是才过了两个星期就违反了那个保证，而在税收上可是两年！”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现在的条件下，政策的稳定性具有特殊意义。我不否认实行非常措施的地区有很大意义，可是不应当夸大这种意义。请大家注意，如果对某村的100个中农中的一个采取了非常措施，其余的人就会想：明天就该轮到我了，等着瞧吧。如果对一个村采取了非常措施，周围的村就会从中看到自己的明天。关于采取非常措施的流言传遍各地。这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毁了明年的局势。同志们，我的发言拖得太长了。

乌加洛夫：你就连晚上也占了吧，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讲得好极了。

臧声：休息以后再讲吧。

主席：有人建议上午的会到此结束，午饭后再听取李可夫同志的发言。休会到6点钟。

## 第九次会议

4月20日晚间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开会。李可夫同志发言。

**李可夫:**我在结束发言的第一部分时,讲到了我们农村政策的缺点。这些缺点造成了许多不好的现象,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非常措施、歪曲选举运动、去年的粮食税,还有一切打击中农的行为。中农的问题我们大家都讨论过多少次了。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讲过许多次了。他在讲到中农时一再指出,“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适应中农经济的情况,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够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好”。(见《文选》,第18卷,第1册,第134页)<sup>303</sup>即使到了今天,中农对于粮食的总产量及其商品部分也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农能种出多少粮食,他们能出售给我们多少粮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粮食和原料是否平衡,能否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口粮和原料,以及工业化的成败。我们应当做到使中农多种粮,多卖粮。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今年采取了一些机动的办法,这方面米高扬同志已经详细地讲过了。提高农产品价格、修改农业税、颁布单位面积产量法——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今年的机动办法。可是从一个普通党员的角度来看,就不能说这些办法是经过认真细致的准备的。请大家想一想,10—11个月以前,也就是去年七月全会之前不久,有没有人能够向一个普通党员说,再过一两个月,我们要提高粮价,然后我们要在农业税方面实行优惠,所有的新增耕地两年之内免交农业税,我们还要采取其他优惠措施来鼓励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发展奶油制造业等等。假如有人提出问题:这些东西是不是体现了党的政策,我敢保证,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可能是一种机动,不过是右倾的机动。

**戈洛谢金:**你对党有很坏的看法。

**李可夫:**戈洛谢金同志,我现在就来说明,为什么说你错了。

戈洛谢金:你的存在不就是为了向我们做解释嘛。

李可夫:如果从我们是向谁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让步,我们是迎合谁的愿望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机动,那很清楚,今天采取这种机动完全不是为了迎合贫农的愿望。提高粮价对什么人最有利呢?对那些粮食多的人,而不是粮食少的人。中农里面是谁能够更多地扩大耕地,而不用为此缴纳农业税呢?很清楚,是那些拥有更多土地、牲畜、生产工具等等的人。

戈洛谢金:决定价格是在去年的7月份。

李可夫:我说的不是日期,不是几号。戈洛谢金同志对日期记得很清楚,可是我认为,他对发生的事情没有完全弄明白。

戈洛谢金:关于过火行为我会回答你的。我提出日期就是为了查清楚。

李可夫:我根本没有提过什么日期,也不想就此争论。我讲的是那些能够从我们的机动措施中得到优惠的农民。我们取消了对富农的优惠,可是其余农民中较为富裕的那些人得到了优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税收的累进制。耕地两年之内免税当然和我们的农村税收政策,和课税的累进制有一定矛盾。大家想必记得上次全会的委员会里,沙茨金同志,也许是洛米纳泽同志,关于农业税的任何改革都必须保留累进级差的争论。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里也增加了相应的指示。可是现在我们违反了这条路线。

米高扬:这是不可避免的修改。

李可夫:米高扬同志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修改。我赞成所有这些措施,可是大家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些措施都是什么样的机动。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机动,因为它对工业化有利,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它巩固了工人阶级专政,有助于解决粮食危机。这都是对的!可是它终究有别于我们近来的所作所为,它为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提供了更多的优惠,而不那么富裕的阶层却享受不到这些优惠。

加里宁:比起向那些完全不缴税的人来,提供更多的优惠。

米高扬:是这样的。

李可夫: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因为它对我们的总路线有利。我们通过这样的机动,努力使中农有更多的粮食。当然,贫农也应当有更多的粮食,可是他们从这种机动措施中得到的优惠比较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党在实行这种机动时,其出发点是,也不能不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危机,其根源是我们对中农的政策有缺点。中农的粮食少了,少于他们应当拥有的。我们要努力使他们的粮食多一些。

为了说明对当前的困难在理解上的一些细微差别,我给大家念一段莫洛托

夫同志的讲话。莫洛托夫同志在最近一次全会上是这样说的：

“农村的小私有者今年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以后，就向我们提出了必须改变粮食和工业品比价的问题，要求提高粮价……”

“……我们现在在粮食制品方面打算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意思呢？同志们，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对中农的实际让步。”

奥尔忠尼启则：对呀。

李可夫：这话有对，也有错。错在莫洛托夫同志认为中农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

莫洛托夫：我不是在谈危机。

李可夫：“农村的小私有者今年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以后，就向我们……”等等。

莫洛托夫同志要用什么办法来消除现在的困难呢？

莫洛托夫：这还不是危机。

李可夫：用更加巩固中农的“经济地位”的办法。莫洛托夫同志还有什么错呢？错在他不明白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无论中农还是一般的农民，包括富农在内，能够向我们提出自己的条件不是因为他们总的说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是因为我国的粮食生产发展了，粮食增加了，而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国粮食不够这种情况。

斯大林：你这是断章取义。

李可夫：这就是说，提出这些条件不是因为中农生产了许多粮食，而是因为生产得太少，全国都感到缺乏谷物。我引用了莫洛托夫的讲话是为了使大家能够弄清楚意见的细微差别，对农业情况认识上的细微差别。

对价格问题的意见也有细微差别。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农巩固了自己地位的时候，因此也就是他们手里有很多粮食的时候，要提高粮价。无论从一般经济关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市场关系的角度看，我都觉得这是不能理解的。在我看来，提高价格是由于粮食不足。

现在是否须要再度提高粮价呢？我认为不须要。在布哈林同志被指责为建议今年春天提高价格之后，我曾经问过他，是不是他有这种建议。他说没有。他在声明中谈到价格的季节性波动时，出发点是，他认为我们的价格政策应当更灵活一些。我不赞成这个看法，正如我不赞成他主张按地区特点来确定富农经济的建议一样。至于由商业人民委员部调节的季节性价格波动，那它只适用于肉类、鸡蛋、奶油等等。这些建议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则性的路线，这都是实际政策



方面的建议,可以接受,也可以否定。就这些实际建议我和布哈林同志还会争论下去,可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之间在政策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今年靠调节粮价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米高扬同志是对的。他指出,国营粮食采购部门的价格和自由市场的价格差别太大了,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合理的加价都不能解决问题。该丢失的就无法挽回。现在有的地方价格差达到了2—3倍,甚至更多些。这是两大市场之间的价格脱节。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粮食的贸易是通过米高扬同志管辖的粮食采购部门进行的,粮食贸易的大部分则绕过了米高扬同志,以商业人民委员部价格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高价进行。这种状况自然不能不大大影响到粮食采购的进程,可是靠提高一点调节价是纠正不了局面的。现在的中农问题是不是还像党的八大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中农是农业生产的中心人物那样呢?我觉得不是的。有一位发言的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当时还没有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因素,没有我们现在具有的那些农业生产中的集体化据点。这也给中农造成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改变了的环境在对待中农方面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中农并不阅读共产国际的纲领,也不阅读党纲,在党的八大时,他们在身边的现实中除了商品生产者通常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之外,也看不见,或者几乎看不见任何事情能够向他们切实地指出发展他们的经济的其他道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讲到,在农民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实际经验非常敏感的、巨大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示范和具体的事例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现时的处境和那时的环境的区别就在于农村中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示范和具体的事例。这和党的八大时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方面的进一步改变必然会缩小富农对中农阶层的影响。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农业集体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加快生产集体化的进程等等方面的工作及其哪怕是最小的成绩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近来这项工作有了巨大的、实际的规模,它说明我们在农村的全部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米高扬:**对呀。

**李可夫:**应当看到,这方面迈出的头几步是最困难的,因为它们是全新事业的起步,也因为实现这些步骤必须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不单是资金,还有机械、化肥、相应的农业干部、组织工作者等等。因此,以我们犯下的这种或那种错误为借口,彻底丑化这项新的、比我们在工业中所做的更为复杂的工作,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找到了农村发展,因而也是中农经济发展的新的、切实可行的道路。现在农村生活的条件和1918年相比是大不相同了。可是这一切在商品流通方面是不是带来了原则性的变化呢?我认为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我们即使是

对集体农庄,也要购买粮食,今后也要购买。

请大家设想一下,现在有这样的集体农庄,它已经十分巩固了,归还了贷款,固定资本(生产工具)和流动资金都是它自己的,它在信贷方面已经不依附于我们了。它已经站起来了,可以独立前进。在不久的将来许多集体农庄大概都能够达到这种状况。这样的集体农庄作为在集体经济中生产的产品的占有者,从产品让渡的形式(即存在市场联系或消除了这种联系)<sup>304</sup>上说,会不会和在个体的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产出的产品的个体主人、占有者有原则的区别呢?

臧声:是的,一定会有的。

臧声:总是会有的。

臧声:嗨,当然会有的。

米柳亭:是的,一定会有的,就像个体摊贩和合作社的区别一样。

李可夫:我想,从产品让渡的形式上说,眼下还不会有原则的区别。

施利希特尔:这充其量只不过是理论公式。

李可夫:什么公式?

施利希特尔:理论公式。

李可夫:你说是“理论公式”。我现在讲的也不是实践问题,而是在分析取消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是好还是不好。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实践了。

施利希特尔:你的“好理论”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经济命脉。

李可夫:我认为,同集体农庄交换产品,它们出让自己生产的产品将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进行。

米高扬:当然是这样。

李可夫:既然说“当然”,那么现在在财富的流通方面,就不会由于组织了集体农庄而发生急剧的转变。这种流通将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进行。

臧声:谁也没有否定这一点呀。

李可夫:太好了!那就不用着插话说,市场和**市场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原则性的改变了。很明显,同在经营活动集体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粮食生产者的市场关系要简单得多。可是即使是有组织的生产者——集体农庄也会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力争为自己的产品取得更高的价格。因为价格的高低决定着集体农庄的收入,以及组织在农庄中的农民的收入。在生产方面,集体农庄当然和个体农户有原则性的区别,它是社会主义类型。可是我们依靠发展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只有在以后,经过许多年之后,才能取消新经济政策,才能组成发达的社

会主义社会。这要到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形式占有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比重时,它们的组织程度也完全不同时才会发生。那些现在仅仅处于规划阶段的形式应该有最广泛的发展。比如说,所谓跨地区的机器拖拉机站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我讲这些仅仅是为了使大家有充分的可能来判断,我的观点是不是和总路线有差别。我认为,集体化的现阶段不会对城乡之间的物资流通制度带来原则性的变化。这种流通将在货币—商品关系,也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当然,要最大限度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财致富,增加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国家调节的因素。

有人在这里指出,我在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的一段话里说,五年计划应当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来实现,这是我在把什么人拉向后退。

就我提出的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已经说了很多了。除了政治局的委员会之外,我没有向任何地方提出过这个草案,没有复制过,也没有分发过,也没有想过要把它搞成一个什么纲领。这是一个初稿,是我的草稿。可是却有好几个发言的人拿我的草案来攻击布哈林同志。布哈林同志没有写过这份草案,应当为这份草案负责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份决议草稿里当然有疏漏和某些错误,就像提纲或者决议的初稿通常会有的那样。可是对这份草案提出的许多指责却是我不能接受的。例如,指责我在这份草案中就新经济政策说了几句话,由米高扬同志签名的、批评我的草案的意见中是这样说的:

“我不明白,关于新经济政策为什么要这样说:‘五年计划可能,也应当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来实现’,或者另一个论点:‘削减粮食采购显然表明,新经济政策及其方法在发展的现阶段也仍然是城乡结合的基础’;这样说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积极意义。难道在执行了八年之后,还须要在党代表会议上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吗?显然,李可夫同志多余来敲这扇门,可是问题不仅在这里。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第八个年头,联系到五年计划,仅仅讲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保留它的方法,却对目前经济中和五年计划中的力量对比不做分析——这就是说要把党拉回到1921年,向党灌输必须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思想。”

这段引文本身就非常出色地证明了,我在草案中谈到新经济政策完全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来解决五年计划的问题呢?是我们在整个商品流通体制中,在各种市场关系中实行购货本和两种价格,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写的是这些市场关系须要加以规范。于是有人反对说,你打算实行像美国那样

的自由流通。可是请问：我们是统一的党的成员，共产国际和联共党的纲领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约束力的，怎么扯得上美国呢？在统一的党内，在它的中央委员会内，怎么可以抛开这个党的全体党员所持的纲领来讨论问题呢？照这么说，我们的全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都变成什么了？这样提出问题，说他，米高扬同志，是站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党的纲领的立场上，而我，李可夫，是站在，比如说，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纲领的立场上，说我同他站在这两种立场上，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进行争论，这简直就是疯子似的侮辱。这简直是绝对的荒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切实认真地讨论问题？在我们苏联规范市场关系，就是建立更正规的苏维埃市场关系，就是对那些人人随处可见，随时可见的种种歪曲、违犯和其他胡作非为加以整顿。和这些歪曲和无法无天比起来，我们须要规范商品市场关系。当然，是按苏维埃的方式，而不是按美国的方式，不是按克鲁伯的方式，也不是按福特的方式，而是按照在一个农民，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应当做的那样。大家就这种规范化的必要性展开了争论，指责我企图把美国式的自由贸易流通引进苏联。有人会说，你是一头骆驼，把这些东西到处传播，然后就来证明你不是一头骆驼，而是共产党员。米高扬同志应当把他对我的指责转向1928年的中央四月全会，那次全会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只有在‘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结合的唯一正确形式）的基础上，只有在严格实行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法制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实现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口号。所以，向富农展开进攻必须建立在基本农民群众进一步协作化、城乡经济周转加强、农业（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已指出它的缺点）提高的基础上；向富农展开进攻必须采用如下的办法：一方面不断提高对富农的课税，限制他们的剥削倾向（实行劳动、租佃立法，采用一般土地政策，在供应机器和发放农贷方面根据阶级原则，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大力和全面支持广大农民群众的合作化、各种集体经济形式和贫农组织，采用各种形式和方法来不断加强国家对市场和小农经济的计划影响。

‘新经济政策’就是党坚决循以前进的道路，只有通过它才能对全国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党对于富农、耐普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关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恶意宣传应给以坚决的回击。党同样应该特别坚决消灭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歪曲和过火行为，尽管中央政治局已经提出相应的警告，但这种行为还没有完全绝迹。”

所以米高扬同志本该首先把他的批评性反对意见指向1928年的四月中央

全会,指向全会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而我只不过在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的一段话里讲了一年以前中央全会已经详细得多地讲过的东西。因此,按照米高扬同志的说法,把国家和党拉回到1921年的是……最后一次中央全会,而不是李可夫。我再说一遍,我引用的四月全会决议是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通过的。

米高扬:决议是很好的。

李可夫:决议是很好的,米高扬同志!而且对五年计划而言,它也是很好的。既然是这样,那么在座的诸位中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懂得米高扬同志的论据,我就会感到非常奇怪了。

现在谈谈增加商品率和扩大商品流通。有人说,这是滑向“自由主义”、“机会主义”等等类似的玩意儿。米高扬同志提出这种指责特别令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商品流通的渠道不够畅通,所以米高扬同志才持这种观点呢?!要知道我国有2700万农户。其中组织起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在我国自然型经济也广泛存在。农产品的任何增加、对自然经济成分的破坏、我国工业化的原料和粮食基础的任何改善都意味着增加商品流通。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是有人对我说,这是“自由主义”、“机会主义”,还有鬼才知道是些什么玩意儿!而且这样说的是商业人民委员。这太危险了!人们就用这种揪住不放的叫嚷和指责来回答布哈林同志应当减少在商品流通中施加压力的看法。人们说,这是自由主义。因为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有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关系,所以这就是“自由主义”(?!)。照这么说来,商品流通中施加压力就是共产主义了,而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商品流通,由于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发展了生产力,就反而成了“自由主义”。可是我就不明白,在工业和农业都增长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交换将以什么为基础呢?在确定了新经济政策之后,这还是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对付这种思想。这种思想表明,在如何对待小生产者的问题上,有人开始倾向于一种全新的提法。这种新提法的完整表述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领导首先应当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出发;这时可能必须执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它就是在对资本主义集团加紧施加压力的制度(没收、征用等等)下,多少是完全地消灭了自由贸易和市场关系,急剧地破坏了对小生产者个人的经济刺激因素的情况下,为了战争的防卫而组织合理消费。”

这段引文是从哪里拿来的?取自共产国际纲领,其中有一个表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现在这个表述中的许多东西在我国的经济现实中增长得很快。

一般说来,谈论市场关系是不是就是机会主义呢?比如说,莫洛托夫同志,而且不是在1921年,而是几年之后,是这样说的:

“……为了更广泛地发展农业,我们必须采取在全国发展市场关系,增加商品流通,更多地把农村,也就是整个农民经济,吸引到商品流通中来的方针。”

我再说一遍,他这样说不是在1921年,而是几年之后。

我再引一段莫洛托夫同志1925年关于集体化的讲话:

“在现时的条件下不应当滚到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集体化的贫农幻想中去。”

按照莫洛托夫同志的说法,贫农的幻想表现为:

“错误地规定农业集体化的任务,似乎集体化在我国条件下可能恢复中农和贫农群众的经济。”

滚到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集体化的贫农幻想中去!

伏罗希洛夫: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布哈林: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李可夫:伏罗希洛夫同志问,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插话吧:是左边还是右边呢?[布哈林和乌加洛夫鼓掌]<sup>305</sup>

伏罗希洛夫:广大的农民群众也包括贫农在内。

李可夫:在集体化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前进一大步了。这方面我们的实际方针已经改变了。可是在发展商品流通方面是不是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呢?我想是没有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才在关于五年计划的提纲的初稿中加了必须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健全商品流通和市场关系是同消除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危机现象联系在一起的。

健全商品流通和市场关系决不排除国家对商品流通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的增大和改善,不排除同投机活动的斗争。可是这仍然是贸易,而且是在不断发展的贸易。在市场关系方面现在最突出地反映了我们尖锐的经济困难。除了我刚才列举的那些现象,如购货本、两种价格等等之外,还应当加上这样的现象,如货币丧失其一般等价物性质的趋势,确切些说,是在粮食采购区,货币的这种性能受到限制的趋势。在粮食采购区的合作社小店里,在粮食采购期内,农民只有在出示贫农证或是出售粮食的证明时,才能用货币购买商品。如果你们以为,所有这些现象,以及类似现象可能长期地,在若干年内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内,而不会致命地影响到整个货币流通,影响到整个经济,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觉得,我已经证明了我们正在粮食采购方面采取非常措施。我们至少缺5000万普特粮食。

非常措施是不是为我们提供了这5000万普特粮食呢?米高扬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已经发过言了。我仔细地听了他的讲话,想听一听他对这个问题怎么说。

米高扬:这是一个特殊问题。

李可夫:米高扬同志说,这是一个特殊问题。那我们就等一等,看他对这个特殊问题怎么说。可是我要说,非常措施眼下还没有为我们提供这5000万普特。请看按照五天统计一次的粮食采购进度。3月份:第一个五天是460万普特;第二个五天490万普特;第三个五天490万普特;第四个五天420万普特;第五个五天510万普特,这里非常措施开始发挥作用了;第六个五天640万普特,非常措施的作用更大了。4月份:第一个五天540万普特,采购量开始下降了;第二个五天430万普特,采购量下降得更多了;第三个五天320万普特。假如没有非常措施,很难说我们能够采购到多少粮食。可是很清楚的是,非常措施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几千万普特。我们实行了非常措施,却只得到了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这一点粮食在我国不但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连多少大一点的作用都起不了。而非常措施对于下一年的收成和采购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只有两个五天的统计清楚地表明了非常措施的影响:3月份的第五和第六个五天,其中粮食采购量比前一个五天增加了100万—150万普特。

臧声:那出路何在呢?

李可夫:我已经讲了出路了。无论如何,不能用给下一年制造更大困难的办法来为今年的粮食困难寻找出路。尽管非常措施不能不极其沉重地影响到下一年度的播种面积和粮食采购,而且我们也没能扩大秋播面积,你们眼前还能采购到几百万普特粮食。可是不能认为这是解决全部问题的一条捷径。现在这不但从施利希特尔同志不喜欢的理论上,而且也从实践、从经验上得到了证明。

施利希特尔:我不是不“喜欢”理论,而是不“喜欢”你的那些脱离了其他各种因素的理论谬误。

李可夫:施利希特尔同志不喜欢“我的理论谬误”。我对施利希特尔同志的理论才干评价并不高,免得以后再来懊悔。(笑声)<sup>306</sup>

现在的粮食情况如何?按照俄罗斯的情况看,比去年4月1日的情况要差些。我们现在全国黑麦和小麦的储备量只有去年的50%,而且去年从1月1日到4月1日储备量增加了3600万,而今年同期却减少了2800万。城市的粮食供应情况又如何呢?对于最重要的工人中心(大致是5个点),每个工人的定量是750—800克面包,俄罗斯的14座城市是600克,也就是1.5俄磅。这14座城市包括明斯克、哈尔科夫、布良斯克等。有9座城市职员定量是400克,另

外9座城市是300克。在消费地区对农村人口的供应还要差得多。今年的情况非常严重。秋播运动的结果使明年的前景并不光明。明年很可能不会好于今年。

在这种条件下采用对播种面积和粮食生产都有负面影响的非常措施具有特殊意义。在粮食采购和供应方面,像今年这样的困难延续三年就不能不触及我国经济制度的其他环节。比如说,涨价。根据中央统计局行情研究所的总贸易指数(合作社和个体的商品流通额也计算在内),今年头半年的农产品零售价上涨了17%。

米高扬:连同私人市场在内。

李可夫:工业品涨了4.2%。连集体化商业的价格也上涨了:农产品涨了6.5%,工业品涨了2%。

不久以前皮达可夫同志在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了金币的情况。1927年11月1日,金币的购买力等于5卢布4戈比(按中央统计局的总贸易指数)。

1928年10月1日,是4卢布73戈比,就是说,过去一年里金币的购买力下降了30戈比。今年:10月1日是4卢布74戈比,1月1日是4卢布63戈比,2月1日是4卢布59戈比,3月1日是4卢布48戈比。

也就是说,五个月内金币的购买力下降了26戈比,而去年一年它才下降了30戈比。金币购买力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解决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为制止货币流转状况的恶化而努力。问题在于购货本和城乡商品买卖活动中的各种条件和限制都延缓了商品流转。商品的流动并不总是和供求关系相适应,和居民的某些阶层所拥有的货币量相适应的。供求之间不相符不仅因为我国的商品太少(这个原因今天当然也仍旧是主要的),还因为商品总量的分配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相适应,而在较为正常的条件下本来是可以更相符一些的。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增加货币发行量来满足这种被束缚住了的商品流转的需求就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我的五年计划提纲草案初稿,我被指责说,初稿使用了一个术语:“国民劳动生产率”。我给大家念一念这段话:

“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指标是计划规定的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国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源泉。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它不能建立在掠夺殖民地、剥夺和排挤普通商品生产者、使广大人民群众贫困化的基础上。”



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描述五年计划,我在初稿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里已经做了。那里讲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这方面讲得很清楚。这条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能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如果工业化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它就不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把用于描述五年计划的提高国民劳动生产率说成机会主义简直是笑话。这里指的是某种平均的劳动,而没有区分国民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在集体化成分里,在个体成分里、工业里、农业里等等。我认为,突出这个因素(国民劳动,即社会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很重要,而且必要的,因为它正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主要区别之一:我们的工业化应当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而不同于以掠夺殖民地、盘剥和“吃掉”普通商品生产者和群众的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至于说“国民”这个词,如果因为它没有突出阶级特征,就被认为是机会主义,那我们大家就都染上了这种“机会主义”。大家手头都有一本关于五年计划的小书。请读一读它的标题。《苏联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第1卷》。《国民经济建设》!(笑声)直截了当就是这么说的。它发给了全体中央委员,检查委员会也批准了它的标题。(笑声)不久以前在这个讲台上发表讲话的是人民委员米高扬同志,可是没有人说他放弃了这个“机会主义的”称呼,他没有这样做,真是太不像话了!米高扬同志是商业“人民”委员,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不得了啦!还有古比雪夫呢?他可是“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请看,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联席全会的主席团里有多少“自由派”!怎样才能摆脱这些“机会主义者”呢?!

莫洛托夫:五年计划的“主要思想”是提高国民劳动生产率,是吗?

李可夫:主要思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在草案中指出,它在社会主义成分和私营成分中是怎样增长的,社会主义成分超过私营成分多少。莫洛托夫同志应当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讲到过我国的五种经济成分。

乌格拉诺夫:这些东西他弄不明白。

李可夫:它们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中。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自然大于社会主义成分,它在目前只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谈一般的国民劳动,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成分生产率的提高,能不能被认为就是机会主义呢?也许,排除了各种“平均数”就是机会主义?如果你们确实想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各国,那么就应当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的动力装备程度的提高这个特征看成是主要的。我给大家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里的一段话,他在那里讲到了国民劳动生产率。在谈到农民“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跟着它走”时,他写道:

“但是我们靠这种信任一直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和极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还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率(黑体是我强调的。——阿·李·)水平上。此外,国际环境也把俄国抛回到过去的水平,我国国民劳动生产率,整个说来,现在比战前低得多。”(《文集》,第18卷,第2册,第125页)<sup>307</sup>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害怕使用“国民劳动”这个词。这段引文里就是这么说的:“国民劳动生产率”。

喊声:主要的思想呢?

李可夫:关于五年计划的陈述方式和分析方法当然可以争论。但是在我看来无疑的是在过渡时期国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是主要特征之一,条件是社会主义成分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私有成分(手工业者、简单商品生产者等等)中要快得多。因为我们并不打算在个体成分的劳动阶层贫困化和破产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我们说也要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为什么在讲到这一切的时候,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使用过的术语都不能用呢,我闹不明白。

由于我的提纲草稿,好像还有人指责我把五年计划和两年计划对立起来。而且有人在发言中还为此同布哈林同志争论起来。我要声明,就两年计划的问题我既没有和布哈林同志,也没有和托姆斯基同志商量过。

喊声:商量什么?

李可夫:关于两年计划。我提出这个建议由我个人负责,我没有就这项建议和任何人达成过协议。我的建议归结起来是什么呢?我们不久以前颁布了农业税法,我们对所有农户(明显的富农户除外)的新耕地两年内免于课税,宣布了三年不变的税率。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不能纳入一个预算年度的范围之中。我们采取这个措施,因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脱节的危险。五年计划的命运(对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怀疑!)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够多么迅速地、多么坚决地消除这种脱节的危险,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那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如果它们继续发展下去,或者保持着现在的局面,我敢断定我们实现不了五年计划。因此消除脱节危险的问题、消除粮食方面的种种危机现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我们执行五年计划的成败是有决定意义的。可是不能这样来解决问题:既然今天粮食不够,那你们就自行决定在一个地方采取非常措施,在另一个地方使用第107条,在第三个地方再

搞一点其他什么名堂。在这些问题上这样鲁莽行事,随心所欲是不行的,这样做什么也得不到。如果把我们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归纳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是围绕着一个题目: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克服发展农业和工业中已经出现的威胁,也就是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威胁。我们找到了,现在正在检验对农村的简单商品生产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批实际的传送带。国家计委的五年计划完全正确地把这个改造过程放在向农业推广新型能源,在农业中实施能源计划作为农村集体化的主要条件的基础上,就像我们当年通过的使整个经济电气化计划一样。按照五年计划,到第五年底,私有成分在农业总产量中将占86%,而在商品粮中占60%。农业中的集体成分在总产量中占20%弱,而在商品粮中占40%。这是很大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加强国内社会主义的阵地,而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阵地。

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那些给我们扣上右倾帽子的人认为,在业已存在两年的那些危机现象的基础上,我们好歹能撑到五年计划结束,而达到计划列举的那些目标。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就在不久以前,我们有过一场奇怪的争论:谁是机会主义,是先写“个体经济”,然后再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人呢,还是先写“集体农庄”,然后再写“个体经济”,然后说,两者都必须大力发展,而同富农经济要进行斗争,把它排除在外的人呢。关于后面这种人,还说他们是折中主义,因为他们既赞成这个,又赞成那个。问题不在于这些毫无疑问的废话,问题是在对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怎样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怎样保证实现五年计划,怎样养活工厂的工人和消费地区的农民。我想,如果你们打算用给我们造成了今年和去年的困难的那些措施来解决这些任务,那你们是不能实现五年计划的。

伏罗希洛夫: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李可夫:作为一般政策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具体建议——把五年计划中涉及消除“脱节威胁”的那一部分置于专门的监督之下——就是要制订工作计划。去年存在过的那些危机现象,今年还在发展,明年很可能还会存在。我们要多少是成功地克服他们,不是一年的事情,至少需要两年。对我来说,两年是或多或少彻底地克服这些脱节威胁的最短期限。

说我把什么两年计划和五年计划对立起来,说五年计划是为了安心,两年计划才是实际要干的,这都是从何谈起呢?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一直在努力保证实现五年计划。也许为了保证五年计划,在工业和农业的联系方面有些其他的方式和方法,那就请提出建议来吧:迄今为止,我们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为每一次播种运动成立一支特派员队伍。这有一定的好处,但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要解决和粮食生产,以及整个农业有关的问题都涉及许许多多人民委员部、托拉斯、辛迪加和各种其他机构:就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要函电往返好几个月。许多运动就因此而中断了,没有搞成。此外,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连一年的收成问题都不能在年度预算和生产计划的范围内解决。可是所有这些问题目前又都是和全国利害相关的,而且,我再说一遍,对整个五年计划的命运具有重大意义。

我的五年计划提纲的初稿还在许多方面受到指责。例如,指责它关于铁路运输一点都没有谈,关于合作社也谈得很少等等。这方面的许多意见和修改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我拒绝对提纲做进一步修改。我拒绝并不是因为没有达成一致的任何希望。我觉得,我们是能够谈妥的。可是在责备我用了一个词“对接”之后,我只好拒绝修改提纲了。我的提纲里有一个地方讲到:“集体成分和个体成分的对接问题”。就这个用语,米高扬同志在由他签名的一份文件(赞同他的还有政治局委员会的其余大多数成员)里写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结合的问题改成对接的新问题。如果说‘结合’的概念表示阶级之间的联盟,那么‘对接’表示的就是斗争和冲突。”

我说的不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农业中集体成分和个体成分的关系。我是一个俄罗斯人,受到这样的指责后,我就想:也许是我把俄语忘了,也许是米高扬同志的俄语知识比我高明。(笑声)那就让我来看看达里辞典吧,看看结合是什么意思,搞清楚用了“对接”是不是就确实背叛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我当时想,如果米高扬同志是对的,我立刻就给米高扬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写一封悔过信,而且在全会上声明我犯了错误。于是我就打开达里的《现代俄语详解辞典》。那里说,结合、对接是指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衔接起来,两者紧密地合拢在一起。接下去有典型例句:“他在领导面前躬身而立。”……真是漂亮的例句!

伏罗希洛夫:这里讲的是琴弓。

米高扬:反正结合和对接不是一回事儿。

李可夫:辞典里还有:“对接是让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衔接起来,使两个顶端连接起来。”米高扬同志说,这不是一回事儿!能不能讲两个地区的连接,比如说,下伏尔加地区和中伏尔加地区的连接呢?可以这么说。可是这完全不是说,下伏尔加边疆区委书记和中伏尔加边疆区委书记是在冲突,在干仗。(笑

声)这说的是两个地区的连接线。

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可以这样来描写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对殖民地的态度,说资本主义是为殖民地服务(?!?)的;可以用古代俄罗斯的财政制度的术语来描写我们同农民的关系,说我们向农民收取“贡赋”(?!?),可是却不能说“两个州的对接”,或者“工业和农业的对接”!

这一切向我表明,不管我怎样修改提纲,反正对任何一个词都可以挑剔,我的工作也是白干。

米高扬:没有这回事儿,这样说不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李可夫:我再说一遍,我拒绝修改提纲。

我好歹也懂得俄语。批评家们论据的种种牵强附会、吹毛求疵我看得非常清楚。“对接”这个词把一切揭示得极其明白,所以我认为,我何必修改提纲,既多余刺激自己的神经,又白白浪费时间呢。比如说,人家会向我证明,“对接”是这个意思,而“结合”是另一个意思;用“服务”来描绘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态度是正确的,把“贡赋”用于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也是正确的等等。我决定拒绝修改提纲。

臧声:你太丢人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李可夫:我不反对把我的提纲的初稿分给大家。

我向大家阐述了,至少是我努力阐述了我们之间意见方面的细微差别。见解上的这些细微差别是由于对眼前的困难及其克服方法有不同的认识,以及计划能不能让我们从这两年经历的危机现象的基础上形成的种种困难中,“飞跃”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能够切实挽救我们的时期去。

如果说的是确实的,而不是故意编造的分歧,那在这方面我们是完全正确的。

我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对弗鲁姆金持什么态度,因为决议里写着你在滚向他那里去?”滚这个词表示一种运动,而运动总是缩小和滚向的物体之间的空间。因为从滚动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所以有人会问,我现在和弗鲁姆金之间的距离还有多大。我不回答这些问题,还因为我过去已经讲得够多的了,也因为这一切都不值得回答。我也不回答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断言:“他们反对集体农庄,反对国营农场,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投票赞成规定要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五年计划。”他说,那些认为我国的农业近来越蜕化了的右倾共产党员,却不知为什么投票赞成规定要大力发展农业的五年计划。请看,如果右倾共产党员指的是那些在草拟五年计划时,从农业蜕化的需要和没有集体农

庄及国营农场出发的人,那只有鬼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人早就应当被开除出党了,不过我认为,这样的人只存在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想象之中!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不是这样说的。

**李可夫:**我是这样听见的。也许速记记录里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我听到的就是我说的那样。

有些地方企图指责我反对工业化,还有类似的东西。可是毕竟有许多人了解我的工作。为什么伏罗希洛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和加里宁同志不走上台来,说明一下我反对工业化表现在哪里呢?我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已经五年了,而且按照指责我的人们的说法,是反对工业化的。可是请看,我国工业化的速度是最快的!怎么会是这样呢?

**伏罗希洛夫:**我们一直在夸奖你的工作做得好。

**李可夫:**可是已经这样写出来了,说我反对工业化!我们把重大问题提交政治局,可是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我当然起很大作用。如果我反对工业化,这无疑会反映在工业化的实际工作上。虽然情况是这样,可是许多决议不仅就我“滚向”弗鲁姆金同志,而且就我的全部工作写了诽谤性的连篇废话,而且都向这里送。

就我们的分歧凭空捏造出李可夫,还有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是右倾,反对工业化。借此发动了很大一部分党员,而且大概说服了他们。不久以前乌加洛夫同志来找我,指责我签署了向富农出售复杂农业机械的命令<sup>308</sup>。这都是不久前搞的活动,以及充斥我国报刊的种种影射和暗示的结果。让全会注意这种东西和对这些指责的批驳,我认为有损于联席全会的尊严。

我还要简单谈谈败坏布哈林同志声誉的问题。大家知道,他过去和现在写的东西比我们大家都要多些。他的小册子和书本按照各种原因被广泛地引用。可是请注意,在这里被用来反对他的那些文字,都出自他4—5年前写的小册子。可是无论在出版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年代里,米高扬同志和其他人,谁都没有表示过和布哈林同志不同的意见,谁都没有反对过布哈林同志这样或那样的观点。

**米高扬:**可是他现在还坚持这些东西呀。

**李可夫:**在布哈林同志讲述和写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无论是米高扬同志,还是其他人没有提出过和他不同的意见。布哈林同志是这样一个党务活动家和政治家,有许多人:既有托洛茨基,又有季诺维也夫,如今还有米高扬同志,都想同他较量较量。

**米高扬:**你别胡搅。

**李可夫:**请看,在所谓83人声明(1927年5月25日)<sup>309</sup>中是这样说的:

“中央领导核心从提出‘发财吧’的口号起,到要求富农‘长入’社会主义止,发展到了对农民中的分化讳莫如深,加以抹煞,同时在实践上依靠经济上强大的农民。”

围绕着“发财吧”的口号,今天反对布哈林的叫嚷者的先驱们当年曾经大做文章。为了回答这类议论,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是这样说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停止对布哈林同志的攻击呢?他们叫嚷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

“……和这些同志比起来,布哈林同志犯的错误要小得多,而且他没有违反中央的任何一个决议。尽管如此,对布哈林同志的疯狂攻击仍然在继续,这该怎么解释呢?说实话,他们究竟想从布哈林同志身上得到什么呢?他们要布哈林同志的血。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结论中突出布哈林的问题,要的正是这个。你们要布哈林的血吗?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你们当心点。”

他在结论里突出了这一点——“他们要布哈林同志的血”,“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

在这之前,我们大家代表政治局就“发财吧”这个词回答加米涅夫同志、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人<sup>310</sup>时,是这样写的:

“四人政纲就‘发财吧’大肆鼓噪。布哈林同志承认,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发财吧’不是党的口号。可是布哈林同志在报告里发挥的观点,其实质(黑体字是原件里的。——阿·李·)不在这里。在这阵鼓噪中最可笑的是,这四个人的气愤同样适用于政纲的起草人之一——加米涅夫同志”<sup>311</sup>……(他曾经写过,说我们需要发财的农村等等)。

也是在1925年,我们在回答“四个人”的第二份文件<sup>312</sup>时,是这样写的:

“我们要指出,《对九人的回答》的作者攻击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喘息的条件下‘和平发展’和‘国内和平’的政策,虚伪地称它是‘布哈林的公式’。我们坚定不移地声明,这个政策是列宁的政策,现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用拉林的政策来替换它是徒劳的。”<sup>313</sup>

政治局在1925年的这份正式文件中反对四个人的诬蔑,引用了发表在1925年7月的《真理报》上的、布哈林同志讲话的一段话:

“必须毫不客气地强调,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最近就会激化。在合作社本身就会有这种斗争,会为管理委员会的名单而斗争,为合作社的章程而斗争,为人多少股份而斗争,为向谁购买,同谁联系而斗争,还会为把谁选入管理委员会而斗争。我们要站在哪一边呢?站在贫农和中农一边,孤立富农……”

无须多说,如果富农想用暴力手段来反对我们,我们就掐他们的脖子。”

米高扬:他在回答我的插话时说,他不否认。

李可夫:米高扬同志在有关布哈林同志的引文上是这样做的:他批驳了布哈林同志的话,而他米高扬自己当时说过些什么,则一字不提;对于就他的讲话提出的问题,他一概避而不答。莫洛托夫同志的做法也一模一样。

可是布哈林同志早在1925年就讲过:

**“必须毫不客气地强调,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最近就会激化。”**

列昂诺夫:不仅如此,他还写了要“带上机关枪”呢!

李可夫:我面前的这段文字里没有提到机关枪。如果有这样的话,那反正不能指责布哈林同志否认阶级斗争尖锐化。这是他1925年说的,这段引文里有他对波斯特舍夫同志的问题:“如果有人攻击贫农,你会怎么办?”的回答。布哈林同志回答说:

“无须多说,如果富农想用暴力手段来反对我们,我们就掐他们的脖子。”

我完全赞成布哈林同志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要掐住富农的脖子。由此可见,对布哈林同志提出的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布哈林同志什么时候,在哪里否认过什么斗争?相反,他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比我们大家都早。现在有人要布哈林同志的“血”。你们很快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米高扬:谁也没有要他的血。

李可夫:请原谅:我是重复斯大林同志的话。

米高扬:他这样说是指的托洛茨基分子。

臧声:你们也把布哈林看成托洛茨基分子。

李可夫:他这样说是指的列宁格勒反对派。

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列宁在“遗嘱”中关于布哈林同志是这样写的:“布哈林不仅是党最宝贵的大理论家,而且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受到全党喜爱的人。”

奥尔忠尼启则:不,你把这段引文念完。

李可夫:不久前我在《真理报》上读到哈塔耶维奇的文章《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sup>314</sup>,哈塔耶维奇同志给“理论家”打了引号,显然指的是布哈林同志。我们当然应当指望,我们能够有按知识和理论水平可以同列宁并驾齐驱的党员,如果一般说来是可能的话,甚至在天赋上超过他。可是我反正不能把哈塔耶维奇同志看成是这样的党员。(全场笑声)

乌加洛夫:可是他有这个雄心!



李可夫:在评价一个人的理论才能方面,我想,列宁比起哈塔耶维奇同志来,无论是凭自己的智慧,还是就对布哈林同志的了解(他认识布哈林同志有几十年了)而言,终归是有许多长处的吧。(笑声)

同志们,我这就结束我的发言了。我的发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完全不像一个犯人最后的“忏悔”。我想从我的发言中,要求我也罢,布哈林同志也罢,托姆斯基同志也罢,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观点,为这些观点“忏悔”,就未必是正确的了。关于工业化、集体农庄、弗鲁姆金同志、社会主义建设等等的一切指责都是臆造出来的、彻头彻尾的废话。是臆造出来的、彻头彻尾的废话!

罗济特:说得对!

莫洛托夫:那你们的声明呢?

李可夫:从我们的任何一份文件中,任何一篇发言中,你们都找不到我们反对过工业化、集体农庄、建设新社会的最快速度等等。分歧不在这里。分歧在于用什么方法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怎样才能克服我们现在经历的困难。克服困难对于实现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之间的分歧既不能归结为右倾,也不能归结为左倾。我们今年在农业中实行了完全正确的机动,这种机动涉及粮价、农业税的改变等等。今后党的政策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机动,我们不妨按现在的说法称之为右的或左的机动。所有这些机动是否正确,就要看它们能不能保证加快我们沿总路线前进的速度。只有这一条标准——是否有助于,是否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才是正确的。没有其他标准。只有从加快国际革命和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只有从是否符合这两项任务,是否能加速解决这些任务的角度才能说某种机动是不是正确。在某些情况下,像我们去年那样提高粮价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去年对农业税的改变是正确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不正确的。在我们采取最近的那次机动时,按当时的条件它是正确的步骤,虽然它为富裕阶层提供了一些优惠,可是它正确,因为它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益处要好几十倍,它加强了,巩固了工人阶级专政。对于在我国这样复杂的环境里执政的党来说,放弃这样的机动是不可思议的。一些年轻的红色教授对我说:你就笔直地朝前飞,别拐弯。我回答他们说,我不是乌鸦,我不会这么傻。(笑声)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指责我们,说我们“滚”(他加了一些修饰语,还有一些条件,不过蔑视仍然保留着!)到了惊慌失措的地步,到了当年反对派集团认为有致命危险的那些方针上去了。

惊慌失措的例子不仅在新党员身上可以看到,在有些老党员身上也有。

因为有人想给我扣上惊慌失措的帽子,我来谈谈我怎样看目前的困难。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的困难不会局限在这两年。为了缓解和消除这些困难,至少还需要2—3年。在任何一个非苏维埃国家里,许多东西都会由于这些困难而受到震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国无论是这些困难,甚至是更大的困难都不会导致政治危机。它们反映到我国总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局势上要缓慢得多。尽管非常缓慢,可是终究是要反映出来的。当然,今后也会有困难。我们的看法是:不能在目前粮食困难和农业有脱节危险的基础上,甚至是困难增加的基础上,冒着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风险而“飞跃”前进。如果党不采纳我们的观点,那困难还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困难会增大,而且首先就对五年计划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产生负面影响。指责我们,说我们拿致命来吓唬人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指责说明,我们,或者我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出发点似乎是工人阶级的政权软弱无力。我已经说过,这种指责是对我们彻头彻尾的、荒唐的诽谤。我已经讲了我国工人阶级政权的巨大稳定性。我再说一遍,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建立起来的组织系统能够经受住几十次经济危机,甚至是比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更为严重的考验。我们的国家组织不同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依靠少数人,因此每次危机都会把与政府为敌的多数居民发动起来。我们依靠的则是国内居民的绝大多数。我们的长处不单单在这里,而且还在于作为劳动人民群众组织的苏维埃组织系统,囊括了财政、工业、党、工会等等,具有极大的力量。只有力量同样强大的打击才能使这个具有极大力量的组织死亡。我们的分歧仅仅是怎样做会减缓,而怎样做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的问题,也就是加快速度的问题。我想,按我们的路子走,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至于抛开速度,只谈前进,那么由于我国的组织依靠的是积极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革命之后已经有十多年了,农村和城市里新的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连个体成分中的人也不那么接近私有主的思想,所以即使在政策不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也会前进的。我再说一遍。即使我们的政策有误,我国业已建立起来的、有巨大力量和运动惯性的系统也可能前进。

我们之间的分歧谈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更快地克服近来的危机现象(如果把我在发言开头讲到的领导问题撇开不谈的话),怎样才能切实保证我国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的、牢靠的、最快的速度。我讲完了。

主席:休息15分钟。下一个发言的是丘巴尔同志,然后是伏罗希洛夫同志。

(休息后)

主席(柯秀尔):丘巴尔同志发言。丘巴尔要求半小时。给他吗?

喊声:给他,给他。

丘巴尔:在认真讨论党内情况之前,我要声明,我就是李可夫同志提到的建议他讲究一点策略的人们之一。我在初步读过李可夫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宣读的文件后,曾经同他谈过话。我坚决抗议对我们之间的谈话做这样的评价。我在读到这份文件后的第二天就同李可夫同志谈了话,可是没有说让他讲究点策略,隐瞒自己的信念等等,而是肯定地告诉他,由三名同志写成并签名的文件是不合适的,因为其中对党和斯大林同志就一系列问题:“贡献”问题、培植官僚主义问题、党内民主问题等,提出的指责都是错误的、莫须有的。我说必须收回这份文件,并不是为了策略,而是因为它对于党是不恰当的、有害的。其次,我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不应当抹煞布哈林同志做法的错误,因为党内任何人都不会赞同,谁都会谴责,即使有减轻错误的情况,他的行为——跑到昨天的反对派分子加米涅夫那里去,对他讲了那些本来不该讲的话。

喊声:铤而走险的话你说过吗?

丘巴尔:铤而走险的话我不知道是谁说的,我没有说过,我只说过,对李可夫同志说过我对三个同志犯下的主要错误的看法。我讲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李可夫同志在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坚持的许多见解和立场,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讨论,但是不要掺杂那些集团斗争的因素,那会妨碍就这些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虽然今天李可夫同志把我同他的这次谈话看成是让他讲究策略和放弃信念的、使他感到屈辱的建议,我仍旧声明,即使是今天我也认为,三名政治局委员在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中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非常有害的,它必然要遭到各级党组织和全党的坚决反击。这种立场无论从哪方面都不会得到什么同情,因为它和捍卫党的路线没有什么关系,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份文件对党是一次打击,可是它既然打击了党,它的另一端就自然会打到它的起草人身上。

喊声:说得对!

丘巴尔:应该向这些同志建议什么样的策略呢?我说的是正面意义上的策略,我愿意把它比作李可夫同志在结束发言时谈到的重大机动:我们从处境出发,不得不修改农业税,提高粮价等等,也就是说,全党从正确地衡量局势出发,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所以我也从评价以三个人的名义提出的文件出发,从布哈林同志声明中的论断出发,我认为,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应当采取坚决的步骤——放弃错误,收回声明,不要因为在政治局内和中央全会上保卫自己对某些问题的信念和原则立场,搞宗派斗争,走上同党、同中央委员会

斗争的道路。我认为,我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而且威胁要把李可夫同志赶出去也是他对提出声明这一步骤的危害性估计不足、认识不足的结果,是对布哈林同志向加米涅夫谈了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里讲到的那些话这种政治罪行估计不足的结果。我本人了解,而且尊重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执拗,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主要错误,这就会导致党内情况的复杂化,而这比私人关系重要得多。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我要说明,我认为党内状况不仅由于三名政治局委员走上了斗争的道路而变得困难、复杂,更由于党内右倾分子、右倾、滑向右倾的趋势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实际的存在,因而更加艰难。这一切,我认为是决定性的,它迫使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还有我们联席全会最坚决地搞清楚这种疾病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令我非常吃惊,他把改善党内状况的问题,或者说任务仅仅归结为解决三个政治局委员的问题。给人的印象是党内根本不存在右倾危险,右倾危险就是三名政治局委员。更令我吃惊的是,不能用一个问题去代替另一个问题,不能认为,解决了受人尊敬的政治局委员同志的行为和错误立场问题,我们也就从党的议事日程上取消了同右倾斗争的问题。同右倾斗争的任务是由党不得不领导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结成同盟,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环境引起的。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党的队伍保持一致、统一和团结。只要螺母一松动,只要右倾在发展,只要存在摇摆和动摇,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失去坚定地领导各种工作的最重要条件。这是最大的危险,这是对我们完成社会主义进攻计划的威胁。改造时期一般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克服这些困难,就不能像历史要求的那样,沿着工业化的路线,沿着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迅速前进。

我们应当克服这些困难:经济方面的困难、组织方面的困难、由于群众文化水平低而产生的困难、由于在社会主义的进攻中遇到了阶级斗争尖锐化而产生的困难。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会推动我们的阶级敌人来进攻,它也鼓舞着希望利用这些困难来巩固自己的阵地,以求对抗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资产阶级。城乡阶级斗争尖锐化、富农的活动、它对我们措施的反抗——这都不是我们可以不去考虑的小事情,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发动党的力量来解决改造时期的任务,而无须议论的“附带的”困难。如果我们不能战胜那些加深经济困难的人,我们就什么经济困难也克服不了。被揭发出来的沙赫特人的破坏活动,一部分资产阶级专家不仅在煤矿工业,而且在其他许多重要行业里存心和我们捣乱,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这都说明什么问题?这些人我们是人赃

俱获了,可是还有多少耐普曼分子和富农分子,我们知道他们在搞破坏活动,加重我们的困难,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没有抓到证据,没有把他们揭露出来。我们应当告诉每一个人,告诉党、工人阶级、贫农和中农,阶级斗争在哪里,现阶段它有哪些表现形式。所以我觉得,托姆斯基同志是不对的,他在这里说,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更大的、更重要的问题。解决所有的问题,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都会遇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环境,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我们全党应当首先集中注意的问题。在改造时期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在阶级斗争尖锐化和由于农业遭受天灾(歉收)而引起困难的条件下,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队伍中可能出现许多摇摆和动摇,而且会传染给党的队伍。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站在一旁看着,跟着那些动摇一起动摇吗?党应当抗拒这种动摇,应当拿出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一致、足够的认识,不仅动员自己的力量,而且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向这些困难进攻。在困难的条件下孕育着什么样的趋势、什么样的情绪呢?显然,这里的问题是这么摆着的:一些人认为,既然有困难,那就应当退却,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减缓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也许可以松一口气。这种趋势在我们党的个别阶层中是存在的。这种趋势会用退却的愿望,绕过困难、避开困难的愿望感染党内很多阶层。我们有很多人希望退却,虽然在通过决议时,在解决重大问题时,大家的意见仿佛都是一致的。

臧声:对。

丘巴尔: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在日常斗争中,种种摇摆和动摇逐渐积累起来,削弱了党的力量。所以对于把我们拉向退却的各种趋势,应当给以坚决的回击。

第二条路线是党的路线、中央的路线,就是不停止进攻,不退却,克服这些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必须动员全党,动员把党和工人群众以及基本农民群众连接起来的所有“传送带”,在动员的状态下进行斗争,粉碎富农和耐普曼的反抗,消除危害分子,打退世界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必须坚定不移地、信心百倍地引导党沿着实现党的十五大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历次全会规定的那些指令、计划和纲领的道路前进。发动全党首先就要使我们的司令部、党的司令部——政治局处于动员状态。

米高扬:说得对。

丘巴尔:所以各级党组织才坚定地、毫不放松地注视着每一个政治局委员,看他是不是哪怕稍稍偏离了党的总路线,是不是有涣散党的队伍、涣散政治局的

团结的企图。我想,谁也不会因为李可夫同志,或是布哈林同志,或是托姆斯基同志,或者政治局的某个委员就某个问题提出了什么建议,就来做一个决议,可是如果这些建议构成了一个系统和不同于中央的路线,而且表现在布哈林同志的声明和“三人”声明中,那全党就会起来反对这条路线,反对这种进攻。

米高扬:说得对。

丘巴尔:这是应当明白的,这是应当懂得的。

李可夫同志说,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攻击”,现在又迫使他来领导。我理解他的处境,是很难进行领导。是的,毫无疑问,如果置身于斗争之中,置身于这场争吵之中,那么无论是苏维埃系统,还是工会系统,还是其他任何系统都很难领导。因此各地通过的各种决议的意义、它们的目标——停止争吵——是正确的。承认错误,转变自己不正确的立场,放弃这场火药味很浓的进攻,——那时的工作就会轻松得多。

喊声:党会帮助你们的。

喊声:可是他们自己保持沉默。

丘巴尔:我想,党会帮助这些同志的,也应当帮助他们。

喊声:对。

丘巴尔:我设想,假如没有这些声明,假如没有去找加米涅夫,假如没有对党提出的这些指责,那我们会怎样讨论控制数字,怎样讨论五年计划的问题呢?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带着许多附加的情绪来讨论。我想,我们作为中央委员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十一月全会上,我们听到委员会内,确切些说是政治局内有争论的传闻,可是没有要求把这些争论拿到全会上来。

喊声:说得对!

丘巴尔: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就经济计算、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实质性的争论,可以谴责一些犯错误的人,而现在我们只好在更差的环境里做这件事。我们当时的做法是保护政治局委员不受冲击,可是疾病却发展到了体内。哎,犯下的错误是没法收回的。应当在这次联席全会上改正错误。

很清楚,离开了经济困难,离开了国内的经济局势是不可能讨论党内状况的,因为这些困难、这种状况引发了动摇和犹豫。请看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讲述的药方,它们的来源是什么呢?我在十一月全会上就说过,不考虑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歉收的后果,就不可能正确地衡量我国的经济局势,特别是农业的局势。这个天灾应当算做我们局势困难的原因之一,所以要和局势联系起来讨论。毫无疑问

问,乌克兰歉收造成的困难是很大的。它反映在苏联全国的经济局势上,它破坏了足以影响到我国主要地区的那一部分区域的市场平衡,从这方面说,不能不充分地估计到这个因素。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消除歉收的后果,怎样动员力量和资金?可是在十一月全会批准1928—1929年度的控制数字时,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争论。十五大以后,中央在四月全会、七月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农业的那些决议已经使党对农业的注意力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喊声:拿出事实来。

丘巴尔: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这一年里,我们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之多是许多年里没有过的。除了关注以外,还拨出了资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农业并不是处在党的视野之外。所以制定的一套措施不仅仅是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有提高产量,也就是组织农业生产,而且不限于社会主义成分,还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现在每个党员都懂得,什么叫农业,农业有些什么过程,而且不单单是一般经济过程,还有技术—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那些长处,党现在在农业方面也掌握起来了。这是一大进步,是一个重要的药方,它不是搞运动,而是作为长期的、系统的措施而发挥作用。这张药方是不是灵丹妙药,能够在今年内就消除我们的困难呢?我看,不可能有这样的药方。没有这样的药方,无论是按地区论价,更不用说什么按季节论价了,都不是这样的药方。布哈林同志试图找到摆脱目前困难的出路,在我看来,他的企图落空了,他什么也没有拿出来,也不可能拿出来,因为这个问题不是靠一张药方可以解决的,要靠一整套的计划措施。

我认为,布哈林同志有一点是对的,他说我们到农村去搞粮食,研究了采购问题之后,就接触到了生产任务。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不单纯是粮食问题。因为没有粮食,我们就不能从农业得到任何东西:肉类、油脂、皮革都拿不到。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是组织农业生产,而且是全方位的生产,重点是粮食问题,因为它是其他部门发展的前提。

党做出了这些决议。党执行了既定政策,因此我觉得三人声明中关于几乎不存在原则性分歧的论断是接近真实情况的。可是既然不存在原则分歧,那声明因何而起呢?纠纷又因何而起呢?又有哪些其他的建议呢?李可夫同志说,主要的分歧、主要的争论可以归结为:目前的困难是市场行情方面的困难呢,还是加了引号的行情方面的,也就是本身固有的?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困难更多的是市场行情方面的,而不是本身固有的,如果不把我国经济的分散性、抗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低等固有的前提看成斯大林同志的公式里、中央的公式里提出的主要原因的话,因为这个原因是谁也不曾取消了的,也是不可能被取消的。

如果认为这些困难是市场行情方面的,那能不能说,这种看法就是对困难估计不足呢?我认为不能。这可能是,也应该是对企图把困难归咎于党的政策的驳斥。这样看才是对的。

把我们的困难界定为市场行情方面的,这并不能缩小困难的规模,也不能使党放松制定措施以减轻这些困难造成的后果。从这个观点看,无论是行情方面的困难,还是带引号的行情方面的困难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就是必须消除这些困难,而问题就是怎样消除它们。从这方面看,中央委员会在粮食采购中采取了非常措施,执行是正确的,谁也不曾提出过指责,这些措施是中央自己取消的。为消除今年的粮食采购运动中对政策的歪曲、过火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方法所做的努力,绝对不会像三人声明说的那样分裂中央委员会。挂着黑牌子游街不过是地方党组织在领导日常工作中的失误,并不是中央发过什么指示。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也没有做出过这样的指示。

地方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创造呢?有可能。地方干部的处境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沉重的。请大家想一想富农的侮辱,他有一两千普特粮食,可是不肯拿出来,并且说:想要你就来抢吧……

喊声:你们得迈过我的尸体去!

丘巴尔:(来抢吧),而我是不管你们用什么公众措施都不会交出粮食的。这样一来,就像打架一样,过火行为就难免了。而且……

斯克雷普尼克:用卢布不行就使大棒子!

丘巴尔:(而且)有时候也伤及中农。可是这些个别的,虽然为数也不少的行为难道能够说明实际情况吗?应当选出现实中主要的东西。现在在大部分地区,这些非常措施基本上都不采用了,而且即使采用,也不会像去年那样,大范围地使用最糟糕的方式。我不知道,乌克兰的局势也许比我说的要差一些,我们并没有采取非常措施,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在个别情况下不会出现歪曲政策的事情。我们在同这些行为,同各种过火行为,无法无天的行为作斗争,可是它们之所以产生大都是由于富农现在想利用我们的困难搞投机活动,并争取中农,甚至是一部分贫农。在这个层面上,在争取中农和贫农方面,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还不够。这是我们的欠缺,是我们的缺点,可是不能归咎于党的指令、党的路线;从这方面说,认为我们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被破坏了是由于党的指令,这样的批评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决定于给这些农户提供的帮助有多



大,以及我们根据党的主要指令采取的措施:预购合同,提供农具、种子和贷款,降低农业税等等。这些措施是最大的杠杆,我们依靠它们来影响农村中的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巩固我们同他们的联系。关于党的农村政策的争论是严肃的争论,可是有什么好争论的呢,既然现在中央制定的路线没有任何变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变化。只有在斗争时期才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小错误,才会就这些问题争论,抓住个别事实不放。

托姆斯基同志把结合的新形式、新方法说成是新的臆造,我认为这种攻击是绝对错误的。新形式和新方法是从哪儿产生的?是从无产阶级国家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中产生的,这可不是哄骗农民的臆造,这是无产阶级国家对农民切实的阶级政策,为的是提高农民的经济,更新它,改造它。这条路线是无须争辩的,要想责怪它用了一些新词,有些词是听来的或者是抄来的,但都是不会得逞的。

谈谈用词。就是“贡赋”这个词。从布哈林同志的发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这是一场语文学的争论。

罗济特:这是雅罗斯拉夫斯基说的,不是布哈林说的。

丘巴尔:我理解布哈林也是这么说的,说这样描述我们的情况从语文学上说是错误的。如果争论只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表述,那就不应当随意指责党实行的是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政策。要知道,这个口号下面掩盖着,也可能掩盖着富农、富农的帮手、小资产阶级的野心,他们正在寻找权威人士的口号来掩饰自己的破坏活动……

罗济特:最好是去掉这个词“贡赋”。

丘巴尔:(来掩饰……)以便反对农民参加国家工业化。如果党内没有这样的靠山,要想和党作斗争是很困难的。因此这个指责是最有害的指责。就是这些词,就是这些论点是有害的,它们不是新方法,也不是改造农村,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村基本群众的联系的新形式。争论一直是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刺激因素问题——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李可夫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如果把迄今为止实行过的刺激因素列举……(主席摇铃)

米高扬:别打断他,再给他一点时间。

臧声:大家都是一小时和一小时四十分钟,可是现在被破坏了。

臧声:给他延长时间!

主席:你还要多少时间?

丘巴尔:十分钟。

臧声:给他!

丘巴尔：如果把迄今为止实行过的刺激因素列举出来，如果把控制数字和五年计划里的各种措施都列举出来，这方面有争论吗？我们听见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说，这方面没有争论。的确，加里宁同志的提纲里表述的提高农业的总路线，在我看来，是不可能有什么争论的，因为它确实是提高我国农业的路线。像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业是为殖民地服务，还是掠夺殖民地，这样的表述是可以争论的。可是这是理论上的争论，关于公式的争论，而不是关于一个有上百万成员的党用来提高农业的措施的争论。提纲关于右倾错误的论述是否正确，也是可以争论的。可是我想，第一，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不要把对右倾的种种描述都认为是针对自己的。可是右倾的这些意见、这些趋势、这些特点是存在的——这是用不着争论的。中央应当讲清楚，右倾表现在哪里，这样才能动员群众起来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可是我们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讲清楚。我在一期《真理报》上读到阿尔布佐夫同志的一篇文章。他写道，既然省财政厅要给企业拨款购买设备和原料，而且购买原料的钱比购买设备的钱多些，因此原料就会闲置起来——我们就指责他是右倾。我看，这样来解释右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到处都可以抓出右倾来，党员群众反而闹不明白什么是右倾了。加里宁同志在提纲中讲到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说，给我们扣了这样或那样的帽子，在我看来，要摆脱这种处境很容易，只要明确地表明，我们反对这些错误，我们谴责这些错误，我们认为必须同这些错误进行坚决斗争等等。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实际情况是，党内无疑存在的右倾趋势是一些有威望的同志带头的，而这些同志的错误还会增长，因为顽固地坚持哪怕是微小的错误也会最终形成宗派。我理解布哈林同志说的，他不会反对党，不会搞宗派，他反对这样做。可是斗争的逻辑比我们任何人的主观愿望都要强烈一些。在这方面如果不及时停步，如果不说到此为止吧，如果不切断斗争的成分，那斗争的逻辑就会迫使人采取种种超出规章的斗争方式。从这个角度说，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采取的步骤（不服从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是非常有害的，所以遭到党必然的回击。党不会，也不可能搞清楚各种细节——是谁，什么时候，在哪儿开过会，写过一些什么便笺，争论过什么问题，——违反党纪的事实就足以遭到谴责、正确地谴责这种行为。

乌格拉诺夫：你就说他们是向资产阶级阵营投降的人吧。

丘巴尔：向资产阶级阵营投降的人是我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说的，我要在这里声明，我过去和现在都不相信，可是我要公开地对任何人说，托姆斯基同志、

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

柯秀尔:还有乌格拉诺夫。

丘巴尔:还有乌格拉诺夫是已经定型的右倾分子,他们把党引导到,或者说努力引导到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上去。可是我要说,今后也要说,也有权这样说:坚持错误,坚持违反党纪就会把他们置于和党对抗的地位,置于搞宗派活动的地位,置于从客观上说给那些从旁反对党的人加油助威的地位。这是今天无论如何都应当看到的危险所在。现在到处都通过了决议,要求三位同志守规矩,建议他们停止对抗,我认为,大家都是从这种情况出发的。

罗济特:要求驱逐的建议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吗?

丘巴尔:迄今为止还没有谁把谁驱逐出去了,这要由全会来决定。关于“驱逐”我要说明一下。十一月全会上我说过,如果右倾形成宗派,如果威胁到贯彻党的路线,那就绝对必须采取组织措施,也就是说,在斗争的一定阶段上,和思想斗争同时,必须做出组织结论,不这样做就不成其为中央,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的党。这里须要具体地说明,我是否认为,必须把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我直到现在为止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这里的发言使我非常动摇,可是我还是这样想:为了党,为了党在我国的工作,是不是现在就应当把这三名同志开除出政治局呢,该不该把他们开除呢?我认为不应该,应当迫使他们工作,因为我认为,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和右倾的斗争不能仅限于开除三名同志,那样反而有加深斗争的危险。第二个理由是无论李可夫同志,还是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仍旧是我们党、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大干部。我不是说他们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按我们党现在的水平,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都是可以替代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只要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弗鲁姆金坚决划清界限,放弃已经渗透进了我们党的许多环节的右倾分子的一切错误,放弃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话中,以及三人声明中对党提出的种种指责,——他们还是可以工作的,他们的工作还是有益的,因为放弃了这些错误,放弃了这些立场,就有可能在历次中央全会做出的,以及就五年计划报告将要做出的那些原则决议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芬科夫斯基:如果他们不肯放弃呢?

丘巴尔:你说什么:如果,如果……

扎东斯基:他们不肯放弃。

丘巴尔:如果仅仅根据他们肯不肯放弃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未必能够做出

对党的整体利益有利的正确决议。有同志在这里指出了什么是不正确的、错误的、有害的,我认为,我们的建议、我们的讨论不会被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当做耳边风。

对党的统一的关心、党同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作斗争的任务都要求我们十分注意保存那些可能犯错误,而且已经犯了错误,但是在党的压力下能够,也应该放弃错误的同志们。这是首要条件,也是主要条件。假如我们按照阻力最小的路线,今天开除了三个人,那么今后在我们党内当然就会出现某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现象,倒不是因为同三个人有联系,而是因为在一些领导机构内的许多争论、不可避免的辩论都会在降低我们工作效能的条件下进行。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任务就是尽力使这些同志留在领导机构内工作,而不把他们排斥出去,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改正错误,因为这样做比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对于巩固党的阵地更为有利;如果把他们排斥在外面,那他们必然会违反自己的主观愿望,给党造成危害。

主席:乌加洛夫。

乌加洛夫(对柯秀尔):你为什么害怕称呼我同志呢?

柯秀尔:乌加洛夫同志。

乌加洛夫:同志们,你们中间那些做党务工作的人都知道,连我也……

喊声:遭到了攻击。

乌加洛夫:是的,遭到了攻击。(笑声)攻击我是因为我似乎反对国家工业化,攻击我是因为我似乎反对同私人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攻击我是因为我似乎曾经说过没有必要同富农进行斗争,攻击我还因为我似乎反对同右倾危险作斗争。还给我扣上了军事—封建法庭的帽子。

喊声:法庭?

乌加洛夫:一个人要是有一点最起码的忠诚老实,他就不会给我栽上这些指责。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因为这些话我都不曾说过。来这里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讲话全都收集在一起了。(笑声)当然,我不会拿这些讲话来麻烦大家,可是我想请大家委托中央监察委员会(笑声)从各处收集我讲话的速记记录,找一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笑声)来检查,你们找不出一个字来证实对我提出的那些指控。

扎东斯基:成立一个乌加洛夫著作研究所。(笑声)

乌加洛夫:在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克鲁敏把我从来没有讲过的话扣到我头上。而且他还对读者说,仿佛是作为证明:请你们去看第3期公报,第19

页。于是我想检查一下,我是不是确实说过。我打开了第19页,可是我真替《真理报》感到难为情,我看到的却是谢尔加宁的讲话,而不是我的讲话。(笑声)张冠李戴了。

臧声:是谁给戴的?

乌加洛夫:我没有时间接着谈这件事了。有人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

克鲁敏:我要检查这件事。

乌加洛夫:还指责我说——就这个问题还通过了好多决议——在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我投票反对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安采洛维奇:你投票反对党中央的建议。

臧声: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是什么人?

乌加洛夫:我反对把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补选进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我还受到攻击,只因为我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说出了我的看法。

臧声:这是什么意思?

乌加洛夫:我在州委全会上,在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基洛夫同志的私下谈话中都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党内进行的破坏三个同志声誉的活动是要把他们搞掉。作为回答,就这件事对我做出的专门决议不止一个,用了各种各样的好字眼来称呼我。现在我要问问大家:我们的结果是什么?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吗?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现在组织就建议把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开除出政治局。谁对了呢?是我。(笑声)也许,我做得不合适,过早泄露了这个打算,可是我是在哪儿说的呢?在列宁格勒州委的常委会上说的,我也对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书记说了。既然一个党员、一个中央委员都不能在自己的组织里谈自己的想法,那我应当到哪儿去说呢?

安采洛维奇:你在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也说了。

乌加洛夫:别吵,安采洛维奇同志,也有你倒霉的时候。这不是贫农代表大会,请你稍微克制一点。

安采洛维奇:在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全会上讽刺贫农代表大会是不恰当的。

乌加洛夫:同志们,在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给我们解释说,把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同志……(笑声)

臧声:真有礼貌。

乌加洛夫:补进主席团只有一个目的:联系党中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我参加了代表大会的领导小组,也参加了大会的党团。讲过增补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其他动机吗?没有。当时根本没有讲过任何其他动机。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

对我们说,那时代表大会的领导小组里有过哪些争论。争论的确有过。可是总应当把小组里有过哪些主要争论讲透彻吧?我们当时的争论不单是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在这里讲到的一些表述问题,还有另外一些想扣到工会运动头上的其他问题。有人提议——我现在不记得是谁提的了——在关于工会中央理事会总结报告的决议里加进“工会脱离了阶级轨道”这样的话。同志们,记得吗?有过这回事吗?

**乌格拉诺夫:**有过。

**乌加洛夫:**有过。

请问,像工会这样团结着1100万无产者的强大组织真的脱离了阶级轨道吗?后来又提出了第二点建议:加进工会运动的“非政治倾向”。我们当然就这个问题争论起来。怎么可能不争论呢?大家知道,所有开展过的重大运动,难道工会各级组织没有参加吗?就这个问题我们也争论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同志们不得不放弃他们坚持,而且要求写进决议的那些指责。我并不想在这里夸奖工会,说它工作得非常出色,没有什么缺点。请大家不要这样想。人人都知道,工会有许多缺点,工会组织有某种程度的保守,以及其他毛病。

**喊声:**还有官僚主义。

**乌加洛夫:**我同意,还有官僚主义。难道会就此争论一番吗?

小组里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你们中有很多人想必还记得,那些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反对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路线,确切些说是反对托姆斯基同志的人都被安排进了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我们从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应当吸取的教训仍旧是那些老教训。这就是:对工会运动发号施令(虽然每个决议里、工会运动的每个报告里都是这样说的)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要发号施令,无缘无故地打搅它,我担心什么也搞不成。对待这个组织应当谨慎再谨慎。

为了结束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说几句。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变成了民主的重要捍卫者。他说:有人要求免去商业职工会主席菲加特纳和印刷工会主席博尔舍夫斯基同志的职务,可是,请大家注意,他没有允许这样做。

**柯秀尔:**不是他,是党中央没有允许。

**乌加洛夫:**我不想争论,我同意是中央不允许,可是我应当列举已经不在工会运动中的那些人的名单。我本人就不提了。八大以后立即撤掉了图拉工会主席卡尔塔舍夫,在莫斯科立即撤掉了涅菲奥多夫和马什金,撤掉了老布尔什维克别列佐夫斯基,撤掉了梁赞的主席基吉亚罗夫,说是他在那里待得太久了,虽然

他被派去才四个月。不久以前,从北高加索“被撤下来的”乌达罗夫到那里去了。

臧声:为什么被撤的?

柯秀尔:这是安德烈耶夫的事。

乌加洛夫:这是不顾他保卫了卡冈诺维奇同志。(笑声)

臧声:难道他们是不可替代的人吗?

乌加洛夫:这些同志被撤职,只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投票反对把卡冈诺维奇同志补进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过错。

臧声:你撒谎!

臧声:是谁撤了他们的?

乌加洛夫:阿莫索夫同志大概知道是怎样撤了他们的。我就不说这些事了。

就工会八大再说两句,算是结束这个问题吧。我认为自己有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的责任指出,在工会八大上,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什基里亚托夫同志的讲话给我留下了压抑的印象。他们讲话以后,我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论述,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什基里亚托夫走出来,吓唬工会干部说:

“你们小心点,别这样投票,因为你们要对省委负责!”

什基里亚托夫:我不是这么说的!

齐夫里诺维奇: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说的!

乌加洛夫:不,是这么说的,你问问同志们!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又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得更干脆。他站出来说道,为这件事把你们送到突厥斯坦去还算是好的呢。

臧声:你就胡编吧!

乌加洛夫:我要说,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安采洛维奇:你最好讲一讲,你在代表团里是怎样胡乱编造的。

乌加洛夫: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再问呢?

我想,应当结束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谈呢。我还想谈谈已经搞过的那种攻击。难道对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攻击……

臧声:你也说说对斯大林的攻击吧!

乌加洛夫:〈难道对他们的攻击〉是现在才开始的吗?

臧声:对斯大林的攻击也应该说一说!

乌加洛夫:请等一下,我会说的。

我有记录。难道这种攻击是现在才开始的吗？对这些同志的攻击在七月全会以后不久就开始了。

**戈洛谢金**：布哈林是什么时候去找加米涅夫的？

**乌加洛夫**：已经有人讲过了，我何必重复，菲利普同志？我不想重复别人已经讲过的东西，我想讲一点新东西，所以请大家听一听。攻击是在同右倾作斗争的幌子下进行的。他们出席积极分子会议，谈论右倾危险等等。

与此同时，攻击按照意大利的复式记账法进行着……

**乌格拉诺夫**：说得对！

**乌加洛夫**：事情就是这样干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指名道姓，而是在其他地方悄悄地讲。他们说：“同右倾作斗争”，工人提出问题：是谁，为什么？于是才悄悄地、轻轻地口耳相传，说右倾就是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

**喊声**：在什么地方是这样搞的？

**乌加洛夫**：还在十一月全会之前六七个月这种攻击就开始了。

**喊声**：什么地方是这样搞的？

**喊声**：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

**乌加洛夫**：我请大家听我讲完。（**喧哗声**）

**喊声**：让他讲完！

**斯克雷普尼克**：给他五分钟！

**波斯特舍夫**：接着讲！

**喊声**：只剩下十分钟了！

**喊声**：你挑最主要的讲！

**主席**：再给他十分钟吗？

**曼努伊尔斯基**：让他讲完吧。反正是一码事儿，否则还得让另一个人发言。乌加洛夫，算你走运，让你在最后讲！

**乌加洛夫**：就这样，我谈到的攻击引起了极大的怀疑。我当时凭着无产阶级的直觉感到（**喧闹声**），事情不大对头。

我现在还记得，我不知道基洛夫同志是否还记得，我去找他，告诉他，攻击开始了，开始破坏三名同志：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声誉了。

**安采洛维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乌加洛夫**：我记不准了，反正是在十一月全会之前。

（**插话听不清楚**）



我没有去找过什么人道歉,也不打算这样做。我为自己负责。布哈林也自己为自己负责。

喊声:你别生气,好吧!

乌加洛夫:这就是让我感到不安的事,我再说一遍,结果发现我是对的。

下面我谈谈同志们的发言。有人说,攻击斯大林只会让我们的敌人高兴。这里谈到了莫斯科的党组织。关于莫斯科的党组织我什么也说不出来,至于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列宁格勒的党组织里没有这回事。我在那里领导和管理,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对斯大林的什么攻击。

喊声:没有人能攻击。(喧闹声)

乌加洛夫:有些人如果犯了错误,可以对他们加以纠正;另一些人则不可以加以纠正,因为我们的敌人会说些什么,——从原则上讲,这样是不对的。同志们,难道资产阶级现在不会因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而兴高采烈吗?

卡巴科夫:可是这是谁干的呢?

乌加洛夫:这难道不是让资产阶级高兴吗?我在午休时读到了克鲁敏同志的一篇新文章《不让人羡慕的成绩》,在《真理报》上。

喊声:是党中央的报纸。

乌加洛夫:对,是党中央的报纸。请看,给我们栽了些什么东西,给我们扣了些什么帽子。嗨,难道可以相信敌人对我们的议论,而且在党员中间散布敌人对我们的诽谤吗?报纸上是没有点名,写得晦涩费解,可是要是读一下,把名字添进去呢?

[彼得罗夫斯基: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乌加洛夫:敌人在议论我们的某个同志,难道可以为此而高兴吗?关于斯大林人家写得也不少。还有,4月9日的《最近新闻报》<sup>315</sup>上有一篇《我们的同盟者斯大林》,我不来引用了,反正是扣帽子。难道这是用争论破坏名声的办法吗?

喊声:你居然把莫斯科的《真理报》和《最近新闻报》,莫斯科的《真理报》和白卫分子的报纸拿来比较!

乌加洛夫:同志们,我不是拿报纸来做比较,我是比较中央机关报引用的《最近新闻报》的文字。难道我们应当走这样的路线,看一看白卫分子的报纸关于我们的领袖或者某个同志都说些什么吗?难道这样的斗争方法是我们应当采用的吗?我想,对这样的玩意儿应该谨慎一些。

喊声:根本就不应当搞斗争!

乌加洛夫:谁也没有搞斗争,我对你说了,我没有斗争过。我说了我的罪过,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彼得罗夫斯基:为罪过忏悔了。

乌加洛夫:我说了,为正在准备的、在这次或者下次全会上必然发生的开除,资产阶级会兴高采烈。到处的敌人都会感到高兴。我认为,在这里也应当一如既往,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行事,让我们的敌人干生气。

臧声:这是什么意思?

乌加洛夫:我还想谈谈工人阶级的处境和工资问题。大家都明白现在的处境,所以用不着多说。大家知道,目前的处境艰难。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实际工资在下降。

臧声:早先的反对派也抓住了这件事。

乌加洛夫:我不打算就此而责备什么人。你们无须认为这是一种责备,我不过是想说,我们的处境极其复杂、极其艰难。难道工人阶级和农民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他们和农民有种种看不见的、想不到的联系。一部分工人难道不是经常受到农民的那些情绪的影响吗?难道工人阶级不知道我国农民身上发生的事情吗?

臧声:我们大家都知道。

乌加洛夫:我们在列宁格勒经常碰到这样的情绪,因为列宁格勒州的情况特别严重,有饿死人的事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米高扬:死人的事总是有的。]<sup>316</sup>

安采洛维奇: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乌加洛夫:我说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局势(安采洛维奇同志怎么也闹不明白)非常艰难,为了克服困难,我们需要钢铁一般的统一意志……至于安采洛维奇同志为什么闹不明白,我也没法把我的脑袋给他。(笑声)

安采洛维奇:对这样的好意,我只能谢绝。

乌加洛夫:我不打算在这里多讲农村中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我有过深思熟虑的机会,我想过,到图书馆待了几天,读了各种报纸。这些报纸都说些什么呢?假如报上说的那些事都发生在富农身上,说实话,我就不会气愤了。可是我们报纸上讲的农村中那些胡作非为的事情都不是发生在富农身上,而是出在中农身上,这就令人气愤了。我不想给大家引用那些札记了,这样的札记我手头有许多。

[米高扬:这样的事也是有的,我们是一个大国。]<sup>317</sup>

斯大林:你就引用吧。

乌加洛夫:“你这个投机倒把的猪猡,照这么说,你是不打算交粮食啰?哼,一副讨人嫌的嘴脸,闭上你的臭嘴,你面前是国家机关,转过身去,你这条毒蛇,会有人找你谈话的”等等。

曼努伊尔斯基:这不是引文,而是小说。

彼得罗夫斯基:这些我们全都读过。

米高扬:这是什么报上讲的?

乌加洛夫:3月28日的《乌拉尔工人报》。

臧声:那里也没有说是中农呀。

乌加洛夫:请听吧,我再给大家引一段:

“街上走着三辆大车。第一辆车上有一块硬纸,上面用油彩胡乱画着一个富农。硬纸的背面写着:‘我不把粮食交给苏维埃政权’。富农对着这条标语喊道:‘说得对!’另一辆车上坐着党支部委员卡谢诺夫同志,他装扮成牧师;在他旁边是身着教士服装的村苏维埃秘书非阿尔可夫,边上还有唱诗班。第三辆车上是一口棺材!这个车队一直走到受抵制的中农家的菜园子边上,顺便说一句,这个中农早就出售了自己的余粮。中农吓坏了,反锁着门,藏在家里不出来。这‘一队人马’在他的房子边搞了一次‘飞行集会’,然后对着似乎是放着被抵制的中农尸体的那口棺材开始做安灵弥撒。党员卡谢诺夫一面摇晃着手提香炉,一面破口大骂。”(《苏维埃西伯利亚报》,1929年4月7日,第79期)

臧声:这都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脑袋给他们装上。

米高扬:党在同这些事作斗争。

乌加洛夫:我想说的是,农民中的情绪,虽然是我们反对的,而且是应当反对的,也会渗透到工人阶级中来。

克鲁敏:可是报纸是在斥责这种事情!

乌加洛夫:我的基本结论是:我们现在对待中农要缓和一点,谨慎一点。

臧声:取消非常措施吗?

乌加洛夫:我不知道你们采用非常措施是否改善了中农的处境。

我要结束发言了,虽然还有许多话没有说。

米高扬:那就请讲吧。

乌加洛夫:我说:我们只有用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政党强大的统一意志和工人阶级一起,才能克服我们目前的处境和面临的困难。正因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把中央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人、政治局的相当一部分人开除出去。

米高扬:谁也没有要把他们开除出去。可是胡闹总该结束了。

乌加洛夫:我们听了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发言。对这些发言,当然可以做出随便什么样的评价。可以像米高扬同志昨天那样来评价这些发言,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米高扬同志,你昨天用来反对布哈林同志的那些论据,都是托洛茨基分子当年用来反对过我们的论据。

而且昨天在这个讲台上被引用的那些话,不是出自我们之口,而是出自我们的反对者、我们的敌人之口。

米高扬:布哈林犯过错误,布哈林还在重复自己的错误。

乌加洛夫:我认为,开除托姆斯基这个老苦役犯、最有经验的工人领袖,他在我们党内工作几十年了,同工人阶级有着血肉联系,——开除他是不应当的。

[米高扬:让他们别再胡闹了,谁也不会开除他们的。]<sup>318</sup>

乌加洛夫:布哈林是我们党内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聪明的理论头脑。

克鲁敏:可是却跑去找加米涅夫!

乌加洛夫:把布哈林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撤职,我认为是对我们党最大的危害。不能开除他,我们这样做就会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最大的危害。

李可夫是整个苏维埃国家优秀的当家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初不是无缘无故地挑选他来做助手的。我认为,李可夫同志也无论如何不能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中开除出去。

不管那些人怎样使劲,不管他们怎样绞尽脑汁,可是那盆泼向三位同志头上的污水终究是粘不到他们身上的。如果我们把他们开除了,我们就给党造成了最大的危害,给整个工人阶级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了最大的伤口。至于我,那是不值一提的。(笑声)

米高扬:为什么不值一提?

乌加洛夫:因为我自己置身于革命工人运动也有几十年了。

米高扬:所以我说,值得一提。

乌加洛夫:我1905年参加革命运动。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认识我,和乌格拉诺夫我们一起工作过,托姆斯基也认识我。在艰难的岁月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曾害怕过。我上过火线,为苏维埃政权战斗过,不止一次亲眼看到过死亡,可是任何困难都不曾让我胆怯过。

苏霍姆林:这很好,可是你把勇气拿来反对中央就很糟糕了。

主席:奥什温采夫同志要宣读一份声明。

奥什温采夫(宣读):

“致联共(布)中央全会:李可夫同志为了证实他关于非常措施的结论,引用了乌拉尔州商业局长马尔科夫同志信中的一段话。歪曲政策、过火行为的个别事件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我们采取了非常措施证明。乌拉尔州的粮食采购工作是在充分发动了贫农和中农,以及苏维埃公众的力量基础上进行的。现在无须争论的是粮食采购运动团结了、吸引了贫农和中农群众来切实克服和粮食采购有关的各种困难。由于广泛地开展了群众工作和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党组织,全州采购了:3月份为700万普特,9个月总计为4300万普特,而去年全年只有3800万普特。农村中的富农对贫农和中农的社会积极性进行了顽强的反抗,直至采取恐怖行动。今年第二季度的恐怖行动数目超过去年同期的一倍以上。积极参加粮食采购的贫农和中农(积极分子)遭到富农分子暗杀,他们的财产被纵火烧毁。全体大会关于富农必须交出粮食的决议遭到抵制,这就必然引起贫农和中农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发生了过火举动,有时候明显地歪曲了政策。州党委和州执行委员会一旦发现过火举动,采用了错误措施,就要求各地按照苏维埃系统取消全体大会的决议。关于地方上曲解政策的每次申诉都发下去进行调查,并通过检察院交由工农检查院和州内务局追究责任。犯有过火举动的过失人(直至区委书记)被撤职并追究责任。

至于马尔科夫同志的信,马尔科夫同志本人无疑犯了错误:他从各地收集了个别事实,加以概括,说成是乌拉尔州在粮食采购中广泛使用的方法。必须指出,马尔科夫同志反对开展群众工作,坚持要求采取更坚定的行政措施,遭到州委常委会的拒绝。

我们认为,李可夫同志企图根据这封信来给乌拉尔州委扣上采取非常措施的帽子,是完全错误的。让我们更感到奇怪的是,李可夫同志甚至不认为有必要表现一点起码的老实态度,征询一下在座的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州委书记的意见。看来李可夫同志并不须要查清事实真相,而是要抓住偶然事件来说明党的政策错了。卡巴科夫、奥什温采夫”

主席:我们须要解决一下明天的会议问题。有人建议明天完全不安排会议。

臧声:上午还是工作吧。

主席:有人建议只在明天上午安排会议。表决。赞成明天不安排会议的请举手。少数。主张上午开会的举手。大多数。现在休会到明天上午11点钟。明天首先发言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安德烈耶夫。

现在闭会。

## 第十次会议

4月21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伏罗希洛夫同志发言。

伏罗希洛夫:在这里发言的同志——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思想相同的人,彼此有明确的分工,毫不吝惜时间,千方百计企图证明,不是他们近来背离了党确定的路线,不是他们的政治言论和实际措施中出现了动摇,不是他们(我指的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用最不能容忍的方式违犯了党纪,不服从政治局的决议,而是政治局逐渐地、一步步地滚进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泥沼,似乎是政治局执行了和我们的总方针不相容的路线。

当我听着这些同志的发言时,我感到,假如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也许就会讲到,甚至是说服他们自己和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不是布哈林跑去找了加米涅夫,同他谈了更换政治局成员的问题,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去找了托洛茨基,同他商量怎样消灭各种政治兔子:右倾分子、调和分子,还有滚向机会主义的各色人等。

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回顾了我們之间政治分歧的历史。两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各种事件的日期。如果说托姆斯基同志认为,斗争是从《共青真理报》着手“攻击”他(托姆斯基)开始的,那么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日期略有不同,他把分歧开始的时间定在他从粮食采购工作回来的时候。如果问一下布哈林同志,他认为分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他不能立即肯定这个日期。布哈林同志的情绪是在不停地变化着的,政治方针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着的。这种精神上的不稳定使他对同一个问题,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可以做出不同的答案。

如果布哈林同志试图把我们之间分歧开始的时间定在紧接着党的十五大之后,那他显然会大体上定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他(布哈林同志)在经历了极度的紧张之后,在我们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共同斗争中表现了高涨的革命热

情之后,正在经历一个精神压抑期,开始了政治上的摇摆。我觉得,我们的分歧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请大家回想一下,十五大之后立即发生了什么事情。粮食采购中的困难,即便是在党的十五大开会期间,也不能不影响到政治局的工作。大会闭幕之后,政治局不得不采取坚决的步骤来摆脱粮食采购的困境。大家想必记得,从1月份起,粮食采购缩减到了最低点,甚至有完全断绝的危险。我必须指出,无论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还是人民委员会在这尖锐、紧急的两个月内都不曾采取什么措施来摆脱困境。政治局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议采取了主动,召开了会议,我不记得是在1月底还是2月初了,提出了党必须干预粮食采购运动的问题。我要在这里指出,当时我们之间、政治局委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歧。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要坚决指出,有一些同志并不是很喜欢党干预粮食采购运动的。后来,一方面随着这种干预取得了成果——我们拿到了必须数量的粮食;另一方面,各地对非常措施的种种歪曲在一些地方导致了负面的结果——这一切反映在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情绪上,也反映在政治局内部的相互关系上。这时莫斯科党组织的高层在乌格拉诺夫同志的领导下表现了动摇,而且采取了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不应当采取的立场,因为首都党组织是政治局工作的依靠。

攻击开始了,可是受到攻击的不是乌格拉诺夫,而是一些同志开始反对中央的政策,特别是反对斯大林同志的活动。莫斯科的干部非常清楚,在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之间一些区里是怎样开始“攻击”斯大林同志的。就在七月全会开始之前,在政治局的闭门会议上发生了同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尖锐争论和冲突。

我要指出,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之间在这段时间内,甚至在根本问题上也不是始终意见一致的。如果说托姆斯基同志更多地攻击的是自我批评,因为它一头打在他身上,那么布哈林同志更多的是宣扬一种理论,说我们太偏重于基本建设投资和对工业化的拨款,忘记了农业和轻工业。而乌格拉诺夫同志则主要坚持必须召开经济干部会议,按他的说法,应当和他们一起制定一些紧急措施,来改正我们的路线,改善总的局势。

但是总的说来,局面是不正常而严重的。必须找到出路。

七月全会提供了出路。大家知道,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本应当成为我们共同工作的基础,不仅在地方,而且在中央,在政治局内。

实际上是这样的吗?没有这回事。

这是谁的过错呢?当然是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错。

我举几件实际的证明。

七月全会后,斯大林向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大会做了报告;与此同时李可夫同志向莫斯科的积极分子大会报告了全会的结果。李可夫同志在积极分子会上的表现如何?很遗憾,我没有参加那次会,可是有人确切地对我讲了同志们对李可夫同志报告的反应。至少大家对李可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感到气愤。李可夫同志主要强调了卡巴尔达的暴动,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因粮食采购而引起的不满情绪。他说,尽管暴动很小,但是它的意义却很大。他举了萨柯和万泽蒂被处死<sup>319</sup>一事。他是这样论证的:这也是一件个别的小事情,可是它却震动了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奋起保卫这两个无罪而牺牲了的革命者。他就这样做了对比,说我们发生的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暴动,结果却可能引起大震动。这就不能不引起与会者(有大约3000人)相应的情绪和困惑不解的问题。可是后来李可夫同志却感到奇怪,而现在则是感到惊奇了——为什么,根据什么要展开对他的“攻击”。这只能说明李可夫同志对什么都太满不在乎了。李可夫同志本该在有12万党员的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之前好好地想一想。他本该根据全会的决议提出一个明确、坚定的方针。实际上他的讲话却引起了,也不能不引起与会积极分子的困惑不解。

而在斯大林同志做报告的列宁格勒,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和李可夫同志的报告根本不同。斯大林同志如实报告了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而李可夫同志的口头报告却完全是另一种调子(李可夫同志送给报社的文本是经过重大修改的,有些地方甚至做了删节)。

在积极分子会上,李可夫同志显然为了进一步肯定自己的方针,引用了我同他的谈话,声称(这也不能不给别人留下印象),伏罗希洛夫,或者按他们对我的亲切称呼,克里姆似乎说过,现在红军是支持我们的,可是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使用过的那些粮食采购方法,军队就可能掉过头来反对我们。我和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认为我们彼此之间应当开诚布公,说心里话。可是我觉得,李可夫同志的做法不恰当,他把同我的私下谈话插到3000人的大会上去了;更不对的是他极不准确地转述了我同他的谈话。让我来恢复事情的真相吧。我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谈过这个问题,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是同样不容置辩的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不正确地转述了谈话的内容。当时是他提出军队的情况如何的问题(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有责任关心工农红军的情况),我回答说,虽然粮食采购引起的困难在军队里也有反映,可是军队还是稳固的,有战斗力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支柱。当然,军队的某些阶层有



不满情绪,也有富农煽动的个别事件,可是都很快就被我们消除了。你说应当采取措施尽快消除这些现象。我同意你的意见,这是我,也是全体政治局委员共同的坚定信念。我们之中有谁赞成那些病态的、被歪曲的非常措施呢?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消除对党的路线的种种歪曲。

为什么李可夫同志在报告里要引用这些“证据”和“论据”呢?因为连小孩子都清楚,李可夫同志虽说在七月全会上和我们一起赞成了决议,可是并不完全同意这个决议;至少他的情绪、他真实的观点并不能纳入我们通过的决议的框架之中。看来,他须要向什么人提出申诉,须要使积极分子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来“补充”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联席全会的决议。总之,李可夫同志是别出心裁地保卫了七月全会的决议。

我不得不就我本人说几句话,非常抱歉,占用大家一些时间。这次全会上托姆斯基同志和乌格拉诺夫同志都提到了我的名字,——我认为必须提供一些资料和说明。我刚才讲到的李可夫同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上的发言和公布我的谈话,都被托洛茨基在去年秋天的那封信中利用了。托洛茨基对这次谈话做出了符合他兴趣的解释。他把谈话说成是伏罗希洛夫想做拿破仑而发出的“威胁”。托洛茨基还赏赐给我一些很不漂亮的修饰语,简单说就是骂了我一通。他毫不掩饰地声称,伏罗希洛夫想做拿破仑;困难引发了某些情绪,而且推出了拿破仑之辈。托洛茨基写道,确实有过拿破仑一世,也有过拿破仑第三,是一个骗子。他说,新拿破仑将会同后者相似,我们苏联的候补拿破仑已经有了。托洛茨基制造的这一套谰言有某种流传。应当注意,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落入不明真相的人手里,特别是非党的知识分子手里,就会被有意歪曲,出现一些奇谈怪论。请看,这就是言谈必须谨慎小心的鲜明例证。当然,李可夫同志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他的讲话、他引用的事实和对比却给我们的政治敌人写最卑鄙的反革命文章提供了口实。

布哈林同志在向加米涅夫忏悔时,承认了一切,同他就种种隐秘的题目进行了交谈,同时声称,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在最后时刻背叛了他(布哈林),而且最后还说,斯大林是用一条特别的锁链把他们(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拴住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待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当然可以有各种态度,可是这份传单里印的确实是布哈林同志的原话,——这是无可怀疑的。在政治局会上,我问过布哈林同志,关于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的话是什么意思,布哈林同志吞吞吐吐地嘟囔说,他没有这么说过。我

相信,布哈林同志说过这种话。我只是想搞清楚,他究竟指的是什么。我要告诉大家,我同布哈林曾经是再好不过的同志。我和布哈林同志经常见面,就各种问题谈过许多。

布哈林同志曾经当着我的面(不是转意,而是直意上的)捶胸顿足,和我就许多重要问题交换过意见,可是我从来就不曾想过,布哈林同志能由此得出什么政治性的结论来,我和他是在搞什么阴谋反对什么人,我和他是在玩什么反对政治局的花招。这简直是荒唐透顶,不足为信的。现在却发现,我同布哈林同志的友谊,以及他过分的“滔滔不绝”被一些人用来说明我的政治路线不很坚定了。而且尽管我和布哈林同志关系很好,我和政治局其他委员一起却始终反对他对局势的评价。

乌格拉诺夫同志有勇气声称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替富农说话。我自己不记得有这回事,也许我在谈话中有过用词不当的事情。可是要我说我支持作为一种经济或者政治范畴的富农,把他作为我们工作中应当支持的成分,——这当然是谎言和诽谤,这至少也是愚蠢。我问过同志们,(大家知道,我不是那种趾高气扬的人,也许我说过类似的话,)可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还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们一致对我说,他们从来不曾听我说过这类的话。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断言原来不过是一些空话。

就算万一我在激烈的争论中脱口而出,讲了一些过分的话。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都应当开诚布公,应当坦率地、毫无隐瞒地谈自己的政治观点。

即使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不进攻富农的建议,即使有过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大家会批评我,政治局会投票否决我的建议。我作为遵守党纪的一个党员,会服从政治局的决议,问题也就到此为止了。

再设想一个更出乎意料的情况。就算政治局在一秒钟之内通过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富农的决议。毫无疑问,你们大家聚在一起开全会,全会就会纠正政治局的路线,而政治局委员们作为守纪律的党员,一定会严格而坚定地贯彻全会的决议。

假如出现了错误,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改正错误。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党的决议。

可是,我再说一遍,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只有在我发表过意见,反对政治局决议的情况下,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议论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大家都很清楚,乌格拉诺夫同志断言似乎我伏罗希洛夫曾经替富农说过话,他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这一切都太不严肃了。不应当讲这种蠢话和废话,说某某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了些什么话。谁也不会相信的。乌格拉诺夫同志,你最好谈一谈,我这个似乎是替富农说话的人,在中央七月全会时,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和莫洛托夫同志一起在莫洛托夫家里和你谈了整整两小时,希望你放弃自己的观点。假如我们的使命获得了成功,那本来对于你和对于党都是更有利的。

[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是对于党呢?是对于他。]<sup>320</sup>

所以我们现在才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来讨论一个问题。没有多少值得高兴的事,因为我们花的代价不低。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乌格拉诺夫,去年夏天我们同你谈过话吗?谈过。我和莫洛托夫劝过你吗?劝过。莫洛托夫同志说过这是没有希望的事吗?说过。我反对过他的意见吗?反对过。我说:不对,我们终究能够把他拉过来,挽救他。后来,到了秋天,9月30日,在我休假之前我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是不是到过你家,乌格拉诺夫同志,劝了你两个小时?

奥尔忠尼启则:12点以后。

伏罗希洛夫:是的,午夜12点以后。我是不是劝了你两个小时,要你放弃你的错误方针,当时还不是反党的,可是必然把你拉上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的方针?我劝过你吗?劝过。那么我当时是在保护富农呢,还是在保护你不要受富农的影响呢?让留京同志说说,在七月全会上我和他是不是在克里姆林宫转了三个小时。我们谈的是什么呢?谈富农。我和留京是不是谈过呢?在这个问题上,留京是不是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他是不是放弃了他自己稍稍的偏离?这和你的说法是不完全相符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详细地谈这些呢?因为在莫斯科的党组织里,还有其他许多地方对我的攻击比对谁的都厉害得多。到处放风说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是同布哈林站在一起的,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摇来摆去,有点偏离等等。这全是胡言乱语。现在终于到了给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以坚决回击的时候了。

布哈林同志在发言里企图证明,他是一名虔诚的政治局委员、一名忠诚的中央委员,从来不曾做过有损于自己名誉的事,这里对他提出的种种指责至少是对他不怀好意的人搞的阴谋。粗略地概括他的讲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来引用他的发言了,不过请让我引他在10月份写的一小段话,这样大家就能明白,布哈林同志就他的所作所为提出的结论是不是公正了。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里,布哈林同志写了下面这段话:

“显然采取了工业的经常生产的增长和基本建设的(既包括工业的,也包括

整个公有经济的)的增长之间的不完全恰当的比例;如果没有砖头,而且(由于技术条件)在一定季节内也不可能生产多于一定数量的砖头,那么就不应当编制一个超过这一极限的建筑计划,从而使需求得不到满足,因为不论你如何进一步加强建筑业,你毕竟不能凭空建造厂房和住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投资问题时还要谈到)。”(《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第38页)

问题在哪儿呢?我不来讨论布哈林同志的议论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我只想指出一点。托姆斯基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出现分歧是在莫洛托夫同志发言反对李可夫同志之后,也就是莫洛托夫同志批评了1928—1929年度的工业财务计划之后。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工业财务计划时,对它做了重大修改——我们给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增拨了2700万。我们详细地讨论了全部问题。通过的方针对于我们大家,特别是政治局委员都是必须执行的。所以布哈林同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里批评我们的既定方针使我们大家——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实际工作者和政治家——都非常担心。

布哈林同志的这篇文章我是在和鲁祖塔克同志一起休假时读到的。我们两个人那时,在外高加索就认为必然会引起争吵。我们两人都不是理论家,也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奢望,也不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可是我们读完了这些札记之后,立即看到这必然引起党内斗争。我设想,这篇文章会给我们年轻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留下多么沉重的印象,而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理论准备并不比布哈林和李可夫逊色(就让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稍稍收敛一点吧,别那么自命不凡)。我们已经有了青年骨干理论家,他们从总体上说是一支强大的学术力量。就让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读一读,听一听我们年轻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就《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样的著作说些什么吧。每一个有文化的党员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每个人都看得出,布哈林同志的立场同最近几次中央全会通过的方针和决议是有分歧的。就让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不要抱怨别人攻击他们吧;这是他们自找的。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道不要以为党内会容忍这种状况;他们可以写同党的路线不一致的文章,批评我们的决议,而全党就应当乖乖地把这种精神食粮咽下去。不能忘记,布哈林同志不单是理论家。如果布哈林同志搞的是空洞的纯理论,那还可以容忍;可是他不单是理论家,而且是政治局委员。比如说,假定布哈林同志和梁赞诺夫同志——我们的两位院士——之间进行一场抽象的、烦琐哲学的争论,那我们是可以容许的,他们本来就是院士嘛。(笑声)

布哈林同志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他有责任权衡每一个词,他在敲钟之前应当先看一看福音书和教历。布哈林同志在写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之前,应当先看一看哪怕是最近一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当然,如果他还尊重决议的话,因为他是投了赞成票,也参与了决议的制定的)。因为人人都清楚,布哈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特别在他稍后的讲话中)表述的路线同历次中央全会的决议,甚至同党的十五大的决议是不一致的。

以后的事态是大家都知道的。十一月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并没有阻止布哈林同志抵制在《真理报》(他是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和共产国际的工作。布哈林同志对我们声称,他同斯大林同志有过信件往来。可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和斯大林同志有过私人信件往来,这和我,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有什么关系呢?这说明布哈林同志本人以及他对集体工作的理解。请看,他给斯大林写过一张便笺或者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不满意、不同意我们的举动。为什么他不把这些问题拿到哪怕是政治局的闭门会议上去呢?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干脆停止了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工作。我们曾经试图迫使布哈林同志去工作,可是他都拒绝了,或者确切些说,根本不做回答,他就是不想去工作。

托姆斯基同志也同样不能容忍地拒绝工作。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得很好;会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不仅没有对托姆斯基同志发出嘘声,反而对他欢呼,尽管与会的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知道托姆斯基同志的情绪。大会的代表们看到党是支持托姆斯基的,代表大会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组织的,就都热烈地欢迎托姆斯基同志。

奥尔忠尼启则:其中斯大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也起立鼓掌了。

伏罗希洛夫:是的,斯大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致了祝词;是的,我们都站起来,鼓了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托姆斯基同志在会上是中心人物。

乌加洛夫:要是该做的都做了,那真该谢谢了!

伏罗希洛夫:嗯,当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乌加洛夫同志,我和你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

乌加洛夫:代表大会开成了一场大闹剧。

伏罗希洛夫:即便是像乌加洛夫同志这样的小头头,如果打算捣乱的话,也会利用我们的党内民主给我们制造许多很不愉快的事件。因为不仅是一个乌加洛夫,而且还有好几个人,所以他们就,说得粗鲁一点,坏了一锅汤。

我再说一遍,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可是托姆斯基同志用什么来回答我们呢?他对党的回答是抵制他在其中工作了十年,而且党还派他今后继续工作的那个

机构。关于他拒绝工作的原因他对大家做了解释。这些解释起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丝毫也不会使联席全会的参加者平静下来。

喊声:没有说服力!

伏罗希洛夫:关于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工作问题,政治局做过不止一次决议。你们已经听说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对于这些决议一概拒绝。李可夫同志和同他观点相同的其他人在发言中说:为什么你们不早一些召开联席全会来解决这个争论呢?如果像李可夫同志这样来理解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职能,我想我们就没法进行实际工作了。那就只好不停地召开代表大会或是四处奔走来解决所有的分歧和争论了。假如托姆斯基同志或是布哈林同志提出了某些的确十分重要而严肃的论据,政治局自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就应当召开中央全会。可是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抵制他们工作的机构是什么原因呢?没有什么认真的、值得谅解的原因。一个是不想和卡冈诺维奇一起工作,因此得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说和卡冈诺维奇一起工作就成了两个中心等等。另一个人不愿意在共产国际工作,因为据说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有人在休息厅里攻击了他。而大家知道,政治局向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声明:关于我们共产党政治局内有意见分歧的种种传闻都是不对的。我们政治局一致通过了斯大林同志的(而不是布哈林同志的)这项提议<sup>321</sup>。由于有了这个声明,这个论据也毫无疑问不复存在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应当服从政治局,应当至少工作到召开下次全会。假如他们不满意,他们就应当在这里,在全会上提出对政治局的申诉,指出他们在哪些地方不同意,请求审理他们的申诉。由于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就……

乌加洛夫: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伏罗希洛夫:〈就〉最严重地违犯了我们的列宁主义的党内规则。

关于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这里已经讲得很多了。托洛茨基分子传单的意义在于它切开了业已形成的痼疽。托姆斯基同志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我说,我们也不愿意这样。有各种各样的痼疽:有的痼疽必须切开,否则会引起血液中毒;有的痼疽可以被吸收,这样的痼疽就不用切开。可是这个痼疽不是我们切开的,我们没有当外科医生。指责政治局散发了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可笑的、荒唐的,可是有人起初,甚至直到现在都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这显然是荒诞不经的。这样的断言至少是不诚实的。托洛茨基印刷的传单大量出现在工厂中。3月4日,许多国外报刊发表了,然后就出现在《社会主义通报》<sup>322</sup>上和《岁月》<sup>323</sup>上。同志们不妨看看这两份报纸。假如我们对这份传单不做出

反应,假如我们不注意这份传单,那就很可笑了。

政治局对这份文件是怎样反应的,已经有人对大家讲过了。我认为有必要再谈谈政治局指望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做些什么。我们赞同列宁对政治局集体工作的观点,希望消除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的“谈话”发表以后,他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采取了错误步骤以后所形成的严重局面。我再说一遍,政治局希望调整局面,创造一个能够保证齐心协力地共同工作的环境。

可是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是怎样做的呢?他们采取了绝不妥协的立场。他们企图抹煞布哈林同志谈话的意义,这次谈话的目的显然是要和党的领导展开斗争。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把政治局的路线同他们自己的路线对立起来:他们甚至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对我们说,我们屈从了托洛茨基的讹诈和挑拨。不对,我们不会屈从任何挑拨离间。托洛茨基分子发表的文件叙述了谈话内容,而布哈林自己承认,确实有过这次谈话。加米涅夫同志肯定了笔记的真实性。笔记记录了由于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同他们持相同观点的人所采取的立场而形成的局势。我们想要什么呢?我们希望在政治局内创造一种健康的工作环境。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却没有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接受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委员会的建议,那他们就做出了和他们的政治良心不相容的举动。而我认为,假如他们想把由他们发动的反对政治局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他们就会犯重大的政治错误。

托姆斯基同志在全会上大谈特谈集体领导。他回忆了列宁的话,说是必须保证在政治局内能够自由地讨论任何问题;回忆了列宁说的在政治局会上可以有一点摇摆;他回忆了斯大林同志怎样把我们组织起来,据他说是为了确立集体领导,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专断独行。托姆斯基同志引证这一切是为了说明,我们政治局内似乎没有集体工作。

如果托姆斯基同志讲的都是事实,那大家就应当尽可能仔细地对待政治局的工作,而且认真地研究局势。假如政治局确实像托姆斯基同志说的那样,蜕变成一个人主宰一切,而其他人只能俯首听命的机关,那我们党内的局面就非常危险了。可是正如俗话说说的,“梦境虽然可怕,但上帝却总是仁慈的”。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曾有过单一首长制,今天也没有,如果说它存在,那也只是在托姆斯基同志的狂热想象之中。政治局始终是在同志式的集体制基础上工作,今后也将这样工作下去。说我们没有集体领导的种种论断都是诽谤和捏造。

请你们说说,在我国的体制中,军队还有没有意义呢?有的。嗯,谁会妨碍我领导军队呢?斯大林同志干预我的工作吗?是的,他干预。他的干预也和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所有重大问题我们都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整个日常工作和领导则由我和同我一起对军队的状态分担责任的同志们来执行。可是在经济方面情况如何呢?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在领导我们成百亿的经济工作方面对李可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特别是李可夫同志)施加压力呢?没有这种事。政治局决定总的方针并对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修正。我已经举过一个例子了,就是政治局在讨论工业财务计划时,给70亿卢布的预算追加了2700万卢布。这个例子表明政治局干预李可夫同志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时所采用的方式。这里有什么压迫,施加压力吗?根本没有。大家都知道,整个日常的经济工作是多种多样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不在政治局内,而在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进行,由李可夫同志领导,我们大家参与。

让李可夫同志来说一说,有哪一个重大问题不曾在政治局讨论过,我们没有支持过他。难道在政治局会议上可能讨论涉及几千万开支的所有重大问题吗?难道李可夫同志不是在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和我们一起解决这些问题的吗?而且我们一贯是支持他的,因为他是在贯彻党的路线。如果你们看一看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大家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当我们要解决涉及我们人民委员部的政策的重大问题时,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到政治局去,而在其他问题上由我们自己来领导。现在各种致命的过失都被算在斯大林同志身上,而我们和斯大林同志的差别只在于,我们每个人支配的资金有10亿卢布上下(军事部门的预算是8.4亿卢布,我的朋友鲁祖塔克是20亿多一点,其余部门的预算大致也是这样),而斯大林没有什么上亿的预算。

洛佐夫斯基:你们都是亿万富翁。

臧声:布哈林同志也有亿万资金吗?

伏罗希洛夫:布哈林同志也有很多资金,即使没有亿万,也有不少钱呢。

[臧声:皮亚特尼茨基到他那儿去过。]

伏罗希洛夫:是的,皮亚特尼茨基到他那儿去过。(笑声)]

好多领导同志都到他那儿去过,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难道斯大林同志妨碍他工作了吗?难道斯大林能够控制、观察、监视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日常日常工作吗?当然是不能的。斯大林能不能知道各个人民委员部和书记处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很明显,他不



可能知道。可是斯大林同志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和我们一起就每个问题：经济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做出决策。托姆斯基同志和他的朋友们进行攻击的原因何在呢？不是别的，就是要攻击政治局。他们想要给党的领导抹黑，证明缺乏集体工作是为了让全会相信，斯大林同志妨碍了建立一个团结的集体来负责领导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托姆斯基发言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可是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当年托洛茨基分子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团结一致地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他们都雄辩地、令人信服地批驳了对斯大林同志的诬陷。可是现在他们自己却又弹起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老调，走上了反对政治局，反对党的道路。他们对斯大林提出了那些陈旧的指责，你们在托洛茨基分子的言论中都可以找得到。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大家都明白。要反对中央，就应当先打它的总书记。斯大林同志，无论托姆斯基同志是否高兴，成了政治局中的人物。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为了能够提出其他人，改变政治局中的力量对比，从而改变中央的路线，就必须打击他。

也许政治局的确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假如斯大林同志提出某项建议，就必须投票支持它？这是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令我非常惊奇的是，有些同志一本正经地说，应当有在中央委员会内自由地陈述自己观点的可能性。哎，我要告诉大家，我同斯大林同志是争论得最多，吵得最凶的了！你们可以对我随便怎样攻击，可是我要说，我从来就不怕斯大林，也不怕李可夫，连列宁也不怕。如果我觉得列宁的某个建议不合适，我就投反对票。这是好还是坏呢？我看这样很好，不过得有一个条件。可以表明，而且捍卫自己的观点，但是决议通过之后就必须贯彻执行。我历来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的意见被否决了，我总是服从，从不坚持被中央否决了的立场。而我们的批评家——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想要什么呢？他们绝不是限于要求思想自由，而是要使自己处于特殊地位，使他们的讲话和建议必须被中央接受。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而斯大林同志却没有这样的要求。政治局委员都知道（有谁能反驳吗？），我们多少次在重大问题上推翻了斯大林的建议，有谁能告诉我，斯大林有过不服从决议，拒绝执行的事吗？我可以举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拒绝了斯大林建议的例子。结果怎么样呢？他服从了，而且不再提起自己的建议。

可是为什么老是攻击斯大林呢？我说过，他是政治局的大人物，是我们党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工作中最复杂的问题上能够比李可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他人更好地辨明方向。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也经常和斯大林投

同样的票。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认识来投票。可是并不是所有人(这首先指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都执行决议,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集体领导。所以关于缺乏集体领导的种种说法都是空话、捏造和诽谤,都有它的目的。

李可夫同志在捍卫言论自由时,举了驱逐托洛茨基的表决情况为例。他说,某个政治局委员是这样投的票,而另一个委员是那样投的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要在这大范围的会上讲某人赞成,某人反对的动机呢?这难道有意思吗?每人都有自己的动机,可是没有必要在这里陈述。[李可夫同志为了证明的确有惊慌失措的人,昨天在这里举了叛徒舍印曼的例子。好吧,李可夫同志想必知道,恰恰是我提出了这个叛徒舍印曼的问题,而且恰恰是斯大林支持了我撤销他职务的建议,因为有人怀疑,而我坚信不疑,他不是自己人。难道现在须要说一说,谁就这个舍印曼讲了些什么吗?我反对这样做。可是既然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讲了那些话,那就应当说一下。他说,舍印曼是惊慌失措的人;可是他并不是惊慌失措的人,而是叛徒。

喊声:说得对!

也许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应当勾掉,也许还应当说他是一个贼,因为他待在国家银行里。所以不必讲这个问题的经过……]

既然我们投了票,解决了问题,对我们而言这就是法律,没有必要再去谈论投票的那些细节。

李可夫同志在发言中还谈到对他提出了种种指控,特别是指责他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谈到了市场困难,还谈到降低工资。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这些事呢?假如我们不存在党内斗争的气氛,假如没有已经肯定无疑,而且现在也无法掩饰的政治分歧,——这本来都是可以不谈的。可是斗争已经开始了,在闭门会议上和公开会议上都在谈论凭证供应粮食,而这个问题连政治局都还没有讨论过;在李可夫同志处秘密讨论过降低名义工资的建议,而政治局却没有从李可夫同志,一名政治局委员,那里得到过任何信息,这自然给人造成很沉重的印象。各种流言开始广为传播。我们能够不对这些现象做出反应吗?我们有责任知道,流言是从哪里来的;当我们得知李可夫同志的确召开过会议,于是就产生了问题:为什么李可夫同志不报告政治局?李可夫同志就重大问题召开过会议,政治局是从侧面得知的,而不是从李可夫同志那里知道的。这是正常的吗?这不仅不正常,而且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李可夫同志昨天用非常阴暗的色调描绘了我国的经济形势:

“秋播面积缩减了,来年春天不能对我们的形势有丝毫改正。没有粮食,要从国外进口。”这些话我们早先也听李可夫同志说过,他甚至还提到了进口的数量。早在秋天他就这样讲了,而当时对粮食和饲料的平衡和即将来临的困难还只是一种猜测。李可夫同志认为至少要进口1.5亿普特粮食。我们实行凭证供应,我们采取了非常措施等等——这是李可夫同志在这次全会上说的。为什么要这样讲,谁不知道这些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政治局和李可夫同志一道采取的那些措施完全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为什么李可夫同志要列举他的各种论据,来说明粮食匮乏,必须尽力增加粮食等等呢?

这次全会上,李可夫同志再一次提出必须进口粮食的问题。这个问题政治局在闭门会议上讨论过,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进口粮食。政治局认为,现在我们靠自己的储备足以应付,没有必要采取像进口粮食这样的极端措施。大家非常清楚,这项措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不能把话说绝,以后不再进口粮食,因为进口粮食是一个实际问题。李可夫同志讲到必须拥有机动资金,必须有储备,也不能放弃采取某种灵活措施。可是政治局从来就不曾放弃过这些东西。李可夫同志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内容。我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说明政治局不顾李可夫同志的反对,通过了一些保证我们政策必要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的决议。所以说,李可夫同志的这一部分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多此一举。

关于凭证供应我再说两句。李可夫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第十二个年头,变着法儿玩弄购货证:购货卡、购货本、购货证……

斯克雷普尼克:这些东西今后也要保留的!

伏罗希洛夫:可是他建议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它们呢?进口1.5亿普特粮食。但是他在这里却不说我们得花多少钱。全会上他没有说1.5亿普特这个数字,可是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这是他建议的。假如我们接受了李可夫同志的建议,我们就要花掉上亿外汇来进口粮食,——我们就不得不停止进口工厂所需要的大量装备,结果投入基本建设的大量资金就派不上用场。大家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现在他再次提出进口粮食。但是这要花多少钱,这些钱从哪里来?李可夫同志会说:为什么你们没有积累呢?我可以用同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为什么你没有积累呢,你不是和[舍印曼等人,现在是皮达可夫]财政干部和经济干部在一起,而且领导他们吗?你应当监督,保证我们有必要的储备。我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我非常关心储备的积累,而且一贯为此而努力。怎么会没有储备呢?没有储备是因为我们在建设重工业,因为我们在加紧建设,以便摆脱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因此我们的储备是极其有限的。粮食储

备不足迫使我们采用凭证供应制。我举一些数字来说明采用凭证供应以后粮食的节约情况。3月份(3月17—30日)莫斯科节约黑面包575000普特,而4月份和1月份相比节约面粉100万普特。假如我们去年就实行了凭证供应,那就根本谈不到进口粮食的问题,我们就能够有7500万普特上下的余粮作为储备了。凭证供应制,我相信,今后也应当保留。

喊声:对!

伏罗希洛夫:当然,我们应该提高定量,使它达到必需的消费量,可是我们确定的分配方式今后也应当保留。

喊声:对!

伏罗希洛夫:为什么要攻击凭证供应制呢,何以见得这是一项坏措施呢?

喊声:凭证供应制没有什么坏处!

伏罗希洛夫:李可夫同志大谈特谈我们在粮食采购中采用了非常措施。而且他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年的非常措施比去年还要厉害。我要说的是,第一,去年那种形式的非常措施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也没有实施非常措施的决议。我们同富农的斗争是坚决的。在粮食采购中我们不是经过采购机构施加压力,而是通过公民大会来施加群众影响。毫无疑问,有些地方歪曲了上面的指令,可是我们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

我再说一遍,我们同富农斗争是残酷的,因为他们不想交出粮食,而且采取恐怖手段。

请大家看一些被害人的数字。这些数字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农村中发生的事情;对这些数字的含义李可夫同志也应当想一想。下面是农村中发生的恐怖行动:1927年12月是67起,1928年1月168起,5月203起,7月149起,9月115起,10月191起,11月210起,12月337起,全都是富农对贫农、雇农和中农采取的恐怖活动。

丘巴尔:也是对共产党员的。

伏罗希洛夫:也是对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你们以为,富农的恐怖举动在农村中不会引起相应的回声,贫农和中农不会予以武装反击吗?你们以为,富农杀害了一个中农,或是贫农,或是某个干部,他们就会听之任之吗?这正常吗?一般说来是不正常的,正像富农杀害了我们的人一样。政治局当然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这种现象。不过应当明白,在现有条件下,农村中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现阶段它是不能预防的。阶级斗争在全面进行,连布哈林也承认,在我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阶级斗争将激化,阶级斗争的激化是不可避

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正常的。

粮食采购的进展如何?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引用了种种事实,他还宣读了马尔科夫的一份被我称为让人讨厌的文件。我要解释一下,发来这份文件的马尔科夫同志,我不知道,也许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共产党员(我完全不想把我对这份文件的评价:让人讨厌的,转变成对马尔科夫个人的评价)。可是马尔科夫的信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果这里并不存在诽谤,那马尔科夫承担的也是一项并不光彩的任务:把他看到的种种胡作非为集中起来,再把这些现象作为一种概括,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呈献给大家。往好了说,这也是歪曲了真实情况的、有倾向性的介绍局势。往坏了说,就简直是诽谤了。

我感到惊奇的只有一点。为什么李可夫同志只谈事情的一面呢?我不打算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坏话,我不打算“攻击”他,可是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引用了粮食采购中歪曲政策的事情,却对事情的另一面只字不提呢?他原本是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有意思的例子,列举大量经过检验的确凿事实的。

施利希特尔:这不是他的“专业”。

伏罗希洛夫:比如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区检查了粮食采购情况。在一个名为弗拉基米尔斯科耶的小地方查明了下列事实:

“富农使出了狡猾手段。从10月到3月每月交粮的情况大致如下:

小官吏雅可夫从10月到3月交给合作社671千克,但不是一次,而是分成22次;

小官吏叶菲姆分14次,共交粮470千克;

雷日金——16次,交600千克;

斯米尔诺夫,雅可夫——16次,520千克。”

奥尔忠尼启则:他们也是凭证交粮啊。

雅科夫列夫:都是些买卖人。

喊声:真是好样的。

伏罗希洛夫:对于这些富农合作社没有注意,可是他们却一磅一磅地交售余粮,还因此而得到了商品。我再举一些中农的例子来比较一下:

“检查了10户农民,其中5户富农,5户中农,结果如下:

马尔蒂舍夫,叶戈尔——种地12俄亩,交给合作社34普特;

科尔宾,马特维——种地15俄亩,交52普特;

雷日金, 德米特里——种地 9 俄亩, 交 38 普特;  
拉祖特金, 彼得——种地 10.5 俄亩, 交 22 普特;  
斯米尔诺夫, 菲利普——种地 14.5 俄亩, 交 30 普特。

#### 5 户中农交售情况如下:

奥夫相尼科夫——6 俄亩, 交 112 普特; 雷日金, 吉洪——4.5 俄亩, 交 102 普特; 舍夫琴科——4.5 俄亩, 交 166 普特; 苏哈列夫, 德米特里——4 俄亩, 交 74 普特; 普拉克辛——5.5 俄亩, 交 92 普特。”(引自区委书记帕蒂姆辛同志 1929 年 3 月 7 日致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委的信)

这对你, 李可夫同志, 应当有所启发了吧? 这里有一点农民反对我们的迹象吗? 请看相当贫困的中农雷日金, 他种地 4.5 俄亩, 却交 102 普特粮食。而富裕的、有许多田地的富农才交了 600 千克。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呢, 李可夫同志? 这样的事情多的是: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州, 伏罗希洛夫斯克区, 杜布罗夫斯科耶村, 有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潘菲连克。他拥有脱粒机、收割机、马达, 种了 40 俄亩地, 凭他的经济实力, 连同燕麦在内, 每亩地的收成是 60 普特(这是农民的算法, 实际上不止, 因为全村的平均数是每亩 55 普特), 总计他的收成是 2400 普特粮食作物。种子、全家的口粮和饲料粮(把可能扩大耕地 25% 也计算在内)用量是 530 普特; 在宣布对他实行抵制之前, 他出售给国家的余粮只有 400 普特(而他拥有的余粮总数是 1870 普特)。实行抵制(剥夺他从合作社得到商品的权利, 主要是把他的子女从村剧团开除了)的两周中他又向采购员出售了 830 普特。总计出售了 1230 普特。即便从对他这个富农户的较为宽松的收成计算来看, 他手里还有 640 普特余粮。”

李可夫同志, 假如你连这样的事情都不曾察觉, 那你忽略的东西就太多了, 你也用不着事后来抱怨政治局领导错了等等。你应当抱怨自己。请你仔细地观察经济的进程, 然后再得出应有的结论, 因为你是首当其冲要为我国的经济状况负责的人。

李可夫同志竭尽全力, 要把我们现在经历的种种困难的罪责推到政治局身上。李可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的目的是清楚的。他们指望我们稍稍偏离一点我们迄今为止一贯遵循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可是无论是李可夫同志, 还是布哈林同志都指望不上的。我们接受李可夫同志关于必须进行机动的修正案, 可是我们还必须对这个修正案做出自己的修正, ——可惜李可夫同志晚了一点——这个修正我们已经付诸实施了。降低农业税、提高粮价, 以及其他立法性

质的措施(提高单产、订立预购合同等等)都证明,我们不仅在实践中不排除机动,相反,我们按照生活规定的必要程度来利用机动。看来,李可夫同志认为,利用机动可以超过限度,甚至不顾限度。按李可夫的看法,既然有了困难,那就必须机动,而且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很不关心机动的目的和性质。而这却是始终应当注意的。

我就李可夫同志的发言再说几点意见。他昨天在这里说到集体农庄时,声称集体农庄和个体经济原则上没有什么差别,顺便说一句,他这样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我们昨天听他说的。他直截了当地声称,集体农庄……

库利科夫:这是歪曲,伏罗希洛夫同志。

伏罗希洛夫:不,这不是歪曲。请你读一读李可夫同志发言的速记记录。我确切地记下了他的话。李可夫同志说,集体农庄,特别是那些逐渐脱离了国家的集体农庄,也就是那些能够独立运作的集体农庄,将不再是国家的债务人,他们作为卖主原则上同个体经济没有什么差别。

臧声:对。

伏罗希洛夫:对,他是这么说的,可是实质上是不对的。集体农庄根本不是个体经济……

罗济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你以为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了。

伏罗希洛夫:不能把集体农庄看成是某种抽象的经济范畴,离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体和我们的政策来讨论它。集体农庄包括了无产阶级国家影响它们的发展、结构和生存的种种因素在内。

臧声:谁也没有否定这一点。

伏罗希洛夫:如果谁也没有否定这一点,那就应当坦率地说,集体农庄有别于个体户,正像米柳廷同志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犹如合作社有别于私有主一样。

臧声:还要多一些呢。

伏罗希洛夫:不,并不多一些。假如你讨论的是英国的或者美国的合作社同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你就可以说,这种关系是以市场—商品为基础的。这样说是正确的。可是你如果讨论的是苏联的集体农庄,那就不能这么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预购合同,因为我们有按照一定条件才可以购买的农业机械,因为这些集体农庄是由我们党组织起来的,而且由我们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国家建设这些集体农庄,由于我们的政策,2700万分散的小农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了300万—500万个农民的集体。所以说,断言集体农庄和个体经济没有原则差别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做出了非列宁式的判断。李

可夫同志稍后补充说,以集体农庄为基础,我们将来就能够取消新经济政策。这后一个结论同前一个怎么能连接起来呢?我来给大家解开这个秘密吧。我觉得,李可夫同志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说明,集体农庄虽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在初期,集体农庄和个体经济没有什么差别。由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直在证明,我们现在的困难不是行情方面的困难,而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应当指靠个体经济。问题就在这里。开一家小杂货店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用于提高农业的资金应当主要发放给个体户。

**施利希特尔:**这就是李可夫的“理论”。

**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的。按照李可夫同志的意见,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金集中用于个体经济,因为它不需要多少时间就能把我们带出目前经历的、并非行情方面的困境。这就是李可夫同志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不是正确呢?一点也不正确。这是有害的、错误的理论。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发展、巩固集体农庄,巩固国营农场。这才是我们最重大的任务。可是我们也许忘记个体户了?我们没有忘记。它们的分量政治局是清醒地考虑到了的,而且也明白,在近几年内,很大一部分商品粮还必须靠这些分散的小农户来提供。党和中央的路线旨在提高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我们历次全会的决议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清楚,李可夫同志的目的何在。他是要把我们大家从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拉到他们的立场,压缩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建设的立场上去。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发言中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他认为在五年计划之外必须再增加一个两年计划,就是说,给五年计划再放上一个两年计划。他说,我们的困难很大,没有粮食,眼看着要通货膨胀,还有许多其他困难,没有储备等等。所以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在两年内(这也是五年计划的一部分)消除这些困难。

应当承认,在我看来,这里有许多弄不明白的地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是绝顶聪明的人,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他怎么会提出这样荒唐的建议来呢?如果须要消除困难,而我们是要消除困难的,那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安排五年计划,使我们能够在最短时期内用我国计划经济的总发展来消除这些困难呢?

**丘巴尔:**因为计划搞得不周详。

**伏罗希洛夫:**那你为什么不呢?是不能吗?那就明说吧,计划不合适,应当草拟一个新计划。可是你却站出来说,国家计委在可敬可爱的格列布·马克



西米里安诺维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领导下制订的计划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赞成这个计划。不过……在谈到实施计划时,你却补充说,应当给它再加上一个两年计划。这就是说,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计划,你并不相信自己制订的五年计划,只是想抹煞这个问题。这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和领导经济是不行的,需要的是清楚、明白。李可夫同志建议的不是计划经济,不是有计划地领导我国的建设,而是最没有计划的闹着玩儿。可是你想把它强加给党是办不到的。

李可夫同志关于“工业和农业连接”的不恰当表述,我再说两句。李可夫同志引证了达里这位大权威人士,可是这位权威人士并不知道连接在我们的理解中(帝国主义和国内战争时代的理解)有一定的含义。我们说两军连接,两条战线连接。大家知道,敌人几乎总是攻击接合部,接合部一旦溃散,就形成突破口,敌人就可以攻击军队的侧翼。这就是我们理解的连接。你的那位达里对于我们理解的结合一无所知。他不知道结合,因为这是列宁的语言,而列宁是俄罗斯人,就像我和你,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样,知道结合就是牢固的同盟,就是联系,而连接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做了一个手势)。(笑声)

臧声:说得对!

伏罗希洛夫:所以指出这个表述不恰当的那些人是对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想证明这两个概念是等同的,可是他做得非常勉强。好在我们大家都不是院士(虽然我们之中也许有朝一日有人,不过当然不是我,能成为院士)。所以我们可以不去争论语文学上的问题。由于这里谈的不是语文学,而是政治,而且是严肃的政治,所以表述必须准确。没有必要用一个有歧义的词“连接”去代替列宁用的明确的词“结合”。

柯秀尔:不能按达里的说法。

伏罗希洛夫:李可夫同志,我们何苦把党、整个工人阶级、世界工人阶级都搞糊涂呢,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结合”这个词,能够准确翻译的,就把它准确地译成结合;不能准确翻译的,就直接说“斯梅契卡”。列宁的许多用语现在已经在世界通行,何必要用一个可疑的“连接”去代替“结合”呢。干什么呢?闹不明白这种怪事。

斯大林:连接,连接! 结合,结合!

伏罗希洛夫:他还说,“斯梅契卡”是乐器的一部分,是小提琴的一部分。(笑声)那是指的小提琴的琴弓,跟我们说的不是一码事儿。

臧声:不对,不是指小提琴的琴弓!

伏罗希洛夫:(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事业而言,还是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

奇来说,都没有必要穿上检察官的制服,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和什么时代的制服,在这里一一列举政治局的罪过,要求惩办。这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并不合适,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指责哪个人。我们不是法庭,而是一个政治机构,它领导着最大的国家和政党,它迈出的每一步、它的每个政治举动都应当有列宁式的明确目标。我觉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乌格拉诺夫同志、李可夫同志等人的发言虽然洋洋洒洒,而且有理论性,可是完全无助于我们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政治局从党的十五大开始直到现在,始终是按照我们列宁主义的路线,按照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在工作的。我觉得,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以及他们的朋友应该认真想一想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同志们,过去的事情终究是不应当忘记的。我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不是六亲不认的傻瓜,我们是政治家。如果我们回首往事,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些政治家,并不比我们差的政治家已经退出了舞台,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你何苦要走上反对中央的死路呢?你何必要打算说服全会和一些熟谙政治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说你们没有错,而错的是政治局呢?我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列宁式的权威机构,它们能够按照自己布尔什维克的良知做出决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一定能够找到途径和办法,向某些理论家和领袖指出,所有争论问题都应当在列宁式的党的机构内,按照列宁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对于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能够向他们讲清楚,怎样摆脱这种疾病,怎样唤起他们的勇气重新走上列宁主义的道路,在党指派给他们的岗位上工作。

主席:是继续开会,还是休息一下?

喊声:继续开会!休息!

主席:付表决:赞成休息的?多数。

(休息后)

主席:安德烈耶夫同志发言。

安德烈耶夫:谈实质问题之前,我先做一点说明。我想,我们没有这样的傻瓜会说非常措施有助于扩大播种面积。

喊声:说得对!

喊声:有一个。(喧闹声)

安德烈耶夫:可是我还是要保卫非常措施,为它洗清那些无中生有的捏造。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还有其他人在这里引用了一些材料,证明播种面积的缩减是我们实施非常措施的结果,他们特别举出了北高加索播种面积缩减的数字。我要驳斥这种论断,而且要指出,我们玩弄数字是很不好的……

米高扬:就是玩弄数字!

安德烈耶夫:(玩弄数字,)让它适合某种用途。这表明,我们的统计是很糟糕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话对。

安德烈耶夫:应当坚决改革统计工作,特别是农业的统计工作,它根据的是农村中最富裕户的所谓通信网。

北高加索播种面积数字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大约在11月或是12月得知,中央报纸上刊登了秋播面积缩减18%的数字。这让我们感到很奇怪,因为在全会上我们就曾经指出,我们的播种面积总的说来是稳定的,我们的资料也说明,缩减这么多是不可能的。但是播种面积缩减18%这个数字已经出现了。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又降低到14.5%。可是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向中央声明,我们不承认这个数字。此后人民委员会派来一个小组,它看了三个州,认为根据这三个州的材料推算,全边疆区的播种面积缩减数字应该是8%。可是我们仍然不同意这个数字,认为我们的资料更可靠一些。可是在小组检查之后,莫斯科的数字不是8%,而是10.5%。又长上去了。

[米高扬:道听途说的。

安德烈耶夫:这个数字不知怎么又拽上去了。

米高扬:加了利息嘛。]<sup>324</sup>

安德烈耶夫:同志们,这样玩弄数字是不行的。我甚至认为,到春天最后检查时,缩减数字可能只有3%—4%,可是这些资料不能随意改来改去,把它统统归结为非常措施的影响。同志们,别忘了在我们北高加索,播种条件是非常不利的:有许多州遇到了秋旱,虽然进行了大量工作也不能下种。结果在北部各州——顿河州、顿涅茨克州、沙赫京斯克州播种面积确实缩减了很多。可是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南部各州给补上了。所以如果看看各州的播种图,面积缩减的大部分是在北部各州,因为那里出现了秋旱。而非非常措施我们是在各地都一样执行的。

奥尔忠尼启则:在库班好像是厉害一些。

安德烈耶夫:是的,库班是要厉害一些。可是从播种面积缩减的角度说,库

班的情况是最好的。我不否认,由于对富农采取了非常措施,播种面积缩减了,非常措施在这里产生了影响。不过我认为,贫农的播种面积扩大了,中农总的说来播种面积是稳定的,而播种面积缩减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并不是非常措施,而是使我们不能正常地开展播种工作的天灾。也许还是要引用春播缩减的数字,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为春播活动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就像俗话说的,拧紧了所有的螺丝。我们100%地净化了种子,做了大量工作,准备把播种面积扩大13%。播种条件略微推迟了一些,有2—2.5周,可是各州的播种工作进展都很好。不过前天我得到消息,下了18公分的雪,气温只有5—7度。

**斯克雷普尼克:**放德萨的情况也一样。

**喊声:**是中央的错。

**安德烈耶夫:**播种只好停了下来,昨天的消息是罗斯托夫的雪还没有化。原来准备在春播中大干一场的农民情绪有点低落。

我们该怎么办呢?要么重新安排,用中耕作物来补偿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要么缩减播种面积,因为我们的播种工作晚了一个多月才开始。

**施利希特尔:**乌克兰也是这种情况。

**安德烈耶夫:**天灾的影响也应当估计到。不能什么都不管,简单地对待播种面积的缩减,把什么都算在非常措施的账上。

这就是我引用的一些我认为有重大意义的材料。

下面我谈谈我们讨论的实质问题。同志们,我们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第六天了,可是好像仍然看不到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可是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显然,事情已经走得很远了,想要把一切都纳入早先的轨道是非常困难了。我完全同意一些同志的说法,他们认为我们犯了个错误。错误就是我们把事情拖下来了。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把事情拖下来,而且越扯越深……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却没有尽快地把事情揭开。我想,如果上次全会上提出的辞职问题,就在上次全会上讨论,那可能就对了。

**喊声:**对。

**喊声:**辞职又收回了。

**安德烈耶夫:**那样就会好得多。我想,我们无疑犯了个错误。那样一来,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文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种种分歧了。

奥尔忠尼启则:既不会有阿扎尔,也不会有卡冈诺维奇了。

安德烈耶夫:对,既不会有阿扎尔,也不会有卡冈诺维奇了。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当时指望,事情会过去的。

安德烈耶夫:可是我想,这个教训我们今后也应当汲取,今后只要某种错误开始滋长……

斯克雷普尼克:叫你舌头上长疔疮,——还今后呢!

安德烈耶夫:只要某种危险开始出现,我想,就应当尽快把它揭露出来。

洛米纳泽:正确!

安德烈耶夫:不过,不管事情多么困难,只要中央全会还没有做出最终决议,我觉得,我们就有责任,首先是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避免尖锐的结果,避免外科手术似的措施。

[乌格拉诺夫:这不取决于他们。]<sup>325</sup>

安德烈耶夫:尽管李可夫同志昨天非常固执地要让我们相信,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可是我还是认为,可以有另一种情况。我的出发点是从各方面考虑,中央全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我们党是非常不利的。说它不利不仅是考虑了我们国内的情况,还考虑到我们会给第三势力提供新的机会,而第三势力正打算钻这个空子呢。在我们北高加索,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事,当富农听说我们上层领导有分歧时,他就抓住这件事:好啊,布尔什维克干起来了,赶紧集聚力量,朝他们进攻!第三势力的希望受到了鼓舞。不能给第三势力以任何希望。从我们的对外关系来看,这也是极其不利的。我觉得,这用不着特别的证明。我想,我们已经为党内的现状付出了代价。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些损失难以计算,可是领导核心——政治局出现的分歧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从必须团结各个共产党的观点来说,这也是不利的,因为我们俄国党内的任何一点震动都会立即反映到各个共产党里。从我们国内局势和党内情况来说,这也是不利的,——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我想,如果我们在这次全会上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那我们党当然不会感到轻松的,无论如何不会轻松的。

现在党内的情绪如何?党坚决反对任何动摇,反对犹豫不决,对于个别同志的错误和倾向,党会做出最干净利索的决定,可是现在党内有这样的情绪,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会以最满意的心情打听:我们的政治局里是不是和解了?政治局的工作是不是和谐了?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十分关注党的领导是否一致,因为最严厉的措施对于我们,对于每个党员来说,都是很沉重的,因为从我们的领导层中开除三名同志——这不是巩固党,而是削弱党,这是无须多说的。这

是我们领导的损失。同志们正确地指出,如果个别领袖离开了领导机构,革命不会因此而死亡。党不会因此而死亡,因为党十分巩固,它的机体业已形成,工人阶级十分坚强,个别人的离去不会对我们的事业产生致命的影响。党会走它自己的路,保持着它的统一。可是我们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轻松地走完我们的路,为此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我们党的全部力量和智慧,为此就必须有铁的纪律和我们队伍的团结一致。

大家谈到了我们现在经历的困难。国内总的政治形势是:尽管我们有暂时的困难,我们仍然能够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我觉得,唯一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可能来自我们党的领导的不正常状况。

如果核实一下党内的情绪,那么总的说来,可以归结为,各种经济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是可以战胜的,假如“上面”的工作和谐而且步调一致的话,假如领导层中一切顺利,而不是时冷时热的话。

所以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件事,结束分歧,避免外科手术似的措施,而达到和谐地共同工作。这样党就可以松一口气了,而敌人则会重新体会到我们的力量。

能不能这样来结束所讨论的问题呢?虽然我们在全会上见到了一些情况,可是我相信,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基础就是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老老实实地承认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我认为,我们许多人在这段时间里感触很多,翻来覆去地考虑问题:党应当怎样来解决这件事情,怎样解决才更好些、更正确些。我们许多人大约都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仅仅是私人关系不融洽呢?我也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都有许多考虑、感触。因为涉及的不是托洛茨基那样的人,而是自己人,是对党非常珍贵的人,对于某些同志而言更是私交……

奥尔忠尼启则:政治里是不应当掺和友情成分的。

安德烈耶夫:同志们,交情归交情……

奥尔忠尼启则:而政治是政治!

安德烈耶夫:对,党的利益、政治局势要求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

彼得罗夫斯基:党的利益必须高于一切。

安德烈耶夫:是的,必须高于一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就应当坦

率地说,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犯了很多重大的政治错误,我觉得,他们确在某些地方是严重地不辨是非。就像和加米涅夫谈话这样的问题,(这里已经谈得很多了,)难道这是可以为自己辩解,或者抹煞的吗?这是既不能辩解,也不能看成是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劝人为善的谈话的。

奥尔忠尼启则:特别是这种事还一再重复。

彼得罗夫斯基:也许是想试探一下托洛茨基分子呢。

安德烈耶夫:我想,如果说出现托洛茨基分子那份让人讨厌的文件的责任何在的话,那最主要的责任应该是在布哈林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无论如何不能把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谈话这件事排除在政治之外,这是很清楚的,这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把它排除在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想用各种条件抹煞它也是不可能的。应当干脆地、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政治步骤。布哈林同志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怎么会相信那些昨天还同党进行过斗争的人,去做这样一次谈话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不过我直到今天也不完全相信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肯破釜沉舟,投到党这一边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加米涅夫做了记录,而这份记录又通过托洛茨基分子公布出来,这件事恰好说明了相反的情形,这件事令人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真诚信产生了很大怀疑。

斯大林:说得对!

安德烈耶夫:从投向党这一点来说,他们做得还不够。

斯大林:说得对!

安德烈耶夫:我不相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放弃了败坏党的领导的声誉的活动。虽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这不是盗窃文件,可是这“盗窃”……

加里宁:往轻了说!

安德烈耶夫:也拿不出证明,我觉得……

斯特罗加诺夫:是家贼。

安德烈耶夫:这盗窃在我看来是很可疑的!是不是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有什么传送带呢?我觉得,要说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靠近了党的政策是缺乏根据的,所以布哈林同志做这次谈话是犯了更大的罪过。

同志们,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为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离开党分派给他们的领导岗位辩解。不管我对托姆斯基多么尊重,但是我认为这是他犯的最深重的政治错误。怎么能这样呢?怎么向普通党员解释这种行为呢?普通党员不能理解这种举动,著名的高级领导怎么能扔下自己的岗位,不服从党的纪律

呢。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党有常设的领导机构,就是政治局。不管它是好是坏,它可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领导着党和国家,你就应当服从这个政治局。不可能有别的道路,同志们,任何人也不能破坏党的纪律。因此离开岗位是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无法辩解的错误。

我觉得,第三个重大政治错误就是几个同志着手写文件。

首先,从形式上考虑这就不妥当。我们党内的相互关系用不着这样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是托洛茨基,是反对派搞起来的。归根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相互关系的这种形式对我们党是不适用的。为什么需要这些书面文件呢?没有它们难道就不行吗?重大政治错误不是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质上。为什么要提出贡献的问题、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政策的问题呢?

罗济特:是斯大林提的。

安德烈耶夫:好吧,斯大林同志说了,也许这个用语不是很恰当,虽然我根本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可是为什么要把贡献政策栽到党身上呢?在这份由三位同志签名的文件里直截了当地说,这不仅是用词的问题,贡献政策反映在党的相应实践中。为什么对党要做出这种虚假的论断呢?

为什么要重复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党内官僚主义的陈词滥调?党自己也认识到,在它的个别环节和机关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这难道不清楚吗?可是党自己在切实认真地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呀。为什么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要在书面文件里重复这些话呢?这完全用不着嘛。

在我看来,几位同志的第四个重大政治错误是在最近犯的,就是在表决决定我们党的总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时,投了弃权票。这是更大的政治错误。弃权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反对,还是赞成?应当怎样解释呢?一方面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弃权,另一方面又声明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这该怎么解释?我虽然尽可能仔细地听了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的发言,可是听不出对弃权的动机有明确的回答。我不知道你们听出来没有。

喊声:没有!

安德烈耶夫:对基本政策的决议投弃权票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决议没有对我们的困难做出详尽的说明吗?难道仅仅因为决议里没有恢复农业的两年计划吗?难道我们在每一个人都亲身感受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还须要在每份文件里,在每次会议上不断地重复困难、困难、困难吗?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都非常清楚这些困难了。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些困难了。难道在我们党已经就摆脱这些困难,在政策上做出了一切必要的结论的时候,还须要不断地重复“困难,以及



诸如此类的”词语吗？为什么要这样无休无止地谈困难、困难、困难呢？

看来，问题确实不在投弃权票的动机，而是有更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谈谈布哈林同志的发言。在这次全会上他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当然是否定的印象。我非常认真地听了这个发言，它在形式上、风格和叙述上都是很优秀的。

我觉得，这个发言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无可争议的，就是布哈林同志谈到革命的法制问题，谈到我国必须实行革命的法制等等。这在党此前的许多决议里都是写了的。如果说革命的法制仍然执行得不够，那我们就须要再加一把劲。可是问题是在这儿吗？还有我们对农民的课税制度还不够完善的问题等等。制度当然还不够完善，可是问题在这儿吗，难道是因为此而出了大乱子吗？制度也许是不完善的，我并不否认，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像富农的地区特点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正在执行，授权各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来规定本地富农的特点，这是人民委员会定的。在北高加索我们规定了富农的特点，如果还不够准确，那就请大家提出建议，我们再修改。可是问题在这儿吗？还有输入粮食的问题，尽管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我还是认为它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它涉及外汇能力：如果有钱，也可以进口粮食。可是在这本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的红皮书里有布哈林同志的声明，说我国的外汇情况非常糟糕。

皮达可夫同志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好像做过一个报告，说我们的外汇情况不怎么好，还有对国外的偿付能力等等。既然是这样，那怎么可以这样轻率地决定问题呢？为了输入粮食等等，我们要花掉5000万呢。

斯大林：是1亿卢布。

安德烈耶夫：哎，花1亿卢布来进口粮食。同志们，我想，这样对待问题是轻率了一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有害的，它削弱了我们加紧粮食采购的动力。

科恩：这话对。

安德烈耶夫：就不能把这个问题先提交小范围内讨论，然后再提到400人的全会上去吗？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有一点当家人的做法，也许在新粮食年度之前，暂缓实行购货本制度，而加紧粮食采购，同时保留这1亿外汇，或者作为储备，或者用来购买工业原料。

臧声：对。

安德烈耶夫：我想，既然是迫不得已，这样做也许会好一些。

臧声：一切都是为了走出困境。

安德烈耶夫：布哈林同志有一个意见，认为从商业、工业等的集中程度看，我

们并非一切都好。我也认为,我国在工业和商业的工作制度方面大约有许多缺点,官僚主义的集中太多了,反而妨碍了工作,严重地束缚了地方的主动性,束缚了地方机构和个别干部的关心和责任感。不过这都是一些专门的问题,应当及时提出来,可是应当经过特别的、实际的审理。我们何必为这些问题伤脑筋呢?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权利就是提出这类问题,争取解决这些问题等等。难道有什么人禁止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同志和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提出审理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吗?

可是我觉得,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布哈林同志的发言中还有更多不对的地方。首先,我认为应当坚决驳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断言,说我们党的政策似乎滑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在布哈林同志本人首先去找了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谈话之后,他怎么还能够做出这样的论断呢。(笑声)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在这方面应当稍微谦虚一点。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影射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某种结盟呢?同托洛茨基分子搞什么同盟呢?这个同盟是在哪儿缔结的呢?如果说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那一份奥尔忠尼启则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谈话就是同托洛茨基分子结盟的证明,那我就要说,我把这个谈话又读了一遍,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结盟。在谈话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明,他和拉狄克脱离了托洛茨基,希望回到党内来;他还说,托洛茨基分子阵营出现了分化,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希望在承认我们党的政策的基础上回到党内来,目前托洛茨基分子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我想,这正是我们应当欢迎的。我觉得,我们党需要人。如果一批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现在承认自己错了,我认为,应当经过必要的严格审查之后,接收他们入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是一个对党非常有用的人,我觉得,现在事情正在向这方面发展。托洛茨基彻底滚进了资产阶级的泥坑,托洛茨基分子的分化将会加速进行,许多离开了党的同志将会很快回到党内来。我想,这是应当欢迎的,可是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结盟。而布哈林同志断言我们转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我觉得是文不对题。难道可以把党为取得粮食而进行的巨大工作称为滑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吗?难道可以把我们对中农的让步、农业税的改变、价格的变化等等称为滑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吗?难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吗?托洛茨基主义恰好相反,是反对对中农让步的。我想,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证明,党和中央委员会脱离了党的十五大的立场。我认为,布哈林同志的这个论断必须坚决驳斥,而布哈林同志本人也应当放弃这个论断。我觉得,正是这个新的虚假论断只能使相互关系问题更加复杂化。

我还想谈一个在我看来是布哈林同志发言的中心问题,就是新经济政策和非常措施的关系问题、市场关系问题。他声称,他赞成新经济政策,而反对非常措施。这是一个虚假的、繁琐哲学的提法。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提法。

安德烈耶夫:虽然布哈林同志被认为是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却在这里制造了那么多的理论迷雾,尽管后来李可夫同志在发言中极力想驱散这些迷雾,可是据我看,并没有什么效果。布哈林同志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说法:赞成新经济政策,反对非常措施?可是我们党内哪有这样的傻瓜,会否定新经济政策,却赞成把非常措施作为经济政策制度呢?你在这儿能找出这样的怪人吗?除非是你凭空想出来,我们没有这样的怪人。如果说我们去年1月和布哈林同志一起采取了非常措施,那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生活好了,而是因为没有吃的,因为无论如何都要把粮食采购到手。于是我们采用了这些措施,作为暂时的特殊措施。

米高扬:所以它们才被称为非常措施。

安德烈耶夫:此外,我们在七月全会上就说过,非常措施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经济政策制度,我们放弃了非常措施。可是布哈林同志现在却提出了这种说法。

李可夫同志想证明,地方上对中农有违法乱纪、过火行为等等。可是难道可以用一些过火行为,虽然数目很多,来说明我们党的经济政策吗?这对于一个严肃的政治家来说是太可笑了。这是完全没有用的。我想,李可夫同志的出发点是虚假的,以为我们的机构都是最理想化的,我们已经摆脱了粮食危机。我们是取消了非常措施,可是我们还有购货本,还没有消除粮食困难。在消除这些粮食困难之前,就不会有正常的粮食采购,因为我们必须加强粮食采购,这应当是清楚的。虽说取消了非常措施,可是我们还在同投机倒把作斗争,对持有粮食的富农施加压力也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如果富农凭着粮食嘲笑合作社或者搞粮食投机,那我们就发动公众来反对他,宣布对他实行抵制等等。

李可夫同志从虚假的前提出发,以为我们的机构都是最理想化的、最文明的等等。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采取非常措施也罢,不采取非常措施也罢,我们的过火行为和歪曲党的政策的事情多的是。

雅科夫列夫:对富农的比[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对贫农的还要多一些。

安德烈耶夫:我可以举一个预购合同的例子。预购合同似乎不属于非常措施。这项措施是为了迎合农民,对农民是有利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地方机构

能把它歪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

**安季波夫:**七小时工作日制也是这样的。

**安德烈耶夫:**不久前我到了一个州里,在那里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我问道:你们预购合同实行得怎么样?回答是——不怎么样,只遇到反抗。那你们怎样消除这种反抗呢?我们抓了一个人,因为他不肯接受预付款。(笑声)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管是向农民收取款项,还是给他们钱,他们不肯收,就通通抓起来。这样的歪曲简直数不胜数,可是不能把它们归结为党的政策如此。只有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才会以为,我们的基层机构是文明的、理想化的。这样的机构还须要我们长期培养、清洗、提高它们的水平等等,才能使我们党的政策不被歪曲地,或者只是受到最低限度歪曲地直达基层。

我回过头来谈主要问题,关于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同志对新经济政策粗糙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让我大吃一惊。我觉得,他不是作为一个辩证论者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把他自己搞得晕头转向。我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理论家,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米高扬:**何况是在布哈林理论方面。

**安德烈耶夫:**可是我直到今天对新经济政策还是这样看,认为它不是某种固定的、凝固的、一劳永逸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会有变化的,应当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新经济政策,如果我们在八年之后,今天还是待在新经济政策出台时的立场上,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和停步不前。

**喊声:**这就是停步不前和腐朽。

**喊声:**说得对!

[**米高扬:**你的理论和布哈林的理论不一样。]<sup>326</sup>

**安德烈耶夫:**我们并没有在原地踏步,而是朝前走了很大一段路。我想,我们的事情会是这样:新经济政策作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政策不会由于某项一时的指令而取消,或者有朝一日宣布取消新经济政策,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等等,可是我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制度,会逐渐发生变化而消亡,被无产阶级国家的另一种政策取代。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这就是问题所在。新经济政策将由于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巩固和扩大而发生变化。

**斯大林:**而且补充新内容。

**安德烈耶夫:**正是这样,它将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且补充新的内容。布哈林

同志玩弄字眼,对“结合的新形式”、对农民的新态度等等抓住不放。我想,对词句吹毛求疵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有一点应当认识的就是:我们是从商品关系的最简单形式开始新经济政策的,而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阶段——改造时期了,所以新经济政策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形态,因此我们和农民的结合也有了許多新内容。应当承认,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那种简单的商品关系了,而是转到了新经济政策虽然仍旧以商品关系为基础,但更为复杂的形式,而且将继续前进。的确,应当看一看在农业中、在同农民的关系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像合作化这样的事情不会给新经济政策带来重大变化吗?我们在北高加索好歹有了75%的消费合作社和50%的农业合作社。这无疑是很重大的变化。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中生产关系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样的问题,虽然李可夫同志把它有一点简单化了,说是我们和它们,也就是集体农庄的关系,和个体农户是一样的,都是单纯的商品关系。李可夫同志,这是不对的。集体农庄是生产合作化的最高形式,它们同无产阶级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和个体经济完全不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从属性不同于个体经济对国家的从属性。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现在我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展很快。这是一个重要的修改。

预购合同问题。我们北高加索现在有将近50%的播种面积都签订了预购合同。这就是说,我们将通过合同关系,而不是市场关系从农民手中得到6000万—7000万普特粮食。

米高扬:通过有组织的途径,而抛开市场的自发势力。

安德烈耶夫:以商品关系为基础,可是不通过市场。以合同关系为基础。这对市场关系体制是一个重大的修改。我们通过农业合作社把生产合作化问题交给了政治局。这个问题即将审理。这对于新经济政策制度是一个重大修正。我们现在对各个拖拉机站、村庄,各个土地社等等实行的播种计划也是重大修正。我们对待农户的组织措施、农业常识、通过各种措施在农村中建立公众劳动纪律等等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大修正。这一切都是和对中农和贫农的物质刺激同时执行的,这也就是实际贯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解决我们的根本任务。对于这些修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视而不见,可是布哈林同志在提出新经济政策问题时,却看不到这些修正。也许我有点离题了,可是我觉得,根据北高加索的工作经验,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实现列宁的合作化计划了,我们不仅通过价格市场关系,而且采取了一定的组织措施把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自发势力纳入了计划,置于我们的组织领导之下。

由于这一切,就产生了阶级斗争问题。在新经济政策的这个阶段——改造阶段上,阶级斗争当然会比单纯的商品关系阶段要激烈些,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改造阶段,我们的政策和实践——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国营工业的增长,合作化的增长等等,这样的政策是在挖资本主义的老根,切断城乡小资本主义的根基,破坏它们,因此阶级斗争就必然要激化。不应当逃避它或者被它吓倒,而应当认真对待这个事实,随时准备给敌人以回击。我觉得,布哈林同志对这一切都认识不足,所以他的说法:“赞成新经济政策,反对非常措施”的含义就是两者必居其一。要么这个说法是想证明,党离开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转而采取非常措施的制度,可是这是缺乏证据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证明的。要么……

斯克雷普尼克:李可夫同志就是这样说的。

安德烈耶夫:尽管有这种愿望,这是不可能证明的。既然这是不可能证明的,那么这个说法就有另一种内容。这是不是布哈林同志在召唤我们退回到最简单的关系,退回到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去呢?

臧声:退回到党的十四大去!

安德烈耶夫:如果连这也没有,那就应当尽快放弃这种说法。别再给我们灌输什么理论糍糊了。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把他看做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可是我们也应当对他提出要求:最好自己先认真地思考一些论点,更好地教导我们,更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思想。

关于农业问题。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起劲。我坦率地说,从他们的发言,以及他们的各种文件里,我看不出他们就农业问题提出了什么正面的纲领,只有一点除外,就是李可夫同志提出了全面恢复农业的两年计划。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纲领,还有一点就是取消西伯利亚的非常措施制度。我看不出其他农业纲领。我们迄今为止对农业的工作做得不好,这话是对的。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无须争议的还有我们抓农业稍稍晚了一点。

臧声: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安德烈耶夫: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应当承认这个过失,我们现在实行的那些措施晚了一点;1—2年前就该采取这些措施了,而不是等到经历了粮食危机和原料危机之后。

党现在实行了急剧的转变,党由此得出了一切必要的结论。十一月全会和七月全会都通过了注意农业的相应决议。农业税在减轻中农税负方面做了很大改变,农产品价格也做了改变,有利于刺激农业,实施预购合同和向农业提供贷款,最后,准备提交代表会议讨论的那些提纲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解决农业问题的

基本途径。我说实在的,对这些提纲并不是非常满意,因为比起我们在地方上进行的工作来,这些提纲有点落后……

臧声:说得对!

安德烈耶夫:而且从农业工作的新因素来说,提纲还缺少一点东西。不过总的说来,它们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由于党在农业问题上做了这样急剧的转变,所以一切原则问题都应当说是不存在了。不错,一切都还不是那么细致,那么确切等等,我们在实践中对待中农还有许多错误态度等等。同志们,应当抛弃关于非常措施的种种议论了。我们没有人赞成非常措施,所以应当抛弃这种议论。现在党处理农业的全部政策就是取消非常措施的政策。

我想就布哈林的发言讲的最后一点,也是我认为贯串布哈林立场的一点,就是他脱离具体的实际。

奥尔忠尼启则:他稍稍有点悬空了。

安德烈耶夫:我想,如果布哈林同志到地方上去待过至少两个月,到过北高加索……

臧声:搞过粮食采购。(笑声)

安德烈耶夫:是的,搞过粮食采购(喧闹声),看过我们怎样搞播种运动,看过怎样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想,他十有八九不会有这种情绪。

臧声:这对乌格拉诺夫没有起作用。

安德烈耶夫:脱离实际会有什么后果呢?它使布哈林同志对现在经历的困难有一些错误的、抽象的议论。它使布哈林同志在原因问题上稍稍有一点动摇……

柯秀尔:不是稍稍有一点,而是很动摇。

安德烈耶夫:对我们困难的原因问题有动摇。我觉得,布哈林的立场贯穿着一种想法,仿佛所有这些困难都是我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在政策上有重大转变。我觉得,糟糕的错误政策当然能够使任何困难复杂化,可是我认为,我们党的政策迄今为止总体上是正确的,没有人证明过它是错误的。可是困难是存在的,这就是说,根源在于其他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加以考虑。显然,根源在于农业的极端落后,它分散成2500万个农户,在于我国工业的极端落后,在于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极度匮乏。这才是困难的根源所在。这是要认真对待的。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卷起袖口,同困难奋斗若干年,而不是大叫大嚷,惊慌失措。从另一方面说,我觉得,布哈林同志固执地不愿意承认,不想承认现在的困难、今年的特殊困难有其特殊的原因(购货本问题、粮食问题等

等)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十二个年头上还在用购货本,这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可是应当明确地揭示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根本原因又是我国农业极端的落后,除了农业中的落后之外,今年我们又遇到了歉收。要不是这次歉收,我们本来是可以不用购货本的,这很清楚。我国的收成在地理上的分布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年我们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少采购了24300万普特粮食。假如我们有了这24300万普特,那不仅用不着购货本,而且简直可以生活得悠哉游哉。

**罗伊津曼:**还可以出口1亿普特。

**安德烈耶夫:**还可以出口。毫无疑问,同志们在对待困难的立场上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就证明他们脱离实际,而脱离实际就使他们夸大了我们的困难,错误地评价了我国的政治形势。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论据,说是我们同中农的结合仍然受到威胁。对于这个论据我仍然是坚决反对的。当然,同中农的结合在我国长时间内将依然受到威胁,可是必须分清楚是什么样的威胁。是像中央七月全会以前的那种威胁呢,还是别的什么威胁?比如说,我根据北高加索的经验断定,从结合受到威胁的角度看,北高加索的情况这段时间里有根本的改变……

**奥尔忠尼启则:**是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安德烈耶夫:**是向好的方向变了。

我觉得,不能像布哈林同志那样,在阿扎尔暴动这样的问题上,只根据个别事件加以概括。

**奥尔忠尼启则:**这和西伯利亚的粮食采购没有任何关系。

**安德烈耶夫:**此外,也不能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材料来研究政治形势。设立政治保卫局是为了寻找和展示我国最坏的、最不恰当的事情,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政治保卫局的材料来安排我们的政策,那我们会老是惶惶不可终日,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会始终毛骨悚然。

要想正确评价局势,应当接触实际工作者,接触地方干部,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形势。

阿扎尔暴动的问题。当然,阿扎尔应当吸引人们一定的注意力,这是对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绕开这件事情,应当尽力研究、分析这次暴动是怎么回事,以免有什么情况给忽略了。可是我觉得,阿扎尔现在不能作为权衡我国政治局势的出发点,无论如何这件事都不能说明我国的政治情况。北高加索是这样一个地区,在那里我国的种种阶级矛盾全都最尖锐地表现出来,可是我们在北高加



索,尽管阶级斗争很尖锐,总的说来仍然为执行我们的各项措施创造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政治环境。大家知道,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陶醉的人,也没有那种形式主义的乐观,可是我简直就被北高加索有关农村、农业等等的群众热情吸引住了。我们的各级机构也都被这种热情所感染了。

喊声:乌克兰也是这样的。

喊声:可是布哈林不相信。

安德烈耶夫:可以引用阿扎尔暴动,可是不能把生产会议这样一些事情扔掉。生产会议是我们在农业中采用的,它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吸引他们参加工作,来自农民本身的30000名农业特派员监督农户执行纪律。你总不能把选种率达到100%、为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进行的巨大工作等等从政治局势中剔出去吧。

最后是苏维埃选举。上一次村苏维埃的选举我们的投票率是42%,这一次是62%。这多少说明一些问题吧。这些情况总不能都说成是“非常措施”吧。

最后,我完全不明白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怎么会在关于右倾的问题上表现得这样固执。如果他们声称没有原则分歧的话属实,如果他们说自己不是右倾,而且坚定不移的话属实,那他们为什么又在基本决议投票时弃权呢?为什么不明确而坚决地同右倾划清界限呢?为什么没有早一些做这件事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国的困难处境加剧了右倾堕落的趋势。我觉得,这是绝对清楚的,而且我们根据地方工作的经验看得很清楚。右倾趋势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它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在工业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放开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手脚问题上,以及放弃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问题上迫使党后退。这就是右倾立场的归纳。可是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不肯和右倾划清界线,虽然他们有许多动摇,还犯了许多政治错误,我并不相信这几位同志就是右倾的代表人物。我不相信,而且认为在现阶段事情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这就更要求他们同右倾划清界线。应当看到,对全党都在谈论的问题默不做声和保留自己的意见,以及几名同志犯下的动摇和错误,客观上都会助长右倾堕落的趋势,支持我们党内的右倾。所以他们必须明确而坚定地划清界线,切断右倾分子抓住他们立场的一切机会,否则党周围的和党内的所有不健康力量都会倒向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很明显,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分子对党的政策不满意的情绪。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时期也有过这种不满情绪,它当时集中在托洛茨基主义身边。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反革命政党。这种不满情绪不可能公开地投向托洛茨基主义,它会寻找其他的方法、其他

的中心。

**奥尔忠尼启则:**寻找合法的领袖。

**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成了反革命政党的代表,和他结盟不是很安全,可是如果在同党的斗争中和李可夫结盟倒是可行的。

正因如此,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才可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必然成为吸引党内外体现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个别人物身上的不健康因素的中心。

他们必须立即同右倾划清界线,因为否则党就有权认为他们就是右倾。

托姆斯基同志是不是就此发表过哪怕一次声明呢?没有,他在所有的讲话中都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声明。布哈林同志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声明呢?没有,布哈林同志在所有的讲话中都从来不曾做出过这样的声明。

**罗济特:**一派胡言。

**安德烈耶夫:**这不是胡说八道,我敢肯定,我敢断言,托姆斯基同志从来没有讲过同右倾划清界线的话。

要么他们的确是右倾,要么他们应当同右倾决裂。否则党有权认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右倾。正因如此,我认为,他们迄今为止犯下的错误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曾同右倾决裂。所以他们现在应当立即改正这个错误。如果他们不划清界线,他们就使党更有权断定他们的确是右倾的代表。

我觉得,他们必须承认错误还因为坚持错误就是进一步走入迷途。这不决定于一个人的品格和个性。由于坚持错误,一些非常好的人毁灭了。坚持错误就使他们替自己辩解,而这只会使他们越陷越深,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下去,沾上的污泥浊水就越多。斗争的逻辑也是这样,坚持错误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从个别错误开始,一直发展到在重大政治决议上投弃权票。怎么能够保证不会走得更远一些呢?

我讲这些话的出发点是:我们在中央全会的决议里必须保留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为我们的领导成员。我觉得,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对党是不利的,因为这将给党造成新的困难,而且斗争的逻辑会把这些同志推得更远。要么这些同志会陷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处境,使党的领导长期失去了这些人。失去这样的人对党不利。党应当尽力保留他们,对他们的错误做出相应的评价。

**柳布琴科:**要是他们不承认错误呢?

**安德烈耶夫:**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留在领导层内。

**柳布琴科:**要是他们不承认错误呢?

安德烈耶夫:可是这就是说,他们的首要责任是必须缓和党的这项决议,用他们真诚地承认错误来缓和党的决议。向党承认错误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党只会松一口气,高高兴兴地接受这种认错。(鼓掌)

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发言,订正几件事。

莫洛托夫:同志们,对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我认为必须订正几件事。

1)关于驱逐托洛茨基。李可夫同志声称,在驱逐托洛茨基的问题上布哈林同志是投票赞成政治局的决议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驱逐托洛茨基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过好几次;布哈林同志一开始是反对驱逐托洛茨基的。只是在决议已经付诸实施,托洛茨基已经启程了的时候,在最后一次讨论时,布哈林同志才投票赞成政治局的决议。李可夫同志特别强调,虽然他投票反对驱逐托洛茨基,但他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时,还是维护了这项决议。不用多说,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之后,每个党员,更不用说中央委员了,都不能有别的做法。我提到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投票反对驱逐托洛茨基(虽然布哈林同志在最后一次投票时改变了立场)只不过是展示了展示一个事实,看一看这几名同志是怎样把自己的立场和政治局的立场对立起来的。

2)李可夫同志引用了我在1925年中央四月全会上的报告,其中谈到在当时的条件下集体化不可能囊括全部贫农和中农群众。大家知道,党在当时也并没有像党的十五大那样,提出农民普遍集体化的口号作为“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可是1925年的中央四月全会在由我起草并根据我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讲了下面的话:

“根据确属群众的主动精神而切实开展的群众性合作化(首先是在供销方面)工作,创造了实际可能利用农民向国营和合作社机构增加投入的资金(储蓄),来逐步加强对力量单薄的农户的经济援助,随着力量单薄的和中等的农户最简单形式的协作(机具社、共耕社、畜牧监督社等)的发展,就为逐步地(自愿地)转变为采用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最新手段的集体大农业准备了先决条件。”

同一个决议接着说道:

“必须进一步支持集体农业运动(农业社、农业组合、公社等等),因为它在农户和雇农等的积极参与下,确实在成长壮大。”

此外,中央四月全会之前发表在《真理报》上(1925年3月24日,《真理报》)的文章《党在农民问题上的路线》中,我曾经指出,若干年后,“党将要强调的口号不再是‘面向农村’,而是这样一些口号,如‘农村向前进,走向大经济!’”

‘大胆实现农村电气化!’等等。如果说目前我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继续深入农村,‘面向农村’,那么这并不妨碍几年之后——首先是由于国营工业的巨大增长和巩固——党的任务将不再是强调必须走进农村,而是把农村从小农经济提高到大经济,从个体生产提高到电气化的社会化农业”(引文中的黑体字是我强调的。——莫洛托夫)。

大家知道,党的十五大的确可能提出“农村向前进,走向集体化的大经济!”作为自己的基本口号。不过应当指出,尽管如此,李可夫同志在十五大上做的五年计划报告中,集体化的口号完全被抹煞了。只要读一读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就清楚了。

3)布哈林同志在发言中引用了我在十五大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我当时完全根据党的路线,坚决反对反对派提出的向农民强行借债的建议。布哈林同志却企图把我讲话的这一部分说成是同现在党在一些粮食采购地区实行的、向富农施加压力的措施不相容的。布哈林同志的意图显然站不住脚,而且是断章取义。只要举出一件事就足以证明了。几周之前,中央委员会又一次讨论了强制性粮食借债的问题,布哈林同志非常清楚,中央委员会断然否决了西伯利亚同志们的相应建议(政治局3月7日的决议)<sup>327</sup>。不知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认为必须隐瞒这一点。可是否决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强制性粮食借债的建议,决不能解释为放弃对富农—投机分子施加压力的政策,特别是在粮食采购过程中。而布哈林同志的立场恰恰会导致错误地解释党的路线。

主席:现在宣布休会。

下次会上发言的是:古比雪夫同志、洛米纳泽同志、斯大林同志。

## 第十一次会议

4月22日上午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开会。古比雪夫同志发言。

古比雪夫:李可夫同志在发言中为反对批评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恐怖制度。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既然你们如此强烈地批评我们,既然你们如此尖刻地看待我们,既然你们对我们的立场做出如此断然的评价,那就拿出激烈的结论来好了。可是我想,我们是不是做出激烈的结论,以及做出什么样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三名同志。不管怎么说,我们做出这样的批评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是因为我们坚信现在反对党中央的几名同志采取的是绝对错误的、有害的、机会主义的立场。

我就从李可夫同志特别关注的问题开始:我们现在经历的是市场行情的困难,还是根深蒂固的困难,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发展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困难。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讲话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的出发点是这些困难都属固有的困难,而政治局的多数、中央委员会和党则认为这完全是供求关系方面的困难。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本末倒置,嫁祸于人,因为如果说可以指责某人被供求关系的困难所困扰,可以指责某人对待各种问题都只关注眼前利益,只注意眼前困难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李可夫同志,就是布哈林同志。

我们的困难好像只是供求关系方面的困难——李可夫同志就是这样说明我们的立场的。我想,这显然是断章取义。我觉得,没有人像斯大林同志那样鲜明地分析了我国的局势,像他那样尖锐地,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提出那样断然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办法来解决我们现有的那些困难。斯大林同志在讲到我国农业极端落后时,深刻分析了这种现象,揭示了它的原因和发生过程。政治局的多数非常坚定地强调指出,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农业的分散性,它的商品率太低,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能迅速提高农业技术。没有人像政

治局的多数以及全党和中央委员会这样明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荣誉不属于李可夫同志,也不属于布哈林同志。是布尔什维克的党,而不是现在攻击它的那些人,清醒地审视了局势,分析了局势,指出了症结所在以及治疗的方法。

现在谈谈治疗。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又是本末倒置了。情况是这样的。他认为治疗这场疾病要采用激烈的措施,他打算把这些措施安排在一项专门的两年计划中,而我们似乎把这些困难仅仅看成是供求关系方面的困难,所以看不到这些激烈措施,也不打算采取这些措施,而只想用一些临时性的措施,也就是通常说的非常措施来解决问题。我想,这里也有些嫁祸于人的味道。农业落后、它的分散性和商品率太低只能靠组织大集体农庄,设立大国营农场来解决。提出用这样激烈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国经济中的各种困难的也不是布哈林,不是李可夫,而是以政治局的多数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会。后来这个办法得到了明白清晰地、坚定不移地、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以革命的方式关注着这个问题的全党的赞同。我国现在正在集体化和建立新的大型国营农场(粮食工厂)战线上进行的这场历史性的战斗也不是由他们发起的。正因为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还有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托姆斯基同志经常被市场行情的困难及其尖锐化所困扰,而且受它的影响,所以他们才没有,也不可能立即走上为党所赞成,而由中央委员会实施的这条道路。

的确,现在攻击中央的几名同志是怎样看待用激烈的方法治理这些困难的某些环节的呢?我们以集体农庄为例。集体农庄是在农村中组织大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五年计划有力地推动了集体农庄的发展。大家知道,到五年计划结束时,我们有43%的商品粮将来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主要是来自集体农庄,也就是说,五年计划结束时的场面同现在比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说现在10%的农民(农民的最上层,包括富农和中农的最上层)占有30%的商品粮,那么到五年计划结束时,情况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由国家直接调配的农业形式将占有40%的商品粮,很明显,现在粮食采购方面的困难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如果五年计划全部得到实现的话)将被消灭,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布哈林同志是怎样对待集体农庄的呢?布哈林同志在发言时,赌咒发誓地声称他是赞成集体农庄,赞成国营农场,赞成工业化的,还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对他吹毛求疵。实际上他在思想方面对事情的描述,和托姆斯基同志在组织方面对事情的描述如出一辙。托姆斯基把自己说成是一只被一些莽汉无缘无故地用“钢针”刺痛了的兔子。布哈林同志也装出相同的一副样子。说他本来是赞成五年计划,赞成国营农场,赞成集体农庄,赞成工业化的呀,可是偏偏被“钢针”

刺痛了。还须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他滑倒了,最终陷进了右倾吗?

我来提醒布哈林同志,他在1925年关于集体农庄是怎么说的。首先说说引文。很明显,翻某个同志在某年某月说过些什么话这样的老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们大家的讲话里都经常会有错误的,可是如果这些错误一再重复,而且最终这些错误决定了他现在所采取的立场,那么这个错误就不再是偶然的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早就决定了他现在所占据的立场。1925年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

“集体农庄是组织贫农经济的自然形式。但是必须指出,直接向这样一种经济的过渡要求同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旧习惯彻底决裂,因此很难设想,集体农庄运动会包括贫农的全部广大群众。正在发展和日益巩固的中农经济,当然将组织到我们上面说过的三种主要的农业合作社,即采购、销售和信贷合作社中去。农民的基本群众、基本核心首先是中农。因此合作化的基本形式也就是相应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到社会主义之路》,第47页)

后来,也是在1925年,布哈林同志关于集体农庄说得更加肯定:“我们应当用提供贷款的办法来帮助它们(集体农庄),帮助它们购买它们所必需的东西,可是要说这就是基本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那就不对了。康庄大道要通过构成农民基本群众的那个阶层,首先就是中农,然后就是通常说的贫农。”(见小册子《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第29页)<sup>328</sup>

柯秀尔:那你前面引的是哪一本小册子?

古比雪夫:《到社会主义之路》。

这本小册子的另一个地方还这样说:

“我们有些同志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是集体农庄。我认为,这样断言是不对的。康庄大道将通过普通的合作化——销售、采购、信贷,总之是通过农业合作社。”(同上,第28页)

无须避讳,对集体农庄运动的这种态度,布哈林同志和赞同他的立场的一些同志一直保留到今天:集体农庄不是康庄大道。我已经说过,在未来的五年内,集体农庄将在我国经济中引起多大的变化。这几名同志接受了五年计划。这是不是说,他们对集体农庄运动的态度和认识同党完全一致,他们对这个运动在我国发展中的意义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呢。实际接触苏维埃机关工作的人都会说,对集体农庄运动有所轻视、对它的意义估计有所不足都明显地表现在这几名同志的全部实际工作中。在草拟1928—1929年度的控制数字时,李可夫同志向政治局建议减少对集体农庄的拨款,认为过去的拨款太多了,认为集体农庄被这些

资金噎住了。我当时支持了这项建议,从集体农庄那边得到了500万卢布用于工业。(喧闹声)这是我的错误。

乌格拉诺夫:你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谈谈吧。

古比雪夫:可是,总的说来,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错误,因为我认为,这500万卢布应当用于重工业,而李可夫同志则是出于对集体农庄运动意义的完全不同的评价。这个错误被纠正了。政治局的多数终于对集体农庄采取了这样的方针,让它们得到了比那时预计的要多的资金。结果是工业和集体农庄都有所得。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的经济政策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形成怎样的情绪。对集体农庄的蔑视态度是到处可见的、无须争辩的事实。

首先十分错误的就是按农村的阶层来划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是贫农的,而合作社是中农的。大家知道,布哈林同志还有富农的合作社窝巢。因此每个阶层都各有去处。这当然不是对农村中发生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认识,尤其不是对中农的性格、特点和本质的列宁主义的认识。布哈林同志当初绝对不是平白无故地说,中农所需要的只是使销售和采购功能合作化和社会化的合作社,而不涉及作为生产者的中农。现在到了1928年,看来他大体上还是这个方针。请看他在1928年5月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是怎样说的:

“我们应当巩固和中农的联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号‘和中农和平共处’并没有被取消,也决不会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人取消。”布哈林同志的出发点是“和中农和平共处”的口号决不会在任何时候被取消。在他看来,富农可以长入社会主义,而中农是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应当同它建立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我想,布哈林同志对我提出的指责,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还给他本人。他歪曲了我的引文,按他的说法,似乎是我认为到了共产主义时代,到了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的时代,我国的阶级斗争将会燃烧得更加旺盛。这完全是断章取义,不过,按布哈林同志本人的说法,富农长入了社会主义,中农永远存在,而且和它始终要维持一定类型的相互关系。显而易见,在这个问题上犯下最大错误的正是布哈林同志。

为了克服我国经济中业已形成的困难,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我们的工业,当然,首先从这一头来医治我国的农业,因为只有从这一头才能够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农业才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劳动社会化的道路。

布哈林同志赌咒发誓,说他赞成工业化,赞成发展工业,赞成五年计划规定的速度等等。我要对布哈林同志的赌咒发誓表示很不信任,因为当事情涉及的



不是政治上的发誓,而是实际工作时,结果就很不一样了。大家想必记得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有人已经在这里引用过他关于“砖头”的说法了;布哈林在这篇文章中的方针是把工业发展的速度、工业建设的速度局限在最薄弱的地方:既然没有砖头,就要少建设一些。而布哈林同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的这种断言在整个苏维埃机关中引起了巨大的回声。这个口号——向狭隘处看齐——成了苏维埃机关中很不相信我们的速度,甚至持讽刺态度的那些人的口号。向狭隘处看齐成了许多同志,有时甚至是领导着国民经济某个部门的同志的行动准则。这也反映到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中,它的一本杂志写道,应当向“可能性”看齐。它也反映到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老是测算基本建设计划完成的“可能性”。生活表明,尽管布哈林同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给工业化带来了有害的影响,但是党终于扭转了局势,扭转了苏维埃机关的情绪,改变了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最后我们没有压缩基本建设的计划,而是全力增加砖头的生产,并且用新建筑材料来代替砖头。

[五年计划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按布哈林同志的看法,五年计划应当稍加压缩。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讲到建筑工业材料方面应当压缩。五年计划的基础不是要降低建设速度,而是要用相应数量的砖头,不是空想的砖头,而是切实可用于建筑的砖头,来保证建设的速度。]

这就是工业化方面的一个方针,它使我们非常不相信布哈林同志真心诚意地接受了五年计划规定的速度。我们再看《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的另外一处地方。布哈林同志拿出一些未经批准的五年计划的材料(他声明说,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没有通过这份材料),断定计划规定的基本建设增长的速度是错误的:五年计划的第二年(1929—1930年)和前一年比增长39.6%,然后就降低了,而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和前一年比,不但增长的速度降低了,而且基本建设的绝对规模也降低了8.3%。布哈林同志因此而幸灾乐祸,高兴得跳起来。他揭露了超工业化和超工业派,或者像他在结尾处说的,念叨“您有什么吩咐?”的“官员们准备制订任何计划,即使是超工业化的计划,为的是明天在‘小圈子里’嘲笑我们,后天就和我们的敌人携手同行”。布哈林同志建议怎样做,以便改正这份未经批准的五年计划材料中设计的、错误的投资增长曲线呢?他建议降低第一年,不要取39.6%。他说,“1929—1930年度的速度几乎达到了40%”。可是“过多的基本建设投入并不总是能获得相应规模的实际建设,经过一段时间,它必然导致收缩业已开始的工程,对其他生产部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加剧各方面的商品匮乏,最终降低发展速度。”他接着举出论据——货币制

度、工业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相适应等等。总之,他使用了各种论据来证明1929—1930年度物资投入增长的这个39.6%是超工业派的梦想,这是无论如何都应当降下来的过度紧张的跳跃。

生活嘲笑了布哈林同志,我觉得,作为经济学家的布哈林同志现在接受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制定的五年计划时,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乌格拉诺夫:到田地里去看一看,你就不会这样夸夸其谈了。

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同志,请你先听我说,仔细听一听我说的,你就会明白了。1929—1930年度国家计委设计的基建投资增长数是多少呢?大家记得,布哈林同志由于39.6%的数字而大吃一惊。现在我向大家报告,按照国家计委批准的最乐观的计划,最高国民经济会议计划的1929—1930年度的工业投资比1928—1929年度增长40.5%。同草案比较起来,情况变了,不过这个变化是在以后的几年内增加投资。现在不是在五年计划结束时比前一年降低基本建设的投资,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都计划增加投资,不错,增加的速度比五年计划的头几年略有减缓。所以说,曾经有过一个完全错误的方案,它没有得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而被它否决了。可是布哈林同志在批评这个错误的方针时,却建议降低头几年的速度,而不是用后几年不降低速度的办法把这条投资曲线拉直。这对于布哈林同志的世界观而言是很典型的……

乌格拉诺夫:你的财政计划是怎么回事?

古比雪夫:这对于他的整个工业化方针也是很典型的。

乌格拉诺夫:你倒说说,你的财政计划有多大的缺口?

古比雪夫: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团不曾批准的材料中的欠缺是怎样弥补上的,而布哈林同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又发表了什么见解呢?这些欠缺是这样弥补的,我们保留了1928/29—1929/30年度的增长速度,增加了以后几年对我国工业的投资,我们认为,到五年计划结束时不仅降低增长的速度,而且减少了投资的绝对规模,这样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不仅要缓解这些市场行情上的困难,而且应当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十五大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路线。我们的出发点是不仅在这个五年计划内,而且在以后的五年计划内应当保证发展工业的相应速度。我们不是那种被这些困难吓得惊慌失措的、跟着行情跑的人。党在批准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五年计划,拟定这些数字时,其出发点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而这个建设不是一个五年计划就能够完成的,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以便缓解,而且部分地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中业已存在的这些困难、各种比例失调和种种矛盾。布哈林同志的方针

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由于降低了五年计划头几年的速度，我们就会阻碍工业化的速度，也就不能迅速地化解我们现有的那些困难；我们就会像一些鼠目寸光的人那样，只看到眼前的困难，而不能达到现在的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为农业服务的那种速度。国家计委，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制定这个五年计划时，都考虑到现在这几年就必须加强化学、农业机械、拖拉机、生铁、机械制造、能源等等，这样才能保证达到为农业服务所必需的规格。由于布哈林同志现在声称，他赞成五年计划，而且赌咒发誓地说，他赞成五年计划和它的速度等等，我很怀疑布哈林同志是否真诚和彻底，因为他主张的工业化的整个方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

我们现在经历的困难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国民经济之中。很明显，我们现在是在市场上看到了这些困难的尖锐化，而它们是由一定的客观环境，主要是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自然现象所决定的。

我不打算描写这些困难在市场上的尖锐化了。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这次会上也评论得不少了。困难的尖锐化要求某种经济上的机动。需要机动是为了消除这些困难。我已经讲到了那些措施，党为了消除这些深深植根于我国经济之中的主要困难，提出了措施，而且列入了五年计划，就是农业集体化、国营农场、国家工业化、尽快发展那些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等等，可是还须要机动来缓解、减少这些困难在市场上的尖锐化。这几名同志怎样看待这种机动，对于描述他们的方针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富农方面进行机动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建议，在西伯利亚、哈萨克和乌拉尔对富农施加公众影响。这种在地区上和规模上都有限的机动，对于应对国民经济中困难的尖锐化是完全必要的。

乌格拉诺夫：那往后怎么办呢？

古比雪夫：可是这种对富农的机动引起了我们同志的强烈反对和强烈抗议。

乌格拉诺夫：打击的是中农，这才是问题所在。

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同志说，打击的似乎是中农……

乌格拉诺夫：当然是中农。

古比雪夫：我想，在这个讲台上发言的许多人——瑟尔佐夫同志、奥什温采夫同志，还有其他许多同志——都证明，你们除了个别例外、个别事件之外，看不见我们党在同富农，特别是在粮食采购中进行的艰巨斗争；你们被麻醉了，被实际存在的个别过火行为蒙住了眼睛，可是从总体上说，机动当然是针对富农的，我认为这种机动是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在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不能

有别的做法,而只能用其他的阶级,用敌对的资本主义阶级,而不能用工业化,不能用我们向社会主义的迅速前进来做机动。可是这种机动却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提出了另一种机动方案,提出从国外购买粮食。

我之所以谈这个情况,为的就是说明:这几名同志的方针归根结底是宁肯牺牲工业化的利益,也不要触动富农,维持阶级之间的和平,不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阶级闹翻。

**乌格拉诺夫:**你们是舍本逐末的方针。

**古比雪夫:**现在进口粮食,这是超出了今年和今后几年计划范围的举动。现在进口粮食,这必然是对我国工业化速度的沉重打击。李可夫同志提到,可以利用信贷来获得粮食,但是第一,很奇怪,他偏偏没有核实过这个情况——究竟能不能通过信贷得到粮食,而如果他提出这样重要,而且责任重大的建议,他首先就应当核实这个情况。其次,即使可以通过信贷得到粮食,那也于事无补,因为工业化计划并不限于1929年的第一个十月。我们的五年计划还有对下一年度的考虑,假如由于进口粮食而不得不在第二年付出外汇,这就是说必须削减第二年工业化的速度和可能性。李可夫同志建议使用外汇储备来做这件事,可是外汇储备对于更加坚定可靠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是绝对必需的。按李可夫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面临困难,可以动用外汇储备来进行机动,但是不能动用富农的储备来进行机动!请大家注意,在国外购买粮食不单是抛售外汇,因为是2500万普特,需要大约5000万卢布,——这对于我国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的代价决不限于5000万卢布,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次进口粮食都立即大大降低我国的国际偿债能力。去年进口粮食导致我们损失的外汇大约等于进口粮食价值的两倍,因为许多公司立即就停止了贷款,开始观望:苏联会不会垮台,它能不能偿还贷款等等。[逐步着手偿还早先的贷款,使我国的外汇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所以说,只有那些不看重发展工业,也不看重发展农业本身的人才会轻率地提出这种机动,而不肯先试一试在我们国内可能采取的机动。

[**乌格拉诺夫:**只有不看重无产阶级的需要的那些人。]

**古比雪夫:**按照他们的意见,拿富农来机动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这是错误的方针。我只举出一件事:在须要进行机动的时候,这些同志总是拿出工业、工业化、高速度来机动,而不肯拿出与我们为敌的农村资本主义阶级来机动。可是拿出与我们为敌的农村资本主义阶级来机动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李可夫同志说,现在已经发现对富农施加公众影响来迫使他们出售粮食是行不通的。我觉得他的看法不对。乌拉尔人说,他们在3月份拿到700万

普特粮食完全是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他们拿到的粮食不会超过100万普特。哈萨克和西伯利亚也是一样。李可夫同志因为这些措施会影响到播种面积的扩大和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惊慌失措。可是那些在地方上工作,因而比李可夫同志更了解具体情况的同志们完全有把握地断言,这对于播种面积不会有丝毫影响。戈洛谢金同志说,在哈萨克这些措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持有粮食的人,主要是富农,刚开始对他们施加公众影响,他们就加紧播种,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免得把粮食交给国家。我想,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因为明年粮食会更多一些。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措施让我们多没收了一些粮食。

所以说,这种机动是正确的。它是由整个环境决定的,至于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反对这种机动,只能证明他们赞同各种各样的机动,就是不要惹恼富农。害怕惹恼富农贯穿着这几名同志的整个立场。我觉得,这种担心正是来源于在农村阶级斗争问题上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

布哈林同志对于所有或多或少涉及这个题目的同志表现出一种老爷式的倨傲。我想,布哈林同志从安德烈耶夫同志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安德烈耶夫同志在分析阶级关系方面表现了更高的理论素养,对农村中的阶级关系有更深刻的马列主义的理解,我觉得,他实际上是用谦逊的形式完全正确地给布哈林同志上了一课。布哈林同志这个伟大的理论家现在搅昏了头,在这方面脱离了列宁主义的阶级路线。

我来稍稍提醒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的。我必然会重复引用全会上已经引用过的那些话,可是我认为,这对于我下面要谈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看列宁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他说:

“剥削者的反抗在他们被推翻前就已开始,被推翻后更从两方面加剧。是斗争到底还是‘说一阵就完’(像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

**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项时代的任务(和内容)被机会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忘得一干二净。

由此产生:

阶级斗争特别(极其)残酷。

同资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相适应的新的反抗形式(阴谋+怠工+影响小资产阶级等)。”<sup>330</sup>

在另一个地方,列宁说: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

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之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像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列宁文集》,第15卷,第467页)<sup>331</sup>

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时,列宁写道: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灭(如旧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第16卷,第227页)<sup>332</sup>

同志们,请大家记住最后这段引文:“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灭,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我就我自己说几句,是关于那段遭到布哈林同志猛烈攻击的引文。当然,他把那段引文歪曲得不像样子了。我觉得,批评不实事求是是近来布哈林同志的特点。照他的说法,我谈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我认为,阶级斗争将日益激烈,而在阶级消灭了之后将具有最残酷的形式。

我说过,阶级的消亡应当,也必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列宁同志说过,消灭阶级将在阶级斗争,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进行。

我的意思是阶级不会不经过斗争就自然死亡。不能像小市民那样设想,资本主义阶级会和平地死亡,而不进行抵抗,富农的窝巢会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必然会伴随着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过程而进行,在某些场合,正像列宁说的那样,这种斗争将采取残酷的形式。

布哈林同志生吞活剥了我上面那句话,我说的是国内外与我们为敌的阶级势力将进行反抗。我指的是阶级斗争不可能局限在一国的范围之内,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不要以为,我国的富农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时候,在它走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道路的时候,不懂得它只有同国际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才能指望推翻苏维埃政权。

布哈林同志喜欢在分析局势的时候,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报。可是他忽略了政治保卫局的这些通报中的一个典型情况——凡是富农资产阶级企图组织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它总是在斗争中开始寻找同国际资产阶级的联系。大家知道,富农在企图发动反革命暴乱时,它总是企图同俄国流亡者建立联系,再通过他们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联系,搞武装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我在引文中想要强调的就是,资产阶级同我国正在发展的、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是没有国界和范围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将随着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而日益尖锐化。不能把事情设想成这样:现在帝国主义者正在搞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我们,战争威胁一直笼罩在我们头上,可是到我们把社会主义成分变成我国经济的决定性成分时,这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尖锐化的程度就会减弱了。这是让人笑掉大牙的想法。正是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时候,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更加尖锐、更加残酷,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各国资产阶级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推翻这个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就自然会变得百倍地残酷。

这些企图是否能够得逞就是另一回事了。随着我国技术的提高,消除了比例失调,我国的经济制度日益完善、灵活,从而获得更高的抗御能力,我们在同敌对阶级的搏斗中取胜的机会当然就越大。不过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会更强烈。

李可夫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我们不做出一定的结论——根本性的结论,我们就不能对这几名同志的立场做出断然的评价,可是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并不把这种逻辑用于他们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指责中央委员会的,恰恰就是认为我们滑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认为我们反对托洛茨基,却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认为我们在农村问题上的立场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立场。这种指责应当使每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得出完全明确的结论。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如果这种指责属实,如果他们相信他们自己说的话,那就应当要求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更换领导,改变政治路线。他们不敢这样做,正是因为不能证明他们说党犯了托洛茨基主义,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指责是正确的。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他们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为农村、为提高农业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干的,都应当记在他们名下。可是困难加深了,还有同困难作斗争中的个别过火行为——这些要记在中央的账上。应当最坚决地抗议这种打算,因为它歪曲了实际情况。正是党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多数坚决地提出了为农村服务,在农村转而采用劳动组织的最高级形式,加紧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今年正在采取和去年

大不相同的许多措施：新的农业税法、增加对预购合同的拨款等等。不过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攻击中央的那几名同志的主动，而是根据中央的倡议。降低中农阶层的税负也不是出于这些同志的意见，而是根据加里宁同志的倡议，是他向政治局提出来的。<sup>333</sup>今年向农村供应的农业机械和拖拉机也比去年要多些，而且也不是这些同志提出的，而是根据中央的建议。总之，现在为农村的播种运动、挑选优良品种，还有我国工业为提高农业所做的一切……

**罗济特：**统统来自“贡赋”。

**古比雪夫：**是来自“贡赋”吗？

**罗济特：**按你的说法可不就是这样吗？

**古比雪夫：**不对，不是这样的。这是根据列宁必须提高农业，改造中农和使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所以今年广泛开展的提高农业的运动无论如何都不能记在这几名同志的名下。这个运动是党发动的，是政治局的多数发动的。全党都被吸引到提高农业的工作中来了，没有一名党员，没有一个党组织会相信中央对农民实行的是军事封建剥削。所以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不敢拿出自己的结论来。可是他们却依然攻击中央。

我觉得，托姆斯基同志没能证明，他是一只被政治局的多数无缘无故地用钢针刺痛了的兔子。他不能证明这一点，因为他绕开了布哈林跑去找加米涅夫，而且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结成同盟反对中央的问题。否定这个同盟的企图是可笑的。嗨，就算不叫同盟，叫不互相攻击的协议吧，可是不互相攻击的协议也是同盟的一种独特形式，只是由于并不决定于布哈林的原因而没有发展成完整的同盟而已。他们闭口不谈布哈林跑去找加米涅夫，不谈他们自己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提出他们反党文件的进攻活动。他们闭口不谈，而且极力想用一些小事来岔开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把辞职作为对政治局和改变政治路线施加影响的手段。托姆斯基同志不能证明他是一只兔子。如果中央把托姆斯基同志连同他的伙伴们一块儿敲打，那也是正确的。

**主席：**洛米纳泽同志发言。

**洛米纳泽：**李可夫同志想把事情说成这样：分歧都是在党的总路线范围之内，没有超出它的范围，有些同志就相信了。

丘巴尔同志说，在他看来，政治局的多数和现在坚决捍卫一条特殊路线的三名同志之间只有一点点分歧。还有安德烈耶夫同志在他出色的发言结束时，做了一点不正确的声明。安德烈耶夫同志认为，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现在并不代表右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他们的立场现在，在现阶段是



右倾最完整的体现。这里指的是原则性的重大分歧,主要的分歧就是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问题,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造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看到的布哈林同志最近一次讲话是在列宁去世五周年纪念日时,它带有政治纲领的性质。这篇讲话后来出了小册子,标题是《列宁的政治遗嘱》。这篇讲话中有许多原则性的重大错误。我只谈一个错误,我先读一小段引文,它表明在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布哈林同志谈到十月革命时说,我国的“革命是同……国内阶级力量的一种特别顺利的结合相联系,而马克思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认为这是一种最有利的结合,这就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这是正确的。可是布哈林同志接着说:“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马克思早已估计到的国内势力的这种特殊结合而实行的,那么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结合(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无论如何都应当持续和保持下去;因为如果失去这种特别顺利的阶级力量的结合,那么在我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基础就要丧失。”我认为,布哈林同志这样断言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错误,由此可以产生一个完全肯定的、错误的政治方针。的确,在十月革命时期我们有过马克思认为是最顺利的力量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的结合。在十月革命时期,全体农民都反对地主阶级,可是正因如此,列宁和全党都认为十月革命是农村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城市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而行。按照列宁的说法,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始于1918年。

罗济特:布哈林也是这样说的。

洛米纳泽:这个时期阶级力量对比有了变化,阶级力量有了新的结合,不再是十月革命时期的那种特殊的结合,而是一种新的、独特的结合。我们看到贫农和雇农——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富农直接进行斗争。当年,还存在贫农委员会的时期,还可以说是中农保持中立的一个时期。后来就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阶级力量的新结合,阶级的新结合,——这就是我们同中农结成同盟的时期。这个同盟由于依靠了贫农,依靠了同富农的斗争而日益巩固。

所以说,在革命时期中我们看到了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列宁始终在研究革命进程的这种辩证法:阶级力量对比在革命进程中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在十月革命时期见到的那种阶级力量的特殊结合应当在我国保留下来作为发展社会革命的基础,那我就觉得,他是在把我们拉回到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去。

罗济特:这是断章取义!

洛米纳泽:没有什么断章取义。布哈林同志在小册子里特别着重指出,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地方。

罗济特:那是指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同中农结成同盟。

洛米纳泽:布哈林同志在讲到和农民结成同盟时,是把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没有阶级划分……

罗济特:布哈林从来没有说过,整个农村都是中农。布哈林从来不曾这样讲过。这是你凭空捏造的。

洛米纳泽:布哈林同志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提到中农。这里只是笼统地讲到农民,讲到反对地主的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对不起,这里没有讲到中农。至于布哈林同志在具体经济问题上也陷入了这个观点,不区分农村中的阶级,可以作证的是他认为贫农、中农和富农在市场上作为粮食的出售者,其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布哈林同志断言,在市场上,粮食的生产者和出售者,贫农、中农和富农,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对于价格高低都是一样关心的。这是他在这里,在全会上发言时说的。这是骇人听闻的理论错误,而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危险的方针。贫农不仅出售粮食,而且也购买粮食。从纯粹市场的角度看,单凭这一点,贫农作为粮食的出售者和购买者就不可能和富农有共同利益。另外在消费方面,很大一部分贫农,还有中农,不仅出售粮食,而且购买粮食。所以即便从纯粹市场的观点看,这里也不可能有贫农、中农和富农的共同利益。这个说法不对,还因为它被实践驳斥了。最近两年的实践中,贫农和中农出售给我们粮食是按我们的价格,而以富农为首的富裕上层则进行抵制,破坏规定的粮价。这就是从市场的观点看,农村这些阶层之间的主要差别。这个差别是阶级差别。布哈林同志是在用一把尺子去度量整个农民,他试图引用十月革命时期阶级力量的特殊结合来加以证明。

与此同时,我还想就李可夫同志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在市场上没有原则性差别的新理论说几句。原来从出售粮食的观点看,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差别。我觉得,李可夫同志的这个理论发现是令人吃惊的无知,因为人人都明白,市场关系和一般交换关系都是从生产关系派生出来的,而作为农村中劳动组织的社会主义新形式的集体农庄和个体私有农户之间的生产关系是有重大的原则差别的。即使从纯粹市场关系的角度看,集体农庄和个体私有农户之间的差别也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在集体农庄制度下,我们在市场上不是两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由统一的计划和领导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经济整体。

的内部关系。集体农庄是国家—公社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成分经济体制的一部分。

在改造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上,布哈林同志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布哈林同志(在同加米涅夫谈话时,以及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时)直截了当地宣称,断言阶级斗争尖锐化仿佛是改造时期的规律,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样一来,布哈林同志(他的确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认为,我们现在就应当逐渐削弱阶级斗争,而这是只有在阶级消亡时期才可能发生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我国,首先就是从小个体农户中生长出来的资本家阶级还在生长。

我们暂时把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探讨放在一边。我来引用一点材料。《农业报》<sup>334</sup>发表了克里茨曼的一篇文章,分析了1924—1927年间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文章是这样说的:居民中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阶层得到正在成长的小资产阶级的补充,在这几年中增加了5.5%,其中农业资产阶级增加了17%。整个国民经济中资产阶级的比重仍旧很大。这些阶层的收入在1924—1925年间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0.4%,在1926—1927年间占10.8%,而农业资产阶级的收入占农村人口总收入的比重在1924—1925年间是9.7%,而在1927年是11%。

小商品经济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俄罗斯对资本主义比对共产主义有更为牢固的经济基础。我们没有拔掉资本主义的老根,没有破坏国内敌人的根基、基础。”

这些物质经济前提就为阶级斗争尖锐化创造了条件。改造时期意味着我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加强了、加紧了资本主义的进攻,更坚决地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基。空前尖锐地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两条道路问题。因此,在我国的经济成分中还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还在增长(虽然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超过了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可是这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成分增长的事实)、我国的经济政策又转向坚决排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展农业的两条道路的冲突非常尖锐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尖锐化了。阶级斗争尖锐化是改造时期的规律,它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改造的初期。

布哈林同志想用开玩笑的办法来岔开这个问题,他说:“难道我们是要带着大规模开展的阶级斗争走向社会主义,尽管到了社会主义的门槛旁时,它会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可是魔棒突然那么一转,阶级斗争就立即停止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虚假的。只要我们还没有占领农业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命脉,只要社

会主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不具有决定性的优势,阶级斗争就会日益尖锐。在这之后阶级的消亡就来到了,与此同时阶级斗争也会缓和下去。这些原则分歧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两条路线是完全对立的,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喊声:对呀。

洛米纳泽:在发展农业的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上,应当非常明确而清晰地确定,我们党的立场和这三名同志的立场有什么差别。这里的差别是很深刻而不可逾越的。

布哈林同志关于农户怎样走向社会主义是怎样设想的呢?米高扬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已经引了布哈林同志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他断定集体农庄不是发展农业,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手头也有这样的材料,我就不来引证了,布哈林同志在这些材料中声称,过高估计集体农庄的作用是早先战时共产主义幻想的反映。可是布哈林同志是怎样设想发展农业,走向社会主义的呢?我来读他1925年报告中的一小段话。直到在这次全会上发言时,布哈林同志仍然坚持这些话是正确的。布哈林说了如下的一些话:

“由于我们将不在,说得粗俗一点,强盗分赃的基础上,而在提高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化、税收制度等等在经济上壮大起来,由于我们将在经济上提高贫农和中农,所以我们会使贫农和中农的生活水平日益接近较为富裕的农户;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更高的阶段,使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农民逐渐消失。”

这么说来,贫农户和中农户提高到富裕户的水平不是以集体化为基础,而是以发展个体户为基础,然后,在全体贫农和中农都达到富裕上层水平之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差别才开始消失。

洛米纳泽:我们按照这种机会主义的立场,永远也不可能打破托洛茨基主义,我们打破托洛茨基主义是根据和这种机会主义立场毫无共同之处的党的正确路线。

因此对于布哈林同志同意总路线的声明也应当这样看待,因为总路线是体现在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中的。五年计划一方面是数量上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在质量上也是有规定性的。布哈林同志同意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规定的那些数字,可是同意数量指标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种同意是廉价的,而且并不赋予什么责任。五年计划规定的各种限额只有在执行五年计划应当包含的一定政策时,才有可能实现,可是恰恰在政策问题上我们有巨大的严重分歧。

我举一个李可夫同志提得十分模糊的问题为例,这就是在五年计划之外,另

搞一个特别的、发展农业的两年行动计划问题。李可夫同志在解释自己的建议时说,这是布哈林同志对农户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这个设想对于他今天的立场仍然有效。布哈林同志既然有这样的方针,他做出这样的结论就不奇怪了:“正确地解决问题应当这样来证明,富裕户也必须发展,以便帮助贫农和中农。”我觉得,这比弗鲁姆金的立场走得更远一些了。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是什么偶然地、稍稍地离开了党的路线。对于党的路线来说,它是一条对立的路线、一个对立的方针。布哈林同志在1925年发挥了这些观点。极大地帮助他发挥这些观点的是他的所谓“学派”,很大一部分是他亲密的学生。我们的确在近年来的著作中、文章中、《布尔什维克》杂志上都曾经见到过,现在也能够见到这种机会主义理论的某种痕迹。当然,党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同意过布哈林同志的见解,和他的方针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布哈林同志本人在很不一贯的表述中,有保留地放弃了一些极端的口号,如“发财吧”,可是今天,由于尖锐地提出了在发展农业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中做出抉择的问题,反对布哈林及其“学派”的这些思想遗产的斗争就是特别必要的了。

**罗济特:**我们是在列宁的这份遗产的基础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

**洛米纳泽:**我们面临着长期的困难,短期内是消除不了的,所以才需要两年计划,以便消除这些困难。让人闹不明白的是:既然在五年计划里已经规定了提高农业的各种措施,还要这个特殊的两年计划干什么。李可夫同志断言,他和政治局多数的实际分歧可以归结为:我国农业的困难是长期性的呢,还是短期的、市场供应关系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党内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分歧。党内没有人说过农业的落后是短暂的、供应关系上的现象,是一两年的事情。五年计划恰恰规定了长期性的措施来恢复农业。这就是发展集体农庄,发展国营农场,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提高农业的指令,五年计划发展农业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等等的方针。

这都是解决发展农业任务的长期性措施。除了五年计划规定的这些措施之外,还能有什么恢复农业的其他计划、其他途径呢?两年计划、一年计划,还是其他什么计划吗?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讲了许多各种机动的可能性,姑且把它们称做右的和左的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叫法是不对的。总的说来,可以也必须采取机动,所以我们在十分必要的时候,就采取了机动。可是李可夫同志昨天讲到了“右的”机动的可能性,而且给右加了括号,因为是用于能够帮助我们跳出今年困境的两年计划。我觉得,两年计划建议的内容恰好可以归结为在最近的两年

中,将资金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个体农户之间进行有利于个体农户的再分配,归结为用玩弄市场上的自由价格的把戏,按布哈林的方式解决粮食采购任务,——布哈林同志关于按地区定价和按季度定价的建议不可能有别的意思。我们在这里的确看到了搞垮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企图,放弃党现在执行的农业方针,而把重点放在发展个体农户的企图。归根到底,两年计划不可能有其他含义,无非是实行弗鲁姆金的口号——不要妨碍富农的发展。李可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内容。

下面谈一谈粮食问题。在今天的所有实际问题中,这是最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问题。布哈林同志按地区和按季度定价的建议意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完全用市场的办法来采购粮食,如果采购不成,那就进口粮食。少量进口粮食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可是如果把大量进口粮食作为一条出路、一种制度,那就会搞垮五年计划,搞垮工业化的路线。布哈林同志认为全部问题在于价格。我不说进一步提高粮价将会使国民收入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配情况恶化。即使是现在,我国的价格比也是对工人阶级不利的。这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问题不单单在这儿。问题在于富农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争取粮食的高价;他要争取机器,争取土地租赁,争取自由雇用劳动力,争取贷款,争取政治权利,而在这个斗争中他使用的最尖锐的武器就是他手中的余粮。《农业报》刊登过国家计委一名工作人员沃尔夫的文章。他说,农村中10%的富裕农户手里握有40%的商品粮。富农和富裕户就是利用这40%的商品余粮来争取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问题不仅在于提高价格。我们怎样才能从富农手里拿到粮食?对此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两年的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办法我们从富农和富裕户那里是拿不到粮食的,我们不能不采用对富农施加公众压力的办法,发动贫农和中农起来反对富农,采用社会强制的办法。社会强制的办法包括这样一些措施,如抵制,以及贫农和中农群众对富农施加公众压力的许多措施。我认为,用不着争论现在许多地方采用的那些措施是不是非常措施。如果以为,由于不交出粮食而采用第107条、处以五倍罚款作为捐献等等可以列入采购的正常措施,那就很可笑了。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非一般的。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这些非常措施,那仅仅是由于我们耽误了组织公众压力,发动贫农和中农阶层反对富农,组织对富农的社会强制措施,以求取得粮食。党的政策不是要把非常措施变成制度,但是为了明年能够取消它们,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采取组织公众压力和社会强制的方针,因为农民自身也在强制富农交出粮食。显而易见的是,明年我们不会仅仅依靠市场的办法来采购必需数量的粮食。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更广泛地组织贫农。我们现在采用的组织贫农小组的办法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全区、全州、全省范围内更广泛地把贫农组织起来。这是根本问题,是粮食采购问题的出路所在。

我再就国际问题的分歧说两句。我还有多少时间?同志们,我只剩下四分钟了。我请求再给我十分钟。

喊声:延长点!给他!

主席:谁赞成延长?谁反对?少数。十分钟!

洛米纳泽:那四分钟不算在内!

在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很小的。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回避了这些问题。早在党的十五大时布哈林同志就断言,第一,在共产国际内右倾危险没有增长;第二,现在的机会主义仅限于托洛茨基主义,除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外,没有其他右倾,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右倾机会主义潮流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否定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这也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犯的严重错误。他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和布哈林站在一起。只是在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事后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并且莫名其妙地攻击了我和沙茨金之后,我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驳他。

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布哈林同志在政治报告中,后来又在他提交给我们党的代表团的提纲初稿中,毫无疑问对资本主义的稳定做了过高的估计。按照布哈林的看法,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的巩固时期。布哈林同志那时认为,直到今天还是认为,只有同新一轮战争联系在一起,新的革命才可能发生。在布哈林同志的整个方针中,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的增长所占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就这个问题和布哈林同志进行过争论,联共代表团彻底否决了布哈林同志的这个错误方针。

斯克雷普尼克:可是你提出的否定第三时期也没有通过。

洛米纳泽:否定第三时期也没有通过。可是争论的并不是字面。第三时期是我们党和共产国际都承认的,不过是作为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时期,作为资本主义的稳定进一步动摇的时期。

关于布哈林同志在右倾和调和分子问题上的立场,这里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就不说了。总之,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看到两条路线、两种政策。这些分歧已经超出了党的总路线的范围。这是两条路线,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阶级内容。我想在这里提出这种右倾的危险问题。

托洛茨基主义也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方向、小资产阶级潮流。可是它披着左

的外衣,用革命的词句做掩护。布哈林支持托洛茨基主义来反对我们,是因为它动摇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国际。

至于右倾,它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更坦率、更直接的表现。右倾以更坦率、更直接的形式反映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它的情绪和要求。请看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他们说我们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这只不过是把与我们敌对的整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情绪用党内分歧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就在这里,在这方面,右倾和无产阶级所处的敌对环境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直接结合,或者说连接(我们不想卷进语文学的争论中去)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从理论上揭露它,揭露它的政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在实际工作中反右倾斗争的任务非常尖锐。认为党内的右倾仅仅限于三名政治局委员: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右倾的代表人物,而在党内的其他地方,在所有的党委会内,所有地区内都没有右倾代表人物,因为我们的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这样看是十分可笑的。右倾也像任何一种机会主义倾向一样,是有伪装的,它并没有确定的、明显的形式。它善于随机应变,经常用一致通过的决议为掩护。

如果认为,既然许多党组织都一致通过了决议,那审查和消除右倾就仅仅限于政治局,其他地方就不用搞了,——这是糊涂透顶的看法。我们有许多同志赞成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观点。在党内必须揭露他们的伪装。尤其要紧的是揭露实际工作中的右倾。我们知道农村中有许多令人发指的歪曲阶级路线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许多党组织中官僚主义的胡作非为也不少。你们要把党内的官僚主义分子抓出来,我们必须把这些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在即将开始的清党中通通清除掉,因为用通常的办法我们已经不能摆脱他们了。如果党内右倾的基础是这些蜕化变质分子,那么清党当然对于反右倾斗争很有帮助,可是它仍旧是不够的。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也反对这种以一致通过的决议为掩护的、伪装的右倾。这个斗争是必要的,它是我们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指责党犯了托洛茨基主义是可笑的。我们党的政策是独立的政策。党的路线是它自己独立制定的,不管托洛茨基分子说什么,也不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什么,——这是它自己独特的路线。由于我们的路线是独立的,我们不能采用某些同志采用的路线;当托洛茨基分子提出某种论断时,我们似乎就必须提出完全相反的论断;或者当右倾分子提出一个提纲时,我们就必须提出绝对相反的提纲。托洛茨基分子说好,我们一定要说坏;右倾分子说是,我们必须说否。无论



是对托洛茨基,还是对右倾,我们都不能走这条路,当然,托洛茨基分子别无选择,只能指责我们党右倾,而右倾分子则指责党犯了托洛茨基主义。我认为这种指责是可笑而荒唐的。党自然会坚决抛弃这种指责。

再看党内民主问题。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都声称同一件事——我们党内缺乏民主,党在培植官僚主义等等。我们坚决拒绝这种指责。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党内民主开展得不够,不过党正在为党内民主而奋斗。为了回答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拨,就声称我们的党内民主开展得十分广泛而深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任务。这样说是可笑的,正如我们现在不能说我们的自我批评开展得很充分,无可挑剔一样。我们有许多事例表明,甚至最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如巴库的党组织,也有破坏党内民主的情况(阿尔塔克等同志的案件)<sup>335</sup>。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这个案件非常了解。连巴库的无产阶级组织内都发生了粗暴破坏党内民主的事件,其他组织内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有不少党员由于担心“犯错误”而害怕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发扬党内民主不仅不排斥反对右倾的斗争,却反而是它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否定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无产阶级自我批评的任务,我们就只会缓和右倾和“左”倾的处境。

同志们,我觉得,安德烈耶夫同志完全正确地提出,早在十一月全会时就应当提出政治局内有分歧的问题了。瑟尔佐夫同志也是对的,他说,党的领导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仿佛有双重痕迹:一方面是非常正确的、阶级立场坚定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含糊糊、吞吞吐吐。我觉得,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内展开的这场斗争是我们稍稍推迟了安排对富农施加影响的社会措施,以求取得粮食的原因之一。中央现在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决定是很大的成绩。我们面对富农没有畏怯,我们接受挑战,党和工人阶级一起当然能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可是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内经常的反对无疑使党的实际工作带上了双重的痕迹。假如把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其余成员之间如此重大的政治分歧早一些提交中央全会讨论,假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一月联席全会就这些分歧表了态,那本来可能会好得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这几名右倾同志在他们现在遵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最后一个问题——我马上就结束发言了——是宗派斗争的危险性。布哈林同志声称,不会有新的反对派,也不会有新的宗派。他这样说是出自真心,我相信他的话。他相信不会搞宗派斗争。可是我们知道,宗派斗争是由政治分歧派生出来的。当政治分歧巨大而深刻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时,宗派斗争就是无法避

免的了。也许明天困难会更加尖锐化,那时今天还真心实意地声称不搞宗派斗争的布哈林同志就会说:“现在时候到了,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共产党员的责任要求我们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结果宗派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党对此应当有所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政治局领导一致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内不能容忍党的政策经常遭到抵制,党的主要决议受到阻挠。这个问题应当得到多少是彻底的解决,当然,问题的出路不仅仅是组织处理。必须首先对这些同志的立场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评价。这样就能保证党的集体领导。我们需要党的集体领导,可是只有在统一的、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党的集体领导。

主席: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发言。

喊声:休息。

主席:我建议先听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发言,然后再休息。(通过)

克鲁普斯卡娅:我们同时讨论的有三个问题:对目前局势的估计问题、党的路线问题和政治局内部的冲突问题。

第一个问题虽然没有列在议程上,可是它很自然地在大家的发言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目前的局势和我们前几年经历过的局面确实不同。在党的十一大<sup>336</sup>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呢?一方面是大工业,另一方面是大集体农业。如果说我们在这七年里大力建设了大工业,那么大集体农业的问题只是在党的十五大以后才被认真地提了出来。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问题已经由决议、决定转到了贯彻实行。你们现在同农民谈话的时候,他们首先就会讲起集体农庄和公社,而且总是非常热情。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更多地是从心理变化,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的。几年以前,三年以前吧,中农有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他看到他当时处境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个体经济,变成一个富裕农民,而现在你们在谈话里听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况。现在许多人,首先就是先进的积极分子,看到的是另一种出路:先进的积极分子看到的出路是集体农庄。当然,这只是开了个头,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不能夸口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

农民已经在实践中看到集体农庄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公社能够给他带来什么,——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如果说结合,那么哪一种结合更深刻一些呢,同依旧带着个体农民心理的中农的结合,还是同公社社员、同集体农庄庄员的结合呢?我想,工人阶级同公社社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结合当然比曾经有过的同农

民小私有者的结合要深刻得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在最后几篇文章中写道，现在主要的是应当注意使贫农户和中农户摆脱贫困。道路就是搞合作社。他说的不是合作化，而正是合作社，也就是把各种经济上的创举联合起来。我们在工作中逐渐接近了更深刻的联合，更深刻的合作社，而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已经开始实行集体农庄、公社了。农村经济的全部基础正在改变着。这当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这对工人阶级也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现在广泛的农村阶层正在融入工人阶级的干部队伍。这些来自农村，但仍然带有小私有者情调的干部正在城市里学习许多东西：先进的那一部分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涉及公社和集体农庄的一切事情。看得出来，他们正在模模糊糊地酝酿着这个思想。前不久，有一个农妇给我写信：“我们现在连公社这个字都不会说了，大家都在嚷嚷，可是只要我一看到这些地界，我就见不得这些地界。”请看，许多人看见地界就受不了，这说明农民正在紧张地思考怎样改变经营。这当然是很大的进步，它会影响整个工作，自然也影响工会的工作。

我主要是从一个方面，就是文化方面了解工会的工作。我知道，像迄今为止那样做是无论如何都不行的，为了实现结合，就必须进行深入的工作，把工会的文化工作同全国的文化工作结合起来。我觉得，托姆斯基同志在这方面对于现在必需的那种改进考虑得不够。在人们批评工会工作的时候，问题不在于某人对某人不信任。我想，问题在于工会的工作应当这样来安排，使它有助于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结合，而且不断巩固这个结合。在集体农庄的建设中工会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是关于对形势的评价。

现在谈谈中央的路线，就是大家讲得很多的问题。我想，既然中央委员会能够实现这些公社，实现集体农庄的建设，既然能够支持这样做，那这个中央委员会执行的路线就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在个别问题上可能有失误，农民有句俗话：不种地的人就没有罪过，——所以当然不能说一切都好，从来就不曾有过任何错误。环境非常复杂，在某些地方自然可能会有过火行为。一切都应当根据统计。

可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有那么多分散的小农户，要做好统计是很复杂的事，统计里自然可能有遗漏。

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讲到，调查数字在很短的时间内是怎样改变的。统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缺乏资料时就可能出错，因为有时候不得不盲目地做出结论。

大家都承认,去年采取非常措施是必要的。现在大家都承认,应当把非常措施限制在最低限度。现在应当把非常措施限制在最低限度,因为在执行非常措施时,往往把阶级的牌局搞混淆了。我不久以前收到一封匿名信,显然是一个很殷实的农民写的:在布古鲁斯兰区,有一个富农被抹了烟油子在村里游街。恰好那里有一个我们的巡视员,他是不会撒谎的。他调查了这件事,报告说内幕是这样的:有两个富农在互相竞争,于是其中的一个就捣了鬼,让另一个丢了脸。(笑声)这是把牌局搅乱了。

有人在这里报告说,公社的拖拉机被没收了,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在尽量扩大、增加公社和集体农庄,所以我们不能对公社和集体农庄采取对小农户那样的措施。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必须非常注意,某些措施对公社和集体农庄建设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事。公社老老实实在地交出了该交的粮食;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以前公社对周围的农民有很大的影响,在信贷方面执行一定的政策,使贫农摆脱富农的影响。可是由于对公社提出了条件——立即交出粮食,结果贫农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富农的影响了。这样一来就只好在另一种基础上进行斗争了。

现在出现了一些非常复杂的现象,地方上的同志应当明确地看到,非常措施是在生活不好的时候采用的,生活好了就不用采取非常措施了。必须监督我们的基层机关,因为过去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采用非常措施,而现在有些地方同志弄不明白我们党的总政策,往往还是按老办法行事,——“哎,非常措施,就这么办吧。”不仅是政治局,而且地方上的同志都应当好好地监督自己的机关,反对过火行为。那么,在文化水平差异很大的我们国家出现这些过火行为,是不是说明我们党的路线错了呢?这说明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它说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大转变时期必然有很多困难。安德烈耶夫同志十分正确地谈到,也许应当早一点着手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过这也取决于可能性,不仅仅在于是否及时考虑到了,是否及时预料到了,而在于有没有物质能力,在于是否不得不关注其他问题。

我们现在经历着粮食危机,它沉重地影响着我国,可是它的起因是什么呢?它是不是中央的政策造成的呢?或许它是由于一些情况使我们没有早一些转向大经济呢?粮食危机是不是李可夫同志说的那些原因造成的,由于小农户和中农户的“文化衰退”造成的呢?我想,粮食危机不是中央错误路线的结果,也不是由于错误地估计了目前的局势,而是因为我们靠小农和小小农是走不了多远的。

喊声：正确。

克鲁普斯卡娅：今天是耕地，明天是牲口，后天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小农户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怪事的。要避免这些只有一条路，就是搞大农业。

我讲最后一个问题——党内状况。我想，托洛茨基分子公布了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的谈话只有一个目的：给党把坑挖得更深一些，指望我们这些共产党员，由于个人的气愤，由于个人的恼怒而背离我们应当采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历来采取的立场，就是在权衡各种冲突、各种内部纠纷时，只能从党的利益出发。在这里各种无关痛痒的相互指责当然只能对党的敌人有利，对托洛茨基分子有利。所以我想，无论哪一方对方提出致命的指责都是完全多余的。说到“贡赋”，每一个共产党员都知道我们说的贡赋是什么意思。用词也许是不恰当的，可是它的意思不是要把农民视为被征服的民族，而是说，没有所有劳动者做出的一定牺牲，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成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被称为带括号的“右派”的人，也不应当提出致命的指责。我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固定的纲领，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乌格拉诺夫同志都在这里发了言。难道他们说的都相同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纲领。

扎东斯基：他们有共同的宣言。

克鲁普斯卡娅：宣言也可能是一时生气写出来的，这样的宣言可以取消。

扎东斯基：就应当这样做。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们，大家别着急，让我把我的看法说完。任何问题在各种集体里面是怎样解决的呢？在任何一个集体里，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唱一个调子，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说一样的话。在集体里面，听取和共同意见有些差别的意见往往是很重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谈到托姆斯基。我的引文可能不很准确，可是意思是不会错的。他说：“托姆斯基有时候说得不清不楚，可是当他开始叫喊的时候，那他之所以叫喊，是因为要反映工会群众的某种情绪。”我想，党应当尽可能充分地听取党内的情绪，这对于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很重要的。即使有人说了什么错话，也不能立即就指责他是什么倾向，甚至记录在案。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得对：“起初，在我们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那时争论的是最主要的问题。而现在主要的基础是相当大的，所以现在应当努力把分歧缩小到最低限度。”我想，现在应当想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话。布哈林为什么要去找加米涅夫？因为和他共事多年，他一气之下就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很多话都不对。现在重要的是从党的利益出发：应当把布哈林和托姆斯

基赶出政治局吗？我想，为了事业的利益不应当这样做。可是我想，同样为了事业的利益，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也不能那样做，说他们拒绝工作。

**斯图鲁阿：**那他们应当怎样做呢？

**克鲁普斯卡娅：**不能这样做，不能像托姆斯基和布哈林那样说，我们不工作了。这是在制造困难。其他干部是怎样工作的呢？你们以为大家都那么容易吗？无论什么地方，任何一个集体都那么容易工作吗？可是大家都在工作。在这方面既然有决议，那就应当执行决议。

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得很对，可是我想，不能要求发表一个放弃的声明：“我，乌里耶·阿考斯塔<sup>337</sup>，声明放弃如此等等”，我某某年说过什么错话，对什么问题估计不正确等等。从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指的不是根本问题，而是对形势的估计。生活会帮助消除这些倾向的。我们应当找到这样的出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也应当放弃拒绝工作，结束胡闹。应当在政治局工作，因为现在是最紧要的时刻。

(休息后)

**主席(鲁祖塔克)：**继续开会。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们，布哈林同志这样谈问题，仿佛什么特别的事也不曾发生：没有发表过三个人的声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不是什么反对派，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同中央委员会吵架，不过是布哈林说说自己的意见，然后就回家老老实实地待着。我认为，布哈林这样说是完全没有什么诚意的。一个人在这里讲了三个小时，对党提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指责，认为党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就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却居然说我不想同党吵架，那就不对了。假如他看出党的路线不对，可是却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那他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呢？

在党的十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为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做的副报告中也是一开始就声明，他的小组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派，他也根本不打算和中央吵架等等。可是后来结果怎样是大家都记得的。我们都记得，当李可夫同志的讲话以《新反对派》为标题发表时，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是怎样火冒三丈地表示抗议的。那时季诺维也夫喊道：我们算什么新反对派呀！我想，我们现在看到了反对派。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今天的立场是反对中央及其政治局的立场。这个反对派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呢？对此不妨这样回答：要是说一个首尾连贯的、完整无缺的纲领，那今天还没有。也

许正因如此,我们现在往往就某个词的含义争论不休。可是过去也有这种情况。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在党的十四大以前,或者在十四大上是不是就有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呢?据我所知,好像是没有的。至少像十五大以前那样的政治纲领他们是没的。可是这是不是说,在十四大上季诺维也夫集团对党而言不构成反对派呢?完全不是,而且应当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坦率地警告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而且是以最坚决、最严肃的形式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放弃他们虚伪的立场,他们这个反对派的下场就会同几年前的反对派一样不光彩,一样可耻。

臧声:说得对!

奥尔忠尼启则:下面我谈一谈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把问题归结为我们缺乏集体领导,全部不幸的根源就在于此。不消说,这个指责是很严重的;既然我们缺乏集体领导,那就是说,我们没有政治局,没有中央委员会。事情是这样吗?托姆斯基同志举出了什么证据来证明这项严厉的指责呢?你们就是把托姆斯基同志在这次联席全会上的发言翻来覆去地读上十遍,你们也只能看到一件“破坏”集体领导的事情。就是亚戈达同志在1929年4月没有及时把阿扎尔暴动通知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认为这就“破坏”了集体领导。我在这件事上不会替亚戈达同志辩护。他有责任及时把阿扎尔暴动通知李可夫同志。[何况在阿扎尔暴动中,阿扎尔人民委员会主席落入暴徒手中,行为十分可恶,而李可夫作为全苏人民委员会主席,对自己同行的行为毫不知情。]可以为这件事生气发火,可以责骂亚戈达同志,可是这同我们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有什么关系呢?请问,这有什么关系?最后,就算这是我们领导的一大过失,就算它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我们缺乏集体领导,那也不过是前天的事,而分歧却是早已开始了。昨天有人列举了事实,说明分歧早在大约一年前就开始了。谁都清楚,阿扎尔暴动帮不了什么忙。可是我们政治局的领导实际上是怎样实行的呢?在地方上,你们在拟定边疆区党委主席团的会议日程时,通常只有几名书记参加。至少我本人两年半以前在外高加索工作时是这样做的。

臧声:到处都是一样的。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这里是怎样做的呢?为了确定政治局星期四的会议议程,星期一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三名代表就要开一次会。这次会上确定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并就所有的重要问题事先交换意见。在拟定议程时,如果有人提出某个问题准备不够充分,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应当取消时,这个问题就取消了。我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半了,我不记得有过

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是重要的问题不是集体决定的。没有一项重要的干部任免，或者干部调动是政治局星期一的会议不曾讨论过的。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乌格拉诺夫同志能不能举出哪怕一件事来推翻我的说法呢；请他们说说，斯大林同志或者莫洛托夫同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单独决定过哪怕是一个多少是重要的问题。我敢断定，他们举不出这样的事实。最后，为什么托姆斯基同志要提出在1929年4月份缺乏集体领导的指责呢？为什么在这之前没有说过呢？我们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也曾经抱怨过，说我们破坏了集体领导，托姆斯基同志在这方面不过是重复他们的抱怨而已，可是我们当时也知道这种抱怨的内情。托姆斯基同志指责莫洛托夫同志去年3月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工业财务计划时，强烈地反对李可夫同志，他（托姆斯基）认为分歧就是从政治局的这次会议开始的。首先，我就起草工业财务计划和预算说两句话。大家知道，我国的预算现在是个大数目——七十多个亿。是谁草拟的呢？是政治局、书记处、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吗？决定政策不是看讲话，而是要看这几十个亿用在什么地方，这是实际的花钱政治。所以我想问一问李可夫同志，——他好像今天没有出席会议，不过托姆斯基同志在场，他很了解情况，请他说说，预算和这几十个亿的用途是在谁的领导下决定的？让他说说，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或是书记处的其他什么人是否有过一次反对了人民委员会批准的预算？我可以断定，这么多年来，政治局不曾否决过一次人民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完全是由人民委员会审核制定的，然后才提交政治局。我在这里要纠正一下托姆斯基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当时反对的不是李可夫同志，而是国家计委和古比雪夫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当时的指责只是说用于建设新工厂的资金太少了，他要求增加对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厂的拨款，加快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前期工作，加快刻赤工厂的建设和尽快结束特尔别斯地区的勘探。这次会上，我和米高扬同志就地方工业和共和国工业的关系问题同莫洛托夫同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莫洛托夫同志不曾讲过一句反对李可夫同志的话，可是李可夫同志却把一切都记在自己名下，显然，他认为既然批评了工业财务计划，那就是反对他，反对人民委员会，因为工业财务计划虽然不是他起草的，可是是他手下的古比雪夫和国家计委起草的。我想，既然工业财务计划和预算都是不能批评的，更不能修改的，那就不必把它们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了。

莫洛托夫同志是否要求彻底修改预算和工业财务计划呢？完全不是。由于他的批评，只好专门为上述工厂增加2700万拨款。这是出自60亿的预算，而且



新增的2700万是一致通过的。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参加确定这2700万并寻找这笔资金的委员会。托姆斯基同志,请你说说,这有什么特别的吗?为什么你认为这就是分歧的开始呢?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不是一再声称,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我们应当完全自由地讨论任何问题,而且互相批评吗。难道你们要求的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只是举手赞成吗?如果要找分歧的开始,那么在我看来,应当找一找更为严肃的问题,也就是沙赫特事件<sup>338</sup>和粮食采购。托姆斯基同志不止一次说过,政治局委员之间的一些齟齬就是从沙赫特事件开始的。

米高扬:那场争论是很厉害的。

臧声:那是一场严重的齟齬。

奥尔忠尼启则:沙赫特事件给我们党提出了一项新任务——建立一支来自工人的专家干部队伍,这个问题是斯大林同志十分明确地提出来的。通过了相应的号召书<sup>339</sup>。号召书是通过了,可是我们大家都是在夜里被紧急叫去开政治局会议的,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到了之后,李可夫同志拿出一整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摘录,说没有旧专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当然,谁也不会争论应不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旧专家,谁也不会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必须迫使资产阶级旧专家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观点,可是大家指出,沙赫特事件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来自工人的新专家干部的问题。指出了培养新专家干部的问题应当有新的提法;在这里提出了派1000名领助学金的学生的想法<sup>340</sup>。这次会议批准了号召书就结束了,可是托姆斯基同志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谈到这次会议。所以说,沙赫特事件在培养干部方面向党提出了新任务,而怎样解决这项任务在政治局委员中出现了一些分歧。

乌格拉诺夫:谢尔戈同志,问题在于评价。

奥尔忠尼启则:完全正确,乌格拉诺夫同志,你有什么样的评价,就有什么样的结论。

乌格拉诺夫:顿巴斯没有人能够设计矿井,这就是一个结论。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这并不是说,那些不是替苏维埃政权设计矿井,而是为了解除顿巴斯的武装的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混蛋、叛徒,——不是说这些人可以留在顿巴斯,哪怕是留一天。

乌格拉诺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赞成枪毙这些人,可是你反对。

奥尔忠尼启则:不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讨论谁更嗜血一些。在沃伊科夫被杀害之后,我本人曾经要求大规模地处决,可是后来我相信,假如我们当初

连那20个人都不枪毙,也不至于就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sup>341</sup>。我知道乌格拉诺夫同志以枪毙见长,可是在必要时,我也并不是吃素的,不过在这个讲台上也没有必要拿这个来炫耀自己。

所以说,第一次齟齬的出现是由于沙赫特事件。沙赫特事件向党提出了对待资产阶级专家更尖锐的态度问题——我们的经济干部必须掌握技术,他们不能做战争时期的坏政委,而应当是确实熟悉委托给他们的东西的主人。沙赫特事件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从青年工人中培养新干部的问题。沙赫特事件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怎样安排我国的技术学校的问题。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围绕着这些问题发生了第一次小小的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1927年底发生的粮食危机。党的十五大会议期间就看得很清楚了,粮食采购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苏维埃机关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让我感到羞愧的是,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听取了格罗曼和维诺格拉茨基的报告,可是不曾采取任何坚决措施。中央看到我们是在滑向危机,就坚决地提出了粮食采购问题。莫洛托夫同志被派到乌克兰去,斯大林同志去了西伯利亚,乌格拉诺夫同志去了伏尔加流域。还有其他许多同志去了其他地方。围绕着粮食采购问题全党都动员起来了。我在这里要提一下我们的乌格拉诺夫。他在这里大谈特谈非常措施,可是他从伏尔加流域回来之后,却起劲地宣扬自己的粮食采购工作。他说:斯大林在西伯利亚对富农使用了第107条,可是我没有使用任何法律条款就卡住了农民的脖子。(笑声)

**乌格拉诺夫:**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把我说成是胆小鬼呢?

**奥尔忠尼启则:**不对,没有人把你说成是胆小鬼,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有一部分人不喜欢党在粮食采购中采取的那些办法,他们倾向于从国外进口几千万普特粮食。他们认为,采取非常措施会导致同农民闹翻,破坏联盟。他们看不到,假如不克服粮食危机,我们国家就会遭遇重大的国民经济危机,我们的所有计划就会告吹。当时的一些打算都是很模糊的,就等斯大林同志从西伯利亚回来,让他去伤脑筋吧。可是粮食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斯大林同志从西伯利亚带回了粮食,大家知道,打了胜仗的人是不受责备的。大家就没有吭声。

**臧声:**对。对!

**奥尔忠尼启则:**由于在使用那时采购到的粮食时不注意精打细算,于是须要再度采取非常措施。这时候一些同志就抬起了头,就在这时,莫斯科党组织的头头们开始了对斯大林同志猛烈的攻击。

波隆斯基:是这样的。

乌格拉诺夫:不对。

奥尔忠尼启则:乌格拉诺夫同志,我尽量提醒你……

斯克雷普尼克:这是悄悄地干的。

奥尔忠尼启则:(提醒)你在七月全会之前是怎样干这件事的。我甚至可以给你指名道姓。

乌格拉诺夫:那你就说。

臧声:请说吧。

奥尔忠尼启则:我想,乌格拉诺夫同志,你本人也不会拒绝这样做,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乌格拉诺夫:对。请你现在就统统说出来,别再保留什么。

奥尔忠尼启则:好的,乌格拉诺夫同志,我现在就统统说出来,什么也不再保留。

乌格拉诺夫同志,你想必记得,七月全会之前你把当时代理哈莫夫尼克区委书记的马什凯维奇同志找去,同他谈了弗鲁姆金的信和斯大林同志对它的回答,还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遗嘱中就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一切全都得到了证实。他问你,跟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建议他找几个信得过的伙伴,告诉他们。

乌格拉诺夫:这一切全是捏造,我敢肯定。

奥尔忠尼启则:你说这一切全是捏造,而我敢断定这都是真实的,假如你想争辩,那就请这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成立一个小小的委员会,花三四个小时调查一下我所说的。莫罗兹同志在这里谈了很多原则分歧,他能讲许多这一类的事情。

波隆斯基:我可以提供一些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我说这些,只不过是提醒乌格拉诺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还有其他人,他们在七月全会之前是怎样攻击斯大林同志的。

臧声:对。

乌格拉诺夫:你不妨问问波隆斯基和吉别尔,他们是多么起劲地干这件事的。

奥尔忠尼启则:谢谢,乌格拉诺夫同志,谢谢你自己肯定了我说的是实情。(笑声)你说让我问问波隆斯基和吉别尔,这就是说,你是知道这件事的。

Сr. 柯秀尔:不光是知道,是他领导的。

奥尔忠尼启则:波隆斯基和吉别尔是好样的,他们一旦发现了你的鬼主意,

就抛弃了它,离开了你们,而且最坚决地反对你们,维护党中央。

乌加洛夫:是不是好样的还得想一想呢。

奥尔忠尼启则:他们老老实实在地离开了你们,而且老老实实在地反对你们。

波隆斯基:而且从来不反对中央,而是勇敢地维护中央的路线。

奥尔忠尼启则:就在这段时间,在7月份,布哈林去找加米涅夫,而且同他做了那次著名的谈话。大家全都认为,布哈林干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我敢断定,这一切都是为了撤掉斯大林同志总书记的职务,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候补人选。

斯克雷普尼克:是谁?

奥尔忠尼启则:让他们自己说吧。他们在党的十五大上和我们一起投票,赞成每个党员都应当讲真话,不得对党有任何隐瞒。我敢断定,7月以后,布哈林也去找过加米涅夫,和他谈过那些同样的问题。我不明白托姆斯基同志的机灵,他说布哈林是去找一个女学生,是女学生加米涅夫爱上了布哈林等等。唉,好吧,就算是女学生加米涅夫爱上了布哈林等等,可是正义要求指出下面这些情况:不是加米涅夫跑去找布哈林,试图和他结成同盟反对政治局,而是相反,布哈林跑去找加米涅夫。看来,布哈林对加米涅夫爱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不等他来就自己跑去找他了。我就不谈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话的这份文件了,大家从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速记记录中已经知道了。

下面谈一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十一月全会前的辞职问题。当斯大林同志把有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签名的辞职声明交给我的时候,我不禁大吃一惊。我摊开两手,怎么也闹不明白。在这之前,在李可夫同志休假回来后,我同他谈过几次。他对我说,七月全会上有过的那些分歧应该认为已经过去了,完结了。他到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走了一趟,认为农民同我们和好了,忘掉了非常措施。我们为控制数字担心,怕讨论时出现分歧,可是讨论进行得很顺利。布哈林同志那时还不在于场。他回来之后,我同他有几次长谈,我尽力说服他,政治局委员之间必须恢复和平。他也和斯大林同志谈过六小时。这次谈话之后,他表示可以在一起和平地共同工作。可是他们却提出了辞职声明。我真是弄不明白。后来我才搞清楚,辞职当时只是一种手段,想对政治局为十一月全会起草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的委员会施加压力。李可夫同志提出的关于控制数字的提纲初稿不能令人满意。交换意见后决定,由布哈林和李可夫根据交换的意见再起草一份提纲。经过长时间的说服之后,那份辞职的文件被我销毁了,我想,罗济特同志不会因此而责备我吧?第二天,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

向我们提出了16点要求,这简直就是为今后共同工作提出的最后通牒。

臧声:谢尔戈,你念一念。

奥尔忠尼启则:好吧。第一点:“全体政治局委员保证就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有争议的复杂问题事先进行集体讨论,表现出为工作所必需的宽容。这特别是指政治局周一的例会。”

毫无疑问,这一点是不能反对的,可是请允许我向布哈林同志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七月全会之前政治局的周一例会上,拿出了你自己事先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讨论过的提纲,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却不许其他政治局委员拿着你的提纲读一读呢?这叫集体讨论吗?为什么要先由三个人讨论,然后才拿到政治局来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向党隐瞒这份文件呢?李可夫同志不是说,七月全会的决议正是以这份文件为基础的吗?那又何必把它藏起来呢?为什么现在布哈林同志不生气,也不肯把这份文件发给我们,让大家见识一下呢?你们没有这样做,对吧?

第二点:“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各少数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州委、边疆区委和省省委发指令的办法,切实保证贯彻中央关于开展自我批评的‘号召书’,其中包括反对扣倾向帽子和赞成同志式的争论等等。”我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因为从布哈林后面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希望怎样进行自我批评。

第三点:“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相应的文章,坚决驳斥关于政治局内存在政治分歧的无稽之谈。”一个几次跑去找加米涅夫的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作者、一个在这里宣称他早就谈到过自己的分歧,还就此给斯大林写过信的人,却要求我们在11月时向党宣布不存在任何分歧,因此他是向我们建议欺骗党。这叫什么话?!

伏罗希洛夫:这太不像话了!

米高扬:这是伪君子!

乌格拉诺夫:既然你说这是伪君子,那就请你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奥尔忠尼启则:这里说的是另一回事,两者必居其一:要么是11月份时政治局内不存在政治分歧,要么是存在分歧。如果存在分歧,——布哈林尽力证明存在分歧,而你们要求我们声明不存在分歧,那就是你们想欺骗党。可是你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人,你们不是不打算欺骗任何人吗?那怎么办呢?

下面是第五点:“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及出版部的名义向报刊发出指令,指示报刊不应当仅限于单纯记录已经通过的决议,而应当保证执行第二节中

规定的准则并实事求是地讨论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不得乱扣帽子。”

第六点:“为从思想上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应当进行坚决而严肃的工作,同时必须防止采取组织措施;停止莫斯科党组织内的‘组织措施’;停止对乌格拉诺夫及其他同志的中伤。”

就乌格拉诺夫同志和莫斯科党组织当时的最高层,发表了大家都知道的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

第七点:“撤去科斯特罗夫同志《共青真理报》编辑的职务,并在报刊上公布撤职的原因。”

我们撤了科斯特罗夫同志的职<sup>342</sup>。

沙茨金:是按他们的要求吗?

奥尔忠尼启则:是的,是按他们的要求。

沙茨金:多此一举。

奥尔忠尼启则:是多此一举吗?我认为,撤职是对的。如果以撤去科斯特罗夫同志的职务为代价可以得到政治局内的和平,而我们却(且不说科斯特罗夫同志是对还是错)没有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党的罪人。

喊声:做得对!

奥尔忠尼启则:接着是第八点:“撤去《红色报》<sup>343</sup>编辑的职务。追究《大炮》杂志上讽刺画作者的责任。如果他非党员,就逮捕他,如果是党员,就交付党的法庭。给书籍出版总局代表严重警告。”

《大炮》确实发表了一幅不像样的漫画,大家都很生气。

喊声:它发表的是一幅讽刺加里宁同志的漫画。

奥尔忠尼启则:这份杂志被封了<sup>344</sup>;编辑被撤了职,漫画作者被逮捕了。

第九点:“解除《真理报》编辑克鲁敏同志和萨韦利耶夫同志的职务。补进美舍利亚科夫同志和扎伊采夫同志。”

我们同意把克鲁敏同志从《真理报》撤出,克鲁敏同志被任命为《消息报》编辑,可是这项决定应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要求而被中止了。克鲁敏被撤了职,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人认为他不称职,而是我们不得不同意布哈林的要求,因为他说和克鲁敏不能一起工作。他要求补进扎伊采夫和美舍利亚科夫来取代克鲁敏同志,我不知道扎伊采夫比克鲁敏高明在哪里。我自己认为,克鲁敏无疑比扎伊采夫要高明些。

第十点:“给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新区委警告处分,因为它出了一份反对索尔

茨同志的文件,还在1928年10月29日出了一份情况通报,并将处分决定在报刊上公布。”

这简直是太可笑了。这个要求开展自我批评的人却要求我们给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警告处分,而且将处分决定在报刊上公布。凭什么呢?

列昂诺夫:是给区委和区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处分。

奥尔忠尼启则:对,是给区委和区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处分。请问,为什么呢?原来是索尔茨同志出席了区委和区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上有人请索尔茨同志谈一谈他对布哈林同志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意见。索尔茨同志谈了他的认识和想法,可是联席会议并不满意,于是通过决议,认为索尔茨同志谈得很不明确,甚至把这件事报告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因为索尔茨同志是主席团委员。难道就因此而应当给予警告吗?如果因为这样的决议(我并不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就给区委和区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警告处分,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警告处分应当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来做。我说,索尔茨同志自己也会坚决抗议这个做法,我也不能保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同意。

第十一点:“给予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希塔罗夫同志警告处分,因为他在共产国际支部的发言支持了托洛茨基分子对联共(布)领导的诬蔑,违反了党纪和党的决议。这个处分应当在中央机关刊物和国外党刊上公布。”

你们之中认识这个年轻的希塔罗夫同志的人多吗?

曼努伊尔斯基:是一个好小伙子。

奥尔忠尼启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可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应当给他警告处分,而且在国内外的刊物上公布这个处分。布哈林要求宣布警告处分,仿佛只是因为希塔罗夫同志在共产国际支部发言时说布哈林是右派。我们回答说:让我们先把事情弄清楚,对一个年轻人,而且无疑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干部,连问都不问,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他警告处分是不合适的。这怎么能说是贯彻7月的号召书呢。李可夫同志当时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但不是立即就同意的,——这个过程并不像我在这里讲的这样轻松。(笑声)

事情就成了这样:一边是三个人——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而另一边是全体其余政治局委员。

Cr. 柯秀尔:白天在这里开会,晚上就交谈。

奥尔忠尼启则:而且事情成了这样:如果这三个人声明不同意某项决议,这项决议就不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抛到一边去了。我们政治局不再是

一致的了,而成了讨价还价的双方:一方是三名政治局委员,另一方是全体其余的人。然而罗济特同志像一只好斗的小公鸡似的在这里跳了出来,叫嚷中央监察委员会到哪里去了等等。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把这三名同志召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要求他们对这种行为做出回答。

臧声:正确!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这只能使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臧声:对希塔罗夫最后怎么处理的?

奥尔忠尼启则:对希塔罗夫最后是这样办的:根据李可夫同志的建议,委托索尔茨同志和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处理这件事。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里已经讲了这个决定。索尔茨同志气愤地否决了对希塔罗夫提出的指责,因为确切地证实了希塔罗夫不曾说过布哈林指责他的那些话。(当然,布哈林同志没有出席共产国际的支部会议,他并没有听见希塔罗夫的发言,是他的朋友告诉他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参加支部会的人在希塔罗夫之后发言,他指出,希塔罗夫把布哈林说成是“右倾主义”;之后希塔罗夫再次发言,声明他对布哈林同志怀着深刻的敬意,他没有指责,也不想指责布哈林是“右倾主义”。索尔茨同志(谁也不能指责他偏向)认为,布哈林听到的消息是不正确的,而希塔罗夫是完全正确的;布哈林同志根据错误的消息要求我们做出警告处分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布。而他还把这称为自我批评!即便希塔罗夫在共产国际支部会上讲了布哈林是右派,难道因此就可以给他警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同志们,我绝不同意不能批评政治局委员。我认为,如果某个政治局委员离开了党的路线,或是违反了党的决议,或是错误地解释党的路线,或是违反了党的纪律,就可以,而且应当批评。

臧声:正确。

伏罗希洛夫:那能不能批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呢?

奥尔忠尼启则:嗨,当然可以,这是不用说的。

臧声: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请你批评一下政治局委员看看!

臧声:给你一个警告。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们,你们这样说是不对的,假如我们确实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而且做出了警告的处分,你们才有根据这样说。

乌加洛夫:所有的人,而不单是这三个人,全都可以批评吗?

奥尔忠尼启则:所有的人。你们不是在七月全会之前攻击过斯大林吗?



喊声：谁攻击了？

奥尔忠尼启则：以乌格拉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党组织的高层人士。

乌加洛夫：我又没有攻击过。

奥尔忠尼启则：既然你没有攻击过，也不同意他们的做法，那就别同他们搅在一起。

乌加洛夫：可是你在七月全会之后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呢？

罗济特：你说说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事吧。他因为批评了斯大林而被赶出了《列宁格勒真理报》<sup>345</sup>。

奥尔忠尼启则：因为什么？

罗济特：因为批评了“贡赋”。

奥尔忠尼启则：我不知道这件事，罗济特同志。你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却想把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种指责都推到我头上，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开脱得干干净净。如果你认为彼得罗夫斯基被赶走是不公正的，你有责任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问题，而且要求回答。可是你并没有这样做。

喊声：对。

(罗济特同志的插话听不清楚)

主席：罗济特同志，不该你发言。

喊声：让他讲。

奥尔忠尼启则：第十二点：“在《真理报》和《共青真理报》上发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支部发言的决定，并详细批驳《真理报》和《共青真理报》上的短评”！

是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支部起来反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了。可是难道有谁支持过它吗？

罗济特：你现在讲得是很宽厚温良的了。

[斯克雷普尼克：难道说支部就没有这个权利吗？

米高扬：中央有一个专门决议制止了它。]

奥尔忠尼启则：我记得是托姆斯基同志给我打了电话，我那时正在人民委员会讨论预算。托姆斯基同志告诉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支部打算开会提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问题。他要求干预这件事，不让支部开会。（顺便说一句，支部里的人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开会。）我立即找了支部书记，请他不要召开支部会，而等待党中央解决问题。为了更有权威性，我请斯大林同志同意向支部书记提出的这个建议，他自然同意了。

喊声：正确。

奥尔忠尼启则：就这样，我们没有让支部开会，而这个支部是很大的，好像有800来人呢。

安采洛维奇：是这样做的——解散了支部会。

扎东斯基：作为自我批评。

奥尔忠尼启则：是的，作为自我批评。为的是不把同托姆斯基同志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我想，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可是罗济特同志却说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防止相互关系的尖锐化。

(罗济特同志的插话听不清楚)

唉，罗济特同志，在布哈林同志去找加米涅夫的时候，我们不能跑去找布哈林呀。

罗济特：你一直没有回答我关于令人气愤的违反自我批评和撤彼得罗夫斯基的职的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我回答了。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那就请你提出来吧。

第十三点：“以中央机关报的名义否认《工人的莫斯科》关于撤销乌格拉诺夫职务的短评。”

第十四点：“委托布哈林同志写出对他的反对者的回答，说明工业化的速度等问题，这篇文章事先应得到政治局的同意。”

就布哈林同志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进行的辩论被政治局制止了<sup>346</sup>，但是部分地同这篇文章进行了辩论，没有指名道姓。布哈林希望对此做出回答。

罗济特：这完全合情合法。

奥尔忠尼启则：我并没有说他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问题。

主席：罗济特同志，你被别人打断时是非常生气的，也许你也能把它用在自己身上。

奥尔忠尼启则：没关系，我不会反对的。他也不碍我的事。

罗济特：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插话似的！

喊声：你不反对，可是主席反对。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主席的权利。政治局是怎样回答的呢？我们不同意你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如果你现在想为这篇文章的错误观点辩解，我们就不得不出回答——这样一来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都将被卷入一场全苏

联范围的党内辩论。还是让我们把《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放在一边吧。我们刚刚通过了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你(布哈林同志)还是评论一下这些数字吧。这比起布哈林发挥自己的错误,而政治局其他委员出来纠正他要好得多。

下面是第十五点:“从德国召回诺伊曼<sup>347</sup>,否定台尔曼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sup>348</sup>。”

布哈林同志要求否定台尔曼的讲话正是在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最激烈地反对德国共产党中央和台尔曼同志的时候,而他们,正如同志们肯定的那样,是完全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立场上的。布哈林同志要求否定台尔曼同志的讲话的时候,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新闻报刊正在掀起一股诽谤台尔曼同志的浪潮。除此之外,当时与会的人中谁也没有听过,也没有读过台尔曼同志的讲话。大家那时要求布哈林至少分发一下台尔曼的讲话,然后再根据它的内容,以某种形式把问题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至于召回诺伊曼同志,许多人声称,我们并没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召回诺伊曼的问题,这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事。

第十六点:“通过共产国际写一封致共产国际各党中央的信,说明联共(布)领导的情况,并指出必须停止‘专门工作’<sup>349</sup>。”

这一点被完全接受了。

第十七点:“恢复萨波日尼科夫同志<sup>350</sup>在《革命与文化》杂志编辑部和《真理报》的工作。”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这和讨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布哈林可以直接向组织局或是中央书记处提出来。

这就是全部要求。请大家说说,这些要求里有没有什么中农啦、农业税啦、非常措施啦、结合啦、“饿汉和饱汉”啦等等。可是我们被迫开了好几次会来讨论这些要求,最后也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尽管决定了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讲话应当是协调一致的。布哈林实际上拒绝了出席全会——他一次会也没有参加。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很少出席。全会要结束时,我去找菲加特纳和施米特,他们是托姆斯基同志的至交,请他们说服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参加全会,因为他们的缺席引起了种种议论和传闻,他们缺席全会是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菲加特纳和施米特确实说服了托姆斯基,他就和李可夫在全会临近结束时出席了全会<sup>351</sup>。

我再就布哈林在政治局委员之间关系尖锐化中所起的作用说两句。应当坦率地说,布哈林在每一次分歧和争吵开始时总是起一个火上加油的作用。著名

的1923年基斯洛沃茨克洞穴会议<sup>352</sup>不单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搞的,布哈林同志也起了很大作用。[可惜伏罗希洛夫今天不在,他本来可以讲一讲布哈林怎样花言巧语地挑起不和,那样他就可以实施让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路线。由此诞生了那个著名的,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组成政治书记处的方案。后来布哈林由于改变了想法,所以他又走到了另一边,恢复了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一致,到开始反对托洛茨基的时候,布哈林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库利科夫:这是为现在的一致提供的历史资料吗?

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同志起初是想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由此产生了那个著名的,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组成中央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方案。后来布哈林放弃了这个想法,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一起展开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

乌格拉诺夫:你知道,布哈林在1924年退出七人小组是因为他反对对托洛茨基采用的那种斗争方法。

奥尔忠尼启则:[别急,别急。我很清楚这件事,我知道,因为我当时去找过布哈林,规劝他,说服他。不错,布哈林现在说,谢尔哥哭哭啼啼地跑来找我。怎么说呢,反正是去找他,请他别犯傻,和我们站在一起,好歹恢复一致,——谁会想到他居然能跳出来说我在他面前哭哭啼啼。请看,他是多么勇敢的人!这些事乌格拉诺夫也是很清楚的。]

这完全是出于另一种考虑。我当时去找布哈林是为了规劝他,安抚他。在现在这场斗争中布哈林起的也是火上加油的作用。

喊声:说得对!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布哈林老想把这事说得好听一些。托姆斯基开始的时候说,遗憾的是,伊里奇当年预言过的事现在都一一验证了等等。一切都归结为缺乏集体领导,有人取消了这种集体领导等等。那是谁呢?是斯大林和他的性格。同志们,我不明白,就算斯大林性格不好,可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跑到君士坦丁堡去吗?托洛茨基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他跑到君士坦丁堡去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斯大林的性格开始,走到绝对错误的立场上去了。难道因为斯大林的性格不好,就可以对富农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吗?难道对富农的子孙或者富农的合作社窝巢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也要取决于斯大林的性格吗?这都有什么关系呀?我并不认为布哈林的性格是理想的,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对斯大林提出的这方面的种种指责都是不体面的挑拨。有人说,这是伊里奇写了

的。伊里奇写了,写的也对,但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布哈林自己也说过,捍卫过这样的观点:这个评价是伊里奇做的,可是没有比斯大林更好的人选了,我们需要他等等。为什么每当出现分歧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评价拿出来呢?这是要干什么呢?唯一的目的是把斯大林从中央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我肯定地说,在布哈林休假<sup>353</sup>回来之前,在十一月全会之前,一切都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什么分歧加深了和关系紧张了的预兆。布哈林回来以后才过了几天,忽然出来了三个人的辞职声明。请托姆斯基同志给我们解释一下,那时提出辞职的原因是什么。斗争尖锐化了,关系恶化了,——这是事实,可是问题在哪儿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难道也能用斯大林的性格来解释吗?托姆斯基总是尽量把什么都归结到这一点上,他一开始就说,很可惜,伊里奇的预见得到了证实等等。好吧,我倒是想问一问,难道由于斯大林的性格就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态度来处理同富农斗争的问题、我国工业化的问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难道由于斯大林的性格就可以在这些问题上赞成党或是反对党?最后,如果一切都错在斯大林的性格,那么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是不是也打算用斯大林的性格来解释托洛茨基的堕落和脱离党呢?当他们驳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性格提出的指责时,他们是不是认为自己犯了绝大的错误呢?他们是不是认为,他们提出这个指责整整晚了四年呢,因为四年前托洛茨基就把这一切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我认为,严肃地提出问题应当是另一种态度。我们现在毫无疑问正在经历着困难。我们面临着重大的任务——改造我们的国民经济,改造工业和农业。我们分歧产生的基础就是对这种局势的评价,对我国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的评价,对解决上述任务途径的选择。李可夫同志企图抹煞这个问题,他引用了马尔科夫同志的信,信里描述了发生在乌拉尔一个区里的无法无天的事情。我相信发生了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我坚决主张严厉惩处这些无法无天事情的责任人,可是马尔科夫同志信里讲的这些事情不能决定党的路线。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就拿农业税来说吧,这是完全合法的事情,可是在执行农业税时,我们犯了很多糟糕的错误。可是难道可以根据这些错误来谈论党的农业税政策吗?托姆斯基同志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试图处理这些问题,可是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农民问题最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据我看,想把现在的粮食危机说成是由于党的农村政策错了的那些同志是不对的。在观察粮食危机问题时,决不能忽略乌克兰有500万公顷冬小麦和春小麦绝收,北高加索有很大的播种面积绝收,中央黑土区也有部分歉收。仅仅在乌克兰,我们就损失了大约35000万普特黑

麦和小麦。

喊声：对！

奥尔忠尼启则：大家说说，难道霜冻和干热风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于我们党的政策吗？不要忘了，1927年我们乌克兰的播种面积是战前时期的104%，乌克兰农业的恢复比苏联其他地区要快一些。你们怎么看呢，1927年党在乌克兰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到了1928年这个政策就招来了霜冻和干热风，摧毁了49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吗？

彼得罗夫斯基：是500万。

奥尔忠尼启则：虽然到春天有80%又补种了，——虽然这样，我们今年在乌克兰还是遇到了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扎东斯基：有些地方补种了两次。

奥尔忠尼启则：请问，干旱、霜冻、干热风，这都是党的政策造成的吗？

扎东斯基：没有采取防霜冻的措施。

奥尔忠尼启则：也许布哈林会说，那些措施可以预防霜冻和干热风吧？

喊声：这是共产国际的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今年仅仅在乌克兰的草原地区就有大约12%的牲畜死亡。恢复草原是要时间的。不要忘了，在乌克兰北部播种面积是扩大了。

扎东斯基：对了。

奥尔忠尼启则：总不能认为，在乌克兰北部是一种政策，而在南部是另一种政策吧。草原的荒芜在今年的粮食困难中的作用是最大的，可是这当然不会取消确定改造农业的途径和我们对待各个农民阶层的态度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容置辩的是，只要我们在农村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我们就永远会受制于各种偶然性。毫无疑问，不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就不能改造农业，不能把它转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可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线表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名原理中，它指出，我们在农村工作中应当依靠贫农，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对富农的斗争。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引用了这段文字，而他自己又做了不成功的诠释。布哈林同志对此手舞足蹈，而对这个原理在今天是否正确的问题（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了），却不作明确的回答。比如说，很抱歉，我就不知道，布哈林直到今天还在捍卫他著名的、能够长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富农合作社窝巢。我以为布哈林同志早已放弃了这个主张，可是他在这里声称他没有放弃，而他的学生罗济特同志在发言中实际上还在捍卫这个原理。

罗济特:我没有捍卫这类东西。我说的是布哈林把富农窝巢比做租赁企业,也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布哈林并没有抹煞这一点。

奥尔忠尼启则:罗济特同志,我们现在是不是应当去组织这些富农合作社窝巢呢?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臧声:他的舌头掉了。(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对待富农的态度问题是我们的主要分歧之一。怎样改造农村,——是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的那样,依靠贫农,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对富农的斗争,还是按照布哈林说的那样,成立能够长入我国社会主义体系,而且能向我们的银行存款的富农合作社窝巢?

臧声:而且富农的孙子还会为此而感谢我们呢。

奥尔忠尼启则:是的,富农的孙子还会为此而感谢我们。假如我们听了布哈林的主意,而且照此办理的话,他真的会感谢我们的。

波隆斯基:可是工人就不会感谢我们了。

奥尔忠尼启则:这样的政策能使苏维埃政权灭亡,而富农的子孙会给能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合作社窝巢的发明人布哈林树立一个大纪念碑。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分歧的一个主要之处。

罗济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奥尔忠尼启则:请你看一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富农做的评价吧。罗济特同志,你是一个读过列宁著作的人,请你仔仔细细地看一看吧。你拿出列宁的书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哪怕是一处地方,列宁说过要同富农和平相处。他到处都说的是同富农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彼得罗夫斯基:就是讲的毫不留情的斗争。

奥尔忠尼启则:下面就是伊里奇对富农的描述:

“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和资本家多。但是富农毕竟是人民中的少数……富农、财主、粮食投机者,总共不超过200万户。这些吸血鬼在战争期间靠人民受穷发了财,他们通过抬高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积累了几万、几十万的货币。这些吸血蜘蛛靠战争中破了产的农民,靠挨饿的工人养肥了。这些水蛭吸吮劳动人民的血……这些吸血蝙蝠过去和现在总是把地主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sup>354</sup>

这就是伊里奇对富农的描述。可以这么说,虽然这段话是在1918年说的,但是从来就没有人证明过,也不可能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改变过自己

对富农的态度,或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同富农达成协议。布哈林认为富农的合作社窝巢能长入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观点同伊里奇的原理是绝对不能相容的;断言富农的合作社窝巢出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学说的人是在诬蔑列宁,把列宁说成是一个自由派的孟什维克。

罗济特:布哈林从来不曾说过“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奥尔忠尼启则:罗济特同志,既然富农的窝巢可以长入我们的制度,那这就是和平长入。这就是我们在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一个根本分歧。

布哈林在这里大谈特谈阶级斗争,可是在十一月全会之前,当我们在委员会里起草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时,我们曾经为决议里要不要加入有关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内容争论了很久。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认为,阶级斗争尖锐化和我们党的政策是否正确密切相关。假如我们成立富农的合作社窝巢,假如这些富农的合作社窝巢能够长入我们的制度,那么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提法了。那时只有我们把这些富农的合作社窝巢组织得很糟糕,对它们的供应搞得很糟糕,阶级斗争才会尖锐化。他们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我们苏联,阶级斗争尖锐化不像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我们党的政策错了,而是因为我国还存在阶级——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向私有主、耐普曼、富农展开进攻。

就拿同一个乌格拉诺夫同志来说吧。去年他就私人小商小贩讲过不少话。谁会说乌格拉诺夫是支持私人小商小贩的呢?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的消费合作社发展了,它取代了私有主的位置,把他推了下来,于是这个被推了下来的私有主就大喊大叫起来。这喊声越传越远,也传到了一部分落后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那里,然后从那里又悄悄地传到乌格拉诺夫同志耳朵里。我们不曾采取过任何行政措施来关闭莫斯科的私营商业。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了。今年乌克兰没有粮食了,可是去年乌克兰的播种面积是战前的104%,收成也不错,但是没有拿出粮食来。为什么呢?因为富农抵制了,还因为商品不足。富农竭尽全力反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在这方面也尽力抗拒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因为他明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在挖掉他在农村中势力的根基。富农坚决要求选举权,这是我们不会给他的。除此之外,还应当加上我国的粮食原本就很少。只有通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才能够改造农业。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把个体农户抛在一边不去管他。可是改造农业的康庄大道毫无疑问就是合作化——以高度发达的技术装备: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等为基础的集体农



庄和国营农场。而这又要求加紧发展工业,因为没有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没有罗斯托夫的农业机械厂……

С. 柯秀尔:没有高炉。

臧声:没有平炉。

奥尔忠尼启则:没有高炉,没有矿物肥料,这是我们必须生产的(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是一贫如洗),没有这一切,我们就不能改造农民经济。然而当政治局强调这一点时,当我们党强调这一点时,伟大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站了出来,在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里写道:要想建设就必须有建筑材料。既然没有建筑材料,那就不能搞建设。任何一个傻瓜都懂得,没有建筑材料,要想建设是不可能的。

臧声:还没有沙子呢!

(主席提醒该午休了)

奥尔忠尼启则:我想请求同志们允许我现在就讲完。

米高扬:那就请讲吧。

臧声:可以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就是分歧的实质所在。有人在这里说,我们什么时候反对过工业化?你们倒试试反对工业化看看,那你们就不仅不能当政治局委员,而且连党员也当不成了。在为国家工业化而加紧奋斗的时候,在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时候,你们要是敢反对,有你们的好看。他们还想要什么呢?至于给工业多拨或者少拨一两个亿,布哈林同志说,那只是个实际问题。当然是实际问题,可是从预算中给工业多拨或者少拨一两个亿,这对发展我国工业的速度具有很大意义。

臧声:对!

奥尔忠尼启则:下面谈一谈对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指责。布哈林同志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我们根据什么在决议里写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样一段话:“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一个勤奋学习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向是支持他的,但是他轻信流言蜚语,而且在政治上极不坚定。”他说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写,我们应当调查一下这些话是指什么说的,应当问一下什利亚普尼科夫等等。我必须首先声明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任何一段话、任何一封信,我都不会去找什利亚普尼科夫,或者布哈林,或者其他任何人去核对。

罗济特:应当明白它的意思!否则你们会从列宁的遗产中得出鬼才知道什

么样的结论来。

**臧声**：罗济特在教我们怎样领会列宁的意思呢！

**奥尔忠尼启则**：唯一可以向他核对伊里奇写了什么的人就是伊里奇本人。

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失去列宁已经五年了，而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世五年之后，再来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争论，而且依靠的是像什利亚普尼科夫这样的权威，那就让罗济特和他的导师布哈林同志去干吧，我们不奉陪。

**罗济特**：无稽之谈！

**奥尔忠尼启则**：引证马利诺夫斯基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处。列宁致施略普尼柯夫的这封信里有些内容同马利诺夫斯基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完全证实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布哈林同志“政治上极不坚定”的看法。列宁在同一封信里就布哈林说了这样一些话：

“战争使他沾染了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作出伯尔尼决议的会议（1915年春）上，他提出了一个提纲（我这里有一份！）——荒谬绝伦；可耻；半无政府主义。”<sup>355</sup>这和马利诺夫斯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这不能证实伊里奇关于“政治上极不坚定”的断言吗？]

**罗济特**：可是在遗嘱里的评价呢？

**奥尔忠尼启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遗嘱中对布哈林的理论是否具有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也是很有怀疑的。

**罗济特**：你是想“盖过”他吧！

**奥尔忠尼启则**：不，罗济特同志，我们不想盖过他。所有感兴趣的同志都可以读到这两份文件，大家可以相信，这两份文件没有什么矛盾。

**列昂诺夫**：罗济特同志，盖过了还是没有盖过呢？

[**奥尔忠尼启则**：哎，什么盖过不盖过的，那是盖不过的。有人提到伊里奇的遗嘱，说是那里写着——宝贵的理论家。哎，什么理论家，是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还大可怀疑呢。嗯，同志们，一般说来理论家多得很，我想，甚至有比布哈林还要高明的理论家，可是我们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不是一般的理论家。而伊里奇对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罗济特同志说到盖过。这里没有什么盖过。]

**臧声**：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1916年底写的。

**乌加洛夫**：关于你也写了些什么吧。

**奥尔忠尼启则**：当然，关于我也写了一些。我是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可是关

于你,乌加洛夫同志,什么也没有写。(笑声,鼓掌)

乌加洛夫:我也没有这个要求。

奥尔忠尼启则:我知道,布哈林在这里引用了每个人的话,而且加以嘲笑,为了不让别人引用他过去写过些什么,他提前骂了人,说是不许提他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的立场,因为这同目前讨论的问题无关。是的,这同目前讨论的问题无关,可是对于证明列宁关于布哈林“在政治上极不坚定”的看法是正确的,无疑具有不小的意义。

他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不可救药地搞错了,这能不能说明他在政治上极不坚定呢?不能。他在关于工会的辩论时期搞错了,这能不能说明他在政治上极不坚定呢?也不能。可是难道他今天的立场也不能说明同样的问题吗?

科托夫同志说,现在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不是伊里奇所希望看到的那样。我同意这个看法。我相信,假如伊里奇还在世,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好一些。我同意说无论是科托夫同志,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从普通委员起直到主席止,都有许多缺点。可是我要提醒科托夫同志,每当党内出现争吵,就会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如果科托夫同志是在别的时间来对我们说:同志们,伊里奇想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这样的。你们有这样的缺点,应当这样来纠正等等。我们会努力改正,而且感谢科托夫同志。可是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把我们称为政治局的“棍子”、“大棒”。哎,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准备在对付那些反对党的人士时做“棍子”和“大棒”。

喊声:说得对!

奥尔忠尼启则:你不希望这样,好吧,愿上帝保佑你。(笑声)

罗济特同志在这里胡说了一通,甚至扯到了阿扎尔暴动。我不明白,这和阿扎尔暴动有什么关系,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有什么关系。梯弗里斯通过了一个什么决议。

我那时在住院,可是他说:你应当讲话。为什么我应当讲话?我那时没有读过这个决议,即使读过,我也不会讲话。

喊声:原来如此啊!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有自我批评,我们有党内民主。为什么代表会议不能做出决议呢?梯弗里斯代表会议正确地做出了自己的决议。如果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翻然悔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不让我们党的领导恢复一致,我就毫不怀疑他们必然走上他们的前人所走过的那条道路。你怎么看呢,难道托姆斯基确实在智力上比那些掉下大车的人要高明些吗?不是的。

罗济特:[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你最好别谈智力<sup>356</sup>。

奥尔忠尼启则:每一个反对派在它开始反对党的时候,总是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站在它那一边。

臧声:或者采取中立。

奥尔忠尼启则:不对,他们是不满意采取中立的,中立是市侩习气。不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站在反对派一边,而且保护他们。

臧声:保护他们反党。

奥尔忠尼启则:他们认为,这才是伊里奇的做法;我不认为这是伊里奇的做法。希望大家认识到:有过反对伊里奇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反对派,假如我们那时,在伊里奇还在世时有过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且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哪怕有一秒钟转到了施略普尼柯夫一边,我倒想看看伊里奇会怎样料理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

臧声:说得对!(鼓掌)

奥尔忠尼启则: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为了党,而不是为了那些自己搞得晕头转向、头脑不清醒、在党内制造惊慌失措情绪的人。

臧声:说得对!

奥尔忠尼启则:请原谅。我们准备采取一切措施,尽一切努力帮助这些同志脱离他们错误的立场。可是要转到他们的立场上去,那就对不住了!我们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不会转的!

臧声:说得对!

奥尔忠尼启则:谁能证明,假如你转到了晕头转向的三个人一边,这就是党的一致;如果你同全党站在一起,这就是分裂?哎,这真是胡说八道。这真是市侩的议论!

可是现在的出路在哪儿?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种局面?我要坦率地说,我不同意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意见。他的发言很好,可是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党离开了他们就不行了似的。我想,安德烈耶夫同志这样说是在给他们帮倒忙,如果这些同志真的相信了他的话,——可是又不能不信安德烈耶夫同志,因为他是最诚实、最忠心耿耿、最真诚的成长中的一个同志。我听他纠正像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的“大”理论家时,感到非常满意。没有他们党也不会灭亡,而会继续自己的事业,不过我完全同意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意见:把他们保留在领导层里比失去他们要好一些。

Ст. 柯秀尔:这话对。

奥尔忠尼启则：为此应当做些什么呢？这首先取决于他们。

喊声：说得对！

奥尔忠尼启则：他们在党内推行什么政策呢？辞职的政策。哎，如果我犯了错误，那就会有许许多多老同志立刻起来纠正我。我们党内什么时候有过辞职的政策呢？

喊声：从来没有过！

奥尔忠尼启则：我记得，在十月革命时期有几个同志提出过辞职，可是伊里奇称他们是逃兵、怠工者等等。

喊声：是工贼。

奥尔忠尼启则：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提出过辞职。哎，请注意，不能这样胡乱对比。在决定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布哈林和他当时的同伙，托洛茨基等人的政策会把党和苏维埃政权导向灭亡时，他当时说：如果通过了否决和约的决议，那他列宁就不承担责任。

加里宁：对了。

奥尔忠尼启则：列宁是想说明什么呢？他是把他自己的全部威望，以及这种威望的全部分量都放到天平上，从而保证通过一个绝对正确的决议。

这是在布哈林、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其他政治盟友想把致命的政策强加给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列宁最坚决地站出来反对他们。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要问：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是怎样提出自己的辞职问题的呢？他们也认为党现在执行的政策是致命的。他们现在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吗？他们不敢这样说。他们说：没有分歧，可是我们要辞职。结果是什么呢？是在最危险的地方给我们党最沉重的一击。我们党有150万党员，管理着有150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党实际上领导着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和全世界的所有共产党。我们党要想胜任面临的任務，就必须有不容破坏的铁的纪律。辞职政策正是对党的纪律的一个打击。我们每个人都一再遇到过自己不完全同意通过的某些决议，可是谁也不曾提出过辞职。假如我们都这样做，那我们就不是列宁的党了，就是一个穿堂院了。我要问托姆斯基同志，他为什么要辞职？他是不是同政治局有深刻的理论分歧和政策分歧？他说，卡冈诺维奇同志被补进了工会中央理事会。可是在十一月全会以前并没有卡冈诺维奇同志，而托姆斯基同志就和布哈林、李可夫一起提出了辞职。他为什么在那时要提出辞职呢？他认为，他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独断

专行会受到某种动摇。同志们,我简直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提出问题。假如伏罗希洛夫同志要求向军队传达的一切都应当用命令的形式,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没有一个疯子会说应当这样做。可是如果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要求政治局同任何一个工会干部谈话都必须通过托姆斯基,那就对不住了!这是不能容许的事。那会是什么结果呢?假如明天李可夫要求每个人民委员同中央谈话都必须有他在场,那就是委托管理制,或是恢复旧的封邑制了。

[米高扬:倒像是中国的督办了。]<sup>357</sup>

奥尔忠尼启则:这让人闹不明白。我同托姆斯基同志谈过许多次,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能先到工会中央理事会去待一个月,执行党的决议,然后再说:解除我的职务吧,我没法工作。不要破坏了我们党最神圣的东西——党的纪律,也不要惯坏了其他人。工人经常说:我们上头做什么都可以,可是下面这样做就要受处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可以违犯党纪,可以不工作,政治局可以通过自己的决议和决定,而他们却可以不屑一顾。这真是不可思议。中央应当结束这种状况了。他们应当向我们保证无条件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不管这些决议是否对他们的胃口。否则怎么办呢?当年同一个托姆斯基曾经稍稍违反了党的一项不大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撤了他,不仅如此,还在全会上建议把他开除出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雅罗斯拉夫斯基:缺少四票。]

奥尔忠尼启则:不对,这是施略普尼柯夫。]可是其他人反对,有些人支持他。

乌格拉诺夫:你就是反对的。

奥尔忠尼启则:谁,我吗?我不记得了,可是我现在说的不是我同你谈过的事,而是伊里奇怎样说的。

乌格拉诺夫:我记得伊里奇是怎样说的,我那时是候补中央委员。

奥尔忠尼启则:我要问:如果三人声明以及它对党提出的种种指责仍然有效,那还能有什么共同领导吗?同志们,那就不会有共同领导了,那就会是这样一种领导:今天好歹修补修补,明天再回到同一些问题上来。

的确,既然党在培植官僚主义,既然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等等,那自然要问一问,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呢,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政治局里工作呢?我们应当要求这些同志收回自己的声明,承认声明是错误的,承认他们是一时冲动才写出来的。真是怪事!他们全都在这里发了言,可是谁都没有讲到这个声明。有人向李可夫同志提到这个声明,他回答说:那里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吗?你拿

他怎么办！可是你倒试试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看，你要是还站在这个讲台上，那你就看到了！（笑声）我们应当最不留情面地谴责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秘密谈话。我要负责地声明，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这种谈话后来还在继续，他不止一次跑去找他，每次都瞒着党。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知道这些事，可是也向政治局隐瞒了。必须坚决谴责辞职政策。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把他们保留在政治局内。

再就我自己说两句。布哈林同志因为我在他发言时笑了，就生了我的气。我插话说，笑并不犯法，他回答说，打司机耳光也不犯法。我当时没有听清楚，因为我的耳朵“太好”了。同志们对我说了以后，我就查了一下速记记录，记录里确实是这样记的。我本来不打算在这里讲的。在斯腾同志和雅科夫列夫同志在场时，我问布哈林同志：请你告诉我，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布哈林回答说：“你为什么要打断我的讲话，你为什么要引用伊里奇的文字？”可是这和我根本不知道的那个司机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用不着证明，布哈林同志提出的指责是诽谤。[我对他说，这本来没有任何关系，你说我打了司机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是要提醒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你是怎么说的。就是说，我在梯弗里斯打过一个人。

那你应当就这样说好了。扯什么司机呢？

好吧，那我发言时就要说，这不是司机，而是另一个人。你是什么意思呢，要把我拉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吗？

这扯得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吗？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明斯克的事情。

嗯，你知道，我觉得，这里有些同志，有来自明斯克的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切尔维亚科夫，还有前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书记加马尔尼克同志。

柯秀尔：还有白俄罗斯的戈洛杰德。

奥尔忠尼启则：他们全都可以证明，我有生以来就不曾去过明斯克。为此你们可以骂我，也可以夸我，（笑声）可是这同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

柯秀尔：你打过司机吗？

奥尔忠尼启则：他说：我不知道，你想知道伊里奇关于你写了些什么吗？（笑声）

我不知道这和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不过，愿上帝保佑他，就让他说吧。我认为，如果有人经常提醒我伊里奇写过的意见，这对我是一种警告，让我别干傻事。

喊声：这对别人也是一种警告。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为什么要栽在我头上呢？这有必要吗？]

我认为，布哈林同志找不出根据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就使用了廉价的造谣诽谤的办法，说什么司机啦，或者是朝伏罗希洛夫同志叫嚷：“闭嘴！”要不就朝鲁祖塔克喊：“你闭嘴！你老是喜欢跟多数站在一起。”为什么鲁祖塔克应当跟少数站在一起呢？而且我应当说明，在出现现在的这些分歧时，我曾经和鲁祖塔克谈过许多次，鲁祖塔克同志没有一个问题是他站在一起的。

主席：休会到6点钟。



## 第十二次会议

4月22日下午

主席(鲁祖塔克):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开会吧。

喊声:开吧。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sup>358</sup>: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布哈林同志集团某些同志的发言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之所以不想谈,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布哈林同志谈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读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昨天在私人关系上还是朋友,现在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乌格拉诺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也流露出这种口气。他们说,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间发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号叫都是一钱不值的。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团体,而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决不容许把私人交情的利益摆在事业的利益之上。同志们,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们老,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颓废和堕落了,即使他活到100岁,他也没有权利称为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没有权利要求党尊敬他。其次,决不能把私人交情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常言道,交情归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如果私人交情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那就应该把私人交情放在次要地位。作为布尔什维克,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我也不想谈新反对派某些同志的发言中所夹杂的那些对个人的影射和隐约的责备。看来这些同志想用影射和双关语来掩盖我们意见分歧的政治基础。他们想用政客手腕来代替政治。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是企图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问题的工联主义政客的典型演说。但是,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

的。既然谈的是某些人的个人品格,既然谈的是某些同志的粗暴或者温柔问题,既然还引用了列宁同志谈斯大林粗暴的那封著名信件的某些段落,——亲爱的同志们,那就请你们直截了当地说吧。请你们把你们对斯大林的组织结论直接说出来。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几次提出解除他书记职责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不是别人,正是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坚持拒绝斯大林同志的请求,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一切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现在你们那里事情起了变化,于是你们认为必须再一次提请大家注意列宁同志的那封著名信件,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用不着含沙射影,用不着躲躲闪闪。新反对派的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这是我能够给你们充分支持的为数不多的问题之一。我答应给你们充分支持不是因为你们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相反,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跟在托洛茨基分子的尾巴后面,托洛茨基分子也和你们一样,企图滥用列宁的这封信,用列宁的名义来掩盖自己背离了党的路线。我答应给你们充分支持只是为了剥夺你们滥用列宁这封信的机会,剥夺你们用列宁的名义来掩盖自己背离我们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机会。

现在我们来谈正题。

## 一、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还是有两条路线,——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李可夫同志在这里的发言中说,总路线我们只有一条,如果说我们有某些“不大的”意见分歧,那么这是因为在对总路线的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这样说对不对呢?可惜不对。不但不对,而且和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跑到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企图和他们组织派别联盟来反对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呢?布哈林同志在那里说中央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说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党中央有原则性的分歧,说必须彻底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结起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呢?为什么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两同志在这件事上支持他呢?如果总路线是一条,那么,怎么能设想遵循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陷害遵循同一条总路线的另一部分委员呢?难道能够设想,在存在着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会有这种倒戈政策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那个彻头彻尾反对中央及

其总路线的声明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三个人2月9日的声明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责备党：(一)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二)实行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三)实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

也许这些声明已经不复存在了？也许这些声明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了？也许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同志已经同意收回这些无疑是错误和反党的声明了？那就让他们公开老实地告诉我们吧。那时大家就会明白，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理解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同志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这样做。不但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将来撤销他们的声明，他们声称将继续坚持他们在这些声明中所陈述的观点。既然如此，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集团看来又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实行这种会招致灭亡的政策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胡说八道。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新反对派看来又是培植官僚主义，那么，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无稽之谈。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新反对派看来又是瓦解共产国际，那么，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瓦解共产国际而不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斗争吗？怎么能相信这种荒谬的话呢？

不是的，同志们，李可夫同志说我们有一条共同的路线，这话是不大对头的。不管怎样，如果看看刚才所说的布哈林同志集团在声明和行动方面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同志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有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一贯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屡次决议，在党内怠工达半年之久，难道这是可以设想的吗？如果我们确实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那么，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竭力实行的这种瓦解性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实行辞职政策的例子。例如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部分同志要求改变党的政策，拒绝担任委托给他们的职务<sup>359</sup>。大家知道，当时他们实行辞职政策的理由是要求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我们党中央实行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策。但是，当时的辞职政策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根据是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中的一条路线主张成立清一色的

布尔什维克政府,另一条路线主张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共同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新反对派一方面宣称总路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实行从十月革命时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哪里抄袭来的辞职政策,那就完全不合逻辑了。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辞职政策就是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或者我们的路线是两条,那么辞职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在政治局表决关于五年计划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提纲时,政治局中的三个人(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同志)认为可以弃权的事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的总路线是一条,而一部分同志在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竟放弃表决权,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不,同志们,世界上是不会有这种怪事的。

最后,如果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有细微的差别,那么,为什么新反对派的同志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政治局委员会在今年2月7日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呢?这个和解方案给布哈林同志集团指出了一条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使他们能够摆脱他们自己所陷入的绝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下面就是中央委员会在今年2月7日提出的和解方案的原文:

“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

(一)布哈林同志承认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是政治错误;

(二)布哈林同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三)根据这一点,布哈林同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四)布哈林同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五)因此,布哈林同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的一切文件(发言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责任编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如果我们的路线确实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么,

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应当竭力抓住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以便消除党内的紧张局面，营造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的环境，这难道很难理解吗？有人谈到党的统一，谈到政治局内的集体工作。但是，谁想达到真正的统一并重视工作的集体性，谁就应当接受这个和解方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究竟为什么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何况他们不仅拒绝了方案，而且作为对这个和解方案的答复，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2月9日发表了声明，指责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瓦解共产国际等等。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那么天地间既不会有2月9日的三人声明，也不会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中央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的事，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不，同志们，如果看看上面所说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你们所说的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可见实际上我们不是一条路线，而是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中央的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同志集团的路线。李可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说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这是说谎。他想以此掩饰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以便暗中破坏党的路线。机会主义的政策正是在于抹杀意见分歧，掩盖党内的真实情况，掩饰自己的立场，使党不能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机会主义需要这样的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用路线一致的空谈做掩护，而在实际上执行它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李可夫同志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就是采取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不妨听一听列宁同志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对一般机会主义者所做的评定。这个评定对我们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一般意义，而且是因为它对李可夫同志完全适用。列宁关于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这样说的：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种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sup>360</sup>

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的面目，他们害怕明确性和肯定性，力图掩盖事物的真实情况，抹杀党内真正的意见分歧。

卡冈诺维奇：说得对。

斯大林：是的，同志们，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不管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如果我们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险。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之

—就是他们不怕真理,不怕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令人痛苦。而现在的真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同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声明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 二、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我们的意见分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们是和什么相关联的呢?

它们首先是和最近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阶级变动问题有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带有偶然性。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是在最近发生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造成了发展中的转变。新反对派的主要错误,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看不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看不见而且不愿意看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而这种不了解就成了新反对派的特征。新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完全避开了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甚至丝毫没有暗示一下我们的意见分歧正是和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的。同志们,这一点你们是否注意到了呢?他们无所不谈,既谈哲学,又谈理论,但是对于决定当前我们党的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那些阶级变动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也许是因为健忘?当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记主要东西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和不了解目前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新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主要东西,忽略了政治家没有权利忽略的阶级变动。正因为如此,新反对派在我们党的新任务面前就显得张皇失措和束手无策。

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内最近的一些事件。请你们回想一下最近党因为我们国内发生新的阶级变动而提出的那些口号。我说的是这样一些口号:自我批评的口号、加强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清洗苏维埃机关的口号、培养新的经济工作干部和红色专家的口号、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口号、向富农进攻的口号、降低产品成本和彻底改进工会实际工作的口号、清党的口号等等。有些同志

觉得这些口号令人胆战心惊,头晕眼花。可是很明显,这些口号是当前党最迫切、最需要的口号。

最初,我们因为沙赫特事件而重新提出了新的经济工作干部的问题,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红色专家来代替旧专家的问题。沙赫特事件表明了什么呢?沙赫特事件表明了,资产阶级还远没有被消灭,它对我国经济建设正在组织而且以后还会组织暗害活动,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一部分党组织忽略了我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因此必须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改善我们的组织。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口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我们各种组织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就不能改善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就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和镇压资产阶级暗害活动的工作推向前进。暗害活动不仅在煤矿区,而且在金属生产方面、在军事工业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内、在金铂工业等等方面,都曾经发生并且继续在发生,这是事实。因此就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

其次,由于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由于富农进行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活动,我们着重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向富农进攻,对富农和富裕分子使用强迫手段收购粮食的问题。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什么呢?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富农并没有打瞌睡,富农在发展,他们在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而我们的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看不见敌人,就是迁就敌人,不和敌人作斗争。

因此就再一次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提出了检查和改善我们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一般收购机关的口号。

再次,由于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工业和农业的任务,就产生了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等等口号。这些任务要求重新审查工会和苏维埃机关的全部实际工作,彻底活跃这些组织,并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分子。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反对工会和苏维埃机关里的官僚主义的口号。

最后,关于清党口号的问题。如果以为不砥砺党本身就可以巩固我们的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就可以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恶习,那就可笑了。毫无疑问,官僚主义分子不仅生活在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里,而且生活在党组织里。既然党是所有这些组织的领导力量,那么很明显,清党是彻底活跃和改善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就提出了清党的口号。

这些口号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们自己可以看出，这些口号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一条叫做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的不可分割的链条上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些口号首先是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业的时期有关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实行全线进攻。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向建成社会主义方面前进的一个极大的进展。但是为了进行这种改造，必须首先提高和加强经济、苏维埃、工会、党以及合作社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脏东西，必须提高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其次，这些口号是和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事实有关的。决不能认为所谓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的活动。至于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那更不能认为已经继续了一年多的富农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活动是偶然的。很多人至今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富农在1927年以前自发地拿出粮食，而在1927年以后不再自发地拿出粮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过去富农还比较软弱，没有可能认真安排自己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余粮运到市场上去，而现在，经过连年丰收，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已经积蓄了必要的资本，于是他们就有可能在市场上玩弄手腕，就有可能把粮食这种宝中之宝囤积起来作为自己的后备，而宁愿把肉类、燕麦、大麦以及其他次要农产品运到市场上去。现在希望富农会自愿地拿出粮食是可笑的。这就是现在富农抗拒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根源。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可是要击破敌人的抵抗并为社会主义的前进扫清道路，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之外，还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提高这些组织的干部，并动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劳动阶层群众去反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

我们党目前的口号就是在这种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变动也应当这样说。如果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没有变化，那就可笑了。如果断言稳定日益巩固，日益坚固，那就更可笑了。事实



上,资本主义的稳定每月每日都在毁坏着,动摇着。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的斗争的尖锐化、军备的扩充、美英之间对抗的加剧、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左倾、欧洲各国罢工和阶级搏斗时期的到来、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长。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作斗争的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代理人。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隐蔽所。由此就产生了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口号。由此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在工会中的所谓新策略。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些口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懂得,不实现这些口号,就不能训练无产阶级群众去进行新的阶级战斗,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挑选出能够率领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我们党目前在对内政策方面和在共产国际方面的口号就是在这些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党看到了这些阶级变动。它了解新任务的意义并动员力量去解决这些任务。所以它可以有充分准备地应付事变。所以它不怕摆在它面前的困难,因为它对克服困难已经有了准备。

新反对派糟糕的地方、布哈林同志集团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些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总是表现张皇失措,他们总是打算逃避困难,在困难面前退却,放弃阵地。

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河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使自己的队伍精神沮丧,“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没准能侥幸冲到岸边。”(会场内的笑声)两种渔夫各有不同的方针。必须指出,布哈林同志的集团在发展着的阶级变动面前采取的方针和行动同第二种渔夫一模一样。

我们说,欧洲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共产党内的右倾作斗争,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党,加紧同掩护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加紧同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作斗争等等。可是

布哈林同志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想对他,即布哈林同志,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和加强企业中的劳动纪律,要实现这些任务,非根本改变工会的全部实际工作不可。可是托姆斯基同志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想对他,即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国民经济的改造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清除这些机关里的腐化分子和异己分子等等。可是李可夫同志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想对他,即李可夫同志,进行“恶意攻击”。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同志除了自己的肚脐以外,看不见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布哈林同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新的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不得不做事变的尾巴,在困难面前低头。

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 三、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我已经说过,布哈林同志看不见,也不了解新的革命高潮的日益增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共产党,制止调和态度并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新任务。我们近来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完全证实了这种情况。

事情是从布哈林同志提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开始的。通常,提纲都是预先经过联共代表团审查的。可是这一次没有遵守这个条件。于是由布哈林同志签署的提纲在送交联共代表团的同时,也分发给了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但是提纲中的许多条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联共代表团不得不对这个提纲提出了大约20处修正<sup>361</sup>。

斯克雷普尼克:还要多些,大约有50处。

斯大林:这种情况使布哈林同志的处境有些尴尬。但这是谁的过错呢?布哈林同志为什么不经过联共代表团审查就把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呢?既然提

纲不能令人满意,联共代表团能够不提出修正吗?结果弄成了这样:联共代表团实际上等于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新提纲,各国代表团就把它同布哈林同志签署的原来的提纲对立起来。很明显,如果布哈林同志不急于把自己的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就不会有这种尴尬的处境了。

我想指出联共代表团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所提出的四个主要修正。我之所以想指出这几个主要修正,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性质。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问题。照布哈林同志的提纲说来,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相反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很明显,对所谓第三个时期,即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做这样的估计是联共代表团不能同意的。之所以不能同意,是因为保留对第三个时期的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的批评家得到借口,说我们采取了所谓资本主义“恢复健康”的观点,即希法亭的观点,即我们共产党人所不能采取的观点。因此,联共代表团提出了修正,从修正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同志们,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具有决定的意义。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在动摇着还是在巩固着,——共产党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针都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我们现在是处在革命运动低落的时期,即单纯聚集力量的时期,还是处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时期,即训练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阶级战斗的时期,——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联共代表团所提出而后来为代表大会所采纳的修正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提出了以第二种前途,即以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前途为依据的明确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说,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本任务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强调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就是这个“左”翼玩弄“左的”词句并以此巧妙地欺骗工人,从而阻碍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很明显,不粉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可是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谈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联共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说到必须和右倾作斗争,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当我们向右倾宣战的时候,右倾分子总是装扮成调和分子,使党陷于困难的境地。为了防止右倾分子玩弄这种手腕,必须提出坚决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因此,联共代表团认为必须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没有提到必须在共产党内保持铁的纪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加紧和右倾作斗争的时期,在贯彻清除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口号的时期,右倾分子总是组成派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纪律,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为了使党不致受到右倾分子的派别袭击,必须提出党的铁的纪律和党员无条件服从这个纪律的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和右倾进行严重斗争。因此,联共代表团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提出了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第六次代表大会采纳了。

我们能不能不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呢?显然不能。古时候有人关于哲学家柏拉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爱柏拉图,但是我们更爱真理。关于布哈林同志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爱布哈林,但是我们更爱真理,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因此,联共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

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二阶段是和所谓维托夫和台尔曼事件有关的。维托夫是汉堡党组织的前任书记,被控盗用党的经费,因此被开除出党。虽然台尔曼同志和维托夫的罪行毫无关系。但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分子竟利用维托夫接近台尔曼同志这一点,把维托夫事件变成了台尔曼事件,并着手来推翻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你们大概已经从报刊的报道中知道,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哈特当时竟能把德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拉到自己方面去反对台尔曼同志。结果怎样呢?他们解除了台尔曼的领导职务,诬告他营私舞弊,并且没有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得到它的批准就公布了“相应的”决议。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和右倾以及调和态度作斗争,却对德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首先是台尔曼同志进行斗争,以便让调和分子取得胜利。布哈林同志引用了这件事的一些事实,他抱怨说,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很好地了解情况(他当时在北高加索休假),所以共产国际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也就是布哈林同志,似乎没有参与。同志们,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两个人,就是我和布哈林同志,当时是在休假。共产国际通知了我们并要求我们就台尔曼一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不妨听听布

哈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当时是这样回答共产国际的：

“必须通知政治局，经过它事先讨论。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案件可能造成重大损害。德共中央的决议在《红旗报》公布以后（这是一个大错误），由于许多原因，再宣布不同意德共中央的决定是不合适的。必须由台尔曼本人在报刊上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承认错误（不必通知中央），承认开除维托夫是必要的。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可以宣布已经得到报告，问题已经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可以不涉及。务必不使自己离开反装甲舰的运动。同时我建议派一个俄国人去帮助台尔曼，彻底消除德共中央上层中分裂活动的头面人物诺伊曼的恶劣影响。我请求迅速公布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能再拖下去了。”

请看，结果成了这样：调和分子排挤了德国共产党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台尔曼同志，他们不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在报刊上侮辱了他；他们不去同右倾和调和态度作斗争，争取革命派的胜利，却同革命派作斗争，争取调和派的胜利；他们不贯彻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却破坏这条路线。而布哈林同志不但不去掉转船舵，扭转局势，叫调和分子守规矩，反而在自己的答复里建议批准他们的篡夺行为，对台尔曼同志则建议他再一次在报刊上侮辱自己，宣布自己有过错。这就叫做共产国际的领导者！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领导者吗？这不是领导者，这是小学生！

下面是我对共产国际的答复：

“由于我不了解全部材料，所以只能谈一点初步意见。等我回到莫斯科，研究了所有的资料后，这些意见可能会有改变。第一，台尔曼犯了一个草率的错误，向中央委员会隐瞒了汉堡书记的罪行，为此中央委员会的那个大家知道的决议给了他惩罚。但他的错误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希望给汉堡书记一个不失脸面的改正机会，这就减轻了台尔曼的过失。

其次，公布决议，而且是在共产国际不知道的情况下，是一个敌视党和共产国际的行动，它只有利于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行动是由埃韦特和格哈特的宗派主义发展到极端而决定的。他们把自己宗派的利益置于党和共产国际的利益之上。我看不出这里有丝毫减轻他们过失的情况。应当把埃韦特和格哈特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从德国召回。”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两封电报并同意以我的回电作为基础<sup>362</sup>。这当然是布哈林同志所不喜欢的。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并不是要人们去违反它，而是要人们去执行它。既然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向右倾

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保持在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基本核心手中,而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哈特却想推翻这个决议,那么布哈林同志的职责就是叫调和分子守规矩,而不是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让给他们。这是布哈林同志的过错,因为他“忘记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三阶段是和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问题,和粉碎布兰德勒与塔尔盖默的派别组织并把这个派别组织的首领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关的<sup>363</sup>。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对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是:他们总是逃避而不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两次召集了联共代表团的会议,邀请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参与讨论问题,可是他们两次都没有出席。实质上这是决定德国共产党的命运的问题。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知道这一点,但总是避不参加有关的会议。为了什么呢?大概是为了既在共产国际面前,又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面前都不失为清白君子。为了以后可以说:把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开除出共产党的并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是斯大林和其他人。这就叫做和右倾危险作斗争!

最后,我们意见分歧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是和布哈林同志在中央十一月全会前提出的要求有关的。他当时要求从德国召回诺伊曼,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说台尔曼同志似乎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布哈林同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要求,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实布哈林同志的要求是对的。布哈林同志答应提出控诉诺伊曼和台尔曼的文件。可是他什么文件也没有提出来。他不但没有提出文件,反而把洪别尔-德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发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演说分发给联共代表团成员,而这篇演说正是后来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评定为机会主义的演说。布哈林同志把洪别尔-德罗的演说分发给联共代表团成员,并把它推荐为控诉台尔曼的材料,想证实他要求召回诺伊曼同志和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是正确的。实际上它却以此证明了他是赞同洪别尔-德罗同志的,而洪别尔-德罗同志的立场是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做机会主义立场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几点主要的意见分歧。

布哈林同志认为,我们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清除德国共产党内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传统,把布兰德勒分子和塔尔盖默分子开除出党,就是“瓦解”共产国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强调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就是巩固共产国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

产党训练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

由此可见,这不是单纯看法上的细微差别,而是在共产国际政策的根本问题上的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

#### 四、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上面我已经说过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我说过布哈林同志集团患了盲目症,看不见这些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我说过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新反对派的张皇失措,害怕困难,准备向困难低头。决不能说新反对派的这些错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恰恰相反,这些错误是和已经过去的那个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发展阶段有关的,当时的建设是通过和平道路进行的,也可以说是自流地进行的,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变动,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斗争方式,重新部署我们的力量,改善并巩固我们的一切组织。布哈林同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还过着旧生活,他们看不见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不了解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必要性。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盲目症、张皇失措、在困难面前惊慌不安。

##### (一)阶级斗争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布哈林同志集团的这种盲目症和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种盲目症和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就是布哈林同志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我指的是布哈林同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指的是他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

有些人在这里屡次引用布哈林同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那段人所共知的话。但是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时有一些遗漏。让我把这段话全部引证出来。同志们,为了说明布哈林同志已经远远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做是必要的。请听吧:

“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由‘劳动’式的基

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不过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异物,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黑体是我强调的。——斯大林)(H.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第49页)

有些同志在引证布哈林同志书中的这段话时,不知为什么把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遗漏了。罗济特同志大概想给布哈林同志帮忙,就利用这一点在这里从座位上叫喊起来,说人家曲解了布哈林的意思。可是这整段引文的要点正是在于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因为既然把承租企业家和富农相提并论,而富农又长入社会主义,那么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不仅富农,而且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场内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可惜奇阿图尔的承租企业家哈里曼已经离开了苏联<sup>364</sup>。

伏罗希洛夫:那就只好不管他了。

斯大林:罗济特同志,结果就是这样。

罗济特:布哈林同志说的是“异物”,请不要歪曲他的意思。

斯大林:布哈林说的不是“异物”,罗济特同志,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物”。所以,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异物。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正是在于他认为富农和承租企业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物,但还是会长入社会主义的。罗济特同志,请看布哈林同志的理论弄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城乡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都长入社会主义,——请看布哈林同志说出了多么愚蠢的话。不,同志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让布哈林同志自己把它拿去吧。

罗济特:就是在长入嘛,而且从内部加以分解。

斯大林: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而且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罗济特:这样说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前提的。

斯大林: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

罗济特:问题就在这里。



斯大林:但是照布哈林说来,资本家会长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罗济特同志,你怎么不理解这一点呢?既然城乡资本家会长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那么,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须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须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社会主义,那么,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

罗济特:问题就在于布哈林所说的长入是以阶级斗争为前提的。

斯大林:我看罗济特同志已经发誓要为布哈林同志效劳了。但是他的效劳像熊的效劳一样,因为他本来想救布哈林,事实上却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全场哈哈大笑)

臧声:不对,不是这样的。你不懂俄国谚语。

斯大林:俄国谚语我懂,亲爱的同志们,我只是不想做“粗鲁无礼”的人。(全场笑声)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没有这种利益的对立性,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

罗济特:布哈林并不承认协调,他的出发点就是必须同富农和资本家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

斯大林:在富农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同富农和资本家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是这样吗,罗济特同志?真是妙不可言!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或者是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阶级利益协调的理论。布伦坦诺或悉尼·维伯之类的“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那还可以理解,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可是,一个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同时鼓吹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

布哈林同志在他的发言中企图引用列宁的一段有名的话来证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同时他硬说列宁所说的和他所说的一样。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对列宁粗暴而不可容忍的诬蔑。下面是列宁这段话的原文: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

合作。”<sup>365</sup>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讲到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这里只说到我们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合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认为耐普曼有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呢?当然不是。只有不知羞耻的人才这样解释列宁的这段话。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消灭资产阶级,我们现在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容许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所谓一定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这些法律是要不断限制资本家并逐步把他们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的。不通过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基呢?不,不能。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而列宁的这段话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的。在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布哈林同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恰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

列宁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sup>366</sup>

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通过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同志的公式。

罗济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要曲解布哈林的意思。

奥尔忠尼启则(对乌加洛夫说):也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乌加洛夫:等他累了,我就说。(场内笑声)

斯大林:这两个公式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想,它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

由此可见,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它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的理论的<sup>367</sup>。

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说,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值得多谈的,因为这个理

论本身就说出了——不仅说出了,而且喊出了——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当这个理论搁着不用的时候,还可以不去理它。在各种各样同志的作品中各种各样的蠢话还少吗!直到最近我们都是这样处置的。可是最近情况变了。近几年来嚣张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已经开始鼓舞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具有现实的性质了。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搁着不用的了。现在布哈林同志的这个奇怪理论妄图成为我们党内右倾的旗帜,成为机会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已经不能忽视这个理论。因此,我们必须粉碎这个不正确的和有害的理论,便于我们的党员同志和右倾作斗争。

## (二)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

布哈林同志从它的第一个错误中产生出来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资本主义成分比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因而他们就加紧进行反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不,这里说的不是这个。并且,说资本主义成分比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是不对的。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已经濒于毁灭了。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正在胜利地进攻资本主义成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成分增长得快,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为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反抗。资本主义分子所以暂时还能够加紧反抗,不仅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援助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他们的相对增长和社会主义的增长比较起来虽然在减低,但他们的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蓄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增长。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目前这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加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个简单明白的真理。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企图用各种偶然的原因来解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例如:苏维埃机关的不中用,地方同志执行政策不谨慎、缺乏灵活性,过火行为等等。请看布哈林同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他完全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而且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别人发财并钻

进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现在开始向农村通讯员开枪,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这是不对的,因为最尖锐的斗争形式是暴动。——斯大林)。可是,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关还软弱无力的地区。随着这种机构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地方农村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十分明显,这类现象会越来越来少,以至最后绝迹。”

这样说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在机关方面,是在我们的基层组织中用还是不用,软弱还是强有力。这样说来,例如沙赫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一种形式,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形式)并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增长,而是由于我们的机关不用。这样说来,在沙赫特区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以前,我们的机关是好的,而后来在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机关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变成毫不中用的了。这样说来,在去年以前,当粮食收购工作还在听任自流地进行,我国阶级斗争还没有特别尖锐化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组织是好的,甚至是理想的,而从去年起,当富农的反抗采取了特别尖锐的形式的时候,我们的组织突然就变成不好的,甚至是不中用的了。这不是解释,而是巫师说鬼话。

罗济特:这不过是布哈林举的一个例子罢了。

斯大林:我知道罗济特同志是满心希望保卫布哈林同志,可是他的保卫无济于事,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应当明白,现在谈的不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次要原因,而是这种尖锐化的社会根源。

罗济特:这仅仅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个例子。(喧闹声)

柳布琴科:他这是在履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呢。

斯大林:不对,不是一个例子。布哈林直截了当地说:“随着这些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地方农村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越来越来少,以至最后绝迹。”罗济特同志,你听见了吗?这可是布哈林同志的话。

罗济特:请你重复一下这之前的两个句子。

斯大林:这种尖锐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在前进,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倒,如列宁所说的和他们做一次最后决战,还是他们把我们打倒。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

时还能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城乡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每日每时都从自己中间分泌出大小资本家来,而这些资本主义分子会采取一切办法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们的基层苏维埃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前进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反抗的。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

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资本家反抗的加紧和资本家比重的增长混同起来了。这样混同起来是毫无根据的。之所以没有根据,是因为资本家进行反抗不是意味着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越来越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越来越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反抗。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原因就在这里。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那么党的政策应当怎样呢?党的政策应当是唤起工人阶级和农村被剥削群众,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加强他们的动员准备,以便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以便和正在进行反抗的阶级敌人作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见解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 (三)农民问题

布哈林同志的第三个错误涉及农民问题。大家知道,农民问题是我们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我国条件下,农民是由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主要由贫农、中农和富农组成的。很明显,我们对这些集团的态度不能是一样的。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这就是我们对这些社会集团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尽人皆知的。可是布哈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在他说明农民的特征的时候,农民分化的事实不见了,存在着几个社会集团的事实也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叫做农

村的灰色斑点。在他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在这里发言时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做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说:我国的中农难道像中农吗?这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很明显,对农民的这种看法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根本错误的看法。

列宁说过,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做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工农联盟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而只是建立在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的那种联盟。由此可见,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论点不但不和工农联盟的思想相矛盾,反而给这个旨在反对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提供了根据。列宁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指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只有建立在和农民本身分泌出来的那些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和不接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忘记了农村中的社会集团,在他的视野中富农和贫农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农群众。这种情况表明了布哈林同志的毫无疑问的右倾,这种右倾和“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相反,“左”倾除了贫农和富农以外看不见农村中的其他社会集团,中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两种倾向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和对农民问题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提法相去甚远。

有意思的是布哈林同志的一个学生、《列宁格勒真理报》前任编辑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曾经对列宁把农民看做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提纲宣战。事情是这样的。我给《列宁格勒真理报》寄去一篇文章《在粮食战线上》,其中引用了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那段话。看来,《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不喜欢这一段列宁的引文,它二话不说,大笔一挥就把它从文章里勾掉了。(场内笑声)

乌加洛夫:可是彼得罗夫斯基并没有参与这件事。

斯大林:很抱歉,乌加洛夫同志,他参与了。

奥尔忠尼启则:乌加洛夫来接罗济特的班了。

伏罗希洛夫:也来履行职责了。

斯大林:我当时就这件事给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写了封信。我提醒他说,第一,他不经作者同意无权删改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文章,其次,他无权勾掉总共只占几行的列宁的引文。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回答说,编辑部删去列宁的引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这样的回答显然没有说服力。看来,是编辑部觉得列宁的提纲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合适的。

奥尔忠尼启则:是异端邪说。

斯大林:对,是异端邪说。能不能认为这次意外事件是偶然的呢?我想,决不能这样认为。这次事件表明了布哈林同志的追随者们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机会主义的思想混乱。

在和农民联盟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同志集团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联盟,而宁愿要“依靠农民”的公式,布哈林集团则主张和全体农民建立任何一种联盟。用不着证明,这两种立场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是半斤,一个是八两。列宁主义者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联盟,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这种联盟。

列宁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妥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如果不这样看,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妥协这个公式自然就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专政的一切敌人按照自己的观点所理解的公式。”<sup>368</sup>

列宁还说:“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领导着政权。它领导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的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sup>369</sup>

这就是列宁对于和基本农民群众联盟即和中农联盟问题的看法。

布哈林同志集团在中农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中农的两重性,看不见中农介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两重地位。列宁说:“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为什么呢?因为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由此就产生了中农的动摇。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这种动摇也是每日每时都在

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列宁说：“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sup>370</sup>

因此，和中农的联盟只有当它的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时候，只有当它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时候，才能是巩固的。

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同志集团忘记了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

#### (四) 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

布哈林同志的第四个错误涉及新经济政策问题。布哈林同志的这个错误在于他看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只看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我们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是把它的锋芒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指向排斥任何贸易自由的制度和秩序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这一方面布哈林同志记住了。这是很好的。但是，布哈林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有这一方面，那就错了。布哈林同志忘记了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绝不是容许完全的贸易自由，绝不是容许在市场上价格可以自由浮动。新经济政策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贸易在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方面。而且新经济政策的这一个方面和它的第一个方面对我们同样重要，如果不说更为重要的话。在我国市场上没有像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那种价格自由浮动的现象。粮食价格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工业品价格是由我们规定的。我们努力实行降低产品成本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以便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这种独特的市场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没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只要新经济政策存在，就应当保持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贸易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对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会受到“从左边”即从那些想取消任何贸易自由的人们方面来的威胁。这是不对的。这是极大的错误。而且这种危险现在是最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里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



不懂得保持一定的贸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和适当的。从右边来的危险,即从那些想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想“解放”市场,从而开辟贸易完全自由的纪元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要现实得多。不应当忘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活动,正是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也应当记住,富农和富裕分子的叫嚷(我们的许多同志常常受这种叫嚷的影响),正是从这方面来攻击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同志看不见破坏新经济政策的这第二种、真正现实的危险,这个事实无可怀疑地说明他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屈服了。

布哈林同志提议使市场“规范化”,按地区“调整”粮食收购价格,即提高粮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不满意苏维埃的市场条件,他想逐渐刹住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提议向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让步。姑且假定我们听从了布哈林同志的劝告,结果会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在秋天,在收购初期提高了粮价。但是由于市场上总是有一些人,各种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会用高出两倍的价钱来收买粮食,而我们又跟不上投机分子,因为他们总共不过收买1000万普特左右,而我们却要收买几亿普特,所以粮食持有者还是会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价格继续上涨。这样,到了春天,当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度提高粮价。而在春天提高粮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害了贫农和农村中的弱势阶层,他们在春天不得不买进粮食,一部分做种子,一部分做口粮,而这些粮食就是他们在秋天按照比较低的价格卖出去的。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是否就能收到什么显著的效果,即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呢?最可能的是得不到,因为总有一些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又会用高出一两倍的价钱来收买这些粮食。于是我们又必须准备再一次提高粮价,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由此可见,只要一走上提高粮价的道路,我们就必定会继续滚下去,而且没有保证可以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第一,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以后,我们还必须提高农业所生产的原料的价格,以保持各种农产品的一定比价。第二,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我们在城市里就不能保持低廉的粮价,因而也就必须提高粮食的售价。因为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委屈工人,我们就必须加速提高工资。但是,这样做就不能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因为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就会违反工业化的利益,使资金从城市流入农村。结果我们就必须不是在降低价格的基础上,而是在提高粮价和工业品价格的基础上来拉平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采取使工业品和农产品涨价的方针。不难理解,这样“调整”价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苏维埃价格政策,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会有利于谁

呢？只会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因为工人阶级以及贫农和农村中的弱势阶层是买不起昂贵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占便宜的是富农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阶级。这也是结合，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结合——同城乡富有阶层的结合。工人和农村中的弱势阶层将有充分权力来质问我：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政权？

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的弱势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规范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

布哈林同志对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概念是多么混乱，他做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俘虏是多么服帖——这一点就从他对城乡之间，国家和农民之间商品流转的新形式问题所表现的极端否定的态度中也看得出来。他看见国家成了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正在成为国家粮食的供应者，就表示愤怒，大肆反对。他认为这是违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规矩，几乎是破坏新经济政策。试问，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国家、国营工业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则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农民已经变成国营工业所需要的棉花、甜菜、亚麻的供应者，而国营工业已经变成这些农业部门的城市商品、种子和生产工具的供应者，从马克思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观点看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签订预购合同的方法在这里是建立城乡之间商品流转的这些新形式的基本方法。难道签订预购合同的方法是同新经济政策的要求相抵触的吗？由于采用这种签订预购合同的方法，农民不仅在棉花、甜菜、亚麻方面，而且在粮食方面正在成为国家的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小宗交易可以叫做商品流转，而按照事先就货物的价格和质量订立的合同（签订预购合同）进行的大宗交易就不能叫做商品流转呢？城乡之间按照预购合同的方法进行的商品流转的这些新的群众性的形式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形式是我们各个组织在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大的进步，这难道很难理解吗？

布哈林同志竟不能理解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这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 （五）所谓“贡赋”问题

布哈林同志的第五个错误（我说的是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赋”问题上对党的路线做了机会主义的歪曲。

我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或者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

(1929年2月)关于“剪刀差”问题的著名决议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农民缴纳的这种超额税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是事实。我们还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剪刀差”,叫做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把资金从农业“抽入”工业。是否需要采取这种“抽入”的办法呢?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采取这种办法是需要的。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我们不能。一旦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它。于是,由于“剪刀差”而形成的这种超额税就成了“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不是贡赋,而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落后而产生的“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需要这种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

这是不是说,征收这种额外税我们就是剥削农民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苏维埃政权的本质不容许国家对农民有任何剥削。我在七月全会的发言中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下,排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农民是否担负得起这种额外税呢?是的,担负得起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征收的。第二,因为额外税是逐年减少的。我们用“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的字眼来称呼这种额外税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用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们的同志,征收这种额外税是令人不愉快的,把它长期保留下去是不能容许的。我们这样称呼加于农民的额外税,是想指出我们征收这种税并不是出于本愿,而是由于需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一旦有可能就取消这种额外税。

关于“剪刀差”问题、关于“抽入”问题、关于“超额税”问题、关于在上述文件中被称为“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的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曾经企图挑剔“贡赋”这个字眼,并责备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但是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这是企图极粗暴地诬蔑我们党。现在连这些同志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他们关于军事封建剥削的胡说是彻底破产了。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这些同志承认“剪刀差”和把资金从农业“抽入”工业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责备是诬蔑,承认党是完全正确的;或者他们否认“剪刀差”和“抽入”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请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让党把他们算入我国工业化的反对者之列。不管怎样,我可以引证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许多讲话,在那些讲话中他们明白无误地承认“剪刀差”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

承认把资金从农业“抽入”工业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就是承认“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的提法。怎么样,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坚持“抽入”的观点,还坚持在目前保留“剪刀差”的观点呢?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

罗济特:抽入是需要的,但“贡赋”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全场大笑)

斯大林:安静些,罗济特同志,别激动,激动对神经质的人来说是有害的。这样看来,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并没有意见分歧,这样看来,把资金从农业“抽入”工业,所谓“剪刀差”、额外税、“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是目前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一种手段。很好。那么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吵嚷呢?因为他们不喜欢“贡赋”这个字眼吗?可是在前面提到文件中用的不是“贡赋”,而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你们看到,在这里遵循了谨慎的所有要求。不喜欢“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这种说法吗?那我们就来谈谈“贡赋”这个字眼。

罗济特:决议里直截了当用了“贡赋”。

斯大林:这话不对,罗济特同志。你好好读读决议吧。好吧,我们就来谈谈“贡赋”这个字眼。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字眼在我们的文献中,例如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认。同志们,这会使一些没有读过列宁著作的人感到奇怪,然而这是事实。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赋”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赋”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就得到了公认,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或许在布哈林同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那么,亲爱的同志们,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例如你们就拿列宁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来读一读下面这段话: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少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sup>371</sup>

看来已经清楚了。能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宣称列宁同志主张对工人阶级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呢？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试试看！

罗济特：反正在中农从来没有用过“贡赋”这个概念。

斯大林：如果你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我们，那你就太丢人了。我见过许多傻瓜，可是像你这样的还没见过。（全场大笑）

罗济特：这话其实并不俏皮。

斯大林：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赋”，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布哈林集团的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搞错了，彻底地搞错了。

有些爱挑剔的人会以为《论“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贡赋”这个字眼是列宁同志的失言，是偶然的失言。但是经过检查证明，这些爱挑剔的人的猜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你们就拿列宁同志的另一篇文章（更正确地说是小册子）《论粮食税》（1921年4月）来读一读其中的第205页。<sup>372</sup>你们可以看到，刚才引证的关于“贡赋”那一段话，列宁同志在那里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最后，你们再拿列宁同志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一文<sup>373</sup>来看一看，你们可以看到，列宁在这里也说到“因我们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赋（已经不加括号了）”。

由此可见，“贡赋”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文章中绝不是偶然的東西。列宁同志使用这个字眼是为了强调“贡赋”的暂时性，加强布尔什维克的毅力，以便一有可能就取消工人阶级因为我们的落后，因为我们的“缺点”而付出的这种“贡赋”。由此可见，在用“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的说法上，我是和一些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伙的，和列宁同志一伙的。

奥尔忠尼启则：就是这样。

斯大林：不过，还有差别。我知道我们有些同志喜欢挑剔，所以我用的字眼（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比列宁同志用的（贡赋）更谨慎些。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容许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贡赋”这个字眼。他说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如果他指的是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彼得罗夫斯基、罗济特等等一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布哈林的气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与其说像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像自由主义者。如果他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列宁同志，那么应当承认，“贡赋”这个字眼在他们中间早已得到了公认，而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是文不对题了。

但是“贡赋”问题还不限于此。问题在于，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挑剔“贡

赋”这个字眼,而且说起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话来,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我认为,他们吵嚷说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是想表示他们对于我们各机关所实行的我们党对待农民的政策极端不满。对党在领导农民方面的列宁的政策不满,对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不满,对我们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不满,最后,希望“解放”市场和规定贸易完全自由,——这就是布哈林同志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叫嚷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没有看见过责备党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第二个例子。这种反党武器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库里拿来的。那么是从哪里拿来的呢?

柳布琴科:是从米留可夫的《最近新闻报》里拿来的。

斯大林:对了。是从米留可夫的武库里拿来的。当立宪民主党人想要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是在农民的白骨上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同志对于“贡赋”吵吵嚷嚷,就是附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就是做自由主义者的尾巴。

布哈林同志在“贡赋”问题上的错误是对党在农民问题上的路线所做的自由主义的歪曲。

## (六)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最后是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城乡结合的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党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实际分歧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首先,我就托姆斯基同志简单说几句。在他身上出现了一些对正常人来说是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政治局在通过五年计划纲要时讨论了结合的新形式问题。布哈林同志当时代表他自己、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其中讲到应该“鼓励和发展工农业结合的新形式”。这是布哈林同志和我们讲和的尝试,不过只是表面的,做做样子而已。托姆斯基同志投票赞成这个“修正案”。这就是说,托姆斯基承认,至少是在口头上承认需要结合的新形式。可是现在他却在发言中宣称结合的新形式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是修改列宁的政策。这真是荒唐至极,谁能说得明白。结果成了这样:我们向中央全会和代表会议提出的所有提纲,其中宣布了需要结合的新形式的,都是对列宁政策的修正。结果是托姆斯基本人也在修正列宁主义,因为他在政治局对结合的新形式投了赞成票。不过说实话,托姆斯基同志显然对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一点也不懂,对列宁主

义的问题也稀里糊涂,他反对结合的新形式,也就是反对列宁主义,企图修正列宁主义。否则就不能理解,怎么能够既赞成结合的新形式,同时又投票反对它们。也许,托姆斯基同志还没有读过“修正案”,就给它投了赞成票了?

奥尔忠尼启则:他完全信任,所以用不着读了。

乌加洛夫:这就不对了:他是聋子,可是阅读能力还是有的。

斯大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托姆斯基同志并不理解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所以偶然地投了赞成票,或者是他闹了个莫名其妙的误会。

什么是结合的新形式呢?从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说,除了城乡结合的旧形式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的新形式。在旧形式下,工业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花布、鞋子、一般纺织品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业将满足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农业机器、拖拉机、优良种子、肥料等等)。过去我们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而现在除了继续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以外,我们还必须尽力供应那些对于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当问题是恢复农业,使农民经营过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满足于旧的结合形式。可是现在,当问题是改造农业的时候,这就已经不够了。现在须要更进一步,须要帮助农民在新技术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

其次,这就是说,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农业。我们正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而且已经重新装备了一部分,为工业奠定了新的技术基础,给工业供给了新的优良机器和新的优秀干部。我们正在建设新工厂,我们正在改造和扩建旧工厂,我们正在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这个基础上,城市正在发展,新的工业区正在增多,旧的工业区正在扩大。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正在增长。而农业仍然使用着旧式农具,使用着古老陈旧的耕作方法,使用着原始的、现在已经不适用或几乎不适用的旧技术,采用着旧的、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和劳动方式。例如我国在革命前约有1600万农户,而现在至少有2500万农户,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是说明农业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又是说明什么呢?而分散的小经济的特征就在于它无力充分利用技术、机器、拖拉机和农业科学成就,它是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由此就产生了农产品商品量的不足。由此就产生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破裂的危险。由此就产生了使农业跟上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必要性。要避免这种关系破裂的危险,就必须开始认真地在新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农业。而要重新装备农业,就必须逐步地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联合为大农庄

即集体农庄,必须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设农业,必须扩大集体经济,必须发展原有的和新建的国营农场,必须有步骤地把签订预购合同这种群众性的形式应用到农业的一切主要部门中去,必须发展帮助农民掌握新技术并使劳动集体化的机器拖拉机站系统,——一句话,必须逐步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和新技术成就,才能一日千里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当丢开个体贫农户和中农户,不,不是这个意思。个体贫农户和中农户在为工业提供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在最近的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必须帮助个体贫农户和中农户。但这是说,单靠个体农民经济已经不够了。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以全力发展集体经济形式和国营农场来补充个体贫农户和中农户的发展。因此,必须在个体贫农户和中农户和公共的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便于农民把他们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真正发展农业。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摆脱贫困。

最后,这就是说,必须全力发展我国工业——我国农业生产在改造方面所赖以滋养的主要源泉,必须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必须建设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无须证明,不通过广泛订立预购合同来把基本农民群众引向集体经营形式,不以大量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等等供给农业,就不能发展集体农庄,就不能发展国营农场,就不能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但是不加速发展我国工业,就不能以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村。因此,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是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

结合的新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就是这样。

布哈林同志集团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必要性。但这不过是口头上的承认,其目的是要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幌子下偷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其实布哈林同志是反对结合的新形式的。布哈林同志所持的出发点不是迅速发展工业这一改造农业生产的杠杆,而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使市场“规范化”,容许在农产品市场上价格自由浮动,容许贸易完全自由。由此就产生了他对集体农庄的不信任态度,他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发言中和他在中央七月全会前拟定,而至今瞒着中央的提纲中都表现了这种态度。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收购粮食时所采取的对付富农的一切非常措施的否定态度。大家知道,布哈林同志躲避非常措施就像小鬼躲避阎王一样。大家知道,



布哈林同志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会自愿地、自发地交出足够数量的粮食的。这一点现在已经由我们两年来的收购工作的经验证明了。如果商品粮食还是不够,那该怎么办呢?布哈林同志回答说:要从国外输入粮食。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提议从国外输入5000万普特左右的粮食,就是说,用大约1亿卢布的外汇输入粮食。如果外汇不能满足既输入工业设备,又输入粮食的需要,那该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应当首先从国外输入粮食。这显然是要把输入工业设备的事情放在后面。这样说来,解决谷物问题和改造农业的基础不是迅速发展工业,而是通过自由市场和在市场上价格的自由浮动来发展个体农民经济。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政策方案。

党的方案:

1. 我们重新装备(改造)工业。

2. 我们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改造)农业。

3. 为此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广泛地订立预购合同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

4. 至于目前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那么必须承认可以采取一些依靠中农和贫农群众共同支持的临时性非常措施,作为击破富农反抗和从富农手里取得最大限度余粮的一种手段,而这些余粮是避免输入粮食和保存外汇以发展工业所必需的。

5. 个体贫农户和中农户在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还起着主要作用,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但是单靠他们已经不够了;因此,必须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产,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加紧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来补充个体贫农和中农经济的发展,以便易于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中排挤出去,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步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引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6. 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不然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也不能改造农业。

结论:迅速发展工业是改造农业的关键。

布哈林同志的方案:

1. 使市场“规范化”,容许在市场上价格自由浮动和提高粮价,即使这样做会使工业产品、原料和粮食涨价。

2.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以便全力发展个体

农民经济(布哈林的七月提纲,布哈林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

3. 以自流的方式收购粮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富农,即使这些措施得到中农和贫农的支持。

4. 缺粮时就输入约值1亿卢布的粮食。

5. 如果外汇不够,不能同时输入粮食和工业设备,那就应当减少工业设备的输入,也就是说,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不然我国农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直线下降”(《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

结论:因此,改造农业的关键不是加紧发展工业,而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布哈林同志的方案是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破坏结合的新形式的方案。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方面是不是做迟了呢?有人武断地说,党在这件事上至少做迟了两年。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在这件事上做迟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的是宣布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口号,那么我们早在十月革命时就开始做这件事了。还在那时,在十月革命时期,党就已经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但是单靠我们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还不足以实现和组织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可见这里说的不是预见,而是实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计划。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计划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直到最近才出现的。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为了实行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的计划,首先必须使党员群众在这方面支持党的领导上层。大家知道,我们党是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大党。其次,为此必须在农民中间造成拥护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必须使农民不害怕集体农庄,而且自愿欢迎集体农庄。这是一件需要相当时间的大事情。再次,必须……

米高扬:必须有资金。

伏罗希洛夫:必须有发达的工业。

斯大林:必须使国家有一笔为资助集体农庄建设,为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经费。亲爱的同志们,这件事情是需要几亿几亿卢布的。最后,为此必须使工业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以便供给农业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能不能断言我们在两三年以前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呢?不,不能这样断言。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在野党可以提出一些口号(我说的是运动中的根本的实践口号),以求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实现。谁也不会责备在野党

不立刻实现他们的根本口号,因为大家都明白,执政的不是他们在野党,而是别的政党。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的口号,而是一种重要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解决问题的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我们党不能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然后又把它搁置起来不去执行。这样做就是欺骗群众。要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特别是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引上集体制轨道这样重大的口号,就必须具备直接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而且首先必须创造和组织这些条件。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说,单靠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是不够的。

比如说在两三年前,我们的党员群众对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是已经有了准备呢?不,他们当时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准备。党员群众向结合的新形式方面的重大转变是从粮食收购方面发生第一批严重困难的时候才开始的。由于发生了这些困难,党员群众才感觉到加速建立结合的新形式,首先是加速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部必要性。你们看,这就是我们以前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在两三年以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千百万农民群众拥护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大运动呢?不,没有。谁都知道,在两三年以前,农民敌视国营农场,而把集体农庄鄙视为毫无用处的“康姆尼”。可是现在呢?现在是另一种情况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看做农民经济获得种子、良种牲畜、机器、拖拉机等帮助的来源。现在只要供给机器和拖拉机,集体农庄事业就会加速前进。一些相当大的农民阶层中的这种转变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呢?首先是合作社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不容怀疑,如果没有合作社,特别是在农民中间造成了拥护集体农庄的心理基础的农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我们就不会看到现在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所表现的那种参加集体农庄的渴望。现有的办得很好的集体农庄在这里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给农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经济即集体经济是可以改进农业的。现有的设备完善的国营农场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它们帮助农民改善了经济。至于你们都熟知的其他事实,我就不谈了。你们看,这又是我们以前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其次,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就已经有可能大量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这方面拨出几亿卢布呢?不,不能这样断言。你们很清楚,我们当时甚至缺少资金去发展最低限度的工业,而没有这些工业就根本不能实现任何现代化,更不用说改造农业了。我们当时能不能从作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工业中

抽出这些资金,把它交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呢?显然不能。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资金。

最后,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的工业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基础来加紧供给农业机器、拖拉机等等呢?不,不能这样断言。当时的任务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工业基础以便将来供给农业机器和拖拉机。当时我们也就是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建立这个基础的。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发展农业的工业基础。至少这个基础在我国正在加速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只是到最近才在我国形成了大量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条件。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方面做迟了。

### (七)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同志

新反对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同志在我们政策的各个基本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大体上就是这样。

有人说,布哈林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当然是理论家,而且是大理论家。但是,问题在于他那套理论不完全行得通。这就从我刚才所分析的他在党的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一大堆错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错误,即在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出现在他身上绝不是偶然的。不,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布哈林同志的这些错误是从他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从他的理论缺陷中产生出来的。是的,布哈林同志是理论家,但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有人援引列宁同志评论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的那封著名的信。让我们来读读这封信吧:

列宁说:“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黑体是我强调的。——斯大林)(1926年7月全会速记记

录第4册第66页)<sup>374</sup>

总之,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繁琐哲学的理论家。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的理论家。这就是列宁对布哈林同志的理论面目所做的评定。

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理论家还需要补习一下。假如布哈林同志知道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家,他还须要补习一下,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的理论家,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假如他知道这些,那么他就会谦虚一点,这对党是只会有好处的。但糟糕的是布哈林同志不知道谦虚。糟糕的是他不仅不知道谦虚,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首先是在国家问题上,竟教训起我们的导师列宁来了。

说到这里,让我援引一下1916年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所发生的那次大家知道的理论争论。这对我们揭露布哈林同志妄想教训列宁的那种不自量力的奢望,以及他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弱点的根源,是很重要的。大家知道,1916年在《青年国际》杂志<sup>375</sup>上登载了布哈林同志的一篇署名 Nota Bene 的论文,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专门反对列宁同志的。布哈林同志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先进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只是意味着倒退,退到旧技术,退到旧式企业……”

“社会民主党是群众的教师,或者至少应当成为群众的教师,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须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观念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

列宁同志批评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观点时说:

“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但他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国家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想‘废除’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像 Nota Bene 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

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承认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会‘自行消亡’，逐渐‘自行停止’。”

“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组织的根蒂’一语是十分含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组织’和对国家组织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sup>376</sup>

看来很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滚入了什么样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斯腾：**列宁当时还没有详细阐述“炸毁”国家的必要性。布哈林虽然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但是已经着手阐述这个问题了。

**斯大林：**不，斯腾同志，现在说的不是这个，现在说的是对于一般国家的态度，说的是布哈林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包括工人阶级的国家在内。

**斯腾：**列宁当时只谈到利用国家的问题，在对布哈林同志的批评中丝毫没有谈到“炸毁”问题。

**斯大林：**你弄错了，斯腾同志。我敢向你担保，这里说的是布哈林（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人应当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因而也敌视过渡时期的国家，敌视工人阶级的国家的态度。你不妨试试向我们的工人解释一下，说工人阶级应当抱着在原则上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国家。布哈林在他登载于《青年国际》杂志上的论文中所陈述的观点，是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国家的观点。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如果真正想镇压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就非有自己的国家不可。这是第一。第二，说列宁同志当时在它的批评中没有提到“炸毁”，“废除”一般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对的。从我所摘引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列宁不仅提到了这种理论，而且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把它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并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建立新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来和它对立。最后，决不能把“炸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打破”，“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混为一谈。有的同志喜欢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但这是不对的。同志们,是完全不对的。列宁在批评“炸毁”和“废除”一般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以“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sup>377</sup>为了使问题更加清楚,我不妨在这里引证列宁同志关于国家问题的一篇手稿,这篇手稿大概是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写的。从这篇手稿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甲)列宁批评布哈林同志在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错误的时候,是以“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乙)照列宁的说法,虽然布哈林“比考茨基更接近真理”,但他还是“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主义者,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他们”。请看这篇手稿的原文:

“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对国家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现在把最重要的地方全部引出来: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 and 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黑体是恩格斯用的)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黑体是恩格斯用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这大概是所谓‘反对国家’的最精彩最激烈的一段了。

(1)‘应当抛弃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

(2)‘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那么是什么呢?显然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

(3)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in die Zähne geworfen——直译=打嘴巴)够了。(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自己德国朋友的这种明显的错误感到羞愧;——但是,他们认为,并且按当时情况来看当然是正确地认为,这种错误比起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来要小得多。注意这一点!!)

(4)‘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分解(“解体”)**注意**和消失。……’(对照后来的:‘消亡’)

(5)国家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所需要的(自然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暂时的机关’。

(6)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 Niederhaltung 就本来意义说不是镇压,而是制止复辟,制服)无产阶级的敌人。

(7)一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

(8)‘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建议(在纲领中)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庸俗化和玷污了的不仅是机会主义者,而且还有考茨基。

这8点极丰富的思想,机会主义者一点也不理解!!

他们仅仅看到目前的实际需要:利用政治斗争,利用现代国家来训练、教育无产阶级,来‘争取让步’。这是正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比较),但这还只是1%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可以用算术分数来表示的话。

考茨基在他的宣传活动和一般政论活动中完全抹杀了(或者忘记了?或者不懂得?)第1、2、5、6、7、8各点和马克思的‘打碎’(在1912年或1913年同潘涅库克的论战中,考茨基|见下面第45—47页|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陷入了机会主义)。

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是:我们主张( $\alpha$ )现在利用国家,并且( $\beta$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利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现在就对实践极其重要。(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点!)

我们同机会主义者的区别是我们有更深刻、‘更永恒的’真理:( $\alpha\alpha$ )国家是‘暂时’的,( $\beta\beta$ )现在关于国家的‘废话’是有害的,( $\gamma\gamma$ )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不完全是国家,( $\delta\delta$ )国家和自由是矛盾的,( $\varepsilon\varepsilon$ )用来代替国家的‘公团’是个更正确的观念(概念,纲领用语),( $\zeta\zeta$ )‘打碎’(Zerbrechen)官僚军事机器。此外,不应当忘记: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德国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科尔布等等)是直接地否认,而正式纲领和考茨基则是间接地否认,在日常宣传中闭口不谈它,并且容忍科尔布之流的背叛行为。

1916年8月曾写信给布哈林:‘让你的关于国家的思想成熟起来吧。’但是,他没有让它成熟起来,就以‘Nota Bene’为笔名爬上了报刊,结果不但没有揭露



考茨基主义者,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他们!! 不过,从实质上看,布哈林比考茨基更接近真理。”<sup>378</sup>

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争论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问题看来已经很清楚: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已经是改正这些错误,跟随列宁前进的时候了。但是只有列宁主义者才会这样想。而布哈林却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反而硬说: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列宁;不是他跟随了或者应当跟随列宁走,相反地,倒是列宁不得不跟随布哈林走。同志们,你们相信吗?那么,请再往下听吧。1916年发生这些争论后过了九年(这九年当中布哈林同志一直保持着缄默),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即在1925年,布哈林同志在《法权革命》文集上发表了从前《社会民主党人文集》<sup>379</sup>编辑部(即列宁)所未予发表的《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布哈林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公然声称:在这次争论中对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同志们,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看看布哈林同志自负到了何等地步。请听这个注释的原文吧:

“弗·伊·(即列宁)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错误,那个错误是硬加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炸毁’国家(当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原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问题混淆起来了。(黑体是我强调的。——斯大林)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你,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你没有意见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黑体是我强调的。——斯大林),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发挥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法权革命》,第1集,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社,1925年,第5页)

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布哈林同志就是这样议论列宁的。

你们看,这就是没有学成的理论家的过分妄自尊大的标本!

很可能,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确实向布哈林同志说过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写的话。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列

宁有某些根据认为布哈林同志放弃了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仅此而已。可是布哈林同志却另有想法。他认定：从今以后，应当被看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始者或者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即布哈林同志。我们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我们是列宁主义者。而现在看来，列宁和我们（他的学生）都是布哈林主义者。同志们，真是有点好笑。可是，既然遇到了布哈林同志的这种狂妄自大，那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有人以为布哈林同志在他上述文章的注释中不过是偶尔失言，他说了蠢话，后来就忘记了。但这种想法却是不对的。布哈林同志说这些话其实是十分认真的。这就从下面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布哈林同志在这个注释中所做的关于列宁错误而布哈林正确的声明，在不久以前，就是在1927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攻击列宁后过了两年，又在马列茨基同志所写的布哈林传略中发表了（见《苏联百科全书》），而布哈林同志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抗议马列茨基同志的这种……大胆行为。很明显，布哈林同志反对列宁的言行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臧声：对。

斯大林：这样说来，对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提倡者不是列宁，而是布哈林。

卡冈诺维奇：在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斯大林：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大家和列宁一样，都应当算做布哈林同志的学生。（笑声）

同志们，布哈林同志的理论偏见和理论野心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这个人在这里发言时却还有勇气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某种东西腐朽了”，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说这种话的就是这个布哈林同志，就是这个在我们党的政策上现在犯了（过去也犯过）许多极严重的错误，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生，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和他们暗中勾结的布哈林同志！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

## （八）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

现在让我来谈谈李可夫同志的发言。布哈林同志曾经企图给右倾提供理论根据，而李可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竭力想为这件事情打下实际建议的基础，拿我国农业方面的困难的“可怕景象”来吓唬我们。这并不是说，李可夫同志没有涉及理论问题。不，他是涉及理论问题的。可是，他涉及理论问题的时候，犯了两

个严重的错误。

李可夫同志在他那个被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的关于五年计划的草案中说：“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在于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虽然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这个完全不正确的观点，但是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发言时仍然为这个观点辩护。苏维埃国家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话对不对呢？不，不对。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我们需要的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一定的增长，即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同志们，这才是关键所在。五年计划如果忘记了这个中心思想，就不是五年计划，而是五年胡说了。任何一个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都关心劳动生产率的一般增长。苏维埃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关心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而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比其他经济形式，首先就是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占优势，因而能够保证战胜和排挤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那种增长。可是李可夫同志忘记了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的这个真正的中心思想。这是他的第一个理论错误。

他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不区分或者不愿意了解集体农庄和任何个体经济（包括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在内）在商品流转方面的差别。李可夫同志断言，从粮食市场的商品流转方面看来，从取得粮食方面看来，他认为集体农庄和粮食私有者之间没有差别，所以在他看来我们向集体农庄，向粮食私有者还是向阿根廷的某个粮商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重复弗鲁姆金同志的论调，弗鲁姆金同志有一个时候曾经断言，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和向什么人买粮食，向私有者还是向集体农庄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这是用伪装形式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的阴谋诡计辩护、辩解和辩白。虽然这种辩护是从商品流转的观点上进行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真相，这终究是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的阴谋诡计做辩护。如果从商品流转方面看来集体经济形式和非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没有差别，那么是否还值得去发展集体农庄，是否还值得给它们优待，是否还值得去执行战胜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这项困难任务呢？显然，李可夫同志采取了不正确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二个理论错误。

这些不过是顺便提一提。现在来谈谈李可夫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实际问题。

李可夫同志在这里断定说，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须要有另一个平行的计划，即发展农业的两年计划。他以农业方面的困难作为提出这个平行的两年计

划的根据。他说,五年计划是一件好事,他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还提出一个农业的两年计划,那就更好了,否则农业就会停滞不前。从表面上看,这个提议似乎没有任何坏处。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那就可以看出:想出农业的两年计划是为了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而两年计划则相反,具有现实的、实际的性质。我们能不能同意这一点呢?不,不能。我们对李可夫同志说过:如果你在农业方面不满意五年计划,如果你认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用于发展农业的拨款不够,那就请你直率地说出你的补充建议,说出你的追加投资额,我们同意把农业方面的这些追加投资额加进五年计划。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同志并没有任何关于农业追加投资的补充建议。试问,究竟为什么需要平行的农业两年计划呢?其次,我们对他说: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有年度计划,这是五年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你在发展农业方面的那些具体的补充建议加进头两年的年度计划,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建议的话。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同志并不想提出这种具体的追加拨款的计划。于是我们明白了:李可夫同志提出两年计划不是为了发展农业,而是想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想破坏五年计划的威信。为了安慰“心灵”,为了装饰门面,就需要五年计划;为了行动,为了进行实际工作,就需要两年计划,——这就是李可夫同志的战略。李可夫同志提出两年计划,是为了以后在五年计划实际执行过程中拿两年计划来和五年计划对立,改变五年计划,使五年计划迁就两年计划,削减工业拨款。

就是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否决了李可夫同志关于平行的两年计划的建议。

### (九)播种面积问题

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吓唬党,断言苏联的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同时他向党暗示,播种面积的缩小应当归咎于党的政策。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正在走向退化。但是他的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有某种类似退化的现象。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这样说对不对呢?不,不对。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利用的是全国播种面积的平均数。但是使用平均数的方法如果不用按地区统计的材料加以校正,那就不是科学的方法。也许李可夫同志曾经读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他读过,他就应当记得列宁在那本书中怎样责骂那些在估计播种面积的增长时采用平均数的方法,而忽视按地区统计的材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真奇怪,李可夫同志现在竟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

误。如果按地区观察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就是说,如果科学地对待问题,那就可以看出,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在不断增加,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减(主要是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材料可以说明我国有什么地方,哪怕只是一个重要的产量区,播种面积在不断缩小。的确,在遭受霜灾或旱灾的地区,例如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播种面积最近有缩小的现象……

喊声:并不是整个乌克兰。

施利希特尔:乌克兰的播种面积增加了2.7%。

斯大林:我指的是乌克兰的草原地带。但是在其他没有受到不良气候条件影响的地区,例如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和巴什基里亚,播种面积是不断增加的。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而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小呢?实际上,不能武断地说党的政策在乌克兰是一种,而在苏联的东部或中部是另一种。同志们,这是胡说八道。很明显,气候条件在这里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是的,富农缩小播种面积并不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这也许应当“归咎于”党的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的政策。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我们什么时候答应过实行一种能使农村所有的社会集团(包括富农在内)都满意的政策吗?而且一般说来,如果我们还想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那么难道我们能够实行一种既使剥削者满意,又使被剥削者满意的政策吗?如果由于我们实行了列宁的旨在限制和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富农开始部分地缩小他们的播种面积,这又有什么特别的呢?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也许这个政策不正确,——那么请直截了当地向我们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因为富农部分地缩小播种面积而惊惶起来,硬说这是整个播种面积的缩小,忘记了除富农以外还有贫农和中农,他们的播种面积正在扩大,忘记了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的播种面积正在加速增加,这不是很奇怪吗?

最后,在李可夫的发言中,关于播种面积问题还有一个不正确的地方。李可夫同志在这里抱怨说,在某些地方,即在集体农庄最发展的地方,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开始缩小了。这是事实。但这有什么不好呢?又怎么能不是这样呢?既然贫农和中农开始抛弃个人耕地而转上集体经济,那么集体农庄的扩大和增多就必然会引起贫农和中农个人耕地的缩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你们又想怎么办呢?现在集体农庄有两百多万公顷土地。五年以后,集体农庄将要有2500万公顷土地。集体农庄的耕地靠吸收谁的耕地来扩大呢?靠吸收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而你们,亲爱的同志们,想怎么办呢?用别的办法能够把贫农

和中农的个体经济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吗？在许多地区，集体农庄的耕地要靠吸收个人耕地增加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真奇怪，有人竟不愿意了解这些简单的道理。

### (十) 粮食收购问题

谈谈粮食收购问题。关于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困难，有人在这里说了一大堆荒唐话。但是我们在粮食方面发生暂时性困难的主要原因却被忽略了。他们首先忘记了今年我们收获的黑麦和小麦（我说的是总收获量）大约比去年少5亿至6亿普特。这能够不影响到我们的粮食收购吗？当然不能不影响到。也许这应当归咎于中央的政策吧？不，这同中央的政策毫不相干。这是由于乌克兰草原地带发生严重歉收（霜灾和旱灾）和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西北区发生部分歉收的缘故。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去年截至3月31日，我们在乌克兰收购了2亿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而今年只收购了2600万至2700万普特。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小麦和黑麦的收购量在中央黑土区几乎减少了八分之七，在北高加索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三。今年在东部某些地区，粮食收购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不能补足，当然也没有补足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带少购的数字。不应当忘记，在收成正常的情况下，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收购的粮食约为全苏联收购的全部粮食的一半，有时甚至达到三分之二。真奇怪，李可夫同志竟把这个情况忽略过去了。

最后，还有第二种情况也是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发生暂时性困难的主要因素。我指的是农村富农和富裕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反抗。李可夫同志回避了这个情况。

但是回避这个因素，就是回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手里有很多余粮并在粮食市场上起支配作用的农村富裕阶层，不想按照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价格自愿地把必要数量的粮食卖给我们。为了保证城市、工业区、红军和技术作物区的用粮，我们每年大约需要5亿普特粮食。用听任自流的方法，我们大约能收购3亿至3.5亿普特。其余的1.5亿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组织地对农村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取得。这就是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向我们说明的问题。最近两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听任自流的方法从前有成效，而现在已经不够了呢？发生的变化是：近几年来富农和富裕分子成长起来了，几年

的丰收对他们发生了作用,他们在经济上巩固了,积蓄了一些资本,因此,他们现在能够在市场上玩弄手腕,把余粮囤积起来等待高价,而依靠其他农产品来周转。决不能把粮食看做普通商品。粮食不是棉花,棉花是不能吃的,也不是任何人都买的。粮食和棉花不同,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它是人人都买,而且没有它就不能生存的一种商品。富农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并以此感染了一般的粮食持有者。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因此,我们从富农手里取得这些余粮,不仅有助于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而且能打破这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阶级的手段。

要取得这些余粮,必须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消除有害和危险的听任自流心理。必须组织粮食收购工作。必须发动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组织他们共同支持苏维埃政权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按照捐献原则实行的粮食收购方法,其意义就在于它能发动农村劳动阶层反对富农以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经验表明,这个方法能使我们获得良好的结果。经验表明,这些良好的结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取得了农村富裕阶层的余粮,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粮食供应;第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发动了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在政治上教育了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为我们在农村中的一支强大的千百万人的政治军队。有些同志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然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粮食收购方法的重要结果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结果。固然,这种方法有时候同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办法结合起来了,于是引起了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可笑的号叫。但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在某些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即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呢?为什么在城市里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机分子,把他们放逐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去,而对于那些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并盘剥贫农的富农,就不能用社会强制的方法,按照贫农和中农卖给我们收购机关粮食的价格去收购他们的余粮呢?这是从哪里得来的结论呢?难道我们党曾经表示过在原则上,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吗?看来,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主张在原则上反对对富农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要知道,亲爱的同志们,这是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你们不会不知道,列宁同志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甚至主张恢复贫农委员会政策——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那么对富农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同贫农委员会政策比较起来,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

**乌格拉诺夫:**这是在战争前夜。

**斯大林:**对,可是我现在并不打算建议采用贫农委员会政策呀。

**乌格拉诺夫:**这可是有点像。

**斯大林:**不对,乌格拉诺夫同志,这怎么说也不像贫农委员会政策。倒是你们的政策像自由派的政策——的确如此。他们,布哈林同志集团的拥护者,希望说服阶级敌人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余粮自愿卖给我们。他们希望那些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有可能依靠其他农产品来玩弄手腕而把余粮藏起来的富农,按照我们的收购价格自愿把自己的余粮卖给我们。他们不是疯了吗?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知道什么是阶级,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他们是不是知道在为加强粮食收购工作而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富农怎样嘲弄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政权呢?他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实,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鼓动员花了两个钟头劝说粮食持有者把粮食拿出来供应国家,可是富农嘴里含着烟斗走出来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

**喊声:**混蛋!

**斯大林:**乌格拉诺夫同志,你倒试试说服这样的人看。是的,同志们,阶级就是阶级。谁也逃不出这个真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方法的好处其实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发动贫农和中农阶层去反对富农,它能够帮助我们击破富农的反抗,强迫他们把余粮交给苏维埃政权机关。

**喊声:**对!

**斯大林:**目前在新反对派中,在布哈林同志集团中最时髦的字眼就是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个字眼在他们那里是最畅销的货物,因为它能够帮助他们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当他们想掩盖自己的路线时,他们通常总是说:我们当然不反对对富农施加压力,可是,我们反对在这方面所发生的触及中农的过火行为。接着他们就叙述这些过火行为的“可怕景象”,宣读“农民”的来信,宣读马尔科夫一类同志的张皇失措的信,然后就得出结论:必须取消对富农施加压力的政策。请看,因为在实行正确的政策中有过火行为,所以就必须取消这个正确的政策。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同时,布哈林同志集团的同志们处心积虑地保持缄默,绝口不提还存在着另一种过火行为,更危险和更有害的过火行为,即同富农结合,迁就农村富裕阶层,用右倾分子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党的革命政策。我们大家都反对这些过火行为。我们大家都反对对富农的打击触及中农。这是很明显的,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坚决反



对用布哈林同志集团热心使用的那套关于过火行为的废话来取消我们党的革命政策,不,同志们,你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请你们说一说,党的哪一项政治措施在实行中没有发生过某种过火行为。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斥责唯一正确的路线本身吗?就拿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这样的措施来说吧。毫无疑问,这个措施是我们党最近所实行的最革命的措施之一。谁不知道,我们实行这个实质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措施时常常发生许多过火行为,有时是最可恶的过火行为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取消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政策呢?新反对派的同志们是不是知道,他们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做王牌,是滚到什么样的泥坑里去了呢?

### (十一)外汇储备和粮食输入问题

最后,略微谈谈粮食输入和外汇储备问题。我已经说过,李可夫同志和他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屡次提出从国外输入粮食的问题。李可夫同志起初说必须输入8000万至1亿普特粮食。这大约需要2亿卢布的外汇。后来他提出输入5000万普特,即价值1亿卢布外汇的粮食的问题。我们否决了这种做法,认定对富农施加压力,取得他们握有的大批余粮,要比花费准备用来输入我国工业设备的外汇好些。现在李可夫同志改变了战线。现在他硬说资本家要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似乎不想接受。他说,从经过他的手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资本家愿意贷给我们粮食。同时他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或者由于任性,或者由于其他某种不可理解的原因而不愿意接受贷给我们的粮食。同志们,这都是胡说。如果以为西方的资本家突然怜悯起我们来,愿意几乎白白地或者长期地贷给我们几千万普特粮食,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是胡说。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各种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想摸我们的底,想试探我们的财政能力、我们的支付能力、我们的坚定性已经有半年了。他们找我国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阿根廷的商务代表,答应以三个月或最多六个月的最短期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他们要达到的与其说是想以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不如说是想探知我们的情况是否真的困难,我们的财政能力是否真的已经枯竭,我们的财政状况是否稳固,我们是否会上他们的钩。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对于我国的财政能力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说,我们已经破产,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即使不是几星期的事,也只是几个月的事了。另外一些人说,这不对,苏维埃政权很稳固,它有财政能力和足够的粮食。现在的任务在于我们要表

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和刚毅性,不要理睬关于贷给我们粮食的虚伪诺言,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不输入粮食也行。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这即使不是政治局全体委员,也是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决定拒绝南森关于以信贷方式向苏联输入粮食的建议。

**米高扬:**要用100万美元。

**斯大林:**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对巴黎、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关于贷给我们粮食的建议给了否定的回答。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决定在粮食消费方面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在粮食收购方面发挥最高度的组织性。我们这样做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输入粮食,保存外汇以输入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向我们的一切敌人表明,我们稳固地屹立着,我们不打算理睬小恩小惠的诺言。

这样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之所以正确,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在我国内部发现了取得粮食的新的可能性。它之所以正确,还因为我们既然避免了输入粮食,既然抛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我们就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并彻底粉碎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的胡说。

前几天,我们和德国资本家的代表们进行了几次初步谈判。他们答应给我们5亿贷款,并且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业得到苏联的订货,的确认为给我们这笔贷款是必要的。前几天,英国保守党代表团来到我国,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得到苏联的订货,也认为必须确认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并给我们提供贷款。我很清楚,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必要的坚定性,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新的可能性,就不能首先从德国人方面,随后又从一部分英国资本家方面得到贷款。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似乎因为任性而拒绝接受以想象中的长期信贷方式贷给我们的想象中的粮食。问题在于要识破他们的真正意图,并表现出为巩固我国国际地位所必需的刚毅性。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拒绝输入粮食的原因。

由此可见,粮食输入问题并不像李可夫同志在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粮食输入问题是我国的国际地位问题。

## 五、党的领导问题

这样,我们就分析了我们在理论方面以及我们党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对内

政策方面发生的意见分歧的一切主要问题。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李可夫同志说我们有一致的路线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实际上我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总路线,是我们党的革命的列宁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同志集团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布哈林同志集团中有想象不到的糊涂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第二条路线在党内的势力很小,于是总想用某种方法伪装起来。但是你们可以看出,这条路线还是存在着,而且是一条同党的路线不同的路线,是一条几乎在我们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基本上是右倾的路线。

现在来谈谈党的领导问题。

### (一)布哈林同志集团的派别活动问题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派,说布哈林同志集团不是反对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从全会的讨论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布哈林同志集团是新反对派。这个集团的反对派活动在于它企图修正党的路线,它企图修改党的路线,并准备条件使另一条路线即反对派的路线(它只能是右倾的路线)代替党的路线。

布哈林同志说他们三个人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同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中央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既然布哈林同志集团的派别活动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为什么还要隐瞒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就是为了在这里说出我们意见分歧的全部真相。真相就是布哈林同志集团是派别集团。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派别集团,我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最爱吹毛求疵的派别集团。这即使从他们现在企图利用阿扎尔暴动<sup>380</sup>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来达到他们的派别目的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所谓阿扎尔“暴动”同喀琅施塔得暴动<sup>381</sup>、四年前的格鲁吉亚暴动<sup>382</sup>或是两年前的雅库特暴动<sup>383</sup>那样的暴动比较起来算得了什么呢?我认为,和这些暴动比较起来,所谓阿扎尔“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是否有过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企图利用这类严重的暴动来反对中央,反对党的事情呢?同志们,应该承认,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相反地,在发生这种严重暴动的时期,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一些反对派集团都曾经帮助党来镇压暴动,不敢利用暴动来反对党。而现在布哈林同志集团是怎样做的呢?你们已

经有机会看到,他们企图最卑鄙、最无耻地利用这个极小的阿扎尔“暴动”来反对党。这不是极端严重的,由派别活动造成的头脑发昏和吹毛求疵,又是什么呢?

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和资本主义国家接壤的边疆地区不发生骚乱事件。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实行一种能使我们社会中的一切阶级,使富人和穷人,使工人和资本家都感到满意的政策。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我们这里没有不满分子。布哈林同志集团中的这些同志不是疯了吗?怎么能要求我们这些和国内外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做到在我国国内没有不满分子,在和敌视我们的国家接壤的某些边疆地区不会偶尔发生骚乱事件呢?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使国际资本能竭尽全力在我国边疆地区组织我国不满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举事,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头脑简单的自由派以外,还有谁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派别性的吹毛求疵有时能把人弄到自由派的盲目无知和目光短浅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二)反右倾斗争问题

布哈林同志说,被我们党的组织(用他的话说)“恶意攻击”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公民死刑”。他说,党在报刊和会议上批评三个政治局委员,即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错误,是使他们受到了“公民死刑”,而他们这三个政治局委员却“不得不”默不作声。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企图削弱党的反右倾斗争的一种自由主义化的共产党员的谎话。

在布哈林看来,如果他和他的朋友犯了右倾错误,那么党没有权利揭露这些错误,党应该停止反右倾的斗争,等待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自愿地放弃自己的错误。布哈林同志对我们的要求岂不是太多了吗?他是否以为党是为他而存在,不是他为党而存在呢?当全党都动员起来反对右倾并向困难进行坚决攻击的时候,谁强迫他默不作声,静坐不动呢?为什么他,布哈林同志,和他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不出来进行坚决斗争去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呢?如果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决定采取这个并不怎么困难的步骤,党是会欢迎他们的,这一点难道有谁会怀疑吗?他们究竟为什么不决定采取这个他们终究必须采取的步骤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摆在党和党的总路线的利益之上呢?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没有参加反右倾的斗争,这究竟应该怪谁呢?关于三名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那些话,是这三名政治

局委员想强迫党默不作声并停止反右倾斗争的一种掩饰得很拙劣的企图,这不是很明显吗?

反右倾绝不是我们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倾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领导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司令部里,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么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吗?布哈林同志集团是否懂得,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呢?布哈林同志集团是否懂得,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而不克服这些困难,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的成就呢?既然如此,那么所谓三名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可怜话还有什么价值呢?

不,同志们,你们用自由主义者的所谓“公民死刑”的废话是吓不倒党的。党要求你们和我们党的全体中央委员站在一个行列中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坚决的斗争。党要求你们这样做,是为了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击破阶级敌人的反抗并彻底克服我国建设事业的困难。或者你们执行党的这个要求,那么党就会欢迎你们;或者你们不这样做,那么你们就自己去埋怨自己吧。

### (三)关于集体领导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谈到了我们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要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要我们相信,政治局的多数委员没有履行集体领导的条件。当然,我们的全会对一切都能容忍。但是,要在这里谈集体领导,总得有点羞耻心吧。布哈林同志谈集体领导的时候,他连脸都不曾红一下。那么是谁破坏了集体领导呢?既然一部分政治局委员跑到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同他们建立联盟来反对中央,而另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却驾上大车,尽一切力量向前拉,——那么哪里还谈得上集体领导呢?亲爱的同志们,怎么回事呀: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同他商量反对中央——你们认为这就是集体领导吗?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怎么不知道害臊。乌加洛夫同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乌加洛夫:我,我。

伏罗希洛夫:问你的意见呢。

乌加洛夫:布哈林自己已经在这里说过了。

斯大林:难道这样做能加强集体领导吗?大家都知道加米涅夫《笔记》的事情。大家知道,由于这篇《笔记》以及和它有关的各种材料,我们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提出了党内状况的问题。所以说,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同原托洛茨基分子搞阴谋诡计反对中央的问题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布哈林同志集团的同志们应当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布哈林同志集团的所有同志或者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把它变成一个笑话。为什么要这样呢,凭什么要这样做呢?布哈林同志集团的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用这种目光短浅的花招想要骗谁呢?布哈林同志声称,它同加米涅夫集团只是做了最一般性的谈话。托姆斯基同志说,加米涅夫的《笔记》是一篇侦探小说。它就是想把一切都变成一个普通的笑话。这是工联主义政客的习惯伎俩!可是如果这只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或者是一篇侦探小说,那你们,布哈林同志集团的同志们,为什么要向党隐瞒呢,向党隐瞒《笔记》的内容,却绝不否认托洛茨基分子充分了解你们同加米涅夫集团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幕后谈判的事实呢?现在我们确切地知道,布哈林同志集团企图同加米涅夫集团结成反对中央的派别联盟,加米涅夫集团把这些企图系统地通知了托洛茨基分子,而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报刊的情报处的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再把你们的幕后活动告诉资本主义世界。结果就成了这样:以布哈林同志为首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同加米涅夫集团进行反对中央的幕后谈判,告诉它党内的种种事情;加米涅夫集团则向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通风报信,帮助它进行反对党的斗争;然后托洛茨基集团再告诉资产阶级,帮助它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政治局的另一部分委员,即它的大多数,却在同资本主义分子作殊死斗争,粉碎大师们的种种阴谋诡计。亲爱的同志们,就是这样的一幅情景。这就是布哈林同志所说的集体领导!

是的,同志们,有了这些事情之后,再在这里谈集体领导,而且含沙射影地攻击政治局的大多数,实在是不知羞耻。可是我们还有这样的人,他们称布哈林同志为领袖,而且是集体的领袖。这真是一个好领袖,没说的,一个被加米涅夫像孩子一样耍了的领袖。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加里宁同志有一个说法,有些人也许不喜欢,但是很中肯的说法,它把布哈林同加米涅夫描绘成狼和兔子。说是兔子去找狼,对它说:我很怜悯你,让我们结成同盟吧。狼却回答说:我把你吃了行不行。确实是这样,加米涅夫把布哈林“吃了”,像孩子似的捉弄了他。

布哈林同志糟糕就在于他不明白他是站在多高的地方。他不明白,政治局委员是站在到处都能够看得见的高处。正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政治局委员,

所以周围的人都把他们看成政治家,权衡他们的每一步、每一个小举动。这件事我对他讲过好几次。而他却理解为我们俩,我和布哈林,站在顶峰上,而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则一钱不值。既然是这样,那还能同他谈政治局的事吗?既然布哈林同志不明白,一个政治局委员同原托洛茨基分子谈到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注定要毁灭”的,因而必须结成反对中央的联盟,不明白一个政治局委员同原托洛茨基分子的这种谈话不是普通的谈话,而是一项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政策,是反对党及其中央的政策,那是谁的过错呢?既然布哈林同志连这种简单的、人人都懂的事情都弄不明白,那又能怪谁呢?可是加米涅夫明白。他明白,所以才把布哈林同志像一个孩子似的捉弄了一番。

不过,布哈林同志跑到外人那里去抱怨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布哈林同志就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同他们进行了反对我们党中央的幕后谈判。

乌加洛夫:这是托洛茨基分子说的。

斯大林:乌加洛夫同志,你错了,在托洛茨基分子之前,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说了,而且谴责了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行为。托洛茨基分子不过是重复了布尔什维克的话而已。事实终究是事实。在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布哈林同志由于不满意中央的政策,跑到我们党的敌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同他们秘密勾结反对党中央。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布哈林同志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同他们秘密勾结反对中央之后,也像现在这样,继续叫嚷要集体领导。多好的集体领导,对吗?

#### (四)关于忠诚

说说布哈林同志的忠诚。罗济特同志在这里说,布哈林同志是对党中央最“无可挑剔”和“忠诚”的党员之一。亲爱的同志们,我对此有些怀疑。罗济特同志口说无凭。我们要看事实。可是罗济特同志并没有事实。举例来说,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集团(它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举行幕后谈判,商量成立派别联盟,改变中央的政策,改变政治局的人员构成,利用粮食采购中的困难来反对中央。请问,这哪里有布哈林同志对中央的“忠诚”和“无可挑剔”?相反,这难道不是一个政治局委员违背了对自己的中央政治局、对自己的党中央的忠诚?如果这也叫做忠诚,那还有什么不忠诚可言?布哈林同志喜欢谈论忠诚,谈论正直,那他为什么不看看自己,不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最粗暴地违反了对中央忠

诚的起码要求,去同和托洛茨基集团有联系的原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反中央的幕后谈判?

不过,布哈林同志已经不是第一次违反对中央忠诚的起码要求了。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同志在我们党的莫斯科区域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并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支持时,竟号召自己的拥护者表示不信任党中央,拒绝服从党中央并提出我们党内的分裂问题。这是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中央已经通过必须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条件的决议以后的事。我们来看看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对此是怎样写的:

“我党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拒绝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并在该决议的‘说明’中声称,‘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免分裂’。

‘……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免分裂,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我们一如既往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sup>384</sup>

请看,这就是当时领导着“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布哈林同志的“忠诚”和“无可挑剔”的例证,他们那时公布了被称为党的莫斯科区域局决议的这篇胡言乱语。

当然,布哈林同志这段时间里学会了许多东西。可是既然在党内出现深刻危机的时期,在列宁领导着党的时期,他都敢迈出分裂党的步子,那又怎么能保证布哈林同志,比如说,在歇斯底里状态下不会再抛出这类把戏,尤其是现在,在列宁已经去世之后。这就是不能相信关于“忠诚”的口头声明的原因。

### (五)关于辞职、集体工作和严守机密

为了替辞职政策辩护,李可夫同志援引了列宁那次大家知道的事情。那是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列宁同志没有取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我认为,引用列宁的事情对李可夫同志不是有利,而是不利,是不利于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现在的辞职政策的。首先,当时是两条路线的问题:列宁主张和平的路线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和平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辞



职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李可夫同志声称我们是一条路线,而只有理解上的细微差别,而他却援引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事情,这合适吗?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是一条路线,那么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辞职就是错误的;要么我们不是一条路线,那么李可夫同志关于统一的总路线的声明就不符合实际。其次,不能把列宁同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等同起来。列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党、我国革命、我国无产阶级、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天才领袖。列宁当时用自己的行动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而现在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用自己的辞职在挽救谁呢?也许是在挽救党,挽救革命?提出这个问题是值得的,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把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行动同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当前的举动加以对比是多么不合适。显然,辞职政策现在谁也拯救不了,也于事无补,——它只能破坏我们党铁的纪律。请大家想一想列宁的话:

“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sup>385</sup>

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说必须实行集体工作。同时他们指出他们,就是布哈林同志和他最亲密的朋友,赞成集体工作,而影射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反对集体工作。让我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

第一个例子。这里已经讲到在中央七月全会之前布哈林同志曾经提出过一份关于党的经济政策提纲的手稿,这份手稿遭到政治局多数委员的严厉批评。它之所以受批评是因为它含有右倾的主要萌芽。当时我们政治局委员请布哈林同志把这份提纲给我们看看。布哈林同志坚决拒绝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请求,说是由他来读这份手稿,让其他人听一听。我们反对说,布哈林同志的拒绝破坏了集体工作的起码条件,而布哈林同志又一次拒绝了大家的要求。从那以后,中央委员们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曾经多次要求把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交给中央委员会审查。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又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布哈林同志却认为可以一再拒绝。这算什么呢?这是集体工作吗?那样的话,还谈得上什么破坏集体工作的起码条件吗?

第二个例子。你们都知道向美国输出黄金的事情<sup>386</sup>。也许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黄金是根据中央的决定,或者是得到中央的同意,或者是通知中央之后向美国输出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同这件事毫无关系。我们有一个非经政治局批准不得输出黄金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被违反了。你们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这些黄金重新运回苏联。究竟是谁批准输出黄金的

呢？原来是李可夫同志的一个副手批准的。李可夫同志是否知道这件事呢？应该认为他是知道的。否则他算什么人民委员会主席呢？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呢？这算什么，集体工作吗？

第三个例子。这是关于同美国一家私营大银行谈判的问题。这家银行的财产在十月革命后被收归国有，现在它要求赔偿损失。中央得知时，我们国家银行的代表正在和这家银行谈判赔偿它损失的条件。你们知道，赔偿私人损失问题是同我国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人以为这个谈判是得到中央批准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同这件事毫无关系。后来中央得悉这个谈判之后，决定停止谈判<sup>387</sup>。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谁批准这个谈判的呢？原来是李可夫同志的一个副手批准的。李可夫同志是否知道这件事呢？应当认为他是知道的，因为他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要为自己副手的工作负责。为什么他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呢？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四个例子。是关于向富农和中农供应农业机械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sup>388</sup>（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李可夫同志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副主席）决定减少对中农的农业机器供应，增加对农村上层阶层即富农的机器供应。请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的这个奇怪决议的原文：

“在哈萨克和巴什基里亚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西伯利亚边疆区和下伏尔加边疆区、伏尔加中游区和乌拉尔区，本条指出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销售百分数，对农村上层阶层提高到20%，对中农阶层降低到30%。”

请看：在党加紧向富农进攻并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阶级的时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却通过了关于降低对中农的机器供应额和提高对农村上层阶层的供应额的决议，——而且把它叫做共产主义政策！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同志知道这个决议吗？应当认为他是知道的。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呢？后来中央知道了这件怪事之后，撤销了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可是为什么不及时向中央报告这项“改革”，却在中央不知情，而且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把这项决议发到了相关地区去呢？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看来，这些例子足够说明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了。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严守机密，关于保守中央和政治局决议的机密问题。你们知道，我们多么需要对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一些决议保守机密。你们知道，对

这些决议保守机密有时候可以决定我们党的成败。你们知道,直到最近保密的这些条件在党内执行得还是不错的。可是现在呢?能不能说,现在这些条件至少在最低限度内还在执行着。很遗憾,同志们,不能这么说。应该承认,政治局和中央已经变成了穿堂大院。简直就是穿堂大院。你今天说一句话,明天我们党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就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一部分政治局委员满不在乎地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眉来眼去,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又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勾搭搭,后者又向资本主义报刊通风报信。不久以前我们讨论过把托洛茨基分子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几名政治局委员提出来的。驱逐的动机大家都知道。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反对驱逐。结果怎么样呢?第二天托洛茨基分子就知道了政治局讨论和投票的种种细节。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把政治局变成穿堂院了吗?再看一个例子。不久前抓住了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在他那里不仅找到了十一月全会的,而且有这次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讨论和表决的某些细节的记录。这是什么,难道不是道德堕落和违反我们中央内部的保密规定吗?必须制定一些严格的条款来保证我们决议的机密性,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臧声:正确!

斯大林:该订出一种制度来保证不把我们的政治局和中央变成穿堂大院,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臧声:对!

## 六、结 论

我来做结论。你们会问,出路何在?安德烈耶夫同志提了一条出路。他建议要求布哈林同志集团放弃自己的错误。我想,这条出路是不恰当的。

臧声:说得对!

斯大林: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言时,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观点没有错。当然,这样说并不能为他们争光。可是这个声明总须要认真对待。如果这几个同志不顾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放弃错误的要求,依然认为不能满足联席全会的这个要求,那会怎么样呢?那时该怎么办呢?我担心,到那时只好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该不该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呢?我想,不应该,因为他们当着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脸保证绝对服从

中央的决议。所以我觉得安德烈耶夫同志建议的出路不是个办法。

我想,办法是这样的:

一)首先应当斥责布哈林同志集团的观点。

喊声:对!

斯大林:应该斥责这个集团在它的宣言和它的代表的发言中所陈述的观点,认定这些观点是和党的路线不相容而和右倾的立场完全相符合的。

二)应该斥责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集团的幕后谈判,认定这是布哈林同志集团不忠诚和进行派别活动的最明显的表现。

三)应该斥责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实行的辞职政策,认定这是粗暴地违反了党纪的起码要求的。我们不能够这样:仿佛对领袖执行一种纪律,对党员群众执行另一种纪律。同志们,这是不行的。党的法律对所有党员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

四)同志们,我还想,说真心话,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托姆斯基同志现在都不能胜任他们迄今为止所担任的职务。我指的是《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应该撤销这些同志的现任职务,并警告他们,如有不服从中央决议的丝毫企图,中央将不得不取消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我知道,党内许多同志对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行为感到气愤。我知道,这些同志要求立即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同志们,我反对这种要求。我想,在政治上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气愤行事。我想,这些同志应该留在政治局内,以便给他们一个机会在政治局内的实际工作中醒悟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和中央的大多数站在一起。至少我们应当试一试。我不怀疑,党能理解我们并重视我们维护党的统一和党内和平的愿望。

五)应该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发言时不说出任何离开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话。

喊声:对!

斯大林:六)应该采取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

七)应该规定特别办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漏党、党中央、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

喊声:对!

斯大林:八)应该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党内问题的决议分发给各级地方党组织和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但是暂时不在报刊

上公布这个决议。

喊声：对！

斯大林：我想，这最后一项措施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帮助布哈林同志及其同伙回到党的路线上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出路。

有人会说，这条出路有一点缓和的味道。那就让人们说去吧。党应该知道，我们拥护党内和平和统一。

乌格拉诺夫：“自由派的措施”。

斯大林：乌格拉诺夫同志，我们有时候是会向中间派做一些让步的。  
(笑声)

乌格拉诺夫：我就是中间派。

斯大林：对于像乌格拉诺夫同志这样的中间派，为什么不做出一些让步呢？当然，这不是经常让步的理论(笑声)，但这终究是让步，是最后的让步，试一试的让步。有效——那很好，要是无效——那对你们，布哈林同志集团的同志们，只能更糟。(长时间的鼓掌)

主席：在休会之前，我就下一步的工作提几个问题。

一部分中央委员对全会下一步工作和代表会议提出以下建议：全会在星期二，就是明天，下午3点闭幕。取消日程上关于乌克兰农业情况的报告，推迟到下次全会。代表会议23日，也就是明天，下午6点开幕。给代表会议的所有问题都规定严格的议事规程：报告2小时，发言15—20分钟。25日晚上结束五年计划问题。26日上午是加里宁的报告。27日晚上是雅科夫列夫的报告。28日晚上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29日晚上代表会议闭幕。代表会议的开幕式由加里宁同志主持。对这个建议……

喊声：赞成！

主席：李可夫同志对这些问题都同意，不过建议代表会议的开幕时间不是明天晚上，而是后天。

洛米纳泽：我有个建议。我建议把清党问题移到代表会议上去。

主席：对这个日程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主席：现在投票。谁赞成？谁反对？通过。

现在有些同志建议结束今天第一项议程的讨论。李可夫同志有一个声明，他请求一定再给他一次发言的机会。

档案文件

喊声：给他！

伏罗希洛夫：这是从头来过。

主席：索尔茨同志也要求发言。

索尔茨：我只要15分钟，多了我也用不着。

主席：谁赞成结束今天第一项议程的讨论？谁反对？通过结束讨论。现在谁赞成作为例外让李可夫同志发言？现在表决。谁赞成？谁反对？多数。否决了。谁赞成让索尔茨同志发言？谁赞成？谁反对？多数。否决了。

为了明天3点结束会议，请全会的全体参加者明天不要迟到，11点准时开会。现在休会。

## 第十三次会议

4月23日上午

主席(鲁祖塔克):同志们,全会现在开会了。由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做总结发言。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们,我的报告在这里受到那些不赞同党的路线的同志的全面批评。批评主要是说我似乎没有把事情准确地讲清楚;此外还指责我的报告表明,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赋予它的任务是不称职的(像某些同志说的那样)。另一些同志指责我,认为报告太软弱了,带有教海的性质。我不反对说这个报告在可能采取的组织措施方面是软弱的。我想,我的责任是给我们在这里讨论他们行为的那些同志一个选择行为路线的机会,使我们有可能采取不同于我们不得不采取的组织措施的办法。

至于原则路线,我当然不曾想到,这次全会上这些同志在背离党的路线方面走得这样远,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同党的路线对立起来,企图破坏党的声誉,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加深了他们和党的路线的分歧。

我的报告的任务是什么呢?客观地、平心静气地、不添枝加叶地叙述发生的事情。这是局面的严重性和我们将要做出的决定的重大责任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我们党内的作用也是这样要求的。可是假如在涉及捍卫原则路线的地方,我抹煞了问题的尖锐性,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托姆斯基同志指责我,说是我把冲突的产生描绘成仿佛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大致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仔细听了雅罗斯拉夫斯基讲的经过,那从他的叙述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他的讲述给人的总印象是这样的: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人们日子过得很好,谁也没有惹他们,谁也没有攻击过他们,谁也没有骚扰过他们。他们因为克里姆林宫的日子过得太顺心了,吃饱了饭,就开始发疯了,生气了。”我没有这样说。我说的是使我们党内其他反对派产生动摇和摇摆的那些原因,主要是改造时期的困难,使一些同志惊慌失措了,迫使他们

去寻找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从而在寻找中把他们抛到了右倾一边。这是我们在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中说的。决议里说: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困难,尤其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必然在居民的小资产阶级中引起动摇,这反映到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中,甚至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影响的这种动摇表现为在主要问题,首先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问题、向富农以及一般资本主义分子展开社会主义进攻问题、在农村大力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问题上脱离党的总路线。”

这就是布哈林同志、乌格拉诺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等人产生动摇的原因。我现在就是这样认为的。在这里展开的辩论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下面我谈谈对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发挥作用,没有履行职责的指责。科托夫同志说,中央监察委员会不胜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它规定的作用,就是箍圈的作用。可是这个箍圈应当把什么东西聚在一起呢?为了使它能够发挥作用,它本身又应当是怎样的呢?不言而喻,如果谈的是党的领导机构——政治局,那我们首先应当关心使它是同质的,这倒不是说所有的同志都应当是同一种性格,比如说,大家都很温柔,这里有人对斯大林同志提出指责,说他“粗暴”等等。我们不持这种观点。在对待党的问题上,斯大林同志从来不是粗暴的。我们说的同质,首先就指的是路线一致,而不是性格一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责就是认真监督我们的领导层中不要有不同的路线,使我们不致成为党内分化的帮凶,不至于支持那些反对党的路线的同志。这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作用。我们懂得,我们必须关注一致,可是是在党的同一条原则路线基础上的一致。

是的,我们有责任监督党内不要出现违犯党纪的事件。可是我们的纪律却遭到三名政治局委员最粗暴的违犯。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说: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是在向中央委员会申诉呀。当然,你们是在向中央委员会申诉;可是政治局为你们两次做出了决议,而你们几个月里都不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尽管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党团对你们说,服从吧,尽管几百个党组织对你们说,服从吧。而你们却说:不,我不服从,我要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当然,你们有权申诉,可是你们却不考虑你对党造成的危害。所以中央监察委员会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你们一边。

是的,我们有责任监督实行集体领导。我要就这个问题谈得详细一点。不过我要说,(而且在这里也得到了证实,)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首先就是那些在和加米涅夫同志的会谈中寻找集体领导的人,那些认为集体领导的基础就是不



信任政治局其他委员,以致连自己的书面建议都害怕给他们看一看的人。我们不能鼓励这样做。

是的,我们有责任监督不要出现派别活动的苗头。可是我们看到,正是这些同志表现出派别的征兆。我们有责任指出这一点。

那中央监察委员会错在哪里呢?在于我们没有采取更断然、更坚决的措施来反对莫斯科组织中出现的宗派活动的萌芽,在于我们为了保持党内和平,为了保全一些同志,我们党非常珍贵的一些同志,而采取了稍稍加以掩盖、抹煞的态度。是的,这也许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错误所在。

现在领导层的同质性问题怎么样了呢?这就是我们应当起箍圈作用等等问题。如果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有一条一致的路线,那么保持这种作用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如果三名有威望的政治局委员把自己的路线同全党对立起来,如果他们把党的路线说成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路线等等,那就困难了,非常困难了。迄今为止,我们有一定权利说,我们之间没有政治分歧。可是我们现在还有权这样说吗?当然没有。所以我们应当看到,向全会提出的、完全正确的决议也包含着许多困难,因为留在政治局内的几名同志如果不放弃他们的特殊路线,就不可能像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特殊路线时那样和谐一致地工作。

中央监察委员会曾经努力使问题不至于尖锐化。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这里向大家讲述了他怎样使几名同志默认了他撕毁他们的辞职书。也许,他做错了?也许当时就应当把这份声明提交给党来处理,把这个问题向党提出来?可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会使问题尖锐化。大家可以看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次事件中是以避免尖锐化为目的\*的。

关于违犯党纪问题。在这里有人,特别是李可夫同志,对我们大致是这样说的,“我们需要纪律是为了执行党的决议”。说得对。纪律当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可是你们搞的辞职,而且是一再辞职,拒绝服从政治局的决议,拒绝履行给你们的委托,难道这有助于执行党的决议吗?相反,这在那些认为自己不必事事服从的阶层中助长了摆脱党的纪律,自行其是,不按党的意图行事的愿望。托姆斯基同志问道:“布哈林同志有过不履行给他的委托的事吗?没有过,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要说,有过这样的委托,而他并没有履行。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快要到了,布哈林同志任责任编辑的《真理报》编辑部请他就共产国际成立十周年为《真理报》写一篇指导性的社

\* 原文如此。——编者注

论,布哈林同志拒绝了;他也拒绝为《共产国际》杂志写一篇文章。应当怎样理解这种拒绝呢?在我看来,他不应当拒绝。正是这条道路,拒绝履行党的委托的道路,今天一次,明天又一次,终于导致了彻底的脱离,确实导致了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今天的完全消沉。难道布哈林同志和其他人的确情有可原,特别是托姆斯基同志,他对我们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再说一遍,是我在党内生活的25年中第一次违犯党的纪律。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有24—25年党龄的他和布哈林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他这样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能够听之任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是,托姆斯基同志,即使有25年党龄,像这样违犯党纪也是一次都不行的。谁也不能违犯党纪而不受处分。

就托姆斯基同志的整个发言看,我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发言中对他的评价,认为它是无原则的、回避了对原则问题做出回答。可是我不同意斯大林同志说托姆斯基同志成了无原则的、典型的……

喊声:工联主义者。

雅罗斯拉夫斯基:工联主义政客作风的代表人物。我不同意这样的评价,虽然在托姆斯基同志的行为中有一些工联主义的成分。(笑声)是的,他对党的态度中有一些工联主义的因素。我责备他在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党内尖锐地提出了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的时候,他认为不能向工会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你说:‘托姆斯基在报告和讲话里都没有谈阶级斗争,没有谈必须同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同右倾作斗争。’我认为右倾问题是党内问题。目前还是这样的问题。这不是工会运动的问题,不是须要交给非党群众讨论的问题。”但是,托姆斯基同志,应当发动整个工人阶级起来同右倾危险作斗争。应当发动整个工人阶级起来同富农作斗争,同工人阶级中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要发动整个工人阶级。譬如加里宁到波多利斯基的工厂去讲话。有许多同农村有紧密联系的工人简直就是代表富农在讲话,他们更多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在农村的很有实力的经济。可是糟糕的不是有一些工人讲了这样的话,糟糕的是党员没有给他们真正的反击,更何况并没有发动非党工人群众起来同右倾危险作斗争。他们没有给富农的应声虫以应有的回击。这种事情很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能够把党同工人阶级分开,把他们对立起来呢?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能把工人阶级同党对立起来。这一点我们大家和托姆斯基同志一样,都是从列宁,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可是现在却有时把它忘记了。这是危险的

事情,这就是把工会同党对立起来的一小步,是非常危险的一小步。

托姆斯基同志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他们实际上并不反对党的路线。那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在党内造反,他们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托尔斯泰主义者”。事情稍有不同。比如说,《共青真理报》事件。托姆斯基同志说是共青团员们对作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托姆斯基同志吹毛求疵。很可惜,科萨列夫同志或是共青团的其他人没能在这里发言,面对极其错误的攻击保护共青团。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欺侮共青团组织,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机关报《劳动报》把共青团看成小孩子,欺侮了它。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谈到《共青真理报》进行的那次任性的争论。可是如果《共青真理报》今天写一篇《反对事务主义》,明天《劳动报》就以一篇《反对共青团的贪欲》作为回答。轻骑兵极尽讥讽嘲弄之能事。《劳动报》把《共青真理报》几乎看成了敌对组织而加以攻击。事情发展到中央不得不干预的地步。当托姆斯基同志把事情说成是他遭到攻击,而他默不作声时,令人不禁想起一句俗语:“得了便宜卖乖。”当然,他自己没有在《劳动报》上写过文章,是其他人写的——金丁等人简直就是欺侮共青团。中央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中央在7月11日就青年人的保留工位问题进行的这场争论决定:“建议《劳动报》和《共青真理报》立即停止关于保留工位的争论”<sup>389</sup>。停止这场争论是因为争论的调子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可是错的不仅仅是《共青真理报》。至少这不是导致托姆斯基同志提出辞职的原因。这里有人引证了事实。托姆斯基同志还在工会代表大会之前,在11月就提出了辞职。在代表大会之前。至于在工会代表大会之后托姆斯基同志提出辞职,那就不能用他现在企图说明的那样来解释。李可夫同志说:“有些人被撤职只不过因为他们赞同托姆斯基同志的意见。”不对,撤职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赞同意见。托姆斯基同志现在问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要求过人们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投票,而不是投另一种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人们仅仅因为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投了票,按照党章规定的权利投了票就被撤销了职务。”

唉,托姆斯基同志,只有把党的历史忘记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列宁格勒人出席党的十四大时,投票反对党的路线,他们立即就被撤了职。你到了列宁格勒,支持了这样做。你是同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加里宁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一起去的,而且帮助撤了他们的职;——你做得很好,可是按照党章他们有权投票,他们并没有违反党章,是按党章规定投的票。而你现在却问道:

什么时候,在哪里有过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投票就被撤职的事情?如果他们投票反对中央和政治局执行的路线,就可以撤他们的职。也许不应当撤乌加洛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职——这是另一回事。可是不能那样天真,不能装得那样天真地问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情?”

我应当对乌加洛夫同志做出回答。他在这里对我和施基里亚托夫同志在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党团会议上的行为描述得完全不对。他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施基里亚托夫同志威胁工会代表们说:你们是在投票反对中央,别投票反对中央,因为你们要为此向省委承担责任。事情不是这样的。当乌加洛夫同志、科罗斯帖廖夫同志,还有其他人走上讲台时,他们之中有人说:“同志们,如果我们把卡冈诺维奇同志选上了等等,全国人民会怎样说呢。”请大家想一想,把党中央的一名书记选进了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在回答这种挑拨性的错误言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现在这样做,那你们回到地方上去之后,各个省委对你们怎么说呢?他这样说完全有根据。

乌加洛夫同志说,雅罗斯拉夫斯基拿突厥斯坦来恐吓人,他说,我简直惊呆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居然拿突厥斯坦来恐吓人。不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没有拿突厥斯坦来恐吓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到突厥斯坦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他讲到伊里奇还在世的时候,托姆斯基因为一件小得多的过失(虽然托姆斯基认为正确的是他,而不是列宁)就去了突厥斯坦。我不希望托姆斯基同志去突厥斯坦,所以我认为必须现在就挽救托姆斯基同志,不使他处于这种境地:我想,如果工会代表大会党团以多数票告诉托姆斯基同志:托姆斯基同志,你必须服从,——他就会服从的,他自己就引用过党章要求服从的条文;可是他没有服从,这不能怨我。至少我不曾恐吓过任何人。

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指出,实际上很容易达成协议,他说,我们提出16点最低要求。昨天奥尔忠尼启则向大家宣读了这16点要求。从维护党内民主的角度看,这些要求怎么样呢?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些要求,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就会因此而声誉扫地。那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呢?某某人该撤职,某某人该受到警告,哪些人该被驱散。这就是党内民主吗?直到某某人因为对布哈林同志的一篇文章不够尊重而受到警告,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因为对索尔茨同志不够尊重而受到警告。这和党内民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这只能使提出这些要求的同志丢脸。

嘿,假如确实不曾有过这些特殊的要求,也不曾有过分歧,那你们现在又何必搬出这一大堆东西来呢?我粗略地算了算他们搬出来的玩意儿:党在滑向托

洛茨基主义；政治局的多数在谋求同托洛茨基分子结盟；政治局在履行托洛茨基分子的订货——迫害布哈林等人；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党用非常措施或者非常措施制度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党内没有民主；没有一个省委书记是选举产生的等等；党在培植官僚主义，而不是同它作斗争；党在共产国际内执行单纯的切除和分裂的政策，在瓦解共产国际；只字不提集聚力量；党在共产国际各支部内机械地推行俄国人的工作方法；党在被引导到死亡和垮台；斯大林不执行十五大的决议，不公布遗嘱等等，等等。

我要问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以及他们的“政治友人”，支持这种种指责对他们有利吗？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在这次全会上更加强调自己对党的这些指责，这些错误的、荒唐的、完全是诽谤的指责，而不是认识这些指责的错误，放弃这些指责。

乌格拉诺夫同志企图在这里起一个特殊的作用。请看，他是一个先知，他什么都预见到了，他早就看出来：不仅是困难，还有真正的出路，一切都没有超出他的预见。他在这里的整个发言被正确地评价为自吹自擂，是错误的发言——“我，就是我，什么都预见到了，我最懂得政治；他把莫斯科组织的功绩归在自己名下：是我实现了电气化，是我在那里，是我如何如何。”那科托夫同志呢？还有其他同志呢，他们好像也是做了工作的嘛，何必到处都是乌格拉诺夫的“我”、“我”呢？而且他的记忆力特别好，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神童”。哎，乌格拉诺夫同志，你何必要这样，这不能给一个无产者增加光彩。你本来应当就你，还有莫斯科组织的其他同志确实有过的动摇和摇摆做出回答。我们最初是怎样对待这种动摇和摇摆的呢？很软弱，简直就是软弱。我要宣读斯大林同志一份不长的文件，当时斯大林同志试图不让存在严重分歧的传闻扩散开去。有一名谢尔普霍夫的女工、共青团员、候补党员施韦德同志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乌格拉诺夫同志因为谢尔普霍夫县委的总结报告和县委书记改选来到县里。乌格拉诺夫同志在县委的秘密扩大全会（不是谈县委的问题）上讲了话，而且在全县（党内的和非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做了国际和党内形势报告。

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讲话令我吃惊的是他的观点和党采取的方针，特别是和您（关于四月全会的总结和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阐述的观点显然不同。

而乌格拉诺夫同志是以党的名义讲话的！

下面是我认为乌格拉诺夫同志提错了的问题：

1) 在分析粮食采购危机时，乌格拉诺夫同志甚至不曾提到富农，不讲危机

的阶级根源,而在四月全会的决议里虽然问题提得不像您在报告中提的那样尖锐,却明确地讲到“经济形势同它的社会—经济表现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说,危机的原因仅仅在于计划统计,仿佛在于基本建设跑得太快了,不过这在下面再谈。

2)粮食采购运动急剧地把我们同农民的关系搞紧张了。并没有补充指出运动的任何社会—阶级后果。

3)幻想家们认为,党的十五大以后应当抓住富农的衣领,把他扔出去。实际上同富农的斗争应当归结为保护雇农的劳动,执行苏维埃法律等等。我们对个人积累的态度没有发生丝毫变化等。乌格拉诺夫同志问道,富农比城市资本家差在哪里呢,我们不是还容许,而且利用城市资本家吗。

4)可是即便在城市里,我们对私人资本的挤压也太厉害了。我们因此而蒙受很大损失。

5)对待集体化要格外小心。党的十五大承认,大规模集体化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按乌格拉诺夫的说法却不是这样。

6)党提出了“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预见到了困难和暂时的停顿。

乌格拉诺夫同志说,我们在反对派的压力下,采取了过高的发展速度。现在只好坚决修改这条路线。几乎一字不差的原话是:“缓缓地、慢慢地前进,不要跳跃,也不要间歇”。

还有一个问题让我困惑:乌格拉诺夫同志说,我们不得不提高谷物的价格。就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决定吗?

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原则性。难道是乌格拉诺夫同志打算就此展开一场争论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要从有非党人士广泛参加的会议开始呢?

同志们请看,从事后发生的情况来看,难道我们从这封信里听不出一个特殊纲领的成分吗?这个纲领正是弗鲁姆金那封信的逐字逐句的重复。

**乌格拉诺夫:**这是一个旧式中学的女学生写的。你们就不能劳神去县党委问一问,党组织对我的报告怎么看。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的,我知道你后来委托调查机关去调查、了解施韦德同志是什么人,以便对她采取作为党内民主的某些措施。斯大林同志是怎样回答这封信的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说:

“我收到了你关于乌格拉诺夫同志讲话的信。我想,我们在这里出现了一

点误会。我对乌格拉诺夫同志非常了解,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同中央没有任何分歧。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讲话里对经济政策的个别问题可能措辞不够严谨,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事。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乌格拉诺夫同志同中央有分歧,认为他想展开一场辩论等等,就是小题大做了。至于粮价,我们确实在考虑在七月底提高价格,以便把各种作物的价格‘拉平’,加强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也许乌格拉诺夫同志把这个问题说得早了一点。不过这算不上什么大事情。”

同志们,请问这像不像斯大林在攻击乌格拉诺夫同志呢?像不像斯大林在迫害乌格拉诺夫或是在党内给他制造恶劣环境呢?这更像是我们在掩盖乌格拉诺夫同志的错误,帮助他改正错误,用另一种办法处理这种局面。

而乌格拉诺夫同志不仅在谢尔普霍夫这样讲了,他在鲍曼区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讲的也大致相同。齐夫里诺维奇同志可以证实这一点,还有速记记录,其中几乎完全重复了这些方针。他在那里讲话时也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据他说是为了在向中央提出这些问题之前,先取得群众的支持。他在那里声称,从1922年开始仅仅由于我们在计划经济方面的重大错误,资本主义分子就破坏了我们粮食、皮革等等的供应。问题全在于糟糕的计划,而根本不在于阶级斗争,——这难道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吗?其次,乌格拉诺夫同志断言,今天的富农已经不再是革命前的富农了;那时他拥有1万—2万—3万普特粮食,而今天区区富农(笑声)却仅仅拥有3000—4000—5000普特粮食。后来我们在西伯利亚的报纸上看到:“富农希望能够自由购买大中型农业机械。西伯利亚边疆区鲁布佐夫州有一个姓杰普洛夫的富农,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肯出售15000普特余粮,他回答说:“给我拖拉机,我就出售余粮。”

这就是区区富农,他有15000普特余粮,就要求:把你们为集体农庄准备的拖拉机给我,那我才把余粮给你们。这就是富农!乌格拉诺夫同志,难道这不是缩小了富农的危险性,抹煞了这种富农的危险性吗?

最后我再举两三个例子来结束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民主主义问题。乌格拉诺夫同志说,施韦德同志是一个中学生;可是她现在不是学生,而是一名女工了。也许她曾经是一个中学生,可是那种中学消失已经有12年了,也就是说,她12年前是中学生,而现在是工人,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去抠她12年前是中学生的事情吗?她是候补党员、几年前就是共青团员了。她提出的问题原则上是正确的,——这和旧式中学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在九月全会上阿尔费罗夫同志发言,维护党的路线,反对乌格拉诺夫同志。这就足够让莫斯科省常委会决定撤销阿尔费罗夫同志的职务,而乌格拉诺夫同志也找不到其他托词,只能说他是“一

个托洛茨基分子阿尔费罗夫”等等。既然批评了乌格拉诺夫同志,那就立刻给戴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还有波兹尼亚科夫同志,他好像是在鲍曼区里取代了齐夫里诺维奇同志。他刚刚采取了正确路线,乌格拉诺夫同志就立即招呼他说:“小心点,你是一个新人,一两下就可以把你清除了。”这一切都叫做党内民主!

我想,现在不应当像托姆斯基同志那样提出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乌格拉诺夫的过失是在什么时候,在通过这个决议之前还是在它以后?按你的说法,主要的事情是乌格拉诺夫对中央进行了很令人怀疑的攻击。如果这发生在通过决议之前,那么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对情况了解不多,或者完全不了解情况,所以他们才通过了这个决议。当中央声称驳斥莫斯科省委把自己的路线同中央的路线对立起来的种种说法时,我却断言,我们是为了党内和平,为了不和一些同志搞僵关系,为了保留他们继续工作,才采取了使同志们的一些原则错误缓和下来,使他们有可能在内部好歹消除自己的动摇和摇摆。

布哈林同志说,他这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做最后一次发言。我想,他没有权利这样说,因为如果党把他留在政治局内,给他下命令,那他就有责任作为政治局委员去做报告,作为政治局委员来捍卫党的路线。我很希望他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这里多讲几次话,不过不是像他在这次全会上讲的那样的话。以前布哈林同志的讲话尽管有个别错误,可是往往能出色地捍卫党的路线。可是这次的讲话却让我们感到,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没有了,剩下的是繁琐哲学,最标准的繁琐哲学。布哈林同志不曾想到,党在不断成长,在思考,在学习,党不会满足于他摆出教授的架势,同一个政治局委员算账,又同另一个政治局委员算账:他觉得,只要他一出手,就能把他们像小鸡一样拧死。可是这全是文字游戏。他觉得他拧掉了他们的脑袋,而实际上他只是搅动了空气,玩弄了字眼,而且毫无内容,正如安德烈耶夫、卡冈诺维奇等同志,特别是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指出的那样。

布哈林同志早就开始谈论灭亡和灾难了。既然如此,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去找加米涅夫,寻求出路。难道加米涅夫能够挽救局势吗?

他是怎样解释政治局的形势的呢?他说,我们在这里简直就是在“政治死刑的鼓点声中”工作;对于我们是形成了“猛烈射击的局面”;“最近的几个月内我们一方表现了最大的克制”。我是按自己的笔记引用的。

在经历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之后,我不知道是否还须要证明,他们不曾表现过丝毫克制,没有出现过“猛烈射击”,相反,出现了用完全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



的方法来射击中央的企图。有人试图在这里说明,攻击来自各个方面——给《真理报》任命了“政治委员”等等,——同志们也许并不知道,克鲁敏和萨韦利耶夫是应布哈林同志的请求才被任命去《真理报》编辑部的。

喊声:这不可能!

雅罗斯拉夫斯基:克鲁敏同志离开了《经济生活》。布哈林同志在有克鲁敏同志出席的第一次编辑部会议上说:“你知道吗,是我使你被任命到这儿来的。”可是以后他却说“政治委员”。这纯粹是假话。

甚至在局面变得很严重之后,在我们得知这些会谈、这些谈话之后,我本人还给布哈林同志写过一封信。我认为必须在这里宣读一下这封信,因为我觉得现在这封信不再是私人信件了。我认为我作为一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应当写这封信,应当干预这件事,虽然我没有告诉其他同志,也没有征得他们同意。我给他写信是在1月31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之后的第二天:

“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给你写这封信没有经过任何人批准。我感到很痛心,因为没能阻止你犯错误,而且是事后很难改正的错误。可是我仍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再做一次尝试。你极大地损害了你自己在我们党和共产国际舆论中的声望。可以也应当纠正这种损害。问题不在于你本人。你给你自己造成的损害是对党和共产国际的损害。可是我担心你会过分看重个人的因素。这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是最危险的事情。假如不过分看重个人的因素,找到出路就会容易一些。我相信,只要你出现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出现你的文章,你积极参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被你称为对你的“攻击”的那些事,也就是关于你有一条特殊路线的议论就会终止(当然不是立即,也不是完全终止)。你能够,也应当这样做。你应当克制,而且和所有惹你“生气”的人和好。因为没有人会认真地相信,你可以提供或者保证充分的党内民主(大家必然会记得你要求撤科斯特罗夫的职,处分希塔罗夫,因为他们对你的文章提了一些意见等等),正如没有人会认真地相信你能保证得到更多的粮食一样。大家必然会记得其他的反对派和宗派集团也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你何苦要走过这些‘阶段’呢?不,用不着。这样的类比是危险的,但也是必然的,如果你不急转弯,而且刹车的话。我同几乎所有被你怀疑为‘攻击’你的人谈过。大家都十分愿意帮助你,还有托姆斯基消除这一切,支持你们,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

我请你,亲爱的尼·伊·,不要毁掉我们大家都十分珍惜的东西,立即勇敢地、积极地着手《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工作。

此外,我请你给我们《真理报》编辑部的同事具体地写一写,你看到我们的工作中有哪些缺点和错误,哪些事情我们应当做另一种分析,应当怎样分析。请你写出你认为必须写的文章。可是别像你在政治局会议上那样朝我们扔石块,因为我们似乎歪曲了党的路线,或者对应当大声疾呼的问题保持了沉默。”

好了,同志们,这封信像不像是我们这些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给他宣判公民死刑,这像吗?我们尽其所能,想帮助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从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摆脱出来。我们的建议是要他们说,他们是在气头上讲了不该讲的话,他们收回自己的辞职要求,他们准备工作。那样就不会有这里发生的一切了。我们就会讨论哪些问题呢?怎样提高乌克兰的农村工作,还有经济生活中提到日程上的其他问题。可是我们却搞了这个问题,虽说它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但它是这些同志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并不希望这样。我们对他们说:别这么做,还有其他出路;你们何苦要和各个反对派集团一样,走完这个沉重而痛苦的阶段呢。

布哈林同志和其他同志,主要是罗济特同志,抱怨他的信没有刊登在《真理报》上。可是,同志们,布哈林同志是责任编辑,可是我们,其他编委,也要为《真理报》刊登的文章对党负责。既然责任编辑发来了一些信,其中说也是中央机关报的《共青团真理报》的头头们同什么人有什么“既不利,又不干净的”勾结,我们怀疑这封信可能会给党造成危害,就压下了这封信,决定问一问中央。我们是不是有权问一问中央呢?中央当时对我们说:暂时不要刊登,我们来处理这件事。这件事是和布哈林同志一起处理的。后来布哈林同志给《共青团真理报》写了一封信,《真理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都刊登了。这封信既没有责骂共青团,也没有对《共青团真理报》提出错误的政治指责,说它同什么人有什么不干不净的勾结,故意歪曲了他的讲话内容。《共青团真理报》错在它压缩了布哈林的讲话,做了不正确的删节。布哈林同志有权对此提出抗议。可是他无权刊登责骂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的《共青团真理报》和共青团组织的信件。库利科夫同志问道:即使一名政治局委员错了,什么时候对他进行过这样的攻击呢?

季诺维也夫抱怨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他的攻击,比如说,攻击了他的《时代的哲学》<sup>390</sup>。我们看了这本《时代的哲学》,把讲不平等的那些地方勾掉了。而《时代的哲学》正是因为被我们勾掉的地方受到了攻击。所以库利科夫同志的发言在这方面是完全不正确的。

不过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展现了我们早先不知道的他的性格特点。他气愤地说,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来对他做出那样的道德评价是不能容忍的。

难道他自己不是早就对斯大林同志和其他中央委员做出了歪曲的道德评价吗？斯大林同志说，不清楚列宁同志认为他“不忠诚”的原因何在，难道布哈林自己没有利用过这种情况吗？问题在于斯大林同志不能谈这些几年之后才能够谈的情况。布哈林同志知道这一点，在这件事上遵循托洛茨基的教诲，又拿出这封信来，指责我们公布得不够。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是为了在道德方面使斯大林同志丢脸。可是大家都相信，像托洛茨基这样后面跟着一支队伍的人尚且不能得逞的事，你们是绝对搞不成的！

布哈林同志对于各种政治措辞要求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说他不能同意加里宁的提纲，因为提纲里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或者资本主义的起步阶段有一些外行的说法。可是布哈林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当然可以告诉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你这个地方写错了，你把它改一下。

李可夫：那是他写的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问：这份提纲是不是完全由加里宁同志自己写的。

奥西莫夫：李可夫是瞧不起人。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意思：企图好歹刺痛一下加里宁同志。我知道，李可夫同志以自己的名义宣读的一些文件也是由他的秘书们起草的，是秘书们在帮他的忙。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起草提纲时有一些同志帮助他，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也不是什么错误。问题不在这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不像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没有上过大学。他是工人，你们问这是不是他写的，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布哈林同志是有学问的人，他本来应当说，你把这个地方改一改。他做了随便多少修改，可是他没有在全会之前把这里也改了，在全会上，也可能是他的某个朋友悄悄提醒他：你看，关于资本主义他们是这样写的，于是布哈林同志认为应当就这个问题拧一拧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脑袋。不行的，你是拧不动的。可是当你从自己的理论高度看问题，说斯大林应当放弃“贡赋”一词时，却有人拿着文件向你证明了你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起码你也应当有勇气承认自己错了。

罗济特：什么也没有证明。

雅罗斯拉夫斯基：对罗济特你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因为有这样一种人——哪怕你拿木棍在他头上刮，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可救药的人。（喧闹，笑

声)

所以说,当他们提出这种要求时,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今天说“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不能容忍“贡赋”,明天他们的学生就在红色教授学院把它翻译成通俗语言,说这就是“鞑靼汗王的政策”,因为鞑靼汗王的政策也就是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可是在工农群众中这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什么样子呢?它会是这样,不管布哈林同志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成了所有反对党的政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的一面旗帜,因为这是用最尖锐的形式反对党的政策,把党的这种政策断定为“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和“鞑靼汗王的政策”。在提出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指责之后,再装出一副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什么特别的分歧也不存在的样子,是错误的,甚至是不老实的。

下面谈谈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还有加米涅夫同志那份最不幸的笔记。布哈林同志绕开了这个问题,就像李可夫同志回避了它一样。显然托姆斯基同志不得不讲讲这件不愉快,而且不光彩的事情了。这个任务他完成得很拙劣,企图把事情描绘成一部爱情的侦探小说,变成一个笑话。这种事情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于是罗济特,不是这个罗济特,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许是他的兄弟,在和—一个姓奥斯特罗夫的党员谈话时,把事情说成这样,说是他相信这封信就是一部粗糙的侦探小说,他倾向于认为,“这份笔记是加米涅夫自己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请看,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加米涅夫在搞阴谋。

贼声:这是个什么人?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几个罗济特中的一个。据说是兄弟。或者,据他说,莫洛托夫的花招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编造这一部粗糙的侦探小说。何况他还发现,一共只出现了几份。他相信,“这一部粗糙的侦探小说编造出来就是为了砍掉一些同志,而这种工作方法对党说来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政策会导致党的分裂,造成党内的严重危机”。在引证奥斯特罗夫同志的信时,我不认为,这个罗济特在这里所说的内容同在座的罗济特有什么不同。也许他是在重复他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罗济特同志,或者是从别的什么“消息灵通”人士那儿听来的话。这样一来,关于伪造、关于粗糙的侦探小说、关于刑事犯罪小说等等的议论,其含义就更加可以理解了,就进一步得到了解释。这样的指责是不应当向国家政治保卫局这种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提出来的。迄今为止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提出过这种指责。如果你们从他们那里拿来这些斗争方法,那你们干得就不好了,不像是党员干的了。这件事传开了以后,应当做些什么呢?就算布哈林同志说的,他的目的仅仅在于了解加米涅夫同志的打算;在

他得知别人要诋毁布哈林之后,说明一下不要让别人诋毁,也就是商量好不相互攻击。这不妨说是有共同政治路线的人之间就不相互攻击的可能性达成的协议;是背着中央搞的协议,是反对中央的协议。那好吧,布哈林同志承认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传开之后应当怎样纠正它呢?首先不仅应当承认这个错误,而且要承认它的最大危害,这种性质的谈话的最大危害,以及停止关于伪造的种种议论,立即停止什么恶意利用的指责,让那些重复伪造故事的人记住,这是最不光彩的丑化党的办法。可是这些事都没有做,却把其他的全都抹掉了。

现在布哈林同志责备我们是托洛茨基分子。同志们,关于托洛茨基分子问题应当彻底弄清楚。这里有人指责我们滑到同托洛茨基分子结盟,完成他们的订货,接受他们的纲领。这是拙劣的手法。它使我们回想起1925年,那时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和扎鲁茨基、萨法罗夫等人一起,也像现在这些同志一样,以同样的根据提出同样的指责,我想,他们现在更不能得逞。布哈林同志的手法很简单,也不狡猾:托洛茨基分子是这样说的,而你们也就是这样做的。哎,这是老一套了;如果说托洛茨基分子的某些要求表面上同工业化的要求相符合,那就无论他们怎样解释都可以说:托洛茨基分子主张工业化,你们也主张工业化。比如说,萨普龙诺夫分子<sup>391</sup>要求加紧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你们也要求加紧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要求向富农进攻,可是布哈林也要求向富农进攻呀!而我们并没有指责布哈林同志拥护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虽然有些反对派分子说,我们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这个口号。当我们看到这种事情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列昂诺夫1925年10月3日给乌格拉诺夫的信。今天列昂诺夫也在座,他也许还记得。扎鲁茨基对他说:“托洛茨基的机会主义派唤醒了自己的对立面——左派。机会主义者本来会被打得粉碎,可是斯大林认为他们是很不错的干部,所以出来保护了他们。这就招致了连斯大林一起反,从而把斯大林推向机会主义一边。”现在是不是又在重复这种指责,说我们打算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呢?伊万诺夫同志关于乔尔内同志也说过类似的话,说是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分歧在于:“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和整个列宁格勒组织努力想彻底击败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加里宁同志等人则不仅想把托洛茨基再度选为党中央委员,甚至准备再度选进中央政治局,出版他的所有讲话和文章而不加任何注解,委托他做各种报告,广泛发行他的书籍和小册子,总之,用这种姑息的办法让托洛茨基主义得以继续存在下去。”(《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01—202页)

同志们,这就是事情的缘起。有些托洛茨基分子企图提出同我们结盟的问

题。可是我们在也是由布哈林同志任编辑的《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分子的昨天和明天》(《布尔什维克》,1929年,第2期),给这种说法以最坚决的回击。在这篇文章中,我引用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信中提出结盟问题的一段话: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我再次建议向党提出呼吁,我们应当谈减少分歧,对多数派的政策给予和从前不同的评价,建议在同右倾危险的斗争中、在贯彻工业化过程中相互合作,指出工人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并着重强调我们待在党外和流放中是非常荒谬的。呼吁最好向即将举行的党代表会议提出。必须为目前的困境寻找某种出路。”

我回答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困境寻找出路的方向错了,以为党可以同托洛茨基分子,即便是放弃了地下活动,却保留着托洛茨基分子纲领观点的托洛茨基分子结成同盟。这至少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一些党员之间有分歧,一些党员在党认为是右倾的许多问题上有动摇。我们正在同右倾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可是这并不能使任何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有权认为,党能够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某种同盟来反对右倾。托洛茨基分子不要忘了,托洛茨基主义正是由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分子组成的,党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也反对托洛茨基分子,而不论他们用什么伪装起来。党用不着托洛茨基分子的帮助来反对右倾。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提问题的方法只能把问题搅混,只能妨碍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的人找到靠近党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彻底放弃托洛茨基主义,同它彻底决裂。”

在这之后,布哈林同志还要说我们在滑向同托洛茨基主义结盟,这至少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实际上现在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某些集团正在发生剧烈的动荡,有些人想要回到党内来。例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全体同志的信是这样写的:

“摆脱困境没有别的出路。应当转向党那一边。我们这样做已经太晚了。我们不能动摇,对这个转变大家应当看法一致。”(摘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致反对派全体同志》)

照这么说,我们就应当对他们说:“不,不要转向我们党。”这可就完全错了。我们有党的十五大的决议,我们必须仔细地审理同志们的这类声明。

我有许多这一类的声明,我本来可以引用一些的。

至于说托洛茨基分子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那谁不知道以列夫·达维多维奇为首的托洛茨基分子,其主要部分对斯大林是恨得要死的,他们散发了专门的

传单,甚至号召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有谁不知道呢?布哈林同志非常了解,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我们要拿出更加有力的论据来捍卫同中央的结盟。”“应当让每个工人都知道,我们也准备完全支持斯大林的领导来反对右倾危险。”(拉狄克语)“只有全体无产阶级分子的同盟才能够挽救革命。”可是拉狄克建议要“完全支持”的、斯大林的中右领导却是“结成全体无产阶级力量同盟”道路上的障碍(摘自托洛茨基分子阿尔谢尼的信)。

这就是说,问题完全不在于我们想同某些托洛茨基分子结盟,而在于托洛茨基分子打算结成“全体无产阶级力量”的同盟,就是所谓“第二无产阶级力量”的同盟,——列宁讲过“第二俄罗斯”,——可是斯大林却妨碍着这个结盟。有些同志是对的,他们说,右派指责党犯了托洛茨基主义是为了更容易地攻击党的路线。这个指责现在是战争的旗帜,而不是和平的旗帜,布哈林同志在提出这种指责时,是非常了解这一点的。他是在举起反对现任领导的旗帜。我们过去反对过,今后也将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可是对于那些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承认自己错了,执行党的十五大决议,而且真诚地靠拢我们的原托洛茨基分子,我们有责任审查他们回到党内的问題。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和非常措施的重大问题。同志们就这个问题已经对他做了充分的回答。布哈林同志对问题的提法是危险的,因为在他认为是自己的政治盟友的人中有人坚持要把新经济政策同非常措施对立起来。库利科夫同志说:“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而不是在采取非常措施的基础上前进。”这就是说,新经济政策排除了采用非常措施;可是——请库利科夫同志原谅,我知道,你也和布哈林同志一样,和孟什维克分子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孟什维克分子就是搞这种对立的,历来如此。同志们,请看达林的一篇文章《新方针的财政》(《社会主义通报》,1922年)的摘录。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财政要以整个经济为支柱,而经济要以总的政策为支柱。只要‘新方针’上还浇着支票的辣调味汁,只要农民仍旧是政治毫无权利的对象,而共产党的支部还掌握着权力,只要自由的经济活动和人身安全还得不到法律和司法的保障,那么纲要、计划、指令和改革对于经济复苏来说就都是纸上谈兵,和现实处于明显的矛盾状态。”

这就是把新经济政策同非常措施对立起来得到的结局。孟什维克分子说:既然实行新经济政策,那就取消非常委员会。我们不这样提问题。我们不取消

无产阶级专政,而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可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我随手摘几段列宁的话: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列宁,1920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17卷,第136页,国家出版社,1924年)<sup>392</sup>

“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像铁,却很像糨糊。”(1918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24年4月29日,第15卷,第214页)<sup>393</sup>

“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1918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24年4月29日,第15卷,第214页)<sup>394</sup>

“专政是一个大字眼,一个严峻的、血腥的字眼,它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政论家短评》,1920年2月14日,第17卷,第16页)<sup>395</sup>

“无产阶级专政不怕实行强制,不怕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1920年12月22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第17卷,第412页)<sup>396</sup>

我还可以引用上百个地方。这些话同新经济政策和非常措施不相容的论断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当然不是这样。而同志们企图修正一下,他们说:不对,我们当然赞成非常措施,可是我们反对系统的非常措施,反对把它们系统化。但是难道我们赞成系统化吗?我们难道主张把非常措施变成一个经常的制度吗?我们难道赞成把这种残酷的必然性变成一种高尚美德吗?去年5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sup>397</sup>建校十周年纪念时,布哈林同志持的是另一种观点、较为正确的观点。他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暂时的动摇,我们必然会遇到多少是重大的阻碍,这就会迫使我们——为了全体劳动者的利益——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措施;这些措施首先就是打击富农的,有时候也可能触及更为广泛的阶层。但是谁也不打算把这种需要变成美德。”(《真理报》,1928年5月27日)布哈林同志,我们也不打算把这种需要变成美德。这种需要依然是需要。不过,同志们,我想



给大家讲一讲美国人是怎样看待实行购货本的。我是根据斯维杰尔斯基同志的话来讲这种意见的,斯维杰尔斯基同志和从美国回来的干部谈过话。在美国得知实行购货本之后,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就说了这样的内容:看来事情很糟糕。而一些大商人则说:既然苏维埃政权能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二个年头上实行购货本而在国内不引起震动,这就是说它很强大,就是说,和这样的政权进行商务谈判可以不用担心。他们就是这样理解非常措施的。同志们,把新经济政策同非常措施对立起来只能有一种意思,就是我们抛开了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新经济政策是实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问题,我们抛开了我们放弃强制的问题。我们不打算把非常措施变成一种制度。如果在困难时刻,有这个必要,我们就实行。

关于集体领导。这里已经得到完全证明的是:首先,任何一个反对派集团都是从攻击缺乏集体领导着手的。不妨数一数所有的反对派集团,——它们都从缺乏集体领导开始攻击。季诺维也夫分子是这样,托洛茨基分子是这样,萨普罗诺夫分子也是这样,施略普尼柯夫分子也都是这样,——他们都说缺乏集体领导,只有斯大林的独裁,没有党内民主,没有一名书记是选举产生的,没有集中,全都是自己人组成的体制,分裂、切断、简单镇压、压制的政策,骇人听闻的公民死刑制度等等,等等。

可是,同志们,这些指责在我看来都在这里遭到了驳斥。再说,他们又打算怎样来改正他们眼中的罪恶呢?他们坚持自己的“16点”。可是这简直就是笑话,似乎这16点就表明了一条特殊的工作路线、一种改正。只要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一宣读(他做得很好,把它宣读了),就足以证明,除了对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要求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除了一些没有根据的、往往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之外,没有提出什么改进党内状况的办法来。

因此大家说,党内有两条路线。所以才仿佛是很难工作。托姆斯基同志说:“如果政治局的一半人只会喊:让胜利的雷声更加震响吧,我们在成长,不断成长,成长等等;而另一半人稍稍冷静一些,说:小声些,请注意,我们可是没有粮食了,——那就得考虑考虑了。”托姆斯基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鲁祖塔克、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等同志什么时候在党内只是喊过:我们在成长,成长,成长?他们散布过这样的乐观主义吗?当高尔基回国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什么呢?他注意到我们令人难以置信地突出了我们的阴暗面、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弱点。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报纸的基调吗?我们有时候为了照顾比例关系,也举出一些成就,可是列宁早就说过,我们不善于展示好的一面。然而我们却遭到指责,说我

们过于乐观,我们似乎妨碍了工作,因为我们把事情描绘得过于色彩斑斓了!这是不对的。向我们指出的所有缺点,我们都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接受了,改正了。

所以在这里提出的种种有关“弃权”的解释也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对此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托姆斯基同志说:“雅罗斯拉夫斯基,你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问我们为什么在表决结尾部分谈到反右倾斗争的五年计划提纲时投了弃权票。”大家已经在这里向托姆斯基同志指出: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切都记在自己名下,为什么他要同右倾站在一起?他彻头彻尾地暴露了自己。李可夫同志硬说我似乎指责他们投票赞成五年计划。不是的,我闹不明白,既然他们没有特殊的路线,那为什么要投弃权票呢?现在,在布哈林同志做了解释以后,我明白了,是有一条特殊路线。

大家都看到了,在向全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讲到了反对右倾,可是如果这让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感到难堪,那他们就应当说,他们反对谴责右倾。

科托夫同志责备我说,我似乎讲过不会有困难。科托夫同志,我从来不曾讲过不会有困难。我只是说过,不要在我们确实存在的困难之外,再臆造、琢磨出一些并不存在的困难来。

施米特同志说,我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讲法是不对的。我指出,那里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着手研究一些中央委员会根本不知道的,至少是没有讨论过的困难。施米特同志责备我似乎想把苏维埃的干部,按他的说法是苏维埃的官吏,说成是一些完全没有责任感的人,自己不打算承担任何责任。我要问施米特同志:在预算缺口还没有得到最后论证,而且这个问题还没有超出主席会议的小范围的时候,国家银行根据什么给各地发去这样的电报:“第二季度的贷款计划被突破了:活期账户、预算管理账户本季度应增加1亿,而实际上2月11日比1月份减少了9800万……”,“我们必须减少资产业务,否则对货币流通将产生沉重后果”。

请看,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预算缺口就这样传遍了克孜勒奥尔达、哈巴罗夫斯克、梯弗里斯、辛菲罗波尔、罗斯托夫等地。而作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瓦夏·施米特在这里却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说是什么事也没有……

丘巴尔:这是谁的电报?

Cr. 柯秀尔:皮达可夫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说是只不过想提出这个问题等等。这种信息的实际结果

只能是惊慌失措。还能是什么呢?预算缺口。那是很严重的,不是一个小问题。根据它就发了电报——削减。结果就是这样。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不知道全国都在认真研究关于预算缺口的惊慌失措的电报,这样的例子完全不能证明,关于臆造困难的问题已经很好地解决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组织处理和结论问题。有可能出现新的反对派吗?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你们搞不出一个新反对派来,你们得不到一个新反对派的。我们之中没有谁会去领导这个新反对派,不管它会怎样称呼。”这是我自己记录的,可能不很准确,不过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大致是这样的说法。如果除了过去的之外,今后不会再有任何宗派活动,同志们也不再捍卫自己的观点,不再在党组织内用宗派主义的方式方法反对党的观点,不再捍卫遭到党谴责的观点,那我们会非常高兴;如果不出现任何新反对派,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同志们,按照斯捷茨基同志的说法,早在7月份就谈过改变政治局组成的事情。请大家设想一下这样的局面:一名政治局委员同反对派昨天的领袖谈判不相互攻击,而且和他一起拟定同中央政治分歧的文字。这是在其他几名中央委员知道的情况下,背着政治局搞的。把党的基本路线宣布为建立在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原则基础之上的错误路线;在三名政治局委员签名的特别文件里提出特殊的机会主义纲领;指责领导靠拢托洛茨基主义;在国内对党的政策不满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接过了口号,“钻了分歧的空子”;政治局委员用辞职政策和不服从政治局的决议来削弱党的纪律;诋毁多数人的领导。哎,不管你们是否愿意(虽然我更倾向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等同志不愿意),不管你们是否愿意,你们构成了新反对派、某个新反对派集团的危险。负责调查特维尔党组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诺沃谢洛夫同志给我一张传单。它不是印刷的,是手写的,被夹在纺织工人俱乐部阅览室的杂志里。这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传单是这样说的:

“工人同志们!大家看到我国的形势是致命的。疯狂的国家工业化使工人和贫苦农民透不过气来。粮食储备出现了危机,黄金储备枯竭了;党的机关官僚主义化了,缺乏民主。这一切必然导致毁灭。我们该清醒了。中央政治局分裂了,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反对斯大林的政策。我们应当支持他们——他们不再工作了。

印刷的传单即将散发,我们是有力量的。工人—列宁主义者,纺织企业”

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可是由于我们粉碎了托洛茨基分子,由于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托洛茨基成了资产阶级的人物,现在工人已经不跟

他走了,只是同农村有联系的个别工人不希望实现工业化,认为工业化是疯狂的,令人窒息的等等,所以他会支持你们指责党的那些话。这就是产生反对派危险的根源,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果断措施。

李可夫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说过:“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我们今后都可能犯错误。假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们少帮助我们纠正一些,那我们就会错得更多。”李可夫同志,我们想帮你们纠正来着,可是你们不肯听,希望你们现在能听进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你们说:你们错了,你们的路线错了,你们改正自己的路线吧。你们是否肯听从这个劝告,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许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一点。这将决定,我们是否会有我们所期望的集聚力量,而你们也是否能卓有成效地工作。那些对党的政策不满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是不是响应你们错误的论断,把你们看做新反对派的旗帜,或者是你们将会和我们一道反对被我们称为右倾的方针,——这都取决于你们。你们能不能放弃并纠正你们犯下的那些在和加米涅夫谈话之后很难纠正的错误,抑或你们还是处于这一时期所处的状态,加深这些错误,——这也取决于你们。你们感到委屈,说是你们遭到许多党组织的攻击,通过了许多断然的决议,像乌克兰人和莫斯科人做的那样等等。当你们对党提出那些闻所未闻的指责时,党必然要反击你们。谁也不愿意流血,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说,“有人想让布哈林流血”。没有人想让布哈林流血。

关于切除。有一些红色教授,如马列茨基,讲到“切除是右倾最坏的形态”。可是我们切除了好几个集团,我们知道这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不走这条路,我们不希望这样做。虽然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犯了错误,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把他们保留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内。当科托夫同志和库利科夫同志提醒我们要爱惜党的力量,而托姆斯基同志说:“我认为,任何一个同志积累起来的一点威望都是党的资本和财富,党不应当像现在这样,随随便便地浪费这种财富。我认为,这是一次沉重的手术。”我们要问:在你们跑去找加米涅夫的时候,这难道能提高党的威望吗?当你们发表对党的这些攻击的时候,这难道能提高你们的威望吗?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她发言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对局势的评价和对中央路线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说:“不能要求做出这样的声明,如‘我,乌里耶·阿考斯塔,声明放弃等等’吧。”可是我们曾经要求米亚斯尼科夫分子、施略普尼柯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萨普罗诺夫分子放弃错误的观点,那为什么就不能要求放弃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许多错误观点呢?我们在这里,在决议里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他们自己在这里只是肯定

了这种指责,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改正自己的错误观点。

同志们,根据我们经历过的和我们听到的,我不能向你们提出其他的建议,而只能用由基洛夫、鲍曼和柯秀尔等一部分全会的参加者签名的那些建议。我想,这些建议虽然很沉重、很尖锐,但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掌声)

主席:柯秀尔同志就建议发言。

柯秀尔:同志们,今天向大家分发了由基洛夫、鲍曼和我签名的决议草案。让我来宣读一下。

喊声:读过了,大家都读过了。

主席:没有人要求宣读吗?李可夫同志就投票理由发言。

李可夫:我最多耽搁大家5—10分钟。我的发言同今天分发给联席全会全体参加者的建议有关。在说明我为什么要求发言之前,我先宣读一下由列宁亲自起草,并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sup>398</sup>。这个决议是这样说的:

“代表大会认为,在目前党的处境中,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是特别不恰当的,因为对于希望党的统一的人而言,这种拒绝一般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现在则更是威胁到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声明:每一个人不是用退出中央委员会,而是发表相应的声明,就可以,而且应当因为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他不同意的步骤而解除自己的责任。因此代表大会坚信,这些同志在同群众组织商量之后,会放弃自己的声明,参加选举而不顾这个声明。”

我宣读这个由列宁同志亲手起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是为了……

卡冈诺维奇:是第七次,而不是第八次。

李可夫:对不起。也许是我说错了。

卡冈诺维奇:是第七次,在布列斯特和约期间。

李可夫:我宣读这个决议只是为了指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和本次联席全会由于昨天拒绝让我发言而使我们所处的境地之间的差别。在这次会上,主席也拒绝让我讲话,发表一个声明。我现在得到发言的机会也仅仅是“为了合乎规矩”。请把这一切同我宣读的七大决议的精神对比一下,大家就会看到当年的工作作风和我们今天的作风有多大的距离。拒绝让我发言还由于从这个讲台上对我提出了那么多完全伪造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断言、诽谤性指责、仿佛是事实的捏造等等而更能说明问题。对于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也是同样的做法。

由于你们昨天拒绝让我发言,我自然不会滥用现在这个讲坛,也不会回到已经被你们宣布停止了的讨论。我只想谈一谈决议草案。

首先我想指出,有些人怀疑我们,也就是我、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对决议草案所持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是针对我们个人的。

我们要声明,而且过去已经说过,和党内、国内的某种局势相关联的个人动机对于我们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我还要声明,历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和党的所有决议我们都是执行了的,今后也将执行。

根本谈不到我们转到了宗派斗争的路线、宗派集团的路线上去了。可以作为证明的是:尽管在这次全会之前我们被置于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下,在这次全会上并没有人指出,在什么地方散发过出自我们的任何文件,捍卫我们的观点而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也没有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在能够从事的政治活动中没有遵守纪律。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没有一次违犯过党的决定。在此前的那些分歧中,你们未必能找出这样的事例来。我就决议的草案发言完全不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我的、布哈林的或是托姆斯基的个人地位,也不是为了保护某些其他的利益,除了党的总利益之外。我要求就这个决议发言,只是因为在我看来完全错误地、歪曲地、虚假地解释了我们的立场,而且就其性质而言,它标志着我们党内生活的新阶段。它在实质上提出了什么建议呢?对于政治局的一些成员提出了不平等的地位。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我们什么时候这样来组成过领导?我想,从来不曾有过。

喊声:不曾有过什么?

李可夫:我们不曾这样来组织过我们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的各个成员地位是不平等的。

喊声:这和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呢?

李可夫:你们不是要求不宣读决议吗?可是你们事先已经读过了。我对在座的人评价都是很高的,我认为,在大家读过决议草案之后,无须再对大家详细解释决议的含义了。如果把决议草案同散发决议草案之前的那些发言,哪怕是同斯大林同志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发言对比一下,它的含义就更加清楚了。

你们拿不出一件我们破坏党的文件中记录着的决议的事实来。我们在政治局内的平等就在于:只要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志,或者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或者中央书记之一的莫洛托夫同志的讲话还没有形成党的正式文件,我们在解释和执行党的决议时就都是政治局的平等成员。比如说,如果从我们两年来都在执行非常措施,就得出结论,认为非常措施今后也是我们的政策和粮食采购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喊声:如果是在政治局内部,那倒无所谓。

李可夫:那我们就有权,而且根据全会的决议有责任就这个方针进行争辩。

喊声:如果是在政治局内部,那倒无所谓。

李可夫:我指的是党的路线和党的决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比政治局要高一些。

向你们提出的这个决议就是从这个方针出发的,虽然说得不是很清楚。它的出发点就是把非常措施作为我们全部经济工作和政策的方针,虽然党的所有决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对于党而言,它的出发点就是从来也不曾记载过的,也不可能记载下来的方针,规定政治局委员的不平等地位。如果你们把它附在全会上发言的后面,那它的含义就完全清楚了。我对你们说过,我关心的不是自己:无论是我,还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都丝毫没有保护自己的因素。对政治局和对我们将要通过的方针可以损害我们,在政治上置我们于死地:党可以,也有权这样做。可是我担心,它会给全党造成极大危害,成为组织领导机构和全党生活中的一个全新阶段的起点。

我不知道这个草案会不会有修改,可是我,还有其他人将服从,我再说一遍,联席全会的任何决议。而且我要排除全会建议我、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中央全会上或是政治局会议上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的可能性。在现在的情况下,提出的决议不能不是把我们作为政治活动家加以消灭,作为进一步反对我们的一种独特的工具。

决议草案提出的建议,其出发点是,即使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下,我们也要留在政治局内。

我和其他许多同志都指出了这种局面的种种不便之处,指出了在解决主要问题——领导问题时的折中主义。不过我们当然会尽一切努力,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执行党及其机构的决议。

可是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我们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这种可能性是极成问题的!

柯秀尔:这完全取决于你们。

主席:我把决议草案的基本精神提付表决。谁赞成基本上通过柯秀尔提出的决议,请举手。谁反对? 10票。谁弃权? 3票。

有对决议的修改吗? 我建议只做原则性的修改,委托政治局最后定稿。

波泽恩同志发言。

波泽恩:我觉得,这里缺少一点说明,虽然许多发言者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应当说明布哈林集团现在已经吸引了第三种势力的注意,说明它的举动是

国外新闻界现在猛烈攻击苏联的口实,另一方面,这种倾向的内容又构成把苏联国内与我们为敌的势力吸引在它身边的特殊危险。我觉得,决议必须以某种形式指出布哈林集团的这种特殊危险性。可是决议里没有这一点。

**主席:**须要讨论修改意见呢,还是提付表决?提付表决。谁赞成波泽恩同志的修改,请举手。少数。

**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决议的结尾是这样说的:“本决议分发给各级地方党组织和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全体代表,但不在报刊上公布。”如果指的是“三个人”的立场和对布哈林集团的评价,那我认为目前不在报刊上公布是完全正确和可行的。可是这个决议不仅仅是界定“三个人”的立场,而且有对于我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总评价。我认为,这是我们不能在报刊上隐瞒的。我们不能脱离工人阶级。决议说得对:“和向困难投降的政策相反,党向劳动群众公开提出必须克服这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的问题。”我无条件地赞同决议草案中的这些话。成千上万的党员应当从这个决议,从我们党的这项决定中受到教育。同时党外的无产阶级新干部也将从党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中受到教育。因此我认为,必须把这些问题不仅用文章的形式,而且以我们党的名义提交给工人阶级讨论,所以我建议在决议里增加下面这一点:

“委托政治局以本决议为基础,在报刊上安排公布。”

**主席:**付表决。谁支持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建议,请举手。少数。

**丘巴尔**同志有修改意见。

**丘巴尔:**第五点里根据其余各点说:“采取措施使政治局个别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言论中不致出现某种背离等等。”

我在这里讲话不是因为这段话涉及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是想维护这样一点:这样的建议应当单列一条,明确指出采取哪些措施,或者指出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经过检查。对于某些同志应当有这种限制,特别是在国际问题方面,免得在外交工作中说法不一致。

**伏罗希洛夫:**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丘巴尔:**现在在国际问题上是这样做了。如果这一点具有同样的效力,那就和建议我们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干部每年就国际问题讲话不得超过一次是一样的了。如果我们就党的问题讲话每年也是这样,而且在发表之前要送审,我担心这会大大削弱我们的工作。我不是反对这个想法的实质,这个实质在我看来就是要为讲话的一致性规定一个程序。



伏罗希洛夫:每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要捍卫党的路线。

丘巴尔:就应当这样写下来。

喊声:本来就是这样写的。

丘巴尔:不对,这里没有写。布哈林搞过幕后谈判。全会谴责他是完全正确的。搞过辞职政策。全会也谴责了。应当免去职务。也免了职。可是却说“采取措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这样写下来,建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注意,他们的讲话不得背离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我认为,这一点的措词不够明确,我举出的协调讲话的事例可以用种种动机来解释,而这一点的上下文中讲到“撤销职务”、“谴责”和“采取措施”,含义并不清楚明确。显然应当委托政治局规定一些细则,怎样在讲话中防止背离,因为在每篇讲话里都有某种背离的因素。这些都可以在发表之前改正。我明白,假如你写的是一部著作,那当然应当协调好,可是这样的表述会导致一种做法,就是使一部分领导干部避免就尖锐问题发表必要的讲话,而宁愿不讲话。我认为,规定这样的程序是有害的。

主席:柯秀尔同志对丘巴尔同志的建议有不同意见。

柯秀尔:丘巴尔同志讲的意见是不对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误解。问题在于每个政治局委员无论在哪里讲话,他当然都应该捍卫党的路线。

洛佐夫斯基:普通党员也应当这样做。

柯秀尔:嗯,普通党员还容许有某些不明确的地方,可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对路线十分清楚。这是不消多说的。普通党员讲话有时候还容许有一些怀疑,对于中央委员则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容许的,无论他自己的观点如何。

洛米纳泽:对于候补中央委员呢?

柯秀尔:当然是一样的。斯大林同志讲得非常正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对于每次讲话都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政治局委员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是政策,所以这里写着,这些讲话首先就应当由政治局委员自己非常仔细地检查。这是正确的。我想,这里应当这样说:“政治局应当采取措施以便……”等等。政治局应当规定一定的程序。怎么会得出那就不要讲话的结论呢?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就是说,每次讲话之前,我应当比过去多十倍地反复考虑我要讲的话,免得出错,以便党的路线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保卫。

主席:付表决。谁赞成丘巴尔的修改,请举手。少数。

现在就整个决议付表决。

丘巴尔:柯秀尔有修改意见。

柯秀尔：我建议这样说：政治局应当采取措施，使讲话等等。

主席：谁反对通过这个修改？没有。

现在就整个决议付表决。

谁赞成整个这项决议？谁反对？10票。谁弃权？3票。

出席会议的大约250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通过了这项决议，有10票反对，3票弃权。

米哈伊洛夫同志就投票动机发言。

米哈伊洛夫：我个人不同意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上采取的一般路线。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中央和政治局的路线是最正确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不能同意就个别问题，特别是就工会运动问题提出的决议。我认为，决议里指出的那些因素在我们的工会运动中并不存在，可是决议却说：“在工会问题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同志极其危险地把工会同党对立起来，他们采取削弱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的实际方针，掩饰工会工作的缺点，掩盖部分工会机关中的工联主义倾向等等。”我认为，我们工会工作中有许许多多缺点，假如我们掩饰这些缺点，那就是犯罪，可是也不能说有工联主义倾向。在苏联的条件下，什么叫工联主义呢？这就是脱离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就是企图组织独立工会。我们是不是把工会同党直接对立起来了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对立。假如有了，那就是最危险的因素。

现在谈谈我反对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是否存在宗派，是否有派性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是的，布哈林同志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同加米涅夫谈过话，是的，三个人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错误的，譬如说，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问题、关于官僚主义的问题，还有许多我不同意的见解，可是所有这些问题，所有提供的这些材料都让我认真地思考，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说明，这些同志，也就是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搞宗派活动，而且可能扩散到全党。没有这种事情。就以这件事为例吧。莫斯科省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期间他们没有出席，虽然有些同志说他们本来应当出席的。他们没有出席。假如他们出席了，那的确就是公开的反党斗争的一部分了。可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认为，以许多经过正确论证的政治问题为基础的决议，也在这样的问题，如工会运动问题、宗派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有助于消除我们党内生活中现在存在的情况。

**主席:**多加多夫同志就投票动机问题发言。

**多加多夫:**我投弃权票的原因如下。我认为,按照通过的决议,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把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从政治局清除掉。我认为,清除他们是不对的。可是我认为,通过的决议使他们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很难工作,甚至不可能工作。

其次,我认为决议里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如指责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搞宗派斗争,指责92名在工会八大上投票要求重新审议政治局关于选举卡冈诺维奇的决定的同志搞宗派斗争。再者,指责惊慌失措,企图遏制社会主义建设。我认为这些指责都是错误的。我并不同意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提出的路线,认为它是停滞的理论,原地踏步的理论。这不是有作为的领导党的路线。我根据上述理由投了弃权票。

**主席:**科罗斯捷列夫同志就投票动机问题发言。

**科罗斯捷列夫:**根据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和一些同志的发言,在工会八大上似乎有一部分宗派集团的成员同中央闹对立。我是投票反对把卡冈诺维奇同志选入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那些人中的一个。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把我根本不曾说过的话强加在我头上:“国内会怎样说呢?”总之,这句话在我看来很奇怪。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我们讲的是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阶级,而国内有富农,有耐普曼,在会上没有讲到他们。

当时说的是,如果我们要建立工会的领导机构,那我们事先就应当使它没有重大缺陷。如果怀疑托姆斯基同志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不能保证充分贯彻党的路线,就应当立即指出来,那样选举卡冈诺维奇的目的就可以理解了。

我认为,说代表大会上有人搞宗派活动,企图把工会同党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根据这些理由投了弃权票。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责成全体党员,其中也包括我,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切实地执行党内多数人的路线。

**主席:**索尔茨同志就投票动机问题发言。

**索尔茨:**我投票赞成这项决议,因为我认为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结论也完全符合业已形成的局面;但是我不同意对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个人的政治评价,因为这个评价同决议建议的处置办法是矛盾的,也使这些同志,主要是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难以消除所犯的错误。

主席:第一项议程到此结束。

## 全苏党代表会议问题

主席:我提出下述建议:基本上同意政治局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提纲、关于提高农业的途径和减轻对中农课税的提纲、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当前任务的提纲,并将这些提纲提交代表会议最后批准。

有反对这项建议的吗?付表决。谁赞成接受这项建议?多数。

托姆斯基同志发言。

托姆斯基:同志们!我、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投票赞成基本上接受五年计划的提纲,因为我们认为,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阐述的五年计划是正确的、切实可行的。

但是我们打算在这次全会上对这项决议做相应的、在我们看来是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我们基本上赞成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同时我们想,在代表会议上会允许我们,像其他中央委员一样,对决议和提纲提出在我们看来可以改善这些提纲的修改意见。我们认为,加里宁同志的提纲有重大缺陷和不恰当的表述。这些提纲对我们面临的困难描述得不够清楚。

但是我们认为,加里宁同志的提纲中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 关于清党

主席:关于第四项议程——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关于清党的报告——建议基本上批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已经发表的关于清党的提纲,并用这个问题补充代表会议的议程。将这个提纲提交代表会议做最后讨论。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主席:付表决。谁赞成这项建议?谁反对?没有。弃权的有吗?没有。

乌加洛夫:我也赞成。把我派去清洗吧,我以前搞过清洗。

## 选举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

**主席:**建议选举下列人员组成筹备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基洛夫同志、柯秀尔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泽连斯基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卡巴科夫同志、鲍曼同志和安德烈耶夫同志。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主席:**谁赞成批准组织委员会?谁反对?没有。

现在宣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闭幕。

## 附 件

### 1

##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会议记录

### 出席人：

#### 联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阿库洛夫、安德烈耶夫、安季波夫、阿尔秋欣娜、巴达耶夫、鲍曼、布勃诺夫、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加马尔尼克、戈洛谢金、多加多夫、茹柯夫、泽连斯基、卡巴科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Э. И. 克维林、基尔基日、基洛夫、克诺林、科洛季洛夫、科马罗夫、И. В. 柯秀尔、С. В. 柯秀尔、科托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Н. К. 克鲁普斯卡娅、库比亚克、库利亚夫、古比雪夫、列普谢、洛博夫、洛莫夫、柳比莫夫、曼努伊尔斯基、梅德韦杰夫、缅仁斯基、米高扬、米哈伊洛夫、莫洛托夫、莫斯科温、奥拉赫拉什维利、彼得罗夫斯基、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鲁缅采夫、鲁希莫维奇、李可夫、斯克雷普尼克、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斯捷茨基、苏利莫夫、瑟尔佐夫、托洛孔采夫、托姆斯基、乌加洛夫、乌格拉诺夫、乌汉诺夫、丘巴尔、丘多夫、施瓦茨、什维尔尼克、В. 施米特。

#### 联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阿列克谢耶夫、安采洛维奇、巴拉诺夫、布留哈诺夫、瓦雷基斯、格里亚

金斯基、日丹诺夫、В. И. 伊万诺夫、伊克拉莫夫、卡达茨基、卡雷金娜、卡明斯基、基谢廖夫、克利缅科、Т. 康德拉季耶夫、克里尼茨基、列昂诺夫、洛佐夫斯基、洛卡茨科夫、洛米纳泽、马尔科夫、美尔尼昌斯基、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米尔佐扬、穆萨别科夫、尼古拉耶娃、诺索夫、奥新斯基、奥什温采夫、В. И. 波隆斯基、К. 鲁缅采夫、伦金、留京、谢苗诺夫、谢列布罗夫斯基、索博列夫、斯特罗加诺夫、苏霍姆林、温什里希特、乌雷瓦耶夫、哈塔耶维奇、齐洪、恰普林、丘维林、丘茨卡耶夫、埃利亚瓦、埃赫。

#### 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阿列克谢耶娃、阿米尔哈尼扬、В. Г. 安东诺夫、安东诺夫、阿法纳西耶夫、巴尔马舍娃、鲍尔、巴赫京娜、别连基、波格丹诺夫、И. А. 波格丹诺夫、博良、布林、布谢、瓦西里耶夫、温伯格、维克斯宁、维什尼亚科娃、沃热夫、加列耶夫、加利耶娃、加卢什金、格拉西莫夫、贡恰罗夫、戈尔恰耶夫、戈尔什科夫、格列恰内、格里戈里耶娃、格罗斯曼、格鲁泽里、格里亚泽夫、А. М. 格里亚泽夫、古列维奇、古谢夫、杰索夫、季里克、多利泽、久热夫、叶夫列伊诺夫、Я. Г. 叶戈罗夫、叶利扎罗夫、叶努基泽、日丹诺夫、扎维茨基、扎格列别利内、Г. А. 扎伊采夫、Г. Н. 扎伊采夫<sup>①</sup>、扎伊采夫、赞格维尔、扎东斯基、泽姆利亚奇卡、伊利英、М. М. 卡冈诺维奇、В. С. 卡拉什尼科夫、М. И. 卡拉什尼科夫、卡尔马诺维奇、卡尔宁、卡拉瓦耶夫、卡拉耶夫、卡里莫夫、卡雷-库利耶夫、卡尔波夫、克柳耶夫、克尼加、科贝林、科瓦廖夫、科热夫尼科夫、科兹洛夫、科科维欣、科洛博夫、科米萨罗夫、康德拉季耶夫、科诺年科、科潘、科皮耶夫、А. А. 科罗斯捷列夫、Г. А. 科罗斯捷列夫、科罗特科夫、科萨列夫、克里沃夫、克雷连柯、库兹米娜、库尔佩巴耶夫、拉多申、拉林、拉里切夫、列别杰夫、列别德、列维京、列扎瓦、林格尼克、利西岑、雷切夫、利亚克苏特金、马格尔、马祖罗夫、马约罗夫、马克耶夫、马尔采夫、曼扎拉、马尔吉基扬、马丁诺维奇、马哈拉泽、梅德韦杰夫、米利恰科夫、米柳亭、米特罗法诺夫、莫伊谢耶娃、莫罗兹、莫罗佐夫、穆拉诺夫、穆采涅克、纳扎列强、纳扎罗夫、尼基京、尼科诺罗夫、诺沃肖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奥斯特洛夫斯基、奥

<sup>①</sup> 原文如此。人物简介为 Г. М. 扎伊采夫。——编者注

西莫夫、帕夫卢诺夫斯基、帕斯图霍夫、彼得斯、彼得罗夫、佩列卡托夫、普列沙科夫、波德沃伊斯基、波泽恩、波林、拉杜斯-曾科维奇、拉斯托普钦、列坚斯、赖因瓦尔德、雷夫金、罗森霍尔茨、罗济特、罗兹米罗维奇、罗伊津曼、罗曼诺夫、萨沃斯京、萨哈罗娃、萨希亚诺娃、谢尔加宁、西罗托夫、斯米多维奇、斯莫罗金、索尔茨、斯塔兰尼科夫、斯塔罗斯金、斯捷波瓦内、斯特列利佐夫、斯图季托夫、斯图鲁阿·瓦诺、斯腾、捷列霍夫、茨韦特科夫、齐科、沙茨金、施韦泽、舍博尔达耶夫、什基里奇、什基里亚托夫、什洛克、绍特曼、施特劳赫、舒什科夫、尤尔金、尤尔岑、雅科夫列夫、Я. А. 雅科夫列夫、Н. М. 扬松、Е. М. 雅罗斯拉夫斯基。

#### 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波格丹诺夫、贝京、弗拉基米爾斯基、列帕、利亚多夫、里亚比宁、里亚博夫、斯捷潘诺夫、尤列维奇。

#### 出席人总计：

中央委员——65人，候补中央委员——4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80人，中央检查委员——9人，共计：301人。

| 听 取   | 议 决   |
|---|---|
| 1. 关于党内事件<br>(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 1) 批准由基洛夫、鲍曼、柯秀尔同志起草的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草案(中委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多数票通过,10票反对,3票弃权)。<br>2) 本决议由政治局最后修订。   |
| 2. 全苏党代表会议问题：<br>1) 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br>2) 提高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税负。<br>3) 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总结和今后的任务。 | 基本同意政治局提出的下列报告提纲：<br>1) 李可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古比雪夫同志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br>2) 加里宁同志的提高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税负；<br>3) 雅科夫列夫同志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总结和今后任务，——提请第十六次全苏党代表会议最后审定。 |
| 3. 关于清党(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 1) 基本同意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关于清党和检查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提纲。<br>2) 第十六次全苏党代表会议的议程中增加清党问题并将提纲提交代表会议审定。  |



(续表)

| 听 取  | 议 决  |
|--|--|
| 4.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和苏联工农检查院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副报告。 | 推迟到下一次中央全会。  |
| 5. 关于第十六次全联盟党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人选。                        | 批准第十六次全联盟党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С. 柯秀尔、卡冈诺维奇、泽连斯基、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卡巴科夫、鲍曼、安德烈耶夫。 |

## 2

##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

1929年4月23日通过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同意1929年2月9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

鉴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没有可能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1929年2月9日的派别政纲式的声明给以评价,鉴于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仍在继续发挥并维护他们同党的路线相对立的观点,鉴于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拒绝服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不准辞职的决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必须通过如下的决定:

1. 联共党内右倾的发展和形成是同现阶段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形势和国际革命运动方面发生重大转变的种种征象。这一转变的特征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在尖锐化,这种矛盾日益动摇并破坏着资本主义的暂时而不牢固的稳定,同时,新的革命高涨的因素在增长起来(欧洲许多国家中的罢工浪潮、工人阶级的左倾化、共产党人在一些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德国工厂委员会选举中的巨大胜利、印度革命危机的扩大、其他殖民地的革命骚动的不断发生、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危险的增长)。

在这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共产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肃清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保证党在不断增长的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训练广大群众去进行日益迫近的决定性的阶级搏斗。

因此,共产党必须在整个战线上加强斗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反对它的“左”翼以及工会的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更广泛而坚决地以共产国际的口号把有组织的,特别是无组织的工人动员起来。

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事实,对共产党内的某些成分起着影响的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存在,以及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残余,这一切都滋养并加强了共产国际各支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这种派别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右倾分子滚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去,他们以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来评定资本主义的稳定(关于资本主义“健全化”的理论),其具体表现是:掩饰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危机,否认资本主义的稳定不能持久的事实,抹煞“第三时期”的革命特点。这样,右倾分子和尾随在他们后面的调和分子就直接走到修正列宁对目前时代的评定的地步,列宁认为目前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是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他们却轻视新的革命高潮增长的因素,因而否认动员工人群众(特别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去独立进行反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派的斗争的任务。

联共党内的右倾和共产国际队伍中的这种机会主义派别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布哈林同志在这一问题上实际是同情调和分子洪别尔-德罗、埃韦特、格哈特等人的机会主义立场的。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阻挠着共产国际去反对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和调和主义。这三位同志声明说,我们党的政策正在使共产国际“瓦解”,使它的队伍削弱,并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分崩离析;这一声明不仅表明他们陷入庸俗的机会主义而不懂得清洗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任务,同时也表明他们在实际上是支持右倾叛徒的。这样,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就在客观上日益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中一切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集团的中心。

2. 联共党内右倾分子的政治立场就是向困难投降,这些困难是由于苏联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产生的。改造时期意味着苏联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重大转变。我们必须在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要求党采取迅速发展工业的政策。目前无产阶级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已着手进行铲除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老根的极其艰巨的工作,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农村中的中心任务)。工人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已进入新的阶段,采取了新的形式,日益带有生产的性质(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机器供应和预

购合同等)。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和农民小私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迅速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落后的任务,直接开始农业的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的工作,都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困难。与向困难投降的政策相反,党向劳动群众公开提出必须克服这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的问题。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对立,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尖锐。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资本主义成分的被排挤,以及随之而来的敌对阶级势力反抗的加强,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转变阶段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现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加剧,而不是熄灭。

目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展起来的农村资本主义上层分子,已经比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拥有更多的经济上的机动力量(粮食、生产资料)。富农正利用这种机动力量来拼命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力图破坏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和苏维埃国家的价格政策。这种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企图是争取实现国内资本主义分子的基本要求,首先是维护农业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道路的最明显的形式之一。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确认,最近布哈林集团在我们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实际上已从摇摆于党的路线和右倾路线之间转为维护右倾的立场。布哈林同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特别是2月9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宣读的三人政纲,以及这些同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显然都是要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对新经济政策的自由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否定无产阶级国家对市场关系的调节作用),轻视社会主义工业同农业结合的新形式,轻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作用,同时又显然过高估计个体小农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这一切在客观上就是收缩社会主义的进攻和削弱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斗争中的阵地的路线。与党的路线相反,布哈林同志集团继弗鲁姆金之后,实际上是在指望扩大富农经济发展的机会。他们在这方面建议废除对富农的个别课税,继续提高粮食价格,停止向富农强制收购粮食。右倾分子反对党动员农村贫中农阶层同富农的蓄意隐藏粮食和进行粮食投机的行为作斗争的措施,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富农对粮食收购工作以及对工人阶级和贫农的粮食供应工作进行破坏的企图。不断向农民让步的理论就是右倾分子这一政治路线的基础,这种理论证明右倾分子已经忘记无产阶级在同农民的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同时表明他们是在明目张胆地修正列宁关于同中农结合的学说。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否认在目前改造时期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性,并企图说明

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不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而是由于所谓计划不周和地方机关的缺点等等所引起的,——这些也都是带有同样的政治目的的。

3. 完成改造时期的极其复杂的任务,克服由此产生的种种困难,以及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都要求改组一切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和一切工人阶级组织的队伍,并改进其工作方法,以便最广泛地发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团结和发动农村中的所有贫中农来反对富农,保证给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以彻底的回击。这种改造的基础,就是进一步开展遭到我们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抗拒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自我批评。对党内蜕化分子实行总清洗,开展自我批评和发扬党内民主,这将使工人阶级先锋队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到锻炼。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阶级敌对分子和官僚主义,活跃苏维埃,坚决加强群众对工人阶级一切组织的工作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使管理制度适合于改造时期的任务,——这一切将促进国家机关的改造,促进其进一步的改善。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组织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方面,以及在对无产阶级的新的阶层进行阶级教育方面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会,必须坚决根除狭隘关门主义和工联主义的各种残余,坚决根除对群众采取官僚主义的冷淡态度、对维护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和利益的任务采取轻视态度的各种残余。活跃合作社,使各个合作社组织完全摆脱农村富农上层分子的影响,加强无产阶级对合作社的领导,这一切将保证这一最重要的农民群众组织能按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不坚决克服右倾,就不能解决这些任务。布哈林同志集团关于党在培植官僚主义的诽谤性的声明就是要贬低党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方面所展开的巨大工作的意义。这个集团庸俗地非难自我批评,其用意不是别的,而是直接反对自我批评的口号。在工会问题上,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极其危险地把工会同党对立起来,他们采取削弱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的实际方针,掩饰工会工作的缺点,掩盖部分工会机关中的工联主义倾向和官僚主义的麻痹现象,把党对这些缺点所作的斗争说成是托洛茨基的对工会的“整肃”。在党机关的作用和党内制度的问题上,布哈林同志集团的立场则完全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曾经用以反对我们党的最恶毒的责难的再版。党正在并且将来还要“不顾情面地”在自己的队伍中为进一步开展党内民主和无产阶级自我批评而斗争。同时,党也要坚决排除右派分子所力争的、以维护他们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为目的的批评“自由”。列宁的党坚决反对这种使党内各种倾向和派别集团合法化的“民主”。党内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总路线的

基础上巩固党的列宁主义的统一和团结。

4. 右倾的根源是工人阶级周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党内,右倾的基础就是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中那些最受小资产阶级影响、最有蜕化危险、最不稳定的分子,以及还没有受过工厂的长期锻炼并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最落后的工人阶层。布哈林同志集团2月9日的政纲以及该集团的成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所维护的观点,都是向这些不稳定分子呼吁,并在客观上促使党内形成右倾。

党在揭露自己队伍里和广大群众中的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党内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彻底克服右倾以及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要解决这一任务,一方面应当不断揭露右倾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另一方面应当对党组织、工会组织、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的右倾现象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的党的基干是在同机会主义进行的多年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在这样的党的队伍里,公开的机会主义右倾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广泛而公开的支持的。更危险的倒是那种隐蔽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拿形式上同意党的决议作幌子,而实际上却歪曲党的阶级路线。因此,揭露实际工作中的右倾,应当是同党内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

5.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确认,布哈林集团已经开始向党的领导进行派别斗争。他们极端严重地破坏党的纪律(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两同志拒绝执行政治局关于他们的工作的数次决议)。他们企图以辞职的手段强迫党接受他们的路线。他们在莫斯科组织内煽动派别活动来反对中央,企图使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党团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企图组织一个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毫无原则的上层分子联盟(布哈林同志曾向加米涅夫同志建议组织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联盟),如此等等。用所谓已滚到托洛茨基立场上去来对党进行空前的诬蔑,用所谓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来对党进行诽谤性的攻击(这是从米留可夫党的武库中搬来的),用所谓党在培植官僚主义和瓦解共产国际来责备党,——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性,证实了这个集团已经背离党的总路线。布哈林集团就是这样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的统一,违反了布尔什维克的纪律,破坏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

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根据所有党组织的意志(他们一致拥护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并坚决斥责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行为和观点,认为这些行为和观点基本上是右倾的反映),考虑到

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为了维护在目前条件下特别需要的党的统一,特决定:

(1)斥责布哈林同志集团在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声明中,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同志2月9日的声明中,以及这些同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所陈述的观点,认定这些观点是同党的总路线不相容,而同右倾的立场基本一致的观点,责令他们无条件地执行党和党机关的决议;

(2)斥责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幕后谈判,认定这是布哈林同志集团派别活动的最明显表现;

(3)斥责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两同志的辞职政策,认定这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

(4)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两同志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担任的职务,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再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及其各机构的决议的情形,就将被当做破坏党纪的分子而立即开除出政治局;

(5)政治局必须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言论中没有任何违背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的地方;

(6)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一切机关报刊(无论是党的或苏维埃的,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7)规定特别办法(直到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以保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性,使托洛茨基分子不能获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内部情况;

(8)将本决议分发给各地方党组织和出席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不在报刊上公布。

## 3

## 1929年2月9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 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

经1929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同意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研究了各种文件,并且考虑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1929年1月30日所交换的意见后,做出以下的结论:

### 一、布哈林同志企图秘密组织反对中央的派别联盟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查明:

(一)中央七月全会期间(1928年),布哈林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一起背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且违反它们的意志,同加米涅夫同志就改变中央的政策和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构成进行了幕后派别谈判;

(二)布哈林同志进行的这几次谈判,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即便不同意,也是知情的,而这两个同志虽然知道了这几次谈判并且也明白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却把这件事瞒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三)布哈林同志进行的这几次谈判的目的是要向加米涅夫同志说明中央对经济问题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是要商议如何改变这个政策和相应地更换政治局成员,并从而论证布哈林同志等人必须和加米涅夫同志集团组织宗派同盟;

(四)这几次派别谈判是在政治局(7月2日)和中央全会(7月10日)已经一致通过了关于经济状况和粮食收购政策的决议之后进行的;

(五)布哈林同志的这几次谈判是在政治局根据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



斯大林同志的倡议正在草拟中央委员会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关于政治局内没有意见分歧的宣言的时候进行的。政治局全体委员在宣言中做了如下的坚决声明：“在下面署名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代表会议声明,坚决抗议散布任何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间存在意见分歧的谣言。”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根据上述情况决定:

(一)斥责布哈林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行为(同加米涅夫同志进行谈判)是一种派别活动,这种活动证明了布哈林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毫无原则性而且违背了忠诚老实的起码要求;

(二)认为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把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进行幕后谈判的事实瞒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这种行为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 二、布哈林同志的派别活动向哪里发展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查明,布哈林同志的派别活动不仅仅限于同加米涅夫同志集团进行了几次幕后谈判,其实,他的派别活动在中央七月全会以后的时期并没有停止过,而且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在以各种方式继续进行。这些事实就是:布哈林同志拒绝担任共产国际的工作;拒绝担任《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不请示中央就在报刊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札记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折中主义的胡说八道,它造成了党内争论的危险);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以前提出辞职;布哈林同志在1929年1月30日发表声明(这个声明基本上证实了他在1928年7月同加米涅夫同志会谈的内容);托姆斯基同志在1928年12月提出辞职;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愿服从政治局数次通过的关于收回辞职声明的决定,——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说明布哈林同志一直心怀叵测地反对中央。

布哈林同志为了替自己的派别活动辩护,对中央、对中央的内外政策、对中央的组织领导进行了一系列极其令人不能容忍的诬蔑,其目的都是要破坏党和党中央的威信。布哈林同志既然诬蔑党的政策,也就滚到了靠耍手腕来维护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分子(弗鲁姆金同志及其同伙)和共产国际内的调和分子(洪

别尔-德罗同志及其同伙)的立场上去,这些右倾分子要求放纵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而调和分子则否认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性,企图修正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并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开除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决议。

由此,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查明了以下事实:

(一)布哈林同志声明,党在七月全会以后的政策是根据斯大林同志在全会演说中所宣布的“贡赋口号,即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而规定的。这个声明是十足的扯谎,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全党(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过去一直反对而且将来还要反对托洛茨基的“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这一点布哈林同志了解得同全党一样清楚。全党(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的出发点是:农民购入的工业品的价格还较高,而卖出的农产品的价格却较低;而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工业化,那就不能马上取消这种超额税(“贡赋”);但是这种超额税必须逐步加以缩减,以便经过若干年后把它完全取消。如果这一点确实是布哈林同志同党发生分歧的地方,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在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上声明呢?大家知道,政治局全体委员(包括布哈林同志在内)在刚开完七月全会之后曾在1928年7月30日政治局委员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的著名宣言上签过名,这个宣言说:“在下面署名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代表会议声明,坚决抗议散布任何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间存在意见分歧的谣言。”如果布哈林同志确实认为他在“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问题上同斯大林同志或政治局有根本的意见分歧,那么他怎么能够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呢?难道他当时是欺骗党吗?大家知道,政治局全体委员(包括布哈林同志在内)在1928年11月的十一月全会期间曾一致通过决议说:无论在全会上或在报告中都要宣称政治局内部是团结一致、没有意见分歧的。如果布哈林同志确实认为他在农民政策问题上同斯大林同志或政治局有根本的意见分歧,那么他怎么能够投票赞成这样的决议呢?难道他当时是在欺骗党吗?显然,布哈林同志自己并不相信关于“贡赋”的废话,他现在所以使用这种诬蔑手段,甚至不惜对党进行造谣中伤,其目的是为自己的派别活动辩护。

而且布哈林同志对党进行诬蔑并不是第一次,在我党历史上的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事实:当时布哈林同志自己坐在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泥潭里,却责备列宁和列宁的党陷入机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性;当时他在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提纲上写道:“党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是一种动摇和妥协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社会基础就是我们党从纯粹无产阶级

的党蜕化成为全民的党的过程”，“党不是把农民群众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农民的水平，从革命先锋变成了中农”（见《媾和反对者集团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02页）。

（二）布哈林同志声明，对农民增收“超额”税是党的政策的组成部分，党和中央似乎没有执行中央全会关于鼓励个体农户并提高其单位面积产量的决议。这个声明是不正确的，是捏造。去年全党都认为征税不足，农业税很少，必须增加。因此，去年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把税额增加到4亿卢布。但是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征税办法（35%农户不增税，而把全部增税负担加在其余65%农户身上）大大侵犯了某些中农阶层的利益。为此，政治局根据加里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还在去年12月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拟定减轻中农税负的办法。为此，政治局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倡议把减轻中农税负的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议程。为此，政治局根据加里宁同志的报告，通过决议把税额减低到37500万卢布并对扩大播种面积的贫、中农户在征税上给以优待。

这些事实布哈林同志是不会不知道的。

至于说到党在提高贫、中农户单位面积产量方面的工作，那么只要指出，全党开展了广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常会以后特别加强起来），在一切产粮区召开了当地和区域的谷物会议，广泛采用了预购合同的方法，——只要指出这一切事实，就足以了解党非常注意谷物问题，非常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鼓舞个体农户的问题。

这些事实布哈林同志也是应该知道的。

关于今年农村商品供应和粮食收购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对农村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无论在质的方面或量的方面都比去年有了改进，否认这一点是完全不对的。今年党没有采取非常措施也能够应付过去了，如果把乌克兰的严重歉收、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带的部分歉收、西北区的大部分歉收这样一些不利情况估计进去，党还算保持了就全苏联来说一般不坏的粮食收购速度，否认这一点同样是不对的。大概用不着怀疑：如果没有这种歉收现象，我们也就不必在某种程度上缩减粮食供应额了。

这些事实布哈林同志也是应该知道的。

既然布哈林同志不顾这一切事实，仍然认为必须指责中央的工作，反对中央在农民问题方面的政策，不公正地断定说，中央决定的是一回事，实行的又是一回事，这就说明布哈林同志不赞成党的路线，他正在酝酿另外一条与党的路线不

同的路线。

但在党内不能有两条路线。或者是党的路线不正确,那么布哈林同志同中央划清界限是对的;或者是党的路线正确,那么布哈林同志在农民问题上的“新”路线就不过是在模仿弗鲁姆金同志的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路线。永远徘徊于“发财吧”的口号和“向富农进攻”的口号之间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布哈林同志已经滚到弗鲁姆金同志的立场上去了。

(三)布哈林同志声明,我国的外汇状况已经无可挽救,他说他曾经“预言过”这一切,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话等等。这个声明是完全不正确的。布哈林同志的这个声明不过是吹牛。其实,关于外汇的困难情况,谈得最多和最早的是鲁祖塔克同志。看来布哈林同志不了解,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很多东西要取决于英法两国(在德国的协助下)所实行的暗中的财政封锁,这个封锁在最近才开始有一点放松。布哈林同志不了解,议论和念咒是无济于事的;要积累外汇储备,就必须采取各种严格措施来缩减次要品的进口,加强木材、石油等的出口,减少外汇支出等等,党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而党在实行这些措施时并没有得到布哈林同志的任何协助。布哈林同志不能不知道,这些措施已经收到成效,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定的外汇储备了。

如果布哈林同志不顾这一点,还继续叫喊我国外汇状况无可挽救,那么这只能说明他是张皇失措,他实际上是要求减少设备进口,因而也就是要求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

(四)布哈林同志声明,我们没有党内民主,党在“官僚主义化”,“我们在培植官僚主义”,党内没有选举产生的书记,我们似乎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内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目前党内制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等等。这个声明是完全错误的,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不能不指出,布哈林同志现在已滚到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的臭名远扬的信中所采取的那种立场上去了。只要把托洛茨基在这封信里所说的“党内制度”、“书记的官僚主义”、“党机关的官僚化由于采用书记挑选的方法而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这些话同布哈林同志的声明对照一下,就会明白布哈林同志已经堕落到极点了。只有对党内铁的纪律不满的人,只有对党内大多数人不赞成自己张皇失措的“纲领”和“提纲”这一情况不满的人,只有对目前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成员不满的人,才会责备我们运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党犯了官僚主义,责备它是在官僚主义化。列宁曾正确地把这些同志称做迷恋于“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的人。关于这些人,列宁曾正确地说过:“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对中央机关人员

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丑恶行为。”(《进一步,退两步》)

布哈林同志认为,既然党提拔他去担任《真理报》责任编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提拔托姆斯基同志去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那就是说,党把《真理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交给他们全权管理,并放弃了中央机关对他们的日常工作进行任何检查的权利。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统一而集中的党,而只有由各个封建王国,例如《真理报》王国、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王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王国、交通人民委员部王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王国等等堆积起来的不定型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统一的党的瓦解和“党的封建主义”的胜利。因此,布哈林同志关于政治委员的叫嚣只不过暴露了他的组织立场本身的破产罢了。

其实,布哈林同志攻击“党内制度”也就是滚到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最初发展阶段所采取的“思想派别自由”的立场上去了。

(五)布哈林同志硬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是他应当负责的政策)错了,因为它以叫嚣来代替说服,硬说这个政策使共产国际各支部瓦解、涣散、分裂等等,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想以此说明他反对把机会主义者塔尔盖默和布兰德勒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但是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因为他知道,庇护塔尔盖默和布兰德勒,反对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者。他想以此说明他反对从德国召回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哈特。但是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因为他知道,庇护埃韦特和格哈特,反对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承认自己动摇。其实,在共产国际内正在进行着清洗德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败类和机会主义分子这种有益的工作。看来布哈林不懂得,不清洗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共产国际各支部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布尔什维克化。布哈林同志不懂得,目前时期,欧洲的阶级斗争正在尖锐化,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成熟,这就要求共产国际把最坚定、最刚强、没有沾染机会主义动摇性和可耻的惊慌心理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到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去,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教育工人阶级去迎接未来同国际资本的战斗,才能引导工人阶级去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实际上,布哈林同志已滚到靠耍手腕来维护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的立场上去了。

布哈林同志声明他承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只不过是为人眼目所必需的一块遮羞布,因为他只是在不得罪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盖默之流、埃韦特之流和格哈特之流、洪别尔-德罗之流

和谢拉之流的情况下承认这个决议。但是不得罪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而且首先是他们妨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共产国际各个支部中孤立右倾分子并战胜调和分子。

(六)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声明,党内有人在“恶意攻击”他们,在造成“组织上的包围”,因此,他们不得不坚持辞职;把卡冈诺维奇同志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就形成了“两个中心”;托姆斯基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只得不服从政治局关于不准辞职的决定;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辞职似乎是摆脱现状的上策。他们这个声明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决不能责备党在“恶意攻击”和造成“组织上的包围”,因为既然布哈林同志发表了完全错误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而党员们批评了这篇文章,认为它是影射攻击中央;既然布哈林同志要求取消对最富裕的富农个别课税,不接受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主义分子加强了反抗的提纲,而党员们批评了布哈林同志的这类观点,认为它们出自布哈林同志富农“长人”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既然布哈林同志顽固地拒绝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工作,而党员们认为对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行为绝对不能赞同,既然托姆斯基同志顽固地拒绝服从中央关于他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决定,而党员们认为托姆斯基同志的这种行为等于捣乱……要求党员在会上不给报告人递条子,要求报告人不答复这些一再提出的质询,那倒是咄咄怪事了。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呢?决不能为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安静而迫使 150 万人的党默不作声,不对党内事件提出问题。既然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以及他们要弄清楚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真相的愿望引起了对这两个同志的行为的公正批评,那么,这只能归咎于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自己的那些使党焦虑不安的错误行为。

第二,托姆斯基同志硬说,把卡冈诺维奇同志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就形成了“两个中心”的威胁,使他不得不提出辞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和李可夫两同志一起第一次提出辞职是在十一月全会以前,是在 11 月初,当时还没有召开工会代表大会(12 月底召开),卡冈诺维奇同志还不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候选人。可见问题不在于卡冈诺维奇同志而在于其他什么方面。可见不能把卡冈诺维奇同志在 1928 年 12 月底被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这件事,当做托姆斯基同志早在 1928 年 11 月初就提出辞职的理由。其次,如果托姆斯基同志的路线,正如他硬要人相信的那样,是中央的路线,而大家知道,卡冈诺维奇同志所坚持的也正是中央的这条路线,

那么“两个中心”的威胁是从何而来呢？既然同中央是一条路线，那还用得着提出辞职吗？

第三，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坚持要辞职，认为他们有权不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样也就是顽固地违反了党纪的起码规则。如果每一个中央委员都认为自己有权不执行中央的决定，那党还成什么党，中央还成什么中央呢？这岂不是给我们的党员开了一个恶劣的、简直是极其有害的先例吗？这岂不是破坏了党的纪律，损坏了党的决定的力量和中央决定的力量吗？

最后，托洛茨基分子发表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这一事实在全世界都知道了。大概这个《笔记》很快就会在国外资产阶级报刊上登载出来。托洛茨基分子发表这个《笔记》就和白卫分子的行径一样，无疑是想在政治局内部制造分裂。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将把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辞职看做自己的胜利，因为他们有理由叫喊：“我们如愿以偿了。”应当让我们的敌人得到满足吗？收回辞职声明，转到中央方面来，在我们的敌人面前表明我们团结一致，这岂不是更好吗？

如果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不顾这一切事实和理由还要坚持辞职，那么这就说明，他们或者是想干脆逃避困难，或者是想拿辞职的办法当做一种对中央进行派别斗争的手段，当做一种向中央的路线进行示威的手段，当做一个号召，叫党内不满分子效法他们并团结在他们的周围来反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目前方针”，这样就不能不给党和共产国际的统一造成严重的威胁。

根据上述一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认为：

（一）在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布哈林同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和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所表露出来的布哈林同志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是完全不正确的，其目的是要诽谤中央在国内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路线；

（二）由于诽谤中央的路线并且为此使用一切造谣中伤的伎俩，布哈林同志显然已经转到制定一条与党的路线不同的“新”路线方面去，而这条路线在国内政策方面不过是模仿弗鲁姆金同志的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路线，而在共产国际政策方面不过是重复洪别尔-德罗同志的靠耍手腕来维护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分子的路线；

（三）由于党正面临着困难，由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布哈林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现政治上不坚定，党如果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争取布哈林同志，那么布哈林同志最近就会更加动摇而转到制定“新”路线方面去。列宁在1916年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信中曾经正确地谈到布哈林同志，他说：“尼古·伊万·是一

个还在勤奋学习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向是支持他的。但是他(1)轻信流言蜚语,(2)在政治上极不坚定”;

(四)如果党批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辞职,那么布哈林同志的动摇就会又一次得到鼓励。

根据这一点,并为了绝对维护党的统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

(1)认为布哈林同志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

(2)责成布哈林同志在国内政策方面坚决同弗鲁姆金同志的路线划清界限,在共产国际政策方面坚决同洪别尔-德罗同志的路线划清界限;

(3)不同意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辞职;

(4)建议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忠诚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党和党中央的一切决议。

### 三、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呼吁

第一次同布哈林同志发生意见分歧是在1928年快要举行中央七月全会之前。当时的意见分歧是发生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关于同农民分裂的问题(布哈林同志硬说我们已经同农民分裂)、关于贸易自由的范围问题(布哈林同志主张贸易完全自由,不受国家机关的调节)以及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问题(布哈林同志低估集体农庄运动的意义)。在取消非常措施的问题上并没有意见分歧。但是这些意见分歧都在讨论中解决了,都由于通过了关于粮食收购的统一决议而被掩盖起来了。统一决议的通过使当时有可能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代表会议发表关于政治局内部没有意见分歧的宣言。因此,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没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已经解决了的分歧。当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并不知道布哈林同志在七月全会期间同加米涅夫同志进行的幕后会谈。

第二次同布哈林同志发生意见分歧是在快要举行十一月全会之前,即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向政治局提出辞职声明的时候。当时的意见分歧主要是发生在以下的三个问题上:对农业状况的估计问题(农业在退步还是在发展)、对最富裕的富农保持个别课税的问题以及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但是,由于通过了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统一决议,由于他们三人收回辞职声明,这些意见分歧也就被掩盖起来了。这样就使得有可



能责成政治局全体委员在全会上和全会外的发言中宣称政治局内部没有意见分歧,李可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没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已经解决了的意见分歧。当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并不知道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仍旧保留着自己的意见,而且其中两人正准备重新提出辞职。

托洛茨基分子发表加米涅夫同志关于布哈林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组织派别联盟的秘密活动的《笔记》使得情况根本改变了。现在大家都清楚,布哈林同志及其追随者并没有放弃他们同党中央在1928年七月全会之前就已暴露出来的意见分歧。现在大家都清楚,这些意见分歧直到目前还继续存在。这一点现在不仅可以用布哈林同志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来证明,而且可以用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辞职手段以及1929年1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和声明来证明。

因此,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方面现有的一切材料,其中包括1929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发言速记记录,提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处理。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请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准本决议。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深信,联席全会一定能够保证在目前的困难条件下我们所特别必需的党的队伍的钢铁般的统一。

## 4

##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主席团收到的信件和声明

### 1.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

由于托姆斯基的发言,我认为必须声明如下:

图拉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卡尔塔舍夫同志去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于12月25—26日结束,卡尔塔舍夫同志开会回来之后,没有就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的情况做过任何传达,与此同时却分别找省工会理事会的委员,对于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讨论问题的情况做了对他有利的讲述,说中央把卡冈诺维奇同志安排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是一个错误。而且卡尔塔舍夫直到他离开图拉时依然保留这个意见,在会上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加深了错误。由于卡尔塔舍夫同志在省工会理事会的正式会议上没有做过任何传达,1月5日省工会理事会的三名委员向省工会理事会党团支部提出,要求就第八次代表大会做报告。1月5日,卡尔塔舍夫在党团支部会上做了报告,经过讨论,支委会多数委员表示在政治上不信任卡尔塔舍夫,决定召开省工会理事会全会的党团会议。我来到党团会议时,会议经过热烈的辩论,在结束时向我提出了托姆斯基谈到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对卡尔塔舍夫政治上不信任的提案,并决定解除他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此后,省委批准了党团的决议。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托姆斯基同志在发言中对我在图拉省工会理事会党团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做了完全不正确的叙述。我的讲话是为了回答一位同志的问题:为什么卡尔塔舍夫被撤了职,而托姆斯基却没有被

撤职。而且托姆斯基同志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是这样说的：“在图拉撤掉工会理事会主席卡尔塔舍夫时，有一位同志指出，撤卡尔塔舍夫这个二流角色，而不撤托姆斯基是不对的。可是省委书记却解释说，在同托洛茨基干仗时，领导机关里容忍了他五年，而地方上的小托洛茨基分子却早就被赶出去了。”

由于我的这段讲话被托姆斯基完全歪曲了，而且被引用了两次，因此我认为必须把我在1929年1月11日图拉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党团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这一段完整地记下来：“现在我就梅德韦杰夫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讲几点意见。他说，他不清楚，为什么违反了决议的托姆斯基同志没有挨打，卡尔塔舍夫却挨了打。托姆斯基的问题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它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资本主义各国中我们的敌人都非常敏感地注视着我国发生的任何摩擦，注视着 we 承受的种种困难。所以很清楚，中央没有别的办法。可是我要问问你们，如果我们现在通过大家提出的决议，就是说卡尔塔舍夫同志不能再当图拉省工会运动的领导人，难道党因此而会受到什么损失吗？没有任何损失，而只会有好处，因为我们可以安排其他人来当领导，他们会完完全全地执行党的路线，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会动摇，更不会反对党中央。这就是梅德韦杰夫同志不明白的差别。”

无论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都没有说过托姆斯基同志讲的那些话。因为我的讲话被托姆斯基同志歪曲了，而且这种歪曲还在顽固地重复着，所以我请求将我的这个声明附在中央联席全会的速记记录后面。

M. 布拉特

## 2. 声 明

科托夫同志在发言中谈到同我的私人谈话，而且完全是按他的意愿叙述的。

科托夫同志说：“对右倾危险的本质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消息报》是一种说法，而《真理报》持另一种看法。我认为，机关报的领导也不清楚。我曾经向克鲁敏同志，他是受人尊敬的机关报《真理报》的领导人，直率地提出了问题，我在政治局会议上问他：你怎么理解，国内没有右倾危险，可是在党内有。他没有解释这个问题的实质，而只是对我声称：你知道吗，这篇文章是根据某位书记的命令写的。”

这样叙述我们的谈话是不正确的。的确,就这个题目我们谈过,大约在六个月以前。科托夫同志对《真理报》的一篇社论感到困惑,我回答说,社论中解释党内和国内右倾危险的那一节是针对《消息报》的错误表述而讲的,《消息报》说,苏维埃的改选活动应当在反右倾危险的口号下进行。对科托夫同志进一步的怀疑,我解释说,国内有阶级斗争,有反革命的、反苏维埃的活动等等,把它们叫做右倾危险是不对的。科托夫同志继续表示不理解,于是我对他宣称,由于问题重要,我必须同一位中央书记商量这些说法。

这次私下谈话就是这样。科托夫同志歪曲了这次谈话,无疑是想对《真理报》编辑部和中央书记处进行恶意攻击。科托夫同志的这种攻击只能表明他自身的无能为力。科托夫同志的企图再一次揭示了同一个科托夫同志抱怨别人“败坏他名声”等等的真实价值。

Г. 克鲁敏

1929年9月19日

### 3. 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

李可夫同志在发言中评价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的品质时,把我同列宁对立起来,这对于我实在是莫大的荣幸。

这种荣幸我实在担当不起。我在4月14日《真理报》发表的文章里确实给“理论家”一词加了引号。可是李可夫同志说这个引号是用于布哈林同志的,这真是从何说起。我把这段文字准确地写下来:“必须尽快地把我国农村(也不仅是农村)党支部中的资产阶级仆从清除出去,因为最近几个月来他们按照右倾思想家和‘理论家’自上而下的右倾口号和反党的右倾批评而活跃起来,勾结起来。”我给“理论家”加了引号,指的是弗鲁姆金同志,指的是戈尔登贝尔格之流、阿斯特罗夫之流、斯列普科夫之流、马列茨基之流等等,他们在正式材料中,在无数的书面和口头言论中都证明存在着“蜕化”,教训全党说富农是中农等等,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子,不过给这样的理论家不能不加上引号。

虽然布哈林同志现在同党有分歧,但我对他一直是很尊敬的,从来也不曾想过要把他的博学多识和理论才干放在什么引号中。

李可夫同志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攻击,显示出他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老爷态度来对待那些按照党员的责任和权利,批评李可夫同志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大

人物的错误观点的年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李可夫同志在总结发言中对那些在地方工作、“不太显赫的”中央委员们表现了更生硬、更令人气愤的老爷态度。他当时居然说,批评他的地方同志过于热心了,没有想到政治局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批评他李可夫还嫌早了点儿。

把在地方工作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看成是“办事的秘书”,也就是小官吏,高傲地欺凌他们,说明李可夫同志对党及其地方组织不够尊重,说明他对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每一个党员拥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的认识是很“独特的”,也是错误的。

候补中央委员 哈塔耶维奇

#### 4.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

科托夫同志在全会的发言中曲解了我对反对派就驱逐托洛茨基出境一事的便函的回答……

全会可能形成这样的印象,以为我“认为驱逐托洛茨基的想法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而我的回答却是这样的:

“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反对派的先生们努力使我们相信,托洛茨基已经被驱逐出境了,已经在国外了。这是说谎。他在苏联。”(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由于布哈林同志在全会上力图从理论上证明,政治局的多数似乎在“滑向托洛茨基主义”,所以科托夫同志想用党内生活的相应“事实”来支持这种“理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大家看到,两个人,说得客气一点,都没有得逞。

又及,请将这张说明附在全会的速记记录中。

联共(布)哈莫夫尼克区委书记

A. 芬科夫斯基

1929年4月20日

#### 5. 声 明

莫罗兹同志在发言中称我是第一个说我党在执行“贡赋政策”的人。我认

为这话是绝对不正确的。我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同斯大林同志就这个问题交谈时,说了下面的话:“我认为‘贡赋’这个词是不对的,而你的想法本身是完全正确的。”我想,斯大林同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后来这个想法我还对莫斯科常委的几个委员谈过。甚至在我们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常委会上发生“争吵”时,我关于贡赋谈的还是这个想法。当时任常委委员(现在是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的科兹洛夫同志可以证明这点。我至今认为“贡赋”一词是用词不当。但是说用词不当,同指责党执行“贡赋政策”,“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是完全不同的。对党的这种指责我认为是反党的。至于我自己的错误,我在莫斯科市委十月全会上就已经承认了。

请将本声明附在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里面。

M. 留京

1929年4月19日

## 6. 声 明

布哈林同志在发言中指出,伊尔库茨克的《劳动政权报》有一篇文章,建议对整个村子实行抵制,作为粮食采购的方法。李可夫同志在发言中也引用了这篇文章。

布哈林同志称这篇文章是“指示性的和指令性的”,得出结论说是整个组织的路线错误。我们必须声明,西伯利亚党组织在粮食采购中遵循的是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常委的下述决定(1929年2月):

“建议各州委不准宣布对整个村子实行抵制,也不得由苏维埃行政机关采用这种办法。”这个指示的确是指示性的和指令性的。

C. 瑟尔佐夫

## 7. 声 明

库利科夫同志声明说他在13人秘密会议上不曾对斯大林同志进行过任何恶意攻击,我对党负责,认为应当向联共(布)中央全会声明如下:

1928年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之前,我得知联共(布)区委副书记处在开

会,就去了(没有受到邀请),见到了大致是这样的情景。库利科夫对参加会议的人说:“跟他没法在一起工作,他篡夺了一切,粗暴,不忠诚……”他接着说:“不告诉政治局就擅自回答了弗鲁姆金的信,为此给了他警告,不过没有记录在案。”他还说,“中央领导的情况是:一边是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和乌格拉诺夫,另一边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等人。”应该说明,我见到的只是“通报”的最后部分,从我讲的这段话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对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恶意攻击。我向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同志汇报了,他回答说,要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

我知道,伏罗希洛夫同志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泽姆利亚奇卡同志和联共(布)中央的尤尔金同志报告了这件事。在区委和区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上,恶意攻击得到了与会者的证明和确认,而库利科夫也被开除出了区委并被撤销了书记职务。我认为必须,也有责任报告这件事,因为决不能容许库利科夫用对党的路线及其原则方针的忠诚(他在今年4月19日对联共(布)中央全会是这样说的)来掩盖他的恶意攻击。而从他的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早已背离了党的路线。他作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却反而不断加深错误。

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 古别尔曼

1929年4月19日

古别尔曼同志在本声明中叙述的恶意攻击的事实确实存在,我同意这个声明。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尤尔金

## 8.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

请将我下述声明附在记录中。

罗济特同志发言中声称,在莫斯科省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把布哈林同志和伯恩斯坦做了对比。罗济特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在代表会议上谈到修正主义的各种形式时,曾经指出,对某种政治学说的修正可以有两种办法:公开地和直截了当地,就像伯恩斯坦对马克思那样,或者

是间接地。

关于布哈林同志我只是证明了,他在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中,用引证列宁著作的办法掩盖了对农民问题的列宁学说的修正。

这个观点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Г. 斯特列佐夫*

1929年4月19日

## 9. 致联共(布)中央全会主席团

请将我的声明(随函附上)载入全会速记记录或在会上宣读。我认为有此必要,因为布哈林同志涉及我的断言(见加米涅夫同志的日记)在党内已广为流传。

致共产主义敬礼。

*E. 瓦尔加*

莫斯科,1929年4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第二十六次会议记录附件

瓦尔加同志对1929年3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听取的联共(布)党内情况报告的声明。

断言我似乎倾向于认为“工业化会导致饥饿”,或者持有这样的意见,是不符合实际的。

无论是在我的提纲的初稿中,还是在政治局批准的提纲定稿中,或是我的报告中,我都没有说过这种错误的意见。

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即从我受托做报告时起,直到我做报告为止,我不曾同布哈林同志就这个问题谈过一次话,因此他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

## 10. 致联共(布)中央全会

洛米纳泽同志就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报告发言时说,即使在无产阶级的组织里,也有违反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的事情,作为例证,他谈到巴库党组织巴



伊洛沃区有两名工作人员被撤职。洛米纳泽同志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这两个人被撤职的原因,向全会完全错误地报告了这件事,认为它破坏了党内民主。为了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我们认为必须做如下说明:

1) 去年12月巴库党组织的巴伊洛沃区有两名工作人员(阿尔塔克和沙图诺夫斯卡娅)因为闹无原则纠纷被撤了职,其中一人(区委书记)是区委全会决议,又由该区所有支部一致批准的。

2) 后来这个案件由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在巴库当地做了详细调查。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在巴库党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就此做了结论,并发表在《真理报》上。我们认为,《真理报》发表的什基里亚托夫同志的讲话足以回答洛米纳泽同志对巴库组织的无端攻击。

3) 最后,这个问题在巴库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上,在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出席的情况下经过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千多名工人—布尔什维克代表。代表会议全票,有三票反对,认为两名巴伊洛沃工作人员的行为是“无原则纠纷”,对他们进行了谴责。巴库党代表会议决议的这一部分曾经刊登在《真理报》上。

我们不明白,洛米纳泽同志为什么还要在全会上做这样的断言。巴库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的一致决议坚决驳斥了洛米纳泽同志关于巴库组织的一个区里违反了党内民主和压制自我批评的指责。我们认为必须让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的参加者知道,洛米纳泽同志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也是绝对错误的。

Л. 米尔佐扬、普列沙科夫、卡拉耶夫、  
帕鲁申、穆萨别科夫、尼基京、鲁缅采夫

## 11.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

我曾经给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呈送过一份文件,其中指出地方上在粮食采购活动中一些歪曲政策和过火行为,李可夫同志引用了这份文件,以便证明在今年的粮食采购活动中采用了非常措施的观点。因此造成了这样的印象:1)到处都采取了非常措施,2)我似乎正式肯定了采用过这些措施。我认为必须向联席全会报告如下:

1) 地方政权机关在粮食采购活动中有过火行为和曲解政策的现象是我用书面形式向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斯米尔诺夫同志报告的。这是在按照

苏联的通常程序举行的一次例行接见时我做了口头报告后,按他本人的吩咐做的。

2) 报告中列举的过火行为不仅涉及粮食采购活动,也涉及播种活动,例如,梁赞市执行委员会没收了集体农庄的 18 台拖拉机来组建拖拉机队,这已经说明呈送的材料具有偶然性。我在报告中就个别事实指出,它们只是根据申诉人的申诉,还须要核实,因此已下令调查。同一个报告中还指出,有人建议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允许提前执行法院判决,被我拒绝了,所以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普遍采取了这些措施,也不能说这些措施特别严厉。最后,这份报告请求就此做出普遍性的指示,因为类似的申诉各地都有。所以我的报告本身,以及其中援引的事实排除了普遍采用非常措施的结论,也说明这些材料并不是绝对可信。

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今年革命的法制和对中农阶层施加压力的情况比去年更糟。我向联席全会报告这些情况,并请求将这份声明附在会议的速记记录中。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H. 克雷连柯

1929年5月23日

## 12.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由于我们美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布哈林同志的立场问题通过的决议在我们兄弟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次全会上引起了争论,也由于但格尔同志就此发表的声明须要做一些解释,我认为必须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事情通报如下:

1) 我党中央一再声明并在决议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我党中央无条件地支持联共(布)中央的路线。我们中央委员会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扩大苏联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才是迅速增强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反对国内和国际的资本主义敌人的唯一手段。我们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观点在我们政治局 1928 年 11 月 14 日的决议中,在我们的机关报《工人日报》12 月 3 日的宣言中,在政治局 1929 年 2 月 7 日的决议中和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莫斯科党代表会议问题的决议中都有表述。

2) 虽然中央再三地一致通过决议,但我们党内的反对派却在全党范围内一再展开活动,这项活动由工会宣传联盟全美总局(главное обще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бюро лиги профсоюз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领导,指责我党中央似乎支持了布哈林同志反对联共(布)中央的政策,似乎只有我党的反对派才是美国“斯大林真正的支持者”。

3)在我们的党代会上,白劳德同志代表反对派发言,提出了同样的指责并声称,它(反对派)“不容许这次党代会仅仅就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宣言就了事,而是要迫使党代会就谴责布哈林同志的问题进行公开表决,还他一个真面目”。我们不可能不懂得这个声明的含义,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实际上是反对派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导着它在党代会上的战略。

4)就在白劳德同志发表这个声明的当天,中央领导同志就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通宵开会。会上但格尔同志坦率地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我们是布哈林的支持者,这个事实影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美国问题的判断。我们被告知,我们虽然一再发表了政治宣言,批驳了这种观点,但还不足以使我们摆脱嫌疑。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声明必须更加具体,而且不应当指名道姓。

5)与此同时,反对派在代表大会上准备了一个声明,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要求发表这个声明。这份声明是我党在涉及联共党内争论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名字。声明是这样说的:

“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在现在,当德国共产党内和联共(布)党内以布兰德勒、弗鲁姆金等人为代表的右翼分子的毫不掩饰的机会主义观点遭到拒绝,而以布哈林对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解释、以他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和他在莫斯科纪念列宁的大会上做的以《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演讲为根据的调和分子(埃韦特、洪别尔-德罗等人)的观点受到激烈反对的时候,对共产国际的忠诚要求无条件地支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党——联共(布)及其由斯大林同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路线。”

6)在登格尔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温斯顿同志(他不经登格尔批准就不会采取任何步骤)提出了一份声明,其中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代表大会支持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由于布哈林同志最近几个月来离开了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他的立场,由于他在反对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和调和分子集团的斗争中持摇摆的方针,由于他的立场有碍于开展反对右派和调和分子集团的坚决斗争,所以我们建议共产国际就布哈林同志领导共产国际的问题做出最后的决定。”

7)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最后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了供代表大会审议的关于布哈林同志今后在共产国际工作问题的决议草案。登格尔同

志和波利特同志两人都出席了主席团的这次会议和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这项决议的那次会议。他们绝对不曾表示过反对这项决议或者就这项决议提出过疑问。在反对派的声明和温斯顿同志的声明提交给代表大会时,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或任何问题。

我提供这些事实是为了让主席团了解情况。

致共产主义敬礼!

**本杰明·吉特洛**

**联共(布)中央情报部<sup>399</sup>注**

由于本·吉特洛的声明,中央情报部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引用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美国共产党的最后一封信中谈到美共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决议的那一部分。

“无论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还是少数,都在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状况问题进行不能容忍的、无原则的投机活动。如果说少数派想借它似乎是美共中支持联共(布)反对右倾立场的唯一集团进行投机,则多数派玩弄腐朽的外交手腕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了无原则的拉拉扯扯的地步。这表现在代表大会完全没有向代表们介绍联共(布)党内的情况,就根据洛夫斯顿和吉特洛的建议而通过了决议,径直提议在反右倾斗争中采取组织措施,后来以吉特洛为代表的多数派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发表了一项声明,实际上否认了这项决议而支持右翼分子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的诽谤性攻击。”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98—421号案卷。)

## 补充材料\*

### 1

## 托洛茨基分子于1929年1月公布并在各工厂 散发的加米涅夫同志1928年7月11日和 12日的笔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党被蒙着眼睛引向新的灾难

反右倾运动建立在欺骗、隐瞒和诡辩基础之上。党这一次也被人蒙着眼睛牵着走,却未被告知要去往何方。斯大林10月19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中说:

“而在政治局内又是怎样呢?在政治局内有没有什么倾向呢?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又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这是必须在这里十分肯定地说明的。对党不怀好意的分子和各种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

不管他说得多么肯定,这一说法都是彻头彻尾虚假的、欺骗性的。如果党员群众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任何一位多少了解点情况的党务工作者都知道,反右倾

---

\* 补充材料1—5的油印复制件作为1929年1月30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文件分发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全体委员及候补委员。

运动的发起和实施就是为针对三名政治局委员,即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运动做准备。运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吓唬这三个人可能的支持者,从而便于斯大林对这三个人进行组织迫害。这一运动的全部奥妙就是要蒙蔽党,把党带到一个新的障碍前,在它已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命令它“跳过去”。至于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决与右派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以及半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为敌,是用不着证明的。但是我们希望由党自己来惩治机会主义的右翼。为此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开蒙眼布,要告诉全党,党的机构在幕后干些什么,在秘密地策划什么。

斯大林集团和上述三个人正处在于激烈的战争状态。

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

“我们和斯大林的分歧要比以前和你们的所有分歧严重很多倍。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对形势的一致看法是‘如果政治局里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取代斯大林要好得多’”。

通过索柯里尼柯夫的穿针引线,布哈林与加米涅夫就结成联盟、撤换斯大林进行了谈判,而且作为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领袖的布哈林是秘密前往会见党员加米涅夫的,布哈林抱怨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一直在跟踪他。瞧瞧斯大林领导下的政治局干的事有多过火。党对此却一无所知。斯大林一直在麻痹党,声称政治局内没有分歧。在十四大前夕斯大林就是这样欺骗党的,他一再声称“列宁主义的”中央同心同德。斯大林说有关分歧的传闻是反对派杜撰出来的。十四大前夕他也是这么说的。那么就让党根据我们在这里提供的文件来评判吧。

这些文件包括:1)加米涅夫7月11日与索柯里尼柯夫谈话记录;2)加米涅夫7月11日与布哈林谈话记录;3)加米涅夫7月12日由莫斯科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函。从文字上看,加米涅夫是在与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谈话之后立即做的记录,以便最准确地向季诺维也夫通报会谈情况。只要看过这些文件的人都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性。

由这些文件得出的结论十分清楚:被蒙住双眼的党正在被领向新的灾难。只有党自己能够拯救自己。为此,党必须撕掉蒙眼布。公正筹备的十六大必须解决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党在代表大会之前必须进行老老实实的争论,而不是目前装模作样的“自我批评”。党必须对三条相互斗争的路线,即列宁主义路线、中派路线和右派路线进行自由讨论。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应该释放出狱,解除流放,返回党内。必须停止对

无产阶级派别的卑鄙诽谤。

党能够而且必须清除官僚主义渣滓,在列宁主义路线基础上恢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统一。

##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

### 文件

1. 7月11日,星期三,上午9点。与索柯里尼柯夫谈话。概述:1)事情已经无法收拾,布哈林和斯大林彻底决裂了。撤职的问题提得很具体: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背叛了。鉴于他的让步,目前他们的态度较为缓和。2)布哈林两次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真想把斯大林换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的处境很悲惨:他最怕的就是你们会说:斯大林的路线是正确的。3)不存在四人帮和五人帮——他发誓。4)全会上斯大林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的两股潮流,真正的潮流是恢复价格。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要发展工业,“需要农民交纳贡赋”。米高扬也说:“剪刀差还将长期保持,不能取消剪刀差”(说是托洛茨基也想取消剪刀差)。索柯里尼柯夫在推销托洛茨基主义。莫洛托夫:“中农强大起来了,所以产生了冲突”。5)布哈林回答:贡赋理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规律”理论毫无二致。托姆斯基回答:“如果莫洛托夫说的对,那么前景会如何”,“你们想要没有耐普曼、富农和租让业主的新经济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李可夫打败了卡冈诺维奇。结论:斯大林路线将被压倒。布哈林处境艰难:别赞美斯大林。将和你们共同起草一个积极的纲领。布哈林自己想谈一谈。为撤换斯大林而结盟。你们对他来说是X,Y?斯大林放风说你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2. 逐字强调的话。“我来后过了一小时(7月11日上午10点),布哈林到我这儿来了,没有预先约好,也没打过电话。索柯里尼柯夫后来走了。看起来很激动,极其痛苦。很激动地讲了下面的话。不停地说了一小时。尽可能准确地记录如下:1)关于任命(4—5)没有进行任何表决。根本就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2)季诺维也夫文章的注释是斯大林口授的,针对我的,作为与莫洛托夫的妥协,后者曾坚决反对发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现在谈问题的实质:

1)中央和党内事态的发展已经无法挽回了,你们(可能还有托洛茨基分子)必将被卷进去,并将对问题的解决起重要作用。

2)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不知道,可能不会太快,因为双方还不敢向你们呼

吁。但无论如何几个月内必然会发生。

3)所以,我想让你们了解情况。我知道(或者料想),斯大林分子也会来找你们。当然,你们作为政治家,会利用这一局面“抬高身价”,但我不担心这个。政治路线决定一切,所以我想让你们了解斗争的焦点是什么。

4)加米涅夫:“斗争是否很激烈?”布哈林:“这正是我想说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会危害整个革命。按他的路线走我们可能会完蛋。我们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要比我们和你们早先的分歧严重很多倍。

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致认为:“如果现在政治局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不是斯大林,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一点我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已经坦率地谈过;我和斯大林已经几个星期都没谈过话了。这个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置于维护自己权力的需要之下。他为了当时要除掉某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理论。在“七人小组”里我们经常和他争吵,直至互骂“你撒谎!”、“你骗人!”等诸如此类的话。他现在让步,是为了整我们。我们清楚这一点,但他要手段,把我们说成是分裂分子。决议被一致通过,因为他收回了,莫洛托夫说百分之九十接受我在“七人小组”里宣读的声明,这份声明我一直拿在手里(一张纸都不能交到他手中)。

他现在的任务是从我们手中夺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真理报》和撤掉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的乌格拉诺夫。他的路线是这样的(在全会上讲的):1)资本主义的发展或靠殖民地,或靠借债,或靠剥削工人。我们没有殖民地,也没人借债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基础是:向农民要贡赋(你知道,这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2)社会主义越发展,抵抗就会越大(参看决议中的句子)。这是白痴般的无知。3)既然需要农民贡赋,抵抗会增强,那么就需要强硬的领导。自我批评不应涉及领导,而是床垫\*。自我批评实际上是指向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这是警察作风。现在的事情不是玩“布谷鸟”游戏,而是真正决定革命的命运。按这个理论走可能会毁掉一切。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外实行右倾政策:他把共产国际赶出了克里姆林宫。对沙赫特案件他建议一个也不杀(我们投了反对票),在所有的谈判中他都让步。托姆斯基这样说:在国际问题上我(托姆斯基)比你(布哈林)要右倾30公里,但我(托姆斯基)要比斯大林左100公里。路线是致命的,但他连讨论的机会也不给。抓住机会就给人扣各种倾向的帽子。他发言中提到只有“地主”才会这样议论问题的那句话,完全是原文引用乌格拉诺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夫的话。他要干掉我们。

5)我：“你们的力量怎么样？”

布哈林：我、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彼得堡人完全都站在我们一边，但是当谈到可能撤换斯大林时他们都被吓住了，所以科马罗夫宣布不同意斯捷茨基的发言，但晚上乌加洛夫到我这儿来替科马罗夫道歉，安德烈耶夫赞同我们。要把他从乌拉尔（北高加索？——编者\*）撤掉。把卡冈诺维奇从乌克兰撤走后，乌克兰人现在都被斯大林收买了。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是1)中间派中央委员还不了解分歧有多深；2)十分害怕分裂，所以对斯大林的非常措施让步，妨碍了我们对他的进攻。我们不想搞分裂，因为那样我们会被除掉。但是托姆斯基在全会的最后发言中清楚地表明，搞分裂的是斯大林。亚戈达和特里利谢尔站在我们一边。150起各种规模暴动。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在最后时刻背叛了。我想，斯大林用某种特别的链子套住了他们。我们的任务是逐渐阐明斯大林的毁灭性作用，引导中间派中央委员去撤换他。组织局是我们的。

6)我：“但现在是他要撤掉你们。”他：“该怎么办呢。”撤职的事目前在中央是通不过的。夜里我时常会想：“我们有权保持沉默吗？这是不是勇气不够啊？”但理智告诉我，应该谨慎行事。周五李可夫做报告。那时我们再下结论。我将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些文章，可能还要再敲打一下，才能让党明白，他要把党引向何方。

7)这些附件中有大量揭露“七人小组”的东西。调子是对斯大林绝对的仇恨和彻底的决裂。与此同时还有些举棋不定，是公开出头还是不出头。出头的话，他就用搞分裂的罪名整你。不出头，他就要小手腕整你，而且一旦10月份还没有粮食，他就会推卸责任，归咎于你。

我：“他们希望靠什么搞到粮食？”

他：“问题就在于再度出现困难时，再次采取非常措施。那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和砍头。”

我：“你们会怎么办？”

他：可能会采取更深入的策略和中农搞好关系。富农可以爱怎么整就怎么整，但应该和中农搞好关系。只要斯大林和那个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并被我们称之为“石头屁股”的笨蛋莫洛托夫还在，就什么办法也没有。

8)我：“你指望我们做什么？”

\* 指印发传单（文件的注释）的编者。

他：“斯大林夸口说你们都在他在掌握之中。你们的人（具体地说就是茹克）被斯大林收买。这简直太可怕了。你们自己当然可以决定自己的路线，但我请你们不要支持斯大林，而帮助他来扼杀我们。斯大林大概会寻求与你们接触。我希望你们明白问题之所在。

9) “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人窃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盯我的梢，你这儿也有。我希望通情报，但不要通过秘书和中间人。我和你说的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你也不要对任何人讲，但要告诉自己人别攻击我们。

10) 我：“斯大林给你看过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吗？”

他：“没有，我头一次听说”。

我：“会拿我们怎么办呢？”

他：“不知道。这种事是不会跟我们说的。要不就是试着用高级职位收买你们，或者安排足够拉拢你们的位置，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再见，最近几天我要忙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事，不能再见你了。总而言之，要保密！”

“我的纲领很多地方都让斯大林给破坏了。”“他自己想在全会上宣读关于纲领的报告(!!!)；而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挡了回去。他渴望成为公认的理论家。他认为，他就缺这个了”。

此外，还谈了很多琐事和细节。他特别激动，有时嘴唇会激动得发抖。有时会造成一个知道自己必遭失败的人\*。所有人都认为这几天另一个阵营该有信号了。要静心地等待。会出现的。

3. 对布哈林谈话的补充。夜，7月12日11点\*\*

1) 总的来说，有种必遭失败的感觉。他的原话：所有我们这些“捣乱”是不是一种手淫？我经常对叶菲姆（蔡特林，布哈林的秘书）说：我们的事业是不是没有希望：1) 如果国家灭亡，我们也会灭亡，2) 如果国家摆脱困境，斯大林会及时转弯，我们也会灭亡，怎么办？当你面对的敌人是中央的那种成吉思汗作风，你该怎么办？

2)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谈有关退出武汉政府的事。

3) 斯大林对共青团员们说，预留岗位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布哈林能否停止其卑鄙的政策。

\* 原文如此。——编者注

\*\* 原文如此。正确的日期应该是“7月11日12点”。——编者注

4)如果我们发起辩论。我们会因此而挨整的!中央害怕辩论。

5)如果我们——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辞职的话,那会怎样呢?

6)我能不能躲开一段时间,——两个月不过问现行政策?等危机来临时,我再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发言。

7)我们不能发起辩论,因为辩论将直接从武装冲突开始,这是由指控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会说:这个人把国家推向饥饿和灭亡。而他则说:他们保护富农和耐普曼。

8)党国一体化就是灾难之所在。

9)除了保住权力,斯大林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对我们让步,保住了领导权,保住领导权后再收拾我们;我们没什么办法。因为中央里面撤掉斯大林的主观条件还在酝酿之中,还没有成熟。

10)索柯里尼柯夫:请你们多努力,哪怕是要求把莫洛托夫去掉也行。

11)斯大林只知道一个手段,就是报复,而且还是在背后捅刀子。我们会记得“甜蜜的报复”理论。

12)谢尔哥不是什么好汉。到我这儿来把斯大林臭骂了一通,可在关键时刻背叛了。

13)全会决议和打架的经过:(1)我要求讨论总的问题。斯大林避开了,用须要讨论工业财务计划等等来搪塞。(2)我给斯大林写信要求进行一般性讨论。他对我说:“布哈什卡,你连大象都可以搞得心烦意乱”,但他没有同意进行讨论。(3)我写了第二封信,他把我叫去了。他说:“我和你就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都不值一提。(4)我们一起去“七人小组”。场面十分粗暴。他开始对我大喊大叫;我讲了他说的关于喜马拉雅山的话。他喊道:“你撒谎!这是你杜撰出来的,想唆使政治局委员们迫害我。”我们分道扬镳了。(5)我宣读了一份20页的声明,没有交出手稿。莫洛托夫说这份声明反列宁主义、反党。斯大林说:“我可以接受十分之九”。莫洛托夫走了。声明基本上被通过,我离开去写决议。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带来一份从我的声明中剽窃而来的另一个决议;我做了三处修改,李可夫改了一处。一致通过。斯大林是这样说的:我用非常手段提供了粮食,我转变及时,自己起草了决议。如果须采取措施,我一个人就能做到。其实他是在把党引向毁灭。

14)瓦尔加宣读报告,因为斯大林不想让李可夫宣读,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报告。瓦尔加还发挥说既然是工业化,饥饿就在所难免。

15)斯大林违反了政治局(“七人小组”)决议。本来决定要把弗鲁姆金的信

分发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并起草答复。斯大林迫不及待,自己写了回信而且发出去了。我们通过决议,谴责违反决定的行为。“回信被认为是正确的,但不充分。”“我不会再勉为其难了”。

16) 发生这样的情况后,我(布哈林)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认为,政治局是附属于总书记的咨询机构。”

17) 斯大林的政策会导致内战。他只好用鲜血来淹没暴动。

7月12日,上午11点。索柯里尼柯夫说:集体农庄的辩论中令人感兴趣的只有下面一些东西。斯大林做了非常粗暴的针对托姆斯基的发言。我十分惊奇地听了托姆斯基的发言。托姆斯基以为,我们什么后备力量也没有,只能向农村让步,——这是投降主义,对建设社会主义不相信。如果中农要求在垄断外贸方面做出让步的话,农民联盟。也要让步吗?这是投降主义。我们的后备是国营农庄和做贫民的工作。黑的,绿的,恶的,被激怒的。令人感到压抑。现在所有人都明白了,不仅布哈林在进攻,斯大林也在进攻。粗暴得令人震惊。索柯里尼柯夫这样介绍全会的动态:李可夫开了火。斯大林应战。彼得堡人犹豫是否拒绝承认斯捷茨基。当时布哈林躲在地下,但一个地雷也没有引爆。莫洛托夫蛮横起来,攻击了《真理报》(尤其是阿斯特罗夫,但总的来说是对报纸的片面性以及克里茨曼和其他人的评论)。于是托姆斯基攻击了莫洛托夫,但形式上很温和。然后斯大林对托姆斯基进行攻击,既直接又粗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2—11张。副本。)

## 2

## 加米涅夫同志 1929 年 1 月 27 日致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信

谢尔哥同志：

就你给我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我认为有必要告知中央委员会——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就通报全党——在这张传单中确实有我给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信。这封信是在下述情况下写的。

我和季诺维也夫当时住在卡卢加，已经长时间没有党和中央内部的任何消息了。我们特别关心恢复我们党籍的问题。我们在卢卡加听到一些传闻，政治局内好像提出要提前恢复我们的党籍，但有四名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却坚决反对这件事。此前有一次去莫斯科时，我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讲了这个传闻，尽管十五大前和十五大中我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之间有尖锐的政治分歧，但我们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同时，我当然很愤怒地指责布哈林同志和其他人的举动。

7 月份我再次来到莫斯科，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告诉我，布哈林坚决驳斥关于他反对提前恢复我们党籍的传闻；当时政治局内由于“非常措施”形成了新的关系，布哈林准备亲自向我证实，无论是他，还是李可夫或者托姆斯基都不反对我们重返党组织。这之后布哈林同志确实来找过我。他从驳斥传闻谈起，证明在政治局业已形成的局面中，他、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可能反对恢复我们党籍，然后他谈到自己在政治局和正在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的艰难处境，以及整个政治局的严峻局面。这些消息出乎我的预料，我觉得非常重要，有必要把这些消息通知留在卡卢加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我当时准备在莫斯科待一段时间，而且确实在那里待了几天。）

所以我给季诺维也夫写了那封信,详细叙述了我记得的布哈林的谈话,并寄往卡卢加。我这封信的复印件就出现在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里。

这封信怎么会落到托洛茨基分子的手里?我告诉自己这只能是盗窃,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我比较了各种情况,特别是托洛茨基去年10月21日从阿拉木图来信中的暗示,我断定,这次盗窃发生在几个月前,这,无论是我,还是季诺维也夫都不曾料到的。

公布这封信是一个令人愤怒的罪行,只有那些毫不尊重党的利益、处心积虑破坏党的信誉并为此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疯子和坏蛋才会这样做。

我觉得有必要做如下的补充。

十五大以来我、季诺维也夫和那些与我们一起向十五大递交声明的亲密友人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严格履行恢复我们党籍的那些条件。我们同党的路线保持完全一致并完全拥护党的一切决定。这是和布哈林谈话之前我们的立场,同样也是那次谈话后我们的立场。

顺致同志般的问候。

*Л. 加米涅夫*

1929年1月27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12—13张。副本。)

## 3

##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1929 年 1 月 28 日致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信

谢尔哥同志：

谨就所谓《加米涅夫日记》中涉及本人的部分向您做如下汇报：

1. 我无法判断，公布的文字在多大程度上与加米涅夫做的谈话记录相符。文字中讲到的谈话虽确有其事，但并不是谈话的“速记记录”，而是带有一定观点的叙述。看来，加米涅夫主要是关注那些对于评价内部关系的尖锐紧张程度特别值得重视的东西，与之相反的东西则记录较少。所以说，《日记》对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谈话总体情况的描述带有一定的分析性。

另一方面，一些句子带有明显的标注性，只是为了备忘而做的记号，其真实意义与字面意义并不相符。这里我想纠正《日记》中一个明显的错误：《日记》中把那句有关“活跃政治”和必须要求“撤掉莫洛托夫”的话归在我的名下（？）。事实上，我说的是如果存在再度采取非常措施的危险，就要提出撤换商业人民委员部领导，亦即米高扬的问题。

2. 根据我的记忆，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面的直接原因是布哈林想消除加米涅夫认为布哈林极其仇视自己和季诺维也夫的想法。（有人对加米涅夫说，政治局以五票（包括布哈林）对四票（包括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否决了关于提前（一个月）恢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党籍的提议）。布哈林坚决否认此事，并认为有必要就此（以及其他类似的传闻）向加米涅夫解释一下，以防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攻击”自己。

3. 说会面时谈过结盟是不正确的。《日记》中关于我与加米涅夫 7 月 11 日谈话的结论中有关于结盟的句子，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否定。如果换一种理

解,则整段话(最后三句)就是绝对荒谬了。要注意这里的问号,它正确传达了真实的含义。事实上,我当时讲的话大约是这样:“布哈林想自己跟你们谈一谈。是不是要谈结盟的事?不是,你们对他来说是X、Y,他不知道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担心你们现在会攻击他来积极支持斯大林。”会面时说得很清楚,不是“结盟”的建议,而是请求在一定时期内哪怕能保持“中立”也行,而不要攻击布哈林。

4. 我本人在这次会面时的路线是“不干预”政治局的内部讨论。同时我坚决主张取消非常措施,并担心会再度采取非常措施。我过一阵子才得知,对这一问题事实上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应该坦率地说,我在七月全会后从布哈林的情报中得出的结论与他本人的结论背道而驰。十一月全会后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曾对布哈林本人直截了当地说过。

顺致同志般的问候。

*Г. 索柯里尼柯夫*

*1929年1月28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14—15张。副本。)



## 4

**M. П. 托姆斯基 1929 年 1 月 14 日的声明**

敬爱的同志们：

1928 年 12 月 23 日政治局通过决议，驳回了我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职务的请求，并在 1929 年 1 月 10 日答复我的第二次辞职声明时，做出决议：“建议托姆斯基同志收回自己的辞职声明”。这使我不得不向全体中央委员提出申诉。

现在我认为，身为党员，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向全体中央委员陈述我去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并请求中央给我调动工作的理由，以及根本不可能返回这个工作岗位的原因。

目前我国的形势潜伏着巨大的困难和危险。这些困难和危险痛苦地表现在工人的经济状况上，进而反映在整个工会的工作中。在工业财务计划紧迫、物价上涨、面包和其他食品奇缺的情况下，在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工资增长极少的条件下，只有在工会和工会领导团结、坚定、有威信，另一方面同志之间相互信任、支持，党对工会有一贯而正确的领导，才能保障工人供应，从而能够顺利完成工会的各项工作。同时，党的领导应当比任何时候更少一些琐碎的监督和干扰，充分保证作为一个团结所有非党工人的、独立的、广泛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会的发展。只有这样，工会才能较为令人满意地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然而在工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些事件，特别是乌克兰代表团、共青团和个别同志采取的反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小组的一些行动，它完全不是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而是旨在损害中央理事会的威信。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遭到联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斥责，反而从他们那里得到明显的同情，以至于影响了第八届代表大会领导小组的工作。在代表大会领导小组内，

以及在个别代表团和党团内经过长期斗争之后,卡冈诺维奇同志被补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这件事本身就是针对我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小组许多成员的。整个代表大会显然都知道这件事正在进行,尽管有我和其他同志的反对。而且一些斗争的参与者还含沙射影地暗示政治路线不对,暗示某种“不和”,“缺少共识”,几乎就是“倾向”。所有这些同保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目前困难的处境中正确地开展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且可能在理事会中形成派系暗中斗争的局面,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卡冈诺维奇同志不可能不认为是被派来纠正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领导的,也就是说,是领导中的领导人。在代表大会结束前24小时突然提出这个候选人,而且不论是大会党团支委会还是党团的负责同志都异常热情地坚持这个提名,甚至对那些不愿意对这个政治局推荐的候选人投赞成票的同志进行直接的威胁,这一切至少会引起疑惑。党章规定:

“在属于党团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上,如果党委员会和党团发生重大的意见分歧,党委员会必须会同党团代表重新审议,并做出最后决定,由党团立即执行。”(联共(布)党章第2章第95条<sup>①</sup>)

党章规定的这条权利以及该权利的使用却被认为是反党的行为。甚至党和工会的一些普通干部,由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张重新审议政治局的决定,不仅遭到批判,而且被“撤销”工会的工作。如果说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成员),但是该组织党团成员,根据上述联共(布)党章第2章第95条,是否有权在代表大会党团中陈述自己的特殊意见还可以争论的话,那么非中央委员的同志拥有这样的权利就无需争论了。但在党团中他们被威胁将受到省委会的追究。中央书记处没有通知政治局就召集了许多省委书记,营造了这样一种气氛,好像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明显破坏党章和党内民主基础的行为在代表大会之后因为采取“撤销”一部分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和“攻击”另一部分同志的方针而变得更为严重。在这种条件下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自我批评,所以有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参加党团会议就没什么可奇怪了。应该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内的广大阶层,被卷入这个问题的讨论的除了代表大会党团和一些代表团之外,还有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甚至是党代表会议,所以那种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讨论卡冈诺维奇同志提名时的情况,以及大会结束后的形势恰恰证明

<sup>①</sup> 应为联共(布)党章第15章第95条。——译者注

了我对任命卡冈诺维奇同志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验证了我对工会运动领导中出现的新风气的担心:有一股对工会进行“重新清理”这种声名狼藉的官僚行政理论的气息。

在这种情况下我参加工会运动的领导工作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日常工作显然是有害的。毋庸置疑,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内部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这实质上是政治局内关系不太正常的反映——切实的工作、协调的领导将被领导方法不同的两派斗争所取代;而无论在工会组织的中央,还是在各个环节,代替工会和所有工会干部之间团结协作的将会是组织处理、选拔“自己人”、扫除“敌人”,钻营活动、阴谋诡计和抓辫子的事都会增加。所有这一切必然导致工作的失败,这是极其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特别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比别人更清楚这样工作带来的所有危害,而以我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地位我又不能不参与工作的各个阶段。

我的问题不在于卡冈诺维奇同志作为一类工作人员的个性如何,而在于我这里所说的大的客观环境。工会运动的领导如果能更纯净一些,能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更充分的信任,那么无论对整个党,还是对整个工会运动和工人阶级都会更好。但说句实话,对我本人却没有这种信任,所以卡冈诺维奇同志才会被补选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尽管该组织内已经有十多名中央委员,其中包括三名组织局委员和一名政治局委员。任何一个其他组织都不像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有这样“饱和”的中央委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信任该组织的工作人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增补一个人选。我要重申,尽管在党委会提交的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总结的决议案中体现出表面的赞许和信任,但实际上这种应有的信任并不存在。

伴随着要求我离开的呼声,对我的“攻击”已经开始了。这一切的企图非常明显。我在实质上,而不是在言语里,被认为是一个不受信任的领导。所以我认为,为了不制造更多的困难,为了不使工会陷入某种内部纷争的局面,代表全党意志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满足我的请求。既然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我认为是错误的一步),就应该把它的附加费用减少到最低。从我来说,离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并请求调换工作是为事业本身着想,因为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如果在工会这样一个广泛的非党组织的领导层中出现两个中心,实在是最糟糕的事了。在同一种政治方针的指导下存在着两种领导方法体系,而党中央对其中一些领导人的信任多于对另一些人的时候(就像莫斯科组织的情况),内部冲突就不可

避免。应当避免冲突。我想减轻党中央的负担,所以我请求你们,同志们,解除我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职务。我是一个工会运动的老工作者,和工运一起经历了它的所有发展阶段并且和它完全融为一体了,要和它断绝关系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痛心、更艰难。但对我来说,工运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考虑到这些,我请求,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让我留在苏联工会领导层中。我知道有人会借口说我拒绝重返工作岗位形式上是“违反党的纪律”。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觉得,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根本没法工作,所以我向中央委员解释我的行为并向中央全会提出申诉。我不能在全会召开之前仍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工作,因为只要开始工作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局面复杂化。而我行使自己的权利要向中央全会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反对政治局让我返回,哪怕是短期返回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决定。作为党员我完全有这个权利。如果我在全会前回去工作,问题因而就全部解决了,那我向全会的申诉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在全会上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此即使从纯粹形式的角度看,指责我违反纪律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是从官僚行政形式的角度看,这些指责就更不正确了。确实如此。要知道,我不能勉强自己昧着良心主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依我看,在类似当前的这种情况下,只要还希望今后能团结地共同工作,至少是为了让我今后还能够工作,政治局就不应该强迫一位老同志。而我向中央要求的并不多:给我另外一份适合我的工作。难道在我们党的实践中,政治局没有和同志们商量过、协商过自己的决定,考虑过某个同志的个人情况吗?只是在一种情况下没有这样做,就是当政治局认为涉及的是宗派斗争时(而且也不是一贯如此)。然而,如果政治局这样评价形势,把我留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就更不正确了,因为这意味着故意把我推进派系斗争。因此,从任何角度来说,我的离职都是合适的。只有从一个角度看不合适:制造冲突,记录这些冲突、谴责、决议等等。

我觉得所有关于无纪律性的指责都是非常不公平的——这种指责已经由个别同志提出来了——为了纪律、为了工会(以及党内)的和平,我没有在代表大会党团会上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政治局以它认为适当的任何形式解除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最后,我什么也不向中央要求,我不要求政治局改变让卡冈诺维奇同志进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决定——我只请求一点:调我到另一个合适的岗位。

我深信,我的观点以及基于此提出的要求符合党的利益。因此我请党满足我的请求。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M. 托姆斯基

1929年1月14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17—24张。副本。)

档案  
1984

## 5

## 布哈林同志 1929 年 1 月 30 日的声明

敬爱的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关于党内事件的通报》。实际上，这已是第三次提到所谓的《加米涅夫日记》、《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的问题，具体一点说就是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的问题，首先是布哈林的问题。卑鄙的、挑拨离间的传单（幸好几乎没有在各地区散发出去）通过相应的“提供消息”被用作武器来损害我党员的名声，并准备“自下而上”地做出相应的组织结论。鉴于此我须要在本次声明中提出自己的一些解释。

谈一谈“文件”。它的各个部分，以至整体是奇怪的粗制滥造：1) 文件中提到三个人的辞职发生在7月，但这个想法是在11月才产生的；2) 传单仿佛是托洛茨基分子日前散发的，但其中却只字未提托洛茨基分子被逮捕及托洛茨基被驱逐；3) 传单引用了斯大林同志的10月讲话作为最后事件，但丝毫没有提及11月讲话；4) 文件本身几乎没有人见过，然而其他的传单却曾经大量散发等等。

我当然不能对文件的内容负责，不管它是由谁，出于什么目的伪造、印刷、传播的。文件，客气一点说，是片面的、偏颇的，它遗漏和歪曲了一些重要思想。所以就加米涅夫对我的谈话所做的解释我不能负任何责任。

我曾向政治局两次声明并且现在再次重申：

1) 我和加米涅夫谈过话；

2) 和加米涅夫坦率的谈话这件事本身，就像事实清楚地证明的这样，是我的过失和错误；

3) 文件有些地方的叙述是正确的。

但文件整体上是 inaccurate 的，是虚假的。这不仅是因为除我之外，它对其他人

的问题和言论都避而不谈。而且因为它忽略并歪曲了我的一些核心的观点,比如,不容许把经济变成派别赌博的对象,不容许进行撼动党的争论,不容许有反对派等等。而在文件中,恰恰相反,用了一堆尖锐的言语、评述等等。

我坚决否认两个主要结论,我认为它们全是胡说和诽谤,它们部分地暗藏在这个不配称为文件的“文件”的字里行间,部分的是一些同志据此“引申”而来。

1. 关于和党的分歧。我和党,也就是说,和党的正式决议中反映出来的党的集体思想和意志没有分歧。我在思想上坚决敌视所有托洛茨基分子或半托洛茨基分子的主张,包括反对派的纲领。我也同意党关于右倾的决议。

2. 关于提出结盟。我没有提出任何“联盟”,也不可能提出。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有关结盟的话是索柯里尼柯夫说的,而我和加米涅夫的谈话“记录”根本没有涉及这一点。而且从“文件”中就可以看出,拜访的“实际目的”是什么:请不要帮忙整某些人和某些人,仅此而已。难道这里包含着反党,或反对中央、反对政治局的地下活动?难道这些机构在某个地方已制定了要消灭某人的方针?难道不能请求某个党员不要参与这种未经任何人正式批准的中伤吗?难道这可以被称为“结盟”吗?此前我不止一次受政治局的专门委托去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谈话。他们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的某种“左倾”方针,从吸取市场行情的教训这个角度,不可能不引起我的兴趣。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为什么我同意和加米涅夫谈谈。

但是我必须详细谈谈和这件事有关的更重要、更实质性的问题。把这件事从相互关联的党的各种重要问题中揪出来,并将“党内形势”归结到这件事上是十分可笑的和荒谬的。

## 一、关于党的政治路线

政治局内部冲突一直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如果只从政治局委员的个性特点等等方面去寻找答案就太奇怪了。很明显,这里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政治差别。

这个问题决不能和政治路线问题相混淆。我直接参与了十四大、十五大及随后历次全会决议的起草。这些决议草案大部分是我写的。我同意党的这些正式机构的决议。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路线的实际贯彻往往违背了这些决议,而按照某些同志自己对形势的理解而做出的指示和言论来执行。

七月全会以前我十分担心非常措施的问题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储备、黄金、播种等等)。遵照列宁最后的遗嘱,我十分关注农民中不满情绪的

滋生等问题。这是列宁直接在遗嘱中提到的。他把这当做主要任务。有些人暗地里说我大惊小怪并把这种流言散布到全国。不过经过艰苦斗争我们还是制定了共同的决议。非常措施被取消了。

但是什么实际上决定了后来的政策呢？就是那个“文件”中提到的斯大林同志关于贡赋的发言。在党的第十四次大会上，就殖民地和剥削农民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曾全力鞭挞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而在七月全会上他却提出了贡赋的口号，也就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贡赋是和社会主义建设毫无共同之处的范畴。但“贡赋”这个通俗的单词，很遗憾，并不只是“文学”词汇。由此导致了后来对农民的过分征税，日趋严重的粮食困难，播种面积减少，农民的不满（现在不得不降低税收）。没有人讨论过“贡赋”问题。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党员同意这项“贡赋”政策。然而却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谁也不能对“贡赋”说个不字，因为这个词是斯大林同志提出来的。急躁的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列宁格勒真理报》）写文章反对“贡赋”，但他很快就沦为萨拉托夫边疆区计划委员会机关刊物（该杂志发行量仅1000份）的副主编。然而这个提法推翻了党早先的所有决定，因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对这个提法，我当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并且我认为它宣告了日后的“非常”政策。卡冈诺维奇在七月全会上曾打算“一旦有事”就再一次推行非常措施。应该把重点放在同中农和解上面，可这点却遭到某些人的嘲笑。

入秋之后我明显感到，经济上令人担忧的现象越来越多。我极其谨慎地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分析。于是我被揪住不放。我不在莫斯科（因此，我根本没法把政治局就这篇文章的决定传达给任何人）。“攻击”的浪潮已经在各地开始了。我警告说黄金的状况令人担忧，并提出储备问题，但却遭到了嘲笑。我谈到我们的粮食问题没有什么进展，甚至出现倒退。但却被指责是惊慌失措和胆怯。我预言，如果没有（而且不能在一年之内生产出）建筑材料，那么拨款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这却被看做是“向低处取齐”等等，而我也被说成是反对工业化、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右倾分子。在报刊上，有数十篇文章对我进行匿名诽谤，而原托派分子分外起劲，还有《真理报》编辑部。

在十一月全会之前，我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提到了在粮食收购前景和播种面积问题上令人担忧的现状。我预言，如果不充分重视同中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和解，就会重蹈覆辙，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困难。我得到的答复是：比如，在乌克兰，农民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挑灯夜耕，而只有那些信念不坚定、惊慌失措



的人才会心有旁骛。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的决议,其主要之点是:把促进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作为一项中心任务。但决议通过之后(是一致通过的——我同样直接参加了该决议的起草——草案是李可夫和我共同写的)的“实践”和整个运动却走入另一条轨道。上面指出的部分却“不翼而飞”了,被“遗忘了”。此后的几百个决议几乎没有一个做出相应的解释。几百篇文章也是如此。于是,尽管有一些非常勇敢的同志们的大胆断言,我们越冬作物的播种面积还是大量缩减(据苏联人民委员会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全苏联减少5%,乌克兰减少12%),还有极其严重的粮食危机和外汇支付的困境。现在我们必须采用配给制,压缩进口,还不得削减原有的生产计划。实际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我因为真实地评价现状而遭到责骂和诽谤,而这个评价却正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根本前提。过去出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一些文字决议,另一条是实际执行的路线。我上百次地自我反省,努力研究问题,征询反对我的论据。但是我们上层形成的局面却是不让说话,否则就会莫名其妙地变成“大惊小怪”的人或者“反对列宁分子”,而这些绰号正是出自那些在这种问题上的权威性还很有争议的人。

从文件中可以看出,我认为重要的是同中农和解,巩固与他们的联盟。这仍然是现在的中心任务。只有现在才更清楚地看出,列宁强烈地坚持在这个问题上要极其小心是多么的正确。

谈到共产国际的政策,我完全同意六大的决议,我在很大程度上起草并执行了这些决议。如果对这一点还怀疑,简直是太可笑了。我坚决反对右倾,我主张把他们的宗派,作为党内宗派、个别集团加以消灭。但我反对对西方采用极其荒唐的政策和领导方法:用大声叫嚷替代论证,只注意任用所谓的“自己人”,尽管这些自己人是很蹩脚的政治家并且还有着一些非常可疑的品质。反右倾的斗争和反调和态度斗争一样,有代表大会解决了。不过代表大会还谈到要集中力量,但这种集中在哪儿?如果说服被叫嚷取代,再加上强迫,在这种实际执行的领导路线下能实现集中吗?难道列宁是这样领导共产国际的吗?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国际方面也不是“挑灯夜战”和“热情高涨”,而是它自己的“越冬作物面积的削减”:即分裂、脱离、小集团——根本没有集中力量。

在党的(和共产国际的)思想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没有兢兢业业地探寻客观真理,并据此制定正确的政策,而是搞一些“左倾”的叫嚷。可以举出轻率疯狂的叫嚷,同时还伴有对事实真相的直接歪曲的几百个例子。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不止一次地谈到必须全面真实地向工人讲清楚艰难的处境——我们的建议被

接受而且……\*发出了“略微有一点不协调”的官样通报。

严重的棘手的问题却未被讨论。整个国家都经受着粮食和供应问题的折磨,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代表会议却保持沉默。整个国家都感到和农民相处得不好,但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却保持沉默。整个国家看到并感到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代表会议却保持沉默。尽管如此,却出现无数关于倾向(相同的字眼)的决议,却出现无数关于右倾分子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的传闻和流言,等等等等。这是一种小人政治,而不是那种在困难时期向工人阶级说出真实情况,寄希望于人民,倾听并感受人民群众的需求,和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干事业的政治。

## 二、关于党的组织路线

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提倡自我批评”,这里包括自我批评本身、党内民主、选举制等等。的确,我们在哪里看到过选举产生的省委书记?的确,官僚主义风气在我们党内日益增长。的确,比如仅仅因为在工会代表大会党团里投票反对中央的建议就被撤职(!!),这意味着什么?这难道是党章所允许的吗?这样一来自我批评又变成了什么?既然对粮食的关心被那些(吃饱了的人们)认为是庸俗的,既然关注巩固同农民的联系就被看做是农民倾向,既然给予一些额外投资或削减投资的建议被看做是反列宁主义,那怎么还能讨论经济问题,等等等等呢?谁还会就这些问题开口讲话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问题没有被提出,而是被掩盖着。这就是为什么全党虽然在讨论这些问题,但只是“在私下”,在两三个人之间。这就是为什么党员有双重“路线”:一条“为了良心”,另一条“为了自己”。出席会议、一致投票、通过官方的公式成为一种礼仪,一种必不可少的党内仪式。同官僚主义的斗争恰恰应该从这里开始,而我们却在培植这种官僚主义。

我和一些同志不是正式被打击和攻击的对象,实际上这是一种惯用的手法。政策的分裂导致组织政策上的分歧。有时非官方的路线会突然冒出来。例如,加里宁同志在鲍曼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反对“右倾分子”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左倾的”加里宁反对“右倾的”布哈林,——这简直就是众位神灵的惯用伎俩!)这样的“路线”得到一系列官方举动的支持;如违反党的一贯传统而改组

\* 原文如此。——编者注



有一条出路,也就是我提出的,而且我将在中央全会上坚持的出路。

**H. 布哈林**

1929年1月30日

莫斯科市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25—31张。副本。)

## 6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 1929 年 1 月 30 日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  
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今天召开这次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原因如下：1 月 23 日我收到了分发给你们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内容你们已经知道了。里面记录了加米涅夫同志 7 月 11 日和 12 日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谈话。1 月 24 日星期四，根据我的提议在政治局会议结束所有日程之后，安排了一次闭门会议。会上我提交了上面提到的传单，并向布哈林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 7 月 11 日是否真的和加米涅夫同志谈过话，如果是，那么传单中加米涅夫同志的转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信的。布哈林同志承认，是的，他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过话，但传单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是准确的转述，在加米涅夫的转述中有不准确和歪曲的地方。接受我询问的加米涅夫同志也确认，7 月 11 日先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一个人来找他，一个小时后布哈林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来，布哈林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加米涅夫记下了谈话并把它寄给当时在卡卢加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他很惊讶，这份笔记怎么会落到托洛茨基分子手里，唯一的解释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从他那里偷走了这份文件。他承认传单的内容是自己笔记的真实复制。

布哈林：他怎么知道这是准确的复制品呢？

奥尔忠尼启则：加米涅夫给我的信已发给大家，在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读)。

李可夫：他给你原件了吗？

奥尔忠尼启则：他没有给我原件。加米涅夫同志说他的原件被偷了。加米

涅夫同志在自己的笔记中谈到,布哈林同志是代表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来和他谈话的。李可夫同志在那次会议上声明,他记不大清这些了,但并不排除布哈林可能就此事和他商量过。我也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谈了——他关于加米涅夫同志和布哈林曾谈过话的书面证词也已经分发给你们了。很显然,早在去年10月21日托洛茨基谈到过的就是这次会面,他是这样写的:(读)。

同志们,这只是问题的表面。谈到文件的实质,我们应该搞清三个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在我们政治局有没有统一的政治路线。到目前为止,政治局的个别成员,斯大林同志,还有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都声称,我们只有一条政治路线。这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上做出的声明。与此同时我们却得知了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这次从现在起著名的谈话,从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多次声明的那样。我没有参加七月全会,因为5月底我去治病了。但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下列事实:6月29日或30日由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米高扬和鲍曼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起草了七月全会关于粮食收购的决议;7月2日这份决议草案在政治局一致通过;7月10日这份决议草案未经任何修改在全会获得一致通过。同志们在发言中都强调完全一致。李可夫同志声明:“我无论如何不会背离党做出的关于粮食收购的决定。”托姆斯基同志说:“我认为,关于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原则性分歧的说法是很不严肃的。”布哈林同志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七月全会上,在7月4日至10日之间说的。而7月11日布哈林同志在跟加米涅夫同志谈话时却说:“我们觉得,斯大林的路线对整个革命是致命的。走这条路线我们就会垮台。我们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要比我们和你们早先的分歧严重很多倍。”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议后的第二天早晨。这意味着什么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如果说加米涅夫同志说的不是实话,那当然很好。如果有把握地说,这一切都是不正确的,加米涅夫在撒谎,那我们大家就可以如释重负了。但谈话本身,向政治局隐瞒谈话都让人觉得这件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布哈林同志也没有否认谈过话这一事实,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如果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为什么他要对我们隐瞒这些事?今天他也许会就此给我们一个解释,但是他显然使我们大家都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处境。政治局委员们刚刚声明,不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不存在两条政治路线,同心协力的工作是绝对有保证的。与此同时,我们却收到了这份文件。或者我们有统一的路线,那么同心协力的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是绝对必需的。或者存在着这份文件提到的严重分歧,那么无论大家怎么拼命努力,都不会有什么

结果的。布哈林同志和他所代表的那些同志——我应该重申一下,李可夫同志说,他没有授权给布哈林同志……

**布哈林:**布哈林否认是代表三个人去谈话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些同志)应该向我们公开说明,我们究竟有没有一致的政治路线。我本人就有一些怀疑。虽然在上次会议上布哈林同志说一致是存在的,但我要请你们注意,属于布哈林同志的还有另外一份文件,他并不否认这份文件的存在。他给皮达可夫同志读过这份文件。在文件中布哈林对现状做了如下评价:我们没有粮食,也没有黄金;面临的前景是4、5月份的饥馑。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我们正面临着危机,面临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遭到破坏。共产国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它现在的领导摧毁了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没有进行任何思想上的领导,甚至不像一个机构在进行工作。

那该怎么办呢?一定不能在农村煽动阶级斗争,应该允许农民从事经营,使他们不害怕被划成富农,不害怕重新采取的所谓的“非常措施”。

在工业领域要保持工业化的现有速度,但必须进行资金再分配,目的是首先发展轻工业,发展能尽快见效的基本建设。在党内对党的力量进行重组,恢复政治局的权力,取消集中在总书记手里的巨大职权,将正常的纯技术职能归还给中央书记处。

上次会议我问布哈林,有没有这份文件,他是否给皮达可夫同志读过,他说有,他让皮达可夫同志看了自己的经济札记,但没有政治方面的内容。

**伏罗希洛夫:**他是这么说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份文件好像是说,要急剧改变中央对农民的错误路线。这份文件布哈林同志给皮达可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读过,由此引发了所有这些议论。

**伏罗希洛夫:**什么时候读的?

**奥尔忠尼启则:**两周之前。在政治局当时的情况下,绝对不容许在其他地方宣读这类文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些空洞的声明有些不信任。我上次对布哈林同志说:既然你说,你读给皮达可夫同志的文件中没有我说的这些,那你就把它带来,读给我们听听。他多次表示,我现在就回家把它拿来,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回去把它拿来。文件中写的很可能并不像转述的那样,但布哈林同志不给我们看,虽然他答应要带来,但是没有拿来,而是藏起来了。在政治路线问题上要绝对清楚。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应该说清楚。这是最

基本的。

文件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有关结盟的谈话。文件中直截了当地说：“布哈林自己想谈谈。为撤换斯大林而结盟……”接着，“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致认为：如果现在政治局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不是斯大林，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一点我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已经坦诚地谈过。”

在另一处布哈林请加米涅夫和他的同伙不要攻击他。这是第二个问题，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布哈林同志不止一次地抱怨，在中央全会已经一致通过了决议后，却在第二天就开始搞组织处理，同时他举出《真理报》编辑部的人员变动作为证明。但是布哈林同志忘了，正是他而不是别人，还在《真理报》编辑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之前，就于7月11日跑到加米涅夫同志那里去，建议这份文件中所说的更大的变化。布哈林的抱怨同这件事是对不上茬的。加米涅夫同志告诉我，当索柯里尼柯夫去他那儿时，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还不完全清楚，全会上哪一方会占上风，谁会成为多数派。现在布哈林同志应该向我们说清楚，谈话是什么内容，怎么进行的。布哈林声称谈话没有涉及结盟，那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一切要瞒着政治局呢？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受政治局的委托或是自己去和加米涅夫或季诺维也夫同志谈话，每次大家都详细将谈话向政治局汇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几次来到我这里，我也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政治局，他们俩也去过伏罗希洛夫那里，去过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那里，他们也同样报告了政治局，而对于7月11日的谈话，布哈林同志半年来却保持缄默，我们不知道这件事，而托洛茨基知道这件事，我们却不知道。很显然，这里面不太干净，所以要对党隐瞒。

上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从李可夫同志那里了解到，布哈林同志不久前又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过话，但我们仍然没从布哈林同志口中得知有关这次谈话的任何内容。

第三个问题，辞职问题。这三名同志，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不久前全体提出辞职。托姆斯基同志直到现在还坚决要求辞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理由是卡冈诺维奇同志被选入理事会后无法进行工作。虽然还在工会代表大会之前，在卡冈诺维奇同志被选入理事会之前，他，托姆斯基同志，就和李可夫、布哈林一起在十一月全会前提交过辞职申请。布哈林同志早在7月11日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时就说道：“如果我、李可夫、托姆斯基辞职的话，那会怎样呢？我能不能躲开一段时间——两个月不过问现行政策。等危机来临时，我再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发言。”大家都看到，这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毫无关系。



这些同志们的辞职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和政治含义。他们想通过辞职改变党的政治路线。起初,当中央全会大多数仿佛都会支持他们时,他们想让其他人辞职,而当这一手没有得逞时,布哈林同志把自己和朋友的辞职当做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从他和加米涅夫的谈话可以看出,布哈林同志觉得,组织局是支持他们的,列宁格勒也是支持他们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一下子都背叛了他。

同志们,关于三位同志(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在十一月全会前提出辞职,我再说几句。当委员会正在草拟控制数字的决议时,我们非常意外地收到了辞职申请,而且其中指出,尽管他们确信可以制定出他们可以接受的一致决议,但他们还是要向中央全会提交辞职书请求解除他们的职务。通过长期的劝说,得到了他们的默许,我把辞职书撕了,我们决定把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提交全会。尽管如此,布哈林同志一次也没有出席过十一月全会,直到现在他既没有恢复自己在《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也没有重返共产国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托姆斯基把自己辞职的理由说成是由于卡冈诺维奇同志被选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會主席团。客气点说,他这是违反了实际情况。其实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很久他们就决定这样做了。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7月11日的谈话就是对所有这一切的一个特殊的诠释。这份文件现在已经在党内外广为人知了。

**斯大林:**要在《方向盘》上发表。

**奥尔忠尼启则:**将在《方向盘》、《社会主义通报》和所有资产阶级的刊物上发表。没什么好说的,要想摆脱这种境地很难。同志们,干出这些勾当的人现在却向我们声明,他们要离职。真漂亮!他们自己惹出了麻烦,而现在想把过错推给卡冈诺维奇同志。你们未必能得逞吧。那么,出路在哪儿?我觉得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抛弃这场幕后的把戏,停止用辞职来威胁党,到党派你们去的岗位上工作,忠实执行党的决定。

谈谈我自己。我坚决声明,如果布哈林同志确实对加米涅夫同志说过,我好像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那他是昧着良心诬蔑我。关于我跑到布哈林同志那里指责斯大林同志,就这点我要说明以下情况:在政治局上次会议上布哈林做解释时,他说7月11日同加米涅夫谈话时指的是我和他们在1926年底的谈话。当然,1926年的谈话已经记不准确了,不过布哈林同志非常清楚,我和斯大林同志之间当时有一场激烈的谈话,是由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问题。这件事为什么到了1928年7月又被提起?这和布哈林同志现在混乱的政治立场有什么联系吗?我可从来不曾赞同过这种立场。诬蔑同志的行为是多么不光彩,多么不漂亮。

鲁祖塔克：按什么顺序继续讨论呢？原来登记的顺序我弄丢了。

喊声：不需要旧记录。

鲁祖塔克：谁想发言？

伏罗希洛夫：布哈林应该做出解释。（对布哈林）你何必要花招呢，说说你的心里话吧。

布哈林：我没耍什么花招。

伏罗希洛夫：布哈林应该发言。

鲁祖塔克：布哈林同志发言。

\* \* \*

奥尔忠尼启则：我坚决抗议布哈林声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把某些同志赶出政治局，而且仅仅为此才召开会议。

布哈林：我没这么说过。

奥尔忠尼启则：如果布哈林想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作用说成是召开会议来除掉某人，那就让他自己去干吧。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一个党员愿意当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时，列宁写道，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应该积极参与审核政治局的所有文件，以防止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所以如果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给你布哈林开会，那也不是为了除掉谁，而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原来你自己是在情况表明要除掉某人时，才会跑去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谈话。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这样看待自己。

这个文件是从哪里来的？——这事你最清楚，因为记录了你的谈话，而不是我的。加米涅夫是不是正确记录了这次谈话，你去问他自己，因为你和他谈过心并且给我们抹了黑。

这份文件是如何落到我们这儿的？23号这份文件到了我手里。在这之前红色教授学院的费金同志来找我：“你知道吗？在工厂中散发着一张传单，是加米涅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里面谈到政治局内部的分歧。”等等。当时我没有在意这件事，认为这是谎言，又一次的诽谤。过了三天我的秘书肖穆什金同志给我拿来这份文件。我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他对我说他也有这份文件。我们打电话给政治保卫总局。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对我们说，他们截获了上百份这样的传单，可能更多。这份文件就是这样落到我手里的。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布哈林暗示，这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写的。那是谁写的呢？说实话，你怀疑是谁散发了这份文件。就算这是其他什么人写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次谈话仍然存

在。今天我们会上谈的不是这份文件的来龙去脉,而是讨论其中提到的这次谈话,谈话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谈话是否有必要进行。这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至于是否须要邀请加米涅夫?当然,如果布哈林说这是伪造的,就须要请加米涅夫来说清楚。否则怎么讨论呢?我认为今天我们要弄清楚,这份文件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将它提交全会讨论。一句话,接下来怎么办。我不知道,还能给布哈林什么样的解释,他是否满意这些解释。也许,我现在应该解释,托洛茨基分子是怎样印刷这些传单的?也许,他会问,这些传单是在哪里印刷的?如果我知道是在哪里印刷的,我就禁止印刷了。也许他会问,这些传单是怎样散发出去的。假如我知道的话,我就禁止散发了。但我怎么会知道呢?

鲁祖塔克:斯大林同志发言。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5号全宗,27号目录,520号案卷,第1—9张。原件,打字稿。)

## 7

## И. В. 斯大林 1929 年 1 月 30 日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 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建议让加米涅夫到会。

**斯大林:**加米涅夫提交声明来确认《笔记》。我建议让加米涅夫到会,他是党员,应该讲出实情。

按顺序发言。

**主席:**轮到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布哈林同志今天的发言与他在政治局几次闭门会议上的声明不符。在本次会议前我们召开了两次政治局闭门会议,会上谈了加米涅夫的文件。布哈林承认,他去过加米涅夫那里,和他进行过谈判,但关于结盟和严重分歧他好像没说过。可是布哈林同志认可了加米涅夫同志《笔记》中的许多内容。他当时没有说加米涅夫的《笔记》是“伪造”的。他当时没提“伪造”这个词。

**莫洛托夫:**一次也没说。

**斯大林:**他没说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布哈林承认,他去过加米涅夫那里,曾背着中央和他谈过话。直到出现加米涅夫的《笔记》之前,他向中央隐瞒了这件事。现在瞒不住了。大家都知道,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一直希望政治局委员就工作问题接见他们。我拒绝和他们谈话。谢尔哥、雅罗斯拉夫斯基、莫洛托夫(主要由他们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系)都曾接受委托同他们谈过话,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向政治局报告了谈话结果。而布哈林同志把自己和他们的谈判向政治局隐瞒了。

**李可夫:**该谁发言——布哈林还是斯大林?

斯大林:按顺序该我发言,因为布哈林出尔反尔,布哈林曾承认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

布哈林:我现在也承认这点,但你不要忘记了,我没有参与召集这次会议,可是既然会议召开了,我就有权提问:这是个什么会。我有提问的权利。

斯大林:我按顺序要求发言。如果我无权发言,就请大家告诉我。(会场上寂静无声)那么,我有权发言了?

布哈林同志出席了政治局第二次闭门会议,但后来离开了。我们叫他,可是他没回来。托姆斯基也同样不想回来。在这次会议上,在第二次会议上,在你们走了,而李可夫回来之后,我们决定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

托姆斯基:我以为会议结束了,所以就走了。

斯大林:怎么会这样想。你和布哈林待在李可夫那里。我们叫你们,你们答应回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李可夫同志回来了。

托姆斯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昨天吗?

斯大林:是的,昨天或是前天。李可夫回来了,我们在有他出席的时候做出决定,我们不能继续,说得难听点,让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政治局的分歧一无所知。

李可夫:我回来是为了确认一下政治局的议程。

斯大林:议程上就有这个问题。

李可夫:我在场的时候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我提出这个建议,得到其他人的支持。李可夫当时也在场,我们大家得出结论,不能让中央监察委员会继续蒙在鼓里。所以要召开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参加的此次会议。既然工厂里的党外工人都知道了政治局里的冲突,那决不能让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决定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这不是什么审判,并不是要决定布哈林同志的政治命运。我理解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我们要结束那种由于某个政治局委员跑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那里,和他们密谋反对中央等等而造成的不愉快的氛围。如果不消除这种令人不快的暗中活动,我们就不可能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要召集这次会议。当然,布哈林同志可以要求检查文件。文件已经检查过了。加米涅夫在声明中确认了由托洛茨基分子公布的《笔记》是他写的。还询问了索柯里尼柯夫,他也没有否认。

布哈林:我也不否认。

斯大林:如果布哈林否认这点,我提议叫加米涅夫到会。

布哈林：我想知道，文件是怎么来的？

斯大林：我们从哪儿知道文件是怎么来的。

布哈林：谁拿来的，你们从哪儿得到的？

斯大林：我觉得，这次会议不是对布哈林同志的审判，我想，不应当惩罚任何人，只是要弄清情况，要弄明白，消除一切制造阴谋诡计的可能，搞清楚我们是否只有一条路线。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能不能、有没有权利不通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呢？我觉得没有这个权利。

布哈林：我并不反对这点。

斯大林：怎么能不通知呢？否则就会有人跟我们说：你们在七月全会之前有一些分歧，然后达成了一个决议，但就此并没有通知我们，通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你们在十一月全会之前有分歧，然后搞出了一个决议，但又没有把此事通知我们；现在才清楚了，分歧依然存在，而且事情走得更远了，为了不再有欺骗，请将一切详细地告诉我们。每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会有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能不把这些情况向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插话听不清）不，请原谅，我们的一切都应该是清白的。〔……〕

斯大林：我提出要叫加米涅夫到会，是针对布哈林在声明中说加米涅夫的《笔记》是“伪造”的。他说，这份文件是“赝品”。布哈林过去没有这么说。在加米涅夫在信中确认这就是他的笔记之后，该怎么办呢？加米涅夫写道，托洛茨基分子公布的文件就是他的笔记，他说的是真话吗？所以鲁祖塔克主张不让加米涅夫来是很奇怪的。要不是布哈林突然出尔反尔，声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叫加米涅夫来。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加米涅夫来。如果文件并不像布哈林现在所说的那样是伪造的，那当然就不用叫加米涅夫来了。〔……〕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我不想深入地谈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发言。我理解他非常微妙的处境。原来他利用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机会，经常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通风报信。他给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牵线，当然不是要他们分手，而是让他们靠拢。过去我不知道政治局内部的一些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现在清楚了。现在清楚了，我们内部情况成为街谈巷议的根源之一就是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

索柯里尼柯夫：我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过全会，但全会的决议并不是秘密。已经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正式提供了了解全会速记记录的机会。我没有透露

过任何内部消息,这不是事实,而且我也不可能透露——我自己也只是从街谈巷议中才知道这些事的。

**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我指的不是这些事,不是中央的决议。我指的是我们内部的秘密信息却成了街头传闻。我觉得就这件事应当专门在政治局议论。无论如何,我们要采取措施,让政治局远离这些对事业有害的意外事件。

现在我们来谈加米涅夫的文件,加米涅夫的《笔记》。

首先,我想对文件中涉及我本人的那些无稽之谈给予实在的驳斥。我不知道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谈话”时,是不是像文件中提到的那样说的,或者是另一种说法。无论如何,文件中有许多无稽之谈和诽谤,而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并没有予以驳斥。所以我有必要来驳斥这些无稽之谈,如果我有什么不实之处,请政治局委员(也包括布哈林同志)指正。

**第一点反驳。**在加米涅夫的《笔记》中,布哈林同志说:“斯大林执行了右倾政策,他将共产国际赶出了克里姆林宫。”要谈右倾,布哈林同志最好还是别说话:我觉得,他多多少少把我同他混在一起了。至于“把共产国际赶出克里姆林宫”,请允许我声明,这是一个卑鄙拙劣的诽谤,甚至连托洛茨基分子都不敢这么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共产国际的六大原本就不是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而是在圆柱大厅。政治局内并没有人反对。只是有点担心,在圆柱大厅安装用于翻译讲话的电话装备有点困难。但当这些疑虑消除,电话设备安装好以后,问题就毫无异议地解决了。事情就是这样。事后声称共产国际被赶出了克里姆林宫,这是卑鄙无耻。

**第二点反驳。**加米涅夫在笔记中转述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如下:“斯大林给你看过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吗?”“没有,我头一次听说,”布哈林答道。“会拿我们怎么办呢?”“不知道,这种事是不会跟我们说的,”布哈林答道。从这段对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有书信往来,并且这件事瞒过了布哈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同志们,请允许我声明,布哈林同志的这个“说法”是彻头彻尾的卑鄙诽谤。我总共就收到过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一张便条(恢复他的党籍之后),他请求接见他,谈谈他的工作安排。我立即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这张便条交给了政治局,并声明我不能接见季诺维也夫同志,并建议派其他人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谈他的工作。为什么我拒绝接见季诺维也夫同志呢?因为,就像我当时跟政治局说的那样,我觉得季诺维也夫同志会涉及政治局内的分歧问题,也许会谈到结盟,那我就不得不将他赶出门去。莫洛托夫被派去和季诺

维也夫同志谈话,最后季诺维也夫同志得到了苏联消费合作社文化处的工作。这就是有关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便条和安排他工作的全过程。我没有收到过其他任何便条。这一切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很清楚,也包括布哈林同志。现在大家来评理,除了卑劣的诽谤外,还能把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行为称为什么呢。

**第三点反驳。**谈到共产国际的纲领,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我的纲领很多地方都让斯大林给破坏了。他自己想在全会上宣读关于纲领的报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挡了回去。”同志们,请允许我声明,布哈林同志说的这一篇话纯粹是吹嘘自己。说到共产国际纲领的起草,中央档案里有文件,每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可以去看。从文件中你们就能明白,纲领的初稿是布哈林同志起草的,被中央政治局推翻了。从文件中看得很清楚,政治局委托布哈林和斯大林起草一份新的草案,这份草案后来得到政治局通过。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这第二份草案后来不仅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纲领委员会通过,而且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也获得通过。

**莫洛托夫:**在中央也有相关文件。

**斯大林:**政治局委员不会忘记,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对纲领的第二稿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而且,布哈林和斯大林还在中央七月全会上一起维护了这第二份草案,批驳了个别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攻击。你们只要从中央档案里取来这两份草案并把它们对照一下,就能明白布哈林同志吹了多大的一个牛皮。

布哈林同志说好像是我“想在全会上做纲领的报告”,而他布哈林“好不容易才把我挡了回去”,这个声明更是可笑。政治局委员不会忘记,事情正像俗话说的那样,“恰恰相反”。

**喊声:**是的!

**斯大林:**政治局委员不会不清楚,不是别人,正是布哈林提议由斯大林向全会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而斯大林坚决拒绝,他说纲领的报告理应由布哈林同志做,因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

**喊声:**对!

**斯大林:**难道布哈林同志把这些都“忘了”吗?

**第四点反驳。**谈到中央七月全会关于粮食收购决议的起草过程和1928年6月底7月初政治局闭门会议上发生的争论,布哈林同志对加米涅夫说:“我宣读了一份20页的声明,没有交出手稿。莫洛托夫说这份声明反列宁主义、反党。斯大林说:我可以接受十分之九。莫洛托夫走了。声明基本上被通过,我离开去



写决议,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带来一份从我的声明中剽窃而来的另一个决议。”(见加米涅夫的《笔记》)同志们,我要声明,布哈林同志的这些自吹自擂,不是别的,只是他狂妄的幻想的结果。

实情是怎么样的呢?6月底布哈林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读了他亲自写的关于经济状况和粮食收购的提纲(现在他称其为宣言)。政治局委员要求将提纲发给大家,进行正常的讨论,布哈林同志拒绝了,声称,他只能接受一种讨论方式,就是:布哈林同志读,其他同志听。而当政治局委员们对这种在我党前所未有的新奇讨论方式表示反对时(只有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不反对这种方式),布哈林同志答道,他不认为还有其他方式。

说到布哈林同志提纲或者叫宣言的实质,提纲虽然部分是正确的,但有三点根本的错误,遭到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严厉批评:(1)关于和农民破裂(布哈林在自己的宣言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和农民破裂了,政治局内大多数人否认这点,称其是惊惶失措);(2)关于自由贸易(布哈林在自己的宣言中讲到充分的自由贸易,他“忘记”了国家机构的调控作用,这点遭到政治局多数人的坚决反对);(3)关于集体农庄(布哈林在自己的提纲里没有充分评价集体农庄的作用,他否认个体农民经济的不足,这点遭到政治局多数人的坚决反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最终被否决了,于是决定让米高扬、莫洛托夫、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组成委员会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审查新提纲,将这份新提纲由米高扬同志提交委员会。米高扬同志确实于6月30日或7月1日将新提纲提交给了委员会。委员会做了些小改动后批准了这个提纲。后来政治局也通过了,就这样,提纲好像是在7月3日被提交给七月全会审议。

这就是决议形成的过程。现在把实际情况和布哈林同志对加米涅夫同志说的那个臆想的虚假事件对比一下,你们就会明白,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这次所谓的“谈话”有什么价值。

布哈林同志说,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粮食收购的提纲是“剽窃”他的宣言。既然如此,为什么布哈林同志不把自己的提纲(宣言)多复制几份,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来证明他对政治局提出的这项严厉指控(“偷窃”)。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把自己洋洋得意的提纲藏起来呢?为什么当时,1928年6月底,他把提纲藏起来,而现在当他确实认为政治局的提纲是“剽窃”他的提纲时,他仍然把提纲藏着呢?从什么时候起善良的人们开始把优秀的提纲藏起来了的呢?能不能让布哈林同志把这个提纲交出来,让与会的委员们最终能把它同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七月提纲进行核对呢?如果布哈林同志确

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就会急不可耐地把自己得意的提纲交给我们,这还不清楚吗?偷窃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和丢人的牛皮,这还不清楚吗?

同志们,对于这场现在已经广为流传的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中所涉及的谬论和公然的是非颠倒,我还可以提出十来条反驳意见。但是值得去做这种并不光彩的事吗?我想不值得。我认为这四条反驳已经足以让大家了解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的性质和价值了。

现在谈谈实质问题。

我们有没有分歧?是的,有过。七月全会前我们首次出现了分歧。我已经向你们讲过中央七月全会前政治局内部的分歧。这些分歧是否涉及非常措施问题,涉及必须取消这些措施等等呢?不,不涉及。必须取消非常措施是政治局全体委员都承认的。或许,分歧涉及中农问题,涉及保障与中农的联盟问题?不,不涉及。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认为,应该保障同中农的牢固联盟。那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分歧呢?就是在刚才我谈到的三个问题上。也就是同农民破裂的问题,自由贸易问题,最后是评价集体农庄运动问题。但结果是就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是粮食收购政策问题一致通过了一个总决议。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布哈林和他的同伙放弃了自己的错误,分歧也随着总决议的通过而消除了。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那个由政治局全体委员签署的(1928年7月)、关于政治局内部一致和没有分歧的著名宣言,并向共产国际六大各代表团代表会议宣读。现在从加米涅夫的《笔记》中可以看出:布哈林和他的同伙只是表面上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他们把这些错误藏在心底以待时机。但是我们当时哪能知道,在投票赞成粮食收购总决议时,布哈林同志却把同中央的一些分歧藏起来了?很显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政治局内部的分歧,我们大家认为分歧已经消除,已经成为历史了。

我们之间分歧的第二次爆发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布哈林同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政治局内并非一切都很顺利,至少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试图重新制定或“修改”中央的路线。我们,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毫不怀疑,《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一篇折衷主义的文章,目的是要放慢工业发展速度,要按照弗鲁姆金同志那封著名信件中的精神来改变我们的农村政策。莫斯科委员会上层的动摇也被认为是这种不好的征兆。但是这些不好的征兆直到十一月全会之前才真正表现出来。当时的争论是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的呢?首先是如何评价农业状况,是退步还是发展。第二,对富农的最富裕部分是继续实行还是取消个别征税。我觉得布哈林同志应当明白,这里谈的不是中农而是富

农。他提议取消个别征税,而我们主张继续征收。

布哈林:我主张总体提高对富农的税率,取消个别征税。

斯大林:无论如何,这里争论的显然不是关于中农,因为个别征税只涉及最富裕的那一部分富农。至于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我们大家都承认应该继续推进这种经济的发展。第三……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

斯大林:(第三,)关于在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增长。布哈林同志反对这点。

布哈林:没有这回事!

斯大林:有,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反对这点。我们手头有事实可以作证。

最后是关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位同志的辞职。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位同志向控制数字决议起草委员会提交了集体辞职的专门声明。这发生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至少一个星期。现在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力图把我们的分歧说成是中农问题上的分歧。然而在他们三个人的辞职声明中却只字未提中农或者什么政治分歧。相反,他们的声明中说政治局委员之间没有政治分歧,他们,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提出辞职只是因为各个组织中对他们进行“恶意攻击”。

但是在控制数字委员会工作过程中所有这些分歧都以某种方式解决了。因为(1)农业倒退的理论被否决了,(2)继续对富农实行个别征税,(3)承认在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是事实,(4)三个同志收回了辞职。结果是政治局全体委员通过了控制数字的总决议。结果是政治局做出了大家都知道的决定:所有政治局委员无论在中央十一月全会还是在全会外,都要声明政治局内部是团结的,是没有分歧的。我们当时能不能知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投票赞成一致的决议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而把自己和中央存在分歧的各点保留下来,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要在实际行动中拒绝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工作,在加米涅夫的档案里有一份《笔记》,它将被托洛茨基分子“偷”去公布,从其中可以明白,我们政治局内部存在一个有自身特殊“色调”的特别集团呢?很显然,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些。

现在大家都清楚,存在着分歧。

谈谈布哈林同志今天的声明,1月30日的声明。不寻常的是,他突然从兜里掏出声明就宣读了,可以说“径直”宣读,而没有多复印几份发给与会的委员

们。干嘛要用这种手段呢？很遗憾，我不能详尽地分析这份新文件，因为只凭听力很难弄清楚声明里的所有部分和细节。但是不难明白，这份文件整体上确认了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让我们来注意布哈林同志声明中的某些地方。

1) 布哈林同志指责党，首先是指责斯大林同志自七月全会以来好像执行着“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政策。你们想想：党执行的原来不是同农民结盟的政策，而是“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政策”。这甚至说不上是诽谤，而纯粹是瞎话，不可理喻的胡说八道。布哈林同志既然和党有如此重大的分歧，为什么他在政治局、在中央、在七月全会、在十一月全会中都不指出来呢？既然他在心中和中央有这种分歧，他怎么能在1928年的7月和11月投票赞同政治局是一致的呢？连布哈林同志自己都不相信他杜撰出来的关于“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胡言乱语，这不是很清楚吗？

2) 布哈林同志在声明中谈到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太重。但他忘了三点：第一，我们已经为35%的农户（贫农）免了税；第二，我们增加了农民中富裕农民和富农的税负（布哈林同志不会是为因此而难过吧？）；第三，去年全体政治局委员，包括布哈林，无一例外地承认农业税太低，应当提高。是的，在给35%的农户免税的同时，将农业税增加到4.2亿卢布的确给一部分中农造成了一些困难。但布哈林同志不能否认，这个失误是我们共同的失误，因为将农业税提高到4.2亿卢布是中央一致通过的，没有任何异议（其中也包括布哈林同志）。现在正在通过众所周知的修改农业税、将其削减5000万—6000万的政策来改正这个过失。那是谁倡议要改正这个过失的呢？是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倡议。不管怎样，应该承认布哈林和这没有任何关系。

3) 布哈林在声明中提到越冬作物严重减少，影射中央的政策。但布哈林同志引用的都是和我们不同道的人，格罗曼先生的话。这位先生昨天还讲，比如在北高加索越冬作物减少18%。然后他把减少的百分数降到了14%。后来看看还是不行，他又把百分数降到好像是7%。我不知道格罗曼先生还想把百分数降到多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他的数字提出异议，断言我们的秋播面积很稳定或者只有最低限度的减少。而且是在不利于播种的气候条件下！布哈林同志怎么会对异己分子如此信任呢？他对资产阶级专家的信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去年，好像是6月份，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全苏联春播面积下降了7%，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苏联所有地区的春播，除了乌拉尔的一些地区，总体是增加的。在叫嚷春播或秋播减少之前，对所有格罗曼之流的资产阶级“记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报道应当认真核实，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今年我

们的秋播很可能出现一些减少,比如在乌克兰。第一,因为气候条件不适合秋播(没有雨)。第二,乌克兰草原地带发生的严重歉收,使农民无法立刻从打击中恢复过来。而且还有可能一些富农分子不顾气候条件减少了自己的秋播。这当然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党的政策原本就没打算要让社会上的所有阶级都满意。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如布哈林同志断定的那样,正走向“灭亡”,走向“衰落”呢?显然不是这样。只有那些惊惶失措的人才会在这种情况下叫嚷农业的灭亡。

4) 布哈林同志在声明中谈到我国外汇储备灾难性的状况。他的话让人觉得,我们吃光了一切,没有留下任何储备,只能坐以待毙了。他声称是他布哈林第一个提出了储备问题并“预言了”外汇状况的恶化。关于整个储备,包括外汇储备,客气点说,布哈林同志错了。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人早在1925年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首先提出了各种储备的意义问题。至于专门谈到外汇储备,保证这方面盈余的问题,也不是布哈林同志而是鲁祖塔克同志,在政治局提出的。布哈林同志喜欢描绘“灾难”的场景,但他总是忘记或者不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意见来防止“灾难”。不过叫嚷“灾难”时,他忘了一个“细节”,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最低外汇储备。不错,我们做到了这点不是靠了布哈林同志的什么帮助。不过实实在在的外汇储备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需要的是“灾难”。

一个小细节。日前皮达可夫同志和我谈起他和布哈林同志的见面。布哈林向他抱怨,他说我们正走向灭亡。皮达可夫反驳他,说工农业的大规模建设使走向灭亡的断言没有根据。而布哈林回答说:“这正是不幸之所在,所有这些工厂很快就会落到白卫分子手里。”皮达可夫据此断定,布哈林疯了。(全场笑声)这就是布哈林心态的又一个写照。

5) 布哈林在声明中指出,中央不但没有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反而还“培植”官僚主义。你们清楚,托洛茨基当初也说过同样的话。但如果说中央在培植官僚主义,那么是谁在和官僚主义斗争呢?那还值得去保护那个培植官僚主义的中央吗?布哈林同志自己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摩拳擦掌反对中央,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6) 布哈林同志在声明中谈到中央瓦解共产国际。托洛茨基分子,布兰德勒分子及塔尔盖默分子都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说中央“瓦解”共产国际,不就是因为中央在那里领导反右倾分子和反调和分子的斗争吗,不就是因为中央在那里执行共产国际六大的决议吗,不就是因为中央帮助德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

肃清自己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吗？好像布哈林同志不仅仅是想同中央作对，他还想把斗争扩大到共产国际。这还了得！

7) 布哈林同志在声明最后想缓和一下，他说分歧将过去或者已经过去了，我们最终会达成一致的总路线等等。这是诡计，同志们。这种伎俩是不会得逞的！先对中央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指责它执行“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政策，指责它“培植官僚主义”，指责它“瓦解共产国际”，然后又宣布一致的路线。不，同志们，这行不通。如果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和中央是一条路线，那你们干嘛要集体辞职呢？为什么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虽说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路线，却仍然执意辞职呢？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听任自己多次粗暴而顽固地破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要求他们留在工作岗位的决议？如果他们的路线和党一致，他们就不会这样执意坚持辞职？这难道不清楚吗？如果路线只有一条，他们就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既然他们仍然不肯留下，这就意味着，他们和路线有格格不入的地方，这难道不清楚吗？

他们抱怨《真理报》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政委制”。可是难道中央什么时候放弃过检查《真理报》编辑部或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吗？亚格洛姆比卡冈诺维奇好在哪儿……\* 费几句口舌说一说诚实和原则性。我举布哈林同志最近的一件事——他和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前反对派进行秘密谈判这件事。我问你们：当中央根据布哈林同志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局内部团结、政治局内部没有政治分歧的决议时，他自己却背着中央同前反对派进行反中央的秘密谈判，密谋组织反对中央多数成员的政治联盟，这诚实吗，忠诚吗，有良心可言吗？

布哈林同志说，他没打算和前反对派结立反对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政治联盟。但有什么根据来相信布哈林同志呢？认为布哈林同志说的显然是谎言，这岂不是更正确吗？因为如果布哈林同志没打算结盟，那他为什么秘密反对中央，为什么把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判瞒着多数中央委员呢？比如说，怎么解释布哈林同志在谈话时对加米涅夫同志说的话：“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人窃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盯我的梢，你这儿也有。我希望通情报，但不要通过秘书和中间人。我和你说的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你也不要对任何人讲，但要告诉自己人，别攻击我们。”这些话不是清楚地表明，布哈林同志知道自己同加米涅夫谈判是在犯罪，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隐瞒与这次

\* 原件此处缺失。——编者注

谈判相关的一切,而用政治局内部的一致和没有分歧的声明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如果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谈话,布哈林同志大可不必这样严格地对中央保密,这难道不清楚吗?把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行为叫什么好呢?这里有什么诚实、良知、忠诚可言?如果布哈林同志把这称为原则性,那什么才是无原则性呢?布哈林同志的“原则性”不能自圆其说,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想就三个问题说几句。首先是关于辞职的政策。辞职这种做法是同党、同中央、同中央决议斗争的最糟糕的方式。

**喊声:**对!

**斯大林:**托姆斯基把选举卡冈诺维奇进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作为辞职的理由。卡冈诺维奇这个借口完全是虚假的。三位同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提出集体辞职时,还谈不到卡冈诺维奇的事呢。这事发生在11月,十一月全会之前,也就是在第一次提出把卡冈诺维奇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工会代表大会(12月底)召开之前两个月。请问,这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有什么关系?我记得,还在9月份布哈林就对我说过,他、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打算集体辞职。

**托姆斯基:**我10月才来——有证明。

**斯大林:**你可能是10月份才来,但关于集体辞职布哈林同志是在9月末或10月初对我说的。

**布哈林:**9月份我不在莫斯科。

**斯大林:**那你就是在10月份对我说的集体辞职。所以,辞职的念头你们在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就有了,也就是说,在提出卡冈诺维奇这个问题前三个月就有了。我再问一遍,这和把卡冈诺维奇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有什么关系?而且,从加米涅夫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你们三人在1928年7月就酝酿辞职。在这份《笔记》中布哈林直截了当地对加米涅夫说:“如果我们——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辞职的话,那会怎样呢?”这不是在12月发生的,不是在工会代表大会期间,不是在11月份,也不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而是在7月份,也就是说是在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前差不多六个月,在提出卡冈诺维奇同志问题之前六个月。

第二个问题——关于所谓的“恶意攻击”。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把所谓的“恶意攻击”作为拒绝服从中央决议的理由。这个“理由”经不起任何批评,是彻头

彻尾的捏造。说实话,谁也没有像斯大林现在这样遭到“恶意攻击”。

**喊声:**对!

**斯大林:**举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为例,举布哈林同志今天的声明为例,最后,举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今天的发言为例——所有这些文件、声明、发言,不是对斯大林进行最凶狠的、不公正的、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还能是什么呢?这是不是给了我辞职的理由呢?当然,不是。你们找不出一个政治家没有被批评过,没有被最荒谬的流言缠住过。如果因此就要辞职,那就意味着必须禁止党员对所谓的领袖进行各种批评或者持批评的态度。

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看事物的视角很奇特。按他们的看法,如果普通党员不执行中央决议,那么他们应该受到党内法规的严厉处罚;而如果所谓领袖,例如,政治局委员,破坏了中央决议,那他们不仅不能受到处罚,也不能对他们进行普通的批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批评会被这些同志看做是“恶意攻击”。不言而喻,党不能遵循这种虚伪的观点。如果我们对领袖们有一套法规,而对“普通人”有另一套法规,那么我们的党和党的纪律就不复存在了。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居然不明白这一点。

有人说,如果是列宁的话,对待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一定会比现在的中央要温和一些。这完全不对。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政治局的两位委员不断破坏中央的决议,顽固地拒绝留在党给他们安排的岗位上,而中央并没有处罚他们,两个月来一直都在劝说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是怎样办的,你们好好想想。难道你们不记得,列宁同志由于托姆斯基同志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把他赶到突厥斯坦去了?

**托姆斯基:**那是由于季诺维也夫推波助澜,多少也有你的功劳。

**斯大林:**如果你想说,列宁同志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别人能够让他相信,那就太可笑了。谁能否认,在派托姆斯基同志去突厥斯坦这件事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列宁,而不是别人?你们再想想另一件事,关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列宁提议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因为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支部批评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个决议草案。谁能否认,现在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粗暴地破坏中央决议,明确提出反党的新机会主义政纲的过失,比上面提到的托姆斯基和施略普尼柯夫的过失要恶劣得多?然而中央不但没有要将他们中的任何人赶出中央委员会或者派他们到突厥斯坦的某个地方,而且试图劝说这些同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当然顺便也揭露他们非党的,有时简直就是反党的行为。我不知道,中央要多么温和才能让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满意。



第三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分歧。听了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同志今天的发言，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我们之间的分歧比表面上看到的要深刻得多。托姆斯基说，如果把卡冈诺维奇选入全苏中央理事会主席团，那我们就会有二个中心。但如果我们只有一条路线，如果卡冈诺维奇和托姆斯基信奉同一条路线，中央的路线，那怎么会有二个中心呢？所以我们不是一条路线。因为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一条路线，那就不可能有二个中心；要么不是一条共同的路线，那么二个中心就不可避免。再者，李可夫同志说，他在我们的农村政策上和我们有什么大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农村工作问题上的分歧就意味着在我们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上有什么大的分歧，这难道很难理解吗？所以，在这方面也很难说有一条一致的共同路线。最后，布哈林同志声明，他不反对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但他坚决反对实际执行的党的那条路线。这又是要的什么花招？怎么能把十一月全会的决议和中央的实际路线分开呢？党的路线、中央的路线就是中央委员会、各个省委和地方组织实际执行的那条路线。如果布哈林同志坚决反对这条实际执行的路线，那就是说，他不同意党的路线，他已经有了或者正在形成另一条路线，也就是我们党内右倾分子（弗鲁姆金同志等人）以放开农村资产阶级分子的手脚为方针的那条路线，而不可能是别的路线。因为二者必居其一，党的路线，中央的路线旨在限制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富农，全力帮助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大力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大力发展合作制——要么这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那布哈林同志及其同伙对中央的攻击就没有任何依据；要么这条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那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就会抓住另一条路线，来放松对资本主义分子的限制，放弃攻击富农，压缩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和全部资金来支援个体农户经济，包括富农经济。非彼即此，没有，也不可能第三条路线。这里有个危险，就是布哈林同志正在悄悄地靠近这第二条路线。

布哈林：我在哪儿悄悄地靠近呢？

斯大林：这第二条路线目前还不敢直接明确地提出。但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突然出现了所谓的“灭顶之灾”，这条路线就会被抛出来。这正是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的战略：现在对新政纲保持缄默，只限于做一些暗示，然后当危机出现时，就公开发言。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谈话”中就是这样对加米涅夫说的：“我能不能避开一段时间，——两个月不过问现行政策，等危机来临时，我再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发言”（见加米涅夫《笔记》）。

布哈林：那里说了——富农随便消灭多少都可以，但要同中农和解。

**斯大林:**说的不是消灭富农,而是说要限制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富农,尽力发展新的结合形式——通过合作化帮助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发展预购合同,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没有这些(指新的结合方式),就不可能解决粮食问题。

**布哈林:**对。

**斯大林:**这就是那一条具体的、实际执行的中央路线,而布哈林同志在发言和声明中却反对它。还能怎样从其他角度来理解布哈林同志的“军事封建剥削农民”和“破裂”等方面的攻击呢?因此,布哈林同志是不同意党的现有路线的。布哈林同志呼吁另一条路线,放开富农分子手脚的路线。

**布哈林:**你硬把这点强加于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斯大林。

**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等同志在这里发言说,存在着两条路线。

**布哈林:**波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也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吗?

**波隆斯基:**一条是拥护中央,另一条是反对中央。

**斯大林:**布哈林的心情倾向于辞职是因为他觉得中央没有执行它自己通过的那个决议,于是布哈林同志就认为,实际执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可这就是反对党的路线,反对中央。

**布哈林:**决议说到储备。我说过我们花钱不很节约,假如我们能节省一点,那就会好一些。这怎么是反列宁主义呢?

**斯大林:**没有,这里没有什么反列宁主义的地方。但是,辞职和破坏中央的决议并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这才是问题所在,布哈林同志。去年我们进口粮食并为此花费了4000万外汇。这是什么,是适量的消费还是过度的浪费?决议提出要积累外汇储备。我们正在积累,顺便说一句,并没有得到布哈林同志的任何帮助,而且一定会增加积累。这是好还是不好?粮食储备没有积累起来,是因为部分地方的歉收。那就让我们采取一切措施,不要浪费粮食。

**布哈林:**你为什么昧心地把富农路线扣在我们头上呢?

**斯大林:**如果你们没有另一条路线,那你们为什么要坚持辞职呢?为什么托姆斯基同志声明,在他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里面有两个中心?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声称,他的共产国际有两个中心?如果只有一条路线,而你们也没有和党的路线不同的另一条路线,那关于两个中心的说法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你们早在去年7月份就同加米涅夫谈到你们三个人可能要辞职?为什么你们在十一月全会之前,还没提出要把卡冈诺维奇同志补选人全苏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时候,就提交了三个人的辞职声明。如果只有一条路线,这些辞职从何而来呢?如果只有一条路线,我们之间没有分歧,那你们为什么跑去找加米涅夫同志,试图和他

们结成反对中央的同盟?这些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瓦解共产国际”的诬蔑之词从何而来?你们怎么能在发表这些诬蔑之词的同时又断言我们只有一条路线?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瓦解共产国际等等言论从头至尾都是谎言假话,布哈林和他的同伙必须放弃这些言论,并且放弃辞职的做法;或者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打算继续污蔑党,同时坚持辞职的做法——那么谈路线一致就是欺骗,对党直截了当的、不能容许的欺骗。

你们会问,出路何在?据我看,出路只有一个。会议必须坚决拒绝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辞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必须谴责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这种行为。

布哈林:却支持加里宁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斯大林:不,我并不建议支持加里宁同志的做法。我觉得,政治局委员里不会有人支持那种无助于巩固党内和平的行为。但我反对散布谣言,反对根据流言妄下结论,而轻信流言正是布哈林同志的一个特点。比如,昨天他说,政治保卫总局在监视他,没有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在场就不准他和作家帕纳伊特·伊斯特拉季谈话。我们大家都很愤怒并要求立即查清此事,如果布哈林同志所说属实,那就立即把罪犯开除出党。大家一致同意让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尽快查清此事。结果怎样呢?原来,布哈林同志说的与事实完全不符。纯属无稽之谈。

布哈林: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对于你是,对我可不是。

斯大林:我也怀疑,政治保卫总局是不是有人搞错了。但调查表明,这件事就是胡说八道。

伏罗希洛夫:布哈林的秘书把事情搞混了。

斯大林:这之后还要请大家相信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关于路线一致的言论。比如,李可夫同志今天在这里说,7月份政治局内部的事情比现在糟得多。可是7月份在为莫斯科积极分子会上做报告时他是怎么说的?当时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些都印在他的报告中)。应该相信哪个李可夫呢?是那个今天断定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李可夫,还是那个在7月份中央七月全会结束后承认“我们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李可夫呢?

所以,除了党的路线以外,还有一条旨在放开资本主义分子手脚的路线,除此之外不可能是别的路线。现在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倾向于这第二条路线。是粮食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的困境引起了这种动摇。我们这些亲爱的同志们想通过辞职来逃避困难,或者至少是推卸自己的责任,然后当出现危机时再来

攻击党。布哈林同志已经不是第一次表现出动摇了。列宁是正确的,他在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说到,布哈林有两大缺点:“1)轻信流言,2)在政治上极不坚定”(见列宁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1916年3—4月)。为了消除在我党最高层出现的动摇,须要坚定地至少采取以下两点措施:1)谴责布哈林攻击中央并企图和加米涅夫结成政治同盟的行为;2)拒绝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辞职,责成他们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所有决议。

#### 提议成立委员会及对委员会的指示

主席:同志们,可以结束讨论了吗?

缅仁斯基:我想请求发言。

主席:没人反对结束讨论吧?(通过)讨论结束。现在请提建议。

斯大林:必须成立一个委员会。

伏罗希洛夫:接受斯大林关于委员会的提议。

斯大林:指示委员会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拟定相关决议,有三个基本指示:第一,谴责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的行为;第二,就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声明对其错误给予政治评价;第三,拒绝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辞职。

李可夫:我有另一个建议:满足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调动工作的请求。

臧声:布哈林并没有这个要求。

主席:谁赞成斯大林同志的提议,请举手。谁赞成李可夫同志的提议?——三票。

李可夫:规定委员会的工作期限。

主席:委员会由谁组成?

布哈林:我能不能给斯大林提个问题?

主席:当然可以。

布哈林:我想问,你们通过的这个指示,是不是排除了我提的解决方法,还是不排除?

斯大林:我提议让布哈林进入委员会,他可以在那儿提出自己的建议。

布哈林:我请求不把我放进去。但如果你们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就像当初对付托洛茨基那样,那好吧,我就进去。

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同志,你应当问一下:有没有人弃权?

主席:有人弃权吗?一票(菲加特纳)。

托姆斯基:我的体力不能胜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所以我请求把我1月14日的声明分发给所有中央委员,如果这份决议要分发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那就把我的声明也发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也许我们现在只限于发给本次会议的成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托姆斯基:我同意。

主席:关于委员会的组成。我提议委员会由以下同志组成:斯大林、谢尔哥、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哈林。

伏罗希洛夫:我提议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哈林、莫洛托夫和谢尔哥。

斯大林:还要加上科罗特科夫,也许还应当有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

主席:也许,由这些人组成:斯大林、谢尔哥、布哈林、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基洛夫和科罗特科夫。

斯大林:还要加上莫洛托夫。

主席:建议再加上莫洛托夫。

布哈林:我声明,我确实不能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工作了。

主席:付表决。谁同意上述八人的名单?多数通过。由斯大林召集。有反对的吗?

斯大林:我建议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尔哥同志召集。

主席:谁同意由谢尔哥召集?多数。现在谈工作期限。

斯大林:一星期。

主席:有反对一星期期限的吗?没有。

斯大林:可不可以将布哈林的声明分发给本次会议的与会委员?

主席:将布哈林的声明分发给本次会议的与会委员。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038号案卷,第16—33张。原件。有斯大林批注的印刷文本。)

## 8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 1929 年 1 月 30 日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们,我简单说几句。我首先要回答布哈林,我对他是否信任。

**斯大林:**回答谁?

**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我说过,有了这份文件之后,让人很难信任他。我认为我有权这样说。他在这里说,谢尔哥要求每份文件都应当让他看,而对其他任何人都什么也不许提供等等。根本没有这回事。请原谅,说的不是这件事情,说的是带有政纲性质的文件,说的是其中讲到没有黄金,没有粮食,四五月份有饥荒,和农民破裂等等的文件。

**布哈林:**没有讲过和农民破裂。

**奥尔忠尼启则:**既然没有和农民破裂,这也没有,那也没有,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拿来呢?你前天不是说过:你想看吗,我回去把文件拿来。可是你回去了,却没有拿来。指的是你让加米涅夫和皮达可夫看的文件,皮达可夫回答你说:“没有黄金,这不值得嚷嚷。”

**布哈林:**这话他没有说过。当时真应当让他写一个书面证词。

**奥尔忠尼启则:**你说:让他写一个书面证词。可以这么做,可是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想搞那么多书面证词,可是你没有把这份文件拿来。

**布哈林:**我没有这个义务。

**奥尔忠尼启则:**你有这个义务,因为谈的是这份文件,而你说过可以把它拿来。

布哈林:要是我昨天去,我就拿来了,可是今天大家却说这是一份政纲。

奥尔忠尼启则:李可夫在这里说:布哈林在七月全会前出示的那份文件里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说他没有义务相信斯大林而不相信布哈林。据我看,没有必要这样提出问题。较简单的办法是把这份文件拿来,读一下,看究竟有没有这样或那样的话。

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说:谢尔哥做得不对,拿到这份文件后,没有找布哈林,而是找了加米涅夫,这是非同志式的做法。我认为我做得对。我得到这份令人大吃一惊的文件——加米涅夫的信后,我很自然地想问一问加米涅夫:这是不是你写的信。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本人很想知道,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无论如何不会对这份文件视而不见,而只是说,哎,看他们尽胡扯些什么。不行,请原谅,我不能这样做。即便我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我也不会对这份文件有另一种态度。托姆斯基说我应当用同志式的态度来处理——先问一问布哈林。可是我认为应当先问写信的人<sup>1</sup>。我应当问一问加米涅夫,这是不是你的信,如果是,那它怎么会落到托洛茨基分子手里的。我就是这样问他的。我认为,我这样做并不是什么犯罪,而是完全正确的。我在上次会议上说了我同加米涅夫谈了话。可是你为什么要说我不曾说过呢?我把事情的经过全都讲了。我简直感到吃惊的是,有人提到这份文件,而且想指责另外的什么人。这简直让我吃惊。写出这份文件是因为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了话。布哈林不能否认这一点。他说,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回事等等。加米涅夫可能在有些地方添油加醋,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能怪罪其他人,除了布哈林之外。另一个问题是他怎么会把它搞丢了。可是总不能因为他把同布哈林的谈话驮在自己的桌子上记下来,又寄给了季诺维也夫,我们就把他钉上十字架吧。我想,托姆斯基指责我在党的一致问题上鲁莽行事是没有道理的。可以指责我的只有一点,就是在我们同反对派的争吵中,我很顽固地竭尽全力防止破裂,可是我无论是对你、对李可夫,还是对党、对政治局、对全会都不曾隐瞒过。他们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份文件呢?因为他们没话可说,难怪布哈林今天不是来说明这份文件,却拿出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宣言。不过我们对这份文件注意得不够,当斯大林说他担心存在分歧时,我想,在这份文件里确实存在分歧。比如说,把党描绘成这种样子:“不讨论重大问题和缺点。全国都在为粮食和供应问题而折腾,而无产阶级的统治党的代表会议却默不作声。全国都感到同农民的关系不怎么好。可是我们党、无产阶级党的代表会议却默不作声。全国都看到,都感到国际形势有了变化。可是无产阶级党的代表会议却默不作声。然而关于倾向的决议却铺天盖地

(用词都完全一样)。然而关于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右倾等等的传闻却数不胜数。这是小里小气的政策,而不是在困难时期向工人阶级说明真实情况,相信群众,倾听并且感受群众的需要,同群众结成一体,开展工作的那种政策。”——既然是这样,那党还有什么价值呢?

下面谈谈组织路线。请看:“在这方面我们有两条路线”。而且“两条路线”是划了着重号的。

斯大林:怎么说的?

奥尔忠尼启则:“在这方面我们有两条路线”。

斯大林:两条路线?我过去没有听说过。

奥尔忠尼启则:是的,他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号召开展自我批评’的路线。这里什么都有:自我批评本身、党内民主、选举制等等。可是实际上我们在哪儿见过选举产生的省委书记呢?实际上官僚化的成分在我们党内增长了。实际上,比如说,仅仅因为在工会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对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投了反对票就被撤了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是党章容许的吗?这样一来自我批评变成了什么东西呢?既然对粮食的关心被(吃饱了的人们)宣布为庸俗风气,那还怎么能讨论经济问题呢。既然关心同农民结合的稳固性往往被说成是农民倾向,既然建议增加或者削减对某项事业的拨款被说成是反列宁主义。如此等等。谁还会就这些问题说话呢?正因如此,所以全党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可是只能‘私下’讨论,两三个人讨论,所以党员中间也形成了两层‘路线’:一层是‘为了心灵’,一层是‘为了自己’。出席会议、一致投票、通过官方的公式成了党的仪式上不可或缺的程式。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恰恰应当从这里开始,可是我们却在培植官僚主义。”

我要问布哈林,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用的词句吗?

缅仁斯基:这是从托洛茨基那里抄来的。

奥尔忠尼启则:只消拿出托洛茨基关于我们党说过的话来,你们就会看到两者非常相似。

托姆斯基说,应当为工作创造条件。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是托姆斯基建议怎样来创造这些条件呢?他要辞职。用这个办法是不能创造条件的。我坦率地告诉你:如果你辞职,那么那些和你一样投票的人,在你离开之后,就会通通被撤职。

李可夫:反正都是一样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今天还掌握在我们手里。如果托姆斯基继续工作,他就可



以说我们同自己的中央吵了一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纠纷,可是这并没有导致分裂。我们有委屈,不过让我们好歹容忍一下,我们继续工作吧。和自己的党最好是和解,而不是争吵。李可夫说,没有什么领袖是不可替代的。请你原谅,不过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当然,你说得对:既然在伊里奇去世后我们已经过了五年,那么很显然,即使没有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党和苏维埃政权也会存在下去。没有了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了党和十月革命的创造者、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没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党会继续他的事业。即使你们三个人中,或者是其他政治局委员中的某个人明天不在了,苏维埃政权也不会垮台,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假如苏维埃政权因此而垮台了,那就是对伊里奇最坏的判决。这是因为他创建了这样的党,它本来可以带领国家走出重重困难,可惜有的人却在这困难时刻逃离了战场。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李可夫的离去是削弱了党呢,还是加强了党;李可夫的离去是有助于克服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呢,还是加重了这些困难?任何一个人都会说,是削弱了党,是加重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斗争。对于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也应当这样说。你们都应当这样说:我们留下来,我们不辞职了,让我们大家一起工作吧。托姆斯基说,请你们停止“恶意攻击”,可是到那时“恶意攻击”自己就会停止的。然而假如你们还要坚持己见,而我们在代表会议上和其他工人集会上不得不一次次地解释你们为什么不工作,那就不管你们是什么打算,不出现“恶意攻击”是不可能的。的确,要向工人说明,为什么托姆斯基不打算服从政治局的决定。可以在工人集会上这样回答:请你们把托姆斯基本人找来问问。就算托姆斯基来了,而且声明,因为卡冈诺维奇被选进了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所以我不想工作。你们怎么看呢,难道这不须要拥护中央的人做出解释吗?这就又是“恶意攻击”了。列宁是用钢铁般的纪律来教育自己的党的。大家想必还记得,在本世纪之初孟什维克关于我们的纪律说过些什么?

**喊声:**专制制度的官僚主义!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老纪律今天也应当继续有效。托姆斯基同志,你想破坏它,不服从党的决定,同时又不会受到触动。

**托姆斯基:**做不到。

**奥尔忠尼启则:**我明白,你很困难,可是克服这个困难至少比起克服我们面临的那些困难来要容易得多。为此只稍稍牺牲一点自己的自尊心、自己的架子。布哈林说:请你们放了我吧。他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假如他明天就去《真理报》,认认真真地工作,那么全党就会轻松地长出一口气,而种种“恶意攻

击”也就会立即停止。假如他去共产国际开始工作,也会出现同样的事情。布哈林不去共产国际,不去《真理报》,却希望谁也不过问,谁也看不见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打算,既然你不去,那我们就只好“恶意攻击”了。“恶意攻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解释,可是不是解释说布哈林是一个优秀人物,他不工作是对的,而是说他做得很糟糕,不听中央的话。

关于党史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还要说一下。我要说我是尽了一切可能查清了这件事情。

**布哈林:**我没有说这些事。

**奥尔忠尼启则:**我非常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情,我要声明,布哈林同志错了。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5号全宗,27号目录,520号案卷,第15—19张。原件。打字稿。)

E. Ф. 罗兹米罗维奇  
1929年1月31日的信

29年2月1日

59份,分送:

杰索夫  
叶努基泽  
扎东斯基  
伊利英  
科科维欣  
科罗斯捷列夫  
科罗特科夫  
克里沃夫  
列别德  
林格尼克  
利西岑  
纳扎列强  
奥尔忠尼启则  
奥西莫夫  
帕斯图霍夫  
罗伊津曼

卡冈诺维奇  
帕夫卢诺夫斯基  
贡恰罗夫  
卡拉瓦耶夫  
罗森霍尔茨  
梅德韦杰夫  
谢尔古舍夫  
斯米多维奇  
瓦西里耶夫  
布哈林  
伏罗希洛夫  
加里宁  
古比雪夫  
莫洛托夫  
鲁祖塔克  
李可夫

|              |        |
|--------------|--------|
| 索尔茨          | 斯大林    |
| 菲加特纳         | 托姆斯基   |
| 什基里亚托夫       | 彼得罗夫斯基 |
| 雅科夫列夫        | 乌格拉诺夫  |
| 扬松           | 安德烈耶夫  |
| 雅罗斯拉夫斯基      | 基洛夫    |
| 彼得斯          | 米高扬    |
| 罗兹米罗维奇       | 卡冈诺维奇  |
| 戈尔茨曼         | 丘巴尔    |
| 拉杜斯-曾科维奇     | 柯秀尔    |
| 斯米尔诺夫, A. П. |        |

按照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吩咐,送上罗兹米罗维奇1929年1月31日的来信供你一阅。

托姆斯基同志昨天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声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讨论过撤销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的问题,我和另一位同志主张必须撤销。我认为必须重申昨天在托姆斯基同志发言时我的插话。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从未讨论过撤销托姆斯基同志职务的问题,而我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都不曾就这个问题讲过话。只是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通报工会代表大会党团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时,我和菲加特纳同志有过一次简短的私下谈话,我对他说,如果托姆斯基同党有重大的政治分歧,那他的去职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政治上也是正确的。

(准确的说法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从来不曾想到要为这样的事情汇报。)

菲加特纳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和昨天的联席会议上都利用了我私下的这个意见,以便在这个对我们党最为严重的问题上歪曲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作用。

为了制止继续诬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歪曲它的真正作用,我请求将我的声明分发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全体与会者。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35张。副本。)

## Н. И. 布哈林、А. И. 李可夫、 М. П. 托姆斯基 1929 年 2 月 9 日的声明

### 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

由于委员会根据仿佛是托洛茨基分子的讹诈性传单通过的决议试图破坏党的最高机构的三名成员——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誉，我们为了党的利益，认为必须对这个决议做出总的答复，因为它包含着许多我们只能称之为最粗暴地歪曲事实真相的论断。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份闻所未闻的文件做出答复。我们认为它是幕后策划的攻击的一个标本，这种攻击是几个月来一直在“非正式地”进行的、针对我们的有组织的、无原则的迫害的总结。委员会通过的这份文件无疑将成为旨在清除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新一轮“恶意攻击”的推动力。它必然会成为这种清除“工作”的工具。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它做出答复，既是为了澄清基本事实，也是为了我们在其中奋斗了几十年的党的利益。

#### 1. 虚假的指控是怎样策划的

首先我们必须谈谈事情的形式方面。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1 月 24 日完全出人意料地要求召开政治局闭门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到会议结束时才搞清楚了，原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已经就此询问过加米涅夫同志等等，对于这一切毫不知情的只有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

基同志。在下一政治局会议上(作为第一次会议的继续,查明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已经同加米涅夫同志、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皮达可夫同志谈过话,拿到了“另一个知情人”的信件,其中甚至告诉他“布哈林同志的政纲”。这个“知情人”的姓名,以及他的证词都不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出示过。还有:在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缺席(也不曾同他们两个人及托姆斯基同志讨论)的情况下,决定1月30日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不知道是谁,而且是完全任意地决定的:许多中央委员(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克利缅科同志、库利科夫同志等)没有出席(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本来是只要两秒钟就可以通知到的),也没有接到通知。会议的进程以及后来的进展简直就是在更大程度上对起码的工作准则的嘲弄。

会议开始时,布哈林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就党内情况进行同志式的讨论(议程是这样说的),还是为了审判;如果是为了审判,那么被告是谁(是他一个人还是三个人)等等;如果会议是法庭,那首先就必须检查据以进行审判的文件。这是伊里奇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因为文件,还有它的来源等等都很可疑。主持会议的鲁祖塔克同志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解释说,不存在什么法庭,也谈不到法庭,只是给业已形成的局面寻找出路的一次同志式的尝试。于是布哈林同志有保留地收回了检查文件的要求。然而,后来他们违反了自己的解释,实际上进行了审判,而且做出了谴责的决议,使用的却是谁也不知道的“另一个知情人”的证词等等。

还在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同志就被要求“如实地”,“真诚地”谈他自己的种种怀疑、政治思想的细微之处等等。他照顾了这个愿望,写出了他在1月30日会议上宣读的声明。结果怎样呢?他根据同志们的建议写的声明现在却被说成是他“宗派活动”的证明!

联席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中(为了展示“和解”)也包括布哈林同志。给了委员会一周时间。在整个星期中,不曾邀请布哈林同志参加任何活动。到了最后一天,就在委员会开会前几个小时,他才得到一份准备好的、长长的文件,说是决议的草案,甚至没有说明这份“草案”是谁起草的(从行文风格看,是斯大林同志写的)。所以,布哈林同志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委员会的活动,委员会是把他排除在外的。

可是在委员会还来不及开始工作,更不用说结束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所谓“通报情况”了:波波夫在鲍曼区,列昂诺夫同志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各支部书记,然后是区委积极分子),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哈莫夫尼克区,在

共产主义科学院等等地方。谁决定“通报情况”问题呢？是谁给波波夫同志、列昂诺夫同志等人发的指令，让他们“开始”的呢？看来，是某人，在某个地方，背着正式的机构决定的！我们且不说这些动作的令人气愤之处，且不说它动摇了领导。受到根据讹诈性的传单展开的新一轮攻击危害的当然不仅是我们，而且是我们全党。“攻击者”竭尽全力扩散“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令党的所有敌人兴高采烈。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之外，这份传单的内容在国外广为流传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大家知道，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是确有其事（参见布哈林同志的声明）。可是传单对谈话的叙述却是虚假的，有严重歪曲。根据传单做出的结论（关于“结盟”、关于宗派活动、关于另一条政治路线等等）自然是百分之百的虚假。对于托洛茨基分子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这张传单的性质表明它早就写成了，这让人产生了重大疑问。在联席会议上，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缅仁斯基同志声称，这张传单给人的印象是“早已备好，以供不时之需的”。看来，他使用“供不时之需”这样的词是为了解释这张传单本身，以及它的出笼经过：在什么地方印制，是什么组织或是一群人印制等等至今都不清楚这样的怪事。可是却根据这张传单掀起了把一些同志清除出政治局的运动。的确，这张传单真是“供不时之需”了！

因此，这件事的形式方面是极严重地违反了党内处理问题的基本规则，而这张可疑传单的整个事件也就是一个德雷福斯案件。

## 2. “和加米涅夫结盟”的谎言 和“派别活动”的谎言

决议草案的第一节“布哈林同志企图秘密组织反对中央的派别联盟”中发明了为决议起草者的目的所必需的主要“事实”。

1) 断定布哈林同志似乎“就改变中央的政策和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构成进行了派别谈判”。我们只能认为这是粗暴地歪曲真实情况。它既遭到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绝对否认，也遭到布哈林同志最坚决地否认。因此，决议的起草者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自己的判决的呢？是根据他自己败坏我们声誉的意图。如此而已。

2) 其次，断定似乎布哈林同志“进行谈判”，“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即便不同意，也是知情的”。我们只能认为这是粗暴地歪曲真实情况。决议的起

草者发明了“谈判”。布哈林同志已经声明,他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不是谈判),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并不知道,他是在事后才告诉他们的。可是必须发明我们的“宗派性”,于是它就被发明了。

3)还断定谈话的目的(“商议”“改变政策”,“更换政治局成员”,“从而论证布哈林同志等人必须和加米涅夫同志集团组织宗派同盟”)。我们只能认为这是粗暴地歪曲真实情况。这也是决议起草者的发明。

4)还断定“派别谈判”(这是斯大林同志对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的说法)“是在政治局……\*正在草拟中央委员会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关于政治局内没有分歧的宣言的时候进行的”。这简直就是粗暴的歪曲事实。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是在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会要晚得多,是在7月17日。而宣读宣言比代表大会开会还更晚一些,是在7月31日。这已经不是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的时候了,而是斯大林同志签署了关于一致的声明之后,为了《真理报》编辑部的进一步一致而大肆攻击,而他的伙伴们在代表大会的走廊里宣布布哈林同志是最危险的人物的时候了。仅仅因为主持代表大会的工作大部分都落在布哈林同志身上,也因为要把代表大会开完,以免贻笑全世界,布哈林同志才没有立即提出辞职(虽然他曾经在代表大会开始以前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斯大林同志)。虽然由于对布哈林同志展开的密谋攻击而在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不堪忍受的环境,布哈林同志自己还是要求通过相应的宣言,作为代表大会继续工作和结束大会的起码条件。顺便说说,这个宣言被斯大林同志擅自扣押了,直到在《真理报》编委会内进行了清洗。现在,根据这些冠冕堂皇的断言,建议把我们搞臭,而且是从原则上,是从循规蹈矩的角度。这真叫做:马基雅弗利的桂冠让有些人难以入眠。

### 3. 关于斯大林同志宣布的“贡赋”的口号

第二节是“布哈林同志的派别活动向哪里发展”——连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样的文章,以及托姆斯基同志的辞职等等也都被归入了派别活动。这些骇人听闻的“结论”还伴有一些奸诈虚假的论断,仿佛布哈林同志赞同弗鲁姆金同志的立场。这种攻击是为了帮助斯大林同志摆脱他由于宣布而且预告了向农民征收“贡赋”的理论而陷入的尴尬境地。

\* 原文如此。——编者注



首先就应当指出,决议草案一再把斯大林同志和党并列在一起,认为两者价值相等,或者干脆就用中央委员会代替斯大林同志,用斯大林同志代替中央委员会。根据这种“混淆”指责布哈林同志“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整个党都不曾宣布过“贡赋”理论,是斯大林同志宣布了这个理论,而又不想承认自己错了。早在几年以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就提出一种理论,把殖民地和资本家的关系比做农民和我们的关系。按他的意见,“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就在于从农民身上获取(按技术上的可能性获取),就像帝国主义者从殖民地获取一样。当时布哈林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详尽地回答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而全党和所有反对托洛茨基的人都是同意这篇文章的。后来斯大林同志本人就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我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把农户和‘殖民地’等同起来,并试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看成是剥削关系,——他这样做就破坏了,试图破坏(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工业化的微弱可能性的基础。

我可以肯定,这种政策和党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党的政策是把工业化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经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11月1—3日。参见:《论反对派》,第369页)

而现在,在七月全会上,他却重复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论据:“这不是政策,而是抽取!”

斯大林同志的错误正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错误一样,并不在于简单地声称农民要“多付一些钱”(这可能还要继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应当按照列宁的直接指示,尽一切努力迅速消灭这种状况)。

这个错误在于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关系做了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这就必然导致课税过重的实践,而破坏了工农联盟的基础。贡赋是剥削者经济的范畴。如果农民支付贡赋,这就是说,农民是进贡的人,是被剥削和受压迫的人,就是说,从国家的观点来看,他不是公民,而是臣民。能不能把农民参与建设工业说成是“贡赋”呢?这是胡说八道,没有文化,而且政治上是危险的。既然把中农看成进贡的人,那又怎么能和他结成联盟呢?既然从“贡赋”的理论出发,那又怎么能认真安排什么结合呢?既然是从贡赋的观点看问题,那当然用不着关心课税的分寸、对农村的供应等等了。大家知道,列宁不认为我们应当向农民收取贡赋,他说的是向农民“借债”、“借钱”,强调我们必须“按期票付钱”。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

“我们迄今为止都在写政纲,做承诺……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工作规定一种严厉的检查制度,而不是那种通过由同一些共产党员建立起来的检查机构进行的检查。现在需要的不是这种检查,而是从大规模经济的角度进行的那种检查。资本家善于安排供应。他干得很糟糕,他是用强盗的办法行事的,他掠夺我们,欺侮我们……然而资本家还是善于供应的,可是你们会供应吗?……这就是去年农民,而通过农民还有许多工人阶层对共产党提出的最简单、最致命的批评。必须有名副其实的检查。(记录,第30页)农民懂得市场,也懂得贸易。我们不能实施单纯的共产主义分配……我们应当通过市场来提供,但是做得不能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是不能容忍这种管理的。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记录,第55页)

“我们的目的是恢复结合,用事实向农民证明,我们从他能够理解的、他熟悉的、在他现时的贫困状态下力所能及的地方开始,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梦幻般的地方开始;证明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证明共产党人在破了产的、贫困的、饱受饥馑折磨的小农处境艰难的时候是在认真地帮助他们。要么是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要么是农民把我们一脚踢开。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记录,第28—29页)农民向我们提供贷款。可是这种贷款不是取之不尽的,这一点必须明确,所以拿到贷款后就应当快马加鞭。应当清楚,小农国家不能为我们继续提供贷款,小农国家,借用一个商业术语,要求现金支付的时刻正在日益逼近……我们逃不脱的这场考试正在到来,它最终将决定新经济政策和共产党政权在俄罗斯的命运。”

列宁是这样看的,全党也是这样看的。可是这完全不同于“贡赋”一词所表达的内涵。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用“贡赋”去代替列宁的“结合”呢?既然你不打算改变关系的内容,那又何必更动已有的表述法,而采用适合完全不同的其他关系的另一种表述呢?改变表述我们同农民关系的公式特别危险,因为我们前不久还采用过非常措施,所以“贡赋”理论很容易被理解为要在意识形态上把这些措施固定下来。斯大林同志只是“深化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见解。他不仅把农民等同于殖民地,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同于剥削者类型的关系,而且采取了最残酷的剥削形式(“贡赋”)。斯大林同志(不是党,也不是中央)爬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观点一边。

说布哈林同志在全会上放过了“贡赋”是不对的。布哈林同志在七月全会上向莫洛托夫同志声明自己不同意“贡赋”的提纲。布哈林同志在同一次全会上发言时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规律”(“速记记录”,第116页)他没有

激化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和其他同志没有这样做一样,是出于保持一致的考虑,知道斯大林同志会怎样对待针对自己的任何批评。托姆斯基同志公开反对贡赋理论。在全会速记记录中,托姆斯基同志的讲话有这样一段:

“当然,建设的重担落在所有劳动者的肩头,落在工人阶级的肩头,落在农民的肩头。可是我不能因此而建议做出冒险的结论,至少我认为,如果我们说中农和工人为恢复工业和改造工业要付出贡赋,这是一个危险的说法。”(《七月全会速记记录》,第2卷,第138页)

提出的决议草案不仅没有谴责贡赋理论,而且把它强行塞进来作为党的决议,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批准这个理论。这是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同意的。

不足为怪的是既然有了这一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就讲到和“斯大林分子”悄悄地联盟,而托洛茨基则要求把我们开除出政治局。

#### 4. 克鲁敏同志和向农户进攻的口号

爬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在十一月全会上,以及全会之后也有所反映。大家知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除了“技术上可行的”对农民课税、“殖民地”等等之外,还发挥了和他的整个方针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思想。他把苏联经济不是分成五种成分,也不是三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以及与之对应的1)富农和耐普曼,即资产阶级、2)劳动农民、3)无产阶级),而是分成两种(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定必须把农民经济排挤出去,“吞噬掉”。列宁主义者向他指出,把资本家和劳动农民、简单商品生产者混为一谈是不能容许的。列宁主义者断言,提出把农民经济“吞噬掉”(在国营经济的挤压下使其破产)的理论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不懂得结合的学说,不明白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列宁主义者说过,对于小农经济和小小农经济无产阶级执行的不是“排挤”政策,也不是“吞噬”、“破产”政策,而是在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中提高它的政策。

中央十一月全会着重指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促进个体农民(贫农和中农)经济。可是在阐述、解释和评价全会的决议时,这项任务几乎消失了。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是《经济生活》。在《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联共(布)中央全会总结)》这篇社论里,这张报纸说:

“……提醒一下被他们遗忘了的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是没有害处的。”

“哪种形式占上风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无产阶级掌握的经济命脉一方面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另一方面向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小农和小小农生产进攻的速度问题。”(《经济生活》,11月25日,第274期)

整篇文章里每句话都是至理名言。资产阶级(耐普曼)消失了,这显然也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断定农民自己就会甩掉无产阶级,而列宁的“基本原理”却教导我们农民同耐普曼结合(城市领导农村)的危险性。散布对农民本身的恐惧,虽然列宁坦率地写道:

“大生产状况的任何改善、把若干大工厂投入生产的可能性就足以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以至无须害怕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甚至是不断增长的自发势力。应当害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增长。应当害怕的是贫困状态、食品不足继续的时间过长,以至无产阶级无能为力,不能抵抗小资产阶级动摇的自发势力。在食品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的任何发展都不再是缺点,因为它使大工业得以发展。”(参见:第18卷,第1册,第154—155页。)

(顺便说说,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引用了这段话,可是增加了下面这一段:)

“反对派的同志们是否会明白,对农村中的分化和私人资本感到惊惶失措的背后就是不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胜利地进行呢?”

不过在《经济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师提出的公式面前,也就是在向资本主义成分和向小农及小小农生产进攻的公式面前,所有这一切都黯然失色了。

原来“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在于向资本进攻的同时,还应当向小小农,即贫农进攻。即便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没有说出这样的丑话来。文章没有署名。它是编辑部写的。编辑的署名是克鲁敏,就是那个被安排在《真理报》监督布哈林的人。

不难理解,执行“贡献”和“向小农和小小农生产进攻”的方针,这种生产就不能健康发展;可是那样一来就不会有粮食,也不会有工农联盟了。

## 5. 关于经济政策和它的实际执行

如实反映情况,研究并严格检查事实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和正确领导的必要前提。遗憾的是决议草案回避了一些严重的事实,又粉饰了另一些事实。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的基本事实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二年,社会主义建设

总的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条件下,我们实行了凭证供应粮食的制度,许多地方出现了半饥馑状态、原料不足、工业品奇缺、通货膨胀的苗头、黄金外汇储备形势严峻。

而且不能不指出同时存在的客观事实:由于许多条件,我们不得不离开正确政策的轨道。的确,在托洛茨基分子最终离开党以前,我们同他们争论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哪些呢?

是下面这些问题:

- 1) 由于实施工业化而向农民课税的问题;
- 2) 关于工业品价格问题;
- 3) 关于我国卢布的价值和通货膨胀问题。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都有脱离正确立场的危险。

向农民课税的问题并不像决议草案说的那样。去年谈的是增加有产阶层(富农、富裕中农)的纳税负担。而实际上却对中农的课税太重了(就是说,事实,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说法,“发生了”)。

工业品的价格问题处理得很不成功。如果说早先政策的轴心是不断降价的政策,那现在实际上实行的却是要么稳定价格,要么提高价格的政策。

至于我国的货币,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通货膨胀计划相反,我们先前是关注稳定币值的,然而现在我们明显地看到通货膨胀的迹象。

我国的工业建设和非工业建设等等近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黄金和发行货币来支持的,而农业生产和谷物生产并没有发展。今年越冬作物的播种面积在全苏联减少了4%是很严峻的现象。不是别人,而正是斯大林同志在他做的七月全会的总结报告(在列宁格勒)中说:

“到没有结合的时候,农民就丧失了对明天的信心,他就只顾自己了,不再相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了,他就开始减少自己的播种面积,至少是不肯冒险去扩大播种面积,担心又会来挨家挨户搜查等,夺走他的粮食。”

从1月份开始,粮食采购工作的进展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决议草案对这个问题讲的完全不是真实情况。如果没有“小农和小小农”个人的经济利益做基础,哪怕是最广泛的运动(农业技术的)也不会带来必需的结果。

虽然有十一月全会的决议,这方面的工作却做得很少,因为在十一月全会以前,谈论个体经济总的说来是被认为不体面的。

只是到了现在,虽然莫斯科的报刊在十一月全会之后发表了一些有害的社论,但在对待中农方面有了一些松动。这种松动应当巩固下来,而且径直贯彻到

最基层去,同时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切实抛弃加里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建议中提出的对待富农的路线(加里宁和米高扬关于富农新增加的播种面积免于纳税的建议已经政治局的委员会通过并提交政治局审议,和米高扬同志当时提交政治局十一月全会的委员会讨论的、给予向合作社交售粮食的富农提供优惠的建议)。责备我们对集体农庄运动估计不足是愚蠢的:不是由于集体农庄的发展,而是尽管有了这种发展,我国依然经历着粮食紧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农村政策近几年来的一切成就统统,而且仅仅同集体农庄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那么粮食匮乏的情况还会更严重,尽管对于集体农庄运动无疑应当大力支持。简单的算术计算告诉我们,几年之内它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可能成为我们粮食的主要来源。主要来源在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农民的个体经济。但是前面引用的《经济生活》的社论表明,对农民个体经济已经忽视到了极点,报纸谈到要在经济上向小农和小小农个体经济展开进攻。其他报纸大体上也是这样“阐释”这个问题的。“解释”十一月全会决议的调子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了。这样来评价党的决议会对实践产生什么影响?例如,这从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的、说明春播准备工作进度的报告(今年2月2日)就可以看出来。报告说:

“在宣传贫农在农村中的作用和价值时,中农问题提得十分模糊。中农和关注个体经济的问题都消失了。”

总而言之,这个调门是这样形成的。大家知道,全会之前是在委员会里为决议而斗争。我们受到指责,说我们对农业形势的估计过于阴暗了:为通过必须刺激个体农民的个人利益的公式等等,我们坚持了很久。因此决议的文本是某种妥协的产物,在情况复杂,而一时又找不到现成的解决办法时,这本来不是坏事情,甚至还是必然的结果。可是解释决议却仅仅涉及了它的一半。由此就把决议说成是折衷主义的;这样的评价在全会上,后来又在全会之后的各种会议上被公开地传达给染上了左派幼稚病的人。说明的不是中央在全会上正式通过的东西,而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而这种片面性的后果就必然给实际工作带来危害。

这种种事实并不是说明“中央错了”。委员会的文件断言,提纲说“中央决定是一回事,而实际执行的是另一回事”仿佛就是不承认党的路线。这当然是很糟糕的诡辩术,这简直就是胡说。既然《经济生活》报谈到向农民经济进攻,那就是错误地“贯彻”中央的决定。既然许多报纸都唱一样的调子,那就是歪曲地“贯彻”中央的正式决定。既然有人在大力鼓吹“贡献”,那就不是贯彻中央的决定。难道今天连这样的意见也不准提吗?

决议草案断定,布哈林(显然还包括我们几个人一起)“滚到弗鲁姆金同志

的立场上”，指望“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等等。这个论断也同这份文件中俯拾即是谎言一样，完全是凭空捏造。

说布哈林似乎认为“我国的外汇状况已经无可挽回”，也是撒谎。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讲过什么无可挽回的话。说的只是黄金储备的使用缺乏远见，没有精打细算，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危险。这里再好不过地表现了决议作者的诡辩术。党通过历次代表大会，其中也包括最近的一次大会，做出了关于储备的决议。这些指令没有得到贯彻。我们认为必须更加注意这些决议，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加以贯彻，把切实贯彻这些决议列入所有起决定性作用的机构的工作计划中。可是按照决议草案的说法，我们要求贯彻党在这方面的决议的意图却被看成是不同意党的路线。

我们没有人打算对鲁祖塔克同志的桂冠提出质疑。我们只不过想确认这样一些事实：十五大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是布哈林和李可夫起草的；在十一月全会上关于储备问题是李可夫同志在报告里提出的，布哈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还谈到黄金）；《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突出地提出了储备问题。这就足够了。我们根本不想降低工业化的速度。相反，我们希望工业化有最快的速度——牢靠而持久的速度。可是我们认为，指望“贡赋”是搞不成工业化的；工业化不能建立在花光我们全部资金的基础上；工业化必须以提高贫农和中农经济和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我们认为，只有拥有健全的农业、健全的外汇储备和良好的物资储备，我们才能够迅速前进，而且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能够保证战胜外部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沿着社会主义在城市和乡村都取得胜利的道路上前进。

因此把另一条错误路线强加在我们头上是粗暴的捏造。我们是在为彻底贯彻党的正式决议而奋斗。只有这样贯彻（而不是片面地歪曲路线）才能够避免导致沉重的经济后果的错误。

## 6. 关于官僚主义和党内民主

委员会的文件极其猛烈地攻击了布哈林同志关于党内官僚主义化的声明。文件引用了列宁同志写的、反对空谈官僚主义的小册子。文件指责布哈林（同时也就是指责赞同他的李可夫），说他“重复”了托洛茨基的说法。所有这些优秀的论据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运用于中央关于自我批评的“号召书”。如果一些同志认为，“号召书”已经过时，应当停止自我批评，我们党内的官僚主义根本没

有那么严重,等等,那么这些话应当公开地说出来。但是我们不同意取消“号召书”。正如我们不同意实际上取消党章赋予党员的那些党内权利一样。比如说,在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对于投票请求重新考虑中央决定的那些人以撤职相威胁。托姆斯基同志在向中央委员发表的声明中就这个问题写道:

“党章规定,如果党委会和党团在后者职权范围内的某个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党委会必须会同党团的代表再次审查这个问题并做出最后决定,由党团立即执行。(联共(布)党章,第2章,第95节)

党章这一节提出的权利,以及使用这种权利现在却被认为是反党行为。甚至党和工会的普通干部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必须重新考虑政治局的决定,都不仅受到谴责,而且被撤销了工会的职务。如果说关于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该组织的党团成员)根据党章的上述条文是否有权在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特殊意见还可以争论的话,那么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拥有这样的权利就是无须争论的了。可是他们在党团会议上受到威胁,说他们以后还要同省委打交道。中央书记处没有向政治局报告就召集了许多省委书记,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似乎任何一个有特殊见解的人都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明目张胆地违反党章和党内基本民主的行为,在代表大会之后成了一些同志(不是中央委员)“被撤职”和另一些人遭到“恶意攻击”的方针。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自我批评,因此难怪有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没有出席党团会议。”

莫斯科的党组织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撤掉了许多工人出身的老党员。各个支部普遍推行了审问制度,把所有对现状不满的可疑人物都登记在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认真地讨论任何重大问题等等。

文件暗示,“党内的多数”不同意我们“惊慌失措”的“纲领”(!)和“提纲”(!!!)。这是很不光彩的。是什么样的“纲领”呢?是什么样的“提纲”呢?“党内的多数”又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些“纲领”和“提纲”的呢?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为的是放出“纲领”和“提纲”的谎言,让自己用以证明存在“派别活动”。

委员会的文件虚假地引证民主,指责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反对“政治委员”、“党内的封建主义”,反对“中央机关对他们的日常工作进行任何检查”的“嚎叫”。

说到检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反对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检查。可是问



题在于这种检查的形式。文件第一次讲到了“实行”“政治委员”的目的。原来,安排克鲁敏同志和萨韦利耶夫同志是为了以“中央机关”的名义每天“检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的活动;安排卡冈诺维奇同志是为了每天“检查”托姆斯基同志的活动等等。这么一来,和党原先的结构相比,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原先是责任编辑以中央的名义检查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而由他本人向中央负责;现在则是被安排以中央的名义对他进行监督的工作人员每天对他进行检查(尽管中央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卡冈诺维奇以中央的名义检查托姆斯基同志,而托姆斯基同志却无权“检查”卡冈诺维奇,因为他不是被安排来干这件事的。

委员会的文件宣布的党内这种新结构的秘密何在?

答案要从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中去寻找。文件断言我们中似乎有人想搞“封建王国”,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可是我们主张集体领导。我们反对个人决定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反对用个人,哪怕是权威人士的监督来取代集体的监督。

斯大林同志玩弄191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来丑化布哈林。可是斯大林同志枉费心机,故意不提列宁很久以后,在1923年写下的既涉及被斯大林指责为不正派的布哈林,又涉及斯大林本人的那些话。

关于布哈林,列宁是这样说的: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加着重符号的地方是谈布哈林的个人品质。

关于斯大林同志列宁同志是这样说的: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当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这个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从写下这些文字以来,“无限的权力”变得更加“无限”了,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比如说,尽管党的十五大通过了决议,却至今没有公布列宁的遗嘱(除了分发给代表们的大会简报之外),也没有公布同一时期的其他文件。

这完全不是说,我们要求斯大林离开这个职位等等,虽然有人想把这种要求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是想,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提出的忠告(非常英明的忠告),而不要脱离领导的集体性。我们认为,可以而且应当纠正斯大林同志,正如纠正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一样,但不至于因此而冒变成“党的敌人”的风险。为政治局委员的工作保证类似的起码条件——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

我们对揪住布哈林的老账,进行个人攻击不予理睬。假如我们也来讲述斯大林的种种错误(我们出于爱护他的威信,把这些错误掩盖起来了),那我们就会走得太远了。就让文件作者的良心来评判他所采用的那些手法吧。

## 7. 关于共产国际的领导

委员会的文件对这方面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同志声明他承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只不过是为人眼目所必需的一块遮羞布,因为他只是在不得罪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盖默之流、埃韦特之流和格哈特之流、洪别尔-德罗之流和谢拉之流的条件下承认这个决议。但是不得罪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而且首先是他们妨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共产国际各个支部中孤立右倾分子并战胜调和分子。”文件作者(还有委员会)

对于所谈论的事情茫然无知简直让人吃惊。

对于这样的论据只能表示惊奇。的确,照这么说,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妨碍了共产国际孤立右派”。可是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右派。而且他们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和联共党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按文件的说法,洪别尔-德罗和谢拉(共产国际主席团和政治书记处成员)处于和被联共党和共产国际开除的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相同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对埃韦特同志、德罗同志和谢拉同志的政治观点做出怎样的评价,在联共党(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正式文件的草案把他们和被共产国际开除的人相等对待时,不能不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政治上的失策。

这几点意见就足以表明,这份文件是多么漫不经心地对待为我们的运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同志。

布哈林没有什么“遮羞布”。他一再声明过(包括1月30日的文件在内),他赞成消灭右倾派别或是他们的特殊政党等等。可是他同时又赞成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不是大喊大叫;主张把组织结论作为最后的明智之举,而不是最早的英明措施;主张不仅贯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这一半(关于纪律、同右倾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等等),而且贯彻另一半(关于党内民主、党的领导的团结、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等等)。这些问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至整个共产国际政策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应当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和右的倾向。可是必须把每一个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为争取每个工人而奋斗。既然现在汉堡起义的组织者、五金工人施赖纳跟右派走了,既然在全德国都很知名的访问苏联代表团的组织者、工人济维尔特跟着他们走了,既然好几百这样的工人都跟着他们走了,这总是我们的损失。应当说服他们,向他们证明,同他们争论,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可是却简单地封住了他们的嘴,甚至不听一听他们的解释就把他们抛弃了。

列宁一再告诫我们要反对机械地采用现成的公式,反对不考虑每个国家运动的特色等等。列宁甚至嘲笑过把克服各种倾向的斗争变成“体育运动”。列宁善于拿出论据,进行说服,而不是回答外国同志(像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回答洪别尔-德罗那样)说:“就让他见鬼去吧!”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须要认真地研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开展有广泛论证的党内争论。例如,不经过最认真地研究许多实际问题,不写出有说服力的、严肃的宣传材料,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中生动的实例证明社会民主党倾向的实质和危害,要想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摆脱非常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倾向是不可能的。可是没有做这样的工

作。却宁愿立即采取开除的“激烈”办法，而不去为争取每一个工人而奋斗。这才是不正确的、不对的、政治上不合适的、无助于在共产国际周围集聚力量，却分散这些力量的做法。

## 8. 关于组织方面的“恶意攻击”和被迫辞职

委员会的文件中说：

“第一，……既然布哈林同志发表了完全错误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而党员们批评了这篇文章，认为它是影射攻击中央，既然布哈林同志要求取消对最富裕的富农个别课税，不接受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主义分子加强了反抗的提纲，而党员们批评了布哈林同志的这类观点，认为它们出自布哈林同志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既然布哈林同志顽固地拒绝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工作，而党员们认为对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行为绝对不能赞同，既然托姆斯基同志顽固地拒绝服从中央关于他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决定，而党员们认为托姆斯基同志的这种行为等于捣乱……要求党员在会上不给报告人递条子，要求报告人不答复这些一再提出的质询，那倒是咄咄怪事了。”

那么党内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如下的声明：

1) 没有人想过要“指责党”搞了“恶意攻击”和“组织包围”。决不能把党和个别人混为一谈。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们已经举了例子：就可疑文件进行的恶意攻击在委员会开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没有一个党组织会决定开始这种攻击。可是个别人无疑发出了这样的指令。

2) 没有人（没有一个党组织）能决定布哈林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完全错误的”。政治局的决议中说，这篇文章“有许多有争议的观点”。不知是谁全权委托决议草案的作者不经讨论就把“有争议的”变成了“完全错误的”。

3) 关于个别征税的声明纯属捏造。文件断言，布哈林同志（而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同志是完全同意李可夫同志的）反对对富农的最富裕部分实行个别征税。文件隐瞒了我们主张对富农征收附加税的额度比个别征税还要大一些，不过不是按个别人物的独断专行，而是作为法律，也就是说，实际上不是主张减少，而是主张增加对富农的课税，不过是有组织的，而不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容许种种滥用职权的征收。而且布哈林同志为了正确实施这种附加税的征收，建议在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参与下，按不同地区分别规定富农的标准。

4)“恶意攻击”和辞职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像文件中说的那样。对布哈林同志最尖锐的一波攻击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展开的,而当时他正夜以继日地在工作。对李可夫同志的攻击开始得还要早一些。等等。

5)至于递条子和做出回答,我们不仅反对禁止递条子和做出回答,而且认为如果一些人“通报信息”,高谈阔论,而另一些人只是听着,再递递条子,那对于实现党内民主是绝对不够的。我们主张所有的党员都可以讲话,而且每个人都能够为提出的问题负责。

6)既然谁也不能制止“恶意攻击”,那么委员会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建议至少是让人感到奇怪的:你收回1月30日的声明和辞呈,我们则取消联席会议的速记记录,停止攻击。这样一来就揭穿了攻击的内部机制。

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在十一月全会之前提出辞呈是因为攻击波、败坏名声的活动和组织包围在11月以前再次达到了高潮。

我们为什么提出辞职?因为我们不希望搞党内斗争、争论,什么小集团、党的震撼。我们宁愿为了党内和平而牺牲自己,我们放弃了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奋斗。我们不想用反击来回答“恶意攻击”。没有任何其他的和平途径——这是要请大家理解的。全会之前,在委员会里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特别坚持要安抚中农,从而达成了一致的决议,于是我们取消了辞职的请求。可是经验证明,反对我们的斗争还在继续:工会事件表明,对托姆斯基同志打算采取对待乌格拉诺夫同志那样的办法(虽然在总路线方面没有分歧),再度掀起了攻击波,在这样的环境里简直没法生活。因此再度提出辞职。要不是由于困难极端尖锐化的氛围中李可夫同志工作岗位的特点,他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一再建议,辞职可以采用任何外部形式。如果给他分配另一个工作,布哈林同志甚至同意根本不提“辞职”这个字眼。

文件说我们逃避困难,这样说简直是愚蠢。我们并没有请求辞去政治局的工作,而政治局正是客观困难表现得最尖锐,而每个成员都承担着最重大的责任。我们同意从事其他任何工作。我们请求解除我们在现时条件下实际上不可能进行工作、绝对无效而徒有虚名的职位。既然在所有的党内都给布哈林同志散布了那么多流言蜚语,那他还怎么能领导共产国际呢?因为这就是说,他要在共产国际内同许多俄国同志坐在一起,他要回到他以前担任的职位上。几乎整个机构,还有最重要的各个支部的很大一部分代表由于过去发生的一切都认为他是某种倾向分子,可是现在却要他去“领导”。这简直是荒唐至极!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布哈林同志去了共产国际,那他也只是侧身其间,而不是政治上的

存在。为扮演这样的角色,只需要找一个木头人就行了。既然克鲁敏同志等人每天都在检查他的工作(按照委员会文件的说法),“以中央机关的名义”教给他像前面列举的那些“列宁主义入门知识”,而整个机构都认为,克鲁敏同志就是中央委员会,而布哈林同志是被监督对象,那叫布哈林同志怎么去“领导”《真理报》?既然有人仅仅因为赞同托姆斯基同志的意见就被撤了职,那托姆斯基同志怎么还能在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呢?和他商量工作,听取他的建议和指示等等,这不就是“下台”(为了民主)吗?

既然有了委员会的这份文件,再坚持要求到《真理报》、共产国际、工会中央理事会去工作岂不是显得特别可笑和虚伪吗?为了党的利益,应当寻求别的途径。

\* \* \*

现在全国都在经历非常困难的时刻。最近几个月内,困难(首先是粮食战线的困难)极有可能会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在一致工作、政策正确、纠正对政策的曲解的情况下,可以很顺利地摆脱困境。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农问题。改革农业税、向农村供应机械的措施、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农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样做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经济政策方面存在过的一些分歧。因此上面讲到那些分歧(不是和决议的分歧,和决议没有什么分歧)很有可能就属于历史了。何况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所有同志都本来应当和谐一致地工作。何况这种工作本来应当是卓有成效的。可惜这种工作由于采用的组织方法(攻击、包围、败坏名声、怀疑、组织结论等等)而受到严重妨碍。此外,政治局的工作现在由于托姆斯基同志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处境和布哈林同志在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处境而变得更加复杂了。正因如此,我们才请求中央委员会(还要请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满足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解除他们一些工作的请求,因为他们,完全客观地说,没法工作下去。应当提供另外的机会,让他们把精力用在其他地方,同时提高他们和政治局全体同志和谐工作的力度。应当消除关于共产国际、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等等问题,因为它们会成为经常争论的题目。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离开工作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他们在那里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要他们经受各种区里的、市里的、社会的等等攻击而不予回答,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然而他们却这样做了,为的是维护党内和平。我们完全不想使关系紧张化。我们深信,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最好离开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工作,却使得政治局内的关系毫无必要地变得紧张的那些部门。我们希望工作。我们认

为,我们能有助于克服困难。我们认为,利用困难搞什么投机取巧简直就是犯罪。可是我们希望给我们提供走出业已形成的局面的最佳出路,这就是我们向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请求。

委员会的决议使问题极端复杂化了。它的方针是切除。这个决议是一份打歼灭战的文件,如此而已。因此,在我们看来,通过这个决议就必然是导致开除我们和彻底破坏真正的集体领导的举动。

*H. 布哈林*

*A. 李可夫*

*M. 托姆斯基*

*1929年2月9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56—85张。副本。)

## 11

##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 1929 年 2 月 9 日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们，我就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简单说几句。我们在委员会里就我们怎么办的问题讨论了很久，应当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决议草案呢？而且在我们交换意见时，我们觉得，布哈林同志认为他去找加米涅夫，同他进行了大家已经知道了的谈话，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我们还感到，他也不坚持自己指责党似乎对农民执行贡赋政策，也不坚持指责党在培植官僚主义。我们是这样理解布哈林的。于是斯大林同志提出建议，也得到我们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支持，这项建议可以归结如下：“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

（一）布哈林同志承认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是政治错误；

（二）布哈林同志承认，他在 1929 年 1 月 30 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三）根据这一点，布哈林同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四）布哈林同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五）因此，布哈林同志收回他在 1 月 30 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的一切文件（发言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主笔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布哈林同志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提出这个建议是想做什么呢？我们的出发点是既然布哈林同志承认同加米涅夫谈话是一个政治错误，既然他不再坚持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对党提出的那些指责，那就应当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已经发生的一切。布哈林同志并没有这样做。他说，你们已经把决议草案分发给了委员会全体委员<sup>400</sup>。草案已经潜在地生效了。我们回答说：当然，一切事情潜在地都是有效的：既包括他同伊里奇的争论，也包括布哈林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一切错误。如果继续争吵下去，这一切自然就会浮出水面。可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好歹要找到共同的语言，以便一起工作。布哈林同志向我们声称，他不能放弃自己的声明，也不能放弃他写下的一切。那就自然要问一问：布哈林同志去找加米涅夫，同他谈了话，这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布哈林在声明中说，这是他犯下的一个政治错误。另外：布哈林同志声称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这样说对还是不对？还有：说党在培植官僚主义，这对还是不对……

**斯大林：**而不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奥尔忠尼启则：**而不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布哈林同志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指出……

**鲁祖塔克：**最让他担心的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最让他担心的事情。同志们，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建议是走出现有局面的最好出路。可是这个建议被否决了。以后我们就转而讨论另一个文件，就是现在提请大家审议的决议草案。这个文件讲了什么呢？这个文件回答了布哈林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党不能把30号的这份文件（布哈林的声明）放在一边而不做出回答。党要么同意布哈林说它对农民执行贡赋政策的指责，那就必须立即解散党的领导机关，党要么同意布哈林说它在培植官僚主义，那就必须立即撤销党的领导机关，党要么同意布哈林说它的中央委员会在瓦解共产国际，那就必须立即撤销中央委员会；要么这些都是谎话，都是不能容忍的对党的诬蔑，那么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就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来。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就是这样做的。布哈林一直在对我们说：“放开我，我根本不想争论，也不想搞什么派别斗争，希望谁也不会强迫我这样做。”可是这个声称他病了三天，一动都不能动，要求把会议从星期四挪到星期五，从星期五挪到星期六的人，却在家里写出了一篇长达30页的声明。这难

道不是伪君子吗？写出这样的文件就是一场大争吵的开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我同托姆斯基谈过好几次。他一直对我说，谁也不能把他拖进争吵里去。我不明白，难道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却是另一套吗？

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提出了他自己的草案，其中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

1) 注意到布哈林同志声明他同加米涅夫过分坦率的谈话是一个错误。

2) 坚决否认党的统一的敌人散布的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结盟的谣言。

3) 注意到加里宁同志声明他在鲍曼区党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是错误的。

4) 建议布哈林同志写出共产国际纲领的注释并拟出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为此在四个月内解除他各种日常工作（除政治局外）。这项决定通过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执行。

5) 建议中央书记处和托姆斯基同志商量他的工作，按照他的请求解除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

6) 本决定提请中央全会批准。”（被委员会全体委员否决）

我很担心，很可惜，加里宁同志的声明是对的。

加里宁：我什么也没有说。

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受到指责，说他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划清了界限。我很担心，其他人会不会也像他那样划清界限。

布哈林的这个草案遭到我们全体委员的否决。我不知道他们在新文件中会提出什么建议，不过反正好事情是用不着写许多页的。（笑声）如果想和平地结束事情并恢复和平的话，那有一页纸就够了。

布哈林：那你们自己又何必写那么长的文件呢？

奥尔忠尼启则：那是回答你毫无用处的声明，还有你对党的种种指责。你不写，我们也就不会回答。你说是不是？你写了，抛出了种种指责，却什么也不让人说吗？我们应不应当向党说明，我们是否同意你30日的声明？你在那次会上对我们说，连你自己也不能同意你写的东西。你至少有几十次这样说过：“你们对这里的理解不对，你们对那里的理解不对等等。”同志们，我想，而且在委员会开会时我也说过，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结束会议时，应当通过斯大林同志在委员会上提出、我们大家也赞成的那些建议。这是走出现有局面的最佳出路。不管怎么说，布哈林也罢，托姆斯基也罢，李可夫也罢，都不能说我们是造成今天的局面的罪人。不管你托姆斯基同志怎么说是在工会理事会里给你塞了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人，不管你怎么说，你总不能抹去

党的历史中的一件事,就是去年7月11日,在一致通过了关于粮食采购这个重要问题的、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议之后,你们跑去找加米涅夫,同他调情,不是浪漫主义的谈情说爱,而是政治上的调情。这个文件把一切都搞了个底朝天。就算中央政治局,就算政治局的多数,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执行政策是错误的,那也应当在这里来纠正,而不是在阿尔巴特大街上加米涅夫的家里。我想,如果布哈林同志的确不愿意卷入一场大争吵,不想在现有的困难之外再给党增加新的困难,那他就应当同意我们提出的那些建议。难道这里有一丝一毫让人感到屈辱的地方吗?这里有什么呢?“承认自己同加米涅夫的谈判错了”。布哈林自己也是承认的呀。

其次,“承认党没有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我相信,布哈林不能坚持这个指责,如果他企图在党的会议上捍卫这个指责,那党员群众就不会听他的。

第三,“承认我们党并没有培植官僚主义”。我并不是要否认我们党内存在官僚主义,而且在苏维埃机关里还要更多一些。可是谁也不会相信党不是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却反而在培植官僚主义。

卡冈诺维奇: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之外。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早在1923年就说过,也写过布哈林今天写的那些东西。

我们最初的建议里没有任何让人感到屈辱的成分,请你们留下来,继续工作。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你们工作。我想,布哈林在《真理报》工作不会有什么困难。在共产国际工作当然会困难一点。在那里他被认为是右倾,这是应当消除的。

布哈林同志应当坦率地表明,他赞成什么人,是右派还是左派,他支持他自己执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还是塔尔盖默和布兰德勒的路线。他必须直截了当地说明白。当然会有很大的难度,可是他能够处理好共产国际的工作。那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多少是,怎么说呢,体面地摆脱目前的处境。如果他们坚持己见,那会怎么样呢?你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用不着再对你们讲了,谢天谢地,我们见过的多了。

我们的建议里关于托姆斯基什么都没有说。不过很清楚,也应当建议他终究要听党的要求和恳求,放弃他自己的固执和政治上的任性。的确,这叫什么话——“我不能”。我不能是什么意思呢?党既然告诉你应当工作,那就应当执行党的要求,而不能调皮捣蛋。

总之,如果几名同志不希望局面进一步尖锐化,如果他们不想给党增添不必要的困难,他们就应当接受委员会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那些建议。如果他们不打算这样做,那我们就请大家审议提出的决议草案,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政治评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5号全宗,27号目录,520号案卷,第10—14张。原件。打字稿。)

## 12

## И. В. 斯大林 1929 年 2 月 9 日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在我谈今天突然出现的三个人的宣言或称政纲之前，我想就李可夫同志的几点错误的、不确切的、不符合实际的声明说几句。李可夫同志的讲话中这种不确切的、完全错误的声明有许许多多。要驳斥这不计其数的错误声明要花费许多时间。因此我只限于批驳其中的几点。

1) 李可夫同志问道，既然我当时就断定，而且现在也仍然断定布哈林同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和中央的路线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大杂烩，那为什么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我和政治局其他委员一起投票赞同政治局内一致的决议，赞同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也没有调和分子的决议？李可夫同志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我是在欺骗党，投票赞同政治局内一致的决议？同志们，我感到惊奇，一个成年人，而且称自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人怎么会在这里讲这样的废话。我为什么投票赞同政治局内一致的决议呢？因为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关于控制数字，也就是关于主要经济问题的决议。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政治局全体委员，其中包括布哈林同志，一致赞同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所以我有根据认为，我们政治局内没有政治分歧。布哈林同志投票赞同十一月全会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是什么意思呢？它毫无疑问表示布哈林同志赞同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从而放弃了他自己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的错误。谁能否认，全会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和布哈林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之间有重大的原则差别？布哈林同志自己能不能否认，全会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和《一个经济学

家的札记》在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上根本不同的呢？让他试试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看。既然布哈林同志不顾这两份文件的巨大差别，投票赞同关于控制数字的十一月决议，那就是说，他放弃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他自己的错误。所以我有充分的根据认为，我们政治局内不再存在政策上的分歧。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李可夫同志，这哪里有什么虚伪呢，怎么能够在这样严肃的大会上讲这种废话呢？可是有另一个问题，的确是有趣的问题：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既然怀里藏着对党的种种攻击，什么“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啦，“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啦，“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啦，——既然这些同志藏着这些诽谤性的货色，他们怎么会在1928年11月投票赞同政治局一致的决议呢？如果说名副其实的话，这才叫做货真价实的虚伪，这才是真正的欺骗党。

*(罗森霍尔茨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布哈林：早先的托洛茨基分子历来就是这样干的。

斯大林：我和你不同，布哈林同志，我既没有参加过托洛茨基派，也没有脱离过托洛茨基派。这一点请你注意。

布哈林：我说的不是你，而是罗森霍尔茨。

斯大林：2)李可夫把加米涅夫的《笔记》叫做讹诈性的伪造。我对加米涅夫的信任程度也许不如李可夫和布哈林。不过加米涅夫同志是党员。既然他在提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专门声明中肯定，由托洛茨基分子公布的他的笔记符合实际情况，那我就不能说这份文件是伪造或者讹诈。

布哈林：符合他的信。这是谁也不否认的。

斯大林：是的，符合他的信，他的《笔记》，而信符合实际情况。这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们不顾这一切，坚持要把加米涅夫的这份文件说成是伪造，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检验这份文件——把加米涅夫找到这里来，让他做出补充说明。所以我在前一次联席会议上才要求把加米涅夫同志找来。可是你们当时反对，请求不要找加米涅夫。你们为什么反对呢？是不是因为害怕真理，害怕进一步揭露你们的幕后活动呢？让人怎么理解你们害怕加米涅夫在会上出现呢？这是不是最准确地表明，你们内心里承认加米涅夫的《笔记》是正确的，现在害怕他进一步揭露你们的种种幕后阴谋活动，所以才竭尽全力反对召唤加米涅夫的建议呢？是不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关于讹诈性的伪造的种种议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为的是掩盖你们幕后活动的事实？

3)李可夫同志坚决反对我们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把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

们的行为说成是派别活动。他连喊带骂,声称布哈林去找加米涅夫不是为了结盟,而只不过是开诚布公地谈谈。这真是令人费解的怪事:既然是这样,布哈林同志为什么要向中央隐瞒他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呢?为什么他要瞒着中央,把一切涉及他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的东西都隐藏起来呢?如果政治局委员同一些党员的谈话确实没有问题,他们会向中央隐瞒这些谈话吗?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们有些同志,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就安排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工作的问题同他们谈过话。事后所有这些同志都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了谈话结果。他们什么都没有向中央隐瞒,也不可能隐瞒,因为他们是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去谈话的。可是布哈林同志为什么没有像他们那样,报告政治局他同加米涅夫同志谈话的情况呢,如果他的谈话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为什么他把这些事情都瞒着中央,而且千方百计地背着中央,告诫加米涅夫不要把和布哈林谈话的事声张出去呢?布哈林同志意识到他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所以他才不得不瞒着政治局的多数,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因此辞职政策和实际上对《真理报》、共产国际、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的怠工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布哈林同志及其最亲密的支持者的派别活动,又是什么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派别活动呢?

4)我们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指出,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的谈判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即便“是不同意的,也是知情的”,李可夫同志说这是谎言和绝对的捏造。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说,根据是什么?难道加米涅夫的《笔记》里没有讲到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谈话是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知道,而且同意的吗?加米涅夫的《笔记》里有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的话:“我和你说的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知道。”这话还能有别的理解吗?你们做了什么来批驳加米涅夫的这句话呢?难道你们今天拿出来的,由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签名的文件不能说明你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用特殊纲领结合起来的派别小组吗?你们作为反对中央多数人的政策的紧密的小组在政治局内活动,而且还在继续活动,这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久前在政治局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声称,他们是在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判之后就立刻知道了的。就算他们是在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判之后就立刻知道了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向中央报告呢?为什么他们要对中央隐瞒呢?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是作为一个紧密的小组在反对中央,难道还不清楚吗?也许的确应当把加米涅夫同志找来,询问他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对布哈林同志谈判的态度?怎么样,你们不愿意吗?太可惜了……

下面我来谈今天提出的,由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署名的文件。

首先我就这份文件的突然出现说两句。它并没有事先分发给出席会议的人,而是突然间拿出来的。大家看到,这些同志已经是第二次同我们玩花招了。第一次是他们拿出布哈林1月30日的声明。想搞得我们措手不及。没有得逞。现在他们又一次玩这个把戏。很遗憾,我们不能在决议草案里对这份文件做详尽的评价,因为决议草案在两天以前就已经发给了参加会议的人。不过这对于文件的作者只有更坏,因为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这份文件将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批评。我们没有可能对三个人的这份文件逐条做出回答,因为靠听觉很难抓住文件的各个细节。可是文件总的精神是明白的,在这次会上就可以,而且应当对它做出批判,何况这份文件就其基本方针而言和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声明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只不过是它更差的再版。

我认为,三个人的这份文件是一个基本上反对中央路线的政纲。迄今为止,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是躲在布哈林身后,而把他推到前台。现在这出喜剧结束了。我们见到了三个人的政纲,再也无法掩藏了。

我觉得,三个人的文件打的是左右逢源的如意算盘:无论我们是所谓的“大难临头”,或者是不出什么乱子。这就是这份文件的两面性、内在矛盾和政治上经不住推敲。针对“大难临头”,文件提供了诸如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在党内实行“培植官僚主义”政策、“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等等材料。一旦灾难临头,就把这些材料抛出来,达到改变党的政策的目的。如果不出什么乱子,就把这些材料藏起来。为了应付不出乱子,文件准备了另一些材料,如“我们是同一条路线”,只不过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分歧已经过去了,属于“历史的范畴”等等。因此这份文件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公开反党的灵魂,另一个是外交上温柔的灵魂。

文件的这种结构完全符合布哈林同志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表现在加米涅夫的《笔记》里记载的布哈林的言论中:“我能不能躲开一段时间,——两个月不过问现行政策,等危机来临时,我再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发言。”

这种两面战略对我们而言不能说是有什么新鲜货色。大家都知道,迄今为止我们党内的各个反对派集团都是遵循这种战略的。可悲的是我们的同志现在也想走反对派的老路。

所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两面战略、等待的战略——哎,没准儿会出现危机呢。如果不出现危机,那就可以等待着,保持沉默。如果出现危机,就可以坦率地、完



全公开地讲话。

**布哈林:**那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拿危机来投机取巧是犯罪。

**卡冈诺维奇:**嘴上说说而已,实际行动呢?

**斯大林:**战略是很明确的:如果发生危机,那就把反对中央的全部武器都拿出来。顺便说说,没有危机,也不会出现危机,虽然他们很希望有危机。

**布哈林:**希望?

**斯大林:**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你们在期待着危机。这就是你们为了给议论危机哪怕是找一点表面的借口,而把各种负面的事实和各种困难夸大到极端的原因所在。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近来我们这几位受人尊敬的同志为了展示危机的到来,采取了两个行动?第一个行动涉及粮食问题。第二个行动涉及预算问题。近来政治局收到一个大量降低粮食供应的建议。这有点像是针对消费者,首先是针对工人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同志建议把粮食供应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们的轻率让我吃惊。他们害怕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却非常轻率地主张对粮食的消费者采取这项非常措施。是不是局势要求采取这项措施呢?不是的。他们是想造成我们处于绝境的印象。检查的结果表明,我们完全用不着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奉派调查这件事的专门委员会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这以后喧闹声才停了下来。

**李可夫:**可是说的是检查米高扬同志的计划呀。

**斯大林:**李可夫同志,你老是爱拿别人来做掩护。今天拿布哈林。明天又拿米高扬。拿谁来做掩护都是可以的。不过我们并不是傻瓜,我们能够分清什么是假象,什么是实情。关于预算曾经放出风声,说是预算有缺口,也许是5亿,也许是3亿,也许是2亿。因此就说必须降低工资,提高工业品的价格等等。检查却发现,预算缺口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是的,同志们,你们觉得什么都是危机。可是不存在危机,也不会有危机。你们是盼不来危机的。

这份文件有一个特点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有了什么成绩,文件的作者就喜欢把什么都记在自己名下。如果没有成绩或是遇到了困难,文件的作者就推到政治局的多数人,而且首先是斯大林同志身上。人们要问,为什么呢?根据什么呢?他们说,消耗储备是错误的,浪费了外汇储备等等。如果这都属实,那是谁的过错呢?尽管我应当在这里坚决地声明,说消耗错误是诬蔑。那是谁的过错呢?要支付拨款首先就要有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同志的签字。而经常受到他们指责的中央书记处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给过拨款。拿我来说,经李可夫同志的手发出的几千万的拨款要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会知道,甚至还要更晚

一些。我不是要用它来指责李可夫同志,因为我完全懂得,没有分工就不能领导我国的经济机构和苏维埃机构。可是既然事情是这样的,是由李可夫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出主要的拨款,那怎么可以推到中央政治局的多数人,或者中央书记处,或者比方说,斯大林同志身上呢?作为直接领导人的李可夫同志推卸自己的责任,这叫什么举动呢?

回过头来谈文件。这份文件有三个对党的主要诬陷。我们来逐个分析。

1) 文件指责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我想,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最终会放弃对党的这种可笑、幼稚而且愚蠢的诽谤。可是三个人的这份文件却轻易地重复了布哈林同志对党的这个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诽谤。文件援引斯大林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讲话。可是文件没有引用斯大林同志讲话的任何一句原文来印证自己的诽谤。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斯大林的讲话不能为文件作者提供任何诽谤活动的材料。也许,我应当引用我在七月全会上的讲话?

С. 柯秀尔:是的,最好读一下,提醒提醒。

斯大林:下面是我在七月全会上讲话的摘录:

“我国农民的情况是这样: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取消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不用说,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们抹煞这个事实,如果我们闭眼不看当前的情况,即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家可惜暂时还不能不向农民征收这种额外税,那我们就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了。

为什么我要说到这一点呢?因为索柯里尼柯夫和奥新斯基看来还不了解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的论点是:农民购买商品付的钱多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农民出卖农产品得的钱少了(这也是确实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究竟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调整粮价,要求立刻消除这种‘剪刀差’,消除这种少得多付的现象。但是,比如说要在今年或明年就消除‘剪刀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阻碍国家工业化,也阻碍农业的工业化,破坏我们还不巩固的年轻工业,因而也就是打击整个国民经济。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显然不能。应不应当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消除所有这些少得多付的现象呢?是

的,无疑是应当消除的。我们能不能立刻就消除这些现象,而又不致削弱我国工业,因而也不致削弱我们的国民经济呢?不,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什么呢?我们的政策应当是逐渐缩小这种‘剪刀差’。使它一年一年地接近起来,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业技术,这样就一定会使粮食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在若干年以后完全取消对农民的这种额外税。农民能不能忍受这种负担呢?当然能,因为:第一,这种负担将一年一年地减轻;第二,这种额外税不是在农民群众注定要遭受贫困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征收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征收的,在苏维埃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剥削农民的,而且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交纳的。”

下面是我在同一次七月全会上另一篇讲话的摘录,是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

“首先是关于城乡间的‘剪刀差’问题。指的是农民购买工业品仍然要多付一些钱,而出卖农产品仍然要少得一些钱。指的是这些多付少得的钱就是向农民征收的一种类似‘贡赋’的超额税,即为了工业化而征收的额外税;我们一定要取消这种额外税,但是,如果我们不想破坏我国工业,不想降低为整个国家从事生产并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社会主义的我国工业的一定发展速度,那么我们是不能立刻取消这种额外税的。有人不喜欢听这种话。托姆斯基同志也不喜欢听,看来,他是怕承认真相。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口味问题。有些人认为在中央全会上不应当说出全部真相。而我认为我们在自己的中央全会上必须说出全部真相。不应当忘记,决不能把中央全会看做群众大会。当然,‘超额税’、‘额外税’这些字眼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它们很刺耳。但是,第一,问题不在于字眼;第二,这些字眼完全符合现实;第三,用这些令人不愉快的字眼正是为了使人感到刺耳,正是为了促使布尔什维克认真地来取消这种‘超额税’,来取消‘剪刀差’。”

你们看到,这里指的是,为了国家工业化而用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的办法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我把这种额外税叫做“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不是布哈林同志现在“诚实地”胡说八道的贡赋)。因此这里指的是那种“剪刀差”,是我们大家都承认其存在,但是不能立刻消除,不过一旦有可能就应当消除的那种“剪刀差”。我说的不是“贡赋的口号”(文件的作者是这样诽谤的),而是一旦有可能就消除剪刀差、超额税、“贡赋”的口号。我说的不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而是说苏维埃制度“排除了对农民的任何剥削,更不消说军事封建剥削了”。这全都是事实,只有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蠢货,或者害怕说出真理的

胆小鬼才会否认这些事实。你们可以看到，斯大林说的和文件作者对他的诽谤是完全对立的東西。

同志们，这就是斯大林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讲话问题的真相。

最让人吃惊的是：布哈林同志对这种种事实了解得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少，可是他却仍然顽固地诬蔑并制造种种幼稚的谎言。在七月全会上布哈林同志发言是在我之后，为什么他在发言中没有指出，哪怕是最含蓄地指出他不同意我的发言呢？从中央七月全会到十一月全会之间，和布哈林同志，也和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就重大政策问题，首先就农民问题进行过争论，——为什么他们就“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问题从来不曾说过一个字呢？只是在加米涅夫同志那份尽人皆知的文件揭露了他们反对中央的派别活动之后，他们才第一次谈到“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今天这份文件的作者们需要“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话，为的是欺骗对政策问题不太熟悉的党员，用某种办法，哪怕是诬蔑中央来替他们自己的派别活动辩解，——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但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话不仅仅具有以攻为守的意义，它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政治含义。既然文件的作者认为可以把党提高个体贫农和中农的经济、推广预购合同、培植合作社社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减轻中农税负、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说成是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他们也像党内的右倾分子一样，企图立刻消灭“剪刀差”，实行恢复价格，从而消除国家收入的一个来源，而没有这个来源目前就不能维持工业化现在的速度。所以说，“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话是文件作者反对我国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的另一类抗议和叫嚷。文件作者需要“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话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降低、收缩工业化现有速度的政策。

2) 文件还指责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培植官僚主义”。对这种可笑至极的指责未必值得多说。既然中央在“培植官僚主义”，那是谁在反对官僚主义呢？我们所有的反对派集团正是从对党和中央提出这类指责开始它们的活动的，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的吗？有过这样的时期，文件的作者和其他中央委员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这样的指责。可是如今，在党开始了蓬勃的生活，党内民主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自我批评的方法一步步在党内取得它应有的位置的时候，文件的作者却像瞎子一样，在老反对派集团的迷途上徘徊起来。

最让人奇怪的是文件作者关于党的集体领导的议论。他们说，我们需要集体领导。完全正确。那么是谁在破坏集体领导呢？同加米涅夫搞幕后谈判，结

成派别同盟，——这就是集体领导吗？还有辞职政策和实际怠工，——这就是集体领导吗？背着这样的包袱，怎么还能谈集体领导而不脸红呢？

3)最后，三个人的文件对党提出的第三个指责是中央委员会仿佛在“瓦解共产国际”。看来，文件作者不喜欢最近3—4个月来坚持执行的反对共产国际各个支部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斗争。看来，作者认为把右倾分子从共产党内清除出去的政策不如和他们团结一致的政策。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要求同作为主要危险的右倾危险进行坚决斗争，以及克服所谓调和态度的决议还有什么意义呢？文件作者说是赞成共产国际六大的决议。不过这只是口头上的声明。而最近他们实际上只是在妨碍粉碎右倾和克服调和态度。近来联共代表团一再开会，以求解决同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斗争的主要问题。每次代表团开会我们都要求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出席，等待他们，一再推迟会议时间。可是他们总是回避，显然是不想插手开除右倾分子的问题。请看，他们是在共产国际面前、在右倾分子面前，也在朋友们面前和敌人面前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以便日后可以站出来说：“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是斯大林和其他人搞的开除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这算什么呢？这叫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吗？你们在哪儿见过这种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布尔什维克呢？难道就是这样来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吗？他们想把开除右倾分子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那好吧，我们准备对这件事负责。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始终反对共产国际各个支部里的右倾分子，同他们作斗争。

**李可夫：**我是投票赞成把右倾分子开除出共产国际的。

**斯大林：**你们回避了，拒绝出席联共代表团的会议。我们找你们找了好几个小时，叫你们参加会议，在决定关于右倾分子的主要问题时，为了你们而推迟了代表团的会议。可是你们却宁愿待在托姆斯基家里，推托着不肯参加联共代表团的会议。

总之，我们在三个人的文件中看到了对党的三项主要指责，如果出现了所谓的“大难临头”，这些指责就会公开提出来：1)“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2)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3)“瓦解共产国际”。这三项可笑的指责的反面就是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政纲的三个基本点：1)用“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谎言掩盖着的降低工业化的速度；2)用攻击“培植官僚主义”掩盖着的结成思想宗派的自由；3)用“瓦解共产国际”的诽谤掩盖着的给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分子提供外交保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文件作者放弃对党的这些

责难,那他们的政纲不言而喻就应当作废;要么是他们不肯放弃对党的责难,那党就不得不揭露他们政纲的机会主义实质。

这些都是为“大难临头”准备的。可是三个人的文件里对于不出现“大难临头”也有应付的办法。他们为此已经准备了种种声明,诸如声明政治局内“没有”政治分歧,声明只存在微不足道的“差别”,声明我们之间的分歧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是正在消除;即使没有成为“历史”,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不用多说,这类声明丝毫也不值得信任,发表这类声明只不过是玩弄外交手腕。不过就算我们现在确实只有一条共同的路线,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废话已经被埋葬了,“培植官僚主义”和“瓦解共产国际”也已经被埋葬了,既然如此,那辞职政策又从何谈起呢?难道统一的路线、不存在分歧等等会要求辞职吗?比如说,托姆斯基同志认为,如果他留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岗位上,他就一定会遭到“恶意攻击”,过一段时间他必然会被撤职,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托姆斯基:**已经有了经验了。

**斯大林:**啊,经验?很好。为什么布哈林同志会认为,如果他留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中工作,过不了几个月就一定会被撤职呢?大概你们也有了“经验”了?现在我对你们是完全理解了。你们起初诬蔑党和中央,指责它们犯下了种种致命的过错。后来又宣称路线是一致的,分歧已经成为过去。不过你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辞职要求。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你们这样做是要表明,即使路线一致,你们也不可能继续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会遭到“恶意攻击”,然后就把你们撤职。那么是谁会进行这种“恶意攻击”呢?显然,是政治局的多数,是中央书记处,最后还有斯大林。因此,问题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把斯大林从政治局撤下来,而不管是否存在分歧。因此,问题全在斯大林。

**布哈林:**照这么说,我们就应当辞去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不对,布哈林同志,加米涅夫记下的关于改变政治局组成的话显然是正确的。尊敬的同志们,你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兜圈子。否则你们的辞职就是不可理解的。

**奥尔忠尼启则:**然后就扭转党的政策。

**斯大林:**对,同志们,现在问题就在这里。那好吧,请便。不过那就请你们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样子来,公开地、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不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为此你们才引用了列宁讲到斯大林粗暴的信。是的,我确实很粗暴。我过去没有否认过,现在也不否认我粗暴。我不是几次提出,请求解除我现在的职务嘛。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这几位亲爱的同志反对解除我的职务。我尽量在最近

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再一次提出申请。我尽量这样做是为了夺走机会主义者手里的武器,他们企图滥用列宁的信件,用斯大林的“粗暴”来掩盖他们自己倒向机会主义一边。托洛茨基分子曾经滥用过列宁的信件。现在你们这几位亲爱的同志也跟在托洛茨基分子后面,想滥用这封信。那么好吧,请便。不过请你们注意,会出现一幅多么奇怪的图景。比如说,如果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诽谤党,指责它“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那么这不是粗暴,而是温柔。如果斯大林反对这种诽谤,揭穿它是对党的不体面的攻击,这当然就是粗暴,是斯大林的粗暴。再比如说,如果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搞幕后阴谋,同昨天的反对派分子组织反对中央的派别同盟,这当然不是粗暴,而是温柔。而如果斯大林揭露了这些派别活动的把戏,反对他们,这当然就是粗暴,斯大林的粗暴。这真是很有说服力呀。

可是三个人的这份文件玩弄辞职的外交把戏,其目的不仅仅在这里,不仅仅在于激化列宁同志的信件问题。他们的外交把戏还有另一个目的,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的目的。几个同志提出辞职是想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它向文件作者可以接受的方向改变政策。他们提出辞职,仿佛是在对党中央说:“我们提出辞职是因为我们不同意中央的现行政策,但是如果中央改变政策,使其有利于党内的右倾分子,有利于解开对农村中资本主义分子的束缚,那我们也许会放弃辞职,而宣布同我们的最高层领导完全一致。”

辞职政策的基本含义就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屈服于恐吓,如果它们哪怕只有一分钟被这种不加掩饰的最后通牒所吓倒,那我们中央委员会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我们党也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的政党了。不论条件多么恶劣,不论环境多么严酷,也不论多少人提出辞职,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都将执行列宁主义的政策。就让我们几位亲爱的同志明白,而且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吧。

奥尔忠尼启则:说得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038号案卷,第34—44张。原件。斯大林做了标记的印刷文本。)

## 13

## 政治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1929年3月14日来信的答复草案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草案

### 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sup>401</sup>

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将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1929年3月14日来信分送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为了驱散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加米涅夫同志《笔记》事件中的举止而在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引起的，委婉些说，误会。

然而，政治局不能不指出，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解释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

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感到不满意的是，莫洛托夫同志认为加米涅夫同志在布哈林同志同他谈判这件事情中的行为是对中央的不忠诚。政治局必须指出，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加米涅夫同志不忠诚行为的意见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的确，加米涅夫同志在同布哈林同志谈判之后，为什么不直接到自己的党中央来，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统一，因而也是党的统一受到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如今在信中称之为“右派”的那些人的威胁呢？这难道不是“忠诚地”对待自己的党中央，并且准备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帮助党”的党员的责任吗？加米涅夫同志宁愿进行幕后谈判，背着中央委员会搞谈判，而不肯



坦然地、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中央，——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还有，从托洛茨基1928年10月21日的信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分子的整个集团早在1928年9—10月间，即在中央得知之前3—4个月，对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一事，以及谈判的内容就已经了如指掌了。从加米涅夫同志同年11月29日向中央提交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他是知道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的那封信的。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会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信散发以后，特别是在国外公布之后，托洛茨基关于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的报道就变成了一份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文件。而且还应当指出，连加米涅夫的朋友和托洛茨基的朋友都知道幕后谈判一事，只有中央委员会不知道，因为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知为什么认为应当把托洛茨基分子早已知道的事情向中央保密。如果不是加米涅夫同志不想报告中央，从而防止幕后谈判一事被利用于反党目的，那么被党开除了的托洛茨基分子消息如此灵通会是偶然的吗？这哪里谈得上对中央的“忠诚”呢？

再者，托洛茨基1928年10月21日的信中谈了两件事：第一，加米涅夫同志打算恢复同托洛茨基分子的结盟；第二，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了结成联盟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托洛茨基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布哈林秘密地从后门跑去找加米涅夫，并答应‘交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来代替。就是这么说的。加米涅夫当然愿意这样搞，不过他明白，布哈林政治上的保证并不比他经济方面的预言更宝贵。共产国际的这位领袖生活优裕，权力无边而又废话连篇，看看自己的身影，他是不会去找昨天被开除的人的。”

加米涅夫同志在1928年11月29日向中央提交的声明(见附件)中驳斥托洛茨基断言加米涅夫同志企图恢复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结盟。可是在就托洛茨基的信向中央提出的专门声明中，加米涅夫同志却令人奇怪地只字不提托洛茨基的另一个断言——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结成联盟反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当时不曾注意到托洛茨基的这个断言，以为它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捏造。然而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会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的断言不是捏造，而完全符合事实。对同后来变成了党的敌人手中反对党及其领导的政治武器的布哈林同志“谈话”一事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这该怎么解释呢？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收到托洛茨基1928年10月21日的信之后，应当立即就涉及同布哈林同志结盟的问题做出反应，并立即就这个重要问题向中央做出说明，这难道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以对党中央“忠诚”自诩的党员却做出这样奇怪的举动，这是怎么回事呢？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向中央发出警报，却宁愿等到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由托洛茨基分子公布出来，让所有的白卫分子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这哪里有什么对中央的“忠诚”呢？

政治局不能不指出，上述种种事实远非有利于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应当承认，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如果把党和党的统一的利益置于派别考虑之上，那就既不会发生幕后谈判的事情，也不会向中央隐瞒这些谈判。列宁教导我们说，唯一正确的政策是摆脱了幕后的、上层的阴谋诡计的原则性政策。不能说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整个加米涅夫同志《笔记》事件中是遵循了列宁的这个教导。

## 附 件

### 致斯大林同志

尊敬的同志！

我听说，由托洛茨基签名、10月21日从阿拉木图发出的信已经分发给中央委员供参考了。我看过这封信，认为没有必要就信中关于我仿佛同托洛茨基的某些“代表”谈过话这种捏造做出反应。可是既然这封信已经分发给中央（或政治局）委员，我认为必须向同志们声明，信中叙述的我的谈话和托洛茨基强加给我的那些意见都是出于政治动机而凭空捏造的。强加给我的那些关于克伦斯基的话都是一些难以理解的蠢话。托洛茨基把这样的话强加给我：“应当（同托洛茨基分子）一道工作。出现分裂是很可惜的。”我认为，原列宁格勒反对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决裂是绝对正确的。托洛茨基分子采取的每一个新步骤都证明这一步是正确的。在决裂时我认为，托洛茨基拒绝走我们选择的、服从十五大的道路，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托洛茨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举动（顺便说说，也包括10月21日信的政治内容）都证明事情正是这样。因此，只有在政治上发昏的时候才可能哪怕是暗示我似乎希望和托洛茨基分子“一道工作”。

如果托洛茨基10月21日的信是中央书记处分发的，那我请求按相同的地址把我的这几行字也发下去。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Л. 加米涅夫

1928年11月29日

##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

尊敬的同志们!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于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讨论了托洛茨基分子那张大家都知道了的传单,其中复制了加米涅夫1928年7月间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我们阅读了联席会议的速记记录,不能不提出几点声明。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就可能被认为我们同意与会者的一些说法。那样我们就等于接受了对于一个党员无法接受的、毫无根据的一些指责,而我们必须坚决地、断然地抗议这些指责。

1)除了速记记录中复述的我致谢尔哥同志的信之外,我认为必须强调,罪恶地公布(印刷)我的信只能是托洛茨基分子干的。除了托洛茨基分子(还有白卫分子)之外,绝对不会有别人会对公布这封信感兴趣。可是托洛茨基分子把赌注押在我们党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上,而且不择手段地力图加重这些困难,现在就在他们的每一份传单中利用这封信。这封信是托洛茨基分子印刷的,而且只有他们(还有白卫分子)对这样做有政治上的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弄不明白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信怎么会落到他们手里的。我们自己绝对相信,这是盗窃行为。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有一个发言者提出一种设想:这封信可能通过我们的某个朋友落到托洛茨基分子手中。这个设想不能成立,原因很简单: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绝对没有任何人哪怕是一分钟持有过这封信。而且一般说来,把这封信拿出去散发(更不用说去公布了)是只有对自己的同志毫无诚意、对党的利益毫无责任感的混蛋才会干的事情。我们敢于向中央委员会保证,我们的至交中没有人肯做出这种指向党的不诚实的、卑鄙的、罪恶的举动。政治文件被盗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避免的,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在卡卢加连可以上锁的写字桌都没有,更不用说保险柜了)。另一方面,我们深信,盗窃这份文件的秘密不会长久维持。不用说,我们这方面准备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揭穿托洛茨基分子的盗窃行径。

2)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明仁斯基的断言,他说我们“对党心怀叵测”。我

们的处境很艰难。我们被我们工作了几十年的党开除了。我们履行了代表大会为我们回到党内提出的条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据此恢复了我们的党籍。既然是这样,再说我们对党“心怀叵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什么诡计吗?它又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明仁斯基同志知道什么“阴谋诡计”,那他这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没有反对恢复我们的党籍呢?他既然有这种怀疑,为什么不立即想个什么办法来加以证实呢?我们不是“死乞白赖地贴着党”,而是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决定恢复了我们的党籍。在我们同党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公开说明了这些分歧,从来不曾把自己的分歧和意见向党保密,也从来不曾把分歧“怀着鬼胎”藏在心底。现在我们也并没有“心怀叵测”。我们完全赞同党的路线,赞同中央历次全会的决议,在委托给我们的工作中,在党的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中贯彻这些决议,因此我们有权最坚决地抗议种种关于“心怀鬼胎”的影射。恢复党籍之后,我们曾经多次同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谈过话,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指出过我们的行动中有什么对党不忠的事情。

3)和布哈林同志谈话的笔记中有些地方被解释为企图结成联盟。这种解释在涉及我们的地方无论就实质,还是就形式而言都是不对的。我们没有想过要同任何人结成任何联盟,也没有结成过什么联盟。倾听一名政治局委员关于其他委员哪怕是最激烈的议论,并不意味着和他组成集团。无论布哈林还是加米涅夫,在谈话时都很清楚使他们分开的理论分歧有多深。从笔记本身应当得出结论:谈话没有丝毫消除这些分歧,或者至少是讨论以便弥合分歧的意图。至于类似“结盟”(比如说,改变政治局的组成等等)这样具体的任务,认为我们可能提出这种目标的想法简直可笑至极。我们当然对党的领导的现状是感兴趣的。我们同任何一名中央委员谈话都努力想搞清楚局面、党的领导的打算和前景(我们认为,这里没有丝毫不忠诚的成分,而是表现了对党及其总政策的命运的关心),——而且从十五大以来,我们已经坚决放弃了任何宗派主义的或是小集团的政策。

4)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讲话时,莫洛托夫同志就加米涅夫同布哈林会见一事顺便提出了加米涅夫不忠诚的问题。尽管莫洛托夫同志对这个问题只是一笔带过,我们还是应当在这里消除可能发生的种种误会。我们的处境迫使我们这样做。由于布哈林拜访了加米涅夫,从哪里可以看出加米涅夫对中央的不忠诚呢?难道真的有人认为,忠诚要求加米涅夫在布哈林拜访他之后,立刻跑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报告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对他说了些什么吗?可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知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

不止一次试图到政治局去谈清楚自己的观点,他们一再试图同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见面,而且每次有机会同他们(莫洛托夫同志、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谈话时,都声明自己不赞同右倾分子的观点,赞同中央的路线和历次全会的决议,准备竭尽全力,在任何岗位上帮助党和中央委员会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瓦解活动,也反对右倾危险。可是所有这些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同我们谈话时都坚决回避党内分歧的问题,而且拒绝了我们了解党的领导层状况的意图。对此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政治局认为,我们不应当干预那些使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产生分歧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党内已经广为流传。由于我们一直希望自己的活动完全符合中央委员会的意图,由于我们不希望同中央有任何分歧,所以我们接受这点,而且遵命执行,我们认为,中央会在对党合适,而且必要的时候召唤我们参与积极的工作。结果我们就只好听凭许多同志责备我们似乎在“等待”,而且几乎是在实行小集团的政策等等。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什么也没有“等待”,也没有搞什么“小集团”的政策,也没有“心怀鬼胎”,也不想同任何人结成“联盟”,也没有结成什么联盟。我们赞同中央的路线,而且准备在任何工作中证明这一点。至于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还要重复加米涅夫在出现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以前很久就对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过的话,——在党内事务中我们被置于“本土上的外国人”的地位,而委托给我们的苏维埃的工作既不符合我们的兴趣,也不符合我们早先的经验。

И. 加米涅夫

Г. 季诺维也夫

1929年3月14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90—99张。副本。)

档案  
1929  
3月14日

## 14

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  
1929年3月27—29日的声明和  
政治局对声明的答复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sup>402</sup>

尊敬的同志们!

由于政治局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信的答复草案包含着进一步败坏布哈林同志声誉的方针,我对这份答复草案投反对票。

致共产主义敬礼!

M. 托姆斯基  
1929年3月27日

致政治局书记处

请将我这份关于投票动机的声明按照分发《政治局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答复》的那些地址分发。

我投票反对政治局已经通过的、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草案,理由如下:

- 1)我不能投票赞成谈到我同加米涅夫“结盟”的文件,因为并不存在“结盟”。
- 2)我不能投票赞成这份文件,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信任党员的证词,却相信党的公开的敌人(托洛茨基)的证词。

3)我不能投票赞成这份文件,因为它同健全的理智背道而驰。要知道,如果相信托洛茨基关于布哈林所说的话,那为什么不相信他关于其他政治局委员所说的话呢?

致共产主义敬礼!

H. 布哈林

1929年3月28日

###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在表决由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起草的、政治局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信的答复时,我投了反对票。为了避免把我反对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草案的投票解释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或者是同他们一致,我声明:促使我对政治局答复草案投反对票的动机如下:

1)答复中有对布哈林同志企图和加米涅夫同志结成联盟的虚假指控。这种指控的虚假性质已经由布哈林同志的声明,也由加米涅夫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声明得到证明。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证实”了“结盟”。

2)答复对于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令人气愤地给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我扣上右倾帽子的企图(这种企图用给右倾加上括号的办法掩盖着)没有给以回击(也就是给以承认)。

3)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信的主要意思可以归纳为:他们愿意为同那些他们企图给贴上右倾标签的政治局委员的斗争效劳。由于这份效劳,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要求扩大他们政治活动的范围作为补偿。政治上的无原则在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文件中俯拾即是。可是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文件的答复在对待许多政治局委员方面也应当同样无原则。

请将我的这份声明按照分发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文件和政治局的答复的那些地址分发。

A. H. 李可夫

1929年3月29日

## 致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关于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声明

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声明形式上是关于投票动机的声明。然而实际上却是这几名同志反对中央及其政治路线的斗争的继续。因此政治局认为有责任对这些声明做出简要的答复。

1) 托姆斯基同志解释自己的投票动机是因为,按他的说法,政治局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信的答复包含着进一步败坏布哈林同志声誉的方针。用不着多少证明就可以明白托姆斯基同志的“动机”是站不住脚的。

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搞的幕后谈判败坏了布哈林同志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和布尔什维克的声誉,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可是这是谁的过错呢?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的过错,因为他搞了同昨天的反对派分子的宗派主义谈判。是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过错,因为他们向中央隐瞒了有损于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声誉的这些谈判,一直隐瞒到党的敌人公布了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

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发表在《人民意志报》(德国托洛茨基分子的机关报)上。发表《笔记》时还配发了转载自英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托洛茨基的诽谤文章。后来它又被《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转载。最后这份笔记以全文或摘录的形式传遍了资产阶级报刊。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我们党中央、我们全党及其领导的声誉都受到了损害,而让工人阶级的敌人兴高采烈。这是谁的过错呢?是同加米涅夫同志搞反对中央的谈判的布哈林同志的过错。是向中央隐瞒这件事,不愿意及时通知中央以防止出现丑闻的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过错。如果没有布哈林同志搞谈判,如果没有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向中央隐瞒这件事,那就既不会有加米涅夫同志的《笔记》,也不会有公布《笔记》的事情。这是明白无误的。

托姆斯基同志是否明白,只能说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败坏了党及其领导的声誉,而谈不上仿佛是政治局采取了败坏布哈林同志声誉的方针?

2) 布哈林同志在解释自己的投票动机时说,政治局不“信任”布哈林同志及其志同道合者在同加米涅夫同志结盟问题上的证词,同时政治局却似乎“相信”托洛茨基。只要一谈布哈林同志的这个“动机”,就可以明白它内在的虚假和不足信。



能够否认布哈林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搞了反对中央的幕后谈判吗?显然是不能的。现在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能够否认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都极力向党中央和政治局隐瞒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这件事吗?显然是不能的。现在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切是否说明,布哈林同志同昨天的反对派分子搞幕后谈判,而且极力向中央隐瞒这件事,是表明了他最大限度地信任昨天的反对派分子,却最大限度地不信任党中央和政治局呢?大家只要想一想: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还有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最大限度地信任昨天的反对派分子,却最大限度地不信任党中央和政治局。还要走到哪里去呢?他们这样做了之后,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政治局信任自己,信任自己的证词呢?

说政治局仿佛“相信”托洛茨基,这样说是不对的。政治局只相信事实。而事实是布哈林同志确实企图组织反对中央的派别联盟。政治局不倾向于相信托洛茨基,这从政治局甚至不曾注意托洛茨基1928年10月21日的信中涉及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秘密谈判的那一部分,认为托洛茨基是在散布有关布哈林同志的流言蜚语,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政治局不如托洛茨基消息灵通,那不是政治局的过错。在布哈林同志搞幕后谈判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确实比政治局更要消息灵通一些。事实上,托洛茨基和他的集团早在1928年10月,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得知以前的四个月,就已经知道这些谈判了。对于布哈林同志进行的谈判,“党的公开的敌人”消息如此灵通,这是什么道理呢?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同我们党的政治局比较起来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消说,当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过错。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认为,可以向同托洛茨基分子有某种联系的、昨天的反对派分子开诚布公,却要对中央保密呢?为什么布哈林同志得知托洛茨基分子已经从托洛茨基1928年10月21日的信(而且是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已经发表了的信)中知道了布哈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一事,还不认为须要和托洛茨基关于他和加米涅夫同志进行谈判的断言划清界限呢?为什么布哈林同志会认为等待公布加米涅夫同志《笔记》的时刻对他更为便利呢?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怪罪布哈林同志和与他志同道合的人,还能怪罪谁呢?

3)李可夫同志声称,指责布哈林同志企图和加米涅夫结成联盟是“虚假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谈到了结盟,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两次联席会议上确定的事实无疑说明,布哈林同志曾企图同原反对派分子结成反对中央的派别同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

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直接讲到“布哈林同志企图在幕后组织反对中央的派别联盟”。不错,这种企图最后以失败告终。它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因为无原则的结盟在我们列宁主义的党内是不会有前途的。不过这并不能改变布哈林同志企图在李可夫同志的直接或间接支持下组织反对中央的联盟这个事实。大家可以看到,证实结盟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而且为各州和地方党组织的一致决议所肯定。李可夫同志愿意不顾这个事实。可是事实并不因此而不成其为事实。

李可夫同志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没有原则性的声明,其中还掺杂着对政治局的攻击,说政治局对布哈林同志及其友人的方针似乎“没有原则性”,——这是很不严肃的,而且简直是可笑的。首先,如果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确缺乏原则性,那为什么李可夫同志的同伙布哈林同志要“跑去”找这些没有原则性的同志,同他们秘密谈判反对中央政治局呢?为什么李可夫同志知道了和这些无原则的人进行的谈判之后,不向中央报告,不努力防止形成无原则的集团呢?李可夫同志容许这些无原则的谈判,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则性考虑呢?李可夫同志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则性考虑,才向中央隐瞒了这些无疑是无原则的谈判的呢?李可夫同志用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缺乏原则性的声明,在不经意间也揭露了他自己和布哈林同志,——这还不清楚吗?

再者,终于被卷进了这场反对中央的无原则纠葛的李可夫同志,怎么还能够大言不惭地说政治局在对待布哈林同志及其一伙方面“缺乏原则性”呢?大家知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谴责了布哈林同志(还有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的行为,认为这个举动“证明”布哈林同志“完全没有原则性”,而且认为“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隐瞒谈判一事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行为”。联席会议的这项决议现在已经得到所有党组织的肯定。这样,政治局就很清楚而确切地表明了对待布哈林同志一伙的宗派政策的原则性态度。在布哈林同志及其友人行为的问题上,还能要求政治局有什么样的原则性呢?或者这样做还不够?对于李可夫同志而言,看来这样做还不够。既然是这样,那就请李可夫同志告诉我们,政治局还应当做些什么,才能表明自己对布哈林同志及其政治局委员中的朋友在同加米涅夫同志搞幕后谈判一事上所持的原则上否定的态度。李可夫同志提到“原则性”,却使他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如果他根本不提“原则性”,岂不是更好一些吗?

李可夫同志对于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给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贴上右倾标签”的企图没有遭到政治局的反击表示不满。这是毫无根据的要求。政治局并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根据什么认为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右倾。至于政治局本身,它并没有掩饰,也不打算掩饰,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基本上背离了党的路线,而接近弗鲁姆金同志(党认为他的纲领是右倾的纲领)的立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非常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并不排除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放弃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党就没有理由指责这些同志右倾。而如果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肯放弃他们的错误立场,那么不言而喻,党将认为他们是转而投入了弗鲁姆金分子阵营的人。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9年4月1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110—117张。副本。)

## 15

斯大林 1929 年 4 月 22 日在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  
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未经修订)

1929 年 4 月 22 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晚间会议

鲁祖塔克: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开会。

喊声:开吧。

鲁祖塔克:斯大林同志发言。(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反对派的某些同志的发言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之所以不想谈,是因为我犯不上替自己辩护。大家都是有经验的人。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你们自己能够做出判断,你们手里都有书,用不着我多谈这件事。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谈布哈林同志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读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在私交上是朋友,可是却分道扬镳了。他不满意。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发言也流露出这种口气。托姆斯基同志也带一点这种口气。他们说,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可是突然彼此不能互相尊敬了。

首先,我应当说明一点——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們老,那就很糟糕了。老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即使他活到 100 岁,他也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也绝不能突出私人友谊问题。因为如

常言说的,友谊是友谊,公事是公事。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果私人友谊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那就让私人友谊靠边站。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

我也不想谈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中所夹杂的那些对个人的影射和隐约的责备。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是工联主义政客的典型演说,想用政客手腕来代替政治。

如果谈的是某些人的个人品格,如果谈的是友谊,如果谈的是某些同志的粗暴或者温柔问题,如果还引用了列宁同志那封著名信件的某些段落,那是怎么回事呢?曾经几次提出过我根据党的意志担任某种职务的问题,我曾经几次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你们是非常清楚的,党也几次拒绝解除我的这个职务。

是怎么回事呢?你们知道,不是别人,而正是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首先反对满足我的辞职请求。这一切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现在事情起了变化,那就请你们做结论吧,我会很高兴。就让反对派的同志们——我把布哈林集团叫做反对派,因为它正是反对派——提出解除斯大林同志职务的问题好了。我想,这是我能够给他们充分支持的唯一问题。私人问题我就谈到这里。

现在我来谈正题。

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还是有两条路线,——同志们,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说,有什么好争论的,总路线我们只有一条,不过有些细微的差别,而差别总是有的,值得为此而大动干戈吗。如果这样说是对的,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那为什么布哈林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企图和他组织派别联盟,在同加米涅夫谈话时要说中央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说如果不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我们的事业就要灭亡?他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为什么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要支持他?如果总路线是一条,那么,怎么能设想遵循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陷害遵循同一条总路线的另一部分委员呢?同志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说法怕是不对吧。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同志1月30日的那个声明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三个人2月9日的声明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责备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责备党培植官僚主义,责备党瓦解共产国际。

也许这些声明已经不复存在了?也许这些声明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了?我想,这些声明是错误的。那就让他们——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承认这些声明是错误的,他们放弃这些声

明吧。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同志们,怎么回事呢: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么,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实行这种政策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又是培植官僚主义,那么,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而不和它斗争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又是瓦解共产国际,那么,李可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难道想和我们一起瓦解共产国际吗?

关于共同路线的话有点不对头。不能相信李可夫同志说我们有一条共同的路线。同志们,这不能成立。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有共同的总路线,而只有细微差别的情况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坚持辞职政策长达半年之久,难道这是可以设想的吗?我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实行的辞职政策。

当时他们辞去职务,是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线。他们要求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成立社会主义的政府,也就是联合政府,而我们,中央委员会,要求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不是联合政府。当时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所以辞职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从原则上说是有道理的,可是现在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一条,——既然是一条,那么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进行工作的六个月内,顽固地一再提出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同志们,关于一条路线的说法不大对头。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政治局表决关于五年计划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提纲时,政治局中的三个人投票,其实是不投票,而是弃权呢?大家的总路线是一条,而有人在我党现行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在五年计划问题上竟投了弃权票,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不,同志们,世界上是不会有这种怪事的。不,同志们,李可夫同志说我们的路线是一条,这话不对,他要么是说走了嘴,要么是说了谎。很遗憾,同志们,我们的路线不是一条。这是机会主义者常用的手法——掩饰自己的嘴脸,如果没有一致的路线,就说有一致的路线;如果搞一条和党的路线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就把窟窿堵上,做得含含糊糊。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我认为,在这方面,在我们党是否存在一条统一的总路线方面,李可夫同志的发言是标准的机会主义的,否则他为什么不恢复政治局委员会在2月7日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建议,建议他放弃1月30日的声明(他对党提出了三项主要指责:实行对农民的

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建议他这样做,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也同意取消这个问题。同志们,我们政治局委员会确实是这样做的。同志们,我们当时对他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1)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布哈林同志承认和加米涅夫同志谈判是政治错误;2)布哈林同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的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3)根据这一点,布哈林同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4)布哈林同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5)因此,布哈林同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的一切文件(发言的速记记录等等)。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责任编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政治局委员会建议布哈林同志,同时也是建议他的伙伴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接受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又重复了一次,但是遭到了拒绝。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而我们大家都希望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特别是我,对这些争论感到厌烦了——如果他们拥护统一,如果总路线是一条,为什么他们不接受这个建议呢?这是最大限度的妥协呀。为什么他们要拒绝呢?作为答复,他们在2月9日发表了声明,再次指责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瓦解共产国际。同志们,请看,说政治局的多数同布哈林集团有统一的总路线好像不大对头。李可夫同志不过是极力把事情掩盖起来,关于统一的路线,关于总路线他只是装装样子罢了,实际上他是在暗中破坏这条路线。这就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我想引证列宁同志的一段话,他对机会主义者的面目刻画得十分深刻。列宁说: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读引文)……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

这就是李可夫同志的面目和他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发言的主要实质。

卡冈诺维奇:说得对。

斯大林：不是的，同志们，很遗憾，我们的路线不是一条。我们，布尔什维克，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但愿我们别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

伏罗希洛夫：但愿如此。

斯大林：我们要敢于面对真理，虽然它使人很痛苦。真理就在于我们并没有一条统一的路线。有党的路线、革命的路线，还有布哈林集团的路线、机会主义的路线。那么我们的意见分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们首先是和最近我们国内以及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阶级变动问题有关的。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察觉到，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发言里谈过我们的分歧同我们国内和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的阶级变动的关系。既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点暗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国内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的阶级变动。他们不明白，他们害怕这种变动。正因如此，他们在我们面临的新任务面前，在我们和欧洲所面临的转折面前解除了武装。

同志们，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一切事情的基础，我们国内、党内、中央内部（因为中央没有脱离党和国家）所发生的一切的基础是我们国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那些新的阶级变动。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提出了许多口号，我不妨说，简直是令人头昏眼花的口号，有些……倾向的党员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

最初，我们因为沙赫特事件而重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问题，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红色专家来代替旧专家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又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因为农村中富农阶层的势力加强了，粮食采购中出现了漏洞，我们的许多机构或者是不中用，说得厉害一点是腐化了，不能同富农展开斗争。

事情进一步发展到我们着重提出了在我们所有的机构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简直就是所有的机构——党的、工会的、贸易的、工业的机构。

事情又发展到由于提出了改造工业时期的新任务，就产生了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这些任务要求重新审查工会的全部实际工作，因为，同志们，如果以为我们无须把全体职业上有组织的工人发动起来，无须放弃工会老一套的做法，放弃自流和暮气沉沉这些对于降低成本和改造工业有致命危险的做法，就能够完成改造的任务，完成对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那就太可笑了。

还有，由于粮食采购的困难，提出了大力发展集体农庄，大力发展国营农场



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查我们的合作社和经济组织的全部工作,要求加强工作,培养改造农业的新干部。请大家注意——改造农业,就是把2500万农户,把2500万农民经济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这是要提高一片汪洋大海。

然后,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这就意味着一切组织的革命,从上到下的一切组织,党的组织和非党的组织。他们必须把自己置于自我批评的火力之下,为的是使自己适应新任务,摆脱腐蚀,抛掉渣滓,像一把刀那样磨砺自己。

最后,关于清党口号的问题。如果不清洗党本身,我们就不能巩固自己的组织,就不能改善它们,巩固它们。请看,有多少问题,挠头的问题,所以一些惊慌失措的党员就嚷嚷起来了:这叫什么话——那边让你组织,这里又是自我批评的口号,那边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里又是清党,清理国家机关。真糟糕。怎么回事呢?问题在于我们提出了新任务,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而我们的阶级敌人没有睡觉,它们在做准备,通过城市资产阶级向我们迂回前进,这在沙赫特事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不是孤立事件,不仅在煤炭工业中,而且在军事工业中,在交通中,化学工业中都有这样的破坏者。请大家注意,敌人在进攻,农村中富农的反抗在加强。可是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迄今为止,譬如说在1927年,富农都交出了粮食,后来就不给了呢。难道是粮食少了吗?其实问题很简单:过去富农还没有积攒自己的家业,还没有发展各种经济,购买机器、拖拉机等。过去就是这样。所以他不得不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以便积累流动资金,而现在他站住脚了,他可以灵活运用,可以把粮食囤积两年,而用家畜、燕麦、干草、蜂蜜、向日葵,用随便什么来周转,他可以灵活运用,因为他有力量了。他想破坏我国的价格政策。这就是国内发生的变动,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无论城乡都有了巨大增长。这一切不能不使局势尖锐化,不能不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因此有了重新组织,重新安排自己的力量,磨砺所有的机构,为迎接社会主义成分的前进做充分的准备。这是国内的情况。而在国外,在资本主义各国也在发生新的变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欧洲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方面是资本的进攻加强了,同盟歇业制度现在已经是常见的事了,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反攻,工人阶级的左倾化,右翼斗争的加强,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在增加,以及与此相关的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尖锐化,同党内的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稳定性日益受到侵蚀,不断为新的革命高潮准备着条件。同志们,这就是在我国和欧洲正在发生的那些阶级变化。那些看到了这种变化的人,看到了这些阶级变化的人,就懂得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的技巧,就像渔夫那样,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阶级斗争。有这样的渔

夫,他们在风暴起来,小船摇来晃去的时候,敢于破浪前进。这是一种渔夫。还有另一种渔夫,风暴一起,他们就躺到船底下,还能往哪儿去呢?听天由命吧。这是第二种渔夫。在我们说到布哈林同志的这个集团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这种渔夫。他们不懂得我国和西方的阶级变动。

他们不明白,当阶级斗争打到他们脸上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起来。他们经受不住,于是躺到船底下,哎,听天由命吧。

**伏罗希洛夫:**常言道:渔夫老远就能认出渔夫来。

**斯大林:**风暴里是认不出来的。我们必须磨砺我们的一切组织,加强自我批评的口号,我们首先必须磨砺我们的党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脏东西,必须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不是麻痹工人阶级,而是使它保持充分动员的状态。当我们在干这件事的时候,在共产国际和我们联共党内干这件大事的时候,这些同志,这些躺在船底的渔夫,却把我们的全部工作看成是对他们进行的人身攻击。这真是可笑,这是瞎子。我们必须磨砺共产国际的所有组织,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渣滓,清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加强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训练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战斗,不断地选拔能抗御风暴的新领袖,可是他们却说:你们在对我们进行恶意攻击。这难道不可笑吗?这是瞎子。我们必须在国内转变我们的全部工作,以便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新任务,迎接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活动,而托姆斯基却说是对他的恶意攻击。我们要重新审视报刊的工作,而布哈林却说是对他的恶意攻击。我们要磨砺我们所有的机构,而李可夫却说是对他的恶意攻击。这不可笑吗?人们只看到自己的肚脐,却看不见国内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看不见我们正在进行改造,在发动新的阶层,开始改造的伟大事业,逐步改造千百万个农业组织、农业单位(农民),正在重新装备工业,在共产国际方面正在掀起从共产党内清除社会民主党渣滓的高潮。可是这些他们都看不见。在他们眼里这都是个人事件,是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恶意攻击。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这就是糟糕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分歧的根源。在风暴来临时,有迎着风暴,破浪前进的渔夫,因为他知道要到哪里去。可是也有这样的渔夫,他们躺在船底下,任凭波浪把他们带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分歧的基础。所以每当这些同志只看见自己的肚脐,别的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政治局的多数都感到好笑。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阶级变动,看不见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看不见那些不解决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来看看共产国际方面的问题。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争吵是从哪里开始的

呢?事情是从布哈林同志向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国际形势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提纲开始的。这个提纲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这个提纲在送交联共代表团的同时,也分发给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

于是我们的代表团,联共代表团,还有德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都明白了这个提纲不合适。我们联共代表团不得不对这个提纲提出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3或25处修正。

斯克雷普尼克:有五十多处呢。

斯大林:这种情况当然使布哈林的声誉受到影响,但这是谁的过错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和联共代表团打招呼,就把自己署名的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呢?后来联共代表团提出了一份新提纲,做了重大改动,新提纲如果和布哈林的旧提纲加以比较,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布哈林同志提纲中的第四个问题应当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就这个问题做出修正,我不说其他次要问题。这些修正后来布哈林也是接受的。这就是稳定问题。按布哈林提纲的说法,资本主义世界里并没有发生什么足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稳定性的新事情,相反,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对第三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国际范围内正在经历的时期,做这样的评价是我们联共代表团不能同意的,因为保留布哈林提纲的说法就是给批评我们的人帮忙,就是使我们站到了资本主义正在恢复的观点上,也就是希法亭的观点上,而我们共产党员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的。我们做了相应的修正,从中可以看出,现阶段的稳定是摇晃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摇晃得更厉害。同志们,这给各国共产党,也就是我们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明确方针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稳定是否动摇,是不是越来越动摇,它决定党在整个政治活动中遵循什么方针。我们正处在单纯集聚力量的时期,就是革命的低潮时期,还是处在训练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and 工人阶级自身准备迎接新战斗的时期,也就是准备打碎旧制度的时期。这是两回事。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说,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是基本任务之一。可是在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关于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谈到,而左翼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最厉害、最狡猾,因此也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对此做了修正,因为不做这个修正就不能武装共产党去有效地开展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的斗争。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党内部的调和态度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说到必须和右倾作斗争,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必须同时和对右倾的种种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问题在于:如果只谈和右倾作斗争,而忘记了同调和态度作斗争,

所有的右倾分子就都说自己是调和分子。那你还怎么去抓他们呢。我们做这个修正的用意在于将反右倾斗争放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没有同调和态度的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同右倾斗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纪律的问题。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可是既然要加强我们共产党内的自我批评,加强从我们共产党内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渣滓,加紧同右倾分子的斗争,事情就很明显,党内的右倾分子总是组成派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派系集团,破坏党的纪律。因此我们联共代表团提出了第四点修正,关于党的纪律,党必须有铁的纪律。

同志们,这就是政治局的多数同布哈林同志之间出现分歧的第一阶段,我们不能不提出这些修正。我们不能因为爱布哈林同志,就似乎不爱党,不爱共产国际。古时候,关于柏拉图这位当时最有权威的人物之一(他的权威可是比布哈林同志大多了),有人说过,我们爱柏拉图,但是我们更爱真理。现在也可以说,我们爱布哈林,可是我们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同布哈林同志的私交,为了他的威信,而不提出这些修正;不做这些修正,提纲就没有用。我要说,虽然布哈林同志接受了这些修正,后来也按经联共代表团修正的提纲做了报告,但是他没有贯彻到底,而在后来的发言中千方百计地避开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事实,是抹不掉的。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同志向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报告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积极分子会议根据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莫斯科的积极分子会议,是首都的积极分子会议,全党,甚至可以说共产国际的各党都在注意着,可是它的决议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调和态度作斗争。没有一个字!这是谁的错呢?当然是布哈林同志。我们就这个问题争论过,联共代表团修正了他的提纲,他怎么能忘了呢?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二阶段是所谓维托夫和台尔曼事件。同志们,你们现在从共产国际史中知道了,那是不对的,那次事件可归结为利用维托夫这个汉堡党组织书记的事件,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一开始是不明显的,但是后来连瞎子都能看清楚了。布哈林同志引用了这件事的一些事实,他抱怨说,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很好地了解情况,他当时在北高加索,我也在北高加索,我们在两个地方,共产国际就问我们,怎么办?事情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反对台尔曼同志的决议(对于他的革命性我们无权怀疑),台尔曼同志事实上被解除了工作,可是根本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而是让它面对已经在报刊上发表的既成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布哈林同志用密码电报

回答共产国际说：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必须通知政治局……(读电报)”

请看，台尔曼已经受了一次侮辱，因为发表了德共中央的决议，现在布哈林建议他再一次侮辱自己，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过失，承认开除维托夫，同时也承认自己被解除工作。“然后共产国际可以指出问题业已解决……(读电文)”。这就叫做领导！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哈特利用了维托夫事件，拉拢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变了领导，排挤了台尔曼同志，而且公布了自己的决议，把台尔曼没有做过的事栽到他头上。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现领导是正确的。格哈特和埃韦特却利用维托夫事件，撤换了这个领导，党的领导就转到了调和分子手中。而应当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布哈林同志却说：“台尔曼呐，别人朝你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公布了中央的决议，现在你自己再吐一口吧，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而让共产国际记录在案。它不便反对德共中央。”

难道有这样的领导吗？这不是领导，这是小学生！难道可以这样来领导党吗？谁还能信任这样的领导人呢？也许，你们愿意听听我是怎样回答这封电报的？

臧声：是的，请你念吧。

斯大林：我那时在索契，布哈林同志在基斯洛沃茨克。我是这样写的：“由于我不了解全部材料，(读电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这就是说，调和分子利用台尔曼的错误，扭转了党的方向，把握了党的领导权，违反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共产国际应当拨正方向，赶走调和分子，让台尔曼回到领导岗位上去。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两封电报并同意以我的回电作为基础。这又是布哈林同志所不喜欢的。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难道能这样领导一个党吗？这是小学生，而不是领导人。这当然又是布哈林同志不满意的。他抱怨说别人不听他的。既然不按六次大会的要求去战胜调和分子，反而让他们成了党的领导，从而削弱了反右倾斗争，还为此利用了同党的政策毫无关系的一次偶然事件，别人怎么还会听你的呢？可是布哈林同志批准了这些事，还想让别人也赞成。他难道是发疯了吗？

我们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的第三个问题，如果愿意，也不妨叫做第三阶段，是在解决了维托夫事件之后反右倾分子的问题。关于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问题，关于开除布兰德勒与塔尔盖默的问题，关于共产国际的公开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时布哈林同志都没有参加。他回避了，躲开了。他是共

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如果不说是主要领导人的话,他是联共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联共代表团曾经事先研究过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问题,召开过几次会议,等过他,可是他没有来。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共产国际反对德共党内右倾的公开信问题,可是布哈林同志不出席。这也叫做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过了一个月,全世界,连房顶上的每只麻雀都懂得不开除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是不行的,只是在这以后,布哈林同志才在政治局开会时说,他也赞成开除布兰德勒。可是在这之前,在一个月、两个月以前,当必须负起反对右倾、反对布兰德勒—塔尔盖默(他们得到像克拉拉·蔡特金这样的权威人物的支持)的全部重担时,布哈林同志却不见了。看不见他了。

第四阶段是和第三阶段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央十一月全会前,当时正在讨论共产国际的问题,而且是作为有争议的问题来讨论的,布哈林同志提出了要求。他说台尔曼同志似乎在一次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布哈林同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要求台尔曼放弃自己的讲话,——这正是德共中央同业已组成了派别的右倾分子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右倾分子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同德国共产党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

我们问他,在这种时刻,怎么能要求台尔曼同志放弃自己的讲话呢?即便你能够证明他反对你了,何况你没有证明,请你拿出材料来。可是他不但没有提出文件,反而把洪别尔-德罗在共产国际主席团发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演说分发给政治局委员,而这篇演说正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演说。

我们问他:全在这里了吗?布哈林同志,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文件?他说:都在这儿,你们看吧,我同意这篇讲话。

请看,在这之后怎么还能保护一个站在洪别尔-德罗立场上的人。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这之后布哈林同志当然有点尴尬,所以他就不到共产国际来了。我们每次问他:为什么你不愿意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却说:那儿都把我叫做右倾分子,敌视我,不肯帮助我,没有人同情我,我没法工作。

经过这些事之后形成的气氛自然让布哈林同志确实没法工作。

国内政策问题。联共(布)党内问题。我已经说过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我说过人们是多么庸俗地,多么个人主义地对待这件事情。

布哈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李可夫同志是从对他们进行恶意攻击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如果确实想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不认真对付,不能不考虑的那些重大变动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我说过这些同志患了盲目症,很遗憾,他们看不见阶级斗争,看不见阶级变动,不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

有人会问:这种盲目症是怎样发生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转到阶级斗争问题。我认为这种盲目症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反对派的领袖布哈林同志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有些人在这里屡次引证布哈林同志的一本小书《到社会主义之路》中那段人所共知的話。让我把这段话引证出来,为了说明布哈林同志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地对待我国的阶级斗争问题。

这本小册子(他没有放弃这本小书,而且又一次肯定了其中的主要原理)中说:“所以说,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读引文)……像租让企业那样。”

有些同志引证了布哈林同志小册子中的这段话,可是把最后一句话遗漏了,而罗济特同志大概想给布哈林帮忙,就从座位上喊起来:“可是他在那里说的是承租企业家。”可是却给他帮了倒忙。

关于承租企业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长入社会主义的不仅有富农,而且有承租企业家。(场内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可惜哈里曼已经离开了苏联。

伏罗希洛夫:那就只好不管他了。

斯大林:结果就是这样。

罗济特:这里说的是“异物”……

斯大林: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通过银行等等长入这同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异物,就像,比如说,承租企业那样,也就是说,富农的企业和承租企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异物,都能长入社会主义。

罗济特:就是在长入嘛……

斯大林:我们这些幼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也就是富农和,比方说,承租企业家,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听不清的插话)我们大家一向认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可是现在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不是不可调和,而是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罗济特:这样说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前提的。

斯大林: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

罗济特:问题就在这里。

柳布琴科:他希望你不要专政就长入。

**斯大林:**结果成了这样,资本主义也长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须要斗争呢?

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喊声:**听不见,请对着话筒说。

**斯大林:**我说,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镇压资本主义,为了同它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既然资本主义也会长入社会主义,那么是同谁斗争呢?

**罗济特:**问题就在于它是在长入。

**斯大林:**我看他是发誓要为布哈林同志效劳了,但是他事实上却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全场哈哈大笑)

**喊声:**不对,不是这样的。你不懂俄国谚语。

**斯大林:**我只是不想做“粗鲁无礼”的人。

**施利希特尔:**外交辞令。

**斯大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城乡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或者是只有阶级利益的协调,有一种协调理论……

**罗济特:**布哈林并不以协调为前提。

**斯大林:**有一种协调理论。

**喊声:**还有长笛呢。

**斯大林:**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协调一致就是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不可调和斗争的理论。罗济特同志,这两者绝对不能混淆。这种话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说的。法国的布伦坦诺或英国的维伯之类的社会主义者这样说还可以理解。他们鼓吹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可以长入社会主义。他们可以这样说,而我们直到今天这样说都是不行的。布哈林同志把列宁同志简单化了。他说:“你们何必骂我呢,嗯,比方说,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机构体系可以有各种途径。”——罗济特同志认为,承租企业家也可以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列宁本人不是也这么说吗”……

**罗济特:**我没有这么说过。

**斯大林:**是布哈林说的。我们看看列宁的话吧。对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读引文)

这不是说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容许合作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消灭资产阶级,而容许他们在我国,在我们专政的条件下存在。可是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将长入社会主



义吗?没有这回事。这是从何谈起?不能这样诽谤列宁。幸好我们还活着,还有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学生,他们绝对不会让别人诽谤列宁。相反,要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出几百处、几千处讲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的地方。我可以随手引证列宁的话,例如,列宁在送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就这样说过:“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读引文)”。

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通过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罗济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要曲解布哈林的意思。

奥尔忠尼启则:也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乌加洛夫:等他累了,我就说。(场内笑声)

斯大林: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这是列宁的公式。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它说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放弃阶级斗争,通过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是布哈林的理论。

罗济特:这话不对。

斯大林:他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是讲坛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这个错误,从对我国阶级斗争的错误态度就产生了布哈林同志的第二个错误。我谈到他是因为他是新反对派的领袖。

布哈林同志从第一个错误中产生出来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抗问题的错误。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并不是说我们越是前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就越是加强。这里说的不是这个。这里说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会加强。

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解释十分奇怪,他用机构观点——绝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请听:“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读引文)”当然,这不是最尖锐的形式,因为还有更尖锐的形式,比如暴动。不过,就算这是最尖锐的形式吧。接下去:“(读引文)……直至绝迹。”

罗济特:这不过是布哈林举的一个例子罢了。

斯大林:我知道罗济特同志是满心希望保卫布哈林同志,可是他的保卫无济于事,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谈的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

罗济特:这仅仅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个例子。(场内喧哗声)

柳布琴科：他这是在履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呢。

斯大林：怎么能说是一个例子呢？布哈林直截了当地说：“随着这些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越来越来少，以至最后绝迹。”罗济特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呢？

罗济特：请你重复一下结尾。

斯大林：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1927年时，我们的工作是自流的，1927年我们采购的粮食很多，根本谈不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这么说来，我们苏维埃机关那时都是理想的，都好得很。1928—1929年才出现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情，就是说，1927年以后我们的苏维埃机关、苏维埃组织才变坏了，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了阶级斗争尖锐化。这是胡说八道。难道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这样来解释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吗？不能，绝对不能。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应当怎样来解释阶级斗争尖锐化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前进了，社会主义成分增加了，工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增长了，和这种增长同时，一些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相应地被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按列宁的公式“谁战胜谁”在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翻在地，同他们，用列宁的话来说，进行最后的决战，或者是我们被他们打翻在地。资本主义分子每前进一步，这对于我们就是损失，是我们之间的斗争尖锐化，相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每前进一步，这对他们，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无疑就是损失和阶级斗争尖锐化。这就是说，我们的前进——这是第一个原因。再有，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的绝对增长，他们的作用相对降低，因为我们增长得比他们快，可是他们也是在增长，他们的绝对值的增长使他们能够站稳脚跟，灵活机动地反对我们的政策，比如说，反对我们的农村价格政策。我们的增长排挤了资本主义分子的某些阶层，迫使他们反抗，罗济特同志，你永远也找不到垂死的阶级和平地退出舞台的事例，从来没有这种事。不管我们的苏维埃机构是好是坏，因为我们的前进而将被排挤的阶级、垂死的阶级会拼死反抗，垂死的阶级决不肯自愿地退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舞台。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诀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这就是我国资本主义分子反抗增长的原因。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第二个错误在哪里呢？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增长和他们比重的增长混淆起来了。这是不对的。如果他们，资本主义分子，进行反抗，这并不是说，他们变得比我们更强大了。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进行反抗，他们的反抗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日益衰弱。是因为我们成长得比他们快，他们感

到自己的衰弱,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所以我国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才加强了。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反抗加剧的原因。如果事情是像布哈林对阶级斗争、阶级反抗的理解那样,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如果事情像布哈林对问题的理解那样,问题仅仅是在机构,那我们就用不着大声疾呼,用不着让无产阶级保持着动员状态。因为按照布哈林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解,用不着唤起工人阶级,提高它的战斗力,所以这是有害的理论。既有害,又危险。我们的政策、我们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反抗加剧的理解是:看到垂死阶级末日的来临,看到他们反抗的加强,要让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保持战斗的准备状态,保持动员状态,以便在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采取内战形式的时候,进行回击。这就是两种完全对立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

第三个错误涉及农民问题,特别是中农问题。在我们政策和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的农民问题上,布哈林同志和他的集团也有许多差错。在布哈林同志看来,我国的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就是这样描绘的,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做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我国的中农难道像中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这难道是贫农吗?他生活得那么艰难,只能糊口罢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这是美化现实。这个奇特的公式否认农民中现有的阶级集团之间的差别和分化。正确的是列宁,他说,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他这样说对不对呢?他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的。应该怎样理解呢?应该这样看:农民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阶级,它,按列宁的说法,每日每时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资本家来。农民中有贫农,有不断分泌出富农的中农,还有不断分泌出更大的资本主义分子的富农。所以他才把农民称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如果像布哈林同志说的那样,农村只是一片贫困,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那么很明显,农民就不是那个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分子的阶级。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

我顺便就被解除了职务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彼得罗夫斯基的事说两句。罗济特同志几次谈到这件事。我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列宁格勒真理报》寄去我关于粮食问题的一篇讲话。这是同红色教授学院谈话的一部分。其中引用了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那段话。

我在那里说明,正因如此,我们同基本农民的联盟就意味着同每日每时从农民中分泌出来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

臧声:有人责备你右倾,你老是朝右边看。(场内笑声)

斯大林:你们想得到吗?我引的列宁的这段话被编辑部勾掉了。(场内笑

声,喧哗声)

**乌加洛夫:**可是彼得罗夫斯基并没有参与这件事。

**斯大林:**很抱歉,乌加洛夫同志,很抱歉。

**奥尔忠尼启则:**乌加洛夫来接罗济特的班了。

**伏罗希洛夫:**也来履行职责了。

**斯大林:**我就这件事给他写了封信。我问他是怎么回事?第一,我们有决议,不经作者同意,政治局委员的文章不能删节,其次,如果你想删,为什么删掉了列宁的引文。他回答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谁能相信是地方不够呢。总共才三行字,谁能相信呢,《列宁格勒真理报》就找不出地方来登。看来,是编辑觉得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话是不对的。

**奥尔忠尼启则:**是异端邪说。

**斯大林:**对,是异端邪说。那么,列宁说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因为它分泌出资本主义分子,这话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基本群众结成联盟的思想是否矛盾呢?伊里奇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就在这次大会上他宣称,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也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工农联盟。那么他当时为什么要把农民定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是为了表明,工农联盟只有建立在同从农民中分泌出来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才是牢固的。

这才是对待农民问题,对待和农民结成联盟问题的正确态度。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农民结成任何一种联盟,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和全体农民,而仅仅是同农民的多数,同贫农和中农群众结成联盟,反对的也是农民一部分的富农。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种联盟,而是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联盟,建立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伊里奇就是这样看待工农联盟问题的。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把农民说成是一堆穷人,而不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显然是向我们暗示,我们必须保持……

**米高扬:**在致富的过程中。

**斯大林:**〈必须保持〉和农民的某种联盟,仿佛任何一种联盟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有用的。我是这样理解他的声明的。这不对,绝对是不对的。他和列宁对工农联盟的理解不沾边。

请看列宁是怎样谈工农联盟的。列宁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妥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是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

行的……(读引文)”

不是任何一种工农联盟都需要,需要的是能够巩固工人阶级、能够在联盟内部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联盟。列宁还说:“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领导着政权。它领导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的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这就是对工农联盟的看法。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而且不是随便什么联盟,而是能够巩固工人阶级政权及其专政,能够保证工人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领导权的联盟。我们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和农民的联盟,而是一种准备消灭阶级的联盟。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在同中农打交道,而中农是一个中间阶级。它一方面是劳动者,接近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又是私有主,因而接近资产阶级。谁看不到中农的这种两重性,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影响到理论,影响到政策,而且影响到市场。这里列宁同志关于农民,而且他指的是中农,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由于中农地位的两重性而产生的这种两重性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同时也就是确立国内工人阶级领导的思想。同志们,我看不出布哈林同志有这种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几乎是确信,布哈林不想搞明白这些细节问题。而赞成和农民的随便什么联盟。这从我要讲到的下面一个问题,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市场问题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喊声:**休息,休息!

**斯大林:**难道我真的讲了很久了吗?

**喊声:**请你接着讲吧。该休息一下了,那样可以平静点。休息吧。

**斯大林:**我不需要休息,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鲁祖塔克:**要休息吗?谁赞成休息?谁赞成不休息?多数通过。

**斯大林:**新经济政策问题。从前面讲到的布哈林同志的所有错误: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尖锐化、农民问题、工农联盟的基础问题,从所有这些问题中产生的下一个错误就是他在新经济政策上的错误。

他看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新经济政策的锋芒,它的一个锋芒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我们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它的锋芒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容许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没有的、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这一方

面布哈林同志记住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更重要、更有意思的一方面,布哈林同志却不曾看到,或者故意忽略了。新经济政策的另一方面就是新经济政策绝不是容许完全的贸易自由,绝不是容许在市场上价格可以自由浮动。新经济政策没有这个意思。新经济政策是在国家及其机构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贸易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在我国市场上没有像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那种价格自由浮动的现象。粮食价格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工业品价格也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资本主义市场上有这种事吗?我们努力抑制工业,不让它取得太多利润,使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因为工业品涨价不是我们的政策。同时在粮价有所提高之后,我们努力保持这些价格的稳定,排除了价格的自由波动,因为这使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活跃起来。这股自发势力想破坏事情的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实行了价格的自由波动,而布哈林同志在谈市场规范化时,在谈扩大商品流通时,在发出叫嚷时,在他说我们是商品的供应者,怎么能这样做时,他正是围着这个问题在跳舞。农民是商品的供应者,怎么能这样?他是在寻求,在指望,而且在努力提高到有价格自由波动的市场制度上去。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正在敲这扇门。当富裕的农民或是富农春天因为不满意我们的粮价,就把粮食囤积起来时,他们想干什么呢?是谁在帮助他们呢?是投机分子,他们支付两倍的价钱。有钱的富农想要什么呢?搞垮我们的价格。请你们读一读农民的信吧。富农也是农民,是有钱的农民。贯穿这些信的红线就是要价格自由。如果容许价格自由,又会怎样呢?布哈林同志围着这个问题手舞足蹈。如果容许按地区机动,提高粮价,那又会怎样呢?假定我们这样做了。今天我们提高了粮价。贫农秋天交出了粮食,而富农和富裕的农民通常是把粮食囤积到春天或是冬末,因为他们能够用其他商品来周转。事实就是事实。两年的实践表明,比如说,我们,就是国家,需要5亿普特粮食,用自流的办法,用通常的市场关系可以采购到3亿—3.5亿普特,其余的1.5亿普特就只好用有组织的办法,用捐献的办法,用施加压力的办法等等才能拿到。这是事实。两年来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补充我们必需的粮食储备的。显然,如果我们今天再提高粮价,投机分子一定会付两倍的价钱。到了春天又会出现粮食困难。也就是说,还得提高粮价。我们反正是赶不上投机分子的,我们也没法超过他们。这样一来,到了春天或是冬末,就是贫农已经在秋天卖出了自己的粮食以后,把价格再提高10—20个戈比,而投机分子则再提高一倍。

我们只好又提高价格。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买5亿……而是几百万。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明天、后天都提高粮价,因为没有办法。

如果想得到粮食,而又不得罪富农和富裕农民,只能这样办。只好压其他农产品,因为畜产品、谷物类产品和其他农产品之间总得保持一定的价格比例。于是就要提高工资。因为我们在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时,不能不提高城市中的粮食销售价,同时提高工资。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我们不能委屈工人。既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就得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否则怎么办呢?否则工业怎样运转呢?结果是:我们暂时缩小了剪刀差,但不是降低成本的基础上,而是在片面提高粮价和畜产品价格的基础上。工资要涨,工业也只好提高产品价格。结果我们只好放弃逐步降低工业品价格和稳定粮价的政策,以及随着粮食生产技术的改进而降低粮价的政策,而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我们放弃了这个明确的政策,而滑到另一种政策上去,滑到在不断涨价的基础上安排剪刀差的政策上去。这打击了谁呢?贫农、农村中的弱势阶层、工人阶级。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城乡资产阶级。这无疑也是一种结合。请注意,这也是一种同农民的结合,然而同哪些农民呢?同富裕阶层结合,而同贫农破裂,同工人阶级破裂。任何一个工人都会说,既然你们的商品太贵,贫农买不起,你们算什么政权,见鬼去吧。既然粮食和肉类等等畜产品的价格这么高,工人买不起,你们还算什么工人阶级政权。

我想,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要破坏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政策,布哈林则跟在它尾巴后面。他从我们的价格政策滑到了另一种价格政策,资产阶级的价格政策上去,滑到了在提高价格的基础上平衡商品流通的政策上去。这只能导致国家同富裕农民结成联盟,而无疑地同贫农破裂,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贫农的政策。这就是布哈林的方向。问题的第二方面表现为国家不能调控价格。结果怎么样呢?加强了富农的权力,富农对农民的经济权力和剥削权力。这就是错误政策。

贡赋问题。

我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中,在报告中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这对不对呢?对。我们还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剪刀差”,另一种说法是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把资金从农业“抽入”工业。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发展的一定速度,是否须要把一部分资金从农业“抽入”工业呢?须要。我有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的讲话。他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我不记得他们有过)必须从农业中抽一部分资金用于加强发展工业。我有一系列我国最高层的决议,谈到我们现在还不能消灭剪刀差。这就是剪刀差、抽入、超额税。我把它叫做“一种类似

贡赋的东西”，用这个字眼是为了醒目，提醒人们要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改进技术，使生产合理化，继续执行工业品的价格政策，从而拉平，加快拉平的时间，加速取消我们现有的剪刀差的时间，降低我们现在承认的，但是最终必须尽快摆脱的最低限度的抽入。也许布哈林同志现在不承认抽入的理论，那就请他明说。也许李可夫同志不承认？也许罗济特同志会不停地插话，也许他不承认抽入？

**罗济特：**抽入是需要的，但“贡赋”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场内笑声）

**斯大林：**安静些，罗济特同志，别激动，激动对神经质的人来说是有害的。这样看来，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并没有意见分歧。我们只能把一些资金从农业、从农民“抽入”工业，来保证工业发展所必需的速度。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抽入的问题、剪刀差的问题等等不是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问题，这已经得到证明了。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是用词不当吗？是这样吗？我说的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超额税，不是贡赋。

**罗济特：**决议里用的是“贡赋”。

**斯大林：**这话不对。决议里说，苏联的经济制度排除对农民的任何剥削。这都是事实，就是说，谈的是字眼，虽然我用的不是贡赋，而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认，甚至用于工人阶级。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这怎么可能，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或是在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的决议里，或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里怎么能用斯大林的话——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而且还得到了公认。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举出列宁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1918年初的讲话。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写道：“保留着坦克的小资产阶级……（读引文）”。“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读引文）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罗济特：**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用过“贡赋”这个概念。

**斯大林：**如果你以为中农比工人更靠近我们，那你就太丢人了。我见过许多傻瓜，可是像你这样的还没见过。（场内笑声）

**罗济特：**其实这话并不俏皮。

**斯大林：**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赋”，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你们会说，这是列宁同志偶然的失言。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接着看下去，在列宁的一个小册子《论粮食税》里，这些话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你们再拿《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来看



一看,这里也说到这段引文。再看《列宁文选》第15卷第266页(这是1918年末),关于贡赋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里又重复这些话。再打开第18卷,第一部分,第205页,这段引文从头到尾重复了三遍。同志们,我要说,我有幸同列宁做了伴。

**奥尔忠尼启则:**就是这样。

**斯大林:**既然对于工人都可以说他因为混乱、因为组织得不好、因为缺点而付出了贡赋,是加括号的贡赋,为什么对于农民就不能谨慎地说“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呢,何况我还说了剪刀差、超额税、补充税,为什么就不能这样说呢?

**罗济特:**这不是对工人阶级,而是对专家说的。

**罗伊津曼:**可以说,也应该说。

**斯大林:**像《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左派幼稚病》、《论粮食税》这样的著作里,列宁把这些话重复了三次,我认为这些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你们怎么看呢?我甚至没有料到,在列宁同志的著作里贡赋这个词会得到了公认。

当布哈林同志谈到马克思主义者不该这样说时,他指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如果指的是施列普柯夫、马列茨基、彼得罗夫斯基、罗济特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指的是那些更像自由主义者,而不像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他们当然不会这样说。如果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你们就可以看到,带括号的贡赋一词是可以使用的,指的是这件事非同一般,指的是一有机会就应当立即取消这种贡赋。这就是事情的实质。但是“贡赋”问题还不限于此。问题在于布哈林同志挑剔“贡赋”这个字眼,而且似乎党对农民实行的是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这不是偶然的。你们以为,他不过是想出我的丑?不对,他这话是暴露了自己。他是想表示他对于我们实行的党领导农民的政策、对我们的收购价格政策、对我们的组织供应的政策、对我们推行乌拉尔的采购方法的政策的不理解和不满意。这我在下面还要谈。这些他都不懂,所以认为我们是在剥削农民。

这个词是从谁的武库里拿来的,是从哪里拿来的呢?

**柳布琴科:**是从《最近新闻报》里拿来的。

**斯大林:**是从米留可夫的武库里拿来的。“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这是米留可夫的玩意儿。当立宪民主党人想要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是在农民的白骨上搞建设。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附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叫嚣呢?为什么呢?难道他就找不到别的词,找不到米留可夫以外的,别的武器了吗?他怎么会这样来指责党,指责列宁的党

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呢？你们知道，这是怎样的指责吗？这是迄今为止，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只有米留可夫才公开对党提出过的指责。

布哈林同志对“贡赋”问题的挑剔中表现了他对我们现在实行的领导农民的政策完全的、彻底的、深刻的、发自内心的不满。这表现了他心里积累的火气，由于不明白阶级斗争，不明白阶级斗争尖锐化，不明白农民问题，对工农联合持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产生的火气。

喊声：休息。

（宣布休息）

（休息后）

主席（鲁祖塔克）：继续开会。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同志们，我列举了布哈林同志的主要错误。同这些错误有联系的有一个问题，就是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我应当就托姆斯基同志说几句。在他身上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他宣称结合算怎么回事呢，结合的新形式是对列宁纲领的修改，是修正主义。这当然是可笑的事。

我应当说，从字面上看布哈林同志至少还是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他在自己的修正中写道：“鼓励和发展工农业之间、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结合的新形式”。他在对五年计划提纲的修正中承认这些新形式。托姆斯基同志也投票赞成这些修正。政治局委员都知道这事。怎么能够既投票赞成结合的新形式，又声称这些新形式是修正主义，是对列宁的修改呢。这当然是错误的。也许，托姆斯基同志还没有读过“修正案”，就给它投了赞成票了？

奥尔忠尼启则：他完全信任，所以用不着读了。

乌加洛夫：这就不对了；他是聋子，可是阅读能力还是有的。

斯大林：或者是托姆斯基同志并不理解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或者是他闹了个莫名其妙的误会。

什么是结合的新形式呢？这是说，迄今为止，事情是要把转交给农民的原先属于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经营起来，迄今为止实行的都是这样一些结合的形式，其主要基础是商品交换。如今，农业进入了生产改造时期，农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开始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某些过程开始通过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协助下签订预购合同而联合起来，还通过集体农庄（这里联合起来的已经不是劳动的某些环节，而是农民的经济）。在这个时期新基础采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它包括的主要就是签订预购合同,依靠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商品流通保持结合的旧形式,经过结合的生产形式建立新基础。结合的生产形式涉及粮食生产本身,而不仅仅是粮食的商品率,不仅仅是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为农村换来花布等等,为城市换来粮食,而且还有机器、拖拉机,——这对农民改造生产是直接的帮助,而不仅仅是为了多一点花布,可以穿得好一点等等。这是从结合的旧形式(它仍然有效,而且只要还存在阶级,就为我们所需要)转到用新形式对它加以补充。新形式通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通过集体化,它使农民经济能够重新装备起来。

结合的新形式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正在借助工业来重新装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重新装备了农业。

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装备农业。农民总不能使用陈旧的劳动工具,运用自己对农业的原始观念和老经验来满足城市和工业点日益增长的需要吧。在我国,新工业中心像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地增长着,旧中心在发展,新的工业巨人——工厂不断涌现,人口增长得比任何国家都快,工业正在重新装备,——这都是事实,因为工业建设的基础是新技术,而农业却停留在原始的、陈旧的耕作方式上,使用旧式工具,而农民使用旧式工具是不能完成日益增长的我国工业向他提出的那些任务的。我们需要的商品粮一天比一天多,但如果我们不重新装备农业,农民就不能满足需求。而重新装备农业生产,这就是说,要依靠新的结合形式、生产的结合形式。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重新装备工业,改造工业。我们提出了重新装备农业,改造农业的任务。为此必须加紧发展工业,使农业工业化。迅速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广泛采用预购合同……(读文件)。由于个体农业在供应工业和工业点方面,在提供粮食和原料方面都在数量上起过,今天还在起着,而且今后还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它必须大力支持,不过,问题当然在于依靠个体经济满足不了工业城市的需求。仅仅依靠小农经济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但是个体经济今天还是主要的,它曾经是,今天还是,以后也是主要的。但这不够。需要用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用合理的手段,如广泛订立预购合同,逐步把个体农民经济引导到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联合和巩固的道路上去,从而找到一条为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保证千百万农民能够站起来所必需的道路。在个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平等的问题、贫困的问题、农民贫穷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逐步和个体经济脱钩,让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结合,变成集体经济。这是可以使千百万农户站起来,把他们吸引到集体中去,让他们摆脱贫

困的唯一出路。其他出路是没有的。

有人说出现困难的暂时性原因是主要的。我们现在不讨论暂时性原因的问题。奇怪的是有人责备中央,说中央不懂得除了暂时性原因之外,还有由于软弱而产生的特殊的、根本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七月全会的决议里已经公开地、清楚地谈到了。在谈到结合的新形式时,我们宣布:结合的新形式的主要问题在于解决和消除农业脱离工业的根本原因,基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就是说,提高农业,使它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而且能出口一部分粮食,以使用得到的外汇输入机器设备,并且留下一定的储备,准备应付战争、饥荒和其他难以预见的意外事件。基本的道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多谈这个问题了,因为讨论加里宁同志的提纲时,会讨论结合的新形式问题的。所以我只是稍微提一下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主要问题。

布哈林的计划的这一部分。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但实际结果如何呢?他要求的第一点就是使市场规范化,容许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浮动,容许提高粮价,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工业品涨价;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

我引用布哈林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吓唬我们说,我们是揪着农民的头发,把他拖进集体农庄,说这可能造成农业和工业的破裂、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破裂。我来引用布哈林同志至今瞒着中央的提纲,这份提纲他一直不肯交给我们,而是在中央七月全会之前作为他们集团的纲领提出来的。他在提纲中说,应当抑制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不应当醉心于国营农场,因为一切的基础是个体农民经济,而那些说个体农民经济的能力有限的人,他们是反对工农联盟。

迄今为止这份提纲还在他手里。他在这里威胁说:你们要是逼我的话,我就把这份提纲掏出来。可是他至今不曾履行这个威胁。

根据这些材料可以认为,布哈林心里是赞成这样提出问题的:一切的基础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

接着他谈到用听任自流的办法采购,排除了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部分地或是普遍地采用非常措施。他像牧师逃避小鬼一样躲开非常措施。他赞成听任自流,他说,通过规范化市场,扩大商品流通、价格波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粮食,无论如何都不能采取非常措施。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态度、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伊里奇对非常措施持另一种态度。他说,在一定条件下,我们或许不得不采用贫农委员会的办法。这可是比非常措施严厉得

多了。

如果粮食不够,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在政治局对我们说:从国外输入8000万普特,后来又讲15000万普特粮食。这大约值1亿卢布。如果外汇不够,那该怎么办呢?那就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因为我们在用外汇输入设备和机器。否则,按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的说法,农业就要原地踏步,甚至是衰退。因此,按布哈林的看法,国家工业化和改造农业的关键不是加紧发展工业,而是加紧发展个体农民经济。

你们看,这一切都是颠倒着的。他字面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这很好。党认为,改造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向前进的问题关键都在于发展工业。为了这个目的,一切都应该牺牲,因为一切的关键,包括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都在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没有机器就不能提高农业。而他,布哈林同志,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却把事情颠倒了过来。在他看来,一切的出发点和关键都在于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我们党的钥匙是发展工业并保持它的速度,而布哈林同志则把发展个体经济看成是一切的关键。为此可以不爱惜外汇,用外汇储备去输入粮食,为此可以放弃使用非常措施,为此必须规范市场,容许价格自由波动,为此可以从右边来摧毁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分子从左边破坏过新经济政策,不承认商品流通是基础,而布哈林分子从右边破坏新经济政策,不承认采购价格和由国家调节价格的政策。请看,虽然他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是必要的,却把一切都颠倒了。这就是布哈林同志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最后一个主要错误。

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在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方面是不是做迟了呢?对于作为发展工业和保持一定速度的补充的结合新形式是不是抓得太晚了呢?我听到有的人在说,我们抓晚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安德烈耶夫同志好像就说过,我们晚了两年。这是不对的。我想,我们抓这件事是及时的。晚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指的是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大规模地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就走不上正路,那我们是早就预见到了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预见到了,还要实现它。问题在于党要相信它,农民也要相信它、欢迎它,而且还需要资金。

**米高扬:**必须有资金。

**伏罗希洛夫:**必须有发达的工业。

**斯大林:**党的首脑机关早就知道个体农民经济是有一定限度的,有极限的,毫无疑问它是不能发展的。如果我们想向社会主义前进,就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起来,变成大经济。在十月革命之前,在十月革命中,在十月革命的第二

天伊里奇就说过,就教导过我们,关心过这个问题,每次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关的会他都要讲。这我们早就知道,可是这还不够。如果党的首脑知道的事,如果党的首脑相信是正确的政策都能够执行,如果一切都能够自然地实现,那就太好了,可是生活里是没有这种事的。必须使党也相信,使党支持自己的首脑。党怎样才能相信呢?有了事实才行。我要说,从去年起采购困难和危机打击了我们,只是在这以后,党员群众才相信了,没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办不成事的。必须要有了去年的粮食采购的困难,必须要有了危机,粮食危机之后,党员群众,几百万党员才明白,党的首脑是对的,必须最后彻底地走上群众性的扩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道路。

同志们,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不是首脑把党引向前进,而是党自己要前进,这就须要使党信服,这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还不够。要使农民也相信,使贫农、中农中的弱势阶层也相信,让斗争的实践说服他们把小经济结合成社会化的大经济。要使个体小农经济放弃它的窝,放弃它的经济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不到必要时,它是不肯放弃的。所以必须在农民中自下而上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运动。起初要先推广合作化运动,要把千百万农户组织到农业合作社里去,还有消费合作社。要让农民认识在经营活动中集体化的意义、作用和比重。要自下而上地由贫农和弱势中农自愿地开展一个建立集体农庄的运动。没有这一切,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就发动不了广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没有这一切,国营农场就会被农民搞垮,因为他们敌视国营农场,而国营农场确实一度遭到农民仇视。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我们就不会有一年增加几万个集体农庄的事情。这就是第二个条件:自下而上的集体农庄运动。没有它,要大规模改造农业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还有第三个条件:我们必须有资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需要大量资金。我们用了几亿卢布。这还只是我们新建的国营农场,不包括旧的,3—4年内需要50亿卢布,而旧农场需要大约3亿卢布。集体农庄也需要资金。大概也不少于10亿卢布。必须积累资金。直到今天我们忙于工业。须要在工业里积累一些,须要搞好国家财政,还要积累一些储备,才能真正地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需要三个条件:除了党的领导,党本身也要坚信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上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道路;其次,必须自下而上地开展集体农庄运动,让农民自愿地参加运动,而不要强迫他们参加;第三,要实现积累资金。安德烈耶夫同志不妨说说,三年前有没有这些条件?他不敢说,三年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开展广泛的集体农庄运动的资金,全党都相信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们就有了足够的钱来提高新的和旧有的国营农场,来养活集体农庄。他当然不敢这样说。所以我说,执政党不能提出一个口号以后就把它忘了。既然说了要改造农业,那就要做,而要做就得有资金。这是一。要有党的支持,这是二。要有农民的支持,这是三。这些条件都是最近两年才有的。所以我说,抓这件事我们并不是太迟了,而是很及时。

新反对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同志在我们政策的各个基本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大体上就是这样。有人说,布哈林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当然是理论家,而且是大理论家,这是应当承认的。但是,他那套理论不完全行得通。这就从我刚才分析的他在党的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一大堆错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错误,即在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工农联盟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这些错误是从布哈林同志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中产生出来的。是的,布哈林同志是党的理论家,但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他还须要补习一下。有人援引列宁同志的话,说是列宁推荐他的。让我们来读读列宁的这封信吧,看看他关于布哈林同志的理论禀赋和理论准备说了些什么。他是这样写的:“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读信)”

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的理论家,在辩证法方面有缺陷的理论家。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理论家还须要补习一下。假如布哈林同志知道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家,他还须要补习一下,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的理论家,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假如他知道这些,那么他就会谦虚一点。但是,同志们,糟糕的是布哈林同志不知道谦虚。

让我援引一件事情,它很典型地说明,布哈林不自量力到了什么程度,以至在国家这样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他认为自己比列宁还高明。你们也许不相信,所以我只好回顾一下历史。这不用花很多时间,不过我应当把事情讲完。

1916年列宁和以布哈林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在国家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争论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共产党人被称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理解国家的,他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布哈林同志用N的署名在《青年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宁同志认为,这篇文章是混乱的、错误的,就在一篇短文里提出了批评。列宁的这篇文章是短评,现在收在《列宁文选》第13卷第461—464页。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不明白,以为批评的不是布哈林同志,

而是一个叫 N 的人,其实那就是布哈林同志。当时布哈林同志关于国家以及社会党人,也就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态度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读引文)”

列宁批评说:“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读引文)……认为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就会‘自行消亡’,逐渐‘自行停止’”这是列宁的话。布哈林接着说:“社会民主党人是,或者至少应当是群众的教师,如今比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自己对国家持原则上否定的态度……(读引文)……在工人心中。”这是列宁的回答。诺塔贝纳\*是这样写的。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读引文)……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

斯腾:列宁当时还没有详细阐述“炸毁”国家的必要性。

斯大林:斯腾同志,现在说的是对于一般国家的态度,说的是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国家。

斯腾:列宁当时只谈到利用国家的问题。

斯大林:你弄错了,斯腾同志。我敢向你担保,这里说的是工人应当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你不妨试试向我们的工人解释一下,说工人阶级应当抱着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这是完全否认过渡时期中的国家。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没有国家是不行的,也不能对国家持原则上否定的态度。诺塔贝纳是怎样界定将来的社会的,他是怎样界定的?“社会民主党希望组织集中的社会生产,而无政府主义者却倾向于不要组织。这就是根源,是差别。”难道问题就是这样的吗?无产阶级专政哪里去了?这里同志疏忽了一件小事情,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没有国家是不行的,而且工人阶级当然不能对任何国家持原则上否定的态度。他敌视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他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在 1916 年。布哈林同志没有直接回答这篇文章。

发生这些争论后过了九年,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即在 1925 年,布哈林同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又说(后来他的讲话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了)。布哈林在这篇文章中公然声称:在当时他同列宁的争论中对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

我来读一下:“弗·伊·(即列宁)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错误,那个错误是硬加在我头

\* 原件如此。——编者注



上的,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问题混淆起来了。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就算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过:弗·伊·要我转告,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布哈林没有意见分歧了。谁都会懂得,没有分歧是因为布哈林承认了自己不对。我就是这样理解的,而不是说列宁过去不明白,只是现在才认识到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在国家这个基本问题是列宁同志向布哈林靠拢,而不是布哈林向列宁靠拢。结果成了这样。这篇文章虽然由诺塔贝纳\*署名,但它是存在的,遭到列宁的批评,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可是没有回答。只是在列宁去世后,布哈林同志才做了回答。你们怎么看是你们的事。可能,在国家这个基本问题上列宁向布哈林靠拢了。就算是这样。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是布哈林的学生,而不是列宁的学生?也许今后不应当讲列宁主义,而应当讲布哈林主义?

喊声:对!

奥尔忠尼启则:应当问问罗济特!

斯大林:不过事实说明,布哈林企图发展半无政府主义的东西,显然列宁是正确的。布哈林一声不响,等到列宁不在了,他才跑到共产主义科学院去讲了一通,又发表了谁也没有见过的一篇文章。有人会问:值得去关心1916年的那些事吗?值得去关心1925年的那些事吗?也许你们是对的,不值得关心,可是总得有人研究这些东西。列宁并不是布哈林的学生,恰恰相反。

谁会怀疑这一点呢?也许布哈林是失言了,说走了嘴?同志们,不是的。这些话他在1927年又重复了一次。你们看,1916年开始的争吵,停了九年,到1925年布哈林又重新提起,批评了已经不在人世的列宁。现在你们不妨看看1927年的苏联百科全书,布哈林词条,是马列茨基写的。

喊声:对!

斯大林:那里散布的是同样的货色,说在国家的理论问题上,列宁是错的,布哈林是对的。是列宁向布哈林靠拢。

卡冈诺维奇: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也是这么说的。

\* 原件如此。——编者注

**斯大林:**你们看,在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一大堆原则性的错误。

这里有一个声明,说他是党的理论家,可是他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不懂辩证法。可是布哈林却有这么大的野心。原来,他是列宁的老师,而我们是布哈林的学生。同志们,这有点可笑,可是这是事实,布哈林的野心就是这样。

现在让我来谈谈李可夫的发言。如果说布哈林给右倾提供了理论根据,我是这么看的,那么李可夫在发言中就竭力想为这件事情打下实际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李可夫同志没有涉及各种理论问题。不,他涉及了两个大理论问题。就这些问题我要说几句。第一,李可夫生气了,因为别人不承认他的提纲,不同意他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他把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说成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他生气了。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说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米高扬:**是思想。

**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蠢话,是胡说八道。难道我们需要的是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发展吗?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是生产率的一定发展,即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各种计划——年度计划、两年计划、五年计划、十五年计划——的关键所在。苏联经济总应当同资本主义经济有所不同吧。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提出了发展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务。任何一个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封建主义社会也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好,苏维埃社会也好——都关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的一切计划首先要关注什么呢?是生产率的单纯增长吗?完全不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不是能够保证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而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占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增长。因此任何一种计划(包括五年计划在内)的中心任务都不是单纯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是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对非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正因为社会主义成分的优势能够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限度增长,所以这项任务才是任何计划的中心任务。

第二,他说从商品流通的观点看,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之间,特别是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经济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里已经有人谈过了,我不来多说,只是简单提几句。你们想必记得,弗鲁姆金当初就这样说过:在我们看来,向阿根廷的资本家,向粮食投机商,向中农还是向富农,向集体农庄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这有弗鲁姆金的味道。这是不

对的。当然不能把商品流通和生产割裂开。商品流通是生产的一部分。我们要从生产是一切的基础这个角度看问题。什么人生产——这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是从阿根廷或是北美的粮食商人那里,或是从集体农庄那里,或是从中农手里、从富农手里买粮食——这对我们并不是都一样的事情。

五年计划和两年计划问题。李可夫同志在这里断定说,五年计划是一件好事,他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还提出一个农业的两年计划,那就更好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拒绝了那个计划。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用平行的两年计划来冲掉五年计划之外,我们看不出这里还有别的目的和思想。我们问李可夫同志:如果你对农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那就让我们把它加进五年计划里去。你看,这是五年计划,里面有拨款计划,有基建投资计划,有增加农业的流动资金计划。也许,还缺点什么?那我们就把它添上。可是不,他什么也不想补充。我们说,除了五年计划之外,还有年度计划,它是五年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就把你认为农业方面须要补充的加进年度计划里去,两年之内把它扶持起来,你有什么办法就拿出来吧。

为什么必须同时平行地准备两个计划呢?谁都会明白,这是为了宣布一个计划是不现实的,是为了安慰“心灵”,而另一个计划是现实的,是为了“身体”(?)<sup>\*</sup>。因为李可夫同志没有拿出一项加强农业的建议来补充五年计划,因为李可夫同志在发展农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拨款方面的或是其他方面的建议,所以我们认为李可夫同志提出第二个平行的计划时,并没有其他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把五年计划宣布为字面上的,而把另一个计划(两年计划)宣布为切实可行的,并且使这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成为中心,以使用其他经济部门来支持这个两年计划。就是因为这样,同志们,我们才拒绝了那个貌似合理,而实际上却有一种拙劣的玩弄手腕味道的两年计划的建议。

关于缩小播种面积。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吓唬人,断言播种面积并没有扩大。他玩弄全国的平均数字。这不是科学的方法。也许李可夫同志曾经读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他读过,他就应当记得列宁在那本书中怎样责骂那些在估计播种面积的增长时采用平均数,而掩盖了地区特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果有人想从党的政策的角度来研究播种面积扩大的问题,那就应当按地区了解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就是说,如果想认识真理,科学地对待问题,那就不能吓唬党,说我们什么都在下降。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缩减了,是受霜灾影

\* 原件如此。——编者注

响,也有增加的,这是事实。例如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

喊声:并不是整个乌克兰。

施利希特尔:乌克兰的播种面积增加了2.7%。

斯大林:部分地区,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另外部分地区还不错。而东部的播种面积在扩大。如果从党的政策角度看,总不能说党的政策在乌克兰是一种,而在东部是另一种;也不能说在乌克兰北部是一种,而在乌克兰南部又是一种吧。不能这样看问题,把自然条件扯进来是可笑的。

富农缩小播种面积并不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这样说是不对的(或者是对的?)。难道说播种面积不取决于自然条件吗?他要求什么呢?难道要我们实行一种能使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政策吗?这种政策是不存在的。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不可能被所有的阶级同样接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不曾估计到我们的农村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农民缩小播种面积吗?我们从来不曾打算过实行一种能够使一切阶级满意的政策。

他第三个不正确的地方是说,在某些地方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缩小了。既然集体农庄在发展,事情当然就应该是这样。怎么会有其他的可能呢?这是必然的,只能是这样。既然贫农和中农开始抛弃个人耕地而转上集体经济,那么它就必然在一方面扩大,而在另一方面缩小。五年以后,集体农庄将要有2500万公顷耕地,而现在只有两百多万公顷。五年以后,集体农庄将拥有2500万公顷——它靠吸收谁的耕地呢?当然是靠吸收个人耕地。难道有别的办法吗?事情就必然是这样:随着集体农庄的扩大,个人耕地将缩小,这就是进步。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那就不能考虑所有的阶级,我们反正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只能考虑工人阶级,如果想到集体农庄的扩大会导致个人耕地的缩小,那李可夫同志的发言就什么也没有了。

谈谈粮食困难。同志们,我想在这里引用几个数字。无论如何总不能把什么坏事都记在党和中央身上吧。出现粮食困难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自然现象难道真的不起作用吗?天气究竟起不起作用?1928年4月1日以前,我们在乌克兰收购了2亿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而今年4月1日以前只收购了2650万普特,也就是说,少1.7亿普特。为什么呢?因为草原受了霜灾,歉收了。去年4月1日以前,中央黑土区收购了1.4亿普特黑麦和小麦,而今年只有500万普特,因为遭了霜灾。总产量减少了,怎么能不看这个原因呢?今年在北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要减产一半。我们的收成减少了两亿五千多万。我们要从东部,在东部地区把它们补上。这不是一件小事!怎么能把这一切推到中央政策的头

上,推到党的头上?!这真是怪事。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大家都看到,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说明,我们必须抓紧有组织的收购,再也不能指望自流,指望所谓的市场规律,指望所谓的市场上价格的自由浮动。两年的采购经验表明,我们无须特别费力,就能收购大约3亿至3.5亿普特,而其余的1.5亿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组织的办法来取得。所以说,乌拉尔人制定的办法,也就是在这里被人责骂的办法,无疑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富农阶层捐献的方法。村里召开村民大会,由贫农和中农阶层进行鼓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富裕的富农应当完成多少,有完不成的就按村里的决议处罚。这样一来全村就都被吸引到组织采购粮食的工作中来了。村子在政治方面分化了,在采购过程中我们从政治上为自己动员了一支军队。如果村子里大家都一样,如果没有政治分化,那就非常糟糕,那就是富农在操纵了。如果村子在政治上分化了,如果中农和贫农发动起来了,那时村子就分为两部分。村子的多数,大多数人,中农和贫农就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迫使富农和富裕阶层拿出余粮,而这些余粮是他们囤积起来,想用来盘剥贫农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价格的。这导致了某种程度上,部分地采用非常措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这样我们今年就没有办法。很可能,在播种以后我们还可能不得不部分地采用非常措施,非常可能还得采取这些措施。同志们,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能像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那样看问题,他们就像修士怕鬼那样,连部分采用这些措施都害怕。

我们的目的和任务是:只要有可能,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采用非常措施,可是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必须爱惜外汇,如果不能用捐献的办法拿到粮食,那就只好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以便把农村的大多数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反对富农。同志们不考虑农村的工作多么重要,我们发动了农村的基本群众之后,在政治上得到了多大的好处。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方法得到正确采用的地方,我们在农村中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军队。这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是十分重要的。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们总是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价格,有时候他们甚至能取得成功,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把农民的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反对他们,情况会怎样呢?应该这样来看问题。伊里奇是怎样看待非常措施,看待非常措施的最尖锐形式,看待贫农委员会政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一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贫农委员会政策已经被排除了。伊里奇说:这话不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形,譬如说,发生了战争,它就会把贫农委员会政策强加给我们。

**乌格拉诺夫:**是在战争前夜吗?

**斯大林:**可是,请原谅,我现在并不打算谈采用贫农委员会政策呀。

**乌格拉诺夫:**这可是有点像。

**斯大林:**没有的事,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只有那些不懂得粮食在富农手里就是外汇的人才会这样看。这不是棉花,棉花不能吃,它只有一个买主,就是国家;这也不是亚麻,亚麻也不能吃。粮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大家都需要的,是宝中之宝,因为借助粮食富农可以盘剥贫农,不仅仅是从贫农身上多得几个钱,而是给贫农扔一袋面粉,就可以盘剥他。你们希望那些站住了脚的富农,那些可以用其他作物来周转,而把粮食藏起来的富农,希望这些富农会自愿地按照采购价格交出粮食吗??你们这不是疯了吗!?你们不了解阶级斗争,不知道什么是阶级。

他们是怎样嘲弄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政权的呢?我们有哈萨克斯坦的例子。我们的鼓动员说了两个钟头:伙计们,工人没有粮食吃,军队也没有粮食吃,你们把粮食拿出来吧,可是富农嘴里含着烟斗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

**喊声:**混蛋!

**斯大林:**乌格拉诺夫同志,你倒试试说服这样的人看。阶级就是阶级。必须能把农村的贫农发动起来,反对富农,必须迫使富农把粮食交给苏维埃政权。

**喊声:**对!

**斯大林:**他们谈到我们农村政策中的过火行为。是的,有过火行为。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宣读了马尔科夫的一封信。过火行为是存在的,可是难道可以根据过火行为就来责备整个政策吗?

就拿七小时工作制来说吧。难道我们这里现在还有人会反对七小时工作制吗?我想,在我们党内找不出敢这样做的人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在推行七小时工作制方面有过多少过火行为和任意歪曲。你们都很了解,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是一件多么恼火的事。这个最伟大的革命措施简直就伴随着一系列的任意歪曲,甚至是可恶之极的歪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事实。可是这是不是,应当废除七小时工作制呢?不能,不能根据过火行为就责骂党的整个政策。这是那些什么也不相信的人的惯用手法,他们不谈党的政策,而是责骂各种过火行为。这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谈谈购货本。李可夫跟着布哈林也在这里骂购货本,把它叫做小卡片儿。这是不对的。粮食卡是在极其贫困时采用的,发给八分之一磅面包,我记得,在

莫斯科有一段时间是两天发八分之一磅。现在的购货本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卡片,因为它们用于减少一定数量的面包,用于控制投机分子,组织面包供应。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莫斯科没有组织供应,没有什么购货本,而是只控制了烤面包量,结果会怎么样呢?每天要剩下1万普特烤面包,没有人买。当然只好卖给投机分子。这是发购货本以前的情形。现在发了购货本,工人就满意了。

纳扎罗夫:还要求对其他食品也实行购货本呢。

斯大林:李可夫几次提到,根据工人的说法,他们对实行购货本是满意的,因为工人知道,他用不着去排队,面包是有保证的。怎么说呢,工人满意,而这是主要的。投机分子被限制住了。请布哈林同志注意,他在市场关系方面一贯反对采取行政措施,我要告诉你们,我们除了实行购货本之外,还准备逮捕200个投机分子。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调节市场吗?(笑声)

斯大林:而布哈林本人不曾想到他会在这里反对这项措施,也投了赞成票。

我们不把行政手段和经济分割开来。我们不能像布哈林这样违反辩证法地看待问题。他是这样的:一个抽屉里装着经济,另一个抽屉里装着政治,第三个抽屉里装着行政措施。这是面包,可是生活有它自己的分类法,它把什么都联系在一起。既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就用行政措施来对付投机,而对市场也不放弃。

我不明白,李可夫同志曾经赞扬过这种手段,而且在发言中指出,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购货本,可是在这里他却和布哈林同志一起责备这种手段,把它叫做退回到卡片制去。同志们,来看看结果。莫斯科由于实行了购货本,工人都很满意,得到了自己的定量,莫斯科报告说,那里还剩有两万普特烤面包。这有什么坏处呢?过去这两万普特烤面包到哪里去了呢?到了投机分子手里。

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谈了粮食输入问题。他说,从经过他的手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有人愿意贷给我们粮食。这是胡说。似乎是这样,有一些善良的人几乎是白送给我们粮食,或者是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偏偏拿架子,不打算要这些粮食。你们在哪儿见过这样的人呢?在中央吗?事情原来是这样:至少是半年以前,各国的资本家对我们狂轰滥炸,想摸我们的底,想看看我们是否打算进口粮食,是否站稳了脚跟,有没有外汇。现在的斗争是我们能不能站稳脚跟,这决定了英国代表团来不来,决定了德国提不提供贷款,决定了能不能从英国得到贷款,能不能从美国得到贷款。这将决定许多事情。半年以前,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美国的许多粮食公司就找过我们……

米高扬:还有阿根廷的等等……

斯大林:(问我们,)苏维埃政权是否想进口粮食,我们可以用优惠的条件向你们出售粮食,或者提供几个月的贷款。我们在政治局琢磨了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向我们打听了半年,这就是说,在摸我们的底。也许根本不会卖给我们粮食,可是会立即报告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资本家集团,说苏维埃政权已经奄奄一息了:没有粮食,没有外汇。如果没有外汇储备,他们干嘛要提供贷款呢,所以我们决定对这些老爷们说:我们不打算进口粮食。南森也建议向我们出卖粮食,我们也拒绝了。李可夫同志也反对,布哈林同志也反对。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南森的建议呢?

米高扬:他的建议要用100万美元。

斯大林:为了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有外汇储备,现在我们不打算进口粮食,如果想进口,我们会及时进口。这样做对我们有利。也许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的对外环境现在才轻松了,如果同志们关注苏联的国际地位的话。也许正因为这样做了,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那帮资本家们现在才争先恐后地同我们拉关系。也许正因为这样做了,德国近来才做了让步,同意以比过去优惠的条件向我们提供5亿马克的贷款。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必须善于自持,有时须要有耐心。在敌人试探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需要粮食的时候,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面目,要了解,然后……

这种时刻往往是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认为必须向这些老爷们说,我们今年不进口粮食。现在却把事情说成这样,有人愿意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这些傻瓜却拒绝了。同志们,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我来讲发言的最后一部分。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能不能说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呢?李可夫同志说我们的路线是一条,总路线是一条,只是有不大的意见分歧,这话对不对呢?我想,这是不对的。从我所说的可以看出,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两个不同的计划。也许其中的一个计划、一条路线不很明显,不像党的路线、党的计划那样明显,可是第二条路线、第二个计划的萌芽是存在的。这一点不容怀疑。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派,说布哈林同志集团不是反对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从讨论中可以看出,布哈林集团就是我们党内的新反对派。它企图修正党的路线,它企图修改党的路线,并准备条件用另一条路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党的路线)来代替党的路线。

布哈林同志说他们三个人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同



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党的路线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为什么还要隐瞒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就是为了在这里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这不仅是派别集团。我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的派别集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谈谈阿扎尔暴动的问题,以及布哈林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

你们还记得,我们有过几个反对派。我们不妨看看托洛茨基反对派。同喀琅施塔得暴动比起来,所谓阿扎尔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我们当时正和托洛茨基派争吵。结果怎样呢?你们以为托洛茨基派利用了这次暴动来达到派别目的吗?没有。代表大会一决定,大家,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就都出发镇压暴动去了。

在格鲁吉亚发生过比阿扎尔严重得多的暴动,当时枪杀了将近 1500 人。我们当时正在同托洛茨基分子争论。可是我不记得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过格鲁吉亚的暴动来反对党。

不久以前,雅库特发生了暴动,比阿扎尔严重得多的暴动。同格鲁吉亚和雅库特比,阿扎尔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你们怎么看呢?是否有过哪怕是一个党内反对派企图利用这类暴动来反对党呢?同志们,我不记得有过这种事情。

请看,在这里有人说,我们没有派别。可是却有人企图利用所谓的阿扎尔暴动来反对党。怎样来解释这种卑鄙的、不光彩的企图呢?必须是真正的自由派,因为只有自由派才不明白,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暴动只会,也必然会发生在边境地区。为什么我们老是大声叫喊,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你们怎么看呢,难道资本家会睡觉吗?你们以为,我们这里没有不满分子吗?难道我们能使一切阶级都感到满意吗?不行,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做,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我们是为一个阶级服务的。难道在我国,特别是在边境地区没有不满分子,现在已经查明,在阿扎尔地区,除了我们党内同志的错误之外,还有另外的因素,孟什维克的因素,泛伊斯兰主义的因素,它们武装了阿扎尔人,于是阿扎尔人就反对我们。这个因素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孟什维克分子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不懂得,在我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不可能在边境地区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骚乱或暴动。除了自由主义者,谁还会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来。他们要求我们做什么呢?既然你们是多数,既然你们是领导,那就请你们安排一下,让富农也满意,让中农也满意,让贫农也满意,没有任何斗争,没有任何骚动,也没有任何暴乱,一切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我们没

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

现在怎么还能够断言,布哈林集团不是派别集团呢?不行,同志们,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货真价实的派别集团。

布哈林同志说到了公民死刑,说是三个政治局委员被判了公民死刑。他说,我们默不作声,而关于右倾的决议,关于调和态度的决议等等却满天飞。这是自由主义分子的谎言,企图瓦解党的反右倾和反调和态度的斗争。布哈林同志是怎么想的,既然他卷进了这件事,我们就应该放下武器,不去反对右倾吗?右倾是不是妨碍我们克服困难?妨碍。我们该不该反右倾?应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在应当进行领导的司令部内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地存在,自由活动,我们就永远克服不了困难。而布哈林却希望,既然他卷进去了,我们大家就议论议论,就等着看他自己什么时候同意说出自己的意见,赞成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同党站在一起等等。不行,同志们,关于公民死刑,骂人也好,说假话也好,都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求他们三个人,从前要求过,将来也要要求他们和我们一样坚决地反对现有的种种向左或向右背离党的路线的行为。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党内就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整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如果党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发动无产阶级力量,克服困难,反对右倾,反对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因为在我们司令部里的动摇会动摇工人阶级,而这三个人却按兵不动,等待时机,——这是谁的过错呢?他们作为政治局委员,难道就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同样坚决地反对,而且公开声明他们也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和党站在一起,而不是反对党吗?他们如果这样做了,就只会令党高兴,让全党高兴。

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谈什么公民死刑。这是自由派的拙劣手段。

关于集体领导。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全会什么都能忍受,不过总得有一点羞耻感吧。布哈林在发言时说,我们没有集体领导。既然一部分政治局委员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挖政治局的墙脚,而另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却驾上大车,尽一切力量向前拉,那么哪里还谈得上集体领导呢?怎么回事呀?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同他商量反对中央——这就是集体领导吗?乌加洛夫同志,你怎么看呢?

乌加洛夫:我,我。

卡冈诺维奇:你是怎么想的?

伏罗希洛夫:问你的意见呢。

乌加洛夫:布哈林自己已经在这里说过了。

斯大林:很清楚,加米涅夫的所谓笔记使党内状况尖锐化了。于是我们在这

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提出了党内状况的问题，——恰好大家在传阅这份笔记。托姆斯基同志说，这是一篇侦探小说。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政客的惯用伎俩！怎么回事呢，全党都站起来了，他却说，这是一篇侦探小说。简直可笑。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的话！而布哈林同志说，这是一次普通的谈话。好像这是一次闲聊天似的！可是我们知道笔记的内容。我们知道谈的是什么问题：党的路线是致命的，政治局的组成应该变动。布哈林同志同昨天的反对派分子、现在还同托洛茨基有联系的人去商量。现在查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告诉了托洛茨基，同他取得了联系。怎么回事，布哈林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既然他赞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那他为什么要向政治局隐瞒呢，躲藏起来，搞地下活动，跑去找加米涅夫这个以前的反对派分子，他昨天还搞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11月7日游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怎么还能够谈集体领导？简直可笑。这也叫领导者！领导，还是集体领导！没见过这样的领导者。他被别人像孩子一样捉弄了。他被加米涅夫像一个孩子似的捉弄了。领袖！真是没见过！在我们政治局里，加里宁同志有一个说法，有些人也许不喜欢，但是很可笑，也很中肯的说法。它把布哈林同加米涅夫描绘成狼和兔子。说是兔子去找狼，对它说：我很怜悯你，让我们结成同盟吧。狼却回答说：我把你吃了行不行。加米涅夫把布哈林像孩子似的捉弄了。他不明白他是站在多高的地方。他不明白这个。我有一次对他说，你和我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是政治家。可是他却理解为我们俩站在喜马拉雅山顶上，而其他的人则一钱不值。既然是这样，那还能同他谈什么呢？他不明白自己是站在多高的地方。你是政治局委员。把我们每个人盯得很紧的有工人，有农民，还有知识分子。我们每走一步都被看成是政治家。布哈林不明白这一点。他跑去找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像一头狼似的把他捉弄了一番，然后做了笔记，又把它给了托洛茨基，有一份文件说，后来托洛茨基利用了它，后来又送到外国报纸上，被各种资产阶级报刊利用了。他被人像一个孩子似的捉弄了。还说是领导者呢！还说是集体领导呢！

布哈林同志跑到外人那里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是第一次了。这在他不是偶然的。1918年他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

乌加洛夫：这是托洛茨基分子说的。

斯大林：事实终究是事实。他去了。这不是偶然的。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时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央委员却跑去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该怎么称呼他呢？这算什么呢，集体领导吗？

先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现在又跑到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是还同

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着联系的人,也就是反革命分子那里去。

罗济特在这里说,布哈林是“无可挑剔”和对党最“忠诚”的党员之一,同志们,这样看问题是不行的。我对这样说是怀疑的。既然政治局的一名委员背着政治局,和党的敌人勾结在一起挖政治局的墙脚,哪里还谈得到忠诚呢。还有什么忠诚呢?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就搞过自己的宗派,执行分裂政策。党的历史上有过这种事情。很可能,布哈林在歇斯底里状态下会再重复这些事情。

大家想必还记得,1918年,在我们党中央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发生的事情。这时在莫斯科,布哈林同志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召开了自己的莫斯科区域委员会(他们在那里拥有多数)……不过,我还是念列宁的话吧,看他是怎样说的:“……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读引文)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

接下去是布哈林同志领导的莫斯科区域局的说明:“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这是列宁还在世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读引文)温和的”,这就是说,列宁是温和的。“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读引文)坚决实行工人专政”。他们已经消灭了苏维埃政权,实行工人专政了。

伏罗希洛夫: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继续读引文)这就是例证。它表明,布哈林多么善于搞派别活动,他怎样指责中央,对中央表示不信任,直截了当地声明他不服从中央,分裂不可避免,他准备丢掉苏维埃政权。当然,布哈林这段时间里学会了许多东西。可是我担心,在歇斯底里状态下他会再抛出这类把戏。

所以我不相信他关于我们党内没有宗派的声明。他说,我们反对把我们叫做反对派,我们是按党的规定行事的。我不大相信声明,而更相信事物的逻辑。如果布哈林同志和他的同伙还将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们还要继续攻击党,那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逻辑,它比人类的任何逻辑都更有力量。这些事情就会发展到让他们重犯伊里奇在世时的那些勾当。那还是伊里奇在世的时候呢。出过集团的问题吗?出过。有过同加米涅夫组织派别联盟的企图吗?有过。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布哈林同志要躲躲闪闪,搞地下活动,让加米涅夫不要用电话同他联系,说是有人监视他等等。为什么要这样躲躲闪闪,为什么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要隐瞒这一切?显然这是企图搞派别联盟。加米涅夫没有上钩,因为他是讲实际的生意人,他看到力量不够,搞集团没有意义。他问道:怎么样,人

多吗?对,很多,列宁格勒,莫斯科。可是这个人笑了,当然是多了。那当然好了,你们人多,可是把你们撤了呢?他说,是呀,我们正在遭到恶意攻击。(场内笑声)

伏罗希洛夫:他睡不着觉的时候是这么想的。

斯大林:加米涅夫很敏锐,他嗅觉灵敏。嗯,和集团联系在一起是会淹死的。集团没有搞起来,可是不能怪布哈林。然而如果没有搞宗派集团的企图,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派别活动,那该怎么解释一贯执行的辞职政策呢,它可是破坏党的纪律呀。斯大林也提出过辞职,是的,有过这回事。大家一喊不行,我就坐下了。李可夫同志,你不要引用列宁的事情。我们没有人敢把自己同伊里奇相提并论。如果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声明辞职,那是伊里奇,而我们不过是普普通通的领导人……

喊声:是普普通通的!

斯大林:(我们)同他比起来,只是他不成器的学生,我们是另外的规律。有时候会感到很累,于是就要辞职,大家一说不行,就只好坐下了。半年以前,就是在7月间,加米涅夫的笔记里记着,布哈林同志有这样的设想:我、托姆斯基和李可夫是不是该提出辞职,是不是该这样来安排,离开领导岗位两个来月,然后,等到出现危机时再出击。这是从何说起?我们党能够容忍这样做吗?你们还记得伊里奇的话吗?“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读引文)……”没有了纪律,我们的党,有50万党员的党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纪律在党内消失了,变成了……(听不清)。这样做无论如何都是不行的。如果司令部不组织好,如果司令部里没有纪律,那在企业里还谈什么纪律呢,既然党内,司令部里都没有了纪律。辞职是什么呢?这是破坏纪律的根基。这能容忍吗?绝对不能。

谈谈集体工作。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大家记得吗?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这里谈到集体工作。这真是海外奇谈。我有布哈林藏起来的一份提纲,是我几次提到过的,确实存在的,被布哈林藏起来的提纲。“这就是我的提纲。”我们说:“让我们看看。”“不,不行。”“我们把它复制几份。”“绝对不行。”“那怎么办呢?”“我来念,你们听着好了。”我们同意了。这叫什么,是集体工作吗?发生了这种事之后再谈集体工作,指责中央,那总得有点羞耻感吧。你们听说过这种事吗?在不应当有宗派性的政治局里,一部分委员就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有自己的提纲,可是又不肯拿给别人看。“我来念,你们就听着好了,一边听一边就解决问题了。”比如说,李可夫同志谈到集体领导。他最好别谈集体领导。

我要举三个例子来说明李可夫同志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三件事。

第一个问题,你们都知道向美国输出黄金的事情。输出了,可是后来我们差一点丢了这批黄金,好不容易才找了回来。是谁决定把黄金输出到美国去的呢?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是政治局?不是,政治局只是面对既成事实。显然是李可夫同志的一个副手,是经他同意的,由他签的字。请看,就有这样的制度。当李可夫同志被问到这件事时,他说,我不负责。那他对什么事情负责呢?他说,这不是我的事。那是谁的事呢?1000万黄金运到美国去了,可是没有保证它的完整。政治局不知道这件事,虽然有一个非经政治局批准不得输出黄金的决议。这就叫集体领导。他说,我不负责。那谁该负责呢?你为什么被称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呢?他说,我不知道。那他知道什么呢?他算不算人民委员会主席呢?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同米切尔的谈判。美国有一个大资本家米切尔,他有一家国民银行。这是个大人物。我们在十月革命时让他受了点气,没收了这家银行。他要求赔偿。我们现在的方针是不满足个人索赔的要求。那就请拿出另一个方针吧。我们不打算满足个人索赔的要求。可是就另一个问题,就汽车制造厂的问题想同这家银行谈判。谈的却是满足个人索赔要求的问题!当时我们正打算同这个英国代表团周旋一下,为的是在英国下议院的选举中给工党一点保护,以便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并没有放弃同工党政府签订的协议中的那些条款,我们执行的还是那种方针,不谈个人索赔的问题。是谁批准的这次谈判呢?原来又是人民委员会的某位副主席批的。对此李可夫也不负责。这算什么人民委员会主席呢?政治局只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对这一切负责。我指的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里的制度,是俄罗斯和苏联的人民委员会。这叫做集体领导。无论是人民委员会,还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都不知道输出黄金的事,也不知道同米切尔的谈判。谁也不知道,而李可夫回答说他也知道,用不知道来掩饰。谁应该知道呢?

第三是关于供应富农和中农农业机械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属下有个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通过了这样一项决定:“在哈萨克和巴什基里亚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读引文)”请看:人民委员会决定降低对中农的机器供应的比重,而提高对富农供应的比重。政治局不知道这些数字。我们是从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听说的这件事,得到的这些数字。这是怎么回事?

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李可夫,他又吞吞吐吐,真是的,这是怎么回事呀?这是

集体领导吗？最后，同志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政治局已经变成了穿堂大院。简直就是穿堂大院。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你今天说一句悄悄话，明天托洛茨基分子就知道了。让你害怕开诚布公地说心里话，因为不想让党的敌人知道。就拿驱逐托洛茨基的问题来说吧。这个问题是我和伏罗希洛夫提出来的。好像是我首先提的。驱逐的动机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中是一个人，可是如果没有了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他就成了今天那样的人了。大家认为，驱逐他对党、对共产国际都有利。第二天托洛茨基分子就全知道了。又过了一天，出现了一张传单：斯大林提出建议——这不是在政治局的正式会议上，而是在星期一我们几个人碰头的时候——斯大林提出什么什么建议，表决时：托姆斯基反对，某某人也反对。简直是对情况一清二楚。

再看一个例子。不久前政治保卫总局抓住了一名托洛茨基分子，没收了他的日记。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姓康斯坦丁诺夫，曾经在《真理报》工作过。他早就是托洛茨基派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他记录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人给他提供情报。雅罗斯拉夫斯基说了什么，布哈林说了什么，李可夫说了什么，——他全知道。同志们，在政治局简直就不能诚实地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工作。成了穿堂大院。必须要保证……

喊声：对！

斯大林：不能这样下去了，政治局必须回到它早先的地位上，是我们党的圣地，而不是穿堂大院。

喊声：正确！

斯大林：我来做结论。你们会问，怎么办，怎么结束这件事？我想，安德烈耶夫同志建议要求布哈林集团放弃自己的错误。我想，这个建议是不恰当的。

喊声：说得对！

斯大林：在这里发言时，他们都正式声明，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现在又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这就使问题尖锐化了。如果这几个同志仍旧不肯放弃自己的错误，安德烈耶夫同志，那该怎么办呢？你想执行一条较为合理，而且较为温和的路线吗？我同意你的意见。可是你提出的问题，就是让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在这里站出来，宣布放弃自己的错误，——它只会使局面尖锐化。如果他们不肯放弃呢？那又该怎么办呢？这样不行。我想，党在无数次的决议中已经说了，同志们应当放弃自己的错误，可是他们走出来说，他们不能放弃，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考虑。

我们应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应当斥责这种观点。

喊声：对！

斯大林：应该斥责他们的立场是和党的路线不相容的，责成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的一切决议。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这是我们必须做的。这是保证我们统一意志的最起码条件，否则我们就分道扬镳。

二、应该斥责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实行的辞职政策。决议应该严厉地谴责这个政策，因为它在我们党内是不堪设想的，是反列宁主义的，破坏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党的纪律。我们不能这样处理问题，仿佛对领袖执行一种纪律，对党、对群众执行另一种纪律。这是不行的。法律应当只有一个：有了决议就得服从，不服从就应当受到处分。我们对普通党员就是这样办的；如果我们为领导人、为领袖搞出什么新规则，以至党内出现了“平民”和“老爷”，那他们是要愤怒的。

我还想，说真心话，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托姆斯基同志现在都不能胜任他们迄今为止所担任的职务，比如说《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样不行。的确，大家不妨想一想：托姆斯基同志有一个顽固的想法，认为中央要像托洛茨基那样折腾工会。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个顽固的想法。把李可夫\*同志留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岗位上没有一点好处，所以应当撤掉他的职务。并不是满足他的辞职要求，而是撤销他的职务，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不可能在那里工作，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对布哈林同志也是一样。他在共产国际也没法工作。不行。布哈林同志往右边走得太远了，而且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和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清楚。《真理报》的情况也一样。这样办不行。应当做出这样的决议：解除或者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工作，——从现在起，他不再是《真理报》或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说真心话，我们当然可以决定让他们留下来。他们也许会留下，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不会为我们工作。

三、我反对将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这方面我完全同意乌克兰同志们，还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同志们的意见，他们提出了相应的决议，特别是安德烈耶夫同志。我认为，如果我们警告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就足够了，警告他们，如果今后稍有不执行中央及其机关的决议的企图，稍有违反中央及其机关的决议的企图，他们就将作为破坏党的纪律的人而立即被开除出

\* 原文如此，应为托姆斯基。——编者注



中央政治局。

同志们会理解这个措施的。我知道,对于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瓦解党的活动是很气愤的,因为他们搞辞职政策。我知道,有许多要求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我理解,这种气愤是一个希望保持我们党的团结一致和纪律严明的人的正直的、无产阶级的义愤,可是我们在解决政治问题时不能凭气愤行事。我们可以,或者说应该让这些同志留下来,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让他们真心实意地履行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决议。如果他们破坏决议,那时再开除他们。

还有,我认为应该注意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在正式发表言论时,在会议上和报刊上不发表任何背离党的路线和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的言论。

喊声:对!

斯大林:这种监督对于执行党的决议是绝对必要的。同志们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仍然留下来;既然在现阶段他们还不能放弃这些错误,那再要宣传这些错误观点就太过分了。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关于刊物。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及其各个领导机关的路线。这也应当无条件地执行。

还有,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及国防委员会的集体工作。我们不能忽略。必须给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及国防委员会,也给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及国防委员会规定这样的制度,使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个人来决定,而必须由集体:通过人民委员会,或者通过劳动及国防委员会,或者召开会议来决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那样我们就不会有面对既成事实,或者是措手不及的情况。

喊声:对!

斯大林:第八,规定专门的措施,直至开除出党,这样来保证党、中央和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性……

喊声:对!

斯大林:保证排除把中央和政治局的情况向托洛茨基分子通风报信的一切可能性。

最后,我们将要通过的关于党内问题的决议,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决议。应该把这个决议分发给各级地方党组织和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但是暂时不在报刊上公布这个决议。(喊声:对!)同志们,这最后一项措施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缓和布哈林同志集团的处境。他们是宗派集团,但是还指望他们会解除武装,给他们一个机会,不使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使他们有改正的机会。如

果公布这个决议,走出了这一步,那布哈林同志集团的成员改正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我想,这个决议应当在原则上是严谨的。这就是我已经说过的那种缓和的味道,如果大家愿意,不妨这样说。

乌格拉诺夫:自由派的措施。

斯大林:我们有时候是会向中间派做一些让步的。(场内笑声)

乌格拉诺夫:我就是中间派。

斯大林:对于乌格拉诺夫同志,为什么不做出一些让步呢?当然,这不是经常让步的理论。

Ср. 柯秀尔:免得发生误会。

斯大林:这是最后的让步,试一试的让步。有效——那很好,要是无效——那对你,乌格拉诺夫同志,只能更糟。决议的原则部分必须是十分严谨的,不能有任何让步,在原则问题上百分之一的让步都不行,要把一切错误的东西都抖搂出来,让党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能有任何原则性的让步。

决议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严谨。至于实际工作和组织方面,同志们,如果我们不意气用事,那就更好。如果我们把布哈林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留在政治局里,让党明白我们不是好战成性的,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假如他们还能够改正的话。我说完了。(掌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043号案卷,第1—131张。原件。打字稿。)

## 16

加米涅夫同志的秘书菲利普·彼得罗维奇·  
施瓦尔贝 1930 年 6 月 30 日对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秘密科科长做的供词  
(速记记录)<sup>403</sup>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加入了列宁格勒反对派。作为加米涅夫的秘书,我只能履行他的一切嘱咐,包括职务内的和职务外的(也有派别斗争方面的)嘱咐。从加米涅夫那里我逐渐了解了分歧的详情。到 1926 年中央四月全会前已经可以感觉到派别活动了。这种活动是以提供信息的形式进行的。从红色教授学院到秘书处来过的有戈尔舍宁、卡皮托诺夫、巴巴汉、波格丹诺夫、索洛维约夫等人,向他们讲过全会上事情。他们也讲了红色教授学院圈子里的议论。我不记得是在 1926 年四月全会之前还是之后,开始谈到同托洛茨基分子结盟的事。我不知道这次结盟是出于谁的主动,可是我知道,大约在 1926 年 6 月间列宁格勒反对派中出现了分歧。我本人在同各个同志的谈话中表示反对这种结盟。强烈反对这个结盟的是克拉夫季娅、萨尔基斯、纳乌莫夫,不过后两个人被季诺维也夫说服了。通常在中央全会之前,反对派阵营中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会在加米涅夫或者季诺维也夫家中,偶尔也在托洛茨基家中聚会,研究全会上的行动纲领;其他人,就是非中央委员和非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不让出席的。全会之后,出席聚会的人增加了许多,比如说,有纳乌莫夫、萨法罗夫、萨尔基斯、戈尔舍宁、卡里夫等人。如果是联席会议,也就是同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开的会,那就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参加,会后大家分别去各区和工厂,彼此通报情况。

1926 年六月全会后,我在秘书处须要用胶印机复印声明。这份文件基本上是托洛茨基写的,季诺维也夫对它做了许多修改,不过据我的记忆,都不是重要

修改。由于这份文件过于冗长,所以在1926年七月全会期间举行的一次反对派中央委员的集会上决定将它压缩到最低限度,我好像就是从奥丽加·拉维奇那儿拿到这份压缩后的文件来复印的。此后我就没有拿到过任何须要复印的手稿了。秘书处复制过各种声明以及类似的反对派的材料,不过都是只复制两三份。由于所有广义上的机器都集中在格尔季克和他妻子手中,我们都是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文件的。

人们还是照旧来秘书处打听消息,而我也为了同样的目的到红色教授学院去。我还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去找那些同意反对派观点的人:卡皮托诺夫、戈尔舍宁等。这些人除了和我互相交换信息之外,还总是帮助我得到和处理相应的材料。

不久我就休假去了。等我休假回来,我发现反对派的希望落了空——他们在航空仪表厂和莫斯科的其他工厂,以及列宁格勒都遭到了失败。

这时出现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给,我不记得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的一封信,其中讲到要取消一切活动。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样一句话:“必须走布列斯特之路。”这封信里的其他细节我都不记得了。据我的记忆,加米涅夫热烈欢迎这个建议。自从反对派在航空仪表厂和列宁格勒失败之后,联合反对派的领导人之间开始了谈判,结果签署了10月16日的声明。此后派别活动就销声匿迹了。没有任何书面的,或是口头的交往。不过,在狭小的圈子里还是互通消息,比如说,谈到过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我本人当时在搞加米涅夫文集的事情,这时正在编纂《党内分歧大事记》第1卷。这一卷复制了四份。一份留在秘书处我那儿,另外三份我交给了加米涅夫。

1月份加米涅夫到意大利去了。走之前他把我找去,问我是否同意留在莫斯科,继续搞文集。我同意了。

当中国革命开始后(1927年,大约在3月份以后),反对派的圈子就活跃起来了,又出现了文章、声明等等反对派的材料。这时机器仍然掌握在格尔季克和他妻子手中,从外省来的人就到那里去取得相应的信息和资料。我不记得究竟是谁,但好像是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讲到要消除反对派内部的派系(大家知道,托洛茨基有他自己的中心,而列宁格勒人也有自己的中心)。联合反对派的最高层赞成消除宗派内部的特殊中心,但是二级人士坚决反对这项建议,因为列宁格勒的中间派人士敌视托洛茨基分子,而托洛茨基分子也敌视列宁格勒人。

1927年七八月份的中央全会之后,季诺维也夫写了一篇文章《全会的总结》,据我记得,托洛茨基也同意这个评价。评价大致是这样的:

1)“想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可是拿不定主意,因为我们身后有许多布尔什维克分子。

2)因此不应当减少派别活动,要继续争取党员群众。”派别活动确实在继续进行。

大约在1927年7月底,格尔季克建议让我代替济娜·阿布拉莫夫娜·格尔季克,因为她要去休假。我问他,我的职责是什么。格尔季克回答说,我应当同马尔采夫和一个姓马丁诺夫的人保持联系,他们那里有打字机和珂罗版印刷机。我应当把原材料交给他们,然后从他们那儿取回复制件。原件我从哈里托诺夫那里取来,复制材料也应当交还给哈里托诺夫。

济娜·阿布拉莫夫娜·格尔季克介绍我认识了这个马丁诺夫,还有一名妇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马丁诺夫的妻子,以及马尔采夫。后来她又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姓列万多夫斯基或者是列万托夫斯基的人,她还告诉我说他们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的习惯是为自己攫取一切文献。我工作了大约一个月。马尔采夫在自己家里装置了一台珂罗版印刷机。复印多少份要向马丁诺夫预订,而这个数字是哈里托诺夫事先告诉我的。

8月份格尔季克回来了,我就把事情交还给她,而自己到意大利加米涅夫那里去了。我给加米涅夫带去了季诺维也夫的几行字,他坚持加米涅夫必须回来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十一月全会。我是和加米涅夫一起从意大利回来的。这时所谓的联欢会似乎已经很流行了。举办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因为大家认为群众得不到应有的信息,所以才不靠近反对派。这时我得了一次小病,所以不清楚莫斯科高技术学校的会是怎样召开的,也不知道11月7日的行动是怎么一回事。

和托洛茨基的分歧,我觉得早在1927年8月就开始了。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的第一次冲突的起因是这样的:季诺维也夫给自己在德国的同伙写了一封信(我不知道是写给谁的)。这封信的内容是说托洛茨基分子不值得信任,所以应当保持自己的面目;也许信里还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主要的就是季诺维也夫责骂了托洛茨基分子。可是这封信不知怎么一来没有落到季诺维也夫的同伙手里,却落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手里,他于是把信寄回莫斯科,给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把季诺维也夫叫到自己家里,把信给了他。这时他们谈过什么话,我不得而知;不过我知道季诺维也夫感到很不妙,我也知道这就是分歧的信号。以后

就开始了在纲领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我记得,对纲领的最后一章产生了巨大分歧。我记得两个派别之间出现了分裂,分裂持续了三天。斯米尔加找到了新的妥协方案才使他们又言归于好。两个派别之间的下一次分歧是在党的统一问题上,而最后的决裂则发生在党的十五大上。

十五大以后,我收到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他建议我在他的地位没有澄清之前不要去找工作。不久他得知他要到卡卢加去工作,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我一直在做加米涅夫文集的筹备工作。为了不使我中断这个筹备工作,加米涅夫才让我和他一起去。我接受了加米涅夫的建议,去了卡卢加。

十五大以后,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就是签署了向十五大提交的声明的那23个人)保持着通信联系。有时格林贝格、库克林、扎鲁茨基、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古拉拉斯基等人来卡卢加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报党内情况和其他政治问题。

在党广泛开展反右倾斗争以后,列宁格勒小组内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因为在莫斯科的格林贝格那里得到很多信息。他定期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写信,而且这些信都是托便人带来的。信息来源是斯腾和马扎尔人库恩·贝拉。通过他们我们获得党内事件的信息。格林贝格的信件是由叶夫多基莫夫、戈尔舍宁,或是列宁格勒反对派中来卡卢加的其他某个人带来的。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我一直保存到不久以前。

1928年1月初,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卡卢加时,波格丹从莫斯科带来了一封索柯里尼柯夫给加米涅夫的信。索柯里尼柯夫紧急召唤加米涅夫到莫斯科去。收到信的当天夜里加米涅夫和我就动身去莫斯科了。到莫斯科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加米涅夫打电话找到索柯里尼柯夫,很快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就到加米涅夫家里来了。过了几分钟,索柯里尼柯夫走了,而布哈林在加米涅夫家待了两个多小时。布哈林向加米涅夫详细介绍了政治局内存在的分歧。他们是在加米涅夫的餐室里谈的。我当时在书房里,只记得布哈林的个别句子:“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认为,假如政治局里是你和格里戈里,而不是斯大林,那就会好一些。”“整个莫斯科组织和整个列宁格勒都站在我们一边。”“安德烈耶夫是我们的人,而他身后是整个北高加索。”加米涅夫说:“这倒看不出来。”布哈林问他:“你读过《真理报》的那篇文章吗?我们现在能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了。”加米涅夫问他:“是不是阿斯特罗夫和马列茨基的文章。”布哈林回答说:“对。”于是加米涅夫说:“那好吧,你就对莫斯科组织发表好了。”对此布哈林回答说:“关于全会的总结报

告将由李可夫来做,而不是我。”

这次谈话是在中央七月全会的第二天进行的。后来布哈林请加米涅夫同他保持联系,但是不要打电话,因为据布哈林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窃听他的谈话,监视他的行动,“盯得很紧”。

布哈林走后,加米涅夫记下了这次谈话的一部分,第二天通过波格丹给在卡卢加的季诺维也夫写了一封信。后来加米涅夫完整地记下了他同布哈林的这次谈话,而且三天后去卡卢加时,随身带走了这份记录。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卡卢加就这个问题谈了很久。这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记得季诺维也夫的一些话:“把我们排除出领导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既然一部分政治局委员来找我们,那就应当期待另一部分人过一段时间也会来找我们。”在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话之后过了一周半到两周,季诺维也夫从卡卢加到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去过布哈林家里,而且据后来季诺维也夫告诉加米涅夫,他同布哈林谈了整整一晚上,谈的还是布哈林早先同加米涅夫谈过的那些问题。

当年(1928年)7月底,我复制了一份加米涅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和他同布哈林的谈话记录。我把这份文件的副本带到了莫斯科。我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告诉了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他也是党员。当时我本人同托洛茨基分子尤戈夫还保持着联系,我同他是1918年盖特曼和邓尼金时期在敖德萨搞地下工作时认识的。尤戈夫原来是敖德萨组织的一名很积极的干部。1926年我到红色教授学院去过好多次,我得知红色教授学院中的托洛茨基分子中有尤戈夫,从这时起我和我的兄弟就依旧同他保持着联系。他经常来我们家(当时我和我兄弟住在一起)。他对我们讲一些新闻,我们也把一些新闻告诉他。

我把上述文件带到莫斯科后不久就去了克里米亚。回来后我得知我兄弟不但让尤戈夫看了这份文件(加米涅夫同布哈林的谈话记录),而且让他复制了这份文件。大致在1928年10月,尤戈夫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我知道他是一个党员。他同尤戈夫一道来过我家一两次,后来他就自己来了。他到我在科技局的办公室去过几次,后来又到我家用去过一两次。我对他讲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第二次谈话。他到科技局去时,有几次问过我有什么新闻。我也问过他有什么新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好像是从他那里得到斯米尔加写的那份文件《纲领发表一周年纪念》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姓康斯坦丁诺夫。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康斯坦丁诺夫来找我,说他们,托洛茨基分子,准备发表

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我请他不要这样做。他对我说,已经无法改变了。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阻止托洛茨基分子的意图。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份文件果然出现了。大约在1928年12月(确切是哪一天我记不得了)什克洛夫斯基来找加米涅夫,说托洛茨基分子发表了记录。很快(我们当时在季诺维也夫家里)奥尔忠尼启则来电话,要加米涅夫到克里姆林宫他那里去。加米涅夫立即去了。加米涅夫从奥尔忠尼启则那里回到季诺维也夫家。这时除我之外,在季诺维也夫家里有:波格丹,如果我没有记错,还有费奥多罗夫。在场的还有季诺维也夫的妻子莉莉娜。

加米涅夫说,奥尔忠尼启则给他看了传单,上面登着他,加米涅夫,同布哈林的谈话。奥尔忠尼启则问他,这传单是什么人散发的。加米涅夫不能准确地回答,因为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张传单。他也问了奥尔忠尼启则,这张传单是哪里来的。奥尔忠尼启则解释说,传单是托洛茨基分子出的,他问加米涅夫,这是不是他的日记。

加米涅夫说,这不是日记,而是他从莫斯科给卡卢加的季诺维也夫写的一封信。以后在场的人就开始寻找罪魁祸首,提出了各种设想,可是仍然不能肯定是谁转交的这份文件。

在加米涅夫写出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声明之前,大约是两天之前,索柯里尼柯夫来找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问文件是怎样落到托洛茨基分子手里的。加米涅夫回答说:“我不知道,原件是完整无缺的,而且还在我书橱里放着。”他从书橱里取出文件给索柯里尼柯夫看。索柯里尼柯夫建议销毁这份文件。他问加米涅夫:“你干吗留着它呢?”加米涅夫就拿起原件,把它销毁了。

我知道加米涅夫同布哈林会面共有四次。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第一次会面是在加米涅夫家里,在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期间。这次谈话的实质从加米涅夫的记录里已经知道了。我知道的布哈林同加米涅夫后来的一次会面有皮达可夫在场。这次谈话我是在卡皮托诺夫、季诺维也夫、戈尔舍宁、巴巴汉等人在加米涅夫家聚会时,听加米涅夫说的。关于这次谈话我当时在单页纸上做了摘记。

关于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第三次见面我也是听加米涅夫说的,当时他对一个人——费奥多罗夫,或是扎鲁茨基,或是叶夫多基莫夫在说,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到他家来过。这次谈了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谈话时我并不在场,谈话时我一直是时出时进的。我只记得加米涅夫说,布哈林“又为自己的失败在奔走”。可是



谈的就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该不该辞职的问题。

最后,加米涅夫第四次同布哈林见面是在皮达可夫家里。这恰好是在加米涅夫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奥尔忠尼启则写声明,谈托洛茨基分子散发的关于加米涅夫同布哈林谈话的传单问题。在他着手写声明的前一两天,他让我去找一下布哈林的秘书叶菲姆·蔡特林,告诉他加米涅夫想同布哈林谈一谈,请布哈林来个电话,定一下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怎样安排在皮达可夫家见面,见面时彼此谈了些什么,我就知道了。

我的日记里有一处讲到季诺维也夫同加里宁见面。我只知道季诺维也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某个地方同加里宁见了面,加里宁告诉他,已经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可是托洛茨基好像拒绝自愿出国。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卡卢加来了以后,列宁格勒小组就活跃起来了。活跃的起因是党一直在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1928年秋天,加米涅夫因为科技局的事情去了一次列宁格勒。我是同他一起去的,我们住在欧罗巴旅馆。我记得那时有好几个人来过,不过究竟是谁,我记不准确了。好像伊万·塔拉索夫来过,还有什么人也来过。可是谈了些什么问题,我记不得了。谈话是很肤浅的,涉及反右倾斗争。加米涅夫认为,由于反右倾斗争的结果,他和季诺维也夫能回到领导层去。一般说来,这时来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他们从卡卢加回来后)的人中,有许多是签署了向十五大提交的停止派别活动声明的人。到他们家来的也有那些在外省工作,有事来莫斯科出差的人,谈一些日常事务。

1928年秋天,在加米涅夫身边聚集了一个小组,成员有:巴巴汉、戈尔舍宁、卡皮托诺夫、我,还有不定期来的沙罗夫。这个小组里主要是一些经济学家。小组每两周活动一次。在小组会上有人就某个问题(工业的情况、粮食采购进度等等)做一些介绍,然后大家交换意见。

大约在1928年12月里,同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又在加米涅夫家里聚会了,有戈尔舍宁、巴巴汉、加米涅夫和我。过了一小时季诺维也夫、沙罗夫、叶夫多基莫夫,好像还有费奥多罗夫也来了。大家谈起十五大以后快一年了。后来季诺维也夫说,法国共产党内成立了几个反对派小组,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也一样。季诺维也夫由此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垮了。然后他说:“只有掐着富农的脖子,才能从他手里拿到粮食。压缩社会主义成分不会有什么结果。”他的意思是,对非社会主义成分,也就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的任何纵容都不能搞到粮食。季诺维也夫接着说,加入我们党的“也有这样的工人,他们在革命前是要跟着社会

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走的,这些工人给党带来了异己的情绪,所以现在党内可以感到有阶级斗争”。他举了一些“切开了的脓疮”的例子——斯摩棱斯克案件、索契案件等等。后来季诺维也夫指出,托洛茨基是在为斯大林和右倾分子工作。这就证明把他们抓起来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列宁格勒小组已经恢复了党籍,为此花去了一年时间。“现在应当采取的方针是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党员”,也就是要让原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分子获得信任,让他们在工人集会上讲话等等。主要的就是在党内取得信任。他接着指出,“右派提出了各种反对派小组结成联盟这样的口号”,而我们列宁格勒小组应当反对他们的这个纲领(右派的纲领是热月政变的纲领)。他们(右派)说,为了工业化,应当从农民那里拿到更多的食物。对于“反对派联盟”(大联合)这个口号,季诺维也夫说,“这个口号可能赢得某些集团的同情,可是它实现不了”。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右派的路线和托洛茨基的路线得到改正,那就可能出现某种接近,可是只有在主要干部,就是列宁在世时,而且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老布尔什维克之间才可能达成这种接近。”按他的说法,“青年人,无论是托洛茨基派的,还是布哈林派的,都持相同的立场”。季诺维也夫说,拿这些青年人没有办法,只有在老布尔什维克中才可能搞成“联合”。他说:“如果能够达成这种联合,那么列宁格勒就应当由列宁格勒小组来领导。”当时季诺维也夫说的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好像是叶夫多基莫夫和哈里托诺夫讲了话。他们讲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因为没有做摘记。

也是在1928年,准确的时间我不记得了,好像是11月份,也是在经济学家的小组会上,季诺维也夫宣读了自己的文章《右倾的根源》。

大约在1928年11月,沙罗夫找过乌格拉诺夫(应当说明,沙罗夫是经常同乌格拉诺夫交谈的)。当他到他家去时,乌格拉诺夫的妻子抱怨说,从前有许多熟人,可是由于现在进行的这场争论,大家都害怕了,谁也不露面了。后来请他喝茶,于是他们开始谈起来。我的摘记里对这次谈话是这样记的:乌格拉诺夫说:“看来我们是越来越接近某种毕苏斯基作风了。斯大林容不得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他同这些人斗争,把他们看成自己的阶级敌人。”“我们代表莫斯科党组织去找斯大林,向他指出,没有粮食了,农民在挨饿,须要改变政策,他说:‘这是惊慌失措。’”乌格拉诺夫补充说,有人对女沙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说,农民没有粮食吃了,她却说,那就让他们吃面包圈好了。

1928年10月,乌格拉诺夫在一次同沙罗夫见面时告诉他,布哈林在南方休息,正在写一本书反对“多数人”的政策,这本书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赞扬。乌格

拉诺夫本人在准备全会。他告诉沙罗夫,他将发表长篇讲话,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我要让他们见识见识。”沙罗夫问他,他发言的内容如何。乌格拉诺夫的回答是不能执行破坏国民经济、消灭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原动力的政策。他说:“应当记住,农民占我国人口的80%。”

**Ф. 施瓦尔贝**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5号案卷,第32—40张。副本。)

## 17

关押在政治犯隔离室、日前声明与托洛茨基  
主义断绝关系的全苏托洛茨基中心原  
成员 A. 康斯坦丁诺夫的供词<sup>404</sup>

我,阿格拉诺夫,  
致鲁特可夫斯基同志。

对于你向我提出的问题:1)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反对派中心都有那些成员,2)关于《党被蒙上眼睛带向无底深渊》这份文件和3)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构干部的联系,如果我知道的话,回答如下<sup>405</sup>:

2)第24号文件(标题《党被蒙上眼睛带向无底深渊》是Л. Д. 托洛茨基拟的)是尤戈夫同志于1928年夏末转交给组织的。他向Б. М. 埃利钦介绍了文件内容,而且好像在同一天也向我谈了内容。我按照尤戈夫手抄的文件副本又用复写纸复制了几份,并答应尤戈夫尽快把文件送给Л. Д. 托洛茨基。因为Б. М. 埃利钦第二天就要去南方,而他走后同阿拉木图的联系就由А. Н. 萨福诺娃负责,我就向她介绍了文件内容,给了她一份文件副本,让她发给托洛茨基。在随文件发出的附信中,我以中心的名义告诉托洛茨基:我们认为所附文件政治上很重要,所以交给他(托洛茨基)全权处置。文件的其余副本由我收藏起来,锁在我的乡村住所中的文件包里。Л. Д. 托洛茨基10月21日的信证明他读了文件,不过该怎样处置这份文件,我们没有得到他的直接指示。只是到了12月份他才建议公布加米涅夫同布哈林的谈话,而且写了前言。1月初或是12月底,我把文件给了А. Н. 萨福诺娃,让她付排。同时我把我手头最后一份文件副本给了我妻子М. П. 索尔金娜,请她保存文件,因为我在中心成员姆季瓦尼、卡夫塔拉

泽、潘克拉托夫、格瓦哈里伊被捕之后,很担心我自己的安全。

有一次尤戈夫从明斯克到莫斯科来,他在同我见面时,建议介绍我认识一个人,说这个人很了解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活动。晚上我同尤戈夫见了面,在济明剧院附近Л. Б. 加米涅夫的秘书施瓦尔贝追上了我们,尤戈夫向我介绍时称他米沙,也许是瓦尼亚。我至今不知道,施瓦尔贝是否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或是我广为人知的代号,正如我不知道施瓦尔贝同志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一样。这是因为他和我见过几次面,却都不愿意多谈信息,只有一次对我讲了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谈话,加里宁同季诺维也夫的会面,季诺维也夫同H. K. 克鲁普斯卡娅的会面。施瓦尔贝对我讲的话我全都记在笔记本里,这本笔记本在1929年4月20日逮捕我时被没收了。

3)1928年1、2月间,我们组织里开始谈论必须遵守直到那时为止都不太注意的地下工作原则,因为各方面都有传闻,说“政治保卫局在各个反对派小组和中心都肯定安插了他们自己的人”。3月份时,我不止一次在同各区的组织见面时都听到抱怨,说中心好像有政治保卫局的人。要详细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些传闻是因为相关机构希望我们的中心不要搞地下活动,也许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传闻的制造者。在这些传闻的基础上产生了莫斯科中心的成员斯托帕洛夫同志和“大”中心的冲突。斯托帕洛夫指责大中心的一名成员尼古拉耶夫(他并没有向我指出尼古拉耶夫的姓名)是“奸细”,而柯秀尔在同我谈话时,把达什科夫斯基的被捕同他和斯托帕洛夫见面联系起来。这样的环境简直没法工作,所以我非常同意把斯托帕洛夫和尼古拉耶夫两个人都暂时解除工作。在4月份或是3月底我得知大中心决定,组织的任何成员都不准企图与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建立联系,违犯中心这项决定的人将立即被开除出我们的组织。我向所有各区组织传达了中心的这项决定。据我所知,这项决定贯彻执行了。我只知道有一例违犯了决定,这就是所谓“库列绍夫案件”。这个案件的详情我不清楚。也许姆拉奇科夫斯基能谈谈详情,是他把相应的文件送到莫斯科去的,这些文件我没有看过,是发给托洛茨基的。

如果须要,我会详细回答你们可能产生的补充问题。

#### A. 康斯坦丁诺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5号案卷,第46—47张。副本。)

## 18

## 季诺维也夫涉及布哈林和 加米涅夫谈话的信件<sup>406</sup>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同志

因保存党的绝密材料而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的联共(布)党员米哈伊尔·施瓦尔贝(Л. Б. 加米涅夫原私人秘书 Ф. 施瓦尔贝的兄弟)今天在受审时供认,在他家的金属床脚里有他藏匿的一些文件。

拆开铁床后,我们收缴了:

1) 洛茨基分子的旧材料;

2) Л. Б. 加米涅夫的一些声明和信件;

3) Л. Б. 加米涅夫在同 Н. И. 布哈林谈话后,写给在卡卢加的格 Г. Е. 季诺维也夫的信的副本和

4) Г. Е. 季诺维也夫 1928 年 7 月 13 日给 Л. Б. 加米涅夫的信和 1928 年 7 月 14 日的附笔。

М. 施瓦尔贝供认,1928 年 7 月 13 日和 14 日的信是季诺维也夫对大家知道的加米涅夫那封信的回答,这两份文件是他(施瓦尔贝)本人在 1928 年交给托洛茨基地下中心的代表尤戈夫的。

随信附上季诺维也夫 1928 年 7 月 13 日和 14 日信的原件及副本。

附件:如上述。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亚戈达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科科长 阿格拉诺夫

第20/c号

季诺维也夫的信(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入党申请的七个月和他们完成入党手续的两个星期之后由季诺维也夫亲手写成)。

1928年7月13日

卡卢加市

读完加米涅夫关于布哈林“造访”的信后。

局势对我们而言是最为关键的。也许正是现在将决定这个问题:我们(最终)将以什么身份(或者角色)进入党和革命的历史。

我们首先应当记住:1) 不要匆匆忙忙, 2) 不要匆匆忙忙, 3) 还是不要匆匆忙忙。

因此我(而且也包括我们中的任何人)准备一而再,再而三地斟酌,改变正在酝酿的决定。眼下先谈这些:

1. 我们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命运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集团联系起来?

这个集团能够完成的唯一进步事业就是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我不知道它是否能行?更可能的是它不行!我想,它成功的几率不超过25%。即便如此:如果接替他的是(按照列宁的遗嘱)一个列宁主义者,但是没有斯大林的那些缺点,撤去斯大林才是有益的。而实际上,这个集团撤掉斯大林就意味着在斯大林的位置上安排一名右派。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他说:“斯大林(指他的集团)之后谁上台对我都是一样的,因为斯大林的右倾后继者反正会做我的事情。”

处在我们的地位,最危险的就是听任感情支配。如果听任感情支配,那当然就会按这样的公式行事:管他妈的,只要踢开斯大林就行。这种“策略”对我们并不合适。

这个集团(1)布哈林(也就是还有斯列普科夫—阿斯特罗夫—斯捷茨基分子—马列茨基分子);(2)李可夫(也就是还有米柳亭、斯米尔诺夫、斯克沃尔佐夫、洛莫夫+比布哈林身边的人更加右倾的“红色”(哼、哼)教授);(3)托姆斯基(也就是还有美尔尼昌斯基、施米特和一些最极端的、半腐化了的工会官僚主义分子)。乌格拉诺夫是有价值的,可是他受到了冲击。他还可能走到我们这边来。在这个集团的司令部里,在它的核心里就有真正的敌人、阶级敌人。当刮

起一阵强烈的富农风暴时,这股风暴把富农崽子:斯列普科夫等人刮进了“李可夫”派系的司令部。这是一些司徒卢威分子。同他们只有斗争。而且最接近这个集团的是名副其实的“康德拉季耶夫分子”。这是事实。托洛茨基说过“尾巴敲打脑袋”,这话很可笑,有些学究气,可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集团是尾巴。而在这条尾巴的末端是真正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

2. 我们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集团联系起来?

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极有可能的是斯大林打垮右派之后,自己加倍地向右转。他很可能这样想:只有国际资产阶级才是可怕的;我会向它让步,可是我要打垮所有其余的人。很有可能,他推翻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和他平起平坐,而只是为了“容许”我们坐在他的下面。很有可能,斯大林的个人“高尚品德”“发扬光大”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完全阻断了党的道路,只要党还没有把这个致命的人扳倒,就不可能有任何党内生活。很有可能,斯大林彻底摧毁了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各种老集团的威望,以致托洛茨基分子的星辰(它当然也会很快就失去光泽)再度升起。到那时就是“经典的”瓦解了。很可能斯大林现在安排的政治局是由“五金工人”组成的(库克林的预言),大体上是:伏罗希洛夫、加里宁、鲁祖塔克、科马罗夫、洛博夫、波斯特舍夫、什维尔尼克等。

不过,现在事情还有挽回的机会(机会是存在的),而无须托洛茨基分子的挣扎,遏制瓦解就是要改组中央委员会内(党内)的力量,现在也要(基本上)重新组合:我们加上斯大林。预期实现这种办法是很困难的,不过至少不是不可能的。

3. 最近期内斯大林派和李可夫派斗争的进程可能是这样的:看来,斯大林已经把他们击败了,不过还没有摧毁。李可夫派在全会上成了少数派,大体上就是我们在1925年10月的宗派全会上那样的(数目)。发现李可夫派成了少数派之后,自然就开始脱离他们了。像曼努伊尔斯基一类的人大概已经脱离他们了。明天还会有人离开。充其量只占全会人数的四分之一的“坚定”集团会留下。“工人—富农”集团分化了(乌格拉诺夫—科马罗夫)。也就是说,它不会起决定作用。

看来布哈林是以为,事情“一两个月内”不会有变化。实际上不是这样。斯大林马上就会给他们当头一棒。至少是夺走《真理报》,解散斯列普科夫小组。也可能走得还要远一些。在现有的框架内,卡冈诺维奇这步“棋”几乎是“天



才”。斯大林大概还会利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总之,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将被打垮。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这样说了。如果斯大林的这条右倾“尾巴”被斩断,这至少是让上帝高兴的一件事。

4. 斯大林和我们。当然,斯大林对我们也会执行阴谋政策。起初对我们表示“冷淡”:用不着你们。然后他就会说:你们的“名声太坏”,应当“立点功劳”,先从小处做起吧,等到党代表大会开会等等。然后就说:政治局15个人中,13个是我的人,还有你们2个人。

可是全部问题在于,第一,斯大林的时间不多了;第二,无论他怎样搞阴谋,他的政策总要“抓住”阶级的外壳。他近来是在阶级问题上“捣鬼”。可是这是办不到的。而他近来如果说“放弃”了“茨冈人的粗野”的话,也是在正确的阶级政策附近“徘徊”。把他的政策说成“警察制度”(索柯里尼柯夫的话)应当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右派发自内心的呼喊声。斯大林集团还有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则永远不会。

#### 5. 我们怎么办?

下述方案是可能采取的。

(1)现在在党内不要像托洛茨基在党外那样做,即老老实实在谈自己的看法(写一些不能发表的文章等等),然后就等着“倒霉”。

(2)保持沉默并像施略普尼柯夫集团那样等着。

(3)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结成“新”反对派。

(4)对斯大林“俯首听命”。

(5)在能够接受的(对党也合适的)条件下寻求同斯大林结盟。

按我的看法,我们只能坚定地走最后一条路。

我认为最理想的是,如果我们现在就能对党说:

——看见了吗?我们曾经犯过错误。我们承认错误。可是有两条是不能否认的:第一,我们当时(1925年)就对国际环境的阶级力量做出了正确的评价,第二,我们没有采取分裂(1927年12月),而是服从了最痛苦的条件。如果你们现在愿意听听我们的意见,那就是:(1)我们的纲领已经消除了稍稍含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味道,这就是政治的道路。没有“让人害怕的”词句。比“富农的”文本(1928年6月)要好一些。

(2)中央委员会的“老班子”和政治局或多或少的“老班子”,也就是既包括李可夫和布哈林,也包括托洛茨基。是大联合。没有新的分裂。这样来解决党的领导问题。

(3)1928年12月—1929年1月召开诚实的党代表大会。

如果你们不采纳(就是说,莫斯科、彼得堡和……斯大林现在实际上不采纳),那我们就准备走一条更危险,不那么正确,却仍然可以挽救局势的道路(因为党总须要行动,而不是坐以待毙)——走狭义的联合(斯大林和我们)。

那时要向斯大林提出如下条件:

1)立即解除托洛茨基的流放,而且一般而言,对反对派不搞监禁和流放。

2)让我们回到彼得堡去。这是主要的。不一定是我本人,可是是我们的同志。“让我们集团和科马罗夫集团在彼得堡和解,如果后者反对右倾的话。”——至少是按照这样的公式。

3)12月的代表大会的口号是反对右倾。

4)现在就在出版机构里安排我们的同志。

5)让我们有机会对过去的事情哪怕说出百分之五十的实情。

6)还有许多保证须要考虑。无论如何不让他再次欺骗我们。

当前要注意的——1)通过索柯里尼柯夫同布哈林见面,这事一旦在莫斯科传开了流言,在政治上就非常危险。

2)因此须要加快同斯大林的会见。怎么做——要专门考虑。

3)应当立即召集拉舍维奇、库克林、哈里托诺夫、巴卡耶夫、阿夫杰耶夫、沙罗夫、叶夫多基莫夫(如果可能的话)、叶梅利亚诺夫(老头),也可以找几个更基层一些的,以及更“年轻一些”的和更基层一些的(例如,米尼切夫、罗茨坎、莫罗佐夫、沃洛加·莱温等人+格森、鲁缅采夫、亚历山德罗夫、塔拉索夫等人+古济科夫和两三个普梯洛夫工厂的人)。应当把这些人稍稍组织起来。和每个小组都要分别谈话,在莫斯科要集聚力量。

4)应当开始移居莫斯科。

5)应当比我们预计的更多利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6)应当尽快完成我们的两份文件,使其具有更肯定的(较少争论性的)纲领形态。

7)应当决定是否反对布哈林——共产国际纲领。

再者,从两个集团的观点看,我们的作用也许是很大的。

1)右派(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认为:假如“这些人”支持我们,情况就会是这样:不存在什么向右转,完全是斯大林个人不堪忍受,列宁的遗嘱等等。

2)中间派(斯大林)认为:假如“这些人”支持我,情况就会是这样:不是什么个人独裁,而完完全全是政治姿态。大家看,我斩断了“极左派”,我也斩断了右

派。我是中心人物。我决定一切。我比列宁更高明。

我们很快就能说真话了：十五大以后，我们忍辱负重，因为不幸的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我们不能让别人把我们从我们的党内清除出去。我们当时（23人声明）实际上就是这样说的：不论条件多么苛刻，“我们都让自己的意志和观点服从”等等。

再再者，斯大林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和托洛茨基谈判呢？啊？

再再再者，我们记得卡冈诺维奇对菲奥多罗夫说的话：季诺维也夫 + 加米涅夫“仇恨斯大林”，所以不能在一起工作。

1928年7月14日。我们现在知道的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

1) 他建议留在莫斯科(1928年1月初)。

2) 他把我们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

3) 他对“祝贺”信表示“不满”。

4) 他口述了对季诺维也夫文章的评论。

5) 他拒绝同加米涅夫会见。

6) 他吹嘘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7) 他说过：“非常高兴接受”，也接受我们入了[党]。

8) 他眼下还没有对季诺维也夫的便笺 + 莫洛托夫同叶夫多基莫夫的谈话，以及柯秀尔的谈话做出回答。

他的司令部：

斯大林

莫洛托夫

伏罗希洛夫

米高扬

奥尔忠尼启则

鲁祖塔克

古比雪夫

加里宁

鲍曼(?)

基洛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84号全宗, 2号目录, 45号案卷, 第48—54张。副本。)

## 注 释

- 1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召开。会上听取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总结报告和组织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大会将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开除出党。
- 2 指副财政人民委员 M. И. 弗鲁姆金 1928 年 6 月 15 日致政治局的信。他在信中指出,由于在农村采取了非常措施,经济中的比例失调和失衡现象危险地增加了。他呼吁:“必须回到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去。”信中还建议放弃加紧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6月20日和2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弗鲁姆金的信发表了讲话。弗鲁姆金的信和莫洛托夫的回答发表了。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 集体化和消灭富农 文件和资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第290—294,297—301页。(以下称《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莫斯科,1999年,第290—294,297—301页。)斯大林的回答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01—110页。
- 3 《真理报》自1917年起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2年5月在彼得堡出版了第一期,1918年3月起该报在莫斯科出版。
- 4 见补充材料1。
- 5 见补充材料5—12。
- 6 见补充材料10。
- 7 见本书第1卷。
- 8 见本书第2卷。
- 9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57个国家的532名代表。
- 10 代表会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代表的会议。
- 11 声明是1928年7月30日由政治局批准的。政治局决议:《通过联共(布)代表团抗议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内存在分歧的种种流言蜚语的声明的最后文本》的草案是斯大林起草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41号案卷,第37张)。在记录所附的材料中还保存着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作为最后文本的声明草稿。这个草稿是布哈林起草的,下方有参加投票的政治局委员的签名:斯大林、布哈林、加里宁、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同上,第33张)。声明文本事先曾发给政治局委员阅读,莫洛托夫1928年8月4日致加里宁的一张便笺可以作证:“亲爱的米·伊·!送上政治局委员们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会的声明。你能理解为什么在目前条件下这是必须的。我们替你签了名,相信你会无条件地同

意这个声明。拖延是不行的。总之,必须得到你对我们的意见,以及对你而言是‘侵犯性的’解决方案的正确性的认可。请别因此而生气……”(同上,17号全宗,85号目录,302号案卷,第1—2张)。

- 12 米高扬的提纲经修改后由政治局于1928年7月2日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8号案卷,第1张)。亦可参阅补充材料7及12。
- 13 指1928年7月13日召开的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李可夫就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做了详细报告。报告发表在1928年7月15日的《真理报》上。
- 14 指《真理报》1928年8月11日发表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篇文章《党内教育的要义》。出于对斯大林集团的不满,文章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应当教育党员群众不要害怕背离布尔什维克的基本路线的某些细微思想,不要害怕‘倾向’这个词。党的一致并不在于所有的人都按一个公式思维,对所有现象的种种细节都做相同的理解;党的一致是在对党的基本总路线有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的一致行动。

在斯大林集团的压力下,莫斯科州常委于1928年8月29日通过决议,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在乌格拉诺夫向莫斯科州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的报告中有详细说明(《莫斯科州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 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1928年,第10—11页)。

- 15 在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九月全会上,利亚多夫有一个简短的发言,谈到必须向中农做出让步。1928年9月28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工人的莫斯科》报上批评了这个发言,认为它发挥了“让步理论”。作为回答,利亚多夫于10月2日在《工人的莫斯科》上发表了《致编辑部的信》。他表示同意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论据,但坚持自己的立场,引用了莫洛托夫的文章《七月全会总结》,其中谈到提高粮食采购价格实际上就是对中农的让步。莫洛托夫就此于10月1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与其加深错误,不如承认错误》,谴责了利亚多夫的观点和“不断让步的理论”。文章说,提高粮食采购价仅仅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向农民群众做出的个别让步,“把它笼统地归结为让步就是陷入了危险的、机会主义的片面性”。
- 16 政治局1928年1月26日批准的《真理报》编辑委员会包括下列人员:布哈林、阿斯特罗夫、鲍曼、布勃诺夫、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扎伊采夫、卡尔宾斯基、马列茨基、帕舒卡尼斯、斯列普科夫、乌里扬诺娃、蔡特林(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70号案卷,第3张)。1928年2月9日编委成员增补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上,672号案卷,第7张)。1928年7月30日政治局决定的新编委成员有:布哈林、克鲁敏、萨韦利耶夫、马列茨基、乌里扬诺娃、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同上,698号案卷,第7张)。
- 17 联共(布)中央的号召书《就开展自我批评致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书》是政治局于1928年6月2日通过的,发表在6月3日的《真理报》上。反对国家机关的腐化被宣布为改造时期的紧迫任务。实行党内和工会的民主,“不论职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实行自

- 我批评被宣布为“当前的中心口号”(《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卷,莫斯科,1984年,第338—342页;以下称《苏共决议……》,第4卷,第338—342页)。号召书由一个小组起草,其成员有:柯秀尔、托姆斯基、奥尔忠尼启则、乌格拉诺夫、布哈林(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7号案卷,第7张)。
- 18 《工农检查之页》自1928年3月15日至1933年11月28日在《真理报》定期刊出。第一期上有一篇短文,将该页的任务规定为:“围绕着同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各种缺点作斗争的问题,加强无产阶级舆论的组织工作,并使每个工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农民和雇农能够通过本页经常同官僚主义、拖拉疲沓和经营不善现象作斗争”。
- 19 根据政治局1928年7月23日的决定,斯列普科夫被解除《真理报》编委的职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8号案卷,第7张),同一天,阿斯特罗夫被补进《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会(同上,第8张)。可参见注16。
- 20 布哈林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迎接新的经济年份)》发表在1928年9月30日的《真理报》上。文章对1927/28经济年度做了总结,并提出了对从10月1日开始的1928/29新经济年度的设想。布哈林批评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经济理论,同时指出了在经济中采用非常措施和放弃市场关系的致命后果。可参见注64。
- 21 指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构的那些联共(布)工作人员。在党内斗争尖锐化时期,自1926年起至30年代初止,代表团成了首先是监督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季诺维也夫,后来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活动的常设机构。
- 22 《共青团真理报》是一张社会—政治日报,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192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
- 23 《布尔什维克》是俄共(布)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和政治杂志。根据组织局1923年11月19日的决定设立,1952年11月起改名为《共产党人》。
- 24 《革命与文化》是半月刊杂志,1927—1930年间在莫斯科出版。
- 25 1928年12月14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会议记录第53号,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613号全宗,1号目录,86号案卷,第106张。
- 26 指德国共产党1921—1923年间的领导人布兰德勒的拥护者们,他们在1928年秋被指责为“右倾”,后被开除出党。1928年12月30日布兰德勒分子组成了自己的反对党——德国共产党(反对派)。
- 27 指在1924—1925年间领导德共的P.菲舍尔—A.马斯洛夫左派集团的拥护者,他们在被开除出德共后,成立了“列宁主义者同盟”。
- 28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展了积极的反“右倾”斗争,1929年2月捷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曾对此做了总结。但“右倾”的拥护者们在1929年4月以前仍然保持着对捷共控制下的“红色工会”的领导权。
- 29 见本书第3卷。
- 30 画线的句子是斯大林添加的。

- 31 苏联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12月10—24日举行。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总结报告和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苏联工会驻工会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总结报告;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的当前任务;工会的工资—经济工作;工会的组织建设;工会的文化—教育任务;工会与合作社;工农检查院在健全和改进行政—经济及贸易机构中的作用;选举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检查委员会。政治局批准的工会八大领导小组成员有: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哈林、古比雪夫、鲁祖塔克、多加多夫、洛佐夫斯基、施米特、施瓦茨、列普谢、阿库洛夫、米哈伊洛夫、乌加洛夫、美尔尼昌斯基、阿尔秋欣娜、米利恰科夫、奥尔忠尼启则、莫斯克温(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6号案卷,第7张)。
- 32 雅罗斯拉夫斯基指的是托姆斯基1929年1月14日的声明(见补充材料4),该声明曾在1929年1月30日分送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16张)。
- 33 卡冈诺维奇根据政治局1928年12月23日的决议被补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主席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8号案卷,第4张)。
- 34 政治局的这项决议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8号案卷,第4张。
- 35 政治局的这项决议见:同上,721号案卷,第3张。
- 36 见补充材料1。
- 37 见补充材料5。
- 38 1898—1899年间法国由于诬告德雷福斯将秘密文件交给德国人并判处他终生监禁,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国内危机。对德雷福斯的指控被利用来煽动反犹太运动和攻击共和制度及民主自由权利。
- 39 见补充材料11。
- 40 见补充材料10。
- 41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于1929年4月23—29日举行。会议的议程是: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关于提高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税负,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代表会议的材料已经发表。参见:《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速记报告 1929年4月》,莫斯科,1962年。
- 42 申诉处(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和俄罗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联合申诉处)是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8年1月18日的决议设立的,“旨在加强和开展调查并审理对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以及对劳动群众的要求漠然置之的申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613号全宗,1号目录,78号案卷,第10张)。
- 43 指通常被称为“遗嘱”的《致代表大会的信》和《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这两份文件是列宁在1922年12月23—26日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列宁认为必须让下一次党代表大会知道这些文件。其中谈到必须增加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人数,并对党的

各个著名活动家做了个人评价。

《致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当天就送给了斯大林。俄共(布)中央全会1924年5月21日决定不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而是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致代表大会的信》。同时预先说明,列宁的文件不得复制。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将《致代表大会的信》作为大会速记记录的附件,并将这些记录和列宁谈党内问题的其他信件在《列宁文集》中发表。这封信刊登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内部公报第30期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二部分则在斯大林时期并未执行。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时,代表们才得知列宁的这几封信,后来信被分送给各级党组织,又在《共产党人》1956年第9期上发表,大量出版了单行本并选入《列宁全集》第4版,第36卷(以及《列宁全集》第5版,第45卷,第343—348页)。

- 44 指1929年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附件3)。
- 45 见补充材料13。
- 46 《人民意志》(《Volkswille》)是1926年被德国共产党开除的左派集团“列宁主义者同盟”的机关刊物,在苏尔市出版。
- 47 乌共(布)第十一次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于1929年4月9—13日召开。此处提到的决议是代表会议于1929年4月10日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26号案卷,第63张)。
- 48 关于定期召开政治局的闭门会议的决定是1927年2月5日做出的。规定闭门会议每月召开两次,同例会交错进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17号案卷,第4张)。但是半年以后,1927年7月29日,政治局取消了定期的闭门会议,规定每次根据政治局的特别决定,就个别问题举行闭门会议(同上,第646号案卷,第7张)。后来又恢复了定期召开闭门会议的做法,并在1930年12月30日由政治局以专门决议批准(同上,162号目录,9号案卷,第12张)。
- 49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议程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组织总结报告,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处的总结报告,经济建设问题,关于工会和共青团工作,关于修改党章。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和将俄共(布)更名为联共(布)的决议。
- 50 见补充材料6—8、11、12。
- 51 《最近新闻报》是一张日报,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1920年4月至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报纸编辑是立宪民主党的领袖П. Н. 米留可夫。
- 52 见补充材料4。
- 53 1929年2月14日政治局批准了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的“1928/29年度下半年粮食供应计划”命令草案。按照这项命令,各种渠道(集中采购、非集中采购、粮食加工)应销售20100万普特,规定了按专门的购货本出售粮食制品的手续和限量,各地执委会在规定



- 工人及其他居民的供应标准时可以自行机动,等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26号案卷,第2—4张)。
- 54 托姆斯基发言的速记记录由一个不知名的人和罗济特做了重大修改,托姆斯基也作了个别标注。
- 55 1928年3月7日政治局会上讨论了工业财务计划。据材料看,正是在这次会上莫洛托夫严厉地批评了李可夫提出的草案,认为对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基本建设拨款不足。李可夫一气之下写了辞呈(参见《苏联领导层 书信往来 1928—1941年》,莫斯科,1999年,第22页)。3月8日政治局再次审议这个问题并通过决议:“1)基本上接受苏联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1927—1928年度生产—财务综合计划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的命令草案。2)责成李可夫及其副职根据政治局本次会议的交换意见对命令草案做最后修改。3)责成由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古比雪夫同志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组成的小组为增加冶金工业的基建投资寻找补充资金,并向今年3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会议提出建议,随后于今年3月15日,星期四,向政治局提出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76案卷,第2张) 李可夫辞职的问题得以解决。
- 56 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成立于1920年,负责领导所有口头和文字宣传工作。1928年经过改组,称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及出版部。
- 57 《共青团真理报》和《劳动报》的争论始于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共青团真理报》在许多期(1928年11月6、11、14、29等日及12月9日)上发表文章和短评,批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机关报《劳动报》对工会八大的筹备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指出了工会工作中的其他缺点,特别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很差,对劳动群众日常利益的维护工作也不能令人满意。《劳动报》(1928年11月10、13、21等日)指责《共青团真理报》破坏工会领导的威信,败坏工会的名声。
- 58 1928年7月2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总的经济形势讨论了粮食采购政策问题。政治局经修改后批准了米高扬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全会提出的报告提纲。(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4号案卷,第1张)。
- 59 雅罗斯拉夫斯基指的可能是自己的一篇文章《论一种危险的理论》。它发表在1928年9月28日莫斯科州委的机关报《工人的莫斯科》上。文章是回答利亚多夫在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可参阅注释15。
- 60 有关资料没有找到。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筹备出版《斯大林全集》时编写的斯大林年表中,也没有斯大林在莫斯科州委常委会上讲话的材料。(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71号全宗,10号目录,415号案卷)。
- 61 1928年7月1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做了报告“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报告7月15日发表在《真理报》上。
- 62 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详情可参阅本书第3卷的前言。停止共产国际中间“右

- 倾”作斗争的“特别”方法的要求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声明中提出的。(见补充材料 14)。
- 63 莫洛托夫的文章《论目前局势》1928年8月5日发表在《真理报》上。它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杂志第14期登载的文章《七月全会总结》的一部分。
- 64 政治局1928年10月8日的会议上讨论过《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文章,布哈林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决议中指出,由于存在许多有争议的观点,《真理报》编辑部不应当不报告政治局就发表这篇文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8号案卷,第3张)。还可参阅注20。
- 65 由斯大林和乌格拉诺夫起草的联共(布)中央号召书《致联共(布)莫斯科全体党员》于1928年10月18日由政治局会议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9号案卷,第3张)。号召书于1928年10月19日发表在《真理报》上。
- 66 1928年11月27日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全会满足了乌格拉诺夫解除他莫斯科州委书记职务的请求。详情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2期,第122页。
- 67 见注16及19。
- 68 见补充材料4及5。
- 69 1928—1929年度及1929—1930年度统一农业税法对个体农户,特别是在当地收入超过一般农民群众的,以及有非劳动性收入的,不按普通税率,而按大大提高了的个人税率课税。受到个别课税的农户数按法律规定不得超过农户总数的3%(《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34期,第212条;1929年,第12期,第103条),而实际上这个数字经常被超过。
- 70 安德烈耶夫是在1919年1月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补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
- 71 1921年5月31日政治局决定派托姆斯基去突厥斯坦,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172号案卷,第3张)。这项任命的原因是托姆斯基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1921年5月)前夕在工会同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专设的俄共(布)中央处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案件委员会认定他在全俄工会第四次大会上的行为粗暴地违反了党纪,同意俄共(布)中央全会1921年5月18日关于解除托姆斯基代表大会的领导职务及以后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的决定。
- 72 布哈林和拉狄克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920年2月6日的决定被派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40页)。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说,我们派他们到工会中央理事会去当政委,这些人是想玩花招,说是破坏了独立性,搞官僚主义。也许你们知道有比拉狄克和布哈林更出色的理论家,那就给我们吧,也许你们知道有熟悉工会运动的更优秀的人选,那就给我们吧。怎么回事呢?难道中央无权给工会增加一些最懂得工会运动理论,熟悉德国的经验,因

- 而能够对错误路线产生影响的人吗?如果中央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它就无法驾驭局面!”(《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 1920年3—4月》,莫斯科,1960年,第88—89页)。
- 73 全俄第三次工会代表大会 1920年4月6—13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约1600名代表,代表着400多万工会会员。会上布尔什维克占据优势: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同情者有1180人,孟什维克是57人,其他党的代表69人。大会的工作基础是刚闭幕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建设纲领。
- 74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 1926年12月18日选举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是:托姆斯基、多加多夫、安德烈耶夫、列普谢、米哈伊洛夫、拉琴科、施瓦茨、施米特;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美尔尼昌斯基、乌加洛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菲加特纳、科罗斯捷列夫。
- 75 伏罗希洛夫在检查插话时抹掉了这句插话。
- 76 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各级党组织的、用红色封皮的材料。此处指的是为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准备的材料(见补充材料1—5)。
- 77 见补充材料14。
- 78 指加里宁为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准备的、经政治局 1929年4月1日批准的提纲《提高农业的途径和中农的税负问题》。
- 79 指由反宗教斗争和侮辱教徒感情和少数民族习俗(关闭宗教学校,禁止戴面纱等)而引发的阿扎尔农民的武装暴动(1929年3月)。1929年3月2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1)建议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用一切手段消灭阿扎尔的反革命暴动。2)责成奥拉赫拉什维利每天向莫斯科报告事件进程和采取的措施。3)建议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放弃执行禁止戴面纱的法令。4)在反对群众宗教偏见的斗争中,承诺决不采取任何暴力和行政压力的手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56张)。
- 80 指1924年8月由于关闭教堂和党政机关的任意妄为而引发的西格鲁吉亚、古里亚和梅格列里亚农民暴动。报刊上把它说成是孟什维克分子准备和挑起的行动。被军事力量所镇压。
- 81 《工商报》是一张日报,是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1922—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有不同名称。
- 82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5日—4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审议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经济建设当前的任务、工会运动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改行民兵制等。
- 8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67页。
- 84 粮食和某些食品的配给制(购货本)是1928年底实行的。1928年12月6日政治局在讨论粮食供应问题时,做出下述决议:“为保证首先向工人和职员供应粮食及短缺食品,消

灭排队现象,减少非无产阶级人口的粮食消费,特别是消灭购买粮食喂养牲畜的现象,建议列宁格勒市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以及其他工人中心苏维埃,在合作社的参与下,制定并与商业人民委员部协调执行粮食供应的具体程序,保证根据各地特点实现这项任务(购货本、固定供应点等等)。作为消灭购买粮食喂养牲畜现象的一种手段,容许对非无产阶级人口提高粮价,此项办法目前仅限于在列宁格勒进行试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5号案卷,第3张。)1929年3月7日政治局审查了莫斯科的粮食供应问题并做出决议:“1)批准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自本年3月15日起实行购货本制度,规定莫斯科工人的每日定量为800克,工人家属及职员为400克。2)准许莫斯科市苏维埃实施此定量而不予公布,严格指令贸易机构凭购货本出售粮食。”(同上,729号案卷,第4张)

莫斯科自1929年3月17日起,凭本供应粮食。粮食凭当日粮票每天出售一次,根据购买者的愿望,可提前一天出售。

- 85 1929年3月底,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讨论了最优(极限)全国统一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李可夫支持这一立场,同时提出再通过一个特殊的两年发展计划,旨在消除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李可夫的报告提纲在政治局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上受到批评。其中米高扬在意见里写道,只谈新经济政策而忽视阶级斗争,就是把党拉回到应该向党灌输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思想的1921年。米高扬认为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加紧发展工业。1929年4月15日提纲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5号案卷,第1张),布哈林在会上提出许多修正,建议把新经济政策和城乡之间的市场关系问题单列出来。修正意见被否决了。
- 86 1929年3月4日,戈尔洛夫卡的“玛丽娜”煤矿在第二班工人下井时,罐笼带着矿工断裂落下。死亡27人。3月13日政治局讨论了戈尔洛夫卡的事故问题,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任命一个政府委员会(成员有乌格拉诺夫、列别德、施瓦茨)调查此案,责成委员会立即前往出事地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0号案卷,第3张)。1929年4月4日,乌格拉诺夫返回后向政治局做了报告。当天该委员会的建议就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同上,737号案卷,第5、6张)。
- 87 1924年2月3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在讨论干部流动和军队供应问题时,指出大量“可能使军队瓦解”的缺点,全会成立了由托姆斯基、皮达可夫、拉舍维奇、古谢夫组成的委员会,“和托洛茨基共同讨论并制定……健全和巩固军队的紧急措施方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116号案卷,第110张)。1924年3月3日政治局接受委员会的建议,解除斯克良斯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任命伏龙芝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上,3号目录,423号案卷,第2张)。
- 88 指卡冈诺维奇1929年4月6日在乌拉尔州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以及巴利茨基1929年4月11日在乌共(布)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 89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稿中,这一句是米高扬的插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01号案卷,第101张)。米高扬在检查插话时删去了这一句(同上,415号案卷,第5张)。
- 90 列宁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是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直接联系着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3—377页)。
- 91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是一张日报,1917年2月28日开始在彼得格勒发行,当时称《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8年6月起称《消息报》,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的机关报,1923—1938年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
- 92 指布哈林1929年1月21日在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的大会上的报告《列宁的政治遗嘱》。布哈林的报告发表在1929年1月24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年出版了单行本。
- 93 指齐夫里诺维奇的文章《他们走上了一条危险的路》(《真理报》,1929年4月2日)和瓦累基斯的文章《右倾和党的农村政策》(《真理报》,1929年3月2日)和《对领导的诽谤和党员群众的呼声》(《真理报》,1929年3月22日)。
- 94 库利科夫根据政治局1929年1月21日的决议被撤去莫斯科州委常委的职务,后被任命为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理事(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23号案卷,第6张)。
- 95 指发表在1929年4月14日《真理报》上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的初稿(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45页)。
- 96 见注13。
- 97 见《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及莫斯科市委第五次联席全会 1928年9月11—12日》,莫斯科,1928年,第85页。
- 98 由于即将举行各支部改选和各区党代表会议,1928年10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由乌格拉诺夫签名的一封信《关于近期任务致联共(布)莫斯科全体党员》。信中提出了加强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残余分子,以及和看不见富农危险的右倾分子作斗争的任务。同时乌格拉诺夫要求“保证党内批评的自由,排除那种把自由思想和任何批评意见都认为是“倾向”和“捣乱”等等的方法。
- 99 莫斯科省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于1929年2月23日—3月6日召开。会议讨论了下述问题: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工会的工作报告、中央工业州的区域划分等。会议完全赞成联共(布)中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一致谴责右倾,声明莫斯科党组织在执行“党的总路线方面”仍然是中央坚定的支持者。
- 100 红色教授学院是专为国内高等学校培养社会科学师资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高等学校。存在于1921—1938年,归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1928年时学院设历史、历史—党务、经济、哲学、法律、自然科学、文学等部及预科。
- 101 可能是指《真理报》1928年6月30日发表的马列茨基的文章《虚假的一步》。马列茨基

- 在回答卡尔宾斯基发表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文章《集体农业》时,批评了他对农业发展前景的解释。
- 102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是1918—1934年间最高军事权力的集体制机构,负责领导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陆海军人民委员。
- 103 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共产党采取了分裂德国工会运动和建立“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方针。但是这个组织并没有能够对德国工会运动的中心——处于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全德工会联合会形成强大的竞争。
- 104 政治局专门委员会通过的、提交党代表会议的五年计划报告提纲草案在1929年4月15日得到政治局会议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5号案卷,第1张)。
- 105 见注92。
- 106 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432页。<sup>①</sup>
- 107 预购合同是以合作社或国营机构为一方,以农民为另一方签订的合同。它规定向生产者订购符合约定条件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以及交售日期。预购单位保证按事先规定的价格采购产品,向农民提供预付款、种子和农具,并给予农业技术援助。预购合同既和集体单位,也和个体农户签订。苏联从1922年开始采用预购合同,但作为采购的基本方式是1928—1929年才实行的。
- 108 战时共产主义指内战年代采用的一套非常措施,它决定了苏维埃国家在1918—1920年间特殊的经济政策。
- 109 关于西伯利亚事件,请参阅:《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463—464页,第491—495页,第605—609页。
- 110 捐献是吸引农民资金来发展农村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种形式。《捐献法》于1924年8月29日通过,它的基本原则是平均主义(《苏联法令汇编》,1924年,第6期,第69页)。1927年8月24日,为了把捐献作为向富裕农民施加经济压力的一种方法,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捐献的新法令(《苏联法令汇编》,1927年,第51期,第509页)。捐献是所有农村公民都必须履行的。规定了可以使用捐献筹集的资金的项目。捐献可以用货币或实物支付,也可以用劳动抵补,并不得超过统一农业税的35%。1928年内,捐献的实施条件曾经一再改变。俄罗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8年10月4日通过的法令《1928—1929年度捐献实施细则》没有公布。规定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不得采取任何施加行政压力的措施。捐献不得作为一种专项运动,也不得无例外地应用于一切农村地区。各地执行委员会不得因实施捐献而削减用于农村人口的文化—社会需要及经济需要的预算拨款。法令规定了按照统一农业税总额按比例分摊捐献额的问题。捐献总额被降低到统一农业税额的25%(俄罗斯联邦国

<sup>①</sup> 原文出处有误,中文仅按原文译出。——译者注

- 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40号目录,1033号案卷,第1—4张)。但实际上这项法令经常遭到破坏。
- 111 卡冈诺维奇指的是1917年10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投票反对武装起义的路线。
- 112 卡冈诺维奇引用的是列宁提出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 1922年》,莫斯科,1961年,第537页)。
- 113 在速记记录中这句插话是米高扬说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15号案卷,第8张)。
- 114 1928年8月30日,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农业税问题,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若干党的文件,以便正确实施农业税”,委员会成员有卡冈诺维奇、库比亚克、乌格拉诺夫(由弗鲁姆金同志代替)、列别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2号案卷,第2张)。9月6日,政治局原则上通过了由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征收农业税给各地的命令草案,责成委员会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修改草案,并责成中央书记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党的系统发一个简短的补充指令,要求严格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同上,703号案卷,第1—2张)。人民委员会于1928年9月11日做出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中的缺点的决议(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390—392页)。
- 115 《布哈林文选》上册,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8页。
- 116 指布哈林1925年3月5日在全苏农业集体会议上的讲话。全苏农业集体会议于1925年2月26日—3月6日举行。会议材料刊登在1925年3月5日及6日《真理报》上。正确的文字是:“集体农庄不是一条主干线,而是最根本的重要辅路中的一条。”(《真理报》,1925年3月6日,第3页)
- 117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是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机关报,1921年2月由马尔托夫创办,1921—1933年在柏林出版,1933—1940年在巴黎出版,1940—1963年在纽约出版。
- 118 经本人修改过的速记记录稿中是另一些数字:“1000、800、600 普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01号案卷,第190张)。
- 119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69条,富农被剥夺了选举权。(《苏联及俄罗斯联邦宪法》,莫斯科,1934年,第35—46页)。
- 120 《加强粮食采购的措施》决议是政治局1929年3月20日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1号案卷,第4—5张)。
- 121 可能指的是1928年政治局十一月全会的决议《与提高农业的任务相关的农村工作》。这项决议是根据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报告做出的。见本书第3卷。
- 122 可能指的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8年10月19日的决议《关于组织贫农参观和贫农代表会议》,这项决议旨在保证贫农更积极地参加苏维埃改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70号案卷,第10张)。

- 123 《农民报》是俄共(布)和联共(布)的机关报,1923—1939年间在莫斯科出版。
- 124 1925年10月3日,一名党的干部列昂诺夫给莫斯科州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写了一张条子,其中讲到自己在列宁格勒同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扎鲁茨基的谈话。扎鲁茨基批评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政策,讲到“热月政变”的威胁,谴责了对列宁格勒领导,特别是对季诺维也夫的攻击。为了审理此案,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扎鲁茨基被撤去了列宁格勒州委和党的西北局书记的职务。列昂诺夫的信成了攻击列宁格勒领导人的借口,也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形成及其与政治局中的多数对抗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列昂诺夫信件的资料,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30号案卷,第40—47张)。
- 列昂诺夫同扎鲁茨基谈话的详情在彼得罗夫斯基和扎鲁茨基在联共(布)十四大上的发言中有说明(见《全联盟共产党(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18—31日。速记报告》,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169、231页)。
- 125 乌加洛夫是根据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常委会1929年3月23日的决议被解除州工会理事会主席职务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1号目录,2710号案卷,第1张)。
- 126 在检查速记记录时,奥尔忠尼启则删去了这句插话(同上,2号目录,415号案卷,第245张)。
- 127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中,这句插话是米高扬说的(同上,401号案卷,第207张)。米高扬在检查时删去了这句插话(同上,415号案卷,第9张)。
- 128 国家领导机关曾经一再讨论过粮价问题。1927年9月1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规定各种作物和不同生产地区之间较为合适的价格。(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51号案卷,第3—4张)这与1926—1927年度相比实际上是降低了1927—1928年度的粮价。
- 129 鲍曼1927—1928年任莫斯科州委组织部长。1928年4月19日政治局任命他为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3号案卷,第7张)。1928年11月起,他是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
- 130 五年计划提纲草案起草委员会是政治局于1927年9月29日设立的,李可夫任主席。经过几周工作,起草五年计划的命令草案于10月20日提交政治局审议。政治局基本上通过了草案,并建议“全体政治局委员当天将对命令草案的修改意见提交委员会审议”。但是没有找到乌格拉诺夫的修改意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6号全宗,2号目录,42号案卷,第5—75张)。
- 131 大概指的是1926年11月25日政治局会议。会上审议了“本经济年度的大规模建设”问题,乌格拉诺夫出席了这次会议。政治局认为在第聂伯河上修建发电站(第聂伯建设工程)是首要任务之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04号案卷,第3张)。政治局的材料中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表决结果。



- 132 私人资本问题 1928年在政治局会议上曾经多次讨论过(10月25日;11月1、12、29日;12月6日)。1928年12月13日,政治局决定从政治局议事日程上取消关于私人资本的决议草案,建议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在与私人资本有关的重大实际问题出现时,将这些问题提交政治局审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6号案卷,第4张)。
- 133 见注55。
- 134 奥尔忠尼启则的插话起初是这样的:“对,我承认这是我说的。”(同上,17号全宗,2号目录,403号案卷,第14张) 后经本人在检查时修改过(同上,415号案卷,第249张)。
- 135 起初专家会议定在1928年3月23日。3月22日政治局建议莫斯科州委将会议改到3月28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78号案卷,第4张)。3月26日政治局委托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拟一份工程师会议的决议草案并不迟于3月27日分送沙赫特案件委员会全体委员”。他们并受委托组织工程师会议上的发言(同上,679号案卷,第6张)。3月29日,政治局指示《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关于工程师和技术干部会议的评论,说明参加会议的人数并全文刊登会议的决议(同上,第1张)。
- 13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33页。
- 137 1928年9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捐献的议程时,曾经涉及征收农业税中的过火行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0号案卷,第1—3张)。
- 138 这句插话是安采洛维奇在检查时加进去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15号案卷,第195张)。
- 139 乌格拉诺夫指的很可能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9年2月20日的命令《富农经济中使用劳动法典的程序》(见:《苏联经济生活大事记 1917—1965 第1卷 1917—1950》莫斯科,1967年,第192页)。
- 140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稿中,这句插话是奥尔忠尼启则说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03号案卷,第22张),在检查插话时被他划掉了(同上,415号案卷,第252张)。
- 141 1928年6月6—15日卡巴尔达暴动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称为“富农—伊斯兰暴动”。它是由当局在粮食采购中使用强硬措施、居民粮食供应困难、开展反宗教活动、关闭清真寺,以及在山村中强行开设托儿所,加之传说要将儿童送往中国,作为“对1919年在小卡巴尔达被杀害的中国人的补偿”而引发的。暴动的借口是巴克桑州基什布隆村居民得到通知,6月份应额外交纳4000普特粮食。最贫困居民的气愤得到一些富裕农民和原封建王公的支持。暴动中巴克桑州执行委员会被捣毁,执委会干部和民警遭到殴打,驻军遭到攻击,枪支被抢劫。1928年6月14—15日,进行了消灭暴动的战斗,逮捕了160名“暴动的最积极参与者和恶意挑唆者”。在暴动者企图占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当地分局的工作人员藏身的巴克桑碉堡时,在互相射击中有8人被击毙,20人受伤。

- 142 见注 2。
- 143 大约是指 1928 年 2 月 13 日成立的联共(布)中央报刊部下设编辑办公室。设立办公室旨在加强党对中央报刊编辑部的领导,并使其更接近中央机关。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介绍相应机构的重要材料,向中央报刊领导人通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政府(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大问题和指令”(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113 号目录,597 号案卷,第 83 张)。报刊部改组后,编辑办公室隶属于联共(布)中央鼓动宣传及报刊部。
- 144 “为青工保留工位”的指令是 1928 年 6 月 28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它规定在工业中为青工预留的工位限额是工位总数的 4.5%。政治局并指出,“为学徒青工预留的工位数不得少于现有的数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693 号案卷,第 3 张)。
- 145 1928 年 8 月 30 日政治局否决了共青团中央对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 1928/1929 年技工学校补足编制的决定的反对意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02 号案卷,第 3 张)。
- 146 1927/1928 年间进行的税率改革的目的是提高税率的作用,相应地限制计件制的额外收入,使按不同税率和不同工业部门缴纳的税款逐渐接近。“右派”被粉碎以后,这种税率改革被说成是“极左的”、“平均主义的”、“被工会以托姆斯基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歪曲了的”。1931 年进行了新的税率改革。
- 147 1917—1920 年间,乌格拉诺夫曾经在工会工作;担任过彼得格勒苏维埃职员工会书记、工会理事会书记。
- 148 赤贫一词来自拉丁文 pauper,意为贫穷。
- 149 第一期工业化公债是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发行的,数额为 2 亿卢布,认购日期自 1927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这是每年大量发行公债,积聚资金用于工业建设的开始。
- 150 见注 86。
- 151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稿上,这句插话是奥尔忠尼启则说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03 号案卷,第 51 张)。
- 152 布哈林交回了经修改后的发言记录,同时附有一张便条:“致阿什马林同志。尊敬的同志,送上我的发言,不过我要指出,不同的人的声音都被你改成了抽象的‘喊声’。我担心,涉及的同志会提出抗议(通常是不能这样修改的)。有些地方和我的回答不一致,因为‘修改’并没有考虑上下文。如果要修改那些不曾将插话送来的同志们的插话,我请你同我商量一下上下文,而不要删除我的讲话中的某句话。致同志的敬礼。H. 布哈林,1929 年 5 月 13 日”(同上,第 60 张)。
- 153 指 1929 年 2 月 23 日—3 月 6 日召开的莫斯科省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见注 99。

- 154 见附件3。
- 155 布哈林错了。这里指的是列宁1916年3月11日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列宁在信中坚持,鉴于拉狄克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集团在党纲问题上的动摇,必须终止出版《共产党人》杂志。列宁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尼古·伊万·是一个还在勤奋学习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向是支持他的。但是他(1)轻信流言蜚语,(2)政治上极不坚定”(《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73页)。这封信被引用在1929年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中(见附件3)。
- 156 见注43。
- 157 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是科学研究机构。作为俄共(布)中央收集、保存、研究及出版列宁的文字遗产,以及和列宁的生活及活动有关的各种文件的一个部成立于1923年。1928年和党史委员会合并,1931年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成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 158 指党的调查委员会(1914年)。其成员有加涅茨基(主席)、季诺维也夫和列宁,负责调查许多党员(包括布哈林在内)指控马利诺夫斯基是奸细。由于当时(1914年)缺乏确凿的证据,指控被否决了。1918年马利诺夫斯基回到苏维埃俄国后,被交付法庭审判,并按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的判决被枪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马利诺夫斯基案件调查委员会的材料见:《历史问题》1993年第9—11期、《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革命法庭审理马利诺夫斯基奸细一案的材料可见:《苏联历史》1991年第1—6期)。
- 159 党史委员会(收集和研究所十月革命历史和俄国共产党历史材料的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9月21日的决议设立,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1921年12月1日起,党史委员会作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转属俄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的各个部门除收集和出版文件之外,还建立博物馆、图书馆等。1928年和列宁研究院合并。
- 160 布哈林指的可能是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60—163页。
- 161 见注78。
- 16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819页。
- 163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1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穆拉洛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加米涅夫、阿甫杰也夫、斯米尔加、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巴卡也夫等向政治局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政纲草案(党的危机和克服危机的途径)》。这份文件是反对派就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提出的反提纲(政纲草案全文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6号全宗,2号目录,52号案卷,第1—40张)。反对派的政纲草案中有一句引文:“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91页)。

- 164 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 1927年12月》,莫斯科,1962年,第1221页。
- 165 同上。
- 166 同上,第1222页。
- 167 莫洛托夫解释自己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报告中的错误的便笺于1928年6月27日由他送交《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发表在该杂志的第12期上。
- 168 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 1927年12月》,莫斯科,1962年,第1222页。
- 169 见本书第2卷。
- 170 “热月政变”是法国1794年7月27—28日发生的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
- 171 见注79。
- 172 布哈林指的是鲍曼在粮食中心理事会第五届会议上的讲话。
- 173 见注107。
- 174 布哈林指的是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77页。
- 175 同上,中文版,第170页。
- 176 同上,中文版,第220页。
- 177 见本书第2卷。
- 178 见注85。
- 179 指1925年出版的布哈林的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Н. И. 布哈林选集》,莫斯科,1988年,第146—230页)。
- 180 这是一句拉丁成语:Caveant consules。
- 181 当时共产国际没有总书记这一职位。布哈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
- 182 布哈林引证的是列宁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6—377页)。
- 183 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9年3月8日的决议《关于统一农业税和减轻中农税负》。
- 184 可能是指1929年3月20日政治局的决议《加强粮食采购的措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1号案卷,第4,5张)。
- 185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稿上这句插话是奥尔忠尼启则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03号案卷,第112张),但在检查插话时被他抹去了(同上,415号案卷,第287张)。
- 186 指1918年3月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立即签订布列斯特合约的建议。
- 187 《劳动权力报》是一张日报,联共(布)伊尔库茨克州委、州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州理事会

- 的机关报。1917年12月30日至1928年底出版。
- 188 抵制是对握有粮食的农民施加社会压力的一种方法,在1928—1929年度粮食采购运动初期被积极采用。起初以为,严格针对个人采用的抵制,即将农民实际上从农村生活中排挤出去(合作社机构、村苏维埃、磨坊、公用耕地等都不为他服务),会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是实际上抵制被广泛采用来对付整个村庄或是村民集体。
- 189 布哈林谴责所谓的“第三次革命”,大约是指斯大林的追随者们打算采取的以暴力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的方针。
- 190 引证不确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62页。
- 191 布哈林指的是列宁的文章《论合作社》。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1—362页。
- 192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稿上这句插话是奥尔忠尼启则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03号案卷,第127张),但在检查插话时被他抹去了(同上,415号案卷,第288张)。
- 193 检查插话时斯大林抹去了这句话,添上了:“调查。斯·”(同上,416号案卷,第186张)。
- 194 1929年4月15日,政治局审议了远东边疆区的供应问题,准许“立即从满洲购买并运入远东边疆区300万普特粮食,而在本季度内不减少按政治局规定的1000万卢布的积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68张)。
- 195 全苏编辑会议于1928年9月22—23日在莫斯科召开。莫洛托夫在会上做了《当前局势和报刊》的报告,9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这个报告。
- 196 政治局因为要向联共(布)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问题,于1929年1月24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托姆斯基、布哈林、A. П. 斯米尔诺夫、雅科夫列夫、И. В. 柯秀尔、列别德。批准奥尔忠尼启则为代表会议的报告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23号案卷,第4张)。1929年3月29日政治局同意奥尔忠尼启则关于批准雅科夫列夫替代他为报告人的建议(同上,733号案卷,第8张)。委员会于4月6、8、9日讨论了雅科夫列夫提出的、向十六次党代表会议做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今后任务》提纲草稿。对提纲的修改意见中有布哈林的如下意见:“6. 必须尽一切努力强调革命的法制问题。没有革命的法制,就不可能或多或少正确地解决改造时期的任务、复杂而责任重大的计划任务等等。必须指出,机关的所有环节都有责任遵守革命法制的准则,经常改变这些准则、缺乏这方面起码的稳定性严重地妨碍着正确的经营活动:造成为非作歹,极大地加剧了官吏的官僚主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7号全宗,2号目录,19号案卷,第61张反面)。
- 197 这句插话在检查时由米高扬做了修改(同上,17号全宗,2号目录,403号案卷,第151张;415号案卷,第19张)。

- 198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中这句插话是米高扬说的(同上,403号案卷,第153张)。
- 199 布哈林致斯大林信的全文(经本人修改的打字稿)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329号全宗,2号目录,6号案卷,第58—60张)。
- 200 这是斯大林党内代号之一。
- 201 信中提到的9亿是指农村仿佛拥有的商品粮储备(按普特计)。实际上这个数字是统计机构错误计算的结果。详情可参看本书第1卷的《导言》。
- 202 见补充材料1。
- 203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中这句插话是奥尔忠尼启则说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03号案卷,第156张)。
- 204 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10月13日的决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因伙同非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立非法的反党印刷所”被开除出党。1930年1月恢复党籍(见《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73页)。
- 205 《红旗报》是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18—1939年间出版。
- 206 1928年秋天在德国进行了反对建造装甲舰计划的运动。在10月3—16日期间征集到的签名不足为否决政府计划进行全民投票所需票数的一半。
- 207 在某些牌戏中全套大牌指从A到10的所有大牌,也就是全部王牌。
- 208 布哈林搞错了。曼努伊尔斯基是1929年3月8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会议上做的联共(布)党内情况的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495号全宗,3号目录,127号案卷,第2张)。
- 209 这里指美国工人(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大会根据指责布哈林属于右倾反对派并支持共产国际队伍中的右派势力的通报通过了决议。决议建议在“与右倾的斗争”中采取组织措施,审议布哈林是否还能够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 210 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之后,直到1933年都住在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普林基诺岛上。
- 211 斯大林在检查记录稿时划去了自己的插话(同上,416号案卷,第205张)。加里宁的插话在他修改发言稿时和打字稿中都被留下了(同上,403号案卷,第211、216张),可是在速记报告中没有这句插话。
- 212 “调和态度”作为共产国际的政治语汇是在1928年2月29日联共(布)代表团和德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会见之后出现的。会见时讨论了德共的形势并把“右倾危险和对它的调和态度”确定为主要危险。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1928年秋天的斗争表明,谴责“调和态度”是使各共产党遵守纪律,以及把持温和路线的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从各党的领导层中清洗出去的方法之一。
- 213 参见本书第3卷的导言。
- 214 红色工会国际于1921年在莫斯科成立,是在共产国际庇护下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红色

- 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8 年 3 月 17 日至 4 月 3 日在莫斯科召开。它的决议巩固了在各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向左转”。
- 215 德国共产党埃森代表大会于 1927 年 3 月 2—7 日召开。在研究了党内情况后决定采取“集聚力量”的方针,也就是把党内各种集团的拥护者都纳入中央委员会。
- 216 指苏联人民委员会 1929 年 1 月 11 日的决议《关于粮食采购问题》,其中承认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实行的提高伏尔加河流域、巴什基尔、乌拉尔等地区的粮食采购任务是正确的。政治局于 1929 年 1 月 17 日批准了这个决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22 号案卷,第 1、10—14 张)。
- 217 主席会议指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会议,是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 1926 年 1 月 19 日的命令成立的集体机构。1926 年 5 月 20 日政治局决定主席会议每周召开一次,制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下周的工作计划,拟定会议议程并审理无须提交人民委员会或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个别行政性问题(同上,561 号案卷,第 6、11 张)。起初参加主席会议的有李可夫及各个副主席。1926 年 8 月 13 日根据李可夫的命令,会议成员增加了米高扬,1926 年 12 月又增加了斯大林、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托姆斯基(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46 号全宗,55 号目录,2037 号案卷,第 52—53 张)。
- 218 1928 年 11 月 12 日政治局在审议苏联预算时,决定“将每瓶伏特加的消费税提高 5 戈比。相应提高烈性酒制品的消费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162 号目录,6 号案卷,第 144 张)。
- 219 见注 84。
- 220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中这句插话是奥尔忠尼启则的。
- 221 指施瓦茨根据政治局 1928 年 9 月 27 日的决定去顿巴斯听取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和煤矿工会中央委员会关于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工作汇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06 号案卷,第 4 张)。1928 年 12 月 31 日政治局派施瓦茨去乌拉尔,于 1929 年 3—4 月间“协助地方加强粮食采购工作”(同上,719 号案卷,第 2、3 张)。
- 222 布尔什维克小组通常在奥尔良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集会,有时在奥尔良大街 11 号的“奥马尼埃”咖啡馆,有时在夏蒂翁大街街角处,圣彼埃尔教堂对面的“奥皮罗日”咖啡馆。如今在“奥皮罗日”咖啡馆的原址上是后建的巴黎国民银行的支行;“奥马尼埃”咖啡馆已经没有了(见:卡冈诺娃《列宁在法国》,莫斯科,1972 年,第 74 页)。
- 223 指 Л. 马尔托夫 1911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拯救者还是取消者(是谁又怎样破坏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
- 224 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320 页。
- 225 由布哈林和 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同撰写的《共产主义入门 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的通俗解说》于 1919 年 12 月出版。

- 22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70页。
- 227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页。
- 228 同上,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76页。
- 229 见注179。
- 230 指布哈林1925年4月17日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10期。
- 231 米高扬搞错了。这里指的是布哈林在全苏农业集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注116。全苏集体农庄代表大会是1928年6月1—5日举行的,布哈林没有在会上讲话。
- 232 见注80。
- 233 指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的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部分舰只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满而举行的反布尔什维克武装暴动。暴动被武力镇压。
- 234 1928年12月5日政治局满足了布哈林休假一个月的请求(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5号案卷,第6张)。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谈话是在1929年1月11日(《历史档案》杂志,1998年,第4期,第39张)。
- 235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稿中这句插话是斯大林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05号案卷,第101张)。
- 236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稿中这句插话是奥尔忠尼启则的(同上,第102张)。
- 237 1928年7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1928—1929采购年度的粮价政策”问题。责成由米高扬、克维林、斯米尔诺夫组成的委员会,“按照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可以有所降低,以及乌克兰略有提高的原则”对地区粮价做出个别变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6号案卷,第4张)。
- 238 1928年4月23日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建立新国营农场”的问题。通过了下述决议:“甲)接受关于在3—4年内,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新国营农场不会伤及农民‘份地’的那些地区,建立一些新的大型粮食生产国营农场,指望它们到期末时能够每年生产1亿普特粮食的建议。乙)责成由加里宁、库比亚克、莫洛托夫、米高扬、克维林(国家计委)、鲍曼、雅科夫列夫(工农检察院)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由加里宁同志召集。”(同上,684号案卷,第7张)
- 239 1928年2月13日政治局在审议集体农庄问题时,成立了由莫洛托夫(主席)、库比亚克、瞿鲁巴、A. П. 斯米尔诺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拟定在发展集体农庄方面开展工作的实际措施”(同上,673号案卷,第6张)。
- 240 库比亚克是根据政治局1928年2月9日的决定被任命为俄罗斯农业人民委员的(同上,672号案卷,第9张)。
- 241 1928年8月30日政治局根据莫洛托夫的提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有卡冈诺维奇、库比亚克、乌格拉诺夫等,以便为党拟定“为正确实施农业税”的一系列指令(同上,第702号案卷,第2张)。9月6日政治局基本通过了委员会拟定的为征收农业税给地方



- 各级党组织的指令草案。责成卡冈诺维奇以政治局交换意见为基础,对指令草案进行修改,并在三天内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命令颁布(同上,703号案卷,第1、2张)。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中的缺点的决议是1928年9月11日做出的,注明“不得公布”(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390—392页)。
- 242 政治局1928年9月13日通过的决议《关于捐献问题》认为有必要让加里宁在一周内发表讲话,说明和农业税以及捐献有关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4号案卷,第2张)。9月18日加里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讲了话,9月23日他的讲话用《我们的农村政策和农业税》为标题发表在《真理报》上。
- 243 见注230。
- 24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74页。
- 24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78页。
- 246 同上,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93页。
- 247 1924年8月,反对托洛茨基的一大群中央委员聚在一起开会,宣布自己是领导集体,并选出了执行机构“七人小组”,其成员包括全体政治局委员(除托洛茨基外)——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七人小组”在政治局开会之前定期举行会议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而有托洛茨基参加的政治局本身的会议只是形式上批准业已达成的决议。
- 248 见注46。
- 249 可能指的是索柯里尼柯夫1929年1月28日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见补充材料3)。
- 250 指同意布哈林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一群年轻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阿斯特罗夫。
- 251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5月5—16日在莫斯科召开。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青团当前的任务》刊登在5月13日的《真理报》上。
- 252 此处指的是1929年2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莫斯科五金工人扩大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列宁应代表们的要求讲了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14—317页)
- 253 列宁在1921年3月27日召开的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的确有这句话:“刚才我从你们会场上走过时,看见这样一条标语:‘工农王国万世长存’。不错,这条标语不是挂在通常的地方,而是放在会场角上——也许,是谁看出这条标语有毛病,把它移到一边去了。我读了这条奇怪的标语,便想到,在我们这里连对这种最起码最基本的东西也存在着误解和不正确的认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21页)
- 254 见注141,以及本书第2卷。
- 255 见注17。
- 256 1928年9月20日政治局审理了《共青团真理报》的问题,决定给编辑部以警告处分,“因为该报在刊登布哈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时犯了严重错误,遗漏了布哈林

同志讲话中最重要的政治部分”。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和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受委托在一周内充实该报编辑部,以保证“切实实行集体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5号案卷,第1张)。

- 257 联共(布)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于1929年1月12—18日召开。加里宁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会上做了报告,集中谈了下述问题:同波兰的关系、粮食困难、同党内各种倾向的斗争。加里宁的讲话没有发表,《真理报》只刊登了它的概述。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拥护联共(布)中央同右倾斗争的政治路线和实际行动(《真理报》,1929年1月13—19日)。
- 258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 259 指的是1930年建成投产的刻赤冶金工厂和罗斯托夫农机厂。
- 260 见注167。
- 261 指1928年秋天被揭发的、台尔曼的一名亲信、德国共产党汉堡地区委员会书记维托夫盗用党的经费一事。在9月26日德共中央全会上,台尔曼被解除了德共主席的职务,认为他向党隐瞒了他知道的维托夫贪污的信息。
- 1928年10月4日政治局听取了“德共问题”的汇报,通过了皮亚特尼茨基提出的决议草案,“责成莫洛托夫同志、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和库西宁同志三人小组根据交换的意见对决议做最后修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7号案卷,第3张)。
- 262 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于1928年。见注129。
- 263 见注2。
- 264 指政治局1929年3月20日的决议《关于加强粮食采购工作的措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1号案卷,第4、5张)。这项决议的倡议人是卡冈诺维奇,他于1929年3月14日给斯大林发来一份密码电报,介绍了乌拉尔州粮食采购情况,建议加强同富农和投机分子的斗争。卡冈诺维奇密码电报的文字经斯大林稍加修改就作为政治局的决议通过了(同上,163号目录,774号案卷,第34张)。案卷里有技术秘书关于这个问题表决情况的一张条子:投赞成票的是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斯大林、米高扬;托姆斯基弃权;李可夫在阅读了卡冈诺维奇的电报之后要求把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在布哈林的姓名后面没有任何标记(同上,第35张)。
- 265 “因反苏维埃活动”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的决议是政治局于1929年1月7日通过的(同上,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26张)。
- 266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辞职声明文本没有保留下来,它被奥尔忠尼启则撕毁了(见奥尔忠尼启则在本次全会上的发言)。
- 267 见注71。

- 268 指1917年10—11月的事情。当时党中央在考虑吸收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的可能性问题,李可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反对党中央的决定,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李可夫放弃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
- 269 见注9和214。
- 270 见注28。
- 271 见注209。
- 272 在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本行业工资的谈判无结果而终止后,企业主于1928年11月1日宣布同盟歇业而解雇了鲁尔区的二十多万冶金工人。斗争一直持续到12月初,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德国共产党内出现党内冲突时,将其归咎于“右派和调和分子的投降主义”。
- 273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召开。实行“工人统一战线”政策的决议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稍后,于1921年12月份通过的。
- 274 《反潮流》(Gegen den Strom)是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机关报,1928年底开始在柏林出版。
- 275 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由3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5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组成。率领代表团的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M. П. 托姆斯基。
- 276 指1928年12月13—14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会上“调和主义分子”反对立刻将布兰德勒的拥护者开除出党。
- 277 指1924—1925年期间,当时领导德国共产党的是菲舍尔—马斯洛夫极左派集团,实行了把曾经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工作人员从党的领导机构中清洗出去的办法。
- 278 法庭宣判向和平游行的群众开枪的法西斯分子无罪后,维也纳工人于1927年7月15日占领了城市中心,烧毁了司法大厦。警察在驱散自发的游行时,有几十人被击毙。
- 279 为声援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英国于1926年5月3—12日举行了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工业和交通各主要部门的约400万工人。按照工联总理事会的号召停了工。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从1926年5月1日起持续到11月底,抗议煤矿主的同盟歇业。
- 280 1928年11月28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同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作斗争问题。
- 281 法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30日—4月7日在巴黎郊区圣但尼举行。
- 2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于1928年2月9—25日举行,它的决议肯定了共产国际转向“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这就意味着首先在法国和英国放弃和社会主义政党结成选举同盟和在议会中的合作。
- 2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统一,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批评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右倾错误”,发表在1928年9月21日的《共产国际》杂志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929年4月16日的决议发表在1929年4月18日的《真理报》上。

- 284 1929年2月底—3月初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全会,支持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开除德国共产党内“右派”的路线。陶里亚蒂3月2日在全会上做了国际问题的报告。
- 285 共产国际中同“联合反对派”划清界限的高潮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会上专门分析了“联共(布)党内问题”。布哈林12月9日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反对派分子关于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条件下,俄国党和共产国际“必然腐化”的提纲。
- 286 由于政府禁止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国际工人运动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计划在1928年7月6日“红色日”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举行非法的群众游行。
- 287 对奥地利的圣日尔曼和约是协约国诸强国于1919年9月10日签订的。
- 288 洛米纳泽和沙茨金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前夕,布哈林关于中国问题观点的主要反对者。详情参见本书第2卷的前言。
- 289 显然指的是发表在《青年近卫军》3月号上的、洛米纳泽的文章《列宁的战略和策略的若干问题》。
- 29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于1925年4月4日批准了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禁止布兰德勒及其同伙“以任何形式干预德国共产党的工作”的决议。
- 291 见注215。
- 292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期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积极参与下,于1926年底和台尔曼达成协议之后,被认为是“温和派”领导人的恩斯特·迈耶尔被吸收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会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中特别着重指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当同一度右倾,但坚决摆脱了早先的错误并无条件支持党的领导的那些同志合作。”
- 在迈耶尔周围聚集了一群温和派的工作人员,日后就成了党的机构中“调和派”(A.埃韦特、迪特利希、B.埃贝莱茵)的基础。
- 293 国际主义者是在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代表大会(1921年1月)召开前夕形成的左翼领导人集团,其目标是使党加入共产国际。
- 294 政治局每星期一开会,确定星期四的会议议程,并事先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参加这些会议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三名代表。
- 295 见注53。
- 296 1929年3月4日政治局在讨论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要求实行粮食公债的电报时,通过了下述决议:“中央断然否决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的建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29号案卷,第6张)。西伯利亚边疆区委领导致政治局的电报全文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557页。
- 297 斯大林第一次请求解除他俄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是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

- 会之后,于1924年6月2日举行的全会上。1927年12月1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声明:“我请求中央解除我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已经有三年了。全会每次都拒绝了我的请求。我认为,迄今为止,各种条件使党必须把我保留在这个岗位上,因为我或多或少是一个严厉的人,对于来自反对派的危险是某种解毒剂。我认为,虽然有列宁同志著名的信件,但是有必要把我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可是现在这些条件不存在了。不存在是因为现在反对派被粉碎了[……]。因此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些被认为足以拒绝我的请求的根据[……]这些特殊的条件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应当[……]遵照列宁同志的指示[……]同志们,请你们相信,这只会对党有利”(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37号案卷,第3张)。全会的决议否决了斯大林的声明,他又一次当选(有一票弃权)为总书记(同上,第4张)。
- 298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中,斯克雷普尼克的插话在先,然后才是卡冈诺维奇的插话(同上,407号案卷,第63张)。
- 299 1929年3月5日,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州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的报告发表在1929年3月10日的《真理报》上。
- 300 在表决单上政治局的技术秘书做了下述记载:“李可夫:1)请将电报发给我。2)我不能早于3—4个小时回复。3)3点钟来过:请放在公文夹(П/6)内”(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74号案卷,第35张)。见注264。
- 30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107条:“用大量收购商品、藏匿或不向市场出售商品等手段恶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一年以下监禁,并处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免于没收财产。若商人互相勾结共同犯有同样罪行,处三年以下监禁,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莫斯科,1929年,第64—65页)
- 302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61条:“拒绝履行义务或完成全国性工程的,第一次由相应政权机关按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分;第二次处以六个月以下劳役或与该义务及工程等额之罚款。数人按照事先商定共同犯有上述罪行的,处一年以下监禁或劳役,或处以该义务及工程数额两倍之罚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莫斯科,1929年,第47页)
- 30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63页。
- 304 括号里的一句话是根据下面这份文件添加的:“1929年5月14日。绝密。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托夫斯图哈同志,根据李可夫同志的嘱咐,请在送交给你的、他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上做下述修改。第73页上,在‘这样的集体农庄作为在集体经济中生产的产品的占有者……’一句中,在‘从产品让渡的形式上说,’后面加上‘(即存在市场联系或消除了这种联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秘书阿尔乔缅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07号案卷,第111张)。
- 305 在检查插话时,布哈林勾去了自己和乌加洛夫的姓氏,并注明:“我勾掉了,因为不仅是我和乌加洛夫,还有好几个人也鼓了掌。尼·布”(同上,415号案卷,第217张)。

- 306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中,接着有下面一句话:“施利希特尔:插话听不清楚。”施利希特尔在修改记录稿时加进了自己的插话:“对你来说,理论家的姿态是最不配的了。”1929年5月22日,李可夫,可能是在审读了记录的条样之后,给托夫斯图哈写了一张便笺:“我不坚持要把施利希特尔在会上不曾说过,后来在修改记录时添加的插话从速记记录中勾掉,但是我坚决要求给它加一条脚注:‘施利希特尔的这句插话在会上不曾说过,是他事后在修改其他插话时添加进去的。А. И. 李可夫’”(同上,416号案卷,第235张)。
- 307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8页。
- 308 1929年2月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在1928—1929年度运动中加强粮食采购的措施》。其中规定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伏尔加中游和下游、乌拉尔、巴什基尔等地区将价值25卢布(而不是以前的12卢布)的农业机械转为信贷销售,将现金销售的农业机械的比重从原先占机械供应计划总额的10%提高到20%。用现金购买时,零售价的折扣达到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Р-5446号全宗,1号目录,446号案卷,第291—291(反面)张)。
- 309 《83人声明》(也称《83人政纲》)是反对派分子于1927年6月初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的。声明的签署者将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1927年5月27日)、中国革命的失败归咎于联共(布)中央;再一次否定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内建成的理论;把政治局的多数在生产合理化、工资和处理失业等问题上的政策说成是反对工人的政策;声称国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削弱,而国家正在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等等。声明的文本可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苏联国内的共产党反对派 1923—1927年》,费尔什京斯基编纂,莫斯科,1990年,第3卷,第60—70页。
- 310 李可夫指的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克鲁普斯卡娅和索柯里尼柯夫被称为《秘密报告》的一封信(也称《四人政纲》),信中批评了布哈林及其追随者(斯列普科夫、斯捷茨基、博古舍夫斯基)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后在对待中农、国家资本主义、农村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立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4号全宗,1号目录,139号案卷,第83—88张)。
- 311 李可夫引了一段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加里宁、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李可夫、鲁祖塔克、斯大林、托姆斯基(“九人”)对“四人声明”的答复,其中声明的作者们被指责为宗派主义活动(“九人的”答复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84号目录,868号案卷,第1—31张)。
- 312 《四人政纲》的作者在为《我们对九人的答复》的文件中表示自己不同意(同上,54号全宗,1号目录,139号案卷,第36—38张)。
- 313 李可夫引用的是1925年10月6日的一份名为《对答复的回答》的文件,由相同的那些人签名(九人),除捷尔任斯基之外(同上,17号全宗,84号目录,868号案卷,第32—40张)。

- 314 哈塔耶维奇的文章《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1929年4月1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
- 315 见注51。
- 316 这句插话在检查时被米高扬勾去(同上,17号全宗,2号目录,415号案卷,第50张)。
- 317 这句插话在检查时被米高扬勾去(同上,415号案卷,第51张)。
- 318 这句插话在检查时被米高扬勾去(同上,415号案卷,第55张)。
- 319 工人H. 萨柯和B. 范齐蒂于1920年被捕,1927年8月23日被电椅处死。对他们的审判在美国和苏联引发了抗议活动。
- 320 这句插话在检查时被奥尔忠尼启则勾去(同上,415号案卷,第326张)。
- 321 见注11。
- 322 见注117。
- 323 《岁月》是由A. Ф. 克伦斯基主编的一张日报,后改为周刊。1922—1933年间起初在柏林,后在巴黎出版。
- 324 这句插话在检查时被米高扬勾去(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15号案卷,第58张)。
- 325 这句插话在检查时被乌格拉诺夫勾去(同上,第133张)。
- 326 这句插话在检查时被米高扬勾去(同上,415号案卷,第63张)。
- 327 莫洛托夫弄错了。这项决议是1929年3月4日通过的(见注296),可是列入记录是在3月7日。
- 328 古比雪夫指的是布哈林在莫斯科党委全会上就俄共(布)中央和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做的报告。这个报告于1925年出版了小册子,标题是:《目前形势和我们政策的基础》。
- 329 在检查时这句插话被乌格拉诺夫勾去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15号案卷,第135张)。
- 330 引文不确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54页。
- 33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55页。
- 33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76页。
- 333 见注78及242。
- 334 《农业报》是一张日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机关报。1929年3月1日起在莫斯科出版,1930年1月底改名为《社会主义农业报》。
- 335 1928年底,阿塞拜疆共产党巴伊洛沃-比比-艾巴特区委书记斯塔姆博尔疆(党内化名阿尔塔克)和区委组织部长沙图诺夫斯卡娅反对以米尔佐扬为首的巴库党委的领导人,指责他们反右倾不力,对自我批评估计不足。阿尔塔克和沙图诺夫斯卡娅拉拢巴库党组织的其他积极分子的企图失败后,被解除了职务。他们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申诉。在莫斯科,这场冲突被利用作为清洗阿塞拜疆领导人的借口。1929年7月1日,政

- 治局会议听取了“巴库事件”的汇报。决定“解除米尔佐扬阿塞拜疆中央书记的职务[……],更换阿塞拜疆政治保卫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高层[……],建议由吉卡洛担任第一书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7号案卷,第4张)。
- 336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于莫斯科召开。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7—133,393—406页。
- 337 阿考斯塔,乌里耶(约1585—1640)是荷兰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犹太族。因反对犹太教规和信仰灵魂不灭而受到迫害。后自杀身亡。
- 338 1928年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制造了一起顿巴斯沙赫特区原矿业主和旧专家反苏维埃暗害组织的案件。这起案件成了广泛开展的“和暗害活动作斗争”运动的借口。1928年4月6—11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专门审理了“沙赫特案件和克服经济建设缺点的实际任务”问题。详情参见本书第1卷。
- 339 1928年3月7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委员会致联共(布)各级党组织、党员—经济工作者、工业及工会负责干部、工农检察院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干部的号召书草案《关于煤炭工业南部地区中的经济反革命活动情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76号案卷,第11张)。这封信被斯大林用来起草《真理报》1928年3月10日的社论。详情参见本书第1卷。
- 340 联共(布)中央1928年七月全会认为国内培养干部的速度落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决定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决定送1000名党员入高级技术专业学校(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卷,第117页)。
- 341 1927年6月8日,即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沃伊科夫被害的次日,政治局讨论了由于白卫分子的活动应当采取的措施问题。其中包括决定“发表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公告,宣布对犯有反苏维埃政权罪行的20名著名白卫分子处以枪决”(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5号案卷,第35张)。6月10日,《真理报》发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公告,其中说,“由于按照情报机关的指示、利用其经费在国外活动的保皇白卫分子公开采取恐怖活动和暗害破坏活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决定发表6月9日对一些人士做出的枪决判决。
- 342 1928年11月29日,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下述《关于科斯特罗夫同志》的决议:“由于《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虽然基本上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近来在反对右倾斗争的路线方面犯了许多错误(对右倾做了不正确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界定),同时在反对‘左’倾斗争的路线方面也犯了许多错误(对‘左’倾的调和倾向),从而妨碍了对脱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各种倾向的正确斗争;由于联共(布)中央虽然一再警告,而这些错误依然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反复出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解除科斯特罗夫同志《共青团真理报》责任编辑的职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4号案卷,第7张)



- 343 《红色报》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和列宁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在1918—1936年间出版。1928—1929年间的主编是恰金,1929年10月9日,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常委会决定解除其职务,“因为发表了许多庸俗的、耸人听闻的文章”(同上,21号目录,2710号案卷,第157张)。
- 344 1929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通过决定:“2)建议列宁格勒州委查封政治上不合格的杂志《大炮》”(同上,113号目录,692号案卷,第4张)。
- 345 1928年10月19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1928年10月13日关于解除彼得罗夫斯基《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职务的决定(同上,670号案卷,第10张)。《列宁格勒真理报》是一张日报,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列宁格勒州和市苏维埃的机关报,1918年开始出版。
- 346 奥尔忠尼启则引用的政治局决议不准确。见注64。
- 347 诺伊曼和洛米纳泽一样,是共产国际中布哈林路线的最积极反对者之一。详情见本书第2、3卷的导言。
- 348 台尔曼在全德共产党代表会议(1928年11月3—4日)上的发言猛烈攻击了德共党内的“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内的斯大林派系的路线保持了一致。
- 349 指谴责联共(布)党内“右倾”的匿名活动,始于1928年夏季,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波及一些共产党。详情见本书第3卷的导言。
- 350 萨波日尼科夫根据联共(布)中央组织局1928年11月12日的决定被解除了《革命与文化》杂志编辑委员的职务。政治局于1928年12月10日批准了这个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6号案卷,第8张)。
- 351 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于1928年11月16—24日召开。15次会议中,李可夫缺席4次:17日上午、19日晚上、20日上午和23日晚上。托洛茨基缺席6次:19日晚上、20日上午、21日晚上、22日上午和晚上、23日晚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6号案卷)。
- 352 自从列宁脱离工作之后,政治局领导集团内就开始了摩擦和分歧。控制着党务机关的斯大林的权力加强了,这引起了其他领导人的不安。1923年7月,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一起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为了削弱斯大林的地位,他们共同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改组党的领导机关:撤销组织局,选举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为书记处书记。这项建议得到当时也在基斯洛沃茨克的一些中央委员的赞同。7月底奥尔忠尼启则去莫斯科,他承担探询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斯大林认为,对中央委员会实行这项改革的意图是在他总书记之上再设几名特别政委,或者是在准备撤换他。加米涅夫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做了让步,事情就以妥协而结束:保留了组织局,但增补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其成员(《苏共中央公报》,1991年,第4期,第196—207页)。

- 353 根据政治局 1928 年 8 月 7 日的决定,准许布哈林自 1928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休假,此外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结束后还有两周休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699 号案卷,第 5 张)。
- 354 引文不准确。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5 卷,第 36—37 页。
- 35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7 卷,第 273 页。
- 356 在检查时罗济特修改了这句插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11 号案卷,第 129 张;416 号案卷,第 182 张)。
- 357 在检查时米高扬勾掉了自己的插话(同上,415 号案卷,第 73 张)。督办是中东铁路董事会主席。
- 358 斯大林讲话的速记记录原稿见补充材料 15。
- 359 见注 268。
- 360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8 卷,第 404 页。
- 361 见本书第 3 卷(导言)。
- 362 见注 261。
- 363 见注 26。
- 364 1925 年 6 月 12 日,苏联政府和美国大企业家哈里曼签订了奇阿图尔锰矿的租让合同。合同于 1928 年 8 月被废除。
- 36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377 页。
- 366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6 卷,第 376 页。
- 367 讲坛社会主义 19 世纪下半叶出现在德国,后来传播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其代表人物是一些在大学讲课(由此而得名)的自由派教授,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中的革命工人运动,把它们和社会改革的道路对立起来。在俄罗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赞同讲坛社会主义的思想。
- 368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298 页。
- 369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2 页。
- 370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6 卷,第 376 页。
- 371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277 页。
- 372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198 页。
- 373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163 页。
- 374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339 页。
- 375 《青年国际》杂志是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915—1918 年在苏黎世出版。1919—1941 年作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出版(1925—1928 年的名称是《青年共产国际》)。
- 37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289—290 页。
- 377 以下的文字中有着重号的是在准备出版速记报告时由斯大林加脚注。

- 378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54—157页。
- 379 《社会民主党人文集》是列宁创办的一本布尔什维克杂志,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两期:1916年10月和12月。
- 380 见注79。
- 381 见注233。
- 382 见注80。
- 383 1927年11月在青年雅库特民族党领导下发生了雅库特暴动。其基本要求是脱离俄罗斯联邦,和苏联的关系以条约为基础,向雅库特提供租让权。暴动于1928年3月被镇压(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33号案卷,第22—29张)。
- 38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416—417页。
- 385 同上,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5页。
- 386 由于1927—1928经济年度的财政状况恶化,曾经大规模地在外国出售黄金,约有160吨,价值20500万卢布(见:尤罗夫斯基,《苏维埃政权的货币政策(1917—1927)》,莫斯科,1996年,第21页。戈兰德作序)。运往美国的黄金数字没有找到。
- 387 1929年初,苏联国家银行董事长舍印曼同《国民城市银行》就满足私人赔偿要求进行谈判。1929年3月7日,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政治局审议了“国家银行的记录”问题。决定设立美国事务委员会来审理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委员会成员是:米高扬、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鲁希莫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42张)。1929年3月21日,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给舍印曼发去电报:“科罗布科夫继续同你知道的银行进行谈判,虽然政府已经决定终止谈判。告诉他要对履行政府的决定负责。执行情况盼告。”(同上,第52张)1929年4月24日,政治局委托李可夫宣布不同意舍印曼在谈判时发表的声明,并向他指出,“《国民城市银行》因借款而提出的私人赔偿问题即便能够解决,至少也要以向我方提供新的借款为条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72张;格尼斯:《1920—1930年代初的叛逃分子》,载《历史问题》,2000年,第1期,第52—53页)。
- 388 经济委员会是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最高经济机关。它批准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的计划,监督这些计划的执行。经济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以及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才能加以更改或取消。经济委员会主席由相应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任。人民委员会从经济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供应人民委员部等)的领导干部中任命经济委员会委员。
- 389 见注144。
- 390 季诺维也夫著《时代的哲学》一书于1925年底出版。

- 391 1927年6月27日,参加了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反对派的、以萨普罗诺夫和斯米尔诺夫为首的一些联共(布)党员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声明,声明批评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政策。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些人全被开除出党。声明的文本见:《托洛茨基档案 苏联共产党内的反对派 1923—1927年》,第3卷,第139—210页。
- 392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4页。
- 39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6—177页。
- 39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7页。
- 39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44页。
- 39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38页。
- 397 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是培养党和苏维埃干部的第一所高级党校。1918年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倡议在莫斯科设立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鼓动员和巡视员短期训练班,稍后更名为苏维埃工作学校,然后更名为中央苏维埃和党务学校,1919年秋季更名为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1932年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改组为斯维尔德洛夫高级共产主义农业大学,1935年改为联共(布)中央宣传员高级学校。
- 398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1918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李可夫引用的是由列宁提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报告 1918年3月》,莫斯科,1962年,第178页)。
- 399 中央委员会情报部是根据1924年1月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设立的,目的是改善有关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和一般党内生活的情报。存在至1930年。
- 400 委员会的材料分送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和候补委员。
- 401 政治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29年3月14日来信的答复草案,连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来信,以及所附加米涅夫1928年11月29日信,于1929年3月26日按斯大林的嘱咐分送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供表决。政治局于1929年4月30日通过了决议:
- “1)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严加审讯。
  - 2)审讯索柯里尼柯夫。
  - 3)撤去加米涅娃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职务,而不加解释。
  - 4)速记记录不发给加米涅夫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梅德韦杰夫同志、梁赞诺夫同志。”
-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74张)
- 402 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声明,以及政治局的答复按斯大林的嘱咐于1929年4月1日分送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供参考。
- 403 施瓦尔贝的供词按斯大林的嘱咐于1930年7月1日分送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404 康斯坦丁诺夫的供词按斯大林的嘱咐于1930年7月17日分送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

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405 略去了涉及所谓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中心历史的第一部分。

406 1929年7月20日,政治局审理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文件”问题,通过了决议:“将文件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及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90号案卷,第12张)。季诺维也夫的信件连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发送单于1929年7月21日送出。

## 人物简介\*

阿尔曼德, И. Ф. (Арманд И. Ф., 1875—1920)——1904 年入党。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省委及省执委会委员, 莫斯科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 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

阿尔秋欣娜, А. В. (Артюхина А. В., 1889—1969)——1910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工农妇女工作部部长兼《女工》杂志编辑。

阿尔塔克(斯塔姆博尔疆), А. А. (Артак [Стамболджян], А. А., 1895—?)——1916 年入党。1926—1929 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巴伊洛沃-比比-艾巴特区委书记。1929 年 10 月起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举办的马列主义学习班。

阿法纳西耶夫, Н. А. (Афанасьев Н. А., 1890—1963)——1910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基本建设检查处处长。

阿库洛夫, И. А. (Акулов И. А., 1888—1937)——1907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 年起任全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 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书记及委员。

阿列克谢耶夫, П. А. (Алексеев П. А., 1893—1939)——1914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 年任工会列宁格勒州工会理事会主席。

阿米尔哈尼扬, Ш. М. (Амирханян Ш. М., 1894—1959)——1915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班。

阿莫索夫, А. М. (Амосов А. М., 1896—?)——1914 年入党。1929 年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阿斯特罗夫, В. Н. (Астров В. Н., 1898—1995)——1917 年入党。1926—

\* 1928—1929 年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参加者大部分死于恐怖年代。——编者注

- 1929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及《真理报》编委。1929—1931年任教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及下诺夫哥罗德高等学校。
- 埃赫, Р. И. (Эйхе Р. И., 1890—1940)——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7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埃利亚瓦, Ш. З. (Элиава Ш. З., 1883—1937)——1904年入党。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起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
- 埃韦特, 阿图尔 (Эверт Артур, 1890—1959)——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7—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欧及英美地区书记处书记。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负责人。
- 安采洛维奇, Н. М. (Анцелович Н. М., 1888—1952)——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农林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 安德烈耶夫, А. А. (Андреев А. А., 1895—1971)——1914年入党。1922—196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
- 安东诺夫, В. Г. (Антонов В. Г., 1893—?)——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塔什干车站铁路工厂铸工。1929年任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安东诺夫, П. Г. (Антонов П. Г., 1878—?)——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乌拉尔州纳杰日金斯克工厂工人。
- 安季波夫, Н. К. (Антипов Н. К., 1894—1938)——1912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1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
- 奥尔忠尼启则, Г. К.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Г. К., 1886—1937)——1903年入党。1921—1927年及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奥拉赫拉什维利, М. Д. (Орахелашвили М. Д., 1881—1937)——190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奥什温采夫, М. К. (Ошвинцев М. К., 1889—1941)——1917年入党。1927—

- 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任乌拉尔州执委会主席。
- 奥斯特洛夫斯基, С. Ю. (Островский С. Ю., 1895—?)**——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敖德萨市铁路工厂模型工。
- 奥西莫夫, Н. М. (Осьмов Н. М., 1891—1962)**——1907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2年任下诺夫哥罗德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奥新斯基(奥博连斯基), В. В. (Осинский [оболенский] В. В., 1887—1938)**——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1928—1929年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研究所所务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团成员。
- 巴达耶夫, А. Е. (Бадаев А. Е., 1883—1951)**——1904年入党。1925—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9年任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主席。
- 巴尔马舍娃, С. Ф. (Бармашева С. Ф., 1886—?)**——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阿尔乔莫夫制瓶厂成品检验员。
- 巴赫京娜, Е. Я. (Бахтина Е. Я., 1888—?)**——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1929年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厂女工。
- 巴拉诺夫, П. И. (Баранов П. И., 1872—1933)**——1912年入党。1927—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31年任工农红军空军司令。
- 巴利茨基, В. А. (Балицкий В. А., 1892—1937)**——1915年入党。1923—1931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克兰全权代表,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
- 白劳德(Браудер Эрл Рассел, 1891—1973)**——美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30年起年为美共领导人。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 鲍尔, Я. Я. (Бауэр Я. Я., 1885—1958)**——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贸易检查主管。
- 鲍曼, К. Я. (Бауман К. Я., 1892—1937)**——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任莫斯科委员会组织部长。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28年11月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二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



中央书记、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贝京, Я. Б. (Быкин Я. Б., 1888—1938) ——1912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

倍倍尔, 奥古斯特 (Бебель Август, 1840—1913) ——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领袖及创始人之一。

彼得罗夫, Ф. С. (Петров Ф. С., 1888—1934) ——1906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党组任书记。

彼得罗夫斯基, П. Г. (Петровский П. Г., 1899—1941) ——1916年入党。1926—192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宣传鼓动部部长<sup>①</sup>,《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编。

彼得罗夫斯基, Г. И. (Петровский Г. И., 1878—1958) ——1897年入党。1921—1939年联共(布)任中央委员。1926—193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19—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兼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

彼得斯, Я. Х. (Петерс Я. Х., 1886—1938) ——1904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32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别尔津, Ю. П. (Берзин Ю. П., 1891—?) ——1912年入党。1929年任联共(布)奥列霍沃-祖耶沃县委书记。

别连基, З. М. (Беленький З. М., 1888—1940) ——1905年入党。1927<sup>②</sup>—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1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小组领导人。

波波夫, Н. Н. (Попов Н. Н., 1891—1938) ——1919年入党。1922—1932年任《真理报》编委。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和出版部部长。

波波夫-杜博夫斯科伊(波波夫-杜博夫斯基), В. С. (Попов-Дубовской [Попов-Дубовский] В. С., 1874—1942) ——1903年入党。1929年任《真理报》编委。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5卷为副部长。——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1,2卷为1928年。——译者注

- 波德沃伊斯基, Н. И. (Подвойский Н. И., 1880—1948)——1901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文化教育督察处处长。
- 波格丹诺夫, И. А. (Богданов И. А., 1891—1966)——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哈萨克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波格丹诺夫, П. А. (Богданов П. А., 1882—1938)——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执委会主席。
- 波利特, 哈利 (Поллит Гарри, 1890—1960)——英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9—1956年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
- 波林, К. М. (Полин К. М., 1881—?)——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卡累利阿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波隆斯基, В. И. (Полунский В. И., 1893—1937)——1912年入党。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29年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 波斯特舍夫, П. П. (Постышев П. П., 1887—1939)——1904年入党。192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乌共哈尔科夫专区委员会书记及市委书记。
- 波泽恩, Б. П. (Позерн Б. П., 1882—1939)——1902年入党。1923—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任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校长。1929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兼部长。
- 伯恩斯坦, 爱德华 (Берштейн Эдуард,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修正主义理论家。
- 博尔舍夫斯基, Б. А. (Боршевский Б. А., 1886—?)——1906年入党。1929年任印刷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博良, Б. А. (Борьян Б. А., 1882—1938)——1903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小组领导人。
- 布勃诺夫, А. С. (Бубнов А. С., 1884—1938)——1903年入党。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星报》责任编辑。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 布哈林, Н. И. (Бухарин Н. И., 1888—1938)——1906年入党。1917—1934

-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18—1929年起任《真理报》责任编辑兼《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1929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部长。1919—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主席团成员。
- 布拉特, И. Л. (Булат И. Л., 1896—1939) ——1912年入党。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副部长,莫斯科州委组织部部长。
- 布兰德勒, 亨利希 (Брандлер Генрих, 1881—1967) ——1918年加入德共。德国工运及共运活动家。1923年任德共主席。1924—1928年为联共(布)党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农民国际工作人员。1928年建立德共(反对派)。1929年被联共(布)开除。
- 布林, А. С. (Булин А. С., 1894—1938) ——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
- 布留哈诺夫, Н. П. (Брюханов Н. П., 1878—1938) ——1902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
- 布伦坦诺, 路德维希·约瑟夫 (Брентано Людвиг Йозеф<sup>①</sup>, 1844—1931) ——经济学家,工人运动中的社会自由主义派代表人物。1872年成立社会政治同盟。
- 布谢, К. Ю. (Буссе К. Ю., 1891—1940) ——1908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在马克思主义学习班学习。
- 蔡特林, Е. В. (Цейтлин Е. В., 1898—1937) ——1918年入党。1926—1928年任《真理报》及《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成员,布哈林的秘书。
- 茨哈卡雅, М. Г. (Цхакая М. Г., 1865—1950) ——1898年入党。格鲁吉亚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1923—1930年任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一,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主席。
- 茨韦特科夫, Н. Г. (Цветков Н. Г., 1890—?) ——1911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组织部长。
- 达林, Д. Ю. (Далин Д. Ю., 1889—1962) ——孟什维克分子,积极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多次被逮捕。1921年被驱逐出境。
- 登格尔, 菲力普 (Денгель Филипп, 1888—1948) ——1919年入党。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之一。

① 原文如此,疑应为 Brentano, Lujo(布伦坦诺,路约)。——译者注

- 德沃莱茨基, Ш. М. (Дволайцкий Ш. М., 1893—1937) ——1917 年入党。1926—1930 年任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局局长。
-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М. И.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 И., 1865—1919) ——俄罗斯经济学家, 历史学家,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之一。1917 年末—1918 年初任乌克兰中央拉达财政部长。
- 多加多夫, А. И. (Догадов А. И., 1888—1937) ——1905 年入党。1924—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9 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书记。
- 多利泽, А. Г. (Долидзе А. Г., 1878—1938) ——1905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 年任格鲁吉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主席。
- 恩德勒, 奥古斯特 (Эндерлэ Август, 1887—1959) ——1905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 年起是德共党员, 《红旗》报编辑。1928 年因“右倾”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职工运动。
- 法布里齐乌斯, Я. Ф. (Фабрициус Я. Ф., 1877—1929) ——1903 年入党。1927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8 年 2 月起任红军指挥员。1929 年任外高加索红旗集团军司令员。
- 法捷耶夫, Н. А. (Фатеев Н. А., 1879—?) ——1912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为兹拉托乌斯特市米尼亚尔斯克工厂技师。
- 菲加特纳, Ю. П. (Фигатнер Ю. П., 1889—1937) ——1903 年入党。1925<sup>①</sup>—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sup>②</sup> 年任苏联商业企业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菲勒, С. И. (Филлер С. И., 1882—1954) ——1910 年入党。1924—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年任中监察委员会组织-巡视处书记。1924—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 菲舍尔, 鲁特 (Фишер Рут, 1895—1961) ——1923—1926 年任德共中央委员。1924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 年 6 月根据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提议被解除在共产国际的负责职务。1926 年 8 月被德共中央开除出党。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 1, 2 卷为 1924 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 1, 2 卷为 1928 年。——译者注

- 费金, В. Г. (Фейгин В. Г., 1901—1937)——1917年入党。1924—1928年在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习班学习。被镇压。
- 费克杰尔, А. Я. (Фектер А. Я., 1892—?)——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图拉省监察委员会主席。
- 芬科夫斯基, А. И. (Финьковский А. И., 1884—?)——1904年入党。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哈莫夫尼克区委书记。
- 弗拉基米尔斯基, М. Ф.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М. Ф., 1874—1951)——1895年入党。1927—1934<sup>①</sup>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1929年任全苏农业合作社理事會主席。
- 弗鲁姆金, М. И. (Фрумкин М. И., 1878—1938)——1898年入党。1926—1929年任苏联副外贸人民委员及副财政人民委员。1929—1930年任全苏鱼品工业联合公司托拉斯主席。
- 伏龙芝, М. В. (Фрунзе М. В., 1885—1925)——1904年入党。1924—1925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及苏联陆海军副人民委员。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及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
- 伏罗希洛夫, 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К. Е., 1881—1969)——1903年入党。1921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60年任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5—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
- 戈尔茨曼, А. З. (Гольцман А. З., 1894—1933)——1917年入党。1927—1933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在飞机失事中丧生。
- 戈尔恰耶夫, М. Д. (Горчаев М. Д., 1886—1960)——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克里米亚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戈尔什科夫, И. И. (Горшков И. И., 1885—1966)——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0年任全俄工艺合作社联合会文化局长。
- 戈戈别里泽, Л. Д. (Гогоберидзе Л. Д., 1896—1937)——1916年入党。1926—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和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均为1951年。——译者注

- 1930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 戈洛杰德, Н. М. (Голодец Н. М., 1894—1937) ——1918年入党。1927年起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被镇压。
- 戈洛谢金, Ф. И. (Голощекин Ф. И., 1876—1941) ——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3年任联共(布)哈萨克边疆区委书记。
- 戈拉西莫夫, А. Г. (Герасимов А. Г., 1883—1962) ——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农业督察处副主任。
- 格哈特(艾施勒·格哈特)(Герхарт [Эйслер Герхарт], 1897—1968) ——1918—1920年为奥地利(后为德国)共产党党员。1927—1928年任德共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6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
- 格里戈里耶娃, М. П. (Григорьева М. П., 1884—?) ——192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特维尔“女无产者”工厂纺织工。
- 格里亚金斯基, Ф. П. (Грядинский Ф. П., 1893—1938) ——1912年入党。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28年任内外贸易人民委员会驻列宁格勒州全权代表。1928—1929年任中央黑土区州执委会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 格里亚泽夫, А. М. (Грязев А. М., 1880—?) ——1911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车里亚宾斯克矿工。
- 格里亚泽夫, И. Я. (Грязев И. Я., 1882—?) ——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乌克兰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 格列恰内, В. М. (Гречаный В. М., 1876—?) ——1918年<sup>①</sup>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斯大林格勒“红十月”工厂捡选工。
- 格鲁泽里, В. П. (Грузель В. П., 1884—1937?) ——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巡视员。
- 格罗尔曼, М. Г. (Грольман М. Г., 1896—1938) ——1928—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副部长。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05年。——译者注

- 格罗曼, В. Г. (Громан В. Г., 1874—1932?) ——经济学家, 统计学家。1921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团成员, 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
- 格罗斯曼, В. Я. (Гроссман В. Я., 1895—1971) ——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财政检查局局长。
- 贡恰罗夫, Н. К. (Гончаров Н. К., 1886—1970) ——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行政财务管理局局长。
- 古比雪夫, В. В. (Куйбышев В. В., 1888—1935) ——1904年入党。1927—1935年任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古别尔曼, М. И. (Губельман М. И., 1885—1968) ——1902年入党。1929年任莫斯科市联共(布)莫斯科河南岸区委主席。
- 古拉拉斯基, А. (赫菲兹, А. Б.) (Гуральский, А. [Хейфеу, А. Б.], 1890—1960) ——1918年入党。1927年为马恩研究院研究员。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
- 古列维奇, А. И. (Гуревич А. И., 1896—1937?) ——191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 古谢夫, С. И. (德拉布金 Я. Д.) (Гусев С. И. [Драбкин Я. Д.], 1874—1933) ——1896年入党。1921—1922年1月任共和国政治部主任,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
- 哈里曼, 威廉·阿维雷尔 (Гарриман Уилья Аверелл, 1891—1986) ——美国政治活动家及国务活动家, 商人。20年代在高加索拥有租赁的锰矿企业。
- 哈斯曼, С. А. (Хасман С. А., 1886—?) ——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车臣州委书记, 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哈塔耶维奇, М. М. (Хатаевич М. М., 1893—1937) ——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7年任中央委员。1928—1930年任中伏尔加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洪别尔-德罗, 茹尔 (Эмбер-Дро Жюль, 1891—1971) ——1921年加入瑞士共产党。1921—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1—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

委会书记。

基尔基日, К. О. (Киркиж К. О., 1888—1932)——1910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书记。

基吉亚罗夫(Кидияров)——梁赞市工会主席。

基洛夫, С. М. (Киров С. М., 1886—1934)——1904年入党。1926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列宁格勒省委兼市委第一书记。

基西斯, Р. Я. (Кисис Р. Я., 1896—1981)——1913年入党。1927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

基谢廖夫, А. С. (Киселев А. С., 1879—1937)——1898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苏联中执委主席团成员。

吉别尔, Б. В. (Гибер Б. В., 1897—?)——1918年入党。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索科尔尼基区委书记。

吉特洛, 本杰明(Гитлоу Бецджамин, 1891—1965)——美共创始人及领导人之一。1929年因“右倾”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和洛夫斯顿一起建立美国共产党(反对派)。

季里克, К. Я. (Дирик К. Я., 1882—1957)——1904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弗拉基米尔省监察委员会主席。

季明, С. И. (Зимин С. И., 1875—1942)——俄罗斯戏剧家, 季明歌剧院的组织者。

季诺维也夫, Г. Е. (Зиновьев Г. Е., 1883—1936)——1901年入党。1912—1927年联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10月、1921—1926年任政治局委员。1919—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1928—1930年任喀山大学校长。

加里宁, М. И. (Калинин М. И., 1875—1946)——1898年入党。1926—1946年任政治局委员。1919—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同时于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利耶娃, М. И. (Гальева М. И., 1884—?)——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为莫斯科州奥列霍沃-祖耶沃第一工厂纺织女工。

加列耶夫, Г. Г. (Галеев Г. Г., 1894—1938)——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鞑靼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加卢什金, И. И. (Галушкин И. И., 1890—?) ——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莫斯科汽车工厂工人。
- 加马尔尼克, Я. Б. (Гамарник Я. Б., 1894—1937) ——1916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2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
- 加米涅夫, Л. Б. (Каменев Л. Б., 1883—1936) ——1901年入党。1919—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29—1932年任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 加米涅娃, О. Д. (Каменева О. Д., 1883—1941) ——1902年入党。Л. Б. 加米涅夫的妻子。
- 捷列霍夫, Р. Я. (Терехов Р. Я., 1889—?) ——1912年入党。1927<sup>①</sup>—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阿尔乔莫夫斯克区委书记。
- 杰索夫, Г. А. (Десов, Г. А., 1884—1937?) ——1902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金丁, Я. И. (Гиндин Я. И., 1892—1938) ——1917年入党。1929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 久热夫, А. П. (Дюжев А. П., 1886—1956) ——1917年入党。191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克里沃罗格矿山工人。
- 卡巴科夫, И. Д. (Кабакон И. Д., 1891—1937) ——1914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
- 卡尔波夫, В. З. (Карпов В. З., 1895—?) ——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在马克思主义学习班学习。
- 卡尔马诺维奇, М. И. (Калманович М. И., 1888—1937) ——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会部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理事会主席。
- 卡尔宁, А. Я. (Калнин А. Я., 1889—?) ——1913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白俄罗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 卡尔塔舍夫(Карташев) ——图拉市工会主席。
- 卡夫塔拉泽, С. И. (Кавтарадзе С. И., 1885—1971) ——1903年入党。1924—192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副检察长。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2卷为1924年。——译者注

出党,1940年恢复党籍。

卡冈诺维奇, 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Л. М., 1893—1991)——1911年入党。1924—195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5年4月—1928年7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

卡冈诺维奇, М. М. (Каганович М. М., 1888—1941)——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卡拉什尼科夫, В. С. (Калашников В. С., 1890—1970)——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

卡拉什尼科夫, М. И. (Калашнико́в М. И., 1894—?)——1918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在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

卡拉瓦耶夫, П. Н. (Караваев П. Н., 1894—1952)——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9<sup>①</sup>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部巡视员。

卡拉耶夫, А. Г. (Караев А. Г., 1896—1938?)——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卡雷金娜, А. С. (Калыгина А. С., 1895—1937)——1915年入党。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任斯摩棱斯克市执委会主席。

卡雷-库利耶夫, (Кары-Кулиев, 1888—?)——1918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突厥斯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共产党(布)监察委员会主席。

卡里莫夫, А. К. (Каримов А. К., 1896—1941?)——1920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乌兹别克监察委员会主席,中亚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卡明斯基, Г. Н. (Каминский Г. Н., 1895—1938)——1913年入党。1925—1938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

康德拉季耶夫, Д. И. (Кондратьев Д. И., 1890—)——1918年入党。1927—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8年。——译者注

- 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赤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康德拉季耶夫, Т. К. (Кондратьев Т. К., 1892—?)——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检察长。
- 考茨基, 卡尔(Каутский Карл,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及理论家之一。
- 柯伦泰, А. М. (Коллонтай А. М., 1872—1952)——1915年入党。1927年起任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
- 柯秀尔, И. В. (Косиор И. В., 1893—1937)——1908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年<sup>①</sup>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柯秀尔, С. В. (Косиор С. В., 1889—1939)——1907年入党。192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
- 科贝林, В. Н. (Кобылин В. Н., 1893—?)——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为图拉兵工厂钳工。
- 科达茨基, И. Ф. (Кодацкий И. Ф., 1893—1937)——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及主席。
- 科恩, Ф. Я. (Кон Ф. Я., 1864—1941)——1906年入党。1929年任《工人报》责任编辑。
- 科尔布, 威廉(Кольб Вильгельм, 1870—191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之友》编辑。
- 科科维欣, М. Н. (Коквихин М. Н., 1883—1965)——1903年入党。1924—1934<sup>②</sup>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黑土区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科罗斯捷列夫, А. А. (Коростелев А. А., 1887—1938)——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29年任教育工作者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科罗斯捷列夫, Г. А. (Коростелев Г. А., 1885—1932)——1905年入党。1924—1932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任莫斯科省监察委员会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2,3,5卷为1927年起任此职。——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3—1930年。——译者注

主席。

科罗特科夫, И. И. (Коротков И. И., 1885—1949)——1905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科洛博夫, Н. Д. (Колобов Н. Д., 1899—?)——1919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 年为“工会国际”工厂钳工。

科洛季洛夫, Н. Н. (Кологилев Н. Н., 1885—1937)——1903 年入党。1924—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 年任联共(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委书记。

科马罗夫, Н. П. (Комаров Н. П., 1886—1937)——1909 年入党。1921、1923—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 年任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科米萨罗夫, С. И. (Комиссаров С. И., 1890—1965)——1914 年入党。1923—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年起任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科诺年科, В. П. (Конonenko В. П., 1885—?)——1917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为卢甘斯克“十月革命”工厂工人。

科潘, А. Л. (Копань А. Л., 1887—?)——1917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斯拉夫戈罗德区委委员。

科皮耶夫, А. К. (Копьев А. К., 1890—?)——1917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联合申诉局副局长。

科热夫尼科夫, И. Ф. (Кожевников И. Ф., 1889—?)——1912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年起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专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科萨列夫, А. В. (Косарев А. В., 1903—1939)——1919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 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 年 3 月起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科斯特罗夫, Т. С. (Костров Т. С., 1901—?)——1919 年入党。1928 年 5—11 月任《共青团真理报》责任编辑,后任塔斯社柏林分社主任。

科托夫, В. А. (Котов В. А., 1885—1942<sup>①</sup>)——1915 年入党。1925—1930 年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 1、2、3、5 卷生卒年为 1885—1937 年。——译者注

- 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29年起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社会保障中央局局长。
- 科瓦廖夫, Л. И. (Ковалев Л. И., 1901—1937)——1918年入党。1929年任《真理报》党务版主任。
- 科瓦廖夫, М. И. (Ковалев М. И., 1887—1965)——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 科泽列夫, Б. Г. (Козелев Б. Г., 1891—?)——1910年入党。1929年任金属工人工会中央责任书记。
- 科兹洛夫, С. К. (Козлов С. К., 1886—?)——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斯大林诺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Г.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 М., 1872—1959)——1893年入党。1924—1939年任中央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委主席。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 克雷连柯, Н. В. (Крыленко Н. В., 1885—1938)——190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
- 克里茨曼, Л. Н. (Крицман Л. Н., 1890—1938)——1918年入党。1925—1929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后任副局长,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1928年起任农业学院院长,农业革命研究委员会副主席。
- 克里尼茨基, А. И. (Крипичский А. И., 1894—1937)——1915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sup>①</sup>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和出版部部长。
- 克里沃夫, Т. С. (Кривов Т. С., 1886—1966)——1905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3年任俄罗斯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克利缅科, И. Е. (Клименко И. Е., 1891—1937)——1912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各中心机器拖拉机站联合管理部主席。
- 克柳耶夫, П. Н. (Клюев П. Н., 1891—?)——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达吉斯坦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克鲁敏, Г. И. (Крумин Г. И., 1894—1943)——1909年入党。1919—1928年任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2,3卷为1926—1928年任此职。——译者注

《经济生活》报编辑。1928年起任《真理报》编委。

克鲁普斯卡娅, Н. К. (Крупская Н. К., 1869—1939)——1898年入党。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0年起领导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1929年起任俄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

克尼加, М. А. (Книга М. А., 1890—?)——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为北高加索边疆区基莫舍夫斯克区农民。

克诺林, В. Г. (Кнорин В. Г., 1890—1938)——1910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8—1935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

克维林, Э. И. (Квириг Э. И., 1888—1937)——1912年入党。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

库比亚克, Н. А. (Кубяк Н. А., 1881—1937)——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1年任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库尔佩巴耶夫(Курпебаев, 1899—?)——1920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班。

库克林, А. С. (Куклин А. С., 1876—?)——1903年入党。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被镇压。

库利科夫, Е. Ф. (Куликов Е. Ф., 1891—1937?)——1910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委第一书记。1929—1930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理事。

库兹米娜, А. П. (Кузьмина А. П., 1888—?)——1917年入党。1927—1930任中央监察委员。“第三国际”工厂纺织女工。

拉狄克, К. Б. (Радек К. Б., 1885—1939)——1903年入党。1924—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8—1929年被流放。

拉杜斯-曾科维奇, В. А. (Радус-Зенькович В. А., 1877—1967)——1898年入党。1926—1930年<sup>①</sup>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陆海军督察局副局长。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3—1930年,第2卷为1925—1929年,第3、5卷同本卷为1926—1930年。——译者注

- 拉多申, Г. И. (Ладошин Г. И., 1892—1973) ——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为十月铁路电器装配工。
- 拉里切夫, А. И. (Ларичев А. И., 1892—?) ——1911年入党。1927—1934年<sup>①</sup>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3月任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1929年4—9月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组织部长。
- 拉林, В. Ф. (Ларин В. Ф., 1895—1937) ——1914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拉林, Ю. (卢里叶, М. З.) (Ларин Ю. [Лурье М. З.], 1882—1932) ——经济学家, 新闻记者。1917年入党。1928年任莫斯科反酗酒协会主席, 后兼任反酗酒协会全苏理事会主席。
- 拉斯托普钦, Н. П. (Растопчин Н. П., 1884—1969) ——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兹别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拉维奇(奥丽加), С. Н. (Равич [Ольга], С. Н., 1879—1957) ——1903年入党。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 受到迫害。
- 赖因瓦尔德, Г. О. (Рейцнвальд Г. О., 1886—?) ——1908年入党, 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红十月”工厂副厂长。
- 雷夫金, О. Л. (Рывкин О. Л., 1898—?)<sup>②</sup> ——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在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组织指导局工作。
- 雷切夫, И. А. (Лычев И. А., 1882—?) ——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计划外督察处处长。
- 李卜克内西, 卡尔 (Либкнехт Карл, 1871—1919) ——德国和国际工运活动家, 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 李可夫, А. И. (Рыков А. И., 1881—1938) ——1899年<sup>③</sup>入党。1922—1930年任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及俄罗斯联邦(1929年前)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1930年兼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4—1927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2卷生卒年为1899—1937年。——译者注

③ 原文如此。本书第1、2卷为1898年。——译者注

- 里亚比宁, Е. И. (Рябинин Е. И., 1892—?)<sup>①</sup>——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1929年任中央黑土区州委农村工作部长。
- 里亚博夫, А. Н. (Рябов А. Н., 1888—1939)——190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8年12月—1929年任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委书记。
- 利林娜, З. И. (Лилина З. И., 1882—1929)——1902年入党。季诺维也夫的妻子。
- 利西岑, Н. В. (Лисицын Н. В., 1891—1939)——1910年入党。1923—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副主席。
- 利亚多夫, М. Н. (Лядов М. Н., 1872—1947)——189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委员。1923—1929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利亚克苏特金, Ф. Ф. (Лякуткин Ф. Ф., 1896—?)——1913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梁赞诺夫, Д. Б. (Рязанов Д. Б., 1870—1938)——1917年入党。1921年起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
- 列昂诺夫, Ф. Г. (Леонов Ф. Г., 1892—1938)——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 列别德, Д. З. (Лебедь Д. З., 1893—1937)——1909年入党。1926—1930年任中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7—1930年兼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列别杰夫, П. Н. (Лебедев П. Н., 1879—?)——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黑土区鲍利索格列布州公社管委会主席。
- 列坚斯, С. Ф. (Реденс С. Ф., 1892—1940)——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高加索全权代表, 外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
- 列帕, А. К. (Лепя А. К., 1896—1938)——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卒年为1941年。——译者注



- 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州委书记。
- 列普谢, И. И. (Лепсе И. И., 1889—1929)——1904年入党。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冶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
- 列维京, К. Ф. (Левитин К. Ф., 1895—1939)——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中伏尔加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 列扎瓦, А. М. (Лежава А. М., 1870—1937)——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 林格尼克, Ф. В. (Ленгник Ф. В., 1873—1936)——1893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8—1929任标准化委员会主席。
- 留京, М. Н. (Рютин М. Н., 1890—1937)——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8—1930年任《红星报》副主编。
- 柳比莫夫, И. Е. (Любимов И. Е., 1882—1937)——1902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主席。
- 柳布琴科, П. П. (Любченко П. П., 1897—1937)——1918年入党。1928年任基辅州执委会主席。192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 卢森堡, 罗莎 (Люксембург Роза, 1871—1919)——波兰、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 鲁缅采夫, И. П. (Румянцев, И. П. 1886—1937)——1905年入党。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委书记。1929年起任西部(斯摩棱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
- 鲁缅采夫, К. А. (Румянцев К. А., 1891—1932)——1916年入党。1925—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起任阿塞拜疆石油公司副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区委委员,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
- 鲁希莫维奇, М. Л. (Рухимович М. Л., 1889—1938)——1913年入党。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鲁祖塔克, Я. Э. (Рудзугак Я. Э., 1887—1938)——1905 年入党。1926—1932 年任政治局委员。1924—1930 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同时于 1926—1937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伦金, К. В. (Рындин К. В., 1893—1938)——1915 年入党。1924—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 年起任乌拉尔州委书记。1928—1929 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
- 罗济特, Д. П. (Розит Д. П., 1895—1937)——1917 年入党。1924—1927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农业部务委员及检查局局长。
- 罗曼诺夫, А. Р. (Романов А. Р., 1892—?)——1919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工人。
- 罗森霍尔茨, А. П. (Розенгольц А. П., 1889—1938)——1905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 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人民委员。
- 罗伊津曼, Б. А. (Ройзенман Б. А., 1878—1938)——1902 年入党。1924—1932<sup>①</sup>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2 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罗兹米罗维奇, Е. Ф. (Розмирович Е. Ф., 1886—1953)——1904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8—1930 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操纵技术研究所所长。
- 洛博夫, С. С. (Лобов С. С., 1888—1937)——1913 年入党。1924—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 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及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洛夫斯顿, 杰伊(李卜斯坦, 雅科夫)(Ловстон Джей [Либштейн, Яков], 1898—1974)——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7—1929 年任美共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9 年因右倾被开除出党。
- 洛卡茨科夫, Ф. И. (Локацков Ф. И., 1881—1937)——1904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 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黑色冶金管理总局局长及主席团成员。
- 洛米纳泽, В. В. (Ломинадзе В. В., 1897—1935)——1917 年入党。1925—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 1.5 卷为 1934 年。——译者注

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任联共(布)顿河区叶伊斯克区委书记。

洛莫夫, Г. И. (Ломов Г. И., 1888—1938)——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委会主席,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洛佐夫斯基, А. (德里佐, С. А.) (Лозовский А. [Дридзо С. А.], 1878—1952)——1901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

马丁诺维奇, К. Ф. (Мартинович К. Ф., 1894—?)——1918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海军检查处副处长。

马尔采夫, Н. В. (Мальцев Н. В., 1891—?)——1908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务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马尔吉基扬, С. Н. (Мартикян С. Н., 1875—?)——1904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亚美尼亚机电托拉斯经理。

马尔科夫(Марков)——乌拉尔州贸易部长。

马尔科夫, А. Т. (Марков А. Т., 1877—?)——189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马格尔, М. П. (Магер М. П., 1897—?)——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师政委(阿尔马维尔市)。

马哈拉泽, Ф. И. (Махарадзе Ф. И., 1868—1941)——1891年<sup>①</sup>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

马克耶夫, М. П. (Макеев М. П.)——1918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马列茨基, Д. П. (Марецкий Д. П., 1901—1937)——1919年入党。1928年以前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社工作。1929—1932年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计划委员会学术秘书和经济室主任。

马利诺夫斯基, Р. В. (Малиновский Р. В., 1876—1918)——莫斯科暗探局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898年。——译者注

暗探。

马什金, К. П. (Машкин К. П., 1885—?)——1915 年入党。1929 年任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兼组织部长。

马什凯维奇, В. С. (Машкевич В. С., 1896—?)——1918 年入党。1927 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哈莫夫尼克区委组织部长, 后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马斯洛夫, А. (Маслов А., 1891—1941)——1918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 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1927—1928 年参加列宁崩得(左派小组拥护者联盟)。

马约罗夫, М. М. (Майоров М. М., 1890—1938)——1906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 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乌克兰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马祖罗夫, С. С. (Мазуров С. С., 1892—?)——1917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沙赫特州监委员会主席。

迈耶尔, 恩斯特 (Мейер Эрнст, 1887—1937)——1918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7—1929 年任德共中央领导成员。

曼德尔施塔姆, Н. Н.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 Н., 1879—1929)——1902 年入党。1926—1928 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

曼努伊尔斯基, Д. 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 Д. З., 1883—1959)——1903 年入党。1923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 年 7 月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28—1943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曼扎拉, Д. И. (Манжара Д. И., 1885—?)——1917 年入党。1924—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亚全权代表, 乌兹别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梅德韦杰夫, А. В. (Медведев А. В., 1884—1937)——1904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29 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梅德韦杰夫, С. П. (Медведев С. П., 1885—1937)——1900 年入党。1928—1929 年任全俄有色金属辛迪加主席。

梅德韦杰夫, Т. И. (Медведев Т. И., 1885—?)——1919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 年任第一模范印刷厂车间技师。

梅尔尼昌斯基, Г. Н. (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 Г. Н., 1886—1937)——1902 年入党。

- 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美舍利亚科夫, Н. Л. (Мещеряков Н. Л., 1865—1942)——1901年入党。1929年任农民国际组织书记。
- 米尔佐扬, Л. И. (Мирзоян Л. И., 1897—1939)——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书记。
- 米高扬, А. И. (Микоян А. И., 1895—1978)——1915年入党。1926—1935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 米哈伊洛夫, В. М. (Михайлов В. М., 1894—1937)——1915年入党。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
- 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 М. С. (Михайлов-Иванов М. С., 1894—1931)——1913年入党。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列宁格勒机器制造托拉斯主席。
- 米利恰科夫, А. И. (Мильчаков А. И., 1903—1973)——1919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班。
- 米留可夫, П. Н. (Милуков П. Н., 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政论家。
- 米柳亭, В. П. (Милютинг В. П., 1884—1937)——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
- 米特罗法诺夫, А. Х. (Митрофанов А. Х., 1879<sup>①</sup>—1941)——1903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建研究小组领导人。
- 米亚斯尼科夫, Г. И. (Мясников Г. И., 1889—1946)——1906年入党。1922年因反党活动及违反党纪被开除出党。移居国外。
- 缅仁斯基, В. Р. (Менжинский В. Р., 1874—1934)——1902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 莫罗兹, Г. С. (Мороз Г. С., 1893—1940)——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1929年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2卷为1870年。——译者注

任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莫罗佐夫, Д. Г. (Морозов Д. Г., 1888—1963)——1905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委会主席。

莫洛托夫, В. М. (Молотов В. М., 1890—1986)——1906 年入党。1926—1957 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1—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29 年兼任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

莫斯克温, И. М. (Москвин И. М., 1890—1937)——1911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

莫伊谢耶娃, Н. Е. (Моисеева Н. Е., 1897—?)——1917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为博戈罗茨克-戈卢霍夫纺织厂工人。

姆拉奇科夫斯基, С. В. (Мрачковский С. В., 1888—1936)——1905 年入党。1927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纺织机械公司管委会主席。1927 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被镇压。

穆采涅克, Я. Я. (Муценек Я. Я., 1892—1941)——1909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年起任基辅专区监察委员会主席、专区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穆迪瓦尼, П. Г. (Мдивани П. Г., 1877—1937)——1903 年入党。1923 年 11 月任中央租让委员会委员。1928 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被镇压。

穆拉诺夫, М. К. (Муранов М. К., 1873—1959)——1904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

穆萨别科夫, Г. М. (Мусабеков Г. М., 1888—1938)——1918 年入党。1925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1931 年任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主席。

纳扎列强, А. М. (Назаретян А. М., 1889—1937)——1905 年入党。1924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 年任外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纳扎罗夫, С. И. (Назаров С. И., 1879—?)——1903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南森, 弗里乔夫 (Нансен Фритъоф, 1861—1930)——挪威北极研究者。

- 1920—1921年任国际联盟战俘问题高级专员,援助伏尔加河流域饥民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 尼古拉耶娃, К. И. (Николаева К. И., 1893—1944)——1909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宣传鼓动部长。
- 尼基京, И. М. (Никигин И. М., 1890—?)——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为巴库市国营阿塞拜疆石油工业联合公司修理场车工。
- 尼科诺罗夫, А. Ф. (Никоноров А. Ф., 1887—?)——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组织指导局局长。
- 涅菲奥多夫, М. Г. (Нефедов М. Г., 1897—?)——1917年入党。1929年任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书记。
- 诺伊曼,海因茨(Нейман Гейнц, 1902—1937)——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7—1929年任德共中央候补委员,后为中央委员。1924—1928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
- 诺索夫, И. П. (Носов И. П., 1888—1937)——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1年任联共(布)特维尔省委书记。
- 诺沃肖洛夫, С. А. (Новоселов С. А., 1882—1953)——1905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工业劳动检察院领导人。
- 帕夫卢诺夫斯基, И. П. (Павлуновский И. П., 1888—1940)——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海军检察院院长。
- 帕鲁申, В. И. (Парушин В. И., 1897—?)——1917年入党。1929年任阿塞拜疆监察委员会主席。
- 帕斯图霍夫, М. Д. (Пастухов М. Д., 1892—1964)——1908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潘涅库克,安东尼(Паннекук Антони, 1873—1960)——荷兰社会民主党人。1918—1921年为荷兰共产党员,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工作。
- 佩拉耶夫, Г. Н. (Пылаев Г. Н., 1894—1937)——1902年入党。1929年任联

共(布)列宁格勒市维堡区委书记。

**佩列卡托夫, И. Г. (Перекатов И. Г., 1894—?)**——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行动小组组长。

**佩尼科夫, М. А. (Пеньков М. А., 1887—1963)**——1907年入党。1928年任莫斯科罗戈日-西蒙诺夫区委书记。1928—1931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巡视员, 后任萨利斯克专区委员会列宁区委书记及北高加索边疆区沙赫特区委书记。

**佩珀, 约翰 (波加尼, 约瑟夫) (Пеппер Джон [Погани Йозеф], 1886—1938)**——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7年起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

**皮达可夫, Ю. Л. (Пятаков Ю. Л., 1890—1937)**——1910年入党。1927年任驻法国商务代表。1928年任国家银行副行长, 1929年起任行长。

**皮亚特尼茨基, О. А. (Пятницкий О. А., 1882—1938)**——1898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书记、主席团成员。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Е. А.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 А., 1886—1937)**——1903年入党。1924—1927年任苏联中央租让委员会副主席,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因“组织非法的党内印刷厂”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10月13日决议被开除出党, 后在苏联国家计委工作。

**普列沙科夫, М. Г. (Плешаков М. Г., 1886—1938)**——1904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年任阿塞拜疆监察委员会主席。

**齐夫里诺维奇, В. Е. (Цифринович В. Е., 1897—1938)**——1917年入党。1928—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分配部副部长, 莫斯科市鲍曼区委责任书记。1929年10月起任钾盐工业托拉斯经理。

**齐洪, А. М. (Цихон А. М., 1887—1939)**——1906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8年任莫斯科市鲍曼区委书记。1928—1930年及1933年起任建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齐科, Ф. А. (Цылько Ф. А., 1894—1937)**——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党组领导人。

**恰普林, Н. П. (Чаплин Н. П., 1902—1938)**——1919年入党。1924—1934年



- 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8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1929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班。
- 切尔维亚科夫, А. Г. (Червяков А. Г., 1892—1937)——1917年入党。1920年任白俄罗斯中央执委会主席。被镇压。
- 丘巴尔, В. Я. (Чубарь В. Я., 1891—1939)——1907年入党, 1926—1935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 丘茨卡耶夫, С. Е. (Чудкаев С. Е., 1876—1946)——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27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远东边疆区执委会主席。1929年任苏联中执委预算委员会主席。
- 丘多夫, М. С. (Чудов М. С., 1893—1937)——1913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8—193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
- 丘维林, М. Е. (Чувьрин М. Е., 1883—1947)——190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 1923年<sup>①</sup>起任联共(布)卢甘斯克区委书记。
- 日丹诺夫, А. А. (Жданов А. А., 1896—1948)——191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4年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
- 日丹诺夫, Г. М. (Жданов Г. М., 1876—1944)——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为彼尔姆州雷西瓦钢铁厂炼钢工人。
- 茹柯夫, И. П. (Жуков И. П., 1889—1937)——1909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莫斯科国营电工器材托拉斯主席。
- 萨波日尼科夫, П. Ф. (Сапожников П. Ф., 1897—1937)——1918年入党。1928年任《革命与文化》杂志编辑。
- 萨法罗夫, Г. И. (Сафаров Г. И., 1891—1942)——1908年入党。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区委书记。1926—1927年任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处秘书。
- 萨哈罗娃, П. Ф. (Сахарова П. Ф., 1890—1969)——1912年入党。1923—1934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7年。——译者注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sup>①</sup>—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萨科,尼科拉(Сакко Никола, 1891—1927)——美国工人,被法院判处死刑。

萨普罗诺夫,Г. В. (Сапронов Г. В., 1887—1939)——1912年入党。1925年起任中央租让委员会委员。1927年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开除出党。

萨韦利耶夫, М. А. (Савельев М. А., 1884—1939)——1903年入党。1928年任列宁研究院院长,《真理报》编委。

萨沃斯京, Д. И. (Савостин Д. И., 188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主任巡视员。

萨希亚诺娃, М. М. (Сахьянова М. М., 1896—1981)——191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

瑟尔佐夫, С. И. (Сырцов С. И., 1893—1937)——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

沙茨金, Л. А. (Шацкий Л. А., 1902—193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青年共产国际书记。1929年任联共(布)下伏尔加州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沙兰戈维奇, В. Ф. (Шарангович В. Ф., 1897—?)——1917年入党。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工会理事会主席。

沙罗夫, Я. В. (Шаров Я. В., 1884—1936)——1904年入党。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被镇压。

沙图诺夫斯卡娅, О. Г. (Шагуновская О. Г., 1901—1990)——1916年入党。1927—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巴伊洛沃-比比-艾巴特区委书记。1929年10月起在联共(布)中央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

绍特曼, А. В. (Шотман А. В., 1880—1939)——1899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舍博尔达耶夫, Ъ. П. (Шеболдаев Ъ. П., 1895—1937)——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任联共(布)下伏尔加边疆区委书记。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3年。——译者注

- 舍印曼, А. Л. (Шейнман А. Л., 1886—1944)——1903年入党。1926—1929年任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苏联国家银行行长。
- 施利希特尔, А. Г. (Шлихтер А. Г., 1868—1940)——1891年入党。1925—193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起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
- 施略普尼柯夫, А. Г. (Шляпников А. Г., 1885—1937)——1901年入党。1926—1929年任五金进口公司理事会主席。
- 施米特, В. В. (Шмидт В. В., 1886—1938)——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8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施特劳赫, Э. М. (Штраух Э. М., 1896—1937)——1912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沃罗涅日州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和州工农检察院副主席。
- 施瓦茨, И. И. (Шварц И. И., 1879—1951)——1899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0年任苏联煤炭工业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施韦泽, В. Л. (Швейцер В. Л., 1887—1950)——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 什基里奇, Н. Р. (Шкирич Н. Р., 1895—?)——1918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明斯克皮革厂工人。
- 什基里亚托夫, М. Ф. (Шкирятов М. Ф., 1883—1954)——1906年入党。1922—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兼组织指导处处长。
- 什洛克, Ф. И. (Шлок Ф. И., 1895—?)——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为戈梅利市工厂钳工。
- 什维尔尼克, Н. М. (Шверник Н. М., 1888—1970)——1905年入党。1925—197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乌拉尔州委书记。1929年任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 舒什科夫, П. С. (Шушков П. С., 1889—?)——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运输检查处处长。
- 斯捷波瓦内, И. М. (Степованный И. М., 1892—?)——1917年入党。

- 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乌克兰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巡视员。
- 斯捷茨基, А. И. (Стецкий А. И., 1896—1938)——1915年入党。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及列宁格勒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 斯捷潘诺夫, С. И. (Степанов С. И., 1876—1935)——1895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任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 斯克雷普尼克, Н. А. (Скрыпник Н. А., 1872—1933)——1897年入党。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2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 斯克良斯基, Э. М. (Склянский Э. М., 1892—1925)——1913年入党。1918—1924年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 斯列普科夫, А. Н. (Слепков А. Н., 1899—1937)——1919年入党。1926—1928年任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长,《真理报》编辑之一,《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
- 斯米多维奇, С. Н. (Смидович С. Н., 1872—1934)——1898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 斯米尔加, И. Т. (Смига И. Т., 1892—1938)——1907年入党。1926年任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院长。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被镇压。
- 斯米尔诺夫, А. П. (Смирнов А. П., 1878—1938)——1896年入党。1922—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兼农民国际总书记。192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联共(布)中央主席。
- 斯米尔诺夫, И. Н. (Смирнов И. Н., 1881—1936)——1899年入党。1923—192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因参加派别活动被联共(布)十五大开除出党。1928—1929年被流放。
- 斯莫罗金, И. Т. (Сморозин И. Т., 1885—1961)——1917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远东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斯塔兰尼科夫, В. П. (Стараников В. П., 1893—?)——1911年入党。1927—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弗拉迪沃斯托克州委书记。
- 斯塔罗斯京, П. И. (Старости П. И., 1885—?)——1917年入党。1925—1930

-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为莫斯科特列赫戈尔内纺织作坊杂工。
- 斯特列利佐夫, Г. М. (Стрельцов Г. М., 1901—?)——1918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9年为红色教授学院学员。
- 斯特鲁米林, С. Г. (Струмилин С. Г., 1877—1974)——1923年入党。经济学家, 统计学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
- 斯特罗加诺夫, В. А. (Строганов В. А., 1888—1941)——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斯大林诺区委书记。
- 斯腾, Я. Э. (Стэн Я. Э., 1899—1938)——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后宣传鼓动和出版部副部长。1928—1930年任马恩研究院副院长。
- 斯图季托夫, П. И. (Студитов П. И., 1888—1969)——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伏尔加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斯图鲁阿, И. Ф. (Стуруа И. Ф., 1870—1931)——1896年入党。1924—1931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外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 斯维杰尔斯基, А. И. (Свидерский А. И., 1878—1933)——1899年入党。1928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文化委员会主任。1929年起任苏联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
- 苏霍姆林, К. В. (Сухомлин К. В., 1886—1938)——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苏利莫夫, Д. Е. (Сулимов Д. Е., 1890—1937)——1905年入党。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年任乌拉尔州执委会主席, 乌拉尔州委书记。1927—1930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
- 索博列夫, С. М. (Соболев С. М., 1900—1939)——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班。
- 索尔茨, А. А. (Сольц А. А., 1872—1945)——1898年入党。1920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苏联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主席。
- 索柯里尼柯夫,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 Я., 1888—1939)——1905年入党。1922—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

席。1928—1929年任苏联石油辛迪加主席。1929—1932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

**塔尔盖默,奥古斯特(Тальгеймер Август, 1884—1948)**——20年代德共活动家。1918—1923年任德共中央委员。1924—1928年为联共(布)党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及马恩研究院工作。1928年12月14日被开除出德共。德共(反对派)的创建人之一。

**塔宁(塔尔哈诺夫), О. С. (Танин [Тарханов] О. С., 1901—1938)**——1921—1924年任俄罗斯共青团中央书记,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兼书记。1926—1927年是赴中国苏联政治顾问小组成员之一。1927年作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成员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

**台尔曼,恩斯特(Тельман Эрнст, 1886—1944)**——德国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5年起任德共主席。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副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特里利谢尔, М. А. (Трилисер М. А., 1883—1940)**——1901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事局局长、总局副局长。

**特鲁舍奇金, В. А. (Трушечкин В. А., 1881—?)**——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下伏尔加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

**托洛茨基, Л. Д. (Троцкий Л. Д., 1879—1940)**——1917年入党。1917—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1926年任政治局委员。1925—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苏联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1923年为俄共(布)—联共(布)左翼反对派领袖及思想家。1926年被逐出政治局,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放逐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

**托洛孔采夫, А. Ф. (Толоконцев А. Ф., 1889—1937)**——1914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工业总局局长。1929—1931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委员。

**托姆斯基, М. П. (Томский М. П., 1880—1936)**——1904年入党。1919—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0年任政治局委员。1922—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起任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苏

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瓦尔加, E. C. (Варга Е. С., 1879—1964) ——匈牙利及国际工运活动家。1906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9年为共产党员,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1920年为俄共(布)党员。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7—1947年任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瓦雷基斯, И. М. (Варейкис И. М., 1894—1938) ——1913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28—1934年任中央黑土区联共(布)州委第一书记。

瓦西里耶夫, В. В. (Васильев В. В., 1904—?) ——1925年入党。1929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州委书记。

瓦西里耶夫, С. В. (Васильев С. В., 1898—?) ——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瓦扬, 爱德华·玛丽·(Вайян Эдуард Мари, 1840—1915) ——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左翼领袖之一。

范齐蒂, 巴尔托洛迈 (Ванцетти Бартоломео, 1888—1927) ——美国工人,被法庭判处死刑。

维伯, 悉尼 (Вебб Сидней, 1859—1947) ——英国经济学家,共运史学家,工联主义思想家。1924年、1929—1931年参加工党政府。

维克斯宁, С. О. (Виксини С. О., 1887—1968) ——1912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下伏尔加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委员。

维诺格拉茨基, Н. И. (Виноградский Н. И., 1890—?) ——1919年入党。1929年任苏联计委交换及分配处副处长。

维什尼亚科娃, П. И. (Вишнякова П. И., 1887—1967) ——1903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5月起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教育督察处副处长。

维托夫, 约翰 (Витторф Иоган, 1894—?) ——191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20—1928年为德共党员。1927—1928年为德共中央委员,汉堡区政治书记。

温伯格, Г. Д. (Вейнберг Г. Д., 1891—1946) ——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食品工人工会主席。

温什里希特, И. С. (Уншлихт И. С., 1879—1938) ——1900年入党。1925—

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

温斯顿,威廉(Вейнстон Вильям, 1897—1985)——1921年任美共中央委员。

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4—5月间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美共内的“右倾”问题。

沃尔夫,М. М. (Вольф М. М., 1880—?)——1920年入党。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团成员。

沃热夫,А. А. (Вожжев А. А., 1879—?)——1920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格罗兹尼采油场助理机械师。

沃伊科夫,П. Л. (Войков П. Л., 1887—1927)——1903年入党。1924年任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

乌达罗夫,А. Н. (Ударов А. Н., 1893—?)——1919年入党。1927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工会理事会主席。

乌尔班斯,古戈(Урбанс Гуго, 1890—1946)——191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6年为德共党员。1925年7月任德共中央书记。1926年11月和菲舍尔、马斯洛夫一起被开除出党。1928—1933年出版《人民意志》报。

乌格拉诺夫,Н. А. (Угланов Н. А., 1886—1937)——1907年入党。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乌汉诺夫,К. В. (Уханов К. В., 1891—1939)——1907年入党。1923—1937年任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29年起任莫斯科州执委会主席。

乌加洛夫,Ф. Я. (Угаров Ф. Я., 1885—1932)——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工会联合会主席。

乌雷瓦耶夫,М. Е. (Урываев М. Е., 1887—?)——1917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任军事工业总局局长。

乌斯特里亚洛夫,Н. В. (Устрялов Н. В., 1890—?)——法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著名活动分子。1920—1934年任哈尔滨大学教授。

西罗托夫,Ф. Н. (Сиротов Ф. Н., 1874—1957)——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赤塔铁路工厂司机。

希法亭,鲁道夫(Гильфердинг Рудольф, 1877—1941)——德国和奥地利社会



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

希塔罗夫, Р. М. (Хитаров Р. М., 1901—1937)——1919年入党。1925—1930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总书记。1928年9月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及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肖穆什金, А. Д. (Семушкин А. Д., 1898—1938)——Г. К. 奥尔忠尼启则的秘书。被镇压。

谢多夫, Л. Л. (Седов Л. Л., 1906—1938)——Л. Д. 托洛茨基的长子。

谢尔古舍夫, М. С. (Сергушев, М. С., 1886—1930)——1904年入党。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谢尔加宁, М. М. (Серганин М. М., 1889—?)——1912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市联共(布)彼得格勒区委书记。

谢拉(塔斯卡·安杰洛)(Сerra [Таска Анджело], 1892—1960)——1921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28年9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1928年9月—12月任共产国际罗曼语系书记处处长。

谢列布罗夫斯基, А. П.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А. П., 1884—1938)——1903年入党。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年起任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金管理总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谢苗诺夫, Б. А. (Семенов Б. А., 1890—1940)——190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任联共(布)卢甘斯克区委书记。

雅科夫列夫, А. И. (Яковлев А. И., 1900—193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雅科夫列夫 Я. А. (Яковлев Я. А., 1896—1938)——1913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同时任《贫农报》(1924—1928)及《农民报》(1923—1929)编辑。1929—1934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雅罗斯拉夫斯基, Е. М.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 М., 1878—1943)——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亚戈达, Г. Г. (Ягода Г. Г., 1891—1938)——1907年入党。1924—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亚格洛姆, Я. К. (Яглом Я. К., 1897—?)——1918年入党。1925—1927年任

邮电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劳动报》编辑。

扬松, Н. М. (Янсон Н. М., 1882—1938)——1905 年入党。1923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8 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8—1929 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

叶夫多基莫夫, Г. Е. (Евдокимов Г. Е., 1884—1936)——1903 年入党。1927—1928 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理事, 乌里扬诺夫斯克省计委副主席。1929—1934 年任萨马拉州农业合作社联社主席。被镇压。

叶夫列伊诺夫, Н. Н. (Еврецов Н. Н., 1892—1941)——1912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 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 1929 年任书记。

叶戈罗夫, Я. Г. (Егоров Я. Г., 1892—1957)——1917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斯摩棱斯克省及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叶利扎罗夫, В. П. (Елизаров В. П., 1887—1939?)——1917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叶努基泽, А. С. (Енукидзе А. С., 1877—1937)——1898 年入党。1924—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35 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兼委员。

伊霍克, Д. А. (Ихок Д. А., 1882—1967)——1903 年入党。新闻记者。

伊克拉莫夫, А. И. (Икрамов А. И., 1898—1938)——1918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1937 年任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兼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

伊利英, Н. И. (Ильин Н. И., 1884—1957)——1910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7—1930 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伊列克·博古米尔(Илек Богумил, 1892—1963)——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2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1929 年作为“右倾”领袖被开除出党。

伊万诺夫, В. И. (Иванов В. И., 1893—1938)——1915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1 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尤尔金, А. А. (Юркин А. А., 1893—?)——1915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

-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经理。
- 尤尔岑, М. И. (Юрцен М. И., 1880—?) ——1903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 尤列维奇, Э. И. (Юревич Э. И., 1888—1958) ——1913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巴什基尔州委书记。
- 赞格维尔, З. Г. (Зангвиль З. Г., 1895—1981) ——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 泽连斯基, И. А. (Зеленский, И. А., 1890—1938) ——1906年入党。192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书记。
- 泽姆利亚奇卡, Р. С. (Землячка Р. С., 1876—1947) ——1896年入党。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1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巡视员、部务委员。
- 扎东斯基, В. П. (Затовский В. П., 1888—1938) ——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监委主席团成员。1927—193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监委主席兼乌克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扎格列别利内, М. Н. (Загребельный М. Н., 1883—?) ——1917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尼古拉耶夫市“安德烈·马尔蒂”工厂钳工。
- 扎鲁茨基, П. А. (Залуцкий П. А., 1887—1937) ——1907年入党。1920—1922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25年为中央委员。1921年任乌拉尔和彼得格勒党委书记,党西北局书记。所谓“新反对派”的一员,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开除出党。
- 扎维茨基, Г. М. (Завицкий Г. М., 1882—1959) ——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哈尔科夫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扎伊采夫, Г. А. (Зайцев Г. А., 1884—?) ——190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任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 扎伊采夫, Г. М. (Зайцев Г. М., 1886—?) ——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为下诺夫哥罗德“红色艾特纳”机械厂钳工。

扎伊采夫, Ф. И. (Зайцев Ф. И., 1894—1960)——191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哈尔科夫州委及市委书记。

佐姆巴尔特, 维尔纳(Зомбарт Вернер, 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 布列斯拉夫尔大学教授, 后柏林大学教授。